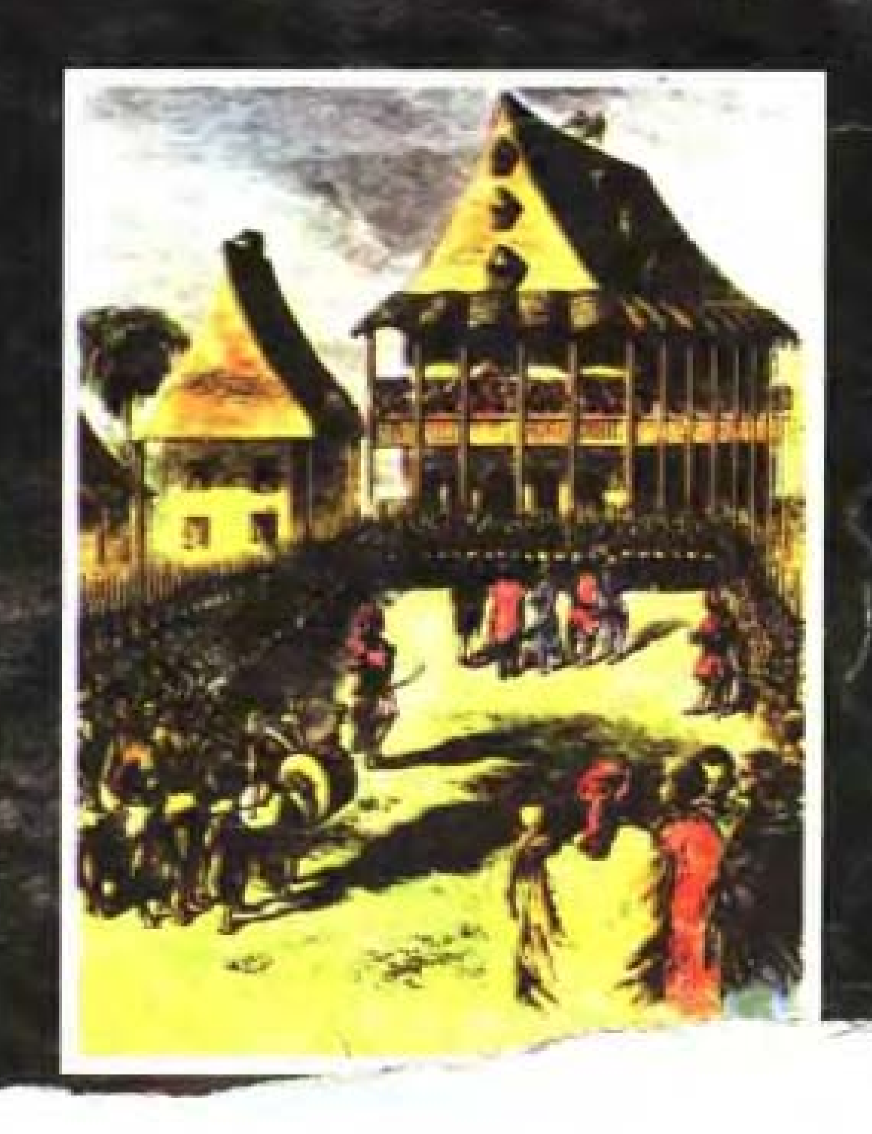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六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主编：J.F.阿德·阿贾伊



UNESCO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至八卷

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将非洲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就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还有许多非非洲人的专家未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史学家们如不摒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生活和国际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互相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相当谨慎地使用非洲的原始资料，以较为严密、客观和无偏见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科文组织所出版的八卷集《非洲通史》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曾热切地重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历史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演变过程。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统一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史学家解释成为非洲学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的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特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关于人类的普遍概念。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非洲通史》对于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关于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显著的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六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J. F. 阿德·阿贾伊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通史　第六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非洲)阿贾伊编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01-0441-3/K・19

Ⅰ. 非…　Ⅱ. 阿…　Ⅲ. 非洲-通史　Ⅳ. K4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155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臧惠娟
封面设计/常燕生
印　　刷/北京云浩印制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43.75
字　　数/1050（千）
版　　次/199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1998 年 4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441-3/K・19　定价：98.00 元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 六 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卷翻译工作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文淳与世界史所彭坤元负责审订。我公司担任本卷译稿审定工作的是臧惠娟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纪 年 说 明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纪年方法。史前年代，可用两种不同方法表示。

一种方法是以当今时代为基准，即距今的年代，以＋1950年为基准年；凡有关＋1950年的年代均为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以基督纪元为基准。凡有关基督纪元的年代均以＋号或－号在年代前表示。提及世纪时，以“公元前”或“公元”代替BC和AD。

现举例如下：

(i) 距今2300年＝－350年

(ii) 公元前2900元＝－2900年
公元1800年＝＋1800年

(iii) 5世纪BC＝公元前5世纪
3世纪AD＝公元3世纪

地 图 图 例

颇勒	民族
恩尤米	国家
迪亚富努	地区
冈比亚河	河流
⚔	战场
▲	山脉
■	教派主寺院
●	城镇
⊙	城市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阿德·阿贾伊，J. F. 和克劳德，M.（编），《非洲历史地图集》，朗曼出版社，伦敦，1985年，©朗曼出版社，伦敦，图3.1，第2卷（第1版），朗曼出版社，伦敦，1974年〔22.1〕

阿伦和汤普森，《远征记事》，伦敦，1848年，〔27.4〕

拉费，阿卜杜勒-拉赫曼，《Açr Mohammad 'A Li》，达尔-纳赫达尔-米克里亚出版社，开罗，1930年，〔13.2〕（第4版），1982年，达尔-马雷夫出版社，开罗，©贾奇·赫尔米·沙欣〔13.3〕

拉费，阿卜杜勒-拉赫曼，《Thawrat Arabi Wal-Ihtelal al-Birtani》，达尔-赫达尔-米克里亚出版社，开罗，1937年（图片最初发表于《The Cutaphic》，伦敦，1882年），〔13.5〕

外交部档案，巴黎，蒙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阁下允许，〔插图4.1〕

阿尔欣，K.，蒙加纳阿散蒂人允许，〔25.1〕

阿诺特·F. S.，《Bihé 和 Garengaze》，J. E. 霍金斯有限公司，1893年，〔12.8〕

©《非洲艺术》，香港，3-4月，1978年，第89页，〔28.1〕

巴伯，N.，《摩洛哥》，泰晤士和哈德森，1965年，门槛出版社，巴黎，〔19.3〕

巴恩，H.，《北非和中非之行与发现》，朗曼出版社，伦敦，1857年，〔20.5〕

巴塞尔传教团档案，〔25.8〕

巴特兰，A.，〔23.1〕

贝内特，N.R. 和布鲁克斯，G.E.（编），《新英格兰商人在非洲：文件中的一段历史，1802—1865年》，波士顿大学出版社，波士顿，1965年，©萨勒姆皮博迪博物馆，马克·塞克斯顿摄，〔9.2〕

贝内特，N. R.，《坦桑尼亚的米兰博》，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71年，©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达累斯萨拉姆，〔10.3〕

宾格，L.，《从尼日尔河到几内亚湾》，阿歇特出版社，巴黎，1892年，〔24.3a〕，蒙鲍德莱恩图书馆允许（架号：710.11.S.8/1），第1卷，第463页，〔25.4(b)〕，第1卷，第17页，〔25.5，25.6〕，第2卷，〔25.7〕

鲍迪奇，F. E.，《从开普沿海要塞到阿散蒂的传教活动》，约翰·默里出版社，伦敦，1819年，〔25.2，25.3〕

布鲁克斯，G.，《19世纪的克鲁水手》，利比里亚研究协会，纽瓦克，NJ，1972年（原载J. L. 威尔逊，《西部非洲》，纽约，1856年），〔24.3b〕

伯顿，R.，《中非大湖区》，朗曼、格林，朗曼和罗伯茨出版社，伦敦，1860年，第2卷，第80页和278页，©皇家地理学会，伦敦，〔10.1，10.2〕

伯顿，R.，《东非最初的足迹》，劳莱杰和基根·保罗有限公司，伦敦，1894年，照片复制：萨索出版社，伦敦，〔15.3〕，英国图书馆复制，〔28.2〕

卡梅伦，V. L.，《穿越非洲》，达尔迪，伊斯比斯特有限公司，伦敦，1877 年，第 1 卷，第 352 页，〔12.1☆〕

塞路里，E.，《Somalia, Scritti vari editi ed inediti》，ⓒIn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罗马，1957 年，第 1 卷，第 xi 页，〔9.1☆〕

《圣公会传教活动探访》，1855 年，〔26.2☆〕

综合图书馆和档案馆藏品，拉巴特，〔18.2〕

科里，J.，《向风海岸观测》，弗兰克·卡斯出版社，伦敦，1807 年，〔24.1☆〕

德夏斯隆·Ch.，《突尼斯摄政时期一瞥》，贝纳尔印刷所，巴黎，1849 年，〔17.3☆☆〕

德纳姆，克拉珀顿和乌德尼，《北非和中非发现游记》，伦敦，1826 年，〔22.3☆，22.4☆〕

德尚，H.，《马达加斯加历史》，Berger-Levrault，巴黎，1960 年，〔16.4☆☆〕，（版权所有）

埃利斯，W.，《三访马达加斯加》，J. 默里，伦敦，1858 年，封面图片，蒙英国图书馆允许，〔16.1，16.6，16.7〕

埃文斯·普里查德，E.，《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派》，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49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17.4☆〕

法格，W. B. 和彭伯顿三世，J.（霍尔库姆，布赖斯编），《西非的约鲁巴雕塑》，纽约，1962 年，ⓒ国家博物馆，拉各斯，〔26.1〕

法国国家博物馆，〔17.5〕

弗雷，科洛内尔，《非洲西海岸》，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巴黎，1890 年，〔20.1☆〕

甘米托，A. C. P.（I. 坎尼森译），《卡曾贝国王》，阿提卡出版社，里斯本，1960 年，ⓒ阿提卡出版社，里斯本，〔12.4☆〕

哈里斯，W. C.，《埃塞俄比亚高原》，朗曼出版社，伦敦，1844 年，〔15.6〕

欣德雷尔，A.，《约鲁巴兰十七年》，伦敦，1872 年，英国图书馆，伦敦，〔26.3〕

霍尔特，P. M. 和达利，M.，《苏丹历史》，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伦敦，1979 年，蒙国家信托公司，金斯顿·莱西，班克斯·姆斯允许，〔14.1〕，蒙乔治·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有限公司（伦敦）允许〔14.2〕，ⓒBBC 赫尔顿图片馆，〔14.7〕

伊基梅，O.，《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商界王子：贝宁河的末代统治者纳纳·奥洛穆的兴衰》，海涅曼出版社，伦敦，1968 年，〔27.2☆〕

黑非洲基本问题研究所（I. F. A. N.），达喀尔，〔23.2，23.3〕

约翰斯顿，H. H.，《英属中部非洲》，格林伍德出版社，伦敦，1897 年，〔3.1☆〕

约翰斯顿，H. H.，《英属中部非洲》，梅休因公司，伦敦，1897 年，第 92 页，〔8.1☆〕，第 93 页〔8.2☆〕，第 421 页，〔8.3☆〕

朱利安，Ch. A.，《阿尔及利亚现代史：征服与殖民化》，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64 年，〔17.1☆☆，17.2☆☆，19.2(a-b)☆☆〕

拉鲁伊，A.，《摩洛哥民族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根源》，马斯佩罗，巴黎，1977 年，〔18.3〕

勒费弗尔，T.，《阿比西尼亚之行，1845-1854 年》，巴黎，照片复制：萨索出版社，〔15.1，15.2〕

林·罗斯，H.，《伟大的贝宁，习俗、艺术与恐怖之物》，金斯父子公司、哈利法克斯，1903

年，(原载：《Globus》，1897，第1卷，第XXII页)，〔26.4，26.5☆，27.1☆〕

梅奇，E.，《西苏丹游记》，阿歇特出版社，巴黎，1868年，ⓒ阿歇特，巴黎，〔23.4，23.5〕

马格亚，L.，《1849至1857年南非之行》，佩斯与莱比锡，1859年，〔12.5☆，12.6☆〕

姆博科洛，E.，《赤道非洲的黑人与白人》，高等社会科学大学出版社，巴黎，1981年(图片复制根据贝利，格里丰，"加蓬"，《周游世纪》，1865年)〔27.5，27.6〕

迈尔斯，S.，《英国与终止奴隶贸易》，朗曼出版社，伦敦，1975年，ⓒ伦敦新闻画报图片库，〔4.2〕

莫利安，G.，《非洲内地之行》，伦敦，1820年，〔24.2☆〕

埃塞俄比亚研究所博物馆，亚的斯亚贝巴，〔15.7〕

图卢兹博物馆，ⓒ让·迪厄扎德，图卢兹，〔18.1〕

凡尔塞博物馆，照片档案馆，旧城集团出版社，巴黎，〔19.1〕

穆蒂布瓦，Ph.，《马尔加什与欧洲人》，朗曼出版社，伦敦，1974年，新闻出版管理处，信息部；马达加斯加，〔16.2(a-f)，16.3〕

纳克蒂加尔，G.，(费希尔，A.G.B和H.J.译、编)，《撒哈拉与苏丹》，赫斯特，伦敦，1974年，第1卷，ⓒ赫斯特，伦敦，〔20.2☆，20.3☆〕，第2卷，1980年，〔22.2(a-c)☆，22.5☆〕

ⓒ国家军队博物馆，伦敦，〔7.1〕

尼日尔信息服务中心，尼日尔大使馆，巴黎，〔27.3〕

奥麦尔-库珀，J.，《祖鲁人的结局》，朗曼出版社，伦敦，1966年(原载加德纳，A.F.，《祖鲁国游记》，伦敦，1836年)，ⓒ幻灯片中心有限公司，〔1.1〕(原载利文斯敦，D.和C.，《赞比西河考察记》，约翰·默里出版社，伦敦，1865年)，〔8.4☆〕

佩特里克，J.和K.，《中非之行》，廷斯利兄弟公司，伦敦，1869年，〔14.5☆〕

照片档案馆，旧城集团出版社，巴黎，〔19.4〕

照片档案馆，人类博物馆，巴黎，ⓒ〔26.6(a-b)〕

波格，P.，《Muata Jamvo的帝国》，柏林，1880年，〔12.10☆〕

波特，A.T.，《克里奥尔状况》，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63年，蒙对外和联邦事务部图书馆允许，〔3.3〕

雷松-儒尔德，F.，《马达加斯加的君主》，卡尔塔拉出版社，巴黎，1983年，科学收藏品博物馆格兰迪迪埃基金会，津巴扎扎，塔那那利佛，〔16.5〕

拉萨姆，H.，《英国传教团拜会阿比西尼亚国王蒂奥多雷记》，默里，伦敦，1869年，图片复制：萨索出版社，伦敦，〔15.4，15.5〕

罗歇·维奥尔特，H.，ⓒ阿尔兰盖-维奥尔特，巴黎，〔28.4〕

罗尔夫斯，G.，《我在阿比西尼亚的使命》，莱比锡，1882年，图片复制：萨索出版社，伦敦，〔15.8〕

桑德斯，C.，《非洲历史上的黑人领袖》，海涅曼出版社，伦敦，1978年(原载约翰·艾特肯·查尔默斯，《蒂约·索加，南非传教活动的一页》(第1版，1877年)，〔3.2〕

施瓦因弗思，G.，《非洲心脏》，桑普森，洛，马尔斯顿，洛和塞尔，伦敦，1873 年，第 1 卷，卷首插图，〔12.3☆，14.3☆☆，14.4☆，14.6☆☆〕

斯诺克·赫格隆杰，C.，《19 世纪下半叶的麦加：日常生活、习俗和学术活动：东印度群岛的穆斯林》，E. J. 布里尔，莱登，1970 年，ⓒE. J. 布里尔，〔28.3☆〕

斯坦利，H. M.，《穿越黑色大陆》，桑普森，洛，马尔斯顿，洛和塞尔，伦敦，1878 年，第 1 卷，第 89 页，〔11.1☆☆，11.2☆〕，第 474 页，〔11.3☆〕，第 332 页，〔11.4☆〕

沙利文，G. L.，《在桑给巴尔水域游弋的独桅三角帆船》，弗兰克·克拉斯出版社，伦敦，1873 年，ⓒ弗兰克·克拉斯出版社，〔4.1☆〕

泰布勒，E. C.，《巴罗策兰初期的贸易与旅行》，查托和温德斯，伦敦，1963 年(原载埃米尔·霍勒布，《南非七年》，第 2 卷，桑普森，洛，马尔斯顿，塞尔和里宾顿，伦敦，1881 年)，〔8.5☆，8.6☆☆〕

ⓒ曼塞尔收藏品有限公司，伦敦，〔13.4〕

ⓒ塔特画廊，伦敦，〔13.1〕

范西纳，J.，《非洲艺术史》，朗曼出版社，伦敦，1984 年，ⓒ民俗博物馆，慕尼黑，〔6.1〕，ⓒ扎伊尔国家博物馆图片研究所(IMNZ)，编号：73.381.1，73.381.2，70.8.2(从左至右)，〔12.2〕，ⓒ沃尔特斯艺术画廊，巴尔的摩，〔12.7〕，ⓒ民俗博物馆，柏林，〔12.9〕，ⓒ沃纳·福尔曼档案馆，伦敦，〔20.4〕，ⓒ弗罗本纽斯研究所，〔25.4(a)〕

☆ 蒙剑桥大学图书馆评议会特别委员会委员允许。

☆☆ 蒙巴黎国家图书馆允许。

22.1，27.5，27.6 等图片未能找到版权持有者，深表遗憾，欢迎提供有关信息。

序 言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各时期的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还有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未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来源，然而对非洲人的口头传说，即对各族人民关于他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线索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是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像非洲各族人实际走过的道路，倒像是作者想当然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总是参考过去欧洲的行事。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史学家们如不摈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此外，非洲大陆几乎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历史实体。相反，却强调这个，强调那个，使人相信，自远古以来"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就处于分裂状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人们常把撒哈拉说成是不可通过的地方，使得任何种族集团和民族都不能融合，使沙漠两侧壮大起来的社会集团也不能交流物资、信仰、风俗和思想。在古埃及和努比亚的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划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历史，同地中海沿岸历史的联系，确实比它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历史的联系密切。但是现在普遍承认，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多么不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各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分支，而这些民族和社会是被具有悠久历史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

严重危害客观研究昔日非洲的另一种现象是，随着贩卖奴隶和殖民化出现的种族成见，随之又产生了轻视和无知，而这种成见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使他们把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都歪曲了。自从被认为是上等人的殖民主义者广泛使用"白种"和"黑种"这个标签的观念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就不得不起来斗争了，他们既反对经济上的奴役，也反对心理上的奴役。非洲人由于肤色易于辨认，于是变成了商品，在他们身上打戳记、让

他们从事繁重劳动，最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就是想象的所谓劣等尼格罗种的象征。这种伪造的鉴别模式，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降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文化和历史事实的理解必然受到歪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生活和作为其存在理由的相互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相当谨慎地——使用非洲的原始资料，以较为严密、客观和虚心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在行使其历史主动权的时候，非洲人自己也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其社会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八卷集《非洲通史》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是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曾热切地重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历史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演变过程。

为了进行这一繁重任务，教科文组织不得不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因为资料的浩繁和文件的零散使得这一任务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第一阶段是从 1965 年到 1969 年，专门搜集文件资料和制定工作计划。业务工作是在现场进行的，包括着手搜集口头传说，建立口头传说的区域文件中心，搜集未出版的阿拉伯文和阿雅密文(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一些非洲语言)手稿，编辑档案目录和《非洲历史资料指南》，这部《指南》是根据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材料辑成的，以后分九卷出版。此外，还组织了多次会议，使非洲和其他各洲的专家一起讨论编史方法问题，经过认真审查现有资料以后，确定了工作大纲。

第二阶段是从 1969 年到 1971 年，专门用来使《非洲通史》具有雏形，并把不同部分连接起来。1969 年和 1970 年分别在巴黎和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两次国际专家会议，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关编写和出版《非洲通史》的问题：分八卷出版，主要版本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斯瓦希里、豪萨、富拉尼、约鲁巴或林加拉等非洲语文版，还将出版德、俄、葡、西、中文版，以及面向非洲和国际广大公众的缩写本。

第三阶段是实际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阶段内，首先任命了由 39 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非洲以外的人，它承担《非洲通史》编审方面的全部职责。

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并且以多方面的研究和各种资料来源为基础。其中首先是考古学，因为它掌握了非洲文化和文明史的许多关键。由于考古的研究，现在人们承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和历史上首批技术革命的发祥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证明，埃及是世界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所在地。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材料来源是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极有价值的工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我们十分感激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员，以及各卷各章的编辑和作者，感谢他们真实而全面地说明了昔日的非洲，感谢他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来研究实

质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列举以下几个：贩卖奴隶，这是一个“流血不止的创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大规模强制迁移，它耗尽了非洲大陆的元气，与此同时，却大大发展了欧洲的经济和商业；殖民化给人口、经济、心理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后，非殖民化和建设国家的进程，这激发了当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激情，他们至今有时还很活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很注意真实性和严谨性，这是《非洲通史》的一大优点。《非洲通史》对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显著的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非洲通史》指出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方法不当，要求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像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一样，《非洲通史》为继续大量研究各种专题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因此，国际科学委员会与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决定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一些专题，以便对非洲过去的某些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在“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和文件集——非洲通史”丛书中正在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非洲通史》的有益补充。还将努力编写有关国别史或分地区史的著作。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团结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史学家孤立地拼凑成为非洲学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的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特性，从面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的普遍概念。虽然在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差别，但是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西半球某些国家的感觉、思维、想象和行为的方式，都有从非洲继承的标志。从美国南部到巴西北部，跨越加勒比地区以及在太平洋沿岸，非洲文化遗产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这种文化遗产甚至加强了居民某些最重要成分的文化特性。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到，并且流传下去。

我当过教师，并且从独立的早期起，担任过西非和中非几个国家第一个史地课程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为了教育青年，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情况，由洞悉各种问题和非洲未来的专家以及了解非洲大陆全面情况的专家编写一部史书，是多么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教科文组织作出保证，用多种文字出版《非洲通史》，广为发行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和编排广播电视节目。非洲以及其它地区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包括小学生和大中学生，从面可以更真实地了解非洲大陆的过去以及说明过去的各种因素，还可以更公正地理解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因此，这部《非洲通史》将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正义、进步、和平。这就是我最诚挚的希望。

我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各位委员、报告员、各卷编辑、作者和所有参加这部巨著写作的人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完成的著作和所作出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具有不同背景，但在为普遍真理服务过程中怀有同样的善意和热情的人能够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国际体制内，完成一部具有巨大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著作。我同样感谢各组织和各国政府，承蒙它们热心帮助，教科文组织得以出版不同文种的《非洲通史》，从而保证这部著作具有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影响，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

编写计划说明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B. A. 奥戈特

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大会责成总干事主持编写《非洲通史》。1970年，执行局成立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971年通过的章程，本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不是非洲人)，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在本委员会任期内以个人身分进行工作。

本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本书的主要特点。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各点：

(a) 虽然《非洲通史》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最高科学水平，但是它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而是一部摆脱教条主义的综合性著作。它将在许多方面，说明一些问题，叙述当前对各种问题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它毫不迟疑地提出存在的不同观点。这样，它就为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b) 在这部著作中，非洲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目的是说明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而迄今为止所出版的著作往往把它分成若干部分。非洲同其它大陆的历史联系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互相交流和多边影响的角度分析这些联系，以便恰如其分地说明非洲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c)《非洲通史》特别是一部思想、文明、社会和制度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范围很广包括口头传说和艺术形式。

(d)《非洲通史》实质上是从内部来观察的。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文明的忠实反映。虽然这部著作要在国际范围内编写，并充分吸取现有科学知识，但承认非洲的遗产也非常重要，还应该说明有利于非洲大陆团结的各种重要因素。致力于从内部观察事物的做法是本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因而除了科学质量而外，还应使这部著作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反映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通史》能为一个专心从事经济和技术斗争的时代提供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准则概念。

本委员会决定，涉及三百多万年非洲历史的这部著作分八卷出版，每卷约有八百页正文，内附插图、照片、地图、图表。

每卷由一名主编负责，必要时配备一名或两名副主编。各卷编辑均由本委员会从委员中或从外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产生。各卷主编和副主编根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计划进行工作。在科学性问题上，他们在各卷内容、文字定稿、插图，总之，就《非洲通史》的全部科学技术方面对本委员会负责，或在两届会议之间对本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审定最后文稿。在办公室认为文稿可以交付出版时，将文稿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而本

委员会，或在两届会议之间由办公室对本书负完全责任。

每卷约三十章。每章由一名主要作者执笔，必要时由一两名合作者协助。作者由本委员会根据其简历遴选。对非洲作者，给予优先考虑，但他们必须具备应有的资历。此外还尽可能保证，在作者中，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以及与非洲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其它地区有同等代表。

在每卷编者审毕各章文稿以后，文稿送交委员会全体委员征询意见。此外，编者将每卷待审文稿送交审读委员会，审读委员会是按照委员的专业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内部设立的。审读委员会对各章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办公室最后审核文稿。

这种程序看来时间长，涉及面广，但已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保证《非洲通史》的科学客观性。事实上，确有几次，办公室不同意原稿内容，或是坚持作重大修改，甚至另请作者重写某章。有时要去请教精通某一阶段历史或某一问题的专家，以便对某卷内容进行最后定稿。

本书将先出版英、法、阿拉伯文的精装本，然后再出版这三种文字的平装本。英、法文的节本将译成非洲各种文字。本委员会已选定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作为第一批非洲文字来翻译本书。

此外还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出版《非洲通史》的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

因此十分明显，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对于非洲史学家和广大学术团体，以及对于正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教科文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编写这样一部非洲大陆历史肯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以往三百万年，要利用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而且要动用不同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学者参加。这是一部全大陆的国际性多学科巨著。

总之，我要强调这部著作对非洲和对世界的重大意义。正当非洲各族人民为团结和进一步合作进行奋斗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了解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源泉。

非洲通史　第六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

第 一 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主编　J. 基-泽博）

第 二 卷　　非洲古代文明
（主编　G. 莫赫塔尔）

第 三 卷　　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
（主编　M. 法西）
（助理主编　I. 赫尔贝克）

第 四 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主编　D. T. 尼昂）

第 五 卷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
（主编　B. A. 奥戈特）

第 六 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主编　J. F. A. 阿贾伊）

第 七 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 年
（主编　A. A. 博亨）

第 八 卷　　1935 年以后的非洲
（主编　A. A. 马兹鲁伊）
（助理主编　C. 旺济）

目　录

M. 奥莫勒瓦(Omolewa)协助本卷主编工作

插 图 目 录

图片目录

1 19世纪初的非洲：问题和前景

J. F. A. 阿贾伊

前　言

本卷《非洲通史》拟对欧洲人在非洲进行"大角逐"和建立殖民统治之前的19世纪非洲历史作一概述。这个被称为"殖民地前的世纪"[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非洲历史重新解释的问题，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将这方面的努力推向高潮。自从认为非洲历史的变化不是起始于殖民地时期，便已对前一个世纪给予极大的关注。19世纪一系列有革命意义的重大事件和变革——诸如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埃塞俄比亚在皇帝特沃德罗斯和曼涅里克统治下的重新统一，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索托-恩古尼族诸国的"姆菲卡尼"（Mfecane），西部非洲的"圣战"运动，都曾是许多学术著作研究的主题，也是本卷各章论述的内容。然而，对于19世纪的主要特征，以及整个19世纪在非洲史研究工作中的意义，至今仍存有争议。 1

第一个问题，由于这个时期可靠的口头材料相当丰富，欧洲人这时期在非洲广泛活动而写出的新的文字资料也很多，诸如欧洲旅行家、传教士、商人、领事官员和深入大陆腹地的各种代理人编写的报道，而且往往是首次发表。所以，对19世纪非洲许多地方的情况已有较多的了解，而且也比先前各个时期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有一种倾向，正如口头传说中的情况那样，把非洲沦为殖民地之前整个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变化全都纳入19世纪这一备受重视的时代。幸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前几卷已就先前各个时期非洲变革的动力作了论述，非洲静止不变的"神话"早已破产。然而遗憾的是，仍有一种假设的推论坚持说，19世纪的变化必定不同于先前各时期的变化，而且只能用前所未有的因素来解释。因此，现在重要的是认真进行考察研究，了解究竟19世纪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是18世纪业已发生的变化的延续，又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因素，即欧洲人日益频繁的活动以及非洲经济与世界体系的日益融合。 2

把非洲"殖民地前的世纪"的变化过分地（即使不是一概地）归诸欧洲人日益频繁的活动，这种倾向正是这时期非洲历史研究工作中的第二个问题。至于非洲经济日益与世界体系相融合，不仅经常被视做是引起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事实上已被认为是这时期非

① P. 柯廷（Curtin）、S. 费尔曼（Feierman）、L. 汤普森（Thompson）和J. 范西纳（Vansina），1978年，第362页。

洲历史压倒一切的主题。19世纪不仅被看做是殖民地时期的前奏，而且实际上就是殖民地时期的开端。按照已故K.O.戴克博士关于“贸易和政治”的论断②——“西部非洲的近代史主要就是五个世纪以来同欧洲各国通商贸易的历史”——海外贸易、商路的变化，以及内地市场网络和供海外贸易需要的长途贸易，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19世纪非洲历史的主要动因，即使不是唯一的动因。按照这种说法，埃及的变化应归因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影响，而非早在18世纪就已形成的各种内因的总和所造成的，这些内因促成了以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民族运动，当时穆罕默德·阿里正致力于复兴埃及，以抵制奥斯曼帝国强化其直接统治的企图。同样，按照这种说法，“姆菲卡尼”只能含糊地说成是欧洲人来到非洲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既包括在开普殖民地东部边境施加压力，也包括企图分享与葡萄牙人在德拉瓜湾做生意所得的利益，而非归因于北部恩古尼人社会的内部动力。19世纪初上述这些突出事件，加之西部非洲的“圣战”运动以及埃塞俄比亚新的动荡局势，十分引人注目，看来要求做出一种全面的解释。③然而，如果不从非洲社会的内部动因中寻求答案，欧洲的工业化和世界经济对非洲的影响便很容易成为另一种假说。

因此，本章作为这一卷《非洲通史》的绪言，有必要集中探讨19世纪初的非洲，研究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和倾向，揭示先前时期延续动因的性质和范围，明确哪些是新事物和新起点，并由此展望今后的趋势。本卷《非洲通史》只有一开始就紧扣这个论题，才能最终抓住19世纪非洲发展过程的本质，才能明确欧洲因素作为“非洲社会、技术、文化和道德标准诸方面发展的必要前提”④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或非洲未能充分发展的主要原因。

人口和人口流动

到1800年，非洲人口各聚居区已完成主要语系和文化的区分，表明他们对自己所持有的土地拥有权利。⑤实际上，这一历程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完成于16世纪，到19世纪已经不同程度地巩固和稳定了。只有非洲之角、东部非洲（大湖区中部高原以外）和马达加斯加，居民大量迁移到人口较少地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7世纪和18世纪。即使是这些地区，到19世纪初，居民在控制土地方面也趋于稳定。

这里，“迁移”一词的含义是指大量居民经过漫长的时间在广阔的地区长途流动的非正常运动。从另一个角度讲，原有居民在谋生过程中经常处于流动状态，或是牧民季节性迁

② K.O.戴克(Dike)，1956年，第1页。他的论断不无言过其实之处，即使他本人关于19世纪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分析也强调了变化的内因。对“贸易与政治”论点的批判可见S.I.穆登盖(Mudenge)，1974年，第373页——“一旦对外贸易的存在得到确认，其后果是可以设想的；关于它对政治体制的实际影响和对某个国家中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分析就变得毫无必要，而集中努力对商路与销售如何组织和货物有哪些种类进行阐述”。

③ 参阅I.赫尔贝克(Hrbek)1965年的试探性见解(发表于1968年)。他说，“1805至1820年期间，非洲连续发生如此之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实在令人惊奇；虽然这些事件相互间各不相关，却在非洲史上形成一种独特的动向”。他所列举的事件有：西部非洲“富尔贝人的革命”、“祖鲁人的起义”、“布干达人的起义”、“穆罕默德·阿里创建现代埃及”、“马达加斯加的伊梅里纳人的统一”、“东部非洲沿岸阿曼人霸权的建立”、“奴隶贸易的废除”。见I.赫尔贝克，第47-48页。史学家们现已发现一种纵贯非洲大陆的综合现象，很容易以此对非洲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渐进过程作出共同的解释。

④ T.霍奇金(Hodgkin)，1976年，第11页，指他对所谓“帝国主义行政官兼学者”的看法。

⑤ 此节主要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5卷，第3章和第8卷，第18章。

移，或是农民实行耕地和休闲地轮耕，或是猎人和采集者在限定的地区之间寻求猎物、蜂蜜和椰果，或是渔民在不同季节随鱼群而流动，或是手艺人(如铁匠)和商人到远方谋生。这一类流动，应当说是常规的人口流动，通常有别于众多人口长期离乡背井、流离失所、长途跋涉的迁移运动。此外，相对土地占用格局而言的人口压力，可能是由于一时的相对繁荣引起人口的正常增长，也可能是由于战乱和原有政治制度瓦解而产生的被迫迁移，还可能是由于邻区长期干旱、瘟疫或生态灾难，这也会引起人口因源流而膨胀。19世纪时这类人口流动屡见不鲜。有几次是由1800年前业已开始的行动所触发，诸如赤道非洲森林地带芳族人的迁移；另外几次则是19世纪贸易机会和经营格局的结果，诸如安哥拉部分乔奎人的迁移。最引人注目的人口流动都与国家制度的兴衰相关。其中有些是以地方性为基础的，如西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的迁移，它是旧奥约帝国崩溃的结果；也有以次大陆范围为基础的，诸如南部非洲纳塔尔地方北恩古尼人的迁移，它是"姆菲卡尼"的余波。这类人口流动往往使某些地区的占领和开垦成为必要，其中有相对贫瘠的地区，也有适合技术发展和种植新作物的新环境。

19世纪初非洲人口总数通常估计为一亿。这个数字，除根据原来粗略的估计外，还参考了1950年以后人口统计方面贫乏的资料。实际的数字也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关键性的重大事件总是关系到人口的发展趋向，人口发展趋向与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影响，关系到与土地资源和农业开发相关的人口地区分布状况。

人口学家一般的假定是，考虑到当时的农业制度、技术水平、卫生状况和导致婴儿过量死亡的疾病，总的人口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一般说来，每年增长0.5%(目前为2.5%-3.5%)，这就是说，估计每一千人中出生比死亡多50人。按照这一估计在一千年内，人口可能翻一番。由于北部非洲人口稳定，而且沃土地区和绿洲实行精耕细作，且灌溉发达，在经济繁荣时期人口稳定增长，但旱灾和瘟疫流行年代人口又减少，两相平衡，人口勉强保持稳定。在西非苏丹人居住的草原地区、在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居民不断改进技能以适应当地环境，维持放牧者和农耕者共生状态，或发展足以维持人口常年增长的农业多种经营制度。同样，在大部分森林地带，也建立了农业体制，足以维持人口正常增长，到18世纪时，在某些地区(诸如下卡萨芒斯地区、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格博人居住区、喀麦隆草原和东部非洲的大湖区)人口已经相当稠密。

然而，除了偶尔发生的自然灾害，整个奴隶贸易时期以及因奴隶贸易而发生的破坏性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特别是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育龄妇女人口的损失，才是17世纪和18世纪非洲人口总数下降的真实原因。可是，人口损失的程度各地并不平衡，损失最为严重的是那些缺乏自卫能力的地方，当时集中在非洲西部和中西部。

因人口损失所造成的后果有待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它仍是一个引起人们思考和积极争论的问题。[6]虽然如今人认为，在资源贫乏、生产能力停滞或缩减的背景下人口迅速膨胀，是社会不发达的最主要特征之一，[7]在依附性经济结构的条件下也确实是如此。但是，在19

---

⑥ 见J.E. 伊尼科里(Inikori)(编)，1982年a；特别是J.E. 伊尼科里，1982年b，第29-36页。

⑦ L. 瓦朗西(Valensi)，1977年，第286页。

世纪初期经济活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人口不足肯定是社会不发达的一个因素。某些经济看来是因奴隶贸易而获益，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与近邻地区相比较，它们能够利用邻邦的弱点来保持活力，从而维持相对的繁荣，较长期的繁荣又足以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导致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进一步发展。可是，即使是这些地区的社会也免不了由于邻邦的贫困和边境的不稳定而遭受灾祸。任何人都无法躲避奴隶贸易和随之而来的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大量流失的悲惨后果——社会和经济遭受严重创伤，陷人全面萧条。[8] 看来，奴隶贸易最能解释非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整个大陆的政治经济结构，为什么到19世纪初仍然如此不稳定和脆弱。国家体制和疆界的不断变更以及政治中心的兴衰无常，好像一股起伏不定的潮流在起作用。即使按当时的农业技术和土地利用标准来看，非洲仍有大部分土地未得到合理开发。

19世纪的全面人口状况也并没有突发的变化。取缔奴隶贸易迟迟未见效果。初期的影响主要是使奴隶的出口集中到少数几个港口，总贩运量并未减少，直到1850年之后奴隶贩运量才明显地削减下来。然而，当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减少之时，向桑给巴尔和印度洋的出口却在增加。而且，替补性出口贸易的兴起又使家用奴隶(可用于采集和运输象牙、棕榈油、花生、蜂蜡、丁香以及后来的棉花和生胶)需求量大为增加。因此，在19世纪，随着起严重破坏作用的采集业的发展，大陆内部的奴隶贸易以及对奴隶劳力的需求迅猛发展。有一种说法认为1830年前的安哥拉和1880年后一个时期的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有些地方人口减少了一半。然而，奴隶贸易的废除，毕竟使非洲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有所遏止，自17世纪以来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口发展趋势在19世纪初第一次有所回升，[9] 1850-1880年间急剧下降，殖民统治建立初期，仍属非洲人下降趋势，接着渐渐出现回升，到20世纪30年代明显上升。19世纪初期的人口增长既有其内因，也有其外因，它成了一个重要的变革因素，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等地区，那里在18世纪很少或没有受到奴隶贸易的影响。

欧洲人对非洲的关注日趋强烈

无论对1800年非洲的实际人口和19世纪初人口统计可能上升的影响有多大疑问，欧洲人对非洲的关注日益加强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只是这种不断加强的关注作为非洲历史上一个变革因素究竟影响有多大，人们往往言过其实。

在18世纪后期的探险活动中，欧洲人开始表现出对非洲的关注。当时的探险活动是了解非洲主要地理特征(主要河流的源头、山脉和湖泊的位置)、人口分布情况、主要邦国和市场、重要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确切情报。另外，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海上强国英国遏制法国扩张的行动，所有这些事件都波及非洲。法国占领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作为进人远东的通道。英国则夺取了荷兰殖民地好望角。此后，不断取得胜

[8] J.E.伊尼科里，1982年b，第51-60页。
[9]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7卷，第18章；另见J.C.考德威尔(Caldwell)，1977年，第9页。

利的英国海军在日益扩大的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中担当了一项使命，即提供一切必要的机会以干涉非洲事务。1807年，英国政府开始禁止英国贸易商从事奴隶贸易，并将弗里敦的获释奴隶定居地改建为王室殖民地，同时作为西部非洲海上进行反奴隶贸易活动的基地。法国虽然被赶出埃及，但仍继续寻求商业优势，设法利用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在北部非洲日趋衰弱的局面，在马格里布以反海盗活动为借口，企图以此获利。遭到失败后，法国不得不加入废除奴隶贸易的行列，这又给它提供一个理由，借以表明它十分关心在西部非洲开辟海岸基地和建立商业据点。于是，在19世纪非洲政局中就出现了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和传教士两个因素，同时，欧洲人还在寻求新的贸易途径以代替可耻的奴隶贸易。 7

有一点十分重要，即不要夸大19世纪初欧洲人在非洲的势力范围，也不要夸大1850年前欧洲人攫取"属地"或渗入非洲内地的进度。当时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提出了广泛的领土要求。他们在安哥拉内地建立了军事据点和"普拉佐"(prazo，农庄)，除在安布里什和木萨米迪什之间的沿岸设立一系列贸易据点外，还逐步控制了从洛吉、宽扎以南，一直到东面卡桑杰的地区。在莫桑比克，到1800年，葡萄牙人有效控制的只限于莫桑比克岛，其它地方则更多地是依靠巴西人和混血种商人，而不是葡萄牙官吏。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奴隶需求量明显增加，这转移了原来对普拉佐制度的注意；同时，商路安全也更多地依赖贩运巴西商货的混血种赤脚商人(pombeiro)，并且只有在非洲统治者和当地商人欢迎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下去[10]。1815年之后，法国恢复了它在塞内冈比亚地区的贸易据点，主要是圣路易和戈雷埃，法国人曾冒险在瓦阿洛建立一个农场，并在巴克尔设一军事哨所以保护农场，但这一计划没有成功。在北部非洲，1830年法国人占领了阿尔及尔，此后经过整整20年才镇压了埃米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领导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抵抗运动。英国人已经确立了弗里敦的地位，并在其邻近半岛上建立了中心村庄，以促使获释奴隶与克里奥尔人同化。随着经济日趋繁荣和克里奥尔人扩展到巴瑟斯特(今班珠尔)、巴达格里、拉各斯和以外地区，英国商业势力和传教士也沿着海岸扩张，并且在1850年前后在阿贝奥库塔等一两个地方开始向内地渗透。在黄金海岸(今加纳)，英国人仍同丹麦人和荷兰人合伙经营贸易，竭力抵制企图统治海岸地区的阿散蒂(阿尚蒂)人，其惯用手法就是利用芳蒂人对阿散蒂统治的恐惧心理，鼓励芳蒂人在英国的监护下采取联合行动。在南部非洲，英国农民移居纳塔尔的企图并未得逞，可是开普殖民地却大大扩大；该殖民地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桀骜不驯的"乘牛车的布尔人"(trekboer)迁入内地，英国统治当局不得不紧随其后，保护布尔人不被新成立的非洲国家消灭，同时充当仲裁者或实际统治者。然而，直到1850年，南部非洲仍旧是一块贫穷农民的殖民地，他们内部分裂，经常受制于近邻非洲人，而后者当时也同样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8

有不少地方企图仿效英国人在弗里敦的成功经验，如美国人在利比里亚的定居地，法国人在利伯维尔(今加蓬)的定居地，还有英国人在东部非洲的另一处定居地弗里尔敦。英、法两国对印度及印度洋周围各地——亚丁、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桑给巴尔新素丹国——的关注日益增强，这很快就在东部非洲引起反响。然而，必须着重指出，欧美殖民者是由

[10] A. F. 伊萨克曼(Isaacman)，1976年，第8-11页。

海路而来，他们集中在沿海一带。1850年以前，欧美殖民势力向大陆内地的渗入尚不明显，而19世纪初非洲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埃塞俄比亚的复兴、“姆菲卡尼”运动、西部非洲的“圣战”，却都发生在大陆腹地，只有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例外。

传教活动作为一个因素，对英国人在弗里敦的显著成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德意志传教士——多半来自巴塞尔的教会，加上几个来自不来梅的教士——不失时机地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克服了虔诚教徒的犹豫态度，参与了英国殖民地的政治活动。他们作为传教士与英国同事一样有机会做农场经理、语言通译、教师、建筑师和推销商。传教士们设置了若干传教站，有影响的个别传教士还深深卷入当地政治事务和种族纠纷，但没有取得弗里敦那样的成就。到处都有传教团体，少数带头的传教站还创办了初级教育、语言教育，可望在以后取得成果。然而，作为非洲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基督教传教士活动在19世纪上半叶并未取得该世纪下半叶那样大的作用。1850年，戴维·利文斯敦刚刚开始他的首次传教旅途。圣神会创建于1847年，非洲传教会则成立于1863年。

19世纪上半叶，欧洲贸易势力比传教活动发展得迅速，影响也更为广泛。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的新兴贸易源自19世纪之前的奴隶贸易，是它派生的产物。合法贸易的先驱竟然是过去的奴隶贩子，甚至在当时也仍然是奴隶贩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新兴的贸易结构与旧的贸易十分相似。19世纪下半叶的贸易，越来越依靠法定货币进行交易，可是在上半叶，棕榈油、花生、象牙和丁香的贸易则依赖内陆奴隶贸易和信贷制度，也就是说，作为保护投资和保证交货的必要手段，商货贷款交托给较大的非洲商贩。长期以来，欧洲贸易商都停留在沿海一带，由非洲商贩把货物运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或者是由沿海地区的非洲人充当掮客，受托将货物运往内地出售，换得土产品运回海岸，或者是由混血种赤脚商人(pombeiro)、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商人经营这类交易，从而将新兴贸易纳入19世纪前的贸易结构。比之先前采购奴隶再卖给欧洲人的商贩，更多的非洲人卷入了采集椰子、阿拉伯树胶、蜂蜜以至象牙的活动。同时，在沿海主要的商贸区和沿商路一带，人口成分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从非洲人口中补充政治精英的方式也有了变化。显然，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助于军人集团的兴起，军人们迫切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克里奥尔人中也有一部分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富商，在向19世纪70年代迈进的过程中，他们的人数和重要性不断增加。但是，社会变迁的速度和范围不能过分夸大。传统的统治者和酋长们不会轻易放弃特权。相反，他们随时都可能依靠少数军人来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某些时候甚至依靠受雇的欧洲人或克里奥尔贸易商。在当时的体制范畴内，军人和克里奥尔商人相互间不断争权夺利，竭力谋求分享特权。这些人征募大批奴隶和仆从，聚敛财富，并通过行贿买得有权势的职位。因此，商品种类虽然多样化，但贸易格局并没有本质的变革，所以并未引起预期的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是如此。

欧洲人的贸易迅速扩大。[11] 扩张成为可能，主要是依赖于地方或地区贸易的既有格局。必须着重强调，一系列问题均由此产生。首先，地方或地区的贸易格局，自然在很大程度

---

[11] 见P. 柯廷、S. 费尔曼、L. 汤普森和J. 范西纳，1978年，特别是第369-376页、第419-443页，其中有一篇集中阐述非洲沦为殖民地之前的世纪的概况，颇有用处。

上依赖于非洲社会内部的动因，特别是农业、手工业和作坊的生产体系，而不是靠外来的刺激。其次，与内部贸易相比较，对外贸易——至少在初期——对大多数非洲人民的生活而言，毕竟是第二位的。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它从外界带来了关键性的因素，会改变那些掌握它的以及没有掌握它的人们的命运。现在还很难拟定一个尺度来衡量它作为非洲统治者的一种财源，或者作为别处得不到的关键性商品的来源究竟起多么重要的作用。对大多数非洲邦国来说，关键性商品中最重要的就是火器。欧洲人从他们的私利出发力求操纵火器交易，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政策往往使贸易作为火器来源的实际重要性，远远超出许多非洲统治者的估计，因为拥有武器未必就能掌握军事优势。 10

因对外贸易的增长而产生的第三个问题，是它的重要性不仅与非洲内部的地方或地区相关，而且还与农业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在 19 世纪初期，不论某个统治者对外贸如何重视，它与非洲人民整个活动休戚相关的农业比较，总是处于次要位置。农业需要投入大批劳动力，它为人们提供食品、衣物、住所，为手工业和制造业提供原料，其重要性决不亚于一般贸易，更具体地说，决不亚于对外贸易，否则，将无法说明任何问题。

农业体制

必须强调指出，在 19 世纪初期，非洲各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食品生产，包括农耕、饲养、捕鱼、打猎以及综合生产活动等一系列复杂体系。比之农业，其它活动——贸易、政治、宗教、手工业、建筑、采矿和制造业等都是第二位的，脱离农业都无法进行。[12] 农业体制不仅是非洲广大人民经济生活的中心，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为了解非洲社群内部的社会关系结构、权力格局、与邻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外贸因素和其它相互作用的反映提供了基础。因此，某些历史学家往往对非洲社会的农业基础不予重视，而集中精力探讨对外贸易因素，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13]

目前对 19 世纪非洲农业体制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从殖民地经济的角度分析问题。这些著作倾向于从理论和思想观念方面探讨问题，侧重论述非洲的不发达状况，不重视研究 19 世纪早期非洲农业的历史发展。它们把非洲农业体制一律看成是持久不变的"自然经济"，认为重商主义时期资本的渗入不过是殖民地时代非洲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奏。只有少量著作依据实证材料，阐述了非洲各个不同地区特有的农业村社在 19 世纪初期是如何发挥作用和向前发展的。然而，这些著作也没有对非洲地区性农业进行评述的基础，更不用说对整个非洲大陆进行综合论述了。不过，这些著作确实提供了重新探讨非洲社会农业基础的主要特征及其内部发生历史变化的种种因素所必需的见解。 11

有一部研究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突尼斯村社情况的著作，[14] 主要叙述奥斯曼统治区的特征，同时也涉及全非洲范围的一些重大问题——土地持有制、生产和交换的家庭格局、中央政府征税的压力（说是提供保护，实际只是少数社会服务措施）、危害公众健康

---

12 D. 比奇(Beach)，1977 年，第 40 页，具体论述绍纳人的情况。

13 见 P. J. 谢伊(Shea)，1978 年，第 94 页："贸易和生产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但我认为，应当优先注意生产"。

14 L. 瓦朗西，1977 年

的常见疾病(包括周期性传染病，鼠疫、霍乱、天花等)。这部著作集中论述的是1750-1850年期间，旨在强调一种延续性，揭示突尼斯政治经济之所以不振，其根源是在18世纪而不是在19世纪因欧洲干涉而造成的。暂且不去争论外来干涉的影响如何，实际上在马格里布和埃及就有许多种形式和格局，更不用说整个非洲了，但是，突尼斯经历的主要特征确实值得在更广阔的非洲大陆范畴里认真进行探讨。

19世纪初期，突尼斯农村的土地持有制是由伊斯兰法典作了规定的。但是，中央政府、地方政权负责人和个体农户，在各个层次都可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作出各种解释。由于"绿洲"农业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精耕细作的集约性质，这里的土地(即使是在农村地区)比之农业集约性较低的非洲其它地区具有更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因此，持有土地，就会受到反复实现其商业价值的较大压力。可是在19世纪初，非洲十分重要的实际情况，土地私有财产权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比，这是根本的区别所在。在突尼斯以及非洲其它地区，土地属于村社共有，或者属于国王而由村社受托管理。在地方一级，由政权负责人或有关酋长将土地分配给人们使用。有些时候，为了掌握土地分配权，经常发生争斗。邻近的村社，甚至向同一个领主交税纳贡的村社，往往为某一地段的使用权或分配权相互争夺，但基本的前提是土地不准许买卖。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势力的渗人，更由于促使土地普遍商业化的农业圈地和庄园制度的发展，加快了变革的步伐。中央政府在理论上仍坚持土地持有制的固有法律根据，但也经常试图转化土地的商业价值，从中谋利；而处于财政困难情况下的一些个体农户，有时也急于转让土地，至少想以土地暂时抵债。然而，18世纪农业体制的这种适应性变化姗姗来迟，土地持有制的基本理论没有多大触动。

12

我们已经无须强调非洲各个不同生态区域复杂多样的生产格局——土地持有和继承的详情，农业的基本工具，种植的作物，土地使用，男女分工，各村社间在农作物、农耕和畜牧上的专业化，等等，不过，突尼斯所经历的另一个特征却与整个非洲密切相关。这里指的是长期错误地把非洲的农业体制说成是"自耕自给"、持久地保持"自然经济"。这些说法，一开始就错误地认为非洲农村地区是固定不变的、"部落性质的"、"自给"或"几乎是自给"的。[⑮]现已收集到的实证材料，否定了这种根据某些孤立村社而形成的看法。但是，一些认定非洲农业有其自给特征的学者，虽然承认商品和劳务流通在当时的非洲确已相当普遍，仍然从理论术语的角度为"自给"下定义。他们认为，非洲的务农者都是"自耕自给的农夫"，而不是"农民"，理由是这些农夫虽然也有可能经营买卖，但其主要的动机并非谋利。他们给"农民"下的定义是："小农生产者，靠出售部分农作物和牲畜为生"。他们认为，转化成为农民是"新市场的冲击"和谋利动机的必然结果。[⑯]但是突尼斯的经历说明，按19世纪初期非洲的农业体制，当时各种村社都不能说是自耕自给的。当时的农作物品种繁多，视各自的土壤情况、家庭传统、个人爱好和所掌握的专门技术而选择。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三种行业同时并存，形成多种生产格局，由此促进相互间的交换，家庭各自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各个家庭出售其多余的产品，换得自己不能生产的必需品，同时保留

⑮ E.P. 斯科特(Scott)，1978年，特别是第449-453页，其注释对自给农业与交换以及"表面的"与"实际的"交换形式的冗长论战作了评述。

⑯ R. 帕尔默(Palmer)和N. 帕森斯(Parsons)，1977年b，第2-5页。

一部分剩余产品，以备干旱或其它灾年之需。

到19世纪初期，非洲已经没有任何偏僻地区的农村村社可以称得上是完全自耕自给。D.W.科恩在他专门研究沃穆纳夫人在布纳夫的经历的一部著作中说道，即使如此"一个孤零零的小村社也能够得到商货和劳务的供应，均由专门人员提供，或是从远方的加工场所获取"。[17] 科恩所说的是北布索加的一个偏僻地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些头人和他们 13 的随从及血亲集团迁入这一当时还"无人管理的区域"。这次移民是尼罗河上游卢奥人飘流的最后阶段，维多利亚湖北岸一些流离失所的族群和卢乌卡等受到布干达王国扩张压力的小邦国也加人了这一迁移行动。他们终于找到了这片远离当时权力结构而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他们在分散的宅地居住下来，未集结成核心村庄，也没有进行定期交换的正规集市。人们通过相互联姻、宗教仪式和其它交往方式，渐渐产生了村社意识。经过一个时期的竞争之后，某种权力开始得到承认，但家庭宅地仍然是他们生活的中心。用科恩本人的话来说：

> 宅地是分散的……一方面为以开垦土地为中心的伟大传统提供了产生和延续的条件，同时又在土地开垦者的血亲成员内部，构成了有权对土地永久持有和控制的基础。一种持久不变的观念是：每个男人都是自己宅地的主人，这与国王是自己领地的主人具有同样的含义。普通入所持有的地产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论有没有围栏，在划定是他的土地的界限内，他就是领主。[18]

布纳夫的居民是不同血亲集团的后代，保持着互相矛盾的传统，也有一定形式超血亲关系的权力当局——对这种演变过程，我们无须在这里详述。需要强调指出的是，19世纪初，那里的个体家庭也就是生产单位和土地持有单位。虽然地处偏僻之乡，与世隔绝，但即使如此，布纳夫的农户也不是自耕自给的。经过两代人的开拓，这里已经出现一个社会和文化关系网络，通过这种关系网络，发展起高效率的商品和劳务流通。新来的移民，诸如沃穆纳夫人的"穆卡玛"(mukama)和他的随行者，带来了备售商品以及他们掌握的手艺和新的技术；当地居民对一些特殊商品——铁器(特别是铁制农具)、陶器和食盐——的需求，促成了定期集市的出现，人们把剩余产品，鞣皮料、兽皮和牲畜，带到集市来进行交换；有些人还把他们的产品带到专业工匠(铁匠、渔夫和陶工)的住地。同样，商品和劳务的流通还用于支付祭祀和礼拜仪式的费用，支付财礼和其它社会捐税，甚至流通于劫掠、偷窃和绑架行为。正如科恩所说，他的研究"给19世纪初期一个没有行政管理机构的地区的经济，作了一些形象化的描绘，这类地区的经济结构并不是依靠与国际贸易和区域贸易相关的'渠道作用'形成的，它所依靠的是一种商品流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范围相当广泛而又紧密的网络"。[19]

19世纪给非洲各个地方都带来变化、新的压力和机遇，即使像布纳夫那样偏僻之处也 14 不例外。家庭扩大了，先前被认为是贫瘠的土地开始得到耕种，过去一贯小心慎用的新作物也得到试种，其中有一些已成为新的主食。村民的"经济视野"扩大了，因为交通日趋

[17] D.W.科恩(Cohen)，1977年，第48页；另见本书插图11-2。
[18] D.W.科恩，1977年，第43页。
[19] 同上，第47-48页。

发达，使农村与沿海港口和海外市场的联系大为加强。贸易蒸蒸日上，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最初，酋长的地位趋于强化，他们发现对盐、铁和铜的贸易征税，远比索取农产品和一般劳务的捐税更易于聚敛财富，至于象牙、蜂蜡和棕榈油获利更大。但是，贸易利润是不容易垄断的。于是，有些人离开他们常住的地方去寻找发财机会，这样便促进了社会流动。只是这一系列变化都是缓缓而来的，18 世纪业已出现的趋势和格局在发展中并无新意。总之，对外贸易这一意外因素的作用不可夸大。正如 J. L. 韦吕所强调指出的，19 世纪并非仅仅是“就非洲的经历而言，世界经济潮涨潮落的历史”，而且是“多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缓慢发展的历史”。[20] 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内部因素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由此产生非洲人民对外部因素的反应。科恩有关大湖区的一章——迄今为止，这篇论文只是研究中央集权国家对外部因素反应的论述——写道：“19 世纪不仅仅是一个大国、小国并存的世界，而且是个人和家庭通过无数、微小的、有时毫不显眼的方式逐步向掌握国家权力、劳务、生产和市场的世界”。[21]

19 世纪初，北尼日利亚古城卡诺周围的农业体制，与北布索加地区“无行政管理的区域”布纳夫的农业情况，既十分相似，又形成鲜明对照，引人注目。首先，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由于卡诺是一个业已建成的城市，是当地、该地区和国际贸易公认的中心，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活动——纺织品的生产、印染和销售以及皮革制作——为基础。这种情况可能会误导人们只关注市场和商路的渠道作用，而忽视市场和商路赖以形成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网络。另外，伊斯兰教在卡诺颇有影响，城墙之内的统治者、统治阶级和商人对经济管理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卡诺、布纳夫以及突尼斯各地的村社中，15 大量农产品(包括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和棉花、染料)却掌握在农村地区的普通百姓手中，而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就是生产单位。正如阿卜杜拉希·马哈迪在他的新作中所说，卡诺地区的户长(maigida)简直“像一个城镇的统治者”。他为全家人提供粮食、衣服，并为他们承担社会义务；他划定每年的耕地面积，决定所种植的作物种类，规定多少时间用于耕种全家人的集体农田(单数为 gandu “甘都”，复数为 gandaye “甘达耶”)，多少时间用于耕种个人所有的私人农田(单数为 gayauna “加亚乌纳”，复数为 gayauni “加亚乌尼”)。男女之间并无明显的劳动分工，所有成员都参加劳动：男子挖坑点种，妇女儿童填土；男女劳力都参加除草，儿童照料绵羊、山羊和其它家畜；男子收割，妇女收仓储存。除了社会和文化关系网络中有些劳务和产品的交换之外，村社一级还有以自愿参加为基础的公共劳动(gayya)，参与者被视为良民，所以人们都真心实意地按时提供额外劳务，从事播种、收割、建房以及其它大规模的公共事业。[22]

如上所述，与布纳夫相比较，卡诺地区国家的埃米尔和他所任用的官吏在管理经济和村社生活方面起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卡诺更接近于突尼斯。人们承认埃米尔是土地的主人。他能规定获取量，征用或转让土地。他可以把故意不服从命令者、无力交纳预定捐税者，或者惯常违反社会行为准则者(如偷窃)逐出家园，剥夺他们使用土地的权利。

[20] 见本书第 295 页。
[21] 见本书第 292 页。
[22] A. 马哈迪(Mahadi)，1982 年，特别是第 6 章。

同时，他也负责保证良民有土地持有权，因而宅地户主一般都深信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显然，这种持有土地的保证并不包括土地转让权，但是出租或转租土地一般是许可的。基于埃米尔是土地主人的观念，有事业心的统治者积极鼓励掌握各种农业和工业技能的族群，从博尔诺、阿兹宾、努佩等地迁移入境，把他们安置在各个地区，劝诱那些地方的原有居民到新地方定居。统治者、高级官员和商人都分占庄园，使用奴隶劳动力和扈从耕种土地、饲养牲畜和从事工业生产。另外再通过自愿参加的公共劳动征募更多的劳力。

19世纪初“圣战”(djihād)的成功给卡诺的政治、经济带来了重要变革，特别是把“沙里亚”(sharīʿa，伊斯兰教教法)应用于土地持有制，在哈里发的统治下，国家加强各种措施 **16** 来促进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但是必须强调指出，18世纪以来的农业体制仍然是新的政治、经济的基础。马哈迪写道，“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偏离19世纪以前的土地持有制度，延续性因素在这些变化中仍占主导地位”。[23] 沙里亚允许埃米尔转让土地，也就是说允许土地变为商品，虽然“在卡诺，人们仍然认为商业化是不合法的”。沙里亚对土地持有制的最显著影响，看来是促使集体耕种的农田“甘达耶”，分化成为个体家庭通过继承享有的小片土地。这样，普通百姓中的农业单位缩小了。与此同时，统治者和商业上层人士占有的庄园农业却明显扩大了，因而土地短缺日益加剧，尤其是在卡诺和其它城镇的周围地区。这就促使农业地区向远离城市的地方发展，更多的普通百姓只能放弃农业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或依附于统治者和商业上层人士以谋求生计。

权力结构

19世纪初期，在政权结构影响非洲农业发展方面，卡诺和布纳夫恰好是两种不同的典型，一方面是权力集中而有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分散而尚未定形。但这并不是人类学家先前设想的“有国家”与“无国家”社会之间的区别。在布纳夫，不仅没有政府意识和权力意识，一些移民还带来原有的等级制度的政治传统(尽管他们本身是为了躲避这种传统而迁移的)，但随着竞争的继续，他们在布纳夫却使自己依附于一种新出现的权力制度。另外一些移民仍然相信某个“穆卡玛”的权力，认为他是天神选定的能力超凡的君主，或者是钦定中枢的神火化身，他能使土地保持肥力和收成。韦吕强调说，不能再用“有国家或无国家”的对分法来作解释，我们该视之为权力结构的两种模式：

> 凡是王国都有等级制度，它是以缴纳贡赋为基础的权限明确的秩序；而在另一个极端，则是较为平等的非正式的政府形式，由长老和显要人物组成议事会。这两种模式是互相补充又互相影响的，实际上还有许多种摇摆和折衷式的中间模式。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现实情况、历史背景，甚至个人的想法，都能对政权机构占优势的模式究竟是趋向君主制(具有维护秩序和安全的特性)，还是趋向灵 **17** 活性较大、专制独裁较少的民主目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24]

---

[23] A. 马哈迪，1982年，第566-567页。

[24] 见本卷第316-320页。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国家制度并不总是对社会秩序影响最大的架构。与非集权社会中的血亲世系交错存在的还有一系列由宗教、司法和经济领域发展而来的综合性整体结构，其作用如同社会秩序的全面架构一样，可以代替正在分崩瓦解的国家体系。[25]上几内亚地区的“波罗”(poro)一类的组织，以及克罗斯河流域以及喀麦隆和加蓬的赤道森林地带各种所谓的“秘密会社”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在阿罗人聚居的地方，有一种神谕就有广泛的影响，通过阿罗人聚居地和当地“秘密会社”的关系网，给伊格博兰的广大地区提供了完整的司法和经济基础。19世纪经济变革对权力结构的影响，并非单指国家制度而言，经常还涉及现存的非政治整体结构。

19世纪初期的一系列事件说明，当时的整个趋势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国王的权威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几个分散很广的帝国(诸如隆达人各邦的综合体、莫戈-纳巴的古奥约或莫西帝国)纷纷瓦解，在它们的疆界内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土较小而权力更加集中的国家。同时，穆罕默德·阿里成功地运用他的权力，使埃及日益强大昌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奥斯曼帝国，虽然他所企望的(也是他儿子所努力争取的)一个横跨非洲和阿拉伯的帝国并未建成。乌斯曼·丹·福迪奥成功地把索科托哈里发国建成一个分散很广的国家，有效的政治权力则归属于埃米尔。更为突出的是“姆菲卡尼”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不仅在南部非洲，同时也在中部非洲、甚至在东部非洲，促成了一系列紧凑的集权化王国的建成。在探讨“姆菲卡尼”的根源时，L. D. 恩康科指出，在北恩古尼人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农业体制占中心地位，而国家在促使社会适应农业体制的需求变革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数年后，北恩古尼人发起了一种混合的农业制度。他们分散居住，定居地完全不同于索托-茨瓦纳人集中居住的核心村庄。在他们的家庭宅地上，父系家长通常与两三个妻子一起生活，每个妻子及其儿女均有各自的房屋。男子照管家畜或出外行猎，妇女种地。使用土地的方式可以使甜草牧场和酸草牧场都可以放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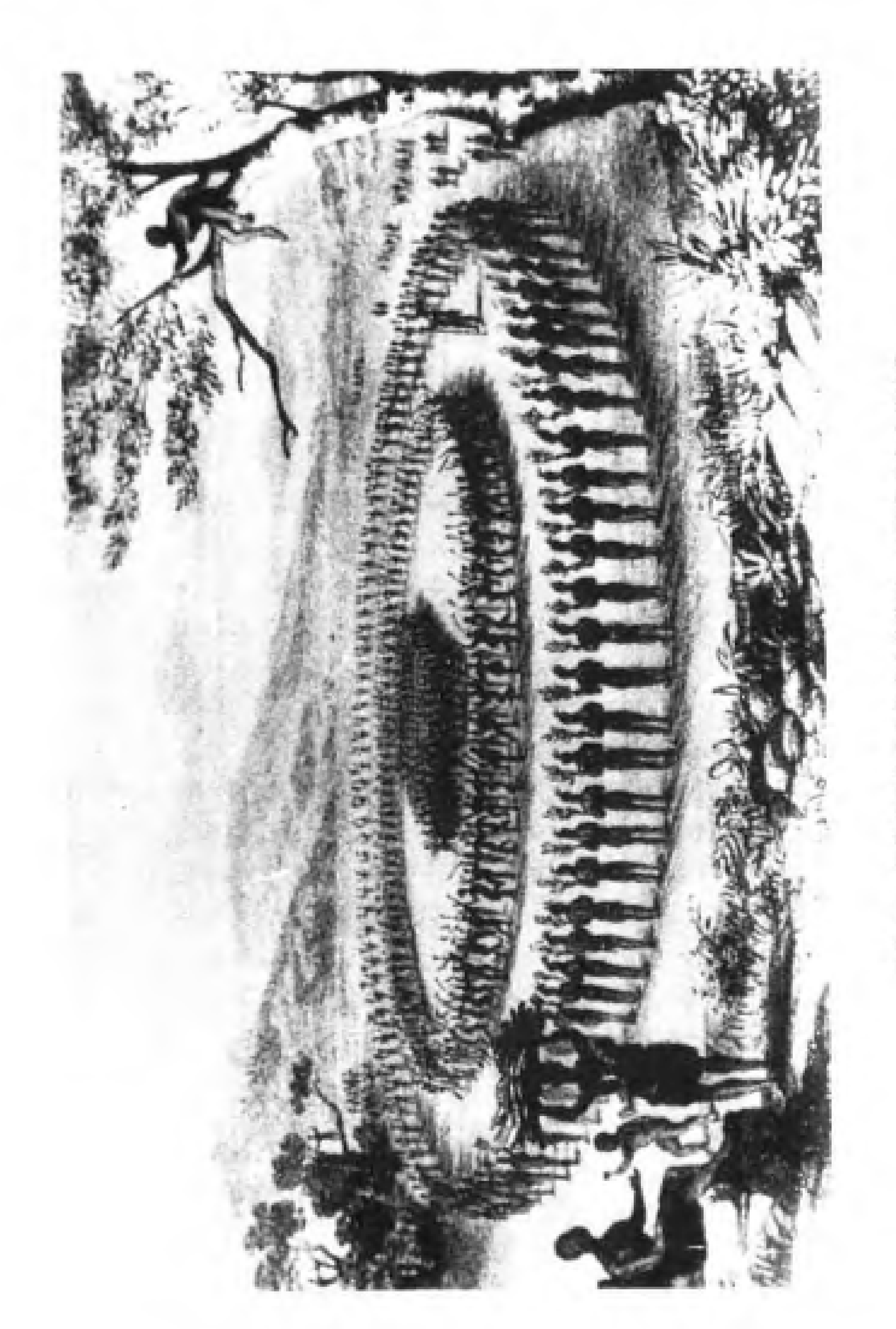
18

> 在春季和初夏，恩古尼牧民把畜群赶到高原酸草牧场上放牧。仲夏之后，他们又把畜群带到河谷低处的甜草草场。多变的气候，使这些农民得以选择最适宜的环境种植高粱，小米或玉米。[26]

玉米是18世纪某个时候引进非洲的，到了19世纪初期，它已取代其它传统作物，成为主要食品。这些因素看来促成了一时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但同时，也促使对土地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并使社会和政治处于紧张状态。当时已经出现一个统治集团，既包括权力至高无上的国王，也包括一些纳贡称臣的附属国君主。皇室宅地越来越大，可供举行宗教仪式、文化活动、军事训练等公共活动。北恩古尼人的最高统治者们接受了索托-茨瓦纳人的习俗，集中举行成年仪式。他们还进一步利用成年仪式，征募青年男女参加公共劳动，后来又将他们招入军队；由青年男子组成的团队驻扎在皇室宅地，有时要服役长达十年之久，才获释回家结婚和种地。这也是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一种措施。一旦对土地的争夺引发成为全面战争，这些同龄人组成的军团就前赴后继地去完成军事任务。

---

[25] J. 奥里吉(Oriji)，1982年。
[26] 见本卷第94页。



图片 1.1 姆贝莱贝莱典礼仪式上的舞蹈，1836 年祖鲁人的军营

动因来自内部

因此，对于被公认为19世纪非洲革命性变化主要因素之一的“姆菲卡尼”，最好的解释是19世纪之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试图以欧洲人出现于开普、“乘牛车的布尔人”进入资本主义牧场制度，葡萄牙从事贸易的商业势力来到德拉瓜湾等事件来给“姆菲卡尼”的缘由作出总的解释，都经不住现有证据的认真检验。“姆菲卡尼”的主要动因来自非洲内部。对19世纪初期一系列其它重大事件——诸如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西部非洲的“圣战”运动——这种观点也同样适用。

通常，不少人都把使穆罕默德·阿里得以掌权，而且他费尽心机争取领导和激励其前进的民族运动，归因于拿破仑及其“远征埃及”的结果。然而，正如A. 阿卜杜勒·马利克在本书下文所指出的[27]，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在看来，18世纪的埃及是新埃及脱颖而出的实验室”。从根本上说，是埃及主要城市(特别是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上层精英以及伊斯兰教中心(诸如：爱资哈尔)的“谢赫”(shaykh)和“乌里玛”(ʿulamā)们培育出来的民族意识，引发了1798年10月和1800年4月反抗法国军队的起义，削弱了法国的地位，迫使法国人撤退。也是这次民族运动，挫败了亲奥斯曼帝国的马木路克在埃及复辟旧日权威的企图。正是当时这种民族情绪给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和他的抱负提供了条件，也正是这种民族情绪促使他的儿子树立起雄心壮志，力争使埃及政府成为真正民族的、对奥斯曼帝国和欧洲都保持独立的政府，并成为一个横跨非洲和阿拉伯的帝国的中枢。

探索复兴和改革的途径，这在面临“姆菲卡尼”挑战的许多统治者的活动中明显可见。同样，在争取重建埃塞俄比亚帝国秩序的统治者以及西苏丹和中苏丹那些指望从伊斯兰教传统中寻找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思想支柱的谢赫们的活动中，也都明显可见。多亏“圣战”的领袖们和欧洲旅行家们留下许多著作，我们现在能够充分了解引起当时一系列革命运动——从18世纪的富塔托罗、富塔贾隆、邦杜，一直到19世纪的索科托、马西纳、丁卡拉耶“圣战”——的各种综合的力量和思想。我们今天也不必再去探索奴隶贸易时期的欧洲商业势力以及废除奴隶贸易和游历探索时期的资本主义影响，究竟对这些综合的力量和思想起到何种作用。总之，“圣战”的起因源自非洲内部。发动“圣战”的国家都很重视发展农业，它们一方面促进传统的一家一户的生产，一方面也开拓使用奴隶和扈从劳力的庄园。这些国家还开展工业生产和贸易，它们改进商路，为零售商和贸易商提供保护，当时在商路运输中，地方或地区性交易占绝大部分。“圣战”领袖们还热衷于推动穿越撒哈拉的商路贸易，保护通往东苏丹、尼罗河流域和麦加的朝圣路线。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非洲内部发展商业的这种主动精神，早在19世纪与欧洲人的新兴贸易出现之前，已经促使商路发展，得以穿越非洲大陆。[28]欧洲人当然很快注意到非洲内部因素发展的后果，并为从中谋利的可能性所吸收。

---

[27] 见本卷第27章

[28] 例如，可见P. 柯廷、S. 费尔曼、L. 汤普森和J. 范西纳，1978年，第14章。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迄今未能获得有关南方更远地区的同类著作。因此，人们更热衷于探索旧奥约帝国18世纪通过埃格巴多人诸邦和波多诺伏港参与奴隶贸易的情况及其可能发生的影响。[29] 但是，这方面的探索以及对废除奴隶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种种假说，截至目前尚未找到旧奥约帝国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基础整个结构瓦解的原因，也不能说 **21** 明19世纪之所以出现用各种政治和宗教思想建立新结构和新制度而进行广泛试验的原因。看来，比较合乎实际的情况是，发动"圣战"的国家，其解体的根源在于内部的不满和迫切要求改革的愿望，而具体地讲则更应该归因于伊斯兰思想的渗入和索科托"圣战"的直接后果，而不是奴隶贸易和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战争、人口流动，以及当时被认为是边缘地区的新区域(诸如沿海沼泽地带)沦为殖民地、新城镇和新市场的兴起、改革的精神和试验——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新的机遇，与其说欧洲人引发了这些变化，不如说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机遇。

以争取复兴和革新来解释，就会明白19世纪为什么从埃及、突尼斯一直到马达加斯加、莱索托、阿贝奥库塔、芳蒂兰会有如此多的统治者，尽管对欧洲人的意图抱怀疑态度，却仍然冒着风险与欧洲的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谨慎合作，试图以此为手段，引进欧洲的技术来促进他们国家的发展。埃及并非当时具有复兴意识的唯一国家。19世纪堪称为"非洲革新的时代"，[30]当时非洲的主要特征是努力对社会进行革新，而这种精神源自非洲内部。统治者们试图利用欧洲人加紧进行的活动来达到革新的目标，但最后反而是他们被人利用，谋求复兴的途径遭到挫折。

结 束 语

19世纪早期给非洲历史带来了新的变革因素，令欧洲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贸易，而且是直接干预非洲各族人民的社会及经济生活。这就引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力求更深入地了解非洲各族人民和非洲大陆腹地现有各种资源，力求终止奴隶贸易，鼓励非洲一些农产品出口，传教士尽一切努力劝诱非洲人皈依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贸易商则不辞辛苦深入内地去经商。所有这些又在经济上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进一步的挑战。新的贸易中心并不就是19世纪以前的中心。商业和财富的新来源以及火器等关键性商品，成了各不同国家或各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竞相争夺的目标。这类新兴贸易，促使商业活动迅速扩大，不仅通过它们本身的交易渠道，而且也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原有交易渠道的发展。然而必须强调指 **22** 出，新兴贸易是19世纪以前贸易的延续，是由维持奴隶贸易的那些人和结构来开辟和维持的，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内地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也就在同样程度上依靠原有的权力结构、内部社会及经济关系网、商路，特别是原有的农业体制作为基础。

---

[29] R. 劳(Law)，1977年。该书在第217—236页全面评述了有关的证据，但看来还是倾向于夸大贸易的影响，特别是奴隶贸易对旧奥约国经济的影响。如第255页提到："18世纪90年代奴隶出口量锐减，可能因此使阿拉芬(Alafin)的收入严重减少，而阿沃利(Awole)则逐步提高王国内部的征税，以应付这种局面。"

[30] A.G. 霍普金斯(Hopkins)，1980年；这是他首次讲学所用的标题，综合概述非洲的经济史，而不是对19世纪各种趋势作专题论述。

因此，我们不应歪曲19世纪早期的发展格局，过早地断言欧洲已占有优势，其势力足以控制非洲历史变革的主动权。事实上，在19世纪初期，由18世纪延续下来的各种因素，大陆内部的各种变革因素，都比外来的变革因素更为重要。

（张文淳 张元一译）

非洲与世界经济



I. 沃勒斯坦

从"奢侈品"到"必需品"贸易的格局

非洲与外部广大世界的经济关系发生巨大转变，并非始于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时代。相反，列强对非洲的瓜分是非洲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欧洲的经济关系发生转 **23** 变的必然结果，这一转变阶段大约始于1750年，到19世纪后期欧洲人广泛实行殖民统治那几十年达到极点。

长期以来，非洲各个地区就存在商业贸易网，其中许多网络还扩展到非洲大陆之外——越过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① 一般地说，超越大陆的贸易联系是由同一类"远程贸易"构成的，众所周知，这种贸易在亚洲和欧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远程贸易"涉及所谓"奢侈品"的交易，常见的奢侈品容积小而单位面积的利润却很高。为交换而生产奢侈品，在原产地一般只用小部分人力，可能也是当地总产值的一小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奢侈品"交易是"非必需品"的交易，即使中断或停止，在其产地也无须实行生产程序的根本改组。因此，两个地区之间交换这种产品，并不能说就是出现了单一的社会劳动分工。②

在1500-1800年期间，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模式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葡萄牙人首先闯入这一海域，其他欧洲人接踵而至，多少改变了这里的商贸人员的成分，却很难说贸易的性质和范围有什么改变，甚至连人员的变化也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大。至18世纪50年代，尽 **24** 管莫桑比克沿海地区已沦为葡萄牙殖民地，在当地定居的印度人/古吉拉特商人的数目多于葡萄牙人。直到18世纪下半叶，由于莫卧儿帝国的瓦解和英属印度的出现，似乎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阿曼阿拉伯人已在斯瓦希里沿海地区得势。③

一方面主要是非商业性的农业生产，另外则是非农产品(奢侈品)的远程贸易——这种传统的划分在当时仍占统治地位，即使在已经存在小规模欧洲定居者农业社会的地方(诸如，赞比西河流域的"普拉泽罗"(prazero)或开普沿海的布尔人居住地)也是一样。

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某些地区的经济状况多少有所不同，那里的社会已开始卷入奴隶

① A. G. 霍普金斯(Hopkins)，1973年，第vi页：指出存在"一些相互关联的经济群体，它们中间就有广泛的、经常的、历史悠久的贸易"。

② 基于这种看法，我曾经详细阐述了非洲对外贸易在1750年以前很可能是这种"奢侈品"的交易。见I. 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3年，1976年。

③ 见E. A. 阿尔珀斯(Alpers)，1975年。

贸易。自然，奴隶贸易是1450年前后出现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派生物，也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个关键部分。17世纪时，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把"扩展"到美洲的加勒比地区当做其外围生产地区的一部分。该地区日益扩大的种植园体系(特别是蔗糖种植园，也包括烟草、棉花及其它产品的种植园)越来越依赖奴隶劳力，而奴隶是从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捕捉"和贩运到大西洋彼岸的。

远程的奴隶贸易应该划在"奢侈品"贸易一类，还是"必需品"贸易一类？是否可以说它涉及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人力"生产"？"出产"奴隶劳力的地区可否看成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地区？对这些问题无法作出简单的回答。不过，从输出量看，1450-1800年的奴隶输出呈上升曲线，1650年前后有显著的增长。1750年的输出量大约是1650年的三倍。④

显然，奴隶贩子一度已不再到处"捕"人来充当奴隶，而是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他们的猎物。于是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一些地方的生产及政治体制开始接受调整，成为当时持续发展的经济纽带上起作用的一个环节。这种"调整"究竟在什么时候达到起作用的程度——1650年？1700年？1750年？——尚难断定。我本人倾向于认为晚一些。⑤的确，正如我们将要阐述的，奴隶贸易从一种"奢侈品"贸易转变为一种"必需品"贸易，削弱了它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再生产的成本已包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劳动报酬所作的盈利性测算中，而一切"必需品"贸易的生产成本都包含有"机会成本"。

只要非洲还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面"，对奴隶主说来，一个奴隶的"成本"不过就是采购费、维持奴隶生活的费用以及监管费(以他/她沦为奴隶之后的一生分摊)，这三项费用的总数再除以他/她沦为奴隶之后终生劳动的总产值。实际上，世界经济体系所得的"好处"就是奴隶生产的剩余价值减去这个"成本"。一旦非洲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或者说非洲本土的商品生产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劳动分工的一部分，那么，一个人如果是奴隶，他/她就不再具有任何其他身分，既不是自由的农耕者，也不是拿工资的劳动者。因此，虽然对奴隶主而言，奴隶的"成本"可能保持不变，但"好处"就要从世界经济体系的总体观点上来重新计算了。计算这个方程式必须把另外使用这个人的"另一种"积累考虑在内。这就是说，如果他/她没有沦为奴隶，他们可能创造更多的净剩余价值。进而言之，至关重要的是自再生产的岁月以来，除法中的分母变化了，原来一般都在计算之外，现在却成了计算的一部分。因此，使用奴隶的岁月的净积累减少了，而非奴隶生产的净积累则保持不变。因此，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积累进程的观点来看计算的结果对奴隶制是不利的。

然而，对非洲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并非这些与奴隶贸易相关的不断变化的经济问题，

---

④ 有关统计数字，见P.D. 柯廷(Curtin)，1969年，图表：33、34、65、67和插图26。柯廷的统计数字肯定引起激烈争论，但对其增加曲线的发展却无异议。参见J.E. 伊尼科里(Inikori)，(1976年a，1976年b,)与P.D. 柯廷(1976年)的辩论；也见P.E. 洛夫乔伊(Lovejoy)的学术依据概述及新的综合研究，1982年。洛夫乔伊只对曲线稍加修改，未作重大改动。

同时应当指出，非洲的全部曲线掩盖了地理的变迁。作为主要通道的是：安哥拉海岸(16世纪)，贝宁湾(仅在1650年前后)，黄金海岸(约在1700年前后)，比夫拉海湾(约在1740年前后)。塞拉利昂海岸卷入时间较早，但直到18世纪中叶才成为重要出口地。东南部非洲直到19世纪才成为奴隶出口的主要来源。

⑤ 有一种看法，认为"奴隶贸易时期"应包括奴隶的"出产"，例如1650年前后；因此，1650 1800年时期的特征有些不同于"奢侈品"贸易及后来的"必需品"贸易，参阅S. 达格特(Daget)，1980年。

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正在发生的更重大的变革过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早一次长期的经济和地域扩展，发生在1450年至1600-1650年间。在这一时期，非洲没有一个地区可以说加入了这一历史体系。而1600/1650年至1730/1750年时期，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说来，则是一个相对滞缓、经过喘息而得到巩固的时期，它主要是在16世纪以来即已包括在内的区域巩固下来。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很难说非洲有哪个地区已经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变化中的奴隶贸易结构除外)。[⑥] 26

资本主义的扩展

大约在1730-1750年间，由于种种内部原因(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挥的作用而言)，非洲开始了它的经济及地理上的扩展。此后的一百年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逐步把它的生产网同当时还处于它"外面"的五个新的重要地区结合起来。这五个地区是俄罗斯、奥斯曼帝国、印度、"更远的"美洲各地(加拿大、北美洲西部、南美洲南端)，还有非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下面我们要讲的是它与这第五个地区(非洲大陆)相结合的历史。

从以欧洲为基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观点来看，它在这五个地区的扩展各有其特点。这五个地区同样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以前的"边境"周围，而且都是已经同欧洲的远程"奢侈品"贸易有联系的地区。它们又都是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初级产品的富有潜力的生产区。

可是，这五个地区在许多方面也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的生态环境就大不相同，因此，从与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观点来看，它们产品的性质和生产成本也不可能相同。至于政治体制，则更是多种多样。一方面，有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的世界性帝国，经济领域广阔，但同时有单一的官僚体制的上层政治建筑。另一方面，在"更远的"美洲各地，人口稀少，非农业性经济，彼此间很少联系，政治结构多样化，但往往没有首领。就前一种情况说，与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无非是成为"结合的一方"卷入其中，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政治体制，或受国际关系的制约而以某种方式将其改造成为国家结构。就后一种情况说，与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作为卷入其中的"结合的一方"，必须建立新的(通常是殖民地的)政治结构，以便组织生产和参加国际关系体系。坦白地讲，在前一种情况下，原有的国家结构"被削弱"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却是一种新的"更强的"国家结构建立起来。总之，由于这两类地区都远在外围边缘，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区"强大的"国家结构发生联系时，它们的政治结构相对而言都是"弱"的。

非洲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过程，正好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非洲各地的政治结构本来就多种多样，其中有些是相当强大并且官僚化的，另一些则实际上没有首领。非洲从来不存在单一的"经济"。然而，在不少特定的地区，确实也存在超越单一政治单位的区域性经济结构。以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一方"的观点来看，当时存在的一些政治结构已经被"削弱"(正如俄罗斯、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一样)。可是，在 27

⑥ 关于1450-1750年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详细分析，见I. 沃勒斯坦，1974年，1980年。

另外一些地方，新的政治权威刚刚建立起来，这些政治权威的强大作用，足以顺利改变经济进程。最终，如我们所知，几乎所有地方都建立起全新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但是大部分地区并非立即建立的。

与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主要的阶段，即生产过程的某些重要环节转化成为构成世界经济社会劳动分工的生产过程总体系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阶段，即形成“国家”的政治结构转化成为国际关系体制的一部分，并在国际关系规则的制约之下发挥作用；这些国家逐渐发展强大，足以促进世界经济体系内诸生产因素的自由循环，但又不足以干扰这些生产因素的自由循环，至少干扰的手段和时间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我们认为，北部非洲、西部非洲和南部非洲，这种结合出现于1750年以后（约在1900年左右结束），至于东部非洲，则直到1850年（甚至1875年）还没有卷入这一结合过程。[7]

“结合”是一个缓慢而平稳的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结合过程的任何环节上，都可以看到农业生产的旧格局持续不变，在统计上仍占支配地位。旧的标准和价值观似乎相对不变。这就容易使人们忽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意义。然而，有四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某些产品的生产已开始系统地面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属的市场；这种生产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讲是“必需”的；对这种生产必须补充（或征用）劳动力，因此导致建立新的劳动供求结构；这种生产一般是本地区控制其产销者有利可图的，因而吸引更多人参与竞争。“结合”仅仅使这一过程开始运行，如果由上述四方面的变化促成的生产面向的是一个世界市场，就出现了“必需品”的生产、劳动力的重新组合和有利可图的交易，这就是“结合”的经济基础，同时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后果。这里特别应当强调，非洲本身并没有与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意向，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过这种意向。“结合”是外部原因引起的过程，它遭到了强烈的抵制。非洲的反抗并不是无效的，它使结合过程迟迟不能开始，后来又使其运行缓慢。只是，在力量对比上，反抗的一方处于劣势。当地各方力量的代理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争权夺利的斗争照样继续，或多或少还是沿着原有的途径进行，只是环境与条件变成新的，所受到的制约也与“结合”之前有所不同。非洲当地的代理人在争权夺利方面是乐此不疲的，其实世界任何地方无不都是如此。

28

在“结合”之前，非洲“国际”性质的商业活动绝大部分是奴隶贸易，而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合则是与奴隶贸易的废除同时出现。因此，随着奴隶贸易转化成为“合法”的商业活动，“结合”一词经常为人们所谈及。然而，使用这一当时的意识形态术语往往引起误解，在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就是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它同时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地方更是如此。

奴隶贸易的衰落固然重要，但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普遍需要开发从事廉价劳动的

---

[7] “incorporation”（结合）一词的含义不同于另外一词“peripheralization”（成为边缘地区）。前者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范围的扩大，后者的含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在任何地方，“incorporation”总是先于“peripheralization”。就北部非洲、西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而言，“peripheralization”始于1875/1900年左右；至于东部非洲，则可能始于1920年左右。这一过程现仍在继续。通常有一种说法，认为非洲直到20世纪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指尚未“peripheralization”。关于这两个过程的区别及其间关系的讨论，见T.K.霍普金斯和I.沃勒斯坦，1982年。

新地区并以此作为其经济活动水平和积累率普遍扩展的一部分相比，则其重要性还是处于第二位的。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结合

这里，我们从埃及说起，而不是按惯例先谈非洲西海岸，这样，非洲与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过程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在1730年之前，埃及的生产原是具有世界规模的奥斯曼帝国劳动分工的一部分。埃及在该帝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产粮地，又是洲际远程"奢侈品"贸易的一个主要交通枢纽。18世纪下半叶，埃及社会内部矛盾突出，加之粮食出口贸易的衰落，导致埃及国家结构发生严重财政危机，结果税收猛增，从而引起农民的反抗，大量农民放弃土地。就在同一时期，扩展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正试图把埃及产品纳入其贸易网络。18世纪末，英国和法国为控制这一地区而进行的激烈的军事竞争，正是这种企图的具体表现。埃及作出的反应是穆罕默德·阿里上台执政，力求在埃及实行"现代化"。

从经济角度讲，这个"现代化"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稳定的农产品出口制度。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各地的生态情况和政治结构而论，埃及有多种理由把长纤维棉花当做比小麦更好的产品出口。但是，大规模的棉花生产不仅要求水利灌溉系统的变革，而且要在社会生产关系上进行相应的变革。因此，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了国家对贸易的垄断，依靠拿薪俸的官吏直接征税。这导致日益加强对农民生产活动的经常性控制，强迫农民承担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服兵役。最终使封建性劳役体制转化成为私营的大庄园制度。1818年，庄园仅占可耕地面积的10%左右，到1844年，增至45%左右。在穆罕默德·阿里去世之后，这一进程加紧进行，继续剥夺农民的土地，以致酿成1881-1882年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尤拉比派起义"，而这一事件正是导致英国在埃及建立殖民统治的因素之一。整个生产程序的转化过程还造就了一个人数颇多的无地的农业工人阶层，农业生产受到直接的监督管理，农民被追付出的劳动时间明显增加。[8] **29**

马格里布的经历完全不同。一方面可以说，早在15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始之初，就一直试图使马格里布(特别是摩洛哥)纳入其中。[9] 但另一方面，直到19世纪中叶甚至更晚，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个地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1450-1830年之间，马格里布和欧洲(并非全欧)跨越地中海的联系，主要是靠私掠船活动，私掠船活动从经济角度讲与远程"奢侈品"贸易相似，如18世纪西部非洲的奴隶贸易一样前途渺茫。然而，与奴隶贸易不同的是，18世纪时地中海上的私掠船活动就已衰落，出现了一种更加商业化的交易形式，虽然时断时续，但逐步统治了地中海(尤其是摩洛哥和突尼斯)的贸易。[10] 18世纪下半叶，摩洛哥已开始生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以及畜牧业产品，甚至还将矿石出

⑧ 详见 A. R. 理查兹(Richards)，1977年。

⑨ 见 A. 拉鲁伊(Laroui)，1975年，第29-33页；D. 塞登(Seddon)，1978年，第66页。

⑩ 据 A. 拉鲁伊称，18世纪突尼斯某些方面的变化与后来埃及的情况相似。他说，"突尼斯是开路先锋，直到下个世纪它才从穆罕默德·阿里的开明专制政治中受到启发"。见 A. 拉鲁伊，1975年，第43页。

口到欧洲，1820年以后，这方面更有显著增长。[11] 可能是由于阿尔及利亚强烈抵制这种经济上的结合，所以在欧洲列强对非洲政治统治的扩张尚未全面铺开之时，就早早地被征服了。

30

西部非洲的格局

马格里布地区之所以能长期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保持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原因之一是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当时在北部非洲经济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马格里布正好处于萨赫勒地区与欧洲间接远程贸易的通行之地，但是该地区却很少受到设立输出本地产品中心点的压力。关于1750-1880年期间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的重要作用，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12] 然而，显然是由于19世纪后期该地区沦为殖民地，这些古老的商路才失去了经济上的重要性，马格里布也因此失去了它作为货物集散地的“掩护”作用。

19世纪西部非洲所谓合法贸易的兴起，已成为史学界一段时期以来讨论的中心课题。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商品交易量的增长，也不是商品内容的变化，而是由此发生的生产结构的转化，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在英国力图废除奴隶贸易之前，这一变化过程已经开始，因为废除奴隶贸易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扩张平行的产物，可以断言奴隶贸易的废除加快了西非生产结构的变革。[13]

大量文献表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棕榈油是“传统的”，同时也是最畅销的新产品。[14] 棕榈油生产先是与奴隶贸易并存，后来自行发展，到1861年达到极度繁荣，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衰落。[15] 棕榈油贸易在黄金海岸(今加纳)同样发达，但不如尼日尔河三角洲，[16] 还扩大到达荷美(今贝宁共和国)，当年奴隶贸易在这里占有重要地位，当地居民实际上通过奴隶贸易已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17]

31

---

⑪ 见D. 塞登，1978年，第69-71页。

⑫ A.A. 博亨(Boahen)，1964年，第131页；他认为，19世纪的贸易“只剩下原有价值的一小部分”。但是，C.W. 纽伯里(Newbury)(1966年)却认为，当时的贸易非但没有衰落，实际上还在增长，到1875年达到顶峰。

⑬ C. 钱柏林(Chamberlin)，1979年，第420-421页。他在批评“合法贸易”这一说法时强调指出，“除欧洲中心论”的含义外，它还包含有一层意思，即“废除奴隶贸易的政策导致贸易的内容从贩卖奴隶转化为非贩卖奴隶，但实际上这一转化在1807年英国采取‘废奴’措施之前和之后都存在。”

他认为欧洲对非洲原料的需求有其重大意义，他指出“特别需要的产品”包括更大量的棕榈油、木材和橡胶。“广大地区的大量生产者都卷入了这些新商品的收集”。

⑭ 见A.J.H. 莱瑟姆(Latham)，1978年。也见C.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Coquery-Vidrovitch)和H. 莫尼奥(Moniot)，1974年，第108页：“与欧洲国家不同，对非洲人来说，奴隶贸易和合法贸易并非两种截然对立的事物。相反，两种贸易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始终互补共存，推动了历史的演变”。

⑮ 见A.G. 霍普金斯，1973年，第133页。

⑯ 见A.A. 博亨，1975年，第91页。他提及尼日利亚作为棕榈油的产地，比黄金海岸更占优势。见S.D. 纽马克(Neumark)，1954年，第60页。

⑰ 见L.A. 阿金乔格宾(Akinjogbin)，1967年，第141页：“自1767年起，长期以来涉及特格贝苏人经济结算的问题成了达荷美国民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特格贝苏人既然已经把奴隶贸易当做达荷美的经济基础，这个王国就完全受外部因素支配，而这个外部因素是达荷美人既不能控制也无法影响的”。另见D. 罗南(Ronen)，1971年；J.E. 伊尼科里(Inikori)，1977年。

从奴隶贸易转向棕榈油生产，加强了私营经济抵制王室商人的力量，(R. 劳(Law)，1977年)，北方草原的贸易日益重要，阿散蒂的情况就是如此。见J.F. 芒罗(Munro)，1976年，第46页。一般地说，生产领域的根本性变化比商业领域更大。“棕榈油和花生等商品的产量、运输量和贮藏量日益增长，大量的进口货物需要许多小生产者，这比奴隶贸易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见J.F. 芒罗，1976年，第47页。

第二类主要的新产品是花生，19世纪30年代上几内亚沿岸已开始为出口这类商品而扩大生产，很快又向西扩展到塞内冈比亚。[18] 第三类主要产品是橡胶，这种贸易开始较晚，而且部分是为了弥补棕榈油需求的下降。[19]在奴隶贸易后期，沿海或近海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日益扩大，从而又刺激了中苏丹地区和西部非洲的经济发展(牲畜、钾碱、农产品、皮货)。[20]

当然，并非所有新经济作物的生产尝试都能获得成功，尤其是欧洲人直接卷人的生产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欧洲人1819-1831年在瓦洛殖民从事农业生产就失败了，[21] 以后在塞内加尔、黄金海岸南部以及尼日利亚所作的各种努力也都遭到失败。[22]欧洲人在非洲的商业人员并没有明显优势，比较重要的变化只是欧洲人在港口地区已逐渐取代非洲商人的地位，他们从进人内地的贸易商手中购进大批货物，用船运出海外，再运回海外的货物。[23] 32

大宗出口的新产品必定会换回新的进口货物。欧洲的(尤其是英国)工业产品在19世纪越来越多地输人非洲。举例而言，18世纪主要的进口货——棉织品，在1815至1850年间增长了50倍，到1891年又增长七倍。[24] 西部非洲的制造商与正在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其它地区的居民一样，尽可能调节生产以适应进口大潮的冲击。一部分地方制造业被迫迁移；另--部分为抵制竞争而设法转向专业化，或退守比较有限的市场。[25]

南部非洲

南部非洲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结合的过程不同于非洲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既没有奴隶输出，又存在一个白人社会。尽管18世纪布尔人的开普殖民地是欧洲人住在欧洲人殖民地，但在实际意义上，很难说他们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26]

拿破仑战争的结果促成了当地政权的更迭，这是英国获得世界经济新霸权在当地的反映，同时政治权力的转移也反映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长期好转和不断扩展。英国不失时机地开始重组经济格局，使这一地区有效地纳人世界经济体系。它明显地加强了航运业，从英

[18] 见G.E. 布鲁克斯(Brooks)，1975年；他着重指出非洲农耕者对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大量需求很快作出反应。另见B. 穆塞尔(Mouser)，1973年，1975年。

[19] 见R.E. 迪梅(Dumett)，1971年。

[20] 见P.E. 洛夫乔伊，1974年，第571-572页："经济增长始于1750年，一直延续到19世纪……该世纪在殖民统治之前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洛夫乔伊着重指出，事实上，在沿海地区(包括欧洲转口贸易)与中苏丹之间流通的商品比迄今认为的要多。

[21] 见B. 巴里(Barry)，1972年，第237-258页。

[22] 见J.F.A. 阿贾伊(Ajayi)和B.O. 奥洛隆提梅欣(Oloruntimehin)，1976年，第211页。也见A.G. 霍普金斯，1973年，第138页，后者强调说，"这些实验的提倡者发觉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无力进行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原因部分在于非洲自由劳工的报酬很高"。

[23] 见C. 钱柏林，1979年，第423页。也见G.I. 琼斯(Jones)，1963年，第82页，后者谈到非洲内地贸易的作用，他以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情况为例，认为"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欧洲商人非得适应非洲贸易组织不可"。

[24] 见C.W. 纽伯里，1972年；也见A.G. 霍普金斯，1973年，第129页。

[25] 见J.E. 弗林特(Flint)，1974年，第388-389页；也见E. 雷诺兹(Reynolds)，1974年a，第70页。

[26] M.F. 卡曾(Katzen)，1969年，第193页指出：尽管荷兰统治当局自范·里贝克起就努力开创产品出口贸易，但"1778年以前开普的出口货物只有少量猎物(象牙、羊皮、鸵鸟羽绒等)，到了18世纪又加上小麦和葡萄酒(白兰地)"。

国大量引进新的殖民者，同时发展商业性的养羊业，使开普殖民地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叶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生产中心。㉗以后，纳塔尔发展成为产糖业中心，那里

33 的种植园使用了印度的合同工人。

白人务农者曾在18世纪使用科伊科伊人当劳工，而所谓的有色人种主要是作为奴隶劳动力。英国人推行正规的释奴政策。经济不断扩大和变化，迫使布尔人进行“大迁移”，基本上英国人是紧随其后，同时祖鲁人和其他恩古尼人也积极移动。㉘结果是为控制土地而展开激烈的斗争，为世界市场生产的部门也为控制劳动力而进行激烈的竞争。在开普殖民地，非洲个体农民经营的农业与使用非洲佃农劳力的白人农场同时并存。㉙

这段时间安哥拉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尽管当地与欧洲有更加长久的历史联系。奴隶贸易和象牙贸易继续飞速增长，捕获奴隶和猎取象牙的举动日趋深入内陆，不断侵蚀内地原有的各种政治结构。㉚奴隶贸易的废除使白人定居者试图建立种植场区，白人殖民者的种植园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棉花生产猛增时曾一度繁荣昌盛，但很快衰落下来，这种情形与西部非洲的经历十分相似。㉛非洲重要的经济作物没有一种在这里得到生产。

东部非洲延迟“结合”

非洲东海岸地区仍然留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这里原先是跨越印度洋与外界取得联系。而此时印度和在较小程度上西南亚洲本身正逐渐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19世纪，奴隶贸易扩展到东部非洲，正是由于该地区仍处于角斗中心之外。不过，在东部非洲，也像西部非洲或中部非洲的情况一样，奴隶贸易是一种起破坏作用、促使社会改组的力量。当时，桑给巴尔已经与世界经济体系结合，19世纪中叶该岛因盛产丁香而在世界市场占重要地位，种植园制度因此得以建立。㉜毛里求斯也出现了蔗糖种植园，马达加

该书第202页还指出，即使是葡萄酒也十分有限，“出售葡萄酒”的产地距开普敦只有两三天的路程，谷物产地则较远一些……人们把开普敦视做临时休息场所，一切都以节俭为原则”。J. F. 芒罗，1975年，第56页谈到，1806年之前，开普敦周围50-60英里以内的地方就与开普敦截然不同，“那里生产小麦和酒类是为了沿海市场的需求”，至于其它维持本地人生计的农业地区，再加上开普敦东面的牧业定居地，“与开普敦沿海贸易的关系微乎其微……”

A. 阿特莫尔(Atmore)和S. 马克斯(Marks)，1974年，第110页甚至断言：即使到了19世纪，南部非洲“没有继续从开普或都市飞地引进技术和工艺”，也可能是因为阿非利堪人(南非白人)“已经融入非洲社会的广大居民中，就像赞比西河流域的葡萄牙‘普拉泽罗’人(prazero)或奥兰治河半种姓社会的格里夸人一样”。但即使如此，到了19世纪，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不得不与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反映了这一现实。

㉗ 见J.F. 芒罗，1976年，第56-60页。

㉘ 此前，18世纪80-90年代，只是在祖尔维尔德“白人殖民者对恩古尼社会施加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见C. 邦迪(Bundy)，1979年，第29页。

㉙ 同上，第44页和以下诸页。

㉚ 见D. 伯明翰(Birmingham)，1976年，第267-269页；J.-L. 韦吕(Vellut)，1975年，第134-135页。韦吕认为这种情况肯定会使内地更加依赖于世界经济。另见W.G. 克拉伦斯-史密斯(Clarence-Smith)和R. 穆尔索姆(Moorsom)，1975年。

㉛ 见J.F. 芒罗，1976年，第51-52页；W.G. 克拉伦斯-史密斯，1979年，第14-15页。

㉜ 见F. 库珀(Cooper)，1977年，第47-79页。

斯加则发展水稻和牛肉生产，向毛里求斯出口其产品。[33]然而直到后来欧洲列强在非洲实行“大角逐”之时，东部非洲才真正受到冲击，其结果正如非洲其它地区一样，这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34

生产结构的变革不可能脱离促进经济变化并使之合法化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单独发生。但是，这中间确切的联系究竟是什么呢？I. 赫尔贝克早就注意到1805-1820年这一阶段在非洲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指出下列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同一段时间内：乌斯曼·丹·福迪奥发起的西苏丹“圣战”（以及其它伊斯兰革命运动）；恰卡领导下祖鲁人的兴起；布尼奥罗人的失势和布干达在大湖区的崛起；西苏丹的富尔贝人（富拉尼人、佩乌尔人）的革命；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现代化”统治；马达加斯加在拉马达一世国王统治时期伊梅里纳的统一；赛义德·萨义德统治时期阿曼人霸权的兴起。他还发现“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接触’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影响”。[34]

“结合”所涉及的问题

没有必要夸大外来努力在非洲国家缔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内部因素总是政治演变的首要原动力，客观存在的发展逻辑导致事件具体细节的发生。何况国家都是在这同一历史时期形成的，此时期的世界经济体系还相距甚远，例如，罗兹威人就是如此。[35]再看一看西部非洲各国，十分明显，参与奴隶贸易与组成国家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的。如果说这两个过程在达荷美和奥约是相继发生，在贝宁则是一个强国的形成并未通过参与奴隶贸易，但是在尼日尔河三角洲情况恰巧完全相反。[36]

但是，这里所谈的是另一个问题。一旦与世界经济体系发生联系，就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够发挥经济作用（即保证贸易、生产和劳力供应）的政治结构。外部压力要求建立这样的结构。[37]什么地方有执行这种必要职能的现成的结构，这个地方所承受的要求改变结构的压力就小。当然，一旦与世界经济体系挂上钩，合意的政治结构的内部创造者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会增加。其实，正是这些政治结构的内部创造者在施加压力，要求结构改革。[38]因此 35

[33] 保护这类生产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毛里求斯有此需要，从而要求英国通过1817年的条约支持马达加斯加独立，打消法国的企图。见P.M. 穆蒂布瓦(Mutibwa)，1972年，第39页。

[34] I. 赫尔贝克(Hrbek)，1968年，第48页。另见A. 威尔逊(Wilson)，1972年，其中谈到同一时期内卢巴-洛马尼帝国的扩张。

[35] S.I. 穆登盖(Mudenge)，1974年。

[36] A.G. 霍普金斯，1973年，第105-106页论及这一点。

[37] W.K. 汉考克(Hancock)，1942年，第163页表述了这种见解，他从一个外部参与者的角度希望非洲人与世界经济体系挂钩。他指出，仅仅经济压力是不够的，“政治问题很难解决，西部非洲的欧洲贸易商很早就发觉他们的生意（即使非洲人积极参与）需要一个‘和平’庇护地，而虚弱的非洲社会无力提供”。有时或许真的是由于虚弱无力，有时也是由于太强大，因而阻挠和平庇护区的建立。

[38] 这是K.O. 戴克(Dike)的重要论述。他指出(1956年、第11页)：“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经济领域的急剧变革很快促成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革”。另见C. 钱柏林，1979年，第430页；也见J.C. 约德(Yoder)，1974年对达荷美国内政治的分析。A.G. 霍普金斯(1973年，第143页)谈到“19世纪西部非洲上层危机……源自新旧生产关系转化的矛盾”；即由奴隶贸易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指出，各个特定的政治结构在克服危机方面的能力是有差别的。

而引起各种动乱，而动乱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其他参与者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反过来施加压力，要求政治稳定，所采取的方式是推动国家的建立，所建立的国家要加入国际体制，同时受其约束。[39] 最终，如我们所知，导致非洲大部分地区成了殖民地国家。奴隶贸易的废除是这一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正如种植园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活动的派生现象，奴隶贸易和种植园奴隶制的废除也同样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无意重提废奴主义者作为一个压力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确实存在，而且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样一个压力集团的存在及其作用，实际上并不能对这个过程作出解释，而其本身作为其中的一方面倒需要解释清楚。

种植园奴隶制是依靠降低其劳动总成本来维持经济活力的，事实上主要是靠人口的增殖来补充奴隶劳力。前面已经提到，正是“被征募”的奴隶人数的增长逐渐改变了西部非洲奴隶贸易的经济特征，奴隶贸易的“机会成本”日益增长，从而影响世界积累的速度。

36 这一普遍现象是与较为狭义的英国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整个18世纪，英属西印度各地蔗糖种植园的比较生产率一直在下降。[40] 英属印度成了有可能取代的主要产地。[41] 然而，印度存在着稠密的农业经济，真要实行奴隶制度，奴役本地居民的话，经济代价实在太高，假如要贩运外地人来当奴隶，则政治上困难重重。因此，对于英国属地的糖业生产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来说，奴隶贸易不是那么紧迫，至于西部非洲，如果要鼓励经济作物的生产，相反是不再需要奴隶贸易了。英国当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已经掌握了霸权，因而占有政治和军事优势来废除奴隶贸易。[42]

---

[39] P. 埃伦萨夫特(Ehrensaft)，1972年，记述了英国在西部非洲历次干涉的情况；A.S. 卡尼亚-福斯特(Kanya-Forster)，1969年，第2章，记述了法国所进行的干涉；B.M. 马古巴恩(Magubane)，1979年，第2章，记述了南非的情况。

[40] 见W.A. 格林(Green)，1974年，第247页：“1850年之前几十年间英国在西部非洲的行动，主要是受西印度的要求支配”。关于糖业“生产过剩”是废除奴隶贸易的重要原因，见E. 威廉斯(Williams)，1966年，第149-150页；D.H. 波特(Porter)，1970年，第142-143页。反对意见，见R. 安斯蒂(Anstey)，1975年，第386页。

[41] 关于废奴主义者与西印度糖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见E. 威廉斯，1966年，第183-188页。

圣多明各爆发革命引起危机之后，自1791年起，印度出产的糖就成了英国市场上一个重要的商品项目。1794-1800年的销售量相当可观，见J.P. 马歇尔(Marshall)，1968年、第88-89页。后来，西印度出产的糖在国会院外活动集团进行游说下恢复了高关税，印度糖的输入量随之下降。但是，除关税之外，“尽管运费高，东印度糖仍以低廉价格卖给西方，”见C.N. 帕金森(Parkinson)，1937年，第85页。接下来如何？事实是“大金融家显然在两个阵营都有立足之地”(同上，第86页)，国会只能作出妥协决定：西印度院外活动集团在废奴问题上未能取胜，但是却使东印度糖加税，1836年、当双方关税均等时、孟加拉蔗糖种植园增加了出口，见K.N. 乔杜里(Chaudhuri)，1966年，第347页，表1。

这里应该补充提及，还有一个产糖地区——非洲的毛里求斯。1826年英国提高税率，糖业很快在全岛的生产中占主宰地位。1835年，奴隶制在理论上已被废除，奴隶也由印度契约工人所取代。不过，非法的奴隶贸易仍继续盛行。这些奴隶是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东部非洲运来的。见B. 贝内迪克特(Benedict)，1965年，第12-19页；E.A. 阿尔珀斯，1975年，第214页。

[42] 这并不是说英国的努力都能即刻取得成功，或者从一开始就能积极贯彻。S. 达格特，1979年，第436页指出：1831年之前，“英国(对奴隶贸易)的压制措施并未对法国推行奴隶贸易的经济政策造成严重打击”。J.F. 芒罗，1976年，第43页强调说，直到19世纪50年代，大西洋奴隶贸易才缩小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自此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聚财者(作为一个总的阶级)的利益和英国聚财者(作为一个总的阶级的分支)的特殊利益就结合成了一体，形成一种政治气候，使废除奴隶贸易成为一项社会政策。[43] 当然，这一变革对聚财者中的某些小集团产生不利影响。于 **37** 是，这些人起来反对废奴政策。另外，应该补充说明，这项政策是以一种灵活方式贯彻执行的。有些地方，虽然它的种植园不属于英国人所有，只要它是英国工业利益直接相关的原料供应地，英国就对当地奴隶制度采取“宽容”政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南方；另外还有古巴和巴西，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能从“废奴线以南”获得奴隶，这些地区仍如前面所指出的保留了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奴隶贸易的经济体制。[44]

曾经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 19 世纪的非洲“被瓜分”之前是“非正式帝国”或“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时期。J. 加拉格尔和 R. 鲁宾逊对这一分析总结说：“如有可能便用非正式手段兼并，在必要时还可以正式吞并，英国至高无上的权力稳固地确立起来”。[45]“自由贸易”是一个可以抓起来随便使用的术语。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商人如果能在市场上通过竞争获得好处，他们就倾向于拥护自由贸易，否则就会千方百计限制自由贸易。由于 18 世纪西部非洲持有特许状的公司所起作用不如 17 世纪时大，某些历史学家就说是由于自由贸易的兴起。其实，持有特许权的公司垄断权力的解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转向自由贸易“是多少受到限制的”。而对于转向自由贸易的解释则主要是由于“实际业务上的理由”，也就是说，对扩展中的奴隶贸易市场降低管理费，扩大灵活性。[46] 就连贸易更为自由的 19 世纪，也可以说自由贸易受到严重的限制，只不过它在理论上是“合法的商业”。[47]

英国倡导在非洲实行自由贸易原则，这是其世界霸权在思想上的反映，在所谓“太平的日子”里，英国工业压倒所有的竞争对手，英国的海军力促“自由进入世界市场，这是史无前例，也是空前绝后的”[48] 英国的贸易商战胜了他们所有的竞争者——在南部非洲胜过了布尔人，[49]

---

[43] 见 B. K. 德拉克(Drake)，1976 年，第 86-87 页。最后，在结束奴隶贸易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把非洲人的“合作”因素考虑进去；正如 C.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和 H. 莫尼奥，1974 年，第 311 页所提示的：“‘合法’贸易最终取得了胜利，因为欧洲人发现它(作为一种贸易)具有很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因为有相当一批非洲国家的商业结构已经适应了合法贸易。换句话说，非洲人是大西洋贸易中处于次要地位的伙伴，尽管他们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仍然是大西洋贸易的参加者，他们不断适应，从市场上获取利益，总之，能像一个可靠的伙伴那样行事。”

[44] 见 A. G. 霍普金斯，1973 年，第 113 页；D. 埃尔蒂斯(Eltis)，1979 年，第 297 页。P. D. 柯廷的图表，1969 年，第 240、247 页，表明巴西的奴隶大多来自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古巴的情况似乎相同。废除奴隶贸易并没有影响到穿越撒哈拉的本质上是“奢侈品”的奴隶贩卖。见 R. A. 奥斯汀(Austin)，1979 年。

[45] J. 加拉格尔(Gallagher)和 R. 鲁宾逊(Robinson)，1953 年。

[46] A. G. 霍普金斯，1973 年，第 93-94 页。

[47] 见 D. D. 莱廷(Laitin)，1982 年。

[48] J. S. 加尔布雷思(Galbraith)，1970 年，第 34-35 页。

[49] A. 阿特莫尔和 S. 马克斯，1974 年，第 120 页提及 19 世纪南部非洲的情况：“只要英国还在该地区占据垄断地位(该世纪中叶已没有出现竞争者的迹象)，只要该地区还处于不发达状态，只要用非正式手段还可以控制局面，就没有必要建立正式的帝国”。

J. 加拉格尔和 R. 鲁宾逊，1953 年，第 3 页提醒人们：实际上正式的帝国并非完全不存在。1843 年英国吞并了纳塔尔，1860 年和 1868 年将布尔人逐出了德拉瓜湾，1861 年和 1866 年又将布尔人逐出了圣卢西亚湾；另外，1860 年，英国对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这些做法使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在 19 世纪中叶沦为“隶属于英国港口的国家”。

在西部非洲胜过了非洲当地商人，[50] 还胜过了法国人。[51]

38　英国优势的最终衰落与世界经济体系外围地区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关系。简单说来，这是其它国家——法国、德国和美国——工业产品的质量具有竞争力所造成的必然结果。1873年的经济危机触发了各国对英国霸权进行积极的政治挑战，在非洲和全世界都是如此。[52]到1879年，非洲的非正式帝国的结构已经分崩离析；到1900年，非洲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53]

结 束 语

经过讨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从1750年开始的一个阶段应看做是非洲(至少是北部非洲、西部非洲和南部非洲)进入一个特殊历史过程，即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时代；非洲被瓜分，并非这一历史过程的开端，而是其结局。然而，“一般的贸易，特别是

39　奴隶贸易的作用……是否被过分夸大了”?[54] 有关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西部非洲经济作物的增产并未引起社会革命，因为它一开始就发生在已有的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而这些制度已被“证明通过调整而不必通过革命”能够适应沿海贸易(在“合法”贸易时代)的变革要求，[55] 这种见解能否成立?

要说非洲的许多体制，甚至大部分体制都能适应新的严峻的要求是不错的。自然，有些制度遭到了破坏，最终在殖民统治时期几乎全部被调整。适应性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进行对比。具备适应性通常是全部的要求，不能多也不能少。适应一种新的社会行动体系，这是非洲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与一个特定的历史体系相结合，也即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张文淳　张元一译)

---

[50] 在这段时间里，起先西部非洲的“商人集团曾充当欧洲(主要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中介人”，见S.B. 卡普洛(Kaplow)，1978年，第20页。可是，他们这种大规模充当中介人的局面日益遭到破坏，见E. 雷诺兹，1974年b、1975年。就连贝壳通货的暴跌也表明西部非洲商人阶级独立的财政基础已经瓦解，见O.A. 恩瓦尼(Nwani)，1975年；A.G. 霍普金斯，1970年。

[51] “法国的排他政策(Exclusif)，即法国企图对西部非洲的商贸加以约束的政策，是一部漫长而痛苦的历史”，B. 施纳佩尔(Schnapper)，1959年，第151页。他说英国在两个方面优于法国：资本充裕，纺织品价格低廉。

[52] 1873年后法国在塞内加尔实行保护主义绝非仅仅巧合。见C.W. 纽伯里，1968年，第345页。

[53] 关于这一点，我早有分析说明，见I. 沃勒斯坦，1970年，第403页。我强调指出：“为了向英国的世界经济霸权进行有效的挑战，其它工业化强国需要(或感到需要)扩大市场来销售其工业产品，并获得原材料。于是，对非洲的角逐开始了，一旦这场大角逐爆发，英国就无可选择，只有投人进去，否则自认失败。”

19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所执行的政策并非没有遭受过失败。如R. 奥拉尼扬(Olaniyan)，1974年，第37页所说，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半心半意的保护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是屈辱的结局”，但先前这些“失败”还不足以导致全面改变政策。

[54] J.F.A. 阿贾伊和R.S. 史密斯(Smith)，1971年，第124页。另见R.A. 奥斯汀，1970年。反对意见，A.G. 霍普金斯，1973年，第124页。

[55] J.F.A. 阿贾伊和B.O. 奥洛隆提梅欣，1976年，第214页。认为我们只有经济变化而没有社会变革；A.C. 乌诺马赫(Unomah)和J.B. 韦伯斯特(Webster)，1976年，第298页强调“东部非洲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变革，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另见C.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1971年，第121页，他强调达荷美变革的关键在于雇用劳动和私有财产，这种变革并非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

3 19世纪非洲的新动向和新历程

A. A. 博亨

在19世纪的前80年间，非洲出现许多新的动向和历程。这些新动向和新历程不在于其独创性，而是以其发展速度、规模和影响，形成一个变革时代，它标志着非洲旧秩序的结束和现代非洲的开端。本章将分析这些新动向和新历程，评述其影响，并试图判断如果19世纪最后20年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未曾侵入非洲，这块大陆将会变成什么模样。 40

新的人口动向

首先是人口统计方面的新动向。19世纪非洲最具革命意义的社会经济变化在于奴隶贸易遭到废除和取缔。在所论述的这一时期结束时，由于本卷其它各章所阐明的原因，奴隶贸易已成为往事。奴隶贸易的废除并未引起人口增长率的突然变化，但是毫无疑问，总的趋势是人口逐步增多而不是减少，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最后30年。

然而，人口增长并非人口变动的唯一内容。更趋激化的是人口的重新分布，所采取的是内部迁移和人口流动的方式。当时，这类引人注目的内部迁移的典型例证，有南部非洲的和中部非洲的恩古尼人、中部非洲的乔奎人、东部非洲的阿赞德人、赤道非洲的芳人和西部非洲的约鲁巴人的迁移。后文将谈到的恩古尼人的迁移，使班图族的恩古尼人从纳塔尔地区分布到南部非洲、中部非洲以及东部非洲各个不同的地区。虽然恩古尼人的入侵使各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深深的苦难，但也有一些积极的结果。恩古尼人征服或吸收新的部落，组成新的民族，诸如恩德贝勒族、索托族。恩古尼人还采用祖鲁人早已具备的军事组织、政治制度和政治主张，组成了加扎、斯威士、恩德贝勒、索托、佩迪等新的王国。J.D.奥麦尔-库珀认为，这些王国都是“由平民英杜纳(indunas)而非王室亲族的国王统治，高度军事化，高度中央集权”。① 而且，恩古尼人的出现也促使受他们侵袭的一些部落开始建立国家。举例而言，居住在坦噶尼喀湖东岸的霍洛霍洛人，就采用了恩古尼人的军事策略，建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南坦噶尼喀的赫赫人，原来分属于30多个独立的酋长国，在遭到恩古尼人蹂躏之后，联合一致，采用了恩古尼人的军事组织、武器和作战方法，征服了邻近的民族，诸如桑古人和贝纳人，组成了大赫赫王国。 41

在西部非洲，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约鲁巴人几乎全部从约鲁巴兰北部大草原迁

① J.D. 奥麦尔-库珀(Omer-Cooper)，1976年a，第350-351页。

移到南方的森林地带。这一迁移运动派生出一些新的群体，诸如伊巴丹、阿贝奥库塔、奥约、伊沃、莫达凯凯、萨加穆等。同恩古尼人一样，约鲁巴人也开始进行各种政治和体制上的试验来对付他们的新环境所带来的政治和生态方面的种种困难。这些试验后来造成了伊贾耶的军事独裁制度、伊巴丹的共和制度、阿贝奥库塔的封建制度，还有埃基蒂-帕拉波的邦联制度。[②] 今天的尼日利亚西南部人口分布图，就是上述这些迁移运动形成的。19 世纪还发生了芳族和他们的亲缘民族(布卢人、贝蒂人和帕霍英人)的大规模迁移，从现今的喀麦隆南方热带草原迁到远至加蓬内地和沿海的森林地带。[③]

伊斯兰革命

社会领域的新动向更具革命性，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宗教。众所周知，早在 7 世纪，伊斯兰教已从阿拉伯传入非洲。然而，直到 18 世纪末，除北部非洲和尼罗河流域外，伊斯兰教的传播一般都是时断时续，而且是和平的渗入，主要通过贸易活动，只有少数例外，如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从 19 世纪的最初十年起，伊斯兰教的传播转而采取一种带军事色彩的动态方式，特别是在非洲西北部。其进展之快和规模之大，最典型的是西部非洲热带草原称为西苏丹的"圣战"运动。整个 18 世纪，该地区只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圣战，一次是富塔贾隆(18 世纪 20 年代)，另一次则是富塔托罗(18 世纪 70 年代)。可是在 19 世纪，至少爆发了四次重大的圣战(还有许多次小规模的战斗)：乌斯曼·丹·福迪奥领导的豪萨兰圣战(1804 年)；塞库·艾哈迈杜(艾哈迈德·洛博)领导的马西纳圣战(1818 年)；哈吉吉·奥马尔在班巴拉地区的圣战(1852 年起)；还有萨摩里·杜尔的圣战(19 世纪 70 年代)。[④]

42

上述伊斯兰革命运动(除萨摩里领导的圣战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均由散居于整个西苏丹的托罗德贝人(富尔贝人、富拉尼人、佩乌尔人中的教团)充当领导。因而这些革命运动实质上是托罗德贝人，即富拉尼穆斯林教团对西苏丹的两方面危机所作的反应：一方面是政治压迫、社会不公正和非法课税，另一方面而则是伊斯兰教的衰落和削弱。这些革命领导人的目标在于"把伊斯兰教从个人信仰的水平转化为一种公共的法规……消除传统习俗的残余影响，创建一个伊斯兰法规和惯例占绝对优势的神权帝国。"[⑤]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在乔拉(迪尤拉)人组织的一系列起义中，70 年代的萨摩里革命是最成功而且影响最大的一次。乔拉(迪尤拉)人是索宁凯族的一个分支，他们早已伊斯兰化，而且善于经商。关于萨摩里·杜尔本人活动的具体情况，将于本卷第 24 章中详细介绍。这里只需肯定地说，虽然萨摩里并不像早期"圣战"运动领导人那样受过高深的教育，也不如他们狂热，但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一直致力于使人民皈依伊斯兰教的工作，并利用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团结的力量。

---

② O. 伊基梅(Ikime)(编)，1980 年，第 307 页。
③ P. 柯廷(Curtin)、S. 费尔曼(Feierman)、L. 汤普森(Thompson)和 J. 范西纳(Vansina)，1978 年，第 423-424 页。
④ M. 希斯克特(Hiskett)，1976 年；另见本卷第 20、21、24 章。
⑤ J. F. A. 阿贾伊(Ajayi)，1965 年，第 1 页。另见 M. 拉斯特(Last)，1974 年。

这些伊斯兰革命或称“圣战”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后果。从政治方面讲，它们创建了几个大帝国，例如索科托哈里发国，早在19世纪20年代，它已拥有先前尼日利亚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和西部的不少地区；又如马西纳帝国，它曾占有尼日尔河湾地区，后并入哈吉吉·奥马尔的帝国，而后者的领土从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源头一直延伸到廷巴克图；还有萨摩里·杜尔的大帝国则从现代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北部一直到巴马科，包括乔拉人的商业重镇和伊斯兰教中心康康。[6] 这些革命运动还迫使旧豪萨和索宁凯族的上层统治者让位给主要是富尔贝人和乔拉人教团的新的精英，从而预示着西苏丹政治权力中心的根本转移。乌斯曼·丹·福迪奥的“圣战”甚至促使博尔诺王国复兴和强大起来，这主要归功于谢赫·穆罕默德·卡涅米的活动，此人是博尔诺统治者招来帮助他们反对乌斯曼·丹·福迪奥及其子穆罕默德·贝洛势力的一个虔诚的卡嫩布族的穆斯林。 43

这些革命运动在社会方面带来的后果意义更为深远。首先，由于“圣战”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军事首领大多是优秀的穆斯林学者，他们从事教育和劝说人们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使伊斯兰教不仅经过净化，而且由一种城市宗教同时转化为普及农村地区的宗教。此外，先前两位领导人(乌斯曼·丹·福迪奥和塞库·艾哈迈杜)属于卡迪里教派，而哈吉吉·奥马尔则属于较新的提加尼教派，这个新教派更接近普通百姓。因此，哈吉吉·奥马尔赢得众多追随者，以至于今天西部非洲提加尼教派的信徒明显多于卡迪里教派，这一点意义深远。第三，由于这三位“圣战”领导人都重视教育和学问，19世纪伊斯兰教的学术和文化水平明显提高。最后，“圣战”的成果使整个苏丹地带至今仍保留着普遍的伊斯兰团结精神。

然而，在总结圣战经验时也应当指出，它们的领导人和旗手未能完全成功地建立由伊斯兰教教法统治的西苏丹哈里发国家。他们不得不同现存的一些社会政治结构和实体实行妥协。因而最终出现的并非统一的、真正的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社会，而是豪萨兰的富尔贝-豪萨人文化和尼日尔河湾地区的富尔贝-曼德人文化，虽然这两类文化都充满伊斯兰教义和先知的信条。

伊斯兰教还传播到非洲其它地区，特别是昔兰尼加和东撒哈拉(今利比亚)，以及现代苏丹的北部——这要归功于赛努西和马赫迪的活动，最后还有东部非洲内地，特别是通过阿拉伯-斯瓦希里贸易商的活动而传入布干达。[7]

基督教的传教活动

同一时期在非洲各地发生的另一种宗教革命也有不小的变革意义和持久的影响，这就是基督教传教会的革命。虽然早在15世纪葡萄牙人来非洲进行探险活动时就试图在西苏丹的南方培植基督教信仰，但直到18世纪初还很难察觉基督教留下的任何踪迹。大约从18世纪最后10年起，特别是19世纪前50年间，形势才大为改观。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出现与约 44

⑥ 见本卷第24章；另见P. 柯廷、S. 费尔曼、L. 汤普森和J. 范西纳，1978年，第388-389页。

⑦ R.O. 科林斯(Collins)和R.L. 提格诺尔(Tignor)，1967年，第16-18页；A. 阿杜·博亨(Boahen)，1964年，第110-1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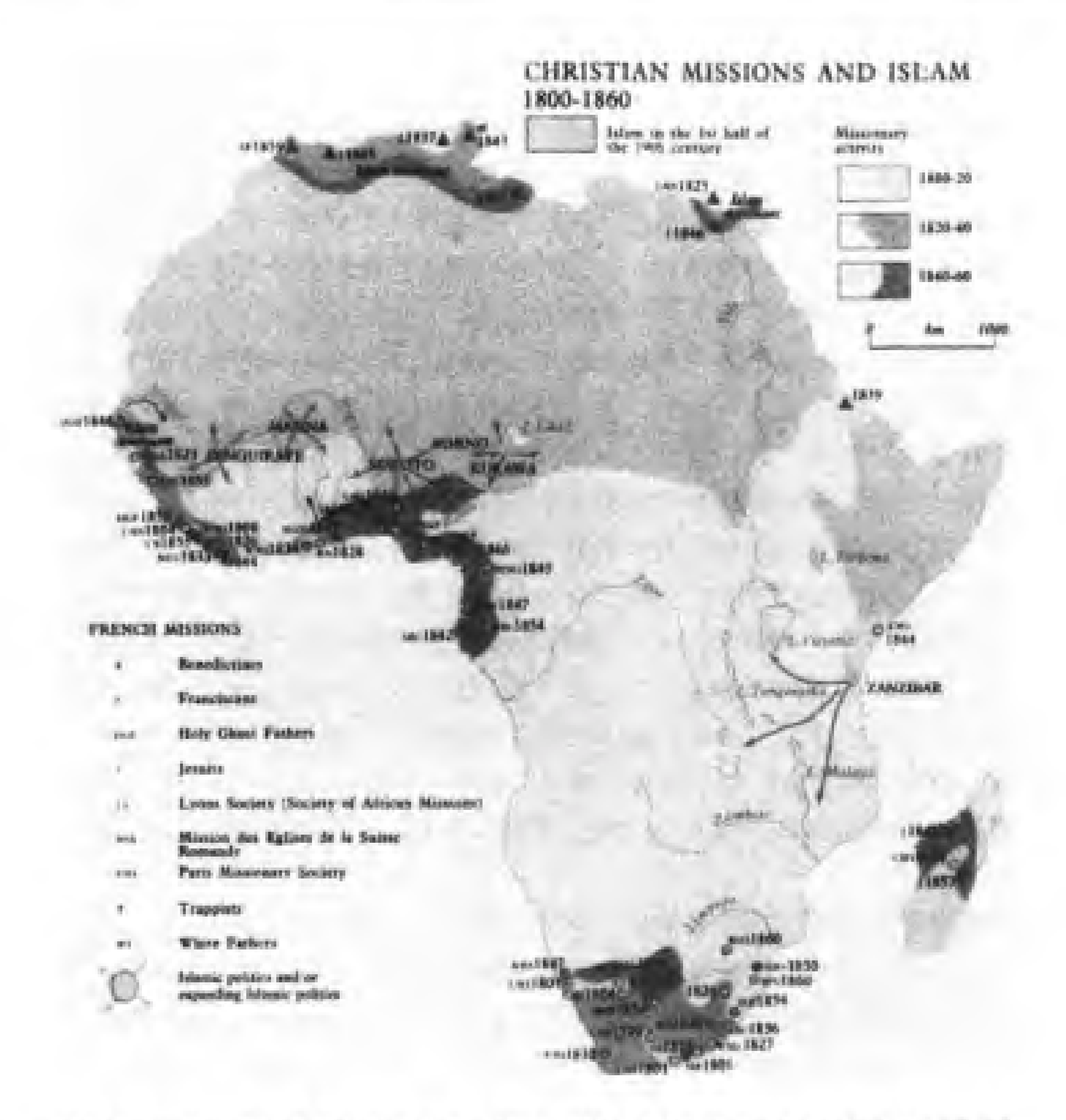


插图3-1　基督教传教团与伊斯兰教，1800-1860年(资料来源：J.F.阿德·阿贾伊和M.克劳德(编)《非洲历史地图》，朗曼出版社，伦敦，1985年)

翰·卫斯理相关的福音派教会的复兴，当时的反奴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产生了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典型的激进思想，促使基督教教会试图在非洲培植和传播其信仰，虽不像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扩张那样采取战斗的方式，但也同样具有朝气蓬勃的活力。于是，圣经、犁和商业交往代替了可兰经和圣剑，积极活动者是以欧、美为基地组成的许多传教团体和在非洲的代理人，而不是“圣战”领袖、伊斯兰教团和他们的旗手。1800年前后，在整个西部非洲展开活动的只有三个传教会，即：福音传教会(SPG)、卫斯理宗传教会(WMS)、格拉斯哥和苏格兰传教会。仅仅过了40年，到1840年，这一类传教会增加到15个以上，其中包括：圣公会的正教传教会(CMS)、北德意志或不来梅传教会、瑞士的巴塞尔福音传教会、苏格兰的联合长老会、来自法国的非洲传教社。此后30年间，又有来自美国的十几个传教会。

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迟至 1850 年只有圣公会的“正教传教会”在进行活动。1873 年戴维·利文斯敦去世时也只增加了另外两个传教会，一是“中非大学传教会”（UMCA），成立于 1857 年，按照利文斯敦当年在剑桥大学对英国公众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演说，其宗旨是“建立基督教和文明的中心，以促进真正的宗教、农业和合法贸易”；另一个是“圣灵会”，这是 1868 年在法国成立的一个天主教教团。[8] 利文斯敦多次在非洲旅行，他的名望和他逝世时的情景，在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激起了宗教革命。四年之中有五个传教团进入非洲。它们是 1875 年由苏格兰自由教会组织的“利文斯敦传教会”；1876 年由已被确认的苏格兰教会组织的“布兰太尔传教会”，其活动地点在今马拉维；由探险家兼记者 H. M. 斯坦利发起的“伦敦布道会”（LMS）——斯坦利曾写信给《每日电讯报》，邀请传教士前往布干达，伦敦布道会的活动后来从南非扩展到今日的坦桑尼亚；两年后又有“天主教白衣神父会”跟随圣公会的正教传教会进入布干达。[9] 因此，到本卷所论述的时期结束时，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也发生了传教会革命。

基督教传教会在南部非洲的活动比起非洲其它地方更为广泛，也更为成功。在拿破仑 **45** 战争结束时，只有两个传教会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活动。其中一个是“摩拉维亚传教会”，1737 年首次进入开普，六年后撤出，直到 1792 年才重新返回；另一个是“伦敦布道会”，1799 年首次出现于开普。[10] 然而从 1816 年起，英国、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传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纷纷来到南部非洲，不仅进入开普，而且深入到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到 19 世纪 60 年代，**46** 它们更进一步向北渗入当今的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的一些地区。这些传教会包括：卫斯理宗传教会、格拉斯哥传教会、圣公会的正教传教会、挪威传教会、联合长老会传教会、柏林传教会、莱茵传教会、巴黎福音会、美国赴祖鲁兰和莫塞加的传教会、汉堡传教会和瑞士自由教会，等等。[11]

基督教传教会在南部非洲的活动，有一点完全不同于他们在西部非洲等地的活动，这就是欧洲传教会在南部非洲采取直接和积极的途径，介入政治事务，首先是有些传教士与一些非洲国王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传教士 J. T. 范·德肯普和约翰·菲利普，一开始就积极参预当地政治，而洛本古拉、莱瓦尼卡和塞齐瓦约则分别成了罗伯特·莫法特、弗朗索瓦·科伊拉德、约翰·科伦索主教的好友。[12]

当初，不少人以为，传教士在南部非洲总是偏向非洲人，或维护非洲人的事业。然而，近来的著作却着重指出，他们“经常受雇去充当殖民当局和非洲统治当局之间的谈判人，与其说他们是福音传教士，不如说他们是外交官”；虽然殖民者有时认为他们是亲非洲人的危险分子，许多非洲领导人却有更多（的理由）认为他们是危险的亲殖民主义者和亲帝国主义者。[13]

⑧ R. 奥利弗（Oliver），1965 年，第 13 页。

⑨ A. J. 威尔斯（Wills），1964 年，第 82-97 页；R. 奥利弗，1965 年，第 1-48 页；N. R. 贝内特（Bennett），1968 年，第 231-235 页。

⑩ E. 鲁（Roux），1964 年，第 25-26 页；E. A. 沃克（Walker），1957 年，第 92-93 页；144-146 页，173-175 页。

⑪ E. A. 沃克，1957 年，第 133、144-146、178 页；E. 鲁，1964 年，第 24-31 页；C. P. 格罗夫斯（Groves），1954 年，第 2 卷，第 118-161 页；D. 德农（Denoon），1973 年，第 26-29、67-81、80-90 页；H. W. 兰格沃西（Langworthy），1972 年，第 82-115 页。

⑫ D. 德农，1973 年，第96-97 页；C. P. 格罗夫斯，1954 年，第 2 卷，第252、274 页；E. 鲁，1964 年，第25-32 页。

⑬ D. 德农，1973 年，第 65 页。



图片 3.1 苏格兰传教会在布兰太尔（马拉维）的教堂

这些传教会的活动，并不限于修建教堂，争取信徒，或将圣经译成非洲语种。传教士们还将大量精力用于建设实验农场和种植园，以此促进农业发展，同时传授泥瓦工、木工、印染和缝纫一类的技术，以此提高居民生活标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推动贸易交往，提高文化水平，并开展西方式的教育。所有传教会都开办小学、专业培训学校，有的甚至开设中学。在西部非洲，圣公会的正教传教会于 1827 年在塞拉利昂创办了一所福拉湾学院。到 1841 年，该传教会在塞拉利昂总共创办了 21 所小学，1842 年又开办两所中学（一所男中和一所女中）。[16] 1846 年，卫斯理宗传教会在黄金海岸开办四所女童小学和 20 所男童小学，

47

1876 年又创办第一所中学，即卫斯理高级中学（现名姆范齐平中学）。1859 年，正教传道会还在拉各斯开设一所文法学校；1879 年，卫斯理宗传教会也开办了循道宗男童中学。[17] 应当指出，这些学校并非全部在沿海地区，某些内地城镇也有一些学校。

在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利文斯敦一所学校在 1890 年已有 400 名学生，还附设一个车间和一台印刷机，"它不断印刷初级读本、圣经翻译本、故事书和地理常识读物，还印刷用尼扬贾、通加、恩古尼、尼亚库萨、恩孔德等语种编写的自然史"。[18] 1835 年，伦敦布道会报导说，它在马达加斯加的学校共有 4000 名小学生；1894 年又报导说，马达加斯加的梅里

---

[16] A. A. 博亨，1966 年，第 118-123 页。
[17] J. F. A. 阿贾伊，1965 年，第 152-156 页。
[18] R. 奥利弗，1965 年，第 62 页。

纳高原约有13.7万人上过新教学校。这个比例已经"接近同时代西欧的水平"。[17]

基督教传教会在南部非洲比在非洲其它地区更重视教育事业，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这段时间里有当时开普和纳塔尔殖民政府的资助。到1870年，传教士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远比他们的福音布道活动更有成效。[18] 他们不仅开办了许多初级学校或乡村小学，而且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师范学校和中学。例如，1841年7月，格拉斯哥传教会在纳塔尔地区的洛夫代尔办了一所神学院，附设工程系，传授泥瓦工、木工、马车和铁器制造技术，从1861年起还传授印刷和书籍装订技术。[19] 1877年，罗马天主教会也在纳塔尔建立"圣家庭修女会"所属的一所修道院，附设寄宿学校、小学和一个收容所，并在奥兰治自由邦建立了另一所修道院。1868年，法国传教士在阿曼济姆托蒂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18世纪60年代中期又在纳塔尔地区的伊南达地方办起一座女子神学院。1880年，英国圣公会在祖鲁人住地创办了圣奥尔本斯学院。[20] **48**

基督教传教会的革命对非洲社会的影响，也许比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更加深远。最明显的是改信基督教的非洲人改变了生活方式。除了学会各种技术之外，非洲人已开始接触欧洲医学思想，虽说只是初步的接触；同时，传统的建筑得到改善，西式衣装开始普及。[21] 此外，由于一夫多妻制、信仰祖宗灵魂、传统神教和巫术都受到批判，传教会逐渐削弱了非洲社会传统的基础以及家庭关系。

新宗教的另一方面影响是使非洲的宗教多元化，各种教派的广泛传播使非洲社会分化为相互敌对或竞争的集团。首先，非洲社会分裂为信徒和非信徒，在南部非洲称之为"粗人"和"有教养者"。[22] 其次，正如伊斯兰教把穆斯林分为卡迪里教派和提加尼教派一样，基督教也把"有教养者"具体分为：天主教、卫理公会、圣公会、路德会、公理会和长老会诸教派。虽然在非洲多数地方，两极分化尚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对立和紧张局势，但在某些地方，例如布干达和马达加斯加，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在本卷其它一些章节中将进行论述。

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的崛起

然而，基督教传教会革命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一个受到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在非洲崛起。从19世纪50年代起，作为上述传教会教育活动的主要成果，先是在沿海地区，而后逐步扩展到内地，涌现出一个主要是受过英国和法国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阶层。这种现象最为显著的地区，无疑是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 **49**

据利奥·库珀所提供的资料，洛夫代尔教会学院从1841年创办至1896年12月，在校

---

[17] P. 柯廷、S. 费尔曼、L. 汤普森、J. 范西纳，1978年，第414页"。

[18] L. 汤普森，1969年a，第335、385页。

[19] C.P. 格罗夫斯，1954年，第2卷，第135-136页；M. 威尔逊(Wilson)，1969年b，第261-262页；L. 汤普森，1969年a，第335页。

[20] C.P. 格罗夫斯，1954年，第2卷，第261-265页。

[21] M. 威尔逊，1969年b，第266-267页。

[22] 同上，第265页；M. 威尔逊，1971年，第74-75页。

毕业的非洲学生多达 3448 人。其中有“700 多人从事专业工作，大多任教，有八名律师，两名法院书记员，一名医师，两名编辑或记者；将近 100 人任秘书和译员；约有 170 人当工匠，600 多人是劳工或务农”。[23] 不要忘记，洛夫代尔学院并非唯一的这类教会学校，同类的学校在开普和纳塔尔还有一些。它们造就的许多人才，如下文将要论述的，在 19 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班图人的群众性宗教运动中起了关键的领导作用。这里试举数例：蒂约·索加，1856 年被苏格兰自由教会授予圣职的第一个科萨人牧师；奈赫米阿·泰尔，曾在希尔德敦学院研究神学；卡尼奥密牧师，开普的一位班图人教士；詹姆斯·德万尼，1841 年生，1881 年被授予牧师圣职；还有曼吉纳·M. 莫科恩。[24] 也许最有影响的是约翰·坦戈·贾瓦布，他生于 1859 年，曾求学于希尔德敦学院（如同奈赫米阿·泰尔），1875 年获教师证书，1883 年成为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第一个非洲人，1884 年创办了第一家班图文报纸（Imvo Zabantsundu），并在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的开普政界发挥了重要作用。[25]

与南部非洲整个黑人居民总数相比，19 世纪 80 年代涌现出来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无疑只是极少数。至于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则更少。例如坦噶尼喀，第一个非洲人牧师塞西尔·马贾利瓦是迟至 1890 年才由“中部非洲大学传教会”授予圣职的，第二个被授予圣职是在 1894 年，第三个则是在 1898 年。[26] 在肯尼亚，直到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才涌现出第一批积极参与当地政治的精英人物，诸如：约翰·奥瓦勒、R. 奥穆洛、J. 奥奎里、哈里·图库、詹姆斯·贝乌塔、赫塞·卡里乌库、约翰·穆丘丘，当然，还必须提到乔莫·肯雅塔。[27] 毫无疑问，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直到本卷论述的这一时期之后，传教会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才真正在东部和中部非洲开展起来。

但是，19 世纪 80 年代，西部非洲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受过教育的精英，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塞拉利昂。事实上，正是塞拉利昂的“克里奥尔人”——该国如此称呼受过教育的人——在西部非洲其它地方开创了主要的传教活动和教育事业。这里应该提一下三个典型人物：詹姆斯·阿非利加纳斯·霍尔顿，1835 年出生于塞拉利昂，1853—1859 年在英国学医，并在西部非洲医疗服务处任外科助理医生；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福拉湾学院首届毕业生，第一个担任圣公会主教的非洲人；詹姆斯·约翰逊，一个思想激进的学者，福音会传教士。[28] 除此三人外，其他知名人士还有：布劳顿·戴维斯，1859 年成为合格医生；塞缪尔·刘易斯，律师，第一个受封为爵士的非洲人。[29] 利比里亚也出现了少数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的精英稍多一些。在尼日利亚，知名人士有：埃辛·乌克帕比奥、D. B. 文森特（后改名为莫约拉·阿格贝比）、H. E.

50

[23] L. 库珀(Kuper)，1971 年，第 433-434 页。
[24] E. 鲁，1964 年，第 78-80 页；E. A. 沃克，1957 年，第 521-522 页。
[25] E. 鲁，1964 年，第 53-77 页；E. A. 沃克，1957 年，第 394-395、536 页。
[26] J. 艾利夫(Iliffe)，1979 年，第 216-219 页。
[27] B. A. 奥戈特(Ogot)，1968 年，第 266-270 页。
[28] E. A. 阿扬代尔(Ayandele)，1966 年，第 185-196 页；J. F. A. 阿贾伊，1965 年。
[29] C. M. 法尔(Fyle)，1981 年，第 74-76 页。



图片3.2 蒂约·索加

麦考利、G.W. 约翰逊、R.B. 布莱兹、J.A. 奥通巴·佩恩。[50] 19世纪70和80年代，黄金海岸的精英则有：J.A. 所罗门、E.J. 菲恩、J.P. 布朗、J. 德格拉夫特·海福德、A.W. 帕克、T. 莱恩、J.H. 布鲁、约翰·门萨·沙尔巴赫。[51]

另外，在西部非洲以及某种程度上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区，一部分受过 51 西方教育的非洲精英从事专业工作，成为文职官吏、教师、传道者、牧师、教会管事等。根据新近获得的资料，1885年卫斯理会在黄金海岸有15名非洲人牧师、43名传道者、259名布道士、79名学校教师。[52] 但大多数人还是进入商界，或是独立经商，或是靠外国公司和外侨商人贷款做生意。苏珊·卡普洛[53] 称这些商人为"有抱负的资产阶级"，本卷将在后面有关章节谈到他们在19世纪把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的零售商业一步一步推进到内陆地区的情况。据来自黄金海岸的一份报告说，1850前后，这些青年人深入内地，或经商，或推销，从而"使英国工业产品的销售量明显增长，并在土著居民中广泛传播贸易和文化"。[54] 马达加斯加、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也都发生了同样的社会变化。因此，在本卷论述的这个时期结束时，非洲社会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阶层——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该阶层又分为医生、牧师、教师、传道者、代办等专业人员以及受过教育的商人，有人称之为 52 "有抱负的资产阶级或企业家。"

---

[50] E.A. 阿扬代尔，1966年，第192-200页。
[51] F.L. 巴特尔斯(Bartels)，1965年，第72-100页。
[52] M. 麦卡锡(McCarthy)，1983年，第110-111页。
[53] S.B. 卡普洛(Kaplow)，1977年，第313-333页。
[54] 引自M. 麦卡锡，1983年，第126页。



图片 3.3 夏洛特乡村学校，塞拉利昂，约 1885 年

埃塞俄比亚主义

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精英阶层的出现，产生出两个独特而有深远意义的重要结果。首先是“埃塞俄比亚主义”——一种非洲宗教和政治民族运动的兴起。其次，这场运动体现出一场知识革命，特别是在南非和西非。应当着重指出，迟至 19 世纪 50 年代，那些受过教育、掌握专业知识的非洲人并未得到白人的平等待遇，也没有获得与其受教育水平和资历相称的职位。很多有教养的非洲精英天真地认为，只有接受欧洲的知识、技术和宗教，非洲才有可能实现文明。可是，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间，却“出现了一股欧、美的伪科学思潮，认为社会是由一些固定不变的种族类别构成的，而黑人则是其中非常低劣的种族”。[37] 19 世纪下半叶，通过阿瑟·德戈宾诺、理查德·伯顿爵士、温伍德·里德等人的著作，这类种族主义思想广为流传。欧洲传教会和它们在非洲的教区牧师普遍接受这种种族主义思想，他们在教会和政府部门开始偏袒白人，歧视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主要是由于白人传教会对有教养的非洲人实行种族歧视，使之蒙受屈辱和深感愤慨，于是激起宗教和政治的民族运动，后称“埃塞俄比亚主义”；这个名称出自《圣经》，“埃塞俄比亚将很快向上帝伸出她的双手”。[38] 与 19 世纪初塞拉利昂爆发的“新斯科舍人”的独立运动相类似，这一民族运动也要求建立由非洲人自己控制的基督教教会，而且要适应非洲的文化与传统。这

[37] J. A. 霍顿(Horton)，1969 年，第 xvii 页(G. 谢珀森的绪论)；P. D. 柯廷，1964 年，第 28-57 页；R. 朱利(July)，1967 年，第 212-213 页。

[38] G. 谢珀森(Shepperson)和 T. 普赖斯(Price)1958 年，第 72-74 页。

种教会独立运动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在南非开始，然而直到80年代才趋成熟。1884年由滕布的卫斯理会牧师奈赫米阿·泰尔发起的第一个“埃塞俄比亚教会”（非洲人的独立教会）在南非成立，到1888年在西部非洲也组成了类似的教会，其发起人是（美国）南方浸礼会所属尼日利亚教会的领导集团。[37]值得注意的是，泰尔当时表达的愿望是“教会的教义要适应滕布人的传统”，他还补充说，“正如英国女王是英国教会的元首一样，滕布人的最高 53 酋长也应当是新的宗教组织的最高领袖（summus episcopus）。”[38] T.B.文森特（后改名莫约拉·阿格贝比）是早年尼日利亚教会分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89年他宣称，“基督教应该归属于非洲的土著居民，要由非洲人亲手来浇灌，用非洲砍刀来修剪，并且在非洲大地上培植……如果我们始终抓住外国老师的围裙带不放，像个婴儿，那将是个祸害。”他还主张，向他的信徒灌输“非洲人种的独立个性以及地方教会自立、自主、自治的思想，主张保留土著姓名、本地服装、健康的非洲习俗，并用本地语言做礼拜。”[39] 19世纪最后20年和20世纪最初20年间，“埃塞俄比亚主义”从南非逐步扩展到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

在西部非洲，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极力抵制和驳斥种族主义者散布的谬论和各种具体活动，发表大量论文、小册子、书籍和演讲，从而引起了这个时代的第二个独特的潮流——知识革命以及伴随而来的非洲民族觉醒、泛非主义和非洲人特性的发展。西部非洲这场革命的先驱者，无疑是詹姆斯·阿非利加纳斯·霍顿（1835-1883年）和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1832-1912年）。霍顿就上述有关问题发表过不少著作，其中有《英属西非的政治经济，以及几个殖民地和定居地的必备条件：一个非洲人论黑色人种在自然界的地位》（1865年）；《西部非洲的国家和民族：为非洲种族申辩》（1868年）；《有关黄金海岸政治情况的书信》（1870年）。在《西部非洲的国家和民族》中，霍顿驳斥了关于黑色人种天生低劣的谬论，指出白人与黑人文明程度的差别“完全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有些人听信所谓黑色人种天生低劣的臆说，甚至提出黑人在白人权威面前终将从大地上绝迹的荒谬论断，霍顿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

> 我们看到，在非洲黑色人种居住的任何地方……人口都繁衍增长，无论他们遭受多么沉重的压抑和重负；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非洲人是能够持久生存下去的民族。有人居然幻想他们会消亡，这种狂人就像现在被废止的美国奴隶制度一样，终究要下地狱。[40]

对臆测黑人不可能发展进步的谬论，霍顿也同样给予强有力的反驳。他说，“非洲人绝不 54 是不能发展进步的，在慈善而又出色的人的援助下，他们肯定会赶上时代的潮流，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取得显著的地位”。[41] 他在《有关黄金海岸政治情况的书信》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

[37] 同上，第72-74页；G.谢珀森，1968年；E.鲁，1964年，第77-80页；B.G.孙德克勒尔（Sundkler），1961年，第38-47页；D.B.巴雷特（Barrett），1968年，第18-24页；T.霍奇金（Hodgkin），1956年，第98-114页。

[38] 引自T.霍奇金，1956年，第100页。

[39] 引自E.A.阿扬代尔，1966年，第200页。

[40] J.A.霍顿，1969年，第69页；另见R.朱利，1967年，第110-129页；关于J.A.霍顿生平事迹，详见C.法伊夫（Fyfe），1972年。

[41] J.A.霍顿，1969年，第ix-x页。

> “罗马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建成”；欧洲最值得自豪的王国也曾经是野蛮的国度，其境况恐怕远较今日位于非洲西海岸的部落更为恶劣；然而，过去所能做到的如今也一样能做到，这是无可辩驳的公理。因此，如果说欧洲能逐步达到它现有的文明高度，那么，非洲也一定能提高到同等的地位，何况还有北方的文明做榜样。[42]

霍顿不仅谴责种族主义谬论，他还是泛非主义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正如乔治·谢珀森所指出的，泛非主义思想早在霍顿留学英国时即已在他头脑里萌生，这种思想与貌似科学的种族主义论调针锋相对，正因为如此，霍顿把自己原来的名字“詹姆斯·贝亚勒”之后加上“阿非利加纳斯”，此后写的作品全都署名为“阿非利加纳斯·霍顿”。[43]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霍顿所关心的不仅是种族和文化问题，他也十分关心政治独立问题。的确，他在创作《西部非洲的国家和民族》时，目的已不仅仅是“驳斥(损害非洲民族利益的)人类学家形形色色的谬论和偏见”，还在于提出“1865 年英国下院专门委员会拟设自治政府方案所需具备的各项必要条件”。[44]

霍顿的同时代人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写过更多的文章，思想更为激进，或许因此也更著名。[45] 布莱登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圣托马斯岛，早年移居利比里亚学习和生活，并在那里当过大学讲师和外交官，直到 80 岁高龄才去世。他出版过大量书籍和小册子，还在欧、美发表过多次演讲，主题都是谴责当时的种族主义谬论。他在本卷所涉时期出版的作品有：《非洲的殖民地化》(1862 年)、《为黑色人种申辩》(1857 年)、《血泪非洲为海外儿女的权利呼吁》(1856 年)、《寄望非洲》(1861 年)、《从西部非洲到巴勒斯坦》(1873 年)、《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黑色人种》(1887 年)。在上述这些著作中，他还主张“非洲属于非洲人”，鼓吹泛非主义，提倡保留非洲人的特性；在他看来，伊斯兰教和一夫多妻制似乎更适合于保持非洲人的个性，他坚持黑色人种要保持纯洁性和整体性，因而抨击异族通婚；他拥护“埃塞俄比亚主义”，尤其宣传黑人应有的种族自尊心。在 1874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布莱登赞扬曼德人和富尔贝人，因为他们不仅是穆斯林，而且在没有外族援助(或干涉)的情况下发展了民族观念和社会组织观念。他总结说：

55

> 自近代的进步过程开始以来，多少岁月已经逝去，可是非洲黑色人种深感屈辱；他们在人类文明的事业中处于从属地位。然而，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引人注目的现实是这个种族面临着任何其他民族均无法承担的任务。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他们将在他们遭受奴役的地区和他们父辈的故土上完成这个其他民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瞻望前景，掌握本族现有的权利——抓住艰苦工作的时机，忍辱负重去争取宏大的成果——我深感荣幸，自己是这个种族的一员，而不是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也不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或 19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46]

---

[42] J.A. 霍顿，1970 年，第 i 页。
[43] J.A. 霍顿，1969 年，第 xvii 页(绪论)。
[44] 同上，第 vii 页(前言)。
[45] 详见 H.L. 林奇(Lynch)，1967 年；J.S. 科尔曼(Coleman)，1958 年，第 106-107 页、175-176、183-184 页；R. 朱利，1967 年，第 208-233 页。
[46] 引自 H.S. 威尔逊(Wilson)，1969 年，第 239-240 页。

1880年5月间，布莱登还在他对美国殖民协会发表的著名演说中，宣扬“埃塞俄比亚向上帝伸出她的双手”这句《圣经》上的名言，并且把埃塞俄比亚人和非洲人等同起来；正是他1893年5月19日在弗里敦演讲时首先用“非洲人的特性”这个词来表明非洲黑色人种是“一个伟大的种族，它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大的忍耐力，又有远大的前途”。他接着说：

> 如果有些非洲人，尤其是有机会接受外国培训的非洲人，不顾人类的根本实情而妄称“让我们抛弃种族感情，让我们抛弃非洲人的特性，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同化于异族……”；无论你如何反复宣传，都不会有人响应，因为谁都不能这样做；一旦你真的放弃你的特性，那就等于抛弃你自己……每个人和每个种族都有责任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因此，要热爱你的种族，忠于它，并以它为荣……假如你不能体现自己，假如你抛弃你的特性，那你就对世界无所贡献……[47]

这个时期知识革命的另一位主要领袖是詹姆斯·约翰逊(约1836-1917)。他是约鲁巴-克里奥尔人，一位充满激情的福音传教士。同霍顿一样，他也出生于塞拉利昂，曾就学于弗里敦文法学校和福拉湾学院，1960-1963年在该院任教。他后来加入圣公会的正教传教会，1874年被派到尼日利亚，在拉各斯主持著名的布雷德弗鲁特教堂。1876年，他被任命 **56** 为圣公会正教传教会在约鲁巴兰内地所有传教站的主管，只因为他是“黑人”，终于在1880年遭到免职。[48] 在詹姆斯·约翰逊的布道演讲、书信和论文中，他不仅鼓吹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且拥护“埃塞俄比亚主义”；在西部非洲，“埃塞俄比亚主义”从未像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那样成为一种反政府的分离论，而是与全非洲认同，颂扬黑色人种的成就并使之带有浪漫色彩，支持黑人在教会管理以及文官政府争取权力及地位的斗争。

詹姆斯·约翰逊不同于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但是他却和布莱登一样，宣扬“非洲属于非洲人”的思想，通过布道、演讲和写作，他使“埃塞俄比亚主义”的观念普及化了。[49] 他与同时代的克劳瑟主教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积极主张由非洲人自己在非洲传教布道——传播福音，同时他也强烈谴责盛极一时的所谓黑色人种品质低劣的谬论。他相信一个独立的非洲教会必将出现，它将消除一切宗派主义，团结全非洲的所有基督教徒，“使他们组成一个非洲人整体”。[50] 他坚决主张非洲人的教会各个层次都应该完全由非洲人员组成，因为“欧洲传教士根本不可能了解非洲人的种族气魄和气质特性”。他强调说，未接触过欧洲人的非洲人，“体魄强健、性格刚毅、勇敢无畏、自强自立和勇于克服困难”，而欧洲人的到来阻碍了非洲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非洲人的这些品质。[51] 1881年，约翰逊被指控反对白人，他反驳道：

> 对现今的传教士来说，一个非洲人坚持独立思考和明确表达他的信念，就是大逆不道。在他们看来，非洲人无权利可言：他必须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听从别

[47] 同上，第249-250页。
[48] E.A.阿扬代尔，1966年，第195-196页；R.朱利，1967年，第197-207页。
[49] E.A.阿扬代尔，1966年，第187页。
[50] 同上，第187页。
[51] 引自E.A.阿扬代尔，1966年，第191页。

人的意见，决不能流露出一点爱国心；他必须去除自己刚毅的性格，不留一点种族感情的痕迹；还要放弃自己的特性和人格，以便和他们和平相处，或取得有利的推荐在教会中任职。[52]

他这种观点使欧洲传教士感到惊恐，1880 年他被免去约鲁巴兰内地的教职。

57 知识分子的这一类活动，同样盛行于非洲其它地区，尤其是安哥拉和下文将要谈到的埃及以及北非其它国家，有关论述见于埃及学者谢赫·里法阿·塔赫塔维(1801-1873 年)等人的著作。[53]

从这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的见解以及他们的著作显示的学术及知识水平、丰富的论证经验、尖锐的逻辑推理、各种论著的充实内容来看，毫无疑问，在非洲各个地区，特别是西部非洲，都发生了一场真正的知识革命。由此产生出“埃塞俄比亚主义”、泛非主义、非洲人独有的特性和人格、宗教和政治独立运动，促进了黑色人种新的觉悟，他们的自尊自信意识得到发展。

新的政治动向

在本卷探讨的时期，除人口变迁和宗教革命之外，非洲还有两方面的动向引人注意。这就是政治动向和经济动向。作为时代标志的新的政治动向，主要表现为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化、现代化或称复兴运动，有些国家缔造和实行宪政，有些受过教育的新的精英加入旧的政治结构，最后是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对抗。

虽然一些旧的帝国——诸如西部非洲的阿散蒂和奥约、中部非洲的卢巴帝国——实际上已经解体，但在这一时期，加强集权化的政治动向在非洲更为普遍。索科托帝国、马西纳帝国、哈吉吉·奥马尔的帝国，还有萨摩里的帝国，正是 19 世纪非洲政治集权化趋势的典型例证。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恩古尼人的迁移运动也形成同样的后果。中央集权化的其它典型事例还出现在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布干达。

19 世纪初，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各自仍处于许多独立的邦国相争阶段。然而，到本卷所述时期结束时，如下文将阐述的，[54] 埃塞俄比亚基本上是通过军事征服方式，在中部邦国之一绍阿的领导之下实现了统一，绍阿国王曼涅里克二世于 1889 年获得了这个联合王国皇帝的称号。在此同时，马达加斯加中部的伊梅里纳王国，在国王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1782-1810 年)及其继承人的领导下，同样通过军事征服，几乎合并了该岛北部、东

58 部及中部的所有邦国。这两个王国在征服过程中，都曾企图将中央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推广到其它地区，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这一过程直到 20 世纪初期尚未结束。

在西部非洲，有两个新建的国家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废除奴隶制运动和种族竞争的成果——塞拉利昂建于 1787 年，利比里亚成立于 1820 年(同时，利伯维尔城在赤道非洲建立)。大约到 19 世纪末，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国不仅有能力合并内地的许多

---

[52] 引自 E.A. 阿扬代尔，1966 年，第 191 页。

[53]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7 卷，第 21 章；本卷第 13 章。

[54] 见本卷第 15、16 章。

独立邦国，而且还靠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成功地组建为民族国家。塞拉利昂是克里奥尔人的国家，利比里亚则是美洲黑人的国家。在组建民族国家的事业上，塞拉利昂无疑要比利比里亚更有成效，因为塞拉利昂文化不是从别处移植来的，它是非洲本地人、新斯科舍人和英国移民在弗里敦及附近地区的环境中融合而成的文化。[55] 克里奥尔人就是这种充满生机的文化培育出来的，他们在西部非洲的传教会革命和知识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的扩张领土和中央集权化过程也在埃及和大湖地区开展；在大湖区，布干达人、布隆迪人和布尼奥罗人都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和影响，主要是企图控制生产和交换手段。

除了中央集权化的动向外，19世纪还有另一种全新的现象，即现代化趋势或所谓“复兴运动”。在本卷所述时期之前，欧洲与非洲的联系大体上仅限于沿海地区的外围。到本卷所述的时期，由于欧洲工业的影响逐步扩展到内陆地区，首先是探险家，接着是贸易商和传教士纷纷来到非洲，这种联系逐步扩大到内地。欧洲人与非洲内地的联系及其影响，已不仅是枪支弹药的输入，还逐步发展到铁路、电讯、农业和矿山机器、印刷、技术教育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金融资本。这些方面的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和危险。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非洲各国的统治者和他们的顾问主动作出反应，这正是19世纪非洲史最引人注目的最新特点。从大多数情况看，非洲各国并不是简单的盲目模仿或全盘抄袭，而是适当引进和综合应用。非洲式的现代化进程确实有大量的例证。[56] 埃及于1822年在开罗的布拉克开办了第一家印刷厂；葡萄牙人统治下的罗安达于1841年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阿尔及利亚于1845年、黄金海岸于19世纪70年代创办了第一个现代矿场；其它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突尼斯，投资兴建公共工程；北部非洲各国大都同埃及一样实行了货币制度改革。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还办起了棉纺织厂、锯木厂、玻璃厂和造纸厂。 59

然而，军事方面的现代化进程更引人注目，其影响也更深远。面临欧洲势力的入侵，非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各国，都按照当时的新模式，对它们的军队实行了整编和训练，配备武器，补充兵源。例如(下面各章将逐一阐述)：摩洛哥在非斯创办了一所工程学院，训练炮兵、测量员和制图员，并派军人出国受训；突尼斯在艾哈迈德贝伊统治下，不仅按西方模式改组了它的军队，采用了西方技术和训练方法，而且建立了制造新式枪炮及其它军事装备的工厂；埃塞俄比亚在特沃德罗斯和曼涅里克统治时也废除了无饷征兵制，由职业军人组成装备精良的军队，并创办了制造火炮和迫击炮的工厂；萨摩里·杜尔也改编了他的军队，使之现代化，并配备当时的一些新式武器。由于这些改革，使萨摩里·杜尔和曼涅里克在19世纪最后20年能够长期坚持与帝国主义列强相抗衡。但是，本卷下面某些章节也将指出，这种现代化进程主要是靠欧洲的高利息贷款来实行的，这就为本卷所述时期结束前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侵吞提供了基础和借口。

立宪政治的现代化步骤也已开始。毫无疑问，这在非洲许多国家，部分地是由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和“乌里玛”('ulamā'，伊斯兰学者)的人数大增，他们自然要在政界争取发言权，所以着手进行了一些立宪政治的实验。事实上，19世纪前半期富尔贝人的“圣战”，可

---

[55] 详见L.斯皮策(Spitzer)，1974年；A.波特(Porter)，1963年。

[56] 见本卷第13、15、16、17章。

以说就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乌里玛”中新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而19世纪后半期的乔拉人起义也可以说是受过教育的商人阶级对保守的上层统治集团的反抗——伊夫·佩尔松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57] 在非洲其它地区，特别是西部沿海地区，这种矛盾并不是用军事或暴力手段来解决，而是找到了更合乎立宪政治的途径。的确，在本卷所述时期，受过教育的精英还没有取代贵族官僚而成为全国性民族领导人的意图。直到20世纪20-30年代才出现这种要求。当时他们还追求在立宪制度下调和矛盾，并与贵族官僚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约鲁巴人大迁移后立宪政治的经验。然而没有证据 60 说明这种趋势比黄金海岸芳蒂人的邦联制度更优越。1874年，芳蒂人制定了邦联宪法，其中第4、5、6条规定：[58]

> 应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副总统、国务部长和副部长、正副司库。
>
> 总统应从国王中选举产生，并宣布他是芳蒂邦联的国王兼总统。
>
> 由副总统、国务部长和副部长、正副司库组成内阁、担任上述职务者必须受过教育并有适当地位。

这部宪法所规定的芳蒂邦联的宗旨也很值得注意。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促进芳蒂各邦国王及酋长的友好交往，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在邦联各内陆地区修筑“宽阔而坚实的公路”，不少于“15英尺宽，两侧挖掘高质量的明沟”；在邦联境内为所有儿童开办学校，“聘请胜任的校长和教师任职”。此外，邦联政府还应促进农业和工业，引进“能成为国家商业赢利资源的新作物”；最后，还应发展和改善国内矿业及其它资源的开发。这部宪法特别强调男女均应接受教育以及大力开展行业技能培训。其中第22条规定：

> 师范学校应附属于全国性的学校，以便教育和指导学生成为木匠、砖瓦匠、锯工、细木工、农业技师、铁匠、建筑师等等。

这部邦联宪法的宗旨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和时代性确实令人惊异，而宪法所体现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统治集团之间和谐的合作精神，也的确有其革命意义。如果阿非利加纳斯·霍顿在他的著作中宣扬的那种具有勇气胆识的合作精神能够落实，实施宪法的计划能够完成，可以想象黄金海岸以致整个英属西非的历史进程将全然不同。可是，由于下文将说明的种种原因，英国于1873年扼杀了这个有勇气、有意义的创举。[59]

在阿贝奥库塔组成的埃格巴族联合协议委员会，也进行过同样的立宪政治实验。据阿非利加纳斯·霍顿称，该协议委员会宣布的目标是“指导本地政府，推动文明进程，促进 61 基督教精神的传播，保护欧洲商人和英国臣民的财产”。[60]第三个例子是格雷博王国的宪法。伊夫·佩尔松指出，它是模仿芳蒂邦联宪法制定的。

上述几例足以证明，政治领域如同宗教领域和人口变迁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当今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诸如：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统治集团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政治独立的主张、泛非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种族歧视现象，等等，根源都在19世纪。

---

[57] 见本卷第24章。

[58] H.S. 威尔逊，1969年，第214页；全文见第213-218页。

[59] 见本卷第25章。

[60] J.A. 霍顿，1969年，第151-153页。

新的经济动向

在经济领域，这个历史时期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而且同其它领域的新动向一样引人注目。最显著的变化，自然是众所周知的奴隶贸易被废除和受到抑制，农产品取而代之，大量出口。这种出口贸易被错误地称为“合法贸易”，完全是典型的欧洲人的腔调。这一变革虽然影响十分强烈，但进展却相当缓慢。如下文将进一步说明的，19 世纪前 60 年，在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非人道的贩奴活动仍然十分猖獗[61]。直到本卷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之末，农产品的出口尚未完全取代奴隶贸易。

上述变革广为人知，可惜许多学者并不理解其深远的意义。变革的关键并不在于从所谓的“非法贸易”转化成为所谓的“合法贸易”，其真正的要害在于经济收入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上层统治集团原来霸占的经济收入逐渐转移到平民手里。奴隶贸易原来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它是由各邦国王及其军事将领及顾问大臣们垄断的，大宗收入归他们所有。随着自然产品的交易取代奴隶贸易，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村居民)可以生产或采集的棕榈油、花生、棉花、树胶、蜂蜜、蜂蜡、柯拉果等产品逐渐增多，于是就引起经济收入的重新分配，结果不仅在城市和市场集中地而且在农村地区都出现了新的富有阶层。总之，在本卷所探讨的这个时期，可以找到现代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源。

同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还引起另一种后果，这就是非洲经济——不仅是对外贸易，而且还包括内部的或农村的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结合成一体。不幸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在非洲并没有伴随相应的生产手段的变革。换言之，在农产品出口贸易 **62** 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并没有技术革新，农产品在出口前也未经加工制作。因此，这个时期非洲还不能发展可以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欧洲经济相竞争的经济，以致随后几十年灾难重重。

学者们还往往忽视 19 世纪另一个有意义的经济变化，这就是非洲逐步完成了它的商业大一统。尽管穿越撒哈拉的商路和穿越达尔富尔直达尼罗河流域的商路历史悠久，早已存在，但 19 世纪初期还没有连接中非和东非的商路，也没有连接中非和北非的商路，无法纵贯整个非洲大陆。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左右，中非、东非和北非之间才有了紧密相联的商旅之路。这些商路是由于东非的阿拉伯人、斯瓦希里人、尧人、尼扬韦齐人、坎巴人；埃及和苏丹的阿拉伯人；中非的蒂奥人、奥文本杜人和乔奎人需要相互展开活动才开辟的。这些商路的开通，使非洲实现了商业大一统。加强了非洲内部的联系，并且使非洲的企业家、中间人和贸易商大量增加，进一步促使非洲内地对欧洲的开放，阿拉伯/斯瓦希里人的商业势力也随之增长起来。然而，大批工业产品的涌现后来却造成非洲极为悲惨的结局——这就留待《非洲通史》第七卷来详细阐述了。

---

[61] 见本卷第 4 章。

结 束 语

最后，让我们再考虑一个问题。简单地说，如果不存在殖民地化这个插曲，非洲又会是什么样子？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清二楚的，无须先知或预言家来回答。如果未曾出现殖民地化，上述各种新动向中的大多数肯定会继续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政治上，中央集权化的趋势会日益强盛，其结果必将演变成为民族国家或类似的政治实体，它们是自然形成的，比后来欧洲列强争夺和瓜分非洲时建立的国家更顺应时代潮流。芳蒂邦联和埃格巴族联合协议委员会的立宪实验也很可能早已获得成功，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贵族统治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很可能已经确立，而这种关系在殖民地统治下和新殖民主义的情况下是很难稳定的。在社会领域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肯定会继续得到传播，即使在殖民地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西方教育以及技术学校和综合科技学校的兴起也会加快步伐，而不至于停滞不前。同时，随着贯通大陆的商业公路的开通，非洲内部的联系和交通会四通八达，非洲会变得比现在更内向和自信。尤其重要的是，种族特性、泛非主义以及埃塞俄比亚主义和“非洲属于非洲人”等口号的势头也会更加强劲，促使非洲早日实现思想和精神上的统一，即使政治上的统一一时尚难完成。可是，令人痛心的是，殖民地化使这些健康而美妙的迹象烟消云散。

63

综上所述，19世纪确实是一个很有生气的革命世纪。许多新的动向和历史进程不断发展，在各方面所造成的效果都明显地标志着非洲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这一时期也显著地表现出非洲人民有能力对付一切新挑战，显示出他们的创造精神，接受和适用新技术和新思想，并能应付环境的千变万化。这一时期还证明非洲人民在政治、社会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知识领域的成就，比经济领域的成就更为显著。在本卷论述的这一时期的后期，大多数非洲国家已享有自治权和主权，非洲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已能够与他们的欧洲评论家相匹敌。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学术和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就是毫无疑问的，但技术和经济方面并没有取得与之相应的成就。因此，在这一时期之后，非洲未能加强其经济及技术的基础，无力抵挡猛烈的帝国主义风暴席卷非洲大陆。这就是非洲遭到瓜分和征服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以至从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结束之后，非洲不可避免地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

（张文淳 张元一译）

4 废除奴隶贸易

S. 达格特

本章并不准备全面评估 19 世纪非洲各方面变化的重要意义，也不是对整个奴隶贸易现象作全面考察，即使是跨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以及阿拉伯人从事的贸易也是一笔带过，留待有关领域的专家进一步分析。本章的目的旨在从广义上概述西方世界在禁止奴隶贸易(大部分黑奴运往大西洋彼岸的美洲种植园)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试图综述该项贸易由兴变衰、最终彻底结束的背景及所造成的一些后果。要对废除奴隶贸易这一现象有全面和明确的认识，尚需进行大量调查研究，重点应放在收集和分析口头传说上，这才是掌握资料的主要途径。 64

并非所有非洲人都曾卷入奴隶贸易。有些内陆居民根本不知道奴隶贸易。沿海某些地方的人们曾奋起捣毁贩奴船，船员不得不支付赎金才能获得释放。另一些地方整个政治体制和阶级结构均因奴隶贸易而分崩离析。还有一些地方实行独裁和极度排外的体制，以此积聚力量，此时，黑人和白人的利害关系反而因这桩盛极一时的买卖而趋向一致。在沿海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这一分支中，某些掌握产出和分配可供出口人力资源的非洲人十分成功。在 18 世纪，他们用 700 万左右的人换回价值三亿皮阿斯特的货物，专用于所谓“几内亚贸易”，其中包括大约 8000 万件武器。同一时期，在跨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中，卖往他乡者超过 70 万人，在印度洋贸易中，大致有 20 万人。经过中途贩运，活着抵达终点的非洲人大致有 600 万(其中 40%是妇女和儿童)，可供贩奴者交换，由奴隶生产的产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售价越来越高。但是，一些欧洲有识之士，原则尚存，良知未泯，因而义愤填膺，纷纷指责人们所吃的食糖充满了“世界上被遗忘者”的鲜血，要求废除奴隶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

废奴主义的思想并非因非洲而获得灵感。它所针对的是大西洋地区的奴隶主和贩奴者，至于对跨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和阿拉伯人从事的贸易，并未显示出任何兴趣和关注。它采用的形式以道德哲理为基础，作为一种动力其功效十分有限。然而，整整半个世纪，废奴主义运动和“文明的”非洲正式支持西方对西非沿海地区日益增强的压力。1860 年左右，西方在西非沿海地区的存在已成定局，在此之前，还只是个别存在和次要的，有时甚至遭到禁止。类似的动向，也出现于北非和东非，从 1830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世纪末。 65

西方推动禁止奴隶贸易

整个 18 世纪，哲学家、神学家和人类学家不断改进他们对争取自由、追求幸福这一人

类普遍拥有的权利的认识，力求完善其定义。正当此时，他们碰到了如何看待非洲人和这一人种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问题。他们经过思考，否定了通常对非洲黑人和美洲奴隶的看法，认为他们不是专供做苦役用的牲畜，而是有道德和社会性的人。他们提出“黑人也是人”的口号，含蓄地抨击了“买卖非洲黑人正当、合法、实用”这一普遍认同的观点。他们的人道主义论断强烈要求废除奴隶制，在他们看来，奴隶贸易有百害而无一利。

奴隶贸易使鼓励和资助它的国家流血不止。它使成千上万白人死于非命，千百万黑人惨遭杀害，无数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人背井离乡，在美洲沦为奴隶，一无所有。它使非洲沿海贸易无法实行多样化。它使黑色大陆永远处于愚昧、不开化的状态，这就是被人们认为唯一了解非洲的西方人——奴隶贩子的观点。废奴主义者痛斥奴隶贸易是祸害，但是并不期盼，也不强求黑人贸易商和白人奴隶贩子立即改变立场。相反，他们提出一项方案，主张通过“传教”、“文明”、“正常贸易”使非洲得到复兴，并提出合理的分阶段实施过程，即：改变基督教社会的公众舆论，说服所谓的“文明”政府设立官方职位、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应按法律程序予以禁止。

18 世纪，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和雷纳尔神父的作品(经狄德罗修订)使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产生一种厌恶奴隶制的情绪。这种清高而又世俗的思想潮流从远方带来对“黑人之友协会”(盛传该协会由英国资助)理想的支持。当时，法国的革命家们对奴隶贸易这种客观现实漠不关心，对他们的新意识形态能否得到公众的支持也并不在意。英国当时的情况则不同，新教福音布道再次盛行，以此为基础的神学说教使普通百姓普遍受到以慈悲为怀的教育。至于美国的清教徒，一方面断然放弃奴隶贸易，一方面劝说英国清教徒参加英国废奴运动。[1] 与此同时，政界人士也不断接受思想灌输。克拉珀姆教派是发动这种钳形攻势的先锋，他们在英国下院通过威廉·威尔伯福斯之口，年年为废奴而大声疾呼。经过与奴隶主和贩奴者设置的重重障碍连续 20 年的斗争，1807 年 3 月 25 日英国终于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其实，英国已是禁止奴隶贸易的第二个西方国家，早在 1802 年，丹麦已作此决定。1808 年，美国宣布清教徒单独作出的决定具有普遍效力。各国政府随之作出类似的人道主义决策，这种举动最为积极的提倡者是英国，而正是英国的奴隶贩子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把大致 160 万非洲人强迫装船运往它在美洲的殖民地。

理想化的作品把这种人道主义革命描绘成翻开了“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但 1944 年发表的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一份分析报告却给这种描述以无情抨击。根据该分析报告作者埃里克·威廉斯的论断，以合法贸易取代奴隶贸易，首先是由于英国作为一个初露头角的工业国家的经济需要。[2] 当然，这一有重大影响的论断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哲理以及富有理想色彩而又确实取得进展的人道主义主张所起的积极作用。然而，该分析提醒人们注意，这种美妙的理论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废奴主义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中，有不少是银行家(法国“黑人之友协会”也存在同样情况)，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废除奴隶贸易而获益甚多。当时奴隶贸易使得位于古巴和巴西的奴隶种植园兴旺发展，

① R. 安斯蒂(Anstey)，1975 年，第 9 章各处。
② E. 威廉斯(Williams)，1944 年，全书各处。

废奴主义者的理论根本无力扭转这种强劲的潮流。同样，所谓的“人道主义”力量也无力控制统一食糖进口税所带来的后果，当时种植园远未达到机械化的程度，仍急需补充大量黑奴劳动力，这正是蔗糖种植园主梦寐以求的，而统一食糖进口税则必然导致这一后果。埃里克·威廉斯令人振奋的论断的主要功绩或许在于促成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因为经济领域的辩论仍在继续。以后，西摩·德雷斯切尔证明禁止奴隶贸易是一种“经济自杀行为”，而罗杰·安斯蒂则强调英国的慈悲心怀植根于诚心和善意。[3] 看来，在废奴主张的政治因素方面，历史学家相互间意见不一致之处较少。

英国曾连续两次建议各国统一禁止奴隶贸易，一次是 1787 年，另一次是 1807 年，但均无效果。唯有葡萄牙在 1810 年作出一些模糊的承诺，作为交换条件，它要求英国同意其货物进入英国市场。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世界饱受战争摧残，到处是一片废墟。1815 年缔结的和平，开放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供海上贸易和运送奴隶。在维也纳会议上，英 67 国采取一系列外交措施，力争会议能明确地谴责奴隶贸易，但所得到的在维罗纳重申的宣言仅仅是一纸空文，一再拖延时日。到了 1841 年，英国外交部和英国海军借坚持官方禁止奴隶贸易的精神，终于获得双方共同执行禁止国际奴隶贸易战略所需的权力。英国执行的是一项激进的三方面齐头并进的行动计划：第一方面，在英国国内通过立法，宣布本国臣民从事奴隶贸易为非法；第二方面，与其它国家签订一系列双边条约，缔约国的海军享有互检权，可以在海上检查和扣留有贩奴嫌疑的商船；第三方面，设立混合委员会，通力合作，授权这类混合委员会对被扣留的奴隶船进行裁决，船上的奴隶一律释放。同样的措施也适用于印度洋，特别是毛里求斯和波旁岛(现名留尼汪岛)之间的海域。

上述行动计划主要是迎合一部分思想开明和慈悲为怀的公众。况且，并非所有国家的经济都有条件漠视英国主顾和英国货物。陷入困境面急需伦敦方面给予支持的政府发现，赞同禁止奴隶贸易，与真诚合作一样能获得英国的欢心。另一方面，上述行动计划也是针对某些反对禁止奴隶贸易的国家，因为它们的利益面对英国采取的一系列强制禁止奴隶贸易的措施，反正要遭受损失。这些国家只能强调维护本国主权，以此反对禁止奴隶贸易，因为检查权和联合委员会均可以看成是部分损害主权的行为。这些国家认为禁止奴隶贸易是英国为了获得世界霸权，以皇家海军为后盾而采取的计谋。它们反对废除奴隶贸易是因为它们的海军、殖民地和贸易利益必将因此遭到损害。葡萄牙、西班牙、美国和法国大量使用和销售种植园由奴隶生产的棉花、食糖、咖啡、烟草，而这些种植园完全依靠向巴西、古巴、美国南方各州、西印度群岛输入非洲黑奴而维持生存。海运代理商也直接受到影响，他们无论是吸收投资，还是为地方经济提供就业机会，都是从开展奴隶贸易获取利润。

丹麦、荷兰和瑞典，尽管某些较小的殖民地仍保持奴隶制，却同意实施对等的强制禁止奴隶贸易措施。[4] 在获取优厚的补偿作为交换条件之后，西班牙与葡萄牙也在 1817 年表示接受强制措施，但葡萄牙仍保留在赤道以南合法从事奴隶贸易的权利，这种贸易一直继续到 1842 年，英国威胁实施严厉的军事制裁才不得不告终。西班牙强化了它的反奴立法，

---

③ S. 德雷斯切尔(Drescher)，1976 年，第 427 页；R. 安斯蒂，1975 年，第 1、2 章各处。

④ S.E. 格林-佩德森(Green Pedersen)，1976 年；E. 埃克曼(Ekman)，1976 年；P.C. 埃默(Emmer)，1976 年。

并与伦敦政府订立协定。但是，古巴继续保持奴隶贸易直到1866年，这一年西班牙通过了它的第三个废奴法律。由于岛上的种植园主威胁实行分治，西班牙的议会、国务委员会和68 财政部不得不退让。[5]英国有条件地允诺在法律上正式承认巴西，导致这一新成立的帝国同意缔结1826年的强制禁止奴隶贸易条约，即使如此，巴西的奴隶贸易还是有增无减，一直继续到1850年。次年，奴隶贸易终于结束，但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英国皇家海军进入巴西领海清除贩奴船，此外，咖啡主要依靠在英国市场上销售，巴西的咖啡庄园主们纷纷自告破产，以清偿对贩奴经纪人的债务，而当地的白人居民则担心黑人人口不断增加。[6]

政治上比较强大的国家对英国压力的反应各不相同。法国热衷于追求声誉和威望，它通过虚张声势的立法以及海军在沿岸和领海中同样执行不关紧要的巡逻任务，继续保持行动自由。实际上，在1815至1830年期间，法国非法走私贸易装备了729次运送奴隶到西非和东非沿海的航行。但是，当它发现这类活动无论在财政收入上，还是在社会声誉上、都不再可能对法国的港口带来任何好处时，法国政府又同意签署对等互检协定。当然，1830年革命之后掌权的法国君主政体需要与英国改善关系，这也是法国同意签订协定的另一原因。[7]法国这种政策上的大转弯导致几个小国也加入了1831年至1833年的几项条约。英国趁机加强它使奴隶贸易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活动，并将海军强制行动扩大到整个大西洋和印度洋。禁止奴隶贸易条约也增补了一项"设备"条款，允许扣押具有明显贩奴设备的船只，即使船上未发现奴隶。但是，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贩奴船仍然不接受检查。整整40年，美国推行的外交政策千方百计逃避承担任何认真的承诺。1820年，奴隶贸易正式在法律上被视做等同于海盗行为；1842年达成"核查国旗"的妥协方案，从而保护了美国人，使之摆脱英国的强制行动，而美国的80-火炮巡逻舰所起的作用，实质上是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同时，纵容奴隶贸易，使检查流于形式。19世纪40年代，美国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主纷纷呼吁法律上允许重新开放奴隶贸易，同时设置专门农场，繁殖新一代的奴隶以供应国内市场。[8] 直到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主动表示同意签订有权互检可疑船的协定(此事在1820年前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美国的奴隶贸易才告结束。

半个世纪以来积累了大量文件，但是，这些文件所能说明的仅仅是人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收效甚微。大量的文字材料纷纷涌来，提及非洲和非洲人的极为少见，好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非洲。海运代理商大发横财，在此期间，他们获得的暴利远远超过法律所保护的贸易，[9] 而奴隶种植园也在大量积累人力资源。

69 种植园主抵制废除奴隶贸易，各有其原因。他们对废奴主义团体的主张无动于衷，认为不过是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和武断臆测。按照他们的观点，废奴丝毫无助于"牲畜一样的奴隶种族改善命运"。[10] 拥有奴隶可以提高社会威望，而由于缺少白人移民所形成的人口状况也有助于奴隶制度的延长。总之，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对奴隶劳动产品的需求有增无减，

---

⑤ A.F. 科温(Corwin)，1967年。
⑥ L. 贝瑟尔(Bethell)，1970年，第11、12章。
⑦ S. 达格特(Daget)，1983年。
⑧ E.D. 吉诺维斯(Genovese)，1968年，第131-132页。
⑨ P.E. 利文(Leveen)，1971年，第27页，表3。也见R. 安斯蒂，1976年，个人信件。
⑩ 引自S. 达格特，1973年。

另一方面则禁止输入提供这些产品所不可缺少的劳动力，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种植园主更加有力地抵制。巴西咖啡的出口量在1817年至1835年间增加了十倍，到1850年又增加了三倍。古巴糖的出口量在1830年至1864年间增加了四倍。[11] 1846年英国通过统一国内市场食糖进口税而采取的一系列自由贸易措施，看来是助长了奴隶制庄园的生产。历史学家对这项创新所造成的后果是否促成了奴隶贸易的复苏有不同的看法。[12]但是，在奴隶贸易有所衰减的古巴，1851至1860年的十年间，输入新的奴隶比1821至1830年增加67%。在英国实行统一进口税的五年间，输入巴西的奴隶也比前五年(1841-1845年)增加84%。[13]在每个奴隶的买价低于600美元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抵消了美洲种植园主进口新奴隶的费用。直到1860年，情况一直如此。[14]

强制措施的执行情况

不仅仅是西非海岸有舰船执行任务。1816年伦敦会议上，法国建议对北非"巴巴里海岸"的奴隶贩子采取行动，但遭到否决，被认为是企图转移视线，让人不再注意在大西洋采取强制措施的迫切性。但到了1823年，法国通过一项法令，禁止本国的船只运载奴隶跨越地中海。采取这一步骤的政治背景与奴隶贸易本身关系不大，它涉及与西班牙的战争、希腊人的解放以及支持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等事态的发展。简而言之，这是法国力图在周围都是陆地的整个地中海称王称霸的政策的一个部分，早在法国决定直接干涉阿尔及利亚之前即已开始策划。此时，英国看来已经丧失领导权，它的军舰活动未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效果。强制性的军事行动在印度洋某些海域见效更为明显，特别是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一带，英国军舰捕捉到法国的贩奴船。这个时期，看来也有一些英国船，从毛里求斯出发，到马达加斯加贩运奴隶，当时塔马塔夫地区是在让-勒内酋长的统治之下。如果一艘船遭到"国际"扣押，船上的非洲奴隶将没收，然后将船只交还，事态即告平息。如果扣押船只的是某个国家的舰艇，贩奴船将交付法庭审理，但这并不意味船上的奴隶能获得自由。通常这些奴隶会不知去向，也就是说，他们被分散到种植园去。长期以来海关当局对这类情况往往视而不见。 70

法国也曾在美洲海域里抓到本国的贩奴船，并把它们押送到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由那里的法庭进行审判。当时法国正醉心于把圭亚那吞并为殖民地，因此，按照巴黎的指示，抓获的奴隶被押送到卡宴城。如果是根据双边条约采取强制行动，则由混合委员会进行宣判，判决的对象是贩奴船，而不是奴隶贩子。至于大西洋美洲一侧的混合委员会效率如何，完全取决于当地奴隶种植园的普遍态度。在古巴，1819至1845年期间总共有714艘贩奴船

---

[11] L. 贝瑟尔，1970年，第73页，注4和第284页。F. W. 奈特(Knight)，1970年，第44页。

[12] F. W. 奈特，1970年，第55页，他不认为采取该项措施之后情况有所不同。持相反观点者有：P. E. 利文，1971年，第78-80页；H. 坦珀利(Temperley)，1972年，第164页；D. R. 默里(Murray)，1971年，第146页。

[13] D. R. 默里，1971年，第141-147页。参见：H. S. 克莱因(Klein)，1976年，第67-89页；L. 贝瑟尔，1970年，附录第388-395页。

[14] P. E. 利文，1971年，第10、72页和以下各页；F. W. 奈特，1970年，第20页；参见：A. F. 科温，1967年，第135-144页。

遭到扣押，但当地的西班牙-英国委员会仅只判决其中的45艘有罪。可是，当宣布西班牙当地巡逻舰队的水手抓到贩奴船有赏，奴隶贸易最后十年一下子就抓到了50艘贩奴船。在苏里南和巴西，混合委员会的情况也并不比这好多少。[15]整个美洲海域，一般只有五分之一的贩奴船遭到扣押，尽管1840年左右这一海域总共有不同国籍的70艘军舰在执行强制行动任务。

在西非海岸，被扣的贩奴船更少。荷兰、葡萄牙和美国的海军巡逻舰队执行任务时断时续。其中，美国巡逻舰队的指挥官往往来自南方各州，基地位于佛得角，远离交通要道。这是利比里亚建国之初的情况。至于巡逻舰的外观一直到1842年都没有变化。按与英国签订的条约规定，将会有四、五艘军舰出现，但这一直停留在理论上，并没有成为事实。1839至1859年期间，有两艘美国贩奴船被截获，船上满载奴隶。到1860年，被扣船只达到七艘，船上的奴隶后来成为利比里亚的居民。

71 正常执行巡逻任务的只有两个舰队——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法国早在1818年就建立了巡逻舰队，在1831年前一直独立，基地设在戈雷岛，当初这是一个奴隶贸易的分配中心，1823至1824年间关闭，成为基地之后经常有三至七艘军舰从这里出发从事搜寻贩奴船的活动，但最初四年并没有执行强制禁止奴隶贸易的任务，这是因为法国政府的真实意图仍游移不定。伦敦政府指责法国背弃原则，不负责任。法国的废奴主义者也指控海军部与奴隶主利益集团相勾结。但到了1825年，法国海军部悬赏每没收一名奴隶可得100法郎的奖金。于是，在海上遭到扣留而被押送法庭的贩奴船增至30艘左右，这样，被宣判的贩奴船总共超过100艘。从理论上说，由此而不致被送往美洲服苦役的非洲奴隶应该超过数千人，但实际上这些黑奴虽然并没有被押到美洲的卡宴城，却以“应征劳工”从事公共工程的名义送往塞内加尔。1831至1833年签订的协定，也因缔约国维护国家尊严和进行激烈竞争，而面目全非。[16]法国由于要和英国皇家海军一比高低，力图增加反奴隶贸易巡逻舰的数目。1838年，法国巡逻舰从三艘增至六艘，到1843-1844年间，英法双方各拥有14艘巡逻舰，旗鼓相当。1845年，由于英美签约的间接影响，英法之间的条约也进行了修改，双方协议把用于执行强制措施的船舰规定为各有26艘。自此之后，如果把拥有五艘战船的美国巡逻舰队和在刚果海域游弋的六艘葡萄牙舰艇计算在内，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专职舰艇动员起来对付奴隶贸易了。1849年，法国方面终止了某些它所无法执行的任务。整整七年，第二帝国打着“自由应征”劳工的旗号，变相运送非洲劳动力。这完全是一种伪装的奴隶贸易。有些英国人和荷兰人也经营此道。此时，法国巡逻舰队实际上已停止执行强制措施，它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显示法国国旗已经插到这个地方。其实，它的主要目的恐怕也正是如此。

至此，执行检查、拦截贩奴船这一人道主义政策的任务完全落到英国海军肩上，但英国人对此也并不热情。英国海军拥有的舰队已从三艘增加到26艘，但这些船舰设备陈旧不堪，难以完成这一特殊任务。舰艇驶入河道时吃水很大，因此只能放下船上的大艇，但大艇没有能力抵御来自奴隶贸易据点或埋伏在周围的小船的袭击。并且，这种舰艇速度太慢，

---

[15] D.R.默里，1971年，全书各处；P.C.埃默，1976年，第245-251页；L.贝瑟尔，1970年，第200-213页。
[16] S.达格特，1981年，全书各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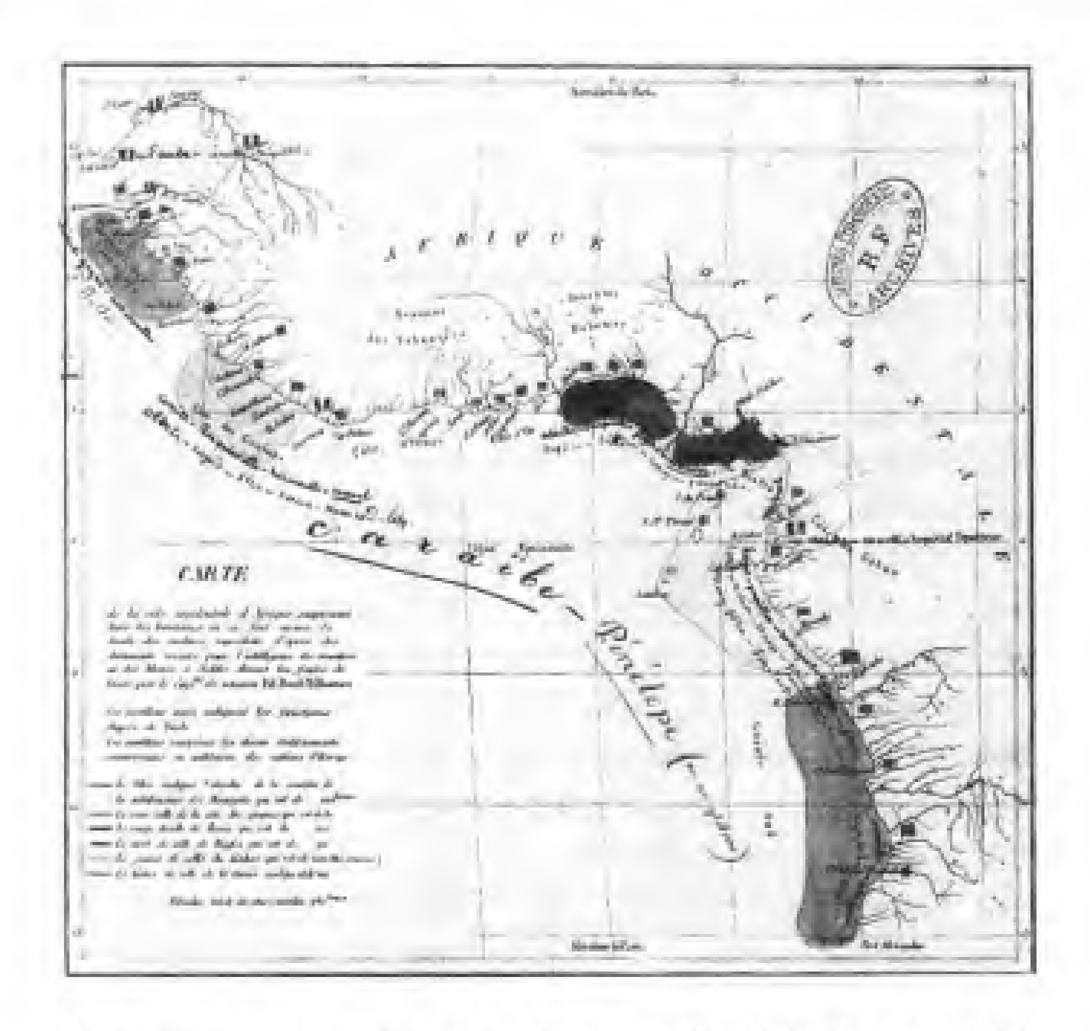


插图4.1 非洲西海岸地图，图中标明所有当时还在进行奴隶贸易的地方。该图由E. 布攻·维奈姆船长根据近期得到的文件复制，旨在为巡逻活动和对贩奴中心实行封锁提供情报。（资料来源：非洲备忘录与文件，30，第415页）

总是远远落在轻便的双桅横帆船后面，也赶不上后来美国的快速横帆船。所以，塞拉利昂的殖民当局下决心购进几艘汽艇，尽管这种船当时受到谴责，但鉴于它们能在海上高速行驶，因此指派它们执行强制措施。英国的巡逻舰队以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要塞为基地，并由此供应饮食等必需品，船舰的具体启程港则在阿森松岛。当时，英国还曾经向西班牙购买斐多波岛，想以此加强在比夫拉湾的强制措施，但未能成功。

强制措施能否行之有效取决于人的因素。英国水手，受到伦敦政府思想意识的输，真心诚意地赞成禁止奴隶贸易。他们还有一种争权的心理，有时以人道的名义导致皇家海军拒绝服从海军部的命令，并对海事法采取蔑视态度。英国海军，在没有签订双边互检条约的情况下，非法拦截与检查法国和美国的船舰，从而引起一系列抗议和外交上的赔偿。英国对捕获贩奴船采取悬赏政策，并且奖金起价很高，因此有人指责英国水手所关心的是抓船获奖，而不是船上装运的非洲黑奴的命运。事实上，从贩奴船被截获到船上奴隶在塞拉

72

利昂、圣赫勒拿、毛里求斯被释放这段时间里，非洲黑奴的死亡率相当高。海员也有不少
73 死亡者，有的是因病而死，有的则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杀。巡逻舰与贩奴船经常爆发生死之战。[17]

由于当时国际领域一片混乱，在对付强制措施方面，贩奴船乘机钻营。在沿岸，他们获取巡逻舰活动的情报，而且十之八九能避开舰艇。他们像海盗一样，船上挂的是伪装的国旗，手中拿的是从西印度群岛买来的伪造文书。即使法律规定得十分明确，他们也能逃避处罚。当执行强制措施的条约进一步强化时，他们干脆甩掉伪装。1831 年之后，法国的文书不再有用。1842 年之后，葡萄牙的文书也失效了。但是，美国的国家主权却一直有效地保护奴隶贸易，直到 1862 年为止。

对付奴隶贩子的种种行径是进一步采用暴力镇压。巡逻舰的舰长和西方国家开拓地当局自发地采取一种特殊的武装行动。[18]他们经由陆路发动讨伐，重点是非洲政治势力尚未组织起来的地方。在利比里亚，总督杰胡迪·阿什蒙牧师率领攻打芒特角的贸易站。1825 年，在塞拉利昂附近，特纳总督也组织进攻，在一段时间内清剿了半岛和周围岛屿，特别重要的是英国就此控制了相当长的一段海岸，使之处于它的监管之下。这一系列进攻全都采取突击行动，轮番袭击加利纳斯、歇尔布罗河和庞戈斯河流域。赤道以南，卡宾达和安布里什附近"葡萄牙"海域里的贩奴船则遭受有计划的炮击。这类讨伐一般均以烧毁黑奴禁闭营和非洲代理人所住村庄告终，被烧毁的建筑物往往很快就在不远处重建。为了获偿，被扣押的奴隶都得到释放，然后送到塞拉利昂、冈比亚或毛里求斯。有些人在那些地方定居下来，也有许多人加入了殖民地黑人劳动大军，还有不少人作为自由应征劳工受雇于西印度群岛。[19]

由于罪恶的奴隶贸易由此而得到"根除"，[20] 英、法两国都认为这一系列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采取两种新的策略：一是与西非沿岸的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保证这些人统治的地区取缔奴隶贸易（这些条约往往是强加于人，条款内容也是强迫接受，而不是通过谈判）；另一则是采用长期封锁主要出口中心的手段进行镇压，应该说这开创了用武装干涉手段强制推行外交政策的先河。对非洲西海岸这一奴隶贸易的"老巢"而言，1841 至 1850 年这十年是关键性的转折时期。

74 同一十年对跨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也同样至关重要。尽管主张废奴的沃林顿领事做了大量工作，英国对在北非进行的奴隶贸易仍视若无睹。理论上，所有曾经参加这种贸易的地方（除摩洛哥外）都归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管辖。但实际上，这些行省长期以来都无视卡拉曼利王朝的宗主权，日益趋向于采取独立行动。1830 年，法国武力征服阿尔及尔摄政区，自 1847 年起更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殖民地，当地的白人定居者对雇佣奴隶劳动力缺乏兴趣。与之相邻的突尼斯摄政区，在英、法两国的双重压力下，于 1840 至 1842 年间废除了奴隶贸易。再往东，的黎波里摄政区则障碍重重，因为它必须取得内地酋长们的允诺

[17] C. 劳埃德(Lloyd)，1949 年，散见各处；S. 达格特，1975 年。
[18] C. 劳埃德，1949 年，第 93-100 页。
[19] C. 法伊夫(Fyfe)，1962 年；J. U. J. 阿谢伊格布(Asiegbu)，1969 年。
[20] C. 劳埃德，1949 年；P. J. 施陶登劳斯(Staudenraus)，1961 年；C. 法伊夫，1962 年。

才能废除奴隶贸易，而有些酋长本人就是买卖博尔诺或索科托奴隶的中间人。1842 年，谢赫·阿卜杜勒·贾利尔从其大本营迈尔祖克统治费赞，同意废除奴隶贸易，但他却被人谋杀了。早在 1835 年，土耳其重建对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直接统治，从那时起，人们才弄明白，能否有效废除奴隶贸易，完全取决于土耳其统治集团的态度。1857 年，君士坦丁堡的素丹宣布禁止奴隶贸易，但实际上这种贸易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停止过，甚至在埃及也是如此，尽管西方的影响日趋增加。1870 年，德国旅行家格奥尔格·施韦因富特从“非洲心脏地带”来到这里，他就怀疑赫迪夫王朝是否支持废除奴隶贸易。[21]摩洛哥则是另一种情况。它是马格里布诸国中唯一欧洲人认为需要认真对付的，直到 1887 年，才普遍开展外交上的主动行动和人道主义的引诱。当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开始显露衰败迹象时，跨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却仍能依靠安全畅通的通道出口和销售奴隶。这里的奴隶贸易，一方面通向摩洛哥，该国在 19 世纪中叶，每年进口 3500 至 4000 个黑奴，迟至 19 世纪 80 年代还每年进口 500 个；[22]另一方面则通向红海和中东（具体情况留待下面阐述）。西方各国对强制禁止跨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束手无策，这种贸易完全掌握在非洲人手中，因为它并没有超出非洲大陆。

废奴主义者强调，如果没有买主，也就无人卖奴隶了。但是，奴隶制的拥护者则把这句话颠倒过来，强调如果非洲不供应奴隶，西方也就不可能有此需求。他们的用意很明显，非洲不言而喻也是同谋者。

非洲的反应

75

从 1787 到 1807 年，即西方禁止奴隶贸易前夕那段时间里，被运往美洲的非洲黑奴超过 100 万。此外，还应该加上在大西洋航行期间 15%左右的死亡人数。至于在非洲捕奴者“产出奴隶”过程中以及从当地押往海岸途中的死亡者则不计其数。[23]

禁止奴隶贸易对沿海出口市场的活力一时并没有产生破坏影响。废奴主义者的犹豫不决使葡萄牙和巴西得以在赤道以南继续不慌不忙地从事这种已属非法的贸易。出口额有时甚至与 17 世纪一样高。1842 年以后，虽经过激烈的战斗，奴隶贸易在洛安果海岸并没有消亡，而是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24] 至于赤道以北，随着禁止奴隶贸易的命令下达到欧洲人的拓居地，塞内冈比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黄金海岸各传统贸易中心纷纷关闭。但是，拓居地的政治权力机构仍很弱，一旦超出它们的管辖范围，废除奴隶贸易的命令就根本行不通。有些时候西方奴隶贩子还继续在周围地区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消失，产出和销售可供出口的劳动力全部由非洲人掌握。

在塞拉利昂边界地区，西北面的努涅兹河和庞戈斯河畔，东南面的加利纳斯河畔，英

---

[21] G. 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h)，1873 年，第 4 章；A. A. 博亨(Boahen)，1964 年；F. 雷诺(Renault)，1980 年；J. L. 米耶热(Miège)，1961-1963 年，第 3 卷。

[22] J. L. 米耶热，1961-1963 年，第 3 卷；F. 雷诺，1980 年。

[23] R. 托马斯(Thomas)和 R. 比恩(Bean)，1974 年。

[24] G. 迪普雷(Dupré)和 A. 马萨拉(Massala)，1975 年，第 1468 页。

国人、西班牙人和混血种人所拥有的奴隶工厂忙碌不堪，这里的布局对它们有利。尽管产出奴隶的地区相距400-500公里之遥，但大部分邻近海岸。交易是在当地酋长、商旅客人、掮客、中间人、代理商之间以个人身分进行。另一方面，在达荷美，奴隶贸易是统治家族收益的一大来源，这些家族指派其主管家臣负责经营。1818年，盖佐国王欠了巴西混血种人弗朗西斯科·费利什·达-索萨的债，因此就封达-索萨为“恰恰”(chacha)，即“白人酋长”，作为经营维达地区奴隶贸易的顾问和行政长官。达-索萨作为第一代恰恰于1849年逝世，恰恰一职仍然保存，并传给了他的儿子。恰恰的职权范围相当广泛：管理西方货物的贮存、抵消帐面借贷、事先安排货物以加快装船速度、收集税款、察看外来白人的动态、款待主顾。这种经济结构也能适应其它形式的生产。奴隶贸易“商品”的产出完全掌握在酋长手中，每年都要进行对邻国的征战(不一定都能取胜)以保证这种产出的源源不断。奴隶主要是约鲁巴人，但也有来自中苏丹的俘虏，运往北方和埃及出卖。运输奴隶的商队在边境地区对货物进行分组，出口的黑奴都身强力壮，挑出来编人搬运队。[25] 再往东，从巴达格里到贝宁王国边界，约鲁巴人长时间的互相争斗，使维达地区的市场上挤满奴隶，供过于求。葡萄牙和巴西对奴隶的需求量很高，当地酋长和礁湖区白人和黑人奴隶贩子满足供应，他们要在转而经营其它贸易之前大捞一把。[26]

福莫萨角以东，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诸河流(从嫩河到旧卡拉巴尔)一带，奴隶贸易继续以完备的机制经营，这种机制在18世纪最后30年即已形成，到此时也同样应用于其它类型的贸易。当地的祭司和宗教界要人、“阿罗丘克伍神示所”(Arochukwu oracle)、“卡诺伊会所”(Canoe Houses)和“埃克佩会社”(Ekpe society)经营一个市场，赤道以北半数奴隶贸易集中于此：约20万人。奴隶来自索科托、贝努埃、努佩、西北喀麦隆和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内陆地带，全都是通过战争、绑架、偿还债务、付保护金、社区清洗、直接从市场购得和作为礼品等传统办法获得，然后通过联营商号或一般供应渠道运到销售点。[27] 到了销售点，交易以经过多次实践证明效果良好的程序进行。每个奴隶都事先按相当于一定数额的货物确定价钱，以当地使用的货币(铜条)计算——与以往的做法毫无两样。在1825年和1829年，男女奴隶各值67根铜条，以后降到45或50根铜条。按到岸货物的价格计算，每个奴隶值33西班牙元，其中8-10%以回扣方式付给销售商。在公爵城(伊弗雷姆公爵在旧卡拉巴尔所建的城镇)，埃格博·埃约、汤姆·霍奈斯蒂、奥根·亨肖等其他一些多少相互敌对的家族首领都经营奴隶买卖和食品生意。40，000薯蓣值2000根铜条，即40个奴隶的价格。1830年左右，大部分交易都在博尼进行。[28]

在禁止奴隶贸易的60年间，这种贸易的数量只能根据其规模作粗略估计。从1807年到1867年，在塞内加尔和莫桑比克之间，总共有4000艘欧美船只进行了5000次左右的贩奴航行，总排水量达到100万公吨。价值大致相当于6000万皮阿斯特或美元的货物用来交

---

[25] C.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Coquery-Vidrovitch)，1971年，第109-111页；P. 曼宁(Manning)，1979年；M. 阿达穆(Adamu)，1979年。

[26] P. 弗吉尔(Verger)，1968年，第11、12章。

[27] K.O. 戴克(Dike)，1956年；P.D. 柯廷(Curtin)，1969年，特别是第254-255页；M. 阿达穆，1979年。

[28] S. 达格特，1983年，特别参阅有关“夏尔”(1825年)和“朱尔”(1829年)两船的资料。

换从各个出口港上船的总数达 1900 万的非洲黑奴，其中可能有 80%是从赤道以南装船的。[29] 从 19 世纪初开始到 80 年代，跨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和阿拉伯人从事的奴隶贸易，分别出口达 120 万和 80 万非洲黑奴，[30] 这些奴隶都是从西非的班巴拉到莫桑比克南部这一广阔地带捕获的。 77

计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史学家普遍认为，奴隶贸易对非洲是一场彻底的大灾难。他们的学术研究证实了这一普遍看法。但是，对这一论断仍需进一步阐述。人道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当时非洲出售奴隶的人根本不会考虑，极少有例外。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天生就不可能放弃奴隶贸易，虽然西方的奴隶制拥护者坚持这种观点。非洲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出口，这完全可以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出售奴隶的是黑人，而把奴隶运送出口的是白人，两者本无联系，纯粹是由于这桩买卖双方都能赢利，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奴隶之所以能不断地供应，是由于一个完整体制在有效地运转，非洲人所抵制和反对的乃是这种体制的瓦解。首先一点，禁止奴隶贸易必将沉重打击非洲出售奴隶者所经营的贸易，[31]这些人别无其它生财之道，更不用说禁止奴隶贸易还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冲击当地甚至远处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换句话说，内地与沿海以及沿海外国人经营的贸易之间这种易货贸易体制，如果没有办法来替代奴隶贸易，非洲出售奴隶者必然反对强制措施，因为他们必须避免商贸陷入混乱状态。[32] 因此，所谓非洲出售奴隶者同谋参与奴隶贸易不过是他们对眼前的经济局势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也可以解释出口的人力资源降价的原因，这是市场对强制措施不断增加压力的一种防御。因此，采取强制措施的力量是不自觉地促成了一种它们感到不满的局面。用这种论断解释向北非和东非输出非洲奴隶时，需要作某种修正。从一方面说，有关的捕捉和出售奴隶者也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却很难看出哪些遭到劫掠的地方获得了什么经济补偿。某些富有个性的强人，诸如，提普提卜和拉比赫，可以趁机加强和巩固其努力，但这些人控制的地区又得到了那些好处呢？这一点仍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78

有一位计量历史学家曾经提出，强制禁止奴隶贸易挽救了 65.7 万非洲人，使他们摆脱了被押往美洲终生为奴的命运。[33]但是，另一位专家却认为这一数字估计过高。他认为 1821 至 1843 年期间免遭厄运的只有四万人左右。[34] 巡逻舰队抓获的贩奴船数目也难以准确估算，合理的估计为 1000 至 1200 艘，远洋航船中大约有四分之一从事非法的奴隶贸易。[35] 英

---

[29] P.D. 柯廷，1969 年，表 76、77。
[30] R.A. 奥斯汀(Austen)，表 2.8、2.9。
[31] G.N. 乌佐伊圭(Uzoigwe)，1973 年，第 201 页。
[32] G.N. 乌佐伊圭，1973 年，B.O. 奥洛隆提梅欣(Oloruntimehin)，1972 年，第 40 页称："调整陷入真正的危机"。
[33] P.E. 利文，1971 年，第 75 页。
[34] D. 埃尔蒂斯(Eltis)，1977 年。
[35] C. 劳埃德，1949 年，附录 A；S. 达格特，1983 年，全书各处。

国海军中将的海事法庭、法国有关法庭、美国巡逻舰队，以及最为重要的各混合委员会（使命结束后，在 1867-1870 年间解散），总共释放了 16 万非洲人。

身为奴隶（也即一种动产）的人全都懂得，他们获得释放并非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而是需要海军当局、殖民地当局或混合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解除其奴隶身份。当时有数千名得到释放的黑奴，由于与故乡完全断绝联系，在巴西和古巴的种植园，生活毫无保障，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社会和经济平等待遇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36] 还有数百人在圭亚那、塞内加尔和加蓬的法属拓居地生活，身份一直不能确定。但是，也确有一些人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获得了名副其实的政治地位。在弗里敦，94，329 人（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正式在“获释非洲人事务部”的名册上登记，[37] 第一次有力地表明，强制禁止奴隶贸易之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

1808 年，英国政府接管塞拉利昂，使之成为英国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挽回 20 年前作为救济事业按照反对奴隶制的三原则——传教、文明、贸易而建立的居留地失败的局面。最早自愿来此定居的 2089 名获释奴隶和逃亡者分为三批，来自英国、新斯科舍和牙买加，住在半岛的东北部。这些外来者未能与当地的非洲人和睦共处，法国人又袭击和洗劫了他们的种植园，移民内部还有一些人耍阴谋，争权夺利。此外，气候条件恶劣，周围环境不利于健康，以至定居者大量死亡。最糟的是，接受委托进行管理的公司宣布无力按照诺言，给予定居者拥有土地的权利。到 1802 年，最早来到此地的开拓者及其后裔只剩下 1406 人。1808 年，废奴主义者带来了人道主义，挽救了这块殖民地。1811 年，这里的人口增加到 4000 人。正式成为殖民地 20 年之后，住在弗里敦和山区村庄的非洲人已达 21，000 人。1850 年，弗里敦市镇居民又增加到 16，950 人，内地居民则接近四万人，而白人只有 89 个。此时，新来者发现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自治地位的邦国已有第三代自由公民了。

79

第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是从头建立一个能独立生存的新社会。在 1816-1823 年，动力来自当时的总督查尔斯·麦卡锡爵士，此人既是行政长官、建设者，又有一颗传教士的善心。由于这里人口不断增长，人们要求在此扎根的愿望十分迫切，必须首先改善生活福利设施。作为殖民政府和海军中将的驻地、巡逻舰的后勤补给基地，以及各混合委员会正式释奴的中心，弗里敦及其腹地能够经常得到资金补贴。麦卡锡总督一方面改进早期建立的村庄，另一方面又建立新的村庄，以容纳新来者，让他们在兄弟般的邻居中间安顿下来。欧洲人含糊的“标准社会”与非洲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传统活动形成鲜明对照。城镇里的土地和财产开始增值，手工业和贸易为个人的兴旺发达打开门路。1828 年左右，一些有魄力和进取精神的人，获准进入沿海的新经济。1831 年，塞拉利昂皇家殖民地向国外贸易开放门户。英国任命的总督规格下降，补贴的标准也逐步降低。塞拉利昂人开始管理自己的事务，仅仅保留了殖民地的框架。在整个创业阶段，西方的影响，包括传教士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资助教会和较小的教派，但这些神职人员无论在反对奴隶制，还

---

[36] A.F. 科温，1967 年，第 166 页；F.W. 奈特，1970 年，第 29 页；L. 贝瑟尔，1970 年，第 380-383 页。

[37] R. 迈耶-海塞尔伯格（Meyer-Heiselberg），1967 年，全书各处；J.U.J. 阿谢伊格布，1969 年，附录Ⅵ。

是传教工作方面都未曾受过培训。于是，塞拉利昂就成了他们的实地训练场所。他们在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文明的同时，还要与奴隶贸易展开斗争，特别是在庞戈斯河流域。当地的奴隶贩子怀疑这些人为殖民政府充当间谍，于是放火焚烧英国圣公会传教会，神职人员只好放弃这里。塞拉利昂殖民地的政治当局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的人道主义职责，而那里的传教士也并非对政治一窍不通。麦卡锡总督任命神职人员管理获释奴隶居住的村庄。尽管存在着激烈的人事纠纷和教义之争，在民事管理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人，与政府充分合作，取得了持久而卓越的成就。学校开办起来，数十名不同族群的学童同堂上课，用英语交流，国语由此产生。虽然未能实现不同宗教之间的融合，但基督教、非洲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在邻近的居民区能够和睦共处。

第二代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获得自由的非洲人开始占据要职。他们先是和最早来此的家族成员展开竞争，接着就和他们平起平坐。起初，两个集团之间既不融洽，也不可能完全融为一体，来此较早的居民力图保持原有的阶级区别。在强制禁止 **80** 奴隶贸易达到高峰的 20 年，由于每年都有约 2000 人涌人这里，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尽管死亡造成一些空缺，但仍难以全部吸收。新来者中有人应征加人了英国军队，十分之一的人被强迫迁移到冈比亚。官方还提出一项移民西印度群岛的方案，从理论上讲，该方案允许人们有自己决定的自由，并且保证可以遣返。但是，这项方案所计划的实质内容很容易使人想起以往恐怖的经历，所以，获得自由的非洲人宁可在灌木丛林中过艰辛的生活，或者在传统村落里求得安宁。此外，在传教士帮助下，有数千人回到了他们沦为奴隶之前生活的地区(主要是约鲁巴族地区)，他们向人们诉说自己的经历，并传授学到的技能。

从经济角度看，不太可能出现引人注目的“繁荣”。然而到 1827 年，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发展进程就启动了。最初，重点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水稻，也开始栽培出口作物(诸如：糖、姜、靛)和开发当地自然资源(诸如：咖啡、特种木材)。一种当地咖啡品种早在定居初期就已发现，且已系统种植。1835 年，有人提出一种经济论点，主张投入更多资金，以促使努内兹河和加利纳斯一带的奴隶贸易早日终止。短短 18 个月内，伦敦一家贸易商行就收进将近 6.5 万公斤咖啡，这充分说明，有必要保护人们种植和销售作物的积极性。塞拉利昂人纷纷开办公司，出口木材，特别是一种柚木树种，从而开始兴旺。这再一次说明，人们感兴趣的还是开辟一种可靠的财源，以取代奴隶贸易。1824 年，50 艘西方船只从塞拉利昂的港湾运出价值 20 万美元的木材。[38] 由于各种有利条件，在这块殖民地创造出相当数量的财富(还很难称得上是资本)。塞拉利昂的船开始沿西非海岸航行，可远达比夫拉湾。从那时起，外国的船能够安全驶入塞拉利昂港湾内的港口，从事合法贸易——这是废奴主义者衷心希望的。但是，强调这一“起飞”的意义不能过分，它只不过说明：即使欧洲宗主国的后勤资助降到最低限度，这种实验还是能够发展的。

1853 年，英国政府在经过周密考虑之后，决定采取行动，让塞拉利昂人成为英国的臣民，表明它明确承认，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混合文明已经融为一个能独立生存的克里奥尔社

[38] 福拉湾学院的档案资料，弗里敦；英国议会文件，信函回件，西非，1812-1874 年，第 135-146 页；C. 法伊夫，1962 年，有关“木材”部分。

81 会。这个“文明”的民族，不是以某个欧洲乌托邦模式为依据，而是以本身的创造能力形成力量。[39] 英国废奴主义者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非洲人自己解决问题。

利比里亚的经历稍有不同。1821 年，美国殖民协会在梅苏拉多角建立定居地，按照法律，这只是一个私人企业。美国政府并未直接插手，但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临时办事处，不行使任何政府职能，其工作人员为殖民协会成员。美国殖民协会使用海军巡逻舰运送获得自由的美国黑人来此定居，以增加这里的人口。利比里亚的建立，既是慈善事业和促进文明的理想，同时也是为了缓和美国黑人人口迅速膨胀，这在美国被认为是一种危机。

当地酋长则强烈反对外来移民，人数不多的定居者不得不起而保卫定居地。酋长们强调，他们被迫放弃土地和主权，而这些黑皮肤的外国人的真正目的在于摧毁这个地区的主要海外商贸活动——奴隶贸易。杰胡迪·阿什蒙牧师领导 450 名定居者(其中 200 人是获得自由的黑奴)起而抵制。结果，这种防卫行动挽救了定居地，1824 年，该地被命名为“利比里亚”，主要居民点称为“蒙罗维亚”。在美国制订了一项政治纲领，由当地总督按照本人的解释贯彻执行。当船舶驶入港湾，不论船属于美国还是其它国家，阿什蒙一概规定必须从事合法贸易，用西方货物换取象牙、木材、毛皮和油料。据称，这种交易从 1826 年开始赢利，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值得怀疑。1830 年，又增加 260 名获得自由的黑人，该定居地总共拥有 1160 名定居者，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植园，奴隶主为了宣传或争做先驱使他们获得解放。也有少数生来就是自由民的美国黑人，但他们抵达利比里亚的时间较晚。殖民协会推行的美国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对美国北方人，它强调的是把黑人遣返非洲符合基督福音精神；对美国南方人，它强调的是一种吸引人的美好前景——清除黑人可以净化南方社会。

利比里亚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在原有的定居地周围相继出现其它殖民社会，陆续建立三个新的定居地——巴萨湾、西诺埃和帕尔马斯角(定名为马里兰)，直到 1856 年才并入该国领土。当地的美国人社会从属于定居地，而不是定居地从属于当地的美国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是自治性质的。无论从生态角度，还是政治角度讲，环境都很恶劣，但居民们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勇于面对逆境。土地并不十分肥沃，人们使用古老而过时的耕作方法。没有商业设施，没有资本，自由民的劳力十分昂贵。但这
82 里有工程师，懂得如何用混凝土营造建筑物。沿海一带的定居地赶走了奴隶贩子，终止了奴隶贸易，实现了慈善家和殖民地开拓者的目的。第二方面，当地领导人具有一定的素质和水平。这些人的出身背景都是圣公会教徒，讲英语。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自己选择的生活，而且十分现实，默默地为建立新的国家播撒种子。托马斯·布坎南带来美国的宪法，经过修改后适用于利比里亚的具体国情。1836-1851 年担任马里兰长官的约翰·B. 鲁斯伍姆把该地建成种族主义无法容身的地方。自 1841 年起担任利比里亚总督、1847-1856 年又担任共和国总统的 J. J. 罗伯茨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事实上的独立条件已经成熟。

此时，英国对利比里亚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只有合法存在才能导致合法独立。英

---

[39] C. 法伊夫，1962 年；J. 彼得森(Peterson)，1969 年，全书各处；J. U. J. 阿谢伊格布，1969 年；J. F. A. 阿贾伊(Ajayi)，1965 年，第 2 章；S. 雅各布森(Jakobsson)，1972 年。

国海员和贸易商争夺蒙罗维亚所拥有的主权标志，诸如，控制贸易、税收和国旗。争端是从经济层面开始的，但答案却落到国际外交层面。美国把自己与该定居地关系的实质透露给英国：利比里亚并非美国的殖民地，尽管美国给予支持。罗伯茨总督则鼓励当地定居者战胜怯懦，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1847 年 7 月 26 日，利比里亚正式发表简单面明确的独立宣言，从此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个非洲共和国诞生了。利比里亚的宪法基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国籍仅对黑人公民开放。1860 年左右，它拥有的公民中，6000 人是获释的奴隶，5700 人是由美国海军巡逻舰释放的奴隶，4500 人是美国出生的自由民，还有 1000 人是自己赎身的奴隶。利比里亚仍然需要为维护其本土的权威而奋斗，还要与法国推行的“自由应征”劳工制度作斗争，保卫其边界，扩展其领土——所有这些任务有待以后完成。[40]

在本卷所讨论的时期内，利比里亚的经济发展还很难说可以与塞拉利昂相比。曾经指挥过废除奴隶贸易巡逻舰队的法国海军官员爱德华·布埃-维尧姆茨多次沿利比里亚海岸航行，他亲眼目睹当地居民的贫困处境，使他不胜震惊。[41] 这种经济方面的评价与美国人霍拉肖·布里奇同一时期所做的定性评价有天壤之别，后者认为当时的利比里亚称得上是“黑人的天堂”。[42]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受本人的个性所左右，是白种人深受殖民主义心态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从历史意义的角度讲，把 19 世纪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的实验视做 20 世纪独立运动的先兆恐怕是不合逻辑面且是时代错位。但是，产生这种想法，即认为新的非洲国家可以在遭受奴隶贸易肆虐达 250 年之久的海岸诞生，并且把这种想法具体化，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83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实验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远不能满足新一代废奴主义者的理想。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在摧毁美洲奴隶制度和禁止非洲奴隶贸易的方法和先后次序上，出现分歧。1841 年，T. F. 巴克斯顿在尼日尔建立的慈善性质的定居地未能成功，反对派纷纷指责废奴主义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并抨击强制禁止奴隶贸易措施陷入全面失败。然而，这类批评无望取胜，尽管官方的态度颇为勉强，各个殖民协会的主张还是受到私人的积极支持。最为重要的是，在赤道以北的非洲沿岸，改革创新之举具有广阔的天地。

保护新的贸易

海军巡逻舰队所关心的主要是完成保护本国国民“合法贸易”的任务，而不是强制禁止奴隶贸易。从 19 世纪最初二三十年开始，非洲海岸就面临美、英、法诸国对非洲天然产品的大量需求，而且这种需求与日俱增。1838 年，殖民开拓的先行者、以后担任塞内加尔总督的布埃-维尧姆茨布置开展一项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塞内加尔和加蓬之间开展贸易的可能性。尽管赢利情况不理想，但奴隶贸易之外的其它贸易也同时开展，并且与奴隶贸易不发生竞争。竞争是在西方国家之间进行，最终这些国家对经济势力范围的非正式划分达

[40] P. J. 施陶登劳斯，1961 年；J. C. 纳尔丹(Nardin)，1965 年。
[41] L. E. 布埃-维尧姆茨(Bouet-Willaumez)，1845 年，第 4 章，第 90-92 页。
[42] H. 布里奇(Bridge)，1845 年，第 20 章。

成一项共识，非洲本土的统治者对此也无异议。法国控制了塞拉利昂以北地区以及象牙海岸和加蓬的某些据点，它仿效弗里敦，建立了利伯维尔城。[43] 当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赶到非洲沿海时，发现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英国的经济飞地，也只能默认了。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化和技术革命迎来了现代化，其它国家也相继走上同样的道路。现代化促成了新的需求，在非洲沿海也就是大量需求油料，用来制造机器润滑剂、肥皂的原料以及灯的燃料。于是，非洲油料植物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风行一时。

84

过去，非洲海岸一直出口棕榈油，只是数量很少。此时，进口到英国的棕榈油逐年增多，从 1814 年的 982 公吨增至 1844 年的 21，000 公吨，此后有 10 年左右保持平稳，然后在 1870 年又增加一倍。法国在 1847-1856 年期间，每年平均进口 4000 公吨棕榈油，在 1857-1866 年间为 2000 公吨，另外又每年从塞内加尔和冈比亚进口 8000 公吨花生，再加上 25，000公吨“tulucoona”果仁用以制作家用肥皂；在 1870 年，进口这些物品共值 3500 万金法郎。这样，长期以来只是乌托邦的空想(找到奴隶贸易的替代贸易)终于落实而具体化了。下一步需要开展工业生产，这样做所用时间并不比古巴和巴西种植园全力生产蔗糖和咖啡多。其实，主要的生产地区也就是出口奴隶的最佳地区——从达荷美[44] 到尼日尔河三角洲诸河流和喀麦隆。这种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特征是：所用人力全部来自内部结构已经殖民化的地方。这意味着：生产仍然采用奴隶制形式，但限于非洲的社会和经济范畴内。事实上，这种经济领域的创举蓬勃发展，并没有使传统经济立时受到破坏，奴隶贸易与油料贸易同时并存，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交易开始向内地渗入。在沿海地区，西方贸易的代理商仍继续牢牢控制市场。这些人精通如何购物和发放贷款，又能使传统货币流通，同时引进金属铸币。参与贸易领域竞争的人日益增多，必然打乱内部平衡，导致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45] 宗教和文化因素又加速了经济上的变化，造成畸形发展，很快影响政局，然而却有助于奴隶贸易的终止。

这时，基督教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少数男女传教士来到非洲，成为西方影响的重要代理人。在塞内加尔，1817 年法国重新进占之后，仍然保留教皇监牧区。雅芙埃嬷嬷明确指出，使徒的首要任务是培训非洲神职人员。当时在非洲，基督徒子女和某些非基督徒非洲人所受到的教育比不上古兰经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兰教越来越盛行。

1844 年，曾经在利比里亚获得丰富经验的贝西厄主教在加蓬建立了玛丽圣心传教团。他把当地的传统信仰一概斥之为“荒谬的无稽之谈”。他力求让更多人皈依基督教和接受洗礼，但很少花费精力布道和讲授教义，总之，他更加关心的是让人改换门庭，而不是真正使人改变信仰。威尔逊牧师领导下的美国传教团取得的成就较为明显。在莱伯共和国的达喀尔，传教团接受“在黑人中间要像黑人一样”的指示，[46] 致力于与当地人交朋友，并且尊重当地的文化。但是，这并不能弥补传教团偏重修来世所形成的弱点，这导致它脱离现实。

85

---

[43] B. 施纳佩尔(Schnapper)，1961 年；H. 布伦施威格(Brunschwig)，1963 年，特别是其中的第 7 章；H. 德尚(Deschamps)，1965 年；E. 姆博科洛(M'Bokolo)，1981 年。

[44] C. 科索里-维德罗维奇，1971 年。

[45] K.O. 戴克，1956 年；K.K. 奈尔(Nair)，1972 年，第 2 章。

[46] P. 布拉瑟尔(Brasseur)，所引 1975 年 a，第 264 页，注[22]；1975 年 b。

传教团无法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从而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战胜进行大力宣传而且高度非洲化的伊斯兰教。于是，传教团转而开始训练精英，即使这意味着使这些精英脱离本州文化、脱离培育自己成长的“根”。在大巴萨姆，当地的非洲统治者拒绝接受传教团入境。但在维达，委托给里昂非洲传教团的宗座代牧职位于1868年设立。它的第一座学校于1873年开学，波多诺伏的学校(已由法国人指导)也开了学。

巴克斯顿的主张在新教的传教团中广泛传播酝酿，再加上塞拉利昂以及获得自由的非洲人所取得的成就，涌现出不少能干的护教者。有些人是专业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此人15岁被卖为奴，得到自由后入教担任神职，历任牧师、会督，同时也是国家的创建者。另一些人则投身合法贸易。这些人大都是长期移居国外而后回到本土的，他们回故乡帮助传教团，为之准备立足地。至于传教团本身则安顿在黄金海岸和喀麦隆之间的海岸线上(贝宁王国除外)，他们很快就发现老百姓对宗教信仰十分虔诚，但政治上却陷入“难以适应的危机”之中。传教团在1842年进入巴达格里，1843年进入维达，1846年进入卡拉巴尔。他们进入内地的立足点是新的埃格巴邦国的重要市镇阿贝奥库塔。

与罗马天主教不同，新教传教团所追求的是现世的影响。他们把自己所传播的基督教教义看做是一个整体，包括教育、文化、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他们教人们读写英语和算术知识，长期以来人们都是自学。来自塞拉利昂的专家讲授建筑、印刷和医药技能。只有参加传教团学习的人才能学到知识，好处是可以进入特权阶级。他们形成的格局是当地酋长所熟悉的，虽然并不是所有酋长都赞成。有些人则炫耀外表上的西方化——衣着饮食、家庭布置，以及生活方式。传教团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中产阶级，从中挑选精英，用西方模式加以培养，以此保证在非洲海岸进行的进出口贸易得以继续，并不断扩展。文明的传播则是一种意外的副产品，在沿岸一带进行交易的棕榈油贸易并不能自动传播文明。[47]

于是，在这个地区广泛存在的新教传教团起了改革的作用，包括插手干预政治和军事战略。阿贝奥库塔的传教团建议英国开辟一条海路，以加速易货贸易，包括运送战争物资。他们请英国军队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以反对达荷美。在卡拉巴尔，传教团对各个城邦的影响足以使当地同意取消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关税。传教团处于有权有势的地位，并不反对西方政府竞争性的干涉，为了抗衡，他们可以支持已经存在的贸易集团，也可以站在对立面。大致在1850年前后，传教团与贸易商和政治当局一起，卷入引向早期殖民统治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任命具有扩张主义观点的领事、实行军事封锁与建立保护国三管齐下。国际外交界对此的借口是：这样做是为了推行激进的和决定性的强制措施，彻底终止奴隶贸易。于是，人道主义手法成了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工具。 86

结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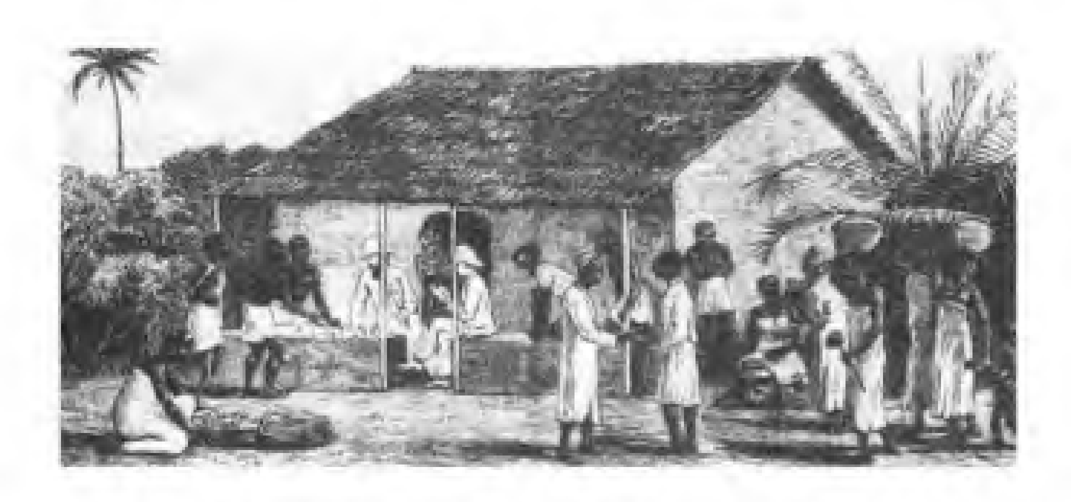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试着为奴隶贸易的衰亡编写一份年表了。当然，我们切不可忘记，截止那时奴隶贸易在任何地方都尚未彻底消亡。

---

[47] J.F.A. 阿贾伊，1969年；K.K. 奈尔，1972年。



图片 4.1 1867 年英国军舰“达德妮芬”上的几位奥洛莫妇女，当时她们刚从一艘从事奴隶贸易的东非独桅三角帆船上被解救出来



图片 4.2 在桑给巴尔附近姆布韦尼的大学传教团庄园，正在给获释奴隶发工资

1824 年，在塞内加尔和法国反奴隶贸易海军基地的总部戈雷岛，奴隶贸易最终结束。1830 年前后，塞拉利昂的影响和进展开始在这个地区产生有益后果，但直到 1866-1867 年，庞戈斯河和努内兹河地区仍不时发生零星交易。在 1848 和 1850 年之间，独立的利比里亚寻求法国战舰帮助，共同搜捕国际贩奴船，并拒绝继续为以“自由应征劳工”为伪装的奴隶体制提供必需品。在禁止奴隶贸易的整个时期，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相对而言受非法奴隶贸易的干扰较少。研究象牙海岸的学者指出，虽然当时那里仍存在捕奴活动，但抓到的奴隶并非供应游弋海岸附近的贩奴船，而是为了满足本地或邻近地区的内部需求。在历史档案中这方面有充分的证据。再往东，从维达到拉各斯这一段，局势比较复杂。1853-1855 年，奴隶贸易的交易和“自由应征劳工”的行动仍在进行，一直持续到 1860 年。有的非洲

人被押上大容量的轮船，诸如“瑙达克号”(Nordaque)，其容量达到空前规模，一次可装载1600名黑奴。然而，英国和法国——一方面在外交方面互相配合，另一方面又一起推行高压政策，最终使奴隶贸易得到制止。在贝宁与加蓬之间，所采取的政策是广泛缔结条约和鼓励占用土地，从而大大地阻挠了奴隶的运输。1842年缔结的英葡条约，最终使搜捕贩奴船的权利推广到赤道以南，在刚果与葡属安哥拉之间的海岸也同样实行。总之，沿海不同地区禁止奴隶贸易的进展不同，但都在逐步削减，奴隶贸易终于在1860至1870年间基本上彻底消亡。 **88**

1867年，法国舰队司令弗勒里奥·德朗格勒在一次考察航行之后声称，他所得印象颇佳，“只有少数例外”。事实上，他的报告是强调指出非洲东海岸奴隶贸易有所复苏之后出现的严重问题。在1860-1870年间，运抵桑给巴尔所控港口的奴隶达3万至3.5万人，其中一部分留在当地丁香种植园劳动，其余人则运到索马里兰和阿曼。1870年前后，阿曼每年要进口1.3万名奴隶，其中有一些又转运到波斯湾各国以及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俾路支和印度。[48] 1873年，英国与桑给巴尔素丹缔结了一项条约，引进搜捕贩奴船的权利，包括授权捕捉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但这项条约实际上并未起多大作用，就像1842年的英葡条约对莫桑比克与科摩罗群岛及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奴隶贸易所起作用微乎其微一样。正如弗朗索瓦·雷诺所说，只有殖民统治出现之后，非洲无边无际的海岸线和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奴隶贸易才真正消失，[49]比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结束晚得多。这种延迟恐怕只能用下列事实来解释：西方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阿拉伯人从事的奴隶贸易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直到戴维·利文斯敦在他的探险过程中才发现。此后西方世界认识这种严重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于是，与西方奴隶制支持者提出的国家和个人立场针锋相对，废奴主义者主张：把非洲奴隶当人看待，将非洲向世界开放。大致1870年前后，废奴主义者实现了他们的目标——除了极少数例外，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终于彻底消亡。这一结局不是西方单方面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长期以来西方行动迟缓，甚至此时还不完全相信为执行普遍道德准则所花费的心血能够得到补偿。从某个角度讲，内陆和沿海地区的非洲一方也同样为此作出了努力。尽管内部条件困难重重，但非洲也在同时抵制经济解体，并且十分迅速地适应了新的体制。非洲对废奴主义者提出的解决办法表现出极强和极快的适应性。在当时，非洲的这种态度与西方所采取的决策同样是使禁止奴隶贸易得以实现的关键性因素。至于西方所采取的新的态度，是由于它不可能认识除自己的价值观外还存在其它价值观。白人对非洲文明的兴趣，与科学家对实验室里的标本一样。经过整整一个世纪为禁止奴隶贸易而奋斗，西方自认为问心无愧，因而感到可以任意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武力。但非洲在这个历史时期并非仅仅只是付出。社会出现了变革，结构发生了破裂，结果往往是分崩离析，甚至全面崩溃，将前面的路清除干净。 **89**

(张元一译)

---

[48] F. 雷诺和S. 达格特，1980年；R. 库普兰(Coupland)，1939年。

[49] F. 雷诺和S. 达格特，1980年，第43-69页。

5 姆菲卡尼运动和非洲新国家的兴起

L. D. 恩康科

90 我们已经知道会冶铁、会使用铁器并饲养牲畜和种植庄稼的操班图语的移民，怎样在公元后五百至一千年间在林波波河以南的南部非洲的几个地方定居下来。[1] 在进入林波波河以南地区之后，南班图人的一支——索托-茨瓦纳人就想在莱邦博-德拉肯斯山脉以西的高原上定居下来，而一些操恩古尼语的族群则迁入这些山脉与印度洋之间狭窄的走廊地带。

在19世纪末期以前的10-15个世纪，这些操班图语的社群在林波波河以南的这个地区创造了一种繁荣的铁器时代文化，其特征是形成了一系列由原有王族世系和王朝控制的小国家。一般说来，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冶铁和使用铁器的农民，他们还种植庄稼——主要是高粱和小米，也打猎，并从事实物交易或长途贸易。[2]

19世纪开始几十年，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摧毁并重建了当时操班图语的南部非洲及其它地区盛行的国家体系，而且改变了远起纳塔尔的祖鲁兰一带直达南坦桑尼亚的许多社群的生活质量和性质。这次革命，在恩古尼语中称为"姆菲卡尼"（Mfecane 意为"粉碎"），而在索托-茨瓦纳语中叫做"迪法卡尼"（Difaqane，意为"锤击"）。

在姆菲卡尼运动中，旧的国家被打败、征服和兼并。一些国家被赶出传统的地盘、被迫在新的地方重建家园。许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削弱，变得贫困不堪。在某些情况下，传统的统治王朝被取代，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整村整庄的居民被消灭或被俘虏。然而，就在

91 这同一场革命中，一些大规模的中央集权的王国在南部非洲的几个地方诞生了。这次革命还产生了一些具备新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的新"帝国"或王国。[3]

姆菲卡尼运动使原来南部非洲殷实地区的居民减少，从而便利了以后白人移民集团对非洲土地的夺取。这些布尔人农场主不仅霸占了非洲最好的土地，而且立即开始有计划地抢劫非洲人的牧群和奴役非洲人，奴役黑人的计划通常被委婉地称为"学徒制度"。

就是对非洲国家本身说来，姆菲卡尼也有其深远的影响。它对非洲政治领袖的聪明才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他们改变原来的军事策略、政治组织技巧和治国方略，以适应新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姆菲卡尼无疑是一场造成不良后果的社会大动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似乎是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种社会发展，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由它产生的一些国家生存下来，成为现今国际社会的一员。如果考虑到姆菲卡

① D. W. 菲利普森(Phillipson)，1969年，R. R. 英斯基普(Inskeep)，1969年，第31-39页。

② M. 威尔逊(Wilson)，1969年a；R. J. 梅森(Mason)，1973年；L. 恩康科(Ngcongco)，1982年，第23-29页。

③ T. R. H. 达文波特(Davenport)，1978年，第56页；D. 德农(Denoon)，1973年，第23、24、32、33页；J. D. 奥麦尔-库珀(Omer-Cooper)，1966年，第12章。

尼这场运动的整个活动范围是多么广泛，考虑到许多国家和各不同民族的命运深受这场横扫一切的戏剧性事件的影响，考虑到上述大多数国家内部变化的根本特点及性质，人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迄今为止，在南部非洲的历史编纂学上，最大的忽略便是姆菲卡尼运动，而且同意 J. D. 奥麦尔-库珀的看法，它"确实使所谓的布尔人大迁徙黯然失色"。[4]

本章拟论述这场革命的性质。它从北恩古尼人中间开始，以祖鲁族国王恰卡所策划而由他的一些老将及同时代人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南部及东部非洲的广阔土地上继续开展的军事行动和社会-政治变革闻名于世。为了充分理解这场伟大革命的内在动因，有必要仔细了解北恩古尼地区的自然环境，考察社会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同时了解社会本身的活动如何促进其赖以生存并对之做出反应的环境的形成。同样重要的是应看到一些恩古尼国家的统治者，如何设法控制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以保证足够的剩余劳动作为国王实力和国家独立的支柱。

北恩古尼地区和当地耕作方式

92

北恩古尼地区的村社农民经过几个世纪的定居和耕作，对他们定居的自然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为方便起见，我们可把北恩古尼地区，或称原始祖鲁人地区，定为以丰戈洛(蓬戈拉)河以南，图克拉(图格拉)河以北，向西大致以姆济尼亚蒂(布法罗)河谷为界的一片地区。[5]这个地区地势起伏很大，几条河流在这里冲击出数道深谷。主要的河系包括图克拉、姆赫拉图泽、姆福洛济、姆库泽和丰戈洛河。这些河流及其支流深深切入周围的高原大地。大河之间的土地往往高出河谷约一千米。[6] 河谷则向西深入内地。

由于地势起伏很大，这个地区相距不远，雨量和气温就有很大差异。同样，植被的变化也相当大，形成"几种类型的植被在当地相互交错的格局"。[7] 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的农民进入此地定居之后，当地的自然植被必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在一本专门论述人类定居生活对整个南部非洲自然环境的影响的书中，生态学家 J. P. H. 阿科克斯认为：德拉肯斯山脉与印度洋之间大部分地区原有的植被可能是"森林和灌木林"，低谷之中则是一片片热带草原。[8] 从原始祖鲁-恩古尼人在这地区定居时起，他们就以刀耕火种的方式，不断破坏并极大地改变了当地自然植被的格局。一个半世纪之后，恩古尼农民已用火、铁锄和大斧将森林推到山脊之上，而灌木林也仅限于河道两旁最潮湿的斜坡地。[9] 这样，农民扩大了对其有利的草原型植被的面积。

盖伊认为，在灌木林毁灭的地方，长出青草，从谷底一直蔓延开来，经常用火烧毁林

---

④ J. D. 奥麦尔-库珀，1966 年，第 4 页。
⑤ J. 盖伊(Guy)，1980 年。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J. P. H. 阿科克斯(Acocks)，1953 年。
⑨ J. 盖伊，1977 年。

木也有利于地表的草生长。[10]这种控制植被的方法用了几个世纪，最终形成植被变化的合成格局，“酸草牧场”和“甜草牧场”相互交错，而这主要是该地区降雨量和地形的差异所决定的。[11]

93

在降雨充沛的地方，牧草多属于酸性品种。这种草在春天最初几场雨之后和初夏月份，营养价值最高，口味也好。一旦生长成熟，酸性草的饲料价值及口味反而降低了。因此，酸草牧场的草在未失去饲料价值和美味之前，只能放牧四个月。而甜草牧场往往分布于这个地区比较干燥的部分，通常与稀疏的林木生长在一起，形成热带草原植被类型，甜草一般构成下层草场。甜草牧场的草虽然稀少又易受损害，但在整个干季都能保持美味和饲料价值。因此，甜草草原特别重要，能提供过冬牧草。除了上述两类典型的草原之外，还有一种过渡地带的混合型草原，一年之内可提供六至八个月的草料。[12]

在南部非洲其它地区，如索托-茨瓦纳人村社所占据的现今德兰士瓦高地，也有大片甜草牧场，但由于缺少北恩古尼那样的河流系统，无法使降雨量少的地区形成虽然干旱但却能充分灌溉的特点。[13] 另外，在生长甜草的高原上，牧场往往滋生萃萃蝇，使人和牲畜染上困倦症。

高原农民，在殖民统治时代之前，从没有北恩古尼地区那样有利的甜草牧场与酸草牧场交错的环境。索托-茨瓦纳人的定居格局 ——分散的村庄、肥沃的耕地、畜牧站，可以表明比北恩古尼地区更为广阔开放的地带适于采用一种空间开阔的组织形式。索托-茨瓦纳社会虽然饲养牲畜，从事农耕，似乎从未受到人口密集的压力，而在北恩古尼地区，一些较大国家的领导人终于不得不面对这种压力。索托-茨瓦纳人居住稠密(恩古尼人则是分散居住)，与其说是受到人口密度大的压力，还不如说是由于水源稀少，整个社群须临水而居的缘故。

由于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长与各种牧场的增加一直保持平衡，这个地区的稳定状态未受到严重威胁。可是，到 18 世纪后半期，人类的活动能力在开发土地资源用于耕地和牧场方面似乎达到极限。人口的增长——这多少与玉米成为当地一种主要作物有关，使通常使用土地和有关资源的方法受到严峻的考验。[14]

94

德拉肯斯山与印度洋之间的狭窄走廊，虽然给当地定居社群的扩张能力造成一定的天然限制，北恩古尼人的酋长国却享受了这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人们世世代代，一连几百年，已学会巧妙地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在春季和初夏，恩古尼牧民把畜群赶到高原酸草牧场上放牧，仲夏之后，他们又可以把畜群带到河谷低处的甜草牧场。多变的气候，使这些农民得以选择最适宜的环境种植高粱、小米或玉米。我们知道玉米是在 18 世纪某个时候传入这一地区的，它很快代替其它几种传统的粮食作物而成为恩古尼人的主要食品。在雨量充足的地区，玉米成为基本食品，人口可能因此而大量增长，对土地的需求也

[10] 同上，第 4 页。
[11] 同上。
[12] J. 盖伊，1980 年，第 7 页。
[13] 同上。
[14] S. 马克斯(Marks)，1967 年 a；M. 格卢克曼(Gluckman)，1963 年，第 166 页。

随之加大。这或许是引起本地区许多小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纷争和暴力事件的原因，他们开始争夺土地，对有限的资源展开激烈的竞争。

北恩古尼地区这种不断变化的形势，可能由于一次可怕的饥荒——约在18世纪最后十年和19世纪最初十年发生的有名的“马德拉图勒”大饥馑(Madlathule)变得更为严重。[15]在这次大饥荒期间，据说发生过饥民抢夺粮仓的风潮。虽然“马德拉图勒”大饥馑的具体年代还不能确定，但据信它显然与巴索托另一次饥荒的年代相近，而巴索托的那次灾荒据说发生过相当普遍的人吃人现象。

北恩古尼社会的结构

毋庸置疑，祖鲁人由于其耕作和生产方式而促使该地区人口不断增长。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该地区人口增长是由于大规模外来移民造成的。因此该地人口增长必定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因为土地和其它重要资源并未同时增加。有些社群由于感到将牧群从一处草场转到另一处颇费时日，而将较多的灌木林改造为草原又很困难，往往去抢占别的社群早已 **95** 占用的土地和牧场。

这些小国家的一些统治者开始采取某种策略来控制生产和再生产。为了了解这个过程，不妨考察一下前殖民地化时代恩古尼族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已经分化成为无数的平民家园宅地，各家宅地均有父系家长管理。家长一般都有两、三房妻子(依社会地位而定)，各房妻子及其儿女均有自已的住房，并生产她们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通常是按性别实行劳动分工：男子负责养牛，狩猎；妇女主要从事农作物生产。

在每个国家中，王室宅地可能有好几处，各有不同的组织结构。除各房家庭成员(包括亲属和仆从)完成正常的生产活动外，各王室宅地——特别从18世纪后半期起——都建立了军营。从全国各地征召男性军士住进军营，并为国王服劳役，包括种植庄稼。应征女性并不住进这些军营，她们仍留在各自的父亲家中。除非国王表示同意，男女应征人员均不得结婚。他们在军队里要待命十年，然后回家结婚。北恩古尼国家统治者的这种做法，加上其它措施，既可控制人口增长率，又能控制再生产。

现在还不清楚，北恩古尼国家这种制度是何时发展起来的。通常把这种变革同姆泰特瓦的丁吉斯瓦约的统治联系在一起，这个制度的完善则与祖鲁国王恰卡的统治相关联。[16]在这些变革发生之前几世纪，将成年仪式作为组织团体和政治事务看待，原本在索托-茨瓦纳人中比在恩古尼人中有较大影响。上述这个重大变革很可能与恩古尼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相关。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大国开始扩张时，它们并吞了索托人的财富，因而索托的成年组织形式也被北恩古尼统治者用来加强其政治控制。

以上，对北恩古尼地区两方面情况——生态环境和社会组织特性的细心考察令人强烈地感到18世纪最后25年至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由于人口膨胀，为夺取几代人积累起来 **96**

---

[15] J. 盖伊，1980年，第9、15页；A.T. 布赖恩特(Bryant)，1929年，第63-88页。

[16] S. 马克斯，1967年b，第532页，认为国家结构较早地在赫卢比、恩瓜内及诺尔万德人族群中开始形成。

的有限财富，斗争不断加剧。马克斯·格卢克曼首先提出人口爆炸这一因素，继而好几位学者表示支持。[17] 人口膨胀与随之出现的土地短缺情况必定对19世纪初期北恩古尼人的暴力行动发生过重大作用，现在对此说似乎已无争议。

被称为姆菲卡尼或迪法卡尼的这次革命也还有别的解释。这些解释，有的在读者批判地看来是可取的，另一些却显得荒唐。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姆泰特瓦或祖鲁一类大的单一民族国家之所以实行奠定其基础的内部重新组织和军事改革，都是因为它们的缔造者效法欧洲人。特别是丁吉斯瓦约，他被说成是自觉地仿效欧洲人，因为他当政之前曾经漫游和考察过欧洲。[18] 更不必去理会露骨的种族主义观点，正如一位批评者所指出的，种族主义观点的鼓吹者企图"借祖鲁人的成就以炫耀自己"，并坚持认为这种想法从来就毫无根据。[19] 有人进一步指出，丁吉斯瓦约和恰卡所建立的国家与同时期这一地区欧洲人的政治组织毫无共同之处。

18世纪时布尔移民农场主(trekboers)逐渐目标明确地从开普西部向东部移民，因而阻碍了南恩古尼牧民向前推进，这个情况也被假定为另一种可以解释姆菲卡尼运动起源的因素。有人认为18世纪布尔牧民的这次迁移封闭了南恩古尼人自然扩张的通道，从而造成了土地短缺的压力，同时也在远方的北恩古尼人中间引起危机。[20] 虽然就全局而言，恩古尼人

97

中间的人口压力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颇具说服力，但是，假如它与乘牛车的布尔人从开普向东移民有联系，那么，这个问题就无从解答：同样的人口压力为什么不曾在被布尔人直接封锁的南恩古尼人或科萨人中间引起社会革命。照此说来，这种人口压力论还会碰上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令人信服地说明一点，即在18世纪中叶乘牛车的布尔人迁至大鱼河之前，原住于图克拉河以北的北恩古尼人中间的拥挤情况，可能或经常由于一些换地居住的族群从这些地方分化出去而有所缓和；这些族群向南移民，穿过操科萨语的恩古尼族的定居社群去寻找"生存空间"，他们或混居于恩古尼族中，或迁到南方更远的地区。因此可以证明德拉肯斯山的天然屏障，事实上比密集定居于今纳塔尔南部的操科萨语的社群造成的阻力还小些。[21]

有一种引人注意而且重要的解释认为北恩古尼地区各大国极欲控制贸易——主要是通往东海岸葡萄牙人控制的德拉瓜湾港口的象牙贸易。这种假说是莫尼卡·威尔逊最先提出的，得到阿兰·史密斯的支持。[22] 他们认为到18世纪末，赫卢比-恩德万德韦和恩瓜内等国家主要通过聪加人作为中间人，已经开始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丁吉斯瓦约一登上姆泰特瓦王位，就曾打通一条去德拉瓜湾的象牙商路，并征服几个部落来实现他通向印度洋港口

---

[17] M. 格卢克曼(Gluckman)，1963年，第166页；J. 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2章。

[18] 亨利·弗林(Henry Flynn)大约在1939年写成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这种有争议的说法，即认为丁吉斯瓦约的革新可能是由于他与白人——尤其是一个名叫科恩的白人医生有交往(见J. 伯德(编)，1888年，第1卷，第62-63页)。后来，A. J. 布赖恩特(1929年，第94页)也曾以可疑的"含米特语假说"的方式强调这种无根据的推测。这些作者定下调子，致使后来许多无批判能力的追随者竟把虚构的传说当做既定事实。

[19] D. 德农，1973年，第19页。

[20] R. 奥利弗(Oliver)和J. D. 费奇(Fage)，1962年，第163页。

[21] J. 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69页。

[22] M. 威尔逊，1958年，第172页；A. 史密斯，1969年。

的事业。[23] 看来，兹维德和索布胡扎也做过同样的努力，他们企图沿丰戈洛河扩张，目的在于建立与德拉瓜湾通商的据点。[24]关于商业因素是促使小国转变为大国的重要因素一说，虽然一些学者持怀疑态度，但这个问题仍有很大争议。

无论如何我们很难用革命领导人的特点或个性来做出认真的解释。当然，丁吉斯瓦约、恰卡及其他一些领导人物为什么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崭然崛起，试图理解这个问题是有益的，这有助于我们避免把人类大戏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神秘化，更合理地把他们看做是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产物。

因此可说，到 18 世纪末，特别是 19 世纪初年，主要是以人口增长造成的土地短缺危机为中心的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引起北恩古尼大多数国家的骚动，并导致暴力冲突。各 **98** 个社会的社会文化结构逐渐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个战乱频仍的地区，骚动迫使一个又一个小国改变或放弃历史悠久的生活习惯，如借地放牧以及伴随割礼而举行成年仪式等传统礼仪，使人感到如再遵循这些传统风俗，在迅速变化的形势的危急时刻，便不能作出适当而有效的反应。例如男子成年仪式包括实行割礼和隐居长达 6 个月时间，数以百计可能应征的青年在紧急关头不能整装待命。结果，社会习俗和传统礼仪的改变及适应步骤带来军事技术的革新和军队组织的现代化。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军事革新者和现代化改革家，如恩德万德韦的兹维德，姆泰特瓦的丁吉斯瓦约，祖鲁族的恰卡。[25]

在许多恩古尼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由于战后被迫迁移，或因此而征服、兼并、联合而形成了这地区三个强大的族群。第一个是恩瓜内-德拉米尼(后来变为斯威士族)，由索布胡扎领导，他们住在丰戈洛河流域。在丰戈洛河、姆福洛兹河与印度洋之间居住的是第二个强大的族群，即兹维德国王统治的恩德万德韦邦联；在他们西边，有一些小酋长国，例如库马洛等。在这个族群之南是第三个强大的族群，即丁吉斯瓦约统治的姆泰特瓦邦联，他们大体上占据了印度洋与姆福洛兹河下游及姆赫拉图泽河之间的三角洲。[26]

这三个大国的统治者都是至高无上的国王，他们向成群的小国、酋长国和部落征收贡赋。一般说来，附属国在日常事务上享有自治权，但在“首季收获”献礼、成年仪式、缴纳贡物和进行战争等重大活动中须承认宗主国的最高权威。

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第一个回合是在索布胡扎的恩瓜内-德拉米尼王国与兹维德的恩德万德韦王国之间进行的，为的是争夺肥沃的丰戈洛河谷玉米种植地的控制权。18 世纪中期以前的恩德万德韦已经是一个强国，它原来属于一个大族群——恩博-恩古尼酋长国的一部分，而恩博-恩古尼早于 17 世纪后半期已从德拉瓜湾内地的滕贝王国迁往南方。恩德万德韦族曾经与恩博-恩古尼酋长国的其它分支——恩瓜内、德拉米尼、赫卢比等，一齐迁到丰戈洛河谷定居，该族统治者当时是兰加二世或前任的夏巴。恩德万德韦的主要居住地在可俯视南丰戈洛河谷的埃马-古杜山麓一带。正是在这个新的家园里，恩德万德韦的统治者采取 **99** 了逐步扩大其政治控制的政策，征服了邻近的几个小酋长国。这些小国包括丰戈洛河谷的

㉓ A.T. 布赖恩特，1929 年，第 97 页；A. 史密斯，1969 年，第 182-183 页。
㉔ A.T. 布赖恩特，1929 年；A. 史密斯，1969 年，第 185 页。
㉕ J.D. 奥麦尔-库珀，1966 年，第 27 页；J. 比尔德(Bird)，1888 年，第 1 卷。
㉖ A.T. 布赖恩特，1929 年，第 160 页。

一部分恩瓜内族和恩通格瓦族社群，还包括马索巴涅统治的库马洛部落。也正是在这里，当国家开始兴旺发达时，他们自称为恩德万德韦，以区别于其它恩博-恩古尼族群——一部分恩博-恩古尼人已定居于丰戈洛河北岸，其余的住在恩德万德韦酋长国西边。㉗

恩德万德韦的统治者把一个又一个小国置于他们的宗主权之下，他们的政治权威日益强盛。兰加二世及其子兹维德统治时，恩德万德韦王国的领土向北扩展到丰戈洛河西岸，向南远抵布莱克-姆福洛兹河谷，西邻恩戈麦森林，东至印度洋的圣卢西亚湾。㉘ 因此，在恩古尼族群的统治者中间，恩德万德韦的统治者首先成为由当地众多的小酋长国转而建起一个大国的典型。巧妙地利用旧的风俗习惯，将它改组来为新目的服务，必要时使用无情的武力，通过这些手段，恩德万德韦的统治者在乌苏图-丰戈洛河汇合处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邦联，向当地许多恩古尼小酋长国征收贡赋。

兹维德大约在1790年继承恩德万德韦王位，其权势与近邻的对手——姆泰特瓦邦联的丁吉斯瓦约同时达到巅峰。㉙建立强大的恩德万德韦邦联的重任主要落在兹维德肩上。但应当看到，他建国的基础是其父和祖父奠定的，同时还利用了当地(甚至德拉肯斯山西部索托-茨瓦纳族)流行的制度和风俗习惯。

如同这地区其它几个恩古尼国家一样，恩德万德韦王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团的部署，将年龄大致相同的成年男女征召入伍。男子在成年仪式上接受割礼。有迹象表明，兹维德及其前任国王可能是最早发觉“索托-茨瓦纳式”协调管理割礼以及有关的成年典礼，将

100 其从个体家庭扩大到社团规模或酋长国范围具有某种政治意义的恩古尼统治者。后来扩大这一原则就容易了。附庸酋长可以继续统治他们的部落，但他们不能再主持或组织成年仪式；这类仪式须由王国中央来组织，恩德万德韦境内所有社团的青年都编入全国的同龄人军团。㉚ 这当然有助于未来军事活动中使用同龄人军团作战。

除利用成年人军团使“本民族”国家各不同部分密切结合外，恩德万德韦的统治者似乎还依靠广泛利用的魔法宗教的影响来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威，帮助他们造成这个强大而不可侵犯的王国的神秘性。每年传统的“首季收获”献礼照常举行，此外，兹维德国王还特别看重一大群医师和王室法师的服务，他们散布消息，使周围的许多酋长国对兹维德的权威产生畏惧感。兹维德还通过外交婚姻，与这地区一些国家建立或改善关系。例如，他将自己的妹妹恩托姆巴扎娜嫁给姆泰特瓦的统治者丁吉斯瓦约。或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终于同意自己的一个女儿坦迪勒与恩瓜内(斯威士)的索布胡扎结婚，她在恩瓜内人中间以兹维德之女拉兹泽闻名。

兹维德的这种联姻意在使其扩张政策不要受到障碍，这在索布胡扎重新要求使用丰戈洛河谷肥沃的可耕地时昭然若揭。兹维德对此作出反应，袭击了索布胡扎设在斯威士兰南部边境的首都。㉛几次冲突之后，恩德万德韦的军队获得胜利，将索布胡扎的随从者赶出丰

㉗ 同上，第158-161页。
㉘ 同上，第160页。
㉙ 同上。
㉚ J.D.奥麦尔-库珀，1966年。
㉛ J.S.M.马泽布拉(Matsebula)，1972年，第15-16页；H.库佩尔(Kuper)，1947年，第13页；J.D.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29、49页；A.T.布赖恩特，1964年。

戈洛河谷，赶往北方。索布胡扎(又名索姆赫洛洛)退到今天斯威士兰山区，为斯威士国家奠定了基础。

斯威士人

恩瓜内族群的核心是恩博-恩古尼氏族集团，以及德拉米尼王族领导的一小群恩通格瓦-恩古尼人和一些聪加人氏族。这些氏族融合成为希塞尔韦尼地区的恩瓜内社会的首要阶层，称为贝姆扎布科(bemdzabuko)即正宗斯威士人。[52] 在现今斯威士兰的中部，索布胡扎又将附近的其它部落置于其政治控制之下。他们主要是与小群恩博-恩古尼和恩通格瓦-恩古尼社群融合了的索托(佩迪)氏族。被索布胡扎并入他的王国的索托社群，当时已具备完善的成人军团体制。这些新到的斯威士人被称为“ema-khandzambili”(开路先锋)，以别于那些从南方迁来的部落。[53] 101

索布胡扎的臣民，早在他们被赶出丰戈洛河谷之前，已经像丁吉斯瓦约一样采用了成人制。这就比用别的方法容易使斯威士兰中部的新社群与索布胡扎的其他臣民融为一体。斯威士兰的成年人也同索托人一样，只在战争时编入军团。被征服的氏族的青年一概加入恩瓜内人的编制，与他们的征服者同军团作战，[54] 这些索托社群的酋长并未被打倒，事实上他们对地方事务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尽管索托氏族在被占领初期在恩瓜内社会中地位相当低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日益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因此而享受到斯威士国家所属恩古尼成员的同等待遇。

索布胡扎有意减轻被征服的索托氏族的负担，他不仅允许索托酋长享有地方自治权，而且在斯威士族军队中给索托青年提供相当大的流动机会；他还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维持睦邻友好关系以保证他的新王国的安全。虽然兹维德已将他从故土赶到现在的斯威士兰，但是，索布胡扎仍同恩德万德韦保持友好关系，并试图娶兹维德之女为正妻来巩固这种关系。为了得到祖鲁族的恰卡的谅解，索布胡扎赠给他年轻女子，其中包括王室公主。甚至恰卡在这些妇女怀孕后将她们杀死，索布胡扎仍坚持其安抚政策。[55] 结果，他的王国幸免于恰卡军团的劫掠。

索布胡扎死于 1840 年，其子姆斯威士(姆斯瓦蒂)继位，此后恩瓜内-德拉米尼人改称斯威士人。姆斯瓦蒂同其父一样必须保卫这个新国家不受来自南方的侵略，同时还要防止国内的叛乱。起初，在父亲去世时还相当年轻的姆斯瓦蒂不得不对一些预谋阻止他统治的势力作斗争。最先发难的是福科蒂，他得到南斯威士兰部分人的支持，但是，马隆格率领的王室军团解救了姆斯瓦蒂。 102

在平息福科蒂叛乱后，姆斯瓦蒂致力于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措施包括加强同龄人军团的中央集权制，建立更为广泛的王室村落网，重新组织“首季收获”(incwala)献礼以提高

[52] J. S. M. 马泽布拉，1972 年；H. 库佩尔，1947 年，第 14 页。
[53] 同上。
[54] H. 库佩尔，1947 年，第 15-17 页；H. 比麦尔(Beemer)，1937 年。
[55] J. D. 奥麦尔-库珀，1966 年，第 50 页。

王室的绝对权威等等。然而，这些改革并未能阻止住索布胡扎的另一个儿子——摄政者马拉姆布勒在 1846 年姆斯瓦蒂通过割礼后不久发动叛乱。这次叛乱牵连到白人传教士和祖鲁帝国丧父的代理人。最后，为了避免姆潘达的祖鲁军队入侵的威胁，姆斯瓦蒂不得不同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结盟。1846 年 7 月 26 日签订的条约有助于斯威士人摆脱祖鲁的吞噬。[36]

在平定马拉姆布勒的叛乱时，姆斯瓦蒂的另一个兄弟索姆库巴是关键人物。他是索布胡扎的长子，地位原属优越，后因平息马拉姆布勒叛乱和 1846 年参预对奥里赫斯塔德-布尔人的谈判，声望更高。然而，索姆库巴于 1849 年发起反对姆斯瓦蒂的叛乱。这次叛乱最终通过"鳄河地区帕依人和索托人的合并"建立了一个敌对国家，[37]索姆库巴夺取君权自己主持"首季收获"庆典。1856 年，姆斯瓦蒂多次讨伐叛乱者，在莱登堡的布尔人支持下终于杀掉索姆库巴，并与莱登堡的布尔人签订新的领土转让条约，[38] 在这地区恢复了正常秩序。

姆斯瓦蒂的国内政策比他的对外冒险有更大的成就。他在新近并入斯威士社会的许多社群的统治家族中选择"公主"，实现外交婚姻；同时，将斯威士王室姑娘嫁给各个氏族或世系的酋长。斯威士平民也很快仿效姆斯瓦蒂的政策，通过广泛的族外婚姻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结果，斯威士社会各种成分之间的种族区分日渐消失。[39]

姆泰特瓦

在恩瓜内-德拉米尼族被赶出韦戈洛河谷之后，北恩古尼地区便由恩德万德韦的兹维德与姆泰特瓦的丁吉斯瓦约两家彼此争夺。兹维德大约在 1790 年成为恩德万德韦国王。他肩负的责任似乎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恩德万德韦国，他以征收附庸部落的贡赋为基础，调动以同龄人军团为基础的军队，一年一度通过"首季收获"庆典(incwala)传播神圣王权的神话，并控制通往德拉瓜湾的商路。

姆泰特瓦王国在丁吉斯瓦约统治时已经闻名于世，他是约伯之子，卡伊(通常所传的姆泰特瓦王国创立者)之孙。[40] 如同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及其后祖鲁人的国家一样，姆泰特瓦政权也是在征收贡赋和围捕牛群的体制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军队的基础也是成人军团制。姆泰特瓦还与德拉瓜湾广泛通商。

前面已经谈到，这地区主要的恩古尼国家都拥有成人军团，而大多数恩古尼国家似乎又受到附近的佩迪人或其它索托族群的影响。[41] 然而，在这地区盛行的传统制度的改组上，丁吉斯瓦约似乎发挥出他通常的彻底性和想象力。他取消了往往形成同龄人等级的割礼，以便废除割礼所必须的一段时间隐居。他为自己的军队选择了"宽胸尖角"(Chest-and-

---

[36] J.S.M. 马泽布拉，1972 年；A.T. 布赖恩特，1929 年，第 325-328 页；H. 库佩尔，1947 年，第 19-20 页。
[37] J.A.I. 阿加尔-汉密尔顿(Agar-Hamilton)，1928 年，第 60-61 页；H. 库佩尔，1947 年，第 20 页。
[38] H. 库佩尔，1947 年；G.M. 特埃尔(Theal)，1908 年，第 4 卷，第 456 页。
[39] H. 比麦尔，1937 年。
[40] T. 谢普斯通(Shepstone)，见 J. 比尔德，1888 年，第 1 卷，第 160-164 页；A.T. 布赖恩特，1929 年，第 95 页。
[41] J.D. 奥麦尔-库珀，1969 年，第 211-213 页。

horns)队形。丁吉斯瓦约还同德拉瓜湾的马普托王国结盟。后来，在征服与合并夸贝国时，据说丁吉斯瓦约就是从他的盟友马普托王国方面得到配备火枪的士兵的援助，而不是如菲恩所说由葡萄牙人派出一连士兵。[42] 丁吉斯瓦约的姆泰特瓦王国向这地区的30多个酋长国征收贡赋，其中有一个森赞加科纳统治的小酋长国，它是祖鲁人国家。后来，森赞加科纳之子恰卡就成了丁吉斯瓦约军队的一名将领。

祖　鲁

丁吉斯瓦约统治时代姆泰特瓦的扩张，一再受到兹维德及其恩德万德韦军团的抵制。敌对双方进行过几次战争。1818年，丁吉斯瓦约被兹维德俘获并杀害。因为丁吉斯瓦约个人统治的特点，姆泰特瓦在他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恰卡早就受到丁吉斯瓦约的尊敬（在他的帮助下成为祖鲁小酋长国的首领），此时迅速趁虚而人。他取代丁吉斯瓦约成为姆泰特瓦酋长国邦联的领袖，实际上继承了姆泰特瓦"帝国"。但是，如同俾斯麦把德意志各邦纳人普鲁士国家一样，恰卡也将姆泰特瓦帝国"并入"了祖鲁国家，因而姆泰特瓦变成了祖鲁族的一部分。虽然如此，他仍指定丁吉斯瓦约的一个年幼的儿子代表他作为祖鲁王国的摄政，借以保留姆泰特瓦的传统制度。[43] 至于其它族群，恰卡显然是完全兼并，而不仅仅是享有宗主权。

104

当他还是祖鲁国酋长从属于丁吉斯瓦约时，恰卡已经着手改组他的军队。为实现军事目的而合理地调整社会机构，由此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合乎逻辑的。恰卡同时使自己的军事技术革命化。远投长矛被一种短巧的宽叶尖矛取代，这种武器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更能发挥作用。祖鲁的战士，现在都手持长盾，弃鞋赤足行走，调动时速度很快。仿效丁吉斯瓦约，恰卡拥用一支常备军团，由40岁以下的男子选拔后组成。不同于丁吉斯瓦约之处是，恰卡将这支常备军放在军营里，由国家供养，士兵在退役前是独身生活。因为驻扎军营，恰卡的军团训练有素，随时能应付紧急情况。[44]

恰卡的军队受过几种战术训练，"牛角阵"只是其中最特殊的。军队从事训练，对敌人残酷无情。恰卡不同于索布胡扎或丁吉斯瓦约，他经常消灭被征服部落的统治阶层的精英，将被俘的族群全部并人祖鲁族体制，用祖鲁王室成员取代原来的统治者。当然，有时一些较大族群的首领也经认可自行管理其臣民。

正是上述某些技术和战术得以实行和改进之时，恰卡投人多次激烈的战斗去夺取后来变成祖鲁兰的地区的统治权。他力图将北恩古尼地区所有的族群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必然导致他与兹维德的恩德万德韦军队的直接冲突，兹维德在1819年和1820年的两场战役中均被击溃。[45]

恰卡在姆赫拉图泽打败了恩德万德韦的军队。这不仅是兹维德本人军事上的惨败，而

[42] A. 史密斯，1969年，第184页。
[43] A.T. 布赖恩特，1929年，第158-167、202-203页；E.A. 里特尔(Ritter)，1955年，第113-116页。
[44]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35-37页。
[45] L. 汤普森，1969年a，第344页；E.A. 里特尔，1955年，第129-149页。

且标志着恩德万德韦国家——由姆库泽和丰戈洛河谷的一系列附庸小国组成的松散的邦联的解体。恩德万德韦残部在兹维德原有的将军率领下仓惶逃到北方，即现今称做莫桑比克105 的地区。这些分裂出来的小族群的首领有索尚甘恩、兹万根达巴和恩卡巴等。恩德万德韦的大部分已被征服，由西库尼亚涅率领，沦为祖鲁君主的纳贡国。[46]

加　扎

索尚甘恩是率先脱离兹维德的将领，他有一小群随从者。他迁移到距德拉瓜湾不远的聪加地区，在那里似乎相当容易地打败了曼尼卡、恩道和乔皮人，将这几个小族群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并纳入他的随从之列。在莫桑比克，索尚甘恩的随从者大都叫做尚加纳人，他在那里开始建立的王国称为加扎。他的军团四处远征，俘虏青年男女，夺取牛和谷物。加扎王国的经济实力牢固地建立在对内地及德拉瓜湾葡萄牙沿海殖民地之间商业控制的基础之上。[47] 早在加扎建国以前，德拉瓜湾已有商业，那里虽是葡萄牙人的商业据点，却引来其它国家——例如英国和奥地利的商船。[48]德拉瓜湾主要是恩亚卡王国、滕贝国和马普托国出产的象牙及其它商货的出口通道。[49]

新建的加扎王国控制下的商业与纳塔尔、甚至开普东部边境均有密切联系。[50] 但是，加扎王国过于依赖军事征伐和战争。从萨比河中游的首府杰伊梅特出发，索尚甘恩的军团一再同周围的酋长国作战，甚至袭击东边的绍纳各国。在这些攻击中，南莫桑比克各部落，尤其是聪加人首当其冲。[51] 1926 年，在恰卡打败兹维德之子西库尼亚涅之后，来自北祖鲁兰的恩德万德韦残部并入索尚甘恩的部落，结果，加扎社会中的恩古尼成分增强了。[52]

聪加人的社群被征服后，也并入了熟悉的祖鲁族型的国家。从范围来看，加扎国从赞比西河下游，一直延展到林波波河南岸。加扎国王的权力依靠一支以成人军团制为基础的军队，所运用的正是祖鲁军队的军事技术。来自南方的原始的恩古尼部落现在已成为社会106 的优裕阶层，称为“巴-恩古尼”，而新加入的平民叫做“巴-蒂尚甘恩”人。与姆菲卡尼时代产生的许多国家的创建者相比，索尚甘恩并未利用他的成人军团使附庸社群和他的核心恩古尼集团合并统一。J.D. 奥麦尔-库珀断言，这些社群仍保持自己有别于恩古尼族的军团，虽然它们受“巴-恩古尼”军官的控制。当然可以设想，这些附庸社群的军队是牺牲品，在战场上总是置于前线。[53]

---

[46] J.D. 奥麦尔-库珀，1966 年，第 57-58 页，H. 芬恩引文，见 J. 比尔德，1888 年，第 1 卷、第 86 90 页。
[47] A.T. 布赖恩特，1929 年，第 313 页；J.D. 奥麦尔-库珀，1966 年，第 4 章。
[48] A. 史密斯，1969 年，第 176 177 页。
[49] S. 马克斯，1967 年 b。
[50] A. 史密斯，1969 年，第 169 页。
[51] J. 斯蒂文森-汉密尔顿，1829 年，第 169 页。
[52] J.D. 奥麦尔 库珀，1966 年，第 57 页。
[53] J. 斯蒂文森-汉密尔顿，1929 年，第 169 页。

恩德贝勒人

姆兹利卡兹——恩德贝勒国的创建者，是布莱克-姆福洛兹河上一个小酋长国库马洛的首领马绍巴涅的儿子，该酋长国(库马洛)曾经向恩德万德韦国王兹维德纳贡。姆兹利卡兹生于1796年，1818年兹维德杀害涉嫌背叛的马绍巴涅，他成为统治者。身为马绍巴涅正妻(兹维德之女)的儿子，姆兹卡利当然是合法继承人，他由兹维德指定为库马洛酋长国首领。

恰卡在怀特-姆福洛兹河战役中打败兹维德，姆兹利卡兹很快就背弃其外祖父兹维德而归顺恰卡。1822年，恰卡派姆兹利卡兹去征讨邻近的索托人部落，事后姆兹利卡兹蔑视恰卡，竟拒绝交出他俘获的牛群。姆兹利卡兹击退了恰卡派去讨伐他的祖鲁军团。他把所属库马洛人集结在恩图姆巴涅山上。但是，恰卡的第二支军团攻克了姆兹利卡兹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堡垒，使库马洛军团受到沉重的打击。姆兹利卡兹逃过德拉肯斯山，其随从减少到200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妇女、儿童和牲畜大为减少，在几百名手执冷兵器的赤足战士护卫下，姆兹利卡兹开始了20年的漂泊生活，行程1500英里，穿越许多陌生之地"。

姆兹利卡兹设法逃避祖鲁军团的追击，他只得在一些索托人小族群居住的高地草原上开路行进。在渡过瓦尔河时，他俘获了一些牛，以及男人、妇女和儿童。先前越过德拉肯斯山散居在索托人社群中的少数恩古尼人，此时加入了姆兹利卡兹的队伍。1824年，姆兹利卡兹来到奥利凡特河定居，当地早有索托-茨瓦纳族的一支佩迪人占住，1820年前他们由图拉雷统治。他的居住地叫做埃库普姆勒尼。姆兹利卡兹对佩迪人和其它索托族群的攻击，主要发生在现今德兰士瓦的东部和北部，他不仅扩大了畜群，而且还由于征服、俘虏或收容恰卡的人员而扩充了自己的队伍。在德兰士瓦高地草原，居住的主要是索托-茨瓦纳社群， 107 姆兹利卡兹的恩古尼随从者叫做恩德贝勒。1825年，恩德贝勒军团在整个高地对索托-茨瓦纳人作战，其范围远至博茨瓦纳东部。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姆兹利卡兹的王国变成了高地草原上最强大富足的国家。

姆兹利卡兹拥有大量财富的消息引来了成群结队的冒险家和抢劫者，其中有莫莱茨亚涅领导的汤格族人(原住瓦尔河)和扬·布洛姆率领的有火枪的欧亚混血种马贼(他们经常骚扰德兰与奥兰治亚的几个非洲国家)。这些劫掠者袭击姆兹利卡兹设在距瓦尔河不远的大畜牧场，任意夺取他的大批牲口。[54] 此外，祖鲁军团经常入侵骚扰，原兹维德属下的两名将领——兹万根达巴和恩卡巴[55]也随时可能发动攻击，迫使姆兹利卡兹于1827年将首都迁到奥迪河(鳄河)源头附近的马加利斯山北坡。这里是今南非德兰士瓦省的克韦纳县和卡特拉县的心脏地区。在今比勒陀利亚城附近，姆兹利卡兹建立了新总部，称为姆赫拉赫兰德拉，此后五至七年间，他的军团从这些据点出发，有计划地攻击德兰士瓦中部克韦纳和卡特拉等邦国。他的军团在林波波河以北、瓦尔河以南进行远征，向西远至卡拉哈里沙漠边缘。在

[54]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9章。
[55] 同上。

姆赫拉赫兰德拉，姆兹利卡兹还为其首都周围和卫星城加贝尼、恩孔格维尼奠定了有效的民族建设的基础。可是，就在他的新家园，姆兹利卡兹也不得安宁。1828 年，扬·布洛姆手下武装的科兰纳人在一些索托-茨瓦纳军团的增援下，袭击了姆兹利卡兹的畜牧站，夺走数千头牛，杀死很多牲口。正在别处执勤的姆兹利卡兹的军团迅即赶回，截住从恩德贝勒边境开往南方的掠夺者，杀死其中多数人，夺回了牛群。一年后，一支强大的格里夸人和索托人的武装队伍在巴伦德的率领下，也曾袭击姆兹利卡兹的畜牧站，但受挫败。然而，姆兹利卡兹仍害怕祖鲁人再次发动袭击。1832 年，他将自己的住地向西移到马迪克韦(马里科)河上的莫塞加。他从这个新据点出发，攻击德兰士瓦西部的大部分茨瓦纳族群以及现今博茨瓦纳境内的茨瓦纳人，直到 1837 年他被布尔人、茨瓦纳和格里夸人的联合武力击败，终于退出莫塞加。[56]

姆兹利卡兹接着在布拉瓦约设立总部。他的军团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该地区的卡兰加和**108** 绍纳人各酋长邦。绍纳各邦由于先前反兹万根达巴和恩克沙巴-恩古尼的战争，实力大减。来自布拉瓦约的恩德贝勒军团经常攻击绍纳人，目的在虏掠牛群。许多绍纳酋长邦变成了交纳贡赋的附庸国，另一些却顽强抵抗。有些绍纳人，尤其是萨比河与胡尼亚尼河以东的绍纳人，从来没有受到恩德贝勒人的统治。然而，卡兰加各酋长邦统治分散，不少卡兰加人并入了恩德贝勒社会。另一些卡兰加人被迫南迁，向西南迁移的则进入了现今的博茨瓦纳。

迁入新家园之后，姆兹利卡兹很少感受到强敌的威胁。他不再花费时间进行军事远征，而是越来越关注本王国的巩固。然而，恩德贝勒国本质上是实行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仍需要不断增加贡品(牛群、谷物、铁器、武器、装饰品、皮革制品等实物)，或征调劳力和徭役。因此，军团继续被派往北部和东部操绍纳语的社群以及南方一些索托-茨瓦纳邦国去。有的茨瓦纳人，例如巴卡人，则奉命照料姆兹利卡兹的畜群。[57] 1842 年，恩瓜托国王塞科马曾经打败入侵的恩德贝勒军团。第二年，恩瓜托人又杀死了姆兹利卡兹的征税官。[58] 或许是因为姆兹利卡兹的好武性格有所消退，或许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把军事任务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他对犯上作乱的恩瓜托人竟出人意料地未加惩罚，直到 20 年后才施行报复。

1839 年，姆兹利卡兹曾经在赞比西河上败给赛贝特韦恩率领的科洛洛人，他似乎有意要对此报仇。他先后派出两支大军，一次在 1845 年，另一次是五年后，但两次远征均告失败，后来再也没有对这个强敌采取行动。另一方面，1847 年，恩德贝勒受到由亨德里克·波特吉特率领的布尔人突击队和佩迪人援军的袭击。这次远征彻底失败。恰如 20 年前对付格里夸人和科兰纳人一样，姆兹利卡兹派遣一支军团去追击显然获胜的来犯者(他们夺走了数千头恩德贝勒的牛)，最后是兹万根达巴的精锐部队打垮了宿营过夜的侵略者，杀死佩迪人卫队并夺回了牛群。

1850 年以后的整整十年间，姆兹利卡兹未曾经历大战。由于渴求与欧洲人改善关系，他**109** 于 1852 年与布尔人签订一项条约，允许他们在恩德贝勒境内行猎。姆兹利卡兹还在 1854

---

[56] L. 恩康科，1982 年，第 161-171 页。

[57] A. 西勒里(Sillery)，1952 年，第 118 页。

[58] R.K. 拉斯穆森(Rasmussen)，1977 年，第 35 页；A. 锡耶里，1952 年，第 118 页，指明这一事件发生于 1838 年。

年、1857年、1860年三次接受传教士罗伯特·莫法特的访问。[59] 这种访问为欧洲人进入恩德贝勒王国铺平了道路。特别是莫法特等人，得到姆兹利卡兹的同意，开始在恩德贝勒王国传教。[60] 随后，欧洲人日益频繁地进入恩德贝勒，其中有猎人，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说他们是罗得斯和英属南非公司的先驱。[61] 欧洲人于1867年得知卡兰加人拥有古代塔蒂金矿之后，进入恩德贝勒王国的人更多。[62] 当时姆兹利卡兹已重病在身。他于1868年9月初去世。

恩德贝勒王国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当它在现今津巴布韦建立时，在德兰士瓦形成的国家模式已发展成熟。在建设恩德贝勒王国的过程中，姆兹利卡兹重复了祖鲁帝国的一些特征，当时他自己的库马洛部落不过是祖鲁帝国中的一个小实体。他把同龄入军团当做一种主要的工具或手段，用以吸收被征服民族，并消除林波波河北岸地区最终形成的社会阶层。

1840年后，恩德贝勒社会包括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姆兹利卡兹最早从纳塔尔—祖鲁兰地区带来的亲族集团，以及在瓦尔河以南加入他的部落。他们称为赞西。声望次之的第二阶层主要是在向瓦尔河以北移民时加入恩德贝勒社会的一些索托-茨瓦纳人。他们称为埃-恩赫拉。这个等级制度的最下层称为霍勒，指林波波河以北被征服地区的人民。[63] 由于赞西的社会地位优越，其它社会集团都有意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用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阶级"成员之间通婚是令入反感的。[64] 但如个人精通辛德贝勒语，或在战争中表现出众，他也就为社会所赞许，在军队中可能晋升。同龄入军团制能够消除这些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尽快吸收被征服地区的青年。它有助于青年接受恩德贝勒的习俗和辛德贝勒语，并忠实于姆兹利卡兹。

在维系不同的臣属集团方面，国王的权位至关重要。这反映在每年一次的"首季收获"(incwala)庆典上。这一庆典比其它任何仪式更能表明国王个人在全国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用一位人类学家的话说，[65] "首季收获"庆典使国王的行为模式仪式化，作为一种维护 **110** 全社会利益的仪式，"袪除邪魔，保佑统治者，在政治上把全国人民团结在国王周围"。[66] 他所有的臣属都要到首都来参加这一盛典。[67] 从理论意义上说，既是恩德贝勒全国畜群的所有者，姆兹利卡兹就处在一种可以操纵其臣属的婚姻能力的地位。除控制全国畜群之外，姆兹利卡兹还把被俘少女置于他的保护下。这就是说，他不仅控制经济生产，同时还控制其臣属的再生殖能力。通过联姻，他与很多臣属联系在一起。

由于恩德贝勒王国是征服性很强的国家，它的庞大军队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政治或行政组织相重叠，使后者相形见绌。这支军队在姆兹利卡兹统治晚年约有两万人，分为几个军团，由称为"英杜纳"(induna)的军团司令监督。他们分属于四个军区司令官管辖，

---

[59] R. 莫法特(Moffat)，1945年，第1卷，第225页。
[60]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53页。
[61] 同上，第152页。
[62] L. 汤普森，1969年b，第446页。
[63] A.J.B. 休斯(Hughes)，1956年。
[64] 同上。
[65] H. 库佩尔，引自T.R.H. 达文波特，1978年，第45页。
[66] 同上。
[67] R.K. 拉斯穆森，1977年。

姆兹利卡兹统领全军。

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加入军队，编入军团。这些军团驻在军团城里。军团的已婚军人可以和妻子与仆从住在军团城里。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可以应付紧急情况的后备军。儿子和父亲在同一个军团城里应征入伍。这样，过去是从全国各地所有社群将青年招募到一个军团（正如索托-茨瓦纳人的情况），现在军团城的成员则变成了世袭的。有时候，在人口增长有保证的情况下，姆兹利卡兹就会从各个军团城抽调青年以组成新的军团，由他任命的“英杜纳”指挥，而一个新的军团城可望建成。每个军团城分别处于它的“英杜纳”和姆兹利卡兹的一个王后的双重监督之下。

然而必须指出，当以吸收青年一代为目标的军团制度照此方式实行时，并非所有被征服人民都住在军团城里。许多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被征服者的村庄仍分布在恩德贝勒王国境内，但是，这些村庄通常是隶属于军团城的。

最后还须指出，在恩德贝勒王国之内，姆兹利卡兹本人已成了一切政治权力的中心。他任命所有的军团司令或村庄头人，收阅他们的详细报告。姆兹利卡兹经常往返于各军团城之间，有时还突然视察这些卫星城镇，了解情况。在较短时间内，他已建立起一个基础牢固的王国，被征服民族接受了恩德贝勒语言和文化，其中有些民族只是被并入这个国家，并未真正成为王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恩德贝勒族全体皈依绍纳的姆瓦里/姆利莫宗教，该宗教的特点是有一位宣示神谕的祭司或降神者。[68]

111

索　托　人

莱索托王国是从姆菲卡尼运动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中产生的另一个新国家。它是由一系列操索托语的小自治社群融合而成的，这些社群广泛分布于德拉肯斯山脉下从北到西的平原，大都由几个属于索托-茨瓦纳社会的克韦纳族群或福肯族群的氏族和世系组成。

为了反对这些住于德兰士奥兰治亚高原上操索托语的社群，赫卢比人和恩瓜内人发动过多次战争，虽说是自相残杀，但却为莫舒舒提供了施展领导和组织才能的机会。莫舒舒原是这个地区克韦纳族酋长邦一个小分支——不大出名的莫科泰利的酋长之子。正统的记载把莫舒舒的某些成就归功于索托人社会一位“思想家国王”、高地克韦纳酋长国联邦的另一分支莫纳亨的统治者莫赫洛米的教导和影响。作为一位求雨师，莫赫洛米以其智慧和声望在德兰士奥兰治亚-索托语系各邦中极受人尊敬。他遍游各国，与许多统治者的女儿结成外交婚姻，据说这些事迹为后来莫舒舒统一各邦国铺平了道路。[69]

然而，聪明的莫赫洛米对莫舒舒的性格和成就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应当承认莫舒舒本人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首先，成年之际在同龄人当中，他已起了带头作用，这种才能在赫卢比人和恩瓜内人入侵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他们的入侵曾使德兰士奥兰治亚大多数索托酋长国纷纷瓦解。[70] 莫舒舒却在创业的初期发现平顶山具有防御能力。于是，他把自

[68] 同上；A. J. 威尔斯，1967年，第155页。
[69] J. 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99页；D. F. 埃伦贝尔格(Ellenberger)，1912年。
[70] L. 汤普森，1969年b，第399页。

己的家族和同龄伙伴安置在布塔-布特平顶山上的堡垒里，并在通向山顶的狭窄通道上加强守卫，用石块筑起围墙，在地势有利之处设立瞭望棚。[71] 112

利用这个平顶山堡垒作为基地，莫舒舒就能对一些邻邦发动袭击，同时也能保护他的人民避免姆马-恩塔蒂西所率领的特洛夸人的攻击。他在“波茨战役”中打败了姆马-恩塔蒂西。但是，1824年特洛夸人反攻回来，对布塔-布特平顶山进行持久的包围战，结果，莫舒舒的人民进行顽强的反击，终因精疲力竭，弹尽粮绝，几乎陷于瓦解。恩瓜内军队的出现，解救了莫舒舒，[72] 这支军队攻击特洛夸人，迫使他们放弃了对布塔-布特山的包围。同年晚些时候，莫舒舒率其部属离开满目苍凉的家园，[73]向南迁移到侦察兵早先选定的一个新的山堡——位于小卡利登河上易于防守的塔巴博休堡。在这处面积约500公顷的平顶山上——牧草丰美、“泉水常流”之地，[74] 莫舒舒与其父及亲密随从者建起了他们的房屋。对通向塔巴博休堡各处山道，严密设防守备。[75]

在这个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山地上，莫舒舒感到安全，从此致力于将许多部落残余组建为一个新民族的事业。他很快降伏了原来占有塔巴博休周围土地的巴曼查内人的酋长诺尼。此时，索托人和恩古尼人的几个族群前来避难，请求莫舒舒保护。他把一些部落置于他的兄弟(后来还有他的儿子)的监管之下。一些较大的族群，如巴富蒂人交给莫罗西监护，巴塔翁人交给莫莱查内，巴罗朗人交给莫罗卡。他允许这些族群原来的统治者保留地方行政管理权，但须承认他的最高权力。

为了对付强大而危险的邻族的威胁，莫舒舒采取了向他们进贡以换取友谊的策略，他定期向马蒂瓦涅进贡，以保自己免遭阿马-恩瓜内人的打击。同时，他还用蓝鹤羽毛作为贡品送给恰卡。最后，巴索托人感到恐慌，因为恩瓜内人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巴索托附近。在这种情况下，经莫舒舒建议，1827年一支祖鲁军队向恩瓜内人发起进攻，虽给予严重打击，但未将他们赶出德兰士奥兰治亚地区。为了报复，马蒂瓦涅的恩瓜内人于1827年7月攻打莫舒舒设在塔巴博休山区的要塞，但受到挫败而撤退。[76]打败令人畏惧的马蒂瓦涅的恩瓜内人，使莫舒舒名声远扬。大多数恩瓜内人进入今天的特兰斯凯，不久又在姆博洛姆波遭到失败。更多的零散部落纷纷投靠莫舒舒。他对恩瓜内人的胜利表明了他选择塔巴博休为首都是明智的。 113

为了提高自己的信誉，莫舒舒派军队去帮助莫莱查内所监护的巴翁人，共同反抗滕布人劫掠牛群的行为。在一次反击中，莫舒舒的人民打败了塞科尼耶拉军团的人侵。从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制止了特洛夸人的骚扰。恩德贝勒军团也曾进人德兰士奥兰治亚讨伐莫莱查内和他所监护的塔翁人[77]，这对于莫舒舒的山区首都防御能力又是一次考验。恩德贝勒军队进人莱索托，企图摧毁塔巴博休。然而，他们失败了，被迫撤退。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莫

---

[71]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00-101页。
[72] 同上，第101页。
[73] D.F. 埃伦贝尔格，1912年，第146页。
[74] L. 汤普森，1969年b，第399页。
[75] G. 蒂尔登(Tylden)，1950年，第5页；D. 埃伦贝尔格，1912年，第147页。
[76]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02页。
[77] E. 卡萨利斯(Casalis)，1861年，第22-24页；L. 汤普森，1969年b，第400页。

舒舒给正在退却的敌人送去少量宰好的牛，以此为赠品要求和平，并说他相信他们是为饥饿所迫才来攻打他的。恩德贝勒人带着对这位伟大的山国国王的敬重，远离而去，从此再没有回来攻击莫舒舒。[78]他为反对恩德贝勒这样可怕的敌手所取的防御策略的胜利，又一次在整个索托语族中引起反响。这一成就大有助于莫舒舒提高威信。它还清楚表明，他的防御战略也就是对强敌必要时进行战斗，但有可能即寻求和解。[79]

恩德贝勒人造成的危险刚刚消除，莫舒舒王国又面临新的灾难。索托人的社群不断遭到成帮结伙武装骑手的攻击。早于1830年，这些格里夸人和科兰纳人的匪帮已开始骚扰巴索托。现在，他们的袭击越来越频繁，且更令人惊恐。德兰士奥兰治亚经过多次激烈的战争，当地大多数邦国国力削弱，陷入贫困状况。然而，莫舒舒的王国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特别是巴索托人拥有大量的牛群。格里夸人和科兰纳人的骑匪往往以闪电般的速度袭击巴索托村庄和畜群。他们组成小连队骑马出击，具有优越的机动性。他们配备了滑膛枪，其射程比任何投枪都远得多。他们都是好射手，善于对他们的侵害对象发起突然袭击。巴索托人为进行反击而设置伏兵，或在夜间袭击格里夸人和科兰纳人匪帮的营地。他们杀死匪徒，夺取匪帮的马匹和枪支。当时，巴索托出产一种本地马"巴索托小马"，他们也就变成了"一个横枪立马的民族"。[80] 这在国防建设中是极大的发展。

114 通过一名格里夸基督教徒亚当·克罗茨，莫舒舒与白人传教士有了接触。1833年，他派人送牛到菲利波利斯传教站，"以讨好传教士"。一小群法国传教士应约而来，他们原来希望在巴胡鲁策人中间开始传教，可是有消息说巴胡鲁策及其邻近的茨瓦纳人正受到姆兹利卡兹的侵袭，希望就落空了。[81] 于是，有人劝服法国传教士，他们应照天意在莫舒舒的巴索托人中开展工作。莫舒舒把他们安顿在马科阿拉涅，传教士称此地为莫里加。不久，在比尔希巴、麦夸特林也建立了传教站。传教士是应加强防御的要求而进入索托王国的。他们应帮助莫舒舒保卫他的王国，向他提出最好的建议，协助他获得火枪，甚至与强大的白人政府建立联系，使莫舒舒同白人政府建立友好关系或结盟。

在姆菲卡尼运动骚乱的局势中，有许多流离失所的族群投奔莫舒舒的王国，由此也可看出他的建国方略的效果。莱普伊率领的巴特拉平人来到法国传教士的贝图利传教站定居。1836年，莫莱查内属下的巴塔翁人来到比尔希巴，两年后他们迁移到麦夸特林；1833年后，莫罗卡属下的巴罗朗人已获准和卫斯理会传教士同住在塔巴恩丘。后来，在"第六次边境战争"时，滕布人也前来寻求莫舒舒的保护。

19世纪30年代，布尔人对索托族领土的侵犯日益加强。1836年后，布尔人的侵略达到极点，这一年布尔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史称"大迁徙"。入侵的布尔人与被逐的巴索托农民之间连续发生冲突。有些冲突是领土争端引起的，有的是为了争夺牛群所有权，还有一些是因为劳工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由于冲突不断，而且越来越严重，英国政府不得不施加

---

[78] J.D.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03页；L.汤普森，1969年，第400页。
[79] G.蒂尔登，1950年，第8-10页；L.汤普森，1969年b，第400页。
[80] J.D.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04页。
[81] J.D.奥麦尔-库珀，1966年。

干涉，两次解决都毫无结果，[82]最后干脆承认侵占莫舒舒王国心脏地区的布尔人为独立的共和国。布隆方丹公约带来的是伤害加侮辱，英国认可布尔人占有索托族领土的合法性，其中一项条款规定禁止出售武器弹药给巴索托人及其它黑人国家，而布尔人却可自由获得这类军需品。

因此，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奉行侵略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不足为怪，它对莫舒舒的全部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布尔人还扬言要拿下圣约翰斯港，[83] 消灭莱索托王国。115 1858 年和 1865 年，巴索托人被迫对奥兰治自由邦进行两次反抗战争，后来他们的国家被英国总督沃德豪斯接管了。

莫舒舒同意英国女王政府兼并他的国家是出于自卫防御的考虑，目的在保存他历尽艰险才建立的民族。他成功地防止了奥兰治自由邦吞并莱索托王国的企图。莫舒舒 1870 年 3 月去世，他不仅挽救了他的完整的王国，而且为今天仍存在的这个独立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科 洛 洛

科洛洛人原来是帕查族分支巴福肯人。在姆菲卡尼运动发生之前，他们住在维特河(蒂科阿内河)左岸库鲁特勒列山附近地区。他们的邻邦是莫莱查内统管的巴塔翁人。[84]姆马-恩塔蒂西的特洛夸人对他们进行过一次突然袭击，几乎夺走了他们所有的牲畜，使这支福肯-帕查人无家可归。他们为贫困所追，逃过瓦尔河，与另一个较大的巴福肯族群合并，人口日渐增多。[85]赫卢比人与恩瓜内人的战争，曾迫使许多小社群的索托人逃过瓦尔河，远离德兰士奥兰治亚地区。帕查家族的王子塞贝特韦恩，当即掌握了这个联合起来的福肯族群的领导权。

塞贝特韦恩的随从四处流浪，以寻找新的家园和牛群。他们逐渐向西流浪到巴特拉平地区。在这里他们遇上了另外两个流离失所的族群——巴富廷人和巴赫拉夸纳人。起初福肯人与富廷人也发生冲突，但不久三个族群就联合起来，并于 1823 年 6 月 26 日攻打特拉平的首府迪塔孔。[86]当时伦敦传教会的代理人罗伯特·莫法特住在巴特拉平人的库鲁曼，他得到格里夸敦的亲教会的格里夸头人们的支援，并与各中心城镇附近的混血种人合作，很快组成一支有 100 名火枪手的联合武装队伍，派去援救迪塔孔城。

战斗当天，进攻者遭到反击，伤亡惨重而被驱逐。格里夸人的骑兵用火枪将他们击溃 116 了。[87] 这次迪塔孔惨败后，混合的牧民族群分道扬镳。富廷人和赫拉科阿内人向东迁徙，[88] 塞贝特韦恩率领其部众——这时改名马科洛洛人穿过巴罗朗人居住区，向北进发。

---

[82] 指 1843-1845 年所订的两次条约，其中 1845 年的条约是与莫舒舒签订的；1848 年的条约认可在英国管理下布尔人占领一块飞地，称为奥兰治河主权国。

[83] G. 蒂尔登，1950 年；D. 埃伦贝尔格，1912 年，第 306 页。

[84] E. W. 史密斯，1956 年，第 50 页。

[85] 这一福肯族群先前曾受到莫莱查内的塔翁人的攻击，并因此丧失了牛群(参见 D. 埃伦贝尔格，1912 年)。

[86] J. D. 奥麦尔-库珀，1966 年，第 94 页；E. W. 史密斯，1956 年，第 52-53 页。

[87] R. 莫法特和 M. 莫法特，1951 年，第 87-88 页，91-97 页。

[88] S. 布罗德本特(Broadbent)，1865 年，第 128 页-133 页。

据传，塞贝特韦恩在反对巴罗朗人的许多部落的战斗中，曾经与巴翁人的首领——老练的军人莫莱查内协作。[89]他们把战争扩大到胡鲁特希，洗劫并摧毁了当地的首府卡迪切韦涅(库里查涅)，驱散居民，杀害了摄政者迪乌特维伦。接着，这两个结盟集团又与阿皮河同鳄河汇合处的卡特拉-卡费拉人交战，[90] 但是，他们在此地的军事活动却引来姆兹利卡兹军队对他们的攻击，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侵犯了恩德贝勒人认为属于自己的地盘。[91]塞贝特韦恩与莫莱查内从此分手，后者向南迁移到马特瓦塞(马卡西埃)。[92]

马科洛洛人转而进攻博里赛地区一个从克韦纳王国分裂出来的较大的分支——莫鲁阿科莫统治的部落。巴克韦拉人由于王族纷争，此时已经衰弱，而且分裂为三部分。[93] 塞贝特韦恩接着又攻击班瓜克策人，这是当地最强大的一个茨瓦纳国家。1824 年，班瓜克策人在约萨巴尼亚纳打败了塞贝特韦恩，久经战斗的国王马卡巴二世战死沙场。塞贝特韦恩再次攻击克韦纳王国，冲破迪特吉瓦涅要塞前沿残部的反抗，夺走大量牛群。他住进克韦纳王国旧都迪图巴鲁巴，打算以此为永久居住(至少是长住)之地。然而第二年，即 1826 年，马卡巴二世之子、恩瓜克策国王塞贝戈成功地发起突然袭击，打败了塞贝特韦恩，将他逐出迪特吉瓦涅山区，科洛洛人伤亡惨重，几乎丧失全部牛群。[94]

塞贝特韦恩和追随他的贫困交加的科洛洛人又一次走上四处流浪的旅程。向北方迁移时，他们两次与卡里率领的恩瓜托人交战，打败了恩瓜托人，抢走大量的牛。但在迁往恩加米湖途中，他们在沙漠里迷路，舍弃了许多恩瓜托人的牛。[95] 他们又一次来到恩加米湖附近的巴塔瓦纳，轻而易举地打败当地居民，抢占了他们的畜群。[96]

117

塞贝特韦恩打算越过卡拉哈里沙漠，直达西海岸。由于沙漠环境恶劣，沙漠中一些社群又顽强抵抗，[97] 他被迫转回恩加米湖。不久向北迁移，又一次与巴塔瓦纳人相遇，打败他们，占领了他们的新城镇和政府。塔瓦纳人后来溃散了，又返回到恩加米湖附近的旧家园。[98]经过艰苦跋涉，马科洛洛人迁移到赞比西河和卡富埃河汇合处附近。但不打退恩古尼军团的攻击，他们还不能安身下来，他们共发生三次战斗，一次是反击姆塞涅-恩古尼的首领恩卡巴，另外两次则是反击姆兹利卡兹领导的恩德贝勒人，当时姆兹利卡兹也在赞比西河沿岸寻找新的住地。

塞贝特韦恩和他的科洛洛人成功地击退了入侵者。但凭经验，他们必须将住地迁往卡富埃高原西边。如同克韦纳的情形一样，在茨瓦纳地区，塞贝特韦恩很容易就战胜了洛齐人，因为洛齐王国正发生继承权纠纷，内讧激烈。塞贝特韦恩征服了洛齐人，只有洛齐王族率领的一小群人逃亡在外。[99]

---

[89] J.D. 奥麦尔 库珀，1966 年。
[90] 同上，第 116 页；D. 埃伦贝尔格，1912 年，第 308 页。
[91] D. 利文斯敦(Livingstone)，1857 年，第 85 页。
[92] S. 布罗德本特，1865 年，第 128-133 页。
[93] A. 西勒里，1954 年。
[94] A.G. 贝恩(Bain)，1949 年，第 51-71 页。
[95] D. 利文斯敦，1857 年，第 85 页。
[96] J.D. 奥麦尔 库珀，1966 年，第 119 页；D. 埃伦贝尔格，1912 年，第 310 页。
[97] D. 利文斯敦，1852 年，第 163-173 页。
[98] J.D. 奥麦尔 库珀，1966 年，第 119 页。
[99] 同上，第 121 页。

此时，既然消除了恩德贝勒的威胁，塞贝特韦恩便安顿下来巩固他的新王国。他制止了恩古尼人，特别是恩德贝勒人的入侵，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因此声威大震，当地许多社群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从的领袖。

在塞贝特韦恩的统治下，科洛洛国家日渐昌盛。他以惊人的魄力和想象力接受了建立民族实体的挑战。为了民族统一，他从洛齐人以及其他被征服民族中间选女为妻，同时鼓励他最亲近的科洛洛追随者也这样做。他坚持认为他的国家所有臣民都是国王的子女。塞贝特韦恩留任许多洛齐酋长，并用新的洛齐官员取代逃亡在外的王族成员。一些洛齐酋长加入了塞贝特韦恩的议事会，按时向他提出建议。[110]

塞贝特韦恩未曾将索托族实行的同龄人成年仪式强加给洛齐人或其他被征服者。但他要求他的王国普及科洛洛语。他尊重洛齐人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动，只是尽可能让它与新的并存的科洛洛制度融合一体。然而，科洛洛人在社会及政治地位上毕竟是贵族统治者。塞贝特韦恩创立一种地方行政制度，即把村庄合组为行省或“县”。指派科洛洛官员担任行政职务，负责管理并向臣民征收贡物。一部分贡品专属国王所有，另一部分则分配给下属。塞贝特韦恩在每个村庄都安插至少两家科洛洛的贵族，他们就是地主。[111]

118

按照洛齐人的传统和宗教，国王和臣民应隔离居住，塞贝特韦恩则使自己成为全体人民(不论他们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地位如何)容易接近的国王。这样一来，他不仅证明自己真是全民之父，更重要的是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洛齐人王权的特征。1851 年 7 月他去世时，他的大部分臣民，包括洛齐人在内，差不多都以为自己属于马科洛洛族。他的继承人是塞克莱图。

在塞贝特韦恩征服洛齐国之后，逃亡到利姆比埃河一带的洛齐王族——例如马西库和塞波帕，只得就地维持一个流亡政府，竭力保留仍在闪烁的洛齐“民族主义”火焰。但塞克莱图的铁腕统治，只是将这闷火煽为烈焰。他死于 1864 年。其继承者更加残暴，这就成了洛齐人起义的信号。塞波帕领兵反抗马科洛洛人。平原地区和托卡高地的人民纷纷响应起义。科洛洛人被打败，他们的统治被推翻，洛齐王朝得以复辟。[112]

利文斯敦在从安哥拉到赞比西河的旅途中雇用过科洛洛人脚夫。1860 年，他让大部分脚夫返回他们的老家，约有 16 人留住于希雷河边。他们与当地妇女结婚，希望建立新的家园。这些青年不仅有火枪，而且具备科洛洛人军事和政治组织的丰富经验。谈起科洛洛国家的成就，他们颇具自豪感。他们把希雷河流域曼甘贾人用栅栏防卫的村庄组织成几个酋长国，由他们来统治。当时，曼甘贾人经常受到奴隶贩子的残酷掠夺和袭击。这些科洛洛酋长国得以保护曼甘贾人以抵抗恩古尼人、尧人和葡萄牙奴隶贩子。曼甘贾人的村庄后来组成为两个王国，分别由最能干的领导人莫洛克瓦和卡西西统治。在希雷河流域的各处战略要地，他们分派科洛洛人担任酋长统治当地的曼甘贾人。他们欢迎利文斯敦来传教，并与传教团合作。最后，科洛洛酋长与尧人也建立了亲密关系，但恩古尼人仍为外敌。尽管强大的恩古尼人不断侵袭，这些科洛洛酋长的势力仍维持到 90 年代即列强瓜分殖民地的时代。

---

[110] D.E. 尼达姆(Needham)，1974 年。
[111] D.E. 尼达姆，1974 年。
[112] J.D. 奥麦尔-库珀，1966 年，第 124 页。

119

横贯赞比西河流域的恩古尼国家

恩德万德韦人在姆赫拉图泽战役中失败后，这个联盟的各个派系四分五裂。兹万根达巴和恩卡巴(恩克沙巴)率领他们的恩古尼追随者进入了距德拉瓜湾不远的南莫桑比克，而这里已经是索尚甘恩的住地，他正在建立自己的王国。在夺取最高统治权的三角斗争中，索尚甘恩战胜了兹维德和恩卡巴，迫使他们退出这一地区。后来他靠牺牲当地聪加人的利益，巩固了他的王国的组织。

兹万根达巴和他的追随者——杰雷-恩古尼人越过林波波河进入罗兹维地区，与当地大多数绍纳邦国作战，在此过程中摧毁了昌加米腊帝国。兹万根达巴军团在距今布拉瓦约城不远的塔巴-齐卡-马姆博与罗兹维军队相遇，打败他们，并杀死最后一位马姆博——奇里萨姆胡鲁。然后，兹万根达巴率领其军团越过赞比西河而进入恩森加地区。他们于1835年11月20日在宗博附近渡过赞比西河。[103]

在向北逼进马拉维湖西部时，兹万根达巴率领的恩古尼人又与切瓦人和通布卡人进行过多次战争，俘虏多人，在一地休整数年后继续迁移。他们继续向北进军，直抵菲帕高原的马普波，地处马拉维湖北端与坦噶尼喀湖南端之间。[104]他们人员大增，因为在长途跋涉中打败许多部落，征募了不少新兵。

兹万根达巴死后，他遗下的恩古尼人约在1848年分裂为几个派系。他们分别参与了对这个地区许多邦国的侵略战争，其活动范围远至维多利亚湖南岸，向东远至印度洋岸。恩卡巴也曾率领姆塞涅-恩古尼人进入现今的津巴布韦。在这场动乱中，他们仿效杰雷-恩古尼人的前辈，对当地各部落不断发起战争。兹万根达巴的杰雷人与恩卡巴的姆塞涅-恩古尼人之间，有过一次小冲突，后者占了上风。这些姆塞涅人后来向西进人洛齐人地区，在那里又与塞贝特韦恩的科洛洛人发生一场战争，恩卡巴的这支恩古尼人被打败，分散而去，他们的首领也被杀害。[105]

恩瓜内领导的马塞科-恩古尼入也从莫桑比克迁移到津巴布韦，他们是1839年在塞纳和特特之间渡过赞比西河的。从马拉维南部并绕过马拉维湖南端，马塞科-恩古尼入进人坦桑尼亚的东南部。在这里，即松盖阿人地区，他们在恩瓜内的继承者姆普塔的统治下，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106]

120

结 束 语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姆菲卡尼运动乃是北恩古尼大多数国家社会-政治急剧变化的结果。激起姆菲卡尼运动的原因，可追述如下：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短缺，林区气候变

[103] R. 格雷(Gray)，1965年；L. 汤普森，1969年a，第347页；D.R. 亨特，1931年，第284页。
[104]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23-124页
[105] E.W. 史密斯，1959年，第71页。
[106]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73页。

化，一方面严重影响了甜草与酸草牧场之间原本脆弱的生态格局、同时，由于人口与牲畜的逐渐增长，又增加了对草场的压力。马德拉图勒旱灾显然使上述严峻局势更加恶化，该地区居民争夺日益缩减的资源的矛盾更为紧张。有迹象表明，当时通过德拉瓜湾进口商品以加快商业发展的影响及其竞争，其意义已超出迄今为止学者们所估量的范围。

然而，同样清楚的是促使这些恩古尼国家政治及军事组织彻底变革的这场重大变化，其动力完全起源于内部。祖鲁人的革命，当然不是把从外界吸收的思想移植或全盘同化于当地环境的结果，祖鲁人后代的国家——斯威士、加扎、恩德贝勒以及许多恩古尼人的政治实体——全都继承了革命化的祖鲁国家组织的基本特征，即继承了以同龄人军团制为基础的庞大军事机器。所有这些国家，都把军团制度当做中坚结构或主要组织，其作用在于把分散的种族实体融合为新的国家。

索托族的王国，例如莫舒舒王国，甚至塞贝特韦恩王国，它们在原有的核心或既成的族群中利用成年人集体割礼仪式，但未将这种做法扩大或强加给新结合进来的社群，其用意也在于维持本民族国家的团结。他们似乎更多地依靠外交婚姻和总督监管制（任用被合并国家的统治者或被征服的旧王室成员为总督），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利用广泛的议事机关（直接参政或通过个人建议和议事会）。

姆菲卡尼革命使非洲南部、中部和东部创建了一些新国家。祖鲁王国是在姆泰特瓦邦联和恩德万德韦邦联的废墟上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从祖鲁兰-纳塔尔地区许多破碎的前姆菲卡尼的恩古尼酋长国中建立起来。今天祖鲁王国仍然存在，不过只是南非控制的一个班图自治区，基地大为缩减。斯威士兰王国和莱索托王国是分别由索布胡扎和莫舒舒在前殖民地化时代创建的，它们生存至今，尤如种族主义海洋中的绿岛。今天他们是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受到别国的尊重。姆兹利卡兹的恩德贝勒王国只维持了半个世纪，后被英国特权公司的殖民主义浪潮所吞没，在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达到高峰时，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塞贝特韦恩的科洛洛王国实际上不过是由个人创建。但因继承者无能而很快瓦解的一个国家。该王国在创建者死后不久即不复存在。 121

姆菲卡尼运动在创建一些新政治实体的同时，也使许多小邦国趋于灭亡，有的暂时消失（例如莫雷米一世的巴塔瓦纳邦和卢伊（洛齐）王国），有的永远消失（例如赫卢比、恩瓜内、姆泰特瓦、恩德万德韦、齐兹-布赫勒等小邦）。姆菲卡尼运动还使一些酋长邦国四分五裂或受到很大削弱。特别在茨瓦纳邦国中不乏例证。有少数国家在姆菲卡尼运动中心区产生而未受损害，甚至可以说它们由于姆菲卡尼运动的混乱而增强了势力，例如佩迪、特拉平和特拉罗。

姆菲卡尼时代的国家可以分为几类。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进攻型国家，其典型例证有如祖鲁、恩德贝勒和加扎王国，还可以加上赞比西河流域的许多恩古尼邦国。这些国家动用军事机器去征服其它国家，依靠刀剑和火枪来维持附属国对它们的效忠。此类国家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政策要求它们以常设"兵营"或军事化村庄为基础，保持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军队。军团常被派遣到王国边区去征收定期捐税或贡品。这些军队是由成人军团组成的，在恩德贝勒和祖鲁族的国家，它们是同化被征服部落青年的基本工具。加扎国也征调被征服的青年加入同龄人军团，但又把他们和恩古尼青年隔离开来，虽然有时是从被征服的旧统治集团中任命军团首领。因此，在加扎国内，军团无助于建立民族统一体。被征

服的聪加人受到过分的歧视，贬称为“巴-蒂尚甘恩”，因而他们没有同化于加扎国。这比任何其它因素更能说明加扎作为征服国的虚弱性，以及该国何以在葡萄牙人攻击下彻底崩溃。征服国倾向于用平民和军人而不用王室成员来组织官僚机构。在恩德贝勒国，军团司令不仅监管他所属的部队，同时还与姆兹利卡兹的一位王妃（作为国王的代表）共管军团城。

122 姆菲卡尼运动还形成一类自卫防御的国家，例如莱索托、斯威士，甚至包括科洛洛王国。在这些国家里，虽然举行同龄人成年仪式，但并未将此作为从被征服的社群吸收青年的手段。这些国家本质上不是军国主义或扩张主义的；它们打仗，若不是自卫防御，就是要明确划定国家地理边界，或需获取财富和牛群。这些国家的创建者都重视强固的防御阵地。莫舒舒在一座平顶山(ghobosheane)上建立首都；索布胡扎在难攻易守的山区设置首府；塞贝特韦恩则选择卡富埃漫滩平原及其险要地点，意外之敌到这里必遭灭顶之灾。

这些防御型王国并未建立常备军。集体举行成年仪式的同龄人，在战时可以起到战斗单位的作用。国王们大都与臣属广泛联姻，特别是与新结合的社群及其核心集团的显要家庭结成密切的亲戚关系。国家必须拥有牛群，以便将它们租借给受优惠的平民，甚至整个酋长邦去饲养(mafisa 制度)。参议制和地方自治权往往用来安抚异己分子。这些防御型国家还吸引西方传教士，为巩固国防而努力获取火枪和军需品。当然，即使是征服性国家，最后也接纳了传教士。

姆菲卡尼时代的所有国家都建立在作为社会基体的亲属关系之上，亲属关系是国家最终赖以形成的基础。王权统治也是这样建立的。征服性国家和防御型国家都利用“首季收获”庆典作为巩固王权的仪式。随着姆菲卡尼时代非洲国家制度的演变，血亲制度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兵役、官职和领地制度所取代。有些国家，例如科洛洛坚持全王国只用一种语言的政策。其它国家，例如恩德贝勒并不强制推行一种语言，但是，精通统治集团的语言可能成为人们打开权势之门的金钥匙。科洛洛王国甚至在不复存在时，其语言和文化仍留传下来。在恩德贝勒国，许多卡兰加人和绍纳人变成了同化的恩德贝勒人。

最后应当看到，姆菲卡尼时代的多次战争使非洲人口相应减少，特别是纳塔尔以及奥兰治自由邦地区。在此意义上说，姆菲卡尼运动削弱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实力，使它们无力应付和对抗第二次更具毁灭性的姆菲卡尼——布尔人的移民运动，致使布尔农场主侵占非洲土地而不受惩罚，他们不仅抢占土地，还掠取牛群和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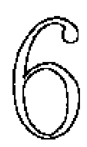
姆菲卡尼运动使南部非洲的非洲人口得以重新分布。一些地方人口更加集中，而另一些地方成了“空地”。它还使一群杰出的领导人应运而生，如恰卡，姆兹利卡兹、索布胡扎，兹万根达巴和塞贝特韦恩。正如奥麦尔-库珀所给予的恰当评论，这些人 123

> 不但有勇气、掌握领导权力和军事技术，而且能采纳新思想和新行动；他们能够发明或采用新制度和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具备超越狭隘的部落见识的政治家风度。他们显示了班图人应付挑战的能力，而传统的部落教育，绝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束缚了人类个性的发展。[69]

（刘乃亚译）

---

[69]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80页。



姆菲卡尼运动对开普殖民地的影响

E. K. 马辛盖泽

前　言

恰卡领导的祖鲁国在19世纪最初25年兴起之后，南部非洲发生了普遍的战事和骚乱。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该地区惯用恩古尼语和索托语的各邦族，他们对姆菲卡尼（恩古尼语）或利法卡尼/迪法卡尼（索托语）时代的动乱记忆犹新。① 这场运动迅速向北扩展到维多利亚湖南岸地区，它对南部非洲其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与富尔贝（富拉尼或佩乌尔）人中改革思想的传播及由此引发的"圣战"对同时代西苏丹历史发展的影响相比拟。如同富尔贝人的"圣战"一样，姆菲卡尼运动以本地区铁器时期以来前所未见的方式改变了大多数的南部非洲社会。本章所论述的即姆菲卡尼对开普殖民地的影响。② 124

姆菲卡尼运动发源地并非开普，而是北恩古尼人居住区，即现今的纳塔尔境内。必须指出，虽然姆菲卡尼运动似乎是一个突发事件，但引发的原因却是几代人在长期过程中积聚起来的。这一过程主要是从事牧牛和农业的恩古尼人由以氏族为基础的小实体发展成为若干较大的国家。大国家的出现，似乎是为了应付牧场和耕地日益短缺的严重困难。至18世纪末期，这一过程已促使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姆泰特瓦和另一些较大的酋长国兴起，这些国家都有强大的军事首领统治。为了保护和增进本国人民的利益，首领们将其统治权扩展到弱小邻国的领土。这样，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小酋长国几乎不能再保持它们的独立和特性。 125

姆菲卡尼运动前夕的开普殖民地

在研究姆菲卡尼运动前夕的开普殖民地之前，需完成三件工作。首先必须给开普殖民地确定一个范围。其次，对人口的分布情况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作简要叙述。最后，关于开普的经济状况也须加以说明。

开普殖民地的范围是很难划清的，因为事实上开普的边界从未固定化。尤其是东部边

① W. G. A. 米尔斯(Mears)，1970年，第5页。

② 关于姆菲卡尼的详细研究，见J. D. 奥麦尔-库珀(Omer-Cooper)，1966年，1969年；L. 汤普森(Thompson)，1969年b；W. F. 利埃(Lye)，1967年。

境，从来是动乱不已和不稳固的。[③] 例如1771年，这里大致是以甘图斯河为界，八年后的1779年，边界向前移至大鱼河，至姆菲卡尼前夕仍以此河为界。因此，大鱼河大致可说是其南部和西部的白人与它东部和北部的黑人之间的分界线。此地的大部分非洲人通称为开普-恩古尼人，[④]有时也称南恩古尼人，[⑤]他们居住于凯斯卡马河和乌姆津库路河之间的领土上。开普-恩古尼人分为三大族群：科萨人，滕布人和姆蓬多人。[⑥] 罗宾·德里考特的分类较宽，把姆蓬多米塞人和博姆瓦纳人也列于主要的族群之内。[⑦] 开普-恩古尼人的邻邦是科伊桑人，他们大部分住于凯河以西地区。

在本章中，开普殖民地的界定范围包括白人所占领土以及大鱼河西部远至乌姆津库路河的非洲人占领区。下面即将看到，姆菲卡尼运动之后作为其结果而出现的社会经济格局和新型关系的性质，由此可以证明这一界定是有道理的。

大体上说，讲恩古尼语的各族人民之间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恩古尼人和他们的邻邦科伊桑人同样和睦相处。这当然不是说，两大族群间或讲恩古尼语的各族人民之间没有矛盾。比如，恩古尼与科伊桑人常有冲突，特别是在凯河上游和特兰斯凯西北部的阿马托勒河之间地区。[⑧] 冲突往往是因桑人袭击畜群的活动而起，恩古尼人进行报复。然而必须说明，无论是恩古尼人与科伊桑人的冲突，还是恩古尼各酋长国之间的冲突，通常都是地方性的，随时可以止住。

126

然而，开普东部边境是黑人与白人的关系紧张地区，经常发生公开冲突，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不要忘记，几百年以来，讲恩古尼语的社群慢慢从纳塔尔地区向西南迁移。但从1652年起，白人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扩张，那一年范·里贝克在开普建立了荷兰殖民地。双方必然相撞，发生冲突。这在南非的史学编纂上称为“卡弗尔战争”。

其次，鱼河虽经开普政府承认为边界，但被它分开和隔离的人民经常越界侵扰。殖民者，尤其是牧场主越过此河去寻找草场。非洲人从来不愿承认这个边界，更不会尊重它，因为在开普政府宣布鱼河为界时，许多科萨人的村庄早已在鱼河一带建立，且向河西扩展。许多科萨人把这片边境地区看做是他们祖传的一部分土地，因殖民地日益扩张而被吞并。因此，许多科萨人照例越过鱼河放牧，与开普政府相对抗。科萨猎人也仍然在鱼河以西地区行猎。

东部边境一带成为黑人与白人关系紧张和暴力冲突地区的第三个原因，还在于两个种族集团从事相同的经济活动，比如，同样从事畜牧业和农业，边界两侧都以此为主要生产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土地持有制的矛盾。

最后，在18世纪，直到19世纪初期，由于北恩古尼兰的发展越来越困难，恩古尼人必须向西南地区扩张。当时的发展使得开普的恩古尼人不可能向东北地区扩张。

科萨人充当了开普-恩古尼人向西南地区移民的先锋，他们在边境上自然是首当其冲承

---

③ 另外也称“活动边界”，见W. M. 弗雷温德(Freund)，1974年。

④ J. J. 范·沃莫洛(Van Warmelo)，1935年，第60页。

⑤ “开普-恩古尼”和“南恩古尼”实际上是地理名称，适用于居住在乌姆津库路河以南操恩古尼语的民族。此河以北操恩古尼语的民族，称“纳塔尔-恩古尼”，或简称“北恩古尼”。

⑥ J. J. 范·沃莫洛，1935年，第60页。

⑦ R. 德里考特(Derricourt)，1974年。

⑧ R. 德里考特，1974年，第49页。

受着黑人与白人的冲突。结果，在开普殖民地史学编纂中，不仅有关他们的记载最多，对他们的斥责和仇恨也最多。⑩

如前所述，科萨人并不承认鱼河为边界，任意过河去放牧牛羊。这种"侵犯"边境事件有时还伴随偷盗牲畜的行为，开普殖民者经常向科萨人住地发动报复性袭击，声称只有采取武力行动才能追回他们的财产。自然，殖民者突击队的行动往往越权超过他们的既定目标。 128



图片6.1 在开普被出售的象征科萨人男子和妇女的玩偶

⑩ 事实上，南非历史书籍通常把东开普边境战争称为"卡弗尔战争"。科萨人被认为是"只知道武力和惩罚的野蛮人"；C.W.德凯威特(De Kiewiet)，1968年，第51页。有些书还把科萨人说成是无可救药的偷牛贼，应该打击；E.A.沃克(Walker)，1968年，第116-119页。

显而易见，在姆菲卡尼运动前夕，该地区黑人与白人的关系紧张。下面我们探讨姆菲卡尼前夕开普殖民地的经济状况。

经济形势和前景

应当看到，1822-1823年，当纳塔尔、卡利登河流域和海维尔德发生大骚乱的消息传到开普殖民地时，许多殖民者在开普刚住上两年多。殖民者当中有1820年抵达开普以充实殖民地人口的英国人（当地居民原以荷兰人为主）。他们约有5000人，大多数被送到新殖民区奥尔巴尼，每人在那里可享有40公顷（100英亩）土地。然而他们并不了解，建立奥尔巴尼殖民区的主要考虑之一，就总督萨默塞特而言，就是要定居者去帮助防护和稳定东部边境。

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形势和前景一直是暗淡的。边境上危险的军事局势只会使经济恶化。与生活在开普殖民地老区的荷兰人相比，1820年新来的居民处境恶劣。原来奥尔巴尼可望发展的主要经济活动及生活来源是农业，1823年这里的农业却出现了彻底失败的兆头。初到非洲的许多新农民并不具备从事农业活动的素质。人们普遍抱怨占有的土地太少。1822年，一场洪水冲毁了所有的庄稼。1823年许多农民放弃了土地，坚持耕作的农民也心灰意懒，失去了原有的热情。他们从英国带来的少量资金迅速减少，许多人不是为生活向政府借债，就是陷于贫困状况。酗酒滋事日益严重。[10]

129 1823年，留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只不过是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处境维艰，整个奥尔巴尼垦殖区农业的前景令人十分忧虑。前面谈到一些农民放弃了土地，他们或到城镇中心从事其它职业，或独立经商，更多的是转变为牧场主。

旧殖民区和奥尔巴尼区同样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即缺乏干粗活的劳工。在这方面，1820年的移民比老殖民者更感困难。老殖民者可以雇用科萨人、科伊桑人，甚至使用奴隶，而1820年的定居者则不得雇用任何劳工。[11] G. 布特勒称之为奥尔巴尼的“盎格鲁斯坦”农民指望从英国召自由人作劳工。但是，大多数从英国来的这类工人一到南非就脱离他们的雇主而去前途较好的城镇工作。也曾竭力鼓励新的移民到开普殖民地来，应召而来的大多是爱尔兰人，但只有很少人真正到东部边区。许多劳工一到开普就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到别处谋生。在这种情况下，新定居者只得靠自己，靠妻子儿女去做通常是由劳工或奴隶做的“下贱工作”。[12] 除了这些困难之外，殖民地的农民和壮年人都必须随时应召去东部边境分担防务。

为了减轻这些苦恼的定居农民的经济困难，一些人组织了“贫民救济会”，为他们筹集资金。该组织确实筹集了一些钱财，1824年已能帮助农民获得所需资本。但是，如前所说，任何财政援助也不能解决长期困扰开普殖民地的两大问题：劳工短缺和东部边境的不安局势。直到1822-1823年，当姆菲卡尼运动越过奥兰治河从纳塔尔影响到开普殖民地时，这两个难题仍未解决。

---

[10] G. 布特勒(Butler)，1974年，第176页；E. A. 沃尔克，1968年，第157页。
[11] 同上。
[12] G. 布特勒，1974年，第178页；G. M. 西亚尔(Theal)，1891年，第238-239页。

姆菲卡尼的到来

这里不必重述北恩古尼地区、卡利登河流域和海维尔德等地骚乱的详情。[13]本章所谈的是纳塔尔、卡利登河谷和海维尔德的事变如何席卷开普的恩古尼人地区和开普殖民地本土。将要探讨的是新的社会形态、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各不同族群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姆菲卡尼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格局。 130

如前所说，姆菲卡尼运动的发源地是纳塔尔，中心是北部讲恩古尼语的部落。姆菲卡尼运动的确切原因至今还不清楚。但是，当地几代人以来人口不断增长，从当时使用土地的方法来看，这种趋势显然造成人口过分密集。为了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得不采用新的政治组织方式。18世纪后几十年间，出现了一系列强大的酋长国，其中最著名的是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和姆泰特瓦。在19世纪最初20年中，这些酋长国，包括祖鲁王国，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君主制的军事国家，它们的领袖分别是兹维德、索布胡扎、丁吉斯瓦约和恰卡。

假如新的国家制度在军事手段和战略方面并未随之发生革命，1815年前后北恩古尼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就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同样，假如北恩古尼各国的军队，特别是祖鲁的军队没有在晚些时候采取有效的军事策略，这些事变也不会像浪潮一般冲出北恩古尼兰以外。

1815年，兹维德的恩德万德韦邦与索布胡扎的恩瓜内邦之间爆发了首次公开的冲突，这是可以肯定的。恩瓜内人失败，被迫逃过丰戈洛(蓬戈拉)河，在那里奠定了斯威士民族的基地。按J. D. 奥麦尔-库珀的看法，这次冲突标志着姆菲卡尼运动的开始。索布胡扎离去后，兹维德与丁吉斯瓦约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果然，1817年底，预料中恩德万德韦与姆泰特瓦之间的冲突爆发了。姆泰特瓦国王丁吉斯瓦约战死沙场，他的人民失去领导，四散逃亡。

在丁吉斯瓦约垮台之后，要不是他曾经保护过的一个新的强权人物出现，恩德万德韦本可以获得全胜而统治图克拉(图格拉)河与丰戈洛河之间的整个地区。这个强敌就是恰卡，他是当时一个微不足道的祖鲁族群的酋长森赞加科纳的儿子。恰卡年轻时在丁吉斯瓦约的一支姆泰特瓦军团里受过训练。他才能出众而又积极主动，在军队里很快升到高级职位。恩德万德韦与姆泰特瓦开战时，他不仅是姆泰特瓦军队的一名高级将领，而且继承其父成为姆泰特瓦保护下的一个祖鲁族小部落的酋长。丁吉斯瓦约死在兹维德手下之后，恰卡和他的祖鲁人民就成了唯一能对抗兹维德及其恩德万德韦族的中心。恰卡准备与兹维德进行最后的较量，他把几个酋长国，包括士气消沉的姆泰特瓦人都置于他的控制下。他完善了自己的新军队的组织方式，将所有到年龄进成年学校的青年征召入伍。成年学校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直接进行军事训练。 131

著名的对抗兹维德及其恩德万德韦族的战争始于1818年，经过多次战斗，恩德万德韦

[13] 有关详情见本卷第5章。另见本章注②。

遭到惨败。奥麦尔-库珀认为，恩德万德韦的失败对于恰卡的事业以及姆菲卡尼运动史说来，堪称一个转折点。[14]恰卡在北恩古尼地区没有遇上强劲的反抗，于是继续他建立祖鲁军事强国之业。祖鲁族扩张的主要方式，不外乎军事征服，将战败的酋长邦全部并入祖鲁民族。许多小酋长邦被置于祖鲁统治之下。但是，也有许多部落设法逃脱恰卡的控制，逃回纳塔尔地区的家园。在1818年兹维德惨败后的几年里，溃散的部落、家族和个人被迫在混乱中逃离家乡，向西越过德拉肯斯山脉进入海维尔德，在这片家园庄稼被毁，满目荒芜的土地上掀起移民浪潮。另一些流离失所的北恩古尼人则越过图克拉河和乌姆津库路河，逃往南方。1822-1823年，蓬多兰和滕布兰已经感受到东北流离失所的饥民流动的影响，移民所到之处不断发生暴力和破坏事件。1823年，由于北恩古尼人的迁移，蓬多兰骚动不已。北滕布人在他们的酋长恩戈扎领导下一度进入蓬多兰居住，随后迁回祖鲁兰。在蓬多兰以西所谓的诺曼斯兰，曾经出现姆丁吉的布赫勒人，他们后来为马迪卡尼统治的乌希人和布哈卡人所并。1823-1824年，祖鲁人袭击蓬多兰。虽然法库明智地约束其臣民不与祖鲁人对抗，蓬多兰的许多牛群仍被抢去。

在蓬多兰的情况传到开普殖民地时，除被称为"费特卡尼"的北恩古尼难民还在开普境内流浪骚扰外，另有许多北方难民也成群入境。这些难民不像"费特卡尼"，他们已失去132 了团体的内聚力和特性，但又同样贫困、饥饿，走投无路。他们被称为"曼塔蒂斯"[15]或"贝专纳人"，是在受到恩瓜内人和赫卢比人侵袭之后，又受到以酋长姆马·恩塔提西为首的特洛考人劫掠活动的影响，被迫从卡利登河流域和德兰士奥兰治亚逃出来的。有些难民来自更远的北方瓦尔河以外地区，他们卷入了不断扩大的姆菲卡尼运动。1823年，富庭人赫拉考纳人和福肯人袭击了特拉平人的首府迪塔康，此后，许多茨瓦纳难民被迫离开了他们在博茨瓦纳的住地。

成群的难民涌入赫拉夫-里内特和奥尔巴尼等地。但是，他们没有造成军事威胁，因为他们既无武装，也无领袖，只盼得到支援和保护。

开普的最初反应，1823-1828年

开普殖民政府和殖民者对难民涌入境内的反应，必须从开普殖民地在姆菲卡尼运动前夕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来考虑和了解，这就是边境安全和廉价劳动力。劳工问题尤其重要，因它已使得许多前程有望的农户放弃农业而另谋生计。

赫拉夫-里内特和奥尔巴尼等地的农业殖民者原来颇为惊恐不安，可是他们很快发觉几

---

[14]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33页。

[15] 白人殖民者、早期作家和开普政府官员所说的"曼塔蒂斯"（Mantatees，或 Mantatis）和"费特卡尼"人，应简单解释如下：这些名称是他们用来指称姆菲卡尼运动中的肇事者。例如罗伯特·莫法特就用"曼塔蒂斯"一词，泛指富庭人、赫拉考纳人和福肯人中的抢劫者，1823年他们掠夺了特拉平人的首府迪塔康。自然，把这些族群称做"曼塔蒂斯"，使人误以为他们与特洛考人的首领姆马·恩塔提西毫无关系。这个名称，后来又误用以指操茨瓦纳或索托语的难民，他们越过奥兰治河和卡利登河，特别是在迪塔康失败之后渗入开普殖民地。另外，所谓"费特卡尼"或"姆菲卡尼"，假如是族群，那一般是指北恩古尼人侵略者，例如祖鲁人或马提瓦涅的恩瓜内人。参见 J.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93-96页；W.G.A. 米尔斯，1970年，第5-13页；L. 汤普森，1969年b，第393页；G. 布特勒，1974年，第182页；H.H. 杜格莫尔（Dugmore），1958年，第44页。

百名从奥兰治河逃亡而来的“曼塔蒂斯人”和贝专纳(茨瓦纳)人并没有引起安全问题。这些难民看来很温和，一副胆小的样子，事实上他们大都失去了内聚力和对部落的忠诚，因此，殖民者认为索托或茨瓦纳难民可以成为“顺从听话的仆人”,[16]满足殖民地的迫切需要。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姆菲卡尼运动对内地的有害影响逐渐变得对开普殖民地十分有利。1823年，殖民地总督批准殖民者可以雇用难民当学徒工，合同期至少为七年。[17]赫拉夫-里内特和奥尔巴尼等地的农业殖民者，尤其感到这一决定的好处，因为他们从没有雇工。

关于索托人和茨瓦纳人劳工的素质，当时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1834年开普自然学家兼开发者安德鲁·史密斯博士认为，有些农户觉得他们的仆人素质“差”，其中不少人“贪婪、不诚实而又懒惰”。[18]另一位开发者乔治·汤普森则肯定说，“在一些最有声望的家庭里 **133** 受雇的几百名曼塔蒂斯难民，或当仆役，或是牧人”，都证明“优点很多”。[19]汤普森的说法与安德鲁·史密斯个人的意见并无差别，因为不管农户如何责备他们的仆人，索托人和茨瓦纳人来到殖民地“还是令人满意的……至少弥补了雇工的不足，因后来几年霍屯督人宁愿选择别的职业而不肯受雇于农民”。[20]事实上，开普的大部分科伊人不是流入城镇中心，就是在基督教传道会的保护下生活，他们都避免为夺得他们祖先土地的人工作而受辱。

这里不可能说明在开普殖民地受到临时庇护的茨瓦纳-索托贫民的确切人数。估计没有几千也有几百人。内陆地区骚动不止，难民不断涌入，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有些茨瓦纳和索托难民才开始返回家乡。大约19世纪30年代中期，即索托国家创始人莫舒舒等统治时，和平及稳定局势恢复，返乡人数增多。[21]看来，在姆菲卡尼运动最初五年，有较多的难民涌入开普殖民地。据乔治·汤普森所得报告说，1826年开普殖民地有索托和茨瓦纳难民1000人。[22]这是难民开始进入殖民地三年后的情况。

无论其数量多少，有几点是无可争辩的。首先，如前所述，纳塔尔、卡利登和奥兰治河谷以及海维尔德等地人民的苦难，竟然为开普殖民地带来好处，给这里因缺乏劳力几乎破产的农业社群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及时到来的劳力资源给殖民地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其次，难民的流入必然产生改变殖民地性质的社会经济格局。例如，在奥尔巴尼和赫拉夫-里内特，据说居民中的白人农夫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因为非洲劳工的到来而不再从事最卑下的工作。这种变革完成于19世纪20年代末。[23]所谓白人居民依靠自己建立“盎格鲁斯坦”或奥尔巴尼的原则基础不攻自破，此后，黑人劳工在开普殖民地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巩固。 **134**

第二点不可辩驳的是茨瓦纳-索托难民涌入开普殖民地，使当地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这反过来破坏了奥尔巴尼和赫拉夫-里内特殖民区的另一个原则：所谓精耕细作的农业。

[16] 参见两名“曼塔蒂斯”的照片(和说明)，G. 布特勒，1974年，第228页，及181-182页。

[17] G.M. 西亚尔，1891年，第240页；G. 布特勒，1974年，第182页；W.F. 利埃(编)，1975年，第20页。

[18] W.F. 利埃(编)，1975年，第21页。

[19] 引自G. 布特勒，1974年，第182页。

[20] W.F. 利埃(编)，1975年，第21页。

[21] W.F. 利埃，1969年，第203页。

[22] 同上，第202-203页，G. 汤普森引文。

[23] G. 布特勒，1974年，第181页。

例如1825年，一方面由于农户要求占有更多的土地，一方面又由于廉价劳动力容易获得，结果，原来100英亩的农场都扩大了。[24]

因为暂时寄居开普殖民地，茨瓦纳人和索托人也分享了一些利益。首先，他们被允许在雇主的地产上建立家庭；其次，根据"学徒"合同，他们可以得到牲畜和其它物品作为报酬。[25] 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积蓄了个人财产，后来又能带回家乡。

然而，索托人和茨瓦纳人的到来并没有解决开普殖民地急需克服的另一困难。殖民者和他们的邻居——南恩古尼人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善。形势依然紧张，经常发生边境冲突、掠夺牲畜、突击队互相报复等事件。

但是，对开普殖民地黑人与白人的关系还须认真分析，免得读者印象中以为没有和平交往的余地。虽然双方在放牧和狩猎权上有争议和冲突，双方却也有促进商业贸易的愿望，因为各自拥有互补性的产品，可以互通有无。例如，科萨人有象牙、牛角、皮革、牛肉和树胶，这些都是殖民地商人大量争购的产品。而科萨人需要铜器、串珠、钮扣、猎枪、火药、烧酒，特别是只有殖民地商人能供应的白兰地酒。因此，非洲人与殖民者尽管是对立的，他们中间也存在实物交易制度。任何形式的控制、军事或法律措施都不能阻止这种交易。事实上，自黑人与白人在东部边境相遇以来，他们相互间的商业来往一直继续不断，甚至违反官方政策。政府对边境实行严格控制，只会使黑人与白人合作进行秘密交易。

的确，在1821年，因为走私活动猖獗，代理总督鲁法内·唐金爵士决定使殖民地与科萨人之间的商业关系正规化。[26] 他设想在凯斯卡马河开办集市贸易甚至设立交易会。总督虽曾反对，后来还是承认现实，并同意在威尔希雷堡开办集市。这个集市开始是每年一次，很快发展成一季度一次，一个月一次，1824年变为一周一次的交易市场，[27] 大群的殖民地商人和成千上万的科萨族商人都来此地交换商品。非洲男女商人从凯斯卡马河和凯河之间地区远道而来，[28] 他们用牛角、象牙、皮革、树胶和牛肉换回串珠、钮扣、黄铜器皿、白兰地和欧洲人的各类工业产品。

135

威尔希雷集市还是一个交际场所，每逢集市日，黑人和白人就有机会相遇交谈。在买卖谈判中，每个人都试图用对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杜格莫尔写道，"他们讲的是奇怪的卡弗尔语……奇怪的荷兰语或英语"。[29]

然而，威尔希雷的集市只是一个外表，虽然这或许是必要的。它并不能掩盖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必须看到威尔希雷地处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边境上，本来就是首要的前沿防御阵地，许多情况证实了这一点。集市之日，笼罩在一片军事气氛之中，到处是"身着各色衣服的黑人、白人和棕色人"，杜格莫尔写道，"英国陆军、志愿步枪队和炮兵的红、绿、蓝色制服"各不相同。

[24] 1825年农场土地的扩大，见G.M.特埃尔，1891年，第239页。
[25] W.F.利埃(编)，1975年。
[26] G.布特勒，1974年，第197页。
[27] G.M.西亚尔，1891年，第237页。
[28] H.H.杜格莫尔，1958年。
[29] 语言不通，买卖很难做成。因此，讲荷兰语或英语的商人试图用科萨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科萨族商人也试图讲欧洲人的两种语言。

不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商业交往如何成功，也无法使科萨人忘记这片祖传土地现已落入了白人殖民者手中。的确，一方面是黑人与白人在法律监护下举办威尔希雷集市，另一方面，远在科萨人居住区，白人走私者正和科萨人买主积极进行着非法的军火交易。科萨人需要枪支，准备应付将发生的黑人与白人的武装冲突。果然，1834-1835年战争爆发，这不是首次也非最后一次战争。就在威尔希雷和远处的科萨人住地进行商业活动时，单身的白人旅游者或替家长看管牛群的欧洲人牧童却引起科萨人的怨恨，遭到杀害，这些事件也使人想到科萨人和殖民者的暴力对抗。[30]

外部威胁和黑人与白人的协同行动

136

直到1828年，姆菲卡尼运动并未对开普黑人-白人稳定和平衡的关系造成严重威胁，这一点是清楚的。如前所述，1823年后流入殖民地白人区的茨瓦纳人和索托人难民，很快被当地经济生活同化了。在东北边境，法库统治下的姆蓬多人独挡一面，使恰卡的军团不能越过蓬多兰。

但是1828年，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一群前所未见的逃亡者突然出现于开普的凯河附近，不同于索托或茨瓦纳难民的是，他们先后在滕布人及其邻居——辛查的科萨人中间造成恐怖，而且几乎完全保持着自己部落的政治团结、忠诚和军事能力。他们就是马蒂瓦涅领导的恩瓜内人；马蒂瓦涅是老练的军人，他骚扰过许多国家，其中也有莫舒舒的索托王国。

当时，包括一些赫卢比人在内的恩瓜内族从莱索托越过奥兰治河，在1828年1-2月间进入了滕布人住地。他们到达时，正巧恰卡的军团也进入蓬多兰，这使殖民者、滕布人和科萨人感到恐惧。因此，从东部边区到东北方的乌姆津伍布，这整片地区传遍了“费特卡尼”或“姆菲卡尼”[31]（即祖鲁军团）的谣言。[32]进入蓬多兰的恰卡军团，正企图向南方渗透，其目的在开辟一条通往开普之路，以便恰卡与开普建立外交关系。虽然祖鲁人决心与任何阻挡他们前进的南恩古尼人的国家战斗，但他们受到严格的约束，避免与英国人冲突。

现在转回来看看恩瓜内人。他们进人滕布人住地之后，很快就遇上了开普殖民军的先头部队，这支部队误以为他们是祖鲁人。双方交火，但无结果，接着，为进行一场大决战作准备，总督萨默塞特便与格卡列卡的酋长辛查，滕布人的酋长伍萨尼携手合作。一支联合部队（包括英国军队、殖民地民兵、科萨人和滕布人军团）召集起来，准备最后的较量；在姆博洛姆波战役中，恩瓜内人遭到彻底失败，伤亡惨重。一些残余的恩瓜内人并人了滕布人或科萨人群体，因而这地区的姆丰古人成份增加了。其余残部随马蒂瓦涅逃回莱索托，莫舒舒一世允许他们住于当地。然而，由于思念故乡又迫使他们返回纳塔尔。在归途中，马蒂瓦涅被丁冈所杀；丁冈这时已继承恰卡的王位，成为祖鲁族统治者。

137

恩瓜内人在姆博洛姆波的惨败，终于使姆菲卡尼运动中最强大而又最具破坏性的一股力量消失了。事实上，在姆博洛姆波战役后，开普殖民地以及科萨人和滕布人居住区已不

---

[30] 例如加尔贝特和斯洛曼的儿子们成了克莱·皮特的牺牲品，有些爱尔兰人也因触怒科萨人而被杀害。

[31] 参见本章注⑮。

[32] 祖鲁人的出现并非毫无根据的谣言，当时祖鲁军团正通过蓬多兰向南方前进。

存在严重的外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反对马蒂瓦涅的恩瓜内人的联合行动，还意味着英国人、科萨人和滕布人暂时同盟的形成。当然，这对于缓和英国人与科萨人的对抗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说科萨人与滕布人的协同行动是可以理解的，英国人的加入却不易解释。英国人出于何种考虑而卷入这一同盟呢?当时英国殖民地并未受到恩瓜内人入侵的紧迫威胁。即使他们想象着恰卡的祖鲁族会侵犯滕布人的领土，但恰卡从未使英国人感到有理由害怕他会入侵。或许他们是害怕滕布兰的骚乱会扩大到科萨人地区，从而使绝望的科萨人向西逃入殖民地东部边境，给那里的农场主造成不安定局势？或者如别处所提到的，英国人加入联盟与其说是由于害怕某种势力入侵，不如说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而装成这种姿态。这就是说，开普官方与白人殖民者认为，给科萨人和滕布人军事援助，将会使科萨人忘记他们的祖传土地落到欧洲人手里，从而促成黑人与白人的友好关系。

不论英国人为何参加1828年的“费特卡尼”战役，有一点是重要的而必须指出：反对马蒂瓦涅的战斗，作为一个例证，正好说明黑人与白人在遇到共同敌人时能够媾和。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尽管科萨人与殖民者仍处于紧张状态不时发生公开冲突，但开普的局而保持相对稳定和平衡，1828年黑人与白人同样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需要防卫。

姆丰古人的出现

姆菲卡尼运动造成的持久而重要的结果之一，即由于广泛的骚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往往在新的地区或不同的环境中，重新组合为新的社会实体或政治性国家。多数情况是由各种不同成分组成的新群体，多亏某些个人的领导素质把他们团聚起来形成具有同一性的政权组织。斯威士、加扎、恩德贝勒，正是这类政权组织的典型例证。战争之后许多幸存者或者投靠这些领导人，加入刚出现的政治性国家，或者被现存的政权组织所同化。正因为如此，莫舒舒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巴索托王国。

同时也有更多的战争幸存者失去领袖，没有安全保障，并陷于贫困状况，虽然他们受到一些酋长的欢迎，他们却不愿被东道国完全同化。[33]这些人成份很复杂，主要来自纳塔尔，并流入开普的恩古尼人领土。他们到来时有的成群结伙，有些人直接来自北恩古尼人地区，也有的是穿过卡利登河谷而来。因为饥饿和贫困交加，他们只能靠乞讨为生(ukufenguza)，因此被叫做阿马姆丰古人(或芬戈人)这一名称看来是当地滕布人、科萨人和姆蓬多人给取的。作为一个集体名词，这名称也适用于称呼来自北恩古尼地区的难民和移民，主要是赫卢比、布赫勒、恩瓜内和齐兹人等，他们在姆菲卡尼运动中散逃到开普-恩古尼人住地，已经有了新的家园。[34] 从北恩古尼地区战乱开始时起，这些难民就陆续流进开普，1822-1828年间人数又有增加。1828年，马蒂瓦涅的恩瓜内人被英国人及科萨人和滕布人的联军打败后，许多溃散的恩瓜内人也加入了开普-恩古尼地区日益增多的姆丰古人群体。

---

[33] 参见一位参加者B. 鲍克(1810-1907年)的第一手叙述，G. 布特勒，1974年，第252-254页；H. H. 杜格莫尔，1958年，第4页；J. 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92页。

[34] 按照定义，姆菲卡尼运动后由纳塔尔进入开普恩古尼地区居住的自愿移民不在姆丰古人之列。见J. J. 范·沃莫洛，1935年，第65页。

滕布人、科萨人和姆蓬多人的统治者对这些难民的要求反应积极。他们热情接收难民，视如自己的臣属，给难民提供土地、食物和牲畜等急需品。按照风俗习惯，牲畜的所有权仍属于酋长主人，但姆丰古人可享用牛奶，还能用牛做家务。

大多数姆丰古人工作勤劳，不少人定居不久就积蓄了自己的财产。他们生产足够的粮食，还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姆丰古人善于种植烟草，常用烟草交换牲畜。他们也参加殖民者的边境贸易，而且很成功。[55]

一般说来，在蓬多兰和滕布兰生活的姆丰古人是幸运的，而且有不少人很快加入了当地的社群，但在科萨地区生活的姆丰古人仍感到自己备受歧视。因此，科萨地区姆丰古人的同化过程并不顺利。比如姆丰古人虽有口音，却能很快学会当地的语言，但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附属的分立集团(科萨人也这样看待他们)，致使融合过程不能完成。

科萨地区姆丰古人的同化过程不但没有完成，两个族群的关系反而日趋恶化，连科萨 139 人与英国人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前面提到，科萨人与姆丰古人最初关系是不错的，可望促进姆丰古人与科萨社会的同化过程，然而他们双方的关系越变越坏，姆丰古人开始寻找更有利的环境。究竟什么原因使得科萨人与姆丰古人的关系恶化，现在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外部势力夸大或挑拨科萨人与姆丰古人之间文化、政治及经济上的分歧，利用了融合过程的失败结局。起分裂作用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是英国卫斯理宗传教会、白人殖民者和开普殖民地政府。

从 1827 年 7 月起，“卫斯理宗”传道会已在格卡列卡-科萨人中开展工作，经辛查酋长的同意，威廉·肖在当地设立了传教站。后来经过谈判，在辛查首都附近的巴特沃思，W. J. 施鲁斯伯里又建立了一个传教站。辛查对传教士并没有多大热情，可他保护传教活动，保护施鲁斯伯里和他的妻子。他还允许姆丰古人为传教士服务。[56]

此时此地卫斯理传道会的出现，恰巧对姆丰古人在科萨人地区定居后开始的同化和融合过程起了干扰作用。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传教士们对姆丰古人的苦难表示同情。本来，姆丰古人已感到自己受歧视，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科萨人与姆丰古人之间这种“统治者与臣属”的关系竟被夸大为“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挑拨者就是施鲁斯伯里的接替人约翰·艾利弗，他的偏见得到开普政府官员的支持。除了这种“奴隶制”神话之外，当时还流传一种说法，即姆丰古人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已经被姆菲卡尼运动所摧毁，R. A. 莫耶尔认为这两种看法加在一起，对科萨人与姆丰古人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和作用。[57] 首先，姆丰古人看来很可怜，他们成了开普政府、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对象。其次，既然姆丰古人已经丧失军事能力而又受到科萨人的“压迫”，上述两种说法使传教士和殖民地政府觉得有责任为姆丰古人争取权利，把他们从科萨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第三，看来姆丰古人很快接受了这两种说法，他们仍然认为自己与科萨人是分离的。基于这个理 140 由，姆丰古人不但把传教士、开普政府和殖民者看做是解放者，而且还把自己的利益、抱负、希望、恐惧、焦虑与外部各集团等同起来。

---

[55] J. 艾利弗(Ayliff)和 J. 怀特西德(Whiteside)，1962 年，第 20 页。
[56] J. 艾利弗和 J. 怀特西德，1962 年，第 20 页。
[57] R. A. 莫耶尔，1974 年。

当然，外部势力散布这两种说法是别有用心的，姆丰古人越是认为自己受压迫和剥削，他们越希望传教士给与同情，越愿意接受基督教的宣传，以换取传教士的帮助。姆丰古人越是抱怨自己经济上受到科萨人的剥削，他们也更容易受雇当廉价的农场工人。

尤其严重的是，姆丰古人总以为自己与科萨人是分离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寄托于英属殖民地，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尽早离开科萨人而投奔英国殖民地。第六次边境战争(1834-1835年)提供了这个机会，当他们看到英国与科萨人之间矛盾爆发时，他们首先就选定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战争之初，姆丰古人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一，姆丰古人决不参加入侵殖民地的战争；二，姆丰古人尽可能保护或保证传教士和商人的安全；第三，姆丰古人将充当英国情报人员，负责将约翰·艾利弗的情报送达英军司令，保证他和英军随时得知科萨军队的动向和意图。

从1834年12月战争开始至1835年5月，姆丰古人在离开科萨地区而进入英军控制区居住前，确实为英国军队做了许多不利于科萨人的情报工作。他们不仅在艾利弗与英军司令之间传递消息，而且为住在巴特沃思的艾利弗送了许多关于盖卡、格卡列卡-科萨人活动的情报。艾利弗因此能让格雷厄姆斯敦的行政兼司法专员清楚地了解科萨地区的势态。从格雷厄姆斯敦到科萨地区有240公里的路程，姆丰古人的信使按时来往其间。[38]大多数活动是夜间秘密进行的，但不久被格卡列卡统治者辛查发现，并决定制止姆丰古人的叛逆行为。

战争爆发后几星期，科萨人曾经摧毁一些孤立的白人据点，杀害了许多农场主和商人。总督本杰明·德·乌尔班不得不亲赴战地视察，为英国殖民地组织防务。就在总督宿营巴特沃思附近时，艾利弗及其姆丰古门徒请求他宣布姆丰古人为英国臣民，以此将他们从科萨"桎梏"下"解放"出来。1835年5月3日，这项请求得到批准，原属科萨各酋长所管辖的姆丰古人(男女儿童共16,000人)以及15,000头牛和数千只山羊，在英军护送下离开了科萨地区。[39]这次迁移始于5月9日，实际上结束了姆丰古人到达科萨地区以来的同化和融合过程。长途跋涉止于5月14日，全体姆丰古人和牲畜渡过凯斯卡马河，进入"允诺地"，即总督德·乌尔班拨给姆丰古人的佩迪埃区。土地正式分给姆丰古人的八位酋长之后，每个人都须宣誓尊崇上帝和忠于英国国王，还应与传教士合作，将子女交给他们去教育。姆丰古人不会忘记，是开普政府和传教士把他们从"桎梏"下"解放"出来的。

141

对前面所说的姆丰古人在第六次边境战争中从科萨"大撤退"，是以姆丰古人承担了一定的义务为条件的。例如，在到达新住地之后，他们立即被召去帮助英国人反对科萨人，约有500名姆丰古人加入了英国军队；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把科萨人赶出布法罗河谷地，守卫所有进入殖民地的通道，从科萨地区找回被抢去的牛群。

为得到"解放"而承担的另一个义务，是姆丰古人为殖民地提供廉价劳动力；这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当时许多茨瓦纳人和索托人到了学徒年限，家乡又恢复了和平，他们已纷纷回去。[40]至于与传教士合作，姆丰古人自然愿意让传教士来教育他们的子女，许多成年人也愿意为教会服务。

---

[38] J. 艾利弗和J. 怀特西德，1962年，第23-24页。
[39] 同上，第28-29页。
[40] 见本章注⑰。

总之，姆丰古人撤离科萨地区，使科萨人在今后与白人的斗争中势力减弱。姆丰古人居住地则被看做是科萨人与英国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地带。

结 束 语

姆菲卡尼运动给受它影响的非洲各地区人民带来了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有时甚至是文化上的变革。姆菲卡尼影响的严重性或其程度，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一方面是运动的始发者和他们的抱负，另一方面则是地区性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条件等因素。

我们已经看到，有三类姆菲卡尼运动的受害者进入了界定为开普殖民地的区域。一类 **142** 是饥饿与贫困交加的难民——索托人、茨瓦纳人和北恩古尼人，他们是来寻求食物、保护和支援的；大多数的茨瓦纳人和索托人给殖民地农场主当了学徒工，纳塔尔-恩古尼难民则由科萨人、滕布人或姆蓬多人的统治者提供了保护和食物。第二类进入开普殖民地的是恰卡统率的祖鲁人军团，他们侵入了蓬多兰，但由于姆蓬多人的反抗而未能深入殖民地。第三类虽非祖鲁人，但与祖鲁人同样强大而又有破坏性，他们是恩戈扎率领的北滕布人和马蒂瓦涅所属的恩瓜内人；1822-1823 年，恩戈扎的滕布人曾进入蓬多兰，但与后来的祖鲁人一样受到姆蓬多人的抵抗，他们未能越过乌姆津伍布河。

马蒂瓦涅率领的恩瓜内人，看来是进一步向南方进军的唯一重要势力，当他们突然从莱索托来到滕布兰时，曾在乌姆津伍布河至甘图斯一带引起巨大骚乱。他们被误认为是恰卡的祖鲁人，恐怕威胁到开普殖民地的稳定和平衡(尽管有科萨人与白人的边境冲突)，因而恩瓜内人遭到了英国人、科萨人和滕布人联合部队的打击。恩瓜内人入侵的军事影响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就被联合部队打败了。由于必须保卫共同利益以防外来威胁而形成英国、科萨与滕布人的军事联合，这一联合同样是短命的，它在恩瓜内人的威胁消失后也结束了。

然而姆菲卡尼运动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似乎比它的军事和政治后果更加深刻和持久。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些在文化、经济及社会影响方面能发挥作用的族群，恰恰是力量最弱、缺少外援、军事上无害的茨瓦纳人、索托人以及姆丰古一类的难民或乞丐。我们看到，1823 年茨瓦纳人和索托人难民的到来，及时挽救了奥尔巴尼和赫拉夫-里内特的农业，当地农业由于缺乏廉价劳力已几乎崩溃。有了劳动力，白人殖民者就不再只靠自己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了，而这两个农垦区原来就是在殖民者自力更生和精耕细作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的。1835 年，姆丰古人到达佩迪埃区，给农场主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力。

姆丰古人来源于北恩古尼，人口多，是一支潜在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势力。可是，1835 年他们撤离科萨地区而与殖民者住在一起，他们对开普的恩古尼主人的政治影响也就削弱了。他们变成了英国臣属，参加过英国对科萨人的战争。这些战争的成就都属于英国人，与姆丰古人无关。例如姆丰古人参加 1834-1835 年、1846 年和 1851-1853 年反对科萨人的战争，不惜牺牲，其作用与殖民地军人同等重要，但这些战争完全是英国人和科萨人的事务，姆丰古人的参加只是次要力量。 **143**

姆丰古人在文化上对开普-恩古尼人和白人殖民者的影响是不易评定的。开普-恩古尼人在文化上同纳塔尔-恩古尼人十分相似。但有一个领域是姆丰古人起过明显作用的，因为

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早于开普-恩古尼人接受西方教育、欧洲农业和欧洲人的雇佣，姆丰古人在开普的非洲人社团中扮演了近代化的重要角色。他们最早产生出非洲人教师、福音传教士、农艺师以及文书等等。

（刘乃亚译）

7 1850-1880年南非的英国人、布尔人和非洲人

N. 贝贝

1850-1880年间，南非仍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它当时被分割成若干个英国殖民地、布尔共和国和非洲人国家。声言要在这片次大陆称雄一方的英国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仍不愿将此变为现实，真正接管整个地区的政治统治权。许多派驻当地的英国官员都力促政府接管南非地区，认为将整个地区纳人英国统治是既能满足英国的利益又能公平对待南非不同种族的最佳方案。然而历届英国政府都害怕费用过大而避免承担这一责任。统治此地确实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征服众多的非洲人国家，讨伐各个布尔共和国(它们正合力坚持自身的独立)，说服英属诸殖民地同这些国家合并为一，还要提供补贴来治理这个当时非常贫困的国度。但是自70年代起，欧洲萌发“新帝国主义”，南非地区又发现了钻石和黄金，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随之扩大，英国当局一改初衷，全力以赴，力图将其霸权扩大到整个次大陆。到70年代末，英国征服并吞并了许多属于非洲人的社会，还将其它非洲各族地域划为保护地，动用武力挫败了最为强盛、桀骜不驯的祖鲁人。英国努力加强控制南非各种社会，从而导致同布尔人的交战争杀。历经一系列战争以及随后签订的各种协定(或彻底吞并，或松散辖制)，英国至少在1881年得以振振有词地对其它欧洲列强宣称，南非不仅属于其势力范围，而且它完全有权独霸此地。在这段时期的南非，英属殖民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布尔人巩固了自身的团结，非洲人的土地及其主权逐步沦人布尔人和英国人手中。 144

英国人退出腹地

英国人自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退出南非腹地。哈里·史密斯爵士在1847年出任南非总督兼高级专员。此人精力充沛，自信过人，上任不久便引人注目地在南非到处拓展英国统治的范围。他深信英国的统治能够带来和平与稳定，必需让非洲人得到英国工业和文化成就的“裨益”。他吞并了处于凯斯卡马河与凯河之间的科萨人领地，称之为英属卡弗拉里亚。接着又霸占了奥兰治河与瓦尔河之间大片布尔人和非洲人杂居的疆域，史称奥兰治河主权国。史密斯对前景相当乐观，认为新辟地区不会给英国带来财政负担，完全可以用当地收入解决新占领地的行政开支。此后的局势发展却证明他大错而特错。他那一套政策导致战事不断，开销浩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惨重。原因很简单，布尔人反对他的兼并之举而非洲人则抵制他的“开化”措施，因不肯丧失自己的土地和主权而奋起反抗。 145

首先发起武装抵抗运动的是安德里斯·比勒陀利乌斯率领的布尔人。1848年他召募一支12,000人的民团，一举将英国驻节长官哈里·沃登少校及其属下官员全部逐出奥兰治河主权国。不过，布尔人的胜利难以持久，很快便各自散去。比勒陀利乌斯只剩下一支小部队，1848年8月29日被史密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

史密斯恢复了英国人的统治，派一小分队留驻当地支援行政当局，自己又赶回开普殖民地。他交给沃登一项有潜在危险的棘手任务，要其在奥兰治河主权国境内给争议不休的各族群的领地划定界线。争夺各方包括莫舒舒的强大王国，莫莱察内、锡孔耶拉和莫罗卡分别统治的塔翁人、特洛夸人和罗隆人三个小国，还有布尔人、科拉人和格里夸人的国家。莫舒舒的王国由于接纳了那些躲避布尔人入侵和横征暴敛的难民，而迅速扩大，因此需要占据卡利登河谷两侧的大片土地，从卡利登河与奥兰治河交汇处一直上溯到卡利登河发源地。莫舒舒的属民日益突破王国北部和西部边疆，占据肥沃的耕地，于是便与在同一片土地上开垦的邻邦居民发生了激烈冲突。英国人试图通过划分疆域来解决这些冲突。但是，沃登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冲突，因为他划定的疆界照顾了布尔人和那些小国的利益，却损害了莫舒舒的索托人权益。况且宣布划分疆域本身就足以引发各个种族集团竞相争占土地，进而导致抢夺牲畜的竞争。

这场危机使得莫舒舒进退两难，只能采取骑墙态度才可求得生存。他不愿惹恼当时统147 治着布尔人的英国人，因为他们兵强马壮。况且，一旦他同白人邻邦兵戎相见，他还指望能够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但是英国人却使他无比难堪。他先曾欢迎他们进入这一地区，期望他们阻止布尔人吞并他的土地。不曾想此时布尔人却在英国人的纵容之下夺走了他的土地。事实上他的臣民严词指责他，他们认为是他同英国人相勾结，将他们祖国的土地一片片拱手相让。这样一来，他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手下臣民破坏沃登划定的边界。他只能一面斥责手下属民，一面不失时机地屡次向英国官员抗议，指出边界划分不公平。他的臣民毫不理睬国王的训斥，随心所欲地择地定居，侵入邻国劫掠牲畜或是实施报复。

英国在当地的驻节长官沃登也无法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他手下兵力不足，宁可对莫舒舒提出的领土要求置之不理。他给特洛夸人划界时破坏了莫舒舒的国土完整。索托人始终等待有利时机打垮特洛夸人，夺回对方过去趁莫舒舒王国尚未强盛之时从他们手中抢占去的土地。沃登甚至强迫莫莱察内的塔翁人接受他划的界线。塔翁人知道自己占用的土地属于莫舒舒，从未要求归于己有。同样，莫舒舒及其属民绝不能容忍沃登慷他人之慨，给泰博斯一带的科拉人等新近闯入此地的异族人划拨土地。沃登的目的正是力图削弱莫舒舒王国的势力，同时想要赢得小国的支持，以便克服英国人在本地区的军事力量不足的弱点。[①]

塔翁人和特洛夸人之间多次互抢牲畜，终于爆发战事。此时沃登确从支持他的少数布尔人以及格里夸地区的罗隆人和科拉人中间征募到一支数量可观的力量，甚至特洛夸人也主动赶来支援。沃登在维尔沃特丘陵地带击溃了塔翁人部队，掠走3468头牛和大量山羊、绵羊。然而难以对付的莫舒舒出兵参战帮助其盟友莫莱察内手下的塔翁人，他们并肩作战，

① P. 桑德斯(Sanders)，1975年，第149-150页和1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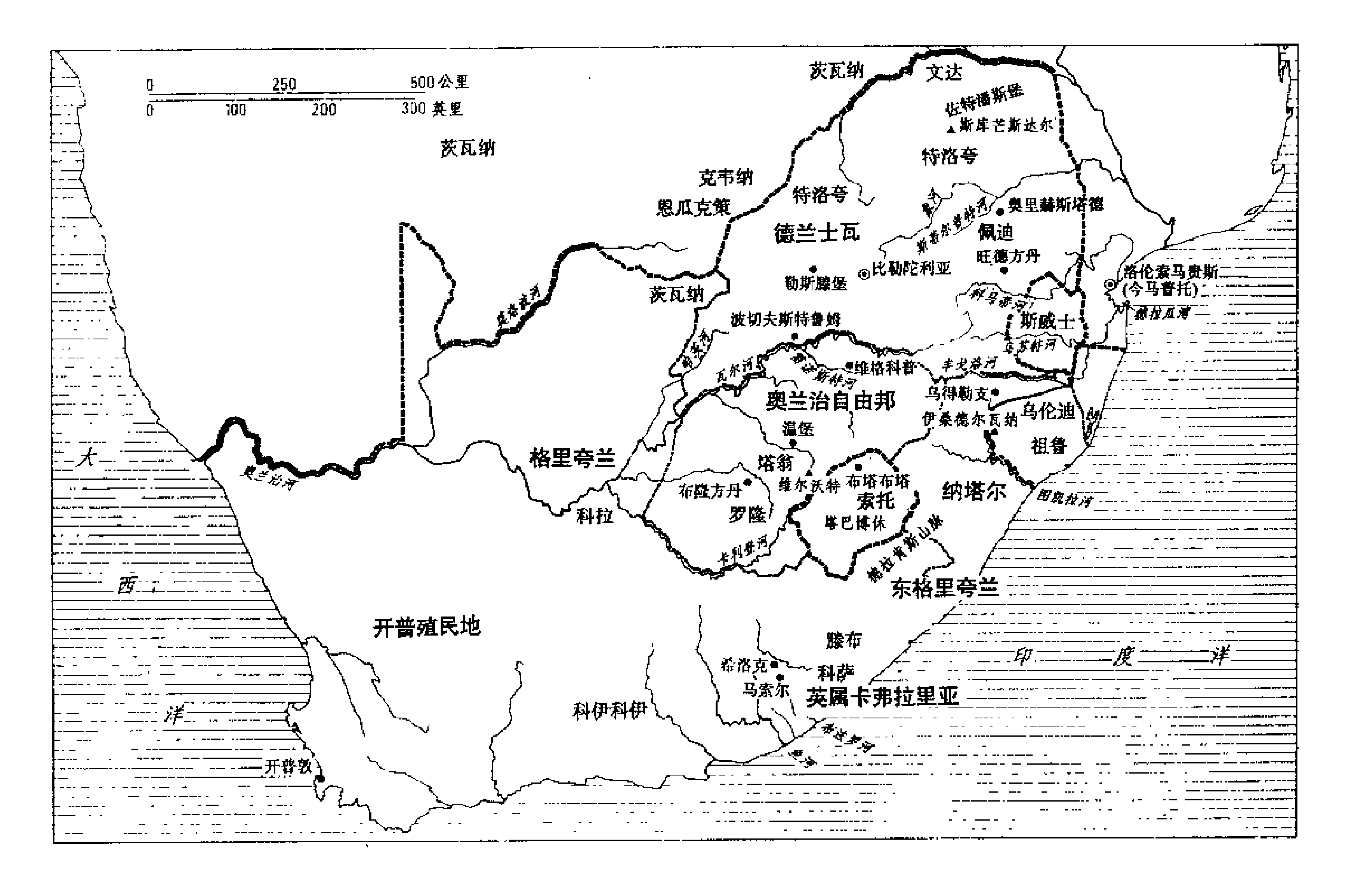


图 7.1 南部非洲国家与民族分布图，1850-1880 年（仿照 N. 贝贝图）

重创沃登及其非洲人盟军。1851年6月奥兰治河主权国的英国当局一败涂地。[②]

沃登从当地的布尔人和开普殖民地的英国人那里都得不到多少帮助。布尔人不是指望瓦尔河彼岸亲友们的支援，就是力图同胜利者莫舒舒和莫莱察内达成和平协议。开普殖民地英军被科萨人缠住不得脱身，双方自1850年12月以来一直激战不息。事实上正是东线和奥兰治河主权国爆发的这两场战争迫使英国人放弃了史密斯在南非实行的扩张政策。

1850-1853年英国-科萨之战的起因在于史密斯一心要剥夺科萨人的独立。他在1848年抢走大片科萨人领土，将菲什河与凯斯卡马河之间的地带并入开普殖民地，然后又在凯河与凯斯卡马河之间另建英属卡弗拉里亚殖民地。许多科萨人无法在凯斯卡马河以西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定居，那片区域被分割成小块，划给姆丰古人中间的"忠顺者"和白人农场主。在卡弗拉里亚当地，科萨族被分赶到划定的"保留地"，其酋长们的权力受到强行委派的白人地方长官严格监督和限制，索取彩礼和讲巫术咒语之类的习俗被视做违犯英国法律，因而是非法行为。而白人地方长官对开普地方法律知之甚少，对科萨族的法律制度更是一窍不通，全凭个人直觉处理呈交上来的科萨案件。这些长官依靠的是500名非洲人警察，他们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只感到能执行白人的命令极为自豪，因而对自己的同胞专横跋扈。科萨人饱受欺凌，被迫奋力摆脱英国统治。

148

由于史密斯粗暴地对待科萨酋长，实际上是蔑视科萨人对本族传统权威体制的深厚感情，因而引起了这场战争。他传唤大酋长桑迪尔到威廉王城与其会晤。桑迪尔拒绝前往。因为几年前他曾应召赴会，英国人却背信弃义，将他逮捕入狱。史密斯宣布废黜桑迪尔，强行任命一名白人酋长和桑迪尔的母亲取而代之，科萨人均拒不接受。史密斯又宣布桑迪尔的地位不合法，并企图用武力逮捕他。到1850年12月，科萨人对英国总督横加干涉他们的生活忍无可忍，举兵攻打当地的英军和军事设施，一连铲除了几座驻兵村。

桑迪尔奋起抵抗英国人，赢得邻近非洲人的普遍支持。在凯河以东，他得到萨里利大酋长手下弟兄们道义上的支持。许多非洲人警察和开普有色人骑兵枪手倒戈加入桑迪尔的部队。科伊科伊人和一些滕布人也同桑迪尔协力作战。许多站在英国人一边的白人农场主和非洲人被杀，牲畜被抢，不动产被毁。史密斯此时却只能依靠当地的非洲人盟友，开普殖民地的白人农场主都不愿为他打仗。他虽然在1852年3月求得英国政府派兵增援，却未能将科萨人的起义镇压下去。接任他的乔治·卡思卡特爵士许诺开普白人农场主可以分享一部分战斗中俘获的牛群，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援，这才结束了这场战争。1852年10月，桑迪尔和萨里利手下的科萨人战场失利，两地众多牛群落入英国人手中。萨里利手下的科萨人在凯河以东，大都在道义上支持河西与英军作战的同族兄弟。[③]

149

英国-科萨之战代价高昂，奥兰治河主权国英方当局一片混乱，英国人只好退而放弃史密斯的莽撞政策。他们派出两名高级官员威廉·霍格少校和查尔斯·欧文前去安排英国人撤离奥兰治河以北地区的事宜。为了有效地处理奥兰治河主权国的局势，避免瓦尔河以北的布尔人插手干扰，这两位官员保证准予后者独立，从而双方达成协议。德兰士瓦的布尔

② 同上，第14章。

③ E. A. 沃克(Walker)，1957年，第250-254页；C. 布朗利(Brownlee)，1896年，第306-319页；M. 威尔逊(Wilson)，1969年b，第256页。

人星散各处，派系林立，安德里斯·比勒陀利乌斯设法从中周旋才组成一个代表团与英方谈判，于 1852 年 1 月 17 日达成桑德河公约。

根据这个公约，英国承认德兰士瓦的独立，并单方面废除同瓦尔河以北地区非洲人各国之间的一切盟约。德兰士瓦保证不干涉各英属殖民地的事务，不再蓄奴和买卖奴隶。英国人和德兰士瓦布尔人进而约定不准瓦尔河两岸的非洲人进入双方的武器弹药市场，但允许布尔人自由进入英国军火市场。[4] 无庸赘述，即便非洲人利用秘密手段通过"肆无忌惮的"英国军火商得到一些枪支，但英国人和布尔人实施的武器禁运有效地阻止了非洲人各国积存大量军火，使非洲人无法从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市场上购买最新式的军事装备。总而言之，白人通过这个公约保证能在军事上压倒非洲人，因而必然从技术上征服非洲人。

两位英国官员排除了德兰士瓦这个后顾之忧，便转回来解决奥兰治河主权国问题。不过新任高级专员卡思卡特却想痛击莫舒舒王国，以便重振英国军威，免得在非洲人心目中声誉扫地。他调集一支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庞大部队，于 1852 年 12 月 15 日在普拉特山向莫舒舒挑战，发出了对方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最后通牒。他要莫舒舒在三天之内交出一千匹马和一万头牛以赔偿布尔人在沃登战争中遭受的财产损失，并弥补卡思卡特此次讨伐的巨额开支。莫舒舒未能按期满足他的要求，恳求他宽限时日。卡思卡特对国王的要求置之不理，下令入侵今日的莱索托。但是他遭到莱索托步兵和骑兵的顽强抵抗，急欲退兵以求解 **150** 脱。恰在此时莫舒舒于 1852 年 12 月 20 日写信给他，做出屈从的外交姿态。莫舒舒恳求高级专员满足于总督大军业已俘获的五千多头牛。国王承认自己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的确领教了英国的威力，因此祈求和平。他还表示今后将尽力阻止属下臣民挑起骚乱。接到此信的次日，总督便迅速率军撤出这个充满危险的王国，部队丢盔弃甲，38 人阵亡，15 人负伤。[5]

卡思卡特在主权国陷入困境，使得英国进一步认定要在这一地区维持下去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乔治·克拉克爵士受遣前去完成撤出奥兰治河以北地区的使命。莫舒舒听到英国人行将离去的风声，随即动手进剿其王国西北面的特洛夸人、格里夸人和科拉人等布尔人的潜在盟友，以备将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同布尔人进行斗争。莫舒舒王国周围的所有南索托人现已落人他的统治之下，唯有莫罗卡酋长的领地除外，不过那里的人口在前一次战争中损失惨重，此时已经减少到仅有一千人。

与此同时，克拉克历经艰难设法召集到一些愿意同他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的布尔人，他们在 1854 年 2 月 23 日达成了布隆方丹公约。该公约与桑德河公约基本相同，赋予当地布尔人完全独立的地位；除了亚当·科克以外，英国人中断与奥兰治河以北地区非洲人诸首领的结盟关系。即便是英国人与亚当·科克签订的限制布尔人在后者领地境内购置土地的条约也被重新修订，允许白人买下其所有土地。克拉克还拒绝接受莫舒舒的请求，不同他讨论划定奥兰治河主权国(不久便改称奥兰治自由邦)和莫舒舒王国之间的分界线。[6] 因此，

---

(4) E. A 沃克，1957 年，第 252-253 页；L. 汤普森(Thompson)，1969 年 b，第 420-421 页。

(5) P. 桑德斯，1975 年，第 185-193 页；E. A. 沃克，1957 年，第 254-255 页；L. 汤普森，1969 年 b，第 421-422 页。

(6) P. 桑德斯，1975 年，第 200-201 页。

英国人撤出这一地区为白人农场主剥夺亚当·科克的土地铺平了道路，并且导致布尔人与索托人间不断发生领土争端。

卡思卡特在开普殖民地东部前线主要防范科萨人扰乱和平。1850-1853年战争之后，他认为桑迪尔手下许多科萨人以及滕布人和科伊科伊人都是叛乱分子，因此没收了他们在凯斯卡马河以西一带、白凯河与凯特河两河流域、马索尔山脚之下、以及英军驻兵村四周的土地。他将这些被充公的土地转卖给白人农场主，赐给姆丰古人中的"忠顺者"。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这个地区保持中立，在以黑人为主的东部地区和西部白人的开普殖民地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卡思卡特还在政治方面改变了史密斯的政策。史密斯大幅度削弱科萨族酋长们的权力，卡思卡特却允许他们在拥挤的"保留地"内部毫无限制地对其属民行使司法权，使英国人地方长官降为"只不过是毫无权力的外交代表。"[7]

卡思卡特1854年告别南非，此时英国人已经撤出腹地，听任布尔人和非洲人自行处理他们的事务。就连英国人继续统治的卡弗里亚也并非一块"正式的"殖民地，无论从当地还是英国利益上来看都没有必要予以开发。它只被看成开普殖民地防御体系的一部分，除了后勤保障的需要之外，这块领地似乎并不值得英国关注。英国政府只求确保在开普半岛上占有海军基地。看来只要保住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不让力量弱小且不团结的布尔人掌握单独的入海通道，完全有可能达到上述目的。英国准许两个白人殖民地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以换取两地当局同意承担大部分当地行政和防务开支，从而尽可能减少宗主国的负担。于是开普殖民地在1853年获准制定宪法和设立议会机构，原在1845年作为一个区被并入开普殖民地的纳塔尔再度分立，并于1856年获准设立独自的立法委员会。

1870年以前的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

然而节省开支并非英国政府在1853年准许开普殖民地建立代议制机构的唯一原因。[8]开普宪法得以产生的背景是当时正值英国放弃重商主义体制转而采取自由贸易体制时期。英国本土的曼彻斯特和韦克菲尔德两大学派各持己见，都曾在有关英国殖民政策的辩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两派立场截然相反，但都主张赋予各殖民地以自治权。殖民事务大臣格雷勋爵率先在1846年提出应允许开普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他本人就积极主张自由贸易。而且，开普的英国殖民者们本身也积极倡导自治，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恳求英国政府准许建立代议制机构。即使是1834年成立的由总督、官员和指定的非官方议员组成的开普立法委员会也未能使这些殖民者停止游说。因此，英国政府由于来自殖民地的压力以及自由贸易原则，且又迫切需要节省开支，于是不得不准许开普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

1853年开普宪法的构想是既要保护处于少数地位的英裔富商的利益，又要有限度地允许处于多数的贫穷布尔人、有色人和非洲人参与政治。保障手段是规定参加选举和竞选上下两院议席的选民须具备一定的财产资格。只有富有者才能当选上院议员，因为具有上院

---

⑦ E.A.沃克，1957年，第286页。

⑧ S.特拉皮多(Trapido)，1964年，第37-54页；E.A.沃克，1975年，第233-245页；T.R.H.达文波特(Davenport)，1969年，第321-324页；C.F.J.马勒(Muller)，1975年(编)，第183-184页。

选举与被选举权的人必须是拥有价值 2000 英镑无债务资产或拥有价值 4000 英镑负债资产的英国臣民。凡拥有价值 25 英镑资产或享有 50 英镑年薪的男性英国臣民均有选举和竞选下院议席的资格。这样就能允许少量布尔人和有色人享受选举权。但是，由于议会的正式工作语言定为英语，乡村地区约有 70%的布尔人被排斥在选举之外，他们一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仍旧不大会讲英语。[9]

开普议会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审议关于殖民地分割的要求，二是解决行政与立法两个部门之间的冲突。东开普各区主要是操英语的人居住，因而要求与以操荷兰语居民为主的西开普各区分治，以免受制于人。开普宪法本身便产生矛盾冲突，竟然试图将专制和民主两种制度相结合。这部宪法规定不设责任内阁部长，各部门首席官员由英国政府的殖民事务大臣任命并向英国驻开普总督负责。总督制订政策，然后交两院议会审议表决。这部宪法的效力完全取决于特定总督的个人品质和当时该殖民地的经济状况。乔治・格雷爵士任总督期间，当地经济相对繁荣(1854-1862 年)，总督与开普议会打交道时策略得当，同上、下两院均无重大冲突。其继任者菲利浦・沃德豪斯爵士(1862-1872 年)却独断专行，使用高压手段，对于东开普居民要求分治的情绪反应过分迟钝。因而他受到各个派别的强烈反对和上下两院的普遍敌视。议会使用其唯一武器予以反击：拒绝表决通过他提出的新税收政策。19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衰退使政府财政赤字累累，沃德豪斯更加感到问题棘手。开普殖民地宪政危机频繁爆发，1872 年获准设立责任政府也仅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当时总督的权力和职责使得他与开普内阁之间不断产生冲突。

正是在乔治・格雷爵士和他的继任者菲利浦・沃德豪斯爵士两位总督统治开普期间，**153** 西斯凯的卡弗拉里亚一带科萨人完全丧失了他们的独立。尤其是格雷为了推行其所谓的开化政策，对西斯凯的科萨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在科萨人领地安置白人定居，创造了人们称为“黑白相间的棋盘”的局面。他还削弱了科萨族酋长的权力，限制他们只能处理民事纠纷，而让白人地方长官负责所有其它事务。酋长们领取薪俸，从而放弃了征收罚款的权利，从此转由英国官员负责。他强行征收茅屋税，以便解决殖民地的行政开支；强迫百姓修筑公用设施，只付给低廉的工钱。劳务和财政勒索，加上大批白人定居造成的人口压力，科萨人被迫力求解决受制于人的问题，指望天赐盛世早日降临。虽然帝国主义的直接压力着重落在桑迪尔手下的科萨人及其近邻滕布人身上，凯河以东地带(位于今特兰斯凯境内)萨里利属下的科萨人也面临沉重的人口压力。难民络绎不绝，有的人为了摆脱英国人的直接剥削和压迫，逃亡而来，有的则是被人以叛乱分子为名赶出河西一带的。

1856-1857 年间，科萨人和滕布人一道寻求宗教帮助解决问题。一位名叫侬卡厄斯的姑娘，显然是受到萨里利酋长手下一位顾问姆赫拉卡扎的传教指点，在 1856 年 3 月作出预言。她告诉众人，如果宰杀所有的牛群，毁掉存粮，当年不种任何庄稼，一场旋风便会从天而降，把欺压百姓的英国人扫刮下海。不仅如此，他们的英雄们将会死而复生，带回大量牛群和粮食，甚至还有白人的工业品。科萨人和滕布人遵命行事，然而吉日过后一切照旧。1857 年，凯河两岸饿殍遍野。西斯凯的许多科萨人涌入开普殖民地，到白人中间寻找工作以维

---

[9] F. A. 范亚尔斯韦尔德(Van Jaarsveld)，1975 年，第 154-157 页。

持生活。整个事件毫无意义，人们一直在寻找内在的解释，但一无所获。E.A. 沃克认为是莫舒舒策动科萨人采取了自杀性行动，原指望他们在走投无路时会奋起攻打英国人，这样就能转移英国人对奥兰治自由邦的注意力，以便莫舒舒更容易对付那里的布尔人。[10]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白人的阴谋，目的是要引诱科萨人走向自身毁灭。但是对这两种观点都还没有或极少证据能加以证实。也许莫妮卡·威尔逊的看法正确，科萨人屠宰牛群之举类似在欧154 洲、美洲和非洲其它地方多次发生的迎接天赐盛世运动的做法。威尔逊告诉我们，这是人们力图借以摆脱外国统治的一场运动，为的是从白人定居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土地。[11]

格雷却利用这一宰牛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科萨人和滕布人力量的衰弱，趁机没收了桑迪尔手下许多酋长的大片土地，唯恐他们策划举行反英国人的起义。此后，丧失了土地的酋长们以及萨里利的属民全被赶过姆巴谢河，凯河与姆巴谢河之间成为一片无人地带，由英国警察巡逻看守。格雷还鼓励白人迁到没收过来的土地上去定居。这里当时被划作一个独立区，派有副总督管辖当地的黑人和白人居民。1865 年，沃德豪斯认为西斯凯过于贫困，当做单独的殖民地来管理开支过大，于是将其并入了开普殖民地。

1870 年之前这段时期，纳塔尔的白人在制宪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地被吞并后的几年之中，许多布尔人回到德拉肯斯山脉以北的德兰士瓦高原一带，以此抗议英国人拒不承认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反对英国对非洲人的政策以及完全排斥布尔人参与政事的新政体制。与此同时，纳塔尔许多在姆非卡尼时期被逐出故土的黑人此时重又返回，致使此地黑人增多。

纳塔尔的殖民当局势单力薄，首先面临的困难是如何统治非洲人。1846 年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此后数年间又历经英国外交代表和非洲事务秘书西奥非勒斯·谢普斯通(1853-1875 年)的不断完善。1846 年委员会建议划出若干保留地或类似的场所安置非洲人，到 1860 年为此划出土地累计达二百万英亩(81 万公顷)。然而这些区域大都地处纳塔尔荒芜贫瘠的丘陵地带，根本不适于农耕。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建议，如向非洲人提供受教育机会，每个区域派一名白人军官负责并配备一支黑人与白人混编警察部队，强行实施罗马-荷兰法以取代非洲人的法律。由于落实这些建议需要大量开支，因此从未付诸实施。结果非洲人的教育事业虽说不是完全由传教士承担，但绝大多数情况仍旧照此办理，而这些传教士并未接受过专门训练，教育经费也严重匮乏。行政治理则仍由谢普斯通本人负责。

谢普斯通熟谙数种恩古尼语言，曾在科萨人中间生活多年，因而得以同非洲人各族群建立起某种可行的关系。生活在各保留地的所有非洲人都处于酋长和头人的管辖之下，即便当时有头人的也指定了新首领。除了巫术之外，非洲人的其它法律均获准运用。谢普斯155 通强行征收茅屋税以便解决行政开支，缴税方式可用现金也可用牛(可卖给白人农场主换回现金)。他的政府始终受到白人移民的攻击，因为他们认为上述政策使得非洲人能在经济上自立，难以再做农场和种植园的劳动力。但是，谢普斯通并非由于喜欢非洲人才不把他们

---

[10] E.A. 沃克，1957 年，第 289 页。
[11] M. 威尔逊，1969 年 b，第 256-260 页；参阅 C. 布朗利，1896 年，第 135-170 页。

束缚在保留地之内，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如果采取强制措施逼迫他们作劳工只会招致抵抗，而这是相对弱小的纳塔尔殖民当局根本对付不了的。批评他的那些白人移民似乎对非洲人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实际上大地产主全靠收缴占黑人半数以上的擅自占地者交纳的租金牟取暴利，而殖民地的收入也要靠非洲人的茅屋税。事实上谢普斯通的政策是使政府开支下降，给白人殖民社会众多机会，以便在相对和平与安定的条件下剥削非洲人和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12]

白人社会主要是英裔移民。继布尔人迁徙浪潮之后，由于1847-1851年英国经济危机造成英国人为躲避社会困境而背井离乡移居南非，纳塔尔的白人数量稳步上升。这段时期内，约有五千白人移民在投机商人的资助下离开英国定居纳塔尔。到1870年，纳塔尔的白人增至18,000。白人数量的增加与制宪变革同时并进。1856年塔纳尔成为分立的殖民地，获准设置立法委员会。有关选举权的规定并没有涉及种族，因而凡是拥有价值50英镑以上不动产或以每年租金10英镑出租价值50英镑房地产的男性英国臣民均享有选举权。但是白人的这条法律使得非洲人实际上不可能有资格获得选举权。1865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允许有文化且拥有一定财产的非洲人可向副总督申请不受非洲人习惯法的管辖。副总督完全可以驳回此类申请，尽管这些非洲人具备必要的资格。即便获准豁免的非洲人要想得到选举权，还必须证实自己已在纳塔尔居住七年以上，其申请书须附有三个享有选举权的白人的证明以及一名白人地方长官或其他可接受的白人官员的担保。副总督仍旧可以随意驳回申请。结果，一直到1903-1905年间，纳塔尔和祖鲁兰只有三个非洲人获得选举资格。[13]

纳塔尔在经济方面逐渐依赖于制糖业，这就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由于工作条件艰苦，种植园主付的工资低，强迫非洲人提供所需劳动的努力毫无收效。纳塔尔种植园主遂在政府的支援下转而引进印度劳工。根据这项计划，印度劳工在纳塔尔做工十年之后，可以领取旅费回国，或者用这笔旅费换取一块土地在纳塔尔永久定居。从1860年首批印度劳工抵达这里到60年代末，纳塔尔已有六千印度人，他们大多选择在南非永久居留。纳塔尔的制糖业依靠印度劳工开拓立业，到1870-1871年已经发展成为这块殖民地的最大出口产业。 156

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初，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显然都已经通过制宪程序逐渐将政治权力移交给白人定居者。开普殖民地的白人多数不讲英语，其宪法不得不在财产资格之外做出限制选举资格的规定，以便英国人能保持大权。无论在纳塔尔还是开普殖民地，非洲人都被赶到保留地，并通过强征税款迫使他们成为白人企业中的劳工而且支付统治他们所需的行政开销。尽管当时财政经费有限，其目的始终是企图将非洲人变为无产者，如通过工业化的教育，剥夺酋长的权力以破坏非洲人的社会凝聚力，强行实施欧洲法律，限制他们使用的土地数量，最重要的是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1870年以前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上述两个英属殖民地在大英帝国的支援下取得了制宪方面

[12] E.H. 布鲁克斯(Brookes)，1974年，第41-57页；J. 盖伊(Guy)，1980年，第41-44页。
[13] E.H. 布鲁克斯，1974年，第55-57页；E.H. 布鲁克斯与C.de B. 韦布(Webb)，1965年，第75-77页。

的发展，建立了在政治上保障白人最高权威和在经济上掠夺剥削黑人的机制。在同一时期，布尔人也力争取得内部统一和征服内地各族非洲人。英国人撤出奥兰治河以北地区之后，布尔人分化为若干集团。主要是沿瓦尔河划分，最终形成了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河南面的奥兰治自由邦与河北面的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

1854年签订布隆方丹公约之时，奥兰治自由邦或许有许多人希望独立，然而极少有人真正有思想准备。除了贫困愚昧、兵力薄弱和缺乏行政基础设施之外，自由邦政府还惧怕其强大邻国莫舒舒统治的索托王国，双方边界一直未划定。奥兰治自由邦内部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长期以来举棋不定，难以决断应该加入南面的开普殖民地还是同北面的姊妹共和国合并。因此，奥兰治自由邦经常面临南北两边的干涉。

分歧主要发生在"乘牛车的布尔人"（trekboers）和"迁徙先驱者"（voortrekkers）之间。157 前者是在大迁徙之前便跨过奥兰治河开拓土地的布尔人。他们主要定居在日后成为奥兰治自由邦一带的南部，一旦被卷入同四邻非洲人的战争时，总是寻求南边的支援。他们在兼并河北地段的短暂时期曾得到英国商贾和定居布隆方丹的土地投机商的支持。这批布尔人被称做"效忠人士"或"再度兼并者"。和他们大不相同的是居住在自由邦东北部的布尔人，主要集中于温堡区及其周围地带。这些人由于仇视英国殖民政府而离开开普殖民地，经过大迁徙移居此地。这批"迁徙先驱者"被称做"忠诚的社会党人"（maatschappijers）或是"共和派爱国者"，自始至终主张彻底独立，摆脱英国人，遇到困难时一向求助于德兰士瓦。[14] 上述这一分歧在某种程度可对下述问题有所解释：为什么奥兰治自由邦在1858年轻信力主联邦制的总督兼高级专员乔治·格雷爵士的煽动，被利用而险些并入开普殖民地；为什么自由邦选择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马蒂纳斯·韦塞尔斯·比勒陀利乌斯担任自由邦的总统（1860-1863年）；为什么自由邦在1880-1881年英布战争时保持中立。尽管奥兰治自由邦存在种种弱点，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实体仍比德兰士瓦快得多。同英国人谈判成功获得独立的那个委员会又一手操办了选举，产生自由邦首届政府，并参照美国宪法制定出一部宪法草案。政府设执行总统和立法机构（volksraad）。这些布尔人并不想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立场，不像英国殖民地那样用提高财产拥有限额的手段规定选举权资格。黑人根本不能成为该国的公民，自然没有选举权。只有居住此地半年以上的白人才能成为本国公民，凡登记愿服兵役的白人男子均有选举权。[15]

首任总统约西亚斯·霍夫曼的执政时间不长，因认为他对莫舒舒和英国定居者过于友善，故而被迫辞职。约翰尼斯·尼克拉斯·博肖夫当选继任，此人富有行政管理经验，主张共和国应彻底独立。他建立了强大的公务员体制，国家财政的基础坚实。[16] 尽管如此，博肖夫任总统期间国内局势并不稳定，由于同莱索托的边界争端，"社会党人"与效忠人士两派之间关系紧张，结果导致乔治·格雷爵士和比勒陀利乌斯两方面的干预。1855年10月，158 乔治·格雷爵士从中撮合，莫舒舒和博肖夫就解决双方子民之间争端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两国并没有划定边界线，莫舒舒事后称只是出于尊重乔治·格雷爵士的考虑他才签署了这

⑭ F.A. 范亚尔斯韦尔德，1961年，第29页。
⑮ L. 汤普森，1969年b，第429-430页；C.F.J. 马勒，1975年，第233-235页。
⑯ C.F.J. 马勒，1975年，第255页。

项协议。[17] 因此，他从未制止其臣民与布尔人争斗。博肖夫不仅仍旧深受边界争端的困扰，而且还不得不对付力图统一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比勒陀利乌斯。安德里斯·比勒陀利乌斯误认为自由邦的大多数人渴望与北方同胞合并，便声称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统治自由邦的领导权。他在1857年2月22日进入布隆方丹，次日便宣布他有意接管政权并称博肖夫政府为非法。博肖夫政府认为他没有这种资格，将他驱逐出境，并指控他的支持者煽动暴乱。于是双方在瓦尔河两岸集结民团，5月25日在雷诺斯特河隔河布阵对峙。比勒陀利乌斯原指望许多"社会党人"会抛弃博肖夫，投诚加入他的部队。不曾想不仅没有多少人倒戈投靠，自己后方反而出现另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佐特潘斯堡要塞司令斯特凡努斯·舍曼。两人过去便争夺德兰士瓦的领导权，而舍曼早已同自由邦结成了同盟。比勒陀利乌斯怕自己彻底灭亡，便同意签署协定，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在1857年6月1日相互承认对方的自治权。[18] 一场内战得以幸免，但也明显地揭示出布尔人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

上述协定并没有消除奥兰治自由邦三大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三派势力分别为赞成重新并人开普殖民地的"效忠人士"、主张奥兰治自由邦独立的博肖夫派和希望并入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联合派。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博肖夫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被迫于1858年2月宣布辞职，然而他后来又收回辞呈，不少立法委员退席以示抗议。除了内部分歧之外，自由邦与莱索托之间的边境纠纷也日趋频繁。1858年3月，博肖夫决定人侵莱索托以图制止边界争端。布尔人民团全都集结在莫舒舒的大本营塔巴博休周围，后方毫无设防，致使莱索托军队突袭得手。布尔人只好放弃进攻莱索托，转回家乡保护自己的亲属和财产。奥兰治自由邦并非真心要侵占莱索托，这一举措反而暴露了本国在军事上的弱点。其实，博肖夫早在宣战之前便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曾同时请求比勒陀利乌斯和乔治·格雷爵士给予军事援助。[19] 格雷做出反应，安排莫舒舒同博肖夫在1858年9月29日会晤，双方签署了北阿利瓦尔条约，确认接受沃登先前划定的边界。[20] 159

比勒陀利乌斯则趁机再次试图统一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方面明确表示，只有在奥兰治自由邦同意合并的前提下才能提供援助。这两个共和国可能合而为一的前景使格雷感到不安，此时他已在考虑将几个共和国和英属各殖民地并成一个联邦。早在1857年格雷就得出了英国人撤出南非腹地是个错误的结论。因而此时他呼吁废除有关公约，主张以某种联邦制形式重新建立英国在南非的统治。他担心面对遍布各地的非洲人国家，白人之间四分五裂势必削弱自身的力量。他还担心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统一之后会与外部列强发展关系，从而威胁到英国殖民地和英国在此地至关重要的海军基地的存在。另外，他认为布尔人同非洲人国家之间频繁的冲突具有潜在危险，控制不住就会波及英国各殖民地。因此格雷迅速采取行动以扼杀布尔人的计划。他告诉布尔人，如果他们执意统一，英国将不再承担履行有关公约的义务，并将开始同非洲人各国谈判结盟，甚至向他们出售枪支。德兰士瓦方面一见如此便撤回瓦尔河北边以保自身独立，听任格雷鼓动自由邦逐步并入开普殖

[17] G.M.西亚尔(Theal)，1900年，第16-18页。
[18] G.M.西亚尔，1900年，第40-45页。
[19] G.M.西亚尔，1900年，第50-60页；P.桑德斯，1975年，第203-236页；L.汤普森，1969年b，第432页。
[20] P.桑德斯，1975年，第233-241页。

民地。但是当格雷努力劝说开普议会审议自由邦提出的合并要求时，英国政府却在 1859 年 6 月将他调离了南非。

联邦方案夭折之后，博肖夫及其支持者由于热衷并入开普殖民地而名誉扫地，总统只好辞职。这样就加强了联合派的势力，他们选举比勒陀利乌斯继任总统。然而奥兰治自由邦希望统一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德兰士瓦方面的同样响应，后者唯恐废除桑德河公约和重新被英国人所吞并。德兰士瓦立法机构强迫比勒陀利乌斯辞去其德兰士瓦总统之职，但他在此后三年间仍通过其支持者来做工作以促成两国的合并。到 1863 年，比勒陀利乌斯在奥兰治自由邦也遭到失败，于是回到家乡德兰士瓦共和国。

自由邦欲同开普殖民地或德兰士瓦共和国合并的尝试均遭失败，转而依靠自己来掌握本国的命运。他们选出约翰内斯·亨里克斯·布兰德任总统。他是来自开普的一位律师和 160 富有经验的议员，任总统后执政 25 年之久。不过，在讨论布兰德执政期间自由邦与其邻国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看德兰士瓦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历程。

为具有公认的国家特点，德兰士瓦花费的时间超过了奥兰治自由邦。瓦尔河以北一带的布尔人星散各处，而且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分裂。正如前文所述，M. W. 比勒陀利乌斯 1853 年接替其父之后，始终致力于统一瓦尔河南北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他同样是统一德兰士瓦的志士元勋，曾与不同派别的分离主义集团进行斗争，如以北部斯库芒斯达尔村为中心的佐特潘斯堡集团；东部的莱登堡集团和 W. F. 朱伯特；以及布法罗河沿岸乌得勒支地区的布尔人。势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比勒陀利乌斯本人领导的这支布尔人，主要在波切夫斯特鲁姆-马里科-勒斯滕堡一带。

1849 年德兰士瓦通过议案，将 1844 年的 33 项条款作为宪法，从而实现了某种形式上的统一。[21] 这些条款不过是有关司法管理、立法机构议员的选举以及一些普通法律。这些条款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分清立法和行政两大职责，立法机构力图行使双重职权。此外，由于没有确定首都，立法机构每次会议在不同的村镇举行，总是不能构成法定人数，只能以当地非议员来充数。比勒陀利乌斯力求通过正式宪法，分设立法和行政两个机构。他在这一方面同莱登堡集团发生冲突，后者疑虑重重，担心会产生类似总统制的寡头政治，更怕产生专制独裁者。

宗教争议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分歧。比勒陀利乌斯为了彻底切断这两者间的联系，敦促波切夫斯特鲁姆居民退出荷兰归正教会的开普宗教会议，并成立独立的荷兰重建教会，从荷兰延请牧师前来主持。莱登堡集团则继续保持同开普殖民地的联系，同时又从荷兰重建教会中分出一支南非归正教会，其显著特点是教徒们拒绝在教堂里吟唱圣诗。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德兰士瓦在 1857 年 1 月还是产生了一部宪法草案，规定设立总统以及立法、司法和军事方面的机构。比勒陀利乌斯的支持者主宰立法机构，推选他任总统，选出佐特潘斯堡集团的领袖约翰尼斯·舍曼为总司令。舍曼既反对这部宪法，也拒绝接受军职，他组织了一支民团攻打勒斯滕堡区的比勒陀利乌斯的支持者。后来，双方同意推选一个委员会，责成其根据佐特潘斯堡集团的意愿修订宪法，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1858 年

---

[21] 这些条款的英文译文见 G. M. 西亚尔，1900 年，第 413-417 页。

宪法修订后得以通过，比勒陀利乌斯和舍曼分别成为总统和总司令，1860年又说服了莱登 161 堡集团加入共和国。

然而如前所述，比勒陀利乌斯接受了奥兰治自由邦总统之职，使新生的德兰士瓦共和国陷入混乱。德兰士瓦立法机构唯恐本国的独立受到损害，要求比勒陀利乌斯在两个总统职位中任选其一，于是他便辞去德兰士瓦总统一职。然而，他通过舍曼以及他在波切夫斯特鲁姆的忠实支持者们继续发挥作用。他们这些人自行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其权力和职能与立法机构相同。立法机构随即任命了自己的总统和总司令。两个政府都自称有权统治共和国。一直到比勒陀利乌斯辞去奥兰治自由邦总统一职，并于1864年重新当选为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德兰士瓦才恢复安宁。他一直执政到70年代，后来由于在德兰士瓦共和国要求拥有钻石矿产所有权问题上处理不当而被迫辞职。

1870年前布尔人同非洲人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在德兰士瓦还是在奥兰治自由邦，许多非洲人社群不是被摧毁，便是并入姆菲卡尼年代出现的一些转瞬即逝的非洲人国家，例如姆兹利卡兹领导的恩德贝勒王国。还有一些非洲人被迫逃亡到南非地势险峻而易于防守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像莫舒舒那样的足智多谋的非洲人领袖接纳了大批离乡背井的难民。19世纪40年代，莫舒舒的王国脱颖而出，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而恩德贝勒人则被布尔人赶出了这一地区。诸如莱索托一类非洲人国家当时相当强盛，足以同入侵的布尔人和英国人较量和竞争。

恩德贝勒人被逐之后，许多过去曾屈从于姆兹利卡兹，但尚未完全被兼并的弱小酋长国与其他一些因躲避恩德贝勒人的袭击而逃亡在外的人，此时又重新回到故土。这些非洲人大都未及建立自己的防御设施，便被布尔人国家击败而吞并，并直接遭受布尔人的经济剥削。布尔人制定的公民法、劳工法和其它法律都含有这种剥削内容，例如德兰士瓦宪法拒绝接受任何关于黑人与白人地位平等的观念。为了防止非洲人进行抵抗，被兼并的非洲各族不许拥有枪支马匹，必须随时随地携带由雇主或政府官员颁发的通行证。每个白人农场主都有权在自家农场，占有几户非洲人，这些人定期为主人提供无偿劳动。“就居住于布尔人直接保护之下的欧洲人地区内的土著人而言，定期提供劳动被视为他们缴纳所分土地 162 的费用。”[22]

没有住在农场的非洲人都划归酋长管辖，各酋长拥有自己的一片聚居区或保留地。这些地区极为分散，每处都尽可能靠近白人种植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分化非洲人，防止他们联合起义，并能保证每个白人农场主易于找到黑人劳动力。每个酋长都要以牲畜和劳役的形式缴纳税收。事实上，地区行政长官(landdrosts)和地方自卫队队长(fieldcornets)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向所辖地区的酋长征募劳工，然后按一年的合同分配给白人农场主。各酋长在战时还需提供壮丁支援布尔人。

此外，德兰士瓦的白人还沿袭开普殖民地的做法，实行颇有争议的徒工制。他们把战

[22] W. 基斯特纳(Kistner)，1952年，第213页。

争中俘获的非洲儿童分配给农场主，男童和女童分别为主人劳作到25岁和21岁。对于兼并进来的非洲人，先是利诱，而后则威逼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农场主当徒工，换回微薄酬劳或小恩小惠。布尔人召集民团袭击邻近的非洲人国家，只是为了捕获儿童作徒工在当时并不罕见。尽管德兰士瓦法律禁止将这些儿童从一个农场转卖到另一农场，但是整个徒工制带有蓄奴的性质，因而传教士和商人都对这种制度加以指责。[23]

布尔人声称，由于征服并驱逐了恩德贝勒人，他们有权拥有德兰士瓦及当地民众。因此，他们以为自己完全有权要求林波波河以南所有非洲人都唯命是从，侍奉效劳。但是西部的茨瓦纳人，北方的索托人和文达人，以及东面的佩迪人，一概强烈反抗这些强加于人的做法。例如迪马瓦一带塞切勒手下的克韦纳人和肯尼耶一带加塞齐威酋长率领的恩瓜克策人便从传教士和商人那里买来枪支抵抗布尔人。这样一来，他们保住了自己的独立，而那些不得穿越德兰士瓦的传教士和商人则借地北上。

东面的佩迪人始终抵抗来自奥里赫斯塔德-莱登堡一带布尔人所不断发起的军事进攻，一直坚持到1857年双方才沿斯蒂尔普特河划定了边界。与此同时，佩迪人很快在战争中认识到枪支的重要性及其威力，特别是将火力武器同他们在卢卢山地的堡垒结合起来使用。因此，他们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到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做流动劳工，钻石矿山开掘后，又到西格里夸兰做工，挣钱后从商人手中购买枪支，积攒大量武器。[24]

163

在北边，抵抗布尔人扩张的有文达人，德兰士瓦的恩德贝勒人、索托人。1854年，沃特贝格山脉以东的索托族马卡帕内酋长打死了12个白人。这些白人是布尔人军事首领赫尔曼纳斯·波特吉特尔手下的狩猎队成员，他们在马卡帕内酋长面前强横霸道，公然"勒索牛羊宰杀而不付分文，并且逼迫黑人交出若干儿童当奴隶。"[25]不管当时出于什么原因，马卡帕内显然不希望白人进入他的领地，也许是害怕白人会因猎取象牙与他们竞争。杀死白人猎手一事在佐特潘斯堡以南引发了一场颇为普遍的对白人定居点的攻击。当地甚至远及南方波切夫斯特鲁姆和勒斯滕堡一带的白人都用牛车围成临时防御阵地保护家眷。德兰士瓦除莱登堡以外的各地区布尔人组成一支500人的庞大民团，在P. 波特吉特尔和比勒陀利乌斯总统的共同指挥下，入侵马卡帕内的酋长领地。索托人得知白人前来攻打的消息，退守附近的岩洞，随时准备狙击进犯之敌。布尔士兵奉命不得把索托人赶出洞穴，他们用木头石块堵住洞口，封锁了25天，见有人突围便杀。估计马卡帕内手下有900人在逃生途中被杀，约2000人因饥渴死于洞中。[26]

布尔人班师回营，深信这次大屠杀足以镇住北边的索托人和文达人，不敢再与白人抵抗。但是1859年又爆发一次非洲人起义，这次爆发地点略微北移到斯库芒斯达尔的布尔人村庄。该地布尔人当局对非洲人横征暴敛，支持非洲人内部反叛械斗，勒索贡品，无端挑起战事从而攻入酋长领地掠夺奴隶。尽管非洲人再次被击败，但是布尔人当局从此之后已

[23] L. 汤普森，1969年b，第435-437页；关于早年的开普殖民制见A. 阿特莫尔(Atmore)和S. 马克斯(Marks)，1974年，第116页。

[24] P. 德利厄斯(Delius)，1980年。

[25] G.M. 西亚尔，1900年，第27页。

[26] 同上，第23-31页。

经无法控制当地的黑人。

到了19世纪60年代，佐特潘斯堡的文达人已经在军事行动和狩猎时用上了枪支。这一带时有象群出没，因此白人猎手和商人经常光顾此地。许多文达人为这些猎手服务，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和保养枪支的技术。后来象群退到林波波河谷一带萃萃蝇肆虐的地区，白人善长的骑马狩猎已无用武之地，只能徒步打猎。白人商贾时常借枪给非洲人，让他们到河谷去猎象，这些非洲人被称做"黑人射手"(swartskuts)。他们用的许多枪最后并未还给 164 白人，实际上都用来将布尔人定居者驱逐出斯库芒斯达尔地区。1867年黑人起义的一位领袖文达族酋长马哈杜原来就是一个"黑人射手"。此次起义十分成功，布尔人不得不放弃佐特潘斯堡地区。[27]

在同一时期，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人主要是对付莫舒舒王国的南索托人、莫罗卡统领的罗隆人和亚当·科克手下的格里夸人。当格里夸人在1861年将其土地权卖给奥兰治自由邦并迁移到诺曼斯兰另建东格里夸兰后，就不再是对付的对象了。莫罗卡也归顺自由邦，甘心作附庸。

莫舒舒的索托人却依旧矢志抵抗布尔人的扩张。尽管莫舒舒国王本人曾在1858年签署了北阿利瓦尔条约，意味着接受沃登少校划定的边界，但是他并无意将此强加于他的臣民，他们继续不断侵扰边界。然而到了60年代，力量均势发生变化，布尔人占了上风。年迈的国王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对几个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儿子更无法驾驭。奥兰治自由邦国力则日益增强。农场主们致力于改良牲畜品种，产品在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颇有市场，整个经济状况大有改善。各殖民地不断有人迁居于此，自由邦人口日渐增多，到60年代，自由邦人也开始积极捍卫自己的独立，布兰德总统完全可以依仗国人的爱国热情打一场持久战争。双方经常发生边界之争，终于在1865年爆发一场大战。布尔人坚持不懈攻打莱索托，索托人却显得离心离德，各谋其政。莫舒舒之子莫拉波统治王国北部，他独自与布尔人签订了和约。由于举国上下不能一致对敌，莫舒舒被迫在1866年签署了塔巴博休条约，将大片可耕地割让给奥兰治自由邦。不过他采取此举只是为了争取时间重振旗鼓，1867年再度爆发战争，此次一直打到英国人出面干预才告完结。

莫舒舒早在1861年便要求英国人给予保护，并在1865年通过总督兼高级专员菲利普·沃德豪斯爵士再次重申这一要求。沃德豪斯本人主张英国应在南非扩展势力范围，并认为并吞莱索托即可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一步。因此，他一面力劝英国政府同意莫舒舒的要求，一面采取措施断绝布尔人的军火来源，使奥兰治自由邦无法抢占莱索托。一俟英国政 165 府同意占领莱索托，沃德豪斯便于1868年3月12日吞并了这个王国，建立起直辖殖民地。

1870-1880年英国在南非的扩张

吞并莱索托表明英国一改初衷，放弃了撤出奥兰治河以北地区的政策。1868年英国不允许德兰士瓦实行领土扩张，1871年自行兼并西格里夸兰，由此可见其改弦更张的意图更

---

[27] L. 汤普森，1969年b，第440-442页；R. 瓦格纳(Wagner)，1980年，第330-336页。

加明显。英国在南非扩张时期正值此地发现大量矿藏之际。1867年有人在开普殖民地的霍普敦拾到一块金钢石，次年，金钢石探掘便沿瓦尔河直至与奥兰治河交汇处一带的沙洲和干地全面铺开。1868年，捕象猎手亨利·哈特利和地质学家卡尔·毛赫宣称，在恩德贝勒地区和恩瓜托地区之间以及马绍纳兰蕴藏有黄金。尽管这次发现的金矿事后证实基本上是一种幻觉，当初却在南非和英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金钢石开采则迅速发展成为南非的一个主要产业。

比勒陀利乌斯总统管辖下的国家似乎经常陷于贫困，他看到可以摆脱困境的良机，便大力扩展疆域，几乎囊括所有已经探明的矿藏地带，并且获得了一个出海口岸。他在1868年4月宣布其共和国北边和西面疆界扩展到恩加米湖，东端延伸至德拉瓜湾南缘的一小段沿海地带。葡萄牙人当时占据着德拉瓜湾附近一个小村马普托，英国传教士和商人前往中部非洲的必经之路因此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强烈抗议，并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阻止布尔人的扩张。1869年比勒陀利乌斯放弃了其领土扩张的野心。

发现金钢石的同时也引发了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沃特布尔统治的西格里夸兰、罗隆人以及特拉平人等几个方面的领土之争。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双方都宣称拥有哈茨河与瓦尔河之间的领土，从而产生了冲突。布兰德总统随即退让，以博得德兰士瓦总统比勒托利乌斯的欢心。德兰士瓦方面和几个非洲人国家则请英国驻纳塔尔副总督罗伯特·基特裁决他们的领土争端，结果是比勒陀利乌斯败于非洲人。布兰德也吁请裁决自由邦和西格里夸兰之间的领土争议。英国生怕自己在南非的最高权力受到挑战，拒绝出面裁决。沃特布尔便要求英国予以保护，于是，英国在1871年10月27日不仅兼并了西格里夸兰，并且吞并了其它所有的金钢石矿区。

英国宣布将莱索托收作保护国，布兰德认为英国人选择这个时间采取行动是为了防止布尔人征服和吞并莱索托，限制德兰士瓦扩张领土，并从布尔人手中夺走金钢石矿区。这一切都使布尔人怀恨在心，多年之后仍拒绝与英国人合作，实际上这倒促使他们下决心抵抗，绝不屈服于武力，再受英国的统治。英国在南非洲重新扩张的这个阶段在历史学家中间引起许多争论。安东尼·阿特莫尔和舒拉·马克斯[28]简要概述了现今各种观点，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果引起更多人研究这一问题。[29]

166

阿特莫尔和马克斯认为，R. 鲁宾逊和J. 加拉格尔等主要依据“官方档案”的学者普遍认识到19世纪后期英国帝国主义政策中各种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对事件叙述之后却调转笔锋，从不进行深入确切的经济分析，无论是谈南非问题还是其它地区都是如此。”相反，持“正统观点”的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扩张归根结底不过是决策者身不由己，进入非洲(包括南非)腹地去制止在其正式殖民属地或非正式帝国领地的“边疆”或“边缘”地区爆发的“危机或紧急局势”。但是阿特莫尔和马克斯指出，那些学者忽略的正是对这些危机的透彻分析，而这些危机的发生最后证明对英帝国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实际上只要研究一下这些危机，就可以发现其发生同“在日益工业化的英国的需求压力之下，地方当

---

[28] A. 阿特莫尔和S. 马克斯，1974年；又见C. de B. 韦布，1981年，他把马克斯和阿特莫尔的“激进”观点与那些“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点区分开来。

[29] 见如S. 马克斯和A. 阿特莫尔(编)的论文选集及颇具启迪的绪论，1980年。

局不堪重负而崩溃直接相关”。19 世纪早期，这种压力主要落在南非东部沿海地带，那里活跃着工业化英国的非正式代理人，如传教士、商人和行政官员。但是到了 19 世纪后期，内地发现了许多矿藏，工业化英国的需求迅速转向内地，非洲人国家和布尔人共和国都受到了压力。因此，尽管开普地区在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在 19 世纪后期仍然影响着英帝国在南非的政策，但英国在次大陆日益扩大的经济利益却更为重要。

英国这些经济利益需要非洲人提供大量劳动力，如果非洲人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立地位和经济自给自足，英国的利益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必须消灭非洲人的各个王国，使其国民成为无产者。南非迅速实现工业化，白人国家也得屈居从属地位，因为英国的各殖民地和布尔人共和国不能“有效地发挥合作者的作用”。这种估价得出的结论则是“局势”极其“复杂和混乱”，再加上其它原因，英国政府力图在南非促成建立一个附属的联邦，以便保障英国的利益。持“正统观点”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又用英国殖民大臣卡那封勋爵和驻南非总督兼高级专员巴特尔·弗里尔爵士的个性特点来解释联邦政策的创始和实施。这一政策最终导致德兰士瓦被兼并、祖鲁王国的衰亡和佩迪国家的毁灭。持上述观点最著名的学者是 C.F. 古德费洛。[50] 阿特莫尔和马克斯则认为，尽管事实上很可能如此，但是关键在于实施联邦政策几乎是唯一可以既保护英国的利益又能满足南非社会经济迫切需要的解决办法。

167

因此，兼并德兰士瓦有可能是为了释放因 1873 和 1874 年实行通行证法而受到束缚的非洲人劳动力，从而使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到金钢石矿区和开普殖民地的铁路工地。另外，德兰士瓦因允许英国及殖民地的土地投机商向在农场占地建房的非洲农户收取租金牟利，也阻碍了非洲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擅自占地的非洲人由于拥有足够的耕地，满足自己的消费之外还能出售部分农产品，换回现金，支付税金，因此并不打算向矿主和其他白人雇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鉴于上述原因，德兰士瓦和因军事体制阻碍劳动力供给的祖鲁王国一样，不得不予以消灭。

诺曼·埃瑟林顿[51] 证实了阿特莫尔和马克斯言之有理。他指出，在发现金钢石以后，吸引了次大陆各地的非洲人劳动力，包括来自当今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非洲人，然而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和祖鲁王国却阻碍了这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外，在 19 世纪 70 年代作为英国决策者和执行者集团主要信息来源的谢普斯通，当时所考虑的不仅是立即解决向英国资本家提供非洲人劳力问题，而且要进一步寻求建立白人国家联邦并实行共同的对待非洲人政策这一整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一些关于英国在南非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记述显然忽视了这个地区在经济上对英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一问题。随着 19 世纪 60 年代末金钢石的发现和有关金矿的报道，这种趋势愈加明显，而到 80 年代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开采动工时更是有目共睹。

1871-1874 年间，英国政府力图将南非诸国合成一个联邦，从而以劝说的方式即可保障其在南非的利益。英国准许开普殖民地设立责任政策时，满心希望开普殖民地会接管莱索

---

[50] C.F. 古德费洛(Goodfellow)，1966 年。
[51] N. 埃瑟林顿(Etherington)，1979 年。

托的劳动力资源以及金钢石矿藏丰富的西格里夸兰，这样开普便可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吸引其他白人移民前来加入。然而英国却大失所望，因为开普政府只同意兼并莱索托，却不肯接受西格里夸兰。开普政府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开普拥有大量布尔人，他们同情那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从未放弃它们对金钢石矿区所有权的要求。到1873年年中，英国殖民大臣金伯利勋爵不得不承认，金钢石矿区所有权之争是成立南非联邦的拦路石，因而不再强求。[32]

1874年2月，卡那封勋爵接替金伯利勋爵，他重提联邦政策，并于1875年5月4日正式推行。这一举措似乎是防止南非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唯一办法。当时，西格里夸兰就是整个南非的缩影，劳动力供应极为缺乏，帝国防务和行政费用昂贵，领土纠纷不休，非洲人轻而易举便可得到枪支，继而为保卫自己的独立调转枪口对准白人。当时兰加利巴勒勒酋长领导的起义尚未平息，纳塔尔白人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显示出白人国家独自对付不难获得枪支的非洲人势单力薄，危险重重。

赫卢比族酋长兰加利巴勒勒在1873年拒绝让其属民登记他们辛苦得来的枪支。这些武器主要来自金钢石矿区。纳塔尔政府视此为反叛之举，谢普斯通和副总督遂召集军队侵入兰加利巴勒勒王国。这位赫卢比酋长逃到莱索托，却被索托族酋长莫拉波所出卖，将他交还给其死敌。纳塔尔士兵同赫卢比人及其邻族只交战一次，打不过便望风而逃，其中一些人被杀身亡。但是，纳塔尔政府最后却采用极为卑鄙的手段报复赫卢比人。甚至早在抓获兰加利巴勒勒酋长之前，纳塔尔政府已经采取了轻罪重罚的措施。他的酋长领地被取消，牛群马匹被没收，土地被夺走，子民被分给农场主当契约劳工。最后对酋长草草审判定罪，处以终生流放，关押在罗奔岛。

当时只有纳塔尔圣公会主教约翰·威廉·科伦索坚决为这位赫卢比酋长辩护，他的论点甚至令英国政府也深受触动，因为英国政府相当清楚，白人如此不公正地处置赫卢比人，实际是由于过分害怕黑人。兰加利巴勒勒在起事之前，或是传说他要起义之前，的确曾同索托人、恩德贝勒人、祖鲁人都有过联络。这就进一步令人担心非洲人会联合起来举行大规模起义反对南非各据一方的白人。卡那封勋爵听从谢普斯通和其他人的建议，认为联邦制是解决南非这座“恐怖迷宫”的唯一方案。[33]

作为第一步，卡那封勋爵设法任命刚在库马西打败阿散蒂人后归来的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前往解决纳塔尔的困难局面。沃尔斯利受命代表英国政府主管非洲人事务，并要推迟建立白人责任政府以准备建立南非联邦。[34]由于决定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卡那封便以应允解决金钢石矿区所有权争议为诱饵来安抚布尔人。他在1875年建议各殖民地和两个共和国一起开会，先讨论诸如制定共同对付非洲人的政策和解除领土方面的误解等次要问题，然后解决成立联邦这一主要问题。但是他过于粗心，提名与会代表时，邀请反对派领袖、分离主义者约翰·佩特森和约翰·查尔斯·莫尔特诺总理分别代表开普东部和西部地区出席

[32] C.W. 德基威特(De Kiewiet)，1937年，第2章；C.F. 古德费洛，1966年，第3章。

[33] E.H. 布鲁克斯和C.de B. 韦布，1965年，第113-120页；N.A. 埃瑟林顿，1979年，第246-247页；N.A. 埃瑟林顿，1981年，第34-37页。

[34] C.F. 古德费洛，1966年，第62页。

会议，使人误以为支持开普殖民地的分裂，因而铸成大错。结果，开普殖民地政府和仍在痛惜丧失了金钢石矿区所有权的布尔人两共和国都拒绝参加会议，只有纳塔尔和西格里夸兰愿意与会。

这次努力失败之后，卡那封又于1876年8月在伦敦召集各方开会，又未成功。奥兰治自由邦总统布兰德经过谈判放弃了对金钢石矿区所有权的要求，得到九万英镑的补偿金，但他拒绝参加关于联邦的讨论。莫尔特诺总理当时正巧也在伦敦，但他对英帝国的干预极为敏感，戒心十足地捍卫本国的责任政府地位。他声称没有得到其政府的授权，也拒绝出席会议。只有西格里夸兰和纳塔尔派人前来英国开会，因而又是一事无成。第二次的失败使得卡那封的"耐心、爱国心和自尊心都已经达到了极限"。[55] 他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来统一南非。

卡那封勋爵的第一个目标是德兰士瓦。1876年9月他接到高级专员的电报，言过其实地报称德兰士瓦正面临塞胡胡尼手下佩迪人进攻的危险，[56]卡那封的机会来了。德兰士瓦人出于多种原因在1876年5月向佩迪人开战。60年代和70年代初，佩迪族的人口和势力迅速发展。邻近许多非洲人社群希望摆脱布尔人强加的税收和劳力征募，纷纷依附于佩迪王国。还有一些非洲人则不得不听命于佩迪王国。前文已经提到，佩迪人还在积极建立独自的武器供应渠道。佩迪人口的增加直接剥夺了布尔人的劳动力资源。当佩迪人扩展其领土而进入有争议地区时，同莱登堡白人发生冲突。由于佩迪王子约翰尼斯·丁克万亚尼不让一布尔人占据土地，接着又有一支佩迪人迫使某个柏林传教布道区的非洲人离去，于是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德兰士瓦总统J.J.布格斯当时正在四处请求贷款修建通向海边的铁路，他决定平息佩迪人的骚扰，以便增强前来本国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布格斯也不能对莱登堡居民的要求置之不理，他们呼吁对"令人讨厌的"近邻佩迪国采取强硬措施，因此布格斯率其国民兴师进军。[57] 170

布格斯在斯威士人的协助之下分兵三路攻打塞胡胡尼驻守的卢卢山群堡。斯威士人和莱登堡人从东面首先进击丁克万亚尼王子守卫的要塞。同时，布格斯亲自带领民团从西边一路扫荡而来。他们计划从上述两面夹击，再加上第三支部队，最终集结合击，大败塞胡胡尼。由于布尔人不过摆摆样子，无心恋战，主要让斯威士人去冲锋陷阵，结果斯威士人伤亡惨重，退出战斗。他们刚一收兵，布尔人的士气便一落千丈，临阵脱逃，根本谈不上围攻塞胡胡尼的城堡。布尔人爱国热情不高的深层原因是他们极为怨恨布格斯，指责他搞异端邪说、教育政策不当和经济规划失算。另外，西部各区的布尔人并不像东部的莱登堡居民那样热心于针对佩迪人的战争，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受到佩迪人压力和抵抗的影响，而且从这场战争中似乎也得不到什么个人好处。[58]

布格斯撤兵之后，当地的布尔人继续侵扰塞胡胡尼，当时又正值播种季节，于是塞胡胡尼便同意谈判达成停火协议。菲利浦·邦纳正确地指出，布尔人和佩迪人在这场战争中

---

[55] 同上，第110页。
[56] 同上，第114页。
[57] P. 邦纳(Bonner)，1983年，第137-140页。
[58] 同上，第143页

都不是战败者，“当时形成了僵持局面，交战双方都不具有绝对的优势。”[39]直到1879年，英国人加上其盟友斯威士人才得以在兵力上压倒佩迪王国，捕获了塞胡胡尼。[40]

然而，英国人认为1876年布尔人这次惨败是一场彻底的大失败，预示着德兰士瓦的瓦解。卡那封任命谢普斯通为驻德兰士瓦特派专员，1876年10月9日又授权他接管该共和国，毫不考虑德兰士瓦立法机构同意与否。关于英国吞并德兰士瓦的动机有种种说法。德171兰士瓦以富有矿藏资源而闻名，有可能会成为南非的首富地区。德兰士瓦共和国阻碍了国内以及邻近地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德兰士瓦政府还威胁要修筑通往德拉瓜湾的铁路，从而它不仅可以不再依赖英殖民地各港口，而且可以通过与外国建立关系而对英国最高权力提出挑战。卡那封还打算在兼并德兰士瓦之后，就可以包围奥兰治自由邦，从而逼其就范。谢普斯通于1877年4月12日接管德兰士瓦，虽然略失智谋，也欠考虑没有安抚布尔人，但是相对而言还算顺利。原因在于德兰士瓦共和国正衰落崩溃，总统本人也不得民心。[41]卡那封兼并德兰士瓦之后便任命巴特尔·弗里尔爵士任总督兼高级专员，以便“落实其联邦方案”。[42]

弗里尔的任务远非轻而易举。开普殖民地拒绝在结成联邦中打头阵；开普领导人认为英国人力图让他们带头是对开普责任政府的过度干涉。奥兰治自由邦也不愿意被拉入联邦。1878年弗里尔邀请自由邦领导人出席会议讨论此事，布兰德总统答复说自由邦各方面都井然有序，其领导人决不打算丧失本国的独立。根据原先兼并德兰士瓦的安排，英国本可强迫它同其它国家合成一体。但是，谢普斯通政府安抚布尔人未果，因此他们一如既往地固执己见，始终要求分离独立。另外，由于谢普斯通本人深深地卷入了德兰士瓦和祖鲁兰之间的边界争端，1878年他就建立联邦问题回答称：“几乎无暇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因此谈不出什么看法”，并要求“稍给喘息之机”。[43]当时只有纳塔尔愿意讨论联邦问题。结果，卡那封被迫因一件与南非毫无关系的事情于1878年1月辞职，他的联邦之梦远未实现。

从确保英国在南部非洲的利益这一点来看，弗里尔是个理想的人选。此人颇有远见，他想“根据欧洲自治政府模式和征服、教化非洲人的办法”，强行建立南非联邦。[44]“征服”和“教化”的基本含义是将非洲人各族社会改造成为英国和殖民地企业的劳动力储备所和工业化英国的市场，而“欧洲式自治政府”则可以保障英国资本家的投资利益。弗里尔决定首172先解决把非洲方面纳入联邦的问题。他的设想是囊括整个次大陆，因此需要通过建立保护国或武力征服的办法吞并茨瓦纳人、科萨人、祖鲁人、恩德贝勒人和绍纳人的所有地盘。

根据当时情况，祖鲁兰最为重要，可以利用它同德兰士瓦的边界争端制造开战的借口。有争议的领土不仅对弗里尔来说是一个适当的争论点，对英国殖民事务部也是如此。因为这一争端牵涉到纳塔尔、祖鲁兰和德兰士瓦三个方面，而且谢普斯通也陷身其中，他始终怀有占据这块地方的野心。争端起因可以远溯到19世纪50年代。塞奇瓦约酋长在1856年

---

[39] 同上，第144页。
[40] L.汤普森，1971年，第282页。
[41] C.F.J.马勒(编)，1975年，第263-264页。
[42] C.F.古德费洛，1966年，第123页。
[43] 同上，第147页。
[44] 同上，第155页。

消灭了可能同他竞争祖鲁王位的姆布拉齐，奋力保障自己及宗族得以承袭。此后，塞奇瓦约和姆潘达共同秉政，直到后者于1872年去世。但是，塞奇瓦约仍旧害怕姆潘达的另一个儿子姆孔古，此人住在纳塔尔，处于科伦索主教和谢普斯通的庇护之下。塞奇瓦约担忧之事在60年代似乎日渐逼近，当时谣传纳塔尔人可能即将入侵祖鲁兰。流言传到德兰士瓦，当地一些人就想趁火打劫。1861年德兰士瓦有些布尔人传话给塞奇瓦约，意在证实谣言不无实据，然后又主动提出可以保他继位并为他加冕，以此为条件换取争议地带的土地。塞奇瓦约许诺同意，但他从未打算兑现。

与此同时，谢普斯通自50年代起便渴望建立一个白人治理的黑人王国，使其在财政上自给，而且不受布尔移民的干预。他当即抓住这个机会要在争议地带实现他的野心。他一听到布尔人同祖鲁人作交易的风声，立刻前去会见塞奇瓦约，代表纳塔尔政府承认他就是祖鲁王位的继承人。然而此后布尔人开始在乌得勒支区，即争议地带占有农场。祖鲁人并没有用武力驱逐他们，而是要求英国政府接管乌得勒支区，以便在本土同德兰士瓦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段。

多年来，谢普斯通一直敦促英国政府接受祖鲁人的建议，认为这有利于安置纳塔尔过剩的黑人，并能防止德兰士瓦方面通过祖鲁兰得到出海口。他的这一主张到19世纪70年代显得更为重要，当时纳塔尔、开普殖民地和西格里夸兰都面临劳动力短缺。很快便发现，流动劳工都将德兰士瓦、祖鲁兰和那段争议地带作为通道。既然德兰士瓦和祖鲁兰干扰劳工的流动通道，谢普斯通如果能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王国，就会成为最安全的劳工流动走廊。只要谢普斯通打算在那里建立他的黑人国家，他就肯定要支持塞奇瓦约向德兰士瓦提出领土要求，因为他需要祖鲁国王予以合作。事实上这正是他1873年出席塞奇瓦约加冕庆典的原因。

而且，谢普斯通深信，如果英国想要控制南部非洲所有的非洲人国家，首先必须控制和影响祖鲁王国。但是，一俟谢普斯通成为德兰士瓦的统治者之后，他便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布尔人的领土要求。道理很简单："此时此刻他只能支持德兰士瓦的要求，唯此才能保证免费使用这条走廊。"[43] 唯一威胁到他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唯一能够威胁到整个次大陆和平的仍旧是祖鲁王国，因此必须消灭这个国家。在这一点上，弗里尔和英国殖民部看法相同，后者到1874年已经接受了谢普斯通的观点。 **173**

谢普斯通于1878年乘船到纳塔尔，此行目的并非解决领土纠纷，而是利用此事强迫塞奇瓦约打一仗。1878年2月26日，驻纳塔尔副总督亨利·布尔沃爵士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划一条对祖鲁人有利的边界线。但是，弗里尔的实施建议却要求不得驱赶位于边界线祖鲁一侧的布尔农场主，打算以此挑起祖鲁人的强烈反对。

弗里尔利用的第二件事情是西拉约酋长的家族纠纷。西拉约的几个儿子在1878年7月28日追捕酋长的两个妻子，越境进入纳塔尔，将她们抓回祖鲁兰，审判之后处以死刑。纳塔尔政府向塞奇瓦约提出抗议，指责他的臣民侵犯纳塔尔边界，要他把西拉约的儿子送交纳塔尔审判。塞奇瓦约却只送来50英镑罚款，对那些年轻人不负责任的鲁莽举动表示道歉。

---

[43] N.A.埃瑟林顿，1981年，第41页。

弗里尔在1878年12月借题发挥，指控塞奇瓦约蔑视纳塔尔政府，责令他赔偿500头牛，并且要他交出西拉约家族罪犯。直到战争爆发之时，塞奇瓦约仍在征集牛群以偿还罚款。

1878年9月，两名纳塔尔白人迷路误入祖鲁兰，祖鲁边防士兵态度粗暴，但是并没有伤害他们。弗里尔却小题大作，称这是"奇耻大辱和严重暴行，理应严加惩罚"。[46] 另外，弗里尔声称塞奇瓦约曾威逼传教士离开他的王国，现在他必须允许传教士返回教区，不得干扰他们传教。很有可能这些传教士是听从谢普斯通的建议才离开祖鲁兰，他知道战争马上就要打响，1877年他就曾这样干过。[47]

1878年12月11日，最后通牒送达祖鲁各位代表手中，强令解散祖鲁军队，接受一名英国驻节官员，恢复所有传教活动，就各种据称侵犯纳塔尔边界和纳塔尔人的行为缴付罚款，[48] 最后通牒的要求甚多，在规定的二三十天内根本不可能予以满足。时限刚过，陆军中将切姆斯福德勋爵便在1879年1月10日率领英军入侵祖鲁王国。

174 切姆斯福德指挥着15,000士兵的部队，其中许多是在纳塔尔征募来的非洲人；塞奇瓦约的兵力约有45,000人。英军的优势主要在于武器精良，尤其同战壕、牛车阵或沙袋墙等防御工事结合使用更具威力。而祖鲁人用的是长矛和盾牌，枪支有限，军事技术和有关培训还没有包括枪支的使用。盾牌在枪弹面前毫无作用。长矛在短兵相接之时虽足以致敌于死地，但是英军不容祖鲁人发挥这种优势，从远处便开枪射击。祖鲁人每次作战都极力逼近敌军，但是几乎总是伤亡惨重。只有1879年1月22日在伊桑德尔瓦纳的空旷地带，祖鲁人才截住一支英军分队，彻底打败了他们。切姆斯福德最后于1879年7月7日在乌伦迪大败祖鲁人，这场战争终告结束。英国人四处搜捕塞奇瓦约，在8月份抓到他后用船押送到开普敦关押。

杰夫·盖伊指出，乌伦迪一仗败北并未导致祖鲁王国的灭亡。最终摧毁这个王国的是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的政治方案。当时他受命出任驻东南部非洲地区高级专员，拥有管辖纳塔尔、德兰士瓦和祖鲁兰的行政和军事最高权力。1879年7月4日他接替切姆斯福德勋爵的职位。他并没有采取吞并祖鲁兰的办法，而是把它分为13个独立的酋长领地。一些新任酋长几乎无法实行统治，因为许多战前的领导人被排除在新政体之外，自然起来抑制这种安排。新酋长们诉诸暴力强行统治，杀戮大量子民，全国一片混乱，结果内战肆虐，一直打到19世纪80年代。[49]

与此同时，这场祖鲁战争原定目标无一实现。原来主要想借此一战作为把非洲人诸国合成联邦的序幕，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如前面所述，弗里尔是在当地推行这一计划的主谋，但他却被沃尔斯利所取代，后者受命不惜放弃联邦方案也要创立和平。另外，祖鲁战争之后又爆发了英布战争(1880-1881年)和开普-莱索托战争(1880-1881年)，最终葬送了联邦计划。

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决不愿意丧失独立，一连三年采取和平方式力图说服英国人撤走，然

[46] E.H. 布鲁克斯和C. de B. 韦布，1965年，第133页。
[47] N.A. 埃瑟林顿，1981年，第42页。
[48] E. 布鲁克斯和C. de B. 韦布，1965年，第134页。
[49] J.J. 盖伊，1980年，第3、4、5章；J.J. 盖伊，1981年。

而屡试屡败，更加坚定了他们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政权的决心。1877 年他们派一代表团前往伦敦抗议兼并行动。卡那封勋爵断然拒绝考虑改变兼并的立场，不过准备同代表团讨论布 **175** 尔人在南非联邦内部实行自治的问题。代表团中最重要的代表保罗·克留格尔要求举行全民投票，由布尔人决定在英国管辖之下他们要什么样的政府，但他表示绝不谈任何有关联邦的事。[50] 1877 年底，代表们在比勒陀利亚一次集会上报告他们的使命毫无收效时，许多布尔人当场要求进行武装抵抗斗争。但是领导人似乎深信，只要全民投票的结果表明布尔人坚决反对兼并，卡那封就会允许他们独立。全民投票如期举行，绝大多数布尔人拒绝接受英国统治。

第二个代表团受命前往伦敦向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详细阐明布尔人的观点。比奇刚接替卡那封勋爵出任殖民事务大臣，新大臣再次拒绝放弃德兰士瓦。代表团回国后在群众大会上通报情况，人们要求打一场解放战争的呼声超过以往。然而领导人仍旧坚持应竭尽全力用和平手段实现独立。但是在散会之前，他们派一位特使前往纳塔尔会晤弗里尔，同时庄重申明誓死恢复德兰士瓦共和国。弗里尔北上德兰士瓦同布尔人谈判，他依旧强调他们可以在英国统治之下实行自治，并能得到经济援助，其它一概不予考虑。他还同意向英国政府转交一份新的请愿书，然而也还是毫无结果。

接着，欧文·兰扬和沃尔斯利在 1879 年 3 月分别接替谢普斯通和弗里尔之职。兰扬对德兰士瓦的了解很有限，沃尔斯利则是一个不相信外交只懂得暴力的军人。这两位官员采取的行动进一步坚定了布尔人的决心，力争用武力夺回自己的独立。1879 年 12 月 15 日，6000 多布尔人在旺德方丹举行盛大集会，决定摈弃以和平求独立的方式，拒绝接受英国子民的地位，并尽快成立共和国政府。沃尔斯利下令逮捕他所认为的叛乱头目。责令他们交钱才得保释。此时，布尔人开始将希望寄托于英国新上台的自由党政府，其领袖格莱斯顿在野时曾表示同情德兰士瓦的独立要求。然而，当他们请他履行诺言时，格莱斯顿却和他的历届前任首相一样，告诉布尔人他们最多只能在联邦体制内实行自治。

1880 年 12 月，布尔人忍无可忍，单方面宣布恢复共和国政府，暂时在新都海德堡办公。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有保罗·克留格尔，皮特·朱伯特和 M. W. 比勒陀利乌斯。12 月 16 日由于兰扬拒绝通过和平方式放弃德兰士瓦的治理权，战争终于爆发。这场战争从 12 月打到 **176** 1 月，最后到 1881 年 2 月 27 日，布尔人在阿马朱巴山地与英军作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881 年 8 月签署了比勒陀利亚协定，停战讲和。根据和约，尽管英国人未能实现将德兰士瓦同其它殖民地和奥兰治自由邦并成一个联邦的最高目标，但还是获得了对非洲人劳动力的控制权，可以派一名驻节官员到比勒陀利亚监督布尔人统治非洲人。其次，英国人控制了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外交，并有权在战时在该国自由驻扎和调动军队及装备，从而保证了英帝国在德兰士瓦的总体最高权威。布尔人赢得了自治权，事实证明这是进一步争取自由的一个步骤。经一系列谈判之后，他们又于 1884 年 2 月 27 日达成伦敦协定，英国放弃了控制非洲人的权利，但仍保留控制德兰士瓦共和国外交的大权。[51]

---

[50] C.F. 古德费洛，1966 年，第 141-144 页。

[51] C.F.J. 马勒(编)，1975 年，第 264-272 页；C.F. 古德费洛，1966 年，第 198-213 页；L. 汤普森，1971 年 b；F.A. 范亚尔斯韦尔德，1961 年。



图片 7.1 布尔人民团，约 1880 年

177 正当帝国军队奋力平定布尔人起义之时，开普殖民军于 1880 年 9 月 13 日发动了针对索托人的战争。同首次英布战争一样，发生在莱索托的武装冲突也和英国力图实现南非联邦计划直接相关。开普殖民地政府和驻开普英国官员都想解除非洲人各国的武装，以此作为建立联邦的第一步。索托人反对英国单方面解除他们的武装，因而导致了 1880-1881 年的开普-索托之战。

1872 年以后，莱索托归属开普殖民当局管辖。接替莫尔特诺出任开普总理的戈登·斯普里格与弗里尔互相勾结，策动开普议会在 1878 年通过和平保障法案，这实际上是建立南非联邦的一个步骤。这项立法授权开普政府下令让开普殖民地的非洲人上缴武器，政府予以补偿。该法案起初并不适用莱索托，但是斯普里格知道索托人掌握大量枪支，便决定也在莱索托实施这项法案。

对索托人来讲，枪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些枪支是他们到金钢石矿区做工攒钱买来的，因而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务投资。索托人珍惜自己的枪支还在于以后可用枪保卫自己的王国，他们长期同奥兰治自由邦进行斗争的历史早已证实了这一点。在索托族社会，男子拥有枪支标志着他已从少年长大成人。索托人也怀疑开普政府并不完全信任他们。另外，索托族酋长们怀疑开普政府企图削弱他们的力量，以便把索托人变成奴隶。索托人奋起进行武装抵抗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如在 1879 年开普殖民地拟将克卢辛地区割让给白人农场主，作为对当地索托酋长莫罗西此前不久进行叛乱的惩罚。

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英国人对莫舒舒许下的诺言：不得割让其国土的任何一部分。更有甚者，开普政府还宣布将茅屋税增至一英镑，索托人根本不能接受，因为开普殖民地不久前刚从莱索托帐户上掠走了12，000英镑。

索托人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同开普殖民地达成谅解。斯普里格两次来到莱索托，讨论上述大部分问题。索托人当面向他提出抗议，并向英国总督和女王送交请愿书，还派代表到开普敦游说议员们，然而这一切努力均未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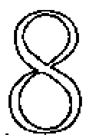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莱索托的权力已从国王（此时已改称大酋长）利齐耶手中转到各位酋长手中。国王年事已高，尽管反对开普当局解除莱索托的武装以及其它一些殖民措施，他却极为害怕武装抵抗可能赶走英国人，但却使莱索托面临奥兰治自由邦的威胁，由此带来不利的后果。因此，他退出民众要求进行武装斗争的呼声，反而呼吁臣民采用和平方式抗议。结果，**178** 大多数人支持莱罗托利、马索法和乔尔三位酋长，他们发誓要诉诸暴力反抗开普政府，鼓励属民严惩支持殖民当局的人，捣毁或没收他们的财产，不服从地方长官的命令。

1880年9月13日，开普出兵莱索托，战争持续达七个月之久。对开普政府来说，战争开支大幅度增加，飞涨到300万英镑，根本承受不起。此时新任总督兼高级专员赫尔克里士·鲁宾逊爵士急于向索托人求和。索托人鏖兵七个月后也已厌战思和，因此同意媾和。总督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1881年4月29日作出裁决。他在裁决令中仍旧要求索托人有偿上缴枪支，但又补充道，只要登记注册可以保留枪支。命令实行全面大赦，但是“叛乱者”必须缴纳5000头牛的罚金，补偿“忠顺者”和商人在战争中损失的财产。因此，总的来讲，索托人打赢了这场战争，因为他们参战主要就是为了保留枪支。领导属民打了胜仗的酋长们声望倍增，国王在国家亟需领袖人物坚决抗战之时却犹豫动摇，自然威信扫地。而且开普政府决定通过酋长们来推行其新的政策，这对索托酋长们来讲的确是双重胜利。[52]

莱索托打了胜仗，祖鲁王国顶住了兼并，德兰士瓦获准实行自治，这些都标志着英国在这一地区强行建立联邦的努力就此罢手。英国政府暂时满足于对南非各个部分实行松散的控制，主要通过委派驻节官员监视局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金矿之后，英国重又力图大大加强控制。非洲人则认为英国人已经大大削弱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在东面，大量科萨人、姆丰古人和科伊科伊人居住的西斯凯完全隶属于开普殖民地。索托人也不例外，尽管他们在莱索托境内的自由更多一些。西格里夸兰同样丧失了主权。祖鲁人和佩迪人被逼上自我毁灭之路。塞胡胡尼被捕，其竞争对手马姆普鲁被立作首领，这意味着佩迪王国势必因派系争斗而四分五裂，因此保证从属于德兰士瓦。

（舒 展译）

[52] S. 伯曼(Burman)，1981年，第9-12章。



赞比西盆地诸国

A. F. 伊萨克曼

179 本章① 论述自 19 世纪开始直至 1875 年这段时期中部非洲变迁的一般模式。该地区包括当今马拉维、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三国，论述的重点放在赞比西河流域。从经济和文化交往来讲，这里是个重要地区，也是绍纳和隆达两大族系建立的许多主要国家的原址故地。本章并非仅仅描述殖民以前众多王国的历史，我们将研究整个地区，特别是由于该地区逐渐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恩古尼-索托族离析迁徙带来的各种变革。所有这些情况改变了中部非洲的政治版图，促成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尽管我们着重研究上述外部因素，但是该地区各个社会绝非静止不变的，每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形态既决定了当地人最初同外来商贾和入侵外族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也决定了最终的变革方向。本章开篇首先回顾 18 世纪末期的中部非洲，以便为此后的发展勾画出恰当的历史背景。同样，本章结尾则概述欧洲列强"大角逐"前夕的这一地区，因为 19 世纪的种种变迁，对此后中部非洲对付欧洲帝国主义的方式具有重大意义。

19 世纪前夜

虽然 19 世纪的经济巨变和恩古尼-索托族的多次入侵(通常被称为姆菲卡尼)给中部非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些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做是 19 世纪之前该地区政治和经济变革更为普遍的模式的组成部分。② 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族群的迁徙、国家的形成和长途贸易体系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中部非洲各个社会的原有状态。19 世纪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变革本身，而在于变革速度相对迅急以及变革带来的深远影响。

180

早在 19 世纪之前，赞比西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就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政治革命。绍纳族和隆达族各个支系先后在以往规模较小的农业社会所占据的大部分地区崛起。除了莫桑比克南部的通加人、当今马拉维境内的通布卡人和(尼亚萨)湖畔的通加人所占边缘地带保持着自治，当地大多数社会都被卷进绍纳族或隆达族的政权体系。

国家形成的进程很可能始于赞比西河以南地带。16 世纪初期，从当今津巴布韦来到此处的绍纳语族移民已经强行统治了自赞比西河沿岸一带向南直至萨比河的大片地区。这一

---

① 1975 年受托着手撰写本章，1976 年初完稿，1981 年又经补充。我感谢巴巴拉·伊萨克曼(Barbara Isaacman)、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和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他们对本章初稿提出了深刻的评论意见。

② 例如，J. D. 奥麦尔-库珀(Omer-Cooper)，1966 年，曾论证这些事态是中部非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

强大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姆韦尼马塔帕王，绍纳帝国因其而得名。尽管此后一系列战争削弱了姆韦尼马塔帕王的权势，一些地方首领脱离帝国各建独立王国，但是绍纳族仍旧在这一地区称雄称霸。独立的绍纳国家中最强盛的有巴鲁埃、马尼卡、基泰韦、昌加米腊，它们在19世纪以前一直有效地控制着莫桑比克南部和中部地区。在这一带，外国人只是沿赞比西河南岸侵占了一些地方。葡萄牙和果阿移民及商贾在那里建立了王室庄园，称为王室普拉佐(prazos da coroa)，名义上归属里斯本的殖民帝国政府。[3]

来自加丹加地区的隆达族各支系稍晚一些时候才开始扩展其地盘，但是直到19世纪开始几十年也尚未成功。首批隆达移民是洛齐人，两个世纪前便在肥沃的赞比西河冲积平原定居下来。不少移民接踵而至，在当今马拉维建立了卡隆加和翁迪两个王国，再往西去的几个王国后来演变为拉拉人、森加人和本巴人的国家。1740年，最后一批以隆达移民为主的姆瓦塔-卡曾贝人定居在卢阿普拉地区。18世纪以后的几十年间，隆达族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不仅巩固了地盘，而且拓展了疆域。时至1800年，翁迪、卡隆加和洛齐等隆达族系移民建立的国家达到了鼎盛阶段，本巴人等其他族人则仍在继续扩展国土。[4]

182 绍纳族和隆达族的国家结构组织原则相似，只有细微的差别。国家政权之首是国王，据信具有神圣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或者是作为王位继承人与生俱来，或者通过受封仪式获得。统治者与超自然的神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到巫师和祭司的认可，使他可以保障臣民的健康和福祉，以及国土富饶。国王同富庶直接相关，这是统治者拥有神秘力量的基础，从而加强了国王的象征性主人和土地的神圣守护人的地位。他因此掌有分配土地的专门权力，这是驾驭所辖酋长和控制其他臣民的基础，并且形成一种互惠的社会关系。属民们为了报答国王准许使用他的土地和受惠于他的神力，必须付出特定的税赋、劳役和贡品，各个王国的规定并不相同。在绍纳和隆达两种国家制度下，大象死后最大的那只象牙自然归属身为国土主人的君王。在马尼卡、翁迪和卡曾贝的隆达等国家，君主从理论上讲还垄断着商业贸易；在昌加米腊王国，统治者是境内大多数牛群的最终主人。[5]征收贡品、征用劳役和管辖商贸增加了君主的权力和财富，他把攫取来的部分剩余分给主要的官吏以确保属下始终效忠自己。就此而言，殖民之前的中部非洲诸国政权机构控制了稀少的资源，使之从被统治阶级那里流向统治阶级手中。[6]

尽管具有这些统一全境的仪式和制度，仍有一系列因素妨碍高度集权型王国的发展。其

---

③ 关于赞比西河一带"普拉佐"制度的论述，见A. 伊萨克曼(Isaacman)，1972年a；M. D. D. 纽伊特(Newitt)，1973年a。

④ 关于隆达人扩张的概述，见H. W. 朗沃西(Langworthy)，1973年，第16-27页。

⑤ 有关"贸易和政治命题"的评论以及牛群在昌加米腊王国的重要性的讨论，见S. I. 穆登盖(Mudenge)，1974年。

⑥ 我用"统治阶级"一词来指占用剩余资源的贵族及其宗教和商界同伙。他们统治了中部非洲各国，控制了稀少的资源。由于没有专门从历史角度去分析中部非洲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著，特别是缺乏有关"何人为何人生产什么"(即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详细论述，根本不可能确切地描述本文所涉及的各国阶级构成的实际情况。在进行这种综合分析之前，需要详尽地调查特定政治实体的情况，才能确定统治阶级如何控制稀少的资源以及如何实现再生产，确定他们控制和剥夺劳动阶级的程度和方式，确定这些盘剥方式对截然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形成发挥多大程度的影响。

C. 科克里-维德罗维奇(Coquery-Vidrovitch)，1972年，C. 梅亚苏(Meillassoux)，1974年，E. 泰雷(Terray)，1972年，M. 戈德利耶(Godelier)，1975年，虽然他们著作的观点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分析阶级形成的理论方面确实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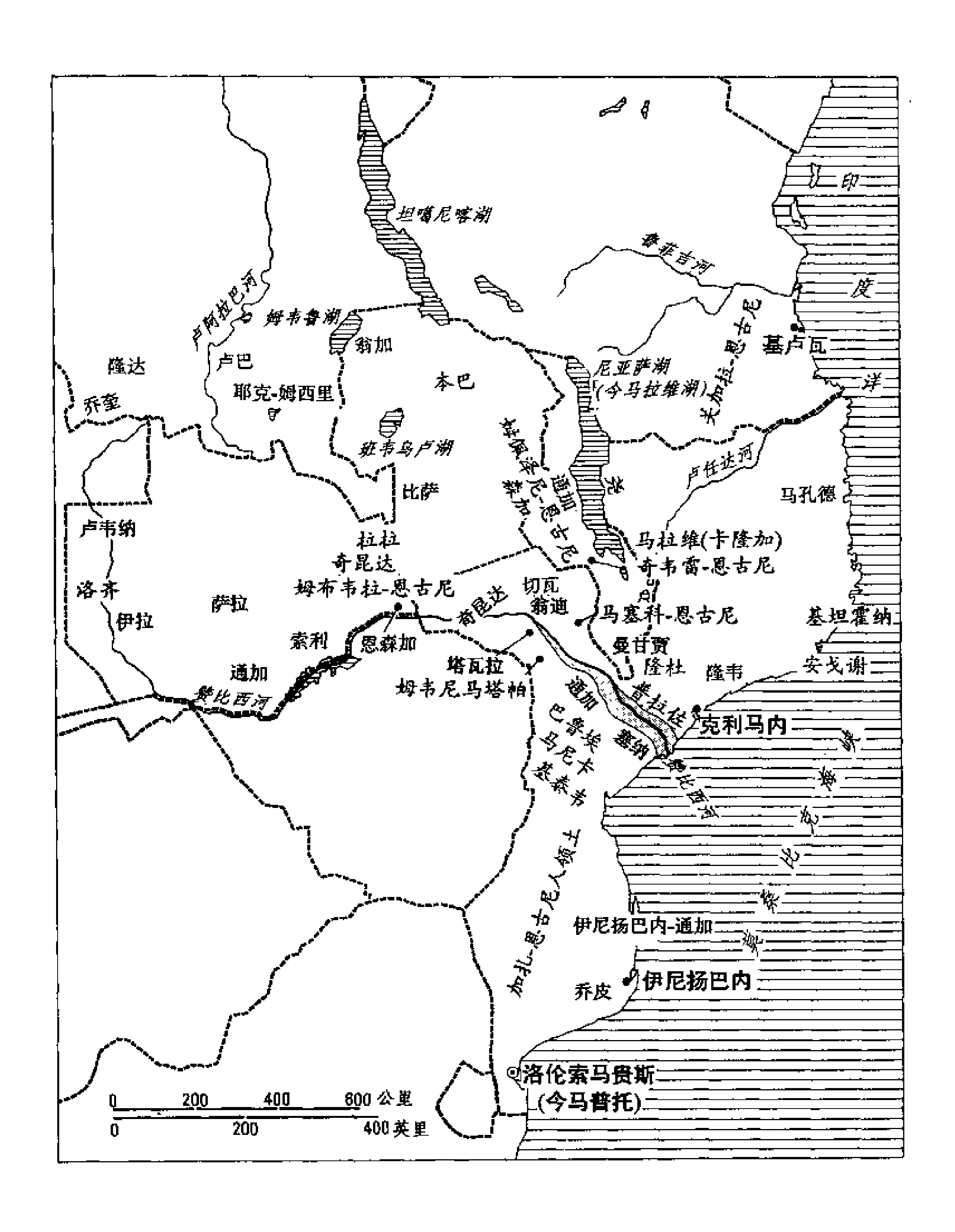


图 8.1　中部非洲的民族与政治，约 1800-1880 年（仿照 A.F. 伊萨克曼图）

中有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包括王国首都经常出现继位危机，偏远地区官员不肯牺牲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屈从于中央政权，针对那些违背“法治”、镇压成性的领导人而爆发的暴动，缺乏种族和文化同一性，没有常备军来维护王国广大领土的治安。上述一些因素导致 **183** 这些国家一再发生形式各异的冲突与分裂。例如巴鲁埃、马尼卡、基泰韦和昌加米腊等绍纳国家都从姆韦尼马塔帕帝国中独立出来，结果本国内部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7]赞比西河以北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特别是在马拉维人的卡隆加、翁迪和隆杜等王国尤为突出。[8]尽管许多国家十分脆弱，但也不应忽视地方上亲族和社团关系网络的牢固性，这种关系在危急时刻构成效忠与扶助的社会基础。[9]

同19世纪之前发生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变革一样，早在19世纪扩张时代之前，整个中部非洲已经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网络。虽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当地各社会的特征是“维持生存为主”，但是经营铁、盐、布、谷物等基本商品的交易在当地经济活动中已经习以为常，并且是当地农业生产的补充。[10]因此，虽然大多数塞纳人以务农为主，但少数从事纺织的人，定期将布匹出口到几百公里外的宗博地区和切瓦人家园，销路极好。[11]同样，比萨商贩在整个18世纪都从事大规模的铁器生意，[12]卡松古的切瓦人食盐有余，便用以换取通布卡人的锄头，[13]而洛齐国的经济基础就是在王国境内不同地区之间进行牛、鱼以及各种制成品和农产品的交易。[14]仍旧需要详细调查的并非当时有没有剩余物资的交易，而是创造出这种剩余的生产体制的特征。

这种当地和地区间的商业格局，在规模不大的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支撑下，促进了内地和沿海地区贸易的持续发展。尽管有关资料零散不全，但是显然在17、18两个世纪里已经在各地商贸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国际网络，当地商贩为印度人和穆斯林商业资本所控制的印度洋沿岸诸港提供商品。最主要的商品有卢安瓜河流域和邻近的翁迪领地出产的象牙，马 **184** 尼卡和昌加米腊两个王国以及特特北部金矿的黄金，还有卡富埃一带出品的铜。[15]这些贸易的规模看来不大而且不正规，直到18世纪最后20年才有所改观。那时卡曾贝的隆达人向东推进，并同比萨人结成贸易联盟，沿海来的尧族商人加紧活动，赞比西流域普拉佐庄园地区的奇昆达族商贾也不断拓展经营，致使对印度洋商品集散港的出口激增。这三族商人都掌握着大量世界市场所需要的象牙和奴隶，从而为逐步加入更大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因为当时几乎完全靠这两种商品换取欧洲的制成品。[16]

---

⑦ A. 伊萨克曼，1973年；S.I. 穆登盖，1974年；H.H.K. 比拉(Bhila)，1972年；D. 比奇(Beach)，1980年。

⑧ H.W. 朗沃西，1971年；K.M. 菲里(Phiri)，1975年，第79-80页。

⑨ 亲族体系内部也有不平等现象；男性长者常积累和控制稀少的资源，不让青壮男子和妇女参与。见C. 梅亚苏，1981年。

⑩ K.M. 菲里，1975年，第109-137页；A.D. 罗伯茨(Roberts)，1970年a。

⑪ A. 伊萨克曼，1972年a，第73页。

⑫ A.D. 罗伯茨，1970年a，第723页。

⑬ K.M. 菲里，1975年，第111页。

⑭ G.L. 卡普兰(Caplan)，1970年，第6-7页。

⑮ A.D. 罗伯茨，1970年a，第717页；S.I. 穆登盖，1974年，第384-390页；A.F. 伊萨克曼，1972年a，第77-85页；H.H.K. 比拉，1972年。

⑯ E.A. 阿尔珀斯(Alpers)，1975年，第172-208页；A.D. 罗伯茨，1970年a，第727-728页；K.M. 菲里，1975年，第109-126页。

中部非洲各个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变革往往产生相应的社会和种族结构上的变化。外来的绍纳和隆达两大族系移民导致广泛的跨族通婚甚至形成崭新的种族集团，如塞纳人、赞比西-通加人和戈巴人。[17] 外来移民一般都成功地将自己的核心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当地居民。例如隆达族亲属关系永恒不变和地位继承的社会机制在赞比西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广为流行，改变了当地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并给王位的继承带来深远影响。[18]在赞比西河南面流传的绍纳族姆瓦里崇拜和民族祖先神灵(mhondoro)辅佐体系同样具有重大影响。在姆瓦里流传的同时又带来了绍纳语言和宗教信条体系，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宇宙观。[19] 不过，文化的变迁并不只是单向的。虽然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但是绍纳和隆达两族征服者显然都曾借鉴当地社会的文化要素，常常创造出新的混合形态。切瓦人和隆杜人崇拜马克瓦纳神(Makewana)和姆博纳神(Mbona)看来就是这类混合形态的代表，[20] 卡曾贝的隆达人统治希拉人之后将掌管土地的酋长和负责政治的酋长分开也是如此。[21]

185 到18世纪末，中部非洲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活跃的阶段。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民族迁徙和征服异族的活动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版图，同时，通商的规模也大有发展。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常常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竞相争夺这一地区稀少的资源。因此，尽管存在政治集权的趋势，局势仍旧变幻莫测，为外来商人和新的移民征服浪潮提供机会。

奴隶贸易与并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19世纪来自东非沿海的空前的商业渗透，将中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并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同西非的经历一样，奴隶贸易在中部非洲，特别是使赞比西河以北地区成为国际贸易体系边缘部分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突出的作用。虽然同西非奴隶贸易相比有一些基本相同之处，但还是存在重大的区别。许多在中部非洲捕获的奴隶都出口到印度洋沿岸的种植园区、马达加斯加和中东地区，并没有送往新大陆。象牙贸易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参与国际贸易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然而这一进程只经历了很短的一个时期。更重要的是，中部非洲奴隶贸易中使用暴力的程度很可能超过西非，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破裂，农村人口流离失所。中部非洲一些参与象牙和奴隶贸易的社会群体，或者至少是其中的统治阶级虽然一时有所受益，但是最终还是沦为从属于国际贸易体系的附庸，这一体系的决策中心远在非洲大陆之外。[22]

19世纪上半叶奴隶贸易的扩大，是由于若干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缘故。当时巴西东北

---

[17] A. F. 伊萨克曼，1972年a，第4页；C. S. 兰开斯特(Lancaster)，1974年。
[18] 有关亲属关系永恒不变和地位继承机制的讨论，见J. 范西纳(Vansina)，1966年，第82页。
[19] 见D. P. 亚伯拉罕(Abraham)，1966年，和T. O. 兰杰(Ranger)，1973年。
[20] T. O. 兰杰，1973年；M. 舍费利尔(Schoffeleers)，1972年a，1972年b；H. W. 朗沃西，1971年，第9页。
[21] I. 坎尼森(Cunnison)，1959年，第180-184页。
[22] 见本卷第2章；又见I. 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6年；E. A. 阿尔珀斯，1975年，第264-267页。

部地区重又风行种植园制，古巴随后又发展起甘蔗种植园，因此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有相当一批奴隶贩子开始光顾莫桑比克诸港。东岸的奴隶一般比西非的奴隶价钱便宜，而且英国海军在此地的力量有限，威胁不大。[23] 与此同时，波旁(今称留尼汪)、塞舌尔、马斯克林群岛的法国种植园主们和马达加斯加的统治者们对奴隶的需求也有增加。然而最主要的刺激因素是桑给巴尔和奔巴两岛在世纪之交后不久便开发了丁香种植业。[24] **186**

中部非洲的内部条件也促使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比萨人、尧人和奇昆达人建立的商贸网络已经把腹地同沿海一带的基卢瓦、莫桑比克岛和克利马内等地的市场联结了起来。虽然他们起初侧重于象牙贸易，但是内地的商贩一直为沿海国际转口贸易港带来少量的奴隶。使用虏囚搬运象牙，有利于增加贸易中的奴隶比重，且又不致于破坏象牙贸易。相反，象牙出口的数量也大有增加，因为非洲商贩力图既满足新的英国和美国市场，也不忘传统的亚洲客户。[25]

随着对廉价劳动力和象牙的需求直线上升，尧人、比萨人和奇昆达人商贩们分别拓展各自的商业帝国。尧人于19世纪前半叶进入了尼亚萨湖地区，1850年后又闯入希雷河流域以便在曼甘贾人和切瓦人中间寻求新市场。他们同时还同印度洋岸的伊博港建立了商贸联系，那里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出口中心。奇昆达人起初为非洲葡萄牙人和非洲果阿人经营的普拉佐庄园服务，后来将经商区域从赞比西河北岸扩展到卢安瓜河流域，并且南下到当今的津巴布韦一带。比萨人则加强了在希雷河流域马卢阿普拉河流域之间地带的经营活动。这三族人中的商贩仍侧重于象牙贸易，比萨商人依旧把象牙作为首要出口商品。[26]

到了19世纪中叶，中部非洲已成为一个提供奴隶的重要地区。例如，从克利马内每年向巴西出口的奴隶数额，在1800年到1835年间增加了四倍。[27] 莫桑比克岛新开发的伊博港以及基卢瓦的生意都很兴隆。安戈谢累丹国在1844年之后重又复兴，同其开始经营奴隶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连欧洲奴隶贩子过去大都不屑一顾的莫桑比克南部的伊尼扬巴内和洛伦索马贵斯两个港口，此时竟也成了重要的二等转口贸易站。[28] 桑给巴尔仍旧是买进这些奴隶的主要地区，每年进口量从1810年的10,000人，至少增加到1850年的20,000人。[29] 象牙的出口额与奴隶进口额的增长完全同步。[30]

安戈谢国的介入表明，尧人、奇昆达人和比萨人虽然据有经济上的优势，也不能长期高枕无忧。一些非洲商贩以及外来商贾很快便开始同他们竞争以获得奴隶和象牙。例如沿海一带的马夸酋长们和雄心勃勃的商人，一方面着手开拓人口众多的腹地一带，一方面阻止竞争对手尧人商队穿越马夸领地去莫桑比克岛。到19世纪中叶，他们得以取代尧人成为向莫桑比克岛提供奴隶的主要角色。[31] 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往往与桑给巴尔种植园经济 **187**

---

[23] E.A. 阿尔珀斯，1967年，第4-12页；A.F. 伊萨克曼，1972年a，第85-94页；K.M. 菲里，1975年，第130页。

[24] 同上；E.A. 阿尔珀斯，1975年，第209-218页；A.M.H. 谢里夫(Sheriff)，1971年。

[25] R.W. 比切(Beachey)，1967年。

[27] A.F. 伊萨克曼，1972年a，第92页。

[28] E.A. 阿尔珀斯，1967年，第10-12页；M.D.D. 纽伊特，1973年b；P. 哈里斯(Harries)，1981年。

[29] E.A. 阿尔珀斯，1967年，第10-12页。

[30] R.W. 比切，1967年；K.M. 菲里，1975年，第117-126页；E.A. 阿尔珀斯，1975年，第234页。

[31] E.A. 阿尔珀斯，1975年，第219-229页。

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日渐发展起来。他们在内地一些地方建立了永久性驻188地，例如霍塔霍塔的琼布就曾在马拉维湖西岸一带设站。不过更为通常的做法是，沿海一带的商贾组织远行商队进入内地，这样容易获得奴隶和象牙的主要市场。来自当今坦桑尼亚的尼扬韦齐人的商贩，其中最显要的是姆西里，他在整个东隆达地区享有商业和政治上



图片 8.1 霍塔霍塔的琼布

的主宰权。[32] 到19世纪中叶，有利可图的消息传到西边的安哥拉，促使曼巴里商贩同洛齐人以及他们的科洛洛领主们建立了商贸关系。[33]简而言之，国际市场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因而赞比西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提供后备劳动力的地方，其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奴隶。

商贩之间竞争激烈，且又都垄断了现代武器，因此在1840年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奴隶贸易的特点变化很大。在此之前，大多数奴隶很可能是通过合法贸易获得的，此时则是以偷袭和征服作为获取奴隶的首要方式。例如按照奇昆达人的传统，他们在奴隶贸易早期阶段总是可以买来恩森加、切瓦和通加等族的奴隶，其中许多人本来就是罪犯、社会游民或外来生人。不过，后来奇昆达人改用强制性手段捕奴，以便满足沿海一带的需求。[34] 同样，尧族行旅商贾起初利用便宜的布匹和铁锄，赢得了商业上的优势，但是19世纪下半叶的外来压力，迫使他们对希雷河流域一带施加军事压力，才能保住自己的经济主宰地位。[35] 马夸人加入奴隶贸易行列之后，也同样经历了这种变迁，而使用暴力则始终是阿拉伯-斯瓦希里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36]

189

为了确保奴隶和象牙的货源不断，一些贸易集团征服并分割了许多国家。虽然这些政治实体不尽相同，但是一些共同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历史发展方向。所有外来的征服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产的武器，才得以霸占这些地方，并且保持了优势。这些先进武器全是用奴隶换来的，不过是新的一轮火枪换奴隶的循环。外来统治阶级一旦站稳脚跟，随即便扩张其帝国边疆。尽管他们施暴程度有所不同，武力却是蚕食鲸吞的主要手段。新占领土提供了更多的奴隶和象牙，可以用来扩充武库，从而使他们得以再度扩张。虽说被征服的国家在政治上还是独立的，但却成为欧洲经济和军事力量间接进入非洲腹地的延伸地。

整个赞比西河两岸以及邻近的卢安瓜河流域，都经历了这种商业渗透、武力征服和国家形成的进程。1840年之后，一大批切瓦、通加、塔瓦拉、恩森加、索利等族的酋长领地被追并人被征服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是由非洲葡萄牙人和非洲果阿人军阀及其奇昆达部下统治。其中最显要的有马桑加诺、马坎加，还有卡年巴和马塔肯亚这两个宗博人国家。[37] 再往北去，情形类似，进度加快，直到19世纪70年代达到吞并高潮。如前所述，从事贸易的尧人酋长如马塔卡、马坎吉拉、姆波纳等称霸于希雷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阿拉伯商贾在尼亚萨湖一带建起了若干政治飞地；耶克人首领姆西里控制了卡曾贝的隆达王国的西部诸省。[38] 简而言之，新统治阶级通过发展奴隶贸易在一大片地区掌握了政权，滥施淫威，剥削和威胁当地居民。

---

[32] J. 范西纳，1966年，第227-231页。
[33] F. 弗林特(Flint)，1970年。
[34] A.F. 伊萨克曼，1976年第24-25页。
[35] K.M. 菲里，1975年，第147-150页；E.A. 阿尔珀斯，1969年。
[36] E.A. 阿尔珀斯，1975年，第219-228页；K.M. 菲里，1975年，第139-145页；H.W. 朗沃西，无出版日期。
[37] A.F. 伊萨克曼，1976年，第22-48页。
[38] J. 范西纳，1966年，第227 231页；E.A. 阿尔珀斯，1969年，第413-416页；H.W. 朗沃西，无出版日期，第14 18页；K.M. 菲里，1975年，第140-145页；Y.B. 阿卜杜拉，1973年，第40-60页。

即使那些奴隶贩子不在政治上称王称霸，他们的洗劫掳掠，尤其是他们巧妙地利用该地区众多政治实体内部的分裂，往往也逐步削弱了当地贵族的权威。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贾避开了卡曾贝隆达国王室的贸易垄断，在其境内建立了地方权力的基础。1872年他们直190 接插手隆达人的政治，协助策划暗杀了卡曾贝国王穆翁加·森库图，并且挑选了一个较为温顺的继承人。[29] 同样，随着奇昆达人和斯瓦希里人的入侵，再加上他们同边远地区酋长领地之间的商业联盟，翁迪王国的地位在19世纪逐步削弱，终于导致1880年的衰亡。[30] 其他一些外来商贾挑动森加族领袖坎巴莫同其主要对手滕布人之间的武装对抗，以便得到更多的战俘出口。[31] 南边的奇昆达人一些团伙运用军事技巧，在森加人和萨拉人中间寻找胜者结盟，从而取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32]



图片 8.2　马拉维湖北部地区的阿拉伯商贾

㉙ I. 坎尼森，1966年，第235-236页；A. D. 罗伯茨，1973年，第199页。
㉚ H. W. 朗沃西，1971年，第18-21页。
㉛ H. W. 朗沃西，无出版日期，第20-21页。
㉜ B. 斯特凡尼辛(Stefaniszyn)和H. 德桑塔纳(de Santana)，1960年，第364页；W. V. 布雷尔斯福德(Brelsford)，1956年，第58页。

奴隶贩子对当地贵族政治命运的影响也并非千篇一律。有的当地统治阶级同奴隶贩子建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系，反而更加强大。例如本巴族统治者与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贾之间就是这种关系。当外国商贾在1860年前后来到此地时，本巴人在奇勒舍·奇佩拉的领 191 导之下，经历过一个领土扩张和政治集权的阶段，结果是本巴王国在这一带远比大多数国家更加团结和强大。本巴王国离主要通商渠道较远，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商贾们不会在王国核心区域发展为庞大的具煽动性的社团。同样重要的是，由于本巴人并非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贾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没有必要对之采取敌对的态度。王家掌握的财富大多是通过袭掠抢来的或是进贡献上的象牙和奴隶，他们极愿意用这两种东西同沿海来的商贾交换布匹和其它进口商品。这种经济互补性促成了一种和睦的关系，同时也加强了本巴贵族在国内的地位，他们得以用洋货招募新的追随者，并加强自己同下属酋长们的关系。由于对奴隶和象牙的需求不断增长，促使本巴王国在1860-1880年间再度扩张，征服了当今赞比亚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本巴族统治阶级通过与外国商贾建立关系，既能称霸一方，又积累了不少财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43]

同本巴人一样，另外一些当地的酋长从与奴隶贩子结盟中得益匪浅。切瓦酋长姆瓦塞·卡松古的领地横跨从马拉维湖到加丹加的商路上，他在19世纪70年代靠给阿拉伯商队提供食物换取枪支。后来他用这批武器抵抗姆布韦拉-恩古尼人的屡次入侵。[44] 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贾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曾保护过向他们提供象牙的一些森加酋长。[45]奇昆达人同安博人联合反对本巴人以及奇昆达人在欧洲列强"大角逐"之前的10年中帮助恩森加人对付索利人，也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46] 从上述所有这些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外来者的战略是阻止商业或政治上的对手扩张势力，从而保住自己相应的势力范围。

统治阶级和商贾们力求获得更多的奴隶，有时却因奴隶贸易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动乱而身受其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行之过头。为了使得保住自己权力所必需的财富和武器能够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把本国或邻国的属民作为奴隶出口。马夸贵族就采取了这种自我毁灭的做法。19世纪50年代以前，马夸一直是向莫桑比克岛出口奴隶的一个主要国家。他们掠夺行为的一个副产品是受害的各族人口大量流失。面临劳动力储备日渐枯竭，马夸统治者们开始相互袭击，捕获本族属民来维持有利可图的奴隶贸易，因为没有这种贸易他们 192 已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不过20年的时间，马夸便严重地分崩离析，成为随后入侵的葡萄牙人不堪一击的牺牲品。[47] 非洲葡萄牙人普拉佐庄园主们同样只顾眼前，拼命攫取利润，导致普拉佐体制迅速崩溃。同马夸酋长们一样，普拉佐庄园主撕毁了他们过去签署的契约，在无法再从内地获得奴隶时便开始逼迫庄园上的非洲人当奴隶。当地民众对这种暴行，不是奋起反抗赶走庄园主，就是举家逃往内地，庄园主从此得不到以往的贡品。无论是哪一种

[43] A.D. 罗伯茨，1973年，第164-214页。

[44] K.M. 菲里，1975年，第143-145页；H.W. 朗沃西，无出版日期，第12-13页。

[45] H.W. 朗沃西，无出版日期，第18-21页。

[46] W.V. 布雷尔斯福德，1956年，第64页；B. 斯特凡尼辛和H. 德桑塔纳，1960年，第64页；K.M. 菲里，1975年，第150页。

[47] E.A. 阿尔珀斯，1975年，第225页。

情况，大多数普拉佐庄园到1830年时均以破产告终。勉强维持的庄园却又连遭饥荒，民不聊生，无法抗拒此后几十年间所遭的袭击。50年之后，格温巴、恩森加、塔瓦拉等族民众奋起反抗欺压他们的混血种人(非洲葡萄牙人和非洲亚洲人)以及奇昆达族领主，这些恶霸一直奴役他们并把他们出口到沿海一带。[48]

绍纳人控制的地区从赞比西河南缘直到伊尼扬巴内的腹地，这里同南边德拉瓜湾地带一样，成为提供奴隶的次要来源。外来商贾在这片广阔的地方只渗透到零星小块地区，主要是奇昆达人沿赞比西河南缘征服了一些地方。有时葡萄牙和非洲人商贩前来劫掠一番，这些人同伊尼扬巴内和洛伦索马贵斯(今日马普托)两个港口的商界保持着联系。19世纪之前的这些活动并不多见，规模也有限。[49]

奴隶贩子不打算或是没能力开发赞比西河流域南岸，这是出于人口分布、商业和政治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原因。南边人口少，同北方相比可以捕获的奴隶要少，而奴隶贩子在北面很容易得手。另外，绍纳族各国盛产黄金和象牙，并以此出口来换取欧洲货物。因此外来商贾要想得到数目可观的奴隶，只能诉诸武力，而绍纳族各国足以打退大多数的袭击。姆韦尼马塔帕军队在1807年击溃一支葡萄牙人武装，巴鲁埃人和马尼卡人时常进攻欧洲人，这都说明了当时的力量对比。1830年之后，加扎-恩古尼人一度统治了南方大部分地区，他 **193** 们确曾参与了国际奴隶贸易，但是英国海军舰队在1850年后封锁了洛伦索马贵斯和伊尼扬巴内两个港口，奴隶贸易日渐难以为继，最终已无利可图。10年后加扎贵族和地区的商贾们便停止参与海上奴隶贸易，宁可使用本地抓获的奴隶。[50]

虽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初步的结果说明在中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曾发生过类似的变迁。19世纪下半叶国际上对奴隶的需求下降，结果奴隶便从出口商品变成了服徭役的劳动力。有不少资料证实，一些原作为出口的奴隶被迫在当地从事生产。其中加扎、马夸、洛齐、格温巴、马孔德、奇昆达等族都曾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力。马孔德人和奇昆达人依靠捕获的奴隶从事生产，从而可以让自由民去采集象牙、树蜡和橡胶，用来向海外出口。洛齐贵族和地主也用奴隶开凿沟渠以便开发肥沃的沼泽地带。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洛齐人口中估计有四分之一是奴隶。恩古尼族的兴旺发达也是由于他们能够吸收大量战俘，从中攫取生产剩余。[51]

各地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还是可以看出奴隶贸易普遍造成当地经济的混乱。大多数乡村经济遭到粗暴的破坏，当地许多最富生产能力的社会成员被卖到他处，极易传染的疾病失控而蔓延，中部非洲经济日趋依附于世界贸易体系，这一切都造成该地区更加难以

---

[48] A.F. 伊萨克曼，1972年a，第114-123页。

[49] 同上，第89-92页；A. 史密斯(Smith)，1969年，第176-177页；A. 洛巴托(Lobato)，1948年，第7-8页；P. 哈里斯，1981年，第312-318页。

[50] P. 哈里斯，1981年，第312-318页。

[51] L. 甘恩(Gann)，1972年，第188-192页；E. 弗林特，1970年，第73-79页；P. 哈里斯，1981年；W.G. 克拉伦斯-史密斯(Clarence-Smith)，1979年b；P.D. 柯廷(Curtin)、S. 费尔曼(Feierman)、L. 汤普森(Thompson)和J. 范西纳，1978年，第403页；T.I. 马修斯(Matthews)，1981年，第23-24页。

虽说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中部非洲许多社会早已存在奴隶制，不过，初步研究的结果表明，贵族捕获俘虏不断发展的趋势是从中攫取生产剩余以便保持自身的特权地位。抓奴隶服徭役一般都发展到了占有奴隶人身的程度，蓄奴制的性质往往与早期已有所变化，早期蓄奴侧重于奴隶的再生产作用，主要用以扩大亲族网络。



图片 8.3 “鲁加-鲁加”(劫掠奴隶者)

发展。这段历程的确也曾带来诸如烟叶、玉米、水稻和木薯等新作物的普及传播，带来了诸如奇昆达人的捕兽器械、粮仓和武器等简单技术的引进，带来了当地工业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但是同整个地区的经济受到破坏而发展缓慢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52]

195 更不用说，奴隶贩子的袭击和扩张行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破坏。土地被夺，村落被毁，幸存者常常被迫逃离故土，重新定居到穷乡僻壤。19世纪有一位旅行家曾经回忆起19世纪60年代曼甘贾人屡遭尧人袭击后的情景：

几个曼甘贾人随他们一同前往。所到之处都可见到战争的悲惨景象：村庄被烧，园地无人照料，周围美丽的田地很快荒芜。约近正午，他们碰上一大帮奔袭得胜归来的阿贾瓦（尧）人。远处，焚烧村庄的余烟可见。一长列俘虏扛着抢劫来的东西。阿贾瓦妇人奔出庄口……欢迎胜利者归来，就连她们喜庆的喧叫也淹没不了俘虏的悲号。[53]

奇昆达人洗劫切瓦、通加和恩森加等族的家园，甚至北上远达卡曾贝的隆达人；阿拉伯-斯瓦希里人则在马拉维湖一带抢掠扰民，造成同样的动荡和衰败。[54] 在破坏最厉害的地方，大片地区人烟绝迹。1861年有一个英国官员公开承认："后来有个阿拉伯人从尼亚萨湖回来告诉我，他17天里走遍了整个地区，乡镇、村落到处是一片废墟，……却看不到一个活着的人。"[55]

由于失去许多最富生产能力的社会成员，使农村地区更加混乱与动荡。虽说有关地区的资料不尽一致，不过，赞比西一带、希雷河流域与马拉维湖地区的资料表明，这些地方饥荒不断，颇有规律，[56] 人们常常被迫用奴隶换食物，人口流失更加严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局势动荡不定和再遭掠夺的威胁使得乡村经济根本无法恢复。

饥荒以及心理压力使背井离乡和营养不良的民众很容易染上沿海商贾带来的传染病。天花和霍乱等疾病在印度洋沿岸居民中十分普遍，但是中部非洲内地居民却十分少见。因此当地居民毫无免疫能力，病魔更具毁灭性的威胁。天花和霍乱两种流行病当时在大片地区蔓延肆虐，遍及今日坦桑尼亚-马拉维边境直到莫桑比克南部。19世纪50年代后期有位欧洲探险家注意到"最危险的流行病是……天花……不时像风暴一样横扫这一带地区。"[57] 根据史料记载，1834、1836和1862年莫桑比克一些地区曾有天花流行，从1850到1880年196 这段时期内地也有疫情记录。[58] 昏睡病也曾在所调查的大部分地区流行，这很可能与滥伐森林和狩猎造成环境恶化有关。[59]

高死亡率及其破坏性影响进一步降低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反过来又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时疫的恶性循环。幸免于难者，大都迁居人口稠密的有围栏防卫的村庄，而那里的土

---

[52] G. 哈特维希(Hartwig)和K. D. 帕特森(Patterson)(合编)，1978年；A. D. 罗伯茨，1970年a，第734-736页；B. 雷诺兹(Reynolds)，1968年，第17和59页；J. 范西纳，1978年。

[53] H. 罗利(Rowley)，1867年，第112-113页。

[54] F. 塞卢斯(Selous)，1893年，第48页。

[55] 援引自R. 库普兰(Coupland)，1939年，第140页。

[56] A. F. 伊萨克曼，1972年a，第114-124页；E. A. 阿尔珀斯，1967年，第20页。

[57] G. W. 哈特维希，1978年，第26页援引R. 伯顿(Burton)语。

[58] R. 伯顿；J. R. 迪亚斯(Dias)，1981年；G. 利泽冈(Liesegand)，无出版日期。

[59] J. R. 迪亚斯，1981年。

地无力养活额外的人口，使情况更加恶化。时疫流行至少还有另外两种破坏性的影响。有资料表明，对巫术的指控及社会动乱由此而激增。与此同时，各地特权阶层力求获得更多的俘虏来弥补当地人口的流失，因而使奴隶买卖的势头更旺。[60]

一方面可以说从事贸易的那些非洲社会，或者至少是其中的贵族和商贾，牺牲弱小邻国的利益换来自己的暴利；另一方面有资料证明，这些集团的优势为时很短，况且他们所处的地位导致他们过度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这方面，至少是经商大国丧失了自身的经济自主权。他们为了保持优势地位，不得不指望沿海一带对象牙和奴隶的需求保持旺盛，不受英国日益强大的压力影响，而且还得确保充足的象牙和奴隶货源。极而言之，像马夸国那样一旦无法保障从国外获得充足的奴隶货源，结果就是内部发生冲突和走向自我毁灭。更为普遍的现象则是，由于争抢俘获劳力，各经商集团内部或者相互之间产生强烈的敌意。奇昆达族各帮派、尧族诸酋长和斯瓦希里各经商集团之间都曾多次发生火并。[61]当地商界依赖于欧洲的军火和外国中间人，常常处于脆弱的境地。例如葡萄牙人利用提供武器为条件施加压力，迫使奇昆达族各派承认里斯本对他们的领地拥有特殊权力。[62]同样，塞纳人日渐严重地依赖其阿拉伯盟友，最终危及到自身的独立地位。[63]就连强大的本巴族也不能完全不顾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贾施加的压力。[64]

更重要的是，废除奴隶贸易之后，曾经从中牟利的阶级或阶层——贵族、商人、军阀和地主们——都拼命地从下属臣民那里搜刮或从商业渠道获得诸如树蜡、咖啡、花生、菜油等新商品，用以确保自己能够不断得到欧洲的货物和武器，因为这是维持其特权地位所必不可少的。在一些地方，这种合法商业为雄心勃勃的行旅商人提供了新的积累资本的机会，也促进了小农生产的发展。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种转变的阶级或阶层，也不过是长期巩固或扩大了对其无力控制的世界经济的依赖。 **197**

从略为不同的角度来看，交换的商品价值不平等，反映出中部非洲地区在范围更广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所处的脆弱地位。E.A.阿尔珀斯曾经指出："尽管象牙在非洲本地社会中并无什么内在价值，但是非洲人用象牙换回的货物根本比不上印度、欧洲和美洲商业资本家赋予象牙的价值。"[65] 这种不等价交易在俘奴买卖方面更为突出。中部非洲各社会损失了劳动力，换来的是种种廉价和不耐用的商品以及毁灭人类的武器，没有一样可以弥补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同时，非洲人为了猎取象牙而耗尽了有限的资源，却并没有得到资本货物来扩大本地社会的生产基础。新近的研究表明，他们不仅造成当地的经济得不到正常发展，而且还毁坏了生态环境。

随着这片地区日渐贫困，财富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变得更为严重。尽管还需要详尽的研究才能确定中部非洲特定的社会各自生产制度和剩余分配的性质，但是显然处于统

---

[60] G.哈特维希，1978年，第25-31页。

[61] A.F.伊萨克曼，1976年，第37-38页；Y.B.阿卜杜拉(Abdallah)，1973年，第52-54页；K.M.菲里，1975年，第144-146页；E.A.阿尔珀斯，1969年，第413-414页。

[62] A.F.伊萨克曼，1976年，第31-35页。

[63] H.W.朗沃西，无出版日期，第20-21页。

[64] A.D.罗伯茨，1973年，第268页。

[65] E.A.阿尔珀斯，1975年，第266页。

治地位的贵族是主要获益者，他们通常和整个商人阶级或者其中一部分人结为同盟。尧族中涌现出像马坎吉拉和马塔卡酋长这样的权势人物，证明这些社会内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分化在不断发展；马夸统治者们竭尽全力把持权力，也说明同样的问题。[66]安戈谢和基坦霍纳两个素丹领地、奇昆达族和阿拉伯-斯瓦希里人所征服的诸国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尽管反抗者增多，时有暴动发生，人数不多的政治-商业阶级仍旧占据上风。19世纪下半叶，民众不满情绪更加趋于表面化，说明阶级对立日渐加剧，洛齐社会内部和普拉佐庄园也多次爆发奴隶起义。[67]

198 在另外一些地方，商业利益集团独立于统治者，能够主宰商业，削弱了执政当局的地位。最能说明这种权力转移的两个例子是在北部的翁迪国和卡曾贝王国。在这两个国家，当地商人都同外国商贾结成联盟，便于避开王室的商业垄断，大大削弱了两国领导阶层的地位。[68]位于邻近的安哥拉一带的卡桑杰王国，情况也很相似。当地母系社会各个氏族控制了奴隶贸易，王室家族蒙受损失，最终导致这个国家很快四分五裂。[69]

商业往来的范围扩大，产生了一种副产品，即不同社会之间在文化方面相互借鉴，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变化的方向显然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商旅集团和所到地区民众之间接触交往的方式和时间长短等因素。来往频繁的地区文化上相互吸收主要有三种方式。在一些地方，孤立的商旅和抢劫团伙完全被当地社会所同化，如奇昆达猎手被吸收加入恩森加、安博以及河谷一带的通加人社群。[70]截然相反的是，一些外来人从根本上改变了所到地区的文化。例如霍塔霍塔所统治的切瓦人在宗教方面吸收了伊斯兰教的某些成分，改用斯瓦希里人的姓名、单词和短语，社会制度也经历了一次大调整。[71]同样，许多尧族商贩由于和阿拉伯人接触交往，皈依伊斯兰教，采纳沿海一带的文化模式。他们从事长途贩运也使城市中心增多，礼教习俗随之发展，形成的一些清规戒律旨在约束尧族妇女在丈夫远涉内地经商时保持贞节，[72]这一点说明社会变化也包括根据新出现的外部环境来改善社会内部结构。有资料表明，除了上述两种同化方式之外，条件的变化促成了新种族和新文化集团的产生。一些奇昆达氏族集团在19世纪中叶摆脱了日渐衰亡的普拉佐庄园制，在卢安瓜河流域组成若干自治社团。他们从各种异族集团中吸收追随者，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融汇了马拉维人和绍纳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观念体系。[73]当今扎伊尔东部地区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马涅马族就是由不同的奴隶贩子团伙转变成的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文化集团。[74]

---

[66] Y.B. 阿卜杜拉，1973年，第40-60页；E.A. 阿尔珀斯，1975年，第228-229页。

[67] N. 哈夫金(Hafkin)，1973年，第253-280页和311-359页；A.F. 伊萨克曼，1976年，第23-30页；K.M. 菲里，1975年，第140-146页。

[68] H.W. 朗沃西，1971年，第18-21页；I. 坎尼森，1966年，第235-236页；J. 范西纳，1966年，第227-231页。

[69] J.C. 米勒(Miller)，1973年，第23-26页。

[70] W.V. 布雷尔斯福德，1956年，第60-62页。

[71] K.M. 菲里，1975年，第140-146页；H.W. 朗沃西，无出版日期，第23页；M.E. 佩奇(Page)，1974年，第88-89页。

[72] E.A. 阿尔珀斯，1972年，第172-196页；E.A. 阿尔珀斯，1969年，第417-420页。

[73] A.F. 伊萨克曼，1972年b，第454-461页。

[74] M. 佩奇，1974年，第69-84页。

恩古尼和科洛洛两族入侵的影响

199

如同中部非洲逐步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样，恩古尼和索托人在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入侵该地区也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其规模之大前所未见。[77] 南部非洲各族的迁徙沿袭几个世纪前便开始的大规模移民和形成国家的模式。在一些地方，外来移民征服了以前曾设法摆脱绍纳或隆达国家政权体制影响的那些团体。加扎-恩古尼入统治下的莫桑比克南部的通加人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人侵者往往强行控制原有的王国。无论哪种情况，新近被征服的国家囊括了当代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一带相当大的地区，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军事和集权型政治体制。

19 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有三次移民浪潮席卷了中部非洲。第一次浪潮是索尚甘恩率领的恩古尼人，他创立的加扎-恩古尼帝国从莫桑比克南部，向北延伸到赞比西河，西面深人今日津巴布韦境内。索尚甘恩在 1831 年打败主要敌手兹万根达巴，逼迫后者逃过赞比西河中游地区，最后定居在马拉维湖和坦噶尼喀湖之间的马普波地区。大约在同一时期，索托族后裔科洛洛移民在塞贝特韦恩的带领之下穿越茨瓦纳人领地和赞比西河中游地段，最后征服了洛齐入，在那里定居下来。

虽然本章将逐一分析这些移民集团，他们却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所有移民集团出于类似的动机离开历代生息的家园，向北方跋涉，途中遇到相似的困难，都曾直接或间接从祖鲁入那里得到武器，并学会军事战略。他们都曾遭到邻国扩张行径的打击——加扎人和兹万根达巴败在恰卡手下，科洛洛人受到特洛夸人的袭击，并且都曾面临损失畜群和覆灭的威胁。由于这些冲突使他们伤亡惨重，被迫接纳大量外族人，否则就难以成为像样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他们采用祖鲁族的短柄刺矛，并发挥优良的作战技术，以助于捕获俘虏和开发被征服的国家，当然他们的优势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战。这还有利于夺取大量畜群，而牲畜在恩古尼和索托人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宗教以及经济意义。因此，就领土扩张和财富积累而言，得到新武器对恩古尼和索托人来说，与奇昆达、尧人和阿拉伯-斯瓦希里奴隶贩子一样至关重要。 200

到 1821 年，索尚甘恩和他的加扎-恩古尼追随者因害怕祖鲁入前来进攻，已经从图克拉(图格拉)河以北地带北上进入德拉瓜湾一带。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抵抗有限，因为乔皮人的酋长领地相对来说都很狭小，而葡萄牙入在洛伦索马贵斯港的存在实际也是有名无实。在一两年间，加扎-恩古尼人已将其领地扩展到伊尼扬巴内腹地一带，与此同时，由于在 1826 年被恰卡打败的恩德万德韦的恩古尼人参加进来而扩大了自己的队伍。

---

[77] 菲利普·邦纳(Philip Bonner)、杰弗里·盖伊(Jeffrey Guy)、戴维·赫奇斯(David Hedges)和亨利·斯莱特(Henry Slater)最近的著作认为，伴随恩古尼和索托人的扩张而出现的 19 世纪国家政权建设，其前提条件是在前一段时期的政治变革和酋长及长老权力的巩固。见 S. 马克斯(Marks)和 A. 阿特莫尔(Atmore)的文章(合编)，1980 年；D. 赫奇斯，1978 年。



图片 8.4　索尚甘恩的尚加纳人到沙潘加向葡萄牙人征收一年一度的贡品

尽管索尚甘恩起初有些进展，但他仍旧面临不少威胁，其中祖鲁人的屡次进犯，对方的军队仍然离得较近，造成较大威胁。1828 年几经武装对抗之后，索尚甘恩将其王国核心部分迁到萨比河中游一带，处于恰卡军队控制范围之外。但是这样一来，他的部队又同兹万根达巴手下的恩古尼人发生直接冲突，1831 年连打几仗才战胜了他们。

这一系列胜仗使索尚甘恩得以巩固他在南方的领土，并拓展边界。加扎人军队随后转

201 向西方，进入当今的津巴布韦，在那里索尚甘恩建都于杰伊梅特，然后又北上来到赞比西河流域。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加扎军队又袭击绍纳人的马尼卡、基泰韦、巴鲁埃等王国，以及赞比西河沿岸残存的普拉佐庄园。加扎国王并不打算把这一大片地区并入其帝国，他只满足于洗劫绍纳诸国和从普拉佐庄园以及从住在塞纳和特特地区乡镇的葡萄牙人那里征取贡品。[76]

索尚甘恩帝国的核心地区在莫桑比克南部和西边毗邻地带。当地被其统治的各族人民遭到粗暴对待，被迫缴纳重税，并且要向索尚甘恩的同龄人军团提供年轻人。它在战略上不同于兹万根达巴-恩古尼人，并不把通加人和乔皮人并入加扎人社会；也不同于其他恩古尼人社会所采取的日渐淡化文化和种族差异的做法，由恩古尼军官控制的隔离的同龄人军团就标志着土著的地位低人一等。被压迫大众和恩古尼贵族之间的矛盾时常暴露出来，例如一些通加酋长领地力图恢复独立，移居他乡，摆脱加扎人的统治。个别的乔皮人和通加人的政治实体同葡萄牙人结盟，希望后者能起一种威慑作用。恩古尼人则普遍认为他们征

76　G. 利泽冈，1964 年，第 47-50 页；J.D. 奥麦尔-库珀，1966 年，第 59-60 页；M.D.D. 纽伊特，1973 年，第 223-224 页；A.F. 伊萨克曼，1972 年 a，第 122-123 页。

服的臣民寻求报复，对索尚甘恩施用巫术，导致他的去世。[77]

当加扎人强行称霸之时，兹万根达巴带着追随者们踏上20年艰辛远征之路去寻找合适的家园。在此期间，他们同加扎人争夺对德拉瓜湾地区的控制权，对分崩离析的昌加米腊的罗兹维帝国以最后的致命打击，一度曾在恩森加人中间定居，并洗劫马拉维湖西缘地带，最后定居马普波。他们在迁徙途中，处处收纳新的追随者。人力资源问题特别突出，因为起初只有300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都很难成为一个实体，在与索尚甘恩的冲突中又有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同加扎人一样，他们起初只收纳有恩古尼血统的个人和分离出来的小群体，以便确保本族文化和语言的统治地位。然而当他们日益远离恩古尼故地之后，兹万根达巴意识到必须同化外来人，才能保证自己带领的较小部落得以生存下去。

因此，兹万根达巴和他的顾问们采取不同于祖鲁和加扎-恩古尼人的办法，将大量迥然不同的人都吸收进来。每个人都被分到指定的恩古尼家庭，双方形成类似亲戚的关系，淡化了这些人作为俘虏的身份。新吸收的年轻人到了适当的年龄便被编入恩古 **202** 尼同龄人军团，这是适合社会需要的重要机构。根据他们的作战能力，外族出身的军士可以得到相当数量抢劫来的物品，也可以晋升并改变社会地位。因此，兹万根达巴领导的恩古尼人的扩张为许多外族人提供了广泛的机遇，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同时他们也接受了恩古尼文化，改变了自己原来效忠的民族。[78] 19世纪40年代定居马普波的恩古尼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外族血统的人，估计占百分之九十，这说明兹万根达巴同化政策的成功。[79]

在接纳外族的同时产生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足以治理扩大了的政治实体。恩古尼人对王权的观念，过去基于年长和资历，统治者只在靠亲族关系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若干村庄享有有限的权威，现在变为将统治者视成国家政权的化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此同时，将同龄人军团改造成为国王的军队，其指挥者由兹万根达巴任命，并对他负责。由于同龄人军团起初与王国的地方分支并无接触，各省领袖缺乏军事能力，无法脱离王国。到兹万根达巴去世时，这个恩古尼国家已成为中部非洲的一个主要强国。[80]

兹万根达巴的去世，标志着恩古尼扩张阶段的结束。王位之争极为剧烈，导致王国四分五裂，散成几个大部落和无数小群体。由于当地本巴、隆达以及北面菲帕人的国家颇为强大，而且武装精良的阿拉伯-斯瓦希里人、尧人和奇昆达人的力量逐渐渗入这一带，恩古尼独立的各派系企图扩张的计划受到重重阻碍。

尽管如此，兹万根达巴家族的两个支系后来在南方较弱的国家中挑选打击目标，1870年从中瓜分到相当大一片领地。姆佩泽尼-恩古尼支系乘恩森加族各酋长领地遭受兹万根达巴的袭击尚未恢复且无力抵抗之际，占据了没有萃萃蝇之灾的马拉维高原西南部分，即当今的詹姆森堡地区。姆布韦拉支系则在原来属于通布卡、通加和亨加等族的领地建立了统

---

[77] J.D.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59-60页。
[78] T.斯皮尔(Spear)，1972年，第9-13页；J.D.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64-72页。
[79] T.斯皮尔，1972年，第11页。
[80] 同上，第9-13页；J.D.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64-72页。

治。这两个支系都吸收了其他同龄人军团，后来一起并入了新创立的国家。正当姆佩泽尼支系吸收新的追随者时，以前的一个恩森加血统的奴隶奇韦雷·恩德卢已经成为一名卓越的军官，他此时宣布独立，以自己的名字为国名，在当代的多瓦地区创建了一个独立王国。除了上述三个分支以外，灭亡的兹万根达巴政权的另一个支系关加拉人进入坦桑尼亚，打败了马塞科-恩古尼人。马塞科人南逃越过鲁伍马，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柯克山岭的高原地区定居。[81]

科洛洛人的迁徙同兹万根达巴带领的恩古尼人迁移方式大体相似。科洛洛人从迪塔孔往北逃，一路上遭遇到一些与之为敌的民族，包括打败了他们的茨瓦纳人和恩德贝勒人。恩德贝勒人的不断威胁使塞贝特韦恩决心渡过赞比西河向西前进，在1835年前后来到洛齐王国的边境。

洛齐人表面上颇为强大，实际上却特别脆弱。统治洛齐国近50年的穆拉姆布瓦死后，不仅造成了领袖地位的真空，并且导致王国的核心层爆发一场剧烈的斗争。而且边远省份被奴役民众对洛齐贵族极其憎恶，面对外国入侵，都不愿保卫专制的外来洛齐政权。因此当科洛洛人进攻之时，只遇到一部分王室家族的抵抗，科洛洛人在四年中征服了广阔的洛齐王国。[82]

科洛洛人掌权之后，面临着吸收数量比自己众多的洛齐人及其从前统治过的属民，并将他们并入索托社会，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十分棘手的问题。他们之间语言不通，文化体系迥然不同，使得这种社会和政治合并过程更为复杂。塞贝特韦恩为了将截然不同的成分融入自己的王国，便和当地几家显贵势力通婚联姻，并鼓励全国民众以科洛洛语为国语，不让他的科洛洛臣民做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而且还赦免洛齐王室家族的死罪，当众宣布“人人都是国王之子”。除了这些象征性姿态，还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比如吸收洛齐人参与塞贝特韦恩的政府，保留一些当地领袖在重组的地区行政机构中的地位。[83]

塞贝特韦恩的融合政策起初颇为成功。科洛洛语很快便成为王国大部分地区的交际语言，居住在赞比西河冲击平原的洛齐人开始使用科洛洛名字。他们打退了纳巴-恩古尼和恩德贝勒人的屡次进犯，表现出他们对科洛洛王国的忠诚。战胜恩德贝勒人确保了西南边境的安全，塞贝特韦恩遂得以把注意力转到继续巩固王国和从安哥拉商入处获得武器，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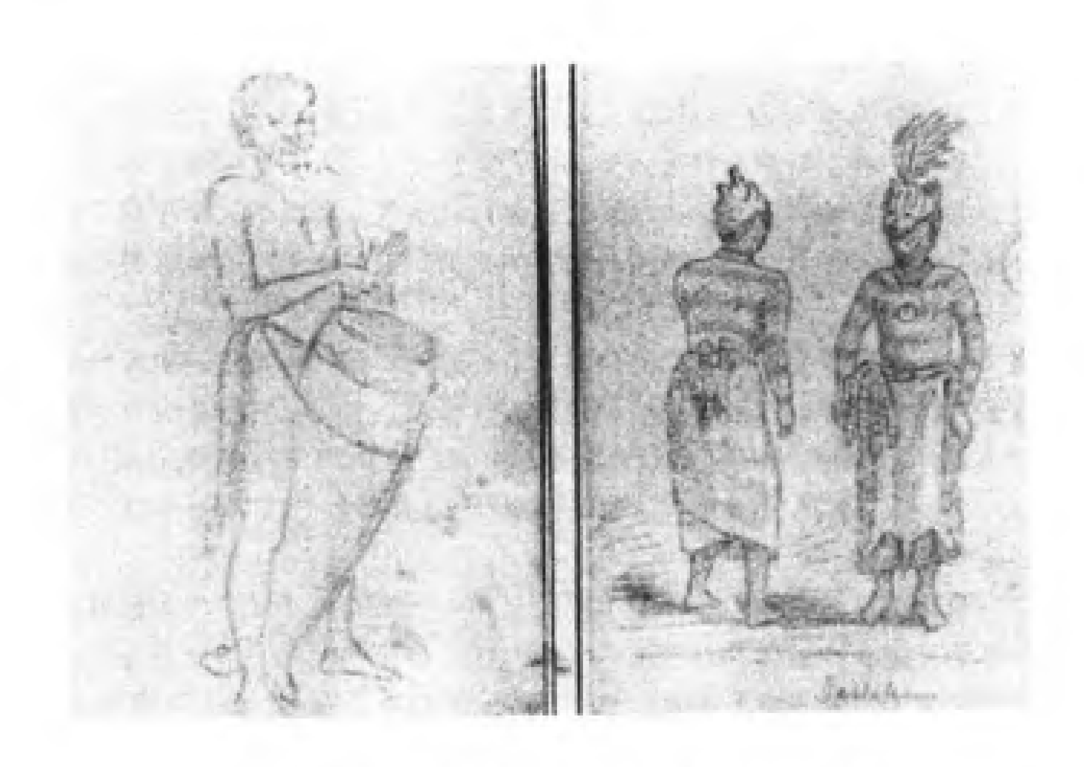
最后有一系列因素使得同化战略半途而废。塞贝特韦恩1863年去世，抢夺王位之争十分激烈，科洛洛族四分五裂。这场冲突暴露出科洛洛人的脆弱，当时由于疟疾肆虐，他们的人口已经大大减少。新国王塞克莱图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但是他改变了父亲的和解政策，独断专行，压迫洛齐人。他强迫洛齐人退出政府职位，终止同当地显贵家族的联姻关

[81] T. 斯皮尔，1972年，第15-19页；J. 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72-85页；K. 伦尼(Rennie)，1966年，第303-306页。

[82] J. 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20-122页；M. 梅因加(Mainga)，1973年，第65-88页。

[83] G. 卡普兰，1970年，第10-11页；J. D. 奥麦尔-库珀，1966年，第123-124页。

[84] G. 卡普兰，1970年，第12-13页。



图片 8.5 洛齐统治者锡波帕宫廷的鼓手和舞者，1875 年



图片 8.6 锡波帕，1864 年推翻科洛洛王国的洛齐暴动领导人之一，统治洛齐直至 1876 年

系，让其科洛洛臣属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完全可以预见，洛齐人于 1864 年在流亡外地的王室家族领导之下发动暴乱。不出几个星期他们便解放了自己的家园，几乎杀死了所有的科洛洛族男人。[85]

这次民众起义并没有完全消灭科洛洛人在赞比西河流域的影响。在此几年之前一小批科洛洛人陪同戴维·利文斯敦沿赞比西河东行，并在曼甘贾人中间定居下来。他们断然反对奴隶贸易，并且以英勇善战著称，很快便赢得民众拥戴。科洛洛人依靠利文斯敦提供的欧洲武器，击退了尧人以及沿海一带阿拉伯人的抢劫行动，使他们的曼甘贾东道主颇感欣慰。[86]

科洛洛人在马卢卡和拉姆坎二人的领导之下迅速地积极介入希雷河地区的政治。他们在曼甘贾族盟友的帮助下，打败了一些显赫的酋长以及在名义上拥有所有曼甘贾土地的隆达族国王察贡贾。这一征服和同化的过程持续了几年，到 1870 年他们建立起一个科洛洛国家，并分为六个地区，各地区的领袖享有很多自治权。此后的 20 年间，科洛洛人始终主宰着战略要地希雷河流域。[87]

中部非洲政治版图的重新组合反映了恩古尼和索托两大族系迁徙的深远影响。移民们组建了若干新的王国，主宰了这一带相当大的地区。在此期间他们不仅兼并了当地几个政治实体，并彻底摧毁了若干重要国家，其中主要有罗兹维、翁迪、隆达。恩古尼以及科洛洛的国家政权结构，与早先的政治形式有较大的差别，只是科洛洛人的差别略微小一些。新建的政治实体幅员较小，人口密集，集权更为明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立同龄人军团，这是贵族的权力基础，并且有利于统治和兼并截然不同的各族人民。

206

尽管这些来自南非的入侵者霸占了大片领土，但他们也在军事上遭到不少挫折。例如姆佩泽尼-恩古尼人几乎花费了十年功夫企图打败本巴人。[88] 他们的失败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即恩古尼人各个分支都无力打入马拉维湖-鲁伍马地区以北的强盛国家。除关加拉支系以外，其它恩古尼分支都被迫转向南边，但也出乎意料地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例如姆瓦塞·卡松古的切瓦酋长国和桑加人都曾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打退了恩古尼人的入侵。加扎袭击者在赞比西河以南受到巴鲁埃人持久的抵抗，巴鲁埃人顶住了不断地侵袭，保住了自己的独立。[89]

即便在被征服的地区，入侵者的霸权也并非没有遇到挑战。19 世纪 70 年代间，湖畔的通加、通布卡和亨加等族发起暴动反对他们视为外部闯入者的姆布韦拉-恩古尼人。加扎国也遇到了通加和乔皮属民的反抗，其中一些群体甚至同葡萄牙人结盟力图获得独立。洛齐人组织的起义最为成功，赶走了科洛洛人，解放了自己的家园。[90]

---

[85] 同上，M. 梅因加，1973 年，第 105-128 页。

[86] W. H. J. 兰莱(Rangley)，1959 年，第 59-98 页；A. F. 伊萨克曼，1976 年，第 23 页。

[87] 同上，E. 曼达拉，1977 年。

[88] H. W. 朗沃西，1972 年，第 92 页。

[89] A. F. 伊萨克曼，1976 年，第 8-9、49 页。

[90] T. 斯皮尔，1972 年，第 28 页；K. 伦尼，1966 年，第 310-311 页；G. 卡普兰，1970 年，第 10-12 页；D. L. 惠勒(Wheeler)，1968 年，第 587 页。

随着恩古尼人国家形成的过程，整个中部非洲地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虽然数以千计的俘虏和被征服的民族历经兼并，但文化融合的程度和形式在各个被征服的集团之间差别相当大。作为一种规律，移民在扩张势力阶段同化异族的速度最快，到了后期稳定阶段移民的力量和威望衰落，抢劫行径日益受到限制，东道地区的人口大大超过移民。因此，兹万根达巴的恩古尼支系一路北上途经一些支离破碎的政治实体时，人口数倍地增加，然而一旦一些分支在新的家园定居下来，并实行自治之后，他们往往难以获得成功。科洛洛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文化融合的实际形式也因族际接触情形不同而大相径庭。例如被兹万根达巴的恩古尼人征服统治下的民众接受了入侵者的文化，与之认同；而科洛洛移民虽然支配着曼甘贾人，但他们自己却完全被附属社会所同化。[91] 在这两个极端事例之间，更为普遍的则是相互交 **207** 流，有的导致形成混合型文化。甚至消亡了的科洛洛人也给洛齐人留下自己的影响，使洛齐人接受了科洛洛的语言和重要的政府体制。[92] 另一方面，在姆佩泽尼王国，新社会的所有政治特点都承袭南非人的模式，而非政治性文化习俗，如土地继承、婚姻模式、女性割礼，以及语言则受当地恩森加传统的深刻影响。[93]这种分化现象不足为奇，因为姆佩泽尼王国的政治和军事体制设置，本来就是为了确保恩古尼人处于优势地位。地域空间和人口分布似乎在姆布韦拉-恩古尼国的初期阶段决定了文化借用的范围；在王国核心地带恩古尼人占多数，通加人和通布卡人接受了大部分外来文化，但是越靠近边远省份，借用外来文化的程度相应减小。这种一般模式还有复杂性的一面，多少是由于恩古尼人采用通布卡语作为国语的缘故，而且后期又有通布卡文化的复兴，说明许多被征服的民众只是在表面上接受恩古尼人的文化。[94]

虽然有关文献显然没有讨论姆菲卡尼运动对现有社会阶层分化模式的影响，但是零散的资料表明在恩古尼诸王国中都形成了新的阶级。在扩张阶段，出现了一个由军团指挥官及其主要部下组成的军事贵族阶层。他们的权力基础主要来自贡品和抢劫，尤其是牛群和俘奴，其中一部分由他们分给自己的追随者。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的优势地位与靠攫取经济剩余为生的贵族十分相近，后者统治着被征服的邻近国家并控制了象牙和奴隶贸易。

当恩古尼各支系定居于赞比西河以北一带时，劫掠的机会更为有限。军事领袖一方面继续收取被征服民众的贡品，另一方面开始盘剥自己蓄积的奴隶，以便确保财富不断增长。他们并不接纳俘虏和生人，由此给他们提供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相反有资料表明许多这种人最后沦为终生奴隶。姆布韦拉、马塞科和姆佩泽尼等恩古尼支系的贵族都曾大量蓄奴(abafo)，让他们为自己种地，或为其主子当猎手和铁匠。[95]种族和阶级两种因素的结合说明，**208** 不应完全用种族观点来分析后来反对恩古尼人的抵抗运动。

[91] W.H.J. 兰莱，1959年，第59 98页；A.F. 伊萨克曼，1976年。
[92] G. 卡普兰，1976年。
[93] J.A. 巴恩斯(Barnes)，1951年，第2 18页；T. 斯皮尔，1972年，第23-26页。
[94] T. 斯皮尔，1972年，第29-32页；H.L. 韦尔(Vail)，1972年，第161-162页。
[95] K.M. 菲里，1975年，第154-156页。

恩古尼和索托两大族系的迁徙移民，在奴隶贸易方面只是起到一种间接的影响。尽管他们的军事征服行动无疑有利于阿拉伯和斯瓦希里人进行劫掠贩奴，但是没有证据足以说明他们曾与奴隶贩子建立过某种正式的商业联盟。在所有主要的恩古尼和科洛洛首领当中，只有姆佩泽尼、索尚甘恩、塞贝特韦恩和马塞科支系的酋长奇库塞曾经出卖过奴隶，而且他们四家经手的交易规模有限，仅是偶尔为之。[96] 总的来讲，他们选择自己役用俘虏来加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不热衷于把奴隶卖给任何贸易团体。不过，他们的掠夺行径造成许多社会的人口大量流散。对那些在奴隶贩子袭击中受害最深的赞比西河以北各个社群来讲，恩古尼人的侵略进一步加剧了乡村萧条衰落和不发达的进程。

列强"大角逐"前夕

中部非洲在1800至1875年间经历了一次广泛的变革。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变迁产生了新的种族集团，增强了文化交流，加速了阶级分化。该地区大部分并入世界经济，阻碍了乡村的发展，加深了经济依附性。奴隶贩子以及恩古尼人与科洛洛人扩张领土的野心共同导致了本地区政治力量的大规模重新组合。总之，中部非洲在列强"大角逐"前夕的局面极不稳定。此外，政治上分崩离析，种族和地区特性各异，内部冲突频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阶级对抗增加，严重制约了大多数非洲社会抵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能力。

至1875年，当地几乎没有什么强国。这种力量真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多数中部非洲社会在此之前均无能力建立和维持某种集权式政治制度。许多隆达和绍纳国家也在政治上几经分裂。在赞比西河以北一带，奴隶贸易加剧了卡曾贝的隆达王国、翁迪、卡隆加和隆杜等国内部的争斗，导致他们在奴隶贩子和恩古尼人的煽惑和进攻而前不堪一击。南边绍纳贵族内部分裂，加上兹万根达巴和加扎两支恩古尼人的毁灭性打击，大大削弱了该地区强国的力量。例如兹万根达巴人侵得手，普遍认为是由于他摧毁了昌加米腊统治之下四分五裂的罗兹维王国的缘故，而巴鲁埃王国分成两大对立派系，以及加扎人的袭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从而果阿探险家戈维亚在1875年前后曾一度篡夺了巴鲁埃王位。[97]

209

类似戈维亚此举只是大进程中的一部分。尧人、阿拉伯-斯瓦希里人、奇昆达人和恩古尼人入侵者都曾利用这种力量真空征服了不少国家。虽然这些新建的军事政权无疑要比他们所消灭的政治实体更为强大，但是被征服的各族常常视他们为闯入自己家园的外来人，痛恨他们的专横统治。因此这些外来领导人被迫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结果更加激化民众的敌对情绪，起义暴动更为频繁。湖畔的通加、通布卡和亨加各族奋起反抗姆布韦拉-恩古尼人，通加和乔皮人反对加扎人，都表现出被压迫各族的仇恨情绪日益高涨。类似的反抗情神，促使塔瓦拉人和通加人时常向霸占赞比西河南缘大片土地的非洲葡萄牙人及其奇昆达盟友发起挑战。统治沿海一带安戈谢和基坦霍纳两处素丹领地的斯瓦希里当局也遇到了相

[96] E. 弗林特，1970年，第73-79页；H. W. 朗沃西，无出版日期，第34-37页。
[97] A.F. 伊萨克曼，1976年，第48-52页。

同的反抗。这种仇恨并未有助于形成统一反对欧洲人的联合斗争。相反，许多被征服民族后来拒绝援助外族统治者；另有一些民族事实上却帮助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欧洲人。[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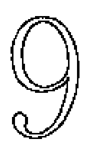
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依赖于欧洲的武器和市场，这就进一步危及他们的自主权。首先，他们在外部压力面前极为脆弱，例如非洲葡萄牙人和奇昆达人情愿充当里斯本帝国的代理人。最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条件的变化，不再允许他们参与奴隶贸易，再加上欧洲帝国主义的野心日益膨胀，促成双方发生剧烈冲突。

大多数中部非洲社会在19世纪后25年中日益脆弱。也有少数国家却在外部威胁或暂时被外国霸占的情况下竟然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本巴王国部分是出于对恩古尼人入侵的反应，在1850年之后一段时期内既完成了政治集权又扩张了领土。在列强“大角逐”前夕，这个王国已经达到鼎盛时期，如果姆万巴三世不在此时突然去世，这个国家很可能会像顽强抵抗恩古尼人那样成为欧洲侵略军难以逾越的障碍。[99]同样，重获解放的洛齐王国在莱万尼卡统治之下极为强大，比起科洛洛人统治以前的时期更为强大，组织也更为完善。[100]19世纪下半叶，姆韦尼马塔帕王国重振雄威，也证明条件的变化可以使一个力量衰退的国家重新占有优势。[101]但是，这些例子十分罕见。总的来讲，19世纪的变革有利于日后欧洲帝国主义的活动。 **210**

（舒 展译）

---

[98] A. 达克斯(Dachs)，1972年，第288-289页；J.T. 博特略(Botelho)，1921年，第469 504页。
[99] A.D. 罗伯茨，1973年，第217页。
[100] M.M. 布尔(Bull)，1972年，第463-472页。
[101] T.O. 兰杰(Ranger)，1963年，第1-3页。



1800-1845年的东非沿海和内地

A. I. 萨利姆

1800年前后的沿海社群

211 在本章论述的这一时期中，东非沿海及其内地人民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状况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发展与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阿曼阿拉伯人取得霸权地位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评价这些变化的性质和程度，有必要对1800年前后沿海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模式作一番综合评述。

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因素是，由本地人统治的各沿海社群享有高度的自治。在阿曼人的帮助下，最终于1728年赶走了鲁伍马河以南的葡萄牙人。此后，阿曼人并没有立即在沿海地区建立起全面、有效的统治。在18-19世纪之交，阿曼人的存在，只在三个中心地区十分明显：蒙巴萨、桑给巴尔和基卢瓦。即使是在蒙巴萨，阿曼人的马兹鲁伊家族也逐渐处于自治状态，它及时支持其成员事实上是无视马斯喀特的布萨伊迪王朝的管辖。他们是在"十二伊玛目派"塔伊发（十二部族联盟）的斯瓦希里谢赫们的合作下，保有这种自治地位的。十二部族又分成两个联盟：特拉阿塔塔伊发（三族联盟）和提萨塔伊发（九族联盟）。这些斯瓦希里族群的领袖引人注目地参与了蒙巴萨的行政事务。一直到1857年，即马兹鲁伊被推翻20年后，理查德·伯顿还提到当时斯瓦希里人参与政事的情况。[1]

1799年，马斯喀特的统治者（伊玛目）的一个亲戚被任命为桑给巴尔的阿曼长官（瓦利），接替曾是埃塞俄比亚宦官和解放奴隶并在阿曼有大片地产的前任雅库特。开始时，本地的统治者——姆维尼·姆库乌带着他的职位的标记（两只鼓和两只号角）同阿曼长官一道统治其臣民。[2] 他的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征收阿曼人向当地以农业和捕鱼以及其它海上经营为生的瓦哈迪姆人和瓦图姆巴图人摊派的税款。阿曼人日益将桑给巴尔作为东非沿海的权力和经济开发的中心，姆维尼·姆库乌渐渐失去了权力，他的臣民的土地也越来越多地被阿曼移民夺去。这些移民开始占据桑给巴尔城以北和以东的肥沃地区。

212

18世纪80年代，马斯喀特伊玛目的兄弟试图将当时处于本地设拉子素丹统治下的基卢瓦-基西瓦尼，作为造反的基地来反对他的兄弟。伊玛目于1785年采取断然行动，派出

---

(1) R. 伯顿（Burton），1872年，第40页。

(2) J. M. 格雷（Gray），1962年，第160页，提到美国观察者们提到的与阿曼长官一道进行统治的桑给巴尔"国王"和"亲王们"。

一支远征军前往该岛。远征军留下了一支人数不多的驻军，预防将来可能再度发生的颠覆活动。阿曼人在岛上存在的另一个目的，是从法国人在当地进行的奴隶贸易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即使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本地的素丹仍保有自己的称号以及五分之一的关税。他是在本岛和对面大陆上的定居点的贵族显宦帮助之下行使其权力的。大陆上的定居点向南一直远达德尔加杜角，基卢瓦的素丹在这一地区享有某种程度不确定的封建领主地位。[3]大陆上新定居点基卢瓦-基温杰的出现，加快了基卢瓦-基西瓦尼经济衰败的速度。19世纪初，新定居点开始将大部分奴隶和象牙贸易从基卢瓦-基西瓦尼吸引过去。

1800年前后，东非沿海的其它地区同许多沿海岛屿一样，由斯瓦希里家族统治。在马菲亚岛及其三个主要定居点——基西瓦尼、乔莱和库阿，行使实际权力的有好儿个显要的家族，其中包括舍特里家族。18世纪最后25年中，基卢瓦-基西瓦尼抵抗阿曼人的势力得到人民的同情，使阿曼人无法像在基卢瓦那样在这一岛区留下驻军。

与此相似，直到1800年，在从基卢瓦到蒙巴萨的沿海地区仍无阿曼人的统治。在萨达尼、潘加尼、姆坦加塔、坦噶、万加和文巴库等聚居区，由"琼布"和"迪瓦尼"等地方领导人行使的传统行政管理处于支配地位。琼布和迪瓦尼掌握着通常的职位标记——号角、鼓和伞，在来自当地显赫氏族的辅助官员"沙哈"、"姆维尼·姆库乌"和"阿米里"的协助下，行使解决争端、宣布审判和征收地租的职能。在行政管理和审判过程中，习惯法往往和伊斯兰教规同时采用。

在基卢瓦和蒙巴萨之间的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定居点是文巴库，它位于今天肯尼亚南部沿海的万加和加西之间。在这里发展起来的行政单位文巴库，其人民是文巴人，是由设拉子人、非洲人和阿拉伯沙里非成员杂居形成的。其统治者采用"迪瓦尼"的称号(这个名字来自波斯语，意为"议事会")。公元1700年以后，从哈德拉毛来这里的赛义德·阿布·贝克尔·本·谢赫·马西拉·巴-阿拉维，通过与当地家族联姻，建立了一个王朝。其授职典礼所体现的文巴人治国方式，既包括伊斯兰教，也包括非伊斯兰教的非洲仪式。"迪瓦尼"的职位标记是"西瓦"(号角)、伞、木鞋和穆斯林缠头巾。他最重要的职能是司法方面的——根据既包括伊斯兰成分也包括传统成分的混合法律体系裁决争议。他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同样得到"沙哈"、"瓦兹里"、"姆维尼·姆库乌"和"阿米里"等的辅佐，这些官员都是从著名氏族中挑选出来的。"迪瓦尼"的司法权限十分广泛，面一个"琼布"的权限，只不过是一个村子，或一个村子的一部分。巴-阿拉维王朝在向迪戈人和塞盖朱人传播伊斯兰教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而迪瓦尼的沙里菲背景自有其宗教方面的影响，无论是作为统治者还是作为开业者在使用咒文和驱邪符等宗教医术方面都是如此。[4] 214

在蒙巴萨以北，葡萄牙人时期以来，马林迪已相当衰败，特别是其统治家族在16世纪90年代迁往蒙巴萨以后。在本章论述的整个时期里一直如此。1848年曾到过此地的J.L.克拉普夫说，该城生活在威胁这一地区的奥罗莫(加拉)人的阴影之下。[5]直到赛义德·萨义德时期该城才得以复兴，他鼓励阿曼人来此定居，由一支驻军来保护他们，到19世纪70年

③ E.A.阿尔珀斯(Alpers)，1975年，第190-191页。
④ A.I.萨利姆(Salim)，1973年，第29-30页；详细的研究见W.F.麦凯(McKay)，1975年。
⑤ J.L.克拉普夫(Krapf)，1865年，第1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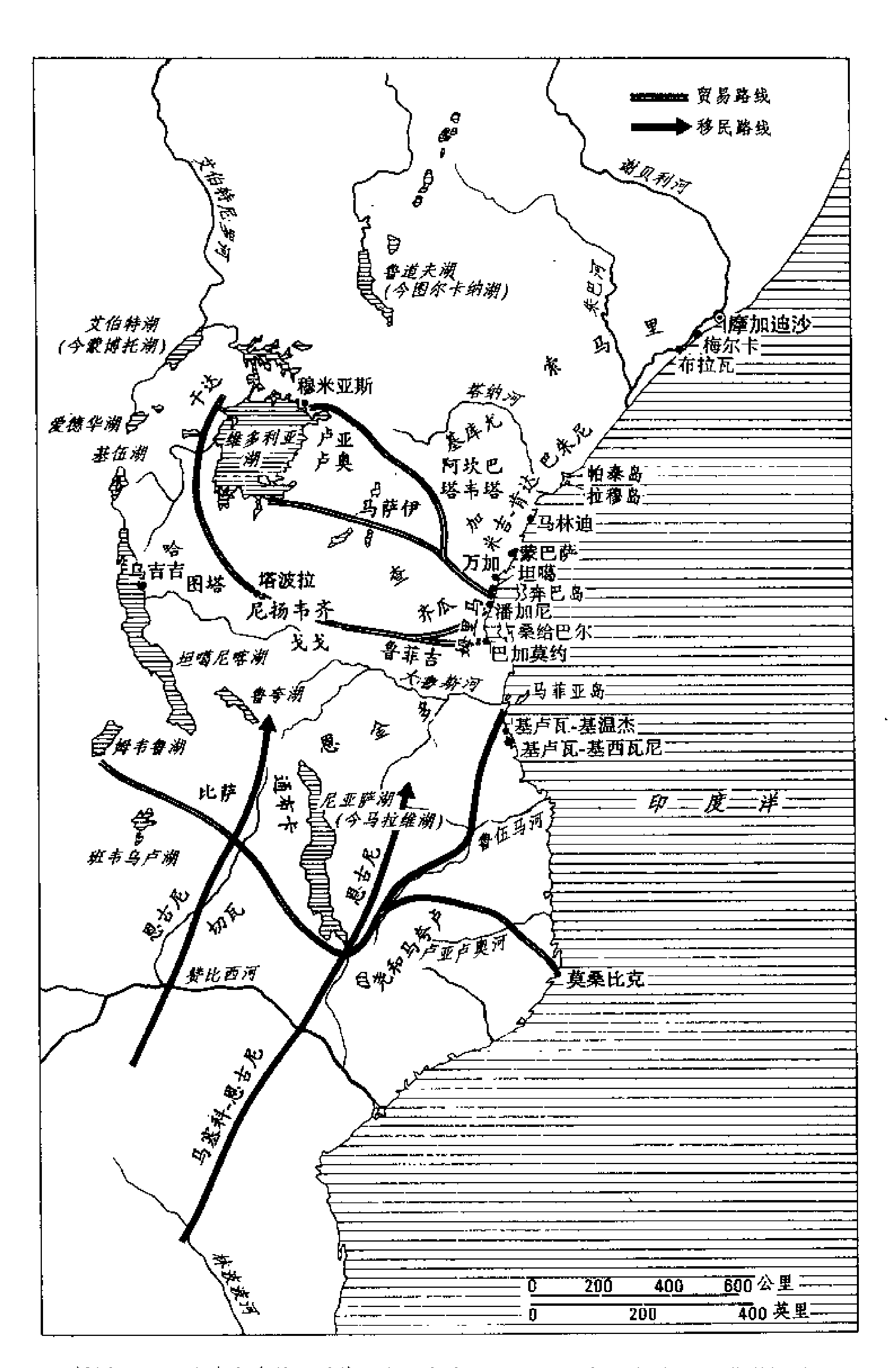


插图 9.1　沿海和内地：民族及主要商路，1800-1850年（仿照A.I.萨利姆图）

代，他帮助将该城变为沿海农业开发最成功的例证之一。

马林迪以北，唯一引人注目的定居点在拉穆群岛。帕泰是世纪之交最为重要的定居点。统治该地的是纳布哈尼家族，他们仍以拥有精美的象牙号角作为权位的中心标记。但到1800年，同17-18世纪繁荣兴旺、势力显赫的全盛时期相比，该城已衰落了许多。[6] 后来，内部争夺继承权的冲突，与邻邦拉穆的争夺，以及卷入蒙巴萨的马兹鲁伊家族的野心，使之进一步衰败，为这个岛国从属于布赛义迪的桑给巴尔铺平了道路。

拉穆内部的派别之争和相互猜忌促使外来者干涉该城的事务。拉穆与帕泰相距不远，两城的家族之间又有许多关系，从而使拉穆卷入了帕泰的事务中去。到世纪之交，纳布哈尼家族统治下的帕泰尽管经济衰落，却仍认为拉穆从属于它，但拉穆的领导家族却不这么想。**215** 这种紧张关系迫使双方在蒙巴萨的马兹鲁伊同布赛义迪之间更大范围的争端中采取相互对立的立场。以后将会看到，结果是双方均附属于桑给巴尔。帕泰岛上的另一个定居区——锡尤，由于其统治者布瓦纳·马塔卡表现出毫不动摇的独立精神，一直到本章论述的这个时期结束之后仍保有独立。

在拉穆群岛对面的大陆上，向北直到索马里人聚居的地区，住的是巴朱尼人，他们效忠的对象是自己的首领。即使到本章论述的时期结束，这里的人们也并未真正感到桑给巴尔的控制。巴朱尼人主要从事海上经济活动：捕鱼，砍伐红树，采集和出售玛瑙贝壳、龟壳和龙涎香，有时也同邻近的索马里人和奥罗莫人作贩牛交易。[7] 后来，奴隶贸易在沿海地区日趋重要，巴朱尼人也参与其中，将奴隶运往邻近的贝纳迪尔港口。

在本章论述的这个时期，贝纳迪尔沿海地区主要是实行自治，像摩加迪沙、梅尔卡、布拉瓦和瓦尔希赫等中心均由当地的索马里谢赫统治，他们欢迎某些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参与本城的贸易活动。但即使是在建立了桑给巴尔的阿曼素丹国之后，贝纳迪尔各港口仍享有很大程度的政治自治。[8] 直到1842年，赛义德·萨义德才应索马里首领们的要求，在摩加迪沙派驻了一位代表。那些首领们更感兴趣的是促进与萨义德的经济联系，并在面临索马里内地的强盗侵袭时从他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而不是使自己从属于桑给巴尔。这是一种两相方便的关系，因为萨义德只是期待他的代表在摩加迪沙监视商业往来情况和监督税收。[9] 也就是说，萨义德的野心在经济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

阿曼素丹国

阿曼素丹国在东非沿海地区的成长和发展是以赛义德·萨义德基本上属于经济方面的野心为基础的，他正确地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商业王子。阿曼本国和非洲东部沿海地区的某些政治-经济因素，对沿海地带阿曼素丹国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作用。在18世纪末，阿

⑥ 详情见W. 希琴斯(Hichens)(编)，1939年；J. de V. 艾伦(Allen)(编)，1977年。
⑦ J. L. 克拉普夫，1860年，第114页。
⑧ 见M. 吉兰(Guillain)，1856年，第2卷，第527-530页。
⑨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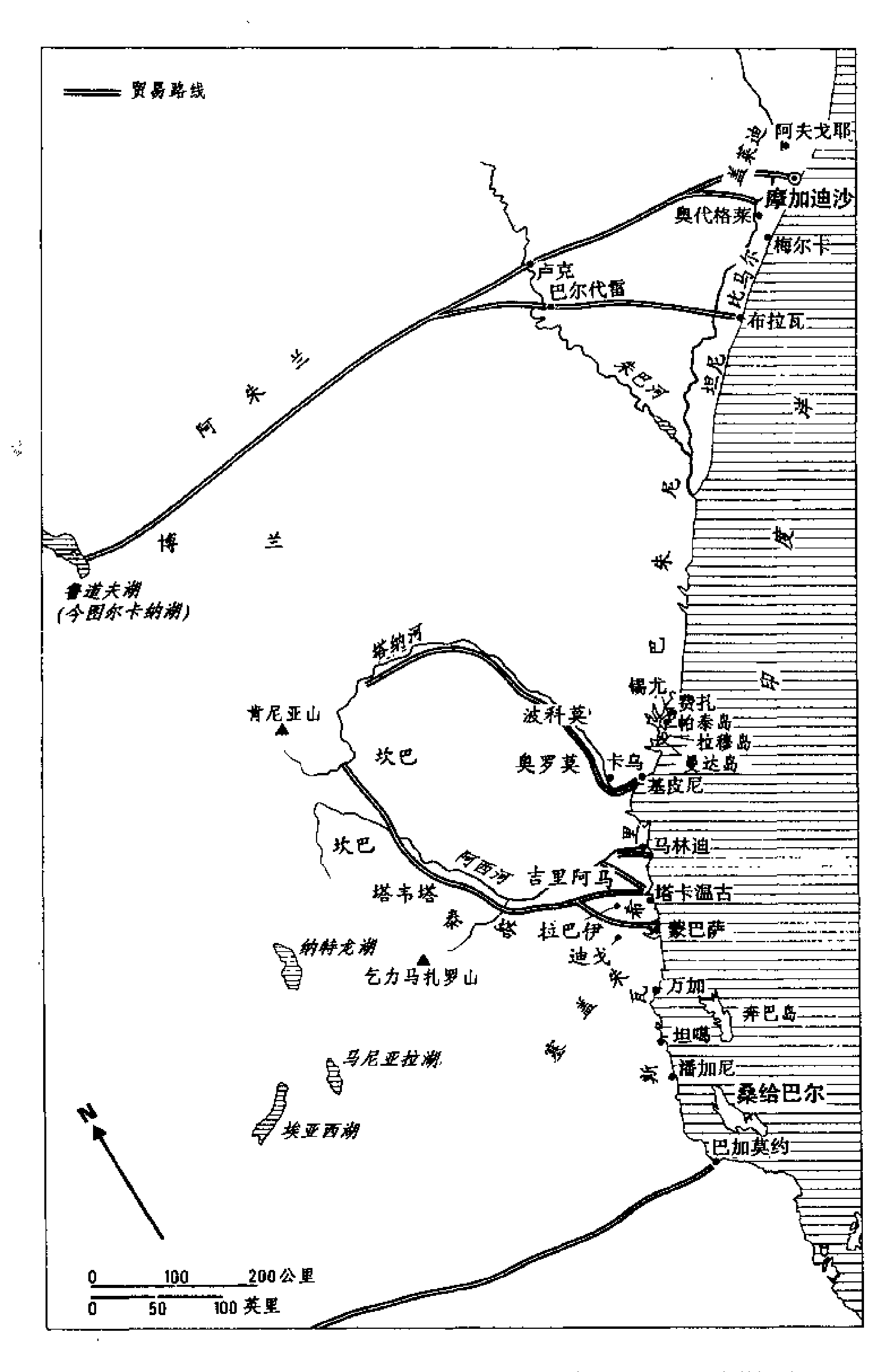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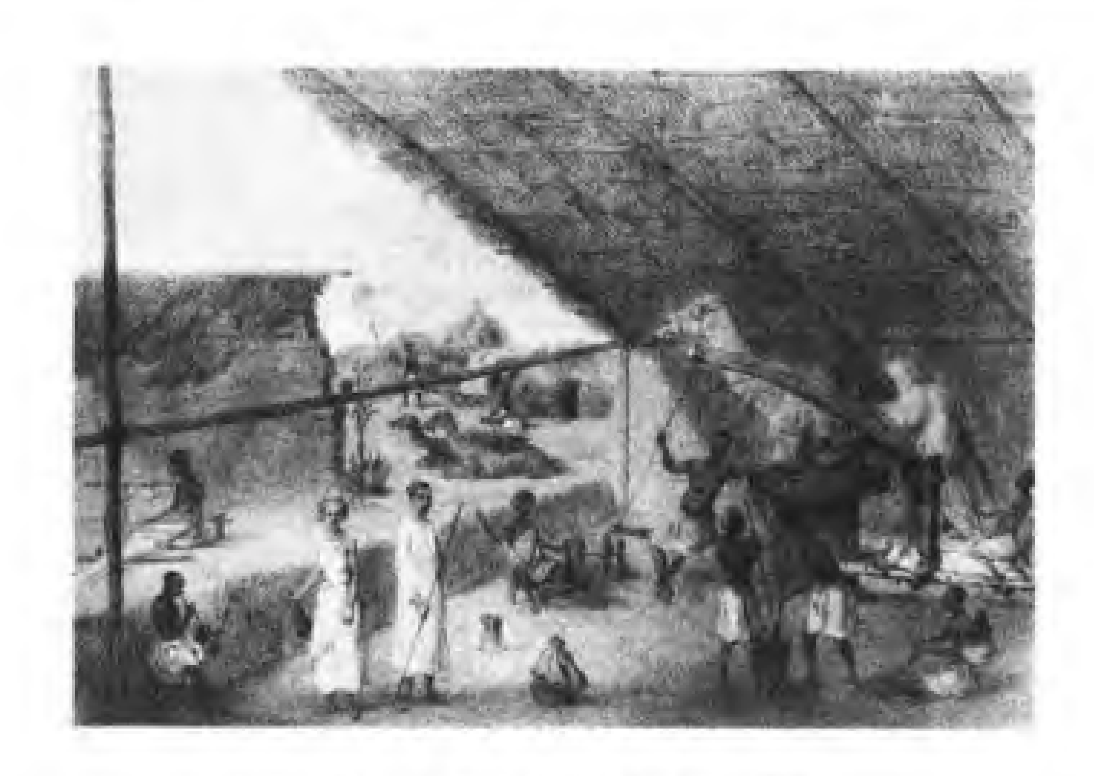


插图 9.2 北部沿海和内地：贸易路线，约1850年（仿照 A.I. 萨利姆图）



图片9.1 摩加迪沙的芝麻榨油业，1847年

曼的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阿曼人打着中立的旗帜，利用拿破仑战争夺取了印度洋 217 及邻近水域相当份额的运输生意，惹得英国商人抱怨说，阿曼扩大了的商船队使他们相形见绌。到世纪之交，阿曼的统治者本·艾哈迈德素丹已同印度洋周围的许多地区——埃塞俄比亚、设拉子、信德和巴达维亚(雅加达)——沿海签订了贸易协定，为本国建立了有利可图的联系。到1802年，他在东非沿海地区的代表们每年交给他价值40,000玛丽亚·特蕾西亚元[10] 的税收。

1806年，萨义德·本·素丹接替他父亲成为伊玛目，他继续对英、法保持中立的英明政策。1807年，他同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英国很清楚马斯喀特的战略意义，感到不得不默认这一中立政策，并在萨义德针对加瓦辛人和瓦哈比人等破坏稳定势力的战争中支持他，帮助他实现国内的稳定。

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引起他对沿海地区的关注。他了解沿海地区的经济潜力；他想利用当地王朝之间的争端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并插足抵制欧洲人在这一地区逐渐增长 218 的利益。他对法国人攫取更大势力范围的野心十分关注，并因此在1785年决定向基卢瓦派驻一名长官。1801年，帕泰曾邀请英国人建立一座城堡，以这座岛屿城市的一半出产来换取英国保护它免受法国预谋之害。[11] 这件事，以及关于英国船只随之前往的报道，可能促使萨义德让他在沿海地区的存在和影响更具实质的内容。

[10] C.S. 尼科尔斯(Nicholls)，1971年，第99页。这一材料对追溯阿曼人势力在东非沿海的增长特别有用。
[11] C.S. 尼科尔斯，第120-121页。英国孟买议事会曾派T. 斯米上尉去调查东非的经济潜力。



图片9-2 桑给巴尔素丹萨义德·本·素丹(1804-1856年)

随后而来的政治和军事的冒险是更为人们所熟悉的。萨义德决定更多地卷入斯瓦希里人的政治冲突，特别是马兹鲁伊在其中发挥某种作用的冲突。帕泰岛内部的继承危机导致马兹鲁伊卷入其中。到1811年，一个亲马兹鲁伊的素丹统治了帕泰，而他的对头则被马兹鲁伊扣在蒙巴萨作为人质，其追随者则逃往拉穆。这样一来，拉穆与马兹鲁伊支持的帕泰之间的冲突迫在眉睫。1812-1813年，发生了斯瓦希里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军事对抗之一的谢拉战争，一支帕泰-马兹鲁伊联军在帕泰岛的谢拉村登陆，力图迫使拉穆就范。入侵者被彻底打垮，帕泰对拉穆称王称霸的幻想终于化为泡影。

拉穆担心受到报复，于是请求萨义德提供支持和保护。萨义德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向岛上派出了一位布赛义迪长官和一支驻军，这不仅是为了对付马兹鲁伊-帕泰的威胁，而且也是为了阻止马兹鲁伊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因为它可能危及布赛义迪正迅速扩大的影响。这样，马兹鲁伊家族安坐于蒙巴萨，势力扩展到奔巴和帕泰，而布赛义迪则只有桑给巴尔和基卢瓦。

处于守势的萨义德转而采取攻势，削弱马兹鲁伊的影响和统治，并以此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在帕泰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小集团。亲马兹鲁伊的素丹死后，这一小集团的首领成了该岛的素丹。当这位亲布赛义迪的素丹于 1822 年去世时，萨义德和他在拉穆岛上的长官与马兹鲁伊家族以及他们新的候选人菲莫伦蒂作战，并成功地任命了一个顺从布赛义迪的素丹，还在帕泰岛上驻扎了一支部队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于是，到 1822 年萨义德扭转了拉穆群岛中两个当时最为重要的据点——拉穆和帕泰——的政治形势，使之有利于自己。同年，他在奔巴岛上向马兹鲁伊家族挑战，奔巴岛上一个反对马兹鲁伊的集团曾派出两名代表到马斯喀特寻求反对马兹鲁伊的支持，根据这一请求，布赛义迪利用马兹鲁伊的长官暂往蒙巴萨的机会，于 1823 年夺取了奔巴。马兹鲁伊试图夺回奔巴但没有成功。

就这样，萨义德在将其注意力认真地转向斯瓦希里沿海十年之内，就为自己及其 **219** 王朝确立了控制的地位，并使宿敌马兹鲁伊感到岌岌可危。正是这种感觉导致马兹鲁伊与英国海军军官 W. F. 欧文上校谈判，使英国轻而易举地于 1824 年宣布蒙巴萨为其保护地。

英国对欧文行动的官方政策有些暧昧不清。尽管没有放弃宣布蒙巴萨为保护领地，但也没有积极地表示欢迎。即使有过某种热情，阿曼与英国的关系也会为之浇上一桶冷水。欧文曾希望并计划将蒙巴萨作为一个反对奴隶贸易的基地，而英国则计划通过萨义德来削减 **220** 这类贸易，并为此目的于 1822 年同他签订了莫尔兹比条约。现在，欧文支持了他的对头马兹鲁伊，这使英国在外交上处于尴尬的地位。

后来的事态表明，保护地是短命的。这一条约于 1826 年失效，不仅是因为英国政府最终决定与萨义德联手，而且也因为马兹鲁伊家族自己对条约感到失望。英国官员对其内部行政事务的过分干预使他们不快，英国人分享关税和限制进口奴隶，自然也不会使他们高兴。此外，英国人当然也没有帮他们夺回失去的地盘。

尽管保护地关系于 1826 年结束，但萨义德制服马兹鲁伊却是十年以后的事，1828 年，布赛义迪的一支部队占领了耶稣堡，但几个月后萨义德的驻军受到围困，被迫撤走。1829 年和 1833 年的两次征讨也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兹鲁伊得到三族联盟和九族联盟这两个斯瓦希里群体的支持。如同在帕泰和奔巴的情况那样，萨义德只是在发生了内部分歧时才最终取得了成功。马兹鲁伊内部产生了两派。才干过人并深得人心的统治者萨利姆·本·艾哈迈德于 1835 年去世，他的继承人同三族联盟的谢赫们闹翻了。萨义德再度受到失意集团的邀请。他这次征讨(1837 年)没有遇到抵抗。马兹鲁伊家族缴械投降，萨义德得到了他久以垂涎的战利品——蒙巴萨。同在别处一样，伴随承认布赛义迪霸主地位而来的，是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这样，在蒙巴萨，萨义德的长官同三族联盟和九族联盟的谢赫们分享着行政职责。

沿海与内地的贸易关系

蒙巴萨落入萨义德的手中时，他似乎已下定决心要将首都从阿曼迁往桑给巴尔。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重大决策，影响到他自己和整个沿海地区的命运。桑给巴尔岛的土地富

饶并有一个极好的港口，其战略地位之重要，还因它面对着姆里马海岸，那时这里已成为来自内地的最重要的贸易项目——象牙和奴隶——的主要出口地。即使在素丹决定迁都桑给巴尔之前，来自这一贸易的丰厚收入已在他的金库中得到了反映。他的瓦利(长官)已开始命令所有外国商人只同桑给巴尔打交道，取缔一切与姆里马的直接贸易，来创造桑给巴尔至上的环境。[12]

> 桑给巴尔很快在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超过了其它沿海城镇。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赛义德·萨义德生意上的精明和他开明、有远见的政策，就使桑给巴尔成为印度洋西岸最大的独家商业中心。它成为东部沿海最重要的象牙、奴隶、丁香、柯巴胶、玛瑙贝和农产品市场，也是印度、美洲和欧洲制成品——棉制品、串珠、金属线、链条、毛瑟枪、火药、瓷器、陶器、玻璃、刀斧——的最大进口者。其地位由于素丹同美国(1837年)、英国(1839年)、法国(1844年)以及一段时间内同一些日耳曼国家签订的商务和领事协定所体现的国际承认而进一步提高。[13]

221

在上述所有贸易项目中，使阿曼素丹国获利最丰的是象牙和奴隶，原因是海外对它们的需求不断扩大，而当地对奴隶的需求也在扩大。在19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象牙和奴隶是通过内地各族——主要是尧人——建立的通往沿海的商业网运出来的。E.A. 阿尔珀斯强调了象牙在世纪之交的桑给巴尔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14] 它在东非和中非的长途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且是多数尧人主要关心的所在。由于更高价格的吸引，尧人将他们的象牙从莫桑比克沿海转向桑给巴尔沿海，主要出口是基卢瓦-基温杰。

在此，应该将基卢瓦-基西瓦尼这个海岛城镇同尧人这时在象牙贸易中利用的基卢瓦-基温杰加以区别。到19世纪30年代，基卢瓦-基西瓦尼由于内部分裂和不利的环境条件而在相当程度上衰败了。而27公里以外北面大陆上的村子基卢瓦-基温杰却取而代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早在1819年，就在这里设置了一位阿曼长官来推动贸易并从中获益。阿尔珀斯认为基卢瓦-基温杰的兴起，是沿海与内地经济结合程度增长的象征。[15] 他认为，这个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主要是由于市场的作用，不仅是由于桑给巴尔的发端，也由于内地的人民把他们的货物拿到这里来卖：

> 基卢瓦-基温杰兴起并在东非贸易中占据显赫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像马桑宁加-尧人冒险者姆维尼·姆克温达那样的来自遥远内地的人们所做的贡献，他于18世纪末在基卢瓦-基温杰定居。

因此，沿海同内地之间的商队贸易是由非洲人创始的。在尼亚萨湖地区和沿海之间进行贸易的，除了尧人之外，还有比萨人。据阿尔珀斯讲，尧人同比萨人之间的竞争迫使前者更多地集中于奴隶贸易来赚取更多的利润，因为比萨人压低象牙价格，使他们在基卢瓦更受欢迎。在19世纪头50年，如果说象牙贸易不如奴隶贸易重要，也是同样重要。比萨人同尧人都将象牙和奴隶运到基卢瓦，再从那里装船运往桑给巴尔。到1850年，基卢瓦-基

222

---

[12] 同上，第80-81页。
[13] A.J. 萨利姆，1973年，第15-16页。
[14] E.A. 阿尔珀斯，1973年，第175-185页。
[15] 同上，第236页。

温杰已成为莫桑比克和桑给巴尔之间的沿海地区中最重要的城镇，从那里出口的不仅有象牙和奴隶，还有大米、柯巴胶和烟草等其它产品。但该城当时经济上的重要性却在于象牙和奴隶。

内地那些被抓来当做奴隶卖掉的人，往往同奴隶贩子属于同一种族集团，例如尧人、比萨人、马夸人和恩金多人。大多数奴隶都是由于战争或袭击为他人所获。这些袭击并不一定是专门为了捕获奴隶而进行的。在这类冲突中被俘获的人后来被用来交换像布匹之类的沿海商品。内地人也保留奴隶供自己驱使。有时，一个奴隶在抵达沿海之前已多次换了主人。[16] 据阿尔珀斯介绍，成群结队的奴隶就用这种方式从内地转到沿海，或者转到某个尧人首领——如姆庞达、马坎吉拉和马塔卡——的内地商队集结地，他们先在那里集合，等人数多了，再大批地被带往沿海。

尧人、比萨人和其它的集团利用尼亚萨湖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与此相似，在更靠北的地方，尼扬韦齐人、坎巴人和米吉肯达人也从事类似的贸易活动。早在 18 世纪，外国产品就通过地区间的贸易进入了坦桑尼亚内地。这种情况刺激了猎象活动，以取得象牙交换外国产品。这样，在 1800 年前后，松巴哇人和尼扬韦齐人就穿越乌戈戈地区，建立了他们自己同沿海地区的联系。[17] 这一联系导致乌尼扬韦齐地区与沿海之间出现一个商业网，连接沿海与内地的新商路层出不穷。

第一个非非洲人的商队是 1824 年抵达乌尼扬韦齐的。1831 年，有一半阿拉伯血统、一半尼扬韦齐血统的利夫·本·赛义德向内地行进到坦噶尼喀湖，并于 1837 年派他自己的商队前往内地。1841 年，一个阿拉伯商队越过坦噶尼喀湖抵达卡曾贝。在本章论述的这一时期结束时（1845 年），沿海的商人已抵达布干达。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卡巴卡的欢迎。这不仅出于商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军事方面的因素，因为他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枪支，这在与邻邦的冲突中很有用。这种向内地推进活动的主要动力是象牙和奴隶的价格不断上涨。[18]

在更北面，到 19 世纪开始时，沿海对象牙和其它商品的需求增加，使米吉肯达同坎巴之间的地区贸易变得更为频繁。那时，米吉肯达已在边境各市场建立起同斯瓦希里、瓦塔、万加和奥罗莫的贸易网。这样，迪戈人在大陆上蒙巴萨以南的迪戈的姆塔韦市场，用高粱、芝麻、椰干和其它商品同斯瓦希里人交换布匹、鱼、金属线和串珠。他们建立了同尚巴人购买烟叶的贸易关系，他们再卖给吉里阿马人。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文巴-迪戈商队从万加向塔韦塔、恰加、桑布鲁等内地行进，最后远达维多利亚湖。 223

到 18 世纪末，吉里阿马人建立了自己同坎巴人的长途内地贸易。甚至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是沿海象牙的主要提供者。他们的象牙是通过狩猎以及同瓦塔人和奥罗莫人进行易货贸易取得的。到 18 世纪末，对它的需求在上升，而当地的供应来源却开始枯竭，这促使吉里阿马人向内地进发，开创了最早前往基图伊的坎巴人地区的商旅。吉里阿马人利用拉巴

---

[16] E.A. 阿尔珀斯，1973 年，第 240-241 页。

[17] J. 艾利夫(Iliffe)，1979 年，第 41 页。

[18] 同上，第 42 页，指出在印度西部的苏拉特，象牙价格在 1804-1808 年间翻了一番；在桑给巴尔，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90 年代，象牙价格上涨了六倍。

伊人作为他们与坎巴和斯瓦希里的中间人。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拉巴伊几乎垄断了同坎巴人的商队贸易，自那时起，坎巴商队开始取消他们的中间人作用。

贸易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

到 19 世纪初，坎巴人跨过土地肥沃的姆博尼高地，扩展到基图伊等一些不太肥沃的低地区，这就有必要进行社会-经济的调整和适应。为了维持生计，在不太富饶的地区进行狩猎、放牧和实物交换贸易。一种称为“库图瓦”(kuthuua，意为寻找食物)的制度建立了起来。这必然导致同基库尤人、恩布人和马萨依人等邻邦进行实物交换。随着吉里阿马人的到来，这一地区性的坎巴人贸易网扩展到了沿海。到 19 世纪 20 年代，坎巴人建立起自己的商队前往沿海。随着贸易潜力日益明显，置身其中的人越来越多。在 19 世纪 30、40 和 50 年代，坎巴商队在东非北部内地的长途贸易中处于统治地位，直到后来，像早先在南部(坦噶尼喀)内地贸易发生过的那样，被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队所取代。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队规模更大，武器更精良，从 19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向内地进发，势不可挡。这些沿海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将产生某些重要的后果。例如，米吉肯达人居住在筑有围墙或城堡的定居点“卡亚”(kaya)的方式受到破坏。1830 年以后，从事商业活动的诱惑和机会迫使许多迪戈人、吉里阿马人、拉巴伊人和杜鲁马人不再居住在“卡亚”中，而是在周围地区建立自己的安身之地。

这种由于寻找贸易机会和更好的牧场而分散居住的情况，不仅破坏了“卡亚”的共同生活，也破坏了长者们的权威。生活的中心变成更小的社会单位，如次氏族或门第。由于 **224** 分散居住，在“卡亚”中聚会举行成年仪式变得越来越困难，同龄人编组也随之消亡。在米吉肯达人和坎巴人中产生了一些富有者，他们利用从贸易活动中取得的财富来培植自己的追随者并扩大影响。

一个叫恩贡约的吉里阿马人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建立了不亚于他父亲的同斯瓦希里人、奥罗莫人、瓦塔人和坎巴人的贸易关系，并为自己建起一个相当规模的村子，将那些原本并无关系的追随者集中起来。这样，他就为后来让英国人承认他为头领铺平了道路。迪戈领导人姆瓦基孔杰是另一个例子。他垄断了同坎巴人的贸易，并利用由此获得的财富发展个人的同盟和追随者，甚至还在佐姆博设立了自己的法庭，他采用了“库博”(kubo)的称号。

坎巴人有自己的“大人”(andu anene，安杜阿尼尼)，他们凭借从事贸易聚敛的财富取得权力和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基武伊·姆温达，他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从事沿海与乌坎巴尼之间的长途贸易，声名显赫。[19] 随着贸易的发展，商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基武伊的商队大约有 300 人。他的联盟网包括基图伊-坎巴人、恩布人和米吉肯达人，一直延伸到蒙巴萨，那里的长官是他的贸易伙伴。

到 19 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在北方斯瓦希里-米吉-肯达沿海以外的地区，也可看出业已

[19] 详情参见 R. 卡明斯(Cummings)，1975 年；关于米吉-肯达人，参见 T. 斯皮尔(Spear)，1974 年。

建立起来的内地与沿海之间商业关系的相似模式。在19世纪最初的岁月中，拉穆已经取代帕泰成为拉穆群岛中最为重要的商业港口。到这时候，拉穆的居民已在对面的大陆上建立起一种地道的种植国农业体系——孔代制[20]。同时，来自群岛的商人从奥济河上的卡乌和基皮尼等处深入内地，抵达塔纳河地区，同波科莫人和奥罗莫人交换牲畜、象牙和农产品。

一个相当规模的商业网将索马里沿海贝纳迪尔地区的城镇——布拉瓦、梅尔卡和摩加迪沙——同内地联系起来。在19世纪这一阶段中，贝纳迪尔的港口同埃塞俄比亚南部和今天肯尼亚北部的一些地点建立了联系，一直到鲁道夫湖(今天的图尔卡纳湖)。这一广泛的商路网上的关键地点是朱巴河上的卢克和巴尔代雷。索马里和博兰的商人将象牙、牲畜，有时还有奴隶带到这些城镇，从那里转到海岸附近的集市城镇，如摩加迪沙附近的阿夫戈耶和梅尔卡附近的奥代格莱。最后，这些货物运达上述的那些贝纳迪尔港口。其它的索马里 225 族群，如比马尔人、盖莱迪人和坦尼人，则向港口城市供应在谢贝利河流域的沃野中生产的农产品，并在内地充当索马里商人的代理人。

这些商业关系建立在将东非沿海各地与内地联系起来的商旅贸易的基础之上，到本卷论述的这一时期结束时(1845年)，已逐渐产生了社会-文化影响，但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更大的发展。如前所述，个人主义兴起，出现了少数人聚敛财富(尽管时间短暂)并在传统社会结构之外扩大影响和声望的现象。更为流行的是娶外族妻子的习惯。这种现象日益引人注意，例如，迪戈人和拉巴伊人在19世纪就是以此来扩大其商业联系。米吉-肯达人、奥罗莫人、坎巴人和斯瓦希里人之间因此而建立了血缘亲属关系。肯尼亚东部这些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导致采用了一些新的仪式，同样引人注目。在19世纪，“由原来单独文化的习惯方式混合而成的整个地区的共同方式，使治病与求神、控制雨量、镇服精灵的新的方法传遍了肯尼亚”。[21]

社会-经济变革的动力为沿海城镇和内地的某些群体带来了文化的变革。随着商旅贸易的发展，这些城镇的人口增加了，其种族成分也更复杂。在这些城镇中，有新近迁来的阿拉伯人和内地的非洲人，还有更为引人注目的奴隶成分。在种植园和家庭内部使用奴隶的现象越来越多，随之广泛流行的纳妾现象，导致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非洲人同斯瓦希里人之间更大的种族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一体化。就连作为统治者的阿曼贵族中，甚至在素丹的王宫中也是如此。萨义德的妻妾大多数是非洲人，他的子女讲的是斯瓦希里语而不是阿拉伯语。19世纪中，所有萨义德素丹职位的继承者都是女奴所生。在这种状况下，正如许多外国来访者后来看到的那样，试图保持阿拉伯人的同一性是越来越难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阿曼或也门的阿拉伯人同在斯瓦希里城镇里定居的斯瓦希里化或非洲化了的阿拉伯人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差异。前者分别被称为姆曼加(Mmanga)和姆什希里(M-shihiri)。布赛义迪霸主地位的建立，以及来自内地和也门的移民浪潮，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城市居民的分层模式，并推动了新的演变，例如在拉穆就是如此。[22] 到19世纪50

---

[20] 参见M. 伊尔维萨克(Ylvisaker)，1975和1983年。

[21] T. 斯皮尔，1981年，第131页。

[22] 见A. 扎因(El-Zein)，1979年；A.H. 普林斯(Prins)，1971年。

226 年代，桑给巴尔的15万居民中，有6万是奴隶。[23] 1837年在蒙巴萨被赶下台的马兹鲁伊家族，在他们原来城邦南面的加西和北面的塔卡温古安顿下来，分别同两地的迪戈人和吉里阿马人产生了紧密地相互影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了吉里阿马的长者。恩戈约同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了盟兄弟。从桑给巴尔和姆里马人那里输进奴隶。马兹鲁伊家族将加西和塔卡温古建成了新的政治与经济基地，利用和迪戈人及吉里阿马人的结盟进一步达到这一目的。

在沿海地区发生这些变化时，内地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那里的许多群体，由于接触长途贸易并参与其中，程度不同地"扩大了规模"。人们效仿或接受沿海的物质文化。因此，在内地一直到布干达，更常见人们穿着斯瓦希里长衫——"坎祖"(kanzu)。前面提到的尧族首领马塔卡，曾吹嘘试图把他的地区改变成沿海居民点翻版。他按沿海的风格重建自己的首府，种上芒果树加以美化。[24] 其他非洲统治者后来也这样做，例如金韦里的儿子、马津代的首领森博贾，他穿阿拉伯人的服饰，喜欢斯瓦希里的烹调。又如哈亚的统治者、卡拉圭的鲁曼伊卡，他用通过商队贸易从沿海地区弄来的奢侈品装饰自己的王宫，包括飞禽标本、镜子和钟表。

19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的种子开始撒向内地。皈依伊斯兰教的不仅是首领家族的成员，而且该教第一次传人农村地区。迪戈人和塞盖朱人最靠近海岸，也最容易接受伊斯兰教。在米吉-肯达人的其他成员中，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巴干达人中间，阿拉伯商人兼传教士艾哈迈德·本·易卜拉欣于1844年抵达后不久，就有人入教。[25] 等基督教传教士于19世纪70年代抵达布干达时，卡巴卡·穆特萨已经遵循伊斯兰教教规，例如斋月，此外还建了许多清真寺。那时，在邦德、乌济瓜和马孔德高原也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只是程度要轻些。

伊斯兰教一旦被接受，往往以一种调和的形态出现。同时，也有一些社会将伊斯兰成份纳入自己的传统宗教，或者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采用沿海地区的做法、人物和神灵。于是，一些坎巴神灵有了斯瓦希里名字；在苏库马人的仪式中也会提到桑给巴尔素丹巴尔加什的名字。[26]

227 作为一种语言，斯瓦希里语在内地的传播比伊斯兰教还广，特别是在坦噶尼喀内地。到19世纪50年代，伯顿发现许多萨加拉人和戈戈人都讲斯瓦希里语，而且内地的几乎所有种族集团都有人会讲斯语。[27]

除了沿海文化对内地的这种影响(虽然在19世纪上半叶还相当有限)之外，还存在着内地各族群之间文化的交融。在某些内地族群中，对沿海商人以及他们的文化也有相当的抵触，特别是那些远离商路的族群。实际上，内地在没有长途贸易的影响，或只有很小影响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有许多内地社会并不认为同沿海的贸易交往对他们的经济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

[23] J. 艾利夫，1979年，第42页。
[24] 同上，第78页。
[25] 见A. 奥戴德(Oded)，1974年；A.B. 卡索齐(Kasozi)，1974年。
[26] J. 艾利夫，1979年，第79页。
[27] 同上。

于是，在 19 世纪上半叶，基库尤人仍在今天肯尼亚中部高原土地肥沃、森林丛生地区扩展他们的定居范围。充足的食物导致人口增加和用剩余产品同他们的邻邦，如坎巴人进行实物交换。在某种程度上，同马萨依人也是如此。马萨依人有助于基库尤人囿于森林地区，基库尤人由于人口增长，需要更多的空间和食物，逐渐将森林伐掉。基库尤人同坎巴人一样，没有集中的政治体制。住在不同山脊上的各个家庭，互相独立，均有自己的首领，不过某些群体间存在着关系，有些首领也曾试图以武力将自己的权威扩展到其他族群。基库尤人的商业活动局限于当地，从未延伸到海边。即使是斯瓦希里-阿拉伯商队于 19 世纪下半叶来到内地时，基库尤人也对同他们建立有意义的贸易联系明显地缺乏兴趣。

到 1800 年，马萨依人传说中的势力已在相当程度上衰落了。平原尼洛特人的这一支，已达到了他们扩张的极限。他们还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据坦噶尼喀中部和肯尼亚中部之间裂谷盆地平原的游牧者，另一部分是定居在乞力马扎罗山和今天肯尼亚高原之间地区的人数较少的农业集团——伊洛伊科普人或瓦夸维人。在本章论述的这一时期，马萨依人的历史主要是以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为一个层次，以各个“拉伊邦”(Laibons)为争夺领导权引起的内部倾轧为另一个层次。

这种内部冲突促使马萨依人各族群向内地不同方向散去，这是抑制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在更早的时候向内陆这一地区渗透的一个明显因素。克瓦菲人向东面的袭扰，曾远及蒙巴萨周围地区。1837 年，克瓦菲人同在城外遇到他们的阿拉伯-斯瓦希里团伙之间曾发生小规模冲突，后者在遭遇中大吃苦头。当时的著述，如传教士 J. L. 克拉普夫提到，克瓦菲人对米吉-肯达人经常造成威胁，这正是“卡亚”方式有其军事意义的理由。 **228**

在裂谷盆地以西，人们在大湖区流动和定居。这样后来形成了阿巴卢伊阿、巴干达、巴索加等讲班图语的族群和卢奥、阿乔利以及其他尼洛特族群。19 世纪上半叶，这一地区的人继续移动、开辟定居点和相互影响，在不同的群体内部各种政治体制已具体化，使各族带有明显的独特之处。比如，以布干达为例，出现了一种中央集权的国家，为首的统治者称做卡巴卡(kabaka)，其职位标志为鼓、矮凳和长矛，他的顾问团称做卢基科(lukiko)。19 世纪时，一直由布尼奥罗人支配的布干达变得更为强大和富于扩张性。

与此相反，维多利亚湖东岸的那些讲班图语的族群没有发展起中央集权国家(万加王国是个例外)，而是由每个氏族建立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单位。氏族的长者从他们中间指定一名智者，以“奥姆瓦米”(omwami)、“奥穆卡利”(omukali)、“奥穆卡萨”(omukasa)等称号来管理本族事务。[28] 万加王国到 19 世纪已经有了礼仪上的国王，叫“纳邦戈”(nabongo)，但在开始时只有一般的酋长身份。国家的发展，应归功于领导者的机智，这使万加人与其邻邦相对而言占有相当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邻邦在相当程度上受他们的支配。在 19 世纪下半叶，当沿海的商人从那里向内地进发时，万加王国还同他们建立了联系。“纳邦戈”穆米亚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商业基地，借此利用他们来援助他不断衰落的王国。

19 世纪上半叶还发生了一件带来深远政治影响的历史事件，即恩古尼人对坦噶尼喀内地的入侵。恩古尼入侵，同长途贸易一样，对内地社会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影响。

---

[28] G. S. 沃尔(Were)，1968 年，第 195 页。

在政治方面，这两个过程导致一些地区国家的形成或巩固，在另一些地区则导致政治上的瓦解。与恩古尼人有关的这些事件是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不属于本章论述的阶段。

阿曼人的国际贸易

229 调查表明，内地的国家对长途贸易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就像长途贸易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对这些内地社会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一样。一般说来，在本章论述的这一阶段，与沿海的关系对坦噶尼喀内地产生的影响要比对肯尼亚内地产生的影响更大。

或许应该看看这一阶段沿海地区发生的其它重要变化。萨义德·本·素丹推行的一个重要而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政策，是鼓励印度人开办实业和定居。在19世纪以前，亚洲同东非沿海就有商业关系，但在桑给巴尔或大陆沿海并无亚洲人存在的明显迹象。萨义德佩服亚洲人在生意方面的精明和擅长，认定亚洲人对发展他的帝国的商业和开发方面会有用处。1804年，桑给巴尔的关税征集交由一个亚洲商人承包。1811年，在萨义德的首都居住的亚洲人已明显增多。此后，他们作为关税代办人、中间人、金融家、放贷者或批发商，发挥着关键的、很快变成支配的作用。尽管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在桑给巴尔和某些大陆城镇定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但却使他们具有了支配的和无人超越的经济地位。例如贾拉姆·塞伍吉在承包海关期间(1834-1835年)聚敛了相当的财富，在他之后的塔里亚·托潘也是如此。尽管他们自己的收入多年来随着关税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但桑给巴尔的素丹们却总是欠亚裔海关承包人的钱。在另一个层次上，亚洲人的资本和货物对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队来说变得至关重要。商队贸易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不可避免地流入亚洲中间人和金融家手中。

萨义德采取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步骤是将丁香种植引入桑给巴尔，这一行动是该地区经济史上的里程碑。到19世纪50年代，桑给巴尔岛作为首府在丁香国际市场上几乎完全处于支配地位。[29] 这是为补充沿海居民海上独桅帆船贸易和商队贸易而开展的种植园经济的开端。萨义德早就注意到沿海肥沃的土地，特别是桑给巴尔沿海。实际上，这是他把首府搬到岛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引进丁香以前，椰子产品是桑给巴尔唯一的出口物，而奔巴岛历史上是出口大米的。第一批丁香树苗是由一个阿曼阿拉伯人萨利赫·本·哈拉米尔·阿布里从留尼汪带到桑给巴尔的，据说不是他为桑给巴尔种植了第一批丁香树，就是他把树苗给了素丹。萨义德开发了丁香产业，并成为丁香最初的主要出口者。他利用奴隶劳动经营大约45个丁香种植园，1840年桑给巴尔出口的28万磅丁香中，有三分之二是他生产的。1837-1838年，孟买这一主要消费地从桑给巴尔进口了价值29万美元的丁香。"五年以后，从桑给巴尔进口的总额达9.7万美元，使所有其它的来源相形见绌"。[30]

---

[29] 任何有关桑给巴尔历史的资料都会提到丁香。最新材料见F. 库珀(Cooper)，1977年，它对桑给巴尔和奔巴种植丁香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评述。

[30] F. 库珀，1977年，第51页。

在本章论述的这一阶段的最后十年(1835-1845年)，萨义德手下的阿曼阿拉伯人在桑 230 给巴尔和奔巴岛上大力扩种丁香，而置椰子和水稻等其它作物于不顾。有些起初经营商队贸易的人，转而从事丁香种植业，因此，到19世纪40年代，桑给巴尔和奔马岛上的阿曼家族都成了丁香种植园主。由于在种植和收获季节需要大量劳动力，丁香业成了刺激奴隶贸易的一个主要因素。丁香业还促进了大面积土地的占有。为了获得土地采取了各种手段：在两个岛上占据空地，向当地居民交纳象征性的租金，购买土地并在感到利润很高时征用土地。用这种方法，阿曼阿拉伯人在桑给巴尔北部和西部获得丁香种植园的土地，当地的瓦哈迪穆居民则被迫在该岛的南部和东部种植自己食用的粮食作物和少量经济作物。[31] 而在奔巴岛，阿拉伯人的种植园却与当地瓦-奔巴人的农场比肩而立，后者也种植丁香，但规模要小些。由于奔巴岛对土地问题的处理较为适当，没有引起抱怨，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关系要好些。

萨义德同美国、英国、法国和日尔曼诸国签订的通商条约，对桑给巴尔在东非作为商业"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美国的关系，对桑给巴尔的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好处。条约是在1833年签订的，当时萨义德正专心制订他的经济计划，因此美国人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市场，从而促进了这些计划的实施。条约也给美国人规定了非常优惠的条款：对东非进口的美国货物征收百分之五的关税，对美国人购买的东非货物不征税。条约签定后，美国船只在东非水域出现的频繁程度大为提高。美国人运走了象牙、柯巴胶等产品。随着丁香业的发展，还运走大批的丁香。他们向桑给巴尔运进食糖、串珠、铜器、枪支、火药，还有在东非变得出名的美利坚棉布。到萨义德于1856年去世时，美国的销售额从1838年的10万美元提高到55万美元。[32]

美国成为在东非水域进行贸易的最主要的西方国家，在商业方面超过了英国。英国人正是因为担心被美国人压倒，才在1839年与萨义德签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即使如此，英 231 国的商业利益(除英裔亚洲臣民的部分外)以及英国在东非贸易中的份额，在这一阶段实际上都下降了。在开始阶段有所保留之后，萨义德于1844年同法国人签订了一项条约。英国人让萨义德提防法国的用心。法国于1844年在桑给巴尔设立领事馆之后，英法竞争时断时续，萨义德不得不以其全部才智来保持中立立场，或借助一方对付另一方。然而，他在阿曼需要英国的军事支持，却有助于英国政治地位的提高。从阿特金斯·哈默顿开始，英国领事对布赛义迪·素丹-伊玛目就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有时甚至是将这种影响强加给他。美国领事沃德1851年有一次同哈默顿谈话后甚至认为，英国很快将计划占领东非沿海。英国这种政治影响补偿了它在东非贸易中的损失，而且绰绰有余。[33]

哈默顿在经过两年谈判之后，于1847年说服萨义德签署了后来称为《哈默顿条约》的文件，禁止在素丹的东非领地以外出口奴隶。丁香种植园经济的扩大以及奴隶出口贸易，导致东非地区奴隶贸易的增加。19世纪对活人买卖规模的估计从来都不可靠。后来的学者往往认为19世纪的资料来源——欧洲访问者、海军军官、传教士和探险家——提供的数字过

---

[31] 同上，第58页，补充谈到"这种在不同种族间的不平等划分土地，成为20世纪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
[32] C.S. 尼科尔斯，1971年，第332页。
[33] 同上，第187页。

于夸大。但他们自己的估计也不一致。E. A. 阿尔珀斯[34]对C.S. 尼科尔斯提出的每年买卖20，000人表示异议，同时对于A.M.H. 谢里夫(Sheriff)[35]提出的19世纪30年代每年只有2500名奴隶被买卖，又认为过于保守(这一计算以马斯喀特、卡拉克和巴士拉每年进口的数字为基础)，因为他似乎低估了家务奴隶的重要性，而只注意波斯湾地区海枣种植园使用的奴隶。但F. 库珀自己没有提出任何估计数字，他只是说，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从桑给巴尔向海湾地区出口奴隶的生意是有利可图的。事实证明，哈默顿条约远不足以限制当地和海外对奴隶的需求。

萨义德被认为是启动了一系列经济和商业政策，从而使桑给巴尔成为东非沿海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从印度、欧洲和美国进口制成品，出口丁香、象牙、奴隶、犀牛角、柯巴胶和其它产品，而且不可避免地将东非的经济拴到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马车上，以东非当地社会为代价，肥了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商人，从而造成当地社会的不发达状况。

在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体制下，通过以桑给巴尔为基地的寄生的外国商人为一方，以沿海和大陆人民为另一方而确立的不平等交换，使东非各地区社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受到了剥削。

由此获得的相当规模的利润流回欧洲、美国和印度，几乎从未用来投人东非的物质和技术开发。用来换取象牙等东非产品的进口货，都是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对资本开发毫无用处。有些进口产品甚至破坏了当地的工业，例如拉穆和贝纳迪尔港的纺织业，就受到亚洲和后来美国棉织品的沉重打击。

同时，奴隶出口贸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族群之间的厮杀和袭扰，使坦噶尼喀内地的人力资本减少，造成这一地区的不发达状态，[36]使它“向着不可避免的死胡同前进”。[37]

结 束 语

在本章论述的这一阶段(1800-1845年)，东非沿海及内地是由一些城邦和内陆社会所组成，在政治上实际是相互独立的，但都参与了区域的和地方的贸易，沿海人民还参与了跨海贸易。

布赛义迪的统治建立之后，多数沿海城市都在名义上向桑给巴尔表示某种效忠，然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地方首领手中。在此阶段，长途商队贸易有所发展，这是由内地的非洲族群，如尧人和尼扬韦齐人首先开始的。然而，对象牙、奴隶和其它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在促使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队开进内地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长途贸易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对许多内地社会发生影响，但并非对所有社会都有这种影响。伊斯兰教和斯瓦希里语传入内地，后者的影响比前者更有意义。基督教传教

---

[34] F. 库珀，1977年，第43页；E. A. 阿尔珀斯，1973年，第185-193页。

[35] A. M. H. 谢里夫(Sheriff)，197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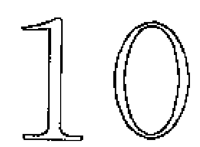
[36] 有关这一问题的著述很多。例如，W. 罗德尼(Rodney)，1972年；J. 艾利夫，1979年，第67-77页；R. 格雷和D. 伯明翰(Birmingham)(编)，1970年；B. 斯威(Swai)，1984年；A.M.H. 谢里夫，1971年；T. 斯皮尔，1981年。

[37] J. 艾利夫，1978年，第76页，引自A.D. 罗伯茨(Roberts)，1970年b。

士在 1845 年以后才到来。与此同时，内地还发生了一些与商队贸易无关的重要事态，今后也产生了它们自己的重大影响。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恩古尼人的入侵，特别是它影响到新国家的形成和原有国家的瓦解。

最后，人们注意到桑给巴尔商业帝国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表——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商人同沿海和内地的当地人民之间非常不平等的交换，使前者在他们培育、发展和控制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过多的好处，由此造成东非的不发达状况。

（艾　平译）



1845-1880 年的东非沿海和内地

I.N. 基曼博

234 第九章已经说明，19 世纪的前 25 年，东非内地的大多数社会都是经历着独立发展的过程。这些社会肯定不像某些人类学著作所描述的那样是停滞不前的。从大湖地区到坦桑尼亚的西部、中部和东北部纷纷建立起了不同规模的国家。一些游牧和农业社群也在高原和裂谷地区安下家来。这些社会中有许多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仍不停地迁入当时尚无人定居的一些农业条件不太好的地区，而晚近时期卢奥人和马萨依人等族群的迁徙仍对其邻邦产生影响。只有紧靠沿海的地区和桑给巴尔岛及奔巴岛被纳人了国际经济体系。19 世纪 40 年代初，东非开始出现两种互不相关的人侵：一种是将内地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贸易人侵，另一种是来自南部非洲的恩古尼人入侵，这是造成原有社会的各种迁徙和调整的原因。在这一阶段中，另外两个因素也很重要，即各马萨依族群之间的斗争和欧洲人对东非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压力。本章简要论述 1845 至 1884 年这一期间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

阿曼人的渗透和贸易的扩展

第九章已经讨论了阿曼人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由阿曼转向桑给巴尔和奔巴岛，以及较为间接地转向其它沿海城邦的情况。渗入东非内地的商业帝国发展的根基，也是在 19 世纪初期奠定的。到 19 世纪 40 年代，象牙和奴隶贸易迅速扩展，并将内地纳入沿海地区业已建立的贸易网。

由于在多数情况下象牙和奴隶来自同一地区，而且可以使用奴隶运送象牙，人们往往将两者视为相互联系的贸易商品。235 但这种表面上的相互联系被过分夸大了。很明显，在长途贸易中，象牙和奴隶都必须与其它笨重的商品交换，如布匹、金属线和珠子，而这些商品也需要运输。

这两种商品之间更为重要的相互关联，在于它们都与当时正吸引东非加入并发挥辅助作用的国际商业体系有关，从而影响到殖民主义建立前东非地区的贸易发展。事实上，东非在殖民统治实际确立之前，就已经被引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奴隶贸易向内地的扩展有赖于种植园经济的建立，首先是在法国控制的毛里求斯岛和留尼汪岛上的种植园，但更重要的是桑给巴尔和奔巴岛上的丁香种植园。当赛义德·萨义德将其经济兴趣转向东非时，向毛里求斯贩卖奴隶的活动已经由于英国的干涉而减少，英国人甚至在 1810 年夺取了该岛。但赛义德·萨义德鼓励在桑给巴尔和奔巴岛扩大丁香和椰

子的种植。到19世纪40年代，他将首都迁往桑给巴尔时，丁香种植园已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大部分由奴隶劳动经营。这种状况造成一个土地拥有者阶级，其成员开始时大多是阿拉伯人，但到19世纪60年代也包括当地的设拉子人和印度人。有人估算，到19世纪60年代，桑给巴尔和奔巴岛每年吸收约一万名奴隶，其中并不包括向海外市场(主要是阿拉伯市场)提供的奴隶。另有人推算，到19世纪60年代，仅桑给巴尔市场，每年就要买卖多达七万名奴隶，1840年以后，开始交易高峰。[①] 尽管这些数字可能言过其实，但仍表明到19世纪中叶，奴隶贸易有了极大的增长。

东非出口的第二种贸易商品是象牙。在第九章中我们了解到，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除了传统的印度市场外，象牙市场由于工业化西方的需求增加而开始扩大。以前，欧洲和美国是从西非取得所需的象牙，但是后来发现东非象牙质地更好(更软)，更适合制作富裕阶级需要的奢侈品，如梳子、台球和钢琴键，致使对东非象牙的需求增加。英国想方设法试图在东非直接控制这一贸易，但却没有成功，因为印度商人早已确立了经孟买向欧洲再出口的贸易地位。只有少数美国商人得以逐渐在桑给巴尔确立自己的地位，成为重要的西方商人，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印度商人。

很明显，贩卖象牙和奴隶的长途贸易条件，对那些参与利用和经营这两种商品的人颇为有利。因此，长途贸易的路线从沿海城镇(如基卢瓦、巴加莫约、潘加尼、坦噶和蒙巴萨)向内地各点辐射。结果，到19世纪70年代，今天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扎伊尔东部、赞比亚北部、马拉维和莫桑比克北部的大多数地区，都已成为通过这些沿海城镇同桑给巴尔相互联系的广大内地的一部分，并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并入了国际贸易网。 **237**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长途贸易的发展看成是不幸的事件，非洲人在其中是无助的受害者。当然，就其对人类生命的戕害而言，奴隶贸易在个人和道义方面对东非各社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但长途贸易，就其所有方面而言，对所涉及的社会实际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要比这大得多。非洲人决非这一进程的旁观者。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例子中所表明的，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主动行动同沿海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正是非洲人。然而，恰当地评价这一贸易入侵对非洲社会的总体经济影响是困难的。这种沿海渗透对内地一些看得到的贡献比较容易认识，例如引进玉米和水稻等新作物，伊斯兰教的传播所代表的文化影响，还有斯瓦希里语的传播这一更为重要的影响。但是，在经济方面，东非人受到哪些影响呢？

菲利普·柯廷在估价塞内冈比亚地区类似贸易情况的影响时得出以下结论：

> 数据无疑足以准确地证明这一结论，即尽管战争期间可能发生反向巨变，但在近两个世纪中以实物交换衡量的净贸易条件，一直向有利于塞内冈比亚方面转变。即使推算的数字只有实际的一半，或者多了一倍，在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间，朝着有利于塞内冈比亚方面转变的总幅度也在5倍到20倍之间。或者按照一种中间值估算，在这一阶段结束时，塞内冈比亚人出口同样数量的商品所换回的比150年前多10倍。[②]

---

① E.A.阿尔珀斯(Alpers)，1967年，第11页。又见E.A.阿尔珀斯，1974年，第236页。

② P.D.柯廷(Curtin)，1975年，第3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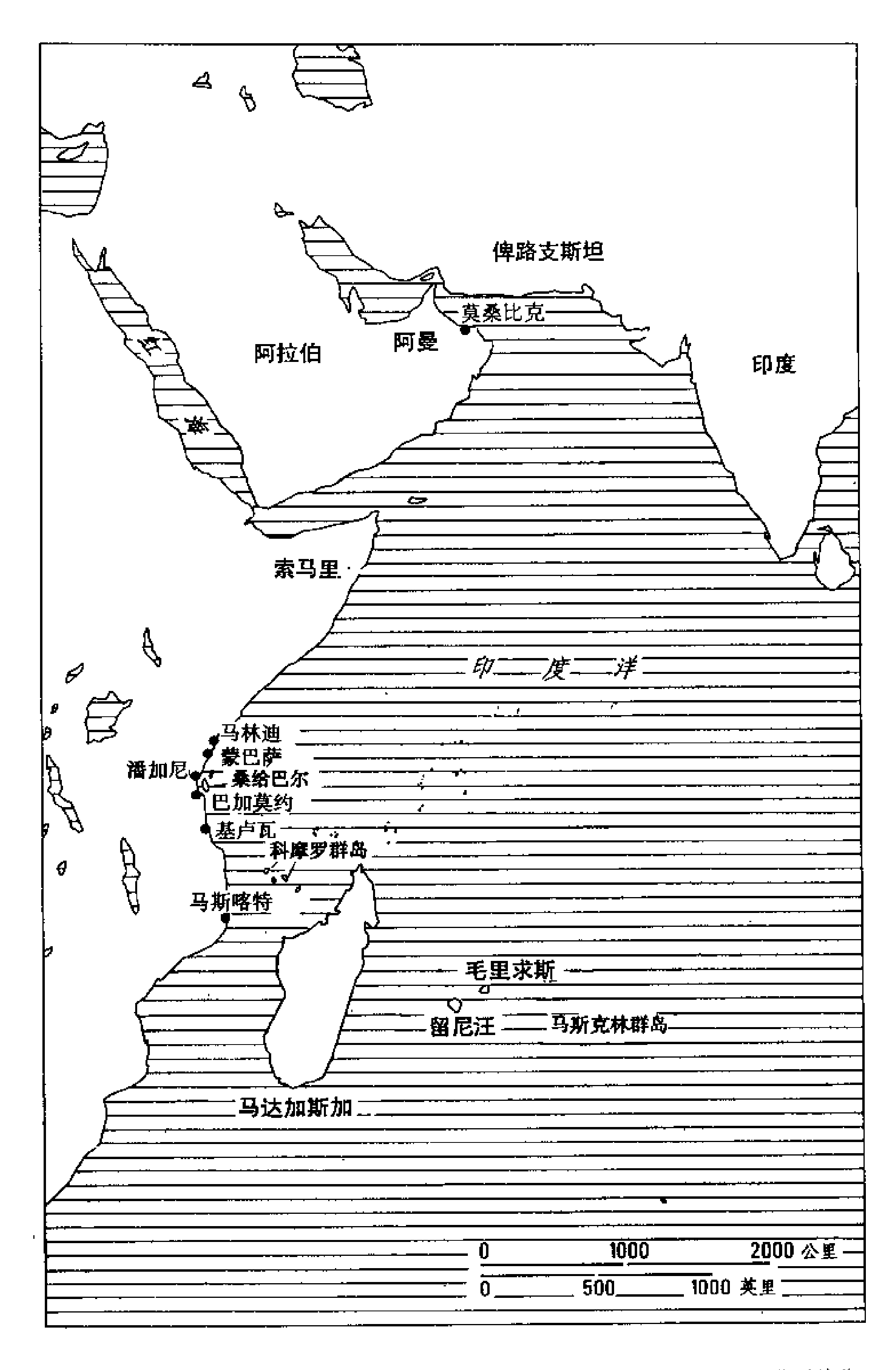


插图 10.1 19 世纪的印度洋（选自 P. 柯廷、S. 费尔曼、L. 汤普森和 J. 范西纳著《非洲史》，1978 年，第 394 页）

遗憾的是找不到有关东非的这类数据。R. 库普兰在整理有关桑给巴尔和一些沿海中心的某些统计数字时表明，例如到 1876 年，基卢瓦每年的利润为 12 万英镑，在 1869 至 1876 年间，桑给巴尔的海关收入从每年 6.5 万英镑提高到 10 万英镑。③ 这似乎表明，至少可以就 238 桑给巴尔本身进行类似塞内冈比亚那样的研究。但是，关于内地无数参与商业活动的社会，这样的研究所能告诉我们的恐怕很少。人们知道，到 19 世纪 70 年代，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经济已开始扩展到大陆沿海和商路两侧的内地，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食品(谷物)养活桑给巴尔和奔巴岛居民中的有钱人和从事种植园劳动的人，并为来往于内地的大型远程商队提供食品。④ 但这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画面。此外，即使能得到一幅完整的画面，表明非洲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间获得了比以前多的收入，也并不能改变当时国际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的剥削性质。实际上，沿海的商人和他们的非洲盟友只不过是获取最大份额利润的欧洲商人的中间人。非洲生产者受到中间人和欧洲商人的双重剥削。如果这种产品是人类本身，那么比较起来，情况就更糟糕！此外，我们还可以说，由于东非是按照不利的条件纳入世界经济的，他们的精力不是用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用来提供原料和劳力，以交换外国的制造业产品(主要是奢侈品)，而这种产品也只给社会当中某些集团的人带来好处。对其中一些社会来说，这种贸易产生了扼杀或抑制某些生产类似产品的地方工业的作用，如大湖区的树皮布生产和坦桑尼亚西南部的手织布产业。

将东非内地的广袤地区同沿海结为一体，并非仅仅是通过将新的商路从沿海延伸到内地而实现的，也并非只是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渗入内地的结果。无庸置疑，这也牵涉到以前存在的地区贸易网络的转变和同化。因此，为了表述清晰，我们将论述四个地区的长途贸易商路：基卢瓦内地商路、坦桑尼亚中部商路、潘加尼河各地区商路和蒙巴萨内地商路。

基卢瓦内地商路

18 世纪末，在法国占领的岛屿对奴隶的需求刺激下，基卢瓦内地商路大概是最早出现的向东非内地伸展的商路。整个尼亚萨湖地区同基卢瓦之间的联系比较容易，因为旅行者可以取道相当富饶和有人定居的地区。这一片土地由尧人控制，他们负责将象牙、蜂蜡和奴隶运往基卢瓦。即使在 19 世纪贸易的全盛时期，尧人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之所以在 19 世纪下半叶引人注目，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就在这一地区的区域贸易中占 240 有突出地位。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他们有利。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区域贸易对社会本身产生的影响。尧人以前在尼亚萨湖(今马拉维湖)周围地区组成松散的小集团，并各有自己的小酋长。到 19 世纪中叶，他们组成规模较大的定居点，由更具强制作用的酋长管理。以前更强调恩古尼人入侵对这种转变产生的影响，但是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恩古尼人入侵时，社会分层现象由于商业活动的影响已明显启动。当阿拉伯商人

③ R. 库普兰(Coupland)，1939 年，第 227、319-320 页。另见 J.M. 格雷，1963 年，第 241 页。
④ A. 史密斯(Smith)，1963 年，第 29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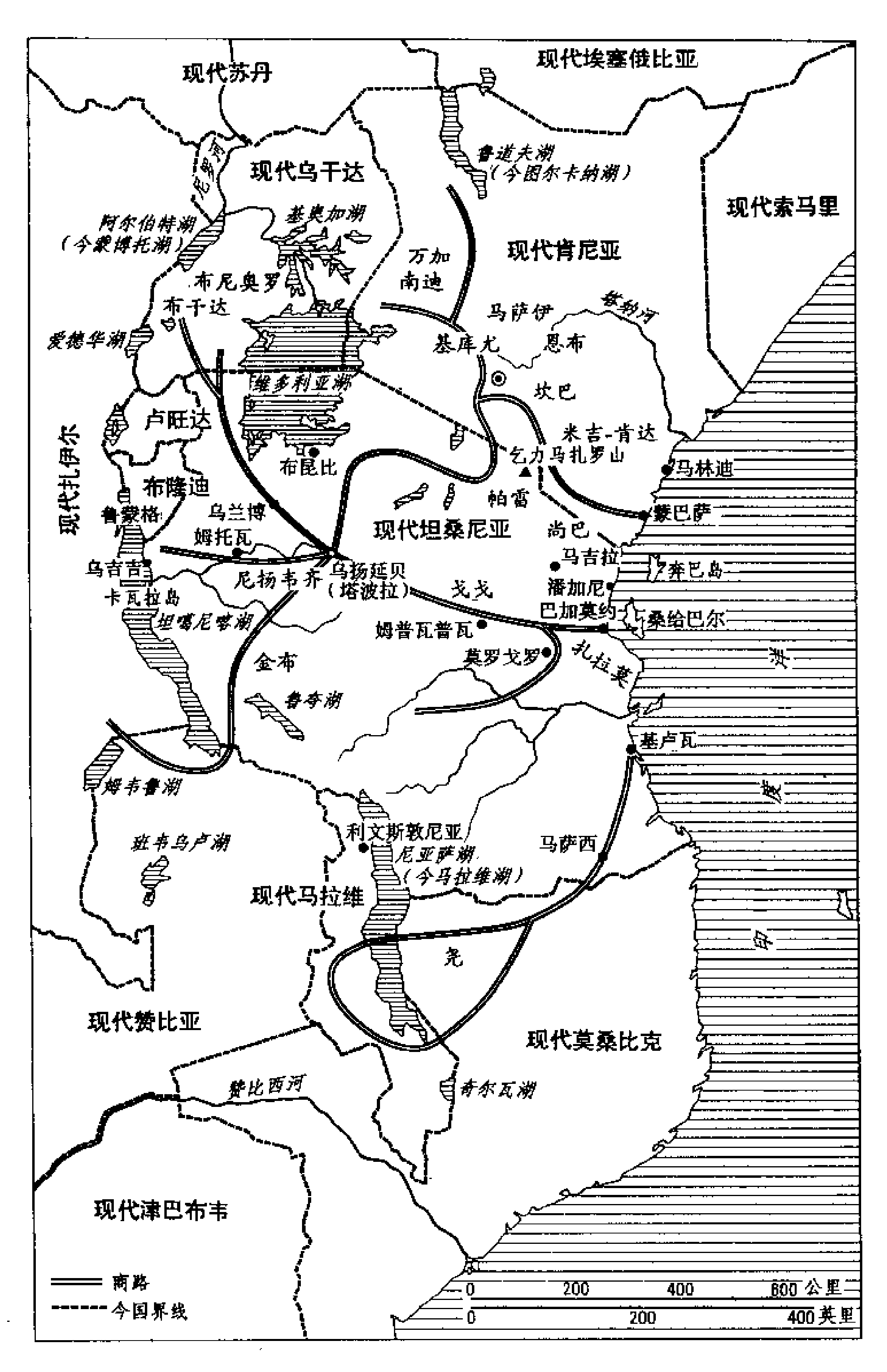


插图 10.2 19 世纪东部非洲的贸易（改自 P. 柯廷、S. 费尔曼、L. 汤普森和 J. 范西纳著《非洲史》，1978 年，第 399 页）

开始沿着这条商路向内地推进时，尧人的酋长还是相当强大，无法向其挑战。因此，除了在今天马拉维的霍塔霍塔和卡龙加这样的孤立小地方外，阿拉伯人从未控制过贸易，他们一般都是与强大的尧族酋长合伙，向他们提供枪支和其它商品，并同他们分享战利品。[5]

坦桑尼亚中部商路

尼扬韦齐人是坦桑尼亚中部商路上最重要的族群。在19世纪初，沿这一商路的贸易大多是由尼扬韦齐商队进行的。由于赛义德·萨义德的鼓励，贸易活动进一步扩展，阿拉伯商人也随之向内地渗透。赛义德·萨义德在其印度官员们的帮助下建立的融资体系有助于这种渗透。赛义德·萨义德将经济事务的主要方向交给桑给巴尔的印度籍海关负责人确定，他每年向素丹上交一定数目的钱。另一方面，海关负责人与管理其它关税口岸（基卢瓦、巴加莫约、潘加尼、坦噶、蒙巴萨等）的印度人社团合作，向商队头目们提供去内地活动所需的经费。在基卢瓦内地，阿拉伯人是尧族酋长的客户。而在中部商路上，阿拉伯人发现必须建立一些中心，作为象牙和奴隶的收集点。多数商队从巴加莫约或萨达尼出发，经过扎拉莫人、卡米人、萨加拉人、卢古鲁人和戈戈人的地区，到达尼扬韦齐人的地区，并再前进到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吉吉。有些商队走得更远，进入扎伊尔，或向北前往卡拉圭和布干达。一条向南的路线通往尼亚萨湖，与通向基卢瓦的那些商路相接。

在贸易中心建立了两个重要的阿拉伯人定居区，一个在尼扬韦齐地区今天塔波拉附近的乌扬延贝，另一个在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吉吉。这两个定居点，在一个主要方面有区别：在乌扬延贝，阿拉伯人的定居地就像尼扬韦齐人中间的一个殖民地，而在乌吉吉，他们或多或少合并在哈人的国家。[6] 这样，在乌扬延贝，阿拉伯人是一个独立的社群，在贸易方面同 **241** 尼扬韦齐商人竞争，其中包括许多尼扬韦齐酋长领地的统治者。尼扬韦齐人将这群商人（不论是尼扬韦齐人还是阿拉伯人）称为“班迪瓦”（bandewa）。[7] 他们都为在长途贸易中得到一份利益而相争。这说明为什么尼扬韦齐统治者同阿拉伯人之间总有冲突，而且也可以解释各个尼扬韦齐小国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其结果是造成对尼扬韦齐人民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的政治和社会结盟关系。

而在乌吉吉，阿拉伯人则利用哈人的政治组织。乌吉吉是更大的哈人国家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的中心远离乌吉吉。因此，阿拉伯人处于该国的外围地区，合并进去很容易，且对双方都有利。

潘加尼河谷的商路

潘加尼河谷的商路同南部和中部的商路不同，并非明显地由某个族群控制。的确，在开始的时候，从1836年到1862年（尚巴王国的伟大统治者金韦里·耶·尼乌姆巴伊去世

⑤ A. 史密斯，1963年，第286页。
⑥ 见N.R. 贝内特（Bennett），1974年，第213-221页。
⑦ 见A.C. 乌诺马（Unomah），1972年。

时），济古拉人曾在发展这一地区的贸易中发挥着首要作用。在1836年前后，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饥荒，[48]使许多济古拉人为了生存将自己作为奴隶出卖。据说，他们当中有些人被布拉瓦（巴拉瓦）商人带到索马里去，在那里，他们把自己的语言一直保留到20世纪。[49]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越海来到桑给巴尔，在种植园中当奴隶。其中有些人设法回到了自己的故土。有一个关于一群济古拉人逃出来并安全返回老家的故事：

> 一大群谋反者们根据一个周密安排的计划，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集合到一个种植园里。他们从那里到了桑给巴尔锚地以北的海边。他们在凌晨抵达那里，登上了几艘独桅帆船，发动攻击，杀死或者制服了船上的水手，提锚起航，跨海回到大陆。[50]

那些回来的人掌握了有关奴隶和象牙长途贸易价值方面的知识，正是他们首先在潘加尼河谷开始贸易活动。金韦里的首府位于尚巴山里，远离平原，因此他在利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获得好处方面动作较慢，尽管他通过各地酋长的政治控制和贡赋系统保持王国的稳定。到19世纪60年代他去世时，他的儿子——与济古拉人相邻的西部地区的统治者森博贾，利用当时的形势，将首府迁往马津代的平原。

243



图片10.1　尼扬韦齐人的发式和头饰

[48] R.F. 伯顿(Burton)，1860年，第1卷，第125页。伯顿在1860年说，饥荒发生在"大约20年前"。J.L. 克拉普夫(Krapf)，1860年，第256-257页，同一时期蒙巴萨也发生一场类似的饥荒。

[49] S. 费尔曼(Feierman)，1974年，第137页。

[50] J.M. 格雷(Gray)，1962年，第141页。



图片 10.2 路途中的尼扬韦齐商人

但森博贾和济古拉商人都没有充分探测潘加尼河谷通往内地的商路。多数商站都局限于尚巴和帕雷平原，尽管某些个人曾冒险远离这一地区，例如基萨本戈，他曾在今天的莫罗戈罗附近建立了一个国家。

冒险进入内地一直到乞力马扎罗山区查加人的国家，以及更远到肯尼亚的，是沿海来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在帕雷山区有一些小国，但它们就像尚巴一样，都位于远离商路的山中。

为了建立贸易中心，多数进入潘加尼河谷的沿海商人都必须同各个统治者或者他们的下属建立直接联系。这往往促使帕雷山区和乞力马扎罗一带无数小国的统治者之间，以及这些统治者同他们的下属之间发生对抗。我们将在下面论述这种对抗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蒙巴萨内地商路

蒙巴萨内地由坎巴人控制，但到 19 世纪 80 年代，对主要商路的控制已转到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手中。这条主要商路穿过乌坎巴尼人的土地，向肯尼亚高原方向伸展，并越过维多利亚湖畔，前进到乌干达。另一条路线向乞力马扎罗山伸展，与潘加尼河谷商路汇合。这第二条路线似乎同潘加尼路线一样，受沿海商人们的控制。

多数作者接受 J.L. 克拉普夫的看法，认为坎巴人从事长途贸易的时间始于 1836 年的饥荒。[①] 但是，正如本卷其它章节指出的那样，坎巴人在贸易中的显赫地位并非一日之功。

① 例如见 K.G. 林德布洛姆(Lindblom)，1920 年，第 339-340 页；D.A. 洛(Low)，1963 年，第 314 页。

有足够证据表明，坎巴人在公认的时间以前一个多世纪，就在区域贸易网中占有支配地位。[12] 但公认的年代仍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坎巴人贸易活动的第二阶段，该阶段使他们进入了当时的国际贸易网。在这一阶段中，象牙和其它当地产品被用来交换进口商品。克拉普夫在1848至1849年间前往乌坎巴尼人地区时，曾描述过这一点："斯瓦希里人向瓦坎巴人供应棉织品（美国产品）、蓝印花布、玻璃串珠、铜、盐、卢阿哈（luaha）、硫酸锌，等等，换回的主要是牛和象牙"。[13] 这样，有报导说，到19世纪40年代，坎巴人每周前往沿海的 244 商队，要运去三四百弗拉斯拉的象牙。[14] 据克拉普夫估计，每个坎巴商队的人数多达三百至四百人。[15] 到19世纪中叶，坎巴商队不仅去拜访他们的邻居基库尤人，而且还前往比肯尼亚山远得多的地区，如马乌、古西、巴林戈湖和桑布鲁。

到19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似乎强有力地控制着坎巴商路。[16] 这是因为沿海商人利用乞力马扎罗商路，通过马萨依人地区（当时马萨依人的势力因战争和流行病受到很大影响），已能够控制象牙的来源。这时奴隶贸易的重要性（在坎巴人控制时期并不突出）似乎有所增加。坎巴人的口头传说，将这一段描写成他们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个时期：严重的饥荒导致同一血统之间的冲突，而社会中更具野心的成员，则利用这种冲突，将弱小的成员卖给阿拉伯人。[17] 因此，坎巴人的口头传说，正确地表明了他们曾发挥重要作用的商品贸易的衰落过程与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商人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口买卖的上升趋势之间的关系。

长途贸易对东非社会的影响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长途贸易侵入东非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首先要看到，并不是所有东非社会都与贸易网有直接接触。贸易活动需要稳定的中心，很自然，这些中心往往是首都，或受到强大统治者保护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贸易的建设性影响在集中的社会中更为明显的原因。那些分散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是脆弱的，因为它们更易受到组织规模更大的社会的侵袭。在这一阶段，游牧社会一般说来属于例外情况。当时操马萨依语的人们正相互厮杀，或与其他游牧民进行战争；如同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他们在肯尼亚的广大地区和坦桑尼亚北部，构成减弱劫掠奴隶活动的缓冲区。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认为长途贸易影响了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们一般都同意，在非洲社会中，对各种仪式的控制是权威的主要基础，但人们也认识到，在那些物质基础足 245 以维持一支军事力量和国家机构的地方，出现了国家这种大型组织。因此，在东非出现集中制国家组织的许多地方，国家规模的差别往往同凭借特定环境形成的经济实力有关。大

[12] I. N. 基曼博（Kimambo），1974年，第207页；1970年，第18页。
[13] J. L. 克拉普夫，1860年，第248页。
[14] C. 吉兰（Guillain），1856年，第2卷，第211页。据查尔斯·雷谢巴赫的《斯瓦希里-英语字典》，一弗拉斯拉约等于16公斤或35磅。
[15] J. L. 克拉普夫，1860年，第248页。
[16] J. 汤姆森（Thomson），1885年，第272-275页。
[17] 见K. A. 杰克逊（Jackson），1972年。

湖地区的大型国家，可以靠有利于香蕉、粮食和家畜生产的稳定的农业环境所产生的剩余食品来维持。到维多利亚湖以南，降雨减少，经济只能支撑较小的国家。在高原地区，规模往往扩大，如在乌桑巴拉和帕雷山区，乞力马扎罗山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在湖间地区，一些大型王国的统治者，通过长途贸易来扩展他们维持帝国的物质基础，从而变得更为强大。[18] 除了传统武器外，他们的军事组织还增添了枪支。除收集贡奉得来的食品外，布匹和串珠等进口商品也可以用来支付劳务。但是，诱人的进口商品也增加了不稳定的危险，因为它会助长处于从属地位的统治者采取独立行动，从而削弱王国。正因为如此，许多国王试图将长途贸易置于他们个人的严格控制之下。

在那些小型国家体系中，进口商品的影响显得更为清楚。这包括坦桑尼亚的很大一部分，以及肯尼亚西部范围小一些的地区。那些能够控制贸易的传统统治者也能够积聚进口商品，用来建立一支庞大军队和扩充行政机构。较为弱小的国家或者遭到入侵，成为提供奴隶的场所，或者被吞并，以形成更大的统一体。在这些地区，如果贸易使一些统治者得以在以往只能维持较小国家的地方组成更大的统一体，那么其影响就是建设性的；如果贸易助长反叛，结果破坏了已有国家的统一，其影响就是破坏性的。尽管可以进行这样的一般概括，长途贸易的影响总的说来是破坏性的。在这里不需要详细列举买卖人口的罪恶之处，即使是以进口商品为物质基础的价值也具有欺骗性。这些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串珠、手镯和其它装饰品。布匹是有用的，但这也会同当地产品竞争，最后毁掉了当地的生产。更糟的是，奢侈品的买卖，以及为了维持贸易去攻击其它社会所造成的普遍暴力活动，意味着维持生存的农业受到忽视。即使没有殖民主义的干预，新的结构也很难维持。实际上在这一阶段建立的大型国家没有几个能原封不动地存在到 19 世纪 90 年代。

为了说明这一普遍情况，有必要简要地看看三个商路地区。在讨论坎巴人的情况时，我们看到，当劫掠奴隶的活动变得突出时，就连他们对贸易的控制也消失了。坎巴人属于分散的社会。长途贸易大概有助于各个传统组织的扩大，首先是亲属、同龄村民团体和防卫组织。但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成为集中的国家结构的基础。在整个肯尼亚，只有在西部地区，沿海贸易才直接导致扩大的集中制政治体系，这就是卢伊亚人的万加王国。 **246**

在万加王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希温杜于 19 世纪中叶掌权之前，该王国一直很小，不断受到游牧邻邦的袭扰。但据说希温杜有效地控制了动荡局面，到他的儿子穆米亚于 1882 年继承王位时，王国已越出自己的边界。尽管 G.S. 沃尔说明，所谓大万加帝国的说法，是在殖民地时期英国人为利用万加王国为代理，将其殖民统治强加给这一地区而制订的策略，但他也同意万加的“实际影响和权威”至少扩展到两个邻近地区，即基萨和布霍洛。[19] 万加的统治者在这一阶段增强实力，有两个原因：即利用了马萨依雇佣兵和首都出现了斯瓦希里商人。第一个因素是下面要讨论的马萨依人战争造成的；第二个因素是沿海商人成功地渗透的结果，他们的渗透开始可能是通过布干达和布索加，后来则是通过乞力马扎罗和坎巴商路。

---

[18] 卢旺达和布隆迪属于例外，见注[31]。
[19] G.S. 沃尔(Were)，1967 年，第 125 页。

希温杜和穆米亚都欢迎沿海商人们到他们的首都来。这使他们能够得到枪支武装自己的军队。在万加的首都可以组织对邻邦的侵袭。1883年，约瑟夫·汤姆森描述了一场五年前发生的侵袭：

> 由于暗杀或其它原因，商人们损失了几个人，为了报复，商人们在我们抵达之前五年即已决定要"收拾"当地人（使他们安分）。为了这一目的，一个驻扎在夸-松杜（后来的穆米亚）有1500人组成的联合商队向他们进发。商队分成几路，从不同地点进入并横穿整个地区，沿途捣毁了每一个村庄，杀死了数以千计的男人和妇女，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例如划破孕妇的肚子，燃起篝火将小孩扔进去，把一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和女孩抓去当奴隶。[20]

东非中北部内地的其他各族人民受这种国际贸易的影响较小。他们同沿海来的外国人几乎没有直接接触，甚至间接接触也较少，事实上他们不欢迎这些外国人进入他们的社会，247 尽管他们愿意将食物卖给商站的商队。对此有一个主要的解释是，由于整个这一地区经历过马萨依人战争造成的长期暴力活动，因此首领们学会了对外来者提高警惕以保护自己的社会。

长途贸易在潘加尼河谷产生的影响基本上是破坏性的。在贸易侵入之前，这一地区产生了几个国家，其中有两个已成为相当规模的王国。一个是尚巴王国，该国在19世纪中叶处于金韦里的统治之下，另一个是帕雷北部山区名气小些的格温诺王国。其它更小的国家分散在帕雷南部山区和乞力马扎罗山的山坡上。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山里，而商路却沿着潘加尼河谷穿过平原。所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不大能够控制沿海的商人，因此也不大能够垄断进口物品。离商路较近的下属统治者们处于较好的位置，能在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还没有到达本国首府前，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地区去。这种情况的影响是明显的，得到商人支持的统治者可以建立武装精良的团体，不服从首府的命令。由此助长了这些国家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争斗，许多国家分裂成更小的国家。

在金韦里于19世纪60年代去世之前，地域包括从乌桑巴拉到沿海的整个地区的尚巴王国已经遇到了很大麻烦。他的一个儿子森博贾是西部地区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的首府搬到平原上的马津代。他可以在那里同进入内地的商人直接接触。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影响，超过其它地区的统治者。金韦里死后由森博贾决定继位者，他看到权力已不在传统中心，便不愿登上王位。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殖民入侵阶段，乌桑巴拉地区由于中央衰落而到处是暴力活动。王国的多数外围地区都独立出去了。

帕雷地区的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到19世纪80年代，格温诺王国已变成好几个国家，帕雷南部一些较小的国家进一步分裂。然而在乞力马扎罗山区，各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往往造成一种临时性的联合，一度似乎要将所有的查加人聚集在一个统治者之下。但这种成功是短暂的。在19世纪80年代，两个强大的酋长国在该地区变得重要起来，一个是西纳统治下的基博索，另一个是林迪或曼达拉统治下的莫希。这两个酋长国都能联系沿

[20] J. 汤姆森，1885年，第306页。

海商人。它们的统治者都竭尽全力将外国人吸引到自己的首府，利用他们的出现和他们带来的货物(特别是枪支)来扩充自己的实力。这两个国家都曾一度控制过其它好几个查加人 **248** 国家，但这种扩大的统一体都未能长期存在。

在潘加尼河谷地区，因沿海贸易而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加强的似乎只有前面提到的济古拉人。济古拉人从未处于尚巴王国的统治之下。由于他们控制着同沿海的贸易，许多济古拉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政治霸权地位。到 19 世纪中叶，济古拉人已在整个潘加尼与巴加莫约之间的地区处于支配地位。有几个济古拉人获得相当大的权力，并得以建立起新的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些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基萨本戈在今天的莫罗戈罗附近建立的国家，一直存在到德国人入侵时期。据伯顿的描述，基萨本戈这个济古拉人成了沿海一群逃亡奴隶的首领，[21] 并因此激怒了桑给巴尔的素丹。他为了保护自己而迁往更远的内地。在莫罗戈罗，他被卢古鲁的一位宗教领袖所接纳。他在靠近商路的地方修建了自己的筑有城堡的首府，向前往塔波拉的商队征收沉重的过境费。1871 年，据 H.M. 斯坦利说，基萨本戈的城市有几千居民，筑有高大的城墙和守望塔，安装着精雕细刻的木门。[22]

在坦桑尼亚西部，在无数非洲小国的酋长之间、当地的阿拉伯定居者之间以及非洲酋长联盟与某些阿拉伯商人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对立与竞争。然而，只有在坦噶尼喀湖对岸乌涅马人地区，有一个内地货站由阿拉伯人控制。在坦桑尼亚西部，他们的势力太弱，不足以取代非洲人酋长。只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某些阿拉伯人在面临欧洲殖民的威胁时，才开始考虑建立他们自己的领土权力。[23]

非洲统治者通过向商人提供象牙和奴隶，或者(在他们能够控制商路上的某一地区时)对做买卖的商队强征过境重税，力图从长途贸易中谋得一份利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在自己周围聚集起追随者，用由贸易积累起来的枪支弹药加以武装。对贸易控制权的争夺，加剧了社会分裂，而同时发生的由恩古尼人(在有的文献中也称恩戈尼人)入侵引起的人口流动，又使这种分裂进一步加剧。由此引起的不安定，使更多的人愿意追随有创业心的首领。在坦桑尼亚西部，这些为发财而组织起来的勇士被称为“鲁加-鲁加”(ruga-ruga)，他们大多是战争中的俘虏、逃亡的奴隶、中途逃跑的挑伕、被社会遗弃的人以及本来应该从军的年轻人。这种军队是由“某种集体精神或仿照恩古尼人的作战队伍实行的铁 **249** 的纪律”凝聚在一起的。[24]

在这样的军队支持之下，坦桑尼亚西部的一些传统首领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领地。有的甚至越出自己所在的地区去建立帝国。例如，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一个穆苏布瓦头人的儿子恩加伦格瓦(后来称为姆西里)沿着贩铜商人的路线到了加丹加，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帝国。[25] 在乌扬延贝本身，统治家族的成员间相互对立，而阿拉伯人支持一位争夺者去反对另一人的做法使这种对立进一步加剧。19 世纪 60 年代，阿拉伯人设法使姆卡西瓦取

[21] R.F. 伯顿，1860 年，第 85、88 页。

[22] H.M. 斯坦利(Stanley)，1872 年，第 115-116 页。

[23] A.D. 罗伯茨(Roberts)，1969 年，第 73 页；N.R. 贝内特，1974 年，第 218 页。

[24] A.D. 罗伯茨，1969 年，第 74 页。

[25] 关于姆西里帝国的情况，见 J. 范西纳(Vansina)，1966 年，第 227-235 页。更早期的史料，见 F.J. 阿诺特(Arnot)，1889 年；费尔贝肯(Verbeken)，1956 年。

代姆恩瓦·塞莱登上王位，于是姆恩瓦·塞莱的兄弟辛巴离开了乌扬延贝，到塔波拉西南的科农戈人中间去建立他的王国。乌扬延贝酋长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尼尤古·亚·马韦，他在1874年离开自己的老家，到瓦尼扬韦齐西南面的瓦金布人中间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王国。除了这些离开自己的传统国度去征服几个小国而建立一个较大国家的统治者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其统治者实力增强而扩张。米兰博的国家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但远非绝无仅有。乌尼扬韦齐东北部的乌松戈，有一个名叫姆廷金亚的世袭统治者，他利用通往卡拉圭和布干达的商路来加强和扩大他的国家。就连乌扬延贝的姆卡西瓦的继承人伊西凯的势力，也壮大到足以对阿拉伯人以及后来对德国人进行相当程度的抵抗。

为了说明情况和机会发生巨变后如何给尼扬韦齐人的统治形式带来真正的变化，我们将简要地论述一下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两个最大的国家：米兰博和尼尤古·亚·马韦的国家。这两个"帝国"尽管都是我们刚描述过的那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但它们的组织形式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米兰博是塔波拉西面的小国乌约瓦的统治者。据说，他在年轻时可能在恩古尼人入侵坦桑尼亚西部时被俘获过，通过与恩古尼人在一起，他逐渐充分地了解了恩古尼人军事组织的能力。在19世纪60年代，他利用一小部分勇士，取得了对乌约瓦周围几个国家的控制。从1870年到1884年他去世时，他进行了多次战斗，极大地扩展了他所控制的地区。正如简·范西纳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国家"扩展到布哈和布隆迪，西面到温扎和通圭，南面到平布韦和科农戈，东面到尼亚图鲁、伊兰巴和苏库马，北面到苏库马和松巴哇"。[29] 他控制了塔波拉和乌吉吉之间的贸易路线，并在1876年迫使塔波拉的阿拉伯人在使用这条道路时向他纳贡。为了控制通往布干达的商路，已知米兰博曾于1876年和1881年向布干达的穆特萨派出使节。当阿拉伯人试图阻止他获得枪支时，他还直接同沿海地区联系以便直接得到。他很快就看出新的力量的潜在来源；他欢迎传教士前往他的首府，并试图同桑给巴尔的英国领事建立联系。

250

米兰博控制他的"帝国"的办法，是将军事实力加诸于传统体系之上。被征服的统治者要不时向他提交象牙等贡赋，并派年轻人到他的军队中去服役，以此来承认他的统治。如果传统的统治者进行抵抗的话，他就用同一个统治家族中更为顺从的成员予以取代。对那些邻近的强大王国的被征服省份，他将自己的武装人员留驻在那里。然而他实行控制的主要办法是使他的军队不断换防，以此来威慑他的邻邦和臣民。

尼尤古·亚·马韦的"帝国"内部统一的程度比米兰博的帝国高。尼尤古·亚·马韦同米兰博一样，利用"鲁加-鲁加"来确立自己在金布人当中的地位。1870至1880年间，他从他在基韦莱的基地出征，并控制了塔波拉以东通向沿海的商路，以及从塔波拉向南通往乌菲帕和坦噶尼喀湖的商路。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尼尤古任命了自己的官员，这些人直接对他本人负责，被称为"瓦特瓦勒"（vatwale）。在他的"帝国"里，真正的统治者不再是那些传统的酋长，而是他任命的瓦特瓦勒。这些官员负责将国内的所有象牙收集起来，送交尼尤古。每一个被任命官员负责的地区；包括好几个传统酋长国。这样，金布人的30

---

[29] J. 范西纳，1966年，第75页。



图片10.3 米兰博(1882或1883年)

个左右的国家，由六、七位瓦特瓦勒统治。[27]

米兰博同尼尤古·亚·马韦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根据19世纪末叶变化了的物质条件，建立起国家组织。尼尤古和米兰博都于1884年去世。由于尼尤古对他的“帝国”的行政结构进行了革新，“帝国”在他死后继续存在，直到殖民主义者将其摧毁为止。而米兰博的“帝国”则分裂成原有的一些小国，原因很简单，即没有一个继承人能够保持“帝国”所需的强大军队。

在论述长途贸易的扩展对内地影响的过程中，有两个主要地区没有提及。第一是大湖区，那是第十一章论述的内容，或许在这里只需指出下述一些内容也就够了。到19世纪中252叶，该地区有许多规模不等的王国。有些规模很大，实力也较强，其它的则很弱小。但所有这些王国都参与一个区域贸易网，这个网内的商路将多数首府连结起来。后来，来自东非沿海的国际贸易也连接到这个区域贸易网中。在19世纪下半叶，这些王国中最强大的大概是布干达、布尼奥罗和布隆迪。但还有其它许多不太强大的王国，包括布索加托罗，安科莱各国(恩科勒、布韦朱和布尼亚鲁古鲁)，[28] 卡拉圭，布哈亚各国和布津扎。

早在1844年，从沿海来的商人就已到达布干达。[29]在19世纪50年代，伯顿注意到：有些沿海商人到这里已有大约十年。十年后，斯坦利报告说，有些沿海商人到这一地区已有20年，一直没有返回沿海。[30] 因此，布干达似乎是这一地区最早的贸易中心。但沿海的商人很快就能够去访问其它的首都。卢旺达和布隆迪是例外，那里的统治者得以将沿海商人拒之门外，并有一套成功的战术对付敌人使用的枪支。[31] 另一方面，布尼奥罗的统治者们也争相将商人吸引到他们的首府去。在19世纪70年代，布尼奥罗的国王卡巴雷加试图与布干达竞争，同桑给巴尔建立直接联系，同时还试图吸引“喀土穆人”(沿尼罗河而下的商人)，当时，那些“喀土穆人”到处侵袭布尼奥罗王国北部一些分散的社会。[32] 从沿海贸易中获利最多的似乎就是穆特萨(1856-1884年)统治下的布干达了。在那里早已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府，并有纪律严明的官僚机构。穆特萨把枪支买卖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进一步加强了集权制度。布干达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集中于国际贸易而不是区域网络，穆特萨对东面的布索加的侵袭，以及他对西方邻邦(布尼奥罗、托罗、恩科勒、布哈亚和布津扎)的攻击，保证了布干达在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穆特萨为了保证沿海商队平安抵达他的首都，甚至力图控制卡拉圭和布津扎。

很明显，在大湖地区，一些较大的王国由于同沿海商人有联系而实力大大加强。特别254是取得火器后提高了他们侵袭其它王国的能力。它们通过侵袭，获得了牛、锄、象牙和俘虏。象牙和战俘可以卖给沿海商人，换回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包括纺织品、手镯、串珠、桌

---

[27] A. 肖特(Shorter)，1969年，第19页。

[28] 安科莱是殖民当局创造出来的，以前这一单位包括好几个国家。

[29] J.M. 格雷，1947年，第80-82页。

[30] B.F. 伯顿，1860年，第1卷，第173页。H.M. 斯坦利，1878年，第1卷，第455页。

[31] 关于19世纪下半叶的布隆迪，目前最好的资料来源，可能就是R. 博特(Botte)，1982年，第271-317页。在E. 姆沃罗哈(Mworoha)，1977年，第133-209页中，也有对布隆迪的概述。关于卢旺达，A. 卡盖姆(Kagame)，1963年，比他1961年的著作有进一步的叙述。

[32] D.A. 洛，1963年，第3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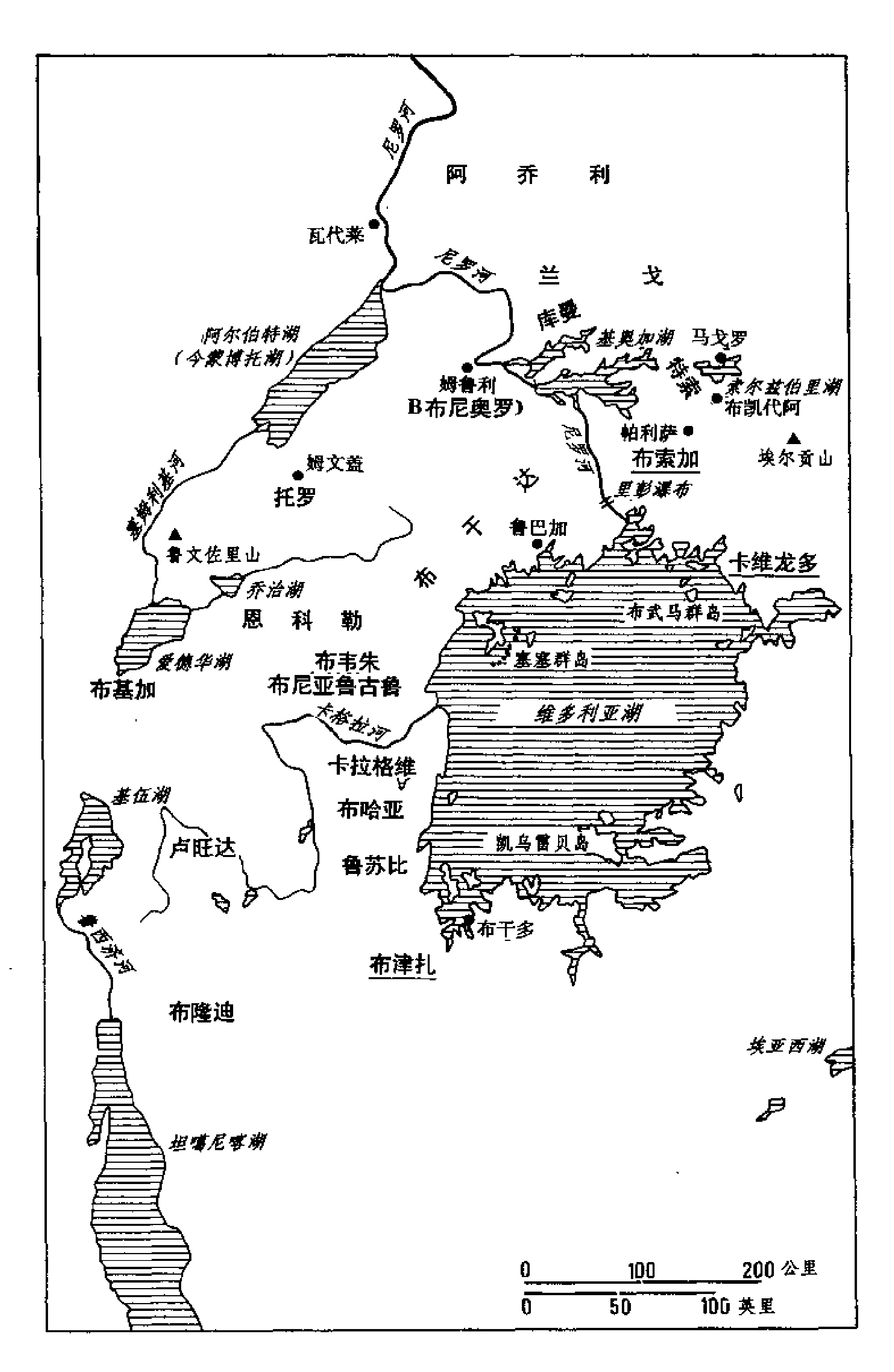


插图 10.3 大湖地区，1840-1884 年（改自 R. 奥利弗和 G. 马修（编），《东部非洲史》，1963 年，第 1 卷，第 299 页）

布，特别是火器。大国可以去劫掠小国，但无论大国或小国都去劫掠周围分散的社群，致使它们受到的损失最大。前面提到的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例外情况表明，还是有可能制订不同的战略对付贸易的渗透。他们的力量并非来自获取枪支，而是来自他们在人口稠密的山区保持稳定和统一的能力。他们在这一阶段进行的广泛战争和劫掠，使他们得以聚敛财富，而象牙和战俘并未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

我们在这一章中有意不提的第二个地区是坦桑尼亚南部。这是因为长途贸易对这一地区造成的后果，最好同另一外来因素造成的后果一并考虑，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恩古尼人的入侵。

恩古尼人的入侵

恩古尼人来自南非，在那里，他们是祖鲁兰北部操恩古尼语的人的一部分。1820年前后，为了躲避势力不断强大的恰卡，恩古尼战士们逃离自己的家园，在他们的首领兹万根达巴的率领下，向北迁移。在大约15年中，他们在莫桑比克南部及附近地区游动，然后于1835年在北上途中越过赞比西河，最后在19世纪40年代初抵达坦桑尼亚西部的菲帕高原。到这时，开始时的一群战士已变成一个有十万之众的继续前进的武装民族。[30]

这里，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恩古尼人的队伍如此异乎寻常地扩大是如何完成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祖鲁家园。当时，恰卡已按照两条交叉的原则，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军事国家。一条以亲属为基础，另一条以军团为基础。根据第一条原则，国王处于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体系的顶端，他下面是由国王的妻子和他们的子女及其侍从构成的各个亲属部分。每个部分在每一代人长大后便分开和扩展。而青年则组成跨越地域和亲属关系的同龄人军团，由国王直接控制。这意味着可以使外来者通过亲属和同龄人军团两条线，逐渐进入充满活力的社会结构，轻而易举地被吸收进来。恰卡还改进了军事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使用短标枪，这使同龄人军团成为非常有效的作战单位。

255 恩古尼人继承了这种充满活力的社会体制，从而可以把他们在北上途中遇到的那些人组成一个非常统一的群体。他们仗着优越的军事组织，可以在行进途中靠劫掠他人生存下来。他们尽管在几个资源条件允许的地方曾定居数年，但仍必须过着掠夺性的生活。恩古256 尼战士在行进途中利用战俘扩充队伍，这些战俘后来被恩古尼的社会秩序所同化。最初，战俘被分配到社会的某一部分，并很快编入同龄人军团，在那里，“真正的恩古尼人”同这些战俘的社会区别微乎其微。当恩古尼人抵达菲帕高原时，这一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是被俘后同化了的莫桑比克的聪加人，津巴布韦的绍纳人，以及赞比亚和马拉维的赞比西河北部地区的森加人、切瓦人和通布卡人。

1848年前后，兹万根达巴之死引发了对继承权的争夺，最后分裂的倾向占了上风。这一民族分裂成五个王国，各自向不同方向运动，并在不同区域定居下来。许多作者将这种分裂现象归结于后来者缺乏兹万根达巴那种使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特殊能力。但是必须看到，

[30] 详情见J.D. 奥麦尔-库珀(Omer-Cooper)，1966、1969年；P.H. 格利弗(Gulliver)，195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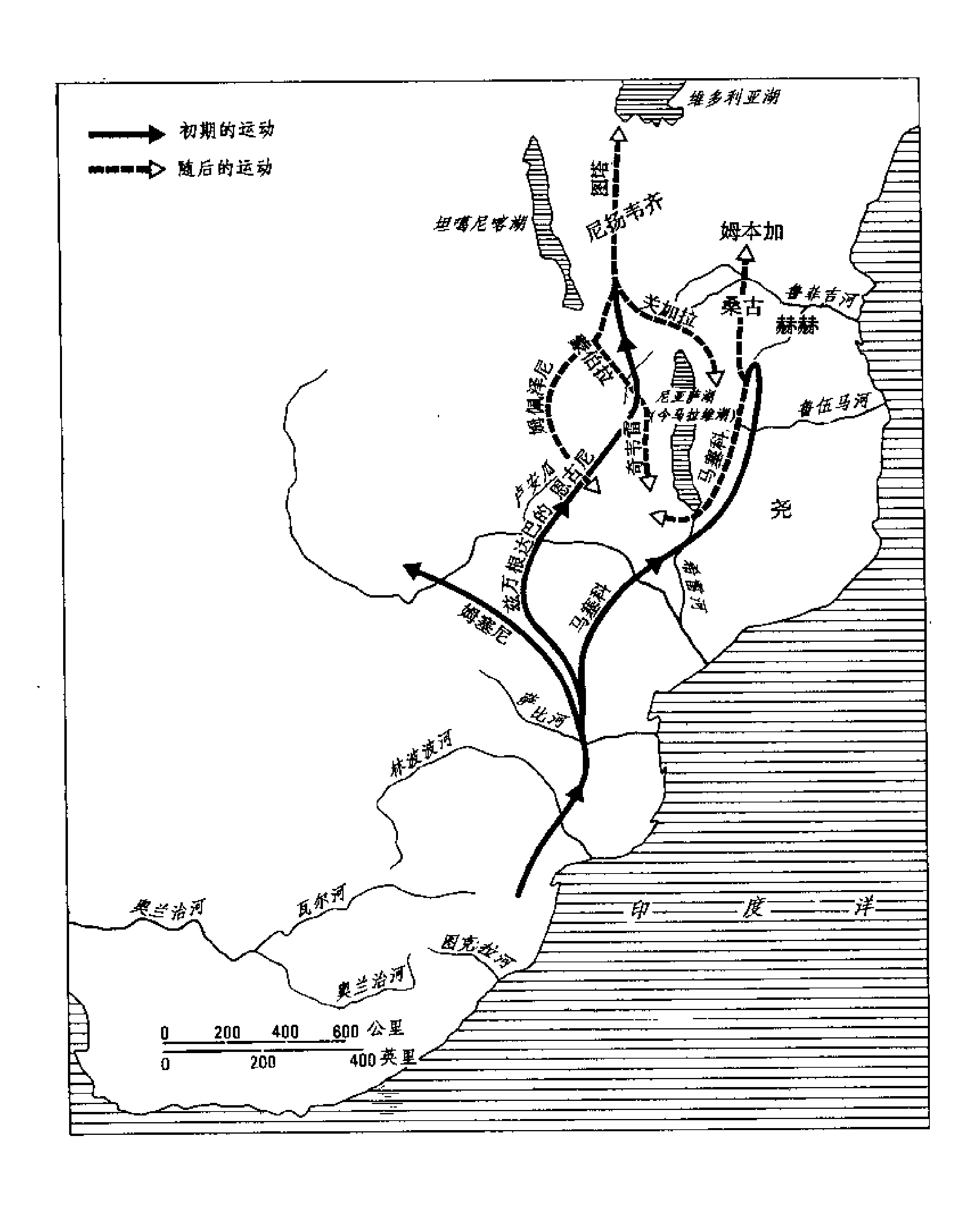


插图 10.4 兹万根达巴的恩古尼人、马塞科-恩古尼人和姆塞尼人北上延移路线

(选自 J.D.. 奥麦尔-库珀，《祖鲁的结局》，1966 年，第 66 页)

那种惊人的“滚雪球”式的增长，使恩古尼人的人口扩大了一百多倍。[34] 这么快的增长，使集中统一的控制变得更困难。同时，考虑到菲帕高原的环境特点，也许可以认为，到兹万根达巴去世时，人口规模已超出环境所能维持的水平。

五个恩古尼支系中有三个向南迁移，并在赞比亚和马拉维建立了王国。第四个，被称为图塔人的一支，向北突进到尼扬韦齐人的地区，其成员劫掠那里的村庄，并骚扰从塔波拉到乌吉吉的商路。他们最后在塔波拉以北定居下来，但他们的侵袭活动曾向北一直到维多利亚湖南岸。图塔人俘获的尼扬韦齐人中包括米兰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学会了恩古尼人的军事技术后逃了出来，从躲避恩古尼人入侵的难民中组织起了自己的力量。

恩古尼人的另一支是关加拉人，他们在祖鲁·贾马的率领下，从菲帕高原向东南移动，进入尼亚萨湖以东的松盖阿地区。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另一支恩古尼族群——马塞科人，后者是在恩古尼人抵达赞比西河之前分离出来，并从马拉维进入坦桑尼亚南部的。人们都知道马塞科-恩古尼人比关加拉人强大得多，他们的首领马普托成了这两支族群的大君主。然而这一联盟并未维持多久，双方的竞争很快发展成公开的战争。最后，关加拉人击败了马塞科-恩古尼人，将他们向南赶过鲁伍马河。恩登代勒人，一支被吸收进来的族群，试图建立一个接替的国家，但最后被关加拉人击败，被赶人基隆贝罗河谷，到 19 世纪 60 年代，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姆本加王国。

257 关加拉人自己分裂成了两个王国，奇佩塔率领下的一支建立了姆绍佩王国。姆塔卡诺·沙布鲁马率领的一支建立了恩杰鲁王国。前者在松盖阿以北定居，后者则向更南的方向迁移。多数作者强调，这两个王国在德国入侵以前，通过侵袭活动在尼亚萨湖到沿海之间的整个地区实行恐怖统治。然而，A. M. H. 谢里夫最近表明，这种解释可能造成极大的误解，因为，

> 这将显得，如果恩戈尼人继续过那种掠夺性生活，“就像一大群蝗虫由于它们毁掉了自己的生计而被迫继续往前飞”，他们就不可能定居下来。因此，他们一旦在松盖阿地区定居下来，他们的经济模式就必须变成更有秩序地开发当地的农业资源，将当地人作为种植者加以更有效地利用，而恩戈尼人自己则去照看他们的庞大牛群。如在更为长远的基础上将农业活动交给被征服的人民，后者的社会地位必将受到影响，他们将被同化进恩戈尼人的社会，但达不到像迁移过程中同化了的战俘那样的程度。侵袭活动仍将以更有限的范围在恩戈尼国家的边缘进行，这样为臣民提供显示他们的英勇以及捕获战俘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机会，将会少得多。[35]

因此，从重要性来说，恩古尼人入侵的首要和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在坦桑尼亚土地上建立了恩古尼国家。这两个恩古尼王国，作为强大的实体一直健全地存在到殖民时期以后。

它们在反抗德国人的马及马及战争中的作用，是坦桑尼亚早期殖民统治史中的光辉篇章。恩古尼人侵的第二个后果是引进了恩古尼的军事技术，好些坦桑尼亚社会采用了它们。

---

[34] A. M. H. 谢里夫(Sheriff)，1980 年，第 33 页。
[35] 同上，第 34 页。

人们一度认为，赫赫人和桑古人等族群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恩古尼人的蹂躏，采用了恩古尼人的军事技术，建立权力集中的政治实体。但是，近来的研究[56]表明，这种假设不正确，因为在以上两个例子中，集中化过程都始于恩古尼人入侵之前。事实是，恩古尼人的军事技术，的确加强了采用这一技术的那些社会的实力，使它们得以对抗当时的情况，包括奴隶贸易的影响。除了需要保护自己免遭恩古尼人的蹂躏和捕捉奴隶者的伤害外，有些社会还得以利用这类技术建立较大国家，如前面已经谈到的米兰博的例子，以及在南方地区的桑古人和赫赫人。

258

桑古人是第一个学习恩古尼人军事技术的民族。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在自己的首领梅雷雷率领下，统治了南部高地的大部分地区。但在1875年以后，从桑古人那里学得恩古尼人军事技术的赫赫人，使他们相形见绌。梅雷雷将多数桑古的领土丢给了以姆维尼贡巴为首的赫赫人。能在1878至1881年之间同关加拉-恩古尼人进行持久战而不分胜负的是赫赫人。此后，赫赫人在姆维尼贡巴的儿子姆克瓦瓦率领下，仍旧是一支处于支配地位的力量。后来，姆克瓦瓦对德国人的军事抵抗可能是坦桑尼亚最为顽强的。

因此，在19世纪下半叶，坦桑尼亚南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变化，有的是因为长途贸易带来的更为广泛的联系而开始的，后来又因为恩古尼人的入侵而加快了。19世纪中叶以前，在坦桑尼亚南部地区居住的基本上是按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到19世纪80年代殖民入侵时，这一地区已有一些最强大的王国，如恩古尼人、赫赫人和桑古人的王国。

马萨依人

在本章前面部分，我们曾间接提到马萨依人是19世纪下半叶影响到东非东北内地历史的一支力量。这中间主要的原因不是扩张，因为到18世纪末，马萨依人已度过了他们的扩张时期。[57] 据说，他们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南下企图，受到了戈戈人和赫赫人有效的阻止。[58] 因此，到19世纪中叶，游牧的马萨依人控制着坦桑尼亚中部和肯尼亚中部之间裂谷中的草原，而几个从事农业的马萨依人族群（伊洛伊科普或瓦-夸维）在西面和东面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高原之间的地区与他们相邻。

到19世纪末有什么重大事件使这种形势发生变化呢？答案要从19世纪中叶爆发的一系列漫长的内战中去寻找。导致这些战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但可以提出几个促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些作者倾向于强调这个好战的民族缺乏继续扩张的机会。“由于受到阻挠，马萨依人将其好战的本性转向了内部”。[59] 但是，正如下面将要看到的，对马萨依人社会的细致研究并未证明马萨依人的好战形象。因此，可以通过观察内战的本身来分析这些促成的因素。

260

---

[56] A. 雷德梅因(Redmayne)，1968年a，第426页；1968年b。

[57] E. A. 阿尔珀斯，1974年，第241页。

[58] J. 汤姆森，1885年，第414页。

[59] E. A. 阿尔珀斯，1974年，第2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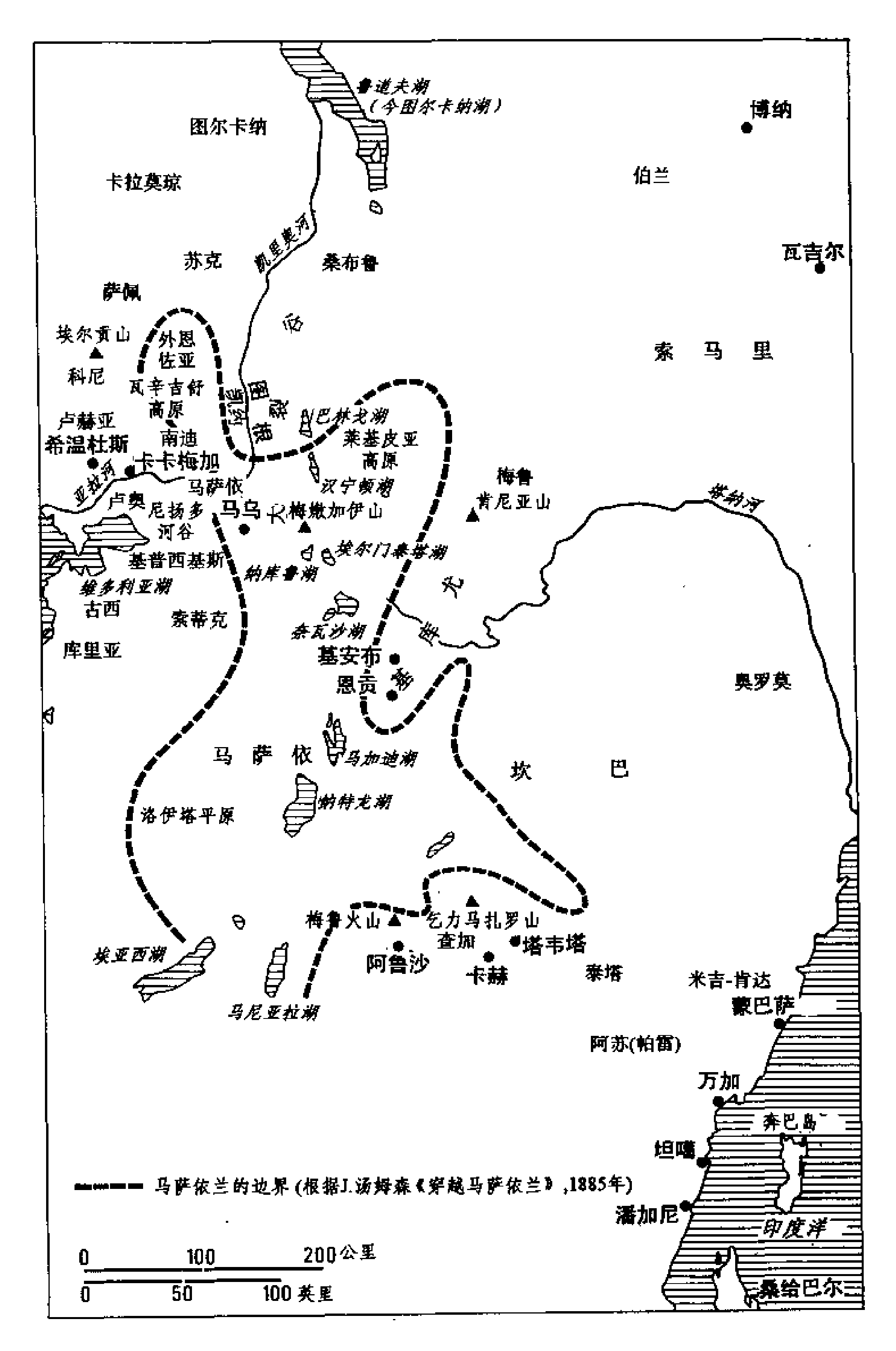


插图 10.5　马萨依人及其邻族，1840-1884 年（选自 R. 奥利弗和 G. 马修（编）《东部非洲史》，1963 年，第 1 卷，第 298 页）

直到不久以前，我们对内战的了解是从A.H. 雅各布斯本世纪60年代上半叶在马萨依人中间进行的一次研究得来的。[40]根据这次研究的看法，内战基本上是马萨依人中的游牧族群和农业族群（伊洛伊科普）之间的冲突。这两个族群都讲马萨依语，但后者除了游牧这一主业外，还从事农业活动。在游牧族群看来，伊洛伊科普人的地位低下，因为他们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从19世纪上半叶起，游牧的马萨依人通过“奥洛伊博尼”(oloiboni)这一强有力的宗教仪式职务的发展，取得了更高程度的统一。由此，他们有了一个能够被广泛请教的中央形象。但是，不论是游牧族群，还是伊洛伊科普人，内部都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雅各布斯对马萨依人的口头传说的解释，指出了宗教仪式职务的演变标志着操马萨依语的这两个族群发生分裂的开始。因为，在苏贝特这个人们所知道的第一个享有政治影响的“奥洛伊博尼”出现之前，伊洛伊科普人也同样请教游牧马萨依人的宗教专家的意见。但是在苏贝特阶段（包括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直到1864年他为姆巴蒂安所接替），据说伊洛伊科普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奥洛伊博尼”。

约翰·L. 贝恩岑后来进行的研究[41]表明，马萨依游牧族群和农业族群的分裂并不是永久性的。在他看来。应试图用牧民与农民的对立“导致无法克服的矛盾。在一次战争或一系列劫掠之前，所有的马萨依人都是牧民，只是由于失去牛群，失去裂谷地区的草场，才迫使一些族群转而通过游牧以外的其它途径维持生计”来解释马萨依人的历史。[42]这意味着19世纪的马萨依人社会要比以前的有关研究所认为的复杂得多，也就是说，有些族群在某一阶段被称为伊洛伊科普人，在另一阶段可能成为游牧民，这取决于他们能否重新补充畜群并取得肥沃的草场。然而，由于19世纪的战争，更多的马萨依人被逐出裂谷地区，他们的半游牧生活一直延续到殖民统治时期。[43]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将从旨在控制牛群和草场的族群联盟的角度来论述这些战争，这两者对游牧生活来讲都是重要的。

冲突的实际起因，可能各有不同。最早开始的一系列战争发生在瓦辛吉舒高原上，这可能是由于牧场的压力引起的。裂谷地区的马萨依牧民希望使用这片高原上的优良牧场，而 **261** 这些牧场当时是另外一个名为瓦辛吉舒的马萨依族群使用的。瓦辛吉舒人得到生活在高原上的其它几个操马萨依语的族群的支持，最后，瓦辛吉舒人被赶出高原，退到其它地方。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沿海商人到来之前，被用来加强了万加王国。

第二系列的战争开始于有名的1836年饥荒之后，人们都知道，这次饥荒影响到东非的许多地区。因此，为了补充在旱灾中失去的牛群，许多劫掠活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在马萨依兰的所有地区都发生了战斗。在南部，裂谷马萨依人袭击生活在他们以东直到潘加尼河的那些族群。他们接着把那些族群赶出了基巴亚、尚巴拉伊和纳贝雷拉，迫使他们在潘加尼河以东、乞力马扎罗低地和塔韦塔地区定居。对梅鲁山坡上的阿鲁沙人的定居，也假定是在这一时期。在北部，有对莱基皮亚人的侵袭。但主要的冲突是1860年至1864年，发生于纳库鲁湖和马乌悬崖的普尔科人和洛塞加莱人之间。一些洛塞加莱人逃到基普西基斯

[40] A.H. 雅各布斯(Jacobs)，1965年。
[41] J.L. 贝恩岑(Berntsen)，1979年。
[42] 同上。
[43] 阿鲁沙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见P.H. 格利弗，1963年。

人和南迪人的领地上去。据雅各布斯收集的口头传说,[44]正是这些马萨依难民将"奥洛伊博尼"那样的职位传到了南迪人中间，在那里被称为"奥尔科伊约特"(orkoiyot)，这导致南迪人的势力在他们的马萨依邻邦走向衰落时一度崛起。

第二系列战争的结束，也是马萨依历史上一个时期的终结，因为它结束了瓦辛吉舒高原基本上为马萨依人控制的阶段，并预示着南迪和基普西基斯人等其它尼罗河流域族群重要性的上升。正是由于马萨依人对高原的控制减弱，沿海商人要利用肯尼亚商路，比以前容易了，而以前他们往往避开这条路。

最后一系列的马萨依人战争，同样以北部高原为中心。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姆巴蒂安已接替苏贝特，担任宗教领袖。[45]这时形成了一些联盟，如普尔科和基松戈游牧族群、莱基皮亚同几个伊洛伊科普族群，即那些被赶出优良牧场，被迫成为半农业者并从事游牧的族群。到 1844 年，游牧族群已取得显赫地位，而伊洛伊科普族群则向不同的方向分散开来。

因此可以说，长期战争是使强大的马萨依族群消灭的原因，特别是在北部高原。这些族群的幸存者由于战争分散到各地：从乞力马扎罗低地到塔韦塔，再到潘加尼河谷的帕雷人和尚巴人的平原，从阿鲁沙向沿海方向到马萨依草原的南部。这些族群就是有关马萨依人的现存文献中称为伊洛伊科普或瓦-夸维的集团。那些分散到更北和更西面的人，后来被其它族群所吸收。

262

至于游牧马萨依人，对他们胜利的描绘可能只是错觉。可以肯定，由于这些战争，他们占据的土地也在减少。他们不再居住于乞力马扎罗山以东地区，也不在瓦辛吉舒和莱基皮亚高原。裂谷的大多数地区，无论是平原还是开阔高原，仍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中，但是其人口数量却大为减少。最后，严重影响游牧马萨依人势力的因素，是在长期战乱之后流行于这一地区对人和牲畜的传染病。由于侵袭涉及到广泛的地区，马萨依人同许多其它族群有了接触，结果从那些族群传染上许多自己不习惯的疾病。例如 1869 年，他们从桑布鲁人那里染上霍乱，许多人因此丧生。[46]最为严重的灾难发生于 19 世纪 80 年代，一场严重的天花和流行性胸膜肺炎，同时爆发，使马萨依牧民大批死亡。最终削弱马萨依人的不是战争，而是这类人畜传染病。结果，在将殖民统治强加于这一地区时，他们为人熟知的凶猛强悍几乎不再引人注意了。

欧洲人日益加大的压力

1845 至 1884 年间，欧洲人对东非地区的直接压力是围绕四项相互联系的活动产生的：废除奴隶贸易，传播基督教，地理探险和建立"合法贸易"。这四项活动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它们都是由欧洲产业革命引起的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产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生产能力，使奴隶劳动不那么有利可图，从而造成了对待奴隶贸易的新态度。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成

---

[44] A.H. 雅各布斯，1965 年。

[45] A.H. 雅各布斯，1965 年，用年龄排列年表，推断苏贝特死于 1864 年。D.A. 洛，1963 年，第 306 页，引用其它几种资料，将姆巴蒂安继任的时间定在 1866 年。

[46] D.A. 洛，1963 年，第 308 页。

功地使西方国家废除了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到19世纪40年代，注意力就转向东非的奴隶贸易。与此相仿，到19世纪中叶，与人道主义派别相联系的宣讲福音活动也转向了东非；这中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理探险(它本身也是新的科学探索和传教精神的产物)揭示了富于挑战性的机会，激励人们通过传教工作和建立“合法贸易”的行动来反对阿拉伯奴隶贸易的罪行。

当时使用的“合法贸易”一词，是指人口贩卖以外的其它商品贸易。比如我们看到，象 263 牙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一阶段已成为东非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商品之一。赛义德·萨义德将首府从阿曼迁往桑给巴尔之后，当时主要的西方强国——英国、美国、法国，都在桑给巴尔设立了贸易机构。然而，正像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由于印度商人在东非贸易中的支配地位，大多数象牙在运往欧洲之前仍要通过孟买。尽管如此，从西方的帝国主义来说，东非贸易已属于西方以英国为首的非正式帝国范围之内，[47] 不论是通过桑给巴尔直接进行还是通过孟买间接进行。分别做廉价印花布和五金买卖的美国和德国(汉堡)公司的代理人买进的数量，要比印度商人控制的数量少些。[48]这种商业关系一直不受干扰地延续到将近这个时期之末。

英国政府的努力集中于阻止奴隶贸易。19世纪40年代，英国试图限制在阿曼素丹控制下的地区贩运奴隶的规模，结果徒劳一场。1841年，海军上校阿特金斯·哈默顿被任命为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有好几年，他努力要同1840年将首府从阿曼迁来的桑给巴尔素丹达成一项新的协议。由于这些努力，签订了1845年的“哈默顿条约”。该条约试图将奴隶贸易限制在素丹的领地范围之内。素丹帝国的疆域从东非直达阿拉伯半岛，这项条约即使付诸实施，效力也是极为有限的。此外，由于素丹不愿看到这一贸易停止，实施条约是很困难的。赛义德·萨义德于1856年去世后，他的帝国被分为两部分，继承了东非部分的赛义德·马吉德同样不愿意放弃奴隶贸易。他甚至想在大陆沿海建立一个新首都称为“和平之港”(达累斯萨拉姆)，借以加强他对这一贸易的控制。但到1870年他去世时，这一工程仍未完成。废除阿拉伯奴隶贸易的努力直到1873年才取得成功，那时英国人通过强化外交活动和威胁，使马吉德的继任者赛义德·巴尔加什同意发布公告，禁止一切海上的奴隶贸易。

为什么要桑给巴尔素丹同意停止奴隶贸易会这样困难？如果我们记得桑给巴尔和奔巴岛日益扩大的种植园经济的性质，那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经济依赖奴隶劳动，如限制获得奴隶，就将限制其扩展。人们知道，在1873年公告之后，种植园农业继续扩展。[49] 由 264 于奴隶贸易在大陆沿海仍是合法的，商人们可以将奴隶沿着海岸从基卢瓦长途运送到蒙巴萨，甚至马林迪，然后在夜间用小船偷运到桑给巴尔，特别是奔巴，以避开英国海军的巡逻。即使到了1876年，奴隶贸易在大陆上已被禁止之后，无论是素丹还是英国人都无力有效地实施公告。岛上的丁香种植园对大陆沿海地区粮食生产的需求增长了，特别是谷物。这样，在从潘加尼到马林迪的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用奴隶劳动生产谷物的种植园。因此，在

---

[47] R. 鲁宾逊(Robinson)和J. 加拉格尔(Gallagher)，1961年，第51页。
[48] R. 奥利弗(Oliver)，1952年，第1-2页。
[49] F. 库珀(Cooper)，1977年，第54页，说1877年从阿曼移居桑给巴尔的阿曼人有一千人之多。

这一时期，无法区分奴隶是准备出售，还是要用于这些种植园。[50] 更糟糕的是，这时内地许多地方的内部冲突造成了大量的战俘，商人们容易想出新办法避开素丹的士兵和英国海军的巡逻检查。在从潘加尼到蒙巴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经过伪装的转运站，小帆船可以毫不费力地乘着夜色溜出港口，直抵奔巴岛而不被发觉。因此很明显，奴隶贸易直到殖民时期以后仍是一项重要的活动。

欧洲贸易使团和针对奴隶贸易的海上巡逻，仅限于桑给巴尔和沿海地区。尽管欧洲人无疑可以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听到一些远离沿海的内地情况，但总的说来，广大的内地对他们来说仍是未知领域。然而，形势的发展，逐渐使人道主义者和传教士的注意力转向东非。在 1856 年以前，他们主要关心的，仍是跨越大西洋的三角贸易，但随着人们对恐怖的东非奴隶贸易的了解越来越多，欧洲公众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这一地区。

推动这一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戴维·利文斯敦在东非和中非的旅行。1856 年，他完成了从安哥拉到赞比西河三角洲的第二次穿越中非的旅行。在这一阶段之前，圣公会的正教传教会曾派出三名德国教士开创东非的工作。约翰·克拉普夫于 1844 年抵达蒙巴萨；J. 雷布曼和 J. J. 埃哈特先后于 1846 年和 1849 年抵达，他们的传教根据地设在蒙巴萨附近的拉巴伊。1856 年，雷布曼穿越尼卡平原到了乞力马扎罗，成为第一个看到这座山峰的欧洲人。克拉普夫则继续南行，去访问金韦里的尚巴王国，然后又向北到坎巴人地区，成为第一个见到肯尼亚山的欧洲人。埃哈特和克拉普夫还继续向南，到了鲁伍马河口地区。后来，埃哈特在坦噶停留一段时间，使他得以发表一份东非地图，其中包含着他在沿海地区收集到的有关内地的大量信息，如各个大湖，他把它们描绘为一个内陆海。埃哈特的“地图后来成为激励伯顿和斯皮克进行他们 1858 年的探险活动的主要启示”。[51]

265

这第一批传教士是先行者，他们为后继者收集了相当多的极为宝贵的信息。但是，他们的材料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只是当利文斯敦开始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鞭挞阿拉伯人的奴隶贸易时，才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利文斯敦按照他那个时代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信仰，强调了商业的力量。他相信这种力量会使广阔的非洲内地同基督教欧洲联系起来，从而使非洲人摆脱奴隶贸易造成的贫困和屈辱。因此，他的旅行集中于寻找可以通航的河流，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打开传播商业和基督教义的道路”。[52] 1857 年，他的《传教旅行记》[53] 一书出版，加上他亲自呼吁，促使一批英国高级教士组建了“中非大学传教会”(UMCA)。这一团体试图按照利文斯敦的想法，进入赞比西河地区，但却发现赞比西河和鲁伍马河都没有可以通航的入口。在克服最初遇到的困难之后，传教团只得迁往桑给巴尔，将注意力集中于获释奴隶。

获释奴隶的问题引起了所有在东非工作的传教团体的注意。1858 至 1873 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团、中非大学传教会和圣灵会都参与了这一活动。圣公会正教传教会继续在蒙巴萨附近的拉巴伊活动，在孟买获释的奴隶被派到那里协助雷布曼工作。中非大学传教团基地

---

[50] F. 库珀，1977 年，第 126 页。
[51] R. 奥利弗，1952 年，第 7 页。
[52] 同上，第 27 页。
[53] D. 利文斯敦(Livingstone)，1857 年。

设在桑给巴尔，而圣灵会则在巴加莫约活动。所有这些团体都没能完成利文斯敦想要内地向商业和基督教开放的使命。尽管如此，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因为传教团体已开始在沿海扎下了根，那些受到这些传教士早期活动激励的欧洲人已前往东非内地探险。1858年，伯顿和斯皮克出发去寻找埃哈特所说的“乌尼扬韦齐海”。[50] 他们到了坦噶尼喀湖，斯皮克还访问了维多利亚湖南岸地区。1862年，斯皮克又同格兰特一道去勘察维多利亚湖，并确定了尼罗河出口的位置。他们在沿白尼罗河行进时遇到了塞缪尔·贝克，他是从海边溯河而上的。后来，利文斯敦本人再次回到非洲内地，为他以往的发现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勘察对教会的入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大湖泊的存在，似乎立即证明利文斯敦的计划是切实可行的。所有在东非活动的英国主要传教团体，都想让轮船驶入这些内陆水域。这 **266** 些探险活动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在于它们揭示了阿拉伯奴隶贸易的范围和特点。因为人们现在知道，东非内地并不像克拉普夫想象的肯尼亚那样(或像中非大学传教会教士们想象的希雷河下游区那样)无法进入。商路无疑深入到整个内地，奴隶这种人口货物正是通过这些商路到达沿海的。更为重要的是，探险者揭示了奴隶贸易对非洲人的生命来说意味着什么。

利文斯敦去世后，英国传教团体激发起更大的热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举行的国葬影响到几乎每一个教士，并激起大众对传教活动的支持。结果，苏格兰自由教会第一次投身于中非的传教活动。1875年，该教会第一支探险队深入到赞比西河和希雷河，并在尼亚萨湖边的布兰太尔建立了一个传教基地。其它已在沿海活动的传教团体迅速扩大了他们的工作。1875年，中非大学传教团在金韦里的乌桑巴拉帝国大陆部分的马吉拉，开设了一个传教基地，1876年又在坦桑尼亚南部地区的马萨西建立了一个传教基地。与此同时，斯坦利这位以前曾受命寻找利文斯敦的英裔美国记者、冒险家兼探险者，完成了进一步勘察这一地区的第二次旅行。1875年，他有一封关于在布干达进行传教活动的可能性的信，刊登在《每日电讯报》上。这促使几个英国教士为传教活动捐献资金。结果，圣公会传教团从蒙巴萨附近拉巴伊的弗里尔敦向外扩展，1876年在坦桑尼亚中部的姆普瓦普瓦建立了一个传教基地，教士们从那里出发，第二年抵达穆特萨的首府。利文斯敦本人所属的伦敦传教会也很快决定沿着他的足迹行动，在一笔专用资金的促使下，决定前往利文斯敦曾度过他最后几年时光的坦噶尼喀湖。从1877年开始，伦敦传教会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的乌吉吉、乌兰博、卡瓦拉岛和姆托瓦等地，建立了好几个传教基地。遗憾的是，由于气候恶劣，而德国又在政治上对传教士抱敌视态度，致使这些基地的工作停顿下来。最后，伦敦传教会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罗得西亚重建了自己的基地。

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不同于新教教会，其推动力在当时来自一个人的远见与精力：他就是1867年受命担任阿尔及尔大主教的枢机主教拉维热里。一年后，他建立了非洲圣母会，后来以白衣神父会著称。该会的目的，是在“中非”作为“国际非洲协会的宗教对等机构，在同一地理范围内活动，即在赤道以北100度到以南20度之间，其传教基地分布于

[50] R. 奥利弗，1952年，第27页。

267 该世俗机构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从而可以相互提供帮助。"[55] 该会在东非的第一个传教基地于 1878 年建在塔波拉。早在十年前，圣灵会就在巴加莫约建立了基地，但活动集中于为获释奴隶建立殖民地，而不是扩充传教基地。因此，当非洲传教会开始侵入内地时，圣灵会只前进到莫罗戈罗，他们在"内地约 100 英里的姆洪达"建立了一个传教基地。[56]

几个非洲传教会的成员从塔波拉出发，向北在维多利亚湖南岸的布昆比建立了一个传教基地，并从那里前往布干达。当他们抵达穆特萨国王的宫廷时，发现圣公会传教团的传教士亚历山大·M. 麦凯已于几个月前先期到达，而穆斯林"来到那个国家已有好几年，有几个酋长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57] 这是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在宗教上对立的开端。穆特萨可以利用一个集团制约另一个集团，借此控制对立，但是 1884 年他去世后，宗教冲突开始严重影响到宫廷内部事务。

另一批白衣神父会的成员离开塔波拉，向西前进，于 1879 年在乌吉吉建了一个传教基地，又从那里前往布隆迪境内，在距今天的布琼布拉约 120 公里的鲁蒙盖建立了一个传教基地，但是这个传教基地因 1881 年有三名传教士遭杀害而被放弃。"白衣神父会几乎有 50 年无法重新恢复他们的传教活动"。[58] 1885 年，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决定将其努力集中于刚果自由邦，此后，白衣神父会在乌吉吉附近接管了由国际非洲协会建立的两个基地。

因此，在 1884 年之前，欧洲在东非内地的压力，主要是由传教团体施加的。即使有些地方存在商业活动，也往往是传教工作的支流。有两个这类的例子。一个是利文斯敦尼亚的中非贸易公司，它与苏格兰传教士在尼亚萨湖地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该公司的目的据说是在该地区的水道上开办班轮，为布兰太尔的传教基地提供日常必需品，还以低于阿拉伯商人的价格使用奴隶，将象牙运出。第二个例子也同苏格兰自由教会有关。该教会一个成员，即拥有英属印度轮船航运公司的威廉·麦金农，从 1872 年开始经营开往桑给巴尔的

268 班轮。数年之后，他说服桑给巴尔的素丹认可他修建通往尼亚萨湖和维多利亚湖的道路的计划。尽管这些道路并未修筑，但正是这些计划使更有帝国主义色彩的组织——殖民地瓜分阶段有名的英属东非公司成熟起来。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代，传教活动还处于开拓阶段。从表面上看，它可能对非洲社会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但是，仔细的研究表明，它已经有了一定的效果。实际上，在这个时代，东非的传教团体更有势力，因为它不像后来阶段那样必须面对殖民政府的种种限制。正如罗兰·奥利弗所说：

> 教会已变成这片土地上的一种势力，而且不仅是精神势力。在布干达，如同在桑给巴尔一样，稳固地建立了本地的政治权威，足以将外来者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其它地方，即使是仅仅带着几十个挑伕启程，试图在当地一个村庄驻扎的教士，也必须建立起一个相当于小的独立国家的单位：[59]

---

[55] 同上，第 46-47 页。
[56] J.M. 格雷，1963 年，第 244 页。
[57] G.D. 基特勒(Kittler)，1961 年，第 161 页。
[58] 同上，第 157 页。
[59] R. 奥利弗，1952 年，第 50 页。

早期各教会基地的注意力集中于为获释奴隶建立殖民地一事，对它们本身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类殖民地不论是在沿海(如弗里尔敦或巴加莫约)，还是在内地(如马萨西、布兰太尔、姆普瓦普瓦、塔波拉或乌吉吉)，其主要考虑都是设在贩奴商路附近，利用获释奴隶作为传教殖民地的核心。这与对阿拉伯奴隶贸易作斗争的意图是一致的。但实际上，传教基地成了神权国家，甚至可以将政治流亡者、逃亡奴隶以及与本社会不合群的人吸引来。[60] 这样，传教基地使那些已经被当时的经济压力削弱的社会，变得更为虚弱，从而减弱了反抗强加给它们的殖民统治的能力。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传教团的社会也是殖民统治的开拓者。1884 年以前生活在大陆上的 300 名欧洲人中，大多数同传教活动有联系。[61] 即使是那些本地统治者有效控制的地方，欧洲传教基地的存在，连同其文化影响，都为瓜分阶段声称有权使该地成为殖民地的做法开辟了道路。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在这个时代，东非是一个由英国控制的庞大的非正式帝国的组成部分。然而到这一时代快结束时，德国作为一个主要的西方强国开始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竞争。在东非范围以外，这种竞争造成的紧张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当利奥波德国王号召于 1876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国际会议，“讨论以和平和协作的行动来发展合法贸易和打击奴隶贸易的方法”时，[62] 对立已经表面化了。最后，国际会议分裂成相互嫉妒的各国小组委员会，而利奥波德则带头在刚果建立了他个人的帝国。这个时代最重大的行动是英国 1882 年对埃及的占领。对英国来说，这一行动是有理由的，因为埃及(苏伊士运河和尼罗河)对英国在印度和东非的利益具有战略地位，不过东非的重要性要差一些。但是，对这一占领的国际反应，却包括德国的一系列殖民地兼并活动：1884 年 4 月兼并西南非洲，同年 7 月兼并喀麦隆。在西非，德国和法国开始站到一起向英国在尼日尔河流域的地位挑战。“帝国主义的高潮”滚滚而来。当俾斯麦于 1884 年 11 月召开柏林会议时，瓜分非洲的进程已经开始。在东非，卡尔·彼得斯已在他的“德意志殖民协会”的主办下抵达桑给巴尔，并进人内地去谈判条约。英国人仍然希望加强赛义德·巴尔加什在大陆上的权威，这将足以保护他们的利益，而用不着直接的殖民统治。

269

（艾　平译）

[60] 同上。
[61] 同上，第 49 页。
[62] J. 弗林特(Flint)，1963 年，第 362 页。

11 大湖地区的民族与国家

D.W. 科恩

序 言

270 18世纪上半叶，布干达国王卡巴卡·马万达试图将位于他王国中央行政区以东的富饶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发动了一次大战役，获得了一些眼前的胜利。马万达派驻一名将军到基亚格韦地区，使该地区全部置于布干达王国的管辖之下。然而，卡巴卡·马万达在基亚格韦的地方长官却在几个地点遭到抵抗。在国王的继承者统治期间，基亚格韦的一些地方已落入布干达西北邻国布尼奥罗王国的势力范围，而基亚格韦地区无边无际的马比拉森林却紧靠布干达王国渗透之处。至18世纪末，离干达中心地带正东不到45公里的马比拉，已成为反对布干达宫廷的力量储备地。对王国内外无数的人来说，马比拉昏暗的通道寄托着转变命运的希望。

临近18世纪末，卡孔古卢逃出他父亲干达国王塞马科基罗的领地。他的曾祖父是马万达的兄弟。卡孔古卢在马比拉得到庇护和支持。在那儿，他和他的支持者组织了一支与布干达周边小国联盟的杂牌军，并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以攫取他父亲的王位。然而，卡孔古卢没有获得塞马科基罗的王位，但他的活动却加剧了布干达老管辖区的动乱，进一步促使干达的领导层下决心惩罚和兼并东西两面反对派所在地区，从而使布干达和邻国之间的对抗更趋激烈。

卡孔古卢并非是企图将马比拉的难民社群转变为一支起义军的第一人。他将希望寄托271 于马比拉，模仿他父亲塞马科基罗的一套战术。大约在三四十年前，塞马科基罗就曾带领一队支持他的强大扈从，试图在马比拉重新发迹。他的流放是长期的。

以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塞马科基罗当时在马比拉的流放者社团已具国家的雏型。但以马比拉为基地的国家形成过程，却由于成功地积聚了支持力量而受到阻碍。塞马科基罗推翻了他的弟弟琼朱的统治，终于作为卡巴卡登上了干达王位。回顾从卡孔古卢于马比拉的避难，到在他之前他父亲塞马科基罗的流放，使人想起在20世纪初叶，干达将军和行政长官塞梅·卡孔古卢在乌干达东部“流放”期间，围绕他所组织起来的庞大、持久和强大的社团[1]，以及统治者们及其副手之间的紧张与复杂的关系，由此形成19世纪末和20世纪

---

[1] M. 特沃德尔(Twaddle)，1966年，第25-38页。

初期布干达王国政治生活的典型特点。

18世纪末有关卡孔古卢和塞马科基罗在马比拉的故事,给历史学家探索19世纪大湖地区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历史提供了几条途径。一条途径是向观察者提供了湖区国的景象,即它仍处于演变之中,并具有一个相对年轻的复合体制,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仍在兼并新的领土和民族。第二条途径是向观察者提供了一幅大动乱的景象,作为18世纪的背景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统治者面对来自其领地内外有力的反抗,他们的任职期可能是短暂的,很少有时间建立统治联盟或设置管理机构。统治者的兄弟和儿子是反叛的中心人物。第三条途径提出,大湖地区的领地或王国并不是按社会和政治单位来圈定的,有很多跨越政治性边界的相互影响。统治者的生活和宫廷成员与庶民的生活质量视各国间关系的性质而有所区别。第四条"观察"的途径把我们带入鲜为人知的宫廷和地区首府以外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并使我们对以下问题得出一些初步和模糊的认识:湖区国在湖区人民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它对国内人民生活和生产、商贸和交易、宗教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所及有多深远。

大湖地区如今与19世纪时一样,仍是东部和中部非洲人口密集、水源充沛之地。该地区从今日乌干达北部和东部的基奥加盆地以及肯尼亚西部的埃尔贡山丘陵地带与威南海湾,一直延伸到今日扎伊尔东部的扎伊尔河流域东部高地和坦噶尼喀湖岸。大湖地区是一个由语言与延续的文化形式所限定的历史和文化区域(又是两大流域的自然汇合处),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具有殖民前政治组织普遍共有的模式。该湖区国在政治文化、结构原则与独裁的思想意识方面符合某些区域性的特定要素。这些要素涉及,有时还包含以"等级"、阶级和多民族成分为标志的社会形态。 **273**

政治秩序

在19世纪初和随后的七八十年中,当欧洲人的压力开始直接影响大湖地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时,该地区一直是由一些大小强弱不同而表面相似的国家组成的聚合体。大湖地区王国被界定为:以一名统治者为中心所组成的领地,该统治者因与王室血统有联系获得地位,并得到宫廷助手和顾问们的支持;领地由任命的官员、工匠和皇亲贵族按照等级组成。

该地区研究官方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的学者②,传统上都把重点放在对塞马科基罗和卡孔古卢的起义活动,以及和他们一起流放和反叛的数千群众的专门叙述。塞马科基罗和卡孔古卢的故事以及他们的流放经历引起人们对该地区内反对现政府和目前首都的潜在势力的注意,并有助于我们摆脱在政治领域中的僵化观念。在19世纪开始时(或早或晚),上述大湖地区国家还并非仅是国王、宫廷和国土三者的集合体,或者政治文化,行政秩序和结构三者的的结合物。塞马科基罗和卡孔古卢使我们联想起,国家的版图在重要的意义上受制于国内外的矛盾。

大湖高原区的政治秩序在19世纪通过精心制造的两大趋势而引起广泛的变化。其一

② 可以这样理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该地区王国的政治史是极为重视的,但令人失望的是关于该地区殖民地化前的著述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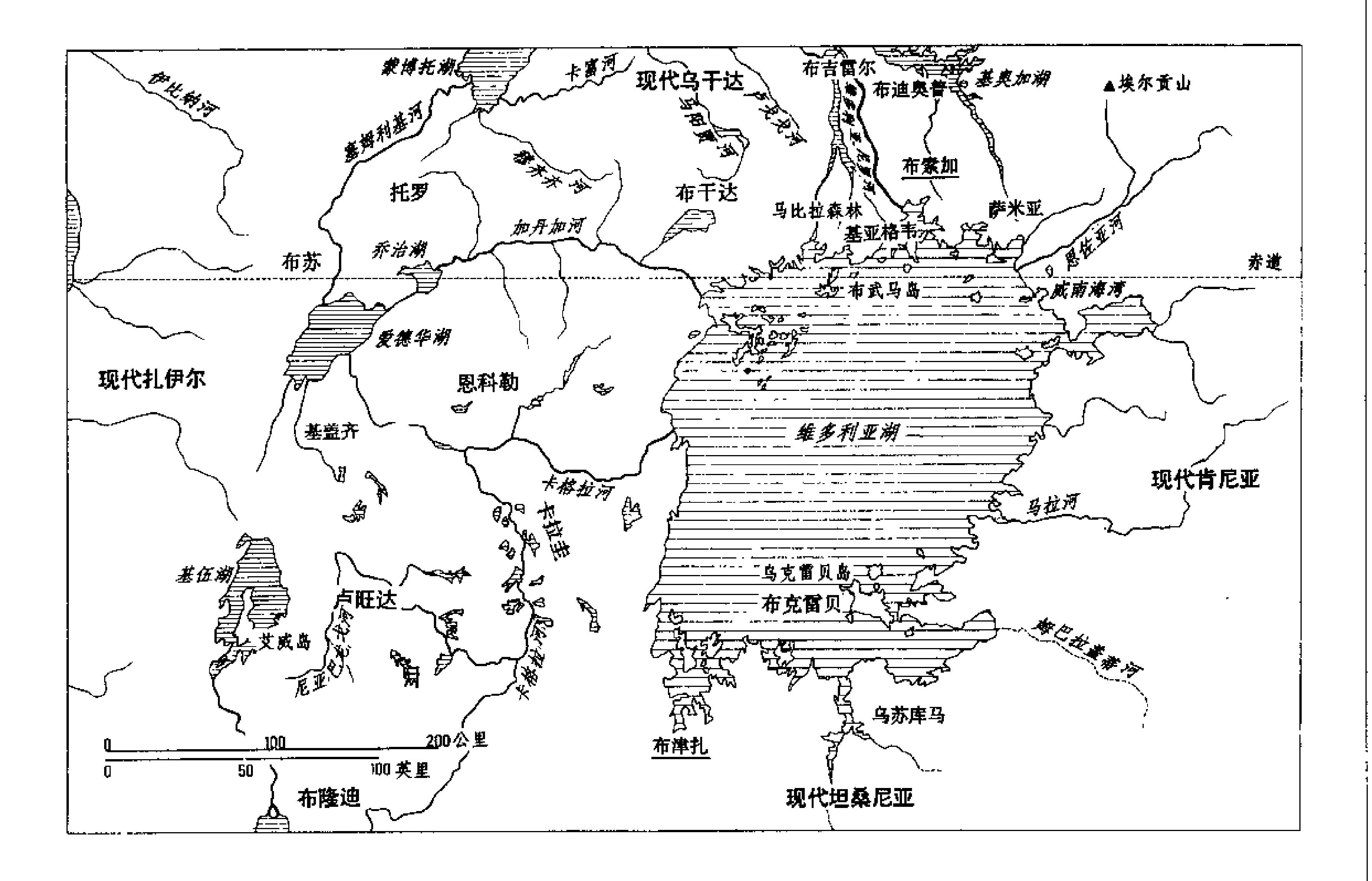


插图 11.1　大湖地区（仿照 D. 科恩图）

是，在一系列国家的中心日益增长的凝聚力和权力。这是通过劳动力和货物的积累，通过官僚体制的成长，通过解决旧时的分裂过程，以及通过对进入该地区的新影响和力量的控制与管理而形成的。

第二种趋势是，有三个或说四个国家——布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最后是处于复兴时期的布尼奥罗——在牺牲别国的情况下，果断地进行权力的扩张。两种趋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9世纪中，这四个主要王国的成功有赖于下列的政策：改组行政机构加强中央控制；消灭反对派，开展扩张性和征收贡品的运动，把内部矛盾引向外部，以平息旷日持久的内战；征服新地区，缴获与兼并区域性生产和贸易部门以扩大版图；将进入这一更广大区域的新的因素和力量结合起来。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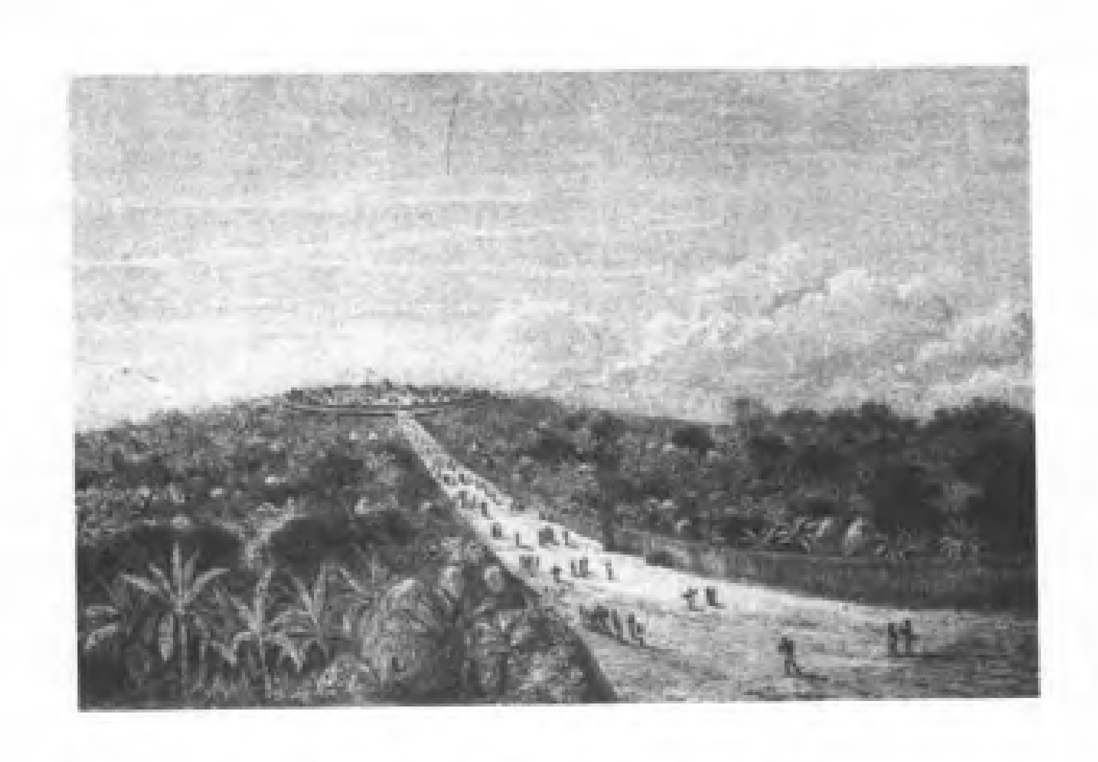
研究19世纪布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布尼奥罗统治者任期的长短，可以发现从18世纪到19世纪这些主要领地中发生这些总体变化的一个信号。在布干达，卡曼尼亚从19世纪最初几年开始统治了30到35年。继卡曼尼亚之后，苏纳统治了20年，苏纳之后是穆特萨，统治了28年。相比之下，在18世纪，有11位卡巴卡统治了布干达，其中大部分被谋杀或被废黜。18世纪的“王子时代”已转变成为“长期统治时代”，其时卡曼尼亚、苏纳和穆特萨各自都有喘息之机来组织初步的控制，限制敌对的王子和派系的反对，并着手扩大国家的资源。

在卢旺达，一个类似的“长期统治时代”取代了前期短暂的任期模式。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姆瓦米·尤希·加欣迪罗执政，统治了30多年。他的继承人姆塔拉·鲁沃吉拉统治了约30年。姆塔拉的继承人基格里·卢瓦布吉里统治了近40年，直至1895年逝世。

19世纪布隆迪只有两位统治者，恩塔尔二世卢甘巴据认为是18世纪末登上王位的；姆韦齐二世吉萨波从19世纪中期一直统治到1908年逝世。据认为在18世纪共有四位不同的国王统治了布隆迪。这样的长期统治的模式在19世纪的布尼奥罗不太明显，虽然穆卡马·卡巴雷加的长期统治是19世纪下半叶布尼奥罗的权力和地区性势力复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统治大约始于1870年，直到1899年他被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推翻。

提出19世纪长期统治的论证同时，应承认存在一种循环效应。时间给予统治者及其宫廷和受其保护的庶民以机会，来建设更强大更持久的权力网和更有保障的政体。时间给予统治者及其政体以机会，使奖赏，报酬与封官成为常规惯例，还向许多宫廷以外的人提供保证，如果他们是参与而不是反对现政权，就可获得机会与安全。反过来，这些效果也保证了19世纪的统治者、宫廷和显贵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继续精心营造他们的权力和政体。持续的长期统治很可能使已形成的联合和惯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大湖高原区的这个国家，建立了合法性和权力并不只是通过登基典礼，而必须要经历时间，通过一部分、一部分地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才能认为是建立合法性和权力。参与国家事务包括对婚姻、劳役和庇护制度的实施，也包括为生产而开荒，建立新的交易路线，以及扩大资金的供应。这些要素只能经历时间才能建立起来。 276

布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布尼奥罗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是该地区最具扩张性的国家，这些国家在19世纪的发展对于20世纪该地区的形状最具有说明的作用。但是在更广大的区域内，另外还有200多个领地，它们几乎都具备与那些较大王国类似的政治体制。有



图片 11.1 1875 年的布干达：卡巴卡的首府



图片 11.2 卡巴卡·穆特萨与酋长和官员

几个小国在19世纪经历了政治改革的过程，在它们直接的范围之内加强了权力。另一些小国在国内失去了中央集权的力量，而成为远处组建中的各中心的附属国。大王国的首府和宫廷开始吸引邻国持不同政见者和起义人员，而喜欢冒险的来客求助于更强大的东道主，借以推翻家乡的当权者。这些具首创精神的行动数百次地反复进行，有助于削弱小国和扩大较大国家的影响。

从19世纪中期起，大领地与小领地间的差别日益明显，该地区的主要国家从境外聚敛新的资源——商货(包括火枪)，引来欧洲、阿拉伯和斯瓦希里的商人及冒险家，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士。大湖高原区的小领地越来越像为较大王国提供仆从、奴隶和贡品的"园地"；也可以说简直成了该地区内外流动力量践踏的场地。

生产与榨取

上述评述，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仅把该地区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观点。我们开始注意到，19世纪最突出的"国家事务"便是生产与交换的结合，不管这个积聚的过程是从老领地的框架中演变出来，还是跨越国家有效行政边界发展而来。当卢旺达、布干达、布隆迪和布尼奥罗等国家在19世纪扩大了版图并扩张了势力范围之后，如何控制生产和交换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有争议的问题。

前面曾提到关于马万达向基亚格韦境内扩张的计划。18世纪的这个行动是针对布干达王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富饶地区。基亚格韦有树皮布、铁矿石和铁匠，它还掌握了通往维多利亚湖北区物产丰富的岛屿的通道。靠近基亚格韦岸边的布武马岛与维多利亚湖东区的贸易网点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的聚集、材料、技术、劳动力，以及进入或控制区域性贸易线路的中心点是殖民前湖区高原国家事务中的主要事项。 277

从例行的管辖区内和国境之外地区榨取的物品，给宫廷带来了财富，并养活了统治的政权。在19世纪中，榨取贡品和反抗国家的榨取，一方面遮掩和影响着——经常是畸形的——殖民前横贯大湖高原区的市场网络，一方面又把生产区和消费区连结在一个广泛的"激发冲突"的关系网中。国家的榨取和生产者及各生产区抵抗受贡国家的高压统治，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在19世纪中的食品生产、食品交换和食品消费的领域内是最明显的。就反面而论，在这个明显富饶和极受人注意的地区内，对食品供应的控制已属于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国家与生产者之间关系的中心位置。[3]

在本地区各王国例行管辖的地带，专业化的和非专业化生产为宫廷和首府产出粮食以及其它一系列物品。国家定期或不定期征收这些产品，要求按季度向宫廷和首府纳贡。另一方面，遇有特殊情况，如军事出征，各种宫廷典礼和招待娱乐，以及间歇性的缺粮，还得作特殊征收，并通过宫廷和首府进行重新分配。

在布干达，似乎已演变出一种政府的农场，这种农场由指定负责向宫廷提供特定主要

[3] 详见D.W.科恩(Cohen)，1983年。此处所用材料，即引自该研究报告，该报告是于1981年6月向联合国大学在肯尼亚的奈瓦沙召开的一次会议提出的。

物品并负责供应卡巴卡王宫的官员所管理。[4] 在卢旺达、恩科勒、卡拉圭和布隆迪，皇家牧群——国家财富的一部分——为贵族、官员及其随员和家庭提供肉、油脂、奶和奶酪。所有这些生产实质上是"政府管理的生产"，即由国家来组织和调节的。政府农场有能力在接到短期内的通知后按期大量供应各种食品和饮料。这意味着生产水平的高速发展，以满足时刻下达的要求。这些供应机构为必要性所驱使，已超越了它们的能量。[5]

278



图片 11.3　卡拉圭国王鲁曼尼加的珍宝库和王位标志

榨取计划超越了专业化食品生产部门，向境外新的场所延伸，并发展到"索取贡品"。从一个连续体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对国家的经济活动也许是有价值的。榨取活动从非经常性的征收过渡到定期征收，或许标志着边境地区和新的生产地区被并入湖区国家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连续体的中部有一个征收模式的例子，就是由布干达的代理人从布索加中部榨取产品。[6] 这些并非是定期的官方榨取，但它们却受到足够的控制，且惯常要求不动用武力，使他们能够在有准备的情况下生产大量的粮食。有人提出这是事先通知和事先准备的。从布索加中部所榨取的最普通的商品是干香蕉（卢索加语称 mutere），它是既作为饭食，又作为晒干的糕饼运出去的。从一个特定的地区按惯例经常征收贡品，会迫使纳贡地区的生产大

279

④　希望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很快完成。关于这类供应方式的概况是从许多资料中得知的。

⑤　J. 托希（Tosh），1980 年，第 9 页；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到生产方式上，认为依靠这种生产方式，非洲在殖民地化之前已取得了大量剩余食品，他对那种认为支撑专业工匠、猎人、随从和宫廷的剩余产品只不过是维持最低生计的生产的正常剩余的看法，提出了异议。

⑥　关于布干达的征收情况的研究，见 S. 基瓦努卡（Kiwanuka），1972 年，第 139-153 页；J. 卡西里（Kasirye），1959 年；F. P. B. 纳延加（Nayenga），1976 年；D. W. 科恩，1977 年。

大超出生产者自己所期望的消费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纳贡地区的生产包括“防务性剩余品”在内。这种剩余品会给早期来此的欧洲旅行者一种印象，认为这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富裕地区[7]，此外便是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即宫廷豪华的情况。但这些旅行者所忽略的则是“防务性剩余品”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不管受贡国家提供给纳贡地区怎样的“互惠”货品和服务，生产的有效成本均已转嫁到纳贡的生产者身上。这些“防务性剩余品”并没有给生产者带来安全，因为在19世纪的大湖地区，索取贡品的国家处于优越的地位，不管什么理由，如不上缴剩余产品，这些国家必攫取之。

邻近我们所说的这一连续体中部的另一有关榨取的例子，就是征收从乔治湖的盐水中提炼的精盐，并运往远处的托罗和布尼奥罗管理的(有时是保护的)宫廷。[8]沿着这一连续体再往前，则是从更遥远的地区不定期和突然征收贡品的情况。[9]可以假定，凡需要在收获、准备和运输中花大力气的食品，诸如香蕉干和其它食物以及饮料，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些遥远的地带，榨取活动似乎更带有军事性质。武装队伍，即便不是远征大军，徒步经过某地，也收集凡可得手的贡品，特别是牛与人，还有工匠和商贩们的铁器和树皮布存货。这是大规模的掠夺。其次在布干达组织的进入布索加的远征中，在一地驻扎数月，征收的小分队派往各地。据称，从布干达来的征收贡品的军队，在乡间驻扎时间之长，足以促进粮食生产和准备，并超出通常上缴军粮的准备定额。到手的贡品为占领的远征军所消耗，有一些最后交回布干达的宫廷。在这一事例中，几乎可以肯定，干达军队在布索加停留的时间还太短，难以刺激或促使他们占领区的粮食生产和其它商品持久的发展。但是他们在那儿的时间之长，也足以摧毁布索加中部生产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这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19世纪中，从卢旺达的首都地区也组织了类似的大规模征集贡品的远征军，其目的是从北面和西面的非管辖区，包括基伍湖西岸周围的一些地区，榨取贵重的商品和牛群。[10] 最后使这些地区的生产和销售变得混乱不堪，卢旺达不得不进一步远征，寻找新的生产来源。

280

这些军事远征的一个要素就是建立颇为稳定的通道进入目标地区。在布索加的西南，有两三个政治实体实质上就是布干达远征军的供应站。这些小国能够在接到通知后很快生产出大量的军需食品。这些提供给养的国家显然是从邻近地区取得供应的。到19世纪60年代，布干达过境通道正北面的地区已被废弃。这些地区对供养国布干达王国或对居民都不再提供任何生产能力了。[11]在几十年中，较大的王国如布干达所组织的大规模榨取贡品的行动，在各地区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后果：在一些地区外界来要粮食，刺激了生产的增长；另一些地区，外界的需求，减弱或摧毁了生产组织。

有关19世纪的资料表明，该地区大国的榨取计划在生产区遭到了积极的抵抗。19世纪中，布干达的军事远征在布索加的北部和东部遭到抵抗，时而折返国内。布干达为了要到

⑺ 例如，见F.D.卢加德(Lugard)，1893年，第1卷，第366页；H.H.约翰斯顿(Johnston)，1992年，第1卷，第248页；H.M.斯坦利(Stanley)，1880年，第142-143页。

⑻ E.M.卡穆汉吉雷(Kamuhangire)，1972年a，1972年b。

⑼ D.W.科恩，1977年，第73-80页。

⑽ D.S.纽伯里（Newbury），1975年，第155-173页；M.C.纽伯里，1975年。

⑾ 这点在D.W.科恩，1977年，第116-177页中扼要论及、本文作者在即将出版的关于布索加(1700-1900)的研究报告中，将进一步论述。

东部富饶地区扩大征取，希望得到获得军火的机会，从而积极地卷入当地的内部冲突，扶持家属中的王子们登上一系列小国的宝座，扩大其军事远征规模，当老生产区的榨取枯竭时，又进而转往远处。H.M.斯坦利于1875年访问布干达期间，曾亲眼看到在布武马群岛反对布干达榨取的抵抗。⑫ 沿卢旺达西部和西北边境的民族和政治实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都在对卢旺达的榨取进行抵抗。⑬

282

高压统治、暴力与市场

在19世纪，湖区抵抗较大国家几乎永不满足的需求所产生的结果，包括邻近地区生产力的下降，以及随之将剩余粮食生产的部分成本转归宫廷——由于要在现有的领地内正规生产区之外保持贡品的高水平，就必需发展更加复杂的生产手段。当然，抵抗活动使暴力在更广泛的地区升级，似乎也使围绕和穿过维多利亚湖、基奥加湖、卢坦齐格湖和基伍湖，以及今乌干达西南部的盐湖所组成的长期运行的贸易和市场的日常工作动荡不安，它们在很长时期中本已产生了剩余物资，也组织了交换。⑭ 我们能画出一幅19世纪该地区的简单图象，着重显示两种区域性交易体制之间激烈的冲突，其一是基于军事力量与政治上的高压手段，另一体制基于市场。在19世纪下半叶的头25年内，大湖地区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即不是改进市场体制，而是在牺牲市场体制的情况下，对高压统治进行了精心改进。首领们和宫廷看来已放弃依靠市场来获得区域间的货品供应。

在19世纪，湖区物产丰富的地区已成为同时由两三个国家征收贡品的目标。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激烈冲突的舞台。较老的布尼奥罗国和新兴的托罗王国方都向今日乌干达西南部的盐场索取贡品。在19世纪中，这两个国家盐的资源时而上升，时而下降。⑮ 从布加索北部的布迪奥普和布吉雷尔直到尼罗河以西的地区，已成为布干达和布尼奥罗两国同时争夺的目标，它们都从那里掠取粮食、薯类、牛、香蕉，以及一些制成品。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布吉雷尔和布迪奥普的抵抗，制止了布干达和布尼奥罗对其产品的吞并。⑯不用说，布干达和布尼奥罗同时侵略这些富饶的生产区，成为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布尼奥罗和布干达之间更广泛的冲突的中心。在有些地区，几个区域性强国之间为争夺“农业贡品的权利”，也许刺激了纳贡集团之间的各种防御和结盟战略。在另一些地区，这类冲突也许只是减少了争夺所在地的人口和产量。在其它的一些地区，几个强国间对资源的争夺和宫廷成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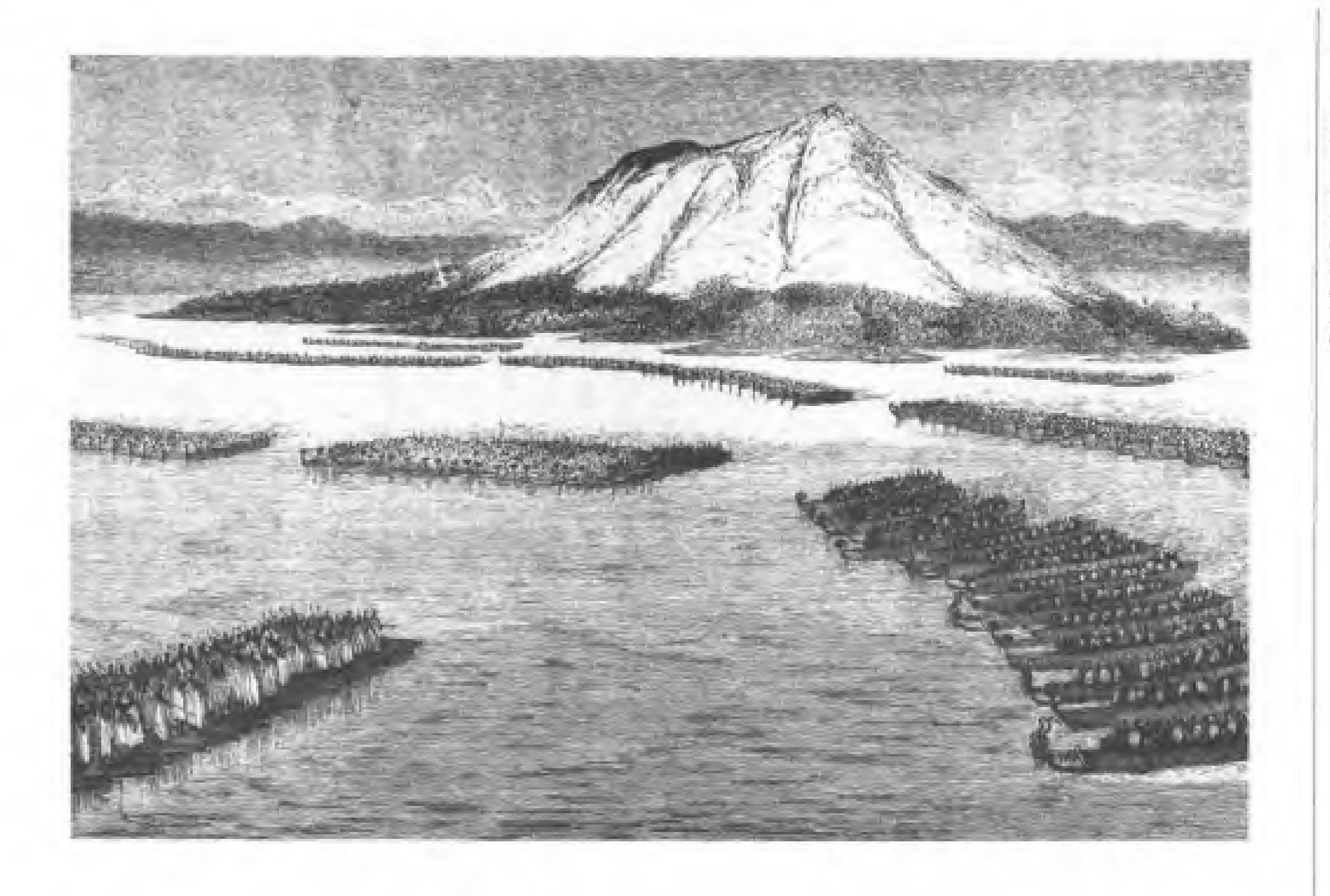
⑫ H.M.斯坦利，1880年，第304-312页。

⑬ 见前注⑩。

⑭ 在殖民地化之前，大湖高原地区已有市场交易的三层重叠的线路：一条是东湖区线路，从布武马岛向东南延伸，环绕维多利亚湖进入乌苏库马；其二是布尼奥罗-基奥加线路，从埃尔贡山向西进入乌干达西部草原；三是基伍线路，从今日扎伊尔森林的周围地带环绕西部峡谷诸湖进入布隆迪、卢旺达和今日乌干达的西部草原。见本章插图11.2。关于该地区贸易线路，有价值的著作可见J.托希，1970年；A.D.罗伯茨(Roberts)，1970年b；C.M.古德(Good)，1972年；B.图里亚希卡约-吕吉姆(Turyahikayo-Rugyeme)，1976年；E.卡穆汉吉雷，1976年；D.纽伯里，1980年；J.P.克雷蒂安(Chrétien)，1981年。

⑮ E.M.卡穆汉吉雷，1972年b。

⑯ 布吉雷尔的情况是最值得研究的。简明的讨论见A.F.罗伯逊(Robertson)，1978年，第45-47页。



图片 11.4 巴干达人和布武马岛居民在维多利亚湖上的战斗，1875年

员间对“农业”贡品的争夺，也许把征收推到远远超出消费可能性的范围。[17] 欧洲人在湖区活动的早期影响之一，就是使主要区域性强国在从遥远地区征收贡品时加强控制，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大湖高原区的某些地区虽因受推动而增产，大大超过了当地消费所需，然而其它地区在食品生产中却经历了罕见的短缺。在雨季开始之际和在歉收的漫长季节和年份中短缺更甚。在肯尼亚西部，在危机期间开辟了临时市场。[18] 这些市场位于较湿润又较安全的高地和干旱又不那么安全的低地之间的间隙地带，从西部肯尼亚的威南以四分之一圆的形状延伸到南部布索加。在此境内，危机之时组织了临时性的市场，从事牲畜、谷物、鱼、蔬菜和制成品的交易，由市场所在地区占支配地位的世系成员进行管理。到 20 世纪初，这些市场管理人员已开始像那些为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学者所熟悉的“大人物”或“准酋长”一样了。

靠近威南湾地区的粮食供应经常短缺，尤其是在沿湖一带，因受单峰模式的降雨和漫长的旱季影响所致。至少自 18 世纪开始，沿湖的人口缓慢而持续地向高地迁移，进入较安全和物产较丰富的双峰雨量区，他们所受到的制约只是来自那些已经占据高地的集团和惯常从低地到富裕的高地抢劫的集团，以及因组织不全未能在较高的地区开辟更多的土地。时至今日，人口向高地的迁移仍在继续。迁移的过程使那些进逼高地的人们在生产和膳食方面发生转变，使较高地带人口密集，使讲卢奥族语言的社群扩大。向高地迁徙的进程，使 **285** 20 世纪的非洲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密度，致使土壤耗竭，森林和林地资源枯竭。[19]

未迁徙到高地的人们继续遭受脆弱的农业系统供应短缺之苦。临时性市场提供了一些救济，人们得以用低地放牧的牛换取在高地生长良好的谷物和根薯类作物。由于低地的饥荒期恰逢首次降雨耕播谷物最需要劳力的时期，临时性市场提供了相当快地克服过长的旱季或提早在短期内收获的手段。低地人民所蓄养的牛群，通过地区性的交换，构成了维持农业和营养的手段。所谓“牛综合体”对低地人民有着直接的必然联系，为他们提供了积累可转换财富的手段。

贸易线路

卢旺达脆弱的农业因地区之间、种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交易而得到补偿。[20] 粮食有剩余的地区和缺粮地区在生产和消费中得到互补，创建了一个交流、交易和相互作用的网络，加强了据以组成卢旺达国的更广大的领域。这种日常交易，可保留当地的特种经济，以及具有民族特性或阶级特性的饮食模式，从而扩大了西部湖区高原的社会阶级差异。

---

[17] 在殖民地之前时期，宫廷阴谋在诸如布干达等王国中也许已成为对遥远地区进行榨取征战的一种刺激因素。

[18] M. J. 海 (Hay)，1975 年，第 100-101 页；另见 L. D. 希勒(Schiller)即将出版的著作：关于肯尼亚西部的根姆人和卡诺人；还有 R. 赫林(Herring)即将出版的著作《1900 年前的乔卢人》。在锡亚耶工作的本文作者和在萨米亚工作的普里西拉・O. 沃尔(Priscilla O. Were)收集到一些确实证据。

[19] 关于 20 世纪西肯尼亚社会及经济发展过程，特别是关于人口、乡村经济及公共卫生条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至于坦桑尼亚同一过程的研究，见 H. 克杰克舒斯(Kjekshus)，1975 年。

[20] H. L. 约拉索沃斯基子爵(Vis. C. Yourassowsky)和 H. 范德波特(Van der Borght)，197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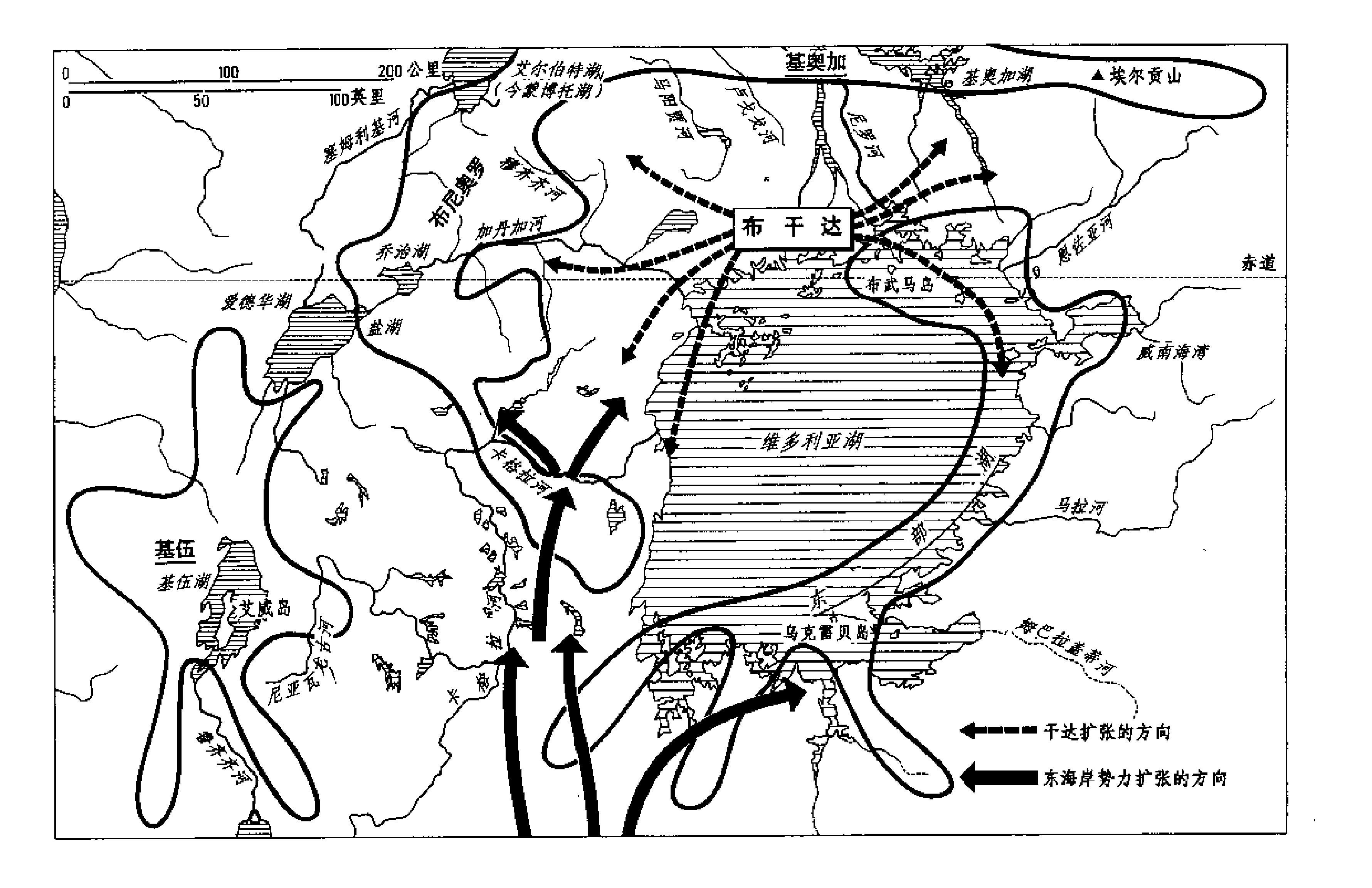


插图 11.2 大湖地区的贸易线路（仿照 D. 科恩图）

卢旺达通过对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富饶区域的频繁劫掠而参与了较广泛的榨取活动,其中有些地区在19世纪已置于卢旺达的正规管辖之下。卢旺达也参与了以基伍湖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位于基伍湖西面的布滕博制作编织手镯,由商贩运到沿基伍湖沿岸的市场上和艾威岛的市场上销售。这些布滕博的编织手镯开始具有货币的特性,到19世纪下半叶,已广泛用于基伍地区的交易中,从而使来自艾威岛的商人和布滕博的手镯制造商发财致富,同时使基伍与卢旺达广大地区的牛、粮食与其它货品的交易成为可能,其结果也许刺激了整 **286** 个地区的生产。[21]

在连接维多利亚湖东侧地区的交换线路中,也有同样增长的迹象。首先,19世纪初,有一个粮食和其它适当商品的广阔的交换网络。这个网络可能已活跃了几个世纪。这条线路把位于北方的布干达沿岸、布索加南部与布武马各岛屿和今日的肯尼亚西部沿岸和"内陆",以及今日的坦桑尼亚的布津扎、乌苏库马与乌尼亚姆韦齐的南湖各地区连接起来。显然,19世纪这条线路的结构中心是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在18世纪后期或19世纪早期来到南湖区布克雷贝岛国已为人所注意。[22]布克雷贝国组织了几种新的作物生产,包括玉米和木薯,还引进了高粱和谷子的新品种在全区生产。体制改革——包括组织非自由的劳力(从大陆贸易中引进)——促使产量猛增。大陆地区为布克雷贝的剩余食品提供市场,布津扎的金属器皿和乌苏库马的牛通过布克雷贝纳入区域性的贸易线路。布津扎和乌苏库马的人民指望布克雷贝的剩余食品和布克雷贝的商人,以此来解决当地食品供应的周期性短缺。有时,似乎这种依赖导致了对布克雷贝商贩的谴责,因为他们在饥荒之际,仅仅靠抬高价格,将食品运到乌苏库马,就从苦难的乌苏库马农民身上牟取到暴利。[23]

如果说,布克雷贝商贩在南方居主要中间人的地位,那么,巴苏巴的中间人则在这条东部湖区贸易线路北端所及之处控制了运输与交换。巴苏巴人以其非凡的技能和勇气,在维多利亚湖水域航行,在很大的范围内运输盐、奴隶、干香蕉、谷物、豆类、牲畜、鱼和铁器,将南方的布克雷贝市场和北方的布索加南部与布武马的市场连接起来。[24]

19世纪期间,巴苏巴在东部湖系的北部逐渐对交易进行垄断,堪与巴加博和巴欣戈商人在今乌干达西部的盐湖区所发展的垄断并驾齐驱。[25]在这些集团中,每个集团都在境外建立了组织良好的集中交易区,对遥远的尼奥罗和托罗宫廷所批准和保护的盐的生产和销售实行政治控制。在盐湖与东部湖区线路,交易区逐步形成垄断,脱离了湖区高原国家的正规范围,在形成其销售网络的过程中,没有利用国家的模式,而只是在他们的生产区、市 **287** 场和舰队遭到袭击时,才接纳本地区国家所提出的要求。

布克雷贝的贸易体系——东部湖区线路的南部——对其它贸易集团也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它鼓励瓦斯瓦希里和阿拉伯商人在乌尼亚姆韦齐地区制止布克雷贝的车队与交易。然后,通过在布克雷贝的市场区鼓励奴隶和象牙的生产,这些新来者终于使布克雷贝的商人

㉑ L.S. 纽伯里,无出版日期。

㉒ 见G.W. 哈特维格(Hartwig),1976年,第62-83,104-111页。

㉓ 同上,第107页。

㉔ M. 肯尼(Kenny),1979年。

㉕ E.M. 卡穆汉吉雷,1972年b。

和他们在南部湖区以食品为基础的交易体系黯然失色。正是通过在南部的取代，瓦斯瓦希里和阿拉伯商人及其商品才初次触及大湖地区。首先是商品，然后是商人，沿着曾为盐湖商人所走过的维多利亚湖西面的同一条深深切入的道路，进入了湖区高原的市场与国家。或许他们引进了比商品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把奴隶和象牙市场带进了湖区的中部，人们可以枪支来交换奴隶与象牙。终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传教士以及欧洲的探索者、冒险者以及代理人，沿着商贩们走过的同一小路，接踵而至，在更加广阔的湖区高原创建了变革的新力量。

正当东海岸的交通向北经过西部草原延伸到维多利亚湖北侧一带的居民点和首府时，从布干达来的船队开始截断了苏巴和布克雷贝对东面与南面的部分垄断，从而使布干达的心脏地带与湖南侧的阿拉伯和瓦斯瓦希里商贩之间有可能建立起活跃的直接关系。这样，布克雷贝的势力在南面被来自乌尼亚姆韦齐和东海岸的团伙所取代，同时，在东面和北面又受到布干达扩张主义计划的排挤。对 19 世纪的布干达和布克雷贝可以进行有意思的对比。如同布克雷贝一样，布干达的农业就某一点而言，已向十分罕见的剩余粮食生产过渡。然而，与布干达不同的是，布克雷贝将剩余粮食运往粮食极缺而又能够生产布克雷贝所需的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的地区。在布干达，剩余粮食生产则是当做国内社会和政治的给养，而不是作为一笔财富储备用以在互补性生产地区进行交换。此外，布克雷贝国和巴苏巴所创建的发展良好的运输组织又因布干达的侵人而深深被切断，不过这是一次军队人侵，而不是新的销售机构的人侵。

在 19 世纪，还有另一个广泛的交易网络，它以布尼奥罗全区为中心，向北和西北延伸进入阿乔利地区和西尼罗；向东延伸经过基奥加湖区到埃尔贡山山坡；向西南延伸通过盐湖进入基伍地区。铁器和盐显然是这条贸易线路的主要商品，然而，粮食和牲畜对精心建立和维护这个体系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在基奥加湖以北的一个地带，兰吉人为了贸易而按计划生产剩余食品，特别是芝麻。[26] 在 19 世纪，这些芝麻是运到西面的布尼奥罗，以交换铁锄，继而又可以促进兰戈地区扩大芝麻生产。仔细的研究表明，此种剩余生产可能包含着在生产、土地利用、收割、种植和播种周期以及劳动力方面的大量技术革新和精心安排，以便获取最大限度的产量。[27] 这其中具有某种农业改造的成分，就某些方面而言，堪与布克雷贝几乎于同期发展的农业以及基伍湖的艾威岛上的农业改造相媲美。[28]

288

可以设想，参与今日乌干达西部的交易线路的个人和集团，看到兰吉人在 19 世纪中愿意增加芝麻产量供市场销售，并以此作为一种手段，首先是刺激了铁器贸易向东发展——压倒了靠近维多利亚湖沿岸萨米亚（靠近今肯尼亚与乌干达边境）所生产的铁器在该地区的领先地位，从而进一步刺激布尼奥罗铁业生产的增长；其次是加深了布尼奥罗和兰戈之间的区际关系，也可说是依附关系或不平等的交换；第三，通过扩大此类商业创造了财富，从而得以于 19 世纪下半叶将埃尔贡山西北丘陵地带贵重的象牙引人。

在 19 世纪的前 75 年中，今日乌干达西部的交易线路，是布尼奥罗腹地对一个颇为广

---

[26] J. 托希，1978 年。
[27] 此处所说系指由家庭或一个个村社在改组劳作的社会关系、任务定义和时间方面所进行的一场社会革命。
[28] 见 G. W. 哈特维格，1976 年，关于布克雷贝的介绍；另见 L. S. 纽伯里编，关于艾威岛的介绍。

阔的地区施加影响的基地，即使在布尼奥罗国因内部斗争而削弱了其君主的权力的时期，也是如此。在19世纪，布索加等地区也重新修订了交换的方针，由较古老的维多利亚湖市场转到新近在基奥加湖流域建立起来的固定的交换场地，以尼奥罗的铁来排挤从布索加北部和东北部市场上来的萨米亚的铁。基奥加湖流域在19世纪吸引了新的拓居者，同时，这些地方的生产也面向尼奥罗市场。基奥加线路的这一扩展是与人口向北移入布索加的过程相辅相成的，深受折磨的人们从布干达大力征收贡品的场所再向前迁移。后来布尼奥罗的这 289 支力量，或者说一直延伸贯穿基奥加地区的西部贸易线路，在人们由于受到英国的压力转向生产棉花的情况下，又恢复了相当大的活力。

在西面，基奥加湖贸易与经过今日乌干达西部草原的贸易相结合，并以位于今日乌干达西南部的各湖泊的盐业生产为中心。布尼奥罗王国的代理人及其附庸国的代理人，对生产、车辆以及货物、粮食与牲口的销售课税，并通过准其进入市场牟取私利。[29] 布尼奥罗和托罗的统治者在湖区西部的交换经济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而又不毁坏日常的交通与交换。有些关于今日乌干达西部的历史文献，把布尼奥罗描绘成一个游牧王国和战争国家，但看来该国已广泛地结合在区域性市场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对其宫廷的供应和对边远地区施加控制和影响。对比之下，19世纪的布干达，倒像个典型的战争国家或征收贡品的国家，它一方面精心炮制一套内部的官僚机构，另一方面，又精心建立起外部市场的基础设施，两个过程之间并不协调。

如果说，在19世纪布干达国的活动倾向于歪曲或毁坏湖区的次区域性市场活动，那末也可以说，与此同时，布干达也开始更积极地参与从维多利亚湖沿岸延伸到东非沿海也许可称之为国际交易的活动。或许对于19世纪布干达与布尼奥罗之间有关存在的市场机遇方面的差异，不能如此简单地去理解。其关键性的差别，也许在于每个国家如何运用不同的战略，从本地区不同层次的市场活动中得益。布尼奥罗是通过加强和扩展市场体系的方式参与区域性市场体系的；布干达则对于它所看到的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短缺，经常寻求以武力解决。与此同时，布干达加入了从东非沿海直达湖区的更大的国际市场，它参与的方式是加强东海岸体系，使它扩展入内地，并在极大的程度上设法排斥布尼奥罗参与这个"较高层次"交换体系。的确，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布干达设法联合与东海岸市场有联系的力量，直接反对布尼奥罗，结果，既永远地减少了布尼奥罗在该地区的影响，又切除了该地区的"北方因素"——英国-埃及与苏丹的利益。

从大湖区一直延伸到东非沿海的这一"较高层次"的交换体系的中心，就是象牙和奴 290 隶的交易。用从湖区收集来的象牙和奴隶，交换从沿海经过桑给巴尔的贸易网络进口的枪支。随同枪支运入的是小量的货品，主要是为贵族消费的，包括纺织品、手镯和餐具，之后还有书籍。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布干达宫廷已能控制这类进口品在王国内外的分销，增加了宫廷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势(因此也增加了所有前往访问的外来者的势力)。重要的是，在欧洲人侵入该地区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的爱好已是"外向型"的，因为布干达有时自觉地，有时不自觉地使其社会并入联合王国的总的管辖之中。

---

[29] E.M.卡穆汉吉雷，1972年b。

不平等和紧张关系的加强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贵族以下阶层的爱好和消费，促进了欧洲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在布干达，在更广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在大约50年中，最强大的国家由于获得了枪支，增加了对附属地区的优势，就像在非洲其它地区那样，容许军政大权集中在该地区小部分人的手中。不平等关系在征集奴隶的远征中最为显著，但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整个大湖区各个地方都是重要而严酷的。因此，当一些欧洲人进入该地区的生活中时，不仅强大的和越来越有权势的中心寻求他们的支持，弱小和无助的人们也要求他们的支持。

如果把18世纪看做是在各地党派和力量大力抵抗和推翻湖区高原各国统治者的情况下而告结束的话，那末，我们也看到在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中，出现了一轮新的抵抗和争夺浪潮的迹象。显然，在19世纪最后25年，湖区高原王国将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指挥权集中于首府地区和附属各省的宫廷，人民对此已难于忍受。在布干达东面和西面，一些小国起而抵抗布干达的多次征收贡品的运动。1875年，H.M. 斯坦利曾亲眼目睹布干达反对布武马群岛的战役所造成的灾难。即使在大国迅速战败其目标区的地方，附属国的党派也进行破坏，使贡品无法按时送交征服者。[50] 在布尼奥罗、卢旺达和布干达，以及在布索加诸小国中，百姓们抵抗首府和宫廷的强征勒索，他们往往迁移到日常征收所达不到的更遥远的地方，或到对他们获得土地、官职和权力机会更大的地方，在今日的肯尼亚-乌干达边境地带，也有人集中居住，修筑壕沟，建立防御村。 **291**

在布加索地区，百姓们组成小型迁徙队伍从一国到另一国，寻求避难，或寻找新的机会，这样的情况数以千计，还有许多个人在一生中辗转好几个领地。这些情况表明，到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内，“寻找机会”的结果是重新确定个人和家庭在有关土地、劳务和权力方面与国家的关系。[51] 19世纪是布加索个人和小集团大批流动的时期。宫廷作为一种适当的机会，不管在特殊的领域之内或之外，在人民生活中都具有一个中心的位置，但是，这个中心位置并不保证宫廷的权力。确实，贯穿19世纪，典型的布索加宫廷逐渐被破坏，由于它竭力维持其权力或扩充其领地，致使无数的人放弃他们的保护人和土地而到别处去寻找更吸引人的机会。在这一时期有可能针对上述这些问题，逐步演化的对“国家”或“王国”的概念，已成为民众谈论的重要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广大社会对当局的这种反应模式，也许抵消了在首都通过垄断枪支和武装宫廷朝臣而增长的力量。在各个地方，这种远离中央政权的情况，也许促进了市场关系和生产活动的重大转移；特别是，当地经济活动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机构脱钩。

很清楚，在19世纪，抵抗有组织的政权往往意味着加强宗教机构的权力，有时只是在短期之内。这一情况趋向于使湖区各处宗教和政治之间的权力对抗更加强烈。19世纪，在

---

[50] 一些关于布干达和布索加的资料述及此事。
[51] 见D.W. 科恩，即将出版。

布索加的布纳夫地区，由沉着镇定的少年沃穆纳夫组织起来的小社群，便是这类在不同的权力综合体中对抗或竞争的一个例子。在布纳夫，沃穆纳夫几十年封闭，完全脱离并反对周围的政治世界。然而，沃穆纳夫政权所依据的思想与体制，却为附近的政治首府所广泛采用。[32] 在该地区西部的布舒，以宗教为基础和以政治为基础的权力之争，在19世纪，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给予反对分子以主持仪式的酋长地位来解决的。[33]在卢旺达、布尼奥罗以及今日乌干达的西南部，“库班德瓦”(kubandwa)思想和组织曾长期对首府政权造成对抗情绪，这是反对国家的原则和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而国家的渗入实质上已被排除。有时，库班德瓦组织强大得足以向现政权挑战并推翻它。在19世纪，众所周知的库班德瓦运动最具实质性的内容，主要是供奉尼亚宾吉(Nyabingi)女神。尼亚宾吉运动是在反对卢旺达国的运动中出现的，并使其影响形式化，超越了卢旺达中心的老行政区，特别是向北向西扩展，在今日的扎伊尔-乌干达边境，在基盖齐以及恩科勒的部分地区，尼亚宾吉的信徒们组织起来，抵抗卢旺达向其境内的扩张活动。到19世纪末，尼亚宾吉运动已成为抵抗更为普遍的政治当局的中心，而且正如该地区人民所感到的，它又是抵抗欧洲殖民活动的中心。[34]

结 束 语

19世纪的大湖地区，与其说是一个中央集权政体简明的模式，不如说是一个由特殊的政治复合体内外涌现出的各种不同势力和力量之间倾轧和斗争的大竞技场。在一个层面上，各国相互争夺纳贡的农业地带和特殊的资源，如盐、牛和铁，并进入和控制分配的系统和通道。竞争不仅在国与国之间，也在国家与组织和企业之间展开，而组织与企业的建设与该地区政体的建设大不相同。

在另一个层面上，全区各处的百姓通过参与和抵抗，寻求限定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范围，从中寻求安全与机会。对全区的个人和家庭来说，19世纪的湖区国往往更多地展示出其榨取的一面，而不是保护的一面。该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应，因其局限性和机会而各不相同。这些反应包括：抛开国家的需求重新制定生产与销售的方针，在外界过分的重压下撤离一些地区，加入新的宗教社团，寻求安全的避难场所，以及支持推翻当局的力量。19世纪的大湖区，不仅仅是一个由大国小国并存的世界，而且是个人和家庭通过无数微小的、有时毫不显眼的方式逐步转向掌握国家权力、劳务、生产和市场的世界。

我们观察19世纪大湖地区日常生活领域的视线，由于时间的流逝，是相当朦胧的。但是，在全区的生产与消费中，在商业中，在各国之间的关系和百姓与宫廷之间的关系中，引起注意的变革的路线和力量，给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带来极大的冲突，它渗入家庭，并使一系列的压力和变革开始运转，其中许多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被看做是欧洲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

（计德容译）

[32] D.W.科恩，1977年。
[33] R.M.帕卡德(Packard)，1981年。
[34] I.伯杰(Berger)，1981年。

12 刚果盆地*与安哥拉

J.L. 韦吕

本章所论述的这个区域，大体上讲，西以大西洋海岸为界，东以坦噶尼喀湖与尼罗河-扎伊尔河的分水岭为界，北以乌班圭大草原为界，南濒横亘于扎伊尔河流域和赞比西河流域之间的高原。本章所论述的时期不能仅限于一个单一的主题。与一般的认识相反，1800-1880年的历史，并非只是或主要是关于长途贸易和与外界联系(这个时期中非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仍然是生产)。也不能因奴隶买卖和内部冲突等原因把非洲殖民地化前的19世纪看做是一个普遍发生暴力的时代。认为非洲深受持续不断的“部族战争”之苦，这种陈腐的看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区域内的各族人民，大都过着和平的生活，从事生产，不断改进耕作方法，改善环境和出口采集食品。最后，19世纪的历史不应被简化为关于专横的王国和国家的纯政治历史；如果说真有一个政治特征在1800年前后的时期内为中部非洲各社会所共有，那么，它更像是出于不同根源的政权之间争取均势与和解的激烈角逐。 294

记述19世纪中部非洲的历史实际上必须满足以下几项要求。首先必须描述当时这一辽阔区域各种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强烈愿望。若是这样，就可能揭示出1800年代与更遥远的过去之间的连续性：变化虽然显而易见，却是缓慢的。

其次，应强调19世纪中部非洲的历史是以与过去决裂为其特征。在1800-1880年，这个区域毕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加入世界贸易网络之中。世界经济形势的冲击，或该经济一些特定部门的冲击，正在为人们所觉察：在有些地区它影响了社会和政治历史，明显地促进了贸易，并为物资储备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地区，它却约束了这个进程。 296 欧洲人已明显开始在中部非洲内地紧抓贸易经济的利润。

本章将围绕这些给1800-1880年留下特殊印记的主题展开论述。这是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历史。正如中部非洲所经历的那样，它是世界经济盛衰消长的历史。这也是一种文明缓慢前进的历史，特别是利用自然资源多样化的历史。

生产：人口稀少与稠密的模式

在1800-1880年期间，中非社会，在其分布、群体行为、生产体系和抱负方面，显示出

* 本章采用了19世纪文件中对扎伊尔河惯用的名称。

雨林的大致界线
草原和开旷林地的大致界线
隆达人出身的政治官员统治区的界线
人口稠密区

0　200　400　600 公里
0　200　400 英里


地图 12.1 19世纪中部非洲政治（约1875年）

它们保留了从远古时期继承下来的特性,这种特性至今仍可见遗留的痕迹。中部非洲物质生活的一个十分古老的基本特点就是人口分布不均,这是地理、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造成的,也是各种历史事件产生的反响使然。下面我们将努力去追索这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在雨林之南,即延伸至南纬16-17度的开旷森林(在扎伊尔称mio mbo,在安哥拉称mato de panda)[①]的辽阔地区,19世纪的农业,因其生产远非集约化,只能提供部分食物供应。这种农耕最适合于开旷林地的贫瘠土壤,但以20世纪的标准来看只能维持低密度的人口生活(每平方公里最多养活8人)。在19世纪,非洲传统谷物——"手指小米"、小米和高粱——仍然是若干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作为对农业的补充,采集食物(有营养的植物,蝶、蛾等的幼虫,蜂蜜,兔、鼠等),狩猎和捕鱼在食物供应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在20世纪,食物采集在这些开旷的林地社会中仍很普遍。

稀疏的人口并非是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与人口较稠密的地区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些地区把过多的人口疏散到邻近的地方。在一些可用面积很有限的地区(例如靠近河道的地方),农业成为多样化和集约化,导致人口两极分化,这些地区通常接近首府或酋长管辖区的中心。

追溯这些人口较稠密地区的最初起因,恰巧与中非农业的扩展相关。由于考古发现,后来又根据最早的书面文件,得以鉴定出这些古老地区中的一些地方,例如,卢瓦拉巴河谷19世纪时曾为卢巴酋长国管辖的部落所占据的居民区,或刚果地区的居民区。至于安哥拉,有一些从传教士或税收记录中得来的(较近期的)资料。例如,19世纪初,根据军队征兵的粗略统计,罗安达当局认为稠密人口主要是戈隆戈区和安巴卡区(人口分别为60,000人和37,000人)的安本杜人,以及拜隆杜(56,000人)和比耶(超过30,000人)的奥文本杜人。[②]在扎伊尔,跨越南纬5度,位于雨林和草原交接处的人口高密度"走廊",一直到进入20世纪很久以后才勘定其界线。[③]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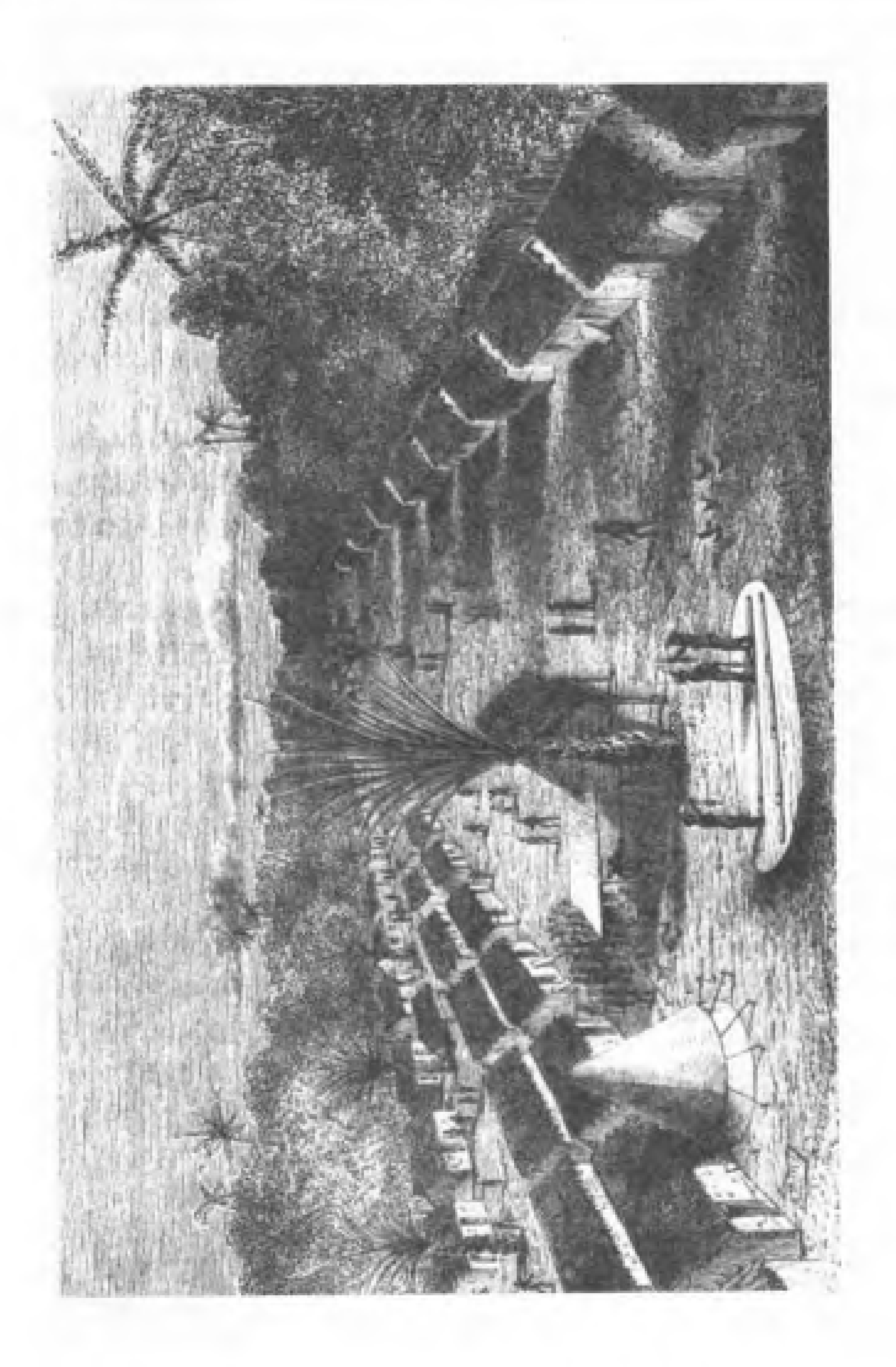
尽管缺少准确的资料,有几种迹象表明人口稠密地区的发展是在较近期才情楚的,而且19世纪事实上是几个世纪之前才开始的这一趋势的顶峰。制铁是班图农业体系的一大特色,15世纪之后才广泛普及。中非口传史料均将17和18世纪视为草原地带和大湖地区人民的一个转折点:殖民于新土地、建立王朝、政治头衔激增,凡此等等。最后,这个地区19世纪已知人口高度密集的中心,均因引进美洲作物品种而使农业发展起来。这项革新导致产量增加,耕地的利用日趋集约化(几个人口高密度区每年可收获两三季),还引进了高产作物(如木薯)。

这些变化的发生年代显然无从详细追踪:据该地区的情况来看,可能延续两个世纪以上(1600-1850年)。这是粗略的估计,可由一些历史事件来确定。在1800年前后,所有的美洲作物品种(玉米、木薯、甜薯、豆类等),无疑各地均以不同的方式引种。似乎没有一个

① 这些开旷的森林是古老干燥林区(muhulu)的遗迹。其特点是赞比西树种占很大比例。见F. 马莱塞(Malaisse)著作,特别是F. 马莱塞等人,1972年。

② 见J.C. 费奥·卡多佐(Feo Cardozo),1825年,第352页及其续页。这些数字大有疑问。将近1850年时,L. 马格亚尔(Magyar)对奥文本杜的人口提出一个差异极大的估计(1,220,000)。至于在众所周知的地区,主要人口稠密区的位置还是较可靠的。

③ 见P. 古鲁(Gourou),1955年。



图片 12.1 卢巴帝国东北部马涅马省的一个村庄，19世纪70年代

地方完全忽略。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美洲作物已与当地品种很好结合，不再被当做国外引进品种。这样，在刚果地区出现了扎伊尔河下游的第一部系统的中非植物志(塔基探险，1818 年)，确认了美洲品种的广泛利用。在殖民地时期，一部详细的刚果农业志指出，几种从美洲引进的品种(花生、红薯等)在口传文化中就像芋头或“沃安齐亚”(voandzou)一样被看做是本地所产。[④]然而在另一些地方，谚语和仪式仍然提醒人们，非洲农业的基础早在 18 **299** 和 19 世纪引用美洲作物品种之前，便已确立。芒戈人有一句谚语，“甜甜的木薯永远不会变得像芋头”，意即一个外国人永远不会像本地人那样懂得当地的语言与风俗。[⑤]

人口统计：人口高度密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

较复杂的农业社会的发展，对中非人口统计造成重要的后果。一般认为，逐步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社会，在一个长时期内，连续呈现低的年增长率(在 0.05%至 0.10%之间)，这与所知狩猎和食物采集社会的增长率颇为接近。另一方面，农业较多样化的社会，其年增长率较高，在 0.10%-0.15%之间。像非洲那样自然环境艰苦地区的统计数字暂缺。但无疑与这个模式不会相差很大。在两个多世纪的过程中，增长率若按此速度增长，对整个中非人口会有相当大的影响。[⑥]

与 20 世纪的增长率相比，这些数字看来被公认是低的。事实是在早期的非洲社会中死亡率一直很高。19 世纪主要死因已经明确，但却无法确定每一死因对死亡总数起多大作用。

首先，有历史的因素，特别是奴隶贸易和随之而来的暴力。尽管自 19 世纪 50 年代后，因奴隶贸易人力外流至美洲的人数急剧减少，但在该地区东面和北面斯瓦希里和阿拉伯贸易却盛行起来。可以得出整个中非全部流失人口的数字，[⑦]但却不可能得出一个地理上的分类细目，特别是由于各集团与个人的不断流动，使奴隶贸易的影响广泛扩散。

此外也有生态和流行病方面的因素。可以肯定 19 世纪中部非洲医药方面已有了初步的 **300** 进展，例如，对地方性疾病的认识较为深人，开始使用疫苗和更普遍地服用奎宁。但这种进步仍限于为来自安哥拉或斯瓦希里海岸的商人们所走访的地区之内。总的说来，此类变化太有限，不能抵御主要的地方性疾病或流行性疾病的爆发。[⑧]

因此 19 世纪人口的增长仍然缓慢，但无疑比以往更明显，因为这是从该地区人口已达到的比较高的基准上开始的。一如既往，多余的人口因外流或定居草原或开旷的林地面被

---

④ V. 德拉丘佐夫(Drachoussoff)，1947 年。

⑤ “芒戈人谚语”，第 489 号，摘自 G. 许尔施特尔特(Hulstaert)，1976 年。

⑥ 非洲人口统计的历史性分析尚处于初创期。目前我们只好根据经济和社会结构类型相似的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估计出大致相当的增长率，权且为用。至于刚果地区，一位历史学家提出，17 世纪人口的年增长率约为 0.20%，18 和 19 世纪可能还要少些(?)，见 J. 索恩顿(Thornton)，1977 年。

⑦ 在所论述的这个地区中，曼耶马和洛马米盆地曾受到斯瓦希里奴隶贸易的影响。有些作者估计，斯瓦希里奴隶贩子在 1800 和 1870 年间从整个中非和东非捕捉的和从非洲大陆出口的奴隶，总计约为 175 万人。J.D. 费奇(Fage)，1975 年。

⑧ 对流行性疾病的爆发情况，仍只知其梗概。现仅对 1864-1865 年爆发的天花病有较完整的文件记录：天花从罗安达扩散到戈隆戈、比耶、刚果地区，直到纳米比亚；可能仅在一年中便使多达 25，000 人死亡。见 D. 惠勒(Wheeler)，1964 年。1885-1886 年卡瓦柳(Carvalho)去穆松巴(隆达帝国的首都)旅行，使他有机会收集该地区有关天花的资料。他说，在战争爆发后，因为有不埋葬尸体的习俗，所以天花特别猖獗。

当地吸收，他们所遵循的扩张法“迁移”的传说在民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多余的人口也为实施较为多样化的农业地区所吸收，因此，正如P. 古鲁所说，有能力“使他们的剩余人口转化为资本”。至此，一种较为固定的移民形式终于战胜了环境的险恶，人们世世代代逐步征服了环境，使之变得有利于人类居住。[9]

该地区的这种物质历史和政治与社会历史，两者互相阐明，不存在单向的决定性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人口稠密区会发展成等级森严的政治组织的基地。在扎伊尔东北部的两个人口稠密区——芒贝图和赞德，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19世纪在姆博穆河谷，以及远至南方的维拉，赞德地区尽管经历了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却仍是一个人口较稠密的地区（据乔治·施韦因富特估计，19世纪70年代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0人）。赞德地区的土地制度比阿文加拉的军事政权更古老，因为阿文加拉人只是在18世纪末才开始统一这个地区。然而，在他们的统治下，赞德一词成了隶属农民的同义词，而且他们发展了高产农业，可以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由于武士-贵族的掠夺和奴隶贸易不断获得俘虏和依附者，人口增长更快。

在基伍湖西面和东面的丘陵地区，19世纪堪称向新开拓的土地殖民的时代。这就是希族以及布隆迪和卢旺达所发生的情况。特别是希族的农业保存了过去曾在这个地区实施的农业体系中的几个植物品种，如“手指小米”、高粱和芋头。然而，最迟至19世纪，它引进了美洲的作物：一份20世纪的希族农耕志记载了32个豆类品种和四个甜薯品种，这些品种在殖民地化时期之前已为人们所知。[10] 19世纪也是希族的酋长国或小国发展时期。P. 古鲁和J. 范西纳在其它有关地区（卢旺达和库巴）观察后认为政治因素能加速人口增长和强化生产，发现必须有高产农业才能养活集中在首府或酋长国中受保护者、依附者和俘虏。这种政治因素对19世纪的希族来说可能也产生了作用。

这样，它就不是一个单向的进程：生产日益增加剩余，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人口的增长转过来又要求进一步扩大生产。有时这是以削弱政权为代价的。例如，扎伊尔西部有几个地区在19世纪时因大量移民的迁入而成为人口的聚集地；但是酋长的权力却被氏族或家族领导人，甚至有进取心的个人所削弱，这才是症结之所在。就这样，人口增长常常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

于是，19世纪在卢巴中心地带之西开发了一个最早的边疆地区（即布希梅河与卢比拉什河之间地区以西）。这些移民有个人和小群体，也有整个家族。他们并没有完全消除以往定居者的遗迹，但是，在以前氏族林立、讲求效忠的地方，在19世纪却逐渐形成共享同一文化、语言和政治组织的意识。这通常是在一些小的酋长部落。一种民族认同感从这个共享历史经历中产生，其中，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增长，还有对个体企业的鼓励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同一时期内，在奇卡帕河上游和卡赛河上游人口稠密的小区，有许多年轻的乔奎人正准备离开他们的村落，脱离令人难以忍受的酋长权力，到开旷的森林中去猎象、养蜂和收集蜂蜜和蜂蜡。因为他们善于种植，特别是种植贫瘠土壤生长的木薯，与他们同来的妇女得以开

[9] 见P. 古鲁，1971年，第89-90页。
[10] J.B. 库佩尔斯(Cuypers)，1970年。



图片12.2 19世纪库巴王国的王家鼓

始种植作物，这些妇女通常是从卢安贝河、奇卡帕河等支流沿岸的隆达人的定居小区来的。

隆达妇女在乔奎社会中被同化，说明了在整个"母系地带"的一种广泛现象。女性俘虏的后裔不是其母亲家族的成员(这是出身于自由人的特权)，而是父亲家庭的成员。到处都有许多这些奴隶的后裔：在刚果人中他们是"bana ba nzo"(房屋的儿女)，在乔奎人中他们是"ana a tshihunda"(村子的儿女)，在奎卢族的彭德人中他们甚至构成强大富裕氏族的主要成员。[1] 家系族谱表明，实行同化俘虏的做法在19世纪是很普遍的。

303

征服贫瘠土壤

政治因素和社会愿望有助于说明这样的事实，即人口稠密区有时吸引移民，而有时却

[1] 关于同化依附者的研究，见L. 苏斯伯格(de Sousberghe)，1961年。

相反，成了人口外移中心，对边沿区或人口稀少区的拓居作出了贡献。而且，征服较贫脊的土地，是19世纪农业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加之牲畜饲养，使人的拓居有可能巩固下来，例如，在安哥拉南部艰苦地区长期定居。

这里多沙和干旱地区，降雨无常是其特点。南部安哥拉社会分裂成多种民族，彼此之间因地域和对农业及畜牧业的重视不同而有别。这个地区各族人民相互团结，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即，政治上自18世纪末开始形成国家，经济上受环境的同一性支配。所有这些民族后称奥万博人，其中以克万亚马人为数最多[12]，其次则是人数少得多的恩敦戈人，克万比人等。他们都住在库维莱河盆地，以库内内河和库班戈河（奥卡万戈河）为界的地域之内。奥万博人靠库维莱河水上涨和大草原洪水泛滥战胜干旱，19世纪的旅行者描述这个地区时都说居民区看起来像花园一样。奥万博人灌溉农田，由于饲养牲畜，也给农田施肥。

正如在其它人口稠密区那样，移民的同化，特别是去奥文本杜高地以南掠回的俘虏的同化，促进了19世纪的农业进一步向集约型过渡。虽然此地也引种了某些美洲作物，诸如花生、豆类和少量玉米，但这些品种的种植不如在安哥拉中心地带那么广泛。小米和高粱仍然是主要作物，它们耐旱力强。王家权力与生产系统密切相联。国王是“造雨者”，也负责分配土地和组织筑堤修坝及其它灌溉工程。[13]

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可以说人口中长期存在的分布不均的现象可能在19世纪更为突出。因农业增产而产生剩余，导致某些地区人口增长较快，诸如奥万博、奥文本杜、卢巴，**304** 以及扎伊尔赤道以南至南纬5度左右的整个地区。由此又导致移民迁离其它地区。这种迁徙，因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进一步高涨。有些经济因素促使人们从事采集业，比如乔奎人收集象牙和蜂蜡，他们便散入森林。另一些经济因素（例如流域地区经常可见），有助于聚集混居的人口，建立贸易中心和人口集中地。所以，除生产外，还必须评估世界贸易和经济对中非地区影响的程度。

在19世纪波动的世界经济中的中非

中非几百年来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体系，而贸易部门始终存在，并根据历史情况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一般而言，由于运输困难，费用高昂，商业交易长期局限于需求最大的几种主要产品，如盐、铁、有声誉的货品（铜、酒椰纤维等），而农产品则很少长途贩运。

始于16世纪的全球市场经济的兴起，在中非较前更广大的地区中，逐步影响到经济生活的组织。这里再次表明，19世纪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不平等贸易关系的连续进程的一部分。然而，自19世纪50年代起，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奴隶逐渐不再是中非对外部世界的主要“输出”。在以采集为基础的经济中所获得的主要产品，如象牙，蜂蜡、硬树胶、油料和

---

[12] 1845年，第一个到这个地区旅行的学者B.J.布罗查德（Brochade），把他们的人数定为12万人。

[13] 关于该地区最有权威的著作仍是C.埃斯特曼（Estemann），1956-1961年。关于19世纪的状况这一课题的有助益的评述，参看W.G.克拉伦斯-史密斯（Clarence-Smith）和R.穆尔森（Moorson），1975年。

咖啡等的贸易扩大了。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容否认的：通过安哥拉港口运出的货品价值，在1844-1881年间增加了七倍；"海外国家银行罗安达分行"回收的现金在1865-1876年间增加了十倍。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这些产品所产生的出口价值，仍只是19世纪20年代奴隶出口价值的两倍。[13]

这些主要的非洲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货量，取决于非洲大陆内部交通和贸易网络的运作方式。这些贸易网络有其驿站、贸易惯例和货币，反过来又在19世纪的中非地图上划定了主要的经济区，等于是新的"边境"，同过去的政治和经济区的划分重叠，并作了修改。**305**

这些新的经济区域受19世纪世界经济的各神经中枢的需求支配。每一个经济区域有其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及社会特点。然而，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改变了非洲古老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使之或多或少与世界经济松散地联系起来。

经济区域与贸易网络

在1800-1880年间，中非可确定为四个主要的经济区。有两个区主要是穆斯林商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该地区的东北部，有从开罗、红海和喀土穆来的商人的前哨基地，这些商人走遍了加扎勒河上下和维拉以西地区。这个贸易网络是由于埃及的统治者穆哈默德·







图片12.3 1870年芒贝图的门扎国王　　图片12.4 卡曾贝在1831年

⑬ 19世纪安哥拉的经济统计在许多单行本的出版物中可以找到。至于一些基本事实，可参看R.J.哈蒙德(Hammond)，1966年，特别是第73-74页和书目。

阿里派商业和军事远征队进入苏丹和达尔富尔而发展起来的。至1850年左右，埃及人到达了加扎勒河，在那里，埃及、科普特和欧洲的商人采用了18世纪以来为达尔富尔素丹们的军队改善了的技术。他们筑起"泽里巴"(zeribas)、碉堡，或只是用荆棘和灌木丛筑成加固体，在进行易货贸易或劫掠时作为基地。一名欧洲旅行者乔治·施韦因富特于19世纪70年代与其中的一些商人结伴而行，他留下了关于赞德和芒贝图王国最初与苏丹商人建立正常联系时的宝贵记述。

苏丹人的网络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特色，特别是在国家垄断与私有贸易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系统地运用武力，主要通过招募地方上的雇佣军，以及执行一项为贸易而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种植棉花的政策。正当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着手在扎伊尔盆地为自己建立一个贸易帝国之时，这些目标和方法对他起了助长作用。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中非地区也纳入了一个贸易网络，并在斯瓦希里沿海的港口和货栈以及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和巴加莫约等地设立基地。进入洛马米以东地区的斯瓦希里路线是由两大组路线组成。一组路线是一个"走廊地带"，从乌吉吉等地开始，穿过位于今日坦桑尼亚中部的乌扬延贝，跨越坦噶尼喀湖；另一组或从马拉维湖，或从坦桑尼亚西南部通往卢阿普拉-莫埃罗地区。

斯瓦希里贸易网长期以来一直是小商队在有势力的酋长(例如隆达酋长、卡曾贝酋长)的庭院内停宿。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商业小公国开始发展起来，其中最有名气的是1875年在卡松戈建立的提普提卜，它控制了在桑库鲁和卢巴"帝国"的远程贸易。通过这个网络，斯瓦希里地区才能成为殖民主义人侵中非东部的第一个基地。

另外两个遍及中非的贸易网，是以在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商人的前哨基地为中心：葡萄牙人的中心在罗安达、本古拉和木萨米迪什，而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贸易站则在扎伊尔河下游和安哥拉北部沿海。这后一地区的供应主要靠刚果贸易与河上贸易。刚果贸易本身是以宽果-奎卢人社会为基础，在那里人们广泛说刚果方言——基图巴语。

河上贸易是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的，取代了老的陆上路线。沿河居住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定居在靠近乌班圭-扎伊尔河两河汇合处或沿扎伊尔河处于赤道线上的人民，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和使用独木舟，从而独霸水上贸易。这些不同的集团传播了巴班吉语言，且形成了赤道地区的混合语言，这种语言后被殖民者所采用。他们建立起贸易中心(例如卢科莱莱)，顺流而下远至普尔的蒂奥市场，逆流而上进人内地，收集象牙与奴隶，特别是从芒支地区收集。他们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重要贸易商品，诸如枪支、铜戒指、作物的新品种等等引进雨林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奴隶贸易促进了小的人口中心的发展。这些中心由俘虏、难民和其它群体组成，他们集中在河岸的贸易中心周围，或干脆就围绕着那些已在贸易中发财致富的个体户而集中居住。[15] 恩加利马就属于后一类人，他原是个奴隶，后来发了财，在1880年前后控制了整个普尔地区。在殖民主义者占领期间，国家所建立的行政基地，以及贸易驿站和传教站，采用同样的办法去集结被俘获的人群，就像在他们之前独木

[15] "大河贸易"这个词，是由G. 索特(Sautter)创造的，他是第一个描述其主要特色的人。较近的研究报告有：J. 范西纳(Vansina)，1973年；R. 汤努瓦尔(Tonnoir)，1970年；和B. 朱西维基(Jewsiewicki)的评论《殖民政府与传统》；关于吉里布马，参看R. 汤努瓦尔1974年；G. 许尔施特尔特，197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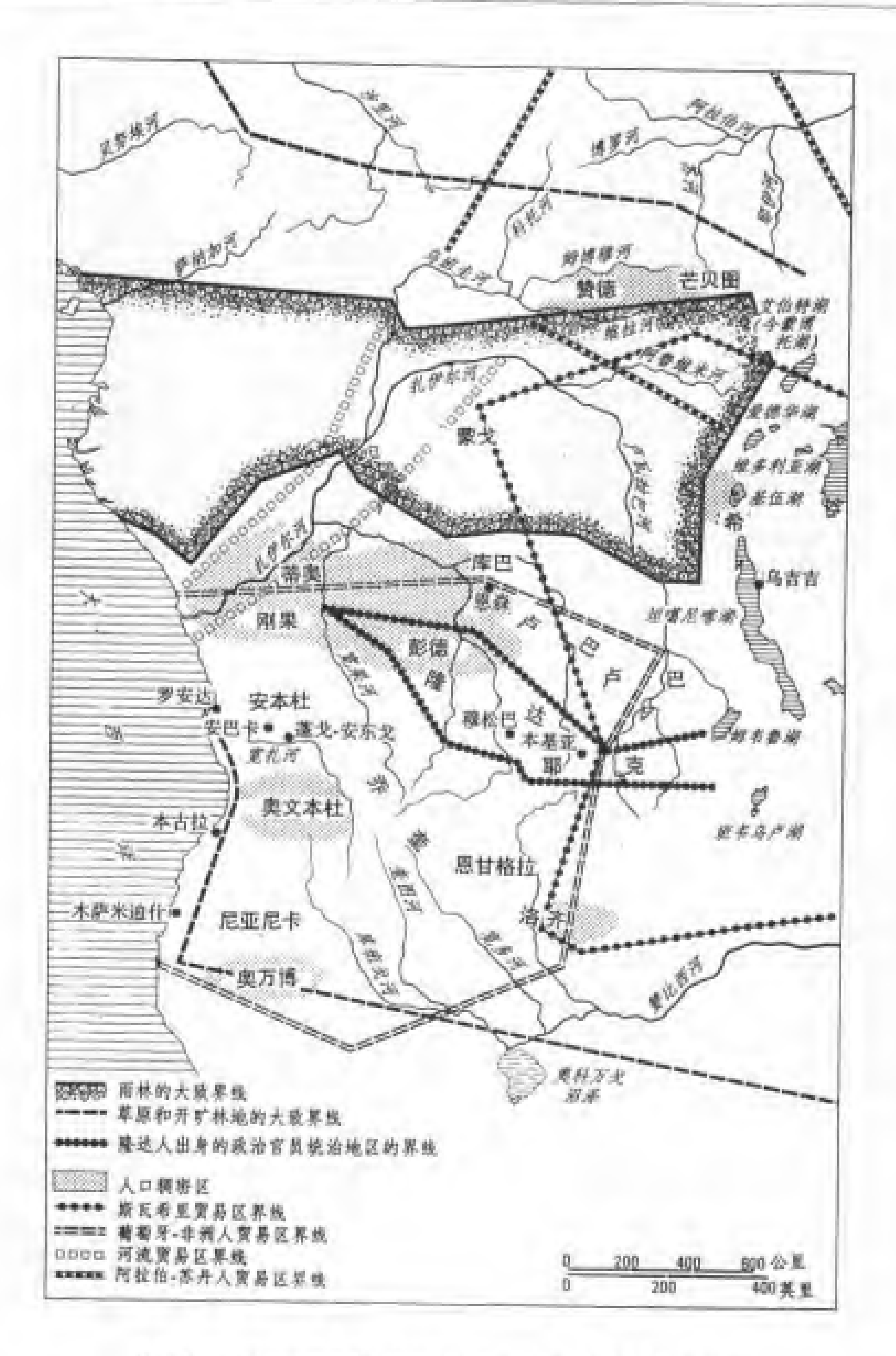


插图 12-2 中部非洲西部：贸易区，约 1880 年（仿照 J.L. 韦吕村）



图片 12.5 酋长阶层的金本杜妇女与其女奴，19 世纪 50 年代



图片 12.6 金本杜武士与酋长阶层的妇女，19 世纪 50 年代

舟商贩所做的那样。

葡萄牙-非洲贸易网在中非是年代最悠久和发展最完备的。[19] 其路线图在整个 19 世纪的变化很容易弄清。19 世纪的前半期，主要各组路线或“走廊”都通往罗安达和本古拉。三个大的经济和文化区集中在通往罗安达的道路上：刚果地区及其“穆比尔”（维利人）的路线网络，它穿过宽果酋长国（特别是霍洛）和恩科吉——安哥拉一处筑防的前哨基地；包括西部隆达各国在内的地区，可通过两条路线到达，或越过卡桑杰的因班加拉人的领土和经过另一个安哥拉前哨基地安巴卡，或穿过松戈和蓬戈-安东戈国境；最后是奥文本杜地区，它与蓬戈-安东戈和在宽扎河谷的其它安哥拉的前哨基地，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另一条通往卡孔达和本古拉的道路，把奥文本杜“高地”与沿海连接起来，商贩们利用这一“走廊”向南向东渗入尼扬内卡、恩孔比和古昂盖拉地区。在 19 世纪 40 年代，卢伊和隆达王国也纳入了这个网络。

19 世纪后半期，这个网络扩大了。安巴基斯塔斯人开始时常出入于姆旺特叶夫的穆松巴，特别是在穆特巴统治时期。他们利用一条直达的道路，从 1857 年在马兰热建立的新的葡萄牙贸易站出发，从而避开了卡桑杰。从这个贸易站来的商人在靠近金本杜（位于通往穆松巴半路上的一个隆达酋长国）的地方很快建立了一个驿站。随着隆达国基于贡品的经济体系的衰落和乔奎人的扩张，安巴基斯塔斯人开辟了通往位于卢巴地区的卢卢阿河流域的道

[19] J.L. 韦吕（Vellut），1972 年。

路，到达库巴周围的市场。在那里，他们面临奥文本杜商人的竞争，后者于19世纪70年代绕过卡拉格内-隆达国，与卢巴各国做生意，购进奴隶，然后出售给库巴人，而库巴人则供给他们大量的象牙。 309

在以贸易经济体系为基础的主要经济区中有一些商业中心，它们的重要程度可根据各自在居支配地位的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决定：给商人贷款，提供贮存设备，包装和装备贸易远征队等等。首先是罗安达，随后是本古拉，在19世纪后半期还有木萨米迪什，它们是最复杂的商业中心和主要商行总部。19世纪罗安达的建筑风格和公共设施具有巴西、非洲和印度建造的葡萄牙热带市镇的特点，但罗安达也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市镇，其中葡萄牙成分往往受克里奥尔和非洲文化所支配。在这里，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19世纪40年代访问过这个市镇的一名旅行者描述了总督的舞会，在舞会上他遇到一名用黄金和珠宝打扮的妇女，而她初到罗安达时却是个十足的奴隶；一名男子原是乘奴隶船来到沿海的囚犯；还有一名男子，他的童年是在里斯本贫民区拥挤的穷街陋巷渡过的。[17] 310

1850年前后，罗安达拥有6千到1万居民，安哥拉内地的贸易站都没有它大。少数几个主要驿站位于内地的"走廊"沿线，在那里解雇老搬运工，招收新搬运工，开展许多信贷业务等等。大多数葡萄牙非洲混血种人和少数与内地开展贸易的欧洲人，集中在这些小的中心。在罗安达腹地，栋多是个与宽扎河左岸开展贸易的主要中心，在咖啡和橡胶繁荣时期，它有了扩大；蓬戈-安东戈是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是商人们前往隆达酋长国的出发地点，也是本古拉与罗安达之间陆上交通的汇合点。[18]在南面，卡孔达占有同样的地位，但它的活动是针对奥文本杜高地以南的各族人民和比耶人开展的。后者的王国是这个网络中居次要地位的中心，在那里，更换搬运工，购进货物和安排贷款。比耶王国有个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约有100人，主要是非洲人和葡-非混血种人（从戈隆戈来的姆本杜人，安巴基斯塔斯人，从比耶来的"曼巴里人"，等等）。

最后，基于贡品的经济网络其终点是穆松巴、本基亚等贸易中心或小酋长国的首府及非中央集权社会的市场。这些终点城镇是活跃的交易中心。

这种体系的特点是，垄断有利可图业务（大量产品以及处理与销售业务集中化）的地区，与积累财富机会较少的地区之间的差别日益悬殊。运气较好的地区，看上去与其它地区很不相同：武器、纺织品和家庭奴仆很多，而在别处则很少。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在经济衰退时期，葡萄牙人试图以消除非洲"中间人"来垄断贸易网络中的利润，而在经济增长时期，大部分的内地贸易又让非洲人去进行。

在19世纪，贸易网络不得不适应一定的重大贸易周期。直至19世纪40年代，奴隶贸易还是最重要的葡萄牙-非洲活动。这个最后的高峰期，事实上是安哥拉奴隶贸易史上损失最惨重的阶段。据估计，从1780到1830年，从中非港口（洛安果沿海到安哥拉南部）出口的奴隶约在15，000人到20，000人之间。巴西是主要进口者，而安哥拉是主要供应者。由于安哥拉奴隶的劳动，才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咖啡种植业经济在19世纪有可能扩大。312

---

[17] 德国医生G. 塔姆斯1841年访曾问罗安达，A. 施塔姆（Stamm）引述，1972年。

[18] J.C. 费奥·卡多佐，1825年，第355页。



图片12.7 19世纪中期来自刚果/安哥拉的洛安果海岸的雕刻象牙，表现了欧洲人和贸易的景象



图片 12.8 奥文本杜人的一支商队在休息

总的来说，大西洋奴隶贸易，甚至连秘密贸易活动都于19世纪50年代消亡，虽然，在扎伊尔河下游地区奴隶贸易脱离了葡萄牙人的控制，依然存在，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拉丁美洲最后一个奴隶市场消失。

在19世纪以后的时期内，安哥拉的出口仅限于少量农产品（如咖啡和糖），特别是采集获得的产品——大多是蜂蜡和象牙，在这个世纪的最后30年中，更多的出口品种是采集来的，如野生咖啡，珂巴脂、棕榈油，以后则主要是橡胶。

非洲主要经济区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财富积累的条件，也加剧了社会压迫。如在扎伊尔河地区和阿拉伯与斯瓦希里地带，葡萄牙-非洲人地区支持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可以肯定，这种类型的生产，在草原地带基于贡品的经济中，并非鲜为人知：例如，奴隶们在穆松巴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家庭的田间劳动。但是在19世纪，某些有特权的集团所拥有的俘虏不断增多，往往正是与市场有关的经济部门快速增长之时，而非由于增加支付纳贡之款而导致的经济扩大时期。我们已经看到该地区一些社群（如刚果、奥文本杜和奥万博人）的“家庭奴隶”在人口统计和农业扩展方面所起作用的后果。 313

在安哥拉殖民地社会中，奴隶贸易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而且在19世纪后半期已发展到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存在一定的法律条款措辞的问题，安哥拉于187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奴隶劳动部门肯定还是棉花、种植园咖啡，特别是甘蔗生产繁荣的基础。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从安哥拉甘蔗中提取的白兰地酒是与内地贸易的主要物品。奴隶劳动也满足了劳动市场自奥文本杜高地以南地区开始有白人殖民时起就不断增长的需求。

安哥拉的葡萄牙帝国主义

中非主要贸易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的性质，为弄清19世纪帝国主义在该地

区的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时期内，至少在中部非洲，金融帝国主义尚未亮相，但种种新型的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发展。在整个19世纪中，安哥拉的葡萄牙属地扩张和收缩的一系列重要阶段是可以鉴定的，它们反映了葡萄牙殖民地总督在控制非洲贸易经济的两种不同概念之间徘徊。这样，葡萄牙新帝国主义者可以选择行使一种纯商业形式的统治和最小限度的行政和军事占领。它唯一公开声称的目的是，要在同大而活跃的非洲贸易社团的合作中促进货物的流通。另一种选择是，葡萄牙可以在保护国家贸易的同时，把非洲殖民地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为葡萄牙初露头角的工业开辟一个新的市场。采取第二种选择就意味着要巩固对殖民地的占领，约束非洲中间人的作用，使之有利于殖民地商人，使殖民地的原料生产多样化，以及为来自祖国的新制成品获得市场，这些主要是通过一项旨在从政治上和行政上统一葡萄牙及其非洲"行省"的政策来实现。这项同化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鼓励"白人"在安哥拉南部殖民。

这两种趋势，收缩抑或领土扩张，贯穿19世纪始终，就像钟摆摆动那样交替出现，因 **314** 为它们与经济形势和葡萄牙经济中的结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种种事件肯定在起作用，而且非洲人使葡萄牙人在军事上遭受的挫折，也可以说明1862-1872年期间殖民占领衰退的原因。人的个性也影响事态的发展；某些总督赞成最大限度占领的侵略政策，另一些总督则赞成撤退至沿海基地。可是，除非将这些因素放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背景中，特别是影响葡萄牙经济的范围中，否则不能揭示它们真实的重要性。确实，在19世纪，葡萄牙帝国主义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扩张的一般规律。[19]

保护主义者决心要确保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在一个独立于工业大国之外的经济体系中保持统一；最初从沿海的木萨米迪什和尼扬内卡地区的威拉开始，试图在安哥拉南部建立起一个白人殖民地，就是明证。征服精神在19世纪50年代仍属至高无上，葡萄牙人持续不懈地占领土地和消除非洲商人的竞争，特别是因班加拉人和刚果人的竞争。直到1860年前后，经历了几年的贸易繁荣之后，才到达一个转折点，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地采用撤退政策。从1862到1875年，殖民政权继续退却，1862年在卡桑加，1871-1872年在登博地区遭到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在罗安达的政府没有为这些失败寻求报复。到19世纪70年代初，撤退完成。在安哥拉的殖民政权退却到沿海，而非洲人则在内地迅速取得对贸易的控制。比耶区的内地人领袖席尔瓦·波尔图，在此期间，在奥文本杜商人竞争的压力下失去了他的全部财产。安哥拉进入了一个贸易迅速增长的时期：1867-1873年，从栋多至宽扎的船运吨位增加了七倍。

可是不久，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开始了一个扩张领土的新阶段。自1873年起世界贸易萧条，此后海外列强对一片"非洲蛋糕"[20]的争夺愈演愈烈，而在安哥拉，这个时期的开始是一场持续的干旱和信贷危机之后严重的衰退(1874-1876年)。与此同时，从罗安达到内地的铁路建设正在开工；试图通过外交协定来避开新来到中非的人的威胁；在罗安达和内地可看到第一批葡萄牙"探险者"紧跟德国、英国旅行者之后正在启程。中部非洲历史上的

---

⑲ 这个观点未被D. 惠勒和R. 佩利西埃(Péllissier)所接受，1971年，第51-83页。作者对葡萄牙人侵安哥拉的起伏不定的命运作了纯政治性的解释。这也是R.J. 哈蒙德所持的立场，1969年。

⑳ 这是利奥波德二世的表达方式，引用者中有J. 斯坦格(Stengers)，1962年，第490页。

-个重大转折点即将来临。

中非的社会与权力(约 1800-1880 年)

315

19 世纪中非的政治与社会历史，应首先从一个古老传统的范畴去了解。就口头和书面史料所能追溯到的，我们看到，生存在这个地区的社会是在两种权力结构之间徘徊：建立在纳贡基础上的等级森严、壁垒分明的秩序，即王国的权力结构；在另一个极端，由元老和知名人士参政组成的较平等和非正式的政府。[21]

这两种模式相辅相成，实际上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中间情况，在两者之间动摇妥协。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现实，以及历史情况，甚至个人的考虑，决定着主导组织形式是走向以秩序和安全为特征的君主政体模式，抑或走向更加灵活而独裁主义较少的民主理想。

在本章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我们发现中非有这样一些例子，即它们的行政体系具有稳定、永久性的等级结构，能够把很多的人口集中于特定的中心或首府。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普遍的，因为必需要有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涌现出一个政治称号和一个国家结构。基于贡品的经济，是一个国家组织的物质基础，要求有一个很强大的农业部门，即使如此，单靠农业也无法提供积累财富的充分机会。除了在征服和掠劫过程中索取贡品外，还可对盐、铜和铁的生产征税，从中占用更多的财富。最后，贡品是从贸易部分收取的。这样，酋长的权力是依靠市场、交换和交通网络的存在，从而使垄断和征收各种形式的税收以及其它捐税成为可能。

在经济部门中，任何一个部门的增长和衰退，都是 19 世纪国家或酋长国权力消长的一个因素，就如同在早先的时代中那样。但 19 世纪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在这些社团中的社会流动性，这在君主政体内部或通过民族和门第关系有助于迅速取得以前由酋长担任的职位，或干脆鼓励个别人的冒险精神。在 19 世纪中，垄断和征收贡品未能制止贸易的扩展，而贸易又往往以牺牲政治上的贵族统治的物质权力而繁荣起来。

然而，除了这些物质因素之外，还有涉及权力的礼仪问题，勋章和防范内外敌人的护身符即是其代表。行使礼仪的和神秘的权力在这些社会的军事和经济命运迅速转换之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历史学家尚未将注意力转向这个问题时，我们对该地区历史的了解，肯定是不完全的，必定局限于狭小的研究范围内，未能反映中非古老社会的深层愿望。

316

组成国家的社会

一些古老王国在 19 世纪的大动荡中幸存下来。其中之一是卡拉格内的隆达国。这个国家在 19 世纪前半期达到全盛时期，随后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进入衰落时期。原本卡拉格内被认为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全境几乎都位于卢卢阿以东，在南纬 8 度到 9 度、东经

---

[21] 对西部草原两个社会(刚果和蒂奥)的政权概念的正确分析见 W. 麦加菲(McGaffey)，1970 年，J. 范西纳，1973 年。



图片 12.9 乔奎人制作的奇宾达·伊伦加(传奇中隆达帝国缔造者)的雕像，可能是19世纪的作品

23度到24度之间的一片土地上。隆达人最初集中于沿河地带，特别是卡拉格内河沿岸，18-19世纪期间，他们成群结队迁往邻近地区。由于这些迁徙，新的政治单位建立了起来。但是，大批人口外流，也是为了逃避酋长力图征用被俘人力。这说明了19世纪初位于卡拉格内国南面的乔奎和卢瓦尔地区的隆达人拓居地的起源。

隆达的最高官衔是姆旺特叶夫，它起源于卡拉格内河流域，至18世纪末，这里一直是政治网络的核心。这个网络以表示永恒亲属关系的象征语言纳入东起宽果河、西至卢阿普

拉河之间许多隆达酋长国。

19世纪中卡拉格内王朝的伟大统治者之一是纳韦奇(1820-1852年)。在他的统治下，姆旺特叶夫的权力加强。纳韦奇或以武力、或不讲道德地利用巫医，对难于驾驭的酋长实行报复和强征贡品，令人们惧怕。虽然纳韦奇喜欢用弓箭狩猎，而正是在他统治时，隆达武士们首次开始使用来自安哥拉的火器(lazarinas)。在他的邀请下，乔奎猎人开始在隆达国境内行猎，他们使用火器，逐渐把大象向北方驱赶。1840年前后，一些乔奎人到首都访问，带来火器和炸药，有些人就在隆达境内定居。纳韦奇想方设法要保持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但没有成功。不久隆达和乔奎两个政治家族陷入敌对状态。

自姆旺特叶夫王朝开始以来，卡桑杰的因班加拉人一直是穆松巴的常客，但是，纳韦奇统治时期的重大发展是长途贸易的迅速增长，其对象仍属因班加拉人，但不久也与奥文本杜人和"曼巴里"人进行贸易。一直到19世纪末，人们还在谈论常到这里来为罗安达一 318 位女富商多纳·安娜·若阿基娜(纳·安登博)做生意的商队，以及纳韦奇派往罗安达到多纳·安娜那里的皇家商队，或派到卡桑杰的"贾加人"那里的商队。

然而，纳韦奇在商人中名声不佳，商人指责他漫无止境地拖延偿付债款，而且动辄找借口没收货物。他的直系亲族为数众多，没有多久，觊觎王位者开始窃窃私语，说纳韦奇已有了应该得到的一份国家权力，他已到了让年轻人接班的时候了。他在一次病中死亡，是被其"兄弟"穆拉奇掐死的。穆拉奇获得了他的手镯——权力的象征(lukano)——并被公认为新的姆旺特叶夫。随后几年，内部纷争频繁，因穆特巴长期统治(约1857-1873年)暂告平息。在那些和平的年代里，大商队在雨季停宿在穆松巴，受到姆旺特叶夫的友好款待。

从姆旺特叶夫·穆特巴统治以来，大批姆本杜旅行者侨居穆松巴。这些人原是安巴卡地区的本地人(安巴基斯塔斯)。这些侨民区的首创人是洛伦索·贝塞尔拉，隆达人只知其绰号卢富马(约1850-1883年)。此人出生于戈隆戈，约1850年定居于穆松巴，在姆旺特叶夫的宫廷中度过约30年，并因穆特巴对安哥拉商人的宠爱而长期受益。1869年，卢富马的侨民区在穆特巴的新的穆松巴——卢安巴塔的近郊建立，并把姆本杜的农业和畜牧业引进该区。姆旺特叶夫个人对这些田地很感兴趣，那里种植了从巴西和葡萄牙进口的植物(稻米、玉米、烟叶等)和非洲粮食作物。卢安巴塔的安哥拉人也成为手工业工匠(金工工匠、纺织工、陶匠、抄录员等)。在纳贡的基础上，侨民区与隆达人家庭并肩做生意。一切交易都通过卢富马。在这些年中，卢富马建立起一支由俘虏和赎买的奴隶等人组成的扈从队伍，1882年他最终返回马兰戈区时，也把他们一起带回去。为此，1800-1880年期间，侨民区已是一个由隆达宫廷的贵族家庭和安哥拉商人控制的主要贸易活动中心。这些侨民因众多婚姻关系而与这个地区密切关联，他们也实行本区盛行的以贡品为基础的贸易办法。卢富马事实上已成为一名有官衔的隆达显贵，他在宫廷生活中的作用就是明证：例如，是他治办了姆旺特叶夫·穆特巴在卢孔凯什的葬礼。

19世纪70年代，乔奎人不断扩张。他们以巫术为借口，逃离他们的村落和酋长，一如既往，依靠采集型经济，搜集象牙、蜂蜡，之后又搜集橡胶，把俘虏来的妇女和青年男子纳入其父系家庭。乔奎人不久便强大起来，足以使位于奇卡帕和卡赛两河之间地区的酋长 319 们的权力黯然失色。该地区的村落和酋长国分崩离析。对久已建立的贵族式的隆达政权来

说，是一个衰落时期。这一趋势由于穆松巴内部的不和而更加突出：沙南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族的家长，他与乔奎人结盟，在他们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他沿袭了姆旺特叶夫·姆本巴的名字。他统治的时代是一个暴力时代，他继续利用乔奎人来威胁隆达的仆从们。1883年他死后，乔奎武士们为他报仇，成功地为姆本巴的一个儿了穆希迪取得了手镯(权力的象征)。穆希迪是由一个乔奎人家庭收养长大。

酋长国和权力分裂

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尽管在隆达-乔奎人地区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隆达贵族并没有完全消亡。在别处，国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分裂：一些曾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分裂成一些酋长国集团，非正式地联合在一起，但不隶属于一个共同的中心；其它国家甚至更加分散，在有些情况下，酋长的权力有消失的趋势。

在安哥拉，位于奥文本杜高原以南的地区，属于大酋长国集团这一类。在高原上居支配地位的文化集团，泛称尼亚尼卡-恩孔比，系由几个民族集团组成：尼亚尼卡人、奥塔兰吉人、恩孔比人，等等。在19世纪中，该地区有些酋长国实际上就是从前的王国遗脉。其中之一如姆韦拉，它本是尼亚尼卡的一个王国，18世纪时曾统治整个威拉地区，临近19世纪中叶分裂，由乔继承，不久解体。在18世纪中，姆韦拉开始与卡孔达人和葡属安哥拉接触。它是尼亚尼卡境内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也是葡萄牙人于19世纪40年代不惜发起多次军事对抗，企图安插白人殖民的所在地。尼亚尼卡的各酋长国，特别是姆韦拉和其后的恩甘布韦，成为蜂蜡、象牙和牲畜的贸易中心，在19世纪的后半期供应整个安哥拉南部。虽然，贸易本身对该地区政治上的瓦解起了作用，但抢劫和掠夺性远征往往有助于冒险家或新来者迅速夺取政权。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商人和小军阀经常武装起来，在整个地区割据自己的地盘，给追随他们的俘虏(仆役)、难民和探险者建筑据点，人畜在荆棘筑成的围栏后面躲避暴力。

321 解体过程的又一个例子是卢巴“帝国”，它横跨于洛马米、卢瓦拉巴和坦噶尼喀湖西岸之间的一大片地区。在19世纪前半期，也就是它扩张的高峰时期，最有威信的卢巴国的军政权——穆洛普韦军政权及其首都基滕塔和宫廷——把矛头针对许多酋长国，而大部分酋长国已经接受卢巴的权力概念——“布洛普韦”(bulopwe)——即生而为缔造者孔戈洛和卡拉拉·伊伦加王族血统的酋长的特权。

事实证明，这种结构是短命的，并成为各个政治家族起伏不定的军事命运的牺牲品。在穆洛普韦·卡松戈·卡隆博统治时(1870-1880年)，他的政治上层建筑开始对特别是来自斯瓦希里地区或安哥拉商队的压力屈服。这种商业渗透，一方面纯粹是在各不同政治领导人之间煽起不和的火焰，另一方面也在参与政务的酋长们之间、在他们与那些拥有土地和领地的酋长家族之间制造不和。到这个时期结束时，这些卢巴国家和酋长国几乎已完全自治。[22]

---

[22] 殖民地行政官员，凡采用间接管理的理论和急欲在20世纪中叶去“重建”假定中的过去的帝国者，往往都过高估计盛行于卢巴国家的中央集权的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述，见A. 威尔逊(Wilson)，1972年。



图片 12.10 姆旺特叶夫·姆木巴

探险者、商人、雇佣兵：新主人

"布洛普韦"的权力是热带草原各族人民历史中最古老和最杰出的权力之一。19 世纪，在该地区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酋长的头衔极其频繁地被僭取，出现了权力的新形式。要

么酋长这个角色已过时(如在刚果和姆本杜某些族群中)，要么贸易的扩大导致雄心勃勃的族群或个体两极分化。这个过程的事例，在整个中部非洲，在有酋长或没有酋长的社会中都可以找到。例如，在中央盆地的雨林中，某些商人成功地积蓄了奴隶、武器、铜等等。他们大多是居住在扎伊尔河两岸的独木舟商贩，靠贩运奴隶致富。确实，姆西里王国的历史是以一系列贸易远征开始的。

临近19世纪中叶，从今日坦桑尼亚所在地而来的松布瓦旅行者，与住在卢阿普拉河谷及其周围地区的隆达、卢巴、奥希等族的酋长做生意。这些商人被当地丰富的象牙和在卡曾贝王国以西炼造的铜所吸引。1885年前后，其中一名旅行者之子恩格伦格瓦，陪他的父亲来探险，在加丹加酋长的领地上定居下来。加丹加是产铜的中心，在世界的这个地区算是人口稠密之地，[29] 在此期间，阿拉伯、斯瓦希里、尼扬韦齐和奥文本杜人的贸易远征队纷纷光顾此地，寻求扩大铜、象牙和奴隶方面的贸易。

姆温达也许是这些商人中最有名气者，他成功地利用统治氏族之间的矛盾，指挥一支庞大而装备良好的军队，能够在选定的地区驻扎；他把很多人吸引到首都，靠一批追随他的忠诚的合伙者、同行的冒险家、亲戚、当地的政治家族，以及什么出身都有的雄心勃勃的个人建立了他们的政权。姆温达在加丹加人境内安家立业后，便开始对政治上的反对派系主动提供服务。在奥文本杜商人的帮助下，他干预桑加、隆达、卢巴和该地区其他酋长之间的争端。这些冒险活动最成功的一次，是他对觊觎卡曾贝王位者之间的争端进行干涉。此外，从比耶区运来的武器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他的崛起。

到1880年，姆温达已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他采用了姆瓦米(Mwami)的称号和国徽，这在他的家乡已享有盛名。他在卢菲拉河流域的本基亚建立了首都。此时，该地区大多数酋长与姆旺特叶夫(隆达)的政权或与穆洛普韦(卢巴)的政权有联系。姆温达把其中许多人拉入自己的帝国，并成功地使他们接受他的国徽(kilungu)。对于所有想要在同姆温达交往中得益的人来说，本基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姆温达自己则以姆西里而闻名。这一名字似乎源出于本地，从穆希迪(mushidi，意为桑加和卢巴的土地)一字衍生而来，即土地拥有者。

与姆西里最亲密的几位妇女包括先前来自普韦托附近的一名年轻的斯瓦希里女子、两名从安哥拉来的葡-非混血种女子，她们象征着姆西里王国在贸易网络中所起的作用。安哥拉人称此地为加拉甘贾，斯瓦希里人把它称做加丹加，它已成为中部非洲从桑给巴尔到本古拉，从卢巴国到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前哨贸易站及马拉维湖上的阿拉伯人前哨贸易站的贸易票据交换所。

姆西里是一位令人畏惧的酋长，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遵守酋长或贵族的老一套陈规，慷慨但毫不宽容。有时他又是残忍的。他把自己的一个妻子马森戈处以死刑，为桑

[29] 阿拉伯旅行者赛义德·本·哈比卜(Said ben Habib)，曾描写19世纪中叶这里的人口。这里的居民比卡曾贝首都更多；市场上有丰富的食品，用本地产的棉花纺纱织布。F. 邦廷克(Bontinck)引述，1974年，第12页。

322

加人对耶克冈的长期反抗发出了信号。桑加人的起义迅猛发展，一直延续到姆西里死后，[24]最终被殖民政权的军队所平息。

结束语

323

在本章简明的评述结束时，是否能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呢？有些结论也许通过中部非洲19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便可得出。由于人口较稠密的居住区的兴起，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的生产力的提高，某些部门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大，结果，使影响财富和扈从积累的条件在19世纪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贸易的发展常常与经济情况与各种商品的供求相一致，在许多社会中，它对社会阶层的分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各种奴役形式普遍存在，但要谈什么"社会阶级"则未免轻率。日趋加深的社会差别常常归入业已确立的政治制度或种族和氏族团结一致的熟悉模式中，令我们无法使用"阶级"这一概念。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政治酋长这种古老的职能证明特别具有适应性。在该地区过去的历史中，曾有过这样的时代，而酋长的职位易于落人集团或个人——从幻想家到暴发户，直至冒险家等各式人物的手中。在19世纪，这种趋势特别显著，传统的政治官职要么越来越多地立足于贸易，为暴发户所篡夺，要么被享有新创立的官衔的人所取代。

因此，酋长制在19世纪继续具有悠久传统的形式，然而这个时期也赋予它新的特征。特别是酋长的地位，看来比昔日更不稳定。19世纪是一个政治命运能迅速赢得，又会瞬即失去的时期。突如其来的变化，使这个地区的自治历史在19世纪末无情地被中断，以致不能形成一些大国。复杂的等级制度和区域性割据，并非是19世纪中非国家的典型特征，该地区看起来就像许多酋长国结成的网络，是若干社群的一种"横向"模式，而不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一种"垂直"等级制。

然而，只以中非的支离破碎来谈1800-1880年中非的政治历史，会得出错误的印象。在这段时期，边界不再主要由政治势力来确定，[25]历史学家不得不考虑辽阔的经济区的发展已远远超越由民族凝聚力或政治组织所划定的边界。

19世纪中部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史的大致脉络逐渐开始显现：那个时代各个社会所生活和经历的历史，各社会的志向和抱负史，智力活动的变化史，这些历史均有一个巨大的领域有待开发，今天的非洲责无旁贷须向其历史询问所有的问题，以便更好地了解非洲的今天。[26]

（计德容译）

---

[24] 姆西里于1891年12月20日暴死于一名欧洲人之手。凶手当即被姆西里的一个儿子处死。亲眼目睹并叙述殖民主义征服前的本基亚生活的，主要是艾文斯(Ivens)和阿诺特(Arnot)的报道；见F. A. 奥利维拉·马丁(Oliveira Martins)(编)，1952年，第366-383页；F.S. 阿诺特，1889年。

[25] J. 范西纳，1976年。

[26] 本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扎伊尔国立大学前教授博古米尔·朱西埃韦基(Bogumil Jewsiewicki)多年合作研究获得灵感后而撰写的。

13 埃及的复兴，1805-1881年

A. 阿卜杜勒-马立克

欧洲的影响：文化移入还是复兴？

325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的历史与历史社会学派在具有革新精神的西方出版物的支持下，明确表明18世纪的埃及在三个世纪让渡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并非只是一个沉默而自我忘却的时代。[1]

这个学派还明确表示，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之所以当选为瓦利(wāli，行省总督)之职，是由于开罗和亚历山大的群众，以及当时传统的社会精英、“乌里玛”、谢赫和城市里的头面人物都采取了直接行动。[2] 就在这一年，1805年，埃及恢复为一个自治的现代国家，它标志着埃及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像传统的殖民地历史编纂者所希望我们相信的是“埃及远征”，即意大利战争后在法国督政府的倡议下拿破仑·波拿巴于1798年至1801年领导的军事侵略。这次远征是在同英帝国作斗争的一次重大冒险行动。正如拿破仑本人所说，“远征将把英国人从其所攻打的东方所有领地上赶出去，特别是，将摧毁在红海沿岸的一切英国贸易点……(鉴于)英国背信弃义，卑鄙地占领了好望角，使共和国船只很难取道通常的路线驶入印度群岛，因此，我们共和国军队必须获得另一路线……”与此同时，“科学使团”也在埃及进行研究，它带来了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时代和“工艺教育”思维模式的成果，这一切不久便被应用于法国和欧洲。《埃及志》[3] 这部20卷的巨著，概述了这一壮举。

18世纪的埃及现在被看做是产生新埃及的实验室。首先是阿里·贝伊·卡比尔试图加326 强民族团结，减少了下埃及三角洲马木路克所控制的不同的封建体系。接着出现了谢赫·哈桑·阿塔尔所从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现代化的最初迹象；再接着便是把从土地上获得的剩余价值集中到城市(不只是开罗)，一批具有霸权倾向的商人和学者认为这些剩余价值应归后来称之为“全民的努力”来支配。法国的远征是独一无二的冒险行动，它使法国

---

[1] M. 沙尔卡威(al-Sharqawi)，1958年；P. 格兰(Gran)，1979年。

[2] 参看(主要有)，A.R. 拉费(Rafe'i)，1951年；L. 布雷伊埃(Bréhier)，1901年；A.A. 穆斯塔法(Mustafa)，1965年；M. 萨布里(Sabry)，1930年；M.S. 古尔巴勒(Ghorbal)，1928年；A.F.S. 瓦希达(Wahidah)，1950年；H.H. 多德韦尔(Dodwell)，1931年。

[3] J.C. 赫罗尔德(Herold)，1962年，描述生动有趣，可与堪称其时代典范的历史学家阿卜德·拉赫曼·贾巴尔蒂(Abd al-Rahman al Djabarti)(1754 1825年)的著作媲美。

人在征服北非之后，得以加强其在地中海东部区域的地位。这还使法国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广大地区被看做是欧洲革命的旗手。但当代埃及历史学家，特别是阿卜德·拉赫曼·贾巴尔蒂和尼古拉·图尔克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法国人的占领改善了下层阶级、零售商、街道清洁工、手工匠、驴夫、马夫以及男妓女娼的地位。"[4] 总之，下等人高兴，因为他们自由了，而上等人和中产阶级由于进出口贸易的中止，而遭受各种各样的困扰。

由此来看，促成两次开罗起义的根本原因就清楚了。第一次，自 1798 年 10 月 21 日至 24 日，经开罗的一些谢赫和显贵人物发动，扩展到城乡。2000 人被杀害，十名谢赫被斩首，协商机构(迪万,dīwān)中止活动。第二次起义要严重得多，从 1800 年 3 月 20 日持续至 4 月 21 日。起义由帕夏和爱资哈尔大清真寺的谢赫们领导；帕夏仍坚决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谢赫则激起了极严厉的扫荡镇压措施。中间派，即民族运动总趋势的先驱，其领导人包括一些谢赫：赫利勒·巴克里、阿卜杜拉·沙尔基和阿卜德·拉赫曼·贾巴尔蒂，他们给梅努将军送去一封和解的信，强调必需保持"两国间"的友好关系。金字塔之战和阿布吉尔之战，以及 1801 年法国侵略军的撤离，终于使新生的埃及民族运动有机会具体化，换言之，即取得社会权力的基础。无疑，这个运动最初是谋求脱离奥斯曼帝国的自治运动。但在 19 世纪，它争取完全民族独立的炽热愿望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整个东方、地中海和非洲，在世界秩序和当时的帝国中留下了标记。

从法国人撤离至穆罕默德·阿里被任命为"瓦里"这段期间，埃及再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第二次开罗起义，其结果使法国的地位严重削弱，加强了常常支持奥斯曼帝国和马木路克的地方领导。虽然奥马尔·马克拉姆的权力在增长，但他仍无法使权力转向埃及的新政治阶级、"乌里玛"、显贵人物和商人。这是因为军队仍受其原先的主子所控制；"独立兄弟会"的领导人雅各布将军在开往欧洲的船上去世，其计划与之一起埋葬；最后，因为埃及行政长官们在此阴谋诡计四伏的多事之秋，很难作出抉择，他们提出的任何别的选择也都落空。在 1805 年，就地位而言，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wilāya)。这里的地缘政治形势严重地限制了它调遣的余地。但其主要组成部分已安排就绪：中央权力机构建立在一支小而精的军事力量基础之上，尤其是它有真正的授权，代表着当时的显赫人物、"乌里玛"和商人的举国一致的意见，并得到城镇和各大省级人口中心的支持。 327

因此，对于将来，始终还是一个在地缘政治的铁轭下调兵遣将的问题。正如贾迈勒·哈姆丹在他的巨著《埃及的个性》中精辟论证的，这意味着新的统治者们必须懂得"地形上的地方特色。"

现代独立的全民的埃及国家的建立与穆罕默德·阿里和伊斯梅尔领导下的帝国

雅各布将军的"科普特军团"(1800-1801 年)和他的支持者宣扬"独立的埃及"信念的"独立兄弟会"是因法国势力反对英国霸权而产生的。随着法国远征军的撤离，这个运动

[4] N. 杜尔(Ture)，1950 年，第 4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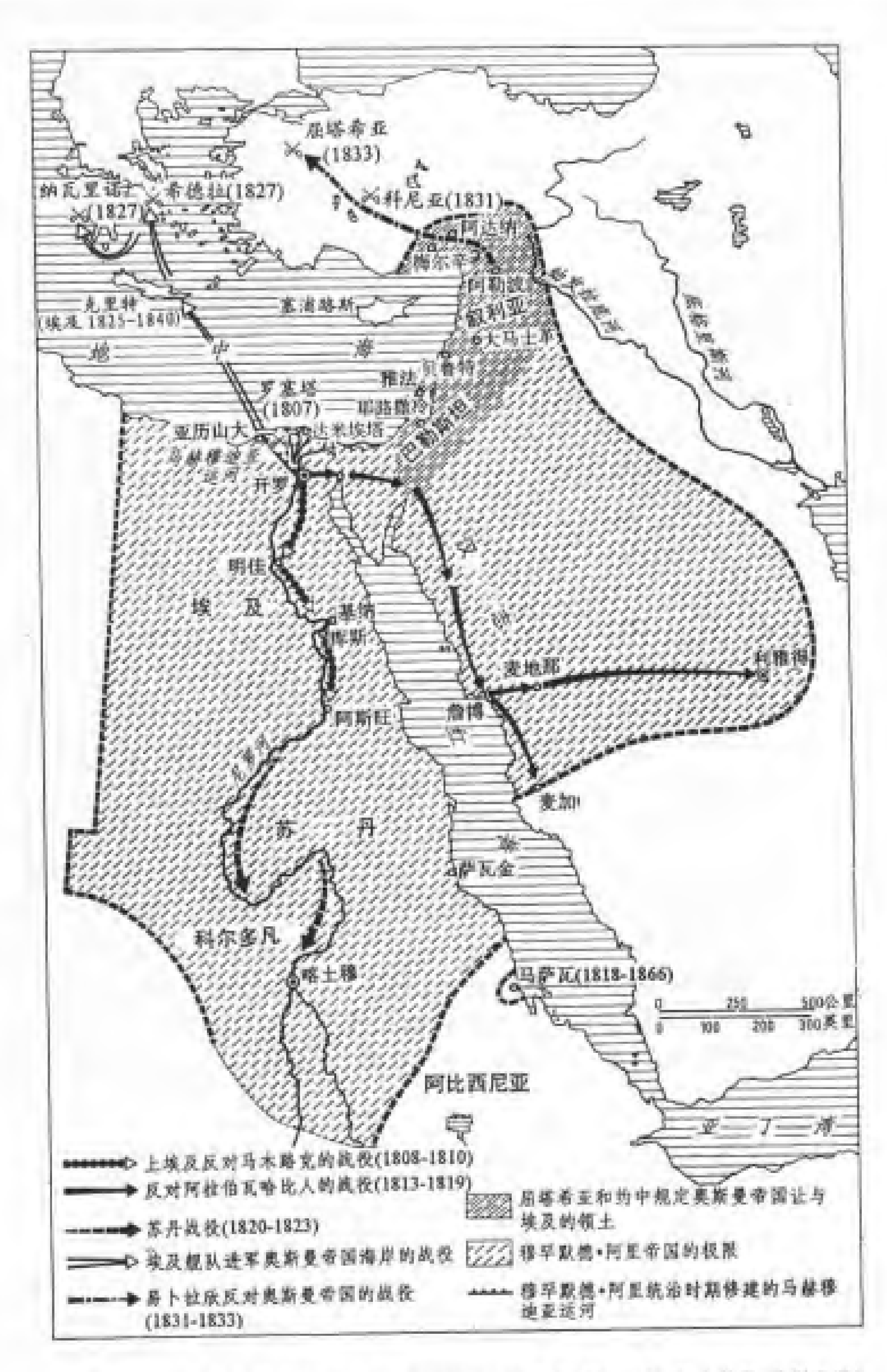


插图 13.1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1804-1849年)(仿照A. 阿卜杜勒-马利克图)

即行瓦解。穆罕默德·阿里的计划和政治生涯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的首要目标是在埃及建立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使其在重建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的背后，成为取代呈现衰老的土耳其的推动力。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考虑到了埃及特性中的两个方面——埃及的和伊斯兰教的。他的这些运动和易卜拉欣的运动，是要突出表明埃及同时是一个伊斯兰教、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他在"乌里玛"、民众和他的忠诚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支持下夺取权力以后，首先要估量这块国土，因为他还只是这块土地上未确定的主人。

英国支持马木路克，这个团伙由穆罕默德·埃勒菲贝伊领导，他于 1806 年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解除穆罕默德·阿里的官职。1807 年，英国企图直接入侵埃及，但在 3 月 31 日，被埃及人击败于拉希德(罗塞塔)。穆罕默德·阿里在利用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方面素负盛名，尤其是利用奥马尔·马克拉姆的支持，他决定要结束马木路克对上埃及的压制，特别是因为他们是英国的盟友。在 1808 年 6 月至 1810 年 8 月之间，他征服了上埃及，1811 年 3 月 1 日，在撒拉丁城堡的大屠杀中，最后消灭了反叛运动的领导，这些人既是中央集权的障碍，也影响新总督未来计划的实施。 **329**

直到拿破仑垮台，地缘政治的形势基本上保持原样。但自 1815 年后英国的势力增长，其它国家加人角逐，其中有梅特涅执政的奥地利。穆罕默德·阿里在使马木路克就范后，便着手进行帝国的建设和全国复兴大业。

穆罕默德·阿里的独立概念是什么呢？帝国内的自治如何与他的框架相配合？1810 年 11 月 28 日，穆罕默德·阿里与法国领事德罗韦蒂密商，提出由法国帮助埃及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仅仅三天以前，他还要求伊斯坦布尔准予埃及只是作为一个行省(wilāya-eyālet)，给予奥贾克(odjak)的地位，具有与当时阿尔及尔同等程度的自治。于是，他派军队进入阿拉伯半岛(1813-1819 年)，后进入苏丹(1820 1823 年)，而其最终目的是要占领埃塞俄比亚。然而，埃及统治者一直在阿谀奉承的英国政府却转而反对他，因为他已渗入英国的三个势力范围——红海、波斯湾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地方对于保护前往印度的路途安全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形势更为复杂。"从波斯湾到利比亚沙漠，从苏丹到地中海，以及红海两岸，一个拿破仑式的，更确切地说，法老式的帝国连绵 500 万平方公里。"而这正处在奥斯曼帝国权力衰落之时。由于北非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力量，看来"埃及问题"似将替代"东方问题"。[5]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 1827 年希得拉和斯培西亚两个希腊岛屿上，在那里集结着穆罕默德·阿里的强大舰队和他儿子易卜拉欣的陆军，他们是来援助奥斯曼帝国的。伦敦派出的特使克拉多克上校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助手在亚历山大开始谈判。谈判的主题正是根据当时具体时期埃及对比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实力地位，来讨论埃及的独立。穆罕默德·阿里是优秀的战略家，他在危急之时设法避免了武装对抗。但是土耳其素丹完全拒绝，直接导致了 1829 年 10 月 20 日埃及舰队在纳瓦里诺被击毁，那时埃及舰队是奥斯曼作战舰队的组成部分。

至此一直是朋友的法国停止了支持，因此穆罕默德·阿里又反过来求助于奥斯曼帝国， **330**

---

⑤ E. 德里奥尔特(Driault)，1925 年。



图片 13-1　穆罕默德·阿里（戴维·威尔基爵士绘）

12 月 12 日他向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带有政治家风度特点的复兴计划：

>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伊斯兰国家中，都痛感复兴之必要。我们的国家在目前冷漠的状态下犹如蛙口般地生存着。我恳求你，让我们屏弃自私、急躁和过分热情，专心思考一下伊斯兰国家现已发觉自己所处的苦恼和贫困的状况。让我们恢复昔日的智慧，缔造更像是休战的和平。
>
> 这样，我们将会一千倍地更好地去生活，去为我们的祖国和宗教服务……我和我的儿子致力于为国家和伊斯兰教服务的时刻已经到来……②

331

② 致切伊吉·埃芬迪的信（1827 年 12 月 12 日），引自 M. 萨布里，1930 年，第 153-155 页。



图片 13.2 易卜拉欣——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和主将

其后发生的事是众所周知的：奥斯曼帝国政府表示拒绝；在易卜拉欣的影响下埃及总督在阿拉伯世界范围内实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日益扩大；土耳其与埃及开战，易卜拉欣在科尼亚、屈塔希亚、纳西宾连获大胜；一心要消灭穆罕默德·阿里的列强进行干预。穆罕默德·阿里自 1831 年至 1840 年的扩张战争，使他兵临伊斯坦布尔城下。欧洲所有大国组成的"神圣同盟"拯救了土耳其素丹的政府，以摧毁这个唯一有能力一方面反对欧洲的殖民扩张，另一方面承担起使奥斯曼帝国诸省复苏、现代化和复兴之责的伊斯兰国家。 332

在易卜拉欣到达伊斯坦布尔的大门屈塔希亚时，他的父亲对其军事活动强行制约，使他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从他于谈判前夕写给他父亲的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 我认为独立必须是与两位谈判者讨论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对我来说，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割让阿纳托利亚、阿莱亚、奇里奇亚三地区和塞浦路斯岛，最后与埃及合并，可能的话，还有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这些都必须是我们的最低要求，对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的基本利益要求这样做。首先，在你的独立的问题上我们务必坚定果断，从而巩固我们的地位，并围绕此问题获得将来的保证，因为没有独立我们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我们仍将处于这个奸诈的政权桎梏之下，由它不断地提出荒谬的要求，不断地勒索钱财，继续把我们压垮。现

在，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这种无法忍受的负担下解放出来，唯有在独立中求得自救……[7]

因此，埃及有两条可能的道路达到一个独立国的地位。穆罕默德·阿里的目标是在土耳其帝国之内的自治，近乎独立，而易卜拉欣的梦想是谋求完全彻底的独立，以埃及为首，以一个阿拉伯帝国为中心。

在穆罕默德·阿里和他儿子的伟大事业中，易卜拉欣的观点开始与其父相左。近东诸省是易卜拉欣和农民士兵(falláhin)所征服和解放的，那里的农民士兵操同样的民族语言，即阿拉伯语，易卜拉欣与之接触使其更加意识到伊斯兰埃及的阿拉伯特性，首先是迫切需要锻造其复兴的工具，即一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并用阿拉伯模式铸成的军队。正如他于1831年在阿克所宣称的："我有两个目标，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埃及永恒的荣誉，恢复其昔日的荣耀……"在攻打胡姆斯之前，他威胁要把奥斯曼军队撕得粉碎，"从而进一步加强埃及的地位，以保证其前程更加灿烂，其荣誉和威望更高。"在包围阿克期间，易卜拉欣在致皮克勒·穆斯考的信中宣称："世界上任何军队都不可能表现出更大的坚韧和英勇的精神；每当发现军队中有迟疑不决或怯懦之事例，肯定是发生在土耳其军官中间，而我尚不知阿拉伯人中发生过这种事。"最后，他对其父亲说，"我与这些士兵生活在一起迄今已20年，可以肯定地说，每1000名土耳其人中有300名大家认为是忠诚的，而1000名埃及人中则有700名忠诚的战士。除非你了解他们具有时而反叛既定政府这种习惯……"[8]在巩固现代埃及国家的过程中，只要能取得进展，泛阿拉伯因素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1840年后，则随易卜拉欣而消失。

333

阿巴斯一世(1849-1854年)除了由欧洲国家掌握政府之外，任何要求都同意。在他之后，伊斯梅尔则是从独立和主权方面来论述国家问题。他的意图是以谈判来减少他的国家对土耳其的依附，然后使之成为一个自治和稳定的国家，自治政府的机构则待以后再制定。伊斯梅尔成功地得到1866年5月27日和6月15日颁发的敕令，以及1867年6月的敕令。前两个敕令确立了埃及的王位依据——长子继承法，直接由父传子世袭，与"大多数欧洲王朝所实行的继承模式相同"，但是，"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完全决裂。"[9]

1867年6月8日的敕令(firmān)为伊斯梅尔及其继承人创立了一个新的称号，即"赫迪夫"(khedive)，以区别于奥斯曼帝国其它行省的总督。它授予埃及"赫迪夫"权力，可推行改革政策(坦志麦特，tanzīmāt)，颁布行政法令，与外国缔结协约(海关、邮政、运输、管理外国侨民等等)。这些协约虽不完全具有国际条约的地位，但仍授予有效的权力谈判经济协议。1873年6月8日达到了顶点。埃及在那一天的敕令中第一次被阐释为一个"国家"，而不再是"省"，按当时获得的规定，保证了赫迪夫权力的延续性。

根据萨布里的说法，埃及帝国的重建，一方面符合"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的思想"，并"用金钱获得了"穆罕默德·阿里试图用武力而没有取得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

⑦ 1833年2月3日的信，引自M. 萨布里，1930年，第227-228页；G. 坎基(Khanki)，1948年，所说信的日期为1833年1月20日。

⑧ H. 皮克勒-穆斯考王子(Pückler-Muskau)，引自M. 萨布里，1930年，第469-471页。

⑨ A. 萨玛可(Sammarco)的引文，1935年，第4卷，第196-197页。

满足了这种要求，即“通过在非洲的扩张，开辟获得名声和自由的可能性，这会使它重新获得国家感和发挥它的一些潜在的力量”。伊斯梅尔认为，利用新的埃及军官团把埃及领土往南扩展到赤道，他就可设法为其国家的独立在这个大陆的中心争取到一个最后和不易进入的庇护所。至少在初期，向非洲大陆中心的这一扩张，未受到土耳其或英国的反对。 334

除了留出一部分战舰交给土耳其，一部分商船供埃及的全部商业需要，新帝国的基础设施包括一支具有中等力量的舰队，18 座炮台，一个装备良好的电话和电报局，以及开始建设的一条铁路(计划从开罗到喀土穆和萨瓦金)。埃及的军事扩张把欧洲文明的各个方面带到了苏丹，也带到了索马里、哈勒尔、赤道省、布尼奥罗和布干达。欧洲自由派报刊一片赞扬。大多数非洲人似乎也很乐意。但是，这项在 1872 至 1879 年之间达到顶峰的事业，后来却以失败告终。

伊斯梅尔在军事最高指挥问题上作出让步，以为这会诱使英国容忍他的非洲事业。他没有作出什么业绩可与穆罕默德・阿里在经济，更重要的是在工业领域中的成就相比拟。虽然指挥军队有方，但系由外国人任统帅，而且，在伦敦条约签订以后，埃及再也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设施可以依靠。它已不再有能力维持其独立和现代经济发展。然而，伊斯梅尔的格言仍以各种方式继续萦绕在人们的耳际：“尼罗河源头各地区的人民，从今以后，必定是赫迪夫殿下的朋友和盟友”。[10]

在执行这一伟大的民族事业的同时，代议制和其后的立宪运动也扎了根，并在伊斯梅尔的领导下达到了顶峰。1798 年 10 月 5 日，波拿巴召开埃及显贵人物的代表大会，成立其“执政府”(al-diwān al-ʻām)。在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下，虽然创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各个不同体制必须包括整个国家，但口号却是效率和秩序，而不是民众授权。1829 年成立了新的咨询议会(madjlis al-mushāwara)。它包括 156 名成员，其中有 23 名高级文官和乌里玛，24 名省级马穆尔(maʻmūrs)，99 名省级显贵人物和谢赫。易卜拉欣任议长。

1847 年在亚历山大设立了一个特别议会(al-ʻmadjlis al-ʻumūmi)，以解决这个城市的问题。1832 年，在叙利亚设立了一个由 22 名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11]

1834 年，谢赫・里法-阿・塔赫塔维出版了关于他对法国革命的感想一书的第一版，书名《巴黎游记》。它标志着现代埃及政治和社会思想的诞生和具体化。该书对“祖国”和“民族”问题的思考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把从全部埃及文化史中(特别是关于科普特人的情况)所得出的论据，以及从伊斯兰的整个历史中(特别是关于哈里发奥马尔的情况)所得出的论据，巧妙地与法国革命的教训结合起来，从而得出结论，即只有根据社会契约制定的，而不是由君主传下来的宪法或宪章，才能构成文明社会的基础。[12] 在阿巴斯一世的统治下，塔赫塔维被流放到苏丹。赛义德建立了一个类似国务委员会的机构，由九名成员组成， 335

[10] M. 萨布里，1933 年，第 383-389 页；A.-R. 拉费，1948 年，第 104-196 页；R. 鲁宾逊(Robinson)和 J. 加拉格尔(Gallagher)，1961 年，第 2-3，59，122-133 页。

[11] 关于埃及立宪政体的演变，见 G. 杜安(Douin)，1933-1941 年，第 298-301 页；P. 拉维塞(Ravisse)，1896 年，第 9 页；A.-R. 拉费，1948 年 a，第 81-84 页；J. M. 朗多(Landau)，1953 年，第 9 页；D. M. 华莱士(Wallace)，1883 年，第 209-213 页；J. C. 麦科恩(McCoan)，1887 年，第 115 页；G. 贝尔(Baer)，1961 年，第 127 页，注⑰；麦罗男爵(Malortie)，1882 年，第 214 页。

[12] R. 塔赫塔维(al-Tahtawi)，1834 年。

起咨询作用。直至 1864 年 8 月前后，制宪运动似再行复苏。

1866 年 10 月 22 日颁布了两个文件——根本法(al-lā' ihah al-asāsiyyah)和规定议会职权的法律(al-lā' ihah al-nizāmiyyah)，又把两法合并为“法规”，据此建立咨询议会(ma djlis shūrā al-nuwwāb)。第一个文本的第一条规定新议会的性质如下：“议会的任务是商议国家的更高利益。议会还须就政府认为应属其范围内的方案作出决定，并就这些方案提出意见，呈交总督殿下批准”。

议会中以乡村领导人占优势(以牺牲从国外培训归来的知识分子为代价)，他们被任命担任行政职位，包括穆迪尔(mudir，省长)之职的人数明显不断增加。在伊斯梅尔统治的最后几年中，这个集团给予他的支持，以及后来这个集团给予军队发动的革命的支持，表明乡村领导人是该时期政治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团体，是正在兴起的本地资产阶级分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控制着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

1875 年是一个转折点。面对苏伊士地峡开凿后欧洲列强的日益渗透，赫迪夫伊斯梅尔被困在一场斗争中，最终于 1879 年垮台并被流放。



图片 13.3　谢赫・里法-阿・塔赫塔维

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性与传统的辩证 336

走向经济自给自足

首先要强调的是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创建了民族经济以替代不协调的地方经济，后者在大多数当代东方国家至今犹存。产生一个统一的经济政策的全国性决策中心是埃及几千年历史的必然结果。穆罕默德·阿里建设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助于促进他在一个帝国的中心建立现代埃及民族国家的计划。尽管在 1840 年受到挫折，伊斯梅尔回到了穆罕默德·阿里所制订的路线上。国际大企业的压力，接着是其渗透，最后在 1882 年占领了埃及，从而在两个意义重大的方面影响了这个基本形势。首先，由此导致建立一个单一的全国性 337 市场——主要由于伊斯梅尔作了很大努力；第二，通过信贷，最主要的是单一种植棉花，导致埃及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相结合。

穆罕默德·阿里的业绩值得仔细研究。在当代东方伊斯兰统治者中，独有穆罕默德·阿里考虑把经济作为政治的基础，因此而使这位精明的阿尔巴尼亚军官成为一位政治家。他计划要建立的国家，在 1805 年初步界定为一个以强大的和有效的军队为中心的民族组合，以自给自足的现代经济为其支柱。[13]

从 1818 年到 1830 年，他创立了一些重要的工业单位：开罗城堡的军火和军械工厂，这些工厂在艾德汉贝伊领导下于 1828 年达到顶峰；在阿塞纳尔的军火工厂；在胡德-马尔苏德的大炮厂(1821 年)，包括五座火药厂，1833 年生产 15，874 坎塔(kantār，1 坎塔＝45 公斤)；在亚历山大的海军兵工厂，1829 年由勒费比尔·德·塞里西建造，他是杰出的工艺大师哈吉·乌马尔的接班人；最后是 1844 年由穆热尔建造的干船坞。这些基础设施，使陆军元帅马尔蒙和克洛特贝伊大为惊讶。在“民用”工业方面，在上、下埃及建立起 30 个棉纺厂。开罗的工厂向各省的工厂供应机器、工具、零件、建筑材料和维修技术人员。

工业生产在两方面满足了国家的需要：提供进口代替品，以近百分之百的利润充实了国库。在布拉克、达曼胡尔和富华建立起三个毛纺厂，在库伦菲什建有一家大丝织厂(1816 年)，在全国还有许多麻纺厂，三座榨糖厂，17 座靛蓝厂，两座大型玻璃厂，罗塞塔制革厂(1827 年)，开罗造纸厂(1834 年)还有由法国人哈伊姆建造的六座硝石厂。但是，这些基础设施因受内在弱点的影响，在一个世纪之后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这个国家缺乏必要的矿

---

[13] A. 阿卜杜勒-马利克(Abdel Malek)，1969 年，第 23，32，65 页；更详细的研究见 A.-R. 拉费，1951 年；G. 贝尔，1962 年；R. 巴拉威 (al-Bara wi) 和 M. 哈姆扎·伊利希(Hamza Elish)，1944 年；A. 利纳·德·贝勒(Linant de Bellefonds)，1872-1873 年，第 3 页；J. 包林(Bowring)，1840 年；F. 吉尔吉斯(Djir djis)，1958 年；M.F. 利希塔(Lihita)，1944 年；G. 米谢利迪斯(Michailidis)，1950 年；H. 蒂埃斯(Thiers)，1867 年；F. 莱塞普(Lesseps)，1869 年；M.K. 穆尔西(Moursy)，1914 年；H.A.B. 里沃林(Rivlin)，1961 年；J. 塔格尔(Tagher)，1949 年；M. 法赫米(Fahmy)，1954 年；A.E. 克劳奇莱(Crouchley)，1938 年；A.A.A. 格利特利(al-Gritly)，1948 年；A. 阿卜杜勒·马利克，1962 年；H. 哈拉夫(Khallaf)，1962 年；C.P. 伊萨威(Issawi)，1966 年；M.S. 古尔巴勒，1944 年；A.A. 哈塔布(Hattab)，1935 年。

产、铁和煤，因而很难得到足够的电力使机器运转。

穆罕默德·阿里对前来为埃及以农业立国的主张作辩护的 J. 包林说："我们的目的不是牟利，而是培训我们的人民运用科学技术。"埃及的史学家现已开始注意到这位王朝奠基人在这方面的业绩，这个王朝直至 1952 年 7 月 26 日始被推翻。

338 欧洲列强与土耳其于 1840 年 7 月 15 日签订了伦敦条约，因此而有可能抑制埃及建设独立经济的伟大动力，而其条款可以说是宣告奥斯曼帝国的全面衰落。穆罕默德·阿里所建立的垄断就此结束。此后埃及对外国资本的渗透开放，这使埃及经济畸变。依靠单一作物，即棉花的种植，显然对埃及经济起损害作用。经苏伊士地峡开凿的运河，使埃及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并直接导致了 1882 年的军事占领。在这一情况下，一体化意味着埃及已完全受世界价格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迁所摆布，特别是在 1879 年后，被剥夺了君主决策权，埃及陷于孤立。

另一类型的畸变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比如牺牲上埃及而使下埃及得益。诚然，绝大部分可耕地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它供养了大城市。这些城市处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心。随着以土地私有制建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发展，一个由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形成的本地统治阶级逐步兴起。这一统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分配，另一方面，在国家和国际经济之间分配，其中包括对外贸易，特别是棉花的销售。

上层的这种共生现象，可以说，在腹地和城市之间创立起十分强劲的有机联系。人口中的某些集团正从乡村迁往城市。此处，"腹地"一词特指南方，即上埃及。而亚历山大面对欧洲，特别是从赛义德执政时到 19 世纪末，在经济上起着带头作用。开罗亦然，它位于埃及的中心，控制着创造埃及绝大部分财富的三角洲，且是绝大部分人口生息之处。对开罗和亚历山大两地而言，上埃及，特别是在外国金融的压力下，成为真正的腹地。

农业和土地利用

农业本身很自然地在经济改革中处于头等重要的位置。18 世纪末，除清真寺的田产"卧各夫"(wakf)以外，所有土地都掌握在包税人(maltazim)手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征收各自所管的一个村或几个村所欠的税款，并将其转交给中央或省的财政部门。但是，被包税人逐步取得的用益权范围，往往使其家庭得益(达到了"国家所有权只不过是笑话而已"的

339 程度)，这使穆罕默德·阿里梦寐以求的现代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不可能实现。他所能做的就是设法尽量不分散从土地得来的收人。1805 年埃及的两百万费丹(feddān，1 费丹＝0.56 公顷)可耕地分为六大类：边缘地或王室封地(ab 'ādiyya 或 shiflik)约 200,000 费丹，由穆罕默德·阿里分封给其家庭成员和文武官员，这类土地免缴土地税；城堡的马木路克的土地(1811 年)，约 100,000 费丹，这些土地在他们于上埃及被消灭时(1812 年)即转为乌西叶地(awsiya)，即免税地，作为政府给马木路克的补偿，以使他们的家庭不致失去所有财源；谢赫地(或称 masmūh al-mashāyekh wal-masāteb)，占每村可耕地的百分之四，共 154,000 费丹，这些土地赐予乌里玛，他们是伊斯兰教学者，也执行包税人的职务；里兹卡地(rizka)，6000 费丹，不缴税，赠与在埃及供职的外国专家；份地(ather)仍然存在，是给予农民

(fallahin)的；最后是酋长地('erbān)，穆罕默德·阿里希望贝都因部落在这些土地上定居。这一政策和土地的分配，使他这位总督在同时代人看来是一位"既得权利的违反者，繁荣商业的破坏者，一个把别人的东西拿走和剥夺他们生存手段的人"。但是，用沙菲克·古尔巴尔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脱离混乱、贫困和饥饿，争取走向秩序、富裕、财富和力量"的问题。

若从土地所有制的观点来考虑，情况更为复杂。的确，总的趋势是走向秩序，当时的埃及经济，总的来说是国营的和自给自足的。穆罕默德·卡迈勒·摩尔西认为，当时土地是以农民个人的名义登记的，这是把情况夸大了。易卜拉欣·阿梅尔的认识比较正确，既然较大部分的土地实际仍属国家资产，那么这个制度应看做是一种过渡形式："在穆罕默德·阿里之前，埃及的地产制度及其所支持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封建主义'，……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的农耕组织是一种暂时现象，是介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14] 有必要强调，现代埃及特有的大量私有地产的发展，是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开始的。但是，开创它们的理由并不是为了想要创建一个新的地主阶级，而是为了便于管理和征税，以利政府和新的统治阶级。

另有一些事实值得搞清楚。比如穆罕默德·阿里使农作物多样化，特别是从 1821 年以后，在朱梅尔的建议下，加紧了棉花种植，朱梅尔以自己的名字为长绒棉新品种命名。朱梅尔棉以及美国"海岛"型棉，因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垄断给予国家可观的收入。在 1845 年，在 212,473 费丹的土地上生产的棉花达 424,995 坎塔，在 20 年内增产 400%。其中，最高时有 80,000 坎塔送入埃及棉纺厂，余下 344,995 坎塔供出口。专家们一致赞扬阿里总督的农业现代化政策："首先，(他)提供了埃及农业经济从自给经济转变到经济作物经济所必需的资金。"[15] **340**

阿里总督特别在与外国观察者谈话时称自己首先是"一个农民和商人"。他用农民这个字，取义于"法老们"，即"水力社会"的老爷们，埃及历代曾出现过最为扎实和惊人的榜样。他用徭役开挖 36 条水渠和排水沟，最著名的是马赫穆迪亚水渠；封住无法利用的法乌尼耶河，并在尼罗河上修建 15 座桥和 23 座水坝，包括在三角洲的大水坝，福利坝，还有许许多多的修缮工程。这些工程集中在下埃及。但在他的统治行将结束时，1838 年任命的一个委员提出一项灌溉 3,800,000 费丹的宏大计划，而这方面的努力似已松懈。当欧洲列强开始形成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攻势时，穆罕默德·阿里对于将相当大一部分人力和财力投入修建新的水坝表现犹豫。[16]

英国人在占领埃及之后实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宏大计划，这一点决非偶然。在技术上得出的结论认为，与埃及历史上其它主要时代的成就相比，穆罕默德·阿里在灌溉方面的成就似乎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这一时期敏锐的观察家决不会弄错：正如英国驻

---

[14] 易卜拉欣·阿梅尔(Ibrāhim 'Amer)解释东方封建主义与欧洲封建主义的区别为"不存在以土地为形式的私人资产和由国家集中控制的土地所有制"。

[15] H. A. B. 里沃林，1961 年，第 169-170 页。

[16] 克洛特·贝伊博士(Clot Bey)是唯一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外国人，因为当时的人和今日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包林和里沃林——把自己局限于技术上的考虑，而没有解释这个现象。

埃及专员约翰·包林正确剖析的，问题不仅是现代化或城乡规划的问题，而是确保“埃及独立于其它国家”。

1840-1879年这一时代是从带有“东方封建主义”深刻印记的经济向“以农业殖民地型为主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期，后一种经济由国家所控制，它重新发现并发展了穆罕默德·阿里寻求现代化的愿望。



图片13.4　开罗与苏伊士间铁路的第一列火车抵达的情景，1858年12月14日

341　事实上，垄断政策沉重地打击了以前封建制的特权，还把土地等集中在总督手中，从而为土地私有制扫清道路，土地用益权即是第一步。在1846年，一项法令允许拥有用益权的土地抵押。到1854年，立契转让财产用益权，必须在法院进行。赛义德颁布的1858年8月5日的法律，根据各种条件(第25款)从继承权开始，正式作出了土地私有制的规定。1858-1871年，接连推出的若干措施，把里兹卡地、乌西叶地和边缘地与卡拉吉地(征税的田地)等同起来，这就是改革的目的。及至1880年，几乎所有的土地持有者都彻底拥有了他们的土地。这主要是由于在伊斯梅尔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良和基础设施的重大工程，可耕地面积从1840年的3,856,226费丹，增加到1882年的4,758,474费丹。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伊斯梅尔利用外国贷款发展重大工程的效益已有较清楚的了解，其中许多工程对农业地区有影响。这一过程始于阿巴斯，他于1851年准许乔治·斯蒂芬森承包修建连接亚历山大和开罗的第一条铁路。在赛义德统治时期，扎亚特村、坦塔和苏伊士已与首都连接起来。苏伊士的大型干船坞的建设和马赫穆迪亚水渠的疏浚，也是在他的倡议下进行的。因此，埃及再次成为地中海和红海的汇合点。

根据比尔兹利的报告，A.E.克劳奇莱估计，伊斯梅尔对几项重大工程的总开支达342　51,394,000埃镑。在他执政期间，建成112条水渠，长达8400英里以上，这些水渠的开掘与苏伊士运河必需的开掘量相比，其比例为165比100。此外还疏浚了数千英里的水渠并建成430座桥。亚历山大已成为地中海最好的港口，海港两岸建有15座灯塔，1500公里铁路，5200公里电报线路(苏丹境内还有2000公里)，以及64座榨糖厂。在赛义德执政时的混乱

之后，他还重新建立了邮政业务。1874 年，埃及签署了伯尔尼第一届国际邮政大会通过的协议。此后还开展了许多市政工程，如设置下水道，改进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街道，对几个区供应淡水和照明，总体上按巴黎模式对开罗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些工程与重大的基础建设工程相辅相成。

在农村地区作为一个阶级出现的最早的社会集团是大地主。在第一个阶段—— 从 1840 年 3 月 23 日至 1866 年 12 月 24 日 ——“乌赫达”（免税地，最初是以用益权形式给予，逐渐变成既成事实的财产）持有权仅限于穆罕默德·阿里的家族和显贵阶层。当时估计共达 1,200,000 费丹土地，四分之一为总督家族所有，其余是后来大地产的基础：封给萨利姆·萨利赫达帕夏的有巴利那纳和法德哈拉两地的村庄；沙瓦利比家族于 19 世纪之末，在卡利尤布（约 7000 费丹中）拥有 4000 费丹土地；萨耶德·阿巴扎帕夏得到沙基亚 20 个村庄的封地，1876 年他去世时，仍拥有其中的 15 个村，总共 6000 费丹；巴德拉维帕夏获得萨曼努德约 1400 费丹土地。向完全的私有制过渡并非蓄意谋求的，看来是穆罕默德·阿里的继承者认可了这一既成事实，以换取在这些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交付税款。第二个地主集团分配到休闲地（ab 'adiyya）。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末期，休闲地面积约在 750,000 至 1 百万费丹之间，绝大部分位于西部省和贝哈拉省，穆罕默德·谢里夫帕夏，达拉马利帕夏，全体省长或部长都是主要受惠者。G. 贝尔指出，然而，因赋税沉重，主要由村庄组成的王室封地（jiflik）已被废弃，这些土地转让给了王室，从而形成大地产的主要组成部分。赫迪夫家族在 1878 年拥有一百万费丹地产，其中很大部分属于王室“封地”，大都是伊斯梅尔在 1867-1876 年间分封赏赐的。

赛义德于 1854 年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1 日颁布了两项法令，把全部土地分为两大类，乌舒里亚地（ushūriyya，包括上述三类土地以及乌西叶地，其面积微不足道）和卡拉吉地（kharādjiyya），即大农庄范围以外的土地。事实上，Y. 阿具和克罗默勋爵认为乌舒里亚地就是大片的土地，其面积从 1863 年的 636,177 费丹增加到 1891 年的 1,423,987 费丹，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从 14.5%增加到 28.8%，而卡拉吉地的面积则在 3,759,125 和 3,543,529 费丹之间波动，即在同一时期内从 85.5%降至 71.2%。 343

现有最早的土地占有情况的统计表明，在 1894 年 11,900 个大地主（拥有 50 费丹土地以上者）拥有 2,243,000 费丹的土地，占全部农田的 44%。1878 年赫迪夫家族拥有一百万费丹土地，而 1844 年仅有 664,000 费丹土地；伊斯梅尔拨出了许多新开垦的土地，将其分为达依拉-萨尼亚地（Dā'ira al-Saniyya，1880 年为 503,699 费丹）和属国家资产的土地（1878 年为 425,729 费丹）。如我们所知，国有土地在 1878 年必须出售，以偿还罗思柴尔德贷款，但赫迪夫在还债期之前，已采取预防措施，将大部分国有土地分给他的亲族；之后，还采取一些措施，使这个集团能赎回一些国家资产。因此：

> 尽管埃及君主作为国家土地所有者和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角色，在伊斯梅尔执政的末年已告结束……但这个家族中执政的成员（赫迪夫、素丹或国王）继续且几乎总是最大的地主。然而，在理论上——并且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他已不再能自行支配大量国土储备以增加他的个人资产……同样，在总体上，王室由于其宗教田地，以及其大量财富，使它能购置更多的田地，自19世纪以来，

在埃及土地所有者中一直保持着突出地位。

这些大地主当然来自政权的高层显贵、官吏、乡村的一些显要人物，某些贝都因酋长、伊斯兰教学者乌里玛和科普特人。更广泛的土地占有情况见表 13.1。

已收集到的关于乡村“乌姆达”(‘umdas)和谢赫的社会经济情况的资料，也表露得很清楚。垄断时代的结束，以及在赛义德统治下土地私有制的兴起，明显地缩小了农村显贵这一类人的规模。他们以前是包税人的管家，而且一直是中央政权对农民的代表。但是，伊斯梅尔加强了他们的权力。《泰晤士报》记者麦坎齐·华莱士曾写道，“这个官职落入最大的地主之手”；阿里·穆巴拉克帕夏的百科全书确认了这一点，并提到了这些乌姆达的姓氏(谢里夫，哈华里，盖耶尔，阿卜杜勒·哈克，希尔，乌卡利，西亚赫，瓦基勒，伊特里比，希里伊，等等)。他们是埃及的富农，曾任英国殖民总督的克罗默对于利用他们作为农村中的权力基础表现犹豫。1894 年人口调查时，他们在农业地区的份量相当大，就是由于在伊斯梅尔统治下得益的结果：分配土地，贷款给贫苦农民，出租自己的土地，特别是与城市进行商业交易。由于农业区较富裕的农民人数增加了，因此土地不足 3 费丹——维持生活所需的数量——的农民家庭和其它无地“无职业”的人数也增加了。这个贫困化进程在殖民地时期甚至更快，阿巴斯一世支持贝都因部落反对谢赫和农民可能结成的联盟，赛义德则谋求减少乡村显贵的政治权力，而伊斯梅尔却与此相反，倚重他们；1866 年第一届咨询议会的议员，大都是从谢赫中选出的；A.R. 拉费估计，1866、1870 和 1876 年的 75 名议员中，乌姆达占 58 名至 64 名；伊斯梅尔任命很多人担任穆迪尔(省长)一职，以反对土耳其-阿尔巴尼亚贵族。很自然，这些人支持在 1882 年的阿拉比革命，并把农民团结到民族事业中。

表 13.1　埃及土地占有状况，1894 年和 1914 年

年份	大地主(50 费丹以上)			
	人数	%	面积	%
1894	11,900	1.3	2,243,500	44
1914	12,480	0.8	2,396,940	43.9
	一般地主(50-10 费丹)			
1894	141,070	15.4	1,756,100	34.3
1914	132,600	8.5	1,638,000	30
	小地主(5 费丹以下)			
1894	761,300	83.3	1,113,000	21.7
1914	1,414,920	91.7	1,425,060	26.1

注：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最显著的特点看来确实是地产逐渐分成小块。其原因很多：伊斯兰继承法的影响，人口剧增，法律(1912 年 12 月)规定强占 5 费丹土地为非法。事实上，小土地拥有是完全相对而言的，这是占有的大土地分成小块的结果，也是中等规模的土地分成小块的结果。

文化发展

从公认的一开始就未成功的文化移入，到民族文化真正哲理的兴起，文化的发展在其

自身的权利方面应认为是一大成就。纵观埃及 7000 年的历史，国家又一次承担了初步规划和培训官的责任，并因此提供了推动力。给人印象深刻的谢赫里法-阿·塔赫塔维（1801-1873 年）是这一进程的中心人物。他使得“中世纪”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其它国家宣告结束。

他宣扬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其特点是重新获得民族同一性，这是在“民族主义”阶段中各种社会与文明的主要目的。这种复兴只有在民族范围内始能实现，由于激进思想的帮助和批判地对待民族遗产和外国思想，从而使“祖国能够成为我们集体幸福的场所，这样的场所我们将通过自由、思想和工厂而取得”。他的杰作《埃及心灵走向现代生活方式之欢乐的道路》发表于 1869 年，它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想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345

> 劳动对一切事物赋予价值，除此之外一切事物均不存在……因此，劳动在获得财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劳动，人类利用兽类的能力和他们自发的勤奋，并将之引入有益于祖国各成员的渠道……
>
> 信仰者在对其他信仰者的行为中必须展示出一切美德，假若这种相互责任和爱国的兄弟情谊——且不提宗教的情谊——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那么这种美德也是祖国所有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凡团结在同一祖国内的一切人员都有道义上的责任在一起劳动，以便改善他们的祖国的状况，使祖国更加荣耀、伟大、富足和繁荣。这种富足只有在社会关系稳定，劳动符合公众利益时才能创造。这种劳动应由祖国的成员平均分担，从而到时人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为祖国感到骄傲。当不公正、怯懦、谎言和轻视消失之时，正面的价值和福祉将洋溢人间，他们将进入一个集体幸福的纪元……[17]

最早派往欧洲（主要是法国，接着是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德意志各邦，后来是美国）培训的学生，自己还不能为全国的教育制度提供一个框架，也不能满足国家的所有要求。但是事后认识到，若与英国统治者们在同一领域内所采取的措施相比较，这个时期的成就似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当时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型式：一是以埃及的遗产为基础的传统的和古典式的教育，另一种是现代教育，以满足这个军事国家和不断发展中的文化复兴的需要。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的先进的学校网络，在同时代非西方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后来，在伊斯梅尔统治时，由于设立了一个完全成熟的民族教育制度，这个学校网得到扩大和加强。这主要是由于阿里·穆巴拉克的努力，而且是在欧美教会在帝国主义渗透的掩护下扎根的空隙之后发生的，尽管科普特教会顽强反对。作为这一切倡议和思想的结果，在半个世纪之内，埃及已可以为具备现代和民族的两种特点的教育体系而自豪，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所具有高级学术标准的大学，一个多样化的科学机构网络和一个基于现代人文、科学和理性主义价值观的教育课程。正如所预料的，正是在最后这个领域遇到了最严重的障碍，由此再一次证明改变机构要比改变态度容易些。 346

教会学校连同新的精英集团跻身于显赫地位，以及特别是城市中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导致了一个新闻出版运动。这个运动从创办由国家鼓励和管理的官方报刊《埃及记事》（1828

[17] R.R. 塔赫塔维，1869 年。

年)开始，但它也确实为私人的主动行动留有余地——《金字塔报》于1876年创办。

事实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各行省中，独有埃及为遭受帝国政府迫害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作家和报刊的时事评论者提供庇护所。这里确实是一切避难者的最好去处，不仅是东方的和伊斯兰的，而且密切地卷入现代欧洲运动，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聚会并从事创作的地方，是唯一的具有先进的物质、技术和经济基础设施的东方国家。自穆罕默德·阿里执政以来，埃及作出了很大努力，争取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结束400年的衰落并建设由有效而强大的军队为后盾的先进的经济。伊斯梅尔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努力，致使思想蓬勃发展，社会和政治运动生气勃勃。其结果，阿拉伯文报刊(埃及的和叙利亚-黎巴嫩的，官方的和私人的)在一个激发民族感情的环境中繁荣起来，有利于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文化更新。这是埃及对教育、新闻、出版的发展，以及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启蒙的主要贡献。这个时期后来被看做是酝酿民族革命和复兴的时代。

历史的方法论迅速地趋向科学的处理方法。它的应用范围伸展到埃及以外，包括席卷世界的大事，特别是现代世界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尤其是代表最有直接威胁的欧洲。在概念上，从“乌玛”(umma，国民)转变到“瓦坦”(watan，祖国)，从“信仰者社团”过渡到严格意义上的“祖国”，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埃及所作的政治努力是要脱离土耳其，成为自治国。

独立的观念并不是沿着与祖国的概念同一条路线演变出来的。在或多或少以自我为中347心的自治与争取真正独立的愿望和帝国雄心之间左右摆动，在一种体制的框架内，以及在欧洲列强之间竞相瓜分世界的情况下，形成了确定埃及民族性格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进行分析所依据的观念和思想基础方面的缺陷，虽然实实在在，但仍是次要的，困难在于别处。提出和回避一种直接辩证的双方对抗或多或少是不可能的，必须运用三种或更多的战略，其主人公总是埃及、法国和英国，也不要忘记土耳其。因此，埃及必须在自身范围内寻求力量的泉源和自我合法化的正当理由。

以改革为名仿效西方，很快被视为表面追求，是可能性而不是可行性的反映。它影响着服装、城市规划、歌剧音乐和军乐曲调，特别是戏剧，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个人日常生活和私生活方面被认为不容侵犯。因此才有科普特族长基罗洛斯和塔赫塔维的创议，为女童提供教育和职业的规划。负有促进现代埃及民族复兴使命的人们面临改组家庭生活的任务，而原始的模式仍是信任和爱的港湾，整个民族在其中永存。然而，各种沙龙以及要求个人生活革新的愿望，也无法掩饰重振国家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努力。它们也不可能淹没这个国家真正的呼声，哪怕只是瞬间，这种呼声可通过谚语、格言和风俗得到理解，它把仿效看做是剥夺了几千年历史。只要每个埃及人对远古的土地怀有深情，那么这种剥夺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众的敏感性开始以强调需要可行的中间形态的形式和公式表达自己。

地缘政治与买办

穆罕默德·阿里的国家的瓦解始于1840年的伦敦条约签署之时，这是在当时的“买办”支持下欧洲大企业侵入埃及的前奏。对于认为阿巴斯一世的统治面对欧洲威胁表现出

一种“沉默与恐怖”的看法，穆罕默德·萨布里的答复是：

> 必须承认，总督的警惕政策树立了抵制欧洲人大量涌入埃及的屏障。而且，主要由于限制国内贸易的规章，这个政策也防止了欧洲人，绝大部分是希腊人进入内地，使亚历山大和开罗两个城市向农业地区扩展，并与愚昧的农民做生意。这样，阿巴斯便能抑制，但不是彻底消灭后来在他的继承者执政的“领事时代”迅速传播的邪恶。⑱

1854 年 11 月 30 日，赛义德(1854-1863 年)给予他儿时的朋友费迪南·德·莱塞普修 **348** 建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并由 1855 年 5 月 19 日奥斯曼帝国的敕令正式公布，这标志着欧洲大公司侵入埃及的开端。拿破仑三世本人便是使“苏伊士运河研究会”转变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管理理事会组织”的幕后推动者。前一个组织由代表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三个小组，每组 10 人组成，成立于 1846 年 11 月 27 日；后者成立于 1854 年 11 月 30 日。正如拿破仑对昂方坦所说，这是“因为工商界人士的组织会有助于政治家进行外交谈判。”昂方坦不久被排除出这个项目，以便让莱塞普独自承担。莱塞普不断利用他与赛义德的友情，勒索各种特许权。他借用外国贷款越来越多。据普遍公认的估计，当赛义德于 1863 年 1 月 18 日逝世时，埃及的债务达 3.67 亿法郎(14,313,000 埃镑)，而 M.F. 利希塔估计的数字为 16,308,075 埃镑。不仅如此，赛义德还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售瓦迪地产 10,000 公顷。这片地产包括通往埃及的要冲基比尔山，在尼罗河与提姆萨湖之间有四条内陆运河，三座房屋和附属建筑物，以及在布拉克占地 10,000 平方米的仓库。

1863 年 1 月 30 日伊斯梅尔在开罗城堡向领事团讲话时声称他意欲废除徭役。稍后他说：“没有谁比我更赞成开凿运河，但我要运河属于埃及，而不是埃及属于运河。”与此同时，他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代表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国外墨西哥、克里特岛和非洲执行外交使命和军事行动，并要在非洲建立一个埃及帝国，这些都使埃及增加了巨额外债。债务增长的模式很明显：国家的债务陷得越深，贷款的条件就越苛刻。1862-1873 年期间，已签约的贷款共八笔，包括赛义德的在内。实际上，1868 年的贷款并不能偿还流动债务，因为被用来支付经常费用了，包括运河开掘仪式。于是，伊斯梅尔·萨迪克设计了一项称做“穆卡巴拉法”即“补偿法”的法令(1871 年)：规定土地持有者付清相当于每年土地税六倍的总额，其产权可得到确认，并可获得永久性减税 50%的权利。这项法律从 1871 年至 1877 年实施。

1874 年土耳其破产临头，限制了伊斯梅尔运筹的余地。为了应付 1875 年 12 月 1 日的最后限期，他首先与法国债权人，接着又与英国债权人谈判出售运河的 177,642 股股份。11 月 25 日，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在罗思柴尔德的支持下，购得全部谈判的股份，即以区区 3,976,580英镑购入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的全部股份。

外国侨民从 1836 年的 3000 人增加到 1897 年的 112,568 人，一开始充当先头部队， **349** 1882 年以后充当占领军的辅助人员。据 M. 萨布里的说法，这批人主要由各种各样的违法者、造假货的、惯犯、巨富和冒险家组成。据 D.S. 兰德斯的说法，他们包括欧洲和地中海

⑱ M. 萨布里，1933 年。

世界中最好和最坏的人："银行家与高利贷者，商贾与窃贼，稳重的英国经纪人和机灵的黎凡特小贩，半岛和东方办公室里规矩的职员；亚历山大领事广场上的花脸小丑，献身于研究阿比多斯和卡纳克神庙的学者；开罗街头的杀手和骗子。"[19]

批发业和进出口贸易几乎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主要是英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1908 年，在数百名进口商中，仅六、七人是埃及人。零售和小批发业也由外国人控制，大多数是希腊人、黎凡特人和犹太人。当地放债者和银行大都是由犹太人，"新的贪婪者"——卡塔伊、梅纳奇、苏亚雷斯、瑟索克、阿达、哈雷里、萨尔瓦戈、艾希翁、西纳迪诺、伊斯马隆等与欧洲银行联盟和协作经营的。他们与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叙利亚人，后来还与埃及人一道经营。工匠、零售商人和手艺人是地中海沿岸居民和黎凡特人。英国臣民，其中半数来自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其它殖民地，他们不是士兵便是公务员和棉花商。1897 年，本地劳动人口中有 64%从事农业，而外籍人口中只有 0.7%在这个部门工作。与此相反，外籍劳动人口中有 50%从事工商业活动，而埃及人只有 17%。

及至 1919 年，1488 名拥有 50 费丹以上的外籍土地所有者，共计占地 583,463 费丹，即每人平均 400 费丹，而埃及的最大土地所有者每人平均仅 150 费丹。外国人每人平均薪金为 85 埃镑，而埃及人为 9.5 埃镑，更不用说在国内活跃的外国公司和在国外的借款了。1822 年设立了混合法庭，以期消灭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混乱。

埃及革命：1881-1882 年

整个 19 世纪，特别的是 1840 年战略停顿之后，在萌芽的帝国主义的束缚下，埃及资产阶级上升到了显赫的地位。伴随而来的是真正的民族文化的建立，如我们所看到的，其总建筑师是塔赫塔维和 A. 穆巴拉克。与此同时创建了一支军队，它成为非洲最强大的军队，并由综合技术人员和科学家领导，他们都是过去的长期战略大师。

350

在伊斯梅尔执政的最后几年，一个受赫迪夫本人鼓励的集团兴起。这就是"希勒万集团"(谢里夫，伊斯梅尔·拉杰卜，乌马尔·卢特菲，苏尔坦帕夏，艾哈迈德·阿拉比上校，阿卜杜勒·希勒米和阿里·法赫米，马赫茂德·萨米·巴鲁迪，苏莱曼·阿巴扎，哈桑·希里伊，马赫茂德·法赫米帕夏)，它像埃及军队中的军官团秘密会议一样，在 1876 年开始产生影响。他们的活动导致 60 名国会议员在高级宗教领袖的支持下，于 1879 年 4 月 2 日向议会提出一个"民族纲领"。这些会议还导致 1879 年 11 月 4 日由民族党签署了第一个宣言，以及 1881 年 12 月 18 日由穆罕默德·阿卜杜和 W.S. 布伦特联合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当时，这些活动主要被看做是抗议和宪政运动。但民族党最后一着获得了军队的支持。该党逐渐与国家最有影响的集团一起工作。它承认军队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把宗教，即伊斯兰教作为政治生活的框架。

携手联合的民族集团还面临着欧洲列强的反对，这回由英国牵头，得到法国的有力支持。欧洲列强借口 1882 年 6 月 11 日的凶恶阴谋造成亚历山大暴乱和多人死亡，于 6 月 23

[19] D.S. 兰德斯(Landes)，1958 年。



插图 13.5 炮轰亚历山大，1882年7月

日在君士坦丁堡开会，再次讨论“埃及问题”。它们决定进行军事干预。西摩海军上将统率的英国舰队于1882年7月11日炮轰亚历山大，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7月12日亚历山大燃起大火。这个行动是军事入侵的前奏，其目的是摧毁民族运动的矛头，即军队。确实，1881年9月9日，军队中积极的三个旅的司令官，亲自率领全体士兵，在阿比丁宫向赫迪夫陶菲克递交了代表整个国家的民族党的要求。英国的入侵导致埃及军队的毁灭，主要是1882年9月13日卡比尔山一役，穆罕默德·奥贝德准将身先士卒在战役中被击毙，成为这次失败的革命未予掩埋的英雄。以穆罕默德·苏尔坦帕夏为中心的许多帕夏投奔占领军。艾哈迈德·阿拉比和他的同伴被开除军籍，流放到锡兰。占领的长夜已经开始，虽然此后数月，事实上几乎整整一年，农民继续采取零星的小组行动，为的是使阿拉比和他的同伴们的传奇活动继续流传。

从伊斯梅尔被废黜(1879年)到英国军事占领这一期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埃及民族运动及其思想意识的极度和加速激进化。民族复兴的问题可以察觉到，且有时被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对欧洲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入侵的抵抗，主宰着民族意识，并决定了它的主题和表达方式。随着军事占领开始的这一时期，到1954年占领军撤离正式结束，实际上是直到1956年收复苏伊士时才结束。 351

要评价这个失败的革命时期的成就，首先，应考虑伊斯兰思想的复苏。1840年的逆转和占领不可能对人民所有的集团没有影响，这些集团的觉悟被伊斯兰教提高了。在社会各集团中工作的一批思想家，与经济的传统部门和传统机构保持联系，他们感到历史处于边际化地位的无人道性，他们此种感觉比该时期专心于现代主义经济部门的人更为敏锐。他们的理论家，其中首推穆罕默德·阿卜杜，在国内最有影响的民族和文化传统中心，亦即伊斯兰中心，勤奋地探索出现这种形势的理由并了解这种形势的要决。他们认为，19世纪

的宗教和思想意识已不复为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宗教和思想意识了。所留下来的只是歪曲的传统和几个世纪对衰落和依附的漫长的注释：伊斯兰已不再是往日的伊斯兰了。因此，民族衰落的根源可在那种歪曲中找到，对一个伊斯兰国家来说，要创造有生命力的未来，关键在于回归到原教旨原则中去。

352　在已提出的改革中，留有理性，或更确切地说，常识的地位，但这必须包含在宗教框架之内。这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态度，既允许与现代世界相互影响，又排除理论化。正如历史循环论，假定伊斯兰教过去的最高权力就是原教旨原则，那末，社会辩证法，不管是以什么形式，都会以乌玛(国民)团结的名义被排除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似已提供了神学的基本原则和应用于民族复兴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基本特征。

激进派则要到别处去找。他们扎根于同样的土壤，但确实只是在某些部门。伊斯兰滋养了两种倾向，爱资哈尔大清真寺经常接受和塑造双方的人，但这只是在初创时期。那时，塔赫塔维只是一名发言人，而不是领袖。民族运动的先锋——“希勒万集团”，声称阿拉比是其领袖——受自由、独立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原则所指导。尽管有临时性革命的爆发，这种谨慎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是很能被接受的。各阶级的先锋队在社会上正上升到显赫地位，然而它们或是结构不良，或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很自然地披上了折衷思想的甲胄，因为它们尚无能力对一切合成体进行必要的有批判性的识别。因此，暂时宁愿要表面的折衷主义，也不要分析，宁愿要革命的一致性，也不要按照原则和阶级作出的明确定义。此时，尽管有塔赫塔维，自由派现代主义思想已成为一个模棱两可的口号。

在那阴沉的时代，在被占领的漫漫长夜里，阿卜杜勒·纳迪姆(1843-1896年)脱颖而出，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思想与行动，辞令与实效，古典主义与现代性，所有一切都集中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主要贡献，基本上是把直到那时还是各种上流人士特权的民族主义原则和思想，反复灌输给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下层群众。阿卜杜勒·纳迪姆是新闻记者、演说家、政治组织者、剧作家、史学家、理论家和阿拉伯方言的杰出实践者，是革命的民粹主义的真正创始人。这种思想，通过他先后为“Al-Tankīt wa'l-Tabkīt”和“Al-Tā'ef”报撰写的栏目和“伊斯兰慈善会”的活动，唤起了公众舆论。正如他所声称：“我宣告要爱士兵，并有必要依靠他们的支持。我呼吁群众与他们联合……”在阿拉比领导的革命期间，他在1882年7月20日的呼吁书中写道：

> 埃及的居民们！英国人说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堡垒，谁进入那个堡垒谁就获得了穆斯林国家的控制权。起来保卫你们的祖国。站稳立场，保卫穆斯林国家的这个堡垒。你们要以阿拉的名义进行一场神圣和正义的战争，为的是维护这个伟大的宗教，赶走敌人。这个敌人要以其步兵和骑兵，穿越你们的国家，在赫迪夫的支持下，侵入上帝的国家，侵入神圣的“克尔白”(Ka'ba)，赫迪夫已出卖国家以讨好英国人，要送掉伊斯兰国土以换取英国人给予他的保护！

353

在革命失败后，他的最后一份报纸“Al-Ustā dh”自认为是民族思想激进化的熔炉，是爱国复兴的跳板，是漫漫长夜的记录员。这份报纸后来在1892年导致以民族党为核心的民族运动的重新崛起。该报称：

> 总之，最猛烈的治疗法是用火烧灼。形势已到危急关头。如果我们能修补这

块被撕破的布，如果我们能彼此依存，如果埃及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能以一个声音为东方说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欧洲说："我们就是我们，你们就是你们"。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彼此矛盾，不断投降，转向一个又一个外来者求助，那么欧洲将有权把我们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一直赶到山顶。而且在把我们遗弃给野兽之后，还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像我们的话，那你们就该像我们那样做"。

地下活动历时九年，这在埃及民族运动史上尚属首次，是一次创举，使纳迪姆成为农民群众的发言人。当时造反的农民中少数幸存者之一哈吉·奥斯曼·苏伊卜在84年之后于1966年发表的珍贵的回忆录中写道：

这个国家没有保持沉默。有许多次起义都被素丹、国王和英国人残暴地镇压了。多少年轻人就这样白白地丧生……！加麦尔来了。他为阿拉比复仇，他为农民复仇，他把素丹和英国人赶走。但有一点使我不高兴，即阿拉比的照片。他的双手在哪里？他高大的身躯在哪里？他的剑又在哪里？

在每次占领所带来的漫漫长夜里，在退位和妥协的凄凉气氛中，面对向国家袭来的恐怖，困惑的纳迪姆宣布，群众可以掌握革命，革命为未来布好场景。

埃及的影响："大河彼岸"

354

在作最后评估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解释在危机期间出现的这次复兴；然后，这是否是抹掉对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个辉煌的突破，是中断使阿拉伯世界和非洲至今犹以惋惜之情回忆的一个进程？

首先，整个进程自始至终存在着地缘因素的巨大分量，这证明地缘因素比内部因素更强大，虽然后者也起根本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用两个圆圈代表"社会辩证"的基质，一个代表外源基质的外圆和一个代表内源基质的内圆，那么，看来对于埃及，那个受折磨的国家是东方和西方以及非、亚、欧三大洲的汇合处，这外圆，地缘政治之圆确实控制着整个过程。

此外，对埃及复兴的第一阶段的打击，从地中海大海战和1840年的伦敦条约到1882年的军事占领，资本和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独立和建国运动的逐步削弱，使埃及没有什么时间——这把我们带到了"社会辩证"的内源圈中心——来发展一个可以抵御外国侵入的条理清楚的民族思想体系，并使国家的总体政策有一个现实的和恰当的结构。埃及思想的主要推进力，一方面是自由派现代主义，另一方面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股力量在20世纪中叶之前并未力求联合。19世纪是一个有多项计划、令人不满的妥协与不可能的结合共存的世纪。所以，国家有渗透性，因文化传入而产生的现代主义很容易与精心构思的民族现代性混淆，而且"西方浪潮"能容易孤立埃及民族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构成因素和主要的形成部分。

埃及复兴第一阶段的反响使之在国界之外也感受得到，苏丹、埃塞俄比亚、非洲之角和中非洲的大湖地区要学习复兴的埃及与帝国主义势力搏斗的经验。在马格里布地区，政

治上的伊斯兰的复兴和武装反抗殖民主义入侵的伟大的人民运动，不断地转化为对埃及各方面努力的鼓舞。柏林条约纳入了1884-1885年瓜分非洲的内容。这个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旨在使支解非洲大陆合理化和合法化，这个大陆的觉醒威胁着那个时代的"世界秩序"，即列强的霸权主义秩序。

355 再讲远一些，穆罕默德·阿里的业绩对1868年明治天皇为促进日本维新所设立的专家小组是个客观的教训。日本的地缘政治形势恰恰是相反的。由于四周的海域和大陆板块的形势，在海军准将佩里闯进之前一直是安全的，日本仍然能大力控制其民族和文化的凝聚力，因而能在没有地缘政治邪恶的控制下，开始进行现代化的任务——直到广岛和长崎事件发生。而在转入20世纪之时，日本在对马岛战胜俄国人(1905年)，这对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埃及的穆斯塔法·卡米勒和穆罕默德·法里德的民族党的影响，是值得牢记的。与此同时，位于阿拉伯世界和日本之间的土耳其的立宪改革，受坦志麦特(改革派)的影响，是直接和明确地根据埃及进行的改革实施的：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奋战，后来由(Ittihād wa Taraqqī)和恩维尔帕夏以及穆斯塔法·卡米勒(土耳其之父)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所接替并使之合理化。

这样，我们对埃及的民族复兴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它处于危机状况中，但客观上却成为从1805年直至1955年万隆会议，非洲、亚洲和中东恢复活力的促进因素。

(计德容译)

14 19世纪的苏丹

H. A. 易卜拉欣
B. A. 奥戈特(南部苏丹)

阿拉伯人早在9世纪即开始移入东部苏丹——大致为除南部地区以外的当今苏丹，14世纪达到高峰。阿拉伯人逐步采取和平手段向苏丹渗透，在其基督教和传统守旧的社会中传播阿拉伯文化、宗教和影响。[1]及至16世纪初，东部苏丹主要由两个穆斯林素丹王国——芬吉和富尔统治。富尔的素丹是著名的苏丹家族凯拉的后裔，统治达尔福尔直至1874年，而在森纳尔的素丹则于1821年向土耳其统治者投降。[2] 芬吉素丹国历经王朝之争，尤其是在其创始人，芬吉与阿卜杜拉布之间的争夺，其后是自18世纪60年代起控制其命运的哈马奇各敌对集团之间的争夺。这一切的结局是芬吉素丹国终于在19世纪初分裂为几个弱小而互相敌对的酋长国。[3] 由此引起的混乱和地方战争给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造成机会，他急不可待地在1820-1821年中将苏丹纳入自己的版图。于是开始了第一个殖民时代，统治苏丹60多年。 356

苏丹历史上这一殖民时期常称为“埃及时代”。但使用此词应谨慎。苏丹并非被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埃及人征服和统治，而是被一个“自中世纪起其成员曾统治埃及的说土耳其语的集团”所征服和统治。真正的埃及人——下尼罗河人——在埃及或在被征服的苏丹从未被授予高级军政职位，而只被授予政府和军队中的低级职位，鲜有例外。因此，苏丹人以及欧洲人称该国统治者为土耳其人，“因为说苏丹属于埃及，仅就其曾为奥斯曼帝国埃及行省-属地而言”。[4] 本章使用“土耳其人”，或另一通用但别扭的新词“土耳其-埃及人”。 358

土耳其对苏丹的统治(1821-1885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征服的战略与北部苏丹人民的反响；1840-1880年对帝国南征的反抗；以及在苏丹现代化过程中新政权的作用。

征服的战略与北部苏丹人民的反响

历史学家对土耳其人侵苏丹的战略一向存有争议。据有些埃及历史学家称，穆罕默德·阿里实行他们所谓的“开放”苏丹的政策，其实主要是为了苏丹和苏丹人民的福利。他们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痛感芬吉素丹国居民情况的恶化，决定实行武力干预，把他们从艰

---

[1] 这一主题的详细研究，见Y.F.哈桑(Hasan)，1967年。
[2] P.M.霍尔特(Holt)，1973年，第67页。
[3] 详见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第5卷，第7章。
[4] R.希尔(Hill)，1966年，第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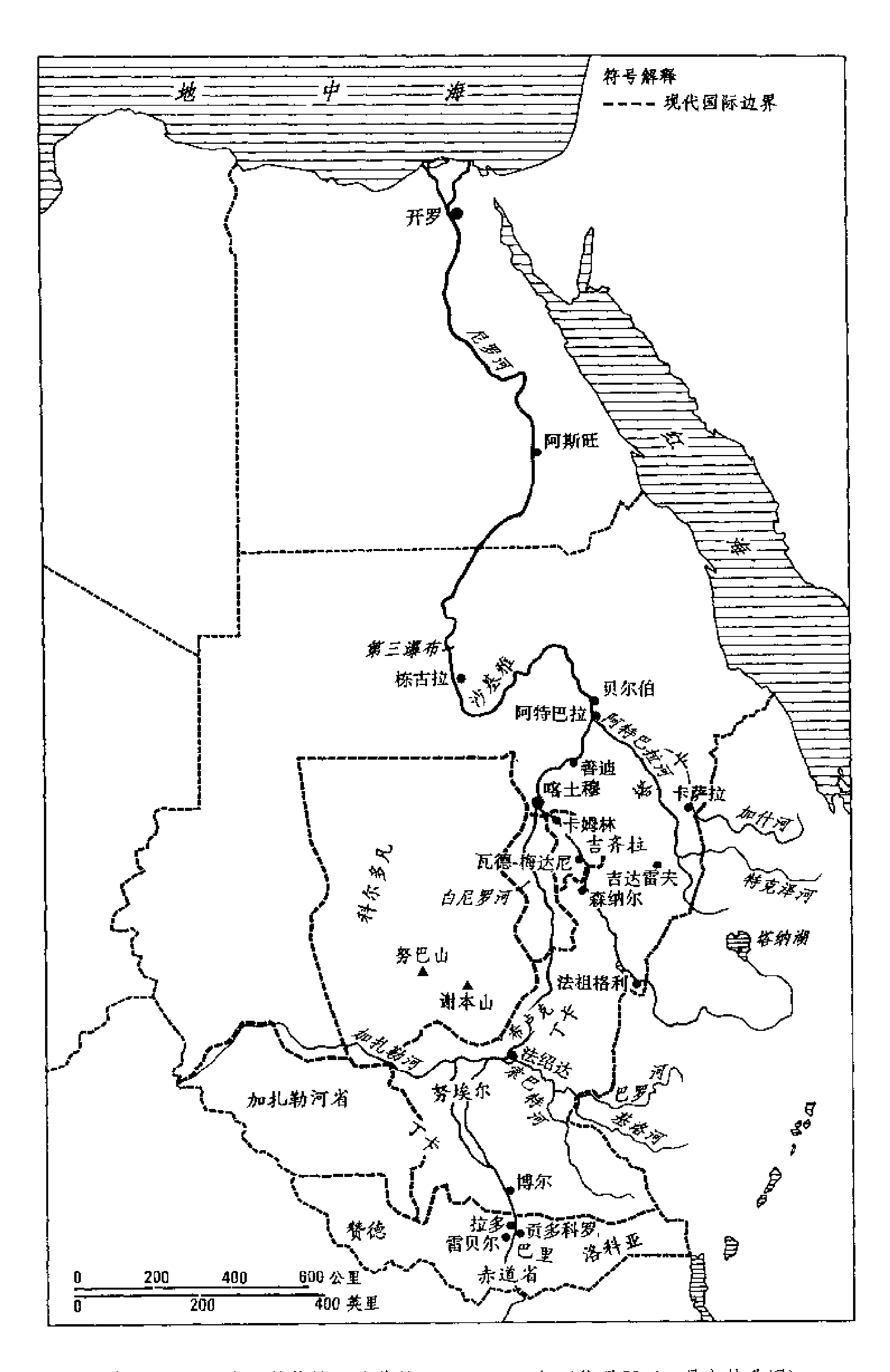


插图 14.1 土耳其统治下的苏丹，1820-1881 年（仿照 H. A. 易卜拉欣图）

难困苦中拯救出来，从而使苏丹人民与他们的埃及兄弟团结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为两国人民谋“福利”。[5] 有些埃及历史学家甚至宣称，穆罕默德·阿里是“应苏丹本国人民的请求”[6] 才进行这次入侵的，一些贵族作为人民的代表赴开罗见他，并要求他做这件事。一些苏丹显贵确曾到埃及见他，但有理由认为他们纯粹出于私人动机，并与他们同芬吉素丹国统治者的一些王朝的抗衡有关。因此，不应认为他们是代表了苏丹人民。

著名的埃及历史学家，已故的穆罕默德·福阿德·舒克里声称，穆罕默德·阿里的征服牢固地确立了埃及统治苏丹的“合法的和确曾存在的权利”。根据舒克里的观点，1820年芬吉素丹国的瓦解及其素丹的合法权力的消失，使苏丹成为“一片没有君主的国土”[7]——一片“无人的土地”。因此，一旦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了该地区，并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埃及按其征服的权利在1821年以后就自动地成为苏丹无可争辩的君主。[8] 舒克里说，穆罕默德·阿里于1838-1839年访问苏丹的根本原因之一，[9] 就是宣传此理论，他称之为“真空论”，并据此以“维护尼罗河流域的团结”，即将其两部分——埃及和苏丹，维持在一个政治体制中。[10]

359

这种认为埃及对苏丹拥有主权的论断，支配着埃及和苏丹的政治，直至20世纪50年代。舒克里似乎出于政治动机而支持主张尼罗河流域统一的人，反对其对立面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苏丹。还应补充一点：森纳尔素丹至1820年虽已成为傀儡，但直到那时他依然是国家合法的君主。况且，埃及不能以征服的权利对苏丹进行统治，因为入侵是以奥斯曼素丹的名义进行的，而埃及至少到1914年仍为奥斯曼的一个行省。无论如何，芬吉素丹国不能等同于全苏丹。

埃及入侵动机的“福利论”在近期苏丹学者的研究中也受到质疑。[11] 这些研究，依据大量广泛的档案材料，表明穆罕默德·阿里的主要目标是利用苏丹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实现他在埃及和国外雄心勃勃的图谋。

穆罕默德·阿里急欲巩固其在埃及的独立，不惜损害奥斯曼皇帝的利益而建立一个帝国，就在征服苏丹之前，已着手组建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虽然他起初因许多理由决定不征募埃及农民(fallāḥin)，[12] 但他希望在他的“新组织”(niẓam-i-jedid)中招募两三万苏丹籍非洲人。他在埃及的许多农工企业中也需要更多的人。所以穆罕默德·阿里不断地要求他在苏丹的司令官加紧掠夺奴隶的武装袭击(ghazuas)，并把尽可能多的非洲人遣送到在阿斯旺为他们特设的营地。他在一份指示中强调，这是承受“征服的困难和开支”的最重要的理由，在另一份指示中他把这一野蛮行径说成是他的“最大愿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13]

---

[5] M.F.舒克里(Shukri)，1948年，第18页。

[6] M.A.贾卜里(al-Jabri)，无出版日期，第18页。

[7] M.F.舒克里，1946年，第18页。

[8] 同上，第38-39页。

[9] 对这次出访的研究，见H.A.易卜拉欣(Ibrāhīm)，1980年a，1980年b。

[10] M.F.舒克里，1958年，第13页。

[11] 例如，见H.A.易卜拉欣，1973年；及B.K.胡梅达(Humayda)，1973年。

[12] 由于是外来人，穆罕默德·阿里或许感到一支民族军队会危及他在埃及的地位。其它理由可能是农民不愿服兵役，以及穆罕默德·阿里希望留下他们从事埃及的农业开发。

[13] 引自H.A.易卜拉欣，1973年，第25页。

直到1838年，虽然每年都对努巴山和法祖格利以外地区的黑人至少进行一次掠夺奴隶的武装袭击，而黑奴的供应仍不敷需求。穆罕默德·阿里希望扩大其黑人军队的梦想，"纯系一种乐观的想法，根本未对苏丹奴隶的储备进行彻底调查"。[11] 况且，苏丹黑人一直顽强抵抗掠夺奴隶的武装袭击，有些人甚至自杀以免当奴隶终生受辱。被捕捉的许多人在途中失踪，其他人则在阿斯旺因发烧、痢疾、寒冷和想家而死去。面对这个惨重失败，穆罕默德·阿里最后大量征募农民，不久便发现他们"是中东最好的一些正规步兵部队"。[12]

360



图片14.1 1821年的森纳尔：土耳其-埃及人入侵时代老芬吉素丹国的首都



图片14.2 搜捕奴隶的土耳其-埃及人在科尔多凡的一处营地

⑪ R. 希尔，1966年，第25页。
⑫ R. 希尔，1966年，第7页

就连那些招募来在苏丹本土给政府服兵役的黑人也不服从命令，不愿干。有些人逃避兵役，另一些人拿起武器反对政府。或许其中最重要的起义是1844年的梅达尼起义。苏丹士兵反对不公正和耻辱的待遇，密谋同时在喀土穆、森纳尔、卡姆林和梅达尼四地造反。但 **361** 是，梅达尼的起义者在预定时刻之前，就杀死了一些土耳其军官，后逃往森纳尔，并在那里继续造反。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起义镇压下去。[16]

同样重要的是穆罕默德·阿里意欲开采苏丹的矿产，特别是黄金。1805年他夺取政权时，埃及若不是奥斯曼帝国最贫穷的行省，也是最穷的省份之一。所以，穆罕默德·阿里采取强大攻势也是意欲找到快速收益的来源，以实现他的国内和国外的抱负。他从青年时期到老年，一直痴迷地幻想在苏丹找到大量黄金，并作出极大努力发掘，特别是在法祖格利地区和谢本山周围地区。穆罕默德·阿里除了向司令官们强调勘探金矿的迫切性，有时还派采矿专家如奥地利人罗塞杰和他自己的工程师博雷安尼去苏丹。最后，在1838-1839年间，他70岁时专程从开罗前往法祖格利，监督采矿活动。但他的三周逗留令人失望。政府的采矿活动不仅未开采出黄金，而且还消耗了不少埃及国库贫乏的财源。

然而，土耳其帝国主义者在苏丹发展农业却比较成功。他们派埃及农业专家去改进灌溉系统，发展原有的农作物，种植新作物，并有效地整治病虫害，特别是蝗虫。此外还委任兽医照料牲畜，从埃及派去专家，教苏丹人保养皮革。这次征服还给北部苏丹人和埃及商人更大的安全感，终于使引进欧洲商业成为可能。[17]

但是，农牧业财富的繁荣，大概不会用以为苏丹人民谋福利。政府主要关心的是把财富输往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整个统治期内，对苏丹的几乎全部产品和出口品实施严格的国家垄断。结果，大量苏丹产品——靛蓝、树胶、象牙等等——被输往埃及。同样，在整个土耳其统治期间，苏丹是埃及最廉价的牲畜来源地。尽管赶着牲畜顺尼罗河而下困难重重，途中遭游牧人的偷盗袭击，并且缺乏有组织的饲料和饮水安排，但牲口每年源源不断地抵达埃及。皮革与毛等畜产品也运往埃及。[18]

在芬吉素丹统治时代，苏丹人民未曾按期纳税，当时政府的负担轻，尤其是对穷人的 **362** 负担轻。但是，土耳其的行政官员在努力调动和开采苏丹的全部资源之时，把埃及的税制经适当修改扩展到了苏丹。他们施行这一全新的税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人民的经济生活。更糟的是由非正规士兵(bāzbuzq)使用残暴手段征收重税，政府则时常坚持要以现金支付赋税，而当时钱币的使用还只限于商人和城里人。

人民的反应很迅速，往往也很激烈。有些人抛弃了他们的土地和水车，逃往埃塞俄比亚边境或逃往西方。但其他许多人在整个土耳其统治区发生的许多次各类抗税斗争中起义，其中最激烈的一次也许是1822年苏丹人的起义。

科普特人的财政长官哈纳·塔维尔无视苏丹传统的税制，于1821年向吉齐拉居民和柏柏尔人强征重税。但他们于1822年2月奋起激烈抗议，袭击并杀死孤立的埃及分遣部队的兵员。从善迪到森纳尔，数以千计的人逃往埃塞俄比亚边境，逃往阿特巴拉河谷和杰达雷

[16] H.A.易卜拉欣，1973年，第92-94页。
[17] R.希尔，1966年，第50页。
[18] H.A.易卜拉欣，1973年，第135-154页。

夫地区。为避免一场大规模的反抗，穆罕默德·阿里之子——伊斯梅尔及其在森纳尔的司令官们匆忙从法祖格利赶回吉齐拉。通过调解和修改估税，他使局势暂时平息下来。但伊斯梅尔本人迅即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从苏丹去埃及的途中在善迪停留，向贾利因人横征暴敛，在两天内索取 30,000 元和 6000 名奴隶。[19] 当地贾利因人的酋长尼米尔抗议说，他的人民付不出他索要之数。伊斯梅尔傲慢地用烟斗向尼米尔劈脸打去。为雪此羞辱，尼米尔与他手下的人密谋，于 1822 年 10 月下旬，将伊斯梅尔及其下属全部活活烧死在善迪。这场反抗后来蔓延到其它地区，造成生命及财产的广泛损失。[20] 虽然这是绝望的起义，缺乏适当的领导，但这场反抗是对入侵者早发的警告，即对他们统治的反抗已深深埋藏在许多苏丹人民的心中。

苛税与暴政也激起人民到处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在达尔富尔的短命统治。[21] 凯拉家族剩下的成员一心要恢复他们古老的统治，动员富尔人反抗殖民者。在这些反抗中，1877 年阿米尔·哈伦领导的起义是最得人心和最大的一次。哈伦持续扰乱入侵者达三年之久，若不是在 1880 年被杀害，他很可能使入侵者的统治结束。他的亲族阿卜达拉·杜德·班卡从努巴山中森严壁垒的军营继续进行斗争。[22] 面对这一英勇反抗，土耳其人未能巩固其统治，直至达尔富尔人积极与马赫迪合作，最终于 1884 年将其统治推翻。

363

苏丹军方在第一个殖民时代也参加了抵抗。在一些北方城镇——梅达尼、森纳尔，奥贝特和萨瓦金曾发生数次军事事件和起义。但最严重的是 1865 年在卡萨拉发生的军事叛乱。驻卡萨拉的苏丹第四军团为拖欠军饷所激怒，公然反抗土耳其军官的指令，攻击和杀死了几名军官，并围城达 26 天之久。这场叛乱造成一些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严重破坏了土耳其人在卡萨拉省全境的统治。这或许是帝国主义 30 多年中在这个国家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然而，政府通过欺骗和外交手段，终于镇压了叛乱。士兵们在得到含糊的大赦许诺后投降了。但幸存者要末被处决，要末遭长期监禁。[23] 埃及总督还指示把在苏丹的苏丹人军团减少到三个，其余的遣往埃及。

反抗帝国南征，1821-1880 年

直至 1821 年土耳其人开始统治苏丹，北部苏丹穆斯林诸国和南部苏丹各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即使不均衡，也是可以匹敌的。但是 19 世纪，尤其是下半叶，对于南部苏丹人民是一场灾难。正如南部苏丹人民普遍记得的，这是一个物质上损失很大和精神上受屈辱的时代，一个“混乱时代”。F. M. 邓是南部苏丹的姜人，他写道，在南方人的记忆中，这个时代同“一批批侵略者对他们发动的奴隶和征服战争密不可分。对于这些侵略者他们几乎难以辨别，只能标以以下各种名称：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埃及人、安萨尔人或栋古拉

[19] R. 希尔，1966 年，第 16 页。
[20] M. 希贝卡(Shibayka)，1957 年，第 33-35 页。
[21] 见下文，第 371-372 页。
[22] M.M. 哈桑，(al-Hasan)，无出版日期，第 35-40 页。
[23] N. 舒凯尔(Shouqair)，1967 年，第 545-553 页。

威人。"[24]

当 1821 年穆罕默德·阿里入侵苏丹时，他把苏丹分成省和区。受埃及或土耳其官员管辖。这些官员则归驻扎在新建立的城市喀土穆的一名总督所领导。如上所述，这外来政权的首要功能是以缴纳贡品和奴隶的形式收税，以扩充埃及军队。为捕捉奴隶经常沿白尼罗河劫掠，自 1840 年以后人口交易达到巨大的数额。奴隶主的私人军队有枪支装备，大块土地承包给在南部苏丹各族人民中投资获得丰厚利润的商人们。穆罕默德·阿里发展的商业网具有鲜明的特色。商人们修筑堡垒(zeribas)，这个主意是从达尔富尔借鉴来的，那里的素丹自 18 世纪以来一直这么做。这种堡垒是用来作为易货贸易或对邻近地区进行掠夺的基地。商业网的其它鲜明特点是在国家垄断和私人贸易之间划分势力范围，主要通过招募地方雇佣军有计划地使用武力，采取为贸易开发种植园，特别是棉花种植的方针。例如，巴加拉人应用牲畜向科尔多凡省省长交税。凡不能或不愿这样做的，可以用奴隶交税。因此，他们虏掠姜人充做奴隶。 364

不仅如此，有些欧洲商入要求土耳其政府把苏丹象牙市场向自由贸易开放。后来，当欧洲商入眼见利润下降时，遂决定用奴隶而不用现金支付给他们的阿拉伯扈从，这就使奴隶贸易加剧。希卢克兰北部的卡卡，不久就成为主要的奴隶市场，尤其是买卖从南方贸易堡垒来的奴隶。卡卡的繁荣，部分是与 1854 年土耳其控制下的苏丹取缔奴隶贸易有关。它成为白尼罗河的主要奴隶市场，移民人口也迅速膨胀。强盗穆罕默德·哈伊尔原是栋古拉威人，1854 年从塔夸利移居卡卡，他的活动也可能促使卡卡转变成奴隶市场。[25] 据估计，到 1860 年平均每年有 2000 奴隶在卡卡出售，为获得此数，哈伊尔和他的一帮奴隶贩子使整个希卢克乡间陷入恐怖状态。[26]

南部地方的人拒绝与这些商人合作，并积极抵制商人们来到他们的土地上。反对入侵者的战争为数之多，形式之多样化，不胜枚举。在此只举数例作说明。

巴里人是首先抓住机会袭击侵略者的。1854 年，他们袭击一法国商队，杀死两人，伤数人。不久以后，在约 5000 名巴里人和另一个由萨丁尼亚的副领事沃德尼率领的商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沃德尼以及他的土耳其人副手和手下许多人被杀害。凡表示倾向与入侵者合作的巴里酋长们也都遭到袭击。例如，酋长尼亚奇洛的权力和财产遭到破坏。他逃往贡多科罗，但一些巴里武装青年小组追踪而至，1850 年在那里将他杀害。[27] 366

商人们往东被赶入敌对的洛科亚人的土地上。1860 年，商人们对袭击五名外国人作出反应，他们派出一支有 150 名士兵的队伍，洛科亚人杀死了其中 120 人，打伤了其余的许多人。[28]

北部的希卢克人同样积极地反对在白尼罗河的商人们。但是迁人希卢克兰北部、特别是迁入卡卡的移民并不全是商人。其中许多是从土耳其人统治区逃来的难民。1840-1860 年

---

[24] F.M. 邓 (Deng)，1978 年，第 150 页。
[25] R. 格雷(Gray)，1970 年，第 76-78 页。
[26] J. 弗罗斯特(Frost)，1974 年，第 216 页。
[27] R. 格雷，1970 年，第 44 页。
[28] 同上，第 56 页。



图片 14.3 丁卡地区北部加扎勒河支流上的喀土穆商船



图片 14.4 姆沃洛的一座商贩贸易站，其墙外为丁卡人居住地

间，难民从土耳其-埃及的北部源源不断地进入希卢克领土。其中许多是塞利姆-巴加拉人，但也有来自穆斯林苏丹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29] 直到 1860 年，移民和希卢克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那时雷斯（reth，国王）已不能再控制在他的王国内发展起来的贸易系统，但这种贸易系统后为外国人所支配，最终为他们所控制。

[29] P. 默塞尔（Mercer），1971 年，第 420 页。

1860年，克瓦特克尔雷斯把许多阿拉伯商人从他的王国中驱逐出去。穆罕默德·哈伊尔则用200名巴加拉人骑兵、1000多名枪手和13艘船攻打希卢克人。皇家首都法绍达被摧毁。约翰·佩特里克和凯特·佩特里克当时在此地区，陈述了亲眼目睹的关于这次攻打所造成的后果。他们说，及至1862年，希卢克兰从阿巴岛到索巴特河河口"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中"；"一度强大的希洛克人散落四面八方"。[30]凯特·佩特里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经过一个称做卡卡的希洛克人村庄的废墟，那里至少有600名被遗弃的图库尔人。去年(他们)被赶出家园。他们是勤劳的人民，大面积种植谷物"。[31]后来他们看到哈伊尔的一次征战，此役俘获了500名奴隶和12,000头牛。[32]

希卢克人决定还击。哈伊尔手下的一次抢劫袭击被打退，他的巴加拉人约70名被杀死。1863年，希卢克人强迫商人们撤退到内地，哈伊尔被追踪并遭杀害。于是，希卢克人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希卢克人不得不支付沉重的牲口税，并为不断扩充的苏丹保安部队提供奴隶充当士兵。

到1868年，持久的冲突已成为全面战争。该年11月，派去征服希卢克人的2000人部队遇到激烈的抵抗，征服未果。政府于是决定对希卢克人和姜人每年征收贡金15,000英镑。367 举国上下深感愤恨。似乎这还不够，土耳其政府于1871年决定在苏丹南部扩大棉花种植。至1874年，在法绍达地区已种植棉花、甘蔗和玉米约5000至6000公顷。这种农业种植，那年为土耳其政府挣得300,000英镑的棉花税收，这只能是通过使用强迫劳动才有可能达到。[33]

希卢克人反叛了。他们杀死了政府部队90人，增援部队不得不从喀土穆赶来平息叛乱。但是希卢克人已决心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斗。阿詹雷斯拒绝合作，他于1874年被阿拉伯人谋杀，于是阿拉伯人试图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进行统治。次年10月，数以千计的希卢克人攻打设在卡卡和法绍达的政府据点。在卡卡仅有14名士兵幸免于难。1876年更多增援部队从喀土穆到达，他们有雷明顿来福枪装备。数以千计的希卢克人被屠杀，及至当年4月，卡卡与法绍达之间的地区被认为已"绥靖"。希卢克人被解除武装，许多人被征入伍，遣往开罗。更糟的是，法绍达成了奴隶市场，在那里，政府的军队把他们俘获的奴隶卖给贾拉巴人，[34]以重新获得每年12,500英镑的税收。希卢克的牛和人都迅速减少，无怪乎婚娶聘礼原先为20至30头母牛，1860-1900年间已减为1头母牛。368

南部苏丹的各族人民许多是弱小和无防御能力的族群，对于商人的劫掠只能进行即使不是无效也是微弱的反抗。许多人在战争中不是被俘为奴就是被杀死，其结果是有几个族群"作为其凝聚力的政治或社会单位几乎消失了"。[35]姜人和诺亚思人或许是最能保护自己免遭劫掠的民族，他们把牲口撤入难于进人的沼泽地。他们习惯于作战，常把来袭军队打得大败。

---

[30] J. 佩特里克和K. 佩特里克(Petherick)，1869年，第1卷，第990页。
[31] 同上，第96页。
[32] 同上，第97页。
[33] J. 弗罗斯特(Frost)，1974年，为本段大部分细节的出处。
[34] 关于贾拉巴人，见下面第373页。
[35] R. 柯林斯(Collins)，1975年，第18页。



图片 14-5 遭奴隶劫掠者袭击后的希卢克村庄

再往南是赞德人，他们在强盛的、实行贵族统治的阿文加拉王朝领导下，在18世纪已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强大的政治体制是其得以抵挡奴隶主进攻的部分原因。一位名叫恩多罗马的酋长甚至能占领一名奴隶贩子阿布·库伦在赞德兰建立的堡垒。其后，在1870年他击败了敌军2000人，杀死阿布·库伦及其手下数人，并没收了一百驮军火。[56]

穆罕默德·阿里的两个直接继承人(阿巴斯和赛义德，1848-1863年)都不想学他在国外的冒险行动，而雄心勃勃的赫迪夫·伊斯梅尔(1863-1879年)却"迷恋于向各方扩张，特别是溯尼罗河而上进入苏丹南部的辽阔腹地。"[57] 伊斯梅尔对势力较弱的欧洲商人课税，并对其歧视，他逐步地使用土耳其人的权威来控制尼罗河上的贸易。及至1867年，欧洲商人被迫离开苏丹，从那时起，他们在苏丹的商业生活中已不再发挥作用；商业生活的控制权已落入土耳其人和来自埃及和苏丹北部的阿拉伯人手中。伊斯梅尔不再受当地一些欧洲人的控制，他溯尼罗河而上，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非洲帝国。镇压奴隶制和奴隶买卖成了这一帝国扩张的正当理由。[58]

土耳其人企图吞并赤道省，这是由两名英国军官——塞缪尔·贝克(1869-1873年)和查尔斯·乔治·戈登(1874-1876年和1877-1879年)指挥的。尽管贝克和戈登广泛地使用暴力和滥用大量装备，但仅获得零星的几个据点，未能在赤道省扩展土耳其人的统治。苏丹总

[56] R. 格雷，1970年，第64-65页。
[57] R. 阿林斯，1975年，第19页。
[58] 关于奴隶制和奴隶买卖问题的研究，参阅：M.F. 舒克里，1937年；A.I.M. 阿里(Ali)，1972年；B.K. 胡梅达，1973年，第254-316页。



图片 14.6 一位赞德人乐师

督(1877-1879年)戈登本人最后也放弃了土耳其人在赤道省的进军。他的后任——德国人爱德华·卡尔·奥斯卡·特奥多尔·施尼策尔(1840-1892年,通常称为阿明帕夏)承袭的只不过是土耳其人衰弱紊乱的局面,结果他被迫全部放弃,并于1889年撤退到东海岸。[39]

370

贝克企图获得非州人的合作是枉费心机,因为抵抗外国人的传统早已深深扎根在南部苏丹。1874年贝克抵达贡多科罗后,立即面临巴里人民和他们的酋长阿洛隆的公开敌视。他们拒绝向他出售玉米,还毁坏他手下人所种植的玉米。贝利曼-巴里人和洛科亚人虽是阿洛隆的竞争对手,也参加了这些行动。[40]摩奇-巴里人杀死了28名士兵,骚扰经过其领地的商队。这种敌视态度也感染了他们在西岸的邻邦。

贝克向尼罗河上游转移,到达乌干达北部阿乔利的帕蒂科。在那里,他把该地区所有本地商人的贸易站都改变成政府站,并把许多达纳克拉人(或栋古拉威人,他们许多人原是栋古拉地区人,当地人一般称他们栋古拉威人)编入政府军,他们是附属于阿拉伯商人的雇佣兵。这种政策使当地人难于区别喀土穆商人和土耳其政府。贝克于是火速往西进入布尼奥罗,希望在那里得到卡巴雷加的支持。但他再一次失望了。据报告,卡巴雷加甚至密谋要毒死来访的整个使团。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贝克终于在1872年8月撤退到帕蒂科。[41]

1873年,戈登被任命为赤道省的总督,以巩固贝克的业绩。按其职务规定,他要修筑堡垒,开辟往南方的交通,与当地各族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进行治理,以及管理南部苏丹的奴隶贸易。[42]

摩奇-巴里人在初期策略性地屈从于戈登之后,又重新开展敌对行为,在尼罗河两岸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战争。最终一战,摩奇人打败了40多人的一支分队,除四人外全部被杀死,包括他们的领导人林南特·德·贝勒丰。若不是河流阻挡了摩奇人乘胜追击,可能戈登会全军覆没。[43]

戈登向南进军赤道各王国也告失败。布干达的穆特萨并不像戈登天真地以为的那样会承认土耳其人对其王国的主权,而是动员一支强大的军队反抗入侵者。正是穆特萨,使戈登"遭遇到这样一位非洲统治者,他既有一个古老而稳固的王朝所传下来的政治智慧,又深谙外交与规避在保护其国家独立的任务中所能发挥的作用。"[44]派去会见戈登的貌似友好的使者却是密探,他们是去侦察敌人的力量和动向的。由戈登派去吞并布干达的努尔贝伊,不久就发觉机灵的穆特萨已将他困于其首都鲁班加,从而使他完全无能为力,全赖穆特萨的好意保住了性命。这才迫使戈登于1876年下令立即向北撤离到拉多。其后,姜人与诺亚恩人在一位名叫唐鲁利的先知领导下,将政府警备队围困在博尔。及至1885年,巴里酋长比戈把这个警备队消灭,并攻打拉多和里杰夫。[45]实际上,土耳其人进军赤道地区,到此时

371

[39] 关于阿明·帕夏的生涯,参见I.R.史密斯(Smith),1972年。
[40] R.格雷,1970年,第96页。
[41] S.W.贝克(Baker),1879年,第272-273页;R.格雷,1970年,第84-104页;N.舒凯尔,1967年,第562页。
[42] 见P.克雷比特(Crabites),1933年,第28-30页。
[43] R.格雷,1970年,第110-111页。
[44] 同上,第117页。
[45] 同上,第161页。

以损失惨重而告终。

土耳其在加扎勒河的殖民进军，遭到该地区最大的奴隶贩子祖巴伊尔·拉哈马·曼苏尔的反对，[46] 他是苏丹北方人，已在那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贸易帝国。1872 年他打败了政府的讨伐，并杀死其领导人。面对此既成事实，赫迪夫·伊斯梅尔正式承认祖巴伊尔为加扎勒河省的省长。但是，冒险成性的祖巴伊尔觊觎加扎勒河省边境以外的达尔富尔，那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奴隶来源地。素丹易卜拉欣动员富尔军队和人民英勇抗击入侵者。但他最后被打败，于 1874 年在曼华希战役中被杀害，达尔富尔遂被并入土耳其人政权。[47]

虽然赫迪夫·伊斯梅尔后来在开罗逮捕了祖巴伊尔，并采取措施粉碎其在加扎勒河省的权力，这位阿拉伯的奴隶贩子却重振旗鼓动支持他的儿子苏莱曼。他们宣称要征服整个苏丹南部，然后进军喀土穆，但终于被打败。

然而，土耳其人并未能在加扎勒河省建立有效的统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里的非洲人的抵抗，非洲人认为土耳其人只能是新殖民者，应该彻底把他们赶走。到 1883 年，姜人的酋长们积极与马赫迪派的军队合作，以推翻在加扎勒河省的土耳其人政权，但条件很明确，将来让他们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48]

土耳其政府的来临，的确结束了苏丹的、特别是苏丹南部普遍的奴隶劫掠。但是，新帝国主义者从未能说服那里的非洲各族人民接受其统治。事实上，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武力来镇压反对其统治的无数次起义。结果，酋长和人民被杀害，家畜被夺走，庄稼被毁。同以前的侵略者一样，土耳其人进一步瓦解了南部苏丹的社会，一直到抵抗运动最终胜利，实现了它所宣告的目标，即结束在非洲这个地区的土耳其殖民统治。 372

19 世纪苏丹的现代化与反应

土耳其在苏丹的冒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但一般都认为苏丹近代史是从 1820-1821 年土耳其征服该国开始的。在那一年由于打败了森纳尔和科尔多凡，现今的苏丹民主共和国的核心才得以建立。1841 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塔卡——库尔卡什地区和红海诸山，从而完成了对苏丹北部和中部的控制。[49] 达尔富尔、赤道地区、加扎勒河诸省和红海沿岸，在赫迪夫·伊斯梅尔统治期间，都被纳入近代苏丹版图。因此，在马赫迪起义前夕，苏丹已形成了从第二大瀑布至赤道诸湖、从红海到达尔富尔的一片广阔领土。[50]

除了把苏丹统一在它现有的疆界内，土耳其政权还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这里所谓现代化，意即"引进源出于欧洲国家所使用的那种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方法，以及生产、运输和交通的技术——这一切大大改变了先前传统社会的结构"。[51]

土耳其人的三项主要技术革新是火器、轮船和电报，电报是在赫迪夫·伊斯梅尔统治

[46] 祖巴伊尔生涯自述，见 N. 舒凯尔，1967 年，第 568-599 页。
[47] 同上。
[48] P. M. 霍尔特，1970 年，第 78-80 页。
[49] P. M. 霍尔特，1970 年，第 3 页。
[50] 除苏丹本土外，土耳其的苏丹包括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地区。
[51] P. M. 霍尔特，1973 年，第 135 页。

期间传入苏丹的。虽然最晚在17世纪下半叶，苏丹就已知道手枪，但并未大量使用。土耳其军队的军备优势在掣胜苏丹人的反抗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约在1828年，轮船首先在埃及境内的尼罗河上使用，但又过了一代人的岁月，轮船才驶入苏丹水域。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那里已建立起一支巨大的舰队，由设在喀土穆的船坞维护。[52]

火器和轮船在土耳其帝国主义者南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次帝国的扩张起初是试探性的，犹豫不决，但后来却大大得益于这两项发明。因为火器和轮船使殖民者和 373 他们的苏丹合作者克服了溯尼罗河而上进军的两个主要障碍：南方人的顽强抵抗和苏德沼泽的巨大障碍，它们阻挡着进入赤道尼罗河和加扎勒河两地区。

南方的开放对北方社会特殊的一部分——后称做贾拉巴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土耳其人征服前，他们只有很少人到过南方，后来，特别是北方的商贩能更多地进入上尼罗河和加扎勒河两省之后，许多人便开始蜂拥而入。他们原先是作为外来商人的仆役和武装随从而去的，但逐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己的职责和权力。虽然在南方加速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但贾拉巴人经常使用暴力和鄙视南方人的态度，无疑滋长了仍然主宰苏丹南、北方关系中的不信任和恐惧感。

土耳其帝国主义在苏丹建立了新的行政体制。它的行政机器是暴虐的，腐败而又无能，土耳其的政府官员素质低下，但与苏丹所习惯的已往各类政府相对照，则又是高度集中的。行政首脑在正常情况下只有一位总督，他的土耳其-波斯官衔称做胡库姆达尔(hukumdâr，俗称 hikimdar)。[53] 甚至在总督之职被废除的短暂期间，如在1843和1882年的情况，[54]苏丹诸省被直接置于开罗的一个部的管辖下。虽然与这个帝国政权合作的一些苏丹人被授予低级行政职位，但也向他们说清楚，他们只不过是中央政权的办事人员，中央政权可随意任命或解雇他们。

军队，特别是正规步兵(dji̱hâdiyya)，[55] 以及有交通的改进，是殖民政府夺取控制权的重要工具。虽然殖民者没有着手拟定严格的道路和铁路建设规划，但轮船和电报网络对中央集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这些工具装备起来，土耳其执政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维护公共安全，镇压骚动的苏丹人，首先是强迫纳税。

北部苏丹社会的宗教生活，由于帝国统治带来的变化，也受到很大影响。虽然土耳其 374 人和苏丹人都忠于伊斯兰教，但在土耳其政府的官方逊尼派伊斯兰教和自芬吉素丹统治时期以来发展的苏丹本地人的苏非-伊斯兰教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在苏丹，正如在埃及和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而在其中伊斯兰机构本身只起很小的作用。其结果，已经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苏丹苏非-伊斯兰教派[56] 必然遭受严重打击。帝国政府越来越多地破坏由苏非教派世袭教师(托钵僧，fakıs)所

---

[52] R. 希尔，1965年，第2-5页。

[53] P.M. 霍尔特，1970年，第14页。

[54] 行省总督们意识到喀土穆远离开罗，对有野心者可能引起诱惑，他们设法分散权力，以免权势过分集中于总督一人之手

[55] 南方人和努巴人往往都出身于奴隶，他们被征入正规步兵。除了这支部队外，还有赛基亚人的非正规军，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在征服时期来苏丹的外籍非正规部队。

[56] 在芬吉统治时期，苏非派世袭教师(faḳis)甚至比素丹和其他政治领袖更有效地充当稳定和连续性的中心



图片 14.7 土耳其-埃及政府的巩固与现代化：喀土穆的胡库梅达尔宫及河上的明轮船

组成的领导层的威信。这主要是通过提高正统的伊斯兰教地位来进行。殖民者通过维护卡迪(kadıs，伊斯兰教法官)和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法说明官)的僧侣统治集团，以及促进在爱资哈尔大学培养苏丹籍乌里玛的办法，使苏菲派的世袭教师面对一个与之竞争的集团，"其观点更正统、更不相容，且更直接依靠政府"。因此，到第一个帝国时代结束时，传统宗教领袖的威信"已大大降低了"。[57] 这确实是一个主要因素，促使他们反对帝国政府，并积极支持马赫迪推翻帝国政府的努力。

伴随现代化的进程，外国来访者——欧洲人和美国人日益增多，他们也促进了这一进程。1820年以前，很少有欧洲人访问苏丹，是土耳其的征服使这个国家向外国来访者开放，他们中有旅游者、商人和传教士，也有政府的专家、咨询人员和雇员。政府的西方雇员很快进入工作，特别是在马赫迪起义爆发之前的十年期间，对阿拉伯化的北方以及南方的苏丹社会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迥异，他们的到来在广大苏丹人民中制造了矛盾。[58] 过多地雇用欧洲人在他们往往不合适的岗位上任职，事实上激起了苏丹人强烈的不满，仇外情绪普遍存在。因此，马赫迪宣布要把国家从外国人和基督教徒控制中解放出来，得到人民大众的迅速和热情的支持。

375

结束语

土耳其帝国主义者大肆争夺开发苏丹资源，同时引进社会-经济和技术革新，深深动摇

[57] P.M.霍尔特，1973年，第140页。
[58] 例如，参见P.桑蒂(Santi)与R.希尔(编)，1980年，第145页。

了苏丹传统社会，造成了广泛的不满因此激起多次起义和造反。虽然其中有些体现了对殖民者的严重挑战，但没有一次得到民众足够的支持，使之能推翻政府。在苏丹，正如在其它地方，单凭不满，不可能造成革命形势，还必须伴之以革命的思想，革命的军队，首先是革命的领导。只有在马赫迪于1885年具备了这一切时，苏丹人才群起而加入马赫迪的革命，从而结束了土耳其人的统治，缔造了独立的苏丹国，但与此同时，又面临逼进的英帝国的统治。至少苏丹北部的形势是如此。

然而在南方，搜捕奴隶、抢劫和掠夺仍不止息。马赫迪政府也曾对南方实行征发，将南方人编人其军队。所产生的辛酸回忆，在马赫迪以后的时期使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在非洲人的心目中失去信誉。尼罗河流域的传统社会经济统治结构，逐渐转变为种族统治结构。这反过来又导致南部苏丹非洲入形成种族反抗的意识。

（计德容译）

15 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

R. 潘克赫斯特

L.V. 卡萨内利(索马里历史的某些说明)

19世纪初叶的埃塞俄比亚形势

19世纪到来时，埃塞俄比亚正处在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时代。这个昔日中央集权的基督教国家，已衰落得近乎土崩瓦解，相当多的地盘已被奥罗莫(加拉)人[①]占去。尽管皇帝仍享有名义上的主权，从而保持着表面上的统一，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封建领主的傀儡。那些封建领主几乎是独立的，而且相互之间不断发生小的摩擦。连绵的战事使包括首都所在地伯根德在内的许多省份惨遭横祸。许多农民不堪军人的勒索，离开自己的田园，投奔某个领主去寻找活路，甚至落草为寇。人们无心从事农业，商队的规模缩小，而且光顾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唯一算得上城镇的贡德尔，人口大量下降，对手艺人产品的需求也在减少。另外，由于皇室的订货减少，承造艺术制品的数量下降。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一片混乱，给埃塞俄比亚的编年史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再阿谀王室，转而对军阀大加吹捧，但仍不免流露出对昔日帝国伟业的惋惜。一位用传统的闪米特文学语言盖埃兹语著述的书吏阿巴加兹·萨乌纳，哀叹权力被新贵们窃取，原来的主人"成了奴仆，奴仆成了主人"。他看到四个在世的君主失去了权力，惊呼他们：

> 像风中的尘埃四散。哀哉！我的主人啊！我为你们的不幸郁闷积胸，愁肠寸断。被奴仆夺去的王国又有什么用呢？[②]

由于帝国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封建主义得势，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马萨冯特"(Masafent，诸王纷争时代)，[③] 字面意思是"士师"，指《士师记》记述的年代："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④]

基督教高原

作为帝国中心的基督教高原，这时分裂成了三个独立的国家，提格雷、阿姆哈拉和绍

---

① 这一重要的种族集团传统上被其阿姆哈拉邻邦称为加拉人，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的书面材料也使用这一称呼，但在当地有时带有贬意。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本来的奥罗莫一名，现代受过教育的人往往用这一名称。

② W. 布伦德尔(Blundell)，1922年，第187-188，191，470-471，477页。

③ 盖布雷·塞拉西(Guèbrè Sellasié)，1930-1932年，第1卷，第204页。

④ 《士师记》，第21章，25节。见E. 厄伦多尔夫(Ullendorff)，1960年，第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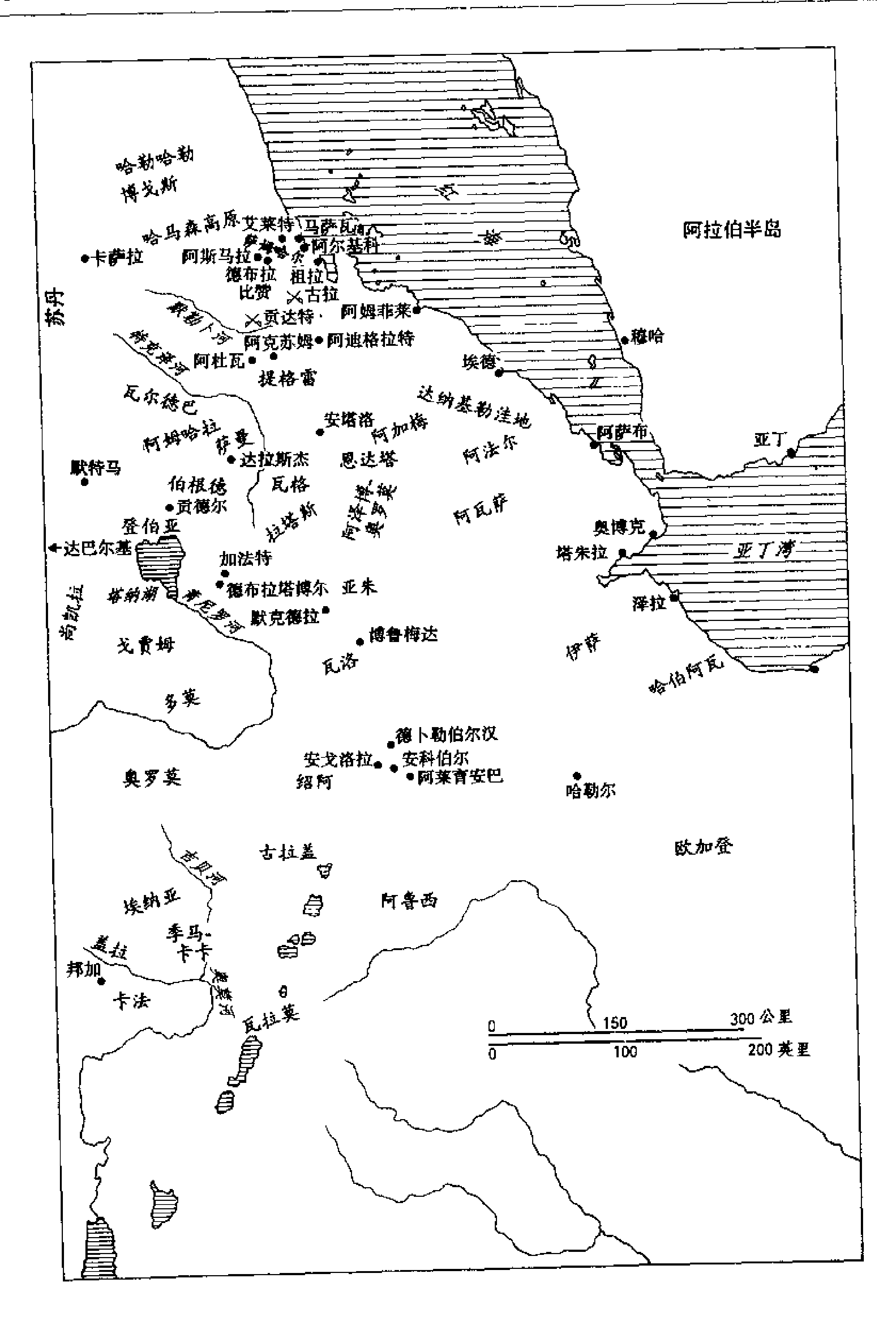


插图 15.1 19 世纪初的埃塞俄比亚（仿照 R. 潘克赫斯特图）

阿，此外还有好几个更小的政治单位。

提格雷曾是古代阿克苏姆王国的中心地带，位置最靠北，也最强大。当地居民大部分是基督教徒，但在东部和南部也有数量可观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通行的语言为闪语的提格里尼亚语(现代埃塞俄比亚语)，由于此地靠近沿海，该省的统治者们凭借贸易税收聚敛了相当财富，并以此取得了远较其它地区为多的火器。

19世纪初，控制这一省份的是恩达塔的沃尔达·塞拉西公爵(1795-1816年)。恩达塔是俯视着阿法尔洼地(又称达纳基勒)的一个重要地区，埃塞俄比亚的多数地区都从那里获取"阿莫莱"(amole′，岩盐棒)，用于消费和充做"原始货币"。[5] 这位首领以前是"巴尔加达"(balgada)，即掌管运盐商队的官员，他的父亲是提格雷的统治者米卡埃尔·塞胡尔公爵手下的一名将军，米卡埃尔·塞胡尔在上个世纪曾控制贡德尔，握有拥立和废贬国王的权力。沃尔达·塞拉西几乎和他父亲以前的君主一样地强大，他统治着从看得见红海的高地边缘伸向离贡德尔不到一百公里的萨曼高山区的广大领土。沃尔达·塞拉西按久已确立的惯例实行统治，给英国旅行家亨利·索尔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索尔特注意到，这位领袖"以其坚忍不拔和勇猛无畏……而著称"，并补充说："所有罪责、分歧和争执，无论其性质多么重要或微不足道，都要提交他来决断，所有的继承权利都要按他的意志决定，多数战争都由他亲自指挥。"[6] 沃尔达·塞拉西这位该国最强大的领袖，希望从当时控制着阿姆哈拉的亚朱-奥罗莫王朝手中夺取对名义上的皇帝的监护权，并力图为此目的而将提格雷的贵族团结起来。作为靠近沿海地区的一个统治者，他更有意取得出海通道，并以此与欧洲技术先进的国家接触。据索尔特称，他表达了鼓励同英国人接触的这一"最大心愿"，并表明自从穆斯林控制红海以来，和沿海穆斯林的"冲突"都是"无益"的。[7] 他在1810年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索要武器，并要求协助得到一位"阿布纳"(abuna)，即大主教。而根据长期以来的惯例，这类主教都是从埃及的科普特教士中引进的。

沃尔达·塞拉西死于1816年，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激烈的继承权之争。最终取胜的是通往产盐洼地途中的另一个重要省份阿加梅的萨巴加迪斯侯爵(1822-1831年)，他在1827年派索尔特的仆人威廉·科芬到英国去争取军事和技术援助。英国人发售了一批军火，可是在马萨瓦港被埃及人拦截了。后来萨巴加迪斯起兵反对亚朱王朝，结果被俘并被处死。萨曼的韦伯公爵(1839-1855年)，在几番征战后控制了提格雷，后来尽管反叛事件接踵而至，他仍控制了远达贡德尔的高原。由于他注意到对外联系的重要性，从而获得了法国少量军火和技术人员。他公开声明要把一位名叫塔克拉·吉约尔吉斯的王位觊觎者立为贡德尔的皇帝，并挥师进攻伯根德的亚朱统治者阿里公爵。1842年，他在阿里的首府德布拉塔博尔附近与之交战。韦伯的步兵在战争中获胜，但这位得胜的首领却在庆功时被俘。他在交了赎金后获释，返回提格雷。1843至1844年间，他再度与阿里公爵交战，但由于提格雷发生叛乱，而埃及又夺取了马萨瓦，他不得不向亚朱王朝投降。尽管遇到这些挫折，他仍是埃

⑤ R. K. P. 潘克赫斯特(Pankhurst)，1968年，第460-464页。
⑥ H. 索尔特(Salt)，1814年，第325，328，330页。见J. 科尔摩丁(Kolmodin)，1912-1915年，第97-98页。
⑦ 索尔特，1814年，第383 384页。

塞俄比亚最有实力和开明的统治者之一。[8]

帝国的第二个主要地区阿姆哈拉位于西北部。其人口多为基督教徒，但也有为数可观的穆斯林，操埃塞俄比亚最普遍的闪语系语言阿姆哈拉语。该地区的基地是重要省份伯根德，那里的统治者有时也控制南边的登伯亚和戈贾姆。阿姆哈拉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控制着首都贡德尔。但是由于阿姆哈拉远离沿海，其统治者要依赖从红海经由苏丹或提格雷提供的军火，而那两地的统治者都不情愿放行。



图片 15.1 提格雷的韦伯侯爵

⑧ 提格雷简史见 M. 帕金斯(Parkyns)，1854 年，第 2 卷，第 88-120 页。又见 C. 孔蒂・罗西尼(Conti Rossini)，1947 年；关于韦伯，见 J. 科尔摩丁，1912-1915 年，第 110、116-117、119-120 页。

19 世纪初叶，阿姆哈拉由阿里加兹·格万吉(1788-1803 年)统治，他是阿里·格万吉的兄弟，亚朱的奥罗莫穆斯林，他曾出于政治考虑改宗基督，但仍得到穆斯林的支持。阿里加兹的继承者是他的外甥古格萨·梅尔萨(1803-1825 年)，他把自己的首府设在德布拉塔 380 博尔，将势力范围向东扩展到戈贾姆，并试图通过宣布贵族的土地国有化来摧毁他们的权力。[9]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伊斯兰教徒不断增长。古格萨的儿子和继承人耶曼公爵(1825-1828 年)站在穆斯林一边反对基督徒，而耶曼的外甥阿里·阿卢拉(1831-1853 年)与他的母亲马南女王分享权力。马南女王由伊斯兰教改宗基督教，她的好几个穆斯林亲戚都当上了 381 省督。前往 16 世纪的穆斯林征服者艾哈迈德·格拉根坟墓朝圣的活动又恢复了。[10]

在阿姆哈拉以南，戈贾姆省被塔纳湖和阿巴伊河即青尼罗河的急湾所隔开，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省份，居民操阿姆哈拉语，几乎全是基督徒。18 世纪末，这一地区为海鲁公爵(死于 1784-1785 年)所统一，他的后代长期争斗不已。他的女婿扎乌迪侯爵是一位来自多莫的奥罗莫人，同他的儿子马瑞德公爵(死于 1821 年)作对，双方的冲突又传给各自的儿孙们。冲突使亚朱王朝坐享渔翁之利，用一位现代学者的话说，戈贾姆省的王公们“不是亚朱的对手”，而另方面，亚朱王朝也从无力量彻底赶走戈贾姆人或维持从外面派驻首领。[11]

绍阿，帝国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位于东南部。这一地区中部高原的居民主要是操阿姆哈拉语的基督徒，南部和西部由奥罗莫的传统主义者和穆斯林占据，东面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法尔人。奥罗莫人的扩张将这一省份隔开，使其统治者独立于贡德尔的上司。绍阿尽管有一条商路通往贡德尔，但通过阿法尔和索马里低地同亚丁湾的港口塔朱拉和泽拉以及商业中心哈勒尔的经济联系却更为重要。通过这些通道，绍阿的一系列统治者得到了数量不大却在逐渐增加的军火，他们凭借这些军火，征服了没有这类武器的邻邦奥罗莫。这种扩张使绍阿控制了同盛产黄金、象牙、咖啡、香料和奴隶的那些更远的内地的贸易。

自 17 世纪末起，绍阿由本地的一个王朝统治。[12] 19 世纪第一个首领名叫阿斯法·瓦桑(1775-1808 年)，意思是“扩展边疆”，这并非没有意义。他把自己的首府设在安科伯尔，戮力斯杀去攻占奥罗莫人的土地，改造税赋体系，并断绝了同贡德尔的附庸关系的最后联系。[13] 他的儿子瓦桑·萨加德(1808-1813 年)接受了公爵的高级称号，指挥了对奥罗莫的远征，并同提格雷的沃尔达·塞拉西合作，袭击了瓦洛和亚朱。他推行宽容的政策，尽管试图使奥罗莫人阿姆哈拉化和改宗基督教，但他还是任命了好几个奥罗莫人和其他穆斯林担 382 任国家职务。[14]

瓦桑·萨加德的儿子萨赫拉·塞拉西(1813-1847 年)是第一个自称“尼古斯”(negus，国

---

[9] C. 孔蒂·罗西尼，1921 年；R. K. P. 潘克赫斯特，1968 年，第 137 页。

[10] J. S. 特里明厄姆(Trimingham)，1952 年，第 110-111 页。

[11] C. 孔蒂·罗西尼，1947 年；塔克拉·亚苏斯(Takla Yasus)，无出版日期；范塔洪·伯安尼(Fantahun Birhane)，1973 年，第 11 页。

[12] H. 索尔特，1814 年，第 494-496 页。又见 R. 佩里尼(Perini)，1905 年，第 210-211 页。

[13] C. F. X. 罗歇·德埃里库(Rochet d'Héricourt)，1841 年，第 212 页；1846 年，第 243 页；A. 切基(Cecchi)，1886-1887 年，第 1 卷，第 242-243 页；G. 盖布雷·塞拉西，1930-1932 年，第 1 卷，第 60-66 页。

[14] C. T. X. 罗歇·德埃里库，1841 年，第 212 页，1846 年，第 243 页；A. 切基，1886-1887 年，第 1 卷，第 242-244 页；G. 盖布雷·塞拉西，1930-1932 年，第 1 卷，第 67-69 页。关于绍阿早期历史，又见 D. N. 莱文(Levine)，1965 年，第 21-38 页，V. 斯蒂兹(Stitz)，1974 年，第 64-126 页，349-350 页。

王)的绍阿统治者，并声称还要统治"耶法特，加拉人和古拉盖"。他有时住在安科伯尔，有时住在刚从奥罗莫人那里夺来的安戈洛拉，对奥罗莫人和穆斯林保持容忍的态度，并建立起双方王朝间的通婚。他发展了一种被英国使者 W.C. 哈里斯上校称为"彻头彻尾封建"的制度，[15] 取得了比他的前辈更多的火器，并进一步蚕食南面和西面的肥沃土地。他因此吸引了埃纳亚、卡法、戈贾姆、多莫和其它地区的商队。[16] 他为了取得武器，同外国势力建立联系。1839 年，他请法国旅行家罗歇·德埃里库从巴黎获取来福枪，并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宣称：

上帝赐与我一个美好、庞大的王国，但艺术和科学还没有像在贵国那样光顾我的国家。因此希望你们乐意帮助我，特别是运来我在国内还没有的枪支、大炮和其它东西。[17]

萨赫拉·塞拉西接待了英国和法国的外交使团，并于 1841 和 1843 年分别与他们签订了友好和商务条约。哈里斯给他带来一些军火作为礼物，转引他的话说，"再多几条滑膛枪就能使我同我的所有敌人势均力敌了。"[18] 在他统治时期，绍阿享有和平，这同北方饱受战乱的省份相比可谓得天独厚。据法国圣西门派教士 E. 孔布和 M. 塔马西埃说，农民"不必担心士兵劫掠"，"以更大的干劲耕种自己的土地，只要播种，就一定会有收获。"[19] 然而萨赫拉·塞拉西同他的好几个先辈一样，死后接踵而至的是奥罗莫人的一场较大范围的起义。他的儿子海拉·马拉科特(1847-1855 年)费了很大力气才平定了起义。海拉·马拉科特是个软弱的君主，他在位时发生了许多动乱。[20]



图片 15.2　绍阿的国王萨赫拉·塞拉西

[15] W.C. 哈里斯(Harris)，1844 年，第 2 卷，第 177-178 页。又见 C. 约翰斯顿(Johnston)，1844 年，第 2 卷，第 18 页；A. 切基，1886-1887 年，第 1 卷，第 244 页；G. 盖布雷·塞拉西，1930-1932 年，第 1 卷，第 70-77 页。

[16] 印度事务部档案，伦敦，孟买秘密听证会，2060G，第 23 段。

[17] C.W. 伊森伯格(Isenberg)和 J.L. 克拉普夫(Krapf)，1843 年，第 251 页。

[18] 印度事务部档案，伦敦，孟买秘密听证会，第 3 卷，第 489 页；W.C. 哈里斯，第 184 页。

[19] E. 孔布(Combes)和 M. 塔马西埃(Tamasier)，1838 年，第 2 卷，第 346 页。

[20] A. 切基，1886-1887 年，第 1 卷，第 250-256 页；G. 盖布雷·塞拉西，1930-1932 年，第 1 卷，第 77-84 页。

马萨瓦港

383

这一地区在帝国范围之外，也是七零八落，有许多地方还受到种族集团间战争的骚扰。

红海岸边的小岛马萨瓦同附近大陆上的港口阿尔基科一道经营着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大部分贸易，[21] 它们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单位。那里的居民，同邻近的萨姆哈尔平原上的人一样，都是穆斯林，他们讲一种与盖埃兹语有联系的闪米特语言的提格雷语。同阿拉伯半岛的联系使阿拉伯语也广为流行，但由于那里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商人和士兵出现，产生了一种混杂的语言。这一地区是四种主要势力发生冲突的场所：第一是奥斯曼帝国，它于1557年攻占了马萨瓦，并设立了卫戍部队，其后代人数不多，却构成一支强有力的占领军；第二是埃及，那里的统治者好几次代表奥斯曼帝国来购买或者窃取这里的主权；第三是当地的贵族世家，是奥斯曼驻军与本地贝劳的后裔，他们的基地是阿尔基科，首领叫"纳伊布"（na' ib，意为代理），他名义上只负责沿海地区，但却对马萨瓦具有钳制作用，因为它的饮水和所有的贸易都仰仗于他；第四是提格雷的省督们，他们视港口为通往海洋不可或缺的出路，宣称对那里历来拥有权利，然而他们尽管控制着内地的贸易，但只断断续续采取行动来实施这种权利。

在19世纪初，对港口的有效控制权，是由土耳其卫戍部队和纳伊布分享的，后者在没有奥斯曼总督的情况下使自己成为马萨瓦事实上的统治者，说"哈巴什的大门是他的"。[22]提格雷的沃尔达·塞拉西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怒，他"表示极为不快"，派出一支军队对付纳伊布，如果纳伊布"不让他满意"，就要"切断所有联系"。[23] 为了打破纳伊布的实力地位，一个英国贵族瓦伦西亚勋爵主张由英国政府买下附近祖拉湾的一个岛屿，但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施。[24]

384

1813-1814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代表奥斯曼人夺取了马萨瓦，纳伊布至高无上的地位随之结束。阿里之子，身为军人的易卜拉欣被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为希杰兹和阿比西尼亚总督，但这一称号的后半部分尽管反映了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却是个虚名，因为埃及的统治仅限于岛上，即使在那里也很少是有效的。1826年，纳伊布利用他对马萨瓦用水的控制，迫使入侵者撤离，尽管驻军继续存在，他仍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25] 埃及人的撤退引起了埃塞俄比亚的潜在的兴趣。提格雷的萨巴加迪斯请求英王乔治四世"取得马萨瓦的港口，并把它赐于我们或自己保留"，[26] 但英国政府予以拒绝。

1833年，穆罕默德·阿里再度夺取马萨瓦，但于1841年撤走。就在这个时期，提格雷的韦伯向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派出使节，提出用阿姆菲莱附近的海湾换取军火，并支持他

---

[21] R.K.P.潘克赫斯特，1961年，第339-346页；1968年，第357-391页。
[22] G.瓦伦西亚(Valentia)，1811年，第3卷，第252页。
[23] 同上，第3卷，第40页。
[24] 同上，第3卷，第261-278页。
[25] R.K.P.潘克赫斯特，1964年b，第38-39页。
[26] 公共档案馆，基尤，英格兰，FO1/2。

对沿海的权利，但法国人不愿合作。[27]纳伊布利用韦伯1842年在德布拉塔博尔战败的机会，侵入哈马森地区，于是，韦伯于1843-1844年对萨姆哈尔平原举行了一次远征(Razzia)。两年后，他提出将阿尔基科交给法国政府，但这一建议同样没有被接受。1846年，穆罕默德·阿里以每年向土耳其人交两万玛丽亚-特蕾西亚元的代价，重新取得了对马萨瓦的宗主权。翌年，他手下的士兵攻占该岛，随后很快进攻了阿尔基科，将其夷为平地，并在大陆上修建了一座城堡，纳伊布成了他们的傀儡。他们决心控制整个地区，要求远及索马里港口柏培拉的所有沿海统治者对其俯首称臣。韦伯勃然大怒，于1843年再度挥师进人萨姆哈尔。**385** 他的部下将阿尔基科劫掠一番，但却无力攻占马萨瓦，遂撤军。他向维多利亚女王发出措词夸张的呼吁，声称他的先人曾"统治着红海的全部沿岸"，并请求她阻止他的敌人"插足大陆"[28]，但英国予以拒绝。然而他的征讨毕竟显示了提格雷对沿海的兴趣，并表明如埃及试图人侵内地，将很可能遇到进一步的干预。

阿法尔低地

马萨瓦东南贫瘠的低地由阿法尔人据有，他们是一个操库施语的游牧民族，19世纪初受内陆的阿瓦萨素丹国的统治。这个素丹国建于一个世纪之前，当时阿塞马拉人("红"阿法尔人)占据着肥沃的阿瓦萨河谷。这时统治素丹国的是伊吉达西斯素丹，他的主要对手是南面的阿多伊马拉人，即"白"阿法尔人。他死于1810年前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混战，阿多伊马拉人乘机掠夺阿瓦萨，并迫使他的后继者与他们分享权力。绍阿不断扩展的贸易，导致塔朱拉港的出现，绍阿的崛起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日渐增长的实力。[29]

英国于1839年占领亚丁后，达纳基勒沿海地区引起了国际关注。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官员莫尔斯比上尉以"十袋大米"的价格，从塔朱拉的素丹那里买下了近海岸的一个岛屿。这位首领还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诺"无论何时均尊重和注意"英国的"友好建议"，未经英国同意，"不同任何其它欧洲国家或个人签订任何其它协定或契约。"[30]不久，两名法国人孔布和布罗匡特代表一家法国公司南托-博尔德莱斯公司，以1800玛丽亚-特蕾西亚元，从当地首领手中购得了沿海的村庄埃德，尔后又发现其位置暴露，不适宜修建港口。[31]

索马里和非洲之角

再往东，亚丁湾的低地荒漠上，居住着穆斯林索马里人，他们讲另一种库施语，曾长期处于阿拉伯影响之下。转运绍阿、欧加登和哈勒尔贸易品的泽拉港，自1630年起就是阿

[27] 公共档案馆，基尤，英格兰，FO1/3；T. 勒菲弗尔(Lefèbvre)，1845-1854年，第1卷，第103-104页。
[28] 大不列颠，1868年，第30页。
[29] M. 阿比尔(Abir)，1968年，第23-24页。又见I. M. 刘易斯(Lewis)，1955年，第155-160页。
[30] E. 赫茨莱特(Hertslet)，1894年，第1卷，第275页；第2卷，第382页。
[31] P. V. 费雷(Ferret)和J. G. 加利尼耶(Galinier)，1847-1848年，第2卷，第436-437页；R. K. P. 潘克赫斯特，1966年b，第203-218页。

拉伯港穆哈的附庸，穆哈的统治者把它出租给历代阿拉伯的世袭埃米尔掌管，但埃米尔的权威却很少超出这座城镇本身。[32]沿海狭长地带的其它部分属于以游牧为生的索马里人，他们也声称自己是柏培拉的主人，柏培拉实际上是座无人定居的港口，只是到每年冬天，当内地的商队前来用他们的货物交换商人们从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和印度进口的制品时，才焕发出生机。[33] 这里的集市非常重要，俗话说，"谁掌握了柏培拉，谁就抓住了哈勒尔的胡 386 子。"[34]

穆罕默德·阿里并没有忽视索马里北部沿海的重要性，他于1821年攻占了柏培拉，但由于当地的反抗又放弃了。大约十年之后，埃及人再度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兴趣，但又于1841年撤走。那时，泽拉的统治权被一个野心勃勃的索马里商人哈吉基·阿里·舍默基买去。他急于垄断这一地区的商业，夺取了柏培拉，并鼓励内地的伊萨部族袭击前往塔朱拉的商队。然而，他日益增长的势力引起了哈勒尔埃米尔的愤怒，后者鼓动哈伯阿瓦勒的索马里人来反对他占领柏培拉。舍默基的回答是挑动其他索马里人封闭通往柏培拉的道路，并废黜埃米尔，但是哈伯阿瓦勒于1852年将舍默基的人逐出了柏培拉港。舍默基试图封锁这座港口，但在亚丁的英国人迫使他放弃了这种打算。1855年，他在麦加被奥斯曼当局逮捕。随后，泽拉交给了阿布·巴卡尔，一个来自塔朱拉地区的阿法尔奴隶贩子。[35]

从亚丁湾的齐阿达港到印度洋边的伊利格这一段海岸，是马坚坦素丹国的一部分，它可能早在15世纪就已建立。这个半游牧民的素丹国收入微薄，主要靠出口熏香和香木。沿这一地区崎岖的海岸航行的悠久传统，给这里的游牧民带来了另一条生计。到19世纪，素丹对内地氏族的权威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1839年，素丹在亚丁同英国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每年付给他一笔年金，他则协助保护在他的沿海失事船只的英国海员的生命和财产。[36]

再往南是贝纳迪尔，即索马里人居住的印度洋沿岸地区，在19世纪初是阿曼的一块保护领地，但在19世纪20年代，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干预而不再附属于阿曼。在那以后，这一地区的宗主权转归桑给巴尔的素丹，他的代表驻布拉瓦港。

摩加迪沙港实际上处于自主状态，正如C. 吉兰指出的那样，桑给巴尔素丹的权威，就像他们的海关官员那样，随着季风来而复去。[37] 摩加迪沙的内地由盖莱迪氏族控制，其素丹们同谢贝利河和朱巴河之间的许多其它氏族建立了联盟关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387 盖莱迪联盟控制着从朱巴河上游的卢克（卢格）到摩加迪沙的象牙贸易；盖莱迪的素丹们还向谢贝利河谷和南及布拉瓦从事农业的氏族征牧贡品。只有位于梅迈尔卡内地的强大的比马尔氏族成功地抵御了盖莱迪人的霸权。[38]与此同时，桑给巴尔的素丹被迫尊重盖莱迪统治者的权威。于是贝纳迪尔的权力就这样通过一种微妙的均衡关系为人分享。例如，1870年，

---

[32] J.S. 特里明厄姆，1952年，第97页。
[33] R. 伯顿(Burton)，1894年，第1卷，第71-74页；R.K.P. 潘克赫斯特，1968年，第421-424页。
[34] R. 伯顿，1894年，第2卷，第28页。
[35] 同上，第1卷，第11-15页；M. 阿比尔，1968年，第14-15页。
[36] I.M. 刘易斯，1965年，第38页，M. 皮隆(Pirone)，1961年，第2卷，第66-68、87-88页。
[37] C. 吉兰(Guillain)，1856年，第3卷，第185-186页；I.M. 刘易斯，1965年，第37-39页。
[38] 在1848年和1878年，比马尔的战士两次使盖莱迪的素丹死于疆场。C. 吉兰，1856年，第3卷，第445-446页，G. 雷瓦尔(Revoil)，1885年，第26-27页。

当桑给巴尔的素丹打算在摩加迪沙建立城堡时，他必须征得盖莱迪素丹艾哈迈德·优素福的同意。[39]

南部索马里人的口头传说中，对巴尔代雷“圣战”这一重大事件依然记忆犹新。这是19世纪30年代后期从朱巴河畔的巴尔代雷宗教居民住地发动的一场伊斯兰改革的军事行动。改革者力图将他们那种伊斯兰神权政治强加给索马里南部人民，甚至于1840年成功地征服了沿海城市布拉瓦。然而在1843年，盖莱迪的素丹优素福·穆罕默德纠集起他在谢贝利河与朱巴河之间地区的盟友，领导了一场针对改革派的大规模征讨。巴尔代雷的居民住地被包围，随后夷为平地，一时间优素福成了索马里南部最为强大的领袖。[40] 19世纪下半叶，好几个伊斯兰教派——卡迪里派、阿赫默底派和萨利希派开始渗透到索马里内地，宗教的居民住地如雨后春笋在农村各地建立起来。[41]

最后，从19世纪初期开始，索马里人最后一次大的迁徙浪潮，将欧加登平原上的游牧民卷向朱巴河以至更远的地方。这些游牧民有的参加了巴尔代雷圣战，最后跨过朱巴河，在那里同奥罗莫人发生了冲突。奥罗莫人最终被迫退向塔纳河，当英国人占领东非保护地时发现了他们。[42]

商业中心哈勒尔

在索马里沿海内地的高原上，有一座带城墙的穆斯林城市哈勒尔。那里的居民讲阿达尔语，这是一种闪米特语言，在其它地方未曾发现。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是一个由埃米尔统治的独立城邦。埃米尔的权力极为广泛，英国旅行家理查德·伯顿惊叹道，“埃米尔就是哈勒尔的政府。”[43]

388

哈勒尔作为绍阿、阿鲁西、古拉盖和欧加登地区的商业中心，铸造自己的钱币，除了纺织品和其它进口商品外，咖啡、喀特(一种起麻醉作用的叶子)、番红花、皮毛、象牙和奴隶的生意也十分兴隆。那里有许多清真寺和穆斯林圣地，是一个研究古兰经教义的中心，经常有阿拉伯的谢赫来访，对附近讲库施语的戈图-奥罗莫人及一些索马里人有着重大的宗教和文化影响。这两部分人都与哈勒尔的贵族通婚，有时他们的领导人力图得到埃米尔的承认。

到19世纪初，哈勒尔饱受内部争斗和奥罗莫人强大压力之苦，但为人精明的埃米尔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1794-1821年)使他的敌人受到遏制。可是他死后家庭内部发生冲突，奥罗莫人及索马里人乘机夺取了周围的土地，哈勒尔城只是靠着城墙、为数不多的

[39] G. 雷瓦尔，1885年，第22页；I. M. 刘易斯，1965年，第38页。
[40] L. V. 卡萨内利(Cassanelli)，1982年，第135-146页。
[41] 同上，第194-197页；E. 塞鲁利(Cerulli)，1957年，第1卷，第187-195页。
[42] L. V. 卡萨内利，1982年，第29-30页。
[43] R. 伯顿，1894年，第2卷，第20页。

大炮及一小队步兵才幸存下来。[44]

古拉盖地区和卡法

再往内地前进是古拉盖地区，那里的居民讲一种闪米特语。全区分为东西两部，西部从中世纪起就信奉基督教，东部则接受了伊斯兰教义。这一地区曾由一个当地王朝统治，但到 19 世纪初叶却分属于七个独立的氏族，称为“七家族”。由于这种分裂状况，他们成了奴隶贩子袭击的目标，后来又被绍阿的萨赫拉·塞拉西所吞并。[45]

在埃塞俄比亚的西南部，土地肥沃、树木繁茂的高原地区，有一个古老王国卡法，这是个因循守旧的国家，讲自己特有的卡蒂乔语。这一地区出产许多有价值的出口物，包括香猫、象牙、奴隶和野生咖啡。由于奥罗莫人的扩张，这一地区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绝，但在 18 世纪中叶曾侵犯周围邻邦的领域。到 1820 年，卡法国王霍蒂·高乔的统治曾向北和向东延伸到吉贝河和奥莫河。[46]

奥罗莫诸国

389

青尼罗河以南地区居住着传统的奥罗莫人，他们在 19 世纪初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古老的平等主义的“加达”(gada)制度——由同年龄组的人轮番治理——受到了富裕和实力强大的军事领袖们的挑战。他们往往以其头衔“阿巴杜拉”(abba dula)著称，意思是“战争之父”。他们开始索取享有终生权威及建立王朝的权力。在 19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出现了三个奥罗莫君主国：埃纳亚(也叫利穆)、戈马和西面的古马。[47] 其中最强大的是埃纳亚，由博富统治。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首领，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他听从穆斯林商人的建议，信奉了伊斯兰教。他的后继者是他的儿子伊布萨，即阿巴·巴吉伯(1825-1861 年)，他同邻近的统治家族建立了王朝联盟，并从戈贾姆得到一些火绳枪，这使他享有坚不可摧的地位。在他漫长的统治之下，贸易，主要是奴隶、黄金、象牙和香猫买卖兴旺起来，王国也变得日益富裕和强大。后来，绍阿的扩张切断了通往哈勒尔和亚丁湾港口的商路。阿巴·巴吉伯死后，他建立起来的政权迅速衰落。

再往南面的王国季马-卡卡，也叫季马-阿巴-吉法尔，还有西南面的盖拉，是在埃纳亚兴起以后几年出现的。季马-卡卡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奥罗莫王国，创建者是来自希尔马塔地区的阿巴·马加尔，他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征伐，随后又由他的儿子们继续进行。其中一个叫阿巴·吉法尔·萨那，他本来享有“阿巴杜拉”的称号，但在 1830 年接受伊斯兰教义

390

---

[44] E. 塞鲁利，1942 年，第 1-20 页；M. 阿比尔，1968 年，第 10-11 页；S. 泰代斯基(Tedeschi)，1874 年，第 481-500 页，J. S. 特里明厄姆，1952 年，第 110 页。关于 19 世纪中叶的哈勒尔，又见 R. 伯顿，1894 年，第 2 卷，第 13-29 页。

[45] W. A. 沙克 (Shack)，1966 年，第 16-17 页；P. 勒贝尔 (Lebel)，1974 年，第 104-105 页。

[46] F. J. 比伯(Bieber)，1920-1923 年，第 1 卷，第 89-90 页；A. 切基，1886-1887 年，第 2 卷，第 483-491 页；G. B. 亨廷福德(Huntingford)，1955 年，第 104-105 页；A. 昂奈肯(Onneken)，1956 年。

[47] 关于古马的编年史，见 E. 塞鲁利，1922 年，第 148-162 页。



图片15.3　哈勒尔的埃米尔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1794-1821年

后，他自称“莫蒂”(moti)，即国王(1830-1855年)，并在政治和行政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他的后继者阿巴·里巴(1855-1859年)与邻近的一些奥罗莫统治者交恶，结果他们联合起来，在1859年的一场战争中杀死了他。此后，国家交由阿巴·吉法尔·萨那的兄弟阿巴·博科(1859-1862年)控制，他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令在各省建立清真寺。他的儿子和后继者阿巴·戈莫尔(1862-1878年)进一步扩展了领土。[58]

这样，本章论述的地区就像由一系列国家和政权构成的银河系，其中每一个都按自己的轨道运行，但又对本星座中的其它实体产生重要影响，并受其影响。每一个统治者都警惕地注视着他的邻居，但除非处于战争状态，又往往同他们交换礼品，表示善意。一旦可能，王朝之间往往联姻，但超越宗教归属的联姻实属罕见。而商业往来却很少顾及信仰差别，传统主义者、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住地都由商路联系了起来。各个种族和语言的社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其特性，但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却颇为频繁。这不仅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和红海沿岸地区是如此，在更南面的沿索马里和奥罗莫分界线地区也是如此。据19世纪的旅行家记载，那里存在着使用两种语言的贸易社区。[59]

---

[58] A. 切基，1886-1887年，第2卷，第156-157、238-240、266-267、537-542页；G. W. B. 亨廷福德，1955年，第29页；M. 阿比尔，1965年，第205-219页；H. S. 刘易斯，1965年，第24-41、44页。

[59] U. 费朗迪(Ferrandi)，1903年，第316页，注①。

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的统一的努力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上半世纪那种分裂状态让位于两次引人注目的重新统一的努力。第一个是卡萨·海库侯爵的努力，他就是后来的埃塞俄比亚特沃德罗斯二世，又称西奥多皇帝。他的统治结束了“马萨冯特”，即诸王纷争的时代。

卡萨约生于1820年，是同苏丹交界处奎拉的一个首领的儿子。首领死后，他的一贫如洗的母亲不得不以出售“科索”(kosso)——一种治疗绦虫的埃塞俄比亚药品——为生。卡萨在一座寺庙中长大，成了一名勇士，后来称雄于奎拉地区，并取得了侯爵的称号。伯根德省的亚朱王朝统治者、阿里公爵的母亲马南女王，试图将自己的孙女塔瓦比奇许配给他，以赢得他的支持。但他起而造反，兴兵袭击登伯亚，并击败了派去对付“科索摊贩儿子”的指挥官。1847年，卡萨占领了贡德尔，后来又俘获了女王，只是在阿里公爵承认他为西部边疆地区的首领后才将其释放。战胜亚朱王朝的胜利扩大了卡萨的追随者，因为许多阿姆 391 哈拉基督徒早就对亚朱亲穆斯林的政策不满。1848年，他进攻苏丹的埃及人，前进到距森纳尔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但是，由于埃及人拥有火器，他无力攻下该城。在同阿里公爵和解后，他一直听命于阿里，到1852年再度反叛。公爵宣布将卡萨的土地转归戈贾姆的统治者戈舒·扎乌德侯爵，扎乌德遂出发去征讨这个新贵。然而，卡萨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戈贾姆人，并试图与阿里重归于好。但是，阿里却同提格雷的韦伯侯爵一起举兵征讨他。卡萨于1853年击败了他们的联军，并放火焚烧了阿里的首府德布拉塔博尔，后来他又在戈贾姆的阿伊沙再度击败阿里。这次战事标志着亚朱王朝的终结，并结束了“马萨冯特”时代。卡萨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唯一剩下的对手是戈舒的儿子——戈贾姆的贝鲁侯爵和提格雷的韦伯。1854年，卡萨攻击并抓获了贝鲁，此后，他取得了“尼古斯”(国王)的称号。次年，他发兵攻击在萨曼的韦伯，并在达拉斯杰击败了他，缴获了不下7000件火器。[50] 随后，他宣布称帝，并选择了特沃德罗斯这一帝号，这是一个有喻意的称号，预言拥有这一称号的君主将实施公正的统治，铲除伊斯兰教，并夺得耶路撒冷。[51]

一位英国观察家，普劳登领事，曾生动地描绘了这位新皇帝的个性和抱负。他在1855年说，特沃德罗斯相信他自己是一个“命定的君主”，“有能力成就大事业，或善或恶……他为人正直，亲耳聆听最贫穷的农民的倾诉；他停止了行贿制度；他以身作则……阻止多配偶和纳妾行为；他禁止奴隶买卖，使整个国家实现了安定”。[52] 这位领事将特沃德罗斯描述成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并评论说：

> 他深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恢复埃塞俄比亚帝国的荣耀，实现显赫的征服事业；他身心两方面都具有无穷的精力，他个人和道义上的勇气都是无止境的。他对手下士兵的严厉充分证明了这后一点，哪怕是他们迫于饥饿起而造反，他却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当他在一个不习惯任何束缚的国家推行改革的时候……在任何不如他

---

[50] C.孔蒂·罗西尼，1947年，第392-396页；S.鲁本松(Rubenson)，1966年，第35-45页。
[51] 关于特沃德罗斯的预言，见R.K.P.潘克赫斯特，1974年。
[52] 大不列颠，1868年，第143-144页。



图片15.4 特沃德罗斯皇帝视察筑路情况

的人都会以妥协作为通往皇帝宝座的跳板而他却压制大封建主的权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在欧洲，粉碎大封建主的权力这一艰巨任务是经过一系列国王的统治才实现的，而他却是以将所有危险人物都囚禁起来进行的……他将来自不同省份的士兵置于他所信赖的追随者手下，而对追随者，他给与了高级头衔，但却没有审判和

惩罚的权力，这样，实际上用将军取代了封建首领……

关于商业，他取缔了好几项令人头痛的苛捐杂税，下令在他的领地中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征收捐税……他还打算解除老百姓的武装，建立一支正规的常备军，完全用滑膛枪武装，他宣布要将刀剑和长矛铸成犁铧和镰刀，使耕牛的售价比最好的战马还要贵……

他的一些想法可能不完善，另外一些可能不实际，但是一个成就了这么多事业并有这么大抱负的人……绝不能等闲视之。[53]

事实证明，特沃德罗斯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统一者、创新者和改革者。[54]他在加冕后即挥师进入瓦洛，夺取了默克德拉这座天然的高山城堡，后来他又定都于此。在当年的晚些时候，他入侵绍阿，这是最后一个处于他统治之外的基督教省份。他任命已故国王海拉·马拉科特的兄弟海拉·米凯尔作为他的总督，并将其子曼涅里克带走作为人质。

特沃德罗斯认识到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控制国家，于是他改组了军队。英国旅行家 394 亨利·达夫汤写道，特沃德罗斯同埃及人打仗的经验使他深信，"原始的作战方法"必须要"废除"。[55]于是，他力图用一支由装备精良的职业士兵组成的军队，取代不给报酬、从封建主那里征集来的士兵，这些人往往在农村劫掠，在战场上却效率不高。早在1853年就有报道说，他已在一些土耳其人的帮助下"训练了他的军队"，[56]在这方面他也利用了一名英国冒险家约翰·贝尔。[57]特沃德罗斯采用给他的士兵"一笔钱"的做法，使他们习惯于定期领取薪金，[58]并把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混合起来编成团队，"从而给那种使士兵聚集在老家的首领周围的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59]他为军队设立了粮仓，命令他的士兵去购买食品，而不是去骚扰农民，尽管这种禁令很难实行。[60]

特沃德罗斯决心增强部队的火力，试图在外国商人的帮助下进口军火，[61]但这很困难，因为苏丹的埃及人和马萨瓦的土耳其人都充满敌意，而很大程度上不受他控制的提格雷统治者也不情愿让武器通过自己的地盘。于是他想出了强迫传教士和其他外国工匠来制造枪炮的计划。1855年，他接受了耶路撒冷新教主教塞缪尔·戈巴的提议，从瑞士巴塞尔附近的克里斯乔纳学院给他派来一组工匠传教士。当他们献上《圣经》作为礼品时，特沃德罗斯宣称，他"更愿意得到一箱英国火药"。[62]但他深知工匠的价值，待他们很好，让他们住在他的首都德布拉塔博尔附近的加法特。后来又来了一个法国枪炮工人和一个从俄国军队

---

[53] 大不列颠，1868年，第150-151页。

[54] 关于对特沃德罗斯的不同看法，见A. 达巴迪(d'Abbadie)，1868年a，1868年b；T. 诺尔迪克(Noldeke)，1892年，第257-284页，C. J. 贾因内姆(Jaenem)，1966年，第25-56页；D. 克鲁梅(Crummey)，1969年，第457-469页，M. 摩根(Morgan)，1969年，第245-269页。

[55] H. 达夫汤(Dufton)，1867年，第138页。

[56] 大不列颠，1868年，第76页。

[57] H. 达夫汤，1867年，第183-184页。

[58] 大不列颠，1868年，第150页。

[59] 同上，第166页。

[60] M. 莫雷诺(Moreno)，1962年，第160-161页。

[61] H. M. 斯坦利(Stanley)，1871年，第273页；R. K. P. 潘克赫斯特，1972年，第92页。

[62] C. T. 比克(Beke)，1867年，第259页。

中开小差的波兰人。[63] 1861 年，特沃德罗斯命令这些外国人建造一门大炮和一些臼炮与炮弹。[64] 开始时传教士们不愿意，但皇帝坚持要他们造，并把他们的仆人关起来，直到他们的主人们表示同意。"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只好答应试试"，没过多久，德布拉塔博尔人就看到炮弹直飞云天，霹雳一声炸开，使周围的山峦传来成千的回声"。[65] 特沃德罗斯赐给工匠们象征荣誉的衬衫，装金饰银的马匹和骡子，以及每人一千玛丽亚-特蕾西亚元，随后命令铸造更大的武器。最后他让人建造能发射重一千磅炮弹的大炮。这门被称为"塞巴斯托波尔"的大炮重七吨，要五百人才能拉动。皇帝说，铸造这门炮的那天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他还打算"派一些比较聪明的臣民到英国和法国去学习有用的技艺和制造方法"。[66]



图片 15.5 特沃德罗斯皇帝的大炮"塞巴斯托波尔"

特沃德罗斯很清楚让他的部队尽可能快地行动的必要性，派他的欧洲工匠去修筑道路。[67] 士兵们不喜欢体力活，不愿意干，但皇帝自己以身作则。据一位英国观察家亨利·布朗说，"从清晨到深夜……他自己都在干活，亲自动手搬石头，平整路面，帮助填平深沟。只要他在那儿，谁也不能离开。"工程"使其他人望而生畏"，但特沃德罗斯"一点一点地使道路即使在欧洲工程师眼中也像个样子了。"[68] 根据设计，他的道路要在崇山峻岭中将德布拉塔博尔同贡德尔、戈贾姆和默克德拉连起来。在另一名英国观察家克莱门茨·马卡姆的笔下，通往默克德拉的道路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程，是矢志不渝和不可征服的决心的

395

---

[63] H. 达夫污，1867 年，第 81-83 页。
[64] 同上，第 83-84 页。
[65] 同上，第 84-85 页。
[66] 同上，第 138 页。
[67] 大不列颠，1868 年，第 189 页。
[68] H. 布兰科(Blanc)，1868 年，第 344 页。

不朽功业"。[69]

特沃德罗斯尽管英勇善战，但却非常关注使他历经战乱的家园得到休养生息。1855 年，他下了一道敕令，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返回其合法的行业，商人去做买卖，农民去耕地。"[70] 他还力图根除盗匪活动。有一次，一群盗匪全副武装来到他的面前，要求他认可他们有行使父辈职业的权力。他毫不犹豫地问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傲慢地回答说"拦路抢劫"。"你们的职业，"他回答说，"是危险的，干农业要更有利可图。下去到平地上去耕种……我会亲自给你们耕牛和犁铧。"那些人顽固不化，他约他们以后再谈。第二次他们还是不肯，于是他命令手下的士兵将他们射杀和砍死。据法国旅行家纪尧姆·勒让说，这种严厉的做法带来了和平，并使由于土匪和内战直到那时还血迹斑斑的商路变得像法国和德国的商路一样安全。[71] 特沃德罗斯迫切希望将其帝国结成一个整体，还力图消除宗教分歧。据普劳登记载，他命令在他统治下的穆斯林"在一年内改宗基督教"，并赶走了所有的罗马天主教徒。[72] 后来有人说他曾宣布，如果他未能"使加拉人和阿姆哈拉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就不能算是个基督徒。[73] 为了巩固对提格雷的控制，他在第一个妻子死后，娶了宿敌韦伯侯爵的女儿特鲁纳什，或称特鲁沃克。[74] **396**

这位锐意改革的君主也没有放过教会。他早在 1857 年就将教会的首领阿布纳·萨拉马拘禁起来。特沃德罗斯力图减少教士的人数，削减教会的土地，使僧侣们依靠国家的薪俸。[75] 这些措施受到教士们拼命的反对。[76] 从长远看，僧侣们的敌意，加上各省心怀不满的贵族，使得大多数人背叛他。据瑞典历史学家斯文·鲁本松说，这"可能是导致他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77]

事实证明，各省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第一个挑战来自提格雷。1856 年，那里一个持异议的首领阿高·尼格塞试图取得法国的保护，表示愿意接受一位罗马天主教德雅各比主教来当阿布纳。1859 年，尼格塞割让祖拉港以换取法国的军事支持。[78] 但法国人担心冒犯英国人，没有批准这项协议。[79] 1860 年，尼格塞被击溃。 **397**

但是特沃德罗斯统治的后期却更为艰难。叛乱此起彼伏，主要是瓦洛的阿马德·贝希尔领导的叛乱，特沃德罗斯在那儿进行了坚决的战斗。与此同时，绍阿的土王贝萨贝也宣布独立。戈贾姆则落入一个反叛的贵族特迪亚·格沃鲁手中，另一个首领蒂索·戈巴塞夺取了贡德尔，拉斯塔前统治者的儿子瓦格舒姆·戈巴塞也在那里造反。同样严重的是，绍阿的王位继承人曼涅里克于 1865 年逃离默克德拉，自称是一个独立的君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反叛，特沃德罗斯求助于暴力。他在 1864 年焚烧了贡德尔，又于 1866 年再度掠夺此

---

[69] C.R. 马卡姆(Markham)，1869 年，第 295-296 页。
[70] G. 勒让(Lejean)，1865 年，第 63 页。
[71] C. 蒙东-维达赫特(Mondon-Vidailhet)，无出版日期，第 23-24 页；G. 勒让，1865 年，第 63-64、67 页。
[72] 大不列颠，1868 年，第 143 页，又见第 172 页。
[73] M. 莫雷诺，1962 年，第 162 页。
[74] S. 鲁本松，1966 年，第 56 页。
[75] R.K.P. 潘克赫斯特，1968 年，第 143 页。
[76] D. 达夫汤，1867 年，第 140 页。
[77] S. 鲁本松，1966 年，第 72 页。
[78] S. 拉塞尔(Russel)，1884 年；J. 科尔摩丁，1912-1915 年，第 139-143 页，145-146 页。
[79] G. 杜安(Douin)，1936-1941 年，第 3 卷，第 1 部分，第 248-249 页。



图片 15.6 19 世纪 40 年代的埃塞俄比亚教士

地及其邻近的登伯亚，他手下的士兵摧毁了这座旧都城中的大多数寺庙。用于宗教仪式的十字架、手稿及其它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劫掠到德布拉塔博尔去。许多铜器和银器被熔化后铸造大炮。成百上千人被处死。这种残暴行为同特沃德罗斯使人喜欢的性格，譬如他对孩子们的喜爱，[80] 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使马卡姆将他比做俄罗斯的彼得大帝。[81]

同英国的冲突

同英国一场不同寻常的争执，使特沃德罗斯统治的最后几年罩上了阴影。由于面临帝国内部日益增长的反抗和需要欧洲的技术援助，他于 1862 年分别致函维多利亚女王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建议向他们派出大使。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激起了冲突，信中说：

> 我的父王们忘记了我们的上帝，他将他们的王国拱手让给了加拉人和土耳其人。但上帝创造了我，把我从尘世中举出，将这一帝国重新置于我的统治之下……凭着他的力量我赶走了加拉人。但对土耳其人，我已告诉他们离开我的祖先的土地。他们如不同意，我就同他们全力相搏。

他解释说，土耳其人阻止他派出使节，并说他希望维多利亚女王能为其安排“安全通

---

[80] D. 达夫茨，1868 年，第 106 页。
[81] C. R. 马卡姆，1869 年，第 293 页，又见 D. 克鲁梅，1971 年，第 107-125 页。

道"。[82] 英国代表卡梅伦领事将这一请求转达给伦敦，说写信人曾请他从英国介绍工程师和 398 医生，并说"不必担心待遇不好"，因为为这位君主工作的教士们所享受的待遇"非常慷慨"[83]。这两封信在2月中旬寄到伦敦，却没有引起重视。对皇帝的信没有答复，卡梅伦的信也直到4月底才由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伯爵给了一个毫无同情意向的答复。[84] 他后来说，英国政府感到"鉴于阿比西尼亚国王在位时间短暂"，要求"尽可能撤消在阿比西尼亚承担的义务、同阿比西尼亚的结盟关系和英国对阿比西尼亚的干预。"[85]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信仍无回音，特沃德罗斯变得不耐烦起来。英国政府对埃塞俄比亚不感兴趣，这使他恼怒，当他知道法国支持了反叛的尼格塞时，更感到自己的皇家尊严受到了轻视。卡梅伦跑去访问埃及统治下的苏丹边境，与那里的官员互表善意，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站到了正在骚扰埃塞俄比亚的敌人一方，这无异是雪上加霜。[86] 罗素给卡梅伦的信证实了皇帝的担心，因为信中无礼地宣称，"不希望女王陛下的代表去干预阿比西尼亚的事务"，并要领事返回马萨瓦，留在那里，"直到接到进一步的通知"。[87] 英国政府似乎正在断绝同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转而支持埃及和马萨瓦的土耳其人。此后不久，特沃德罗斯听说一个名叫亨利·斯特恩的传教士发表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言论，包括教士们受到折磨和判处拘禁的控告。又过了不长时间，11月卡梅伦的秘书克伦斯带着一封罗素伯爵秘书写的信回来，提醒领事曾指示他返回马萨瓦的训令，并说，他只是港口的领事，"在阿比西尼亚没有代表资格。"[88]

克伦斯带回来的一件礼物更使特沃德罗斯怒火中烧——那是一块地毯，上面画着一个包着穆斯林头巾的士兵，正在攻击一头狮子，他后面是一个骑在马上的欧洲人。特沃德罗斯认为野兽是指他，士兵是指埃及人、骑手代表支持埃及人的法国人。他厉声问道，"那支持狮子的英国人在哪里呢?"[89] 他的结论是，英国正在把他抛给埃及，这并非不着边际的假设，因为此时由于美国内战，世界棉花供应短缺，英国正急于同年产七千万公斤棉花的埃 399 及搞好关系。[90] 后来，埃塞俄比亚自中世纪起就设在耶路撒冷的女修道院[91] 院长回到国内，带来消息说，埃及的科普特僧侣曾试图夺取这座修道院，而英国代表不愿站在埃塞俄比亚一方进行干预，[92] 特沃德罗斯勃然大怒，于1864年1月做出反应，将卡梅伦及其伙伴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领事被禁止离开埃塞俄比亚的消息使英国政府感到震惊。皇帝那封久已被遗忘的信从档案中找了出来，并很快起草了回信，托英国驻亚丁的助理驻节公使霍尔穆兹德·拉萨姆带去。拉萨姆几经周折，于1866年2月抵达皇帝的营地。到这时，特沃德罗斯

[82] 大不列颠，1868年，第225页。
[83] 大不列颠，1868年，第223-224页。
[84] 同上，第229页。
[85] 同上，第396页。
[86] C.T.比克，1867年，第93-94页。
[87] 大不列颠，1868年，第229页。
[88] 同上，第236-243页。
[89] C.T.比克，1867年，第124-125页。
[90] 同上，第35页。
[91] 关于埃塞俄比亚同耶路撒冷的关系，见E.塞鲁利，1957年。
[92] C.T.比克，1867年，第129-134页。

的境况已严重恶化。T.M. 弗拉德报告说，“整个国家”处于“极为动荡的状态中，到处发生叛乱”，[93] 而C.D. 卡梅伦预言说，该国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夕”[94]。尽管如此，特沃德罗斯仍热烈地欢迎了拉萨姆，[95] 并释放了卡梅伦、斯特恩和其他外国人。但此后不久，他又逮捕了拉萨姆和其他外国人，显然是希望迫使英国政府倾听他索要外国工人的请求。4 月，他派弗拉德前往英国，要求获得两名枪炮工人和一名炮兵军官，以及几名其他工匠，还有他的铸造厂需要的一个鼓风蒸汽机和一个火药粉碎机。[96]

一开始，拘留拉萨姆及其同事的举动达到了特沃德罗斯预期的效果。1866 年 7 月，英国驻埃及代表评论说，被捕者能否获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所能得到的“满足”。[97] 8 月，英国驻亚丁的政治驻节使米尔韦瑟中校声称，政府应“公开地并非常慷慨地”满足皇帝的请求。[98] 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主张，不到一个星期就同意了特沃德罗斯的请求。[99] 但几天之后，从弗拉德的妻子那里传来的消息说，特沃德罗斯又将俘虏们关了起来。实际上同外国人的关系变得更坏。拉萨姆试图安排囚犯们离境，这使统治者发怒。又有消息说一家英国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要在苏丹境内修建一条旨在协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铁路，这更是火上浇油。于是特沃德罗斯下令将俘虏们迁往默克德拉的城堡。弗拉德的反应是建议英国政府放弃派工匠给皇帝的计划，“因为我担心达不到释放被关押者的目的。很可能他将继续要求英国政府永远无法交出的其它东西……我认为女王政府应立即采取更强硬的立场”。[100] 这样一来，皇帝的策略流产了。米尔韦瑟写道，“关押拉萨姆先生的做法”是对英国的“极大伤害与凌辱”，原先的计划“无法实施”了。[101] 于是决定工匠们应前往马萨瓦，在囚犯们获释并真正抵达港口之前不派往内地。而皇帝则宣称，直到工匠们抵达他的宫廷后才能释放他们。

400

特沃德罗斯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强大的统治者了，因为他已丧失了除伯根德省、瓦洛、达兰塔和几个次要地区外的几乎全部国土。[102] 米尔韦瑟在 1867 年 1 月报告说，他的境况“已变得岌岌可危”，他的势力在“迅速下降”，除非他采取“某些与他事业早期名声相符的辉煌之举，他的统治将在几个月内终结”。[103] 英国人知道他们的敌人实力已江河日下，于 7 月决定进行军事干预。由印度派出一支由孟买驻军总司令罗伯特·内皮尔爵士陆军中校率领的远征军。这支远征军避开由奥斯曼帝国防守的，通常会选择的马萨瓦港，于 10 月在祖拉登陆。与此同时，特沃德罗斯则在为即将到来的较量进行孤注一掷的准备。他放火焚烧放弃了的德布拉塔博尔，将大炮拖到默克德拉这个几乎唯一仍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地方，准备在这里迎击敌人。

---

[93] 大不列颠，1868 年，第 348 页。
[94] 同上，第 351 页。
[95] H. 拉萨姆(Rassam)，1869 年，第 2 卷，第 45 页。
[96] 大不列颠，1868 年，第 478 页。又见 H. 拉萨姆，1869 年，第 2 卷，第 102-103 页。
[97] 大不列颠，1868 年，第 484 页。
[98] 同上，第 492 页。
[99] 同上，第 503 页。又见 R.K.P. 潘克赫斯特，1968 年，第 217-235 页。
[100] 大不列颠，1868 年，第 508 页。
[101] 同上，第 509-510 页。

英国军队由 12,000 人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印度人，部分士兵装备着尚未在战争中使用过的后装式步枪，他们一路无阻地向内地挺进。在提格雷，这支入侵部队得到卡萨侯爵，即未来的约翰尼斯四世皇帝的合作，与此同时，拉斯塔的瓦格舒姆·戈巴塞和绍阿的曼涅里克国王也持赞同态度。4 月 10 日耶稣受难日——在埃塞俄比亚这是一个禁食的日子，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真正的战斗在默克德拉脚下的阿罗热打响了。英国人使特沃德罗斯的部队受到重大伤亡，他们未曾试过的大炮并未发挥作用。[102]内皮尔尽管没有得到如何对待埃塞俄比亚君主的指示，还是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宣布如果他"向英国女王俯首"，将所有欧洲人"于今日移交给英国营地"，就可保证得到"合乎尊严的对待"。[103]特沃德罗斯不愿受到这样的羞辱，以一封傲气十足的信作答，这实际上成了他的最后遗言。他在信中问他的人民，"如果由于上帝的安排我不能亲自和你们一同出发以鼓舞你们，你们就将永远在敌人面前四散逃跑吗?"他对英国人则说，他的臣民抛弃了他，仇恨他，因为他向他们征税，并试图用军事纪律来约束他们。关于战争的结局，他惊叹道：

> 我那热爱我的追随者们，被一颗子弹吓坏了，不顾我的命令四散逃走……
>
> 我相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君主，我与你们交战，但由于我的大炮无用，我的所有辛苦均付诸东流。
>
> 我的国人以我信奉欧洲人的宗教来羞辱我，说我变成了一个马瑟尔人，并以十种不同的方式对我挑衅，使我对他们怒火中烧。但愿上帝能从我对他们的恶行中引出善事。他的意志将变为现实。如上帝有此天意，我曾试图征服整个世界。假使我的目的无法实现我愿意去死。从我有生以来，至今没有人敢伤害我……我曾希望在阿比西尼亚征服所有的敌人后发兵耶路撒冷，将土耳其人从那里赶走。一个曾将大力士当孩子玩于股掌之上的勇士，绝不会允许自己让他人玩于股掌之上。[105]

在写完这封非同凡响的信后，特沃德罗斯举枪对准自己的头，试图自杀，但他的士兵从他手中夺下了武器。于是他释放了拉萨姆、卡梅伦和教士们，但继续扣押着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其他几个欧洲人。第二天，他向内皮尔提出送一千头牛和五百只羊以换取和平，在他听到这一提议被接受后，便释放其他的人质。然而，当内皮尔听说特沃德罗斯的礼物的"分量和性质"后，他决定拒绝。皇帝意识到这意味着敌意仍将继续，试图逃走，但后又改变了主意，回到了默克德拉。

尽管扣押的人已经获释，远征的目的达到了，[106]英国人还是于 4 月 13 日对默克德拉发起了进攻。特沃德罗斯的军队，除了 28 门大炮和 9 门"有工整的阿姆哈拉铭文"的当地制

---

[102] S. 鲁本松，1966 年，第 81 页。

[103] 大不列颠，1868 年，第 550 页。

[104] 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见 K. St. C. 威尔金斯(Wilkins)，1870 年；T. J. 霍兰 (Holland) 和 H. M. 奥齐耶(Hozier)，1870 年；H. M. 斯坦利，1871 年；C. R. 马卡姆，1869 年；A. J. 谢泼德(Shepherd)，1868 年；H. M. 奥齐耶，1869 年；F. 迈亚特(Myatt)，1970 年。

[105] C. R. 马卡姆，1869 年，第 327 页。

[106] 同上，第 330-331 页。

造的黄铜臼炮外，[108]还有三千支“勉强算好”的前装枪和一千支火绳枪。据莫齐上尉说，那些在当地制造的火炮，“比英国人的强得多”，“要不是炮手临阵逃脱，一定会给攻击者造成很大损失。”[109]特沃德罗斯似乎很快看到抵抗是徒劳的。他让追随者们解散，叹息道：“完了！我不能落人他的手，我得自杀。”于是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嘴，扣动了扳机。[110]

英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准备离开。他们从未打算留下，并许诺一旦解决了同特沃德罗斯的争执就撤走。只是基于这种谅解，土耳其人才允许他们登陆，卡萨才同意他们通过提格雷。在离开之前，他们摧毁了默克德拉城堡和它的大部分大炮，并根据他母亲的要求带走了特沃德罗斯的幼子阿拉马耶胡，[111]以及皇帝收集起来准备建立图书馆的大约四百份手稿。[112]远征的最后一个行动，是赠送提格雷的卡萨12门重炮，752支滑膛枪和一批弹药作为奖励。这些军火在后来的权力之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法国人出现在奥博克，意大利人来到阿萨布

19世纪下半叶，法国人对奥博克港的兴趣逐渐增长。1856年，法国驻亚丁的领事M.朗贝尔买下了这个港口。[113]但随后并没有实际占领，只是在1862年签订了一个新条约，四名阿法尔首领以一万玛丽亚-特蕾西亚元的价格，将这块领土割让给法国，并承诺“集体和分别地”拒绝任何“没有得到法国皇帝陛下政府批准”的提议。[114]这一协定尽管行文浮夸，但在当场并未受到高度重视。一位英国观察家沃克领事报告说，那位主要的首领“在拿到403 钱后就无影无踪了，他的继任者既不赞同法国人有权买下这块地，也不认为首领有权处置它”，而法国人修建的几座棚屋“在他们走后就被扔进海里”。[115]

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11月开通后，欧洲人对这一地区的兴趣更大了。就在那个月，一个意大利的遣使会传教士朱塞佩·萨佩托代表意大利海军部以六千玛丽亚-特蕾西亚元的价格，从两个阿法尔素丹手中买下了阿萨布港。次年3月他以意大利鲁巴蒂诺航运公司代表的身份回到那里时，发现卖主对价格不满意。于是又缔结了一项新的条约，新加入的第三个首领同前两个一道，又得到了8100玛丽亚-特蕾西亚元，同时说服另一个首领以每年一百玛丽亚-特蕾西亚元的租金，将附近的一座岛屿出租十年，外加2000卢比（约合1000玛丽404 亚-特蕾西亚元）授予的购买权。[116]这些活动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意大利同绍阿的联系奠定了基础。

---

[107] 见R.K.P.潘克赫斯特，1973年a，第189-203页；C.杰斯曼（Jésman），1966年，第94-151页。
[108] C.R.马卡姆，1869年，第240页。
[109] T.J.奥齐耶（Hozier），1869年，第240页。
[110] C.R.马卡姆，1869年，第352页。
[111] R.K.P.潘克赫斯特，1973年b，第17-42页。
[112] 阿穆尔里勋爵（Lord Amulree），1970年，第8-15页。
[113] P.索莱莱（Soleillet），1886年，第23页。
[114] E.埃尔茨莱（Hertslet），1894年，第1卷，第269-270页。
[115] 大不列颠，1868年，第231-232页。
[116] 意大利，外交部，1906年，第1卷，第25-28页。又见G.杜安，1936-1941年，第3卷，第2部分，第240-249页。



图片 15.7 特沃德罗斯皇帝在罗伯特·内皮尔爵士面前自杀(现代人的解释)

约翰尼斯皇帝与埃塞俄比亚统一

特沃德罗斯之死使埃塞俄比亚陷入分裂，没有一个皇帝。三个相互对立的人物在不同地区执掌权力。曼涅里克自封绍阿国王，而成为姆哈拉、瓦格和拉斯塔的统治者的戈巴塞公爵也加冕称王，于1868年自称“塔基亚·乔吉斯”。但是第三个人物，提格雷的卡萨才是实力最强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那批军火。1871年，戈巴塞挥师夺取了提格雷的首府阿杜瓦，但是卡萨于7月击败了他，并于1872年1月在阿克苏姆加冕成为约翰尼斯四世皇帝。[10]

[10] W. Mc. E. 戴伊(Dye)，1880年，第473页。又见加布雷-塞拉西(Gabre-Sellassie)，1975年，第17-53页。



图片 15.8 约翰尼斯四世皇帝

这位新皇帝注定要取得比特沃德罗斯更为有效的统一，他采取了对各省贵族实行一项更具和解性的政策，[98]自己则以教士的朋友和保护者的面目出现。他在加冕之前，成功地从埃及请来一位"阿布拿"(abuna，科普特教会首脑)，后来又同耶路撒冷的埃塞俄比亚社区建立了联系，并给他们送去急需的资金。他修建了许多教堂，最为著名的是位于阿杜瓦和默克德拉的教堂，将古都阿克苏姆的大量土地赐与教会，并恢复了对俯瞰红海的德布拉比赞修道院的资助。[99]他在同妻子哈利玛成婚前让她改变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还试图使穆斯林，[100]特别是阿泽博-奥罗莫人中的穆斯林，以及那些被迫害不信天主教的人接受集体洗礼。[101]由于迫切希望净化宗教的实践，他禁止搞巫术，并按照埃塞俄比亚教会对烟草的反对，禁止吸烟和吸鼻烟。[102]而在军事方面，他却乐于创新，进口武器，并雇用一名英国军官约翰·柯卡姆

[98] G. 罗尔夫斯(Rohlfs)，1885 年，第 58 页，又见加布雷-塞拉西，1975 年，第 16、250-257 页。

[99] 加布雷-塞拉西，1975 年，第 33-34 页；R. 佩里尼，1905 年，第 86 页；L. 维拉里(Villari)，1958 年；G. W. B. 亨廷福德，1965 年，第 79 页；R. K. P. 潘克赫斯特，1966 年 c，第 100-101 页。

[100] J. S. 特里明厄姆，1952 年，第 122 页；加布雷-塞拉西，1975 年，第 94-100 页。

[101] 关于约翰尼斯的宗教政策，见 G. M. 基达纳(Kidana)，1972 年。

[102] M. 拉马(Lamma)，1959 年，第 52 页；A. B. 怀尔德(Wylde)，1901 年，第 44 页；R. K. P. 潘克赫斯特，1968 年，第 5 页。

来训练他的士兵。[123]

约翰尼斯在统治初期面临埃及的强大压力。埃及当时是非洲大陆最为强大的国家，时运不佳的赫迪夫·伊斯梅尔，正在苏丹建造一个帝国，并希望兼并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领 405 土。1868年5月，奥斯曼的素丹再次将马萨瓦置于埃及的统治之下，从而造成了冲突的场所。埃及人占领马萨瓦港口后又夺取了祖拉，并切断了埃塞俄比亚的武器进口。1872年春，在埃及军中任职的瑞士冒险家韦尔伯·蒙青格尔占据了埃塞俄比亚同苏丹交界处的两个区，博戈斯和哈勒哈勒，[124]位于马萨瓦内地的艾莱特的首领又将他那个区卖给了埃及政府。面对这些侵犯，约翰尼斯于9月将柯卡姆派往英国，带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一封信，吁请她帮助反对埃及的扩张。后来，柯卡姆代表皇帝致信女王，请她注意埃塞俄比亚没有可以用来同"欧洲基督教大国"联系的港口这一"不公正"的现象，并补充说，如果欧洲列强 406 保证埃塞俄比亚"在红海有一个出口"，约翰尼斯准备同他们订立"最慷慨的通商条约"。[125]然而这种呼吁并没有从伦敦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支持。[126]

约翰尼斯急于同外国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任命了英国人亨利·金为驻伦敦的领事，[127]并且在他看到反对贩奴运动的力量时，就告诉英国人他打算通过处死从事奴隶买卖的商人来清除奴隶贸易。埃塞俄比亚的法典(Fetha Nagast)早就禁止奴隶买卖，但这一禁令只适用于基督徒，不适用于穆斯林商人。[128]

这时，已在红海南部沿岸站住脚的埃及人，正向亚丁湾地区扩张。1873-1874年冬天，他们一度夺取了柏培拉。次年冬天，又对柏培拉和泽拉实行了永久性的占领。[129]随后，他们向内地推进，于10月夺取哈勒尔，刚刚在那里掌权的埃米尔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无力进行抵抗。[130]

埃及人在东面取得了立脚点后，又决心兼并远至默勒卜河的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他们派出一支由埃及贵族阿雷凯尔·贝伊、丹麦军官阿伦德吕普上校和奥地利人齐奇伯爵率领的2500人的部队，装备着现代化的雷明顿式后膛步枪和野战炮。约翰尼斯得知入侵者已前进到阿斯马拉，于是下令整个王国拿起武器。[131]大批的人自愿投入这场他们视为像十字军抵抗伊斯兰教入侵的战争。约翰尼斯就这样聚集起可能有7000人的武装力量。1875年11月15日，决定性的战斗在贡达特打响了，皇帝的军队向入侵者发起攻击，并几乎全部歼灭了敌人。阿雷凯尔和阿伦德吕普均被击毙，齐奇受了重伤，约翰尼斯缴获了2500支雷明顿式步枪，14门大炮和两万玛丽亚-特蕾西亚元。与此同时，埃及人从内地塔朱拉派出另一支

---

(123) E.A.德科松(De Cosson)，1877年，第2卷，第64页。

(124) A.B.怀尔德，1901年，第22-23页；G.罗尔夫斯，1885年，第43页；G.杜安，1936-1941年，第3卷，第2部分，第337-344页。

(125) 公共档案馆，基尤，FO1/27，致外交部，1873年5月13日。

(126) G.杜安，1936-1941年，第3卷，第2部分，第378-387页，第403-409页。

(127) J.德库尔萨克(de Coursac)，1926年，第107-118页。

(128) P.察迪尤(Tzadue)，1968年，第175-178页。

(129) G.杜安，1936-1941年，第3卷，第2部分，第266-279页，第3A部分，第547-555、583-602页。

(130) 同上，第3卷，第3A部分，第602-607页；J.S.特里明厄姆，1952年，第120-122页。

(131) W.Mc.E.戴伊，1880年，第135页。

纵队，这支队伍遭到当地阿法尔人的截击，指挥官穆津格尔及其手下的许多人被杀。[132]

伊斯梅尔决心要为这些惨败复仇。1876年2月，由雷提布·帕夏、赫迪夫的儿子哈桑·帕夏和美国军官洛林将军率领的一支更大的、装备精良的两万人的部队向内地进发。约翰 407 尼斯的回答是号召基督徒再一次集合起来反抗异教的敌人。尽管埃及人装备着雷明顿步枪和克虏伯野战炮，但人数仍然处于劣势，因为响应皇帝召唤的人有近20万。3月7日至9日，埃塞俄比亚人在古拉投入战斗，入侵者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再度赢得了非凡的胜利。在埃塞俄比亚人的攻击下，只有几百个埃及人死里逃生，他们将16门大炮和12,000至13,000支雷明顿步枪以及许多弹药和其它给养抛在了身后。[133]

埃塞俄比亚人在贡达特和古拉取得的胜利，打破了埃及人建立帝国的梦想。伊斯梅尔损失了两万多人，还有多数的大炮和其它武器，并且使他的国家面临经济崩溃，因此不得不抛弃扩张主义的目标。不久，他陷入破产，并于1879年6月被赶下王位。与此同时，不满情绪在他的军队中蔓延，主要原因是那些将埃及士兵引向灾难的土耳其和切尔克斯的指挥官们既傲慢又无能。在埃塞俄比亚的失败，为赫迪夫日后种下了苦果。在崩溃期间驻扎在马萨瓦的埃及上校阿拉比·帕夏，日后成了埃及第一次民族主义起义的领导人，决非偶然。

埃塞俄比亚尽管是胜利者，同样深受战争之害。早在1873年，一个英国旅行者E.A.德科森就曾评述说，由于埃及人的蹂躏，哈马森高原的"人口锐减"，阿斯马拉"几乎空无一人"。[134]约翰尼斯方面则力图减少这种贫困，据一个在埃及军中的美国人威廉·戴伊上校说，约翰尼斯下令，尽管他的士兵可以拿走谷物，"但畜群和衣物必须留下"。[135]1875至1876年的战役，以及随后一个受埃及人支持的首领瓦尔达·米卡埃尔公爵的劫掠却导致巨大的破坏。[136]一个英国观察者，A.B.怀尔德后来注意到，米卡埃尔"使以前以成千的村庄而闻名的哈马森高原……变成断壁残垣、鬼哭狼嚎的荒郊野地，那里只有饥肠辘辘的农民。"[137]

尽管如此，战胜埃及还是提高了约翰尼斯的声望和实力，他由于夺取了物资，成了三个世纪以前枪支传进这一地区以来这个国家第一个有精良装备的统治者。战斗结束后，他可以腾出手来继续进行统一事业。他挥师南进，到瓦洛去同曼涅里克算帐。这位绍阿的统治者依 408 赖通过埃及人占领地区运来的物资，在约翰尼斯需要的时候没有支持他，并且对深入皇帝利益范围的伯根德省和戈贾姆省进行远征，同时与赫迪夫友好地互致信函。[138]

---

[132] A.B.、1901年，第23-25页，G. 杜安，1936-1941年，第3卷，第2部分，第745 1075页；加布雷 塞拉西，1975年，第61-65页。

[133] 关于埃及战役，见W.Mc.E. 戴伊，1880年，全书各处；G.B. 希尔(Hill)，1881年，第205 206页；G. 罗尔夫斯，1885年，第44 54页；A.B. 怀尔德，1901年，第26-81页；M. 谢纳(Chalne)，1913年，第8页；J. 德库尔萨克，1926年，第322-324页及全书各处；A. 比佐尼(Bizzoni)，1897年，第60 64页，J.S. 特里明厄姆，1952年，第121-122页，加布雷 塞拉西，1975年，第59 63页。

[134] E.A. 德科森，1877年，第1卷，第50页。

[135] W.Mc.E. 戴伊，1880年，第292页。

[136] 同上，第652页。

[137] A.B. 怀尔德，1901年，第28页

[138] 关于曼涅里克确实同埃及人合谋反对约翰尼斯的说法，见H.G. 马库斯(Marcus)，1975年，第38-43页；及加布雷-塞拉西，1975年，第55-59、61、65、260-262页。

提格雷和绍阿这两个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最强大部分的统治者之间的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曼涅里克开始打算和平解决，但在听到约翰尼斯提出的苛刻条件后，于1878年1月着手动员他手下的人们。然而，发生冲突的前景使双方阵营中的许多人感到害怕，认为这只会使共同的敌人坐收渔翁之利。在两人中间，约翰尼斯实力更强，然而他缺少供应，还要在敌对领土上与一支绝非无足轻重的军队作战。结果尚不可知，但大量的军火意味着可能发生的惨重伤亡。许多僧侣和教会人士奔走于双方阵营之间，敦促两位君主认识到流基督徒的血是不受欢迎的。

约翰尼斯相信了达成妥协更为有利，于2月同意与曼涅里克进行谈判。3月，由皇帝的一名僧侣进行的谈判达成了协议，其内容虽未公布，但似乎包括以下几点：[39]

1. 曼涅里克放弃皇帝的称号。

2. 在纳税的条件下，约翰尼斯承认曼涅里克的独立。

3. 约翰尼斯同意曼涅里克加冕成为绍阿和瓦洛的国王，承认曼涅里克的后裔有继任那些省份统治者的权利。

4. 两位统治者承诺在另一方需要时提供援助。

5. 曼涅里克同意泽拉和绍阿之间的通道两年后对欧洲人关闭。

随后，约翰尼斯以盛大和显赫的仪式为他以往的敌人加冕。这一行动一方面标志着约翰尼斯在法律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曼涅里克事实上享有独立。[40]

后来，两位统治者又在瓦洛的博鲁梅达会晤，讨论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内部的宗教之争，以及最好使穆斯林和传统宗教信仰者改变信仰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家边缘那些不知是否效忠的地区。两位统治者同意分别用三年和五年的时间来改宗基督教，所有非基督教的 **409** 政府官员都应受洗。[41] 于是，瓦洛的两个主要首领，伊玛目穆罕默德·阿里和伊玛目阿巴·瓦塔在施洗礼时命名为米卡埃尔和海拉·马尔亚姆，并获得了公爵和侯爵的身份。[42] 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其他许多人也改变了宗教信仰，许多清真寺及传统宗教的神殿都被拆毁。然而许多这类改宗都是名义上的。意大利传教士马萨拉看到一些改宗者从接受洗礼的教堂出来便径直前往清真寺去消除洗礼，[43] 还有不少人被称为“白天的基督徒，夜晚的穆斯林”。有一些穆斯林逃往国外，但在某些不允许非基督徒占有土地的地区，受洗使穆斯林得到了土地，这些土地即使在他们回归伊斯兰教后也依然保留了下来。[44] 博鲁梅达协定的另一个结果是，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于1879年被逐出绍阿。约翰尼斯一直反对各种传教士。[45] 虽然认为传教士的主要价值是提供技术，他们离去可能造成不利后果，但曼涅里克以雇用其他外国

---

(39) G. 马萨拉(Massala)，1892年，第2卷，第5-23页；A. 切基，1886-1887年，第1卷，第422-423页；T. 沃尔德迈耶(Waldmeier)，1886年，第133-134页；盖布雷-塞拉西，1930-1932年，第1卷，第138-148页。关于近来对提格雷-绍阿协定的讨论，见加布雷-塞拉西，1975年，第93-94页。

(40) G. 马萨拉，1892年，第2卷，第60页。

(41) 罗尔夫斯，1885年，第149-156页；A. 奥佩尔(Oppel)，1887年，第307页；盖布雷·塞拉西，1930-1932年，第1卷，第145-156页；加布雷-塞拉西，1975年，第95-96页。

(42) 盖布雷·塞拉西，1930-1932年，第1卷，第155-156页；J.S. 特里明厄姆，1952年，第24、122页。

(43) G. 马萨拉，1892年，第2卷，第78页。

(44) 加布雷-塞拉西，1975年，第97页；R. 佩里尼，1905年，第344页；R.K.P. 潘克赫斯特，1968年，第147页。

(45) G. 比安基(Bianchi)，1886年，第86页，关于约翰尼斯对传教士的态度，又见加布雷-塞拉西，1975年，第98-99页。

人予以补偿，其中一个是瑞士工匠阿尔弗雷德·伊尔格，他既是技术专家，又是外交顾问。[146]

与此同时，赫迪夫·伊斯梅尔将埃及同约翰尼斯谈判一事委托给查尔斯·乔治·戈登上校，这名英国军官当时是埃及驻苏丹的总督。戈登在他的日记中承认，他的雇主"窃取"了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对埃塞俄比亚"很坏而且不公正"。[147]他于1879年10月为完成徒劳无益的使命[148]到德布拉塔博尔会晤约翰尼斯。皇帝要求"归还"博戈斯、默特马和舍格拉等边境地区的立场十分坚定，还希望取得出海通道。[149]他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并谴责这位英国人作为基督徒不应为一个穆斯林政府服务。他给赫迪夫·陶菲克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说埃及的行径像个"强盗"，又说"你希望和平，但你阻止阿比西尼亚商人前往马萨瓦。你占领了本不属于你自己的土地"。[150]对戈登的命令是不允许让出领土，结果这场会晤使他处境狼狈。皇帝对他严密监视，这使他恼羞成怒，几乎对离开这个国家感到绝望，后来在一个有幸活着出去的特沃德罗斯的囚犯的回忆录中写到此事。他在回忆录中说，约翰尼斯"像《旧约》那样"讲话，"极易大发雷霆"。[151]但对他的姐妹，他又说，"真奇怪，约翰尼斯同我一样——是个宗教狂。他负有使命，并要履行这一使命，这一使命就是让所有的穆斯林改宗基督教"。[152]

410

到这时，约翰尼斯已经取得了扎实的成就。他阻止了埃及的入侵，实现了比特沃德罗斯统治下的大多数时期更大程度的统一，使他的人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阶段。目光敏锐的观察者A.B.怀尔德注意到，埃塞俄比亚在击败埃及后"有幸享有安定和好收成"，并"得到迅速的改善"。[153]

然而，在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结束时享有和平与繁荣的埃塞俄比亚正处于一场重大磨难的前夜。苏丹马赫迪的兴起，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1881年宣布了他的使命，这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它很快便横行于埃塞俄比亚帝国的西部并劫掠了贡德尔。1885年，意大利人夺取了马萨瓦，开始了欧洲人在非洲大陆这一地区争先恐后的抢夺活动。此后不到五年，又有大规模的牛瘟流行和随之而来的饥荒，从而再度使整个地区陷入贫困和苦难之中。

综 述

约翰尼斯虽然只统治了本章所论述这一时期的最后一段，但他是这一地区实力最强的

---

[146] C. 凯勒(Keller)，1918年，W. 利奥普费(Loepfe)，1974年；R.K.P. 潘克赫斯特，1967年，第29-42页。
[147] G.B. 希尔，1881年，第403、405、406页。又见304页。
[148] 加布雷-塞拉西，1975年，第111-117页。
[149] 同上，第412-414页。
[150] 同上，第420页。
[151] 同上，第421-422页、424页。
[152] C. 戈登(Gordon)，1902年，第155页。
[153] A.B. 怀尔德，1901年，第30页。

国家和唯一有影响地卷入国际关系的统治者，而他的国土只是本章所涉及领土的一小部分。他的帝国以提格雷为基地，向四周扩展到实际上包括整个基督教高原。戈贾姆的阿达尔·塔萨马公爵(后来的塔克拉·海曼诺特国王)和绍阿的曼涅里克国王(后来的皇帝)都被迫承认他的帝国权威。瓦洛的穆斯林领袖这时已正式皈依基督教，也间接地接受他的霸主地位。但再往东，阿瓦萨的穆斯林素丹国则是独立的。提格雷西北和东北的低地处于埃及人的统治之下，因为约翰尼斯尽管打败了他们，却未能完全逆转他们近期蚕食的结果，也没能实现获得出海口这一雄心。然而埃及人的统治在不到五年后即告终结，但这一地区并没有随之落入埃塞俄比亚统治者手中，而是被一个殖民列强意大利抢去。 **411**

西面、南面和东面的土地还没有并入埃塞俄比亚版图，因为尽管曼涅里克已使自己成为古拉盖领域的征服者，但对南方的重大征伐行动还是几年以后的事。在国家的西南部，还存在着一系列独立的小国家。其中包括卡法、坚吉罗和瓦拉莫等古老王国，以及几个奥罗莫君主国：季马，它的最后也是最著名的一个国王——阿巴·吉法尔二世刚刚登上王位；莱卡，那里的地方首领莫罗达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此外还有利穆、戈马、古马、盖拉和一些更小的政治实体。往南的奥罗莫人及其它集团，在阿鲁西、博兰纳和其它地方，也有单独的政治实体。

在西南面，一度独立的城邦哈勒尔处于埃及人的占领之下，但这很快结束，曼涅里克仍将控制该城。在亚丁湾沿岸，索马里的港口也处于埃及人的统治之下，但这也很快成为往事，而被三个殖民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取而代之。其它的索马里港口，即印度洋沿岸的港口，马坚坦以北和贝纳迪尔以南分别处于阿曼和桑给巴尔的宗主权范围。1870年前后，马坚坦素丹阿曼·马哈茂德同他的岳父优素福·阿里的争执导致了这一素丹国的分裂，而优素福·阿里，在更南面建立了一个新的素丹国霍比亚(奥比亚)。[154] 在谢贝利河下游，种植粮食、芝麻、水果、棉花的商业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盖莱迪素丹国的繁荣，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155] 但是阿曼的统治很快让位于意大利的殖民主义。然而外国对索马里地区的影响仅限于沿海地区，生活在内地的大多数索马里人，就像许多奥罗莫人一样，完全不受外来权势的影响，而生活在当地氏族的控制之下。

(艾 平译)

---

[154] M. 皮隆，1961年，第88页。
[155] L.V. 卡萨内利，1982年，第161-178页。

16 1800-1880年的马达加斯加

P.M. 穆蒂布瓦
F.V. 埃索亚韦洛-曼德罗索(供稿)

引言

412 马达加斯加在1800-1880年间的历史以两大趋势为特点，这两大趋势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指导路线。第一种趋势是国家的政治演变和马达加斯加与海外列强，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在外交上的相互作用。第二是在国家的社会组织中，特别是在宗教、行政和经济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演变主要在巩固梅里纳君主政体，并将其权力扩大到岛上其它地方。这个君主政体与英、法两国所保持的外交关系成为该国发展的基石。在行政方面，特别是在建立法治方面所实现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也是马达加斯加致力于本国现代化和抵御外国控制的一个重大因素。信奉外国宗教被看做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部分。

413 这里也许有必要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作一个简要的叙述。马达加斯加约有18个民族，其中最大的，也是19世纪最重要的民族，就是生活在岛的中央高原上的梅里纳族。这个中央高原以伊梅里纳闻名(意即远处所见之国)，是梅里纳人的家园。在这个民族中有一个特权阶级，它在法国殖民于该岛之前已统治了这个岛的大部分地方。很难说在本章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中马达加斯加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但据英国驻马达加斯加的领事估计，1865年的人口为500万，其中约有80万是梅里纳人。① 马尔加什各群体都说同样的语言，遵循相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极少有例外。这样，尽管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别，但马尔加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民族，具有一种深远的文化和民族统一性。②

伊梅里纳的统治者们在塔那那利佛确立了中心，一个个有才能且得民心的君主统治着这个岛的大部分地方。“马达加斯加王国政府”这个名称，将用来指塔那那利佛的这个政府，它在1880年控制了全岛三分之二的地方，虽然当时各地还有一些零星的叛乱。因此，尽管不同的省份和地区的历史有其重要性，③ 但关于马达加斯加的政治、社会、经济和行政演变方面的讨论，主要是针对作为该岛其它部分的中心或心脏的中央高原的历史。

---

① 公共档案馆，基尤，英格兰，外交部(以下简称FO)48/10，帕克南(Pakenham)致罗素(Russell)函，1865年1月31日。

② H. 德尚(Deschamps)，1951年，第53页谈到“马尔加什语言的统一是卓越的。从岛的一端至另一端，用同一语法，同一句法，绝大多数人用相同的文字。”

③ 马达加斯加大学历史系正在开拓对各地区历史的研究，从而使我们对马达加斯加的内部历史开始有了深入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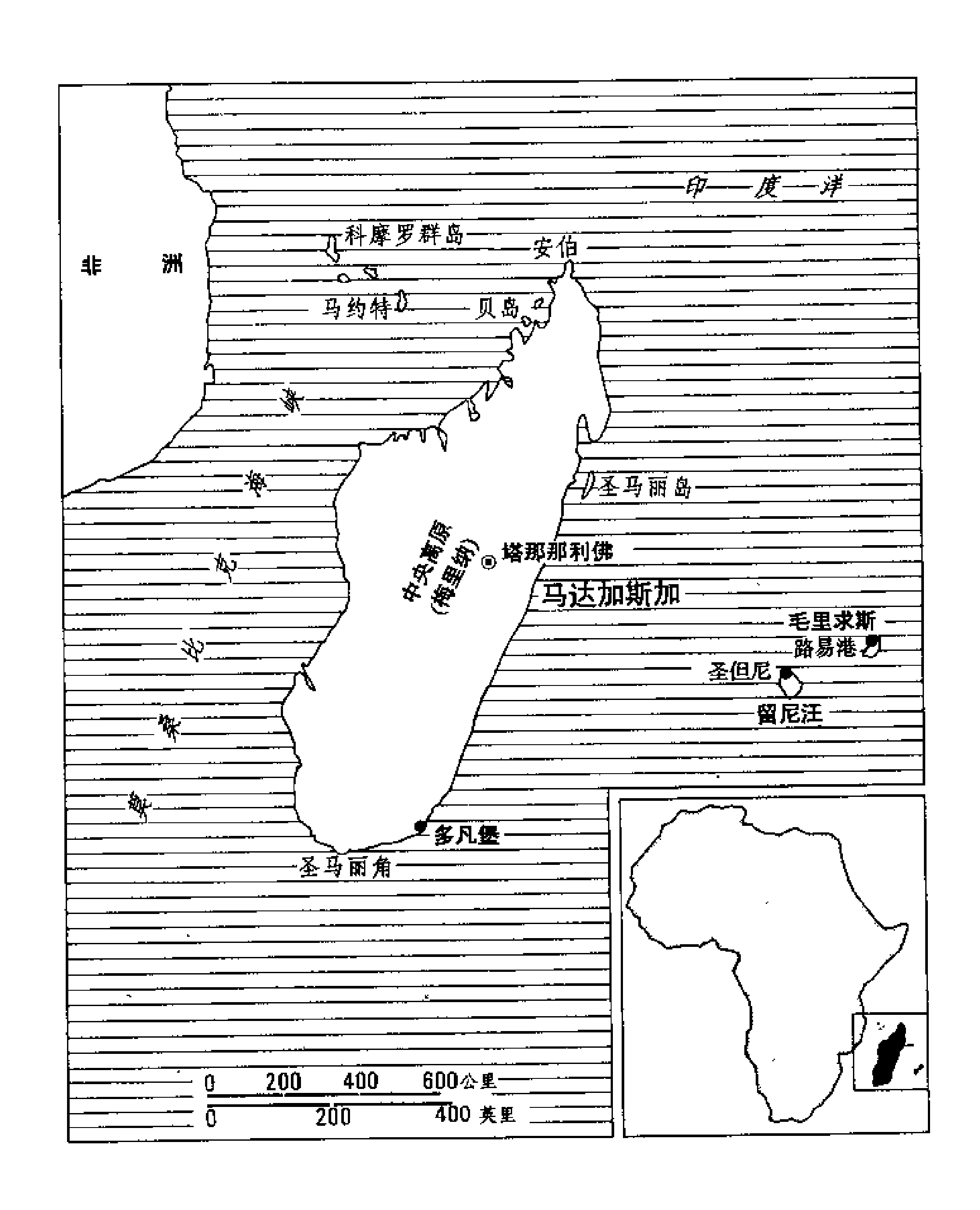


插图 16.1 马达加斯加及其邻邦(仿照 P.M. 穆蒂布瓦图)

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的时代(1792-1810年)

如若不研究梅里纳王国的创始人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是如何在中央高原取得权力和巩固他的地位，就难以了解19世纪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他重新统一了梅里纳王国并予以扩充。此外，他还增强了人民的凝聚力，并将此作为领土扩张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

1780年前后，在中央高原伊梅里纳只有三、四个小王国，均处于自相残杀的内战之中。约在1785年，其中一个小王国安布希曼加的国王的侄子——兰博阿萨拉马，赶走了他的叔父，自立为王，号称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④] 于是，他开始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在伊梅里纳巩固他的地位。他杀掉塔那那利佛和安博希德拉特里莫的国王，因为他们虽与他缔结和约，但仍公然反抗他。[⑤] 在1791或1792年，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将首都迁至塔那那利佛，并着手建立新王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自那以后塔那那利佛一直是伊梅里纳和马达加斯加的首都。

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统治的第二阶段，大约始于1800年，其特点是向伊梅里纳境外扩张，从而开始了统一马达加斯加全部18个民族的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他迫切希望征服该岛的其余部分，传说他在病榻上曾对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拉达马说，"海是我的边疆"。[⑥] 首先，他征服了传统上属于梅里纳人，而后为东面邻邦(诸如贝扎诺扎诺人和西哈纳卡人)



图片16.1　塔那那利佛的景色，19世纪50年代

④　关于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国王的简要写照，见H. 德尚，1967年；A. 德利夫雷(Delivré)，1974年。

⑤　R. W. 拉贝芒安贾拉(Rabemananjara)，1952年，第53页。

⑥　原文是"海是我的稻田的边界"。他把种植水稻和反饥荒的斗争联系起来，并为开发贝齐米塔塔特拉平原发出指示。

占领的部分土地。[7] 虽然他把这些人置于他的宗主国权力之下，但他们之中有些人，特别是贝扎诺扎诺人继续反抗。他用武力在伊梅里纳巩固权力，但他也试图在对手面前把自己扮作一位以和平与统一为唯一愿望的统治者。

他向南方的扩张，最初主要是打算保护移居到那里的梅里纳人。那时贝齐利奥人已处于梅里纳霸权统治之下，梅里纳军队在进一步向南至安卡拉特拉山和法拉齐胡地区的进军中没有遭遇很大的困难。[8] 然而在西面，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发现，后来他的继承人也发现，萨卡拉瓦人是难以对付的。事实上，一切征服萨卡拉瓦的努力均告失败。确是这样，他有时成功地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但萨卡拉瓦经常侵犯伊梅里纳，几乎侵入到塔那那利佛。在萨卡拉瓦诸王国中，最重要的是梅纳贝和博伊纳，他们在两国之间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以抵制梅里纳向西扩张。然而，最激烈的抵抗则来自安邦戈。还应当指出，马罗赛拉纳纳·萨卡拉瓦王朝是唯一可以真正取代梅里纳统治者的力量；19 世纪之前，这个王朝已把它的霸权扩张到岛的西部，并与一些东部的王国，例如贝齐米萨拉卡结盟。[9] 但是，1810 年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逝世时，他已使伊梅里纳成为马达加斯加全岛需要认真考虑的一支力量。

伟大的现代化领导人：国王拉达马一世(1810-1828 年)

马达加斯加历史中几乎没有什么统治者像拉达马一世那样富有传奇性。他于 1810 年继承王位，年方 18 岁，被看做是马达加斯加的“拿破仑”，而他也确实是这样看待自己的。

在宣布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逝世的消息时，一些被他征服的人造反了。为此，压服这些反叛者就成为拉达马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压服安布托曼加的贝扎诺扎诺人，他们许多人逃亡到东部。虽然，拉达马成功地在伊梅里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迫切希望能延伸到海边，因他父亲在病榻上曾指示他这样做。如无直接入海的通道，梅里纳人受其邻邦所包围，他们甚至抢劫国人当奴隶。梅里纳的商人越来越渴望能在塔马塔夫和马任加两个港口直接与欧洲人，特别是在马斯卡林群岛上的英国人做生意，然而他们当时不得不通过贝扎诺扎诺、西哈纳卡和萨卡拉瓦的中间人，用他们的手工艺品、大米、牛肉和其它农产品换回欧洲人的盐和武器。拉达马把领土扩张看做是他所继承的马罗赛拉纳纳的遗产的一部分，总之，他认为这是尊重祖先的愿望而尽的一份孝道，同时也是实现占卜者的预言。[10]

418

拉达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东部——日益重要的塔马塔夫港。可是，贝齐米萨拉卡地区四周的政治局势需要加以干预。拉齐米拉胡于 18 世纪新组成的邦联，已经破裂成许多敌

---

⑦ 见 J. 瓦莱特(Valette)，1971 年，第 327 页。

⑧ 同前书，第 328 页。另见 J. 雷尼希菲纳(Rainihifina)，1975 年。关于梅里纳移民到安德兰特赛和韦罗马赫里(贝齐利奥的北部边境)，见 D. 拉塞缪尔(Rasamuel)，1980 年；E. 福鲁(Fauroux)，1970 年，第 83 页；J. Y. 马沙尔(Marchal)，1967 年，第 241-280 页；J. 德兹(Dez)，1967 年，第 657-702 页。

⑨ C. 吉兰(Guillain)，1845 年，第 376 页。

⑩ H. 德尚，1960 年，第 154 页，另见 J. M. 菲约(Filliot)，1974 年，第 27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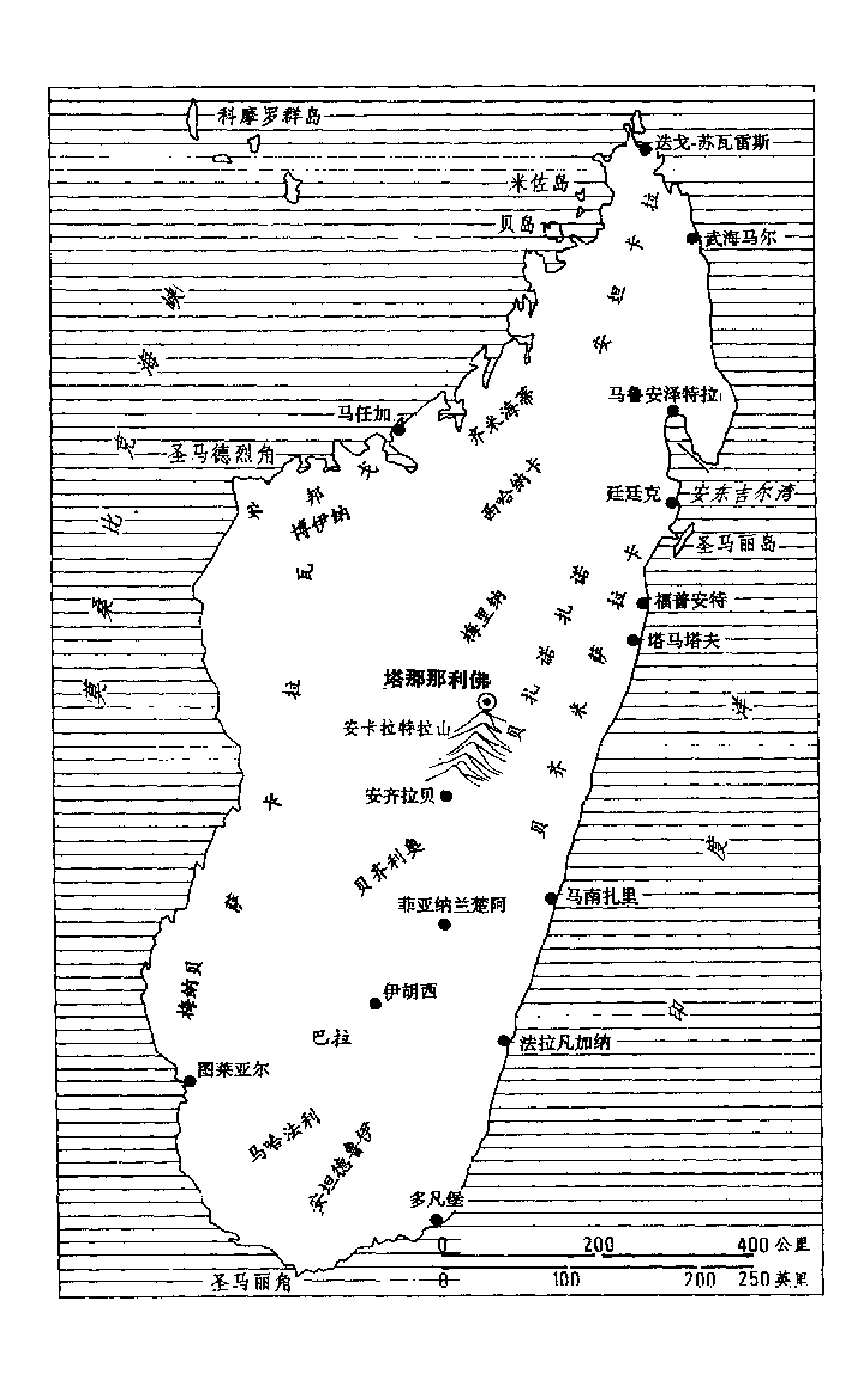


插图 16.2 马达加斯加，1800-1880 年（仿照 P.M. 穆蒂布瓦图）

对的公国，相互作战，并充满了内部的挑战者，普遍反对邀请拉达马前来干预的“非洛哈”(filoha，实行统治的酋长)当局。在这场政治混乱中，让·勒内，一名法-非混血种人，于1812年夺取了塔马塔夫的控制权。[11] 主要是由于拉达马期望建设一条通往这一东部港口的道路，才令他与毛里求斯的总督罗伯特·汤森·法夸尔爵士进行外交上的接触。他想延伸到海上的愿望，正好与法夸尔——也是英国的愿望相合，英国想要控制马达加斯加，或至少是影响那里的事态，因为马达加斯加是毛里求斯进口牛和大米的唯一来源，也是毛里求斯制成品的一个重要消费国。此外，从政治和战略上考虑，马达加斯加也是重要的。特别是英国人想要获得这位主张废除奴隶贸易的统治者的支持，因为马达加斯加是该地区奴隶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按照罗伯特爵士的要求，在马达加斯加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这项政策可以说与拉达马本人向东扩张的决心相吻合，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它“对马达加斯加的未来将产生重要的后果”。[12]

经过数次友好的接触之后，法夸尔派出一个由萨热上尉率领的外交代表团，于1816年12月21日到达塔那那利佛。1817年2月4日，拉达马与萨热终于签订了一个友好与商业条约。但此条约并未使毛里求斯总督满意，因为它没有提到奴隶贸易，而这对罗伯特爵士来说却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所以总督又派另一个代表团到拉达马的首都，这次由詹姆斯·黑斯蒂率领，他是前驻印度的陆军中士，在与东方统治者的谈判方面更富有经验。[13] 黑斯蒂随身携带送给国王的若干礼品，包括马匹、一个罗盘、一幅世界地图和一座音乐报时钟，这些礼品给这位年轻的国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有助于黑斯蒂博得他的喜爱和信任。然而，由于英国坚持拉达马必须废除马达加斯加的奴隶贸易，遂使谈判陷入困境。拉达马争辩说，若这样做他就是经济自杀，因为奴隶贸易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黑斯蒂马上答道：英国人会付给马尔加什统治者每年1000金元，1000银元，100桶火药，100支英国滑膛枪随带100块火石，400套士兵制服，12把军士用的剑，600匹布，以及给国王本人一套大礼服和两匹马作为补偿。[14] 拉达马认为他做了一笔公平交易，特别是由于该条约也承认他是整个马达加斯加的国王。英国和马尔加什友好与商业条约于1817年10月23日于塔马塔夫签署。这位成功的谈判者詹姆斯·黑斯蒂，于1820年再次被派往马达加斯加，担任英国常驻马尔加什首都的使节。可是，当法夸尔回英国休假时，他的继任者盖奇·约翰·霍尔少将拒绝支付 419 条约中规定的补贴。这件事导致英国与梅里纳宫廷关系的破裂，并在英国控制时期给法国人在梅里纳保留了一个立足之地。[15] 拉达马显然因英国人不履行1817年条约的条款而心烦意乱，但为了长期利益，他很快表示不计前嫌，因为他明白他的长期利益寄托在他的国家

---

[11] H. 德卡里(Decary)(编)，1939年。

[12] J. 瓦莱特，1971年，第331页。

[13] H. 德尚，1960年，第154页。拉达马一世与毛里求斯当局之间的初次联系建立于1816年初，那时罗伯特·法夸尔派雅克·沙尔德奴(一名定居在毛里求斯的前法国奴隶贩子)到塔那那利佛，对国王作礼节性拜访，并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与资源等的情况。见M. 布朗(Brown)，1978年，第137页。

[14] 同上，第143页，注⑩。关于内部资料，见L. 蒙特(Munthe)、C. 拉沃阿贾纳哈里(Ravoajanahary)和S. 阿亚切(Ayache)，1976年。

[15] M. 布朗，1978年，第144页。

与英国之间的联盟上。所以他接受了黑斯蒂为霍尔(已被召回)的错误所作的道歉，并于1820年10月11日续订了这个条约。在一份单独文件中，拉达马还允许英国传教士在马达加斯加工作。

在此协议之后，1820年12月3日，伦敦布道会(LMS)的戴维·琼斯到达塔那那利佛。拉达马欢迎英国传教士，因为他们不仅带来了教育(虽然仅限于基督教)，也带来了技术援助。[16] 拉达马致函伦敦布道会，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派传教士来，要有工匠，例如织布工和木匠，以及宗教人士。”[17] 传教士们于1820年12月8日在塔那那利佛开办了第一所学校，有3名学生，他们是国王的年轻侄子。因为拉达马亲自给予传教士巨大的鼓励，到1829年，伦敦布道会已开办约23所学校，约有2300名学生。传教士们用拉丁字母简化马尔加什语言，形成文字，并把圣经译成这种文字。

在这项工作中，有几名传教士如琼斯、贝文和格里菲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依靠已转变宗教信仰的有才干的马尔加什人的帮助和合作。教会社团特别注重印刷和出版工作。这样，通过学校、圣经班和散发印刷品，教育不仅使人们改变宗教信仰，也人们识字，并促使马尔加什语言和文字演变为全岛民族一体化的工具。到1827年，已有4000多马尔加什人能阅读和书写自己的语言。[18] 在技术教育方面，英国传教士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派遣一些马尔加什青年，或去英国，或去毛里求斯，接受技术教育；在国内又引进了许多技术工艺和概念，诸如木工、建筑、制革、现代化镀锡工艺和编织工艺。在技术教育方面帮助马尔加什人的最杰出的传教士是詹姆斯·卡梅伦；他于1826年来到塔那那利佛，除度过几年流放生活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1875年去世。为什么传教士能有这样的成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传教士的妻子发挥了作用，她们推进了与马尔加什家庭的联系，特别是与贵族妇女们的联系，给她们初步的家庭指导，并提供女裁缝一类的服务。[19]

拉达马所需求的最重要的技术援助是一支英国模式的现代化常规军。他召募了一支约15,000人的军队，装备了拿破仑战争时英国制造的良好枪支，甚至一些轻火炮。他们主要由英国教官训练，最重要的教官是黑斯蒂和布雷迪。经过培训的军队，比岛上他的对手们的军队好得多，更有效率。为了保持军队的职业精神，拉达马一世引进了军衔制，根据“勋章”的数目而定，一个勋章是二等兵，上至十个勋章为将军。军队已成为重要的工具，不仅用于征服岛上的其它领土，也可维护已征服领土的法治。

东部沿海人民的归顺始于1817年，当时，拉达马率领3万名士兵前往袭击塔马塔夫，在途中得到贝扎诺扎诺人的归顺。他与控制该镇的让·勒内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从此便获得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口岸。1823年，拉达马带着一支更加壮大的军队回到塔马塔夫，这一回他得到贝齐米萨拉卡人对他的权力的承认。他访问了东部沿海其它地区，诸如福普安特、安东吉尔湾、武海马尔和安坦卡拉地区。1824年，在返回首都的途中，他穿越齐米海

⑯ V. 贝尔罗斯-惠格斯(Belrose-Huyghes)，1978年b。

⑰ M. 布朗，1978年，第155页。另见，V. 贝尔罗斯-惠格斯，1978年b，与J. 瓦伦特，1962年。关于建筑方面的外国影响，见V. 贝尔罗斯-惠格斯，1975年。

⑱ H. 德尚，1960年，第161页；V. 贝尔罗斯-惠格斯，1977年；L. 蒙特，1969年，第244页；F. 雷松(Raison)，1977年。

⑲ V. 贝尔罗斯-惠格斯，1978年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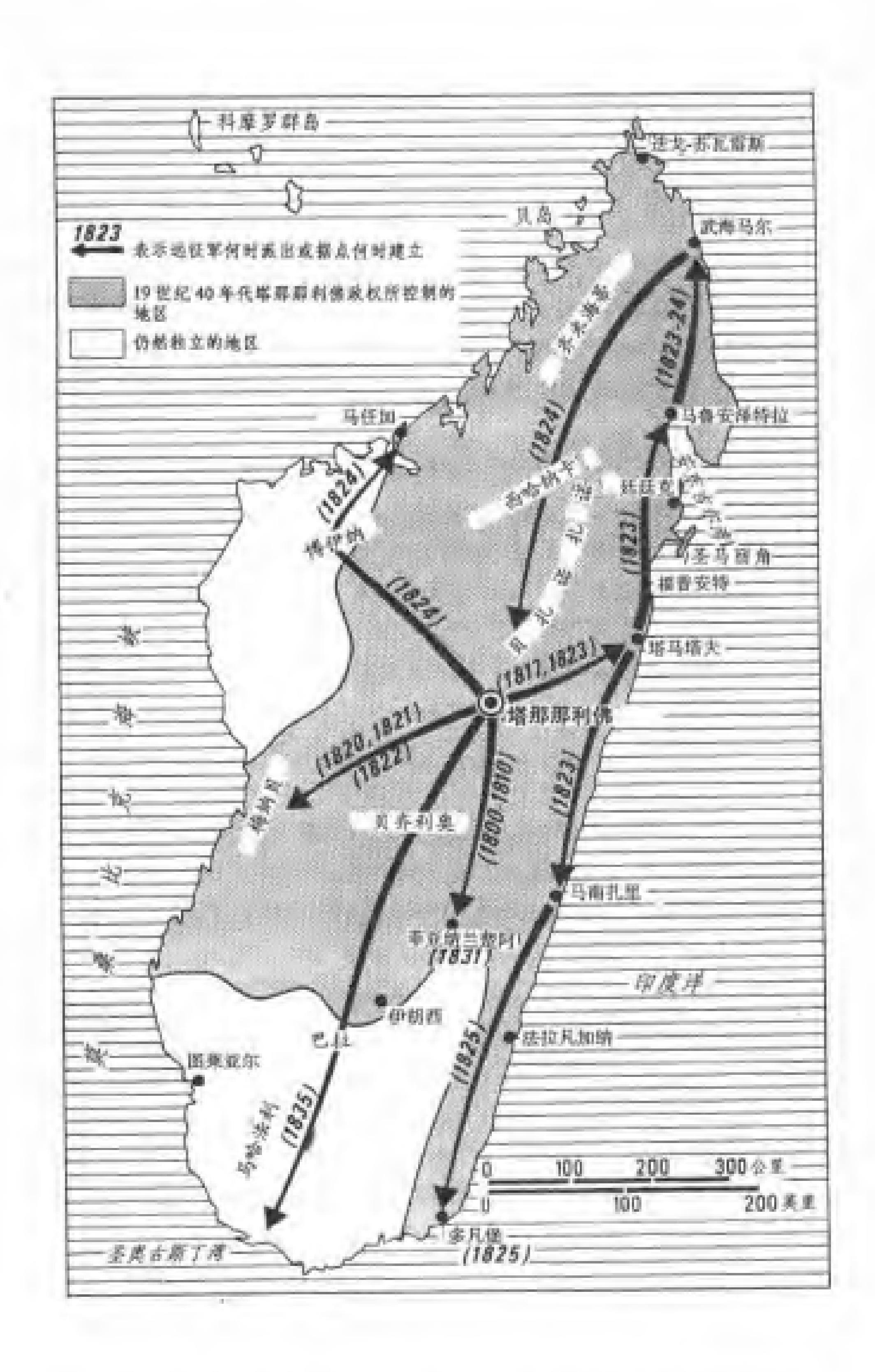


插图 16.3 梅里纳王国的扩张，1810-1840 年（仿照 P.M. 穆蒂布瓦图）

蒂人的领土，并在曼德里塔萨拉建立了一个据点，他还通过了西哈纳卡人的领土；这两个部族都承认了他的权力。与此同时，已成为拉达马在塔马塔夫代理人的让·勒内，在塔马塔夫以南地区也在实行类似的做法。于1825年到达该岛东南端的多凡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拉达马成为马达加斯加东部沿海地区主人的要求。[20]

但在西部，即在萨卡拉瓦地区，拉达马和他的前辈一样，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820年，他派一支大部队攻打梅纳贝国王，但未成功。1821年，拉达马率领一支约7万名士兵（包括1000名职业军人）的军队，在黑斯蒂陪同下重返梅纳贝。这一次也未能征服这片领土。1822年，他再次带领一支约13,000人装备良好且经过认真筹备的远征军，终于打败了梅纳贝人，**422** 并在该国境内建立了一些设防的据点。但是这次胜利持续的时间有限，因为北方的萨卡拉瓦人仍然蔑视他的权力。1824年，他对西北部的博伊纳发动攻击，取得了较大成功。博伊纳的统治者安德里安楚利与之讲和，使拉达马得以到达西北市镇马任加，在那里他建立起一个梅里纳据点，但胜利仍是短暂的。

这些战役说明了在争夺全民一体化中梅里纳军队的实力与弱点。它们通常能够击败敌对的军队。此后，控制的惯常方式是建立行政据点，安置梅里纳移民在(voanjo)在那里定居，并建造一个称为罗瓦(rova)的筑防区予以保护。这种筑防区类似首都的王宫，它象征着梅里纳的存在。拉达马也经常安排联姻，如他娶梅纳贝国王拉米特拉霍的女儿罗萨利莫为妻。[21]可是军队要维持从遥远的伊梅里纳获得供应却是十分困难。在移民还不能生产足够的产品之前，军队不得不靠被征服地区供养，而这往往引起叛乱。一旦拉达马返回塔那那利佛，博伊纳和梅纳贝的萨卡拉瓦人就起来造反。萨卡拉瓦人决心要保持他们的独立，不受塔那那利佛的控制。同样，在博伊纳，安塔拉奥特拉贸易集团构成了另一个对一体化的障碍。他们是穆斯林，马尔加什人把他们当做外国人。[22]这给马尔加什政府制造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法国人准备利用一些反叛的萨卡拉瓦酋长，在马达加斯加西部和西北部的一些领土问题上，对梅里纳统治者的主权进行挑战。

尽管有这些挫折，拉达马一世的战役使他得以将梅里纳霸权扩展到该岛的大部分地区。到1828年，全岛三分之二的地方已处于梅里纳的控制之下。只有位于西南部的安坦德罗伊和马哈法利的偏远和荒无人烟的平原，以及巴拉国（除了在伊胡西有一个不稳定的梅里纳据点外）不受拉达马一世的控制。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在萨卡拉瓦人境内，虽然拉达马已征服了梅纳贝和博伊纳的领土，并建立了前哨基地，但总的来说，萨卡拉瓦人依然独立于梅里纳政权之外，特别是博伊纳南部安邦戈人。然而，即使拉达马的政权没有统治全岛，至少对于他作为马达加斯加国王的头衔尚不存在有效的挑战。[23]但是，这些战役极大地损伤了他的精力与健康，加之他严重酗酒，生活放荡，致使他更加衰弱。他于1928年7月27日去世，年仅36岁，从而使一代有成就的统治突然结束。

---

[20] 详情见H. 德尚，1960年，第151-161页，本处叙述也来源于此。
[21] C. 吉兰，1845年。
[22] G. 兰托安德罗(Rantoandro)，1981年；M. 拉索阿米亚拉马纳纳(Rasoamiaramanana)，1981年。
[23] M. 布朗，1978年，第150页。

拉纳瓦洛娜一世(1828-1861 年)：反作用时期还是稳定时期? 423

拉纳瓦洛娜一世是拉达马一世的堂妹和第一个妻子，她是在被拉达马从有权势的职位上撤下来的贵族和军队首领的协助下登上王位的。[24] 这意味着新政权打算除掉拉达马的亲信，并以那些过去不接受或不参与已故国王所执行的政策的人来取而代之。女王最初的首席顾问是雷尼马哈里和安德里亚米哈贾；但这两人相继被清除。最后与女王分享政权的最重要的人物是雷尼哈罗和雷尼乔哈里。前者出身于齐米安博胡拉希氏族，另一个出身于齐马哈福齐氏族；这两个氏族，在 18 世纪末曾协助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建立了梅里纳王国。他们大多数是从庶民发展起来的，并为霍瓦人的中产阶级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个中产阶级的成员曾给君主政体以支持，其结果，它就逐步建立起经济、行政和政治权力，并达到了与君主政体的权力相匹敌和侵蚀其权力的地步。

拉纳瓦洛娜的政策基础是，务必维护马达加斯加的独立，不受外国势力所支配，特别是不能影响到国家体制、传统和风俗。这意味着在外交政策方面，要脱离英国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与宗教领域。1828 年 12 月，拉纳瓦洛娜政府告知新任英国驻马使节罗伯特·莱尔说，虽然他们不会再引进奴隶贸易，但他们不希望再继续实行这个条约，也不考虑让他继续留驻在他们的首都。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与留尼汪群岛之间的贸易也被禁止。已加入马尔加什国籍，并由拉达马一世封为贵族的布雷迪将军，被迫于 1829 年退休。1829 年，法国查理十世政府想提高在国内的威信，由于法国人在位于圣马丽岛对岸的廷廷克存在的问题与马尔加什发生了一系列误解，于是命令轰炸和占领廷廷克和塔马塔夫，致使马达加斯加对海外列强的幻想进一步破灭。马尔加什人在福普安特击退了侵略者。查理十世的继承人路易-菲利普对这次无缘无故的袭击拒绝承担责任，但这给马尔加什人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痕。法国要求马达加斯加在 19 世纪剩下的时间内使法-马关系具有永久性的特色。但这样做有时不免产生一种亲英国的反作用，由此也说明为什么尽管执行了文化独立的政策，而英国传教士在此后六年中并没有被驱逐出马达加斯加。

马尔加什领导人欢迎并感谢英国传教士提供的技术援助，但是他们最需要的是世俗的 425 而不是宗教方面的教育。所以，拉纳瓦洛娜的态度是一种非系统性的拒绝，虽然她从一开始，就显然对基督教不如她的前辈那么热情。使新的领导人最为担心的，而且最终驱使他们投入反对基督教日益强大的影响的斗争，是因为它普遍构成了对马尔加什传统和体制，特别是对君主政体的挑战。基督教礼仪与皇家宗教仪式进行竞争。由于劝阻人们不要敬奉萨姆皮莫安贾-卡纳(Sampimoanja-kana)，即保证国家富裕的皇家神灵，基督教动摇了皇家权力的基础。它的平等原则也与传统的等级制度相抵触。[25] 基督教正在改变这个国家的传统，并使马尔加什人转变为耶稣基督的崇拜者，而他们把耶稣基督当作是白人的祖先。到 1830 年，约有 200 人改信基督教，这些基督教徒甚至准备为他们的信仰而死。对于这种“在本

---

[24] 见 G. 阿亚切 (Ayache)，1966 年，A. 德利夫雷，1974 年，关于她的任命的口头传说的重要性，以及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的同伴——雷尼马哈里的作用。有几个人被判处死刑，但人民迅即接受拉纳瓦洛娜为女王。

[25] M. 布朗，1977 年。



图片 16.2 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1810年去世



图片 16.3 国王拉达马一世，1810-1828年



图片 16.4 女王拉纳瓦洛娜一世，1826-1861年



图片 16.5 国王拉达马二世，1861-1863年



图片 16.6 女王拉索海里娜，1863-1868年



图片 16.7 女王拉纳瓦洛娜二世，1868-1883年

士兴起的新力量”，政府不能漠然置之。[26]当传教士们拒绝要他们提供教育而又不准传教时，他们与拉纳瓦洛娜之间的破裂已不可避免。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于 1832 年禁止受洗礼。三年之后，所有她的臣民都被禁止成为或继续为基督教徒。禁止传播基督教，但不禁止世俗教育。1835 年 2 月 26 日，拉纳瓦洛娜在王宫召见英国传教士，在解释她的这项决定时对他们说：

> 她感谢他们给予这个国家的良好服务，而他们也可自由遵循本国的宗教习惯，但她不允许她的臣民背离他们的古老风俗……她完全允许他们教授工艺和科学，但不能涉及宗教。[27]

第一批基督教殉教者倒下了；拉萨拉马于 1837 年 8 月、拉卡里拉希-安德里亚马佐克于 1838 年 2 月先后牺牲。传教士们被流放，接着是一个对马尔加什基督教徒的猛烈迫害时期，在此期间有几百人死于暴力。然而，基督教远未熄灭，似获得了新生。

宗教在地下传播，基督教社会的地下会议在岩洞中(即在伊梅里纳西北部沃尼宗戈的菲哈奥纳纳地区)召开，或在私人家中，甚至在塔那那利佛召开。一批基督教徒逃往英国，在那里他们为最终作为传教士归国作准备。耶稣会方面组织了一个布道团到小岛(贝岛、法利岛、西北部的马约特岛和东部的圣马丽岛)去，他们试图从这里渗入大陆，特别是进入法利湾，他们是 1857 年从这里被迫离开的。有些作者把这个时期称为“拉纳瓦洛娜统治的最黑暗时期，”[28] 拉纳瓦洛娜也得到“马达加斯加的玛丽女王”或“现代的梅萨利纳或女尼禄”等称号。即使如此，马尔加什宫廷仍渴望不要与英国完全破裂，以避免同怀有敌意的英法联盟抗衡。 **426**

马尔加什领导人意识到国家需要与外部世界联系，以获得欧洲的制成品，特别是枪炮和弹药。他们还想购买奢侈品，如布匹和酒类，并扩大他们向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的出口(主要是牛和大米)，以便支付他们必需的进口品。所以拉纳瓦洛娜女王要找到一个与欧洲人缓解的权宜之计，以使她的国家在不担心欧洲人的对抗和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发展。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她和她的顾问们决定于 1836 年派一个使团前往法国和英国，在对方尊重马尔加什文化与独立并承认拉纳瓦洛娜一世为马达加斯加女王的基础上，商谈新的友好和商务条约。[29]马尔加什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往欧洲的这个使团由六名官员和两名秘书组成，由安德里安齐查伊纳率领。[30]他们在巴黎的停留是顺利的，然后他们横渡海峡到达伦敦。他们受到国王威廉四世和王后阿德莱德的接见，但是他们与帕默斯顿勋爵的会谈却没有解决问题。英国政府坚持商业与航运自由，这与马达加斯加要求控制自己的贸易和只允许在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下的港口通航的要求背道而驰。

使团未能与法、英两国缔结条约，从而增添了马尔加什对外国人的猜疑，而产生恐惧是很有根据的。1845 年，在留尼汪和毛里求斯法、英当局的分别命令下，一支英-法海军中

---

[26] 见 W.E. 库赞(Cousins)，1895 年，第 83 页。
[27] 引自 P.M. 穆蒂布瓦(Mutibuwa)，1974 年，第 26-27 页。
[28] M. 布朗，1978 年，第 177 页；A. 布杜(Boudou)，1940-1942 年；另见 P. 拉巴里(Rabary)，1957 年和 J.T. 哈迪曼(Hardyman)，1977 年。
[29] 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当时谣言传播，英国即将攻打马达加斯加。圣奥古斯汀湾的马尔加什人已经看到一些英国船只在靠近那里的伊斯拉里湾行驶。参看 R.E.P. 瓦斯泰尔(Wastell)，1944 年，第 25 页。
[30] 详情参看 J. 瓦莱特，1960 年。



图片 16.8　让·拉博德应女王拉纳瓦洛娜一世要求于 1839 年开始建造的塔那那利佛王宫

队攻打了塔马塔夫。这次攻打的借口是 5 月马尔加什颁布了一项法律，责成所有外国人都要服从当地的法律，英国指责说，这意味着他们对市政工程也有付税的义务，还有可能被奴役和判罪(tangena，神裁判罪法)。这次攻打使马尔加什人大吃一惊。他们成功地击退了进攻，迫使英-法残余部队撤离塔那那利佛，留下被杀死的同伴们的尸体，马尔加什人割下尸体的头颅，悬挂在竿头，以告诫其他想入侵者。虽然法国和英国政府否认这次袭击与它们有关，但损失已经造成。拉纳瓦洛娜女王的反应是驱逐全部外国商人，中断海外贸易，特别是中断对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的牛肉和大米的出口，不过与美国的贸易仍在继续。

这种对抗是马尔加什人的特点：如果欧洲人不与他们合作，他们便会自助和自立更生。女王，特别是安达菲亚瓦拉特拉氏族，以及实行寡头政治的政府，都能采取这种反抗外国人的态度，因为尽管有零星的反叛，但他们控制着最重要的省份，控制着这些省份的经济，包括垄断牛肉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心继续促进西方教育，并建立工业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而目前又不能从外部进口的物品。为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联系，女王利用在塔马塔夫开业的一个名叫拉斯特勒的法国人和在马任加的一个名叫威廉·马克斯的美国人提供服务。在拉斯特勒的支持下，东部滨海区设立了一个甘蔗种植场，并在马海拉建起一个生产糖和朗姆酒的工厂。[20] 女王聘请让·拉博德（一名于 1832 年抵达塔那那利佛的法国冒险家）担任"工程总监之类的职务"。他首先在塔那那利佛以北十公里处的伊拉菲建立了一个工厂，之后又把它迁至位于东部森林边沿的曼塔索亚，这是个流水丰富的区域，但却难于找到马尔加

⑳　F. 尼科尔(Nicol)，1940 年。

什人乐意来此工作。在曼塔索亚,他在官方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工业联合公司,雇用了约两万名工人。这个公司生产各种各样的物品,从枪支大炮到玻璃和肥皂。也许拉博德的最大和最永久的创建就是女王的木结构的王宫,之后又由卡梅伦加筑石头围墙,现在它仍高耸于塔那那利佛。拉斯特勒和拉博德成为马尔加什公民,并被纳入寡头政治统治集团。[32]

拉纳瓦洛娜女王继续拉达马一世开创的扩张政策,并在被征服的领土内巩固她的政府。为了军队的装备,必需经营对外贸易,以获得弹药,并鼓励拉博德的工厂生产枪支。她征收特种税款资助战争。1831 年创建菲亚纳兰楚阿市,作为地区首府,并重组贝齐利奥省。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从菲亚纳兰楚阿派出远征军到南方,有些远征军在雷尼哈罗的指挥下跨越了巴拉、马哈法利和马西科罗的领土。其中一支军队于 1835 年抵达圣奥古斯丁湾。[33] 在西部和北部,萨卡拉瓦人和安坦卡拉人继续抵抗中央政府当局。政府军挫败了萨卡拉瓦人的酋长齐奥马可和齐米哈罗,他们和支持者们逃往邻近的贝岛、法利岛和米佐岛,并送信给留尼汪的法国当局,把他们的领土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1841 年,留尼汪总督阿米拉尔·德·埃尔接受了请求,法国与反叛的萨卡拉瓦流亡酋长们签置的条约构成了法国对马达加斯加西部领土要求的基础。[34]

雷尼哈罗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一直是政府首脑,他于 1852 年逝世,由年轻一代执掌政权。政府由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和他的弟弟雷尼莱亚里沃尼(雷尼哈罗的两个儿子)领导,他们分别担任首相和军队总司令。这新一代的领导人还得到拉纳瓦洛娜的儿子拉科托·拉达马的支持,他已被立为王储。这些年轻人,包括拉科托在内,从传教士那里接受过一些教育,他们比雷尼哈罗等老一辈更加开放。确实,曾与已故的雷尼哈罗共享政权的雷尼乔哈里还活着,仍被称做首相,他反对政策上的任何改变;但王储称呼那个法国工程师让·拉博德为"我的爸爸",他的存在必然导致重新修订拉纳瓦洛娜的政策。1853 年,在留尼汪和毛里求斯两岛(特别是毛里求斯)的商人支付给拉纳瓦洛娜 15,000 元的赔款后,马达加斯加与两岛间的贸易禁令得到解除。女王对一些外国人开放门户。1856 年,她允许伦敦布道会的 W. 埃利斯牧师访问塔那那利佛,他带来了英国政府的信件,表达了对马达加斯加的友好与和睦之情。两名罗马天主教僧侣——菲纳兹神父和韦伯神父(菲纳兹充当一个名叫朗贝尔的法国商人的秘书,韦伯则作为前往照顾雷尼乔哈里的兄弟的一名医生的同伴),私自进入首都。[35]

429

约瑟夫·朗贝尔于 1855 年抵达塔那那利佛。他是毛里求斯商人兼种植园主。他所包的商船一直同马达加斯加做生意。在这年早些时候,他曾给拉纳瓦洛娜提供过重要服务。当时驻多凡堡的卫戍部队被东南部反叛的各族人民所封锁,他为该部队补充了给养。所以他受到宫廷的欢迎是毫不奇怪的。朗贝尔通过拉博德对拉科托·拉达马施加影响,诱使王子发给他一张特许执照,使他有权开采该国的矿产和农业资源。据说王子还曾要求把马达加

---

[32] S. 阿亚切,1977 年;O. 卡依翁-菲莱(Caillon-Filet),1978 年。
[33] H. 德尚,1960 年,第 170 页;S. 拉霍托马汉德里(Rahotomahandry),1981 年;R. 德卡里,1962 年。
[34] C. 吉兰 1845 年;R. 德卡里,1960 年。
[35] A. 布杜,1940-1942 年。

斯加变成法国的一个保护领地。但是拿破仑三世皇帝当时正专注于克里米亚战争，以致不能在马达加斯加执行一项只会引起法国的盟国——英国反感的政策；结果，关于保护领地的建议为巴黎所拒绝。

虽然拉纳瓦洛娜对外国人愈来愈友好，但法国和英国却寄希望于王储，因为后者已明确显示出亲欧洲的倾向。主要由于上述考虑，致使朗贝尔于 1857 年返回塔那那利佛策划了一次政变。他是在拉博德、拉斯特勒和雷尼哈罗家族，以及其他赞成现代化的马尔加什人，特别是基督教地下社团的支持下进行的。当时，基督教社团的成员之间已发展了兄弟般的关系，他们与王子也很亲近。密谋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拉纳瓦洛娜，立王子为王；但计划尚未实施即被发现，于是朗贝尔和拉斯特勒被驱逐出马达加斯加。[36] 因此谣言四起，不仅在马达加斯加，甚至传到欧洲，说法国将入侵马达加斯加，甚至在伦敦也有人相信这些谣言。[37] 拉纳瓦洛娜因她儿子的叛国和这两名法国人的不忠诚而感到痛心和失望，她也曾把这两个法国人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拉纳瓦洛娜年迈、焦虑，在立拉科托·拉达马为她的继承人后，于 1861 年 8 月 18 日在郁闷和孤独中死去。雷尼乔哈里和他的“保守派”支持者，试图拥立女王的侄子兰博萨拉马为王位继承人，但是，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和他的弟弟雷尼莱亚里沃尼，却支持拉纳瓦洛娜提名的继承人，事实上他们也具有与王储一样的进步思想。他们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并保证了王储的平安登基，成为拉达马二世。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被确认为首相，雷尼莱亚里沃尼为军队总司令。这样，他们的家族——安达菲亚瓦拉特拉，“牢固地掌握着政府，在君主政体期间他们从未放权。”[38]

怎样评论女王拉纳瓦洛娜一世的统治在马达加斯加历史上的作用呢？正如一位现代作家所说，“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个恐怖的统治”。[39] 对于在梅里纳霸权统治下长大的许多臣民来说，她的统治也是剥削和专制的。东南部各族人民的反叛和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在当时也是臭名昭著。一位现代马尔加什历史学家拉奥姆巴纳，曾以图表的形式描绘了由此而造成的荒凉景象。有些民族如安塔诺西人，为逃避梅里纳的统治，往西迁移至奥尼拉希河谷。然而在她统治期间，工业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教育扎了根，在许多领域中现代化进程从未逆转。此外，对她的许多臣民来讲，拉纳瓦洛娜是马尔加什民族主义的象征，她的统治是反对与马尔加什文化和传统背道而驰的外国势力的堡垒。[40]

门户开放政策：国王拉达马二世，1861-1863 年

拉达马二世是一位极端亲欧洲的君主，他的统治时期极短，主要事件集中于他急于逆转前政权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全部政策。事实上，他的统治之所以史无前例地短暂，主要

---

[36] A. 布杜，1943 年。

[37] 考利致特乌韦奈尔，“口头照会”，1860 年 2 月 19 日，外交部档案(以下简称 MAE)，法国外交部，巴黎，《马达加斯加系列集》，第Ⅳ卷。

[38] M. 布朗，1978 年，第 189 页。

[39] 同上书，第 188 页。

[40] S. 阿亚切，1975 年；拉奥姆巴纳(Raombana)，1980 年；M. 布朗，1978 年，第 167、188 页。关于英国传教士对这个时期的持久影响，参看 B. A. 高(Gow)，1979 年。

原因即在于此。

拉达马二世雄心勃勃，想通过吸引外国商人、投资者和传教士来马达加斯加，使他的国家现代化。他热情地允准讲授基督教，并请传教士和流放在外的马尔加什基督教徒全部返回马达加斯加。他欢迎他的老朋友拉博德、朗贝尔及其他欧洲人回来。这年年终，他派朗贝尔到法国和英国执行外交任务，寻求他们承认他为马达加斯加国王，这对于他实行马达加斯加与外部世界商业自由流通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法国和英国对马尔加什统治者登上王位很快做出反应。他们同意派友好代表团，并任命驻塔那那利佛的领事。英国政府任命康诺利·帕克南为它在马达加斯加的代表，并保证支持马达加斯加的独立。[41] 法国政府任命拉达马真正的好朋友——自1832年以来一直住在马达加斯加的让·拉博德为领事，毫无疑问，这是希望利用他在该国的重大影响和他对该国的了解。法国人也承认拉达马为马达加斯加的国王，虽然在拿破仑三世皇帝致拉达马二世的信件中，曾含糊地提到法国在该岛的"古老权利"。然而，法国政府向他们的领事明确表示，他们无意接管这个岛，也不希望与英国争夺在那里的特权。[42] 431

传教士们紧随欧洲外交代表之后出发。天主教传教团由茹昂神父率领，于1861年9月到达。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由W. 埃利斯牧师率领，于1862年4月抵达，他曾于1856年访问过塔那那利佛。埃利斯带来一束英国政府致拉达马的信件，这使马尔加什领导人深信伦敦布道会确实是英国官方的得力助手，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为什么他在马达加斯加首都有如此大的影响。

英国人乘机利用已改变的环境来谈判缔结新的友好和商务条约。法国人于1862年9月12日签订了一项条约，英国人于1862年12月4日也签署了条约。这些文件的内容引起马尔加什贵族的关注。首相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和他的同僚心中不悦，因为商人们特别约定，外国人可以购买和拥有马达加斯加的土地，这是违反马尔加什传统的。加之，条约还豁免外国人付进出口税，而这是马尔加什官员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政府不能定期付给他们薪金。此外，1862年9月，拉达马批准了他曾于1855年发给他的朋友朗贝尔的特许执照，允许朗贝尔开采马达加斯加西北部境内的矿产和农业资源。另一项租让权涉及武海马尔区，授予毛里求斯一个名叫考德威尔的英国人。

国王的内阁一致反对缔结这些协定，给外国人如此多的特权。加之1862年9月28日，法国谈判代表迪普雷准将诱使拉达马签订一秘密条约，在条约中国王承认法国对岛上某些地区拥有权利。[43] 虽然法国政府未承认这项秘密协定，但拉达马的部长们还是得知此事，更增加了他们对国王的不信任，而国王当时似乎准备不顾一切地要签署这些文件，即使它们威胁着民族独立。 432

到1862年12月，拉达马看来已完成了他的计划，要把他的国家向外国势力开放。但是，

[41] 公共档案馆，FO/48/9，罗素致帕克南函，1862年5月10日、详情见P. M. 穆蒂布瓦，1974年、第58页。

[42] MAE、《马达加斯加V》，特乌韦奈尔致拉博德函，1862年4月24日；拿破仑皇帝致拉达马二世函，1862年4月22日。

[43] MAE，《马达加斯加V》，迪普雷致德鲁安·吕伊函，1862年10月23日。

那16个月对他的臣民来说却是个史无前例的时期。在短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人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许多急速改变的政策，而这些政策与他的前任所执行的政策又如此的不同。他所签订的条约和特许证激怒了那些曾帮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的势力增长如此之快，甚至使他的许多有权势的官员感到震惊。人们对新政策不满，以致在“拉马南雅纳”流行病(Ramanenjana)肆虐期间，患病者宣称他们是被已故女王拉纳瓦洛娜的幽灵缠住了。当拉达马决定免去首相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及其弟雷尼莱亚里沃尼和雷尼乔哈里的职权时，事态发展达到高潮。这三人都是齐米安博胡拉希和齐马哈福齐两个氏族的领导成员，我们前面已提到，这两个氏族曾协助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创建梅里纳王国。拉达马的计划是要以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去取代由少数人垄断的政府，这些人自称为“梅纳马索”(mean maso，意即红眼)，由梅里纳的故都瓦基尼西纳奥尼的贵族所领导，他们自称比塔那那利佛的阿瓦拉德拉诺人更为资深和优越。[44]

尤其是，拉达马在政府的管理中对外国人比对马尔加什人更为信任。他派往欧洲寻求承认的代表团，不是像以前那样由马尔加什官员(1836-1837年)而是由法国冒险家朗贝尔率领。他过分地依赖埃利斯的意见，当拉哈尼拉卡于1862年11月逝世时，拉达马任命一个美国人——威廉·马克斯和法国领事的儿子克莱门特·拉博德为外交国务大臣。由此，也通过他决定要依靠梅纳马索(红眼)这件事，使雷尼哈罗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雷尼乔哈里在内，意识到国王就要着手根除他们了。他们决定抢在被消灭之前采取行动。当拉达马拒绝辞退梅纳马索——甚至威胁要惩罚那些反对他的意志的人时，首相的集团决定废黜他。1863年5月12日凌晨拉达马遭暗杀，被一条丝腰带勒死，以免流出王家的血液，433 因为这是违反马尔加什传统的。默文·布朗对此有一段简明的评述：

> 拉达马垮台主要是其生性软弱所致。他天性善良，聪颖过人，心意极好，但这些与自我约束、运用权力或需要具备很强的判断力是不相称的，而且，已证明他没有能力应付由于他急剧逆转他母亲的全部政策而激起的各方反对。[45]

马达加斯加政策的回顾：1863-1868年

拉达马二世的继承人是他的妻子拉沃多扎克安德里亚纳，她的王室名字是拉索海里娜。她是拉达马一世的堂妹，所以仍然是在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的家族之内继承。她是应寡头统治集团的“邀请”——这个词需要强调——而成为女王的。这个寡头政治集团曾推翻她的丈夫，而且从此以后，是国家的有效统治者。还需特别强调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雷尼莱亚里沃尼和他们的同僚是不反对欧洲人也不反对他们的国家现代化的。确实，由雷尼乔哈里领导的“保守派”还在，并迫使彻底扭转拉达马二世的政策；但是首相的亲

---

[44] 关于拉达马的支持者的民族背景，见S. 埃利斯，1980年。

[45] M. 布朗，1978年，第195页。拉达马二世死后，谣传他还活着，谣言持续两年多。许多欧洲人，包括伦敦布道会的W. 埃利斯牧师和法国驻马达加斯加领事拉博德，都相信这些谣言，并试图与垮台的国王联系。雷蒙·德尔瓦尔曾对此作过调查，证实拉达马二世当时确实没死，已逃到该岛西部，在那里搞复辟失败后，他便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直到19世纪末叶年老死亡。见R. 德尔瓦尔(Delval)，1964年。

欧洲集团在女王委员会中控制着多数。[46] 新领导人所厌恶的是拉达马所奉行的亲欧洲政策的方式；他们感到不应以牺牲本国传统和独立为代价去推进现代化。

新政府掌握在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的手中，直到1864年7月被他的弟弟，军队总司令雷尼莱亚里沃尼所取代。雷尼莱亚里沃尼在这个世纪余下的年代里一直控制着该国的命运。新政府想要继续推行拉达马的外交政策，但是作了重要的修改。有损国家独立的朗贝尔和考德威尔的特许证权被取消。与法国和英国的条约要作修改，从而使允许外国人拥有马达加斯加土地和豁免外国人进出口税等引起愤慨的条款得以删除。关于国内政策方面，基督教可继续讲授，但必须遵守国家的关于禁止外国人访问诸如安布希曼加等城镇和在那里传教的风俗习惯。凡希望来马达加斯加和援助发展项目的外国人是受欢迎的。马尔加什政府分别致函在留尼汪和毛里求斯的法国和英国当局，向他们解释马达加斯加所发生的事件并略述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于1863年11月派遣一个使团前往英国和法国，说明马达加斯加的新政策，争取修改1862年的条约，这个使团由雷尼菲林治亚率领，由雷纳维德里安德雷纳陪同。 **434**

英、法对推翻拉达马二世的反应迥异。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意识到马达加斯加在与外国政府打交道中的困难；他一方面对新政府废除一项国际条约表示遗憾，一方面又接受了马达加斯加关于修改旧条约的要求，在取消考德威尔的特许权问题上不愿与马达加斯加发生争执。[47] 所以，当1864年3月马尔加什使团抵达伦敦时，英国政府给予友好的欢迎，并商定了一份新的条约草案，吸收了马达加斯加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只须使节返回马达加斯加后在塔那那利佛作进一步谈判。1865年，当谈判终于开始时，英国要求他的国民应该拥有马达加斯加的土地，而进出口税应为5%而不是如马尔加什所建议的10%，因此又出现了僵局。但马尔加什在这些问题上毫不退让，最终英国政府接受了马尔加什的全部建议。1865年6月27日在塔那那利佛签署了条约，气氛喜悦。

法国政府的反应则不同。它拒绝接受塔那那利佛新政权的政策。法国人对于拉达马二世被除掉感到很大不安，这主要是由于英国传教士，特别是埃利斯在巴黎和圣丹尼斯两地的影响。所以法国政府拒绝废除1862年的条约以及朗贝尔特许权，这两者都是由拿破仑三世皇帝批准的。朗贝尔特许权是在皇帝亲自授意下制定的，并已组成一个公司来开发这片租让地。所以对法国人来说，接受取消特许或条约的做法将是一个严重打击，他们宁愿于1863年9月与之断绝外交关系。[48]

在巴黎，法国政府受到沉重的压力，要求采取武装侵略的手段，以实施1862年条约和朗贝尔特许权；但即便如此，法国政府也不愿介入一场反马达加斯加的远征。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建议：倘若马达加斯加为撤消特许权支付120万法郎（或24万美元）的赔款，则可以考虑修改条约。这个建议传达给了当时尚在欧洲的马尔加什使节。所以，1864年他们到 **435**

---

[46] 关于女王委员会政治结盟的讨论，是根据让·拉博德的叙述；见拉博德致德鲁安·吕伊函，1865年5月25日，MAE，《马达加斯加Ⅵ》。

[47] 见科多尔致德鲁安·吕伊函，1863年11月28日，MAE，《马达加斯加Ⅵ》，和罗素致考利函，1864年6月7日，公共档案馆，FO/48/6。

[48] 见帕克南致罗素函，1863年9月30日，FO/48/10，信中对法国派遣至马达加斯加的特使迪普雷准将的行为有充分的讨论。

巴黎的访问毫无结果。拿破仑三世皇帝甚至拒不接见他们。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法国外交部长德鲁安·吕伊一次友好的但措词强烈的训诫，他谈到遵守国际公约的重要性和法国政府毫不含糊地要求，如果要恢复两国的友好关系就必须迅速支付赔偿费。

大使们返回马达加斯加，向政府说明了法国对取消朗贝尔特许权和条约所持态度的严重性。由于马尔加什极希望不再负担这两个协定的义务，所以同意支付赔偿费，特别是由于英国政府已表示无意为马达加斯加干涉这件事。赔款于1866年1月1日在塔马塔夫付讫，两国开始谈判新的条约。然而，法国人并非如马尔加什所期望的接受英-马条约的版本，而是仍要求他们的国民能在马达加斯加购置和拥有土地。当然马尔加什拒绝了法国的要求。法国政府自觉处境尴尬，遂谋求英国政府修改英方与马达加斯加的条约，以使英、法国民能在马达加斯加获得土地。但是，英国人拒不修改已经批准的条约，法国的阴谋失败了。最后，法国人无可选择，只好接受以英-马条约作为新的法-马条约的基础，在新条约中规定法国国民无权在马达加斯加购置和拥有土地。该条约于1868年8月8日在塔那那利佛签定。

拉达马被推翻后的五年是马达加斯加的多事之秋。该国在取消拉达马二世缔结的条约问题上与法国发生很大分歧。因此给马尔加什的印象是：英国依然是友好的和无所要求的，而法国则是不友好的和有敌意的，当时塔那那利佛甚至担心法国人会侵犯马达加斯加。据驻塔那那利佛的法国领事说，在1865年英-马条约签订之际，马尔加什政府"感谢所有的英国人——即居住在塔那那利佛的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们——为了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修改而与政府良好合作。"[49] 这个条约被看做是英-马友谊的加强，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436 另一方面，由于法国不友好政策的结果，马尔加什与法国的友谊遭到严重破坏。英国人已抢在法国人之前，而就马尔加什政治背景而言，这是马达加斯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国内发展，1861-1880年

以上对于本章所论述的这个时期的讨论大部分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问题，包括该国从1800年到约1880年之间的政治演变，以及在以马达加斯加为一方和以英、法为另一方外交上的相互作用。下面有必要转而论述该国在行政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演变，特别是因为处在欧洲人大角逐时期，这些领域中的发展，对于马达加斯加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为生存而斗争，将是至关重要的。

在此期间，马达加斯加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女王拉纳瓦洛娜二世和她的首相与丈夫雷尼莱亚里沃尼于1869年2月改信基督教，这件事对此后事态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1861年，传教士重返马达加斯加，他们的热忱工作，清楚地表明国内迅即会发生一场宗教革命。1863年，马尔加什首都的总人口约为60,000人，其中约5000人是基督教徒。至1868年末，单是伦敦布道会在马达加斯加全境已有10,546名教会成员和153,000名信徒。[50] 基督教集团中有许多成员是政府中的领导官员，因而再不能被忽视，也不能再用迫害

---

[49] 拉博德致德鲁安·吕伊函，1865年6月29日，MAE，《马达加斯加Ⅶ》。

[50] 见19世纪60-70年代伦敦布道会《编年史》和报告。



图片 16.9 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统治时代一座受人尊敬的建筑物，前面是拉索海里娜女王的轿子，背景是拉索海里娜和拉纳瓦洛娜二世时代兴建的新教教堂

作为消灭基督教徒的手段：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曾试用过，但失败了。到 19 世纪 70 年代，迫害基督教徒则意味着想要消灭最有势力的一部分人。追随伦敦布道会的改教者拥戴雷尼马哈拉沃为他们的领导人，他是马尔加什外交部长，也是雷尼莱亚里沃尼在争夺领导权中的公开对手，正好也是亲英国的。为了使雷尼马哈拉沃采取中立立场，避免一场甚至会导致拉萨塔王子（伦敦布道会的门徒）取代女王拉纳瓦洛娜二世的激进的基督教革命，拉纳瓦

洛娜和她的首相决定信奉基督教。[51]当然，这并不表明他们不信仰他们所入的教门，但确实说明了他们为何和如何在此时此刻改信基督教。

马尔加什领导人信奉新教，即英国人的宗教，而不信奉天主教，对马达加斯加的未来有437 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马尔加什人倾向于把新教当做是统治者的宗教，并把它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在伊梅里纳和贝齐利奥之外更是如此，基督教只是在梅里纳拓殖者所守卫的一些设防据点盛行，那里的总督也往往是福音传教士。天主教在贝齐利奥地区和隶属的各族人民中很活跃，他们发展了一种人民的基督教，与官方宗教并驾齐驱。此外，在对当局的反作用中，传统宗教有所复苏，尽管伴随基督教的传播，传统宗教"萨姆皮"(sampy)已为公众所摧毁。而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最著名的"萨姆皮"祭司已成为反王室当局的反对派领导人。[52]

马达加斯加统治者改信耶稣教发生在法-马条约缔结后不久，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为签署条约已有过争吵，法国甚至以战争相威胁。改教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即英国的姿态看来好像是马达加斯加的真实朋友和盟友，在马达加斯加的传教士对此也一再极力强调。通过诸如詹姆斯·卡梅伦等人，伦敦布道会给予马尔加什大量的技术援助，而雷尼莱亚里沃尼和他的同僚们相信，如果信奉打着伦敦布道会招牌的基督教，就能进一步巩固这种友谊。事实上，信奉了新教，他们会像盟友一样更加靠拢英国，一旦与法国再度发生争执，便可期望英国的支持。法国人也把马尔加什领导层接受新教，看做是它对英国的事业承担义务的表示。马尔加什领导成员则把女王转变宗教信仰，看做是马达加斯加抵制法国在该岛的文化和影响以及偏向英国的表示。

英国传教士赢得了这场宗教战争，他们利用在首都新得到的有利条件，在马达加斯加全境扩大活动。即使是天主教徒，由于在首都缺乏直接的政治影响，所以也不妨碍他们在国内其它地区改变宗教信仰。[53]如上所述，他们在贝齐利奥地区控制着福音的宣讲。之后其它教会进入，及至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逐渐划分出势力范围：诺尔斯基传教会在瓦金南卡拉特拉，福音传教会(SPG)在东部，FFMA在西部。由于各种教会的作用和英国教会与马尔加什政府之间的亲密联盟，在教育、社会变革和医疗服务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前439 面已经提到推广扫盲和书面文字。由此产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革，如从传统的阴历过渡到由英国传教士于1864年引进的格里历。在建筑上也有教会的影响，特别是狂热地建造教堂和殉教者纪念碑，努力使塔那那利佛取代安布希曼戈成为一座圣城。[54]由于马尔加什人民取得了卓越的进步，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以在我们所论述的这段时期内他们赢得了"文明世界"的赞扬。反过来这时国内即将来临的一场社会革命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1820年，英国传教士在塔那那利佛开设了第一所学校。当基督教遭禁、传教士纷纷撤离该国期间，世俗教育由受过传教士教育的马尔加什青年继续。1861年后，随着传教士的归来，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结果到1880年，在教会和政府学校中的学生已超过40,000名，

---

[51] D. 达利贝拉(Dalibera)，1977年。
[52] M. 伊索阿韦洛姆安德罗索(Esoavelomandroso)，1978年b；S. 埃利斯，1980年。
[53] A. 布杜1940-1943年。
[54] F. 拉伊松(Raison)，1970、1977、1979年。

首相颁布法令，“凡七岁以上儿童必须入学。”[55]事实上，实行义务教育已写入1881年的305条法典，1882年，政府的督学开始考察伊梅里纳的学校。19世纪70年代开办了中学，不过这些中学直到1880年后才真正开学。许多男孩，包括首相的两个孩子被送到国外，特别是去英国和法国深造。由于教会开设了一系列印刷厂，出版书籍、杂志和报纸，从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随着教会势力所支配的教育的扩大，技术教育未能与文科教育同步发展并不奇怪，因为传教士对发展教会信徒比对公共工程更有兴趣。然而，马尔加什人已能用英、法两种文字起草外交信件，足以证明。他们在文学教育上所达到的水平。

随着1862年伦敦布道会在塔那那利佛开设一家诊疗所，马达加斯加开始有了医疗服务，三年之后在首都中心区阿纳拉克利开办了一所医院。1875年，马尔加什政府创建了自己的医疗服务，还有领薪的工作人员。及至1880年，马达加斯加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合格医生，安德里亚纳利医生和拉贾奥纳医生(首相的一个女婿)两人都曾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九年医学。[56]

自从拉达马一世时代以来，马达加斯加在宪法和行政发展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以雷尼哈罗家族为首的霍瓦人的寡头政治集团取代梅里纳君主，他们成了国家的统治者。走向君主立宪制的运动始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女王拉纳瓦洛娜一世被迫与雷尼哈罗和雷尼乔哈里分享政权，这两人均出身于重要的霍瓦家族，18世纪末曾协助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创建梅里纳王国，并从低微的社会地位一跃而成为有权有势之人。在梅里纳，政府的传统形式一直是由君主“个人统治”，按照他认为合适的办法管理王国，完全由他自行决定是否与顾问们商量。然而，在拉达马一世逝世后，梅里纳君主的权力由于霍瓦家族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上升，越来越削弱。霍瓦人在创建和巩固扩张主义的王国中发挥过主导作用。多年来，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靠新的商业机遇以及他们在军队和行政统治集团中的牢固职位，发财致富。虽然安德里亚纳阶层在国内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军队和政府的实权和势力已归于霍瓦阶层。1863年国王拉达马二世被暗杀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新的女王拉索海里娜被正式承认为立宪君主时，统治权旁落霍瓦寡头政治集团之手，而这个集团曾推翻女王的丈夫。在拉索海里娜加冕之前，首相及其支持者要求她“签署一系列条款，诸如她同意不喝酒，没有评议员们的意见不得擅自判人死刑，不经他们所控制的委员会的同意不得颁布新法律”。[57]

440

事实上政府的权力最初是由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和雷尼莱亚里沃尼两兄弟分享的，他们分别担任首相和军队总司令。1864年7月，首相雷尼沃尼纳希特里尼奥尼被推翻，由雷尼莱亚里沃尼取代，后者既是首相又是军队总司令，这是首次由同一人兼任此两职。[58]不久，雷尼莱亚里沃尼与新女王结婚，尽管她已年过50，并且比他大15岁。这位新首相成了国内最强大的人物。事实上，雷尼莱亚里沃尼已成为马达加斯加的统治者，无冕国王。他

---

[55] M. 布朗，1978年，第212页。另见B.A.高，1978年，第4章，其中关于英国教会的教育和医疗工作有很好和全面的讨论。

[56] V. 拉曼安卡西纳(Ramanankasina)，无出版日期。

[57] B.A.高，1979年，第141页。

[58] M. 布朗，1978年，第199-200页。

又与继任的女王结婚，继续巩固他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的效果，就是要把权力从君主和安德里亚纳集团转移到首相手中，而他正是霍瓦寡头政治集团的首领。[59]

为了改善对法治的维护与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能，1868年颁布了一部101条的法典，从此逐年增加条款，最后为305条，于1881年3月颁布。这部法典总的主题是，国家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只要不妨碍革新，准予继续保留。印发的101条法典在执行中是严格的，当然在许多方面对旧的风俗习惯作了改进。它将“死罪从18种减到13种——其中之一是蓄意谋杀，另外12种为各种形式的叛国罪”。它还废除了全家负责的观念，即妻儿要为男人犯罪受到处罚。这一法律在各省实施的形式不同，而且处罚往往较轻。拉纳瓦洛娜二世甚至于1873年为贝齐利奥地区颁布了一部118条的特别法典。[60]

1876年创立了三个高级法院，而以前只有一个法院。这些法院审理各种类型的案件，每次审讯有13名法官，其中11名是王宫官员。在村庄中，委任地方治安官和村长(sakaizambohitra)主管司法；在地方一级，司法机关(fokon'olona)的改组确实使村长在维护法治和确保对所有人公正执法和公平对待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所有的案件，无论是经村法院或经首都的三个最高法院审理，都要由首相来作出最后裁决。这种集权的做法虽然赋予一个人极大的职责，但能使塔那那利佛政府了解各省所发生的情况。

同年3月，政府机构作了更加彻底的改组，创建了由8名部长组成的内阁制，即，内务、外交、作战、司法、立法、商业与工业、财政以及教育各部。创建这些部是新的305条法典的一部分，此法典在19世纪以后的年代里，甚至在殖民统治期内，成为马达加斯加实施其它法律制度的基础。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它标志着“进一步向更加人道的制度迈进，尽



图片16.10　拉纳瓦洛娜二世从菲亚纳兰楚阿省归来途中的营地，1873年

[59] P.M. 穆蒂布瓦，1974年，第88页；M. 布朗，1978年，第207页。
[60] 参阅M. 布朗，1978年，第214-215页；以下论述也主要来源于此。另见E. 泰博(Thebault)，1960年。

管许多处罚仍然是严厉的，法规在本质上仍保留了马尔加什的特性”。[61]这是马尔加什人期望他们的国家进入现代化时代和参与“国际礼让”的又一证明。

军队也进行了一些重要变革。拉达马一世在军队中的改革被他的接班人所抛弃。但是，在1872年，首相又使马尔加什军队现代化的政策复苏。特别是，在英国军队教官的帮助下，政府开始招募、培训和装备一支扩大的职业化军队。让·拉博德在曼塔索亚开办的制造轻武器的工厂，在他离开这个国家时已停业。政府改从欧洲，特别是从英格兰和美国进口武 **442** 器。但这样做政府要花很多钱，而政府没有什么税收，外汇又很少，所以不得不在国内安排生产小型武器。

1876年，军队中又引进了新的改革。此后士兵每年接受一次身体检查，禁止购买“荣誉”和用钱便可免除兵役的做法，副官制的陋习也告结束。1879年开始实行为期五年的义务兵役制。要求伊梅里纳六个省份各组成一支5000人的军队，合成一支有30,000名职业士兵的令人生畏的军队。在19世纪70年代，经过妥善计划的远征军被派往南方，镇压萨卡拉瓦人（特别是梅纳贝人）和巴拉人中的叛乱。1873年派往巴拉的远征是成功的，最终将该地区置于塔那那利佛的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但是，随着70年代的结束和80年代的开始，情况日益明确，即对马尔加什军队的要求不仅是镇压岛上的叛乱，而且要保卫国家，反对法国干涉。

马尔加什政府为了改善它在国外的形象，禁止烈性酒特别是朗姆酒的买卖。一些风俗习惯，如酷刑审讯(tangena)，在拉达马二世统治期内已经废除。奴隶贸易在马达加斯加仍属非法，不过有些外国贩子，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人，无视这项法律，继续贩卖奴隶，特别是在岛的西海岸。1877年，马尔加什政府也解放了马可亚人，他们被梅里纳人称做马松比 **443** 基(Masombiky)，都是从非洲大陆带入马达加斯加的奴隶或奴隶的后裔。1877年的法令，除了废除奴隶制本身外，对于被解放的约15万奴隶的前奴隶主来说，是一笔很大的经济损失，由此构成了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并预示着该国实现现代化的决心。[62]

经济发展[63]

在马达加斯加卷入国际贸易之前，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欧洲人开始大批进入马达加斯加之前，马尔加什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大多数人从事农业，主要用于家庭所需，大米是主食，特别是在岛上的中央高原。马尔加什人的水稻种植发展到了专业化的高度，一名观察家曾评论说：“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水稻种植更能显示出马尔加什人的勤劳与独创性”。[64]除农业外，马达加斯加的经济依靠养牛，特别是在该岛西部的萨卡拉瓦人和南部的

---

[61] M. 布朗，1978年，第216页。

[62] 参阅公共档案馆，FO/48/34，《海军少将W. 科尔-琼斯的报告摘要》。

[63] 参阅P.M. 穆蒂布瓦，1972年。以下许多论述也来源于这篇文章。

[64] 引自前书。另见H. 弗洛朗(Florent)，1979年；G. 兰托安德鲁，1981年；M. 拉索阿米亚拉马纳纳，1974年，1981年。



插图16.11 19世纪50年代马达加斯加的冶铁与锻铁业

人中。在中央高原则饲养羊和猪。鱼是马尔加什人的一项主要食品。梅里纳人未能控制西海岸的贸易：在南部，他们实际留下个空白点，而在西北部，他们必须与安塔拉奥特拉人竞争。但在东海岸，他们建立和控制了一个高效率的商业网。

444

马尔加什人有两个主要产业经验丰富，一是纺织业，另一是采矿和冶金业，特别是冶铁。他们纺纱织布，并生产各种各样的金属制品自用。这些生产为从欧洲人那里接受的技术教育提供了基础。我们已经提到塔那那利佛东南约35公里处的曼塔索亚的拉博德的工厂所制造的产品。阿尔弗雷德·格兰迪迪耶是19世纪到马达加斯加探险观察的有名的法国人，他讲述了关于曼塔索亚的情况：

> 拉博德锻铁炼纯钢；生产水泥、大炮与白炮；制造各种武器与弹药；制革；玻璃与陶器；锅盘；砖瓦；各色肥皂；蜡烛、纸与墨水；钟、明矾、硫酸；1843年后饲养中国蚕。[60]

19世纪50年代后期，拉博德离开马达加斯加，此后，上述许多产品停止制造，但是有一些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还能继续生产一些生活必需品。从欧洲和美国进口廉价物资，诸如布匹、鞋和陶器，扼杀了马达加斯加本地工业。

拉达马国王于1810年登基，当时马达加斯加正开始深深卷入国际贸易。奴隶贸易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主要特征，但随着1847年英-马条约的缔结，在马尔加什政府的权力有效控制地区，奴隶贸易已被禁止，而且再也没有恢复。然而在西海岸和西北地区，在合同劳工名义的掩盖下，奴隶继续从非洲大陆向马达加斯加进口。这项贸易主要由安塔拉奥特拉人和印度人控制，有时也得到梅里纳官吏的默许。[61] 与此同时，有些奴隶也从马达加斯加，特别是塔那那利佛当局有效控制之外的地区向留尼汪、毛里求斯、美国和西印度出口。其它

[60] 引自P.M.魏莱布瓦，1972年。
[61] M.拉索阿米亚拉马纳纳，1981年；G.坎贝尔(Campbell)，1981年。



图片 16.12　马达加斯加的女奴在汲水和舂米，19 世纪 50 年代

重要的出口有大米和小公牛，而进口的各色货物大多是布匹、枪支、朗姆酒和机器。牛肉贸易提供了政府关税收入的一半。除了同欧洲和美国的直接贸易外，马达加斯加还通过毛里求斯、桑给巴尔[67] 和塞舌尔与英国进行贸易，通过留尼汪岛同法国进行贸易。马尔加什的贸易对法属殖民地留尼汪岛是绝对重要的，留尼汪所需要的牛和大米几乎全部是从马达加斯加获得的，更不必说奴隶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在留尼汪的法国殖民者和马赛的小商人把马达加斯加当做他们合法的势力范围。 **445**

马达加斯加的国际贸易是以友好和商务条约为基础的。我们提到的它与英国和法国的 1862 年条约，分别于 1865 年和 1868 年进行复审。美国驻塔那那利佛的领事到达后，它又于 1867 年与美国签署了第一项条约。马尔加什政府还在毛里求斯、英国和法国建立大使馆以促进贸易。[68] 首相宁愿任命派往各国首都的几位主要商人担任领事。他选择塞缪尔·普鲁克特为驻伦敦领事，此人曾领头与马达加斯加做过一宗成功的生意。这项任命，看来早在 1862 年即已决定，当时拉达马二世向伦敦的普鲁克特兄弟公司订购一批马尔加什士兵制服。他于 1876 年选择一名与马达加斯加有联系的有名望的法国商人希拉里翁·鲁先生担任马达加斯加驻巴黎总领事。伊波利特·勒米埃被任命为马尔加什驻毛里求斯的领事，他是毛里求斯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也是那里的一名主要商人。[69] 1881 年，为了进一步鼓励贸易，创立了工商部，通常称做“鼓励工业艺术和制造”部。 **446**

---

[67] H. 凯伦本茨(Kellenbenz)，1981 年。

[68] 例如，见拉达马二世致勒米埃函，1862 年 9 月 25 日，该函件附于斯蒂文森致纽卡斯尔的信中，1862 年 11 月 1 日，英国公共档案馆，CO/67/443；另引自 P.M. 穆蒂布瓦，1972 年。

[69] P.M. 穆蒂布瓦，1972 年。

在国际贸易方面，马尔加什统治者对私有和国有企业均实行鼓励。有足够资本的政府高级官员与毛里求斯、留尼汪，甚至欧洲做生意和进行赚钱的贸易。其中最活跃的就是首相雷尼莱亚里沃尼本人。雷尼莱亚里沃尼在毛里求斯的代理人是领事勒米埃，并通过他开有一个私人银行账户，用以购买毛里求斯和欧洲的奢侈品，大多是服装。然而，个体的作用只不过是对国家作用的补充。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正是塔那那利佛政府通过缔结条约，在国外设立领事馆，以及为了开发国家的矿产和其它自然资源给予外国资本家特许权，从而与外国和外国人建立了贸易关系。根据马尔加什的传统和国家的宪法不得将土地让给外国人，但政府愿意出租土地，外国人可以在租地上建立种植园或开发重要的矿产资源。第一个租让特许权，是1855年由拉达马(当时他还是一位王子)给予法国冒险家约瑟夫·朗贝尔的，并在1862年9月以条约的形式确认。虽然该特许权很快被取消，但它已成为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给予类似的特许权，不过更加谨慎，以免出现可能会威胁国家独立的条款或条件。事实上，1881年3月的305条法典规定，禁止出售土地给任何外国人，违者处以死刑。

结 束 语

在我们的讨论中，特别提到马尔加什部署了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以便为国家的发展建立牢固的基础。这个进程始于国王拉达马一世登基之时，并在19世纪上半叶加以巩固。1861年后外国人的归来，特别是鼓励对外贸易和外国的文化影响，为马尔加什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现代化进程包括信奉基督教和制订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之适应于调动国家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争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得到更大的发展。由马尔加什领导人所实施的这些改革，特别是自1861年拉达马二世登上王位以来的改革，对于马达加斯加的发展至关重要。有些人坚持认为非洲是因为贫穷和没有开发才变成殖民地的，因此值得指出，至**447** 少马达加斯加在我们论述的这段时期中实行了重要的改革，正如一位美国海军上将在1881年3月所说，改革已使马尔加什人“成为适于管理本国土地的一个种族；事实上排除了任何外部国家干涉的必要性”。[70] 然而，当“大角逐”来临之时，这样的发展并不能使马达加斯加顶住外国干涉的压力。从某些方面而言，现代化削弱了这个王国；[71] 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改革也使马尔加什人有能力结集起来加强抵抗。

(计德容译)

---

[70] 公共档案馆，FO/48/34，《海军少将W. 科尔-琼斯的报告摘要》。
[71] G. 雅各布(Jacob)，1977年。

17 马格里布——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新趋势

M. H. 切里弗

整个 19 世纪，马格里布发生了几次巨大的激变。这些激变，最显著的特征是欧洲主要 448 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外施加压力，结果使 19 世纪初在北非崛起的几个独立国家灭亡。1830 年，在法国军队接连不断地打击下，阿尔及利亚的德伊政权日渐衰亡；1835 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度恢复了它对利比亚及其卡拉曼利家族的直接控制；1881 年，贝伊统治的突尼斯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11 年，利比亚遭受意大利入侵；1912 年，摩洛哥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落入法国和西班牙之手。显然，这些政治事件并非仅仅是发生的一些变化，19 世纪的马格里布在经济、社会以至文化模式方面都受到一些意义深远的新趋势的影响，各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干扰，而上述政治事件或许是新趋势的发展序幕，或许是其最后结果。

正是这个时期，一方面出现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初步迹象，另一方面，世界其它地区——如我们这里谈到的马格里布仍处于"不发达"状态。[①] 大量当代文献表明，这两种现象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按照旧方法，片面地考虑北非问题，比如归咎于社会的"陈腐"性、"世俗社会的落后"和北非文明特有的"缺陷"，只是从纯粹的地区状况探究 19 世纪北非问题的根源，而不从全局来考查还存在着欧洲的影响，那么，无论怎样研究也是徒劳的。

19 世纪初，马格里布仍然沉浸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准备考查一下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并评价其优劣之处。这种平衡局面是在 1815 年突然中断的，当时欧洲扩张主义的矛头开始转向北非，因为北非近在咫尺，而且长期以来欧洲通过劫掠或贸易又与北非有着对抗或和平的关系。针对马格里布，欧洲人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根据 449 当地的情况施加影响。在短时期内，鉴于马格里布各国的情况不同，欧洲的扩张造成不同的局面，而从长期效果看，扩张给各国带来同样的剧变，导致相同的结局，即殖民地化。

19 世纪初，马格里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合法的独立国家摩洛哥，由阿拉维特王朝统治；另一部分是奥斯曼帝国的"摄政"管辖区，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行省，实际上享有高度自治权：由阿尔及尔选举产生的德伊控制着阿尔及利亚，自 1705 年起侯赛因王朝统治着突尼斯，1711 年起卡拉曼利家族掌握了的黎波里摄政区。奥斯曼帝国的这些摄政管辖区有何共同特点？它们统治的是什么类型的社会？

① E. J. 霍布斯巴姆(Hobsbawm)，1977 年；L. 瓦伦西(Valensi)，1978 年。

19世纪初的马赫增政权[②]

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传统上称国家为马赫增(Makhzen)，采取政治-军事结构的形式，对其统治的社会主体只能维持有限的权力。执掌政权者认为他们有别于臣民，比如各摄政管辖区的土耳其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已被当地人同化)和摩洛哥的谢里夫(sharifs，先知的后裔)阶层。在这个上层圈子里，最高一级的官员称做马木路克(mamlūk)，他们原是信奉基督教的奴隶，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受过专门训练而在宫廷或军队中服务。这种政权主要依靠外籍军队保护，大部分是土耳其近卫军。控制本地穆斯林社会的主要手段也由统治阶层外部和其它国家提供；例如通过海上贸易或劫掠活动而获得硬通货(尤其是西班牙的比塞塔)；在军队中使用西方"现代化"武器，并聘用技术人员；行政机构中使用外国纸张和簿记术(犹太会计师)。与欧洲国家管理方式相比，这些管理手段显然很不完善，但在当时还不懂得行政管理的社会中却行之有效。马赫增政权是介于欧洲式或土耳其"现代化样板"与当地社会"传统方式"之间的一种折衷形式。马赫增政府能够控制当地社会，剥削土著居民以自肥，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和城市贵族以及欧洲商业资本家分享利润，因为后者向其提供货币、武器和纸张等物以换取农村产品。这种剥削方式即使可以不对此时的衰败现象负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造成内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的主要根源。[③]

450 在殖民地化之前时代，马赫增政权并不缺少本地区的支持：它能够从尚武集团中招募士兵，并依赖城市贵族的效忠，由他们提出地方总督(卡伊德，kā'id)人选，指派纳税农夫
451 (拉扎姆，lazzām)，管事(瓦基尔，wakīl)等；还可依靠乡村地区显贵家族的合作，谢赫(shaykh)或地方村社首领都来自这些家族。马赫增政权还在宗教首领中拥有可靠的同盟者：乌里玛('ulamā'，伊斯兰学者)在城市，马拉比特(marābit，圣者)和穆斯林兄弟会首领们在城乡，都向百姓灌输服从政府的思想，从而有助于使其权力合法化。地方上给予支持的程度决定马赫增政权的性质，实际上还决定它的生存机会。土耳其近卫军(至少到1817年)在阿尔及尔占有支配地位，黎凡特籍的德伊竭力阻止任何与当地人结合为一体的统治形式(即使是局部结合的形式也不行)；突尼斯贝伊仍自称是"土耳其人"，虽然17世纪中叶以来他们已被自己统治的这个国家同化。自1711年起，的黎波里的卡拉曼利家族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

城市社会

一般地说，同样的人类关系模式——以家庭感情或直系亲属相互依存以及共同的穆斯林文化为主要特点——在整个马格里布也很普遍。不过，在"突尼斯"地区，城市社会更趋稳固；利比亚则更盛行"部落"生活方式；在阿尔及利亚，村社制度占支配地位；而在

② A. 拉鲁伊(Laroui)，1970年，第244-267页；M.H. 切里弗(Chérif)，1977年。
③ 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见M.H. 切里弗，1979年a。



图片 17-1 阿尔及尔的凯查瓦清真寺(1794 年建)内景，1833 年

摩洛哥，柏柏尔山民在各地的影响较大。因此，马格里布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社会，这个社会大致可以划分为城市居民(哈达里，h'a dhari)、定居村民、部落集团和高地居民，特别是柏柏尔山民。

城市已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格里布广大地区相应形成了一系列错落有致的城市：西部有拉巴特和非斯；中部有阿尔及尔摄政管辖区的特莱姆森、阿尔及尔和

君士坦丁，还有突尼斯摄政管辖区的突尼斯城、苏萨和凯鲁万；东部有班加西和的黎波里。[④]虽然这些城市的居民从未超过马格里布总人口的10-15%，但是它们已成为马格里布社会最赚钱的和重要活动的中心：贸易和手工业，其中有的已接近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例如突尼斯的非斯帽，即毡帽业；[⑤]在研究书籍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普及宗教教育、文化、普通教育和宗教法；发挥政治、行政和军事功能，由于马赫增权力集中在城市，而对乡村的影响比较薄弱。城市生活与货币经济、与基于书面文字的文化紧密相联，城市还产生出人类关系的意识，相比之下，乡村社会仍保持亲族联系或名义上的平等主义格局。虽然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有着共同的血缘基础，但是，两者的差别十分明显。[⑥]

既然城市社会有上述各种优点，它们是否能像当时欧洲的情况那样独立发展，并带动国内其它地区走上激进变革之路呢？[⑦]这个问题取决于城市"中产阶级"的性质，取决于它的力量，特别还要看到它的弱点。事实上，其弱点如何是相当重要的。当时城市区域所用的方法和技术，大都仍然是"传统型的"，质量效益也差。城镇对乡村地区的经济影响很小，因为乡村——尤其是："部落制"的乡村以自给自足经济为主，对变革有抵触。城市又受到欧洲商业资本家的激烈竞争：他们甚至垄断了各个穆斯林国家之间海上联系的管理和监督权。因此，从事贸易和手工业活动的非洲中产阶级很难独立发展自己的事业，只要他们的商业利益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受到马赫增政府的束缚。中产阶级通常只得与一些高级官员结成商业伙伴，例如1800年前后，犹太商人巴克里和比斯纳赫就和阿尔及尔的德伊合伙经商，杰尔巴商人哈杰杰·尤尼斯·本·尤尼斯也在突尼斯首相的协助下从事贸易活动。在国内，城市"中产阶级"倾向于将资产投入纳税农场(利兹马，lizma)。[⑧]由于中产阶级自身的发展步履维艰，它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变革起到推动作用。

乡村社会

当代学者已对马格里布的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巴达维，badawi)作了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有何标准？一方面，城市文化复合体是以书面文字为基础的，而农村仍沿用口头传说，保持世代相传的文化；在宗教方面，城市中有阿利姆(ʿālim，宗教学者)教授正统法律，而在乡村则由马拉布特(marabout，伊斯兰教派首领)宣讲教义并举行"耳闻目睹"的礼拜。[⑨]从物质方面来看，货币体系及相应的活动已成为城市的命脉，而乡村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技术手段都保持自给自足经济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从社会的角度看，城市居民有相当强的

④ L. 瓦伦西，1969年a，第50-61页；P. 布尔迪厄(Bourdieu)，1970年，第54-57页；J. 贝尔克(Berque)，1978年，第115-117、221-230、398-401、434-440页；R. 加利索特(Gallissot)和L. 瓦伦西，1968年；D. 萨里(Sari)，1970年，第3-12、32-56页。

⑤ L. 瓦伦西，1969年b，第376-400页。

⑥ L. 瓦伦西(1977年)认为马格里布社会的特点在于父系关系占主导地位，坚持说马格里布社会是同一性质的。与他相反，我则强调城市社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并在多篇著作中详加论述，特别见M.H. 切里弗，1979年b，第235-237页。

⑦ R. 加利索特和L. 瓦伦西，1968年，第58-60页；瓦伦西，1978年，第574-586页；A. 拉鲁伊，1970年，第244-267页；J.C. 瓦廷(Vatin)，1974年，第104-110页。

⑧ M.H. 切里弗，即将出版。

⑨ E. 格尔纳(Gellner)，1969年，第7-8页。



图片 17.2 阿尔及尔的一所古兰经学校，1830 年

等级意识和个人主义思想，乡村民众则固守着不可违反的血亲关系，确切地说即父系家族结构：这意味着人类群体系以亲属关系来区分，并认定某个名祖（“某某的子孙”），与其说这是真的，不如说具有某种神话色彩。贝都因社会形成许多并列的“群体”，它们或互相联合，或相互对抗，这种“群体”与其说是受血统关系的支配，不如说是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或由于维持整体平衡的需要。[10] 血亲原则意指"同胞兄弟"和"堂(表)兄弟"理论上是平等的(但有时也可能成为仇敌);共同拥有土地;在劳动中相互依靠和帮助。决策人称为谢赫即首领,按照词源亦即"长老",他们由选举产生,确切地说是由部落下属各级族长推选出来。

以上简单地描述了贝都因或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但对它如何解释呢?赞同"群体"论的学者认为,这只是一种雏型,没有任何真实的物质基础,纯属以"结构"和神话的形式重现实际状况。无论是公社制生活,乡村或城镇,任何事情都从血缘和家谱世系的角度来考虑。[11] 这种解释遭到批判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不顾社会结构的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偏向于探究基本群体的生物学起源,而不是研究对某个真实的自然环境的适应后果;它没有结合伊斯兰教或马赫增政权的背景来分析乡村社会,因而过高估计了历史发展等因素。[12]

笔者只想指出,"群体"特点虽然在偏远地区或与世隔绝的村社里相当突出,但在城镇或集市影响所及的乡村地区,则变得模糊或完全消失了。据我们估计,[13] 这类地区包括城市周围约10至30公里以内的平坦地区,重要商路上的绿洲,以及专营某种畅销商品的农业区域——比如种植谷物的庄园(穆尔克,mulk),突尼斯生产食用油的萨赫勒地区等。城市通过以下方面在经济中产生影响:有形资产的流通;土地持有制,需根据成文法证明无偿土地的所有权;社会关系,带有某种程度的从属性和剥削性,在这些地区,"二八分成"的佃农(卡姆马,khammās)普遍出现。[14] 即使家族因素继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农经济已在这些"开放"地区普及开来。自然,这对"部落"地区或山区来说还是陌生的。

毫无疑问,北非村社社会和马赫增政府存在许多弱点,这是由于这些社会有很大的差异性,又处于相对隔绝状态,仍然使用效益甚低的"传统"技术,马赫增政府还部分地借助外来手段实行统治,但是,它们毕竟维持着一种平衡状态,直到1815年,欧洲舰队和投机商发动新的一轮进攻之后,这种平衡状况才无可挽回地动摇了。

欧洲人的进犯

1815年拿破仑战争宣告结束,欧洲人依仗势不可挡的军队,先向马格里布而后对世界其它地区发动了进攻。最初,这场攻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争夺市场。由于马格里布的生产发展要跟上欧洲的工业化速度,产品价格相应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在当时恶劣的经济条件下,竞争日益激烈,欧洲人的海外扩张政策就更具有侵略性。[15] 早在1816年,埃克斯茅斯勋爵曾率领英国舰队前往北非,1819年弗里曼特尔海军上将指挥的一支英国舰队在朱利安上将的法国海军分舰队配合下,再次驶往北非,目的是向"柏柏里"诸国宣布一项由欧洲列强一致达成的禁止海盗活动的命令。然而,这种貌似高尚的目标掩藏着贪婪的意图,法国为了曾

[10] E. 格尔纳,1973年,第59-66页。
[11] 参见前注[8]、[9]、[10]。
[12] A. 拉鲁伊,1977年,第174-178页;L. 本·萨勒姆(Ben Salem),1982年。
[13] M.H. 切里弗,1979年b。
[14] S. 巴尔加奥维(Bargaoui),1982年。
[15] R. 施内布(Schnerb),1957年,第44-45页;M.H. 切里弗,1970年

罗旺斯省农民的利益，要求在北非获得大量商业特权；英国则为了它的附庸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正与法国竞争)的利益，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标志着一项最终获得巨大成功的政策开始实施，这项政策旨在保证北非国家屈从于欧洲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需要。[16] 1824 年率先遣队到突尼斯赴任的法国新领事接到指示，其中强调说“需要与这个劣等政府(摄政)建立 456 联系，这更有助于(法兰西)王国保持尊严和利益”。[17] 欧洲贸易，尤其是法国的贸易，从这一“需要”中得到的好处最多，因为有一套令人生厌的不平等体制为欧洲贸易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使它得以迅速扩展。借助于公使的影响，即使是最不可靠的欧洲人的交易也能保证成交。在突尼斯定居的一名法国商人声称，“就算柏柏里海盗消失了，他们也会被捏造出来”。[18] 推动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因素是欧洲人的“民族自豪感”，因为在马格里布不用冒多少风险就能使各种愿望得到满足，遭到的失败也能得到补偿。众所周知，1830 年法国对阿尔及尔的远征是由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决定的，这个政权指望恢复它在国内的威信并巩固其地位。

在开展贸易活动的同时，各类业务交易也发展起来，借贷或高利贷领域尤其发达。这里仅引述一个例子：突尼斯贝伊因为缺钱，习惯于每年收获前向欧洲商人出售本地生产的橄榄油，他对这项贸易有垄断权；然而 1828 年农作物欠收，橄榄油短缺，于是欧洲商人要求退还预付款，这笔赔偿是按当时马赛通行的油价支付的。[19] 贝伊并未因此而摆脱困境。30 年代持续增加的债务负担，一部分落在首相大臣等几个高层人物身上，当时首相就被国债拖垮了；另一部分落在萨赫勒地区油料作物种植者身上，1832-1845 年他们必须支付二百多万法郎的债务。[20]欧洲商人玩弄手腕，诱使贝伊坚持要臣民用现金(而不是用橄榄油)偿还预付款，他们因此得以独吞这类商品贸易的利润。最后，他们还代替贝伊在收获季节前直接向种植者发放贷款，从 1838 年起，许多种植者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扣押了财物。[21]

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借贷活动一直在升级。1860 年左右，欧洲资本过剩，利率下降，当时仍然独立的马格里布各国竟根据外国公使和顾问的意见，开始试行“改革”，使欧洲人的 457 渗透活动有了新途径，即从贸易转向金融领域。阿尔及利亚的门户大开，资本主义投机活动或所谓“温和的殖民事业”在农业、银行业、公共工程、采矿业等领域开展起来。[22]

这一趋势在突尼斯尤为明显，该国财政资源先是遭到剥削，然后在十年之内(1859-1869 年)完全落入欧洲人控制之中。按照法国和英国公使的建议，贝伊政府的大臣们着手实行一项庞大的“现代化”公共工程建设计划。他们轻率地大笔花钱，高价从欧洲购买过时的陆海军装备，例如 1865 年购得一批老式枪支，与外商签订合同营建耗资巨大但未必实用的公

---

[16] A. 拉鲁伊，1970 年，第 275 页。

[17] 法国外交部档案，领事通信，突尼斯，第 44 卷，“给法国驻突尼斯总领事的指示”，1823 年 11 月 28 日。

[18] 同上，第 48 卷，1830 年 8 月 10 日信件(讨论突尼斯的法国“民族”问题)。

[19] M.H. 切里弗，1970 年，第 741-742 页；K. 查特尔(Chater)，1984 年，第 335-338 页。

[20] 突尼斯政府档案汇编，第 2348、2349、2433 号档案等……I. 萨道伊(Saadoui)在 1980 年评述 19 世纪上半叶突尼斯对外贸易的论文中引用了这些资料。

[21] 同上，另见 L. 瓦伦西，1977 年，第 343 页。

[22] A. 雷-戈德泽格尔(Rey-Goldzeiguer)，1977 年，第 583-606 页。

共工程，如修复古代迦太基的罗马水渠，1859年开工建造欧洲各国领事馆，[23] 等等。贝伊不可避免地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起初他向当地金融界经纪人和代理人，特别是受欧洲人保护的来自意大利的莱亨犹太人借债，到1862年，他们要求偿还贷款总额约达2800万法郎，由政府通过高利率筹集而来。[24]

从1863年起，贝伊转向外国人借款，照理说外国债主要求的条件比本地借贷者适当，由法国政府批准的债券开始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流通。然而，有些欧洲骗子(如德裔犹太银行家埃尔朗热和奥本海姆、法国贴现银行经理皮纳尔等)与代表贝伊的一些无耻之徒(如首相穆斯塔法·哈兹纳达尔)相勾结，大量佣金公开贿赂，投机取巧，甚至公开诈取，结果使真正贷给贝伊领地的款额远远低于预定数。[25] 这些债务很快使国家债台高筑：1866年初国债约为1亿法郎，1870年2月增至1.6亿法郎，相比之下，政府年收入大约只有1000-1500万法郎。[26] 1866-1870年农业欠收，1867年还发生饥荒和瘟疫，面临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贝伊政府旋即垮台。1869年7月5日，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迫使贝伊接受一个"国际财政调查团"。由该团控制突尼斯政府的全部收入，以保证突尼斯每年按650万法郎的定额分期偿还国债。[27] 1870-1881年，突尼斯在政治舞台上得到喘息，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战事失败，无力再对突尼斯进行干涉，另一方面也由于1873-1877年任首相的海鲁丁对公共事务处理公正和明智。然而，外国资本仍通过银行机构的活动，继续渗透：1873-1876年突尼斯的伦敦银行同巴林银行、格林银行和米尔斯银行等合伙；1877-1881年，马赛信贷银行得到"工业信贷机构"的支持，与佩雷尔兄弟公司、法国贴现银行及低地国家银行等相互联系。资本主义的国际财团，或通过子公司，或与某些工业康采恩(例如巴提纽勒公司)合谋，巧取豪夺，从无力抵抗的贝伊那里获得有利可图的特许权，建立有特权的银行，建造铁路，开矿，修建港口，开发大片地产。[28] 由于外国资本在突尼斯基础设施以及生产领域发挥作用，资本主义为突尼斯铺平了直接殖民地化的道路。因为要保护既得利益，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便呼吁进行政治干预，并事先为其合理性辩解，而所谓的政治干预即军事远征，很快导致1881年5月12日在突尼斯建立法国保护制。

458

在阿尔及利亚，欧洲人的渗透方式略有不同，因为这个国家早于1830年已被征服。除资本主义的商业银行集团纷纷涌入外，殖民主义者还把贪婪的目光转向阿尔及利亚土地，向统治当局要求土地占有权。当局采取不同方式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强行征收土地(特别是在诸如1871年起义等大起义之后)；[29] 在不顺从的乡村社区驻兵占地，40年代颁布的军事条例和公告最为明目张胆；[30] 根据1873年1月26日的法令，鼓励分配"公有"土地并征用财

[23] A. 伊本·阿比-迪亚弗(Ibn Abi-Dhiyāf)，1963-1964年，第4卷，第261-264页；J. 加尼亚格(Ganiage)，1959年，第190-192页。
[24] J. 加尼亚格，1959年，第195页。
[25] 同上，第203-216页；M. 布迪拉(Bdira)，1978年，第121-124页。
[26] J. 加尼亚格，1959年，第335-402页。
[27] 同上。
[28] 同上，第421-426、463-471、564-588、600-608、640-661页。
[29] C. R. 阿格隆(Ageron)，1968年，第1卷，第24-36页。
[30] C. A. 朱利安(Julien)，1964年；A. 雷-戈德泽格尔，1977年，第139页。

产。[31] 为保护当地居民——尤其是公社的财产，曾有几次尝试，例如1863年参议院的决议，但在“移民”界的压力面前，这种尝试毫无进展。到1882年，欧洲人已占据107.3万公顷土地（1890年为133.7万公顷），被占土地大部分在特勒地区，[32] 由此给土著居民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变革因素

由于欧洲人的渗透方式多种多样，长期以来马格里布生活方式的平衡状态已被破坏，其后果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商业或金融领域中。变革的主要手段是什么？这种变革是沿着什么样的路线发生的？欧洲人所施加的压力对当地各社会阶层又有什么影响？ **459**

海洋贸易是首要的变革因素，原来它是由欧洲商人控制的，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由欧洲商人在当地的代理人或合伙人经营。由于海洋贸易的发展，历史悠久的远程商队贸易，甚至与黎凡特地区的近海贸易日渐衰落，最终被取代。[33] 利比亚穿越撒哈拉的运输线除外，因为1845年前后这条运输线重新繁荣起来，其势头一直保持到1880年后。[34]在马格里布本地，欧洲工业产品（纺织品、金属制品、进口军用品，甚至绑腿纽扣以及糖、茶、咖啡等食品）很快在当地富人圈里找到消费者，不久又打入社会各阶层。进口量迅速增长，大大超过出口量，结果，财政来源枯竭，各方面都受到影响，特别是外汇交易。[35] 其次，欧洲工业产品开始同马格里布手工业生产的同类产品竞争，并将本地产品挤出以富人为购买者的本地或国外市场。突尼斯制帽业的衰落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861-1862年以前，制帽业每年出口值大约300万法郎，1864-1865年出口值减半，1869-1870年降至85万法郎，1875-1878年降至最低点每年25万法郎。[36] 欧洲人的竞争，受影响的确实主要是高级手工业品的生产和远程贸易，但是，零售商之类的小商人也受到损害，因为失去富人买主，外汇管理混乱，又难逃避苛捐杂税，总之，社会处于普遍贫困化过程中。

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又引进一套专使少数人受益的货币制度，促使社会依赖于借贷和高利贷。除上面谈到贝伊领地靠借债度日的情况外，高利贷的破坏性影响随处可见，即或是最偏远的乡村。当时突尼斯各省总督在来往信件中反复提到未偿还的债务问题，这些债务多半是欠欧洲商人的，也有些是欠地方贵族的。1875年以来突尼斯所保留的公证注册中，就有大量有关贫困农民向本地放债人（多为犹太人）借债的记录。[37]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可能更糟，用1860年阿尔及利亚副总督马廷普雷将军的话来说，“很不幸，法国占领的后果之一是高利贷的泛滥……情况确实如此”。起义遭到镇压，乡村生活和传统的社会模式已被破坏，实行货币经济又产生出形形色色的投机者（甚至在乡村内部），这些因素加上恶劣气 **460**

---

[31] C.R. 阿格隆，1968年，第1卷，第78-88页。
[32] 同上，第94-102页。
[33] L. 瓦伦西，1969年，第70-83页；N. 赛杜尼(Saidouni)，第39-40页。
[34] J.L. 梅奇(Miege)，1975年。
[35] M.H. 切里弗，1970年，第728-729页；L. 瓦伦西，1978年，第583页。
[36] P. 彭尼(Pennec)，1964年，第257页。
[37] S. 巴尔加奥维，1983年，第353-357页。

候造成灾害以及不堪忍受的捐税负担，都促进了高利贷的发展，使之成为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时代“七大祸害”之一。[38]

突尼斯和摩洛哥政府以及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由于面临困境，它们的捐税制度更具有压榨性和贪婪性。由于需求增加，早在1820年突尼斯贝伊已对主要的出口商品橄榄油建立了垄断制。

1830年8月，法国在占领阿尔及尔之后，强加给突尼斯贝伊一项条约，迫使他放弃对橄榄油的垄断，但是，他又对其它产品建立起垄断，40年代增收间接税，并扩大纳税农场制度。[39] 1856年，他修改了长期以来已经确定的生产税的评估率和基数，还开始征收人头税(i ‘āna 或 majba)。[40] 1864年突尼斯的大暴动就是因为政府决定加倍增收人头税引起的。几年后，摩洛哥遇到与突尼斯一样的财政困难，也曾采取同样带来灾难的解决办法。[41] 在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被迫交纳传统的“阿拉伯税”和新加的“法国税”(特别是不公正的村社税，1892年朱尔·费里说这种税是“对土著居民的公然剥削”)。此外，还不得不支付间接税以及各种徭役的赎金，负担每次起义失败后沉重的战争赔款：例如1871年起义之后，法国要求赔偿，吞没了卡比尔人全部土地(总地价)的70%左右。[42]

在原有经济及社会模式遭到破坏，当地人民遭到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盘剥的新局势下，马格里布还连年出现气候异常造成的灾害，19世纪的自然灾害似乎比18世纪更加频繁。**461** 1866-1869年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危机，1878-1881年摩洛哥的危机，都使人口锐减，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削弱更是不可挽救。[43]

危机的获益者

如同其它地区一样，19世纪马格里布的普遍状况为投机者提供了良好环境。首先是欧洲移民前来定居，1855年阿尔及利亚移民人数为16.4万，1872年为24.5万，1882年增加到37.5万。[44] 1856年突尼斯的外国移民约1.1万，1870年为1.4万，1881年增加到1.9万。[45] 利比亚的外国移民，直到20世纪初年还不算多。虽然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定居的欧洲人大都出身低微，但与大多数当地居民相比，他们仍享有优越的特权。犹太人是少数民族，也享有与欧洲移民同样的地位，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身份在欧洲资本主义商业网中发挥作用，利用在这些网络与土著居民之间充当中介人谋利。[46]也有一些穆斯林起到与犹太人

---

[38] C.R. 阿格隆，1968年，第1卷，第370-372、383-386页；A. 雷-戈德泽格尔，1977年，第171-172、484-485页。

[39] 伊本．阿比-迪亚弗，1963-1964年，第4卷，第43-48、55-56、80-83、144-156页；L.C. 布朗，1974年，第134-137、340-349页；K. 查特尔，1984年，第553-560页。

[40] 伊本．阿比-迪亚弗，1963-1964年，第4卷，第203-208页；J. 加尼亚格，1959年，第101-102页。

[41] J.L. 梅奇，1961-1963年，第2卷，第225-243页；G. 阿亚切(Ayache)，1979年，第97-138页。

[42] C. R. 阿格隆，1968年，第1卷，第249-265页；引自朱尔·费里(Jules Ferry)，第452页。

[43] L. 瓦伦西，1977年，第307、315页；J. 蓬塞(Poncet)，1954年，第316-323页；A. 雷-戈德泽格尔，1977年，第441-493页。

[44] C.R. 阿格隆，1979年，第118-119页。

[45] J. 加尼亚格，1959年，第44-45页；A. 马赫茹比(Mahjoubi)，1977年，第33页，注[24]。

[46] J. 加尼亚格，1959年，第312-313页；A. 拉鲁伊，1977年，第310-314页。

相同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充当领事代理人、经纪人，更多的是欧洲商行的贸易合伙人，一有机会就摆脱穆斯林当局的控制，以便在欧洲各国驻突尼斯、利比亚和摩洛哥的领事保护下获得利益。[47] 人所共知，马赫增政府的高级官员滥用职权，利用国内苦难深重的混乱局面聚敛财富。例如在1837-1873年间任突尼斯首相的穆斯塔法·哈兹纳达尔，按保守的估计，他拥有的财产总值约2500万法郎(其中大部分投放于法国)。[48]

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官员和已经削弱的突尼斯贝伊政权在乡村地区不得不依靠某些有权势的人物，这些人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对村社实行“封建式”的统治，例如阿尔及利亚的穆克拉尼，直至他反叛和死亡(1871年)，[49] 突尼斯东南部的阿里·本·哈里发在1840-1881年间也同政府合作，后来他领导抗法运动，才被流放到利比亚。[50]，一些宗教家族的兴起也可以用同样的趋势来解释这些家族世代相传，垄断显要地位，或在伊斯兰学术界享有半官方待遇，尤其是突尼斯，[51] 或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许多伊斯兰兄弟会中占主导地位。[52]

462

危机的受害者

前面提到的多种因素——荒年欠收，马格里布并入世界市场的后果，沉重的捐税负担，以阿尔及利亚为例的殖民战争和征服者的苛刻法律造成的破坏(征服者将一些最好的土地分给外来少数移民)等加在一起，给无数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结果，民众广泛贫困化，传统社会结构遭到破坏，以致1866-1869年发生持久的危机时，国家经济和人口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损失。[53]

那么，受害者有何反应？首先是他们表现出“听天由命”的顺从态度，在19世纪所有关心穆斯林社会的欧洲人看来，这是不能过于责备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情况，1892年马斯盖雷写道，“在这个令人惊异的伊斯兰世界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个新的乞丐邦联里，与其说愤怒，不如说顺从的气氛更强烈”。[54] 这种态度与从前有过的战斗意志一样，似乎自然而然地有助于地方上的圣者和兄弟会加强他们的地位，在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如同少有的几个抵抗堡垒。[55] 19世纪初年，兄弟会派系曾出现明显的复兴迹象。这一趋势与当时世界上一些地区发生的动摇既定秩序的重大事件可能有些关联，而马格里布本身也受到影响：突出的例子有19世纪初期的达尔卡维教派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提加尼教派的贵族们强调反省，并倾向于对当局妥协，甚至1830年后与法国人妥协；卡迪里和拉赫马尼

[47] 关于一些被称为“异教徒”的穆斯林的地位问题，持赞成观点者见伊本·阿比-迪亚弗，1963-1964年，第4卷，第117-118页；J. 加尼亚格，1959年，第181-182页；摩洛哥的情况，见A. 拉鲁伊，1977年，第251-254、314-315页；B. 布里格农(Brignon)等人，1967年，第291、294页。

[48] J. 加尼亚格，1959年，第426-436页。

[49] M. 拉切拉弗(Lacheraf)，1978年，第53-60页；关于穆克拉尼，见A. 雷-戈德泽格尔，1977年，第775页。

[50] A. 克拉耶姆(Kraiem)，1983年，第145-158页。

[51] 自19世纪60年代起，大的宗教家族的垄断趋势加强，这无疑是由于政权陷入了危机。见A. H. 格林，1978年，第93-95页。

[52] 参见以下注。

[53] 参见前注[43]。

[54] 引文见C. R. 阿格隆，1968年，第1卷，第128页。

[55] J. 贝尔克，1978年，第423-429页。

463 教派则不时发动反抗占领当局的斗争。在阿尔及利亚，有一种现象虽不能说引人注目，也受到极大重视，据说伊斯兰教的学术思想和城市生活被破坏，从更广的范围来讲，则是传统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因而广大穆斯林民众重新转向扎维亚（zāwiya，礼拜寺）和兄弟会寻求精神寄托。[56] 本作者认为，19 世纪突尼斯的兄弟会也是一个例证，他们在长期消沉之后又有了新的活力，而且某些圣者或兄弟会首领当时还起过重要作用。[57] 在摩洛哥，这种趋势更明显，那里的扎维亚和兄弟会十分兴旺。

在马格里布的另一边，与埃及相邻地区，1843 年出现了赛努西教派，在以后约 60 年间，该组织有效地行使了宗教和政治权力，其势力不限于昔兰尼加，还越境扩展到苏丹、撒哈拉等地，到 1900 年，它建立的据点多达 146 处。[58] 对于欧洲人人侵与马拉布特和兄弟会势力增长之间的联系，至今虽无专门研究，但本作者认定这两种现象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欧洲人的渗入或征服还引起另一个后果：19 世纪马格里布的起义次数越来越多，而且规模空前。无论是初级的反抗形式，还是求生手段，乡村中每天都发生抢劫、偷窃、纵火、蓄意破坏森林等事件，灾年情况尤为严重（例如 60 年代的突尼斯）。[59] 地方起义频繁，不仅是被占领的阿尔及利亚（直到 1881 年奥兰地区南部发生最后一次大暴动），[60] 摩洛哥和突尼斯 1815 年后也经常发生起义，50 多年的平静从此结束。一些基础广泛的起义活动唤起大片 464 地区居民乃至全国民众的响应。例如利比亚村社民众和山区居民多次举行反对奥斯曼占领当局的起义，传奇式的英雄古马・马哈茂迪和阿卜杜勒・贾利尔声名大振，而在 30-40 年代反抗土耳其人的斗争中，阿拉伯人的觉醒意识已露端倪；[61] 1864 年，当政府为偿还贝伊所欠外债而增加捐税时，突尼斯各族人民组成了造反联盟；1871 年，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及其邻近地区居民得知一个为欧洲移民效力的文职政府成立的消息，立即利用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击败的时机，发动了起义。然而，所有这些重大行动均告失败，因为正规军火力强大，起义的民众却缺乏凝聚力。

此外，为了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平衡秩序，也曾在许多方面试行改革，但同样是无所成就。下面将根据马格里布各国的具体情况，对这些改革作一番研究。

阿尔及利亚

马格里布各国是在不同年代落入欧洲人直接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在 1830 年，突尼斯在 1881 年，利比亚在 1911 年，而摩洛哥在 1912 年。毫无疑问，这些国家没有在同一时间全部沦为殖民地，绝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各国内部不同程度的抵抗所造成的。

在马格里布所有的政权中，19 世纪初期的阿尔及尔摄政管辖区成功地保持了它的非土

---

[56] C.R. 阿格隆，1968 年，第 1 卷，第 293-301 页；Y. 图灵（Turin），1971 年，第 110 115、129-145 页。

[57] L.C. 布朗，1974 年，第 174-183 页；A. 本・阿乔尔（Ben Achour），1977 年，第 218-222 页；A. H. 格林，1978 年，第 65-67 页，特别是注[40]、[41]、[42]、[43]、[44]。

[58]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1949 年。

[59] “突尼斯政府档案总汇”中地方总督的通信提到有关农村骚动的情况；M.H. 切里弗，1980 年。

[60] M. 拉切拉弗，1978 年，第 69-87 页；关于 19 世纪阿尔及利亚武装抵抗运动问题，见 1982 年 2 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学术讨论会纪要（即将发表）。

[61] “突尼斯政府档案总汇”专栏 184，案卷 1020-1023，详见古马（Ghuma）致突尼斯贝伊的信件，1855 年 7 月底（案卷 184-1020）。

著化特点，至少阿尔及尔本地和中央政府是如此。中央政府完全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他们比其它地区的土耳其人享受统治"阶层"特权的时间更长。阿尔及利亚之所以有此明显的特点，原因在于它比马格里布其它地区更具有乡村性质：这里的社会分化现象比其它地方更明显，其"中产阶级"（巴尔迪，baldī）多与征服者同化，势力较弱，城市文化尚未发展起来。

是否可以说阿尔及利亚统治当局反对变革呢？看来不是这样。整个18世纪，当局实行一种有限的寡头统治，他们一律是土耳其出身，利用强横的土耳其近卫军来巩固统治地位，并从自己的圈子里选出德伊，使中央机构更加稳定。然而，纯粹军事统治和外族统治的趋势日渐衰弱，统治阶级"政治上"日益分裂。这一进程在阿里·胡贾的"革命"中达到高潮，1817年他粗暴地对待军界，并得到当地某些民众，如科洛格卢人（土耳其与阿拉伯混血族）和兹维瓦-卡比尔人的支持。[62]这正是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早已出现的历史事件的重复，只不过阿尔及利亚一百年之后才出现这种趋势。此前是东部或西部行省（beyliks）发生变化。18世纪以来，各省贝伊已不得不主要依靠"阿拉伯"军队，并采取与地方贵族结盟的灵活政策。[63] 这也是抗法活动在东部或西部省份要比阿尔及尔及其周围地区更加持久和顽强的原因之一。 **465**

尽管有这些变革迹象，整个说来，"阿尔及利亚"政权直到它实际灭亡时仍保持其非土著化的特点，由此导致矛盾和尖锐的冲突。在兄弟会的宗教领导下，1803-1805年在西部地区、1814-1815年在卡比利亚大部分地区，都发生过声势浩大的起义。[64] 在法国人侵前，一种"民族"觉悟已在形成，它预示着阿卜杜勒·卡迪尔杰出事业的到来。

法国决定征服阿尔及尔，其基本原因在于稳定国内政局，而对当时法国经济和社会的需求并无实际意义。这就是法国在胜利后数年中政策上犹豫不决和矛盾百出的原由。当时曾制定过一些计划，特别是在主要城镇外围沿海地区实行有限占领，而将内陆地区让给境外来的统治者，比如1830年和1831年，曾打算由突尼斯的王子们统治，或者与该国实际控制者谈判后挑选统治者，例如1832年任君士坦丁贝伊的艾哈迈德和埃米尔阿卜杜勒·卡迪尔。[65]

1830-1837年，艾哈迈德贝伊在君士坦丁省加强和改进了原来土耳其或科洛格卢人的统治制度；[66] 1845-1847年，活跃在瓦迪切利弗地区的马拉布特们，例如布-马扎，严守着他们的古老传统；1851-1853年，在阿尔及利亚东南部声名卓著的瓦尔格拉"素丹"是另一位"政治"上的马赫迪（mahdi，救世主）[67]；然而，阿卜杜勒·卡迪尔既不同于他在君士坦丁的对手艾哈迈德，也不同于宗教领导人，他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燃起"阿拉伯民族"意识的火焰，对此连他的敌人都有所陈述。[68] 1808年他出生在一个马拉布特家庭，

---

[62] P. 布瓦耶(Boyer)，1970年a，第121-123页；1970年b，第92页。
[63] P. 布瓦耶，1970年b，第87-88页；A. 拉鲁伊，1970年，第248-249页。
[64] P. 布瓦耶，1970年a，第119-121页；N. 赛义杜尼(Saīdounī)，第59-61页。
[65] 关于埃米尔阿卜杜勒·卡迪尔，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传记记载，例如M. 拉切拉弗，1978年；A. 萨达拉赫(Sa'dallah)，1983年，第2卷，第40-46页；R. 加利索特，1965年，第339-368页；C. R. 阿格隆，1977年，第19-49页。
[66] A. 特米米(Temimi)，1978年。
[67] A. 雷(Rey)，1978年，第197-221页。
[68] 见前注[65]。

466 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学者(阿利姆，'ālim)，也是合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改革家：他宣扬只有返回信仰之源，才能复兴乌姆玛('umma，伊斯兰社团)。1832年11月，在非常混乱的局面下，奥兰地区的村社酋长和马拉布特们推选他为抵抗运动的唯一领导人。

他施展个人的杰出才能，通过外交途径或使用武力，在1839年成功地将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的居民置于他的领导下，其权势达到顶峰。这期间法国殖民当局(1834年上任的德米歇尔和1837年上任的比若)决定暂时收敛法军占领行动，并与阿卜杜勒·卡迪尔达成协议，承认他对阿尔及利亚内陆地区的统治权，公开换取他对法国占领沿海地区的认可。有段时间法国甚至还帮他击退敌手。阿卜杜勒·卡迪尔逐步建立起一套国家机构，它虽不是中央集权制，但至少执行了统一管理的职能，既按照可兰经规定的原则实行法律和征收捐税，又考虑到各地方实际情况，将“行政”机关和军事组织与普遍的社会条件协调起来。后来把阿卜杜勒·卡迪尔击败的比若私下承认：“埃米尔缔造的组织机构是以对国内每个地区、部族间关系和居民各阶层利益的全面认识为基础，简言之，是建立在对人类和物质问题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我看它值得保存下来。”这个“民族”国家已初具规模，而且它所要求的宗教和爱国情感交织在一起，因此从1832至1847年由“忠实者埃米尔”领导的抗法运动颇具活力和持久性。然而，他的军队与敌军实力悬殊(比若出动10万大军对付他)，法军实行焦土政策，更重要的是当时阿尔及利亚社会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原因导致不屈不挠的埃米尔终于失败：他被法国人赶出阿尔及利亚，逃往摩洛哥避难，至1847年底终于向法国投降。

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误，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殖民地社会及其统治机构逐步建立起来。阿尔及利亚由一名大总督管辖，划分为“公民区”和“军事区”：欧洲人住公民区，建立了一套法国机构，穆斯林村社属军事区，听任驻军统治。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为了配合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活动，也曾尽可能加强土著居民上层人物的权力，比如尝试建立著名的“阿拉伯王国”，借以换取他们对“军事区”行政管理的支持。不过，1867-1869年涉及 **467** 穆斯林社会的经济崩溃，1870年法国军队又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结果，皇帝的一片好意化为泡影。[69]

法国失败时，阿尔及利亚的公民区正在扩大——欧洲移民将占据优势，这一威胁激起了卡比利亚及其邻近地区1871年的大起义。这场起义的领导人是穆克拉尼一类的“封建主”和某些兄弟会(主要是拉赫马尼教派)头人。经过一场血战，起义被镇压下去，参加起义的村社随后遭到经济毁灭。大约80万居民被迫支付赔偿费，赔款超过其土地价值的70%还多。[70] 这标志着欧洲移民开始掌握统治权，穆斯林居民从此进入最黑暗的“殖民地黑暗”时期。土著人民陷入贫困状态，丧失了本民族的许多社会文化传统，受一种极严酷的专门管理制度的束缚，他们只得听凭居少数的欧洲移民公开剥削，而市镇、行省和中央政府所设各级代表机构的成员，几乎均出自欧洲移民集团。1891年前，只有一小部分人捍卫穆斯

[69] A. 雷 戈德泽格尔，1977年，第545-547、686-688页。
[70] 见前注[29]。

林的利益，他们大多是1881年成立的“土著人保护协会”的成员。[71]

突尼斯

突尼斯是极愿接受外来影响，政治上十分集权化的国家，它也是最早进行西方式改革和仅次于阿尔及利亚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

突尼斯有一个相当活跃的“中产阶级”与国外保持着正规的商业联系，主要贸易对象是黎凡特各国；而统治阶级中参与对外贸易的人，主要是同欧洲商人进行交易。由不同商业利益引起的压力和地方贵族的权力，不久就对政治制度发生影响，军事和异族统治的特征逐渐减弱，开始向“半民族君主制”发展，这一趋势甚至在18世纪初以前就已出现。政权当局既未放弃与奥斯曼帝国的联合，也未取消土耳其近卫军和马木路克的服务（它们仍然是贝伊统治体制的两大柱石），却在本地居民中扩展了其同盟者和支持者的范围，从而扩大和稳定了其统治基础。哈穆达帕夏统治时（1782-1814年），突尼斯贝伊政权无疑达到鼎盛时期。[72] **468**

欧洲刚一恢复和平，主要的基督教强国就向突尼斯贝伊提出要求，并轻易获得他的许诺：查禁海盗活动，突尼斯全境向欧洲企业的贸易及其它活动开放。前面已经谈到，这一决定给突尼斯的经济和财政带来了有害的后果。此外，在30年代，由于1835年的黎波里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前哨阵地，1837年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落入法国的统治，突尼斯受到这两个邻国的军事威胁。突尼斯贝伊艾哈迈德（1837-1855年）也仿效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和土耳其的马哈茂德二世，决定向欧洲借款。奥斯曼素丹和列强驻突尼斯领事，都曾以不同的但同样带有偏见的理由，强迫贝伊走上此路。[73]

贝伊旋即宣布一项大胆实施改革的决策，然而改革措施过于草率，没有顾及突尼斯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按照西方军队模式组建起一支新军（nizami），所使用的也是西方武器、技术和管理方式，甚至军服式样和队列操练也加以模仿。新军实行征兵制，专为培训军官而在巴尔杜建立了一所“综合技术学校”。为了满足新军的需要，艾哈迈德贝伊建立了现代化工厂，生产枪支、弹药、布匹和皮靴。随后发生的财政问题，促使他对旧的税收制度和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全面改革，还建立起一家通货发行银行。除了纯功利性的措施外，艾哈迈德贝伊还做了一系列有悖地方习俗的决定，虽然并不违反古兰经法律。1846年，他颁布法令取消所辖各省的奴隶制度，比土耳其采取这一决定早一年，比法国占领的阿尔及利亚早两年。1847年他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第一位踏上欧洲土地的非欧洲国家的元首。此外，他还发起一场国家“民族化”运动，削减土耳其人在军队以至乌里玛（‘ulamā’ 伊斯兰学者）中的特权，从而使土耳其人与这一团体中的本地人处于同等地位；他因此直接呼吁“突尼斯子孙的爱国热情”。

---

[71] C. R. 阿格隆已对这一时代的研究写出巨著（1968年），本文主要引用了他的著作。关于“土著人保护协会”，见第1卷，第414页及以后诸页。

[72] M. H. 切里弗，1978年。

[73] A. 伊本·阿比-迪亚弗，1963-1964年，第4卷，第9-182页；L. C. 布朗，1974年；K. 查特尔，1984年，第483-583页。



图片 17.3　身穿欧式制服的突尼斯军人(尼孔米)

可以看出，改革计划是颇有一番抱负的，但结果却远不如人意。正规军在征兵、训练、装备和纪律方面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大多数工厂造价昂贵，始终未能开工生产。有件事469情能说明艾哈迈德贝伊的徒劳无功，他在古莱特船坞建造了一艘大型快速炮舰，但由于通向大海的水道过于狭窄，这艘炮舰从未下水。最糟糕的是这些花费昂贵的改革计划，很快耗干了贝伊领地的财政积蓄，致使贝伊增加捐税，求助于一些极有害的权宜之计，例如将70个纳税农场租让给肆无忌惮且权势极大的马哈茂德·本·阿亚德，致使改革措施和政府本身失去民众的拥护。[59]

在此不必探讨艾哈迈德贝伊改革失败的原因，因为前有埃及和土耳其，后有摩洛哥，都实行同样的现代化改革，而结果都适得其反。广而言之，这些改革并不适合预计将会改变的人文环境。再说欧洲的先进国家也不愿看到这些改革取得成果，试行改革只不过是让欧洲人和他们在马格里布的贸易伙伴有机会得到有利可图的合同。

1855年艾哈茂德贝伊去世，突尼斯的局势相当严重。改革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470只是播下了民族国家的种子，并在贝伊宫廷里促成了一个倾向于现代化的派别。但是，改革却引起更多外来干涉的危险，而且显出了内部的虚弱。这些弱点正好为欧洲各国领事、投机商和他们在突尼斯的合伙人所利用，这些合伙人大都是受到有势力的外国人和宫廷显贵庇护的犹太人。

1856-1857年，欧洲列强向突尼斯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推进专为发展资本主义企业铺平

[59] 同前注。

道路的“改革”。1857 年 9 月 10 日，艾哈迈德贝伊的继承人穆罕默德贝伊在英法两国领事的逼迫和军队的威胁下，采纳了“基本约法”（‘ahd al-amān）。这项法律，除重申维护摄政区全体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外，还特别规定了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利和保护条款，其中包括外国人享有财产权和不受限制寻求职业的权利，同时宣布了自由贸易政策。[75]这个基本约法仅仅是一部更详尽的宪法的绪言；宪法很快起草完成，并于 1861 年 4 月 24 日颁布实行。作为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的第一部宪法，突尼斯的这部宪法奠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从而建立起立宪政府体制。此外，1858 年在突尼斯城设立了市议会，改组了政府各部和行政机关；突尼斯还设立了一家印刷所，它的出版物中有一份周报。[76]

果然不出所料，这些改革重蹈覆辙，因为它们和过去艾哈迈德贝伊的改革同样是仿效外国模式，并不适合当时社会的普遍条件和心理状况。可是，欧洲商行的活动却得到更多的便利。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突尼斯政府进口的货物总量显著增加——罗思柴尔德公司保证来自法国的供应渠道；英国获得土地租让权，有权设立特惠银行、建造一条铁路干线，但是，这些商业冒险活动开始不久就失败了。法国提供军事装备，获得大批公共工程合同，这些我们已经提到。[77] 突尼斯摄政区的财政支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同时由于取消了垄断制（“基本约法”中有此规定），又给欧洲人提供优惠条件，政府收入急剧减少，不久便债台高筑。1863 年底，为了维持日常开销和支付政府债务利息，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决定人头税增收一倍。

这就引起了 1864 年的暴动，所有部落集团和部分定居农民几乎都支持暴动，他们联合起来，坚决反抗政府任意征收捐税和造成灾难的改革政策。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起义者 471 在反抗贝伊政府及其仆从的斗争中一直保持良好的组织纪律性，然而贝伊的许诺和他的宫廷策划阴谋，很快破坏了起义者的团结和决心。起义集团一个接一个地放下武器，农耕地区从此处于严酷管制之下，再也没有恢复正常秩序。[78]

1866-1870 年全国农业欠收，引起一场可怕的饥荒，加上 1867 年霍乱流行，使贝伊政府的财政状况变得更加危急。破产是不可避免的。1869 年 7 月 5 日，一个“国际财政委员会”在突尼斯成立，其目的在于控制贝伊领地的收入，以保证每年分期偿还总额约达 650 万法郎的国债。[79]

当时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局势，而法国由于 1870 年战争的失败，它作为力图占领突尼斯的主要强国，声望大减。1873 年，贪赃枉法的穆斯塔法·哈兹纳达尔（1837 年以来任突尼斯首相）由赫雷丁所取代，后者是一位十分正直和思想敏锐的政治家。[80] 赫雷丁采取务实的紧缩措施，使经济活动尤其是农业得以振兴；他组建了更加注重效能的行政管理部门，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品行标准，同时推行现代教育方法。他负责创办

---

[75] A. 伊本·阿比-迪亚弗，1963-1964 年，第 4 卷，第 240-244 页。
[76] J. 加尼亚格，1959 年，第 76-88 页。
[77] 参见前注[23]。
[78] J. 加尼亚格，1959 年，第 267-270 页；B. 斯拉马(Slama)，1967 年。
[79] 参见前注[27]。
[80] V. M. 贝拉姆(Bayram)，1885 年，第 2 卷，第 46-93 页；G. S. 范克里肯(Van Kriecken)，1976 年，第 161-272 页。

了萨迪基学院，该学院在殖民地时代对突尼斯的文化甚至政治生活起了主导作用。1873-1875 年农业的丰收对他有所帮助，但是不久又遭欠收，而从 1876 年起法国在突尼斯重新得势，赫雷丁遭遇重重困难，终于 1877 年 7 月下台。这一事件标志着突尼斯又陷入任人摆布的混乱局面，国家滑向灾难的深渊。最能说明以后那可悲岁月的莫过于贝伊从前的奴才和宠儿穆斯塔法·伊本·伊斯梅尔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他执掌大权，直到法国军队入侵突尼斯，1881 年 5 月 12 日法国强迫贝伊签订丁保护条约。[81]

利比亚

利比亚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马格里布的其它国家相比，它占有撒哈拉沙漠较大的地域，1880 年以前欧洲人对它的觊觎之心还不太强烈，因此它保持本国特性和经济生活方式的时间最长，这一点用下述史实便可证明：的黎波里的撒哈拉商队贸易直到 1903 年仍很活跃，班加西的商队贸易甚至持续到 1911 年。

472

1800 年前后，利比亚只有的黎波里堪称真正的城市，还有其它几个沿海城镇(如班加西和达尔纳)，绿洲地区有一些小镇(如古达米斯、迈尔祖克和奥吉拉)。农民(hawāra)人数极少，他们在米斯拉塔与祖瓦赖之间少量可耕地上种植作物，大多数人在内陆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其中有牧羊人('urūba')，他们在小范围内比较有规律地巡回放牧，也有养骆驼人(bawādi)，他们不时四处游荡，无规律地巡回放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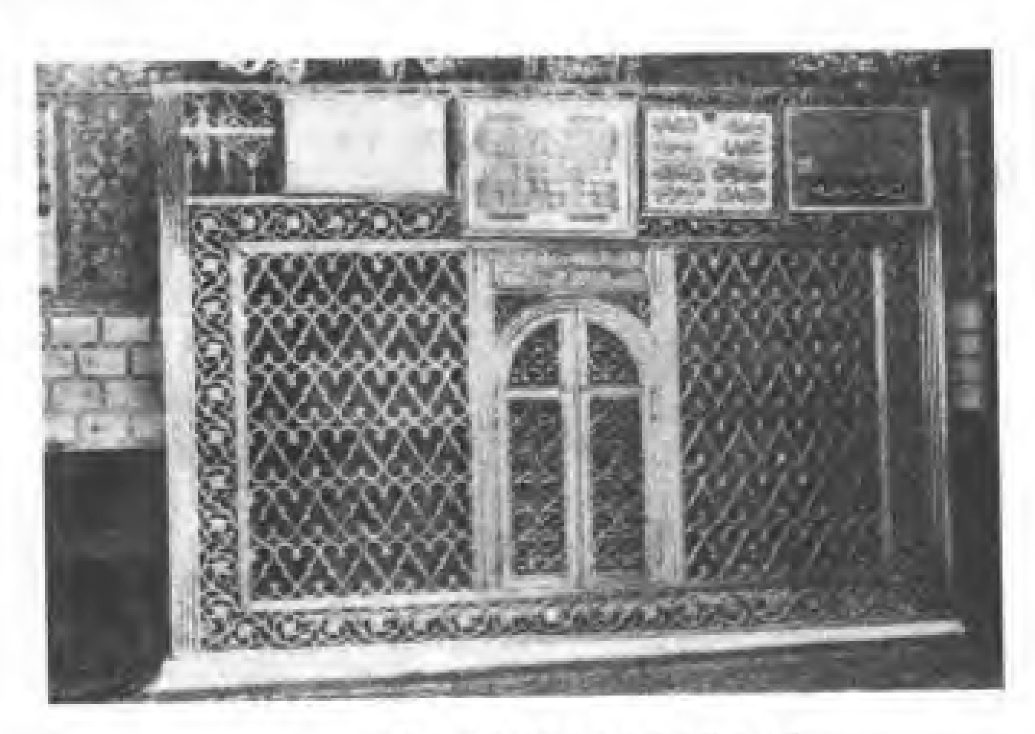
与常理相悖，利比亚最有势力的村社都坐落在沙漠深处。历代的黎波里政府都不得不和沙漠中的强权势力达成协议，以维持国内和平。在沿海地区，城市中产阶级的财源来自长途贸易、地区贸易、手工业和海上劫掠(1815 年前)，中产阶级包括军界(karaghla)、商界(tudjdjār)和宗教界学者乌里玛中著名的大家族，他们是 1710 年以来统治利比亚的卡拉曼利王朝的主要支柱。[82]

在经历了非常严酷的权力斗争之后，卡拉曼利王朝恢复丁统治地位(1794 年)，由优素福·卡拉曼利执政。他振兴了穿越撒哈拉的商旅贸易，并恢复了海上劫掠活动，因此在 1801-1805 年间引起了与美国的战争。[83] 优素福赢得了这场战争。不过，1815 年欧洲列强下令禁止海盗活动，实行维持海运的政策，因此给优素福带来了财政困难。他征收苛捐杂税，引起人民反抗，终于 1832 年被废黜。[84] 优素福执政初期，曾经有两个游牧民集团——以马哈米德部落为首的牧羊民和以奥拉德-苏莱曼部落为首的养骆驼人，联合起来反对中央政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扩张权力的企图，1804 年养骆驼的部落占领重要据点费赞之后，局势尤其严重。然而，卡拉曼利家族借其同盟者——以麦加拉部落为首的游牧民联盟的帮助，在 1812 年摧毁了反抗运动，并将后任部落首领古马和阿卜杜勒·贾利尔送交法庭审判。1830 年，中央政权发生危机，古马和阿卜杜勒·贾利尔乘机恢复了对马哈米德部落和奥拉德-苏莱曼部落的领导，并宣布独立。1835 年，卡拉曼利王朝垮台时，他们控制了费赞和的黎波

[81] V.M. 贝拉姆，1885 年，第 97-115 页；J. 加尼亚格，1959 年，第 476-491 页。
[82] A. 巴巴尔(Barbar)，1980 年，第 33-34、96-121 页。
[83] K. 福莱安(Folayan)，1972 年，第 261-270 页。
[84] E. 罗西(Rossi)，1968 年，第 259-294 页。

里塔尼亚通往班加西的所有地区。[85]

直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恢复对利比亚的直接控制，这场政治危机才得以解决。这一转折对中产阶级尤其是军界人士直接有利，因为新政权需要中产阶级的支持，便给他们减免捐税。[86] 奥斯曼统治者还要对付游牧民的联合反抗。军队的镇压活动未能奏效。最后，土耳其人设法与由塔尔胡纳领导的另一个牧羊民部落集团结盟，目的主要是在古马与阿卜杜勒·贾利尔之间制造猜疑和纠纷。1842年，奥拉德-苏莱曼部落终被击败，逃往乍得。1856年，马哈米德部落因饥馑而实力大减，1858年古马被杀后，该部落只得投降。[87] 此时奥斯曼统治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全境和费赞的部分地区。同时，在巴尔卡(昔兰尼加)也形成了类似的政治局面，当地的赛努西教(1843年成立的兄弟会)竭力引导民众返回真正的信仰，并使图布人皈依伊斯兰教。赛努西教派成功地开辟了从巴尔卡到瓦代的商旅干线，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平息了许多游牧部落之间的纠纷，很快确立了自己的显要地位。1856年，土耳其人开始和赛努西教团谈判，该教团保证在土耳其人与游牧民之间充当调停者。[88]



图片17.4 赛努西教派创建者哈萨纳因帕夏之墓

奥斯曼统治者终归要在利比亚建立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所以从1860年起谨慎地推行他们的改革计划(坦志麦特，tanzimat)，因为费赞和加特地区的图阿雷格人仍然与中央政权

85 D. 科尔德勒(Cordell)，1972年，第12-21页；G.F. 莱昂(Lyon)，1821年，第54-56页；G. 纳奇蒂加尔(Nachtigal)，1967年，第1卷，第19-22页。

86 A. 巴巴尔，1980年，第25页。

87 A.J. 卡奇亚(Cachia)，1975年，第30-36页；N. 斯劳舍(Slousch)，1908年，第58-64、211-257、433-454页；D. 科尔德勒，1972年，第21-27页；E. 罗西，1968年，第297-312页。

88 A. 巴巴尔，1980年，第121-127页；D. 科尔德勒，1972年，第21-36页；E.E. 埃文斯-普里查德，1949年；N. 齐亚德(Ziadeh)，1958年。

相对立，而且政府必须避免触犯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以便赢得他们中间至少一部分人的支持。从1865年起，逐步实行了司法改革，后来又实行了教育改革(1869年)、市政改革(1872年)、行政制度改革(1864年和1875年)、医疗和中央市场改革(1880年)。1870年还开始在各地建立荒年食品赈济中心。1870-1871、1881-1889、1892、1907、1908、1910年都发生过严重饥荒。赈济中心的建立是政府为平民群众(al-amma)所做的唯一有益的事情，其它所有的改革措施则只有利于中产阶级(主要是商人)，而后果则是加重百姓的纳税负担。改革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相当有限。尽管1850年之后欧洲商品进口量不断增长，但经济仍顺利发展。地方工业经得住竞争压力，由于细茎针茅的出口，财政平衡得到保证。[89]

但是，1881-1889年连续饥荒，首次预示利比亚即将出现意义深远的变化。出口业受到

474 损害。另外，细茎针茅的市场价格暴跌，食品进口量增加，从1892年起，贸易出现赤字。这次赤字的比重颇大，1897年后竟然常年亏损。因为从那时起，民众的食品需求有了变化，大量进口的茶叶、白糖、面粉和烟草成了普遍的消费品。当时撒哈拉商旅贸易的收入已渐告枯竭。1895年博尔诺不再同利比亚有贸易往来，同样，1903年卡诺也停止了贸易关系。[90]赛努西教派在巴尔卡陷入困境，1901年后该教派因乍得境内的军事活动而实力大减。1902年，赛努西教派经营大量地产以弥补预见到的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损失，一部分支持者因此而疏远。最后，该教派在对抗当地离经叛道的派别的斗争中未能守住自己的地盘。1910年前后，赛努西教派的据点比1853年少了许多。[91]

在上述背景下，那些已在的黎波里或在班加西立足的欧洲人的公司，凭借雄厚资本，发觉轻而易举便能占据有利地位。利比亚社会已处于剧烈变革的过程中；旧的社会结构已经破坏。这一局势直接引起意大利征服利比亚的企图(1911年)和1911-1932年的战争。[92]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475 19世纪初，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无论是西部(自廷巴克图至塔菲拉勒特，自古利米梅至陶德尼)，还是中部(自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至古达米斯)都依然繁荣，苏丹地区的出口仍包括奴隶和黄金在内。19世纪40年代，西路商旅贸易逐渐衰落，撒哈拉中部商路，尤其是的黎波里至卡诺、的黎波里至博尔诺之间的贸易却很兴旺。此外，1809年或1810年发现的直接连结瓦代和巴尔卡的路线，在1850年后成为一条主要的商路。[93]在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缓慢衰落，博尔诺一线奴隶贸易持续时间较长，瓦代一线贩奴数量一度还有所增长，甚至1900年后仍有这种贸易。[94]象牙的出口量平稳增长，1877年前后达到顶峰。最早取代奴

[89] A. 巴巴尔，1980年，第25-33、54-63、71-80页；A.J. 卡奇亚，1975年，第36-42、68-93、125-133页；E. 罗西，1968年，第312-352页。

[90] A. 巴巴尔，1980年，第139-144页。

[91] A. 巴巴尔，1980年，第128-131页。

[92] A. 巴巴尔，1980年，第139-182页。

[93]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C. W. 纽伯里(Newbury)，1966年；J. L. 梅奇，1961-1963年，第3卷，第371-447页；M. 约翰逊(Johnson)，1976年，D. 科尔德勒，1977年；S. 拜耶尔(Baier)，1974年，1977年。

[94] D. 科尔德勒，1977年，第35页。

求这种商品的是鸵鸟羽毛，其出口盛期在1878-1883年间，随后是皮货，尤其是山羊皮。除了这些货物之外，还有用靛蓝染色的布匹、豪萨地区出产的少量黄金和其它杂货。英国棉织品是输往南方的主要商品。1860年，英国棉织品约占撒哈拉贸易进口额的70%。其它进口货物包括的黎波里塔尼亚出产的北非毛织服装，奥-匈帝国出产的纺织品、羊毛制品和地毯，还有五金器具、药品、祈祷用品、香水、珠宝、丝绸、珍珠，而最重要的是武器和弹药。另外，人们对撒哈拉内地出产的岩盐、绿洲产的椰枣和萨赫勒地区产的谷物，从来都有需求。[39]

476



图片 17.5 阿尔及利亚上层社会妇女与黑奴仆人

直到大西洋航运业和西非内陆（铁路）运输业开始成为有竞争力的交通方式，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才趋于衰落。政治局势对撒哈拉贸易也起作用，但是次要的。早在1850年，瓦代的命运就决定了瓦代和巴尔卡商路的重要性。1895年，的黎波里与博尔诺一线的贸易由于拉比赫的军事活动而受到损害，主要由法国在西非的征服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也有影响。不过，商路贸易是在1903年真正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落境况，当时组织商队的费用比铁路加上海运的费用还高。[40]东部商路上的瓦代和巴尔卡是因为地点偏僻，商队贸易一直维持到1911年，甚至在1898年英国重新控制苏丹之后，达尔富尔的商路才被阻断。1900年后，撒哈拉地区的传统生活模式已经破坏，不久，最后这片尚未殖民地化的广阔土地也遭到欧洲人的践踏。

[39] 见前注38；另见A. 巴巴尔，1980年，第63-75页。
[40] A. 巴巴尔，1980年，第140页提供了数字。

结 束 语

马格里布各国或早或迟都受到暴力侵略，虽然受害程度不等，但同样是一个从自治走向依附国的过程。所以，单纯从某个地区某一统治者的错误或个别欧洲代理人的卑劣行径去寻找国家衰落的原因，都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外部因素——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决定了马格里布的命运，正如它决定欧洲以外世界的命运一样。1885 年前后，朱尔·费里，作为一名殖民主义促进者，把资本主义的扩张描述为“无法抵抗的运动，它驱使列强开始征服新领土”，它是“全欧洲共同经济体系不容置辩的证明和无法逃避的法则”。[97]

然而，或许是由于特定的地区条件，或许像阿尔及利亚那样发生过历史重大事件，马格里布各国陷入依附国地位的过程快慢不一，而欧洲列强为达此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和各国 477 人民的反应也不尽一致。阿尔及利亚早于 19 世纪中叶前就被法国武力所摧毁，该国传统社会和文化遭到欧洲最无情和最残暴的破坏。另一方面，突尼斯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逐渐受到渗透，政府曾试图通过现代化改革政策来对付外来势力。虽然改革失效，当时还带来破坏性后果，但是，这种改革政策却给未来奠定了宝贵的基础，比如产生了一个现代化社会的精英阶层，初步走上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等等。利比亚的情况是：1835 年恢复了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这在一段时间内遏止了欧洲人的野心，当然，也因为利比亚贫穷和偏远。是否可以说，19 世纪马格里布各国所经历的具体情况，对整个殖民地时期及其以后时期都产生了反响呢？本作者认为，这无疑是事实。

（沈浦娜译）

---

[97] 引自 L. 伯杰龙(Bergeron)，1968 年，第 8 卷，第 319 页。

18

19世纪初至1880年的摩洛哥

A. 拉鲁伊

摩洛哥在经历了穆莱·伊斯梅尔(1672-1727年)长期辉煌的统治之后，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经济衰弱，社会结构动摇，军队也受到破坏。素丹穆罕默德三世(1757-1790年)逐步控制了局势，奠定了“现代”摩洛哥的基础，这一过程后来为其子苏莱曼(1792-1822年)所加强。苏莱曼将马赫增政府改造得更接近于沙里亚(s hari'a，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使它的城市基础更加明显。他直接统治着豪兹和迪尔一带定居农业和树木栽培业地区，还有盖尔布一带适合自耕农发展的沼泽地区。同时，他还通过大酋长卡伊德(kā'id，卡比拉部落首领)和扎维亚(zāwiya，伊斯兰教团)领导人，对山区和沙漠地带实行间接统治。这样，君主领地和封建主领地(传统上称为 bilād al-ma khzen 和 bilād al-sibā)就有了明显的区分，这种区分表明两类领地是严格对立的。 478

摩洛哥当时是在一个限定的基础上进行改组。过去享受马赫增政府特权的某些集团丧失了权力，他们自然力求恢复以往的地位，如有必要甚至会发动叛乱。维也纳会议之后，尤其在1830年法国侵占阿尔及尔后，欧洲很清楚自己有充沛的实力，所以不断向摩洛哥施加压力。摩洛哥政府同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加强自身实力以对付外国的威胁，一是扩展疆域和巩固政治基础。这两方面的改革措施曾经受到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暗中操纵，也曾引起国内势力的反对。虽然阿卜杜勒·拉赫曼素丹(1822-1859年)性格坚强，穆罕默德四世(1859-1873年)聪明机智，哈桑一世(1873-1894年)声望卓著，但是，他们在摆脱外国控制这个主要目标上，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就，1880年的摩洛哥只保持着一个稳定国家的外观。在这个承受着欧洲沉重压力和实行积极的改革政策的时代，摩洛哥主要的成就无疑是树立起有传统特点的、高度敏感的摩洛哥社会意识，使摩洛哥在西北非占有特殊地位。 479

政治-社会结构

19世纪摩洛哥引人注目的政治制度是封地契约“贝耶”(bay'a)，直接仿效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第一个穆斯林社区时实行的方法，只有摩洛哥保留了这种封地制的纯粹原型。[1] 它根据书面契约，对摩洛哥素丹和各部落人民实行约束，这也是一种确认政权合法化的立法程序，从此不再是单凭武力来建立政权；“贝耶”加强了摩洛哥人民属于一个无形 480

[1] A. 伊本·宰丹(Ibn Zaidān)，1961-1962年，第1卷，第8-35页。



图片 18.1 素丹阿卜杜勒·拉赫曼（1822-1859 年），1832 年

的、不受政治或军事变革所左右的民族社会的感情。每次王朝更换新君主，军队将领、城市各阶层的代表、各部落首领“卡伊德”和宗教组织“扎维亚”领导人，都向朝廷宣誓效忠。所有这些誓言，大致都按同样格式写明，确定素丹与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素丹负有双重责任：保卫国土，[②] 抵抗外敌入侵；维持国内和平秩序。作为交换条件，只要素丹不违背伊斯兰法律和习俗，人民就绝对服从于他，遵守马赫增政府颁布的法令，交纳法定捐税，在和平时期维持地方武装队伍，战时则汇集到素丹旗帜下出征。在拉巴特居民呈给阿卜杜

② 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摩洛哥领土自 16 世纪以来已经明确划定。萨阿德王朝和阿拉维王朝反抗阿尔及尔的土耳其人的战争结束时，双方确认了领土划界。在撒哈拉，沙里夫王朝统治权扩展到绿洲地区，当地居民签订了“贝耶”，其统治权还达到游牧部落的牧场边境，各部落也签订了契约。19 世纪摩洛哥历代素丹与欧洲列强的交涉，都表明马赫增政府对摩洛哥领土范围是十分清楚的。

勒·拉赫曼的“贝耶”中有一段程式化的陈述：“我们在真主和他的使者面前宣誓，注重和执行伊玛目的命令，只要他的命令合法而又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现达成协议，我们按照真主的命令服从，素丹受命于真主，他尊重我们的权利，尊重他的其他臣民的权利。”[3]

为了履行职责，素丹建立马赫增政府，它主要由军队和官僚机构组成。

1885年后实行军事改革前，摩洛哥军队由三部分组成，兵源和实力各不相同：一部分是“布瓦克尔”（bwakher，传统上也称abid al-Bukhārī），这是一支几百人组成的奴隶部队，其前身是穆莱·伊斯梅尔的5000人的黑奴卫队；第二部分是吉什（gish，传统上也称jaīsh），人数不超过9000人，由来自切拉加、乌拉德-贾米、乌达亚、切拉尔达等社群的民兵构成，这些社群各自耕种国家土地，19世纪时分布在非斯周围及拉巴特和拉腊什郊区；第三部分是“努阿伊布”（nuaib，传统上也称nawa' ib，单数为nā' iba），这主要是豪兹、迪尔地区的社群按照君主的要求组成的临时性军队。穆罕默德三世认为，这支军队只是一支维持国内治安的警察部队。因此，摩洛哥在伊斯利战役中被法国打败后，素丹又决定按欧洲方式建立一支新军“阿斯卡里”（'askarī）。[4]

官僚机构成员包括国务大臣“维齐尔”（vizier）和各部大臣“库塔布”（kuttāb）。各部门下属机关在摩洛哥称做“巴尼卡”（banika）。该机构按照安达卢西亚传统，在由非斯的卡拉维因大学教授课程，并有一套复杂的文官选拔办法，因此得以维持。同时，一些国务大臣和政府大臣还是安达卢西亚血统。从19世纪中期起，出现了新型的马赫增官员，以适应与欧洲扩大交往关系的需求。他们是关税督察“乌马纳”（umanā，单数为阿明，amīn），高级学者“图尔巴”（tulba，单数塔利布，tālib），这些新官员不太精通论辩术和历史，但较为熟悉欧洲语言和财政问题。[5]

482

摩洛哥国家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基础上的，国家的法定收入来源有：国有土地的收入，对商业资本和农场产品征收的捐税“扎卡特”（zakāt）——这笔收入用于特别指定的项目——以及对外贸易的捐税；其它各种税收，包括由“卡拉吉”（kharādj）演变来的什一税“乌术尔”（'u shur），都不具备合法性。[6]

由于在税收方面受到约束，素丹不得不把开支限制在最小范围内。穆罕默德三世满足于关税收入和豪兹地区以及王室农田（'azıb）的税收（扎卡特）。然而他还对进口的布匹、皮革和磺征税。后来，他得到几个乌里玛（宗教学者）的同意，开始征收市镇税、市场税和度量衡税。[7]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此不满，强迫素丹苏莱曼在继位时取消了这些捐税。由于素丹决定限制与欧洲贸易，国库损失严重，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素丹一再到乡村地区巡视，以便尽可能多地征收“扎卡特”和什一税，这自然引起乡村居民的极大不满。1850年，他的继承人阿卜杜勒·拉赫曼不得不恢复皮革税，后来又对集市“苏克”（sūḳ）上出售的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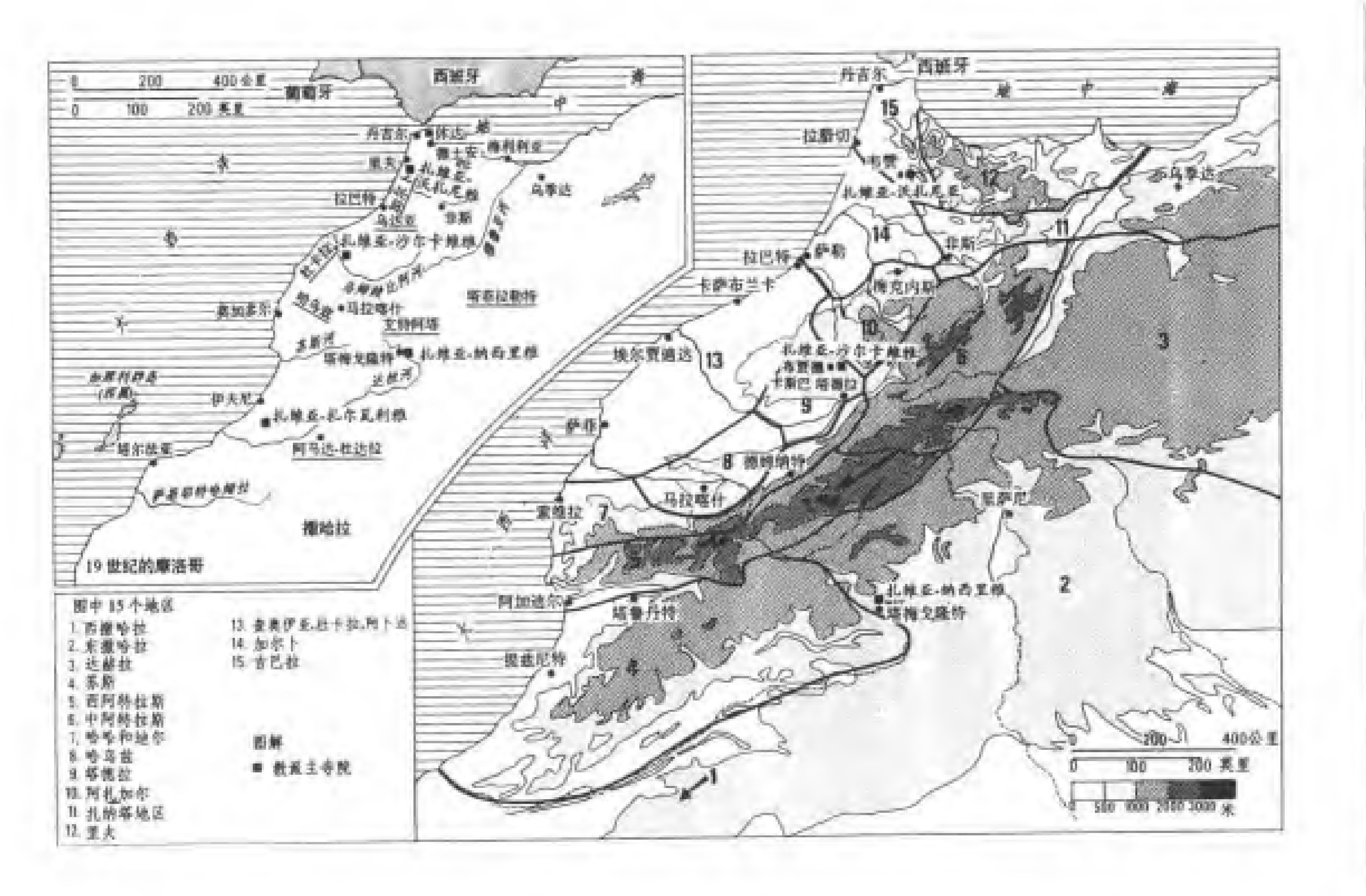
[3] A. 伊本·宰丹，1929-1933年，第5卷，第9-15页。

[4] J. 埃尔克曼（Erckmann），1885年。

[5] A. 伊本·宰丹，1961-1962年，第1卷，第46页及以后诸页。

[6] 按照穆斯林法律，只有在征服地区才征收“卡拉吉”。但是，大多数乌里玛认为，摩洛哥居民是自愿信奉伊斯兰教的。见P. 萨兰（Saran）和J. 伯顿-佩奇（Burton-Page），1965年。

[7] A. 纳西里（Nasiri），1954-1956年，第9卷，第61页。据认为，这些捐税给政府带来300万法郎的进款，足以支付军队和官僚机构的费用。



18.1 19世纪摩洛哥的历史疆域（资料来源：A. 拉鲁伊，《摩洛哥民族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根源》，1977年）

畜征税。1860年，摩洛哥在被西班牙打败后，不得不支付赔款一亿法郎，这相当于当时摩洛哥国家预算的20倍。[8] 税制改革必须尽快实行。虽然素丹穆罕默德四世一再呼吁，乌里玛阶层却仍坚持正统观点。[9] 在整个19世纪，税收问题一直是摩洛哥历史上的焦点，而又从未得到圆满解决。历史的经验迫使马赫增政府限定其职责，以便保持收支平衡，而不是增加收入，以便力争达到理想的目标。然而，由于欧洲不断对摩洛哥施加压力，全面改革 483 迫在眉睫，已无法再追求圆满。

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与城市和乡村居民之间有一些中介团体，他们享有某种自治权，但从广义上说仍是马赫增政府的一部分。[10] 作为社会各阶级或地方集团的代言人，他们积极捍卫反对素丹的传统权利；同时，他们又对素丹负责，执行马赫增的法令，但也顾及地方风俗习惯。

宗教界上层包括伊斯兰学者"乌里玛"（'ulama'），执法官"卡迪"（ḳāḍī），伊斯兰法典阐述者"穆夫提"（muftī），宗教基金（ḥabūs）管理人"纳德希尔"（nādhir）和集市检查官"穆哈台斯布"（muḥtasib）。这实际上表明城市的行政管理，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s̲h̲arī'a）得到严格遵守，从理论上说它受到素丹-伊玛目的监督，但却享有无可置疑的自治权。[11] 卡拉维因大学对教育享有特权，君主既不能更改教育内容，也不能改变其形式；他在任命上列官员时不能忽视其他乌里玛的意见，不能把宗教基金的收入转入他的钱库，也不能否决"穆哈台斯布"宣布的法令。真正统治社会生活的是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它由乌里玛监护执行，任何要公开改变它的企图都很难得逞，即使是素丹也不例外。[12]

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称为谢里夫（s̲h̲urafā，s̲h̲arīf），他们在摩洛哥城镇和乡村形成一个宗教贵族集团。在伊斯梅尔、穆罕默德三世和苏莱曼素丹统治时，曾经三次对谢里夫集团进行过普查，因为他们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声望。[13] 如果触犯法律，他们有权由自己的法官"纳基布"（naḳīb）审理。作为伊斯兰国家缔造者的后代，他们对公共资产享有权益，不仅免除几项税务，而且还接受素丹的大量赠品。[14] 作为真主的使者的后代，在公众看来他们有一种天生的福气"巴拉卡"（baraka），这种平时潜在的福分一遇有利条件就会转化为超自然的权力。他们好比是奇迹创造者和社会仲裁人，他们因此得到报酬，甚至素丹本人必要时也向他们求助。

扎维亚（zāwiya）是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团体，19世纪摩洛哥的扎维亚有多种形式，其 484 中两种最重要：一是扎维亚兄弟会，如提加尼教团或达尔卡维教团的兄弟会，其成员不分社会阶级、财富、职业或种族出身，所以有极大的横向联合能力。另一种扎维亚是寺院领

---

[8] J.L. 梅奇(Miège)，1961-1963年，第2卷，第362页。

[9] M. 达乌德(Dawud)，1956-1970年，第5卷，第97-99页。

[10] "马赫增"在狭义上指政府，广义上则指国内政界和宗教界精英阶层，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凡是提到马赫扎尼雅(Mak̲h̲zaniya)和马赫增家族，意指后者。

[11] 对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尽义务与对马赫增政府尽义务是有区别的。见穆罕默德·b. 贾法尔·卡塔尼(Ja'afar al-kattānı)，1899年，第3卷，第5页。

[12] A. 伊本·宰丹，1961-1962年，第2卷，第163 188页。

[13] E. 列维-普旺斯(Lévi-Provença)，1922年。

[14] 马赫迪·瓦扎尼(al Mahdi al-Wazzanı)，1900年，第2卷，第92页。

地，其领主实际上拥有整片封地的绝对控制权，比如摩洛哥北部的沃扎尼雅、塔德拉地区的沙尔卡维雅、西南地区纳西里雅或在小阿特拉斯山区的扎尔瓦利雅。每个扎维亚组织都试图同时具有上述两种形式，有时也能成功，例如纳西里雅；扎维亚也可能采取别的形式，但无论如何，也都是传授社会法规的学校，是马赫增政权的前哨阵地，尽管它们表面上是独立的。[15] 这种作用在城镇里特别明显，城镇扎维亚和社团(hinta)有共同的成员，追求同一目标。

“卡比拉”(kabīla)部落首领的地位差异极大。对马赫增政府来说，卡比拉主要是行政或财政管理上的一个概念，相当于某个行政区“杜卡拉”(Doukkala)、山区村镇“贝尼-乌里阿格尔”(Beni Ouriaghel)、游牧部落联盟“艾特阿塔”(Aït Atta)或迁移的牧民士兵社区(切拉尔达，Cherarda)。无论何种情况，都要事先征得当地人民同意，根据一道法令“达希尔”(dahir)，任命一名行政官“卡伊德”(kā'id)，并向其授权。卡伊德当然既是素丹的代表，也是当地人民的代言人，一身二任，但总有一方面的任务更重要，这取决于该地区与中央政府距离的远近，还取决于当地是否富足。卡伊德受总督“艾米尔”('amil)管辖，后者负责收税和征募军队。在某种有利情况下，一人也可以兼任两职，但两种职责仍须分别履行。卡伊德成员得到发展，一个卡比拉有两名卡伊德，一名代表马赫增，另一名代表地方利益，而无论掌权与否，这些成员都属于国家管理的精英集团。[16]

上述这些中介性团体，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管是以个人关系还是血亲关系为基础，其最终作用都是政府机器运行齿轮上的嵌齿。宗教学者“乌里玛”维护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也就是加强素丹-伊玛目的合法地位，因为伊斯兰教首先是一种政治社会形态。一旦出现严重的或短暂的动乱，先知的后裔“谢里夫”都会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酋长之间起到协调人的作用。扎维亚组织的首领“谢赫”(shaykh)代表素丹统治着偏远的贫瘠地区，或在战略要地维持和平秩序。[17] 一旦某个扎维亚出于政治目的反抗君主，他就会摧毁它。如果卡比拉酋长反叛，也会受到同样的处置。在抵抗外敌时，酋长们享有更大的自治权，比如西班牙人在休达或梅利利亚遭到持续围困时的里夫地区，或者，他们统治的是山区或沙漠。但是，如果他们不服从素丹的命令，或者不实行伊斯兰教教法而宣称完全独立，他们就被宣判为无故破坏“贝耶”(契约法)而犯了“希巴”(siba)大罪。素丹会按照他的军队实力情况，或发起突然袭击，以武力或外交手段将他们降服，或者通过逐渐消耗实力的方式逼他们投降，总之，素丹和伊斯兰教教法的最高权威绝不能动摇。[18]

485

摩洛哥的社会-政治制度，经过穆罕默德三世的改组，又恢复到伊斯兰教的正统上来。这个制度承认中介团体的自治权，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势，同时鼓励各行业团体、社会团体和种族集团在政府内部陈述意见，从而加强了摩洛哥的国家观念。然而，这个制度本身也包

[15] E. 米肖·贝莱尔(Michaux Bellaire)，1921 年。

[16] R. 蒙塔格涅(Montagne)，1930 年。这是一部经典著作，但应以批判眼光去阅读，因为马赫增史料本身使我们对“卡比拉”这一概念的许多原有的解释改变看法。

[17] A. G. P. 马丁(Martin)，1923 年(关于图瓦特的沃扎尼雅“扎维亚”的作用)；P. 杜兰德(Durand)，1930 年，第 65-77 页(关于塔德拉的沙尔卡维雅“扎维亚”的作用)。

[18] 殖民主义列强总是按照它们扩张政策的需要来解释“希巴”这一概念。现在则应按其原意来解释这个词，它与那个时代欧洲的法律无关。

含矛盾性，它总是徘徊于两种观念之间：一种观念是乌里玛和商人所欢迎的，即按照伊斯兰教教法实行直接统治；另一种观念是地方首领比较喜欢的，即认为素丹仅仅是统一的象征，他只享有地方首领们授予他的权力。这种制度是重商主义时代以来摩洛哥与欧洲实力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尚未稳定已不得不应付欧洲所施加的强大压力；1844 年摩洛哥被法国打败，1860 年又被西班牙打败，此后，这种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

马赫增政府实行改革以防欧洲的侵犯

关于殖民主义列强对摩洛哥的政策，我们将在其它章节论述。[19] 这里仅提请注意，直到 1880 年，欧洲舆论仍主张维持摩洛哥帝国现状。法国没有从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据点向西扩张领土，西班牙也没有从休达或梅利利亚向外扩张，英国商品在摩洛哥并未享有特权。尽管在 1844 年的战争和 1859-1860 年的战争之后，法国和西班牙强迫摩洛哥出让了几项特许权，但在 1880 年的马德里会议上，重申了保持摩洛哥现状的原则，直到 19 世纪末这一原则仍然有效。[20]

可是，欧洲列强的要求是绝对违背素丹的统治权威的。在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 **486** 中，素丹不能按英国人所建议的那样保持中立，因为穆斯林习惯法规定他有义务帮助那些被他们的合法君主抛弃的穆斯林，即被奥斯曼统治者抛弃的邻邦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这是个简单的常识问题。[21] 1859 年，里夫人民捣毁西班牙人在休达城墙外的建筑物，并扯下该建筑上的旗帜，马德里方面要求摩洛哥交出他们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的 12 名肇事者，素丹未予同意，因为那样会担上破坏“契约法”的罪名。[22] 英国特别关心贸易问题，素丹却不能轻率地批准出口自由和允许欧洲人拥有财产权，或要求执法官“卡迪”受理非穆斯林的证词，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宗教法所绝对禁止的。[23] 素丹日益感到自己处境不妙，既为欧洲人的要求所纠缠，又为乌里玛傲慢的反对态度所困扰；在欧洲人看来，他是个蒙昧主义者，而乌里玛集团则认为他属于革新派。结果，改革无所适从。

19 世纪时马赫增政府和欧洲各国领事都认为摩洛哥应加强军队，改组政府机构以保证全国的安全、秩序和公正执法。问题在于法律结构：应采用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还是借鉴欧洲法律重新立法？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马赫增政府确实进行了一次改革，但极有限，因而欧洲人并不满意。

穆罕默德四世经历过两次失败，一次是伊斯利战争，当时他是王位继承人兼军队统帅，另一次是德土安战争，他已继位为素丹，由此可见他从 1845 年起就着手实行军事改革。为

---

⑲ 见本卷第 19 章。

⑳ 比若的军队在 1844 年 8 月 14 日对乌季达附近伊斯利的摩洛哥军队发动进攻；法国海军在 8 月 6 日炮轰丹吉尔之后，15 日又攻击摩加多尔。9 月 19 日，双方签订《丹吉尔条约》，结束了战争。但是 1845 年 3 月 18 日的《拉拉马尔尼亚条约》并未解决边境纠纷，因为法国对撒哈拉有领土野心。1859 年秋，西班牙在休达组织了一支欧洲军队；在卡博尼格罗发生几次小冲突之后，他们于 1860 年 2 月 6 日进入德土安。根据 1861 年 11 月 20 日的条约，西班牙人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获得大片土地，还获得商业特惠权和南边一渔港（1883 年定为伊夫尼）。

㉑ A. 塔苏利（Tasūli），无出版日期。

㉒ A. 纳西里，1954-1956 年，第 4 卷；J. L. 梅奇，1961-1963 年，第 2 卷，第 360-362 页。

㉓ A. 塔苏利，第 1 章，第 4 节。

了冲破传统势力的阻挠，他委托一位著名的教法学者“阿利姆”（‘alim）著书，用传统观点来论证改革的正确性。[24]

他招募一些曾经在奥斯曼军队中服役的突尼斯人，组成一支按欧洲方式训练的部队，称为“阿斯卡里”（土著士兵），最初大约只有500人。他得到一些改信伊斯兰教的欧洲人的帮助（最有名的是法国人德索尔第，他的穆斯林名字为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在非斯建立了一所工程学校（madrasat al-Muhandsīn），培养检验员、地形测量员、制图员和炮手。为了办学，他委托一名马耳他籍学者翻译各种有关几何学的论文，并亲自监督这项工作。他 **487** 通过在直布罗陀的代表，要求埃及帕夏给他邮寄由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科学书籍。素丹阿卜杜勒-拉赫曼放手让他的儿子去实行改革，但并不承担责任，可惜他生前未能见到改革的直接效果。穆罕默德四世继位，他本来无疑会更热衷于改革，但是1859-1860年的战争使他陷入了复杂的财政困境。不过，他仍然决定派一支“布瓦克尔”（奴隶部队）去埃及接受炮兵训练。1870年之后还定期派员去直布罗陀接受两年期限的训练。哈桑一世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继续实行其父的政策。他建立起一套正规的征兵制度：国内每一城镇必须提供500名士兵，每个港口提供200名士兵，每个行政区提供2000名士兵，这样就组成一支有25,000名士兵的军队。1877年，他要求法国能派军官来指导他的炮兵部队。1880年，180名现役和预备役军官从海外回国，被编入英籍指挥官麦克莱恩少校所领导的“哈拉巴军团”（harraba）。后来，哈桑一世还向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派出军事代表团。依靠这支经过整编的部队，他又能维护对苏斯、塔菲拉勒特等边远地区的统治权，当时有几个欧洲强国正觊觎这些地区。[25]

1839-1886年任英国驻丹吉尔公使的C. 约翰·德拉蒙德·海，曾热心维护素丹的统治权和领土，同时也强烈要求摩洛哥对世界敞开贸易大门。[26]他因与素丹阿卜杜勒·拉赫曼交往而享有很高的威信，终于说服素丹在1856年12月9日签署了《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这项条约奠定了下述原则：贸易自由，消除一切官方或私人的垄断势力，保证财产和人身安全，在摩洛哥全境设立领事馆，对外国商人及其摩洛哥伙伴免去一切捐税（只保留关税、停泊费和领航费）。[27]

摩洛哥对欧洲开放贸易，引起了一些不良后果，首先是严重的货币危机。18世纪时，金币第纳尔已完全消失，以后摩洛哥的货币制度变成了以银和铜为基础的复本位制。合法银币是西班牙的比塞塔、杜罗和法国的法郎、埃居；杜罗和埃居也称做里亚尔。摩洛哥铸造的铜币分为乌基亚（ukia，盎司）和穆祖纳（mūzūna）。计算单位为“米特卡尔”（mithkāl）：一米特卡尔值十盎司，一盎司值四穆祖纳。随着与欧洲贸易关系的发展，银币越来越少，通用铜币又在贬值。19世纪中叶，铜币降到原价值的四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 **489** 飞涨、民众贫困化、政府财政拮据，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马赫增政府试图采取对策，在1852、1862、1869、1877年都曾采取强制性措施，每次都希望将已经偏离的价值调整到对

---

[24] M. 卡尔杜迪（al Khardudi），无出版日期。

[25] J.L. 梅奇，1961-1963年，第1卷，第208页。特别参见M. 曼努尼（al-Mannūnī），1973年，第55页。

[26] J.D. 海（Hay），1986年。

[27] 参见P.L. 里维耶尔（Rivière），1924-1925年，第1卷，第36-42页。



图片18-2 素丹哈桑一世（1873-1894年）

等价值水平上来。素丹只有要求外商支付银币，他自己则随意用里亚尔或盎司来偿还债务，才能从调整价值的措施中获益。然而，外商是用贬值的盎司支付关税，致使摩洛哥的关税收入减少，而素丹则不得不用高价买得西班牙的皮阿斯特和法国的埃居偿还外债。因此，这种复本位货币措施的最后结果是国库困难重重。到这一时代之末，哈桑一世决定铸造一种新银币（哈桑里亚尔，值五法郎），但未撤回铜币；当时铜币继续贬值（1881年一里亚尔值14

"米特卡尔"，而过去是十"米特卡尔"），还带动新铸硬币一起贬值。[28]

马赫增政府的开支不断增加，因为它要实行改革，同时还须向欧洲各国和商人支付债务和赔款。财政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在与乌里玛商量之前，素丹并不能自由行事，这也是习惯法规定的。早些时候，乌里玛集团已几次宣布商业营业税（通称"穆库"，mukūs，单数为，maks）违法，除非有特殊用项而临时征收这种税；他们也不同意征收任何土地税，因为摩洛哥人对他们的土地都是独立的全权所有者。[29] 1860 年 7 月，穆罕默德四世要乌里玛告诉他怎样支付战争赔款来收复已被西班牙人占去的德土安，并防止其它城镇落入西班牙之手。乌里玛集团仍坚持正统立场，认为只有一种直接向所有居民平均直接征收（即不得让第三者承包）的临时特别税才是合法的，其实，素丹早就细心向他们解释过情况不允许他使这种正统措施生效。[30] 在驳回乌里玛的反对意见后，素丹征收了间接税，这引起了城市民众的愤怒和顽强反抗。当他的继承人于 1873 年即位时，手工业者要求废除这类"穆库"（营业税），宣称这是他们签订"贝耶"的条件，哈桑一世不得不用武力压服暴动的市民。后来，他凭经验征收一种固定税率的土地税"特尔蒂布"（tertib），由关税督察"乌马纳"中的专职人员负责收税。哈桑一世分明知道乌里玛对此持反对态度，并未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开始在国内管理最好的豪兹地区征税。可是他很快又取消这种土地税，虽说原因不明，却无疑与公众舆论和某些军队将领的反对有关。既然财源短缺，政府只得收缩原来颇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将正规开支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1856 年以后，在摩洛哥安置下来的欧洲商人日渐增多。为了平息他们的抱怨情绪，政府开始实行一项行政改革计划。1861 年组建了一个关税督察团（乌马纳），其成员是从商人、政府官员和公证人中招募来的，薪金相对优厚，分驻于八个对外开放的港口；与他们共事的还有西班牙籍督察员，后者负责检查关税收据，因为 60%的关税收入要用来抵偿战争赔款。这些"乌马纳"中，有人已在国外（直布罗陀、马赛、曼彻斯特、热那亚等城市）发迹，他们有助于摩洛哥官僚机构改革的合理化，在穆罕默德四世和哈桑一世统治时颇有势力。另一个社会集团——高级学者"图尔巴"（tulba）的声望也在提高，他们被送到欧洲培训，学习外国语言。1874-1888 年间，先后有八个代表团共 350 名学者，前往欧洲主要国家。这些青年回国后，有的分配在非斯著名的制造局"马基纳"（makina）—1886 年由原来意大利人创办的一家兵工厂改建而成的铸币局下属的税务部门工作，有的分配到外交事务部（wizīrat al-bar）。[31]

但是，欧洲商业家真正的企图还在于限制执法官"卡迪"的权力。[32] 他们宁愿由总督（卡伊德或艾米尔）审理案件，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一个实施西方司法程序的混合法庭里进行

---

[28] J.L. 梅奇(Miège)，1961-1963 年，第 2 卷，第 388-389 页；第 3 卷，第 97-107、434-437 页。另见 G. 阿亚切(Ayache)，1958 年，第 271-310 页。19 世纪初，10 盎司值 5 比塞塔；1845 年，值 3.25 比塞塔；1874 年，仅值 1 比塞塔。统计数字见纳西里，1954-1956 年，第 9 卷，第 208 页。

[29] 马赫迪·瓦扎尼，1900 年，第 3 卷，第 92 页。

[30] M. 达乌德(Dāwud)，1956-1970 年，第 5 卷，第 99-100 页。

[31] J.L. 梅奇，1961-1963 年，第 4 卷，第 397-408 页。

[32] "要和平地渗入摩洛哥，首先需要使它非穆斯林化。"见 G. 毛拉(Maura)，1911 年，第 197 页。



图片 18.3 1881 年在巴黎为哈桑一世铸造的银币里亚尔

申诉。法国借口它在 1860 年曾经给西班牙施加适度的影响，竟诱使穆罕默德四世接受 1863 年 8 月 19 日的协定，这项协定给予外国商人和他们的摩洛哥贸易伙伴司法特权。此后，他们的案件不再由执法官审理，而是由欧洲有关国家的领事陪同摩洛哥地方总督来判决。尽管这种情况令素丹不快，但因享有上述特权的摩洛哥商人并不算多（1870 年前后每个卡比拉约 200 人），所以还是可忍受的。不过，后来外国领事对所有想要逃避卡迪管辖的人给予"萨姆塞尔"（samsār，中间商）的身分，不管他们是犹太人还是穆斯林，只要能花钱买这个名分就行。[29] 鉴于这种非法的保护权有损于政府权力，这是对 1863 年的协定带有倾向性的解释，马赫增政府不断提出抗议，最后赢得英国的支持。1880 年 7 月，有 12 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在马德里召开，制止继续实行上述做法。受保护者的人数受到严格控制：一个外国商人只能有两名"萨姆塞尔"；只有他们本人及其住在一处的家庭成员才能寻求外国的保

[29] J.D. 海，1896 年，第 321-323 页。

护。与此交换的条件是摩洛哥政府承认欧洲人在定居港口享有财产权，虽然这在素丹看来是不利的。

总之，欧洲施加压力的后果是摩洛哥对军队、政府机构、货币和税收制度实行了一场改革。可是，外国的阻挠和国内矛盾使这次改革的范围受到限制。欧洲人当然为获得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和经营有利的措施高兴，但是他们，尤其是法国和西班牙并不愿看到摩洛哥政府变得强大而能够与他们的目标相对抗。[34] 此外，只要乌里玛不予妥协，素丹就无法触动 **492** 教育、司法或宗教体制。在因财源短缺而受到更多限制的改革领域，出现了预料不到的结果：素丹不但没有变得强大和独立，相反，他随着国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而更加靠拢欧洲。这是因为对外关系日益扩大，外商人数增多，他们要求重大赔偿或租让土地甚而有损于摩洛哥国家声誉的事件层出不穷。[35]

摩洛哥人民感觉到外国人不断渗入和政府实行改革与他们的贫困化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出于经济的、心理的和宗教的原因，社会舆论越来越迁怒于外国人。

民众的反应

摩洛哥农业生产过去一直依赖(现在依然如此)难以预测的天气变化，当时却必须适应欧洲出口商人日益增长的需求。结果灾荒不断，给城市和乡村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害。1850、1857、1867 年均发生饥荒，1878 年和 1881 年饥荒特别严重，估计约 12-15%的城镇居民靠社会救济生活，6.4 万人背井离乡。[36]在城镇护墙之外已经出现类似 20 世纪贫民窟和棚户区的灾民区“努阿拉”(nualas)。许多务农和养牲畜的农民，因无力纳税或给欧洲商人还债，只得离开自己的土地；这种向城镇迁移的趋势，影响到南方和沿海城镇周围约三分之一的农耕地区。上述局势给马赫增政府造成双重困难：首先，扎卡特(商业和农产品税)的收入减少了；其次，欧洲人要求它替私人还债，特别是地方总督“卡伊德”拖欠的债务。更有甚者，在摩洛哥掮客的撮合下，外国人中间以低价进行非法的财产转让交易，各地方无耻的执法官竟然默许，这使马赫增政府丧失了原应征收的财产税。素丹曾试图扭转这种灾难性趋势，1873-1883 年采取一系列措施，禁止欧洲人参加乡村集市“苏克”，要求卡伊德把自己的财产和所管辖的民间财产划分开来，并限定有权使涉及贸易的期票生效的执法官和公证人的名额。[37] 如果说 **493** 农村居民正陷入贫困化过程，城市民众的处境也不见得好。谷物、羊毛、皮革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涨价，人人受到影响。进口商品(布匹、蜡烛、火柴、食糖)倒便宜，但作为城市经济支柱的手工业受到严重的竞争。政府雇员，无论是领薪俸的还是由宗教组织或民众团体支付工资的，都吃了货币贬值的苦头：1845-1874 年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到原有货币价值的十分之一。[38] 唯有商人和欧洲商人的合伙人避开了这场普遍的贫困化灾难，因为他们能获得银币。

---

[34] J. 卡耶(Caille)，1951 年，第 121 页。

[35] 素丹穆罕默德四世曾对法国大臣蒂索特说：“土耳其和埃及经过改革之后变得富有了，然而独立性也更加少了。”见 J.D. 海，1896 年，第 288-289 页。

[36] J.L. 梅奇，1961-1963 年，第 3 卷，第 367、444 页。

[37] A. 伊本，宰丹，1961-1962 年，第 1 卷，第 364-366 页；第 2 卷，第 48-51、129-131 页。

[38] 见前注[29]。

他们的资本自行增值，他们购置房屋和产业的价钱低得荒谬，可他们还向农村居民，甚至向马赫增集团成员放高利贷。与广大民众的贫困状况相对照，他们这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显得非常卑劣，因而被认为是国家对外商开放门户的又一恶果。

这些只不过是经济方面的恶果，还有让摩洛哥人民敏感的情况：卡迪、素丹，以至于伊斯兰教本身的权威都在衰落，这或许更使民众感到愤怒。殖民主义各国都强调它们的国旗要受到尊重。如果某一国侨民遭到杀害，该国领事并不关心起因，也不问是否故意杀害，他只要求将犯人处以死刑(是否处死所有在事故现场的人，这并不明确)，给受害者家属经济赔偿，将他认为办案不力的官员撤职，同时还要求摩洛哥政府就此事道歉，并保护该国旗帜。[39]

诸如此类的事件一旦发生，摩洛哥官员都不知所措。如果他们拒绝外国领事的申诉，而事情变得不利于素丹，他们要对其后果负责；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容许违背地方习俗，不尽力去追究案情而让中央政府掌握判决权，那就会引起民众暴动，其后果也由他们负责。地方官员的威信经常受到损害，这又不利于维持欧洲人所要求的公共秩序。[40]

在上述违背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的局面下，执法官"卡迪"和检查官"穆哈台斯布"成了最大的牺牲者。因此他们强烈反对所谓治外法权。英籍犹太慈善家摩西·蒙特斐奥雷爵士在英国官方的积极支持下，访问了摩洛哥，事后素丹穆罕默德四世签署了1864年2月5日的达希尔(dahir，法令)。这项法令规定摩洛哥官员必须迅速而公正地处理犹太人事务，否则他们将受到严厉制裁。历史学家纳西里介绍说："犹太人当时一拿到这项法令，便复制在各城镇散发；他们一致行动，向地方当局特别是港口当局显示他们的独立地位。"[41]在乌里玛集团看来，这项法令给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沉重的打击；民众的反响如此强烈，以至穆罕默德四世不得不收回成命。然而"受欧洲人保护"的穆斯林引起的民愤更大。在星期五的清真寺祈祷式上，乌里玛曾发布许多宣传手册，敦促素丹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有一位乌里玛说："如果您不这样做，不知内情的人就会萌发疑问，以为伊斯兰教有弊端，开始相信异教徒的宗教比伊斯兰教还高尚。"[42]

494

素丹当时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因为他不愿给欧洲列强引起麻烦，于是乌里玛就转向人民寻求支持。关于这一点，上面刚引述过他的言论的那位宗教学者认为："每一个忠诚的信徒应尽的义务是避免与'受欧洲人保护的'穆斯林交往，不邀请他们，不同他们分享食物，不和他们建立友谊或婚姻关系。"[43] 鉴于这些"受欧洲人保护"的穆斯林大都是富裕商人，所以宗教学者们发动的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宗教界贵族反对新兴精英集团的斗争，前者得到城市劳动阶级的支持，而后者则因国家对外开放造成前所未有的环境而得以发展。

如果说改革是外来压力促成的结果，那么，它也是产生强烈的仇外情绪的根源。由于改革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主要是不良影响，摩洛哥人自然把这些改革同欧洲人日益广泛

[39] G. 阿亚切，1965年，第159-204页。
[40] A. 伊本·宰丹，1929-1933年，第2卷，第374页。
[41] A. 纳西里，1954-1956年，第9卷，第114页。
[42] M. 曼努尼(al-Mannunī)，1973年，第256页。
[43] 同上。

的渗入联系起来。纳西里指出："物价飞涨和饥馑的原因，就在于欧洲人的到来。"[44] 摩洛哥人都希望尽可能少与外国人接触，而且想要返回旧日生活。社会各阶级都转而追求一种浪漫的思想意识——美化过去和复兴传统(ihyā' al-sunna，圣训复生)。为了限制欧洲人的活动范围，素丹拖延各项谈判，这激怒了外国领事，抱怨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哈桑一世曾经指示他在丹吉尔的一名代表，说："我们必须讨论再讨论，反复讨论才是有益的。"[45] 宗教团体要求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他们赋予改革一词特殊的含义。在乌里玛看来，改革并非指改变制度——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办到——而是要振兴长老们(salaf)制定的法典，他们给穆斯林树立了伟大和公正的榜样。为了反对改造其军队、官僚机构和生活方式的"尼达姆"(nidham)概念，他们提出个人道德和宗教自新(iṣlaḥ)的 495 观念。这就是所谓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salafism)运动。[46] 城市平民抱着怀旧心情，追忆过去食品和用品都很便宜的美好时光，那时个人的需求和马赫增政府的需要同样有限。普通人似乎认为，需求增长显然是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所以他们总抱有一种恐惧、羡慕、蔑视与憎恨相交织的复杂感情。人民的仇外心态、乌里玛的原教旨主义、马赫增政府的保守主义，都反映出他们的经验：原来的社会一旦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相遇就发生衰退。当时摩洛哥政界和宗教界的精英阶层是强烈反对自由化的。"无论欧洲人如何理解自由一词，毫无疑问，它是我行我素的无神论者的创新，因为自由就是否定神权、家长权威，甚至否定人类天性。"[47] 摩洛哥社会正是本着辩证法的这种积极意义走向现代化的，它屈从于欧洲势力的同时也反抗欧洲的影响，但卷入这一现代化历程的人们并未认识到。他们没有从中看到未来完全不同的前途；他们只感觉到一个金光灿烂的时代——人民富足、乌里玛受重视、马赫增政府有权威和素丹保持独立的时代正在消逝。

结束语

1880年，延续五年之久的严重农业灾害结束了。马赫增政府正向西班牙支付最后一笔分期偿还的战争赔款，同时向英国银行偿还公债。摩洛哥的西班牙籍关税督察员很快就要离开各港口，他们的存在一直是两国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总让摩洛哥人沉痛地想起1860年的惨败，政府也即将取消对商人征收的营业税"穆库"。[48] 1880年7月3日，第一届马德里会议结束，签署了对摩洛哥实行保护的国际协定；这次会议对英国和摩洛哥相对而言似乎是一次胜利。法国还没有从1870年的惨败中完全恢复，尽管它得到德国的策略性的支持，却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国际会议。[49] 此后不久，德国凭武力加入在摩洛哥展开的角逐，它反对英国攫取商业利益，同时阻挠法国的政治图谋。摩洛哥领土得到保护，法国人对图

㊹ A. 纳西里，1954-1956年，第9卷，第208页。
㊺ A. 伊本·宰丹，1929-1933年，第2卷，第376页。
㊻ 参见A. 梅拉德(Merad)，1965年。
㊼ A. 纳西里，1954-1956年，第9卷。
㊽ 同上，第147页。1885年12月取消了市镇税。民众焦急等待着取消其它捐税。
㊾ J.L. 梅奇，1961-1963年，第3卷，第263-292页。

瓦特、英国人对塔尔法亚、西班牙人对萨基耶特哈姆拉的阴谋都未能得。[50] 总之，摩洛哥这个有时被称为西方哈里发的国家在哈桑一世的统治下，有别于奥斯曼帝国，哈桑一世在国内以及海外都堪称一位伟大的素丹。

由于与欧洲频繁接触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始终存在，不过当时似乎还能控制。摩洛哥得 **496** 到像英国那样的国家庇护，或者说失去德国那样的国家保护，它似乎开始走向新生。无论如何，这是摩洛哥人对20世纪的信念。哈桑一世统治时期，摩洛哥不依赖于现实成就，成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如果没有法国和西班牙的操纵，摩洛哥肯定会通过改革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独立国家。马赫增政府的改良主义、乌里玛的原教旨主义与农村民众的反欧洲思想融合在一起，形成了20世纪活跃的民族主义思想。

诚然，如何客观地评价摩洛哥改革政策的结果，这个问题仍需继续讨论。但是，必须着重指出，这场改革完全是在穆罕默德三世传下来的基本结构范围内进行的，当时他本人不得不应付摩洛哥与欧洲之间实力对比关系的急剧变化。事实上，只有对决定穆罕默德三世选择改革之路的历史背景有充分的理解，才能对19世纪摩洛哥社会的演变过程作出合理的评价。

（沈浦娜译）

---

[50] 同上，第357页。另见A. 伊本·宰丹，1929-1933年，第2卷，第333-335页。

19 欧洲干涉马格里布的新格局

N. 伊凡诺夫

497 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欧洲殖民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行商业扩张，同时争夺世界贸易通道。长期以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摩洛哥进行的海上"圣战"，一直是引起欧洲商人和船主们极大担忧的根源。19世纪初，欧洲仍然惧怕马格里布的海盗船。假如那不勒斯的船只要靠岸航行时发现突尼斯或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旗帜，它们的水手就会立即转舵逃走。马赛、来亨和欧洲其它大商港的商人总是利用表现出的一片恐慌战胜他们的竞争对手，尤其是"狡猾的突尼斯"，他们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进入了地中海的广大水域。突尼斯船只在1800年抵达马耳他，1809年到达来亨。阿尔及利亚的德伊政府抛售大麦，获得厚利。马格里布国家所奠定的贸易和航运环境，使欧洲感到很大烦恼。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都征收贡物，并要友好国家按照和平条约或航海条约为它们的船只支付自由通航的费用。由于商人拖欠应付款项和发生一些破坏条约的事件，冲突增多，使马格里布与欧洲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1]

欧洲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资产阶级支持马耳他和那不勒斯的海盗，对穆斯林的商船进行残暴的劫掠。拿破仑战争一结束，欧洲资产阶级就着手组织对马格里布的大规模海上远征。英、法、荷兰、奥地利和美国都利用打击海盗活动的幌子，派其舰队驶向北非海岸。1815年，美国舰只首先抵达阿尔及尔海域。1816年初，由埃克斯茅斯勋爵和范卡佩伦指挥的英-荷联合舰队也随之到达。这支舰队在"制裁"的黎波里和突尼斯之后，又猛烈轰炸阿尔及

498 尔(1816年8月27日)，向该城发射了34,000枚炮弹。1819年，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再次出现在北非沿岸，逼迫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摄政者宣布禁止海盗活动。1825年，英国海军又一次炮轰阿尔及尔。1827年10月20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残余舰只与埃及和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中，被英-法-俄联合舰队所摧毁。1829年，奥地利向摩洛哥船只开火，当时按照毛拉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命令，摩洛哥人企图恢复"圣战"。马格里布国家在海上战败了，因而门户大开，欧洲国家加紧进行贸易扩张。在马格里布各国舰队覆灭之后，欧洲国家得以垄断海权，实际上控制了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与欧洲之间的贸易。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试图保住各自的地位，因而它们与海上列强的关系随即恶化。阿尔及利亚德伊政府拒绝给予法国商人特殊权利和优惠条件——他们竟然要求在阿尔及利亚

---

① 详情见N. A. 伊凡诺夫(Ivanov)，1976年，第3、4章。

享有“治外法权”，特别是德伊政府拒绝承认法国单独有权解决两国间财政纠纷，结果导致法国于1827年宣布对阿尔及利亚实行海上封锁。至于摩洛哥，该国政府决定不与外部世界交往，对外国人闭关锁国。1822年，只有五个摩洛哥港口对欧洲人开放，各港口贸易均受到严格监督。

欧洲对马格里布传统社会施加压力

欧洲人在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发展贸易，其重利盘剥和两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过程是它们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2] 1824年，突尼斯摄政当局签署了首批借债票据，接着，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卡拉曼利王朝政府也学了这种做法。这两国的几位大臣从此债务缠身。所以到20年代末，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开始放弃一切对欧洲的政治抵抗，就不足为奇了。到1827年，它们已不再拒绝外国领事的任何要求，而且逐步与他们的政策协调一致。强加给这两国的第一个单方面条约，反映出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与欧洲列强间关系的特殊性质。在1830年8月8日的法国-突尼斯条约中，突尼斯确认了先前所有的和平、贸易及航海协定，宣布法国为最惠国，预先放弃应向欧洲各国征收的费用和贡物，接受自由贸易原则，扩大给与外国人的外侨权利。1830年8月11日，法国与的黎波里塔尼亚之间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些条约大大加强了法国在北非的地位。突尼斯很快沦为法国的半附庸国，法国的主 **499** 要对手英国为此十分忧虑，所以在1835年竭力支持土耳其完成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远征。同年5月，土耳其人侵入的黎波里，废黜卡拉曼利王朝，1835年6月1日宣布重建奥斯曼政权。1835-1836年，土耳其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沿海一些城镇布置了驻防军。然而在征服内陆地区时，土耳其人碰到很大的困难。1835-1858年间，土耳其人不得不拼命镇压土著居民的反抗斗争；一些卓越的领袖人物在起义中产生，其中就有古马·马哈茂迪，他对土耳其人从不妥协，因而声誉卓著，1858年3月战死时他手里仍握着宝剑。

和平局势恢复后，土耳其人就在的黎波里实行改革，试图按照欧洲模式建立行政和司法机构。根据奥斯曼帝国“坦志麦特”(Tanzimât，即改革)的原则，总督乌斯曼·阿明帕夏(1842-1847年)改组了行政机关、司法制度、征税法等。1851年，在的黎波里建立了一个混合法庭，这一措施随即加强了外国人的地位。所有这些，加之改革措施对传统社会的基础起了破坏作用，在土著居民特别是游牧部落和农民中间引起普遍的惊恐和抗议。赛努西教团创始人之子西迪·穆罕默德·马赫迪常说：“土耳其人和欧洲人是一丘之貉。”[3]

突尼斯从1830年开始实行改革，继续推行改革的艾哈迈德贝伊(1837-1855年)是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狂热崇拜者。突尼斯历代的摄政者力求改变军事和技术的落后状态，因而解散了由土耳其士兵组成的军队，同时从欧洲引进机器和装备，为建立一支正规军和改进兵器工业奠定了基础。

以埃及为榜样，突尼斯建立了国家垄断制，由政府实行经济的民族化政策。设立了国

---

② M. H. 切里弗(Chérif)，1970年，E. 罗西(Rossi)，1968年，第282页。

③ E. 罗西，1968年，第327页。

家银行(1847年)，信用货币投入流通。1841年，艾哈迈德贝伊禁止贩奴活动，在突尼斯国内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1838年，创立了一所军事学院和一所综合技术学校；突尼斯人开始学习外语，赴海外学习，并翻译欧洲作家的书籍。

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政府当局希望讨好外国领事，便赞助基督教传道会的活动。1816年，方济各会在的黎波里开办了第一所男童小学，1846年又办起一所女童学校。1845年，布尔加德神父在突尼斯创办了圣路易学院和几所小学，他还在突尼斯城办起一家阿拉伯文印刷 500 所。1826年，来亨的戏剧首次上演。[4] 1838年，第一份意大利文版的突尼斯报纸问世；一批意大利移民在突尼斯定居，其中有一些寻求政治避难者，例如加里波第(他在1835年和1849年来到突尼斯)。

与欧洲人频繁接触，使突尼斯知识界逐渐觉醒，在统治阶层的精英中也就有了西方化的基础。军人穿制服，影响到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政府官员也穿欧式服装，采取欧化举止和生活方式。旧时对欧洲人的反感已渐消失。1845-1846年，突尼斯政府当局为接待法王路易-菲利普之子——蒙庞西耶公爵和儒安维尔亲王来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1846年11月，艾哈迈德贝伊出访法国，从此双方消除了旧日的一切偏见。

与统治阶层相比照，人民群众承受着沉重的劳役——修建宫殿、工厂和兵营等，他们对西方化和外来势力的增长感到不满。他们认为统治者已经变节，自己仍遵守传统生活方式。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统治者依然抱守旧态度，这两个国家还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虽然当时西方势力正迅速渗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

阿尔及利亚被征服

阿尔及利亚因为政府的迟钝而付出了重大代价。侯赛因德伊做了许多使他与法国关系恶化的事，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国防力量。在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看来，这简直是卖国，同时暴露了统治当局的腐败。[5]

阿尔及利亚毫无备战考虑。明知敌人要入侵已经三年，可是当1830年6月14日法国军舰在西迪-法鲁吉(法国人称Sidi-Ferruch)湾出现时，仍然惊诧不已。强行登陆的法国远征军由布尔蒙将军指挥，共37,500人。直到1830年6月19日，侯赛因德伊的大批人马(包括土耳其近卫军和马赫增部队)才在易卜拉欣·阿加率领下，开到斯塔乌埃利迎战法军，加上卡比利亚的援军，共计4万人。这次战役以易卜拉欣·阿加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侯赛因德伊军队在军事组织和技术装备上的缺陷暴露无遗，除了士兵的英勇精神，这支军队并无实力抵抗法国人。在力图阻止法军前进的第二次战役(6月24日的西迪-卡列弗战役)中，易卜拉欣·阿加又遭到失败。6月29日，法军在占领布扎雷亚沿岸地区之后，开始围攻有名 501 的素丹卡拉西(皇家城堡)，它扼守着通往阿尔及尔的陆路。7月4日法军发起总攻。据波格

④ S. 潘图塞克(Pantucek)，1969年，第47页；T. A. 庞廷泽瓦(Pontintseva)，1977年；J. M. 兰道(Landau)，1958年。

⑤ 这类观点主要见M. 卡迪尔(al-Kadir)的著作，1903年；最具特点的引文见A. 贝纳琴布尔(Benachenbour)，1966年。

达诺维奇上校记载,"这是一场军事技巧与拼命抵抗的残酷战斗,占上风的最终是军事技术:城堡的厚墙打坍了,守城大炮失去作用,很多勇敢的土耳其士兵在枪林弹雨中丧命,驻军残部逃往市区。他们在城市里也没有找到预想的安全,因为德伊下令从卡斯巴赫开炮,士兵们在炮火中纷纷倒下。"[6]

1830 年 7 月 5 日,侯赛因德伊签署投降书,交出阿尔及尔城。他被允许——连同迪万(Diwan,即王族)成员和土耳其近卫军——带着他们的家属和财物离开阿尔及利亚。最高统治权交由法军执掌。可是,法军司令根本缺乏行政组织能力,必须做的事都不清楚。比如孔德·布尔蒙就很荒唐,他在打败德伊的军队之后晋升为陆军元帅,曾命令他的工程师们同时筹备两项工程:一项要把阿尔及尔港拓宽挖深,另一项却要把港口填平。法国波利尼亚克政府曾打算通过谈判,将阿尔及尔置于土耳其帝国直接统治下。[7] 可是 1830 年"七月革命"后,制定了分而治之的计划:阿尔及尔和沿海一些城镇由法国占领,奥兰和君士坦丁两省由突尼斯贝伊代管。占领军总人数缩减到 9300 人。然而,1830 年 12 月 18 日由克洛泽尔将军与突尼斯签署的条约未经法国政府批准,法国将军们仍恣意妄为。他们设法给军队补充了一些兵源,随即侵占奥兰(1831 年)、博内(1832 年)和布日伊(1834 年)。

法国政府终于克服摇摆不定的立场,作出有利于马赛资产阶级和占领军的决定,占领军陶醉于轻易获得的胜利,无耻地掠夺阿尔及利亚的财富,而且拒绝交还"战利品"。1834 年 7 月 22 日,法国颁布在北非建立法属领地总督制的法令,这表明它绝不撤出阿尔及尔,采取了所谓"有限占领"的政策(直到 1840 年)。实际上,这一政策如何解释,完全随 1830-1841 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许多法军将领的意愿和个人爱好而定。他们大都赞成"间接统治"制度,即根据与土著部落酋长签订的条约(关于和平、承认附庸地位、自由贸易以及缴纳贡赋)来建立殖民统治。为便于法军将领的联络,设立了"阿拉伯局",它逐步形成为间接统治的主要纽带。法军继续在沿海城镇驻防,只有这些城镇才开始设立文官行政制度,而这种行政制度自然是宗主国法国公共管理的原则和标准的翻版。它慢慢地取得了合法地位。1845 年,阿尔及利亚全境划分为"阿拉伯区"和"公民区",前者保留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和实行间接统治,后者则正式建立起法国的司法和行政制度。1847 年 9 月 28 日的法令特别规定公民区须遵守法国 1837 年的公社自治法。

502

阿尔及利亚的抵抗运动

法国虽然占领沿海地区,但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变化。传统社会的部落酋长大都是旧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现在依然如故,掌握着地方统治权。侯赛因德伊的投降和旧行政制度的崩溃,造成了一时的政治空白。在"无政府时代"(1830-1834 年),很

---

⑥ M. N. 波格达诺维奇(Bogdanovitch),1849 年,第 54 页。

⑦ 1830 年,在德伊军队溃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坚持要在素丹统治下维护阿尔及利亚的领土完整,拒绝承认法军的征服。但是,自 1828-1829 年对俄国作战以来,土耳其军力大减,又发生财政危机,因而除抗议外,无力采取任何行动。应当指出,法国在试图就阿尔及利亚问题与土耳其政府接触时,首先希望得到俄国的同意。法国外交档案中的资料,见 C. R. 阿格隆(Ageron),1964 年,第 9 页。

多地方城镇和村社不再承认任何权威。在阿尔及利亚，除某些城市富有阶层和少数有政治头脑的酋长外，绝大多数人民对法国的占领都很仇恨。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和游牧民决心捍卫自身的安全和独立。然而，既没有中央权威也没有共同的中心，反抗斗争只能保持在地区水平上，由于配合不当，经常是被动抵抗。抵抗运动一开始，采取拒不承认法军占领的形式，效忠于伊斯兰教，封锁被占领的城镇和地区，袭击法军支队和驻防哨所，刺杀某些欧洲人，对叛国叛教者实行即决裁判，这往往变成大屠杀。

随着抗法斗争的发展，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抵抗中心，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在东部，君士坦丁省的前总督艾哈迈德掌握了领导权。他所依靠的是剩存的土耳其近卫军和阿尔及利亚东部马赫增集团的村社力量；政治上仍效法土耳其帝国的政策，力图恢复德伊的统治制度。他自称是侯赛因德伊的继承人，制止了行政机关的衰退，加强了国家机器和军队实力。初期，他对法国造成了主要威胁。

503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阿卜杜勒·卡迪尔(谢里夫后裔一位马拉布特，即伊斯兰教派首领之子)领导了起义，政治上得到摩洛哥的支持。他在起义宣言中表明要制止无政府状态，坚持“沙里亚”，领导起抗击法国人的圣战。1831 年 10 月，他被拥立为埃米尔(amir，元首)，在马斯卡腊的贝伊府邸就职。1832 年 11 月 27 日，阿尔及利亚西部乌里玛和贝都因部落代表的会议承认他为总督。他依仗自己的才能、决心和勇气，在抗法武装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 1835 年 6 月 26 日马克塔战役的胜利，巩固了他的权威。法国曾经两次承认他是阿尔及利亚整个中部和西部地区唯一的统治者(沿海飞地除外)：一次是签订《德米歇尔条约》(1834 年 2 月 27 日)，另一次是《塔夫那条约》(1837 年 5 月 30 日)。作为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的热情崇拜者、思想家兼诗人，阿卜杜勒·卡迪尔不仅希望阿尔及利亚光复，而且想要实行改革。他一方面要对付奥兰和蒂特里的贝伊(原有的土耳其军人)、阿拉伯-土耳其混血种人(kologlus)及为他们效力的马赫增村社，另一方面还得对付艾哈迈德贝伊的游击队和据守在艾因-马赫迪堡(1838 年沦陷)的提加尼教团兄弟会。在残酷斗争中，阿卜杜勒·卡迪尔创建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阿拉伯谢里夫后裔领导的国家，拥有现今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的领土。他结束了这片国土上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以哈里发、阿加和卡伊德的地方统治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协调有效的司法和行政制度，保证实施严格的纪律。1838 年，他着手组织一支正规军，两年后征得一万人。以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为榜样，他依靠政府管理经济，建立国家垄断制，创建兵工厂，修筑碉堡，加强国防以抵制颠覆分子和外来之敌。[8]

起初，由于巴黎的政策摇摆不定，法军将领又不能有效地对付游击战术，所以阿尔及利亚人巧妙地利用时机取得了胜利。直到 1837 年，他们还能够挫败法军进攻被围城镇的一切企图。西部受到一些挫折(马斯卡腊失守、特莱姆森沦陷，1836 年 7 月败于西卡克河岸)，但在 1836 年 11 月 23-24 日，君士坦丁战役大获全胜，艾哈迈德贝伊的部队和本·艾萨领导的守城部队打败了克洛泽尔元帅指挥的法军 7400 人。然而由于抵抗运动的分散性，使这次胜利几乎变得无足轻重。《塔夫那条约》缔结后，法国从西部地区腾出手来，经过周密准备，

⑧ 见 A. 贝纳琴布尔，1966 年，第 69 页；此书对阿卜杜勒·卡迪尔缔造的国家政治及军事结构作了详细的分析。



图片 19.1 阿卜杜勒·卡迪尔

在 1831 年对艾哈迈德贝伊发动了决定性的攻势。1837 年 10 月 13 日，法军攻下君士坦丁，这表明东部抵抗运动有组织的堡垒战术失败了。艾哈迈德贝伊逃往山区，从此转入对法军 **504** 及其在东部设置的傀儡政府进行骚扰性的袭击，直到 1843 年。

君士坦丁沦陷后，抗法斗争就主要集中于西部。为了反击法军强行通过"铁门"(Bibāns)的挑衅行为，阿卜杜勒·卡迪尔宣布进行圣战，进攻到阿尔及尔近郊。但是，1839 年 12 月 31 日，他在瓦迪-阿勒乌格遭到失败，以后被迫转入防御状态。1840-1841 年，他 **505** 让出了马斯卡腊、赛义达、梅德亚、塔扎、博加尔、布-萨阿达，最后又放弃塔克登普特，于 1842 年建立了一个称做斯马拉(smala)的流动总部。1843 年 5 月 15 日，他被奥马尔公爵的部队打败，他所创设的全部行政和军事结构随之崩溃。他带着一群随从者撤往摩洛哥。造

成阿卜杜勒·卡迪尔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奉承许诺，法国代理人的黄金贿赂，某些宗教领袖散布凯鲁万和开罗的乌里玛的"判决"(fatwā 法特瓦)是指责"荒唐的反抗"，他身为埃米尔采取不必要的残暴手段，等等，然而最终使他失败的原因还在于比若元帅采用的"焦土战术"，比若下令烧毁农田、赶走牛羊、夺占粮仓和水源。



图片 19.2 阿卜杜勒·卡迪尔的步兵



图片 19.3 阿卜杜勒·卡迪尔的骑兵

阿卜杜勒·卡迪尔试图从他在摩洛哥的基地重新点燃抗法斗争的烈火，结果导致法国-摩洛哥战争。1844 年 8 月 14 日，摩洛哥军队在伊斯利战役中遭到惨败；法国军舰炮轰丹吉尔和莫加多尔，迫使摩洛哥的毛拉阿卜杜勒·拉赫曼放弃对阿卜杜勒·卡迪尔的支持，并与法国言和。摩洛哥素丹斥责"阿卜杜勒·卡迪尔是卡非尔('kāfir，异教人)，从此对他抱敌视态度。1845 年，泰比亚兄弟会传言"救世主"马赫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他以别名布·马扎，即牧羊人闻名)到来，并宣布圣战。起义风暴很快席卷了达赫拉、瓦尔塞尼，直到切利弗河谷。同时，阿卜杜勒·卡迪尔的流动分队出现于草原上，与他们从前的敌人——德尔加瓦的马拉布特(教派首领)的部队并肩抗击法军。在镇压这场组织松散、孤立无援的起义过程中，法国远征军暴露了极其凶残的面目。例如，佩利西耶上校就曾用烟熏死躲在山洞里的几百名阿尔及利亚人。1847 年，布·马扎和阿卜杜勒·卡迪尔先后放下武器向胜利者投降。

506

1848-1849 年，在先前艾哈迈德贝伊和"马拉布特"布·齐扬领导斗争的奥雷斯山区和姆扎布，抵抗运动的最后几个据点被摧毁了。1852 年，法军经过激战夺取了拉格瓦特，1854 年又占领了图古尔特。1856 年，撒哈拉的图阿雷格人派出一个代表团到阿尔及尔，宣布效忠法国，并表示远至南方廷布克图的图阿雷格人也都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北部，最后投降的是卡比利亚山民。1851 年以来，他们在布·巴格拉的领导下，曾经对妄图侵入大、小卡比利亚山的法国人进行过顽强的抵抗。直到 1857 年，在与朗东将军的部队激战一场之后，山民们才停止抵抗。至此，阿尔及利亚全境处于法国军事统治下，这个国家变成了"阿拉伯局"所保护的法国人自治城镇和法属领地的混合体。



图片 19.4 法国与摩洛哥之战：伊斯利战役，1844 年



图片 19.5 阿卜杜勒·卡迪尔降服

殖民地化和财政奴役

507 普遍起义的威胁，阻止了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内陆地区殖民计划的实行。比若的殖民试验，以及第二共和国(1848-1851 年)和巴黎的“阿尔及利亚部”(1858-1860 年)移民扩张的活动，都曾遇到军方毫不妥协的抵制，因为法军要对阿尔及利亚的局势负责。共和派主张实行同化政策，1848 年曾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阿尔及利亚的“公民区”划分为几个郡，下属县和自治村镇，派法国行政官治理；这项政策在第二帝国统治时期撤消了。1852 年，拿破仑三世还取消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选派代表参加法国议会的资格。1860 年，在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后，他指责同化政策不适当。当时，军官们的“浪漫”态度胜过殖民者的“重商”态度。拿破仑三世没有站在殖民者一边，他决定自己与阿尔及利亚传统的酋长(“封建主”)结盟，于是宣布阿尔及利亚将变成一个“阿拉伯王国”。先前设置的“公民区”受到严格限制(1866 年的面积为 10,160 平方公里，即等于阿尔及利亚北部地区总面积的 2.5%，拥有穆斯林人口的 8%)。除在占领面积和人口上加以限508 制外，所有权力仍由军队和传统的穆斯林行政当局掌握，他们的行为则受“阿拉伯局”监督。拿破仑三世认为欧洲移民只应住在城镇，从事商业和技术性职业。1863 年法国参议院的一项法令规定，阿尔及利亚土地仍留给村社，由村社按照传统原则支配。[9] 只有村社未占用的“剩余”土地才转归国家所有，才能分配给特许公司或个人。至于工业和商业方面，不受限制的私人企业占统治地位。从前德伊和阿卜杜勒·卡迪尔采取的垄断政策完全废除。为使阿卜杜勒·卡迪尔遗留下来的行政和司法机构现代化，殖民当局改组了穆斯林的司法制度(1854 年)。这次改革，基本上是建立法国人与穆斯林的混合法庭，同时设立穆斯林的高级司法委员会。“阿拉伯王国”的拥护者对穆斯林的教规很有兴趣，他们鼓励修建清真寺，支持穆斯林去麦加朝觐，等等。1865 年参议院的法令确认阿尔及利亚人有权加入法国军队和参与行政管理工作。最后于 1869 年，拟定了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草案，[10] 准备让阿尔及利亚自治，穆斯林在各级议会中享有代表资格。

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在 19 世纪中叶实行的行政、司法和经济改革，内容上大同小异。在突尼斯，赫雷丁帕夏(1826-1889 年)领导的自由派得到海外列强的支持，于 1857 年 9 月 9 日成功地颁布了“基本约法”(Ahd al-Amān)——一份重申土耳其“坦志麦特”原则的改革宣言。作为改革的结果，垄断制被废除，私有企业得到发展(1851 年 10 月)，成立了

---

⑨ 有关前资本主义时期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问题引起过激烈的争论。1962 年在巴黎，由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主办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会议，对苏联史学家关于亚、非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论点作了意外的深入研究。近来有关这次讨论的反响著作之一，见 A. 杰格洛尔(Djeghloul)的论文(1975、1976 年)。自 1973 年在基齐涅夫和 1974 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讨论会以来，我认为“东方封建主义”的概念更明确了。依据“社会多重结构论”，R.G. 兰达(Landa)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1976 年，第 49-55、109-120 页。F.B. 米勒(Miller)所编的 M.M. 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1879 年)，对卡比利亚村社的研究工作仍很重要。至于各种农耕方式的比较研究，可参见 L. 米利奥特(Milliot)，1911 年。依据法文资料对这一问题的有关著作给与评价的最新一部综合性参考书，见 J. 鲁埃迪(Ruedy)，1967 年。

⑩ 见 C.R. 阿格隆，1964 年，第 32-38 页；1972 年，第 60 页及以后诸页；作者对法国史学工作中某些陈旧的原则提出了批评。

市镇自治政府(1860 年)。1861 年 4 月 23 日，宪法颁布实行。这部宪法规定，政府大臣应对全国代议机关——最高委员会负责。在的黎波里塔尼亚，1865 年，即马哈茂德·奈迪姆帕夏统治时，实行了新的行政改革法，建立了商业、民事和刑事法庭。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改革，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发展私人企业的必 **509** 要条件已经具备，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关税壁垒的消除(1851 年)又为外国商货在这三个地区打开了市场。这种状况给大资本家、银行、特权公司和地产公司提供了扬帆起航的好时机。在阿尔及利亚，1851 年开办了阿尔及利亚银行，随后开办移民和农业信贷银行(1863 年)和其它几家银行。在突尼斯，英国最早企图建立突尼斯银行(1853 年)，可是受到法国的反对，直到 1873 年英国才成功地开办了突尼斯的伦敦银行。法国-突尼斯信贷银行是靠法国资本开办的(1879 年)。在的黎波里塔尼亚，1880 年出现了最早的几家银行；银行与特许权持有者和商业公司有着密切联系。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当局给外国公司和银行提供优惠条件，突出的例证有实力雄厚的日内瓦公司(1853 年，两万公顷)，阿尔及利亚总公司(1864 年，10 万公顷)等。在突尼斯，英国最先获得租让权(1856 年，在杰德伊达占地 7 千公顷)。随后，法国(西迪·塔贝特集团在 1886 年)和意大利(突尼斯商业和工农业银行在 1870 年)也获得了租让权。这些特权公司开始开采铅矿，经营造纸和细茎针茅出口业，并试验种植棉花、烟草和马铃薯等农作物。阿尔及利亚在 1857 年、突尼斯在 1859 年，先后开创铁路。外国公司使海港建设现代化，架设电报线，修筑道路和防波堤；在它们的推动下，城市，特别是沿海城镇，开始有了发展规划。

经济基础设施的创立，有助于外国资本"开发"北非事业的发展，而经济基础设施又由于"文化"方面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立而得到加强，文化建设则与自然资源的研究和欧化人才的培养相关。在阿尔及利亚，1857 年创办了第一所法国-阿拉伯中学，随后于 1865 年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在突尼斯，除原有的圣路易中学外，1875 年设立了"萨迪基亚"国家中学；橄榄培种学校的课程计划也得到修订。在的黎波里，第一所教授外国语言的日间学校是 1858 年开办的。这期间还出现了阿拉伯文印刷所，官方报纸开始发行：阿尔及利亚的《al-Moubachir》(1847 年)，突尼斯的《Ar-Raid at-Tunisi》(1960 年)，的黎波里的《Taraboulous al Gharb》(1866 年)。[11]

阿尔及利亚是在被法国占领之后，由外国资本推动而开始发展的，相反，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则是在被征服之前即有了发展。这三个国家沦落到殖民地附庸地位，与土著酋长们盲目顺从，甚至于同谋投降密切相关。他们的现代化，预算支出大为增长，主要靠外国贷款。他们不得不接受极不平等的条件，任凭地方官吏和欧洲债主重利盘剥。严重的是借款 **510** 越多，对外债务越重。1869 年突尼斯的外债比当年国民收入总额高达 12 倍，政府只得宣布破产，同意成立一个国际财政委员会，由它控制本国财政。虽然这个国家保留着独立的外装，实际上已成为欧洲列强的一个半殖民地。

摩洛哥比北非其它国家抵抗外国压力的时间都长，但最终也屈从于同样的命运。1856

---

[11] 关于北非的第一份阿拉伯文报纸，见 F. 迪·塔拉齐(di Tarazi)，1913 年；C. 苏里安-霍贝雷奇茨(Sourian-Hoberechts)，1969 年。

年的英国-摩洛哥条约给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1859-1860年的西班牙-摩洛哥战争[12]以《德土安条约》的签订(1860年4月26日)告终，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西班牙扩大了它原来侵占的飞地，勒索大笔赔款，还扩充了西班牙人在摩洛哥的治外法权和特权范围。与法国(1863年8月19日)及欧洲其它国家签订的类似条约，也为摩洛哥走向殖民地附庸地位作好了准备。

随着突尼斯、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发现”，随着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大批外国人(欧洲人和黎凡特人)移居到这几个国家，充当大资本集团的代理人。他们代表外国公司经营商业(并不反对纵容走私、高利贷和各种舞弊行为)，购置房产、花园和地产。从1856年起，他们在突尼斯、的黎波里和摩洛哥享受治外法权，只受各自国家的领事管理。[13]

欧洲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占有的特权更多。在所有“公民区”，他们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形成一个敌视土著居民的封闭社会。1856年后，移民的出生率超过死亡率。C.R.阿格隆写道：“这些迹象清楚地表明，一个外国殖民地已经建立。”[14]由于移民人数日渐增多，他们密谋决定结束“军事统治”，要求“收回”1863年按照法国参议院法令“让出”的土地，在全境建立土地私有制，普遍实行文官管理制度。

传统社会的反应

511　殖民者的扩张野心、外国巨头的无限权威、移民在国民生活各个领域的日益渗透，这些现实情况激怒了北非的土著人民。自由派人士[15]——诸如突尼斯的赫雷丁、侯赛因、卡巴杜、穆罕默德·拜拉姆、阿尔及利亚的库桑蒂尼——不忍看到他们的国家陷入深重的苦难，同时也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们脱离人民，孤立无援。对于拿破仑三世在阿尔及利亚推行的“文明化政策”以及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改革，大多数居民虽说没有表示公开的敌意，但也很不理解。比如否定“沙里亚”和穆斯林人格特性，这在他们看来就是本国走向殖民地附庸地位的另一个步骤。伊斯兰教派的马拉布特和乡村居民对这类改革特别憎恶。农民和游牧民认为欧化的穆斯林简直是叛徒，对他们毫无信任可言。民间诗歌[16]表明，普通的穆斯林民众都为传统的家长制的崩溃感到痛心。在这个“没有信仰或法律”的“可耻的时代”里，他们觉得自己像陌生人，对诗人莫汉德-乌-姆汉德(1845-1906年)所说的往日的狮子而今天戴上枷锁的人表示厌恶。

19世纪60年代初，几乎在所有的穆斯林国家，反外国人的艰难斗争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泛穆斯林“圣战”的宣传鼓动开始出现。恰在此时，赛努西教派兄弟会的势力抬头，这个教派把刺杀欧洲人看做是献身信仰的崇高行为。在当时形势下，任何纠纷甚至于偶然事件往往成为群众发难的理由，这是不足为奇的。奥雷斯山区(1859年)和霍德纳(1860

---

[12] E.席曼斯基(Szymanski)，1965年，第54-64页。关于这次战争带来的财政上的后果，见G.阿亚切(Ayache)，1958年。

[13] J.L.梅奇(Miège)，1961-1963年，1-4卷；这部著作载有关于欧洲人在摩洛哥享受各种特权的资料精选。

[14] C.R.阿格隆，1964年，第28页。

[15] 关于19世纪阿拉伯自由派思想的特点和特性，见A.霍拉尼(Hourani)，1962年。

[16] 阿尔及利亚民间诗歌中反映人民斗争的有趣资料，见A.麦米(Memmi)，1963年。

年)的小规模起义，突尼斯(1862年)的骚乱，正是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规模民族起义的前兆。这时的起义迅速扩大，民众的愤怒好比火山爆发，造成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抢劫财物，刺杀仇人，破坏电线、邮局以及一切属于欧洲人的东西，后面这种行为看来荒唐，却也证明民众中间藏有巨大的复仇力量。这些起义往往缺乏严格的组织，有时也出现一些名义上的领袖，他们并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只有伊斯兰教的兄弟会参加起义，民众才能团结进行圣战，以争取宗教信仰的胜利。

这种有领导的起义，最早在突尼斯爆发，它始于1864年3月，席卷全国。起义领袖是 512 阿里·本·古达赫姆(又称"人民的贝伊")，在思想上受到提加尼教派兄弟会的影响。但这次起义是分散进行的，据J. 加尼亚格评述，它"不可能给群众以胜利的信心"，[17] 所以贝伊政府保住了首都，摧毁了"萨尔蒂雅"(shartiyas，公社，起义军选举的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关)，并在1865年4月消灭了最后几个反抗据点。

与德尔加瓦的伊斯兰教团兄弟会有联系的乌列德·西迪·谢赫领导了同一性质的人民起义。它始于1864年4月，波及高原广大地区，秋季影响到奥兰、达赫拉以及西阿尔及利亚其它地方。法国从海外调来援军之后，才在1865年将传奇式领袖西·斯利曼的起义部队摧毁。

1870年3月9日阿尔及利亚文官政府的成立和随后第二帝国的垮台，成为东阿尔及利亚普遍起义的信号。1870年秋组成第一个"萨尔蒂雅"，但直到1871年1月才发生第一次战斗。这场起义波及君士坦丁省大部分地区、大卡比利亚区以及西部几个地方。1871年4月8日，拉赫马尼兄弟会的首领、谢赫·哈达德宣布举行圣战。这次起义的军事领袖是指挥官(bachagha)马克拉尼，他死后，其弟布-麦兹拉格继任。1872年1月以后，法军占领起义者的据点，终于控制了局势。

殖民军在镇压这些起义运动时，对各地居民进行围剿，随即处以罚款，没收土地，解除地方自治当局的武装。欧洲殖民者本来就与各地反抗者没有共同的事业，这时大都参加了反穆斯林的武装斗争。应当指出，就连那些为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理想斗争的移民——尽管他们在1870-1871年阿尔及尔公社活动期间表现突出，在当时也是反对北非穆斯林的民族觉醒的。

帝国主义政策的逼近

19世纪60和70年代初的起义失败后，北非走上了无限制的殖民地化道路。欧洲已经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资本主义企业占到统治地位，推动了殖民扩张。这种殖民主义的扩张逐渐具有了纯属帝国主义的争夺和瓜分世界的特点，其目的在于垄断原料来源和其它自然资源。

阿尔及利亚变为殖民地的"黄金时代"开始了。[18] 1870年10月24日，军事大总督由

[17] J. 加尼亚格(Ganiage)，1959年，第251页。
[18] 见C.R. 阿格隆，1968年，第1卷。

513 “阿尔及利亚三个郡的文职总督”所取代。不过几年，欧洲殖民者已经变成“公民”——“白人少数民族”的特权统治阶级，享有公民和政治的全部权利。土著居民属于“臣民”，权利被剥夺，实行以所谓“土著法”（1874 年的法令）为根据的法规统治，这种“对土著居民实行的统治”一直延续到 1936 年。通过新的地产法（1870 年的奥利维耶法令，尤其是 1873 年 7 月 26 日的条例），建立了私有财产原则，并许可土地自由转归殖民者所有。法国的投资显著增长，阿尔及利亚与宗主国间的贸易以及其它经济联系扩大了。

临近 19 世纪末，突尼斯也沦落到同样的地步。1878 年的柏林会议决定了突尼斯的命运，经过多次争论，俾斯麦同意把这个国家“还给”法国。[19] 赫雷丁出任首相时（1873-1877 年）曾以奥斯曼宗主权的名义，企图“维持”突尼斯的独立，但未成功。1881 年 4 月 24 日，法国军队越过边界，5 月 12 日，法国威胁要废黜贝伊，迫使他签订了《巴尔杜条约》，1883 年 6 月 8 日，在一切抵抗均告失败之后，他又签订了《马尔萨公约》，这项公约给“保护制”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法律基础。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摩洛哥推延了欧洲人入侵的时间。意大利是对的黎波里野心最大的国家，它在 1881 年以前一直关注着列强争夺突尼斯的情势，直到 80 年代初才开始强调其要求。[20] 1884-1885 年，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已经拟定了作战计划。然而在列强未有协议之前，意大利的计划只能推迟实施。[21] 同样的原因使摩洛哥在 19 世纪末幸免于外国的入侵占领。但是，突尼斯企图削减外国人的特权，制止他们横行霸道，一切努力都受到挫折。1880 年，在欧洲列强和美国一起参加的马德里会议上，摩洛哥的主权又一次受到限制，这次会议宣布，未经与会列强的预先同意，摩洛哥的行政管理制度决不能有任何改变。

在穆斯林世界，北非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分割、强占，这被视作是欧洲对伊斯兰教的一次新的蹂躏。北非战士为信仰而战，得到伊斯坦布尔和东方其它国家的支持（主要是道义上

514 的支持）。[22] 依靠这种支持，阿尔及尔和突尼斯通过武力重新奋起阻止殖民化进程：1881 年阿尔及利亚由布·阿玛玛领导，1881-1883 年突尼斯由阿里·本·哈里发领导均发动过起义。尽管起义者表现出顽强精神和英雄主义，但他们的起义并未达到目的。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望取胜，一个传统社会为保卫以古老的道德和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特性发展的途径所做出的最后努力，在外国征服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期间已经遭到破坏。

（沈浦娜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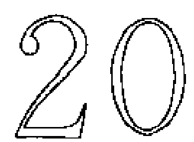
---

⑲ 见 J. 加尼亚格，1959 年，第 701-758 页谈到列强争夺突尼斯的复杂情况。

⑳ E. 德里昂涅（de Leone），1960 年，第 301 页及以后诸页。A. V. 伊利塞耶夫（Elisseev），1896 年，第 79 页：这位俄国旅行家于 1894 年访问的黎波里塔尼亚，他记述了意大利人在当地活动的一般情况。

㉑ 利比亚被征服前国际外交斗争的主要情节，见 V. L. 卢茨基（Loutskii），1965 年，第 269-272 页；V. 卢茨基（Lutsky），1969 年英文译本。

㉒ 关于这一问题的数据资料，见 A. 马特尔（Martel），1965 年，第 228 页及以后诸页。有关奥斯曼帝国政府与赛努西教派之间的关系，见 N. A. 齐亚德（Ziadeh），1958 年，第 61 页及以后诸页。关于阿卜德·哈米德二世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埃及协调和指挥反外国人的示威活动，见 H. 阿达利（Adali），1968 年，第 54 页及以后诸页。



19 世纪的撒哈拉

S. 贝尔

重述撒哈拉地区的历史，应该考虑两个层面上发生的事件。第一个层面是季节性迁移牧场的撒哈拉牧民和沙漠绿洲居民，在生活上变化不定；新联盟的形成和旧联盟的解体，首领们的掌权与失势；相互间的劫掠与反劫掠；骁勇武士和贵妇人史诗般的传说；商人、教士和学者们的生活及其时代。[①]第二个层面叠加在地区历史之上，它带有明显的历史变革的形式。19 世纪的撒哈拉尽管是偏僻的荒漠，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却日益紧密。到 19 世纪末，欧洲经济的渗透已经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而欧洲人对沙漠地区的征服(虽未整个占领)使撒哈拉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515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历史资料都十分缺乏，造成许多问题和困难，需查阅和研究奥斯曼帝国、法国、意大利、埃及和摩洛哥的有关档案和个人收藏。到 19 世纪，欧洲列强对沙漠地区的兴趣与日俱增，原因是列强把这里看做通往苏丹地区的商业通道。欧洲的资料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些看法。凡文字记载的这段历史，不论是用欧洲各国文字，土耳其文还是阿拉伯文书写的，都需要用零星收集到的口传史料加以补充。例如，对撒哈拉中部的图阿雷格人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而对于这个地区其他民族的情况则没有多少现存史料可利用。某些撒哈拉的社会，因缺乏连续的族谱，也缺少当地阿拉伯文的历史记载，给史学家留下许多可能永远无法说明的问题。

本章将论述 19 世纪撒哈拉地区历史，着重于这个地区的骆驼游牧民和以畜牧为生的沙漠居民的历史。在好年景，骆驼作为财富，使拥有者具备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他们对沙漠绿洲的居民和定居的农耕居民进行闪电般的袭击，然后逃回荒漠以免遭惩罚。这种军事优势使他们得以为掠获奴隶而发动袭击，他们经常沿着沙漠南端的萨赫勒地区进行这种袭击；他们也因此而能够统治沙漠绿洲或萨赫勒的农耕居民，勒令后者交纳贡品以换取保护。尽管游牧民族可以奴役农耕居民，摧毁枣椰树或未收割的庄稼，盗窃谷仓，破坏商业，但他们的目的往往是控制和占有农耕居民的产品，而并非要毁灭他们。因此，这种游牧民族成为许多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对象，也成为政治、军事和宗教变革研究的主要角色。 516

社会和环境

自然，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能完全适应沙漠的干旱环境。然而，仅按沙漠这个词的简

① 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阅读了本章的草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订意见，在此，作者向他表示感谢。

单含义来理解问题是片面的，比如认为雨量稀少，事实上，沙漠地区存在多种多样的气候和地形，造成了撒哈拉地区各种不同的社会。

为简要说明问题，可以将撒哈拉地区划分为两类不同的降雨地区——南部沙漠地区和北部沙漠地区，前者在夏季常有骤雨，后者则在冬季降雨；而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气候，则介于上述两种降雨区之间。即使降雨量很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也是极不均衡的，因此在沙漠大部分干旱地区，有些地方也许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会降雨。沙漠中部，尤其在中部以东地区，即今日的埃及和利比亚东部最为干燥。有三座高于平均降雨量的“雨水桥”从沙漠北部到南部横贯中部干燥地带。其中第一座连接塞内加尔和摩洛哥，从较干旱的大西洋沿岸向内陆伸展，第二座连接尼日尔河湾和阿尔及利亚，第三座则沿着濒临红海的高地延伸。因而人口也就自然地集中于沙漠中雨量比较充足的地带，骆驼商队则通常绕开埃及和利比亚的最干旱地区。随着纬度升高，降雨量也逐渐增多，而撒哈拉地区的地形同其气候一样千差万别。在雨水过后，原先干涸的河道水流数百公里，而在远处仅仅湿润了沙土的表层。在某些地区，由于水位高，农业灌溉是可行的。在被称做艾尔格(ergs)的沙丘地区，沙土本身保有大量的湿气，可以吸收几乎所有的降水，很少流失到地下含水层。此外，由于沙丘只有迎风面流动，因此沙土向四周散发湿气的速度非常缓慢。②

牧人及其畜群之所以能够在沙漠中生活，仅仅是由于他们从一地到另一地寻找并利用517 分散的、生长期短的牧场。但是在沙漠边缘地区，人们对环境可有各种不同适应能力，包括不同程度的对农业的依赖，以及同时畜养多种畜群。在萨赫勒，牧牛族与定居农民彼此和睦共处，而一些牧骆驼族则将家庭劳动力分成放牧和农耕两部分。其他人为了放牧的需要，顾不上农业收成，他们播种谷物，让畜群外出寻找草场，然后回来收割贫瘠的土地。在中部沙漠的干燥地区，流动的牧人虽饲养几种家畜，但他们主要依赖骆驼，因为骆驼最能适应干燥的气候。饲养骆驼需要各种不同的草场，因此必须定期地从沙丘地区迁徙到岩石地带(regs)。这种需要同寻找草场一样，决定了牧骆驼族迁移的频繁性。③ 那些生活在岩石地带和沙丘地带交接地域的部落，如昌巴族，比起生活在这两种地带以外的部落，如雷格巴特族迁徙的距离较近，尽管这两类部落的领地还有其它相似之处。

干旱环境在大多数游牧民族中促进了相近和松散的政治体制的发展。牧民为寻找草场进行分散活动，而在面对外界威胁时，则实行联合行动。这种体制在上述两种活动间起调节作用。这些被人类学文献描写成氏族血缘制的社会，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属于连续不断地扩展和增多的血缘群体，这些群体中规模较大的、历史更久远的，就被公认为最早的始祖群体。④ 人们利用族谱，将一个社会划分为若干个大族群，每个族群又划分为若干个部落和氏族，往下就通过中间层次，划分为许多家庭。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如果部落权力在该社会结构的一定层次上是平衡的，也许无需依靠中央政权即可解决其内部冲突。血缘制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常常显示出它的这种机制。不过，历史也表明，为了对付外来威

② J. 杜比夫(Dubief)，1973 年，第 125-130 页。
③ A. 考奈尔(Cauneille)，1968 年，第 108-109 页。
④ D.M. 哈特(Hart)，1967 年；E. 盖尔纳(Gellner)，1973 年，第 18-19 页；1969 年，第 35-69 页；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9 年，第 29-61 页。

胁，各个部落能够联合起来，而当出现军事危机时，甚至有可能建立类同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定居或半定居的人们往往同化那些迁移来的外来族，这些社会因人们同住一地，协作原则代替了亲属关系。即使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在部落结构的各层可能都设有首领或议事会；富有者可以吸引非亲属关系的追随者；联盟也可能否认或部分地取消亲属观念，以此作为效忠的决定因素。

撒哈拉各民族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形成等级社会结构，这是有势力的武士造成的，他们聚敛财富，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通常的形式是，由具有贵族血统的武士控制被征服的游牧民族的后裔，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在政治上居从属地位。地位低下的人，奴隶或奴隶的后代，则充当仆役、牧人、手工业者、商贩或农民。 518

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

沙漠游牧民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他们并非不受外界的影响。由于他们专营畜牧业，因此，要获取谷物和其它物品，不仅靠掠夺和勒索贡物，还要依赖同农业国的和平贸易。另一个因素是，虽然他们具备机动性强的军事优势，但达不到远离沙漠边缘以外的地域。越是肥沃的地区，供养的人口越多，而人口密集的居住区，能够征集到人数足够的保卫者，因此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的优势也就被抵消了。

19世纪初，游牧民族和农业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沙漠边缘北部和南部有较大差异。在西非和中非地区，定居民族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将游牧民族阻挡在安全地带之外，而在北非，以阿特拉斯等山脉作为地理屏障，多少缓解了这类问题。沙漠南部国家最好的防御战略，是支持他们发展沙漠边缘地区的贸易、城市和农业，并利用游牧民族小分队同其它农业国发生武力冲突的时机，将他们吸引到富庶地区的经济活动中。此外还经过深谋远虑，如同中国一样，利用游牧民族的一支作"雇佣兵"，而使其它分支就范。在沙漠以北地区也使用了相同的办法，但是在19世纪，奥斯曼的摄政和统治摩洛哥的素丹，在保持各游牧民族力量平衡以免自己介入直接冲突方面，表现得相当巧妙。[5] 一个主要的区别是，他们比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富有，因此通过对一些集团施惠更便于统治，他们还允许北非的统治者支持人数少、但装备精良的军队，这些军队时而干涉游牧民族的事务。另外，马格里布各国政府如同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或他们的代表一样，拥有精神上和世俗的权威，这种地位可以使尊敬的素丹或总督们巧妙地行使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武装小分队的作用。

奥斯曼帝国侵入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法国人进入阿尔及利亚，标志着撒哈拉社会与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早期阶段，法国和奥斯曼向南方推进到沙漠地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战略考虑上也有相似之处，也就是想要控制和征收撒哈拉地区的过境贸易税，并且防止其它势力并吞濒临地中海的内地立足点。尽管两国推进的速度相近，其特点却迥然各异。[6]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总督比法国人办法少些，他们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 519

5. E. 盖尔纳，1978年。

6. A. 马特尔(Martel)，1965年，第1卷，第101—132页。英国阻止法国向吉达米斯推进的作用，见A. A. 博亨(Boahen)，1964年，第132—212页

兰尼加内陆领地处理同游牧民族的关系时，考虑十分谨慎。他们了解地方政治结构，因此可以利用不断变化的封地模式，部落之间的战争以及各种联盟，从中牟利。他们长期统治部落社会，很有经验，对那些他们未能统治的社会则保持外交关系，他们还使自己获得合法的穆斯林世界政治中心的代表地位。

1835年，奥斯曼帝国接管了拥有部分自治权的卡拉曼利王朝，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实行直接控制权，极力阻止法国势力从埃及方面入侵。奥斯曼帝国通过一系列行动，扩大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沙漠地区的控制，这也说明了他们政府的特点。从理论上说，驻守在贾洛的一位"凯马卡姆"(kaimakam)负责监督征收贾洛和奥吉拉的枣椰树税，维持沙漠地区周边的秩序。但是，到1869年，凯马卡姆的大部分时间在班加西，因此，一年一次到达沙漠绿洲的收税官成为奥斯曼帝国在内陆地区的唯一正式代表。作为上缴赋税的回报，奥吉拉绿洲居民要求得到保护，免受祖瓦亚游牧民的袭扰，这些牧民经常骚扰撒哈拉的过境贸易，并试图扩大对绿洲的控制。J. P. 马逊记录了一个口头传说，讲述一个奥斯曼官员到奥吉拉，与显然已经交上手的祖瓦亚人讲和。1856年，班加西的凯马卡姆通过巴拉阿萨(贝都因部落)的谢赫进行统治，派出50名武装士兵支持谢赫。[7] 奥斯曼政府的影响，从没有深入到昔兰尼加沙漠地区。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赛努西教派(创立于40年代的苏非派兄弟会，tarika)成为内陆地区的实际政府。[8]

即使奥斯曼帝国对枣椰产品的课税或干预游牧民族事务的能力有限，他们仍然遇到后者的抵抗。奥斯曼帝国总督阿里·阿斯卡尔于1838年抵达的黎波里，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内地偶遇三个抵抗运动的首领，其中之一是奥拉德-苏莱曼（费赞和西尔特一个游牧部落）的首领阿卜杜勒·贾利尔，他们相遇的经历颇具启发性。这位帕夏第一次同阿卜杜勒·贾利尔谈判时，承认他作为自己管辖区的合法统治者，但必须保证不骚扰的黎波里和内地之间的贸易。但是，就奥斯曼帝国的目的而言，阿卜杜勒·贾利尔过于强大了，他主动涉足突尼斯和埃及的商业利益，表明他对的黎波里的繁荣至少有潜在的威胁。于是，阿里·阿斯卡尔使用外交手段，使阿卜杜勒·贾利尔在他的盟友眼中信誉扫地，被看做是独揽大权和具威胁性人物。1840年和1841年，阿卜杜勒·贾利尔在战场上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遭遇三次，他被从前的盟友所抛弃，陷于孤立。在最后的战役中，阿卜杜勒·贾利尔被杀死，几乎全军覆没。战败的奥拉德-苏莱曼部落沿着费赞到博尔诺的商路向南逃走。阿卜杜勒·贾利尔先前曾与博尔诺的名门望族联姻，这是他建立一个商业帝国的战略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与苏丹王国的联系。残余的奥拉德-苏莱曼部落利用这种联盟关系，在博尔诺牧民疆界上建立了阵地，博尔诺统治者则利用他们阻挡图阿雷格人的劫掠。但是，1850年，奥拉德-苏莱曼部落被敌对的游牧部落彻底击败。此后十年中，他们有两次几乎被歼灭，但最后还是幸存下来，变成了骚扰贸易和邻近游牧民族及农业民族的祸根。他们同化劫掠来的奴隶，又

520

---

⑦ 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通史，参见L. C. 弗劳德(Feraud)，1927年。关于奥吉拉史，参见J. P. 马逊(Mason)，1971年，第200-206页，1976年。

⑧ D. D. 科德尔(Cordell)，1977年a；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1949年，全书各处。

招募原在西尔特和费赞一带的盟友——有盟约的部落(soff)，因而增加了人口。[9]

奥拉德-苏莱曼部落的经历表明，甚至军事力量有限的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的帕夏也能在游牧民族中引起骚乱；它还表明奥斯曼有能力操纵部落政治，拆散有盟约的部落关系，这可是一种重要的技巧。相比之下，法国人却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几乎完全依赖武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扩张，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卡迪尔组建的国家，但在1847年打败他之后，法国人将注意力转向沙漠地区。19世纪50年代，在兰登将军统治时期，法国人热衷于在阿尔及利亚和西苏丹之间重建商业关系。法国人希望为扩大贸易提供安全保证，1852年他们在热里维尔和拉格瓦特，1853年在瓦格拉，1854年在图古尔特建立了前哨阵地。在西部，热里维尔以南，法国的军事扩张受到了持续近20年的奥拉德·西迪、谢赫起义的阻碍，后又因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1871年卡比利亚山区的一系列起义而暂时中断。19世纪70年 **521** 代，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和一项尚未考虑成熟的撒哈拉铁路计划，重新引起法国人的兴趣，刺激他们进一步向沙漠地区渗透。当时阿尔及利亚沙漠的南部尚未被法国人控制，1881年，阿哈加尔-图阿雷格人破坏了第二次弗拉特斯远征，法国向瓦格拉以南的推进受阻，这证明要占领图阿雷格国家将付出极高代价。1890年以后，法国人得到英国人的认可，继续征服撒哈拉，其最后阶段始于1899年对因萨拉赫的占领。1902年，阿哈加尔人被击败，最后的顽强抵抗被镇压下去。在后期，法国人采取新的权宜之计，大量招募游牧民去参加非正规军，把具有机动性和地区知识的游牧民族同拥有强大火力优势的法国军队联合起来。1902年，法国人利用昌巴人和图阿雷格人之间长期存在的仇恨，击败了阿哈加尔人；在最后战役中，只有一名法国军官率领一支训练有素和配备重武器的昌巴人军队，骑着最好的骆驼作战。[10]

摩洛哥中央政府不同于法国，尽管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了经济改革，却无力资助一支军队去阿特拉斯山以外的撒哈拉前缘地区实行有效的占领。摩洛哥人也没能抵挡住法国军队。后者在阿尔及利亚边境施加压力，有时为追逐反抗者而侵入摩洛哥领土。摩洛哥的撒哈拉前缘地带属于“异族之地”(bilad al-siba)，但这个译法并不能准确地说明“西巴”和马赫增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重大联系，因为素丹原来可以在当地课税和施行统治。摩洛哥非正式地获得英国的保护，而英国则控制了摩洛哥进出口的最大份额，它在摩洛哥的权益有助于推迟法国人的占领。为了尽力保护阿特拉斯山区以外的领土，摩洛哥素丹尽力缓解同东南部地区当时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即使摩洛哥素丹不能对阿特拉斯山区以外的游牧部落征税或实施控制，他们也要通过调解纠纷支持一派或对另一派以施加影响，或利用他们的宗教领袖的威望介入地方政治。摩洛哥素丹的宗教影响远达尼日尔河湾地区；昆塔人的谢赫艾哈迈德·贝凯、苏丹卡迪里教派的领袖，承认毛莱·阿卜杜勒·拉

[9] 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内地抵抗运动的一般论述，见A. 马特尔，1965年，第103-106页；关于奥拉德-苏莱曼部落史的详细研究，另见D. D. 科德尔，1972年，第11-45页。这里提到的soff，指奥拉德-苏莱曼部落与其它贝都因部落之间的一种盟约；如同摩洛哥境内的“勒弗”(leff)一样，“索弗”(soff)也可在一个卡比拉内形成，用以联合各部落，或部分地取代氏族间的同盟关系。

[10] A. 伯纳德(Bernard)，1906年，第16-110页。关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边界地区，见R. E. 邓恩(Dunn)，1977年，第137-175页。关于对图阿雷格人的征服，见J. 基南(Keenan)，1977年，第72-85页。

赫曼是全体穆斯林的伊玛目，他有权同摩洛哥君主保持外交关系。[11]

522 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沙漠地区，实际意义在于这是全新的现象，它比起摩洛哥素丹偶尔远征到沙漠（主要目的在于结识当地的重要居民并巩固这种联系）长久得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也是偶尔走访昔兰尼加绿洲居民，帝国对游牧民实行放任政策，只是偶尔在部落间的纠纷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游牧民来说，第一次被迫面对有现代装备的法国占领军，他们还有熟悉沙漠的地方向导和非正规军协助。法国军队依靠一群能干的军官（有些人会说阿拉伯语）组成"阿拉伯局"，统治游牧民族，这些军官收集有关穆斯林首领和兄弟会的情报，执行法律，指派酋长统治臣民。当然，不宜夸大法国人早年在沙漠地区的控制程度，但有必要指出，法国人的占领比撒哈拉周边一些定居国家曾试图要做的全面得多。这种占领的代价是很高昂的，特别是要沙漠和沙漠边缘地带贫瘠的土地能够生产剩余产品。史学家指出，穆斯林人民丧失土地和牲畜，是他们贫困化的原因，此外，还有法国的驻军（cantennement）政策引发各地的起义。如能估定撒哈拉人民因被占领而付出多大的牺牲——特别是与一般阿尔及利亚人作一比较——那是很有意义的，只是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12]

在此不可能全面论述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地区的抗法运动，但是，罗斯·邓恩记述了法国人在摩洛哥的撒哈拉前缘地区所引起的反应，他提出的观点有助于了解抗法运动史。这一概述注意到游牧民社会中联盟群体的不稳定性，也说明法国人的入侵完全出乎预料。法国人毁坏了未收割的庄稼、棕榈树庄园、灌溉工程和畜群。另一方面，法国人又按他们的条件建立了永久和平的环境，所谓和平，即进一步扩大贸易。总之，据邓恩所说，法国人的入侵给游牧民和绿洲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 简言之，他们的到来，使极为多变的新的经济更加不稳定。结果，每个部落和格萨尔（qsar），事实上是共享资源的大大小小的群体被迫权衡，对法国军队的影响做出反应，不管这对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好是坏。危机并未使战胜环境的斗争拖
> 523 延下来，反而使之强化，因为联合起来的群体和个人同时还要保护他们至关重要的资源，以免向入侵的军队无条件投降。[13]

邓恩指出，亲属观念在面对外界暂时的威胁时，可以成为军事联盟的基础。但是，在"生存主要依靠共享资源的群体，通过进犯、妥协和退让的非连续的矛盾过程，使其政治符合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亲属观念几乎毫无意义。[14] 这个结论是针对达维马尼的情况，但同样可以说明许多撒哈拉部落社会的历史。

尽管有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游牧民社会固有的分离性，抵抗运动当然是可能联合的，宗教为大规模运动提供了组织保证。在正常的沙漠生活中，苏非兄弟会及其学术中心扎维亚，

---

⑪ R. E. 邓恩，1972年，第106 107页；1977年，第31-39、137-175页；E. 伯克（Burke），1972年，第176-178页；1976年，第1-40页；J. M. 阿本 纳斯尔（Abun-Nasr），1975年，第284-303页。关于图阿雷格人，见A. 泽巴迪亚（Zebadia），1974年；A. A. 巴特兰（Batran），1974年。

⑫ C. R. 阿格隆（Ageron），1968年，第1卷，第3-56、239-265、367 393页；第2卷，第737-858页；A. 伯纳德和N. 拉克罗伊克斯（Lacroix），1906年，第122-126页。

⑬ R. E. 邓恩，1977年第225页。

⑭ 同上。

吸引了许多信徒和学者，通过执行法律，调解各派别和氏族之间或所有居民中的纠纷，尽到了重要的政治责任。从事教育，调解纠纷，苏非教圣者和领袖受到尊敬，还博得学者、神秘主义者和法官的声望。一旦出现危机，教派和他们尊敬的首领自然会充当政治和军事的角色。在法军占领之前，达尔卡维教派已在卡比尔人中和南奥兰反抗奥斯曼的统治。同样，抗法运动联合了各地宗教领袖和他们的教派，例如，1900年后有阿卜杜勒·卡迪尔领导的运动，奥拉德·西迪·谢赫的起义，赛努西教派在利比亚、乍得和尼日尔组织的抵抗运动等。[15]

另外一种情况是50-60年代法国人闯入沙漠地区，引起了经济混乱，使阿哈加尔-图阿雷格人采取统一行动。由于通往北部市场的商路被切断，阿哈加尔人只得改变其经济基础。在阿门努卡尔(amenukal)哈吉吉·艾哈迈德(1830-1877年)的领导下，形势相对稳定，阿哈加尔人有可能利用受奴役的农耕者，发展农业。1880-1883年旱灾严重，于1881年发生袭击弗拉特斯使团事件。后来，法国人占领撒哈拉中部绿洲。阿哈加尔人的反应则是利用今天尼日尔西北部的草场，并与撒哈拉南部边疆通商。他们将阿马多洛尔盐原(sebkhra)的盐，连同枣椰和少量英国进口的棉织品，贩运到达麦尔古，它位于津德尔以北的黎波里至卡诺大道最北端的定居农业区。阿哈加尔联盟的统一有利于经济上的调整，但这无疑是同邻国发生冲突的结果。70年代，阿哈加尔人对他们东部和北部的阿杰尔-图阿雷格人发动了严厉的挑战；阿杰尔人在那十年中由于的黎波里-卡诺贸易的繁荣，日益变得富庶。阿杰尔人还受到其他图阿雷格部落(如西南方的奥利明登人和东南方的一些艾尔-图阿雷格人)的敌视。[16]

524

全面论述抵抗运动还应注意到骆驼游牧民的流动性和他们把牧群从撒哈拉的一端迁徙到另一端的能力，只要他们愿意过充满危险和不确定因素的生活。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杰拉姆纳族历尽沧桑50年流浪的经历。他们在1881年奥拉德·西迪·谢赫起义期间，在热里维尔附近头一次同法国人遭遇，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因为土地不足，以及听说弗拉特斯探险队屠杀的消息和法国军队出兵支援在突尼斯的战役。后来起义首领布·阿玛玛众叛亲离，杰拉姆纳人离开后加入到阿哈加尔-图阿雷格人中去。1889年，他们参加了昌巴人对加达米斯以南的黎波里-卡诺大道的袭击；稍后，据说他们又参加了对费赞和南突尼斯的两次袭击。随着图阿雷格人抵抗运动的失败，他们撤退到的黎波里塔尼亚高地(南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接壤地区)，而他们的袭击却引起了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领土争端。1925年，在结束游荡生活近50年之后，他们最终回到热里维尔宣布投降。[17]

沙漠贸易和游牧民

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军事技术迅速变革，结果是欧洲军队全副最新武器装备，而对

[15] C. R. 阿格隆，1968年，第1卷，第62-66页。J. A. 阿本-纳斯尔，1975年，第240-246页；B. G. 马丁(Martin)，1976年，第36-67页。

[16] J. 基南，1977年，第63-85页；第139-140页；1972年，第345-356页；J. 杜比夫，1947年，第15-16页；G. 加德尔，1961年，第126页，第144-156页。

[17] P. 博耶(Boyer)，1971年。

手只有落后的武器。技术的变革不仅便于征服沙漠，也改变了撒哈拉地区的经济生活，因为廉价的工业制品的输入，使欧洲人的渗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里从前就与欧洲人有贸易关系，但是19世纪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并且因撒哈拉地区经济结构而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例如，摩洛哥在整个阿特拉斯山区有销路的棉织品，在1860年之后被曼彻斯特棉织品的竞争挤垮了，而南突尼斯毛纺织业发展较好，还能继续向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网提供产品。[18] 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各个部落集团都加入到出口初级产品的行列。例如，塞内加尔盆地 **525** 以北地区增加了阿拉伯胶的出口，这使扎维亚家族（以研究伊斯兰学问见长，善于调解纠纷）得以组织商队到塞内加尔河一带获取权势。[19] 19世纪最后30年，在索科托哈里发国以北地区，鸵鸟羽绒和鞣制山羊皮出口的增长，促使游牧社会的统治阶级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农民和依附性农耕者收集和销售这些产品赚钱的新本领。[20] 欧洲人的经济渗透也影响到消费者的口味，饮用加糖浓茶的习俗即流行于本世纪。



图片20.1 沙漠边缘地带的贸易："摩尔人"在塞内加尔河上的巴克尔进行树胶贸易

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贸易吸引了撒哈拉商人、向导、运输者，以及从食品、山羊皮制的盛水容器到向欧洲市场出口的鸵鸟羽绒等各种商品的供货者。首先，北部的塔菲拉勒特、姆扎布、加达米斯、费赞、奥吉拉和西瓦等绿洲居民，在组织和资助贸易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或许由于这些绿洲地处战略位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枣椰同更北面的降雨农业区换取谷物的贸易，已有长期贸易经历的绿洲居民，在机会到来时，自然会加入已有几个世纪的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商业网。游牧民——如阿哈加尔-图阿雷格人、克尔埃维-图阿雷格人、图布人和撒哈拉中

⑱ K. 布朗(Brown)，1976年，第9页；A. 马特尔，1965年，第1卷，第125页。
⑲ C. C. 斯图尔特和E. K. 斯图尔特，1973年，第86-97页，第119-120页，第151-153页。
⑳ S. 贝尔(Baier)，1977年。

部的祖瓦亚人(一支不同于毛里塔尼亚"扎维亚"神职家族的贝都因部落)等，都按自己的需要从事少量的奴隶贸易和其它产品贸易，但是他们无法同北部绿洲的定居商人相比，因为这些商人得到地中海各港口的中间商而最终是欧洲方面的资助，尤其在价格和商路条件有利时。结果，骆驼游牧民的主要作用只是提供运输用的牲畜，充当向导和商队的军事护卫，还为那些无力或不愿陪同商队的商人提供运货服务。[53]大多数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与穿过他们的领土从事的贸易利害攸关：如雷吉巴特人处在通往西摩洛哥的商路上；艾特-卡巴什人(艾特阿塔人的一支)处在通往塔菲拉勒-图瓦特的商路上；吕巴人处在图瓦特以北的商路上；图阿雷格人处在的黎波里-卡诺的商路上；图布人处在博尔诺-费赞的商路上；穆贾布拉人和祖瓦亚人往来于班加西和瓦代之间；卡巴比什人则处在达尔富尔和下尼罗河之间的达尔卜-阿尔巴因，即四十天之路上。 526



图片 20.2 1869年费赞的穆尔祖克要塞

19世纪撒哈拉历史的主要动力在于这些商路上的贸易潮流。在描述这一过程的细节或概貌之前，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可以假定，贸易的变化影响了沙漠地区移民史和战争史这些永恒的主题。控制一条商路，靠提供运输工具和服务而获得收入，是相当重要的目的，但须经受游牧民竞争对手的挑战。由于财富集聚在家族、氏族和全体部落手中，常常搅乱当地政治事务的正常进程，在社会结构的特定层次上，这种政治事务取决于各部落、氏族间权力分配的大体平等。富裕部落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但是，不稳定因素往往出于松懈，甚至大型商队也因放松警惕而成为偷袭者的牺牲品。最后，在一度活跃的某条商路衰落后，需要重新调整，有关这一问题的史料很少，不能就下结论。有些部落(如吕巴人)，通 527

[53] 关于通往的黎波里的穿越撒哈拉的贸易，见M. 埃尔·哈恰奇(EL-Hachaichi)，1912年，第200-202页；H. 麦希尔·德·马图伊西耶(Méhier de Mathuisieulx)，1904年，第20-34页；T. S. 杰戈(Jago)，1902年。关于商人和图阿雷格族在交通、护卫和运货方面的安排，见M. 布鲁拉德(Brulard)，1958年，第202-215页。

过扩大对沙漠边陲地区贸易的承诺，或袭击富裕邻族，来克服贸易的衰落；其他部落（如尼罗河沙漠地区的卡巴比什人）为克服四十天之路的衰落，尽力转向近乎单一的畜牧业，这样的调整似乎更容易些。[22]

沙漠地区贸易地点和贸易额的不断变动，有一个明显的总体格局，即贸易活动远离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这是莫大的讽刺，因为它完全打乱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目的。法国占领初期，贸易得到恢复；1833年以后，非斯和特莱姆森之间重开商队交易，英国产品通过摩洛哥德土安港进入阿尔及利亚西部。1837年，尤其在1839年后，对武器的需求保证了生机勃勃的商业，德土安城和阿卡杜勒·卡迪尔所属领地之间的贸易大增。但是，在阿卜杜勒·卡迪尔的国家灭亡后，贸易随之衰落，部分原因是对西苏丹运来的撒哈拉过境产品征收极高的进口税，又限制邻近地区的货物进入阿尔及利亚。50-60年代法国人试图挽回局势，但是贸易并没有得到恢复。[23] 另一个因素是阿尔及利亚对奴隶的需求萎缩，虽然这一因素常被用来说明阿尔及利亚商业上的困难，但却需要根据最新资料予以重新评价，其实，阿尔及利亚的奴隶贸易从来也不如北非其它需求奴隶的地区重要。[24] 最后一个原因是阿尔及利亚境内没有给商队提供安全保障，因为任何时候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各部落之间的敌对行动都威胁着商业的安全。

阿尔及利亚西部商路直到70年代末仍然繁荣，此后开始最后的衰落，在19世纪向西转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边境附近的菲吉格衰落了，位于菲吉格西南约240公里的阿布阿姆繁荣起来，它包揽了进入摩洛哥的大部分奴隶贸易。其它商业活动大部分也向西转移，远达大西洋沿岸，结果是建成摩加多尔港，该港地处战略要地，自40年代以来承担的横贯撒哈拉的贸易份额日益增多。[25] 19世纪中叶，以塔贾坎特为中心的联盟战胜雷吉巴特人时，在通往摩加多尔的商路上的廷杜夫（古代卡萨尔堡遗址）修建了一座驿站。到1884年，雷吉巴特人再次赢得战争时，便有一支更大的联军保卫绿洲。[26] 贸易的衰落无疑是这场斗争的一个因素，通往摩加多尔的贸易在1878年达到高峰，此后便开始了最终的跌落。1894年法国人抵达廷巴克图，不久，这地区贸易完全终止，开通了廷巴克图和位于塞内加尔河口的圣路易港之间的水陆联运。[27]

529 的黎波里和卡诺之间商路上的贸易在19世纪中叶以后有所增加，特别是1850年后，奥斯曼政府在加达米斯以南有效地维持了和平秩序。随后30年是这条商路上贸易的黄金时530 代，70年代鸵鸟羽绒出口猛增，贸易额创最高记录。在80年代萧条期间，贸易暂时衰退，但是90年代随着鞣制山羊皮出口兴旺，贸易又得以恢复。阿吉杰尔-图阿雷格人的商队来往于加达米斯和伊费鲁安（艾尔山区的一个中转站）之间，克尔-埃维联盟的图阿雷格人则在伊

---

[22] Y. 蒂格尼尔(Tègnier)，1939年，第108页；T. 阿萨德(Asad)，1966年，第79-88页

[23] J.-L. 梅奇(Miège)，1961-1963年，第2卷，第158-163页；第3卷，第74-75页。

[24] R. A. 奥斯汀(Austen)，1979年。

[25] R. E. 邓恩，1977年，第107-112，1971年。

[26] A. 皮杰特(Pigeon)，1956年，第85-94页；A. 劳盖尔(Laugel)，1959年，第301-310页。

[27] J.-L. 梅奇，1961-1963年，第4卷，第380-385页。



图片 20.3　绿洲社会：穆尔祖克市场上的妇女，1869年

费鲁安和卡诺之间开展贸易。这两个集团都遇到邻近部落的挑战，在北方，阿吉杰尔人击退了吕巴人和阿哈加尔-图阿雷格人的进攻，在南方，克尔-埃维联盟遇到达麦尔古的伊麦祖雷格人的挑衅，后者是一个半定居的图阿雷格部落，有地方权力基础，有能力在其领地内对鸵鸟羽绒贸易课税。的黎波里与卡诺的贸易，比通往摩加多尔的贸易持续时间更长，因为卡诺避免了海路商业的竞争，但在1900年之后，由于海上运费低廉，沙漠商路日益不安全，因而贸易急剧衰落。在尼日利亚，英国人想使的黎波里-卡诺的贸易改道至拉各斯港，而在尼日尔，法国人则试图保持沙漠商路的畅通。1911年，当铁路铺到卡诺时，老商路终于废弃了。[39]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班加西到瓦代的商路比其它路线都显得重要。这条由昔兰尼加直达瓦代的商路早在19世纪初就发现了，而18世纪中期之后国势日强的瓦代素丹急于开辟一条向西经过博尔诺，向东可到达尔富尔的商路。从1860年起，这条商路的命运就同赛努西教派联系在一起，1843年之后，这个教派在昔兰尼加的贝都因人中蔓延，后又沿着这条商路向南扩展。这个教派的成就对贸易有重大影响，因为在漫长的商路上，只有这一

[39] M. 约翰逊(Johnson)，1976年a；S. 贝尔，1977年，第39-45页；C. W. 纽伯里(Newbury)，1966年；S. 贝尔，1980年第3、4章。



图片20.4　阿加德兹清真寺尖塔

个组织存在，他们为过往商人提供法律、社会和商业方面通常的准则，以及邮政系统。赛努西教派领导人力图保持商路沿线的安宁，促进贸易发展，为此，他们积极调解家族、氏族或整个部落之间的纠纷，往往能把袭击商队而抢的货物还给商人。反过来商业也使赛努西教派领袖获益，他们征收通行费和仓贮费，接受商人的馈赠，还能借机统一赛努西辽阔的领地。[59]

[59] D. D. 科德尔，1977年。

班加西至瓦代的贸易持续到20世纪初，因为有赛努西教派的支持，也由于这条商路通到比的黎波里-卡诺商路南端更远的地区。最东的达尔卜-阿尔巴因商路，在19世纪中叶后，随着班加西-瓦代贸易的兴起和贾拉巴商业帝国的形成，逐渐衰落了。1885年后，苏丹马赫 531 迪国家破坏了达尔卜-阿尔巴因和尼罗河地区的商路。

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在很多方面影响着游牧民族的生活。西非萨赫勒地区附近的游牧部落掳掠苏丹人的奴隶，对于穿越撒哈拉贩奴贸易进行袭击的事件，偶尔有些记载，如奥拉德-苏莱曼部落迁移到乍得盆地之前，以及20世纪初巴努-穆罕默德部落都曾发生过此类事件。游牧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贩卖一些奴隶，就如同他们经营少量的穿越撒哈拉的其它产品一样，总的说来，他们是运输者而非经营者。转手买卖奴隶比其它商业形式给游牧民带来的岁入大概要少些，因为商人们不必支付运输费，只须付通行费。

奴隶贸易对撒哈拉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或许在于随时可以供应奴隶劳动力，这在发展时期——尤其在沙漠边缘——是个重要因素，奴隶不仅用于放牧业，还用于农业和手工业。例如克尔埃维-图阿雷格人，在19世纪该地区气候最佳时期发展经济，因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和食盐贸易而繁荣发展，还增加了对以艾尔-卡诺走廊为中心的整个地区的投资。除几个图阿雷格部落以外，有关沙漠地区社会制度和社会各阶层演变的资料不易找到。前面已经提到阿哈加尔人新出现了依赖奴隶劳动的农业；而克尔-格雷斯人和伊曼宁的图阿雷格人，则是从原先利用奴隶劳力放牧，改为向定居农耕者征收贡赋。这种转变发生在沙漠武士进入适宜农耕的萨赫勒地区时，此后他们就向当地农耕居民索取贡物，或掳掠奴隶，被掠为奴的人最终与交纳贡赋的农耕居民融合。[30] 另一个经济扩张的例证，如17世纪以来一直在摩洛哥的撒哈拉前缘地带活动的艾特阿塔人，也说明实行扩张需要补充奴隶劳动力。19世纪，艾特阿塔人的一支——艾特-卡巴什人在沙漠区率先实行经济扩张，其影响扩大到塔菲拉勒与图瓦特之间的贸易，他们向图瓦特居民强征保护金。[31]

目前，我们对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数额知之甚少，不过，拉尔夫·奥斯汀已根据来源广泛的各种资料，作出初步的估计，结果有些出人意外。据奥斯汀估算，19世纪的人口贩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卖到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奴隶数量，比以前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奥斯汀的数字表明，1800-1880年间，大约有50万奴隶输入埃及，25万奴隶 533 被带到摩洛哥。只有少数奴隶输入法国人占领之后的阿尔及利亚，而阿尔及利亚从来不像其他地区那样是重要的奴隶市场。[32] 在利比亚，直到19世纪末，班加西-瓦代的商路仍继续为埃及和中东其它地区提供奴隶，因为这条路线比起的黎波里-卡诺一线来，不易被欧洲废奴主义者监视。再往东去，尼罗河商路甚至20世纪初还在贩运奴隶。[33]

进入沙漠地区和过境的武器贸易同时也在进行，尽管欧洲列强试图阻止这种贸易。据报导，19世纪80年代初在的黎波里，尤其在班加西，军火贸易十分活跃，有许多走私的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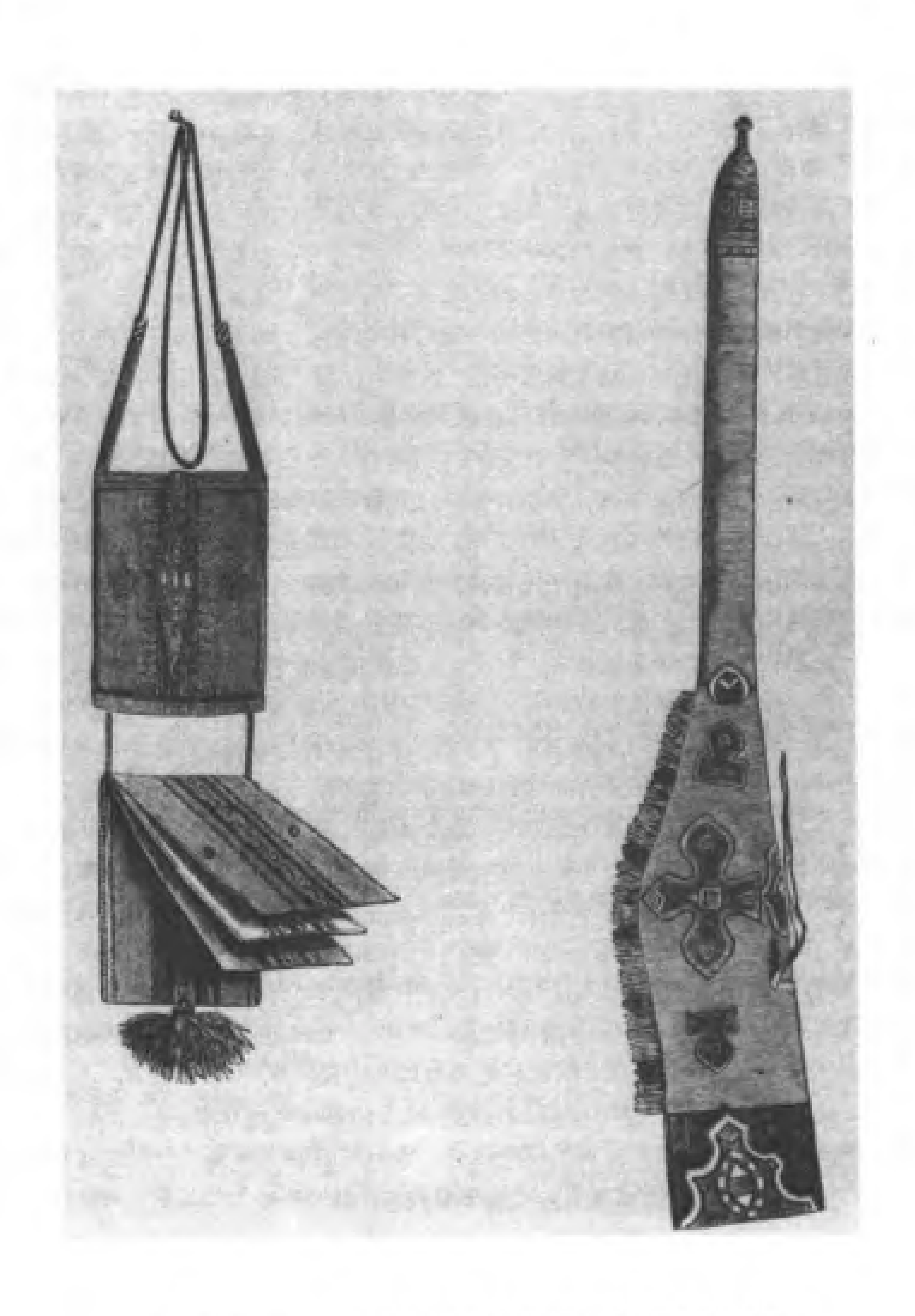
---

[30] P. E. 洛夫乔伊(Lovejoy)和S. 贝尔，1975年；S. 贝尔和P. E. 洛夫乔伊，1977年。关于定居生活和贡金，参阅P. 邦特(Bonte)，1976年；H. 吉劳默(Guillaume)，1976年。

[31] R. E. 邓恩，1972年。

[32] R. A. 奥斯汀，1979年。

[33] J. P. 马逊，1971年，第267页。关于从赤道非洲到埃及的奴隶贸易，参阅D. D. 科德尔，1977年。



图片 20.5　19 世纪 50 年代在廷巴克图出售的图阿雷格人的皮货

福枪(特别是18响的温切斯特连发枪)进口，为商队护卫队所用。这些新式武器，有一部分肯定又落到其他游牧部落手里，他们的袭击屡屡成功，因为这些袭击团伙原来就有突袭的战术，现在又加上了火器。[34] 新式连发枪运入沙漠地区，似乎多半是通过班加西-瓦代的商路，但其它地区也受到影响，约瑟夫・斯马尔登搜集的一些证据表明，19世纪90年代是火器在阿哈加尔-图阿雷格人中扩散的转折时期。在摩洛哥西北部，非法销售1860型单发雷明顿后膛枪十分猖獗，至19世纪末，雷明顿枪已成为摩洛哥全国许多部落(包括撒哈拉前缘地区游牧民)的主要枪支。尽管上述证据还很不充足，但是1898年后的黎波里-卡诺商路日益不安全，可能就是因为抢劫者手中有了武器。[35]

的黎波里-卡诺商路南端周围地区，为研究沙漠区居民在经济、政治和宗教方面对苏丹地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实例。在大草原区，19世纪标志着国家组织集权化、伊斯兰化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的过程逐渐达到顶点。19世纪初期的圣战运动，在这个较长的过程中虽说只是最后一个阶段，但其结果是形成了索科托哈里发国，这个大国在靠近卡诺、卡齐纳和扎里亚的中心区、后又在索科托-里马谷地的二级中心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通过掳掠奴隶的办法，从境外向中心地区迁移人口。该地区的中心地带农田肥沃，使奴隶庄园或农户可以为市场需要而生产，剩余产品的生产促进了都市中心和手工业的发展。[36]卡诺和邻近城 534 镇出现了家庭纺织业，所产布匹供应中苏丹广大地区和北部图阿雷格人地区。在沙漠区，尤其在津德尔和艾尔马西夫(当时为克尔埃维-图阿雷格人占领)走廊一带，经济的增长与草原地区的发展互为补充。图阿雷格人用从比尔马和法奇贩来的枣椰、食盐以及家畜和畜产品，换取苏丹地区出产的粮食和制成品。克尔埃维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在草原地区维持了一个精心组织的商业网，它包括城市手工业者和商贩的聚居区(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后裔)以及奴隶和他们的后代干活的农庄。这些庄园遍布萨赫勒地区和草原地区，向沙漠区牧民提供一部分粮食，并在旱季为图阿雷格人的季节性游牧提供栖息场所，旱灾期间也可以做避难处。[37]

虽然图阿雷格人和定居的近邻之间以和平的经济交往为主导，至少在卡诺-艾尔走廊一带是这样，但高尚的图阿雷格人的经济实力主要是拥有骆驼和武器，还有他们的机动性。图阿雷格人可以成为定居之国的强有力的盟友，在对付共同敌人时他们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潜力都十分重要，例如图阿雷格人对达马加拉姆的关系就是如此，后者原是19世纪初在哈里发国北部形成的国家，其势力逐渐强大，令人不安。另一方面图阿雷格人也可以成为有破坏力的敌人，如19世纪初他们对博尔诺就起过破坏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尤其在19世纪，撒哈拉南部地区还一直是伊斯兰教的知识宝库，对草原地区不断产生影响。[38] 中苏丹，塞内加尔盆地，尼日尔内陆三角洲和乍得盆地等沙漠边缘地区，为周围沙漠区的牧民提供谷物，这些经济联系促进了思想观念的交流。撒哈拉南部

[34] P. 贝托利(Bettoli)，1982年，第267页。

[35] J. P. 斯马尔登(Smaldone)，1971年，第161-162页；1977年，第100-101页；H. J. 费希尔(Fisher)和V. 罗兰(Rowland)，1971年，第233-234、240页。

[36] P. E. 洛夫乔伊和S. 贝尔，1975年；P. E. 洛夫乔伊，1978年；斯马尔登，1977年，第39-68页及各处。

[37] P. E. 洛夫乔伊和S. 贝尔，1975年，第564-571页。

[38] C. C. 斯图尔特，1976年a。

地区社会的特点是，它分成武士和神职家族两大部分，前者热衷于战争和政治，后者崇尚和平主义，善于经商，继承了知识传统。恰如氏族结构本身，一分为二是一种社会模式，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因此只有最圣洁的教士，才能真正远离战争；而武士家族也有从事商535 业的，尽管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如神职家族擅长经营。然而毛里塔尼亚的"扎维亚"神职家族，尼日尔河套地区昆塔族神职家族，还有图阿雷格人中的"伊尼斯利明"(inislimin)，都掌握两门政治上有用的学问：法学(fikh)和神秘主义(taṣawwuf)，这些神职家族也像赛努西教派或摩洛哥的神职家族一样，他们在调解和仲裁纠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活动还涉及经济、政治和学术等方面。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维护和发展伊斯兰的学术活动，他们的影响扩展到沙漠以南地区，那里的撒哈拉学术成就使寂静主义的传统以及好斗的改革者传播的伊斯兰教都受到影响。

结 束 语

19 世纪是撒哈拉沙漠区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时期。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瓦解了北非的经济统一体，把横贯撒哈拉的贸易转到阿尔及利亚以东和以西的商路上，同时在沙漠北部边缘地区破坏从东到西的商业交通。法国军队的到来是欧洲势力最直接的表现，这种影响，如果说在其它地方真正存在的话，由于穿越撒哈拉的贸易量和构成的不断变化也是比较遥远的。直到 19 世纪末，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连同其收入和现成提供的劳动力才几乎枯竭。这种贸易在游牧民生活中至关重要，所以，对商业上的变化和它的衰落所产生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阿卜杜勒·卡迪尔统治的国家横跨一条由东到西的主要商道，它的建立有何影响？沙漠区居民对商业上的变化如何明确地作出了反应？商业衰落对抵抗运动的影响如何？法国侵占了沙漠地区，这在沙漠居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还引进了一个新的军事因素。游牧部落的机动性，使他们在抵抗运动中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可以团结在穆斯林领袖和各个教团周围。但是干旱的环境，往往限制共享资源的群体或个人的自由，使他们只能二者择一，或抵抗，或逃生。另一项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就是欧洲人的经济渗透对下列地区经济产生的不平衡和多样化的影响：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这里主要是艾特阿塔人在扩张；摩洛哥沿海地区，这里是阿特拉斯山区和穿越撒哈拉贸易相联系的地带，其基础已经动摇；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活动占据优势；塞内加尔盆地北部，那里树胶的出口增加了摩尔人部落间的竞争；还有尼日尔河湾北部地区；索科托哈里发国，由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废止，这里经济明显增长，地区伊斯兰化和中央集权化也在加强；乍得盆地；以及东边的瓦代，它的扩张改变了北方沙漠和南方林区。上述任何一个地区的历史都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例如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对法国军队的态度上有何共同点和不同点，地区经济的重新定向，等等。536 正如查尔斯·斯图尔特指出的，研究人员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从这些沙漠边缘地区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统一体的主题出发，对南撒哈拉和西非及中非之间的宗教关系提供详细材料。[39]

---

[39] C. C. 斯图尔特，1976 年 a，第 81-85 页。关于中尼日尔北部沙漠-萨凡纳经济的研究，参阅 R. 罗伯茨(Roberts)，1978 年。

气候的普遍影响是贯穿撒哈拉历史的一个主题，旱灾或人口过剩的压力，使游牧民离开干旱地区，前往沙漠边缘土地较为肥沃的地区，或迁移到台地和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现有的气候资料，只能对19世纪的撒哈拉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可以说撒哈拉没有经历过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那些大的灾难，也没有发生1911-1914年、1969-1973年那样严重的萨赫勒旱灾；除了19世纪30年代乍得盆地的大旱灾之外，虽说没有出现严重的旱灾，但19世纪初比1600-1800年的平均值还要干燥；1870和1895年一度恢复了湿润的环境，但是到19世纪末，环境又恶化了，20世纪初旱灾的严重程度达到了顶点。[40] 这些一般的判断显然掩蔽着许多地方和地区的差异。有关气候的详细数据可以更好地解释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尤其是物资缺乏与战争及迁徙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资料几乎都找不到。

（刘 巍译）

[40] S. E. 尼科尔森(Nicholson)，1976年；即将出版。

21 19世纪西非的伊斯兰革命

A. 巴特兰

537 19世纪西部非洲的戏剧性场面，出现于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史学家所熟知的比拉德-苏丹(黑人国土)走廊。由于北方是不断侵蚀的撒哈拉，南方局势不利，处于包围中的该地区的历史重要性、繁荣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人类和牲畜之间的平衡，依赖于定居农耕者和游牧人之间，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之间，自由人和受奴役者之间，以及穆斯林和坚持传统信仰的人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另外，自古以来，这个地区一直是地方商品和外国进口货物相交换的国际市场。而且，比拉德-苏丹相当于一个人口急剧流动和人口混杂的地区，例如散居各地的富尔贝人(富拉尼、佩乌尔)，他们原先的家乡在富塔托罗，从东部的乍得湖和喀麦隆，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大西洋。这个地区是一些大国和帝国兴衰更迭之地，也是代表西非最早的达尔-伊斯兰(穆斯林居住区)的地区。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长期的说教和宣讲，最终猛烈爆发——这里诞生了三个哈里发国：北尼日利亚的索科托哈里发国，马西纳的哈姆杜拉希哈里发国，还有塞内冈比亚和马西纳的提加尼教派哈里发国。

改革运动的宗教背景

19世纪西非的圣战运动基本上是以宗教为推动力，以实现形成伊斯兰教早期特点的基础教义和习俗。由于伊斯兰教是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性宗教，圣战运动的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机是分不开的。因此，19世纪的伊斯兰革命表达了在素丹国家的危机形势中所反映出的各种不同的由来已久的担忧。

538 乌斯曼·丹·福迪奥谢赫(乌斯曼·伊本·福迪)、塞库·艾哈迈杜(艾哈迈德·洛博谢赫)和哈吉吉·奥马尔，这些西非革命家都是宗教界人士。他们是学术泰斗和具有非凡魅力的领导人，他们的生平和活动紧紧地遵循穆罕默德的榜样和"沙里亚"。[1] 他们笃信他们关于重建和改革(tadjdid)的号令和他们最终求助于军事行动的做法，是由安拉注定的，是先知

---

[1] 已出版若干论述19世纪西非伊斯兰革命的一般性著作，如J.R.威利斯(Willis)，1967年；M.拉斯特(Last)，1974年，第1-24页；H.F.C.史密斯(Smith)，1961年；B.马丁(Martin)，1976年，第13-35页、68-98页；M.希斯克特(Hiskett)，1976年。有关乌斯曼·丹·福迪奥谢赫的圣战运动，参阅M.拉斯特，1967年a；H.A.S.约翰斯顿(Johnston)，1967年；F.H.埃尔-马斯里(el-Masri)，1963年，1979年；M.希斯凯特，1973年 关于塞库·阿赫马杜的运动，参阅W.A.布朗(Brown)1969年；A.H.巴(Ba)和S.达格特(Daget)，1962年。关于哈吉吉·奥马尔的圣战运动，参阅J.R.威利斯，1970年，即将出版；O.杰赫(Jah)，1973年；M.A.泰亚姆(Tyam)，1961年；B.O.奥洛隆提梅欣(Oloruntimehin)，1972年a。

穆圣所预示的，是神圣祖先认可的，并且是过去和当代都有先例的。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被选择去执行神意的工具。

圣战鼓动者凭借《古兰经》的一些词句、“哈底斯”(hadith，伊斯兰“圣训”)和法官(idjmā)的一致意见，物别强调圣战的义务以及期待来世圣战者(mudjahidūn)会有大量回报。[2] 重要的是应该指出，在西非，如同伊斯兰教传播的任何地方一样，圣战运动赋予苏非派(神秘主义)自我苦行的含义，并具有道德行为的严格准则。人们期待圣战者带头过一种模范生活，并且实践他们所宣传的教义。

另外，穆罕默德的预言“安拉将在每一百年的开始派遣人到这个乌玛(穆斯林社会)，为安拉更新自己的宗教”，在西苏丹也是尽人皆知。由前几代人沿袭下来的所有“末世学”的传说，的确对圣战运动领导人的计划和行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传说的普遍感染力和它所释放出来的狂热的冲动，也已为全世界所公认，因为圣战运动领导人以救世主的身份体现了大众的希望和要求，并且提出他们认为稳妥的排除危机的方法。据说期待中的救助者已被安拉委以职务，要用语言(宣讲和说教)，必要时则用行动(圣战运动)，有力地推进《古兰经》中关于“求善禁恶”的训诫。救助者将清除不信任、不公正和压迫。他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并且使穆斯林社团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宗教。

“改革”的概念在任何穆斯林居住区(达尔-伊斯兰)都不如19世纪的西非影响更深远。**539** 在19世纪，西非的穆斯林急切地等待改革者或革新者(mudjaddid)的到来。[3] 据说穆罕默德预示，将有12位哈里发(mudjaddidūn)追随他。因此，盛传一个无秩序的时期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地方传说还自豪地认为，先知穆圣使塔克鲁尔(Takrūr，西非)荣获最后两位哈里发。在西苏丹，人们普遍认为，首批十位改革者已经出现在东方穆斯林世界(五位在麦地那，两位在埃及，一位在叙利亚，两位在伊拉克)，桑海大君主阿斯基亚·穆罕默德(1493-1528年)将是第十一位。据称，第十二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改革者，要在13世纪“大迁徙”时期，即(1785-1881年)在西苏丹现身。[4]这种相信太平盛世会到来的气氛被19世纪西非圣战领导人所利用。人们已经注意到，乌斯曼·丹·福迪奥谢赫和塞库·艾哈迈杜(都声称是命中注定13世纪“大迁徙”的改革者。[5] 尽管哈吉吉·奥马尔从未冠以改革者或“马赫迪”的头衔，但他接受了提加尼-苏非派的称号“哈蒂姆·阿莱亚哈里发”(提加尼教派创始者艾哈迈德·提加尼的继任者)。[6]

圣战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由于声称这三人均接受了先知穆圣以及他们所属的塔里卡(tarika，苏非教派或兄弟会)创建者的神圣使命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如此声称便提出了证明

---

② 《古兰经》第二卷第126章：战斗是你的职责，尽管你不喜欢它：战斗或许对你来说是有益的，但你厌恶它；战斗或许对你来说是邪恶的，但你却钟情于它；真主安拉洞悉你不知晓的一切。《古兰经》第二卷，第193章：与他们战斗直到没有迫害，宗教只为真主安拉效劳。除了与压迫者战斗之外，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就没有敌意。伊斯兰教圣训：你们当中不论谁看到任何该受责备的事，都应该亲手改变它：如果他没能这么做，他也得嘴上这么说；如果他没能这么说；他应该在心里这么想；这是宗教最起码的要求。

③ J.R. 威利斯，1967年；A.A. 巴特兰(Batran)，1983年；M.A. 哈吉(al-Hajj)，1967年。

④ 同上。

⑤ J.R. 威利斯，1967年；A.A. 巴特兰，1983年，第32-39页；纳卡尔(al-Naqar)，1972年，第77-78页；W.A. 布朗，1969年，第21页。

⑥ O. 杰赫，1973年，第4页，第123页及以后诸页。根据J.R. 威利斯(即将出版)和B. 马丁，1963年，哈吉吉·奥马尔的追随者为他争得马赫迪和瓦齐尔-马赫迪的称号。

领导人诚意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反击了可能出现的怀疑论者和诋毁者，即乌里玛-苏('ulamā'al-sū'趋炎附势和品行不端的学者)发起反圣战运动的宣传。乌斯曼谢赫向他的听众保证卡迪里教派创建者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死于1166年)在先知穆圣、圣门弟子及所有尊贵圣徒的面前命令他领导圣战运动。1794年，在乌斯曼谢赫领导的圣战开始之前十年，他就体验到这一神秘的幻觉：

在我步入40岁零5个多月时，天主把我召到他面前，我看到神怪和人的主人，我们的主人穆罕默德……与他在一起的是圣门弟子、诸先知和圣徒们。他们向我表示欢迎，并让我坐在他们中间。然后……我们的主人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带来一件绿色袍子……和一块包头巾！……天主的使者将它们抱在胸前一会儿……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让我坐下，为我穿上袍子，包上头巾。然后他称呼我为"诸圣徒的伊玛目"，并且要求我做得到称许的事，禁止我做没得到称许的事；他为我佩带好真理之剑(Sayf al-Hak)，以备对付天主的敌人。[⑦]

540

据说哈吉吉·奥马尔的精神师长、麦加的穆罕默德·伽利命令他在西苏丹地区实施改革。[⑧]后来，当他与敌手的猛烈冲突无可避免时，哈吉吉·奥马尔开始被神秘的启示所驱使，领导起圣战运动：

最初，穆罕默德和提加尼谢赫授权我召集不信教者信仰伊斯兰教，指导他们走上正路，后来我又奉命举行圣战……一个神圣的声音对我说："现在准许你领导圣战运动。"我接受了这个任命。这件事发生在教历1268年(Dhul-Qa' da)21日晚上(1852年9月6日)。[⑨]

19世纪西非的圣战运动深深地植根于正统派和苏非派思想之中，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黑人国土具有长期改革传统的最新表现，改革旨在彻底实现伊斯兰教所允诺而被暴虐的、妥协的和极不公正的政权所否认的平等和正义。

人们试图从纳西尔·丁(死于1677年)[⑩]的圣战、11世纪的阿尔莫拉维德运动[⑪]以及8世纪北非的哈里吉特革命[⑫]中，寻找西非伊斯兰革命的共同根源。但已证明这种年代学的方法表明与这些早期的战乱"只有简单的因果关系"，而非直接承袭。[⑬]虽然不可否认西非圣战领导人很了解这些成功的运动，甚至也了解一些不成功的尝试，[⑭]但他们似乎是直接从靠近家乡的同时代的来源中获得了灵感。在圣战领导人以前，他们自己的祖先托罗德贝人已在本杜、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留下了业绩，穆赫塔尔·孔蒂谢赫和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卡里姆·马格希利曾致力于和平的改革，苏非派响应了阿拉伯的瓦哈比派原教旨主义的爆发，而艾哈迈德谢赫和哈吉吉·奥马尔则为豪萨兰的圣战领袖乌斯曼谢赫开创了先例。

541

⑦ M. 希斯克特，1973年，第66页。
⑧ J.R. 威利斯，即将出版，第6章；O. 杰赫，1973年，第131-132页。
⑨ 同上。
⑩ P.D. 柯廷(Curtin)，1971年。
⑪ M.A. 哈吉，1964年，第58页。
⑫ O. 杰赫，1973年，第62-64页。
⑬ C.C. 斯图尔特(Stewart)，1976年a，第91页。
⑭ 参阅F.H. 马斯里，1979年，第32页，书中记载，乌斯曼谢赫曾指出在17世纪早期的塔菲拉勒特，艾哈迈德·伊本·阿布·马哈利领导的圣战是不成功的，事实上是灾难性的。

圣战领导人追根溯源到黑人国土比拉德-苏丹最神圣的地区，即据说最早出现西非伊斯兰国家的著名的塔克鲁尔（富塔托罗）。⑮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属于那个以托罗德贝人闻名的乌里玛（学者）"社会"。J. R. 威利斯告诉我们，托罗德贝人是分布在整个西苏丹和中苏丹地区形形色色的种族混合而成的穆斯林群体。⑯ 他补充说，托罗德贝"社会"包括富尔贝人、沃洛夫人、曼德人、豪萨人、柏柏尔人，均为出身奴隶和有种姓族群。不过，托罗德贝人被认为是与富尔贝人同宗的。他们都说富尔贝语（富尔富尔德语），实行通婚，并且与富尔贝人相伴而不停地四处迁徙。在西苏丹整个地区，托罗德贝是富尔贝的同义词。事实上，托罗德贝人构成了富尔贝人中的学者部分。

托罗德贝人遵循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他们寻求精神和物质食粮的手段。托罗德贝人与相邻的有学究气氛的氏族——西撒哈拉的"扎维亚"（zawāyā）共同研究最为关心的伊斯兰教。⑰ 虽然每个扎维亚氏族就是一个独立的种族单位，其成员有共同的血统，但托罗德贝人则"动摇了种族差异的观念，……为一切保留自己习俗和信仰的个人建立起一个开放的社会"。⑱ 这个教士和学者组成的社会混合体产生过一些有文化教育的王朝（bayt al-ʿilm），至少仍然可以引以为自豪，例如乌斯曼谢赫的托伦卡瓦王朝、阿赫马杜谢赫的巴里王朝、哈吉吉·奥马尔家族的塔尔王朝等。另外，托罗德贝还可以自豪地指出不平凡的过去：17世纪末叶马利克·西的圣战，18世纪中叶卡拉莫科·易卜拉欣·穆萨的圣战，同时代易卜拉欣·索里的圣战，18世纪70年代苏莱曼·巴尔的圣战等，结果，形成了托罗德贝人的伊玛目（伊斯兰教长）国家，如本杜、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由于这一历史背景，哈吉吉·奥马尔得以使巴努托罗人（富塔托罗人的后代）潜在的圣战精神觉醒。哈吉吉·奥马尔提醒他们，圣战运动是他们的宝贵传统，他说：

> 巴努托罗人像我们最初的祖先一样；他们勤劳、强壮，是最好的和正直的人。巴努托罗人……重新继承你们的事业；用圣战反对安拉的敌人……由于圣战，西奈山是你们的发祥地……巴努托罗人，……变得像你们的祖先一样。⑲

542

托罗德贝的革命传统在穆罕默德·贝洛（乌斯曼·丹·福迪奥谢赫的儿子和继任者）的一首诗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这首诗假如可信的话，应是贝洛1837年去世之前所写。此诗以一段冗长的序言开始，赞美哈吉吉·奥马尔（贝洛的女婿），随后详细叙述了巴努托罗人（托罗德贝人）的"光荣"业绩。据说哈吉吉·奥马尔曾将这首诗作为他的宣传材料，散发给富塔托罗的显贵人物。显然，奥马尔的意图是向读者表示，福迪奥家族完全支持他（托罗德贝人）的圣战运动：

> 这些人（巴努托罗人/托罗德贝人）是我的人民，是我族的祖先，……为了支持伊斯兰教，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中有些是宗教学方面杰出的人物……是保

---

⑮ J. R. 威利斯，1978年，第195-196页；即将出版，第2章；B. 马丁，1976年，第15-16页；J. S. 特里明厄姆（Trimingham），1962年，第161-162页。

⑯ J. R. 威利斯，即将出版，第1章；1978年，第196页及以后诸页。

⑰ 关于扎维亚，见J. R. 威利斯，1976年，第3-12页；C. C. 斯图尔特，1976年(a)；H. T. 诺里斯(Norris)，1968年；A. A. 巴特兰，1972年。

⑱ J. R. 威利斯，即将出版，第3章。

⑲ J. R. 威利斯，1970年，第98-100页。

卫自己抵御敌人的邪恶并且宣布圣战的人。[20]

西非圣战运动的领导人还从穆赫塔尔·孔蒂谢赫(1729-1811年)的"寂静修行"改革模式中吸取了灵感。从大约1750年直到他去世(1811年),穆赫塔尔·孔蒂一直在西非高擎卡迪里兄弟会的大旗,他是卡迪里教派的缔造者和精神领袖。[21] 孔蒂是用"笔",而不是用"剑"对西苏丹地区实施了空前未有的影响。乌斯曼谢赫和阿赫马杜谢赫都把他认做卡迪里道路的精神向导。他关于宗教事务的法定思想常常用于圣战,他的名字被圣战领导人用来支持革命行动并使之合法化。穆罕默德·贝洛宣称,孔蒂一听说乌斯曼谢赫的圣战,就为圣战赐福并预测圣战成功。据记载,他曾说,"乌斯曼·伊本·福迪是多才多艺的圣徒之一,他的圣战运动是正义的"。[22] 孔蒂的这些言论使托罗德贝领导人能够借助于他的巨大威望。尽管哈吉吉·奥马尔属于不同的苏非教派,然而他敬仰孔蒂,同样受到孔蒂的思想影响。[23]

改革者们还受到巡回的马格里布学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卡里姆·马格希利(死于1503-1506年)激进思想的影响。[24] 他们尊重他的判断,以区分达尔-伊斯兰(Dar al-Islam,穆斯林居住区)与达尔-哈尔白(Dar al-Harb,战争/异教徒地区)之间的不同,为库夫尔(kufr,异教)国家下定义,并揭发乌里玛-苏(ʻulamāʼ al-suʻ)。据马格希利所述:

543

任何国家的居民都反映了统治者真实的宗教观点。如果统治者是穆斯林,那么他统治的是伊斯兰教国家(Bilād al-Islām);如果统治者是卡非尔(异教徒),他统治的就是异教国家(Bilàd al-Kufr),将它转变为伊斯兰教国家就是应尽的义务"。[25]

马格希利关于信仰不明的统治者和品行不端的宗教学者(ʻulamāʼ al-sūʼ)的判断是清楚的,他们是异教徒,举行圣战运动反对他们是穆斯林的义务。这种统治者和学者,在他看来,"是用谎言掩盖真理,使许多无知的穆斯林误入歧途"。[26]

西非地区的穆斯林并没有封闭外界的影响。穆斯林东方,特别是伊斯兰教诞生地所直接影响的阿拉伯的宗教及政治发展,在所有穆斯林居住区都有其反响。东方苏非教派对瓦哈比原教旨主义者占领麦加(1803年)和麦地那(1805年)的反应,就是这类事件的例证。

尽管穆斯林的一大派反对瓦哈比派的某些教旨,瓦哈比革命仍然是伊斯兰世界军事行动的催化剂。况且瓦哈比派以他们对苏非派信仰和行为的谴责,还激起了苏非派的一场复兴运动,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就是卡尔瓦蒂教派及其教师——著名的苏非派领袖艾哈迈德·伊本·伊德里斯·法西(死于1837年)。[27] 苏非派的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哈吉吉·

---

[20] 同上,第97-98页。

[21] A.A. 巴特兰,1973年、1974年、1979年。

[22] A.A. 巴特兰,1973年,第349-350页。

[23] J.R. 威利斯,1979年c,第181页。

[24] M. 希斯克特,1962年,第578页及以后诸页;M.A. 哈吉,1964年,第53页及以后诸页;J.R. 威利斯,1970年,第38-42、148-151页。

[25] M.A. 哈吉,1964年,第50页;J.R. 威利斯,1970年,第38页。

[26] 同上,哈吉,1964年,第56页。

[27] J.O 沃尔(Voll),1969年,第90-103页;B.G. 马丁,1972年,第302-303页。在西苏丹,对瓦哈比派反苏非派的反应十分强烈。穆赫塔尔·孔蒂谢赫发布"法特瓦"(fatwa,判决),宣称在当时阿拉伯的条件下,"哈吉"(hadjdj,朝觐)并不是每一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参阅U·纳卡尔,1972年,第47-48页;A.A. 巴特兰,1972,第186-189页。

奥马尔在西非以艾哈迈德·提加尼哈里发的身份所倡导和培植的提加尼教派的诞生。据说，哈吉吉·奥马尔在逗留开罗期间，直接受到卡尔瓦蒂派谢赫们的影响。[28]还有人认为，乌斯曼谢赫的圣战，在他的良师益友吉布里尔·伊本·乌马尔的帮助下，与卡尔瓦蒂-苏非改良主义相互关联。[29]

如果因此把西非圣战运动划在广泛的伊斯兰好战派以及寂静派改革运动范围内，那么这三者之间无疑具有"家庭"所特有的联系。事实上，乌斯曼谢赫1804年领导的圣战已使革命的宗教热情复活，并在西苏丹大地底层引起了骚动。索科托圣战运动印刷品"呼吁穆斯林推翻妥协的异教徒当局，或者至少摆脱它们的政治统治，以富尔富尔德语史诗庆祝豪萨兰的富迪人和圣战者的业绩"，广泛流传于比拉德-苏丹(黑人国土)。[30]据说，来自尼日尔河湾的富尔贝人圣战者参加了乌斯曼谢赫领导的圣战，他们将革命精神带回各自的家乡。有人断言(但未经证实)，阿赫马杜谢赫不仅以前是乌斯曼的学生，而且还是他领导的圣战运动的积极参加者。[31]另外还传说阿赫马杜谢赫得到过索科托圣战领导人的帮助和赐福。还有记载称乌斯曼谢赫亲自授与阿赫马杜谢赫一面旗帜，在行进的圣战者队伍前面高高举起。[32]此外，阿赫马杜谢赫还同阿卜杜拉希·丹·福迪奥(乌斯曼谢赫的弟弟和继任者)通信联系，寻找应付那些反对他倡导的圣战的马西纳穆斯林学者的合法对策。除去阿赫马杜谢赫的圣战之外，1816年至1823年马西纳北部至少发生了三起索科托鼓动的圣战运动。头一次是豪萨学者马拉姆·赛义德领导的，在吉姆巴拉反抗图阿雷格人。但是，赛义德的军队被击败。结果，马拉姆·赛义德离开吉姆巴拉，很可能返回了豪萨兰。另外两起圣战的领导人法基赫·侯赛因·科伊塔和阿尔发·艾哈迈德·阿尔发卡，都是当地的富尔贝人。科伊塔的圣战爆发于菲图加，阿尔发卡的圣战集中在法里马卡。阿赫马杜谢赫认为这两起圣战对他年轻的"迪纳"(dina，哈里发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便迅速击败科伊塔，并将阿尔发卡收编为哈姆杜拉希的力量。[33]第三位圣战领导人哈吉吉·奥马尔，在索科托哈里发国持续停留达六年多。他利用往返朝觐的机会两次光顾索科托。哈吉吉·奥马尔在索科托期间继续从事他的布道和斡旋活动，并介绍追随者加入提加尼教派兄弟会。

544

改革运动的主要动力

建立一个真正伊斯兰教社会和扩展穆斯林居住地边界，从此成为西非圣战领导人的目标。他们相信，伊斯兰教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理想的框架，是对来世的一种拯救方法。但是，将这些信仰转化为现实，全靠他们赢得一批献身于他们的事业的追随者，而且要使这支队伍强大到足以带来他们所希冀的变化。

---

[28] M. 希斯克特1976年，第161-162页。

[29] B.G. 马丁，1976年，第24-25页。据说吉布里尔·伊本·乌马尔曾试图在艾尔人地区掀起圣战，但未成功。参阅F.H. 马斯里，1963年，第438-439页。

[30] W.A. 布朗，1969年，第66-67页；U. 纳卡尔，1972年，第51页。

[31] J.S. 特里明厄姆，1962年，第177页。阿赫马杜谢赫似乎从未离开过马西纳地区。

[32] U. 纳卡尔，1972年，第51页；W.A. 布朗，1969年，第17、22页。

[33] W.A. 布朗，1969年，第66-67页。

545 未来的改革者们继承了大量经院哲学的传统，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住地，甚至到遥远的地方接受著名教授的"经院"教育。他们在那里接受深入细致的训练，不仅学习普通学科，还有具神秘教义的学科，因此而成为有造诣的学者和苏非教派谢赫，致力于教学和布道，并宣传和扩大他们各自的苏非兄弟会。加入乌斯曼谢赫和阿赫马杜谢赫所发起的逍遥派"扎维亚"的学生，被正式介绍到卡迪里教派，受教于哈吉吉·奥马尔的学生，则被接受为提加尼派。正是这些虔诚信徒构成了圣战者的核心。他们完全是以神秘主义方式(asrar al-Tārīḳ)的奥秘培养起来的，因此忠诚地拥护其导师们的理想。他们绝对服从(盲从)导师的精神指导——这是苏非教派训练的结果，使他们成为一股潜在的爆炸性力量，随时准备积极响应他们的谢赫的召唤，像殉教者一样为他们的谢赫去战斗和牺牲。在他们眼里，谢赫比其他所有"乌里玛"在精神和智力上都更加高明。他们是安拉所宠信的圣徒，是有巴拉卡的人(baraka，受神保佑，拥有魔力)，又是信徒与兄弟会缔造者之间唯一的联系。他们的确是教历13世纪所期待的救世主和解放者。

19世纪西苏丹的伊斯兰教无疑还远远达不到改革者及其信徒们的理想。改革者们抱怨非伊斯兰教的习俗在统治者和臣民中间仍有很深的影响。他们谴责统治王朝不公正，实行压迫；指责统治者将传统宗教习俗(takhliṭ)，甚至十足的异教与伊斯兰教相混杂。他们谴责乌里玛对伊斯兰教的沉沦状况漠不关心，实际上是赞同的态度。此外，最麻烦的干扰因素——尤其对哈吉吉·奥马尔而言，还有侵略成性的法国(异教徒)在富塔托罗和邻近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扩张。

这些抱怨大部分——即或不是全部——是正当合理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当地的穆斯林商人和学者传入比拉德-苏丹(黑人国土)。[34] 这些改宗者的成功不应隐瞒这一事实，即宗教皈依者并没有完全摒弃他们的宗教遗产。的确，这种非暴力的改变宗教信仰的方式，必然产生伊斯兰教和传统的非洲信仰"和睦相处"的状态。统治阶级成员和附属于他们的臣民所奉行的就是这种混杂的或称调和的伊斯兰教。在豪萨兰、马西纳和塞内冈比亚，西部非洲的统治者不仅表明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而且与穆斯林商界和学术界有密切的关系。穆斯林学者、阿拉伯文人和号称"魔"力强大的人，成为宫廷有用的政治和行政官员。与国际上黄金、盐、奴隶和其它商品贸易有历史关联的穆斯林商人是
546 财富的重要来源。因此，穆斯林欢迎统治王朝的垂顾和保护，而统治者的非伊斯兰教的放纵行为得到容忍，甚至为之辩解，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改革者而言，真正的伊斯兰教绝无妥协余地。因此，所谓"创新"(bidʿa，即传统宗教习俗移入伊斯兰教)必须止住。最初的尝试是通过布道，呼吁穆斯林回到纯洁不掺假的伊斯兰教。最后由于改革者对统治者和宫廷学者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的布道宣传破坏了官方"规章"的制定。他们鞭挞乌里玛的道德沦丧、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无知和对伊斯兰教的腐蚀。他们谴责统治者的压迫和腐败、滥用权力，对臣民非法课税、横征暴敛，"高举世俗王国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旗帜"。[35]哈吉吉·奥马尔警告说："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世

---

[34] 例如，参阅N. 莱夫茲昂(Levtzion)，1973年，第183-199页；J.S. 特里明厄姆，1969年。
[35] M.A. 哈吉，1964年，第50页。

纪中，凡明智的人都懂得那些陷入世俗事务者(mukibbin'ala ad-dunya)，如异教徒走狗、背信弃义的国王、腐败的乌里玛等，他们使这个世界和来世蒙受耻辱，令人失望”。[30] 显而易见，这些话是鼓励革命的。当局对危险的风暴反应极快，他们企图将日益迫近的革命扼杀于萌芽状态。

可以预见，改革者将当局的企图看成是无信仰的行为，是异教徒的犯罪行为。由于早已确定“如果统治者是异教徒，他统治的就是异教国家(Bilād al-Kufr)”，而西苏丹现在变成了非穆斯林居住区(dār al-Harb)，所以将它征服和并入穆斯林居住区(dār al-Islām)就是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仅在几年之内，圣战者及其同盟者扫除了豪萨各国的萨尔基斯政权、马西纳的阿尔多斯政权、塞古和卡尔塔的法马斯政权，以及本杜、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的阿尔马米政权。随后，豪萨兰成为信仰者的领袖“穆民的埃米尔”(amĪr al-mu'minĪn)乌斯曼·丹·福迪奥领导的哈里发国；马西纳成为艾哈迈德·洛博谢赫的“迪纳”(dina，哈里发国)，他现在也有了“穆民的埃米尔”称号；塞内冈比亚和马西纳则合并为提加尼教派的哈里发国，处于哈吉吉·奥马尔(Khalifat Khatim al-Awlyya')的统治下。

推翻黑人国土原有各国强权的圣战者，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和民族背景。他们中有富尔贝人、豪萨人、曼德人、沃洛夫人、图阿雷格人。他们有的是游牧民，有的来自定居或半定居的村社，有的出身于有文化的乌里玛阶层和“穆里德”(murid，苏非教派信徒)，有的来自没有文化的社会，还有不同的种姓氏族，获释奴隶或契约奴。各类人都有其特殊的苦情，如能改变现状，人人都梦想分得丰厚的利益。

圣战运动的中坚力量，包括那些追随谢赫们巡回布道(siyaḥa)的学生(穆里德或塔利布)，还有伴随谢赫们强行迁出(ḥidjra)“库夫尔”地区的信徒。这些圣战者与加入谢赫阵营的独立的或自立的学者们，建立了“贾马阿”(djama'a，信仰者社团)。这个团体的成员，在宗教热情的鼓舞和谢赫们的感召下，都成了坚定的拥护“安拉之路”(mudjahidūn fisabil Allah)的战士。改革者点燃的宗教烈焰，确实传播到一些接近“贾马阿”的穆斯林中，他们被谢赫们非凡的魅力所吸引，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改革者身上。但是这些改革的卫士，在数量上或军事上都不如西非统治者的军队更具优势。因此，只有在“贾马阿”得到“社外人”的支持而壮大战斗队伍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社外人”当然可以是信仰调和论者(mukhalliṭūn)，但是他们加入圣战运动就能缩小原来使他们与“贾马阿”隔离的社会和宗教的鸿沟。这样，期待最终进入天堂的圣战者队伍中也有了不成熟的成分。“信仰者社团”，或许还有“社外人”大都出身于富尔贝人。改革者同富尔贝人有密切联系，而富尔贝人支配了哈里发国家领导权。富尔贝人在改革运动中占绝对优势，这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圣战是一系列旨在使富尔贝人对其东道国实施统治的种族战争。然而可以肯定，一些富尔贝人没有种族团结的意识就参加了圣战运动，也有很多富尔贝人是站在反圣战势力一边。再者，由艾哈迈德·洛博和哈吉吉·奥马尔谢赫领导的圣战，主要是直接反对富尔贝人在马西纳和塞内冈比亚的政治领导。

547

[30] O. 杰赫，1973年，第184页。

从富塔托罗散居在外的富尔贝人，在圣战运动之前，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富尔贝人无论在哪里，大部分是牧牛者，他们在城市和农业社会以外的地区生活。只是由于季节性的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进入南部定居的农业区和北部的图阿雷格人地区。[37] 旱季，富尔贝人被迫将牛群放牧到农场。这种对农耕者的季节性压力，尤其在庄稼收获时，往往使农耕村社和游牧的富尔贝人之间发生冲突。此外，富尔贝人若进入城市管辖范围内，则要纳税，他们的放牧活动和水源的使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38] 他们还被迫为牛群破坏农作物缴纳罚548 金。在雨季，富尔贝人将牧群赶到北部较干燥的地区，在那里同图阿雷格人争夺水源。富尔贝人的牛群经常遭到图阿雷格人的袭击。[39] 此外，每遇萨赫勒地区旱灾或饥荒，图阿雷格人就对富尔贝游牧民加紧劫掠和破坏。富尔贝人苦于长期被约束、纳税、罚金，牧群也不断受到威胁。圣战运动为他们提供了生逢其时的选择：摆脱捐税和罚金，不再遭受图阿雷格人掠夺。

除此之外，马西纳和塞内冈比亚的富尔贝人还有其它的苦情。约在18世纪中叶，塞古的班巴拉人成功地扩大了对马西纳富尔贝人的宗主权。塞古的法马斯政权没有直接统治马西纳，而是依靠当地的统治王朝——阿尔玛人(摩洛哥桑海占领者的后裔)，管理杰内廷巴克图和松戈约诸镇，富尔贝-迪科军阀则统治尼日尔河湾的其它地区。法马斯政权每年向富尔贝人强行勒索贡品，其中须包括“100名童男，100名童女，100匹公马，100匹母马，一部分黄金”，还要大量的牛。[40] 此外，富尔贝人的畜群成了班巴拉君主和迪科人的猎物，他们经常袭击富尔贝人的营地。阿尔玛人参与了对富尔贝人的劫掠。据说1810-1811年，班巴拉人在马西纳一次用了约四个月时间，劫掠富尔贝人的牛，并从农民手中抢走大量稻米。对富尔贝人实行奴役，掠夺他们的牛，加之班巴拉人和地方当局对他们滥施暴力，这些是使富尔贝人与阿赫马杜谢赫联合起来的几个主要因素。

显然阿赫马杜谢赫的圣战只是富尔贝人一系列尝试之一，其目的在推翻当地班巴拉霸权。富尔贝领袖哈马迪·巴德吉奥及其子戈拉吉奥也倡导了民族主义斗争。1815-1816年，即阿赫马杜谢赫发动其圣战之前两年，戈拉吉奥已从班巴拉人手上夺得了库纳里地区。阿赫马杜谢赫很快与这些爱国力量联合起来。联军在反抗迪科人和班巴拉人的努库马战役中赢得了胜利。[41]

塞内冈比亚的富尔贝人的生活状况并不比别处的同族人好些。他们同样遭受托罗德贝人阿尔马米政权的蹂躏和粗暴统治(一两个世纪前富尔贝人帮助托罗德贝人掌握了政权)。19世纪中叶，阿尔马米已变成掠夺臣民的暴虐的世袭寡头政权。阿尔马米还与法国人建立549 了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允许法国人沿塞内加尔河流域建立据点。法国人的军事存在和他们在该地区不断增加的权力，引起了虔诚的富尔贝人的强烈愤恨，他们认为法国人(作为基督徒)可以成为保护民(ahl adh-dhimma)，但必须按规定缴纳“吉兹亚”(djizya，人头税或

[37] W.A.布朗，1969年，第60页；M.拉斯特，1967年，第62-63页；M.希斯克特，1976年，第138页。
[38] M.拉斯特，1967年；第62-74页；M.希斯克特，1976年，第138页。
[39] W.A.布朗，1969年，第35-36页；M.拉斯特，1967年，第63页。
[40] W.A.布朗，1969年，第182页，注[23]。
[41] 同上，努库马战役是决定性的一战，结果是哈姆杜拉希哈里发政权的建立。

贡金），而且不能对穆斯林居住区施加影响。[42]法国人拒绝缴纳"吉兹亚"或其它任何税金，是与其按照穆斯林法律所处的附属国（纳贡国）地位不相容的。因此，富塔托罗的富尔贝人热情响应哈吉吉·奥马尔的号召，加入他的圣战行列，抗击腐败的地方统治者和"异教徒"法国人，这就不足为奇了。在圣战运动的不同阶段，奥马尔的家乡富塔托罗不断涌现出许多提加尼派圣战者。

同样，改革者从生存于黑人国土的广大奴隶和种姓部族得到有力的支持。19世纪苏丹的寡头政治，即统治王朝及学术界和商界，为了自己的财富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受奴役的部族的辛勤劳动和贸易。同族结婚的种姓氏族从事社会下层的手工业工作，如打铁、捕鱼、纺织和制革。奴隶则被雇用来从事耕种、放牧、家务，并作为武士和保镖参加战斗。

在圣战爆发前夕，生存于西苏丹的奴隶人口似乎有大量的增加，这是因为当地获得了火枪，而沿海地区又有欧洲商人竭力扩大奴隶的出口。[43]该地区的寡头政权，靠掠夺农民和牧人来维持，同样地压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由于采取暴力掠夺奴隶，大量潜在的受害者害怕失去自由而寻求谢赫们的庇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奴隶都参加圣战，希望得以赎身，成为新社会的成员。结果，奴隶在圣战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众多的门徒和初人教者聚集在改革者的身旁。阿赫马杜谢赫和哈吉吉·奥马尔都成功地召唤奴隶们来为他们战斗。据说阿赫马杜谢赫宣称，"你们今天随我来的所有的马丘比（machube，奴隶）都是解放的。所有马丘比将会随我找到天堂。"[44]阿赫马杜公开反对班巴拉人和塞贝拉的迪科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塞贝拉是奴隶和种姓部族密集的地区。

改革者们为受奴役的部族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结果，他们也给改革者以丰厚的回报。奴隶们得到解放，分得他们应得的战利品。他们当中一小部分人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因此，在哈里发政权内可以见到"社会最底层的人晋升到国家最高职位的怪事"。[45] 550

移居地的"信仰者社团"

改革者的讲学和布道，在政府当局察觉出一些危险的迹象之前，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是，一旦讲授者变成政治鼓动者，统治者及其乌里玛便迅速将他们驱逐，限制他们的行动，阻挠他们的追随者。[46]谢赫们及其随从被驱逐出他们的活动中心（豪萨兰的德格尔，马西纳的库贝和富塔贾隆的朱贡库）及后来的移居地（dār al-Hidjra）之后，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暴力对抗。在古杜（1804年）、努库马（1816-1817年）和丁圭拉耶（1849年），"贾马阿"（信仰者社团）已经形成。这些社团远离当局监视，为即将爆发的圣战作准备。他们收集并贮存武器，修筑防御工事，乌斯曼·丹·福迪奥和阿赫马杜·洛博谢赫被称为"穆民（信仰者）的

[42] J.R.威利斯，1970年，第160页；O.杰赫，第152、153、179、181、205页。
[43] J.R.威利斯，1978年，第208-210页；W.A.布朗，1969年，第114-115、124-125页；M.希斯克特，1976年，第138-139页；P.E.洛夫乔伊（Lovejoy），1983年，第188-199页。19世纪中叶，富塔贾隆的奴隶人口估计，几乎占西苏丹总人口的半数。
[44] W.A.布朗，1969年，第188-189页，注[52]。
[45] J.R.威利斯，即将出版，第3章。
[46] A.A.巴特兰，1974年，第49页。

埃米尔”（amir al-mu'minin）。前面谈到哈吉吉·奥马尔已经被任命为哈里发（Khalifat Khatim al-Awlyya'）。

难民人口不断涌人移居地或是响应谢赫们的号召，或是为逃避当局的迫害，教士和学生、奴隶和自由人、农民和游牧民，纷纷来到圣战领导人身旁。移居地内弥漫着宗教狂热和期待新生活的气氛。学生们接受伊斯兰教的学问，特别受到苏非派的教育，并被介绍加入苏非派的卡迪里教派和提加尼教派。可以想见，关于引起大迁徙(hi djra)的事件原因，他们的迁徙比之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至麦地那(622 年)以及备战问题，带来了无休止的讨论。

在改革者的事业中，大迁徙自然是最重要的阶段。迁徙绝非自愿之事，也不像许多学者所说是为了使圣战合法化有意为之。[47] 迁徙也非通常所说是西非改革运动或起义爆发的主要先决条件，因为即使没有迁徙，起义也会发生。在迁徙之前数年，戏剧性的事件即已发生。F.H. 马斯里援引阿卜杜拉希·丹·福迪奥的说明(Tazyyn al-Warakat)之后解释道，索科托圣战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武器的收集，在 1797 年就已开始。[48] 从那时起，圣战的势头几乎不可遏制，乌斯曼谢赫的思想当然已酝酿成熟：

551

自 1797 年起收集武器，当时居民要求与非信仰者决裂，并发起圣战，但是丹·福迪奥要他们最好先武装自己。福迪奥本人则求助祈祷，并求他的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代他祈祷，让他亲眼得见伊斯兰法律统治豪萨兰。[49]

同样，哈吉吉·奥马尔向丁圭拉耶迁徙(1849 年)前的活动(征募信徒、鼓动和武器的收集)也足以使马西纳、塞古和塞内冈比亚全境的统治当局感到惊恐，他们或者拘留奥马尔，或对他行刺，或者不允许他通过其领地。威利斯认为，奥马尔选择朱贡库作为他的第一个学术中心，绝非偶然，因其地理位置“便于(谢赫)在当地积极进行军火和军备贸易”。[50] 大迁徙即使脱去圣战后宗教名义的外衣，或更准确地说改革者们实际上是被迫迁居的，它也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它为“贾马阿”(信仰者社团)免除了直接受害的危险，又为不可避免的圣战提供了准备时间。

毫无疑问，改革者对他们的敌手占有压倒优势。他们笃信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们能够表达民众的苦情和烦恼。更重要的是苏非派的教育强调对兄弟会的谢赫个人要绝对服从，所以他们对“贾马阿”无限忠诚。苏非派宣称：

任何人成了穆里德(信徒或入会者)，他的谢赫的愿望便成了他自己唯一的愿望。他必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他的谢赫；他好比是送葬者双手间(原文如此)的僵尸，或者是抄写人手中的笔。[51]

改革者们还拥有另一种财富，即他们个人的宗教魅力。作为苏非派兄弟会的精神向导，他们被奉若圣徒，拥有神的巴拉卡(baraka)。他们的信徒深信，这种力量使谢赫们能够免除

[47] O. 杰赫，1973 年，第 180-185 页，认为不能肯定哈吉吉·奥马尔离开朱贡库，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的。但是他认为，富塔贾隆的阿尔马米确实决定要驱逐奥马尔，很可能制造许多困难条件，使谢赫及其“信仰者社团”难以久居朱贡库。

[48] F.H. 马斯里，1978 年，第 23 页。

[49] 同上。

[50] J.R. 威利斯，1970 年，第 90 页。

[51] A.A. 巴特兰，1974 年，第 49 页。

旱灾和饥荒等自然灾害，使土地肥沃，六畜兴旺，妇女生育，还能击溃敌人，等等。有关 552 谢赫们的奇迹广泛流传，人们都信以为真。在一个对超自然力的存在有强烈信仰的社会里，具有灵验的"魔"力的谢赫们名声远扬。[52] 他们多次大难不死，证明他们确有神灵保佑。他们超凡的智力，禁欲的生活方式，而且远离"腐败"的统治者，使民众更加信任他们。

改革者们并没有匆忙引导他们的信徒去冒险。在进行充分的准备之后，他们才决定反击挑衅的时间。例如，乌斯曼谢赫告诫不要冒险，认为"冒险只能导致失败，使缺乏战斗力的穆斯林毁灭"。[53] 他们占领了广大的地区，这证明他们计划周密。"尽管他们的敌人十分强大"，但他们无疑赢得了胜利，那种通常认为圣战胜利主要是由于王朝间的倾轧，以及素丹诸国权力的普遍衰落，尚未得到确证。[54]

值得注意的是，乌斯曼谢赫和阿赫马杜谢赫领导的圣战运动，主要局限于他们在豪萨兰和马西纳的家乡，而哈吉吉·奥马尔在富塔贾隆东部边境发起的圣战，其目的在于征服整个西苏丹地区。奥马尔未能解救他的家乡富塔托罗，原因是那时法国人已在这个地区站稳了脚跟。他袭击了法国人在麦地那(1857年)和马塔姆(1858-1859年)的阵地，但是他的军队被击溃，损失惨重。结果，他将注意力转向东部，占领了塞古(1861年)和哈姆杜拉希哈里发统治区(1862年)。

哈吉吉·奥马尔希望将他的哈里发政权扩展到东边多远的地区是不难想象的。他的目标就是要在比拉德-苏丹全境建立哈里发政权。[55] 事实证明，他的"国际性"占领是可行的，因为与乌斯曼谢赫和阿赫马杜谢赫领导的军队相比，奥马尔的军队具有更广泛的基础。他们来自各个地区；包括哈吉吉·奥马尔在西苏丹广泛旅行期间亲自介绍入会的大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提加尼教派成员。可是，他向东部的挺进，以他在马西纳（1864年）的惨死告终。

圣战运动的某些后果 553

在比拉德-苏丹如此巨大的领土上建成中央集权的伊斯兰神权政治国家，这是首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但是，每个哈里发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上又有不同。看来，只有哈姆杜拉希(1818-1862年)统治的小片地区，因同族人口少、交通便利，达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因此阿赫马杜谢赫及其继任者，能够广泛应用"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其范围也是其它哈里发国无法达到的。

最高的称号"穆民的埃米尔"哈吉吉·奥马尔之子及其继任者艾哈迈德也获得这一称号)和兄弟会谢赫的称号封给了改革者们的后裔，他们住在各地首府。哈里发国家划分为若干"伊马拉特"（imarat，酋长国），每一个酋长国由最高长官穆贾希德(mudiahid)统治。大多数的埃米尔(行省总督)都是学者，但其中也有氏族领导人和获释奴隶(据说哈吉吉·奥马尔偏爱奴隶)。到后来，高级职务的委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哈里发世系的血缘关系，或

[52] M. 拉斯特，1967年，第3-13页；W. A. 布朗，1969年，第48、116、123页；O. 杰赫，1973年，第237页。
[53] F. H. 马斯里，1978年，第22页。
[54] M. 希斯克特，1976年，第139页。
[55] O. 杰赫，1973年。

授与显赫的圣战者。

总之，传统权力和社会地位转移到圣战者这一新的精英阶层。因为富尔贝人是圣战的骨干力量，他们成了西苏丹地区的显贵。他们在许多行政部门任职，其中许多人在圣战时都住在偏辟的地方。富尔贝人和其他土地所有者，依靠奴隶来耕种他们的农田。[56] 在哈里发国家中，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似乎仍保持在圣战前的高水平。参加圣战的奴隶得到自由，但没有投奔谢赫的奴隶又重新受到奴役。更多的奴隶在穿越边境的战斗和反抗中得到解救。马格希利在“法特瓦”（判决）中明确了被捕奴隶的合法地位：

> 如果你发现他们（无信仰者）手中有一个奴隶，他声称是生来自由的穆斯林，他的话，只有在证明他确是一个奴隶后，才可相信……至于任何人因他声称是生来自由的穆斯林，而你从他们中将其释放，如果证明他是无信仰者，就再使他当奴隶。[57]

哈里发国家对国内所有个人和族群都提供保护，确保安全。游牧民移向南方的活动受到节制，这使得游牧民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北部边境和牧场不断受到监视，以遏制图阿雷格人的袭击。村社内部的奴隶掠夺也停止了。建立了“沙里亚”法庭，哈里发和埃米尔任命“卡迪”（教法官）。许多非伊斯兰教习俗被禁止，例如严禁酗酒；威信扫地的旧政府所征收的苛捐杂税被废除，代之以正规的扎卡特（zakat，什一税），卡拉吉（khardj，地税）和吉兹亚（djizya）；娶妻不得超过四名，等等。[58] 负责派税和征税的埃米尔多半横征暴敛。

554

革命在教育和宗教皈依领域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学校遍布哈里发国家，大量教士进人未皈依伊斯兰教的地区，出现了一批苏非派教师骨干力量。一些教师定居在新建的农业和学术中心，如索科托、关图、哈姆杜拉希和塞古，还有其它一些乡镇。其他教师则追求传统的“西亚哈”（siyaha）荣誉职称。但是，大多数教师，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教师，仍不得不努力解决传统宗教习俗（takhlit）这个永久的问题。许多传统的准则最终得到容忍。实际上，一旦最初的热情平息下来，一些新颖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屈服于实用主义。哈里发国家由于庞大，“不完善的社外人”又在“贾马阿”中占据优势，这就使妥协不可避免。不应忘记，尽管改革者们所宣布的目标是实现一个理想的伊斯兰教，但是，大多数圣战者却抱着比较庸俗的动机。然而，圣战运动使伊斯兰教在西非有了巩固的地位，形成了两个竞争的苏非教兄弟会——卡迪里教派和提加尼教派。托罗德贝人的伊斯兰革命传统被新一代的圣战领导人保持下来，他们是冈比亚的马巴·迪亚库（约 1809-1867 年）、塞内冈比亚的马哈茂德·拉明（1885-1888 年）、几内亚的萨摩利·杜尔（1879-1898 年），他们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奋起反抗外国入侵者及其地方同盟者，但终被欧洲强大的战争机器所压倒。[59]

（刘 魏译）

---

[56] M. 拉斯特，1974 年，第 28 页；P.E. 洛夫乔伊，1983 年，第 188-199 页。据拉斯特的研究，放牧的富尔贝人在索科托的居住地比其它哈里发国家更为集中。

[57] F.H. 马斯里（编），1979 年，第 119 页。

[58] A.G. 霍普金斯（Hopkins），1973 年，第 144 页，认为禁酒使豪萨兰对可乐果（一种穆斯林法律不加禁止的兴奋剂）的需求量增加了。

[59] I. 赫尔贝克（Hrberk），1979 年；C.A. 奎因（Quinn），1979 年；Y. 珀森（Person），1979 年。

22 索科托哈里发国和博尔诺

M. 拉斯特

引　言

索科托哈里发国和博尔诺地处同一地区，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哈里发国在该地区是占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该地区内的其它国家和民族，也自觉或不自觉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本章将仅对哈里发国和博尔诺的政治结构及总的发展作简要论述，笔者认为，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对该地区共同历史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555

在过去的 15 年中，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了至少一项或详或略的历史研究的对象，而这些研究几乎全部局限于政治演进的过程。先是研究宗教问题，现在则关注经济问题，但是，尽管有大量的资料可资利用，人们在资料的掌握和理解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本文不打算对所有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归纳，只想对了解该地区 1820-1880 年这段历史提出一个框架，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某些思路。

本章着重叙述 1820-1880 年间的情况，这一时期，在历经史称圣战时期的战乱、饥馑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之后，重新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府。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将分三个阶段概述 1775-1820 年前后的情况。首先，1775-1795 年期间，戈比尔等一些国家的穆斯林改革派以和平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且取得成功；其次，1795-1810 年期间，卷入国家政治生活的不同派系因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而爆发全面战争；最后，1810-1820 年期间，新的政府采取措施消除战争后果，有的试行新的行政管理，有的试图建立新的居民点。这些政权在 1820 年以后取得的真正成就，在于成功地为该地区恢复了稳定，从而奠定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的基础。这或许是自 15-16 世纪以来，该地区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经济繁荣时期。为这一成功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地方政治和经济丧失了许多自治权，某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也消失了，尽管人们对此进行了抵制。有关抵制的全部历史还有待论述。 557

1775-1795 年：通往改革之路

穆斯林改革派势力最强大、取得成就最显著的地区不是博尔诺本土，而是豪萨诸国和努佩，豪萨国家和努佩一度曾是大博尔诺哈里发政权所管辖的地区。在这种城市政治的背景下，上台执政的统治者大都赞成宗教改革，如努佩的埃楚・吉布里勒、卡诺的萨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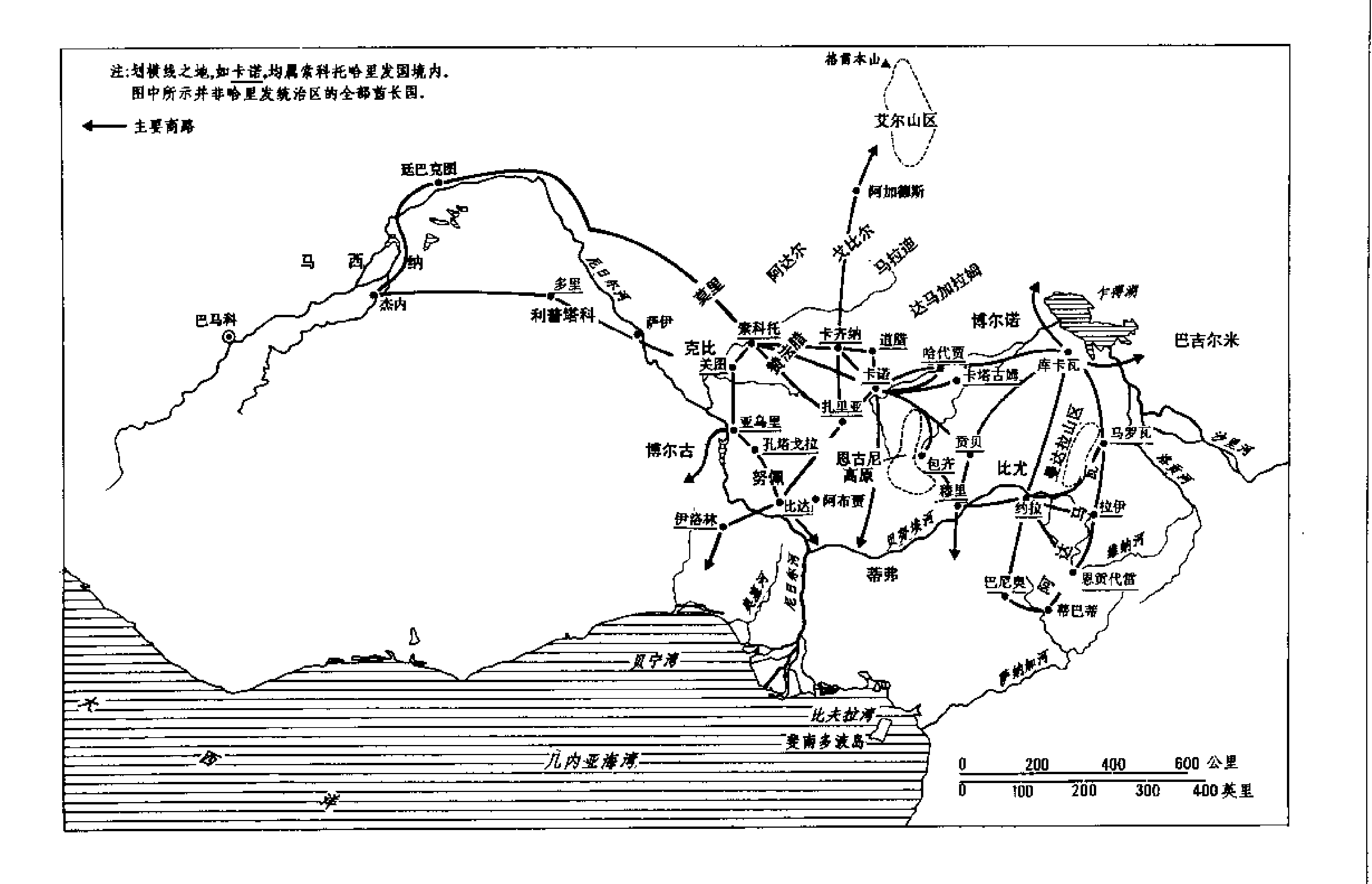


图 22.1 索科托哈里发国与博尔诺及其邻邦(仿照 M. 拉斯特图)

阿尔瓦里、扎里亚的萨尔基·伊沙克、卡齐纳的萨尔基·戈佐，即便在戈比尔、克比和赞法腊，谢赫乌斯曼·丹·福迪奥也对人数日众的信徒宣扬改革，该地区的素丹，如阿尔卡拉瓦的巴瓦·扬·格瓦佐，准备同改革派签订政治协议。然而，改革运动在农村地区十分激进，也取得引人注目的胜利。改革运动最初由来自阿加德斯的哈吉吉·吉布里勒·阿克达西领导（虽然时间很短），但在谢赫乌斯曼的灵活指挥下发展壮大。运动初始，关心的主要是在整个农村地区推行良好的穆斯林教育和规范，而谢赫则像该地区其它地方的学者一样，担任他所领导的地区各位素丹的老师和顾问。可是，大约 1788 年以后，改革运动试图主要在豪萨诸国的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自治村社，并为居住在已有村落的穆斯林争取自治“等级”的权利。[①]

改革派的战略从改革国家体制变为在国家内部或外部寻求自治的过程，与其它背景下的政治演进并行不悖。戈比尔政府基本上停止对博尔诺进贡，也许因此在改革派看来丧失了它的一些伊斯兰正统性。与此相似，1781 年前后，与博尔诺南部毗邻的曼达拉素丹国成功地从博尔诺独立出来，那时，甚至博尔诺国内达亚地区的首领也跃跃欲试，准备宣布自治。[②] 在这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时代，改革派似乎认识到，他们推举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出任素丹一事所取得的成功，只能是暂时的，更好的解决办法应是建立自己的自治村社并拥有 558 自治“等级”权利，这才可能长治久安，尽管这更难以实现。但作为一种战略，它有另外两方面优点：第一，这种办法，早些时候不仅在博尔诺而且在西非其它地区运用过；第二，更重要的是，这种办法同先知在麦加的经历相似。

1795-1810 年：军事对抗时期

在穆斯林国家内部为属于特殊教派的穆斯林要求和谋得特殊权利（在豪萨，改革派被称为“卡迪拉瓦”，Kadirawa' 以区别于其它教派，表示他们的卡迪里教派成员的身份），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官员失去了对臣民的司法裁判权和征税权。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奴隶，要求得到新的特殊待遇，地方政府拒绝了这类新的要求，并动用军队来恢复他们的权威。在社会动荡中，许多奴隶逃跑了，他们在新的自治村社里获得自由，新村社以这些奴隶是穆斯林为由，拒不将他们归还原来的主人。政府采取措施来恢复秩序，弥补损失，但这只能扩大农村和城市社会的裂痕：官吏经常对市场进行突然袭击，没收民众的农产品和牲口。更有甚者——或许是实行报复——他们还袭击富尔贝（富拉尼，佩乌尔）牧民，抢劫牲口，把富尔贝人掳掠为奴，以为用这种手段就能迫使改革派（他们大多操富尔贝人的富尔富尔德语）停止活动。事后，人们对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还争论不休，其实就是上述迫害

① 有关谢赫乌斯曼生平的详细资料，见 M. 希斯克特（Hiskett），1973 年。当代人对谢赫乌斯曼生平的叙述，见 U.F. 马兰法希（Malumfashi），1973 年。在西非更广阔的背景下对改革运动进行新的分析，见 M. 拉斯特（Last），1988 年。

② 有关曼达拉的情况，见 B.M. 巴尔金多（Barkindo），1980 年。关于 18 世纪的博尔诺，见 J.E. 拉弗斯（Lavers），1980 年，第 206-209 页。据认为，达亚最后大约是在 1805 年反叛的，见 S.W. 凯勒（Koelle），1854 年，第 212-223 页。一方面博尔诺衰落了，另一方面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伊斯兰教，其原因极其复杂，人们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经济因素包括 18 世纪贸易从北向南的转移，以及因此而导致农村的生产者-贸易者越来越重要，他们为争取自由市场而斗争。

手段使牧民加入了改革派阵营，从而使改革派能够长期经得住严重挫折，最终由改革派和游牧民的联盟赢得圣战的胜利。结果，牧民武装集团在圣战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意料不到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新国家的治理方式。事实证明传统的观点——这是一场费拉塔（富尔贝人）的圣战（博尔诺学者对这场战争正是如此称呼的）——更有说服力哈里发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富尔贝帝国”。[3]

正式宣布圣战是在1804年，此前，谢赫乌斯曼已经同他的社团从德格尔“迁徙”到古杜，他在古杜被选举为新“国家”的伊玛目。到1806年初，按地区分发了各色战旗，每个

559 大区均任命了司令官。在豪萨各国内部，改革派的战略是，以地区为单位各自连续作战，然后联合起来，集中军力进攻首都。例如，在卡诺，谢赫的部队同他们的盟友各自为战，卡诺的其它部队也分别发动各自的战役。这样，某一战役的失利不致危及整个圣战运动，但是，指挥权的分散在日后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改革派使用游击战术和游击战武器，他们在农村地区比较安全；他们认为，主要的损失不在于战斗失利，而是由于饥馑和传染病。但是，至少有两次战役，谢赫的部队几乎全军覆灭（1804年的楚恩楚亚战役和1805年的阿尔瓦萨战役）。这些损失，尤其是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损失，使谢赫更加依赖游牧民的支持。再者，由于发生饥荒，许多图阿雷格人被迫南迁购买或抢劫粮食，他们同改革派及其牧民盟友争夺稀少的牧场和粮食。直到1804年左右，改革派中有了一些图阿雷格学者，同时又把阿加德斯素丹当做盟友，他们才能防止同图阿雷格人的严重冲突。

然而，要迅速结束战争就必须夺取和占领各国素丹的宫廷。因为在这一阶段，战争的目标是争夺“王位”，而不是抢占领土。唯有博尔诺的玛伊有足够的权威在失去首都比尔尼-恩加扎尔加莫之后，还能生存下来，部分原因是改革派一度攻占其首都，但未能守住（最后也就遗弃了）。军事方面，王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得到重骑兵的护卫，国家对重骑兵实行有效的控制。改革派的弓箭手和梭镖队及少数骑兵士气旺盛，一旦选择好战场，大多能在战斗中灵活多变，击败前来迎战的无能的皇家骑兵队。但是要赢得战争的胜利，改革派需要组建自己的骑兵和所需的军事机构。“游击队”必须逐渐变成政体。

到1809年1月，经过四年时断时续的战争后，豪萨地区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停止了抵抗，这些国家的素丹纷纷外逃。谢赫们的部队在戈比尔经受了激烈战斗的考验。1807年和1808年，部队人数和装备均占优势的穆斯林改革派，先是在战场上，随后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取得一连串的胜利。这在改革派看来既是奇迹，但又证明了他们事业的正义性，而且同先知穆罕默德在拜德尔战役中的胜利如出一辙，这更证实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1810-1820年：战争的结局

历经四年的战争、饥馑以及流行病的蔓延之后，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家园。对

③ 当代学者关于圣战是富尔贝人的事务的论断，见M. 贝洛(Bello)，1951年，引用的来自博尔诺的书信，及贝洛(1970年，第1卷，第18-35页)所引用的学者阿卜德·萨拉姆的信件。圣战的经过，从现有文件看，只有索科托的详情为人所知；据这些文件所作的概述，见M. 希斯克特，1973年；M. 拉斯特，1967年。



图片 22-1　索科托的哈里发穆罕默德·贝洛（1817-1837 年）致卡诺马的乌马尔·达迪的一封信，信中为进行一次战役指定了部队集合地

于有的战败者来说，如博尔诺的玛伊，或豪萨地区各国的素丹，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在流亡 560 地安顿下来，为光复失去的王国而重建朝廷和军队。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博尔诺的玛伊，最不成功的或许就是卡诺以前的那些素丹，而其他人则同新政权达成协议。有些地区，如努佩，战火还在燃烧，别的地方如奥约，战争几乎还没有开始。

对于获胜的穆斯林改革派来说，重建问题由于必须严格遵守伊斯兰律令而变得复杂化

了。最初，谢赫乌斯曼在解释对于一个真诚的穆斯林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时非常严格，但1810年以后他逐渐改变了立场，容忍了一些他以前谴责过的行为(如听音乐)。[4] 所有圣战领导人，包括谢赫乌斯曼、他的兄弟阿卜杜拉和谢赫的儿子穆罕默德·贝洛，最为关心的是在各级政府中任命既受过教育、能通晓伊斯兰律令又具有个人权威实施律令的人选。但是，战争期间学者和学生伤亡很重，此时甚至在索科托也没有足够的文化人出任地方埃米尔、农村地区的法官和伊玛目。哈里发国的其它地方，早期人才短缺的现象甚至更为严重，尽管谢赫推行让学生回家乡任职的政策。人才短缺，不可避免要委派男性亲属来弥补，他们受到中央的监督。

解决人才紧缺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使用旧政权的官员。起初，旧政权的一些官员被派往地方或法院供职(在卡诺，他们被称为“豪萨瓦”)，但他们对新政府的忠诚很快受到怀疑，其中许多地方一级的官员被撤换了。与此相似的另一个问题是，前“敌对地区”的商人是否可以进入哈里发国的市场做生意。从一开始，这种跨越边界的贸易活动似乎就受到人们的怀疑，已经落伍的豪萨商人，以及要求以贸易为基础恢复经济的豪萨地方官员发现他们处境艰难。

由于新政府缺少经验和人们潜在的不信任感，一开始，监督哈里发政府的担子相当繁重。各种怨言和争议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到谢赫面前，请求仲裁。首先，军事将领与学者中就谁被分配到何地掌权争吵不休。但实际上，一些此类争执的解决，要么靠武力，要么被侵害的一方脱离对手，自立门庭，宣布直接效忠谢赫。第二类问题是由于战争期间“圣战”军队的处置不当而产生的权利要求，如非法奴役和非法没收财产或土地等。第三类问题在于谢赫原先信奉千年盛世的理想，而1810年以后却改变主意，使学者们产生了一种幻灭感。[5] 虽然如此，仍至少有一人站出来自称是马赫迪运动的领导，而且争取到新的哈里发国以外的支持，此人最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是，在他之后还有别的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如丹·布亚和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

562

对谢赫来说，诸如此类的争论不胜其烦，他退隐下来教授撰写，1815年病倒，两年后逝世。五年前的1812年，仲裁争端的重担便由阿卜杜拉·丹·福迪奥和谢赫之子穆罕默德·贝洛分担，所以在谢赫去世后政策上并没有重大变化。当时产生如此繁多的争端，原因之一在于早期酋长国的政府结构，其模式是从圣战期间分散化的军事指挥遗留下来的。尽管埃米尔最初由上面任命，是“扛旗人”。他们只不过是平起平坐的同僚中的首位，有时甚至一个地方有几个“扛旗人”，此外，最初委任的一些埃米尔证明太软弱而无法行使权威。到1820年，有的老“扛旗人”去世了，或者已经同对手达成妥协。

最后一点，在早期阶段，受改革派绝对控制的地区也还有限。在索科托本土，有居民的安全区只限于索科托以南一条长65公里，宽40公里的狭长地带。同样，在卡诺、卡齐纳、道腊和扎里亚，内地安全也缺乏保障，从领土上看，像包奇那样的小埃米尔国可能更不稳定。然而，重要的是到1820年，已不存在别的堪与新政府竞争的有合法外衣或得到广

---

④ 谢赫乌斯曼改变观念的详细情况，见F.H.马斯里(El-Masri)，1978年，第13-33页。
⑤ 关于马赫迪运动的详细研究，见M.A.哈吉(al-Hajj)，1973年。

泛支持的能自立的政府。因此，新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向农村扩展，把乡村地区合并于哈里发政权之内。与此对比，博尔诺的玛伊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利用他们与农村地区的既有联系来重建国家，以便保持自己对新哈里发政府的自治地位。

索科托哈里发政府：1820-1880年

1820年，索科托哈里发国大约由七个主要的酋长国组成，另有十个大酋长国还在形成之中。博尔诺在首都撤军和丧失西部及南部大片领土之后，也得到重建。为便于了解"哈里发国"和"埃米尔国"（酋长国）这两个词含义的变化，在此重新简要叙述一下改革派所推翻的旧的政治制度。

旧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国王的作用，国王在不同场合被称为玛伊(mai)、萨尔基(sarki)、埃楚(etsu)、阿拉芬(alafin)。在18世纪末权力转移之前，国王具有礼仪上的职能，需要远离公众，宫廷显得神圣而不仅仅是一所房子。国王多少超越政治，是最高权威的象征，一切活动都是在其名义之下进行的，他代表国家。众多的男男女女作为奴仆或太监献身宫廷和国王，他们是仆人，没有亲属或后嗣，组成政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享有世袭头衔的独立的大家族，他们有自己的属下。再一部分是王室成员，特别是国王的母亲、兄弟姊妹和子嗣。负责仪式或军事领导的枢密院和机构的具体组成，各国有所差异，宫廷奴仆和自由的官员分成几个等级，个人可晋升官阶。政治竞争限于国王以下的官职中。据我们所知，18世纪末叶国王积极参加政治和根据伊斯兰政府的准则推动改革、更加穆斯林化成为趋势。[6] 经济方面，似乎这是一个消费水平（尤其是棉布）提高、对奴隶的需求增加的时代，需要对日益扩大的市场进行管理和保护。这些变化反过来对农村地区的商人、农民和牧民村社产生影响，因为卷入政治竞争的官员努力加强其对权力基础的控制，结果，圣战运动就得到这些变化的受害者的广泛支持。 **562**

穆斯林改革派（至少包括最后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豪萨国王之一）对自己将要建设的制度有着迥然不同的蓝图。国王换成埃米尔，埃米尔其人抑或其所居住的宫廷都不神圣。权威源自真主，而不是由国王个人化了的国家。结果，选择埃米尔不是根据他所承袭的受尊敬的品性，而是根据他个人对真主的虔敬。埃米尔是其平等同僚之冠，他的伙伴们在埃米尔的领导之下作为一个集体分享权力。这样，原宫廷的奴隶官员降为个人奴仆，太后或公主的正式职衔被取消。埃米尔成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讲，埃米尔职位对任何虔诚的候选人开放。根据这个蓝图的设想，一种由大臣、法官、检察官、警察和伊玛目组成的最小规模的官僚制度建立起来，按照马利克学派的解释，沙里亚（伊斯兰教教法）的律例是用来调整和管理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的关系的。上述变化旨在限制和规范政治程序，防止过去不成文法规的明显操纵，减少以宫廷为中心的政府机构的膨胀。这种变化，倾向于消除穆斯林对以地方和传统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仪式权威抱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代之以唯一 **564**

---

⑥ 对"圣战"前博尔诺国家的描述，见J.E.拉弗斯，1980年，第187-209页；N.M.阿尔卡利(Alkali)，1978年。有关"圣战"前豪萨国家的状况，见A.哈森(Hassan)和A.S.奈比(Naibi)，1962年；M.G.史密斯(Smith)，1960年；Y.B.乌斯曼(Usman)，1981年。

源于真主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是穆斯林社团可以接受的，而且对社团承担义务。这个蓝图的详细计划，在阿卜杜拉·丹·福迪奥所写的一本指导卡诺制订新宪法(Diya'al hukkam)的书中得到最实用的描述。[7]随着问题的产生，穆罕默德·贝洛及其后的哈里发又给许多新成立的社团领导人写信，略述新制度的关键要素，增加一些在实际执行中的细节。从某种意义上看，19 世纪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可以视为执行或修正改革派蓝图的持久努力。换一个角度观察(这也暗含在蓝图中)，这是一部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有意识的一体化的历史，先与地中海地区随后是同大西洋经济发生密切联系。在改革派所关心的事物中，还有一项独特的紧迫而严重的任务，即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重建社团，等待预期中的马赫迪的降临。

哈里发的职位

改革派所设计的最重要的一项创新，就是哈里发这一职位。18 世纪，豪萨地区各国及其邻邦都是自治的政治单位。在过去的不同时期，博尔诺享有某种程度的宗主权，并曾使用哈里发这个称号；甚至在 18 世纪，玛伊仍是该地区最高或许也是最强大的统治者。在新制度下，索科托的哈里发对酋长国拥有明确的宗主权，并向他们授权治理具体的地区。由于有明确的伊斯兰宪政律例做基础，哈里发对在形式上超越任何地方或任何种族特性，这是以前的宗主国所没有的，由于公认他拥有其它世俗权力，哈里发的作用明显地不同于以前的统治者——没有礼仪或仪式化，没有惊人的财产。

565 1817 年 4 月，谢赫乌斯曼·丹·福迪奥去世时，哈里发的领土已经划分，由两大集团治理。通常是一分为四，瓦代和博尔诺大概就是如此，豪萨的城镇示意图也采用了类似的概念。四分的领土组合成两对，每一对设一个首领和两名副手。随着 1817 年贝洛继任哈里发，这个模式改变了。1817 年前，哈里发谢赫乌斯曼有两个由他授予全权的官员，一个是他的兄弟阿卜杜拉任大臣，另一个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贝洛任苏丹的埃米尔。1817 年后，哈里发(穆罕默德·贝洛)把治理西部各酋长国的全权像以前那样，仍授予他的叔叔阿卜杜拉，现在简称为埃米尔，但东部各酋长国由他亲自全权管理，只是把行政权授予他的朋友兼仆人基达多，他当时也称大臣。

由于哈里发所授权限包括地方税收，把富裕的酋长国保留在哈里发手中是适当的。因为东部各酋长国，尤其是早期的卡诺和扎里亚，能够做哈里发经济上的后盾。没有它们的税收支持，哈里发无力建设首都和开发内地，甚至对来访嘉宾难以保持适度的慷慨。俘虏、布匹及其它贡品定期送来，而俘虏对于扩大索科托周围的耕作区和边远村庄(因为这些地区还不是农耕中心)，以及修筑防御工事(如高泥墙、平顶防火住房)和为新殖民村落修建永久的清真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8]

---

[7] 新近关于阿卜杜拉·丹·福迪奥的思想及其背景的研究，见 A. A. A. 哈米德(Hamid)，1980 年。关于哈里发的政策及实践的一般研究，见 M. M. 图库尔(Tukur)，1977 年。圣战之前许多传统的职衔后来得到应用，包括有些酋长国的权势家族重要妇女的头衔(如卡诺的玛达基、索科托的英纳)。有关 19 世纪妇女的地位和组织状况的研究刚刚起步，参见 J. 博伊德(Boyd)，1982 年。

[8] 开始向索科托上贡的日期和贡品价值不详。1850 年前后，索科托的需求急剧增加。参见 M. G. 史密斯，1960 年，第 154、157 页。

索科托和关图的关系相当复杂，难以详细叙述，这种关系，部分地取决于特定时间里埃米尔的个性。但是，西非有一种很普遍的类似二元组织的形式：关图扮演“叔叔”的角色，体现了仪式的权威(关图的埃米尔以其虔敬著称)，而在索科托，哈里发则扮演了一个积极的“侄子”角色，对具体事务负责并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在阿卜杜拉和贝洛之间、哈利勒和阿里之间，似乎都是这样的关系，因而防止了冲突，关图也无意向附属的酋长国扩大控制权。

1820-1845年，其他埃米尔和哈里发之间与其说是上下级的正式关系，倒不如说更像以前战争时期战友或同学的平等关系。特别是包奇的雅库布(一名早期社团的老战士)，不同于别的埃米尔，他不是富尔贝人，但在贝洛去世后与哈里发有着叔伯一般的特殊关系。每个埃米尔在其领土上巩固地位后，必然都有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很难肯定，是否像谢赫乌斯曼在圣战期间严格分配战旗悉心控制人事任免那样，酋长国(如卡诺)内部官员的任 **566** 免也须经过哈里发的推荐。

哈里发政府

穆罕默德·贝洛身兼三职，即哈里发、东部各酋长国首脑及索科托内地的首脑，因此必须建立哈里发政府。身为哈里发，他要撰写著作和训诫信，而作为地方总司令，他负责军事指挥，保卫索科托。哈里发一般不到索科托或赞法腊以外的地方巡视。因此，哈里发政府主要负责监督东部各酋长国，特别是维持哈里发帝国所依赖的岁入。

在他的政府中，哈里发可以起用五类人员：首先是他的家臣，大多为奴隶或太监，其职责包括照看马厩一类事情；其次是他过去的战友，现在担任顾问和特别信使；第三类是直系家庭成员及其父亲谢赫的亲属；第四类是地方上富尔贝氏族的首领；最后是包括他父亲的老社团和构成首都知识分子阶层在内的家族。最后一类人被授予司法或宗教职责，或出任次要的地方官职，而索科托的地方实权则落到氏族首领和哈里发的亲戚手中。哈里发的顾问有瓦齐里(waziri)、马加景-加里(magajin gari)、马加景-拉菲(magajin rafi)、加拉迪马(galadima)一类的头衔，大多受瓦齐里管辖，是联结哈里发与酋长国的纽带。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家臣，在城里有单独的住宅，但最初他们在索科托内地或索科托地方政治中无足轻重。依附于谢赫的有学问的亲戚和后裔，(或称萨尔金-雅基，sarkin yaki)使他们相形见绌。但在19世纪，他们凭自己的势力发展成为强大而富有的家族，在索科托政治尤其是在哈里发的推选中日益发挥关键作用。

哈里发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任命埃米尔或批准埃米尔的任命，解决埃米尔继承问题的争议。哈里发的代表(如瓦齐里)安排新埃米尔就职，他手里有哈里发的密封委任状(埃米尔姓名一栏空着)。第二年新上任的埃米尔将亲自到索科托朝觐哈里发。由于两任埃米尔之间的空位期往往发生混乱，必须在一周之内任命一位合法统治者。因此哈里发的代表有时肩负的责任相当重大。除任命或废黜埃米尔外，哈里发和他的代表还须调解一些涉及埃米尔的重大争端，他们是可以上诉的最后法庭。随着大臣权势的扩大，特别是由于瓦齐里的私人代表常驻卡诺和扎里亚这两个主要的酋长国，瓦齐里成为哈里发唯一的巡回代表，其

职权范围越来越大。[9]

哈里发政府的另一个职能是接收或征集理应上缴索科托国库的礼品、赋税或贡物。征收工作是在各酋长国收获之后，一年至少征收两次，恰与穆斯林一年两次的节日相吻合，其实与节日的具体时间无关。目前尚不清楚，究竟一个酋长国总收入中有多少上缴索科托。另外，哈里发有权继承去世的埃米尔的部分财产，接收新埃米尔进贡的礼品。哈里发还分享各酋长国在战斗中抢掠的战利品，其份额取决于地方统治者以及哈里发的代表向他们施加多大的压力。这些征收大都是非正式性的。有鉴于此，哈里发政府常常显得贪婪就不足为怪了。随着政治联系和大臣本身重要性的增强，瓦齐里需要更多的礼品进行再分配，以维系他在这种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在 18 世纪，瓦齐里在索科托内部政治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大臣们不得不建立起可以同其他直接管理领地(这一点与瓦齐里不同)的显贵们财力相比的经济基础。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哈里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哈里发的需求增加了。而索科托内地比较贫困，学者和学生所占人口比重较大，农民很少，牧民很多(他们只付捐款而不纳税)，这一切使索科托成了其它酋长国的负担。最初，在无人居住的土地上建设新村社看来是有利的，那里不会有物欲横流。但这使得哈里发须持久依赖酋长国的友善，哈里发政府还须具备保持这种关系的能力。

问题也在于哈里发国十分庞大，哈里发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远距离的巡访。当时有人计算，哈里发从西到东穿越国土旅行需四个月时间，从北到南需两个月。虽说信使可在八天之内从索科托到达包奇(650 公里)，像大臣那样的官员的正常速度是一天 25 公里左右。另一个因素是在军事上相对缺乏压力。

军事与外交活动

哈里发国没有常备军。确实，与类似规模的国家相比较，索科托哈里发国决不是一部军事机器。[10] 一年一度的军事动员不过是表示效忠、威慑反对势力和控制边疆的演习而已。经过最初的征战建立边疆以后，哈里发国再也没有协调一致征服更多的领土，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计划或雄心。个别埃米尔和军事指挥官自行其事，哈里发统治的领土尤其是在南部和东部的确也有些扩展，但这是各地酋长国的政治而非哈里发的政策。除了思想意识上信奉圣战外，促使酋长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唯一原因就是哈里发永久的需求，他需要弥补索科托年复一年的财政亏空。因此，虽然哈里发常常卷入索科托-赞法腊地区内部的征战，却没有对外挥师讨伐。在东部酋长国的一些重要战役中，由大臣(有两次是包奇的埃米尔)指挥索科托的部队。

部队不是职业军队，也不是建立在以小分队为单位的奴隶兵基础上。大小官僚从他们

---

[9] 关于大臣职位的深入研究，见 M. 拉斯特，1967 年。

[10] 军事方面的具体情况研究，见 J. P. 斯马尔登(Smaldone)，1977 年；R. C. C. 劳(Law)，1980 年，参见 R. 哈里斯(Harris)，1982 年，第 81-85 页。此处叙述简略，尤其没有太强调军事的作用，不同于上述两部书的分析。J. 博伊德友好地提醒我，1850 年哈里发最初成立的特别卫队对内外安全都很重要，参见阿尔哈吉·朱奈杜(Alhaji Junaidu)，1957 年，第 54 页。关于宫廷的严密构造和保卫情况，目前尚无研究，尽管人们经常提到这一点。

的家族和所管辖的村庄征兵。武器和马匹通常不由国家供应，士兵除分到战利品外没有报酬。当兵是一种义务，一般不是强制性的，在后方保护村庄抵抗掳掠者和野兽也同样危险。战斗在旱季进行，早先多半是在收获季节(虽然自愿参战的人不多)，其目标是破坏敌人的庄稼。实际上，雨季作战根本不可能，不仅因为有其它工作或地形不利，而且下雨使兽皮盾牌和弓弦无法使用。旱季末作战也受到限制，这时马匹和人所需的水紧缺，不过，小股部队随时可以发起突然袭击。

兵团的装备五花八门。少数人骑马或骆驼，大部分人用梭镖、弓箭和戈矛。有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弓箭手，使用特制的毒箭以增强杀伤力，有的则专门使用带钩梭镖。剑用得不普遍，除非是当地特产好铁或进口铁打制的，人们认为用剑可能会有麻烦。直到这一时 **569** 期末，人们还不能弄到大批的火枪，因此火枪多半为私人所有，或由半职业性(奴隶)军队所用，又因缺乏实际应用，使火枪没能成为令人生畏的武器。同18世纪一样，最强大的武装是哈里发国的骑兵。圣战之初，改革派缺少马匹或骆驼，与图阿雷格人或戈比尔各国部队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骑兵也很少取胜，他们不仅要与士气旺盛的圣战部队作战，还要进攻有护卫墙的城镇或山区堡垒。哈里发国经历过多次战役，有失败，也有胜利，总的说来，骑兵小分队也许更加善战，因此，他们采用一种与精心布置会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战术(daga)迥然相异的战术(hari)，即对平民进行通常的袭击。豪萨社会是由商人、奴隶和流亡者组成的，成份混杂，流动性大，在这个疏于防范的共同体中容易安插间谍，派人渗人，突然袭击，抢占地盘。

简言之，哈里发国没有引进任何新战略或新的军事技术，它除了庞大的潜在资源外，并没有任何优势，而它的资源从未全部动员起来。19世纪大部分时间，由于圣战之后人们离乡背井，农业混乱造成粮食紧缺，或者干脆为谋利而出售战俘，所以，游击战一直困扰着哈里发国。由于不安全，许多事情都会发生，在某些地区，人的一生中某一阶段沦为奴隶的可能性相当大。[11] 俘虏可以赎身获得自由，战俘也可能逃跑，但多数情况是一家人或全村遭到突然袭击，抓去的有去无回。虽然某些地区可能中断，战争对商业活动似乎没有很大的冲击。远距离贸易商队进行武装自卫，一些商人主要向部队供应马匹和军火，换取战俘，再把战俘卖到远离家乡的地方。

由于军事活动受到限制，外交便成为哈里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2] 哈里发似乎亲自主持外交函件的往来。哈里发从未进行国事访问，哈里发政府的高级官员也从未派驻海外。一般都是过路学者、香客和商人担任信使，带回海外政治发展的消息。哈里发与摩洛哥、的 **570** 黎波里和英国有函件交往，这些函件保存了下来，但是毫无疑问，比较重要的内容都是带口信，或者信件已经遗失。但是，穆罕默德·贝洛十分关注对外关系，就像他对待商业或政治一样明智。他关心并且有能力跟上北非和外部世界的发展、思想和革新，努力使哈里

---

⑪ A. H. M. 柯克-格林(Kirk-Greene)和 P. 纽曼(Newman)(编)，1971 年，第 29-101 页，生动记载了这样一个战俘(约 1850 年)的身世。

⑫ 关于外交活动的一般情况，见 R. A. 阿德勒耶(Adeleye)，1970 年；M. 明纳(Minna)，1982 年。也许因为相信世界末日行将来临，发展同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看来成了次要问题，这也可解释索科托档案中有关外交的记载为何很少。

发国完全加入有宗主权的穆斯林世界。同时，由于担心世界末日逼近，可能不得不东迁到麦加，他设法保障道路通畅，任命谢赫的一个远亲监管这条道路的巴吉尔米地段。

在哈里发国与北边和西边的关系中，外交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北面，与图阿雷格人的关系，同政治形势一样变幻莫测。早些时候，阿加德斯素丹是一位盟友，他声称拥有该地区的定居人口(若放弃游牧民的话)。各色各样的谢赫和商人中也有同盟者，特别有一位谢赫穆罕默德·贾伊拉尼企图发起一次圣战，这一行动暂时看来，似乎比18世纪末期吉布里尔·乌马尔的更成功。[33]可是，图阿雷格氏族(尤其是乌勒米顿氏族)中的贵族和他们的臣属相当强大，使穆斯林难以形成一个有势力的特殊阶级。所以，哈里发国没有组成类似廷巴克图的昆塔那样可借助的谢赫组织网络。索科托的哈里发试图在图阿雷格人中组织这样的网络，也试图充当图阿雷格内部事务的调解人，但只取得有限的成功。相反，图阿雷格学者及其支持者可以在索科托避难。

然而，同廷巴克图的昆塔诸谢赫却保持着友好关系。作为西部主要的穆斯林中心，索科托的学者关注这一方甚于关心博尔诺。他们相互走访，交换诗文；索科托学者从昆塔得到卡迪里的"维尔德"(wird)和萨拉西尔(salasil)，而在关于提加尼教派的争论中，廷巴克图的昆塔成了卡迪里正统派的保垒。[34]

可是，马西纳的新哈里发对昆塔的谢赫和索科托都成了问题。索科托-马西纳关系的详细情况与演化过程尚不清楚，但它同造成昆塔-马西纳敌对的许多地方问题是有联系的。[35]虽然索科托的哈里发要求远在利普塔科之外的马西纳边境地区效忠于他，但关图没有控制马西纳的有效手段。阻碍西部政策实施的主要问题在于显然无法控制阿尔贡古-莫里-赞伯马的轴线，关图不愿组织其军事力量同样起了阻碍作用。同索科托不一样，关图几乎没有得到亚乌里、努佩或者伊洛林的定期支助，因这些国家都受到东部各酋长国所没有的内乱之苦。关图的埃米尔可以进行斡旋，提出建议，事实上埃米尔甚至亲自出访努佩。但关图既没有战斗部队为后盾，又没有维持它的能力(直到19世纪末一直如此)。

571

最后，是关于与博尔诺接壤的边境地区的情况。博尔诺西部领土已出现哈代贾，卡塔古姆，密骚和贡贝等酋长国的雏形，原先妥协谈判的失败(见圣战期间穆罕默德·贝洛与谢赫卡涅米的著名通信)，为19世纪以后的发展定下了基调。1824-1826年，在博尔诺入侵东卡诺的三年中，调停遭到拒绝，两国间没有正式缔结和平条约。有组织的敌对状态逐渐消失，但没有外交活动，也未能决出胜负。可是，双方没有交换象征国际关系的"赠礼"。

比较成功的是外交与军事相结合的政策，这导致与较小的邻近村社休战(例如，与克比；拉菲雅尔·托哥，1866-1874年)或签订条约，哈里发国向它们提供保护(amana)，同时征收捐税。在某些地区，双方共同评估一定数量的俘虏及贡品(如蒲席)，同一些酋长国的纳贡差不多。但是，不知人均税率与哈里发国境内穆斯林的税率有多大的差别。

---

[33] 关于穆罕默德·贾伊拉尼的圣战，见H. T. 诺里斯(Norris)，1975年，第11章；D. 哈马尼(Hamani)的文章，见Y. B. 乌斯曼(编)，1979年，第392-407页。

[34] 关于昆塔，见A. 泽巴迪亚(Zebadia)，1974年。

[35] 关于西纳，见W. A. 布朗，1969年；C. C. 斯图尔特(Stewart)的文章，见Y. B. 乌斯曼(编)，1979年，第408-429页。

除战争和外交之外，国家关系中最常用的政策手段是经济。用武力毁坏庄稼或粮仓只是一个方面。特定的集团(如图阿雷格人)可能被禁止进入市场，他们无法获得特定的商品(如粮食)或靠近水井。当地年降水量多少不一，这种禁令非常有效。对进出口商品(如马匹、武器、盐或布匹)实施禁运，效果要差一些，而对城镇或地区不加区别的封锁更是难以维持，主要是因为走私赢利极大。可是，宁吉人和姆布塔瓦人等的袭击造成哈里发国正常商业流通的混乱相当严重，必须采取补救措施。确实，像穆罕默德·贝洛那样，在圣战期间亲身经历过严重的粮食短缺和粮食贸易中断，他们明白发展商业的重要性，所以采取措施保持商路畅通，建立市场，实施法律保证公平交易。因此，哈里发的经济比较有效，周边各族人民更加依赖哈里发国的商业与商人，经济政策日益成为比战争更有效的权力工具。

酋长国：政治结构

本章不可能逐一叙述各酋长国的发展历程，只能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找出主要的不同之处，然后概括地说明酋长国的社会情况。 572

尽管最初的合格标准十分宽泛，但是几乎所有的酋长国都根据单一世系继承与资历的原则正式任命埃米尔；有些酋长国，埃米尔最终是在一个“王族”世系的两个甚至更多的支系之间轮流委任。唯有扎里亚，三个互不相关的世系交替登上埃米尔的宝座。

埃米尔之下官职的地位和分配，并无单一的模式，不过，大致说来，酋长国的政治结构分为两大类，每一类又包括两小类：

(1)在紧密团结的大族群的支持下建立的酋长国。政府的某些主要职权和领土由这些族群的成员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分配，早期官员的后裔继续享有做官的权利，并维持相关的财产。这些酋长国(“基于世系的”)又分为两类：

(1a)例如扎里亚和卡诺，包括埃米尔的亲属在内的重要官员住在首府，组成埃米尔的枢密院，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控制分给官员的领地。

(1b)例如索科托和卡塔古姆，负有各自领地职责的官员(包括埃米尔的亲属)居住在首府以外；埃米尔的枢密院成员包括他亲自任命的顾问，与某些有势力的族群并无特别的联系；这些顾问充当埃米尔和首府外大权在握的官员之间的协调人。

(2)并非靠一个或更多大族群的支持而建立的酋长国，它们只占少数，靠的是埃米尔的朋友或奴仆等异族的个人集团。没有世袭官职，因此也没有相应的官职资财，当然，埃米尔例外。这些酋长国(“基于保护关系的”)也分为两类：

(2a)例如哈代贾，权力集中在首府的埃米尔手中，奴仆在政府中的比例通常较大；埃米尔的枢密院是非正式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没有权力制衡。

(2b)例如伊洛林、努佩或博尔诺境内的卡内米政府，国运不长，实行两头政治，传统的统治者维持其朝廷，“马拉姆”(努佩和伊洛林)和“谢赫”(博尔诺)同时也执掌基于保护关系的中央政府。

第二类酋长国大多经历过内战。奉行两头政治的酋长国消灭了早期传统的统治者(伊洛

林和努佩于 19 世纪 30 年代，博尔诺于 1846 年)。然而，和平并未来临。在努佩、哈代贾和博尔诺，埃米尔王朝的权利要求者之间发生内战，无论努佩抑或哈代贾，在大约 1860 年以前都未建立起稳定的政府。随后，努佩建立(1a)型政治结构(与扎里亚相似，只是埃米尔之职有关的家族轮流担任)，哈代贾和博尔诺仍保持着依靠埃米尔的最高权力和拥有众多的皇家奴仆的保护关系型政府。

第一类酋长国居多数，情况也更复杂。官员居住集中或分散，是区别这些酋长国的明显标准。分散居住，意味着首都有一批中间人，他们开始可能被认为是埃米尔的"被保护人"。由于这种政治体系带有门第之风，他们发展了自己的家族。结果，埃米尔建立了另一种不能发展家族势力的被保护人制度，即起用宫廷奴仆，但他们发挥不了重要作用。与此相比，官员集中居住则意味着在官员和埃米尔之间没有这种中间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埃米尔建立了一种以宫廷奴仆作为其私人代表的制度，他们在政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集中居住，表明官员还要负责管理很多分布广泛的城镇、村庄或民族(防止地方权力集团的出现)，而分散居住通常意味着官员的府邸设在大体对他效忠的地区内，即或有些村庄效忠于别的地区的显贵，那也是极少数。

官员的居住状况不能作为一个十分严格的标准。在 19 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许多酋长国对各级官员的居住规则进行了修改(如本世纪初，包奇的马达基的官邸便从瓦塞迁回首都)，许多官员有几处官邸，他们在各处居住具体的时间安排尚不清楚，也不知住在首都以外的官员每隔多长时间回到首都出席重要会议。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官员的相对重要性也有变化，如包奇这样的酋长国，埃米尔之下的权力似乎在中心的官员和某些领地的官员之间摇摆。但是，官员府邸所在何处确实反映了初期酋长国的情况，使人们注意到各个酋长国之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差异。

(1b) 型酋长国(有领地的官员住在首都之外)是在政治上响应圣战的基本要求，即建立

574 和维持边疆哨所，在境内重建新酋长国的经济。它们没有自己的城镇，也没有集中的居民点作为自己的基地，军事上相当脆弱。初期的几十年花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修筑堡垒(伊斯兰传统上称之为里巴特，ribāt，守卫堡垒的人称为穆拉比屯，murābitūn)，组织足够规模的农业生产，以应付外来的进攻或进攻威胁。此外，当游牧民不得不定居下来或一些非穆斯林集团加人酋长国时，不得不帮助他们改变生活，适应定居，遵守里巴特的穆斯林教规。改革派领导人在他们的著作和相互往来的信件中，对这些现实问题有生动的叙述。

经济方面，这些酋长国常感人手不足。贸易通道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并加以保护；由于受到无家可归的难民或敌对团体进攻的威胁，安全的农耕地比较缺乏。总之，决不能低估初期某些酋长国的不安全感，因而也不能过高估计政府或政治组织的正规性。鉴于这种易变性，无论初期还是整个 19 世纪，它们面临的危险在于权势显赫的官员要求完全自治，要索科托承认其独立的酋长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斡旋并不总能防止武装冲突的发生。

在 19 世纪，首都的官僚比之有领地基础的官员(除一两个官员外)，权力越来越大。因此，驻在首都之外的官员，尤其是有世袭权的埃米尔自己家族的成员，倾向于更长时间住在首都，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个倾向与人口增长和边疆安全不无关系，与以前一些独特

的族群同化于哈里发国更加同族的社会以及埃米尔(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职能的正规化不无关系。

哈里发国建立初期,(1a)型的酋长国(官僚们居住在首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只有卡诺和扎里亚有条件建立一个庞大的城市"朝廷",因为不仅城市是现成的,而且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发达,商业网络也很好地建立起来了。防御外来侵略也不成问题。现有城镇重新命名为里巴特,但大量的定居人口并无反叛之意,而被废黜后流放到远方的卡诺和扎里亚的国王也不构成威胁。

这些酋长国的经济实力对哈里发国的财政收入是不可或缺的,某个埃米尔一旦单独控制了本国,就可能试图与哈里发相抗衡。因此,哈里发政府和那些被排除在埃米尔之职之外的集团都有一个目标,即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在扎里亚,这个问题是通过埃米尔之职 575 和其它官职由三个不同的家族轮流担任来解决的,哈里发随时可罢免埃米尔,后者任期较短(最长为 14 年,只有两个埃米尔有此殊荣)。这种解决方法的代价是,有些埃米尔没有威信。与此相对照,在卡诺,第二任埃米尔易卜拉欣·达博就职后,内战连绵不断。他担任埃米尔 27 年(1819-1846 年)之久,破坏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和轮流任职的制度。相反,重要官员的领土实力以及他们作为顾问和"有权支配要职任命者"的独立性得到保障——但是,只取得部分成功,第二个任期达 27 年的埃米尔(达博之子,第四任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造成官职和资源进一步向埃米尔家族集中。索科托既没有足够的理由也不可能有能力罢免卡诺的埃米尔。这样,有资格担任公职的圈子愈来愈小(某个人只有父亲做过官他才有资格当官);被削除公职的代价是相对贫困,他本人及其后人和扈从失去社会地位。所以,"皇族"成员内部竞争非常激烈,导致 1893-1895 年激烈的内战。达官贵人集中在首都,既使贵族统治阶级的费用迅速增长(最初恐怕只有卡诺或扎里亚才承担得起),又使酋长国中心可能发生冲突的危险加剧。与此相比,19 世纪末,(1b)型国家(如贡贝和卡塔古姆)的内战则是要分裂。矛盾的是,在包奇,为了阻止离心反叛的发生,又不得不分散权力,但由于进一步削减在首都的埃米尔亲戚可担任的职权(经过一段时间的集权,有私人顾问和奴仆官员的宫廷政府变得比较强大),分权只能使他们对唯一留下的真正重要官职——埃米尔的竞争更加激烈。结果导致 1881-1882 年首都及其附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在卡齐纳,最初十分严格的以世袭为基础的集权制,公开军国主义化,愈益变成专制宫廷政府。这段历程中没有内部纷争,部分原因是边远地区一直有高度的自治,边区日益繁荣使首都官职不那么重要了。

以上只探讨了政府系统上层的情况。"基层"政府则比较一致(与西非其它地方相差无几)。最小的单位是家庭或营区,由地域或血缘关系决定而组成较大的单位。一般说来,游牧部族(图阿雷格人或富尔贝人)的血缘纽带比农耕部族的更起作用,结果保留了他们自己的领导人(ardo'en,或称 tambura)。他们的内聚力使他们在政治上比支离破碎的农耕部族更有力量,但是,这种相对于其余部族的优势并没有维持到 19 世纪下半叶。 576

在长期定居的较大城镇和村庄,行政区的代表由他们中的一位(称 maigari,magaji,dagaci 或 mukoshi)协调。这些地方代表与上级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络工作,由贾卡杜(jakadu)负责,他是分管该地区居民的官员的仆人或代理人。与此类似,官员与埃米尔之间的联系人

是信使。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征税，这既有政治意义又是经济行为。纳税是臣属的象征性行为，抗税则是反叛的标志。作为征税的一项必要工作，政府搜集政治情报，批准官员的任命；征收继承税，处理倒毙路途的陌生人的财产；组织力量逮捕罪犯或在逃奴隶，在民事案件中传唤被告人，安排释放错押或赎身之人；将棘手的案子交官员调解或请他们在埃米尔私人法庭对指控他们压迫的事件进行答复；战时负责征兵上阵。索科托、贡贝和包奇的官僚后裔保存下来的信函中，有一些关于19世纪末叶政府工作的记载。

社会结构

哈里发国社会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场社会，包括有官衔者和他们的亲戚、学者、受保护者及其家奴；二是非官场社会，包括农民，商人和各色各样的手工业者，与他们的奴隶构成哈里发国的经济台柱。二者之间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允许相向流动。特别是学者和奴隶同任何一方都有联系。但是学者的态度，譬如说，不是一致支持官场社会，他们从哈里发国的创建者谢赫乌斯曼·丹·福迪奥那里获得灵感，崇尚远离官场的虔敬理想。

577 官场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相对的稳定。这些人如果离开他们有权做官的酋长国，他们的权利却不能随之到移居地，虽然礼仪上他们仍可保留头衔。与此相比，平民则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酋长国迁到另一个酋长国，他们不堪忍受压迫时就会这样做。奴隶是不容易按照他们的意愿自由迁移而不被视为逃奴的；自由平民(talakawa，塔拉卡瓦)主宰了商业、运输和一切商旅行当，如有必要，他们随身带着奴隶做助手或脚夫。

官场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对家谱历代联姻及比较严格的父系继承原则十分关注。相反，平民百姓主要看面貌和特殊习惯面对某一特定地区和种族保持一般的认同感，他们不大注意家谱上的细节。虽然平民大多是子承父业，但与西非其它地方不同，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达官贵人的妻子被禁锢在深宅大院，维持有小妾和佣人的一夫多妻制家庭，普通人的妻子则没有这种限制，在哈里发国的大多数地方，妇女参加商务活动，生产用于销售的物品，并从事农业生产。

实际上，官场社会的人口比例是无法估算的。奴隶和自由人的比例，估计为1∶4到1∶2(但并不清楚这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总体上说，随着时间的延长，官场社会的奴隶数量很可能增长了，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地位也上升了，因为在埃米尔政府中忠实而政治上无竞争力的官员是公认有用处的。在农村地区，奴隶和自由人的比例变化还不得而知，但在19世纪，奴隶的数量大概增加，奴役俘虏是解决经常人手不足的办法，尤其是人烟稀疏的地区，如索科托，那里的酋长国建立在同以前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与此相似，在大草原地区，如包奇，需要人手耕地。目前还不清楚重新卖到大西洋海岸或北非出口的俘虏所占的比例，但是，对出口俘虏的限制措施是有效的，奴隶贸易本身在19世纪后半叶衰落了。[16]

[16] 关于索科托哈里发国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目前还没有深入细致的论著发表，但有几部论述某一地区和某一时期问题的论著。例如，关于卡诺，P. 希尔(Hill)，1977年，第13章；关于扎里亚，J.S. 霍根多恩(Hogendorn)，1977年；关于阿达马瓦，P. 伯纳姆(Burnham，J.L. 沃森(Watson)编，1980年；关于奴隶贸易的大致情况，D.C. 塔博(Tambo)，1976年。

奴隶被允许拥有财产，有时间为自己干活，还可望为自己赎身。奴隶主并没有足够的工作叫奴隶去做，于是让奴隶出租他们的劳动力。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即主人因满意奴隶所提供的服务或因欢庆某个节日或为某种成功而感谢真主时解放了奴隶。不知道自由民的人口数量，更不用说获释奴隶所占比例了。

女奴可同其他奴隶结婚生子，她们的孩子一般成为主人家里的成员，却仍保留奴隶身份。女奴也可以嫁给自由人，这样她们的孩子就有自由人身份，她们自己则在主人死后获得自由。由于王室男子在正式娶妻之前通常都先纳妾，长子大多并非嫡出。伊斯兰律令不像富尔贝牧民的习俗那样在继承权问题上区分嫡出和庶出。结果，许多埃米尔都是庶出，有一个小妾身份的母亲，对一个“真正的”埃米尔确是必备的资历，因为埃米尔不会受母系亲属的影响。伊斯兰律令也不承认西非通常对生而为奴和生而自由的奴隶的区别，前者作为奴隶的孩子，一般不卖到他们的出生地之外。虽然某些地区或某些阶级中仍有这种区别（豪萨人称 cucenawa，博尔诺和费赞也使用这一名称，与哈拉廷——非自由民同义），圣战时代改革派所承认的唯一正式的禁令，是禁止出口这些穆斯林奴隶，尤其是禁止出口到基督教国家。这就是说，奴隶天生不属于某一特定的家族，而属于整个伊斯兰社会。但是，这种变化也意味着奴隶变得更有销路，分布也更广。 578

奴隶不纳税。但与通常一道按照“甘都”(gandu)为家长干活的主人的儿子或妻子一样，奴隶把大约四分之三的劳动时间给了主人。可是与主人之子不同，他们无望继承也不能变成一家之主——他们永远是“儿子”。在国家或私家的奴隶村庄里，奴隶也有家室，由工头监督劳动。从外表看，这种居民点与自由人村寨并无二致。

如果说奴隶不纳税，那么许多奴隶主也是如此。什么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到底纳什么税尚不得而知。例如，索科托免征一种也被称为“哈拉吉”(haraji、<u>Kh</u>ara<u>dj</u>)的一般土地税(Kurdin kasa)。富拉尼牧民为他们的牧群缴纳一种叫“詹加利”(jangali)的税，有些地方官方称它为吉兹亚(<u>dj</u>izya)，又有的叫扎卡特(zakāt)。豪萨的农民每年每人交约 2500 贝壳(1850 年前后，卡诺)，而在扎里亚则交锄头税，(大概是因为扎里亚的妇女在农业劳动中起重要作用)；或许是同样的理由，卡诺的马古扎瓦人(豪萨的非穆斯林)的纳税率高些。另外，所有非穆斯林社团都纳较高的税，这是他们作为穆斯林国家臣民的部分义务。商人、某些工匠(如染工)和某些经济作物要纳税，实际上是旱季纳税。此外，在每年节日或哀悼日，还要进贡，此外还有施舍，军队过境时必须提供食物。显然要计算税率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税率变动幅度都很大。但如推测和概括一下，基本农业税在年收入中的比例似乎相当低，换算成劳役时间，或许整个农耕季节每周不过一天。 579

大小官僚主要是上缴继承税，继任官职时纳税，在埃米尔或哈里发就职时进贡。他们的收入来源，包括由他们征收的捐税，分享战利品和礼品，但日常开支可能主要是靠农场提供的盈余，这些农场是奴隶耕作的，有的属于官方，有的属于家族。

同有些国家相比，官场社会的消费并不十分奢侈。除车马和服饰外，财富最明显的标志是有多少“悠闲的”当班奴仆，分发多少施舍物。因此，需要大量的粮食，但除上等的香料、肉食、蜂蜜和柯拉果外，食物做得并不精细。即便是哈里发也没有贵重的办公设备，没有金制御座，没有皇冠或珍贵珠宝，甚至没有阿散蒂生产的棉布那样的奢侈品，素白是

公认的达官显贵的象征。

然而，财富的差距很大，不仅官僚家庭和平民之间，而且平民之间也是如此。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奴录在全部人口中的分布情况，有的农户(和一些奴仆)拥有上百个奴隶，奴隶价格低到多数家庭都能买上一两个。例如富尔贝牧人用奴隶帮助放牧，马古扎瓦人用奴隶做家务。但财富不是长久不变的，一笔赎金加上奴隶逃亡，可能在几年内毁了一个农耕家庭，如卡罗的巴巴就遭此厄运。[17] 商队也同样遭此损失。再者，一个家庭的儿子都能分享继承产业(一般富有的男人是妻妾成群，有许多儿子)，平民的资财极少能维系几代人的。最后，正如哈里发国创建者的作品以及学者们通俗的方言诗中所表明的那样，时代思潮对巨额财富的价值和消费持怀疑态度。

据此，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1)总的说来对自由人征税的水平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对奴隶生产品的征税要重得多，但也没有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恐怕不多于儿子交给父亲的“甘都”(gandu)的数量。

(2)官僚家庭的消费水平比较低，虽然某些地区(如索科托)消费者的人数可能很多。

580

(3)哈里发国的人口比较稠密(与前几个世纪相比)，收税人和纳税人的比例总的说来相当低，众多的人口每人纳一点税即可积累成一笔可观的数字，不仅足以维持政府机构的开销，而且在财政上支持了哈里发国社会特有的各种引人注目的消费。

(4)最后，虽然远程贸易不是岁入的主要来源，出口俘虏却是弥补岁入潜在的巨额收入。贩卖奴隶出口的商人对俘虏的需求，并不妨碍哈里发国境内许多战俘居留点的建立。此外，哈里发国没有其它国家那样的垄断(如对黄金、盐矿或可拉果、油棕榈等作物的垄断)，也没有对贸易、交通和唯一“入口港”的垄断。笔者认为，它甚至缺乏对武力的垄断。如果在此对哈里发国经济的大致分析——以低度剥削和控制为特点——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潜在财富余额和劳动时间来创造19世纪后半叶哈里发国内贸易与生产的空前繁荣。

这种发展的经济基础在于哈里发国领导下修筑的农业基础设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基础，原因在于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最初是奴役俘虏的形式。多年来，新的定居者修筑了良好的排灌系统，进行作物轮种，靠拥有的牲畜施肥，土地得到清理，地力也增强了。牲口过境的道路用篱笆隔离起来，就近打井以免运水之劳，有新围墙的营寨(ribāṭ)使居民受到更好的保护。农业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劳动时间有了精心安排，鼓励个体生产已成常规，铁制品十分充足，可以设计出各种农具，广泛用于专门耕作。索科托引进了使用桔槔提水的灌溉技术，还有一项技术革新——小型甜菜种植园和制糖厂(像是巴西的方式)。笔者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改进，经济作物如棉花、洋葱或花生(加工制成点心)的种植面积可能扩大了，同时促进了手工业者的生产，还使农民逐渐扩大了运输和买卖业务。虽然这些改进的

⑰ M. 史密斯，1954年。巴巴当然指1880年以后发生的事件。

证据和具体时间尚未肯定，哈里发国初期对农业的巨大投资也是不容易略的。

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变迁：1820-1880 年

本章中多次提到发展趋势和过程，概括一下这些变化或许是有益的。下面将 1820-1880 年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1820-1845 年，建立阶段；1845-1855 年，不平静的过渡年代；1855-1880 年，经济扩张时期。 581

1820-1845 年

这一阶段有两个基本的需要。首先要防止那些在哈里发国建立过程中战败或流亡的人反攻。其次，不仅要重建战乱之后被毁坏的农业经济，而且还要在临时农业和军事拓居点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工作，对许多居民来说，这种工作是以前没有经验的。

要取得成功，领导人就需有感召力，还需有一种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某些人来源于穆斯林共同的信仰，而对另一些人说来，则来自身为富尔贝人共有的自豪。此外还有一种紧迫感，一方面由于他们感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方面也由于这时期一些酋长国的生活状况不安宁。

这一时期的历史往往是军事编年史，记载某个营寨的建立，某个城镇的降服，以及关于死亡人数或俘虏人数的报告。但与瘟疫流行、蝗虫成灾和饥馑不断的“圣战”时代相对照，这是一个没有饥荒的时期。在此期间，内部政治安定，政府略具雏形，设置了官职(沿用豪萨旧官衔)，官员们的来历和特点知之甚少。

这时期的卡诺、扎里亚和卡齐纳是突出的例外，它们原封不动地沿用前豪萨国家发达的基础结构。然而，与博尔诺以及北方图阿雷格人和豪萨的敌对行动，影响了它们的商业活动。卡诺和扎里亚的埃米尔易人(卡诺在 1819 年，扎里亚在 1821 年)，结果导致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扎里亚虽曾受到暴力的威胁，这一变革还是和平进行的。在卡诺，埃米尔不得不镇压他所重用的“加拉迪马”(galadima)发动的普遍的反叛，此外，他还不得不驱逐最后做了卡扎乌雷的埃米尔的穆斯林领袖 A. 通库。

到这时期末，大多数酋长国已牢固建立起来，明显的例外是努佩，各地首府也已成立(只有哈代贾例外)。据在尼日尔河流域的欧洲人报道，尽管努佩局势不稳，有些通货膨胀，但商业还是得到很好的发展。哈里发政府积极干预扎里亚内政官员的任命，而边境地区在 1840 年前后已大大排除了外来威胁。

这时期的思想史，可以在哈里发穆罕默德·贝洛用阿拉伯文撰写的一系列著作、诗歌和信件中看到基本的脉络，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涉及宪政训示、神秘主义和医学。但他并非唯一的撰写人，他的大臣基达多写过史书，他的姐姐阿斯马写过诗歌，他的家人或谢赫的学生也写了许多作品。廷巴克图的昆塔谢赫和卡姆尔·丁曾经来访并交换信件和诗歌，重视卡迪里教派的联系。哈吉吉·奥马尔也曾来访，他介绍了提加尼教派，并在逗留索科托的八年间赢得了当地和其它地方一些学者的信任。整个这一时期，学术活动的发展仍源自 582

圣战的灵感，学者们在多数酋长国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诺的埃米尔易卜拉欣·达博或许是一个典型，他挤出时间撰写一部关于神秘主义习俗的著作，他非常讲求实际，经哈里发穆罕默德·贝洛允许，重新采用圣战前豪萨的某些象征和习俗，借以表明自己是豪萨臣民的实际统治者。然而，最重要的是城镇和乡村教育的发展。有人推算1920年约有40,000名“马拉姆”，因此可以肯定1900年移民之前会更多(但19世纪的数字不得而知)，我们知道，圣战期间大量的学者和学生死亡，不仅因为战争，也由于疾病流行和饥馑。[18] 如果说，教育得以发展的一个因素是女教师在大家庭里进行初级阶段的古兰经教育，另一个因素则是教科书的广泛流传，因当时纸张供应得到改善，成本降低。

1845-1855年

这十年是巨大变革的酝酿期或分水岭，在此期间，根据伊斯兰原则建设稳定国家的努力暂时成了问题。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老龄化。到19世纪40年代，领导圣战的改革派人士年岁已高，一个接一个去世，或在担任30年左右的领导职务后隐退了。例如贡贝的布巴·耶罗(1841年)，索科托的阿蒂库(1842年)，包奇的雅库布(1845年)，哈代贾的桑博(1845年)，卡塔古姆的A. 卡瓦(1846年)，卡诺的易卜拉欣·达博(1846年)，阿达马瓦(福姆比纳)的阿达马(1848年)。东部各国受影响特别大，1844-1848年西部亚乌里的埃米尔政权被彻底推翻，努佩的一个雇佣将军取而代之(1847-1856年)。

583　军事上又出现了危险和挫折。1843-1844年间，西卡齐纳发生了由马拉迪的流亡者卡齐纳瓦领导的大规模叛乱，但是，六个酋长国的联合部队平息了叛乱；卡齐纳的埃米尔对反叛地区进行严厉惩罚，哈里发只得将他革职。还有两次更加严重的骚乱，一次是1849-1854年间威胁索科托和关图的将近六年的扎伯马-克比-戈比尔起义，另一次是布哈里在哈代贾的反叛，他击败了索科托的部队。哈代贾在大约15年间坚持自治(1848-1863年)，随后广大地区发生劫掠和饥荒，全部居民沦为奴隶。数十年来卡诺发生过一次饥荒(1847年)，布海里的战争使东卡诺的粮荒持续了几年。

最后，这十年中还出现了移民的思想和宗教运动。1845年哈吉吉·奥马尔的著作发表，对有关提加尼兄弟会的争论犹如火上浇油，特别是哈里发穆罕默德·贝洛对该教派的关注，它使索科托的大臣们长期争辩不休。[19] 约在1850年，关图埃米尔的首席大臣莫迪博·拉吉(从圣战时代起就有盛誉的学者)挂冠而去，他公开表明先前忠于提加尼教派，并向东迁移到阿达马瓦。卡诺的其他人加入他的行列，扎里亚也成了提加尼派学者聚集之地。马拉瓦“王族”支持提加尼派，可是19世纪扎里亚唯一的提加尼派的埃米尔西迪·阿卜杜勒·卡迪尔上任九个月后被废黜(1854年12月)。或许与这个运动有关(或混为一谈)，马拉姆·哈

---

⑱ 1921年的人口普查把34,903名马拉姆统计为“教师”，大约46,000人归入马拉姆职业——当然，这两者有重合的部分，对这些统计数字要认真分析。见C.K. 米克(Meek)，1925年，第2卷，第218、226、256-257页。

⑲ 乌马尔·富蒂('Umar al-Futi)，1845年。关于这场大辩论，见M. 拉斯特，1967年a，第215-219页。关于哈吉吉·奥马尔的生平，J.R. 威利斯(Willis)，1970年，所论述多少有些歧异，另见O. 贾赫(Jah)，1973年。

姆扎和 15 名学者退出卡诺以示抗议，他们最后在宁吉定居，组成一国并成功地袭击了卡诺和包奇。另一个肯定与东卡诺的经济状况有关的事件发生于 1855 年前后，易卜拉欣·谢里夫·丁所召集的大批来自卡诺和东部各邦的人民组织了马赫迪派的东迁运动，最后在巴吉尔米遭到大屠杀。







图片 22.2 1870 年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搜集的豪萨工艺品

尽管有这些变化，也还存在一些稳定因素。首先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制度的稳定性。哈里发国有两位高级领导人：关图的埃米尔哈利勒（1833-1858 年，1849 年退出军事活动）和年轻的哈里发阿利·贝洛（1842-1859 年），他们一直在位，东部各酋长国许多新上任的年轻官员也是如此。我们从旅行家海恩里希·巴思的日记里得到有关当时大致情况的异常丰富的材料，他在此地区逗留了大约四年（1851-1855 年）。他谈到社会不安定，但没有上述一系列

变革中可能提到的混乱状况。当时在道腊和达马加拉姆交界地被掠为奴的多鲁古(豪萨人，
584 巴思的仆从)却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偷袭和饥馑对农民家庭生活的影响。[20]

如果把这个过渡时期说成是哈里发国及其敌国(如博尔诺或马拉迪)的权力从一代人转移到下一代人手中，这恐怕是过于简单化了。在边界两侧，1855 年前后在任的大多数埃米尔往后又执政 15 至 20 年，实际上他们一同构成了新的一代。值得注意的是，在 19 世纪末迅速变革的还有其它国家，哈里发国及其邻国在 1850 年前后不是单独经历重大变革的，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埃及、法国、奥地利、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发生变革，哈里发国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个年代最重要的特征是思想的动荡，似乎人们在国家本身的崇高意义上对国家的合法性也产生了怀疑。确切地说，为什么思想的动荡公开化了，哈里发国学术界对此有何反应，都有待于深入详细的研究。但是，至少争论的性质和争论者使部分文献资料得以保存下来。我认为这十年间学术界已分道扬镳，有的人永远离弃政府，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伊斯兰政府。50 年后，基督教殖民统治降临时，类似的问题又造成类似的分歧，争论点更加明显了。

1855-1880 年

此前十年最显著的成果是哈里发国和它的许多反对者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政策。1863 年，反叛的埃米尔布哈里去世，哈代贾自动回到哈里发国的怀抱甚至努佩的内战到 1859 年也结束了。努佩第一次成为稳定的政治实体，但付出了代价，其北部出现了一个新酋长国孔塔戈拉，它是由亚乌里、努佩和扎里亚接壤的地方分离出来的。孔塔戈拉吸引了许多有“王族”血统的无拘无束的冒险家，他们的野心在业已建立的酋长国框架内得不到满足。其它地区也吸引这样的冒险家，最有名的是南扎里亚-包奇边境地区和东部阿达马瓦的半自治酋长国。并非所有的移民都是香客，但也不全是武士。哈里发国的流动人口，无论是内部流动的还是跨越边境的，这时已不仅从军，而且从事搬运业和贸易，搜寻象牙，随后还开发橡胶业。所有这些人不管出身如何，通常都称“豪萨”人，这名称标志着他们不属于某一种族集团，而是属于哈里发国的广大社会，这个社会有着四处移动的复杂的经济
585 活动和通用的混合语。[21]

在各酋长国的历史上，这时代有两个特点。首先，这地区比较和平稳定。虽然仍有偷袭和攻击事件，但都不是可能造成严重威胁的入侵，更不可能推翻哈里发国。同样，埃米尔们仍在发动战役，但总是造成僵局。哈里发国的对手们建立了自己的稳定的政治制度。直到 1880 年后，危机再度出现。

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哈里发国的经济扩张。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新地区设立定居点，建立新村庄，继续迁人劳动力(自由人或俘虏)；(2)在主要商路上和大宗贸易中，以豪萨为基地的商人和运输业者日益增加，这表明商人从其它地方转移到豪萨城镇；(3)“豪

---

⑳ H. 巴思(Barth)，1857 年。多鲁古自传，见 A. H. M. 科克·格林和 P. 纽曼(编)，1971 年，第 29-101 页。

㉑ 关于散居在外的豪萨人的情况，见 M. 阿达姆(Adamu)，1978 年。

萨”商人向远离哈里发国边疆的新地区扩张，作为通货的贝壳在新地区流通；(4)越来越多的制成品(布匹和其它商品)出口到西苏丹其它地区，象牙或树脂黄油等物资远销欧洲，大众奢侈品(柯拉果和欧洲各种产品)进口增多。不仅生产过程而且运输业和包装业对人手的额外需求，看来都容易满足，例如，据迈克尔·梅森计算，装 25 吨树脂黄油要用 1500 个罐，而 1871-1878 年八年间努佩出口的油已从 120 吨增加到 1500 吨。[22]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相伴而来。但是，关于通货膨胀的社会后果及其实际情况，都不知其详，各地的差别就更不用说了。马里恩·约翰逊提供的汇率表说明，大约在 1855-1890 年间，一个银元原来可换 2500 个贝壳，后来贝壳贬值，一个银元可换 5000 个贝壳。[23] 据 M.G. 史密斯提供的数字，税收似乎以同等速度增长，而根据巴思及后来的旅行者提供的价格情况，富裕家庭的消费增长速度至少两倍于此。[24] 如果这个大趋势没有说错，它就意味着那些不能分享国家岁入、不能出口俘虏或不能从事专门远程贸易的中等收入的“绅士”渐渐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到直接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奴隶或自由人)的水平，而后者还可能从通货膨胀中得到些许好处。这样的发展加剧了官职的竞争，同时使潜伏在哈里发国内的千年盛世的思想高涨起来，引发了成为 19 世纪最后 20 年显著标志的移民运动和内部冲突。这些危机使哈里发国后期的基本问题更加明显：虽然经济在衰退，大小官吏和他们的亲戚、侍从的数量和欲望仍有增无已。 586 587

这时期文化方面重要的发展，在于豪萨文逐渐取代阿拉伯文或富尔贝文，豪萨文普遍用于书籍和诗歌创作。谢赫家族成员把早年圣战的诗歌翻译出来，这表明他们意识到广大群众需要了解圣战时代改革派的思想和作品，而对群众说来，阿拉伯手稿中的豪萨文比阿拉伯文更容易理解。[25] 比之前几个时代原始作品较少，或者说保留下来的较少。此外，有迹象表明，阿达马瓦政府和学者之间关系紧张，官方试图控制学者讲授的作品——这大概是针对提加尼派学者的。但是新任埃米尔桑达取消了这个禁令，他把学者吸收进他的枢密院。当伊斯兰纪元 13 世纪(AH1300＝1883 年)行将结束时，人们盼望千年盛世的来临，然而直到 1883 年前后，政治上仍无起色。当时利曼·亚穆萨统治着卡诺，吉布里尔·盖尼统治着博尔诺边境，谢赫的重孙霍亚图统治着阿达马瓦。其它地方是平静的，据说西边有人要迁往东部加入计划中的最终朝圣行列。可事实上直到 1903 年，朝圣仍未实现。

博尔诺，1820-1880 年

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历史与它的对手及邻国的历史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哈里发国影响其邻近小国采用了能够对付外来压力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多半是穆斯林国家政治制度

[22] M. 梅森(Mason)，1970 年，第 3 章。关于布匹，见 P. 谢伊(Shea)，1974 年、1977 年。

[23] M. 约翰逊(Johnson)，1970 年。

[24] 确实很难对特定集团生活费用上升的情况进行评估。据 1857 年 H. 巴思提供的资料，重现“一篮子”商品的价格是可能的，而 80-90 年代旅行家的记录就不太全而和准确了，参见 P. 斯托丁格(Staudinger)，1889 年；P.L. 蒙泰尔(Monteil)，1895 年；C.H. 罗宾逊(Robinson)，1896 年。较大的地区和季节性的价格涨落情况，或许由于蒙泰尔的随员较多和罗宾逊遇上卡诺的内战而估计过高，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关于卡诺，见 M.G. 史密斯(即将出版)。

[25] 关于翻译热潮，见 B. 赛义德(Sa'id)，1978 年。

的翻版。在先前没有统一组织的社会里出现了首领或“大人物”，但这些社会所包括的许多民族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也许永远不会重视。以哈里发国为震中的地震波，在远离边疆的地方也能感觉到，因为要支付袭击事件后议定的赔偿，或者哈里发国强迫弱小邻国进贡。这并非单纯的战争关系。尽管涉及的人口不多、经济规模也小，但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商业交往。同过去别的大国一样，哈里发国的贸易业越过边疆渗透、扩大并改变了商路。



图片 22.3　谢赫穆罕默德·阿明·卡纳米

确实，“边疆”这个词难以应用，它似乎更多涉及征税权而非对活动的限制。“敌人”也是一个难下定义之词。比方说，卡齐纳的埃米尔西迪库击败了马拉迪人的入侵，后来，他 588 因为对马拉迪的盟友惩罚太苛刻而被索科托废黜，竟然到马拉迪寻求保护，并与马拉迪人一起侵略索科托的属国赞法腊。最后，他回到索科托隐退了。反叛某酋长国的人在毗邻的酋长国避难而不会引起两国的摩擦，这是常事。还有豪萨商人在战争中向敌人提供给养，跟着进攻部队，卖给他们武器和马匹以换取战俘，这也并非罕见。

简言之，基于地方民族主义或种族同源的意识，有时可以理顺族群之间的关系而不会使之互相隔离。这样，哈里发国与周边国家及其人民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区域，毫不足怪，在此区域内，一国的政治事件几乎立即会在另一国引起反响，这些事件的范围和时间大致相近。

博尔诺的历史为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例证。博尔诺是哈里发国最强大的对手和邻国，它原有的霸主地位已由哈里发国所取代；一国的政治发展对另一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与哈里发国形成明显的对比，博尔诺代表着谢赫乌斯曼一度曾想选择的另一条发展道路。

谢赫乌斯曼·丹·福迪奥领导的圣战的详细情况及其对博尔诺的直接影响并不在本章探讨范围之内。[26] 这里只提一句，博尔诺国家从来抵制对其人民的进攻，结果暂时让“圣战者”(mudja hidūn)占了首都，永远失去了大片领土。为了抵挡思想渗透和军事进攻，博尔诺的玛伊(mai)采取了类似索科托使用的对策：请出一位有声望的熟悉地中海各国政治并与费赞关系密切的谢赫、学者哈吉吉·穆罕默德·阿明·卡纳米，他与当地舒瓦的阿拉伯牧民有联系，并在卡嫩布人中有他私人的追随者。总之，他能维持与“费拉塔”改革派相对立的既有的国际秩序。

在卡纳米取得几次军事胜利后，玛伊任命他为恩古诺地区的半自治首领——类似恩古鲁传统的“加拉迪马”(galadima)。他没有接受或由博尔诺封给正式官衔，但后来有份记录中称他为瓦兹里(waziri)，这意味着他不仅接受了博尔诺的政治制度，而且臣服于它。[27] 再者，他集军事指挥权和领土控制权于一身，权力比所有前任都大。卡纳米比玛伊本人更加负责守卫自己的疆土，他任命自己的奴仆统治城镇，同时把他势力范围内以前的半自治酋 590 长置于他直接统治之下，从而扩大了他的领地。他还在总部附近布置一支卡嫩布人梭镖手组成的常备军，又派一些奴隶指挥官(相当于索科托的“穆拉比屯”，murābitūn)到边疆驻防。他的枢密院大约由六位友人组成(其中有自幼年时就相识的)。原先他控制的地方较小，人口稀少，几乎没有岁入，因此他更依赖商业和俘虏的出口，同时鼓励各族群移民到他的采邑居住。他没有庞大的朝廷，他的奴隶官员也没有扩大他们的家族，他们对他无限忠诚，又少花经费。

相反，玛伊虽保持了他的朝廷，但领土已缩减不少，仍要维持宫廷和供养官吏。此外，

---

[26] 有关圣战的某些细节，见L. 布伦纳(Brenner)，1973年，第26-47页。当代主要著作，见M. 贝洛(Bello)，1951年或1964年。

[27] 参见H.R. 帕尔默(Palmer)翻译的文件，1928年，第2卷，第119页；当时杜纳马重新任“玛伊”，恩吉列罗马“被废”。

他没能或没有接管在他势力范围内的半自治的酋长领地，如马尔特。然而，他的确从他的王朝继承王位的权利及其延续性所带来的安定与认同意识中得到传统的权力。

第一阶段（1820-1845年）：博尔诺的两头政治

1820年，博尔诺国家完全分成为两个政治区域（有时相互重叠）：驻在库卡瓦的谢赫卡纳米和他的顾问们将领土向南方、东方、西方扩展，驻于比尔尼-卡费拉的玛伊及其朝臣控制着博尔诺其余的地方。1820年，即使是非正式的，卡纳米的地位大为加强。玛伊杜纳马在进攻巴吉尔米的战斗中阵亡，他年幼的儿子易卜拉欣在卡纳米的监督下继位。此后，卡纳米享有谢赫的头衔，在他的御玺上他以AH1235（公元1819-1820年）作为登基之年，或许他认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在撰写博尔诺的历史时，习惯上似乎认为从这时起卡纳米就握有最高权力。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证据不足，它部分是依据两名英国使节（德纳姆和克拉珀顿）的见闻记录。[28]他们的报导过于偏袒卡纳米，反对玛伊易卜拉欣，因而很少有人认为它是严肃客观的政治分析。[29]德纳姆是卡纳米的贵宾，又是北非商人的朋友，经常出入卡纳米宫廷，与卡纳米有协议的的黎波里公使曾保护他周游旅行，难怪他对玛伊有偏见，他很少访问玛伊朝廷，知之甚少。

其实，卡纳米在早期已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只不过那时情况还不十分明朗。德纳姆在那里的时候，玛伊易卜拉欣仍维持着一个庞大的朝廷，早朝官员多达260-300人，其中许多人将成为拥有自己部属的领主。同别的领主一样，卡纳米不得不上缴自己从采邑获得的部分岁入——德纳姆说是一半。在继续支持玛伊的集团中，有的特别怨恨后来的移民（如苏古尔蒂-卡嫩布人、布莱克-舒瓦人，也有著名学者，如耶尔加鲁阿的M.阿卜杜拉、曼加的M.法纳米）。预料传统的官吏（如加拉迪马或马尔特马）会反对卡纳米权力的膨胀。支持玛伊的集团可能还有卡努里部落，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奇马吉利贝”（chima jilibe），从已经发表的历史文献来看，还不清楚早年这些部落领导人是否仍由玛伊委任，是否对他忠诚。同样，卡纳米委任各地方领导人“奇马奇迪贝”（chima chidibe）的迅速程度也不清楚。人们后来抱怨“舒瓦统治”的扩张（1842年扩张到加济尔省），这表明任命不一定很迅速，也不彻底。的确，地方官员和部落社会官员之间权力的划分很容易就采取了笔者所说的某种双头政治方式。虽然我们不知道奇马等官员驻在比尔-尼卡费拉的玛伊宫廷的详情，但我认为下面的假定是成立的：大多数“卡努里贵族”呆在比尔-尼卡费拉，而同时他们也派年轻的亲属驻在库卡瓦。

592

---

[28] D.德纳姆（Denham）和H.克拉珀顿（Clapperton），1826年。

[29] L.布伦纳，1973年，第21-22、46-47页，摘录德纳姆和克拉珀顿报告中有关卡纳米和玛伊易卜拉欣的段落，澄清了他们的偏见。本节多数资料来自布伦纳的研究和J.E.拉弗斯（1977年，第7卷，第45-71页）。很感谢拉弗斯对本节的意见，当然，他并不同意我这里所有的解释。



图片22.4 谢赫卡纳米手下的卡嫩布族投枪手

如果我们假定，玛伊易卜拉欣并非德纳姆所描述的可笑人物，而是一个依然强大的朝廷的首脑，那么卡纳米的活动就更加有意义。他是“最高加拉迪马”（即总督），不仅受权管理西南边疆（加拉迪马负责西部），而且还管辖南部边疆。他有权建立军队，又负责管理博尔诺的北非人，处理有关外交事务。1824-1830年，他对西面的政策与其说是进攻哈里发帝国，毋宁说是在恩古德里重新建立“加拉迪马”无权过问的西博尔诺。卡纳米的西博尔诺或许应包括索科托以东的几个酋长国（如果不包括卡诺的话），但他未能成功。然而，他成功地把索科托的追随者穆罕默德·曼加驱逐出境，渗透到远至卡诺的边疆地区，显示了博尔诺的军事实力。他还帮助重建受荫庇的国家古梅尔，击败曼加人后把他们争取过来。这样，四面被围的“加拉迪马”逃往索科托，但又回来屈服于卡纳米，接受一块小得多的领土。因此，到1830年，卡纳米建成了他自己的西博尔诺国家，由奴隶出身的“卡切拉斯”（kachellas）治理，其中包括的许多族群对玛伊没有任何明显的效忠。

与这个西部“附属国”并存的是南部类似的一个地区，主要包括科托科的城镇和巴吉尔米边界地带，也由奴隶出身的官员统治。最初，1818-1824年，卡纳米曾试图在北非的帮助下，对卡奈姆建立一个大东南保护国(以巴吉尔米为仆从国)，但后来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扩张领土的边疆战争当然从比尔尼-卡费拉调集由自由人组成的骑兵队，同样的机会也引来了

593 索科托派到扎里亚或包奇作战的自由骑士志愿部队。当时，乍得湖东边的大多数正统的博尔诺人，仍然臣服于正统的卡努里政权，对玛伊表示效忠。

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两头政治运行不利，玛伊控制着卡努里-博尔诺的大部分人口，从当地获得岁人；卡纳米则掌管西面和南面边境地区，雇佣博尔诺骑兵，交出岁入中玛伊应得的份额。卡纳米并不企求胜过玛伊朝廷。的确，在某些方面，他们遵循着传统的皇家城市的古老模式，与严格的穆斯林商业城镇(及其中的外国人住所)相隔若干英里。在德纳姆和他的朋友那样的外国人眼中，库卡瓦似乎是一切活动的中心。

有关玛伊易卜拉欣朝廷活动的资料非常之少，因为王朝覆灭时(1846年)很少保存下来。哈吉吉·奥马尔在出访博尔诺期间，曾使玛伊家庭的一名重要成员皈依提加尼教派，因而引起玛伊或卡纳米的敌意——不知究竟是谁，不过通常认为是后者。[30]

笔者认为玛伊和卡纳米之间两头政治安排得当的原因之一，是卡纳米显然没有独断专行或野心勃勃。卡纳米似乎没有建设新博尔诺的远见。他的著作或函件中没有改革的设想。他没有索科托领导人那种对千年盛世的期盼或紧迫的义务感，也不曾把有类似使命感的人吸引到他的周围。他对自已继续留在博尔诺的理由缺乏自信；他的兴趣并不狭隘，他的忠诚也非“部落式”的。与索科托相比较，卡纳米没有一套思想体系，缺乏信心，没有能激发思想的动力。博尔诺也没有赞美“烈士”的诗歌。至于说他打破了玛伊独受尊崇的局面，除了对他个人效忠，共同反对索科托的“费拉塔”(富尔贝人)，以及作为更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的一员而应承担义务外，卡纳米无意取代玛伊。卡纳米可以利用玛伊政权来团结博尔诺人，这种制度比局部利益重要得多。同样，玛伊也能有效地利用卡纳米，因为他没有改革派那种可能毁灭守旧的博尔诺的热情。即便希望如此，卡纳米大概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来推翻玛伊，只要他依赖玛伊来维持博尔诺的团结，也就不能推进任何实质性的改革。19世纪30年代他派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使(这意味着他否认玛伊任哈里发的传统权利)似乎也没有改变上述情况。直到这个国家既无法支配其传统制度，又没有强烈的思想信仰时，博尔诺才真

594 正面临危机；这时(而不是此前)，对博尔诺进行政治分析才能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来说明，把个人优势看做主要的政治因素。

玛伊易卜拉欣和卡纳米的相互依存，后来证明，主要是私人关系。1837年卡纳米去世后，就玛伊和谢赫的关系问题重开谈判，有证据表明，是卡纳米的三个顾问，而非他的儿子奥马尔没有按原先向玛伊提出的条款进行谈判。笔者认为，玛伊颇有君子风范，他招来奥马尔，让他继任其父职位；相反，库卡瓦的顾问们则威胁说，如果玛伊不对新谢赫表示敬意，就要进攻比尔尼-卡费拉。据报，在此之前玛伊没有因此出访库卡瓦，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但结果是新谢赫对玛伊表现不恭，恶语相加，上缴玛伊的赋税也比他的父亲要少。

---

[30] 见U.纳卡尔(al-Naqar)，1972年，第72-74、144页。

这样，奥马尔的顾问们破坏了近20年来与玛伊合作的关系，最后他们也为此丧命。卡纳米年岁最大的顾问哈吉吉·苏达尼本想支持奥马尔的兄弟阿卜杜勒·拉赫曼出任谢赫之职，他因此付出了性命。奥马尔继任后，不仅与玛伊易卜拉欣相对抗，而且最终与他的兄弟反目为仇。

博尔诺：1845-1855年的过渡期

如果说1845-1855年是索科托哈里发国的艰难岁月，相比而言，博尔诺经历的阵痛更重，不仅有外来的侵略，有内战和屠杀，还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玛伊的职位被废除，他的朝廷解散了，谢赫特有的朴素的宫廷连同它特殊的国际联系也消失了。奥马尔把玛伊和谢赫两个职位合为一体，建立起一种既不同于以前博尔诺的政权也不同于索科托哈里发国的新型政治制度。

下面扼要叙述这10年中发生的事情。由于玛伊易卜拉欣的传统权威受到严峻的挑战，1846年，他怂恿瓦代的素丹出兵博尔诺。这样，他重蹈27年前他父亲的覆辙，当时杜纳马邀请巴吉尔米的素丹出兵消灭卡纳米政权，结果自己送命。在抵抗瓦代军队入侵的战斗中，奥马尔的两名顾问官——M. 提拉布和艾哈迈德·戈尼米阵亡。战后，奥马尔把玛伊易卜拉欣送上绞架，随后又击败并处死了他的继任者玛伊阿里。

新大臣哈吉吉·巴希尔取代阿卜杜勒·拉赫曼，成为谢赫奥马尔的心腹。1853年，阿卜杜勒·拉赫曼强迫奥马尔下台，并处死巴希尔；第二年，阿卜杜勒·拉赫曼被废黜和处死。奥马尔重新执政，他死于1881年，维持统治26年之久。

笔者认为，这十年对索科托哈里发国和博尔诺都是关键时期，并非巧合。当然，两国都曾卷入圣战，年岁相近的人登上了权力宝座，因此，权力继承问题同样影响这两个国家。然而，哈里发国对博尔诺的压力减轻了：思想方面，40年代的哈里发国更关注千年盛世的朝圣和提加尼教派，不再关心圣战；军事形势缓和下来，尽管边界地区不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或许可以说，正是外部形势的缓和使内部纷争表面化：库卡瓦的朝廷不再需要玛伊作为博尔诺团结的象征，甚至库卡瓦内部也不需要团结了。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博尔诺内战鼓励布哈里反叛索科托；博尔诺西部边疆的混乱使巴希尔张狂，阿卜杜勒·拉赫曼冒险废黜奥马尔。民众方面，这十年中一系列事件的影响表现在他们对倡导千年盛世的易卜拉欣·谢里夫·丁的支持(1856年他远游东土时途经博尔诺)。然而，这些事件的重要方面表明，两国都无力或不愿利用对方的混乱局势，1855年之后迅速回到正常状态。 595

第二阶段(1855-1880年)：博尔诺谢赫王国

第二阶段的博尔诺可以说是个统一的国家。虽然奥马尔保留谢赫称号，首都仍设在库卡瓦，但他的朝廷已经扩大，他已成为一个合法的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作为新体制的一部分，他任命了一位首席大臣，授予他相当大的权限，但是谢赫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有他选择的人受权代表他。同以前一样，朝廷由谢赫家族成员、自由的知名人士和奴隶出身的官员组成(卡纳米的顾问的名称也作为新头衔保留下来)，还有一支约3000人组成的王家

奴隶军队，奴隶官员比过去权势更大(当然他们仍完全依赖谢赫的恩宠)。奴隶的子嗣偶尔也能继承父亲的位置，可他们不属于有权获取特定官职或财富的门第。因此，政府中奴隶官员的增加影响到寻求肥缺的自由候选者的选举过程，有世袭头衔的自由知名人士不一定能执掌某一部门或握有权力。结果，时间越长，越不能维持正常的"权力制衡"，原以自身权力为基础的传统的权贵家族消失了，许多情况表明，最有权势者并没有正式的官衔。而在以谢赫为首的靠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形成的统治集团中，晋升职位只能通过保护关系。与索科托相比，竞争公开化，不受与生俱来的权利或等级的限制。

596 如果用庇护与被庇护关系来分析博尔诺政治是正确的(如R.科恩和L.布伦纳的分析)，那就可以说，这种制度起源于卡纳米早期政府任用奴隶和少数朋友的办法。[80]由于国家在服从谁的问题上有分歧，古老的家族或许追随玛伊，谢赫没有接管原来世袭制的政府；1846-1854年内乱频仍，卡纳米的顾问官纷纷被杀，发展进程中断了。1846年后，玛伊政府成员也信誉扫地。那时，谢赫奥马尔已很难利用别的政治整治形式。因此，若是把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看做博尔诺沿袭已久的制度，或者看做19世纪早期的统治制度，恐怕就弄错了时代。起初，卡纳米的顾问们也不是受他的保护，而是他的合作伙伴，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所以他们在卡纳米死后的一些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大臣统治集团仍有可能发展。总之，笔者认为1845-1855年后发生了显著的政治变革，不过也容易把卡纳米任命奴隶官员的原则简单地扩展到整个政治结构中来。

与上述政治趋向同样重要的是支撑政治结构的经济上的变革。如前所述，这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哈里发国贸易与生产的扩展，边疆空闲土地得到垦殖，"豪萨"商人远远推进到边界外的地区。在这种形势下，不仅以豪萨为基地的商人来到博尔诺，而且越来越多的以博尔诺为基地的商人把他们的业务重心转移到豪萨兰。两国之间政治与思想关系的缓和使一切成为可能；的确，从长期以来博尔诺对西部贸易的历史背景看，19世纪早些时候的禁运不过是例外情况而已。当然，在同哈里发国商业中心的竞争中，博尔诺提供的商品似乎愈来愈少。过去大宗出口的商品泡碱(纯碱)继续外销，但也可能受到其它地方别种盐的剧烈竞争。另一种大宗出口的商品是奴隶，看来逐渐减少了，虽然在博尔诺工作的战俘可能增多了，但是，博尔诺经济的生产基础似乎没有与哈里发国同步扩展。其它出口或再出口的商品，如兽皮、毛皮、象牙或鸵鸟羽绒，也要经过豪萨的商路，新的供货来源(如阿达马瓦的象牙)也得在哈里发国的保护下寻找。简言之，博尔诺似乎是以原材料供应商和奢侈品消费者的身份参与哈里发国经济的，当权者得到的利益也比从前少了。到1850年，博尔诺最终成为西非贝壳通货区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便是上述经济变化的象征；另一个问题是商人在首都讨债遇到困

597 难——或许是商品销售额不足以应付经常性开支——北非商人到博尔诺做生意谨慎起来。在卡纳米的政策中，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占有重要地位，为此，19世纪40年代博尔诺曾重新控制主要进口港津德尔。然而，这个优势地位在与哈里发国的经济竞争中已不再是强有力的武器。

如果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宫廷中奴隶出身的和有自由人身份的官员增多，奢侈品

[80] L.布伦纳和R.科恩，1974年，第109-10页；1988年。

价格上涨，为出口生产的基础薄弱，博尔诺作为主要商业中心的地位下降——偿付商业债务的困难就不足怪了；1883年，博尔诺甚至必须对每个纳税人征收其一半财产的重税。如果说这次征收反映了纳税人无力支付年税，可以推测当时农村几乎无力生产剩余产品。然而，我们对1855-1880年农村地区的情况了解很少，只知道在80年代的千年盛世运动兴起之前，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



图片22.5 19世纪70年代制作的博尔诺刺绣女衫

或许真是奥马尔领导无方，以致博尔诺停滞不前，但更深刻的原因或许在于博尔诺与日益扩展的哈里发国经济的关系。倘若这样，博尔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它表明哈里发国对周边国家发生影响，与经济边缘的其它国家的经历相比较，博尔诺也是一个典型。政治上，事后看来，谢赫奥马尔及其政府可能做出的选择似乎是有限的：在西面和南面，由于 598 哈里发国的扩张，奥马尔政府的扩张受到限制，它在东面又受到巴吉尔米和瓦代的阻碍，博尔诺甚至对控制西北面的达马加拉姆也感到力不从心。另一个可选择的办法是减少宫廷人员，分散政府权力，但这与时代潮流相违背，会瓦解保护关系的政治根基，而且与领土扩张或移民分不开。到头来，谢赫奥马尔治下的稳定让位于第三种解决办法——政治暴力与消灭竞争对手，但这已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

结束语

虽然博尔诺与索科托哈里发国在地域和人口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对两国进行比较，

才能阐明铸就两国不同历史的因素。这里可用简短的文字表达笔者个人的观点，把最初的差异归纳如下：

(1)如果说卡纳米在军事上并不强大，他却在礼仪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与玛伊分享权力；穆罕默德·贝洛领导下的索科托，则没有这样一个传统统治者的人选。

(2)与穆罕默德·贝洛不同，卡纳米没有分布广泛或数量众多的家庭和氏族联系，所以，他不像前者那样得到有力的支持。

(3)结果，卡纳米依靠的对象是奴仆和朋友，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穆罕默德·贝洛不得不下放和分散权力给他的伙伴(和穆拉比屯)，他们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或地方利益集团。

(4)在博尔诺失败后，为了本国的团结，卡纳米不得不对玛伊保持传统的忠诚，同时施展自己的魅力，谋取私利，并参与反对"费拉塔"；而穆罕默德·贝洛在取得"圣战"的惊人成功后，许诺对伊斯兰教千年盛世的信仰负有重任，依靠这种忠诚把手下分布各地的埃米尔团结在一起。

(5)为了弥补减少的岁入，博尔诺依靠贩运战俘出口(这种贸易部分地受到博尔诺与北非特殊联系的刺激)；而索科托财源旺盛，需要进口俘虏(各大家族和绅士阶层需要农业劳动力和手工业生产者)，最终形成了索科托巨大的经济优势。

第一阶段两国关系的紧张，是造成日后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走向的深远而重要的因素。相反，紧张关系的相对缓和，间接引发了1845-1855年的混乱局势，其后两国采取了克制态度。

599 在第二阶段，当政治斗争让位于经济竞争时，博尔诺逐渐发展了一种以保护关系和个人腾达为重要原则的政治体系；索科托政府则促进有共同利益的一些集团的成长，保持对伊斯兰教的崇信——即使不是苦苦期待千年盛世的降临，这信仰也能限制一些集团的利益，并提供一个道德准绳。两国关系的缓和，虽然也可能使博尔诺农民和商人有更多机会为扩展中的哈里发国市场提供商品，但是，富有自然资源的比较有活力的哈里发帝国却使得博尔诺在经济上逐渐枯竭。在博尔诺，首都人民受经济衰落的影响最大，而在索科托，虔诚的"绅士"阶层似乎更多地承受着正在改变性质的哈里发政权的压力。

(张顺洪译)

23 1878年前的马西纳和托罗德贝(图库洛尔)帝国

M. 利-塔勒

马 西 纳

正如第21章和第22章指出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整个西部非洲的特征是出现了一个社会类群，即一直由定居民族统治的游牧民族富尔贝人(富拉尼人、佩乌尔人)。自15世纪以来，由于持续不断的迁徙浪潮，他们的人口不断增加，同时还由于黄金不再是西非经济的原动力，富尔贝人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 **600**

在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受到伊斯兰教正义、平等思想鼓舞的富尔贝人，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定居民族的统治。19世纪初，这场运动蔓延到豪萨兰，接着又从豪萨兰扩展到利普塔科和马西纳。早在18世纪末，在塞古的国王——法玛恩戈洛·贾拉(迪阿拉)统治时(1766-1990年)，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富尔贝人就曾首先试图解放自己，但以失败告终。[①] 19世纪初，在达·蒙宗统治期间(1808-1927年)，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班巴拉人的压力达到顶点，致使富尔贝人的生活毫无保证。

马西纳的穆斯林革命：塞库·艾哈迈杜(谢赫艾哈迈德·洛博)统治时期

革命前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富尔贝人的不安全状况

自从恩戈洛·扎拉统治以来，塞古的势力不断扩张到所有邻国。在蒙宗·贾拉(迪阿拉)统治时(1790-1808年)，塞古的势力西至本杜，东至多贡国。[②] 在达·蒙宗统治期间，塞古的“通宗”(tonzons)对富尔贝人营地的勒索不断增加。同时，在杰内等已经适应一般习俗和商业需求的穆斯林中心，伊斯兰教已失去活力。[③] 但是，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地区富尔贝穆斯林革命的成功，为西部非洲的伊斯兰社会开辟了新的前景。 **601**

① 恩戈洛·扎拉对富尔贝人发动了一场持续八年的残酷战争，许多富尔贝人逃到瓦苏鲁避难，见E. 梅奇(Mage)，1868年，第401页。另见L. 陶克希尔(Tauxier)，1942年，第90页。关于塞古的法玛统治年代，我们一般采纳托希尔的意见，他对此问题进行过审慎的比较研究。我们注意到，这个年代大致相近。

② L. 陶克希尔，1942年，第101页。在1796年，尼日尔、卡尔塔和本杜之间的地区遭到蹂躏，同时，离塞古最近的国家(贝莱杜古、德杜古、富拉杜古)也受到镇压。

③ C. 蒙泰尔(Monteil)，1932年，第52-54页。

1804至1810年间，在离马西纳不远的索科托和利普塔科，传统的酋长统治刚刚被推翻。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许多富尔贝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在返回家园的途中，传播了新的革命思想。

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穆斯林革命的开端

1815至1818年期间，几位伊斯兰隐士力图利用三角洲地区普遍存在的革命气氛来动摇班巴拉的统治。第一位付诸行动的是古兰经学者伊本·赛义德，他于1815年从索科托来到该地区，成功地夺取了金巴拉全省，但未能争取到其他富尔贝人，尤其是图阿雷格人。与此同时，在法里马卡，另一位古兰经学者艾哈迈杜·阿尔法卡·库贾乔也在号召圣战。他们都宣布效忠于乌斯曼·丹·福迪奥。[4]但在福迪奥的追随者中，最成功的两位是伦迪锡鲁的艾哈迈杜·哈马迪·布布·桑加雷和来自菲图加省的侯赛因·科伊塔。[5] 前者最终成为马西纳圣战的领袖。

塞库·艾哈迈杜（谢赫艾哈迈德·洛博）——马西纳"迪纳"的缔造者

塞库·艾哈迈杜（谢赫艾哈迈德·洛博）约于1773年出生在马西纳省的马兰加尔，他的虔诚、忠实和谦恭，闻名遐迩，这些品质使他成为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低微，只受

图片23.1 《al-Idtirar》一书首页——据说此书是塞库·艾哈迈杜（谢赫艾哈迈德·洛博）所写的唯一著作

④ H. 迪亚洛(Diallo)，1979年，第138页；F. B. S. 迪亚拉赫(Diarah)，1982年，第97-98页。
⑤ H. 迪亚洛，1979年，第140页。

过一般的神学教育。⑥ 直到 22 岁时，他才拜杰内的著名神学家卡巴拉·法尔马为师，开始潜心钻研神学。他以圣洁的名声，号召匡复纯洁的伊斯兰教，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塔利布(talib，追随者)，他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对起源于索科托的这种思想坚信不移。1816 年，他向乌斯曼·丹·福迪奥宣誓效忠，后者送给他一面旗帜，并授予他“谢赫”的称号。⑦ 与此同 **602** 时，他从索科托得到几本传授伊斯兰法律的著作。⑧

1818 年，这场运动以起义的形式爆发了。塞库·艾哈迈杜组织人们反抗阿杜恩王朝及其塞古盟友的苛捐杂税。⑨塞古的法玛对这场运动的规模估计不足，命令一支正开往金巴拉参与治安行动的部队“沿途惩罚这个伊斯兰隐士和他的追随者们”。⑩ 塞古军队在努库马溃 **603** 败，使富尔贝广大民众更快地聚集在塞库·艾哈迈杜周围。自此以后，他以保护人的面目出现，反抗班巴拉暴政。同时，杰内一些始终对塞库·艾哈迈杜怀有敌意的伊斯兰隐士们，在经历长期围困后，于 1819 年被镇压。全体富尔贝人皈依为穆斯林，由于非凡的组织力量，马西纳迅速成为一个位于塞古必经之路的强大的穆斯林国家。在达·蒙宗统治期间，两个邻国之间战火连绵。1828 年 3 月，战争仍异常激烈，当时，勒内·卡耶正抵达杰内。据他记载说：“杰内的地方领袖塞库·艾哈迈杜仍在对塞古的班巴拉人发动猛烈的战争，他想将班巴拉人争取到先知的旗帜下。但是好战的班巴拉人却在抵御他的进攻”。⑪ 在这位法国旅行家离去之后很久，该地区经历一场大饥荒，战士们精疲力竭，战争才告结束。⑫ 班巴拉人最终面对现实，承认了这个穆斯林邻国的存在。

然而塞库·艾哈迈杜还须对付来自另一地区——菲图加不知不觉间加剧的富尔贝人的抵抗，那里另一位名叫侯赛因·科伊塔的伊斯兰隐士正在领导一场运动，其目标也是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发动圣战。菲图加位于廷巴克图与关图之间，是昆塔和索科托极为重要的贸易中心。谢赫乌斯曼的继承人穆罕默德·贝洛对侯赛因·科伊塔的运动更加支持，因为塞库·艾哈迈杜利用谢赫乌斯曼去世后的继承危机，不再向索科托效忠。菲图加在昆塔人和穆罕默德·贝洛的支持下抗击塞库·艾哈迈杜，直到 1823 年菲图加被征服，首领均被处死。⑬ 征服廷巴克图的道路开通了。

桑海帝国解体后，廷巴克图未能建立持久的政权，它有时处于阿尔马人的控制之下，有时处于班巴拉人或图阿雷格人的控制之下。廷巴克图继续保持贸易繁荣，这归功于一个 **604**

---

⑥ F. B. S. 迪亚拉赫，1982 年，第 84 页。

⑦ 在西非各种语言中，“谢赫”(Shaykh)一词相当于 Shehu、Seku 或 Sheku，由此产生塞库·艾哈迈杜、塞库·奥马尔等名称。

⑧ 据一些材料看来，他收到四本书，内容涉及政府制度、王公行为、《古兰经》中关于正义和艰辛历程的教义；见 H. 迪亚洛，1979 年，第 138 页。除了对索科托的圣战领袖效忠之外，至少在初期，塞库·艾哈迈杜还得到他所操纵的“塔里克-法塔什”(Ta' ri kh al-Fattash)的强有力支持，因而被拥立为第十二任哈里发；传说他降世于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到麦加朝圣之时，真主已有预示(见 M. 利-塔勒，1972 年)。乌斯曼·丹·福迪奥在豪萨兰曾巧妙地利用 19 世纪被压迫民族对“马赫迪”(Mahdi，救世主)的迷信思想。

⑨ 见 A. H. 巴(Ba)和 J. 达格特(Daget)，1962 年，第 29-31 页。

⑩ C. 蒙泰尔，1932 年，第 103 页。

⑪ R. 卡耶(Caille)，1830 年，第 2 卷，第 214 页。

⑫ L. 费德尔布(Faidherbe)，1863 年，第 11 页。

⑬ H. 迪亚洛，1979 年，第 138-14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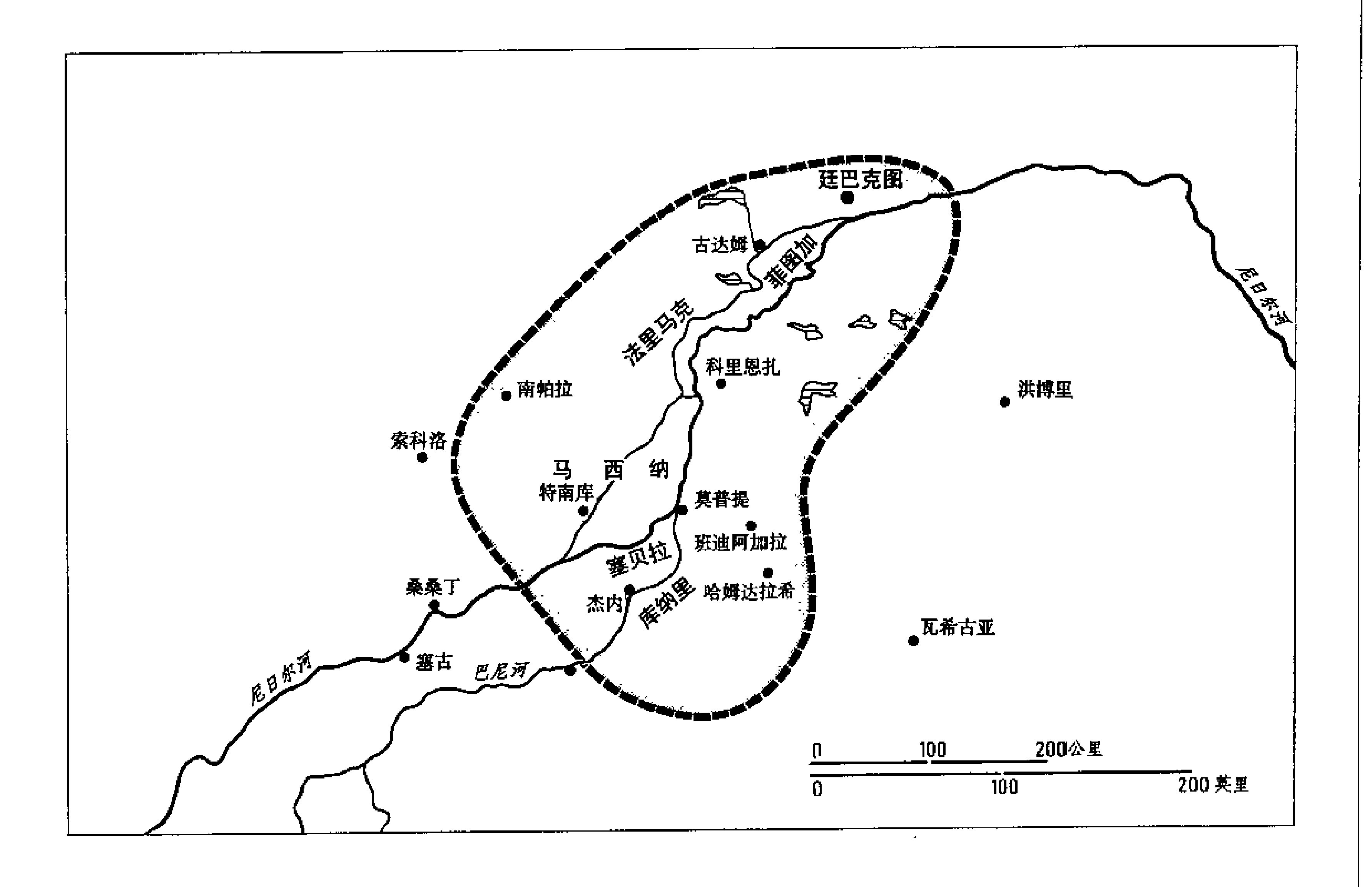


图 23.1 极盛时期的马西纳，1830 年（仿照 M. 利-塔勒图）

"摩尔人部落"昆塔人的保护，18世纪下半叶昆塔人已在此确立统治。他们是有经验的商人，也是撒哈拉各地通往廷巴克图的所有商路的保护人。从19世纪初，他们的一位族人穆赫塔尔·孔蒂(1729/30-1811年)已开始在此传播卡迪里教派的教义，他们在该地区享有极大的宗教权力。他的孙子穆赫塔尔·萨吉尔答应廷巴克图商人和政治领袖们的请求，于1826年前往援助这个被马西纳大军围困的名城 605

> 1826年，马西纳的富尔贝人夺取了廷巴克图，几乎彻底摧毁了它的贸易，征服者不仅向盲目崇拜的各民族(曼德人、莫西人、桑海人)征收苛捐杂税，还向居住在特瓦特和古达米斯地区与他们信奉同一宗教的商人勒索。后者发现自己处于受压迫的境地，于是向阿苏阿德的谢赫·穆赫塔尔求救。他是昆塔部落的贝凯的长兄，在柏柏尔人中很有影响力，他们把财产托付给他。[14]

在塞库·艾哈迈杜去世之前，这位昆塔人领袖未能阻止该城的陷落。它被一支守备军占领了。[15] 他1845年去世时，马西纳的势力已从杰内扩展到廷巴克图，从纳帕拉地区延伸到多页。[16]在持续27年的统治中，塞库·艾哈迈杜还为这个新的神权国家——"迪纳"(dina，即宗教)建立了坚实的宗教组织和行政机构。

迪纳制度

像富塔贾隆、富塔托罗等伊斯兰国家和索科托哈里发国一样，以后马西纳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根据穆斯林法律管理。塞库·艾哈迈杜任命40名成员组成一个大议会，协助他行使各种权力。这个著名的大议会的成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已婚，带头过纯洁生活，受过良好的教育，年龄在40岁以上。大议会中有两名议员同时参加塞库·艾哈迈杜的枢密院，他们在把国家事务提交大议会讨论之前，先要与他商议。

各地的司法权起初交给"卡迪"(kādi，教法官)执行。理论上，最高司法机构是大议会；最初几年，他并不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一些比他更有学识的伊斯兰老隐士，[17]但塞库·艾哈迈杜最终使大议会俯首贴耳。A.H. 巴和J. 达格特报道的几则故事，试图说明塞库·艾哈迈杜并不总是尊重他亲手建立的比较民主的机构。例如，他坚决反对大议会关于废除等级制度的议案：

> 大议会中的伊斯兰隐士们根据《古兰经》中"所有信徒皆兄弟"这句经文，提议废除等级制度。次日，塞库·艾哈迈杜命人把蜥蜴、青蛙、鱼、小鸡和蘑菇放在一起煮，为伊斯兰隐士们端上这道菜，请他们吃。他们大声说："你为什么要我们吃这种大杂烩？""难道这些食物中有古兰经禁止食用的吗？"塞库·艾哈迈杜反驳道。"没有，不过尽管古兰经没有禁止这道菜，但吃蜥蜴、青蛙，与我们常吃的 606

[14] J. 安塞勒(Ancelle)，1887年，第114页；另见H. 巴斯(Barth)，1863年，第4卷，第32-33页；P. 马蒂(Marty)，1920-1921年，第1卷，第75页；A·拉芬内尔(Raffenel)，1856年，第2卷，第352-353页。

[15] L. 费德尔布，1863年，第11页；M. 德拉福斯(Delafosse)，1972年，第1卷，第236-239页。

[16] M. 德拉福斯，1972年，第2卷，第236-237页；另见L. 费德尔布，1966年，第51页。

[17] A.H. 巴和J. 达格特，1962年，第62页。

东西搅在一起，使我们感到恶心。”“同样，虽然古兰经没有禁止等级制度，但把贵族和贱人混杂在一起，废除我们习惯上使他们分开的屏障，也令我厌恶。”[18]

刑罚很严酷。以汉巴贝·萨马塔之名为世人所知的阿赫马杜·哈马迪·桑巴·布巴卡里担任检察官，他极端严厉，“他总是把他的法律书、《古兰经》、剑和一条皮鞭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迪纳’设在努库马的整个时期，他都到场行使审判权，随时随地亲自执行判决”。[19]

行政人员用同样严厉的方式征税，他们的俸禄部分从自己的劳动果实中支取。除了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普通税收——扎卡特、穆杜和乌苏鲁(zakāt, mudu, usuru)外，议会让那些因身体条件无法参战的人和没有伊斯兰化的国家交纳“帕贝”(pabé)，即战争特别税。[20] 此外，战俘为“迪纳”耕作大庄园。马西纳省盛产大米、小米和各种蔬菜。[21] 另一方面，由于与邻国班巴拉之间战事不断，马西纳的贸易遭受极大的损失。这个地区的主要贸易中心在杰内，不再与布雷保持联系，摩尔人也不再经常光顾这个商业中心：

> 这场战争正在对杰内的贸易造成极大的损害，因为战争切断了它与亚米纳和桑桑丁、巴马科和布雷的任何联系，整个内陆地区交易的黄金是从那些地方来的……杰内的商人因这场战争受到巨大损失，但是他们不敢公开抱怨。我个人认为，即使他们抱怨的话，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几个黑人告诉我，自从这场战争爆发后，摩尔人纷纷离开这个贸易中心，前往桑桑丁。[22]

这个国家在行政上分成五个军事行省，由塞库·艾哈迈杜的亲戚或忠实信徒管理。在杰内，他的第一门徒乌斯曼·布哈里·哈马顿·桑加雷守卫着尼日尔河上的贸易和尼日尔河与巴尼河之间边区的贸易，被授予“埃米鲁·曼加尔”称号。[23] 塞库·艾哈迈杜的侄子博里·哈姆萨拉，这位马西纳省的酋长坐镇特南库，守护着西部边界。法卡拉酋长阿尔法·桑巴·富塔负责监视巴尼河右岸。最后，海雷的酋长纳贝和邓德分别保卫东部疆界和湖区。

约1820年建立的新都哈姆达拉希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位于泛滥平原中部的努库马容易遭受洪水的损害。塞库·艾哈迈杜喜欢努库马以南25公里一处更易守卫的地方，它在现今莫普提镇的东南，位于易受洪水侵袭与洪水线上地区之间的接触地带。建都工作用了三年时间。由杰内的石匠们建筑的清真寺和塞库·艾哈迈杜的皇宫是这个城市最辉煌的建筑物。居民区由18个区组成，周围环绕防护墙，开了四座门。七名伊斯兰隐士维持该城的治安，人数众多的骑兵分成小队在各区巡逻，协助他们。据说这个城镇非常整洁。[24]

哈姆达拉希的生活受到极其严格的管理。对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如何消磨时光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晚祷后在街头被发现的人必须证明身份，如果是已婚者，将带到法院去；在城镇骑马过街不得偷视住宅，违者严惩；寡妇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得过隐居生活，以

---

[18] A.H.巴和J.达格特，1962年，第67-68页。关于塞库·艾哈迈杜的个人权力，另见C.蒙泰尔，1932年，第108、112-113页。

[19] A.H.巴和J.达格特，1962年，第65页。

[20] 前引书，第67和280页。

[21] R.卡耶，1830年，第2卷，第217-218页。

[22] 前引书，第214-215页。

[23] 他是军队的统帅。

[24] A.H.巴和J.达格特，1962年，第43-53页；另见F.B.S.迪亚拉赫，1982年，第122-139页及以后诸页



图片23.2 哈姆达拉希的"塔塔"(城堡)守塔遗址



图片23.3 塞库·艾哈迈杜在哈姆达拉希的陵墓

免老年男子回想自己的青春年华，等等。

但是，塞库·艾哈迈杜的主要功绩无疑是他发起的使富尔贝人定居的运动。除了建都哈姆达拉希之外，他还建造了许多农庄和畜牧业村庄。后一种活动自然引起了组织者们的充分注意。一种半军事性的组织一丝不苟地管理着牧草区和季节性畜牧迁移。[23]在塞库·艾

[23] A.H. 巴和J. 达格特，1962年，第81-103页；另见N. 魏加洛(Waigalo)，1977年，第8-9页。

哈迈杜的儿子阿赫马杜·塞库统治期间，所有这些建设都有了成果。

阿赫马杜·塞库的统治(1845-1853年)

阿赫马杜·塞库的统治被认为是马西纳最为平和与繁荣的时期，与他父亲和他的儿子的统治都截然不同，前者饱受战争的破坏，后者深深地刻上与哈吉吉·奥马尔战争的烙印。[26] 但是，这个王朝的开端并不顺利。首先他继位时已面临困难。塞库·艾哈迈杜于1845年3月19日去世，面根据马西纳的传统，任命“迪纳”新领袖的唯一标准是学识和虔诚。609 尽管赞成由塞库家族继位的支持者们设法平息了他的侄儿巴洛博的野心——授予他军队统帅之职，但仍有阿尔法·努胡姆·泰鲁和哈吉吉·莫迪·赛义杜等人，他们不是已故领袖家族的成员，但比他的长子更符合规定的条件。[27] 因此，提名阿赫马杜·塞库为“迪纳”领袖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青年人对“迪纳”的严格性越来越难以忍受。因此，当新领袖表明他打算全盘照搬他父亲的政策时，哈姆达拉希城里传遍这样的怨言：“这些戴着头巾的老隐士，无时无刻不在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律，不作丝毫的让步”。[28]

除了这些国内困难之外，当塞库·艾哈迈杜去世的消息公布时，廷巴克图地区的萨罗-班巴拉人和图阿雷格人起来反抗。“塞库去世的消息一宣布，马西纳沉浸在悲痛中，但欢乐的鼓声在班巴拉上空回荡，同样也在图阿雷格人住地(戈西湖)上空回荡，人们立即举行盛大的宴会，感谢上苍替他们除掉最强大的敌人。”[29] 在巴洛博的母亲的家乡萨罗，镇压不很激烈，但巴洛博对图阿雷格人进行最有力的镇压。据说他急于利用这个机会，向大议会证明，他们选择他的表兄弟而不是他做塞库·艾哈迈杜的继承人是何等错误。[30]

廷巴克图地区的图阿雷格人利用哈姆达拉希的这场王位继承危机，摆脱了中央政府设在那里的代表桑西尔菲的统治，并宣布独立。1846年初，巴洛博向他们进军。在戈西湖附近，他们遭到富尔贝人矛骑兵的伏击，损失惨重。接着，他们请求昆塔家族替他们调停。塞库·艾哈迈杜去世后不久，谢赫·西迪·穆赫塔尔也去世了，他的弟弟谢赫·西迪·贝凯开始与马西纳谈判。谢赫·西迪·贝凯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谢赫·孔蒂称号的，因此他决心不遗余力地获得廷巴克图事务的实际控制权。[31] 尽管他遭到哈姆达拉希的领袖们的反对，还是于1847年前往廷巴克图，在那里他解散了驻军，但无法阻止桑西尔菲重新夺取他的据点。在阿赫马杜·塞库统治期间，莫尼姆普的班巴拉人是哈姆达拉希的第二大目标，仅次于图阿雷格人。但在他统治的末期比较太平，而且总的来说，塞库·艾哈迈杜的继承人既

[26] I. 巴里(Barry)，1975年，第24-25页。
[27] 前引书，第15页。
[28] I. 巴里，1975年，第21页；另见A.H. 巴和J. 达格特，1962年，第259页。
[29] I. 巴里，1975年，第21页。
[30] A.H. 巴和J. 达格特，1962年，第258、266-267页。
[31] 他刚取消其长兄谢赫·西迪·哈马达的谢赫·孔蒂称号，这一称号按理说是属于他的。巴思是他的朋友，曾提及他个性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性格(H. 巴思，1863年，第4卷，第86-87页)。另见A.H. 巴和J. 达格特，1962年，第274页。

坚定有力又有手腕，他设法使这个王国的疆界原封不动，还在内陆地区重新建立了某种谅解。不过1853年2月他去世时，王国内外交困的局势再度加剧。 610

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马西纳的末代统治者(1853-1862年)

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的统治始于一场重大的继承危机，塞库·艾哈迈杜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卷入了这场危机。此前，在塞库·艾哈迈杜的后代中挑选"迪纳"领袖的惯例已经确立。巴洛博是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军事领袖，但他清楚自己不符合挑选的所有条件，尤其是学识方面。因此他与已故统治者的儿子、年轻的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阴谋策划，[32]使他被提名为统治者，自己当然希望占据领导地位，[33]从而在马西纳播下了不和的种子。符合所有选举条件的候选人是已故统治者的弟弟阿卜杜拉耶·塞库，他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 他决定在昆塔人以及库纳里和哈伊雷军队的支持下，向哈姆达拉希进军，包围了这个城市。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的支持者和阿卜杜拉耶·塞库的支持者将首都一分为二。群情激昂，冲突随时都会发生，但由于埃迪雅老人对她儿子阿卜杜拉耶·塞库的干预，避免了严重的后果。[34]此后，马西纳分裂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双方进行冷战。[35]

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的统治只能加深这些分裂。他既缺乏教育，在政治上又缺少前任统治者的宽容。他掌权后对"迪纳"的基础进行激进的改革：与他年龄相仿、具有自由化思想的年轻人取代了年高德劭的伊斯兰隐士们。[36]据易卜拉希马·巴里记载，"迪纳"创建后40年，热情消退了；"敌对、密谋和唯利是图又占了上风"；[37]巴里还讲述了一则轶事，它可以表明马西纳统治阶级中流行的看法。巴洛博阴谋集团的一名成员被哈吉吉·奥马尔逮捕入狱，有一天他对取笑他的看守说，"无论我受到什么惩罚(后来他被枪毙)，也比让这乳儿统治强"。这个乳儿就是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38]

我们不难理解，因这些内部分歧而逐渐削弱的马西纳，无法对哈吉吉·奥马尔运动作有效的抵抗。 611

托罗德贝(图库洛尔)帝国

无论是在西苏丹还是在中苏丹，奴隶贸易均动摇社会的传统根基，造成一种持久性的

---

[32] 各种资料估计他的年龄在18～24岁之间。

[33] I. 巴里，1975年，第29-30页；N. 魏加洛，1977年，第1-2页；另见A. H. 巴和J. 达格特，1962年，第286页。

[34] 她也是已故领袖的母亲，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的祖母。据说，她对孙子易动感情。

[35] N. 魏加洛，1977年，第2页。

[36] I. 巴里，1975年，第32、36、38-41页；N. 魏加洛，1970年，第34页。另见F. B. S. 迪亚拉赫，1982年，第321-322页。

[37] I. 巴里，1975年，第142页。

[38] 前引书。关于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统治期间马西纳的内部分歧，另见E. 梅奇，1868年，第263页；哈吉吉·奥马尔·塔尔(al-Hadjdj'Umar Tal)，1983年，第52-53页。

危机状况，当然也有助于一些国家的全面发展，这些国家的生存依赖这种贸易的继续。在富塔贾隆、富塔托罗、索科托和马西纳，有一个相当大的穆斯林聚居区，伊斯兰教徒对这种状况作出了反应，那个时代最受压迫的民族——富尔贝人领导开展了民族革命。奴隶制没有被废除，而是根据法律规定（即《古兰经》）来加以控制。马西纳、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之间的尼日尔河以西地区，或多或少依附于塞古或卡尔塔的众多小国，仍然逃避伊斯兰法律。这些小国并未联合，又由于内部分歧，无法有效地抵抗一个新兴的穆斯林教派——提加尼教派凭武力改变宗教。[39]

哈吉吉·奥马尔的圣战和塞古穆斯林帝国的诞生（1852-1862 年）

伊斯兰化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取得成功之后，在各方面未能再取得任何进展。新的神权国家发生继承危机，四分五裂；而在西苏丹又出现了伊斯兰教的顽敌——法国的威胁。因此，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富塔托罗，伊斯兰教受到东西两面的威胁。哈吉吉·奥马尔运动正是对这种形势作出反应。

奥马尔·赛义德生平简介

奥马尔·赛义德（哈吉吉·奥马尔）约于 1796 年[40]生于托罗省的哈尔瓦，这个省最靠近法国殖民地圣路易。他的家族曾在 18 世纪末的穆斯林大革命中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他的整个童年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熏陶。由于他聪颖过人，很早就学习并精通伊斯兰的所有学问。他很快脱离了古老的卡迪里教派[41]，而在卡迪里教派保护下，伊斯兰隐士在塞内冈比亚扩充了封地。他加入新创建的提加尼教派之后，于 1826 年离开富塔，去钻研、通晓这个新教派教义的来源。直到 1847 年初，他才返回家乡。[42]

612

20 年的旅行（包括三次前往伊斯兰圣地）使他成为那个时代黑非洲无与伦比的见多识广的人物，他访问穆斯林国家和非伊斯兰化国家所获得的丰富经验也是无人可比的。他回来时获得提加尼教派的“大哈里发”称号，[43] 肩负着完成黑非洲伊斯兰化的使命。

从 1830 年至 1838 年，[44] 在逗留索科托期间，他拜在穆罕默德·贝洛门下学习圣战的各项法则。他的渊博知识和坚强个性，使他成为索科托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之一。1838 年，本

---

[39] 该教派以其创建者之名艾哈迈德·提加尼（1737-1815 年）命名。这个教派约于 1782 年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创立。后在北非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尤其是在摩洛哥，非斯的“扎维亚”成为最大的中心。与其它教派相比，提加尼兄弟会较少偏见，基本教义也更朴素。它最初由伊达或阿里传到撒哈拉以南，只是到了塞库·奥马尔当政才在该地区广为传播。

[40] 根据富塔传说，他生于本戈维战役的前夕，这场战役是 1796 年阿尔马米·阿卜杜勒·卡德尔为了使卡约尔的“达麦尔”（Damel），阿马里·恩戈内·恩德拉皈依伊斯兰而发动的。因为奥马尔将要出世，他的父亲赛义德·乌斯曼——苏莱曼·巴尔的信徒未能参加那次战役。参见 M. 卡马拉（Kamara），1975 年，第 154 页；F. 迪蒙（Dumont），1974 年，第 4 页。

[41] 卡迪里教派是撒哈拉南部最古老的教派之一，最早是昆塔人传播到那里的。

[42] F. 卡雷尔（Carrère）和 P. 霍利（Holle），1855 年，第 194 页，

[43] 即该教派在黑人国土的最高领袖。

[44] 这些年代是阿赫马杜·贝洛大学（尼日利亚、扎里亚）的历史学家公认的，该校当年历史系主任迈迪·阿达穆 1981 年 12 月 24 日的一封信对此已有说明。

民族人民的召唤，促使他踏上返回家乡的旅途。此时的富塔托罗，因其东部诸省频繁遭到马萨西人的周期性袭击，国势衰微，不可能再成为发动圣战的坚固阵地。因此，哈吉吉·奥马尔在富塔贾隆定居下来，提加尼教派在那里有许多支持者，在那里的卡迪里教派内，他知道能依靠阿尔法亚人的支持(他们是好战的伊斯兰教徒的热情支持者)。[45] 尽管掌权的索里派对他怀有敌意，哈吉吉·奥马尔还是把朱贡库作为他的主要作战基地，在当地征募士兵和收购武器。同时，他在最出名的著作《里马赫》(Rimah)中阐明了圣战运动的思想。[46]1847年，他在富塔托罗游说和招募新兵，回来后加快准备工作，把首都迁到贾隆卡杜古的丁圭拉耶，当地统治者吉姆巴·萨克不久就后悔为他提供了避难所。吉姆巴·萨克深信自己的军事优势，于是向丁圭拉耶发动攻击，但被击退了，圣战者(mudjahidun)[47] 在附近几个小 **613** 村庄取得几次胜利后，1852年攻占了贾隆卡杜古首都坦巴的坚固堡垒。

圣战的开始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来自塞古地区的马萨西人在卡尔塔建立了一个国家，从巴克胡努到盖贾加都受到它的影响。它的力量凭借一支强大的职业化军队，基本上由完全忠于主人的王室奴隶组成。他们总是冲锋在前，完成突破敌人营地的重任。他们的首领在法玛(fama)[48] 宫廷中举足轻重，在王位继承时期更是如此。在法玛去世至假定继承人即位期间，他负责管理国家事务。[49] 卡尔塔加强实力的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的骑兵部队，几乎全由马萨西人组成。最后，精通火药的制造，使这支军队成为上塞内加尔地区最令人畏惧的军队之一。

权力被组织成为一种专制君主政体，王位由旁系库鲁巴里(库利巴利)家族继承。迅捷而严格的审判使这个国家能实行有效的干预，同时发展起来的一种审慎的内部通婚制度，使马萨西人能选择婚姻联盟来加强国力。他们很快变成了塞内冈比亚地区所有战争的主要调停者。[50] 一国与另一国之间解决争端时，常常寻求他们的支持，这也给了他们有利时机发动袭击。他们比邻族受到较好的战术训练，因而也为参与调停而索取大量的贡金。这个地区所有的小酋长国如本杜、沙索、盖贾加，均处于动摇状态。马萨西人的压力远达富塔托罗的东部省份。[51]

这是1843年在卡尔塔爆发马萨西人和贾瓦拉人内战前的形势。18世纪中叶，马萨西人到达这地区后，发现贾瓦拉人已经定居，于是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一旦马萨西人控制了这地

---

[45] 哈吉吉·奥马尔·塔尔，无出版日期(b)，第9页；T. 迪亚洛，1972年，第37、38、148 150页。另一方面，由军事领袖易卜拉欣马·索里·莫多传下来的"索里"兄弟会是政治组织而不是宗教团体，他当初只因为贾隆凯人和富尔贝人对这个新国家不断施加压力，才获得王位。

[46] 在这部著作中，他运用同胞能够理解的朴素语言，阐述了提加尼教派的主要纲领。他的个人经历和这个新教派许多学者的评述，丰富了这些纲领。该书大量翻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广为流传。F. 迪蒙，1974年，第64 65页；他认为《里马赫》至今仍是"从最低级的隐士到最尊贵的导师所有博学的提加尼学者之书"。

[47] 伊斯兰教忠诚战士的称号。

[48] 班巴拉国王的称号。

[49] A. 拉芬内尔(Raffenel)，1856年，第2卷，第387页。

[50] A. 巴，1982年2月10日和11日的记录。另见F. 卡雷尔和P. 霍利，1855年，第181页和E. 梅奇，1868年，第97页。

[51] 在这些战争和袭击中掠取的奴隶，被卖给圣路易当局或冈比亚人，他们成了主要供应者。

区，他们便以十足的主人身份自居，把贾瓦拉人赶向南方。贾瓦拉人被迫交纳重税，受尽折磨。[52] 1843年，被赶出首府尼奥罗的贾瓦拉人起来反抗，使卡尔塔陷入一场持续七年的内战。1850年，马萨西人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但此后国势衰微，甚至分裂。[53]

614

西马萨西人（科尼亚卡里地区居民）不愿卷入这场反对贾瓦拉人的斗争，据他们说，这场战争是出于个人原因，由库鲁巴里末代国王马马迪·坎迪亚宣布的[54]，他只顾自己复仇，让他们单方面去对付穆斯林军队。科尼亚卡里被占领后，马萨西人云集耶利曼以保卫旧王都，但徒劳无益：1855年2月该城被摧毁，马马迪·坎迪亚和所有卡尔塔的酋长（贾瓦拉、卡戈罗和巴克胡努-富尔贝人的酋长）纷纷投降。1855年4月11日，穆斯林圣战者胜利进入尼奥罗，马萨西人屈服于伊斯兰的统治之下。

这些情况使马萨西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剧烈的变化，以致他们不久就在各地举行起义，直到1856年，穆斯林军队仍处于紧急待命状态。镇压极端残酷，马马迪·坎迪亚和许多马萨西人被处死。逃散的马萨西人退往塞古边界。

哈吉吉·奥马尔让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贝拉留守该省，自己向卡索挺进。当时，法国人已在卡索建成一个联邦（由他们的朋友——麦地那的迪乌卡·桑巴拉领导），撤离了势力范围。1857年春，围攻该城是穆斯林军队不得不进行的最艰苦的战斗。穆斯林军队不顾法国人炮火的威胁，顽强进攻，连他们的对手也只能佩服。形势危急，对富坦凯人而言，多年来法国在塞内加尔的政策所强加给他们的耻辱和苦难必须消除。这一点儿也不意外，使得麦地那注目的将军是恩加诺的酋长马马杜·库罗（1854年法国军队夷平了这个恩加诺村）。

这场圣战是以“真主保佑”作为整个思想基础的，因此，可以理解哈吉吉·奥马尔的信徒穆罕默杜·阿利乌·蒂亚姆和蒂尔诺·阿卜杜勒[55]都以为麦地那的失利应归因于“塔利布”目无纪律，或归咎于他们不服从主宰者的使命去与白人作战。长时间围城，接连向麦地那派遣援兵，穆斯林作战的猛烈，无疑证明奥马尔赞同此事。据我们所知，关于这场战役的最早的报告都没有提及哈吉吉·奥马尔对这场战争的爆发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穆罕默杜·阿利乌·蒂亚姆在其著作中为穆斯林军队的失利辩解，一切都归咎于“塔利布”不守纪律。[56] 围城三月之久，被困者几乎绝望，没想到河水水位升高，费德尔布总督得以到达，终于1857年7月18日使该城解围。

616

富塔族在麦地那丧失了许多优秀儿女。事实表明，法国人已变成塞内冈比亚的主人。为了恢复势力，哈吉吉·奥马尔继续向本杜和富塔进军，每到一处，他就命令居民迁移到东部刚刚创立的穆斯林国家去，不许他们同法国人或白人混居。此后，在费尔洛-恩迪乌姆

[52] A. 拉芬内尔，1846年，第298-301页；1856年，第1卷，第337页。

[53] A. 巴，1982年2月10日、11日和15日的记录；F. 卡雷尔和P. 霍利，1855年，第184页。

[54] 这场战争的借口是一位贾瓦拉王子被马马迪·坎迪亚的儿子暗杀，但根本原因是贾瓦拉人不堪忍受班巴拉人的专横统治和沉重的税收，他们被赶出尼奥罗，更是忍无可忍。以上根据D.S.迪亚洛的报道，1977年，第10页。

[55] 为E.梅奇提供描写哈吉吉·奥马尔生平资料者。

[56] 同一原因，这种说法流传至今。



图 23.2 极盛时期的托罗德贝帝国（仿照M. 利-洛勒图）

(1858年2月)，马塔姆(1859年4月)，阿伦杜和格穆(1859年10月)，穆斯林都与法国人作战到底。

他连续向富塔投入了战士四万人，自己从富塔返回(1859年7月)。[57] 毫无疑问，哈吉吉·奥马尔原来并未以抗法战争作为主要任务，但在麦地那、格穆、恩迪乌姆和马塔姆，他都坚决作战，尽管他知道敌人有火力优势。[58]

向塞古进军

贝莱杜古和塞古的班巴拉人比卡尔塔-班巴拉人还顽强地抵制伊斯兰教，特别是塞古-班巴拉人，几个世纪以来都抵制马尔卡、博佐和索莫诺的伊斯兰教士要他们改变宗教信仰，这时又反对马西纳"迪纳"发动圣战。18世纪上半叶，马里和桑海帝国瓦解后的政治真空是由塞古"芳加"(fanga，国家)填充的，恩戈洛·贾拉(迪阿拉)统治时代(1766-1790年)，塞古国家十分繁荣，其势力从曼德扩大到廷巴克图。这个国家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许多战略要地都有驻防军"通约恩"(tonjon，王室奴隶军队)，同时，其它的军队经常侵袭邻国，将他们俘获的奴隶贩运到康加巴和桑桑丁市场。这是法玛(国王)和通约恩(王室奴隶军队)的岁入的主要来源。行政上，塞古国家分为五个省，每一省由法玛的一个儿子管理。

在恩戈洛·贾拉之子、继承人蒙宗统治时期(1790-1808年)，塞古势力扩张到塞内冈比亚。1796年，塞古军队曾经洗劫尼日尔河、卡尔塔和本杜之间地区，征服过邻国贝莱杜古、德杜古、富拉杜古等。[59]

617 长期的衰落过程始于达·蒙宗统治时期(1808-1827年)，其显著标志是富尔贝人的解放和塞古东部边界新生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哈姆达拉希的"迪纳")日益频繁的威胁。哈吉吉·奥马尔约于1839年从麦加回国途中，访问过这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当时的法玛塞福洛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王室内部，权力斗争已经展开。在要求继承王位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托罗科罗·马里，他甚至同意押在狱中的一名图库洛尔教士为他改宗，以换取他的祝福和祈祷。[60] 他们之间的秘密同盟使塞古在时机成熟之际能和平地实现伊斯兰化。

但是1859年，托罗科罗·马里统治已达六年，他祈祷时被人听到，他遭到"通约恩"的斥责并被处死。[61] 1859年9月，从富塔返回家乡的哈吉吉·奥马尔决定向班巴拉首府进军。他于1859年9月12日离开尼奥罗去塞古，一路上传教和领导改宗。1859年11月20日，在贝莱杜古的坚固堡垒——麦尔科亚，所有从卡尔塔来的难民对伊斯兰的进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穆斯林武士们不得不第一次使用1858年从法国人手里夺取的两门大炮。以后，哈吉吉·奥马尔放慢了进军速度。1860年5月25日，他抵达尼日尔河上的尼亚米纳。穆斯林大军从这里进入塞古领土。

[57] 据E. 梅奇1864年在塞古所收集的资料，有许多分遣队先期开赴尼奥罗。这里没有完全引用统计数。
[58] 法国人在西非各地都是侵略者，而不是受攻击者。他们总是率先对有碍于法国经济利益的非洲酋长们开战。
[59] L. 陶克希尔，1942年，第101页。
[60] A. 科奈(Koné)，1978年，第62页。
[61] 前引书；另见E. 梅奇，1868年，第234-246页。

在班巴拉首府，阿里·蒙宗·贾拉取代了托罗科罗·马里，后者被认为过于讨好穆斯林。阿里·蒙宗·贾拉发誓保卫塞古，抵抗伊斯兰的一切入侵，然后就职。[62] 尽管他取的是穆斯林的姓，他并没有真正信仰伊斯兰教，马西纳的领袖们后来都这样说他。他在沃伊塔拉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由他的儿子指挥。据说在这个村庄发生的会战是这场圣战中流血最多的战役之一。直到 1859 年 9 月 9 日，经过四天血战之后，哈吉吉·奥马尔的军队才攻占这个堡垒，打开了向塞古进军的道路。

阿里·蒙宗此刻唯一的出路只有与他的宿敌、马西纳的领袖们结盟。自从马西纳爆发伊斯兰革命以来，哈姆达拉希和塞古一直处于交战状态。马西纳的许多领袖人物想征服塞古，他们都失败了。[63] 班巴拉人甚至利用马西纳的继位危机，几次把战火烧到那里。[64] 哈姆达拉希的领袖像塞古的领袖一样，也希望不计前嫌，因为占有尼日尔盆地的哈吉吉·奥马 618 尔正对其政治和宗教领导权提出挑战。但是，双方都陷于深重的危机之中，谁也没有能力对组织完善和装备精良的奥马尔军队作有效的抵抗。1861 年 3 月 9 日，穆斯林军队开进塞古。阿里·蒙宗·贾拉事先得到警报，幸而有时间逃到马西纳避难。

与马西纳的战争

从索科托到朱贡库，库图洛尔的朝圣者带着众多的扈从、巨额财产，几乎毫不掩饰对异教徒开战之意，使当时的统治者——无论是因循守旧者还是其他人都感到不安。穆斯林分裂成三个主要的势力范围：西北部的富塔托罗、西南部的富塔贾隆和东部的马西纳。除本杜之外，这个三角地区之内有许多的传统社会。形势有利时，穆斯林表面上派遣探险队为圣战作前导，而根本动机往往是为了掠取奴隶。[65] 不过，在取得圣战初期的胜利之后，穆斯林统治者在各地或多或少地处于守势。马西纳统治者在与他的非穆斯林邻邦交往时更是如此。

哈吉吉·奥马尔必然被视为一个危险的对手。他在 1855 年 4 月获得对马萨西人的胜利后，向许多穆斯林统治者(包括马西纳的统治者)宣布这条“好消息”，后者的答复是要他滚回老家去，这对西苏丹两位穆斯林领袖的未来关系无疑不是好兆头。[66] 次年，1856 年 8 月，一支马西纳军队前往迎击哈吉吉·奥马尔。卡萨卡里战役标志着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持续到 1864 年。

不过，这两位穆斯林领袖也曾通过几封信，试图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但实际上是谁也不愿听对方的话。奥马尔凭借他渊博的伊斯兰学识向马西纳统治者表示，只要不与他作对，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向异教徒开战；至于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则用更加政治性的论点反击，提醒奥马尔注意这一事实：从塞古到卡尔塔的整个地区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67]

1860 年 10 月，奥马尔的军队开进桑桑丁，后来塞古和马西纳的联军也抵达这里，在城 619

---

[62] E. 梅奇，1868 年，第 246 页。
[63] E. 德拉福斯，1972 年，第 2 卷，第 293 页。
[64] I. 巴里，1975 年，第 27 页。
[65] 豪萨兰也有这种现象，那里的穆斯林统治者无意使每个人都皈依伊斯兰，这样他们就不会失去奴隶的来源。
[66] 马西纳的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认为，尼日尔河与卡尔塔之间的所有非穆斯林国家都属于他的势力范围。
[67] 奥马尔和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的信件往来，见哈吉吉·奥马尔·塔尔的新译本和注释，1983 年；F. 迪蒙(1974 年)、F. B. S. 迪亚拉赫(1982 年)和 M. 哈菲兹·提德贾尼(1983 年)都作了有趣的介绍。

前安营扎寨。这种相峙局面持续了两个月，任何一方都不想首先开火。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1860年2月发生的一件小事，使冲突一触即发。[68]

我们注意到，直到最后一刻，奥马尔似乎也不希望发生战争。[69]毕竟他自己曾以极其激烈的言词，谴责过博尔诺和索科托统治者之间的武装冲突。马西纳的统治者未能使塞古的班马拉人改宗，奥马尔建议，要他与他联合，用心是真诚的。[70]但要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同意这个建议，也太难了，因为这无异于承认奥马尔的无上权威。尽管双方有许多信件往来，但假如双方坚持自己的立场，各不相让，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71]马西纳与塞古之间的联盟，为奥马尔向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开战，提供了法律依据。

奥马尔在班巴拉首府逗留一年后，于1862年4月向马西纳进军，5月攻占了哈姆达拉希。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在蒂亚亚瓦尔战役(1862年5月10日)中受伤不治而死。[72]从未放弃马西纳王位要求的巴洛博投降，他希望这样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奥马尔从不让那些与他打过仗的人掌权。奥马尔认为，既然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已死，他已达到

620 自己渴望的目标，即与马西纳的统一，因而这个国家的所有高级官员原封不动。[73]但在1863年1月，他把马西纳置于他儿子阿赫马杜的管辖之下，自己则打算“统率他的军队继续对异教徒发动战争，这支军队因马西纳军队的加入而更加壮大”。[74]巴洛博失望后，1863年3月转向廷巴克图求援，他知道，他会找到奥马尔的死敌——西迪·艾哈迈德·贝凯。奥马尔一得知这个消息，就把巴洛博和他的许多追随者逮捕了。

廷巴克图——马西纳联盟和哈吉吉·奥马尔的去世

廷巴克图名义上属于哈姆达拉希管辖。事实上，那里的权力掌握在昆塔人手里，他们的酋长西迪·艾哈迈德·贝凯唯恐失掉他在整个尼日尔盆地享有的宗教最高权力。奥马尔军队的逼进必然使他不安。1860年，他与班巴拉人接触，向他们提供道义上的支持。[75]西

---

[68] 据F. 迪蒙所述(1974年，第126页)，马西楠凯人向正在沐浴的奥马尔的支持者们开枪射击。梅奇认为，当时是两个营地的捕鱼人交火，奥马尔得知这个消息时，试图约束他的军队，但他们已开始渡河。E. 梅奇，1868年，第105页。

[69] 据有关富塔的全部资料，他不想开战：O. 巴，无出版日期，第109页；塔普西鲁·阿赫马杜·阿卜杜勒·尼亚甘恩(Tapsiru Ahmadu Abdul Niagane)，1981年5月3日的记录；哈吉·阿赫马杜·易卜拉希马·达特(Al-Hajj Ahmadu Ibrahima Datt)，1981年5月4日的记录。另据M.A. 蒂亚姆所述(1935年，第45页)，当伟大的圣战于1854年6月发动时，卡尔塔和塞古是哈吉吉·奥马尔唯一想攻击的目标。同样，据马西纳的传说(N. 魏加洛，1977年，第6页)，当时哈雷的阿赫马杜·海穆特奉命避免开战，以便争取马西纳统治者的支持，向莫西人进行圣战。

[70] 奥马尔即将到来时，进行了某些适时的改宗，但对基本问题没有影响，塞古的班巴拉人仍然坚信他们的宗教在塞古找到的许多偶像送哈姆达拉希展出：M.A. 蒂亚姆，1935年，第183—184页。关于奥马尔圣战前班巴拉人的宗教，见E. 梅奇，1988年；M. 德拉福斯，1972年；L. 陶克希尔，1942年；C. 蒙泰尔，1977年；哈吉吉·奥马尔·塔尔，1983年。

[71] 这些信件的具体内容，见F. 迪蒙，1974年，第141—182页；哈吉吉·奥马尔·塔尔，1983年。

[72] 蒂亚亚瓦尔是索法拉附近沼泽地区的一片林地。阿赫马杜·莫·阿赫马杜和奥马尔的军队在这里作了最后的较量，马西楠凯人顽强御敌，但马西纳的一些军事首领据说有意不去蒂亚亚瓦尔(N. 魏加洛，1977年，第32页)。重要的是，奥马尔的军队无论在装备上还是组织上都优于马西纳的军队，富尔贝人过多地依靠个人的勇猛。

[73] N. 魏加洛，1977年，第33页。

[74] E. 梅奇，1868年，第268页。

[75] 1860年，他致信阿里·蒙宗就是这个目的：C. 格雷施(Gerresch)，1976年，第894页。

年后，1862年，他向奥马尔提出和平建议，同时向正酝酿起义的哈姆达拉希提供支援。[76]逃亡的巴洛博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西迪·艾哈迈德·贝凯的支持下组织了暴动。首先在马尼马尼，接着在库纳里，廷巴克图-马西纳联军重创奥马尔的军队；1863年5月和6月，奥马尔失去了最优秀的将军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贝拉和阿尔法·乌斯曼[77]。经过八个月的围困，这支军队的残部于1864年2月7日试图突围。奥马尔遭到追击，逃到代盖姆贝雷的一个岩洞中避难，1864年2月14日死于此地。几小时后，他的侄儿提加尼·阿尔法指挥的增援部队抵达这里。提加尼极端愤怒，与联军展开毫不留情的战斗，这时联军已抛弃合作协定，各自追求权力。他们被各个击破。1865年2月，[78] 这个联盟原来的中心人物西迪·贝凯，在塞贝拉的萨雷迪纳的一场冲突中被杀。提加尼成了马西纳和廷巴克图的征服者。继卡尔塔和塞古之后，马西纳成为这个帝国最重要的省份。

托罗德贝(图库洛尔)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哈吉吉·奥马尔和圣战者

占领马西纳后，哈吉吉·奥马尔的帝国版图达到了极限，从基迪马卡延伸到廷巴克图，从丁圭拉耶扩展到撒哈拉。[79]这片广袤的国土并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分布着一大批要塞，政教合一的政府就靠这些要塞来巩固伊斯兰的扩张。国家的大厦完全建立在哈吉吉·奥马尔的威望之上，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圣战者，即一个为信仰而战的斗士。他本人不大过问组织或行政事务，而满足于在每一个新皈依的地方任命塔利布，通常根据教育和道德标准进行选择。[80] 这些塔利布负责进行组织工作。奥马尔本人首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81] 坚信他负有上帝的使命，即完成对黑人的伊斯兰化。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无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敌意，还是非穆斯林统治者的激烈抵抗，都阻止不了他。奥马尔确信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像先知一样，前进路上的障碍绝不会使他沮丧，而只能增强他的决心，“这位继承人继承了被继承者的一切”。[82]

621

确切地说，现有关于奥马尔的叙述只有保罗·霍利是唯一见过他的。他说，他于1847年8月在巴克尔见过奥马尔。奥马尔“相貌堂堂，给人的印象是智力过人、深思熟虑”。[83] 他得到最杰出的将军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贝拉·万的英明辅佐，他常常对这位将军说，他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思想。[84] 他最亲近的第二个人是从索科托赶来追随他的阿卜杜拉耶·豪萨。总的来说，尽管他对他的伙伴们有个人支配权(这种情形由于提加尼派有关“谢赫”

---

[76] C. 格雷施，1976年，第895页。并非全体昆塔人均同意西迪·艾哈迈德·贝凯的看法，相当一部分人赞成哈吉吉·奥马尔(C. 格雷施，1976年，第893页)。

[77] M. A. 蒂亚姆，1935年，第190-192页，注1092和1110。

[78] E. 梅奇，1868年，第450页。

[79] 同上，第113页，认为麦地那和滕格雷拉是西部边界，看来，丁圭拉耶和基迪马卡更合乎实际。

[80] F. 迪蒙(1974年，第121页)充分证明，他是一位反素丹分子。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位正统派穆斯林首先强调奥马尔的这一基本特征。可惜后者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未翻译过来。

[81] 他经常“静修”(Khalwa)。他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在静修后做出的。

[82] 哈吉吉·奥马尔·塔尔，无出版日期(b)。

[83] F. 卡雷尔和P. 霍利，1855年，第191-192页。

[84] 塔普西鲁·阿赫马杜·阿卜杜勒·尼亚甘恩，1981年5月3日的记录。

和他的信徒之间关系的教条而加强），他还是让塔利布参加一切重大决定。何况在这些托罗德贝人的统治阶层中，也不可能出现其它情况，在那里，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正是在静修期间，奥马尔完善了他的大多数计划，广泛吸收了先知穆罕默德和以往伊斯兰贤哲的经验。然后，他把自己的计划提交塔利布会议批准。[85]毕竟，取得这些信徒的不断支持，对圣战的胜利十分重要，这些人为了追随他而背井离乡。因此他要显示他有超自然的力量，622 给他们分发财物，竭力使他们归附于他。据说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86]他尤其注意维护军队。

在豪萨兰，哈吉吉·奥马尔开始招募第一批战士，接着，从索科托到丁圭拉耶，军队人数继续增加。这是一支多种族的军队，包括来自富塔托罗、豪萨兰、富塔贾隆、卡索、卡尔塔和塞古的分遣队。来自富塔托罗的人数最多，在朱贡库1859年脱离尼奥罗前，富塔托罗一直为圣战军队提供人力。[87]

这支圣战军队由四大军团组成，每支大军以富塔来的一支分遣队为核心组织起来：托罗军团包括托罗、本杜、基迪马卡和富塔贾隆（一部分）的军队；伊尔拉贝军团包括伊尔拉贝、哈比亚贝、卡索、迪亚富努、巴克胡努和沃拉贝-富尔贝族等；恩盖纳尔军团包括恩盖纳尔、博塞亚贝、贾瓦拉和马萨西人；最后是穆尔古拉军团，由马丁卡人和部分富塔贾隆人组成。哈吉吉·奥马尔的卫队主要由豪萨族人组成。[88]每个军团有自己的旗帜（伊尔拉贝军团为黑色，托罗德贝军团为红色和白色）。

部队的装备主要是来复枪和刀剑，少数有特权的个人拥有双筒来复枪。有大批铁匠跟随军队，为军队提供弹丸。[89] 1858年7月，在费尔洛-恩迪乌姆，奥马尔的卫队从逃走的科尔尼上尉手里俘获两门出故障的山炮，部队工兵桑巴·恩迪亚耶把这两门炮修好了。在贝莱杜古和塞古战役中这两门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赋予穆斯林战士们力量的，首先是他们的信仰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哈吉吉·奥马尔经常对他们说，今世和来世的幸福希望，在于支持他们去为信仰而战。[90]在打硬仗之前，我们注意到他总是加紧活动；他引用《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及哈里发们的主要著作，激励他的士兵们去克服一切困难。在亚吉尼：

624

> 这位明察秋毫的将领命令传令兵召集军队，军队排成队列，这位“谢赫”高谈阔论，发表演说。他是博学者，一贯正确……这位“独一无二”的人使塔利布欣喜若狂；他使他们注意许诺的报偿和永恒惩罚的威胁；他阐述了先知的传统和先知的言论。他做祈祷，使他们心中充满对来世的向往；他像戳破肥皂泡一样替他们揭穿今世真面目，把来世当做他们的目标。[91]

---

[85] M.A.蒂亚姆证明奥马尔常过“静修”生活。这位作者还讲述了塔利布违抗命令的一些例子，但总是解释为失败。因此，我们不知道对这些不同的叙述可信的成份占多少，但这些叙述之多，足以说明其中有些是真的。

[86] 在军队开赴麦地那之前，在尼奥罗分发财物；在开赴马西纳之前，在塞古也分发了财物。

[87] 每次他要重建军队，就派使者到富塔托罗，如1849年准备向坦巴进攻时，1853年在伟大的圣战前夕，1855年在损失惨重的耶利曼战役之后；M.A.蒂亚姆，1935年，第43、44、47页。他的儿子阿赫马杜统治期间也是如此。1858-1859年向塞古进军前，他亲自前往巡视，带回平民和士兵四万余人。

[88] O.巴、无出版日期、第78页。我们注意到索法人尚未组成军队。

[89] E.梅奇提供了托胡战役前夕阿赫马杜的军火详情：4200公斤本地火药，15-20公斤欧洲火药，9大袋火枪燧石和15万颗弹丸；E.梅奇，1868年，第415页。

[90] 据说，他每晚祈祷；见O.巴，无出版日期，第86页。

[91] M.A.蒂亚姆，1935年，第56-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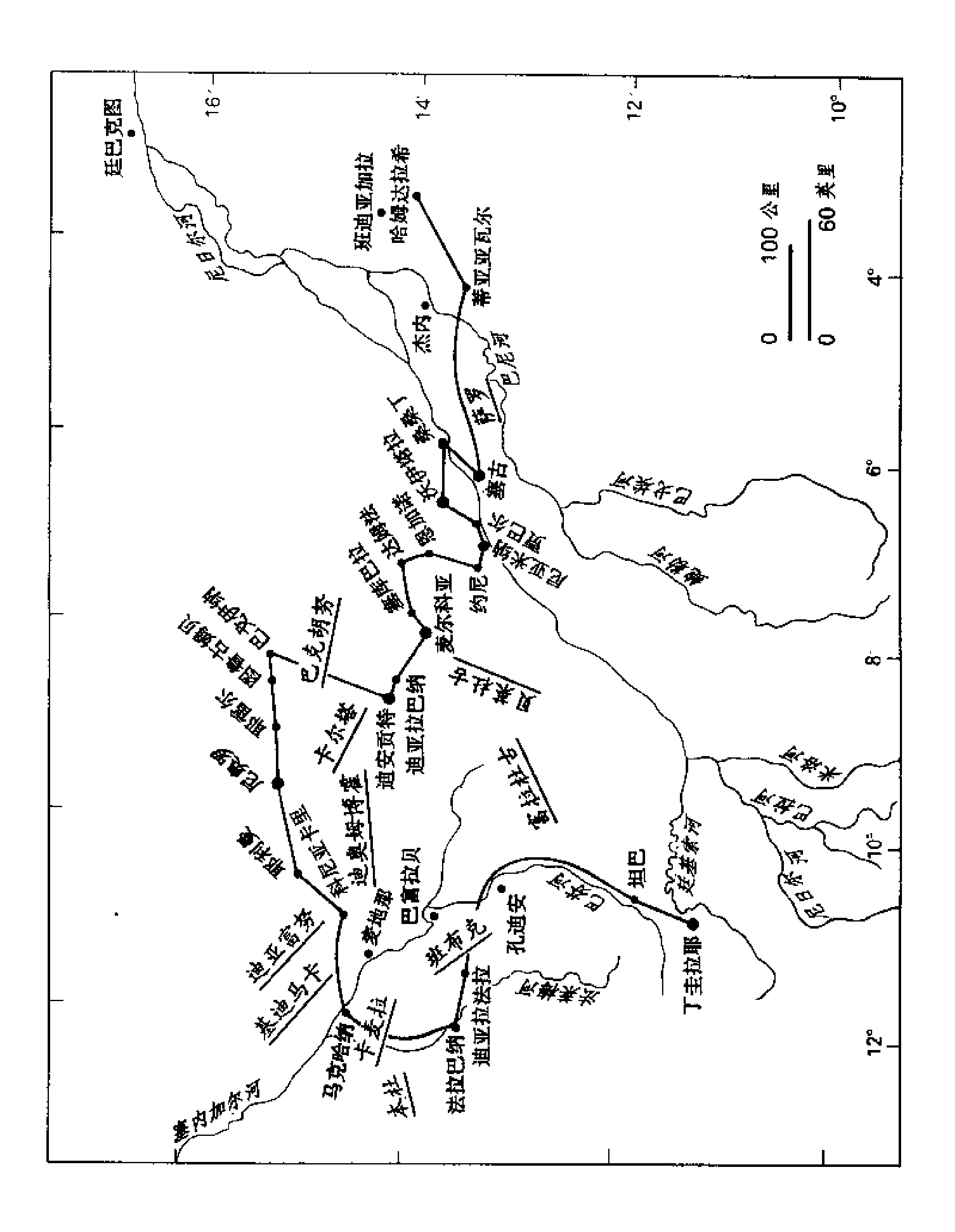


图 23.3 从丁主拉耶到哈姆达拉希（仿照 M. 利-塔勒图）

同样，在麦地那被围期间，我们知道他殚精竭虑，鼓励士气，使士兵们确信神的保佑和他们的灵魂将升入天堂。当时，保罗·霍利为了贬责他，曾问一个将死的年轻塔利布："可怜的人，今天早上为什么不是你们的阿吉神在最前面呢?"这垂死的男孩可怜地望了霍利一眼，高声喊道："天啊，天啊，我感谢你。我要死了！我看见天堂了……"

这支狂热的军队对付的敌军经常内部不和。在班布克、卡尔塔、塞古和马西纳，都是这种情形。它在军事策略上也占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声东击西、包围敌人、快速运动，还能运用先知和他的哈里发在短期内征服大片领土的所有军事技术。甚至恐怖行动也成为一种战略工具，对男子的屠杀和对妇女儿童的奴役，[92]摧毁了被威胁国家的士气，并使一些国家不战而降。当他们逼近一个国家时，做法总是相同的：派遣使者拜见酋长，请他改宗。如果他勉强同意的话，就让他把头发剃掉，脖子上挂一串念珠(satala，萨塔拉)，给他传授伊斯兰的基本戒律。对他的臣民采取同样的做法。一个塔利布和一小队驻军留下来巩固改宗的成果。这种和平改宗的做法，使他们免除了许多战斗，而这些战斗可能是很艰苦的。因此，坚固的法拉巴纳要塞被围时(1854年)，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1856年，哈吉吉·奥马尔向举行暴动的法拉布古人表示他愿意妥协；同年，占领迪安贡特后，他毫不迟疑地与卡莫里人谈判，使他们遵守穆斯林关于战败者财产管理的教规。[93]只有人们拒绝信奉伊斯兰教时才进行战斗。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最多。

这支军队的统帅是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贝拉·万。有一天就谁更亲近哈吉吉·奥马尔发生一场争论，是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贝拉，还是阿卜杜拉耶·豪萨？有人说是前者，有人说是后者。为了解决争论，双方派人去向奥马尔本人请教。奥马尔对他们说："如果有人带剑进来，让他选择割下自己的头，或奥马尔的头，阿卜杜拉耶·豪萨就会选择割下自己的头。如果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你会发觉，无论我做什么样的决定，阿尔法·乌马尔都与我意见一致。"[94] 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贝拉是圣战的关键性人物，而哈吉吉·奥马尔应该说是圣战唯一的中枢。

在富坦凯人的回忆中，其他军事领袖也很出名，例如，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莫勒·利(奥马尔最早的伙伴，死于麦尔科亚)；阿尔法·乌斯曼(死于马西纳)；马马杜·哈马特·库罗·万也是一名勇将。后者来自恩加诺村(卡内勒附近)，该村在圣路易当局新干预政策的压榨下饱受痛苦；1854年，他在法拉巴纳和全村人一道投奔哈吉吉·奥马尔。他是激烈反对法国的战士，他冒着炮火，设法向麦地那要塞进攻，把穆斯林旗帜刚刚插在要塞上就被一挺机关枪打倒，夺去了生命。

尽管这支军队很勇敢，组织良好，但是，它也避免不了那个时代所有非洲军队的一大弱点——生存依赖于战利品。穆斯林法律确实为战利品的分配作了一些规定，但事实是战利品在战斗中仍占重要地位，穆斯林法律难以有效实施。由于哈吉吉·奥马尔的品格，以及他注意定期而公正地分配战利品，因而维持了军队的凝聚力，直到他去世。在阿赫马杜

[92] 穆斯林法律只许战斗中杀死能够手持武器的人。不得杀死妇女和15岁以下儿童。
[93] M.A.蒂亚姆，1935年，第81、82、98、100、124-126页。他在基迪马卡和迪亚富努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94] 塔普西鲁·阿赫马杜·阿卜杜勒·尼亚甘恩，1981年5月3日的记录。

统治期间，上述情形不复存在，但军队在这一制度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帝国各省的忠诚有赖于军队。

各省行政管理：分权制

我们注意到，各行省星罗棋布，分散在以堡垒为中心的地带，伊斯兰教就从这些中心向周围扩张。最重要的省份，有丁圭拉耶、孔迪安、尼奥罗、科尼亚卡里、迪安贡特、迪亚拉、法拉布古、穆尔古拉和塞古。实际上，丁圭拉耶、尼奥罗、科尼亚卡里和塞古是地区首府。

丁圭拉耶位于富塔贾隆和曼德各邦边界上，是帝国第一个有历史意义的省份。哈吉吉·奥马尔的整个家族，在其子穆罕默杜·哈比布(穆罕默德·贝洛之孙)领导下，长期定居在这里。班布克的孔迪安要塞，名义上也归它管辖。这个要塞是在奥马尔直接监督下，于1858年建造的，目的在于维持曼德各邦的秩序。[95] 这个要塞给梅奇留下深刻的印象，据他说，626 "它会给一支发动攻击的正规军造成极大的困难"。要塞处于双重控制之下，行政官是一名贾恩戈族的自由民，他得到哈吉吉·奥马尔的堂弟、塔利布拉西纳·塔勒的协助。

尼奥罗是哈吉吉·奥马尔统治下最大的省份。该省有许多要塞，最重要的是法拉布古、迪安贡特和尼奥罗本城。马萨西人被赶出家园，他们的许多村庄就变成富尔贝人和托罗德贝人的大片殖民地。随着殖民政权越来越暴虐，从富塔来的移民日益增加。1857年成立的临时行政机关处于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贝拉的总体节制之下，1859年，为了适应塞古战役的需要，这个行政机关作了重大的改组。[96]马萨西人的抵抗最终被扑灭，谢库与许多地区的酋长离开了尼奥罗。所有留在卡尔塔的平民则由小股驻军保护。在迪安贡特，蒂尔诺·布巴卡尔·西勒·利取代了阿卜杜拉耶·豪萨；在法拉布古和尼奥罗，自由民丹丹古拉和穆斯塔法接替了哈利杜·埃利马内·登巴和阿尔法·乌马尔·蒂尔诺·贝拉。

迪奥姆博霍是离麦地那和巴克尔最近的行省。建于1857年1月的科尼亚卡里要塞，[97]是保护迪奥姆博霍免受法国人和他们的盟友迪乌卡·桑巴拉攻击的。1866年，塔利布的首领蒂尔诺·穆萨[98]热情欢迎梅奇，穆萨是地方会议的鼓动者(1860年他与巴克尔的指挥官为此签署了协定)；另一方面，该地区的军事长官桑·莫迪毫不掩饰他对梅奇的敌意。

尼奥罗离法国殖民者太近，我们知道，哈吉吉·奥马尔尤其讨厌与法国人同住一地。这无疑是塞古在托罗德贝帝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帝国的首都归阿赫马杜管辖。1864年前，塞古是一个省会，与其它省会并无两样，1862年4月以后，则由奥马尔的长子管辖。他得到他父亲一些老朋友的辅佐，如蒂尔诺·阿卜杜勒·塞古、蒂尔诺·阿赫马杜和桑巴·恩迪亚耶，后者是这个帝国大多数要塞的总工程师。[99]但是，宫廷中最有权势的人无疑是巴 627 巴·乌利博和博博，他们分别担任总督和外交顾问。[100]奥马尔前往马西纳时，为了保卫这个城镇及郊区，只带去1500名塔利布以及蒂尔诺·阿拉萨内·巴率领的由贾瓦拉和马萨西的索法(sofas)组成的一支分遣队。因此，阿赫马杜不得不处理这个省的一切事务，而哈吉吉·

---

[95] E. 梅奇于1863年到过孔迪安。据他描述这个要塞"有60米见方，4至8米高，基地有1.5米厚，侧翼有16个塔楼"(1868年，第82-83页)。

奥马尔只是途经此地，在这个省也像其它地方一样没有什么作为。[100]1863 年 2 月，由于马西纳的加入，这块巨大的领土在理论上扩展了。但是，3 月间那里爆发的起义，使统治当局一无所获：在奥马尔去世后，提加尼·阿尔法重新征服马西纳，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新皈依的地区，对伊斯兰的敌意是公开的，所有这些穆斯林要塞区，行政机构总有双重性，即由一个宗教首领在一个军事长官的保护下继续推行伊斯兰化。在每个要塞，奥马尔都有一所房子，住着他的部分家庭成员。因此，他认为自己像临时统治者一样居无定所。

像富塔托罗一样，每个行省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组织起来，哈吉吉·奥马尔只是整个帝国的精神领袖。如果我们相信梅奇的话，这个制度非常有效，他于 1863 至 1866 年期间曾访问过这个帝国的大多数省份。尽管有些地区存在分歧(考虑到新政府介入各民族的古老习俗引起的暴动次数之多，几乎不可能出现其它结果)，但这位法国旅行家还是对整个帝国统治的秩序和安全留下深刻的印象。[102]

所有省份的民事纠纷，均由卡迪根据《古兰经》进行审判；刑事犯罪和政治罪被送往省府由宗教领袖来处置。据梅奇讲，在塞古，只有卡迪和阿赫马杜本人是名符其实的审判者，对他们的判决不能上诉。在所有穆斯林国家，惩罚是相同的：最常用的是鞭刑，任何人都不能幸免，连帝国的高级官员也不例外。[103]

628 帝国的经济与财政

哈吉吉·奥马尔自己制订的目标对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发展几乎不做考虑。自从征服索科托以来财富便积累起来，加上从被征服人民那里掠夺的战利品，足以使战争机器继续运转，直到他死后这架战争机器才停止运转。因此连年战争所需的经济负担重又落到地方当局身上。

对于被征服国家的经济而言，十年战争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并不是所有省份都受到同样的影响。在这场圣战中损失最惨重的农业似乎在 1863-1864 年有了起色。梅奇曾经到过

---

[96] 据奥马尔·巴(Omar Ba)记述(无出版日期，第 96 页)这个行政机关 1857 年的状况：迪亚富努的行政官是蒂尔诺·朱巴伊鲁·布布·哈鲁纳；卡尼亚勒内的行政官是蒂尔诺·艾哈迈杜·乌马卡拉；尼奥戈麦拉的行政官是莫迪·马马杜·帕考；迪亚拉的行政官是苏莱曼·巴巴·拉基；法拉布古的行政官是卡利杜·埃利马内·德马；格穆摩拉的行政官是乌马尔·马马杜·拉米涅；迪安贡特的行政官是阿卜杜拉耶·豪萨；巴克胡努的行政官是阿卜杜拉耶·阿里。另见 B.O. 奥洛隆提梅欣(Oloruntimehin)，1972 年，第 92 页。

[97] 这个要塞全用石块建造，墙厚两米，高数米；经阿希纳德炮火轰击之后的要塞废墟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98] 1859 年他接替蒂尔诺·吉比担任这一职务。

[99] E. 梅奇，1868 年，第 222 页。

[100] 后者来自豪萨兰，在梅奇与阿赫马杜的谈判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是阿赫马杜的伙伴中最反对法国的。前者是乌利博·巴的儿子，他的父亲从尼奥罗就追随奥马尔，而他却是亲法国的。

[101] 他在塞古逗留一年，主要利用这段时间写书——Bayán Mawa ka。

[102] 他禁不住把这种状况与当时盛行的状况作比较，例如卡索的情形，根据他的看法，由于迪乌卡·桑巴拉不断地对邻国进行骚扰，这个地区极其混乱和不安全：E. 梅奇，1868 年，第 86 页。

[103] 同上，第 344 页。

的马丁卡诸国棉花尤其富足。在基塔省，村庄周围种着烟草、蔬菜、西瓜和 油脂树。[104]在巴盖的盖塔拉，卡戈罗人摆脱了马萨西人的高压，开始更辛勤地劳动，“(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将不再受到掠夺。这里安宁太平，每个人都在劳动，因为伊斯兰隐士哈吉吉·奥马尔命令这么做。”[105]

梅奇谈到了卡尔塔和迪安贡特地区的真正富足(在班巴拉-蒙坦和马迪亚加，小米大丰收)。但最重要的是迪安贡特村本身，它给这位法国旅行家留下的印象是那里盛产大米、小米、玉米、花生、棉花、西红柿、洋葱和烟草。“在晚上，他们给了我的随从们许多粉蒸羊肉，给了我差不多六公升牛奶。我们把这些食物都吃完了，因为有人正在给法赫马拉送礼物。”[106]

即使在这场圣战战利品中占很大比重的牛，在卡尔塔仍很多。[107]塞古省也很繁荣，那里的农业相当多样化，[108]成群的牲畜作为传统贸易品供给布雷地区。

在中苏丹，战争状态从未使贸易完全停止，所有交战国都从战争中获益。把中苏丹与北苏丹和南苏丹联系起来的主要商路一直很繁忙。许多商队从尼奥罗把盐和牲畜运到布雷，再从那里带回黄金和奴隶。[109]尼奥罗、科尼亚卡里、基塔、巴纳姆巴、尼亚米纳和塞古是进行这种贸易的主要中途站，而传统上这种贸易的终点是巴克尔、麦地那、弗里敦、巴瑟斯特和摩尔人居住地。但自从与法国人开战以来，麦地那和巴克尔的联系暂告中断。[110]梅奇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商讨恢复这种贸易。但马西纳发生宗教革命以后，像尼亚米纳和桑桑丁这样的城镇已趋衰落。廷巴克图的贸易中心桑桑丁已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奴隶市场。塞古的国王们和这个城镇的西塞族酋长们已从奴隶贸易中获取了巨大财富。[111]1860年9月，哈吉吉·奥马尔占领这个城镇后，禁止向这些国王或酋长们缴纳各种税收(因此使布布·西塞成为他的死对头)，并且用穆斯林税取而代之。但是，在1863年3月，当西迪·艾哈迈德·贝凯的使者们正努力争取使塞古和马西纳的整体提高时，阿赫马杜很不明智地向这个城镇征收一种特别税。于是这个富有的索宁凯人城镇加入这场叛乱，并迅速成为叛乱中心。 629

每次战斗胜利后，被征服人民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并被分成五部分，一部分归国家，其它四份分给战士们。在丁圭拉耶、尼奥罗和塞古逐渐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储备、牲畜和各种货物。哈吉吉·奥马尔定期把这些财富分发给他的塔利布们，[112]他本人完全靠自己的财产生活。扎卡特(什一税)只向穆斯林征收，这种税是用来满足多种需要的，如招待客人、帮助穷人和孤儿。[113]斋月期间，每个穆斯林都要进行每年一度的施舍或捐赠即“穆杜”

[104] E. 梅奇，1868年，第89-100页。
[105] 同上，第116页。
[106] 同上，第137-138页。
[107] 同上，第123页。
[108] 同上，第148、156、161、165页。
[109] 同上，第105-123页。
[110] 同上，第120页。
[111] 同上，第526页。
[112] 1859年他离开尼奥罗和1862年离开塞古时，都曾这样做过。
[113] 相当大部分税收用来赡养在这场圣战中死难将士的家属。

(mudu)，这部分钱物是给宗教官员(阿訇、卡迪、律师和古兰经读经师)的，也用于赈济穷人。“乌苏鲁”(usuru)最初只由商队来支付，税率为商品价值的十分之一，后来这种税扩大到畜牧业者身上，税率为每30头牲畜交纳1头牲畜。[114]

上述各种税收的安排和用途完全处于这场圣战领袖的监督之下，但在阿赫马杜统治期间，这些税收经常引发暴动。[115]还有来自塔利布的无声反抗，他们责怪哈吉吉·奥马尔的继承人不如他父亲慷慨。

由塔利布统治的社会

哈吉吉·奥马尔的塔利布由各种族的人组成，来自不同的国家。[116]他们的社会背景差异极大。王孙贵族和从前的奴隶可能成为最亲密的伙伴。我们知道，奥马尔的目标之一就是抵制传统贵族的统治，使社会民主化。

630

因此，在整个帝国，新兴的政治与宗教精英们取代了出身高贵的旧贵族，他们是根据学识和伊斯兰惯例选拔出来的。在所有的省会和大村庄，这些新兴的精英们(人数或多或少)帮助新皈依的居民们熟悉新宗教的仪式。例如，1864年2月在迪安贡特，有540名精英，他们来自各个阶层，有些人甚至会讲一点法语，这表明他们来自圣路易。在蒂尔诺·布巴卡尔·西勒·利的指导下，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清真寺附近的小茅屋里，读、写或教授《古兰经》。[117]他们占据了这个帝国的所有高级职位。因此在阿赫马杜统治期间，他们很快成为一群一意孤行的贵族。阿赫马杜既没有奥马尔的宗教才能，又没有他的军事才干，因此发现很难在他父亲的同事面前维护自己的权力；这就很自然地导致他依赖“索法”这一社会阶层。

这个阶层的功能是军事性多于宗教性，由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大众组成，被编入圣战大军。他们新近皈依伊斯兰，对伊斯兰只有一点粗浅的知识。[118]在奥马尔统治期间，他们构成恩盖纳尔大军的一部分，但这支军队的主力开赴马西纳后，阿赫马杜不得不为自己建立一支军队，因为从富塔来的移民宁愿留在卡尔塔，因为那里离他们的故乡近些，这使得他只好从被征服国家招募志愿人员。这些人被编成一支独立部队，为了削弱塔利布的影响，阿赫马杜甚至在行政机构中给予他们一些低级职位。在奥马尔的继任人统治的整个时期，塔利布和索法之间的对抗是他要面对的困难之一。

---

[114] B.O. 奥洛隆提梅欣，1972年，第177页。
[115] 据E. 梅奇记载(1868年，第275页)，1863年桑桑丁的索宁凯镇暴动就是因为一种特别税太沉重引起的。
[116] E. 梅奇，1868年，第78-344页。
[117] E. 梅奇，1868年，第141页。
[118] 索法和塔利布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受教育程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前奴隶成为塔利布。

哈吉吉·奥马尔的继承问题：阿赫马杜试图继承父业

艰难的继承：阿赫马杜的初期统治(1862-1869年)

代盖姆贝雷灾难事件发生后，哈吉吉·奥马尔的长子阿赫马杜发觉自己成了这个幅员辽阔、权力分散的帝国之王。帝国由四个像丁圭拉耶和塞古一样截然不同的省组成，前者由穆罕默杜·哈比布·蒂尔诺·穆萨管辖，后者由阿赫马杜本人统治。各省首脑定期向他汇报治理情况。[27]他在塞古就职的第一年一切顺利，但在1863年，在塞古和哈姆达拉希同 631



图片 23.4 位于塞古-锡科罗的艾哈迈杜的王宫大门

时揭露出一个阴谋。5月底与马西纳联系中断，使阿赫马杜陷入困境，他被孤立在一个敌对的国家里，身边只有少数随从(1500名塔利布)。为了对付这种情况，他征收特别税，这只能增加不安定因素。1863年12月，在桑桑丁，富庶的索宁凯城公开暴动，尽管阿赫马杜从尼奥罗调来2000人组成的增援部队，还是没能在桑桑丁重建他的统治。确实，这支刚刚抵达尼奥罗的托罗德贝移民新分遣队离开富塔与其说是去圣战不如说是为了避开法国人的势力。这些人没有受过哈吉吉·奥马尔本人精心的思想灌输，他们对世俗的财物更感兴趣。当他们成为桑桑丁的主人时，对战利品的贪婪使他们失去了胜利。[28]

[27] 毫无疑问，奥马尔把整个继承权留给他的长子。E. 梅奇(1868年，第113页)几乎在这一提名最终确认后一年在塞古收集到这一信息。当时甚至还无法肯定阿赫马杜是否知道奥马尔的去世。因此B.O. 奥洛隆提梅欣的假设对奥马尔的决定表示怀疑是无法接受的。

[28] 见E. 梅奇，1868年，第279页。

于是阿赫马杜发觉自己成了两种塔利布的首领：一种是他父亲从前的同事，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但把他当一个孩子看待，[121] 另一种是新塔利布，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且缺乏纪律性。不幸的是，他又打出第三张牌，即依靠来自被征服国家的志愿人员——索法。[122]

632

阿赫马杜受过高等教育，由哈吉吉·奥马尔一手培养起来，正像穆罕默杜·阿利乌·蒂亚姆所说，是他父亲给了他一切。尽管他智力超群，极端虔诚，但从未像他父亲那样坚持自己的权利。他精神不振，梅奇对他有如下描述：

第一眼看到阿赫马杜我以为他是 19 或 20 岁，实际上他已 30 岁。他坐在那里显得矮小，其实他长得高大健壮。他的脸长得很可爱，表情平静，看上去很聪明。他手里拿着一串念珠，在谈话的空隙喃喃自语。在他前面的山羊皮上放着一本阿拉伯文的书和他的凉鞋，还有一把宝剑。[123]

阿赫马杜统治初期碰到一些困难。尽管在尼亚米纳驻扎着一支大军以便维持与尼奥罗的联系，而且在特南古驻扎着另一支大军，但暴乱还是席卷了整个地区。直到 1866 年，成败还是未知数。在贝莱杜古遇到最顽强的抵抗，有时通往尼奥罗的道路甚至被切断。贝莱杜古和桑桑丁两地的暴动得到马里·贾拉支持，1869 年前人们因暴动一直处于紧张不安之中。农业乃至贸易在这些暴动中遭受巨大损失。有些村庄如通布拉，1863 年它的繁荣曾给梅奇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两年以后，这里只剩下废墟。不过局势还远没有糟到不可救药的地步。1866 年，这位对塞古政权的弱点明察秋毫的法国使者认为，阿赫马杜最终将重建他的政权，即使不是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那么至少可以在整个塞古省重建政权。1869 年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但在阿赫马杜与班巴拉的抵抗相争之时，他无力照顾这个帝国的其它地区。虽然穆斯塔法从尼奥罗定期向他汇报治理情况（当梅奇在塞古时，有许多尼奥罗的使者来到此地），但阿赫马杜的表兄提加尼·阿尔法就没有这么做。提加尼·阿尔法在征服马西纳后，以完全独立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说他也是奥马尔的合法继承人，并出示奥马尔给他的一些遗物作为证据。他巧妙地设法使哈贝人痛恨他们以前的富尔贝主人。提加尼·阿尔法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他在他的新都邦贾加拉使他舅舅的宗教热情永久存在。“在邦贾加拉，每天都在祈祷中度过，这个城镇像个大清真寺，提加尼是其住持。没有喧哗，没有歌声，没有音乐和舞蹈。”[124]

633

但是对阿赫马杜而言最激烈的抵制来自他的兄弟穆罕默杜·哈比布，自从他们的父亲去世后，他对阿赫马杜敬而远之。[125] 另一个兄弟穆赫塔尔在科尼亚卡里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权，还与哈比布达成协议，欲取代穆斯塔法（他仍效忠于阿赫马杜）在尼奥罗的统治。至 1869

---

[121] E. 梅奇，1868 年，第 318 页。

[122] 关于阿赫马杜与他父亲的塔利布之间的分歧，见前引书，第 222-305 页。

[123] 同上，第 214 页。

[124] 海军少校卡龙(Caron)的报告，Y. 圣马丁(Saint-Martin)所引，1970 年，第 103 页。

[125] 在哈比布知道他父亲把一切都留给阿赫马杜之前，两兄弟的关系似乎不错。例如，1864 年 2 月，梅奇与一帮索宁凯商人结伴同行，其中一人受哈比布委托把大量礼物带给阿赫马杜。见 E. 梅奇，1868 年，第 108 页。

年，塞古地区恢复了和平，阿赫马杜把他的兄弟阿吉布留在那里，自己启程前往卡尔塔。穆斯塔法提醒他注意，他的兄弟穆罕默杜·哈比布和穆赫塔尔对尼奥罗的威胁，那里的许多塔利布已经站到他们一边。穆罕默德·贝洛的两个孙子通过他们的母亲继承了这个显赫的母系家族的秉性，并为这个家族增添了非凡的智慧、宽宏和机智。[126]

阿赫马杜加强政权(1869-1878年)

对阿赫马杜而言，他决不能让一个敌对的首领在尼奥罗立足，这对塞古生死攸关。1869年底，他抵达卡尔塔。差不多在这同时，阿拉维王朝的一个摩洛哥谢里夫授予他重要的宗教头衔“信徒的埃米尔”，即信徒的领袖。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对他的兄弟们行使自己的权利。在随后的四年中，他继续与那些留在卡尔塔并支持哈比布和穆赫塔尔分享其父继承权的人作艰苦的斗争。同时，他在吉迪马卡和洛戈的哈松凯人领地加强他的权力，[127]还平定了班巴拉和索宁凯中心地带的一些叛乱。

1874年，他的权力达到顶峰。[128]但是，尽管他在这场兄弟互相残杀的战争中获胜，在卡尔塔，很长一段时间不安宁。塔利布们不同意拘禁哈比布和穆赫塔尔，因此阿赫马杜不得不与他的兄弟们作更多的妥协，更多地考虑他们的要求即共同治理他们父亲开创的帝国。于是，穆斯塔法在尼奥罗的统治更加巩固，他是1873年3月被阿赫马杜任命为尼奥罗首领的。他成了整个卡尔塔地区的统治者，手下的兄弟在丁圭拉耶是赛义杜、在科尼亚卡里是巴西鲁、在迪亚拉是达耶、在迪亚富努是努鲁。在每年一度的塔巴斯基节期间，他们都在塞古相聚，并取得共识。[129]阿赫马杜巩固了他在塞古的统治。他的非正式议事会包括宗教和 634 军事要人，如蒂尔诺·阿拉萨内·巴、蒂尔诺·阿卜杜勒·哈德里·巴、巴巴·乌利博和博博。由于吸收了他的一些亲戚如赛义杜·杰利雅和穆罕默德·杰利雅，议事会机构扩大了。在乡镇，总的说来，行政制度得以维持，阿赫马杜仅仅用桀骜不驯的酋长们较为友好的亲戚取代他们，并且为他们指定监督人。筑有防御工事的托罗德贝村庄在各地建立起来，从而加强了这些被征服地区的安全。[130]

随着与上塞内加尔地区法国人贸易点的交易，传统商业贸易得以恢复，[131]与英国人贸易点的贸易也得到发展，这导致经济的多元化发展。[132]豪萨人的贸易和柯拉果贸易也扩展了。1866年以后法国人更关心西非南部诸河流域地区的利益，不再干涉中苏丹事务，因此在中苏丹出现了新的平衡。但是，1878年法国人对洛戈的干涉使这一进程突然中断。

---

[126] B.O.奥洛隆提梅欣，1972年，第179页。
[127] 洛戈的酋长们从未承认法国人强加的对迪乌卡-桑巴拉的宗主权。
[128] Y.圣马丁，1967年，第150页。
[129] 这一制度从未完全起作用，1884年，阿赫马杜又回到卡尔塔与他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兄弟们对抗。
[130] 前法属西非档案，《塞古行政管辖区概述》，1G320/1 1904年，第15-16页。
[131] 阿赫马杜在与他的兄弟们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止了贸易往来。
[132] B.O.奥洛隆提梅欣指出(1972年，第207页)，1876年5月，冈比亚总督亲自率领一个英国使团前往塞古。



图片 23.5 艾哈迈杜在王宫接见来访者

635

结 束 语

到1878年，阿赫马杜清除了他父亲去世后面临的一切障碍。诚然，班巴拉人，尤其是贝莱杜古的班巴拉人仍在捍卫他们祖先的信仰。但是他们对这个帝国的统一已不再构成严重的威胁。[60]众多的要塞（对那个时期而言多得令人惊叹）和人人视伊斯兰为天职最终使这个大族群产生民族凝聚力。由哈吉吉·奥马尔本人开创的与各种族和社会阶层合作的政策大体上被他的子孙们和托罗德贝人继续执行，因此为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前托罗德贝帝国疆域上建立起来的前法属苏丹殖民地是西非各国中种族对抗问题最少的国家之一。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于传统信仰的各族人民显然会被伊斯兰施加的暴力所消灭，然而，这为更加和平地皈依伊斯兰奠定了基础。无论在塞内冈比亚（殖民当局认为这里已清除了奥马尔的影响）还是在中苏丹，在哈吉吉·奥马尔之后涌现的大多数宗教领袖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是继承了他的衣钵。

（郑文鑫译）

[60] Y. 圣马丁，1970年，第119页。

24 塞内冈比亚和上几内亚的国家和民族

Y·佩尔松*

从塞内加尔至班达马[1]的非洲西海岸各民族历史上是否存在过某种统一体，(尽管从19世纪初依法终止奴隶贸易至殖民大征服前夕的殖民时期以前，该地区历史上确曾有过某种共同性)，看来令人置疑。因此，所界定的这一区域包括迥然不同的各种文化地区。唯一明显可见的共同因素是沿此海岸扩展的欧洲影响，以及最早形成的殖民飞地。关于飞地将另章讨论。本章有必要从非洲民族的观察角度予以表述，因此将按地理分布依次探讨以下主要文化地区：塞内冈比亚、上几内亚和富塔贾隆、克鲁人国家、曼德南部，最后是从上尼日尔地区至班达马的曼德。 636

塞内冈比亚

塞内冈比亚[2]是古西苏丹文化地区(其特点是若干大的国家都有稳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与大西洋海岸相互联系的唯一地区，数百年来欧洲主要通过向美洲贩奴不断在这个地带进行侵蚀。这里各个社会由于有苏丹人和具有穆斯林特点，因此比几内亚湾的那些社会更为稳定，但也深受对其产品和人口的外部需求变化的影响。这个地区的奴隶贸易从1760年代以来日趋衰落，只在1780年代有一次短暂的增长。对于已经衰落而又以各种伪装或非法形式小规模延续至1850年代的奴隶贸易来说，无论是1808年英国颁布法律废除奴隶贸易，还是1831年有效实施法国的反奴隶贸易法，都没有什么重大变化。这个地区较为重要的经济变革是，塞内冈比亚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至1830年代，树脂的年均出口值是极盛期奴隶出口值的五倍多。除树脂贸易的复兴外，黄金、兽皮、象牙和蜂蜡的出口也有显著增长。后来成为19世纪中叶重要出口产品的花生，在这个时期也开始上市。[3] 638

对外贸易中的这些变化，对当地经济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收益从奴隶贸易谋利者手中转移到依靠这些新产品谋利的新集团手中。从18世纪晚期起，至少是因部分地不受欧洲因素的影响，伊斯兰教开始取得一种新的发展势头。农民开始大批地皈依这一宗教。这

---

(1) 上几内亚本土从冈比亚至帕尔马斯角。但是，克鲁人和阿坎人这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种族分界线，却在班达马以东更远处。本章采用此说。

(2) 关于沃洛夫人，见O. 巴(Ba)，1976年；B. 巴里(Barry)，1972年；L.G. 科尔文(Colvin)，1981年、1982年和V. 蒙泰尔(Monteil)，1966年。关于塞雷尔人，在J. 博利格(Boulègue)和M. 古依埃(Gueye)的论文之前，见M. A. 克莱恩(Klein)，1968年。关于冈比亚，见C. A. 奎因(Quinn)，1972年。

(3) 参见P. D. 柯廷(Curtin)，1975年、1981年。

* 1982年12月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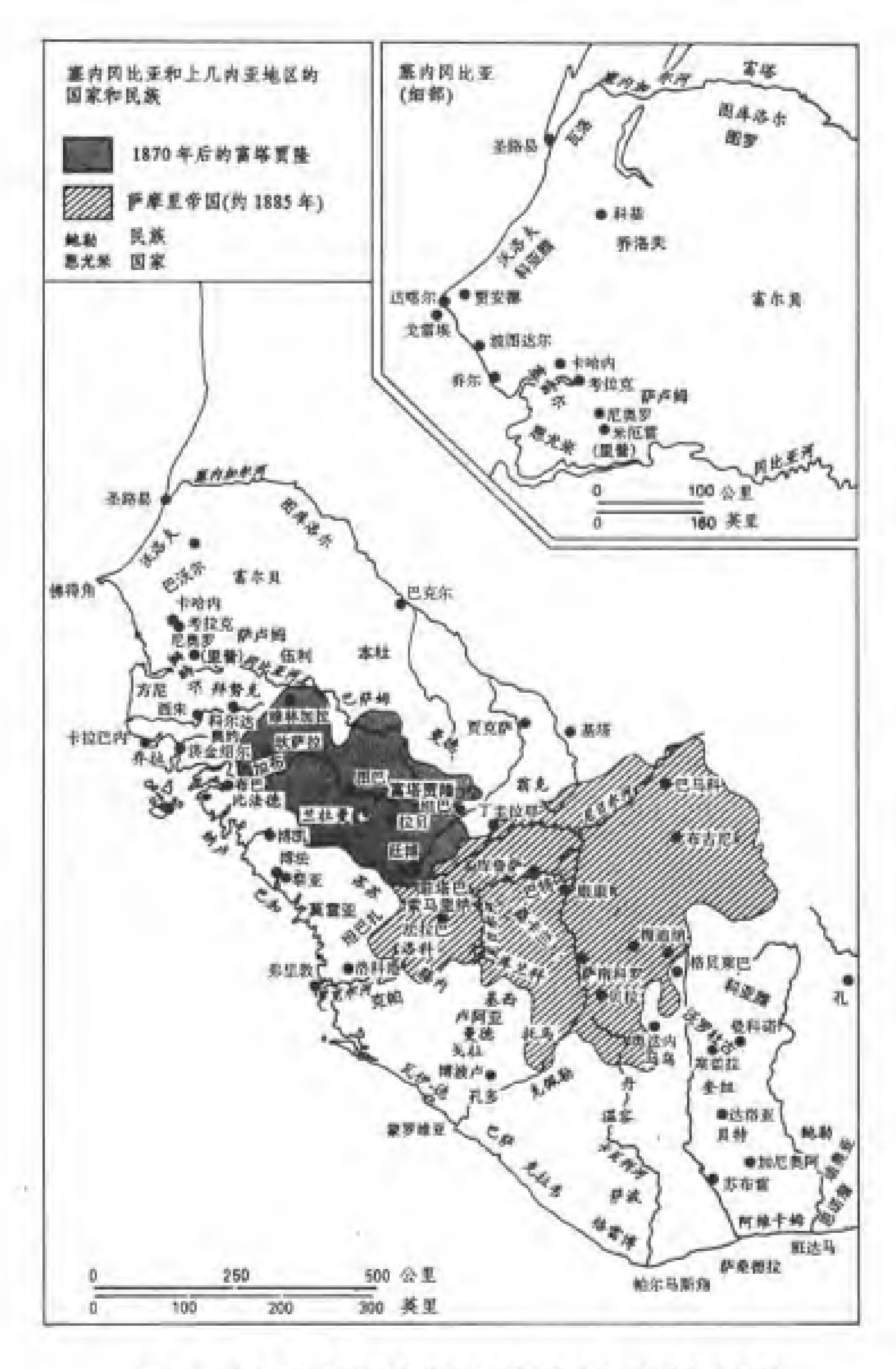


图 24.1 塞内冈比亚和上沃尔特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仿照 Y-珀森图）

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反对贵族的一种形式，因为贵族正在寻求从新的经济潮流中谋利，他们不是保护农民，反而劫掠农民。因此，塞内冈比亚各社会发现自己陷入两种新的力量之间，一种是新来的活跃的伊斯兰教，另一种是正在工业化推动下脱胎换骨的新的世界经济势力。那些陈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由于未能改革更新，无力应付使自己遭受灭顶之灾的严重危机。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一直延续到欧洲人征服带来一种新秩序时为止。

这种情况在北方的沃洛夫人和塞雷尔人的王国中尤甚。而这两个民族都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统一性。

1786年，卡约尔国的达梅尔(国王)阿马里·恩戈内毁灭性地击败了富塔托罗的阿尔马米·阿卜杜尔·卡迪尔·坎，重新建立这个国家和瓦洛国的贵族权力。但是，尽管卡约尔国的王公们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传统宗教，广大民众却加快向伊斯兰教转宗。

瓦洛国因靠近圣路易的法国贸易站也受到损害，圣路易在1809年至1817年之间落入英国人之手。瓦洛还处在特拉扎-摩尔人的直接压力之下，被迫割让了塞内加尔河右岸的领土，因而无力抵抗摩尔人的频繁进犯。这个国家受到削弱和侵扰，颇为困难地建立与欧洲的新关系。在葡属几内亚以北地区，隐蔽的奴隶贸易并不多。1817年，在法国重新占领圣路易和戈雷埃之时，需要为商业关系找到一种新基础。树胶、兽皮和蜂蜡是任何农民都能生产的商品。然而，在塞内加尔的法国人，像在南部塞拉利昂的英国人那样，也想建立起欧洲人管理的种植园，以替代西印度群岛种植园。这就是以棉花为基础的宏大农业殖民计划的目的。该计划由总督施马尔茨和巴伦·罗杰在1819至1827年间以牺牲瓦洛为代价提出的。这个计划由于技术上的失误，劳动力的短缺，商人的反对和非洲人的抵制未能实现。随后，采取了一种纯粹的商业政策，圣路易的商人只能按政策去适应首先是波尔多大出口商社的日益扩大的势力的影响。在塞内加尔河涨水季节，商人们前往河两岸的登陆地点，而毛里塔尼亚人和塞内加尔人则沿河上溯至远在加迪亚加的贝克尔。 639

有一段时间，法国人增加了交纳给沃洛夫贵族的“关税”。但是，此举只是加剧了这种政治制度中常见的争夺继承权之战。从1827至1840年，分别以布拉克·法拉·彭达·亚当·索尔特(1827-1840年)和布拉克·泽尔菲·扎里·达亚罗(1830-1835年)为代表的冲突，在特杰克(蒂戴克)和乔斯(德约斯)两个母系家族之间持续进行。但是，普通百姓却不支持任何一方。1830年，正在这整个制度看来摇摇欲坠之时，一位有社会地位的铁匠，即卡约尔的代尔，成为反抗贵族的穆斯林反对派的首领。在数周内，他以主张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的名义征服了整个国家。传统制度看起来已被摧毁，但是，圣路易的法国总督实行军事干涉，击败了代尔，并俘获了他，随之当众将他绞死。

在此之后，法国人拒绝再次干涉集团内的派系斗争，尽管特拉扎人经常越过界河劫掠瓦洛人。一些厌倦战争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摩尔人党。他们在1833年促成特杰克部族的年轻领袖恩詹博特(恩迪约姆博特)与特拉扎人的埃米尔穆罕默德·哈比布联姻。此举未能恢复和平，而圣路易的总督因发现自己处在摩尔人的包围之中，大发雷霆，于是倾全力支持乔斯人。然而，特杰克部族取得了胜利，而且在1846年恩詹博特去世之时，以布拉克·莫·姆博吉·马立克(1840-1855年)的虚名，将国家的控制权传给了恩詹博特的妹妹恩代特·雅拉。

一旦法国采取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圣路易外围的这种混乱局面就变不可容忍了。费德尔布总督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1855年1至6月发动三次军事战役彻底兼并了瓦洛国。这个国家被划分为五个行政区，但是，尽管人口在减少，这个古老王国的结局仍然是不得人心的。法国人试图利用布拉克王族的继承人，受过法国教育的利昂·乔普·西迪亚充当傀儡，却白费心机，只好将他放逐到加蓬。然而，从1855至1880年，法国人正是在这个国家使管理和征服的手段得以完善。此后不久法国人又在整个西非证实这些手段确有价值。

卡约尔比瓦洛国富裕得多，有更多的人口，距圣路易更远，它起初进行的抵抗也更加强硬。从18世纪中期直至1855年，卡约尔通过人员交往与巴沃尔(巴奥尔)的混血种人塞雷尔人王国结成联盟。这里情况也一样，以科基为中心的伊斯兰教高潮威胁了传统的贵族统治。尽管在1786年王族取得胜利，但许多穆斯林教徒逃往佛得角，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穆斯林的莱伯“共和国”。除了吕菲斯克这个颇不便利的港口之外，达麦尔没有其它通往海岸的出路。与其毗邻的贾安德(迪安德)省完全伊斯兰化了，因而也不可靠。但是，在1837年镇压了北方穆斯林教徒之后，梅萨·特内达·乔尔(1832-1855年)的统治就相安无事了。

640

接着，最后的危机开始了。法国人先是圈占戈雷埃岛，1857年占领了达喀尔，很快又采取步骤用电报与圣路易取得联系。卡约尔因而陷入两面夹击，随后在马科杜(1859-1861年)和马朱朱(1861-1864年)的短暂统治时期陷入混乱。但是在1862年，抵抗达麦尔的派别使年轻的拉阿特·朱尔·恩戈尔·拉提尔·乔普(拉特-迪奥尔)当选。后来他被法国人驱逐，投奔萨卢姆的伊斯兰教领袖马巴寻求避难，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提加尼教派。这个教派又称哈吉吉·奥马尔·塔尔兄弟会，利用各种同它有联系的伊斯兰教传教渠道，在一个先前只知有卡迪里教派的国家中迅速传播开来。教派的这种多样性是北非伊斯兰教隐士现象的前兆，后来成为该地区殖民时期的特色，而且还成为非洲抵抗运动的一个特点。1867年的欧洲危机，还有1870年的灾难，导致法国在海外扩张的收缩。拉阿特·朱尔作为行政区首脑又回到了卡约尔，取得了达麦尔的头衔，并立即着手完成这个国家的伊斯兰化，目的是要恢复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团结。他敷衍搪塞法国人，决心不作出实质性让步。1875年，在法国的援助下，他将图库洛尔的隐修士阿马杜·谢库逐出乔洛夫，并任命他的亲戚阿尔布里·恩贾伊填补空缺。

早在1850年，花生的种植已经遍布塞内冈比亚，从而使该地区依赖世界经济。这种情形因在达喀尔至圣路易之间修建铁路线的计划而强化了。拉阿特·朱尔原则上赞同此项计划，然而，他也认识到他正在失去自己的国家。1881年，他突然改变主意，禁止此项工程，宁愿作绝望的抵抗，也不肯屈服。在一场漫长的游击战之后，他死于1886年。他的死标志着卡约尔王国的终结和殖民秩序的建立。

乔洛夫国也经历了伊斯兰化运动大潮，由于贫穷又孤悬于内地，没有直接遭受欧洲冲击的影响。其历史演变与卡约尔历史密切相关，但是，阿尔布里设法拖延他的抵抗运动，时而积极，时而消极，直至1890年。他拒不向外来势力屈服，后来还加入哈吉吉·奥马尔之子、塞古的阿赫马杜的队伍，一起开往索科托的边境地区。约在1900年，他死在那里。这是自由非洲最后的几个地区之一。

从14世纪以来，塞雷尔人就有稳定的王国。其社会组织类似于沃洛夫人的社会组织，641 尽管其语言不同（很接近富尔富尔德语而不接近沃洛夫语），而且还有自身颇为突出的农牧混合型农业体制。西音人（西内人）是纯粹的塞雷尔人，直到法国统治时期尚未接触到伊斯兰教。更为强大的萨卢姆国，其同族性较少。18世纪时它就进行武力扩张，将其领土扩展到冈比亚。但是，这些东部国度的主要居民是沃洛夫人和曼丁卡人。萨卢姆的伯尔人向南扩张，进入了恩尤米和巴亚迪布（里普）的古老的曼丁卡诸王国。穆斯林少数派遍及各处，他们或是沃洛夫-图库洛尔教派，或是曼丁卡教派。纯粹的塞雷尔人传统主义地区只是首都卡哈内四周之地，邻近考拉克。

花生在此地的种植很早之前就已开始，经由冈比亚和小海岸角（乔尔、波图达尔）出口。天主教传教士也很早在这里出现，时在1849年。他们希望利用伊斯兰教尚未到来的时机和久已建立的葡萄牙-非洲人社会（刚刚放弃使用葡萄牙克里奥尔语）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至于下塞内加尔，塞雷尔人和曼丁卡人的传统主义贵族统治都处于困难境地。他们陷入欧洲人提出的要求和反叛的伊斯兰教的权力要求的双重夹击之中。反叛的伊斯兰教组织起农民和少数民族反对他们，提加尼教派的鼓动则是另外一个因素。如哈吉吉·奥马尔在发动他领导的战争之前，约在1847年访问了该国。他的信徒之一，马亚巴·贾亚齐（马巴）是一位图库洛尔的伊斯兰教隐士，居住在巴亚迪布的沃洛夫人社区中，宣称要推翻旧秩序。为了向他的导师表示敬意，他把自己的住所称做“尼奥罗”（Nioro）。

从1845年以后，在河南岸班珠尔附近的科姆博，一场类似的“伊斯兰教隐士之战”正处于狂热进行之中。1859年，费德尔布和冈比亚的总督本杰明·德·阿奇发动了一场针对萨卢姆和巴亚迪布的合击攻势，占领了考拉克。1861年，马巴集合起巴亚迪布的穆斯林教徒，并很快成为他们的首领。然后，他卷入了恩尤米的内战，但采取了克制态度，旨在避免惹怒英国人。1862年，他联合了东萨卢姆的穆斯林之后，对恩尤米国发动了攻击。伯尔人萨姆巴·芬贝·法尔尽管有法国人支持，也无法阻挡他的进攻。1865年，在拉阿特·朱尔的支持下，他又征服了巴沃尔的一部分和整个乔洛夫。由于威胁到法国人的卡约尔，在一次不重要的战役之后，法国人烧毁了在巴亚迪布的尼奥罗以作为报复。

然而，结局却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1867年7月，马巴入侵西内，但是在这个没有穆斯林的同种族国家，他遇到了塞雷尔人的一场全国性的抵抗，并被伯尔人库姆巴·恩多芬·朱夫（迪欧夫，1853-1871年）击败并杀死。

由于其继承者们争权夺利，马巴的四分五裂的帝国很快被削弱，这使萨卢姆的重建成为可能。可是，来自考拉克的法国人对萨卢姆的干涉变得越来越直接了。马巴的继承人纳 643 木尔·恩达里将他的势力扩展到尼亚尼和伍利，进而抵达冈比亚。不过，他在大河以南的插足却不成功。1887年，法国人毫不费力占领了该地区。

上几内亚和富塔贾隆地区

冈比亚河有数百公里之长的通航水道。数百年来，它为上塞内加尔和上尼日尔地区的乔拉诸国的金矿提供了出海通道。由此往南是一个颇为不同的世界，即上几内亚。这里的



图片 24.1 冈比亚沿海地区的曼丁卡人酋长们，1805年

农耕居民没有集中化的组织，大多讲西大西洋诸种语言，长期居住在海岸地带。从蒙罗维亚到冈比亚这片苏丹地区从18世纪才开始同这个海岸地带接触。这个地区也是欧洲人势力在克里奥尔人文化发源地——几内亚比绍以及后来的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影响最早的中心区之一。像塞内冈比亚一样，这个地区在16世纪是重要的奴隶贸易场所，但是，它的作用在18世纪衰落了。

在这个海岸地区之外，曼丁卡人和富尔贝人(富拉尼人、佩乌尔人)是两个最主要的民族。卡布的曼丁卡人帝国可追溯至13世纪，而且从16世纪以来一直独立于旧马里。至少自15世纪起，富尔贝人就一直生活在这一地区。不过，只是在1727年之后才建立富塔贾隆的穆斯林国家。

19世纪初，葡萄牙人的势力处于衰落之中，但是，在反奴隶制中心的塞拉利昂的双方，隐蔽的奴隶贸易仍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曼丁卡-卡布要维持其远至冈比亚河南岸的势力颇为棘手，后来同它原先的附庸拜努克人一齐在海岸地区失败了。福阿人(巴兰塔人)属于非集权化国家的农民，他们于1830年摧毁了拜努克的都城。拜努克人的大多数幸存者汇入了曼丁卡人，或是汇入了乔拉人(迪尤拉人)。乔拉人是强悍而又"不守法"的传统的稻米种植者，他们占据了直到北面的整个海岸地区。在东面，富塔贾隆的富尔贝人统治着曼丁卡人，其范围远至坎托拉的冈比亚地区。在卡布及其属国，一批势单力薄的富尔贝人对自身所处的屈从地位日益焦躁不满。

在这一时期，法国人在卡萨芒斯建立了商站。1836年在卡拉巴内，1838年在西朱(塞迪乌)也建立了商站。花生贸易很快发展起来，其经济和社会的后果可想而知[4]。

但是，旧秩序在1859年开始被推翻。当时，富塔贾隆，尤其是伟大的阿尔法·莫·拉贝(耶耶·莫多)发动了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反对卡布。卡布的国王亚吉·萨扬被杀。在廷博的阿尔马米·乌马鲁增援阿尔法·莫·拉贝之后，一度成为葡属几内亚的坎萨拉宣告陷落，这个旧帝国在1867年也随即崩溃。在曼丁卡人的各个属国中，布拉苏很快屈从，落入阿尔法·莫拉之手。但是，奥约却一直维持其自由直至1905年葡萄牙人征服为止。 644

卡布的陷落引起极大的反响，富尔贝人起而反叛他们的曼丁卡主子，其范围远至冈比亚河两岸。1869年，阿尔法·莫洛(其身世不详)从科尔达来到韦林加拉，并由西朱逆流而上，组建了富拉杜古王国。他含糊地承认了廷博的权威，并着手实行一种政策，使他的臣民们有组织地实行富拉尼化。直至他1881年去世时，这位新穆斯林统治者一直是曼丁卡人的苦难之源。

曼丁卡人试图在松卡里·卡马拉的领导下在西朱附近重新聚集起来。但是，他反对贸易的立场很快就遭到法国人的敌视。由于巴兰巴和穆萨·莫拉的富尔贝人联手反对他，使他1873年发动的反抗法国势力的叛乱终于失败。松卡里被迫屈服，但在1882年，他又一次投身于毫无获胜希望的反叛，从而结束了他的生涯。

(4) 关于卡萨芒斯，参见C. 罗奇(Roche)，1976年；F. A. 利里(Leary)，1969年。关于几内亚比绍和卡布，参见A. 台塞拉·德·莫特(Teixeira de Mota)，1954年；M. 曼尼(Mane)，1974-1975年；A. 卡里拉(Carreira)，1947年；J. 威莱兹·卡罗瑟(Vellez Caroço)，1948年。

冈比亚河两侧的曼丁卡人，在一位出身于贾赞克(迪耶坎克)血统的宗教领袖周围重新聚集起来。这位领袖来自上塞内加尔，他就是享有盛名的福德·卡巴·邓布亚。从1875年起，他成为军事统帅，在马巴人支持下抵抗阿尔法·莫拉的军队。然而，阿尔法·莫拉将他赶回西部。1878年后，福德·卡巴依靠对方尼的乔拉人(迪尤拉人)的控制来维持自己，并且使他们部分地皈依伊斯兰教。

曼丁卡人在卡萨芒斯的抵抗，虽然处在富尔贝人和法国人的夹击下，最终还是取得胜利。因为，在松卡里和福德·卡巴的影响下，他们全体归顺伊斯兰教，从而保持了他们的民族性。但是，在1883年，阿尔法·莫洛的儿子穆萨·莫洛倒向法国人，富尔贝人获得了某种优势地位。福德·卡巴利用英、法之间的对抗，设法维护自己在冈比亚河边境的地位，直至1901年他被消灭。像乔拉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抵抗一直持续到1913年，甚至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从18世纪初起，富塔贾隆地区强大的富尔贝人国家的发展，一直主宰着从冈比亚河至塞拉利昂整个地区的历史。[5]正因为如此，带有苏丹影响的长途贸易才找到了通往海岸的道路，与欧洲人联系起来。直到18世纪初，贸易一直是穿过由一个个分散的社会组成的世界困难地进行。现在，有了固定的商旅路线，从上尼日尔地区下来，越过富塔高原，可通往设在里奥-格巴(比绍和布巴)的葡萄牙人贸易站，也可抵达努涅兹河和庞戈斯河，1866年法国人在这里兴建了博凯，1867年兴建起博法。这条商路最后通往塞拉利昂。正是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花生种植业，尽管其自然产地有限。这就是19世纪法国旅行者提到的著名的"河岸角"，英国人称之为"北方河流"，这是因为它相对于塞拉利昂的位置而言。由于其港湾深曲、难以停泊，在19世纪中叶以前成为隐蔽的奴隶贸易地区之一。

645

该地区奴隶贸易的持久性，也由于其靠近富塔贾隆。庞大的富尔贝人国家对奴隶的需求贪得无厌，或发动袭击掳猎奴隶，或从内陆地区大量引进奴隶，或从沿海地区少数民族中掠取奴隶。有些奴隶随后转供出口。

19世纪初，富塔贾隆的富尔贝人社会看来是相对稳定的。圣战的胜利者已经建立起新的贵族统治。贵族居于极为严格的等级社会的塔尖之上。在国家一级和几个有很大独立性的省份(diwal)，以及各个"教区"(missidi，每个"教区"均有一个"贵族"村和许多小农庄)，都由一个自负而高傲的阶级在发号施令。战败者，特别是原来的居民贾隆克人(雅隆卡人)，其所受压迫之深竟使他们失去自己的语言。而不断输进来的奴隶又扩大了这一阶层的人数。他们至少占人口的四分之三，受尽残酷压榨且被严密监视。在这个严酷的社会里，在各个阶级之间还有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贫困者，实际上是法律之外的遗弃者：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富尔贝人家族，他们在圣战中没能夺得地产，在"教区"之间的公有土地上依靠瘦弱的牧群艰难度日。在信仰方面，伊斯兰教文化得到迅速的传播，经常使用书面形式的富尔富尔德语，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罕见的。虽然有高度的文化，这个贵族阶层仍主要从事畜牧、战事以及某些形式的冒险贸易。支撑政治结构的文化传统依然存在，而且在

5. 关于富塔贾隆，参见T. 迪亚洛(Diallo)的论文，1973年。富尔贝人的主要文本已由A.I. 索(Sow)于1966年和1968年出版，关于这类信息的概述文章在1966年发表，见Y. 珀森(Person)，1974年，关于富尔贝人，参见J. 蒙德斯·莫雷拉(Mondes Moreira)，1948年；W. 德曼(Derman)，1973年。

富古姆巴省已地方化了。该地区的伊斯兰隐士通过就任阿尔马米(伊玛目——国家的历任统治者)这一圣职来裁决政治上的争端。

但是，富尔贝人没有垄断宗教，他们甚至将一种声望赫赫的角色委托给被视为中立的外人，这些人是我们已熟知的一个少数民族，即贾赞克人(迪耶坎克人)。他们从16世纪起，以经商活动方式先是走遍了冈比亚地区，随后又走遍富塔地区和河网地区。这些西部的乔拉人(迪尤拉人)首先是信教者，原则上说也是非暴力者。在富塔地区，除了从事长途贸易之外，他们还是图巴镇的宗教文化大师。图巴镇位于拉贝附近，约建于1810年。贵族对他们予以鼓励，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中立，他们的影响也从上尼日尔河流域的康康扩展到塞拉利昂的欧洲人商站。



图片24.2 富塔贾隆的都城廷博风光，约1815年

富塔贾隆的力量在于军队，成群的白袍骑兵从沙石高原奔袭而下，完成袭击任务后返回高原。但是这支军队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团结，而18世纪后期的冲突几乎使它完结。为了保存这支军队，贵族们在1799年达成妥协，以减少对军队的危害。阿尔法亚和索里亚两大家族各自同时指定一名阿尔马米在廷博轮流执政，每两年轮换一次。这一著名的妥协虽然执行得不总是那么顺利，发生过多次冲突，但大体上说还是有成效的。内战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特性和取得权力的正常方式，统治者们不过只是限制暴力的数量而已。此举本身避免了王国的崩溃，双方的分裂在每一个省和"教区"的层次上重复进行。因此，尽管贾洛(迪亚洛)控制着的北方大省拉贝，其势力要比富塔地区所有其它力量都更为强大，但它却从未打算分离出去。 646

所有这些分歧都是深刻的，以致限制了富尔贝人推行侵略政策的能力。实际上，富塔的国土范围在19世纪初才得以形成，从未进一步扩张，唯一的例外是拉贝。那些未被充做

647 奴隶的贾隆克人在东部和南部重新组织起来。他们背靠曼丁卡人，并且日益吸收曼丁卡人的文化。其结果是坦巴王国的出现，这个王国封锁了尼日尔河的通道，控制了布雷的金矿，因此，在法拉巴的堡垒要塞周围组织起索里马纳，封锁了富尔贝人通往南方的道路。这条道路还被横跨尼日尔河浅滩的桑卡兰地区的曼丁卡人建立的法拉纳封锁住。

对于19世纪初这种边界僵持状态来说，唯一的例外是拉贝。它在19世纪初向北扩张还没有越过格兰德河的上游区域。然而在1810-1820年，它向前挺进，很快就抵达冈比亚河的上游地区，在那里控制了坎托拉的曼丁卡人。这种扩张意味着要在行动上毁灭各种传统守旧的坦达人集团或巴迪亚尔家族(查皮、帕凯西和巴萨里)。这一扩张行动也是强有力的阿尔法・莫拉贝的事业。阿尔马米们的行为支持了他，他们呼吁整个富塔拿起武器进行一次十字军讨伐。在乌马鲁，情况尤为如此。索里亚的阿尔马米从1840年执政直至1869年去世，他就是利用在北方的战争来弥补因被胡布人击败而遭受的损失。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扩张取得的最终胜利是在1867年摧毁了卡布的曼丁卡人帝国，而且至少还暂时地摧毁了阿尔法・莫洛的富拉杜古的新富尔贝人国家的顽抗。

当拉贝在北方日益壮大时，廷博周围的派系战争却是19世纪上半叶一场无休止的血腥游戏。具体情况已为人所共知，在此无需赘述。经过19世纪初阿布杜莱・巴班巴(阿尔法亚)和阿布杜勒・加迪里(索里亚)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之后，阿布杜莱的儿子布巴卡尔・莫多违背轮流执政的规定，独自掌权达12年之久(1827-1839年)。这场内战在1844年全面展开，当时，哈吉吉・奥马尔从他那著名的朝圣之旅归来，在富塔附近居住。从那时起，这个制度又或多或少地正常运转起来。对此，仅以这位提加尼教派隐士的威望无法做出全部的解释，因为他在1847年前后肯定已离开富塔。事实是，在19世纪中期，富塔的贵族们已捐弃前嫌，因为他们被迫面对一种新危险：胡布人的反叛。

“安拉的使者胡布人”，即热爱真主的人，看来属于从富尔贝贵族分裂出来的卡迪里教派中的一个极端教派。在哈吉吉・奥马尔的影响下，其成员大多加入了提加尼教派。富尔贝人毕竟对奥马尔的激进主义不放心，下令让奥马尔离开这个国家。可以肯定，胡布国的奠基者莫迪・马马杜・朱厄(迪乌厄)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他是一位知名学者，曾在毛里塔尼亚拜谢赫・西迪亚为师。虽然这点还没有人进行扎实的研究，还是可以提出如下设想：这场宗教革命使富尔贝人社会中的被遗弃者得以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活动。胡布人的组成看来包括了被分离出来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富尔贝人，贾隆克人出身的农奴或新近输入的奴隶。

648 1849年，反抗运动在富塔各地全面爆发，但大都被镇压下去。反叛者们四处避难，或逃往边远地区和沿海地带或逃往上尼日尔地区。他们先是在朱厄的亲自领导下，后来又在他的儿子阿巴尔领导下在菲塔巴驻扎下来，因而对贵族统治构成严重威胁。阿尔马米从未成功地消除这一威胁。尽管反叛者人数甚少，但他们吸收了来自各地的流民和难民，而且在他们的博凯托要塞营造一种狂热的神秘主义气氛。他们是令人生畏的战士，在富尔贝人当中肯定引起了某些反响，因为阿尔马米难于动员本国的力量去抵抗他们。胡布人两度焚毁了廷博，而所有对博凯托的进攻都失败了。1871年，在试图攻占博凯托的战斗中，阿尔法亚的阿尔马米易卜拉欣・索里・达拉阵亡。最后，富尔贝人不得不求助于萨摩里(胡布人阻碍其向沿海地区进军)，才在1884年摧毁了博凯托这一抵抗中心。

萨摩里于1879年抵达富塔的边界。富尔贝人认为，同萨摩里结成联盟对自己有利，于是向他出售牛羊，换取奴隶。甚至在胡布人的威胁减轻时，富尔贝人社会仍然只能维持分裂的局面，对随后的殖民征服无力进行抵抗。

富塔贾隆的形成取代了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开拓了一个广大的领域，使苏丹地区的贸易可抵达海岸，不过安全保障仍然只是相对的，而且富尔贝贵族对保护商旅有自己奇特的想法。1827年，勒内·卡耶从博凯穿越这个国家前往尼日尔河的经历便是一个明证。

沿海地区的开发影响及苏丹地区，急剧地改变了低地民族的文明，尤其是这些民族大都不得不接受富塔贾隆的政治权威。[6]

在西北方面，富尔贝人控制了现为几内亚比绍的许多地方。这一领地在1867年坎萨拉陷落后进一步扩大了。再往南面，他们控制了里奥-努内兹的上游通航地段，并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博凯的兰杜曼人，还通过兰杜曼人与欧洲人接触。兰杜曼人虽然在1840年曾屠杀富尔贝商人，却无力解脱自己，1844-1849年陷入一场长期内战之中。1856年，费德尔布建造了一座要塞，使他们提前进入了殖民时代。

在海上，几内亚比绍的比法德人和里奥-努内兹的纳卢人在其居住的沼泽地上逃避了富尔贝人的管辖，但几乎不妨碍与欧洲人的贸易。塔韦拉的纳卢人民族声称有曼丁卡人血统，然而他们的文化却没有显现出曼丁卡人的影响。他们的突出表现是迪纳·萨利富国王对法 **649** 国权威进行的自相矛盾的抵抗。

再往南到里奥-庞戈斯，在紧邻博法而居的苏苏人中，廷博的权威极为强大。苏苏人与曼丁卡人有密切关系，其文化深受海岸和森林地区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巴加人（滕内人的亲族）的影响，他们被苏苏人同化了。苏苏人深受奴隶贸易之苦，而且，在美洲和英国奴隶贩子后裔的许多混血家庭中可以看到欧洲人的影响。由于他们，隐蔽的奴隶贸易未能轻易地消失。然而，由于苏苏人居住在靠近富塔贾隆的边境线上，伊斯兰教也渗入他们之中，他们的文化在殖民地时期加速苏丹化了。居住在庞戈斯河流域的居民建立了泰亚王国，由丹巴族人（卡蒂人）控制。始于1865年的"姆拉托（黑白混血人种）战争"，因拥护奴隶制和亲富尔贝人派的失败而终止。当法国人于1868年占领该地时，一些莱特伯恩-廷博人默认了自己失败的命运。

继续往南，富塔人的权势并未扩大到海洋。但是，苏丹地区的影响却是很深刻的。从18世纪中期以来，图雷氏族的一个分支控制着莫雷亚国（梅拉科里）。这个氏族作为经商者来自康康，其语言为苏苏人所同化，但依然尊奉伊斯兰教。[7]这个小国的阿尔马米，在索里马纳的贾隆克人帮助下，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从1865年起，他们分裂了，原因是亲伊斯兰教的阿尔马米博卡里派和马里基·格利的"马里吉斯特"派之间无休止的内战。1869年驻在本蒂不远的法国人并未改变这种局势，因为这场冲突随后变成英、法两国争夺边疆的一部分。这激

---

[6] 关于沿海地区历史的研究非常不平衡，今几内亚共和国的历史被忽略。W. 阿欣（Arcin）那本引起混乱的著作（1911年）迄今仍在使用。关于塞拉利昂，参见C. 法菲（Fyfe），1962年；O. 戈尔格（Goerg），1980年；J.S. 特里明厄姆（Trimingham）和C. 法菲，1960年；A.M. 霍华德（Howard），1976年。关于本书之前的时期、W. 罗德尼（Rodney）非常有趣的概述（1970年），还有Y. 珀森的评论（1971年）。还可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洲通史》第3和第4卷。

[7] 关于南部的苏苏人，尤其是莫雷亚危机，见Y. 珀森，1965 1975年，第2卷。

起了萨坦·拉海的滕内人和卡里穆(坦巴扎的酋长、英国人的大敌)的苏苏人的干预。1884年后,萨摩里本人也参加进来。直到1889年英、法两国划定分界线后,事态才得以解决。

莫雷亚的情况很能说明自18世纪以来在河网沿海地区发挥作用的社会-文化现象。操各种不同语言、生活在沿海农业文明地区的各民族,早在16世纪中叶就受到因松巴人入侵带来的北方影响,而且接受了这种影响。此后,随着苏丹地区商人来到沿海地区,这些古老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曼丁卡人和富尔贝人各处定居,控制了政治,带来新的政治思想。那些实行平等,还未完全分化的社会因而接受了新的社会组织,形成尚武的酋长国和半集权化的国家。然而,这些民族保留了他们的文化特性,为数甚少的新来者在语言上完全被同化。这种现象基本上存在于南部苏苏人国家和林巴人、洛科人和滕内人的领土,在塞拉利昂突然截止,即南部森林地区的边缘地带,主要是靠近苏丹地区贸易路线一带。但是,其重大的社会影响却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因此,从滕内到利比里亚的克佩勒,其社会和政治生活是由一些大的成年人入会组织所控制。其中最有名的男性成年人会社称为"波龙"(塞努福人称"波罗")。[8] 因此,这一基本的社会现象并不限于刚划定的历史地区。

650

洛科人曾是曼德人的先头部队,他们背靠海洋,被孤立于滕内人和林巴人之间的地区。他们在曼丁卡人的一个亲族的统治下谋求生存,这个亲族使他们拥有一个伟大的首领叫帕-科巴,他是萨摩里的同盟者。[9]

1787年以后,滕内人(讲一种接近巴加和兰杜曼语的西大西洋语言)不得不将塞拉利昂让给英国殖民地,作为查禁贩奴用的巡逻艇的基地。正是在此地很快出现了克里奥尔人社会。他们的主要中心区在洛科港。该港是从富塔和上尼日尔地区来的商队的终点站,苏苏人曾于18世纪末在此掌权。1818年,伊斯兰化了的滕内人驱逐了苏苏人,他们的首领"阿尔卡利"(alkali)于1825年同英国人结盟。滕内地区的北面为坎比亚所控制,由萨坦·拉海家族实行统治,尽管这个家族已经完全同化了,它仍然声称是巴特(康康)的图雷人的后裔。在罗克尔河的南侧,约尼人成为滕内人的先遣队,随着弗里敦的贸易在其周围地区发展使他们深感孤立。此时,克帕-门德人的扩张又封锁了他们的南面。为摆脱困境,他们投身于长期的战争。这一问题由于1886年英国军队的到来迎刃而解。

然而,在罗克尔河以南的地区,情况颇为不同。这个地区茂密的森林阻碍了它维持同苏丹地区的联系,尽管在16世纪就开始建立这种联系。另一方面,沿海地区过去奴隶贸易兴旺,而且这种贸易以隐蔽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845年,尽管弗里敦和蒙罗维亚就在附近。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内陆的历史才向我们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当时,塞拉利昂的克里奥尔人所建立的贸易网络已经扩展到那里,并且开始使这个地区纳入了世界市场。但是,这个贸易网络不像在北方那样,它没有与通向苏丹地区的商路终点站联接起来。这个新出现的角力场所导致地方性冲突的增加,也使这些冲突具有新的倾向。

651

18世纪时在滕内人的南面,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南方曼德族,即门德人,其血统与托马人相近。他们极力恢复向外扩张。由于门德人吸收了布隆人(布隆人由此永久地脱离了基西

⑧ 见K. 利特尔(Little),1954、1965、1966年。

⑨ 关于洛科人和某些滕内人,见Y. 珀森,1968-1975年,第2卷。关于门德人,见K. 利特尔,1954年。

族），使他们离海洋更近了。门德人建立了强大的尚武的酋长国，并相对地集权化，其妇女在政治上起了突出作用。他们的先驱克帕-门德人由于同约尼人发生战争而与英国人结成同盟。1880年前后，克帕-门德人的统治者是名声大震的马丹·约科。在他们领地的最东面为卢阿瓦人的酋长国。在19世纪末它一度是强大的征服者凯-伦杜的属国。凯-伦杜是基西族人，他的雇佣军勇敢地对抗萨摩里的先遣队，还深深地侵人现今为利比里亚的克佩勒和托马地区。[10]

门德人的进军把两个关系密切的曼德族——科诺人和瓦伊人分离开来，科诺人困居于当时尚未勘查的蕴藏有钻石矿的内陆山区；瓦伊人至少从15世纪中期起就扎根于现为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接壤的沿海地区。瓦伊人从16世纪的松巴"帝国"那里夺得并保持了相当大的酋长领地。18世纪，它在该地区特有的奴隶贸易中起过积极作用。因此，说瓦伊人助长了延续到1845年前后的隐蔽奴隶贸易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在该地区奴隶贸易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西班牙人佩德罗·布兰科。这些与外部世界的暧昧关系引起了瓦伊人文化的大变化，但也表现了瓦伊人的创造性。约在1818年，他们发明了(如何发明的不详)少数几种典型的非洲手写字体之一。[11]

但是，从18世纪以来，瓦伊人和他们东部的邻居，讲克鲁语的蒙罗维亚的德人，因受到来自内地的戈拉人积极扩张的影响，被困居于沿海地区。[12]戈拉人和基西人都同样使用西大西洋语言。在北部，瓦伊人又受到门德人及其亲属部落的压力，只好离开孔加巴的家园，向大海方向前进。19世纪初，他们的先遣队与克佩勒人相遇，对沿海各族和通往苏丹的道路进行干预。

接着来到圣保罗河一线，该河将蒙罗维亚沿海同孔扬高原连接起来，成为该地区曼丁卡人苏丹范围的边境线。一般说，罗克尔河以南(以及把上尼日尔河流域同塞拉利昂沿海相连接的富塔贾隆)一直到班达马甚至到最东面的科莫埃河的丛林地带是不可逾越的。不过，在圣保罗河，我们发现了一条介于大海和草原区之间的荒僻路径，由此可以确定瓦伊人的居住地和蒙罗维亚的后来位置。在16世纪，强大的松巴人入侵开拓了这条路，后来弃置不用。18世纪，奴隶贸易终于从塞拉利昂扩展到克鲁人海岸，这条通道又繁忙起来，用于从内地输出奴隶。因而在18世纪末，从孔扬高原大批涌来的曼丁卡人在博波卢的酋长国周围建立起孔多人的尚武国家。博波卢的酋长们决心保持这条道路的畅通，他们在圣保罗河的下游，组织了一个包括托马人(洛马)、克佩勒人(格尔泽)、瓦伊人、德人和戈拉人酋长国在内的同盟。1820年后不久，博波卢成为萨乌·博索的都城。萨乌·博索因其"幸运军人"称号而出名，他像瓦伊人一样，成为利比里亚奠基者的盟友。但在1830年以后，他的

652

[10] 关于凯-伦杜的生产和他的雇佣军泰约格布费，见Y.珀森，1968-1975年，第2卷，其中列出直到1970年的完整的参考书目。还可参阅K.C.怀利(Wylie)，1970-1971年。

[11] 关于另一种观点，见A.琼斯(Jones)，1981年；Y.珀森，1982年。关于瓦伊人的手写字体，见P.海尔(Haire)，1963年。

[12] 本文没有提供关于利比里亚国家的历史书目。关于戈拉人，见W.L.阿兹维杜(Azevedo)的著名论文，1969-1971年。关于克佩勒人，见R.M.富尔顿(Fulton)最近的著述，1968年。关于一般性评述，见G.施瓦伯(Schwab)和G.W.哈利(Harley)，1947年(附有截至1947年的参考书目)。

权力受到戈拉人的酋长詹金斯的威胁。1836年在他死后，孔多人的霸权就衰落了。[13] 于是，利比里亚人只好同过去怀有敌意而现在成为统治者的戈拉人打交道，在安德森于1869年旅行至孔杨高原时，情况更是如此。1885年后，在萨摩里的部属参与下，这条道路重新开通，直到1898年，戈拉人占据的领地才归属蒙罗维亚政府。

克鲁人集团

我们还应提及的最后一段的沿海地区，是从蒙罗维亚至班达马，这里形成了克鲁人各族聚居的广阔森林区的前沿地带。[14] 克鲁人是林区农夫、猎人，但也是出色的水手。他们因其生理人类学特点（缺少镰状细胞）和所讲的声调语言而出名，其独特性使人们无法将他们划入任何已知的群体。

这期间，在大海和班达马以西的大草原之间还无法通行，因为峡谷在18世纪初一直被鲍勒人所封闭，很多河流也难以通航。在这个发展过快的国度里，其社会既没有中央集权的传统，也没有长途贸易，只有在相邻民族之间传送货物的转运交易。因此，这个国家的
653 历史是一些小集团不断分裂、夺占地盘的历史，是他们之间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以及近数百年来同欧洲人海上贸易关系的历史。克鲁这个名称看来是克拉威（Krawi）一词的误称，克



图片24.3　克鲁船民



图片24.4　克鲁人的房屋

拉威是介于巴萨人和格雷博人之间的西部族群中一个沿海民族。这一名称也用来指整个语系中最具代表性者。尽管克鲁人有很大的同种性，还是可以分出两个族系，分别居住在萨桑德拉河两岸，东岸是贝特-迪达人集团，西岸是巴桀人集团。我们将着重论述后者。

19世纪初，在人烟稀少的内陆地区，温容族系（克兰人和格雷人）东-西向迁移运动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他们从萨桑德拉河越过吉格洛河和图莱普勒高原，来到卡瓦利河流域，大

[13] 关于博波卢和孔多，见S.E.霍尔索（Holsoe），1967年。

[14] 对克鲁人海岸已开始广泛研究，见G.E.布鲁克斯（Brooks），1972年；C.贝伦斯（Behrens），1974年；R.W.戴维斯（Davis），1976年。关于内陆的研究情况正在好转，见G.施罗德（Schroder）和D.西贝尔（Siebel），1974年；A.施瓦茨（Schwartz），1973年，施瓦茨关于塔布地区（象牙海岸）克鲁人的论文即将发表；E.特雷（Terray），1969年。

约在19世纪中叶，其前锋进抵吉奥人(丹)领地，最终在塞斯托斯河上游扎下根。在他们的左侧，自称萨波人的族群向大海挺进，到达西纳河口附近，因而将克拉威人几乎分隔为两部分。来自同一地区的各个族群，聚居在卡瓦利河下游，逐渐与格雷博人融合。居住在沿海地区的这部分格雷博人，至少从1701年起就由东部通过海上移来，并定居在这里。

然而，最显著和最闻名的变化发生在海岸地区。这里，农民和水手，或称“丛林居民”和“渔民”之间的区分由来已久。然而，18世纪在这个迄今相对贫瘠的地区，奴隶贸易却巩固了“丛林居民”的地位。但是，似乎是不久之前(约16世纪)来自内地的“克鲁人五城镇”的著名集团，在奴隶贸易中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在这个集团中农民和水手这两个社会群体彼此紧密融合。围绕塞塔-克鲁人形成的这个地区就成了克拉威国的中心区，并与塞拉利昂有着特殊联系，这为文化上的变革带来了新的刺激。看来，从1780年代起，许 **654** 多船只在开往几内亚湾之前通常都带上“渔民”作为译员或船工。这种交易活动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一度中断，但在1815年以后又迅速地恢复。当时，隐蔽的奴隶贸易与刚兴起的合法贸易并存。大批克鲁人很快就在弗里敦，后来又在蒙罗维亚立足，充做劳工和伐木工。他们一直很团结，但也接受了克里奥尔人的文化。沿海各族系(“渔民”或“克鲁人”)利用同内陆地区的联系招募劳工。在整个19世纪沿着海岸向东航行的船只几乎没有不带“克鲁人”的。这种活动逐渐扩大，一直到达萨桑德拉河。1850年，自汽船广泛取代帆船后，这种活动在性质上有所变化，但其程度未变。

欧洲人的活动逐渐渗入克拉威以东至黄金海岸由沿海渔民组成的古老社会。这个社会崇拜卡瓦利河口附近有名的赫迪埃“巨怪”，并以此为象征，吸引了远至象牙海岸的阿拉迪亚国的居民。航船西行时常常向南绕行远离海岸，返航时则要避开逆风和落潮。但是这对克鲁人并不是问题，由于他们付得起船费，可以在东面很远处下船登岸，不用费力就可到家。在汽船时代，这种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因为汽船在沿海往返于同一条航道。

1821年后，利比里亚政府几乎控制了海岸边缘地带。这已不属本章叙述的范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弗里敦开始发生的文化变革，在某些受新教传教士影响的地区，尤其在格雷博人中间，表现明显。格雷博人开始用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并日益形成民族意识。1871年，当他们听说黄金海岸的芳蒂人成立联盟的消息后，也建立了一个“格雷博王国”。利比里亚人在1910年前一直未能用武力消灭它。格雷博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之一，就是后来闻名于象牙海岸的先知哈里斯。⑮

在萨桑德拉河流域以外的克鲁人领地，可以见到诸如加尼奥阿的贝特人和一些迪达人的聚居点，他们的地区受到森林边缘民族如南方曼德人、古罗人或鲍勒人等向北扩张的压力。18世纪期间，曼德人和古罗人的政治制度，除班达马地区之外，因人数不多的阿坎人的到来而得以巩固。这种外来的压力，还有另一些阿坎人，即阿维卡姆人——纳简人(阿拉迪亚人的先遣队)，在班达马河口立足，限制了迪达人，把鲍勒人也融合进来。

与此同时，萨桑德拉河的航线还处在克鲁人的领地内。有些船只在各段河区航行，此外，苏布雷或加尼奥阿向沿海地带东-西向扩展的民族迁移活动表明，欧洲人贸易的影响正

⑮ 关于哈里斯，见G.M.哈利伯顿(Haliburton)，1971年。

在扩大。这些民族的到来加强了河口地带的内约人，他们的文化通过与欧洲来的商船，尤其是来自利物浦的商船的接触，开始发生变化。然而、很多暴力事件也表明，这些沿海民族是很早以前就使这个地区获得“恶人海岸”之称者的后代。

南方曼德人的世界

在几内亚大草原和沿海民族之间，是南方曼德族散居的地带，其中主要有：门德人、托马人、克佩勒人(格尔泽人)、丹人(雅库巴人)和奎纽人(古罗人)。[16] 他们生活在靠近森林的草原地区，或是密林深处，常常向大西洋沿岸派出先遣队探路。虽然他们来自大草原的边缘地区，但其文化与河网地区的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甚至与克鲁人文化也有相似之处。他们没有集权化的国家结构，其政治生活受秘密会社控制，这些会社除其它产品外，还制作各种引人注目的面具。

这些演变中的民族，他们的历史与沿海民族的历史密不可分，他们总是混居在一起。但是，如不考虑南方曼丁卡人的因素，也无法解释这段历史。南方曼丁卡人在北部与他们为邻，数百年来一直往回驱赶他们，而且渗入他们的居民中，影响其文化，并不顾及各种曼德语言之间疏远的亲属关系。

南方曼丁卡人(不包括科诺人和瓦伊人)分布在从富塔贾隆边界直到班达马的尼日尔河上游地区。他们在那里遇到塞努福人和鲍勒人。显然，他们属于苏丹大草原地区的国家。大草原的南部从来不属于马里帝国，但是，在 19 世纪初，南方曼丁卡人(数百年前不是逐走就是同化了那里的门德人或沃尔特人)一批组织涣散的农民占据了该地区。这些农民的经济生活与长途贸易网密不可分，他们把南部林区的柯拉果运往尼日尔河航线。这些东-西向商路的终点必然是有大批掮客聚集的村庄，便于同“林区居民”接触。正因为同这些“野蛮人”有经常的接触交往，商贩们才得到柯拉果的可靠供应。重要的手工业，特别是编织业也同这些交易活动有联系。

656

森林边缘地区从东到西的各个地段都同更北面的台地有联系，例如，桑卡兰人和库兰科人与基西人之间的联系；贝拉的托隆人和孔扬人与托马人和克佩勒人之间的联系；奥迭内国(卡巴杜古人)和图巴的马乌人与丹人之间的联系；最后，还有塞盖拉的沃罗杜古人和蒙科诺的科亚腊人与古罗人的联系。探险者勒内·卡耶对这里兴旺的投机贸易做了生动的描述，因为柯拉果保存期短，其价格往往暴涨暴跌。

在这个由尚武贵族统治的普遍因循保守的社会中，伊斯兰教是一个不可或缺又无处不在的少数教派，很自然地与上述贸易网有联系。然而，在南方，这个贸易网遇上了难以逾越的森林障碍，而林区又是柯拉果的产地。实际上，直至殖民征服时，这个地区的显著特色就是与大海隔绝，只是在西部由上尼日尔地区通往富塔贾隆和河网地区或塞拉利昂的一

[16] 关于整个南方曼德人的情况，我冒昧提及拙著，文中附有几乎是完备的 1970 年前的参考书目，有的甚至还不止 1970 年：Y. 珀森，1968-1975 年，第 2、3 卷。第 3 卷有全部索引。这部著作旨在全面描述 19 世纪该地区的情况，不仅限于评述萨摩里。关于他的生平，在 Y. 珀森 1972 年的著述中有详细叙述。关于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萨摩里的早期情况，见 Y. 珀森，1974 年。

段才可通行。此外，从孔扬到芒特角(蒙罗维亚地区)也有一小段可以通行。这些商路只是在18世纪随着奴隶贸易的扩大才变得重要起来。在东部，班达马人曾为沃罗杜古人，还有更远的孔人地区提供了一条通道，但是这条通道大约在1720年被鲍勒人封锁了。此后就意味着到科莫埃或库马西去找一条通往大海的出路。南方曼丁卡人地区因而是一条死路，而且，它在传统上就是朝向尼日尔河和它的文化发源地苏丹地区。

18世纪，远在这个地区的西部，米洛河的康康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由于利用了富塔贾隆的出海口，它因而成为在科莫埃的孔国的一个对手。康康的位置得天独厚，位于通往巴马科上游航线的终点，又是由基西国的林区以及由海上经富塔贾隆或塞拉利昂抵达康康的最短路线的汇合点。它曾是著名的曼宁卡莫里人或穆斯林曼丁卡人的中心，其文化渗透到整个乔拉(迪尤拉)人社会中那些奔走于南部商路的小商贩和大富商。卡巴人控制着康康，他们是一个政治、宗教和经商兼而有之的家族，不过在宗教方面，他们同谢里夫教派有竞争。马马杜·赛努西·卡巴长期统治该城(大约从1810至1850年)，他一直维持与廷博人的联盟，而且极少参与战事，只是因坦巴的贾隆克人几次封锁塞古人的贸易路线而与之发生战争。但是，大约1845年，哈吉吉·奥马尔从麦加返回时途中顺访了该城，这些因他而皈依伊斯兰教的卡巴人在1851年发动圣战初期帮助他摧毁了坦巴的贾隆克人王国。阿尔法·马马杜·卡巴接着又试图以武力强行控制传统守旧的邻国，但是，孤立无援的康康还没有足够力量做到这点。卡巴人遭受几次重大挫折，康康也因商业上受封锁而衰落。他们因此于1874年求助于萨摩里·杜尔这位正在把南方诸国组织起来的新兴的穆斯林征服者。 657

实际上，南方曼丁卡人旧的社会秩序早在哈吉吉·奥马尔访问之前，就在康康的南部、在托隆和孔扬等地开始崩溃。其原因极可能是：18世纪期间开拓通往“河网海岸”的商路扩大了穆斯林商人的队伍，提高了其地位的重要性。由于存在隐蔽的奴隶贸易，因地方性战争造成的奴隶输出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期，在富塔贾隆使用奴隶持续到殖民征服时期。接着，对进口布匹和欧洲武器的需要也变得日益迫切。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人口不断增加的乔拉少数民族，通过伊斯兰教认识到北方的圣战和穆斯林神权政治国家是其基本需要。富塔人的影响经由康康扩展开来，而柯拉果商旅的足迹远达谢赫·阿赫马杜的马西纳。乔拉人和穆斯林教徒终于不再接受整个社会为他们划定的地位，此时这个社会固守传统，变得僵化已不可能进行改革了。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地方性冲突，从西北的象牙海岸波及到上尼日尔地区。但是，所遇到的抵抗是十分顽强的。如果要使运动广泛展开，就需要在当地出现这样一个人，他迫切要求变革而又不损毁他所在的社会，而且还能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以便推进新的举措。这就是萨摩里以及他所从事的事业。笔者曾建议将这场运动统称为乔拉革命。不过，如果以此来称呼18世纪初孔帝国的兴起，那么，萨摩里的运动只能叫第二次乔拉革命了。

第一次改革运动约始于1835年，在远至南部的托隆和孔扬交界地区，离托马的柯拉果产地不远。发起人叫摩里厄尔·西塞。他是一位宗教人士，出生在康康地区却成长在富塔。他把梅迪纳(托隆)新城中各区的冒险者都集合在自己周围。在经历了破坏性的激进活动期之后，他于1845年被杀，而他的国家也临近崩溃。后来，由他的两个儿子，塞雷-伯莱(阿

卜杜拉耶，1845-1859年）和塞雷·布雷马（易卜拉欣马，1859-1881年）重建这个国家时，大家才清楚地认识到必需同当地居民实行妥协，并且对当地的制度表示一些尊重。但是，兄弟俩的地位仍然是既不可靠又不稳定。他们一度大力扩张，将权势向南扩大到越过上孔扬地区，远达克佩勒国的森林边缘地区。但他们从未设法与北方的康康建立联系。此时在萨巴杜古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传统军事首领南特内-法穆杜·库卢马，他组织力量反抗上述两位穆斯林实权人物，使自己跻身于他们之间（下托隆）。

但是，在横跨托隆和孔扬的米洛河上游地区，另外一支乔拉亲族贝雷特人，以科纳特传统主义者的名义建立了地方霸权。他们封锁了由西通向西塞人住地的道路。西塞人两次击败他们，但只是为萨摩里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658 摩里厄尔被瓦卡巴·杜尔所杀。瓦卡巴是来自奥迭内地区的一位乔拉青年，他起初在摩里厄尔手下作战，但后来不得不去保卫他母亲所在的村庄。从18世纪以来，奥迭内地区一直被固守传统主义的军事国家纳法纳所占领。纳法纳国为了保护乔拉人曾击退塞努福人。瓦卡巴设法动员起穆斯林教徒，同时也使许多传统主义者承认自己，因此，他摧毁了纳法纳国，在其废墟上建立了卡巴杜古国（或卡巴萨拉纳）。新王国由于利用的好，比西塞人的领地更强大，也更为稳定。它主要是沿着东-西向的柯拉果贸易路线向图巴扩展。1857年，瓦卡巴去世。他的儿子瓦木克塔尔（1858-1875年），是这个家族中最好战的统治者，他两次鼓动他的堂兄弟布努·马梅里在布古尼（马里）通往北方的瓦苏鲁地区，为杜尔家族再开创一个新王国（1868-1870年和1873-1875年）。西塞人的干涉和瓦苏伦克人的反对挫败了这一宏伟计划。瓦木克塔尔死后，这个计划即告破灭。

之后，卡巴杜古经受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在瓦卡巴的幼子曼格贝·阿马杜（1875-1894年）登位时，许多藩属地区反叛。他的主要将领之一，瓦库鲁·班巴分裂出去，建立了一个靠近图巴的军事小国，后来又扩大至塞盖拉和曼科诺。阿马杜用了数年时间以武力来强制实行他的权威。因此不难理解，当萨摩里于1881年出现在其边界时，已经削弱的卡巴杜古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的队伍。这一降服又由婚姻予以保障，显得真诚且持久。

由于篇幅所限，不容我们论述第二次"乔拉"运动，如基西国在森林边缘地区和福德·德拉梅·苏莱曼尼·萨瓦内发动的那些运动，或曼科诺（象牙海岸）的科亚腊人发动的赫迪·莫里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伊斯兰教和贸易世界相关联。尽管它们纷繁复杂，仍清楚地表明：这个少数派不再接受它的传统地位，而且能够倾覆整个社会。他们提供了为理解萨摩里所需的结构框架。萨摩里将这个运动推向顶峰，他消灭或战胜他的一切敌人，特别是整个曼丁卡人，包括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传统主义者，都接受甚至期望他造成的这一破坏。

萨摩里·杜尔来自下孔扬地区，即托隆边界上的米洛河上游地区。他的祖辈曾是康康地区的穆斯林商贩。由于他们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传统气氛的环境里，并在这里通婚，于是逐渐地回归到传统的宗教习俗，成为织工、农夫和牧人而定居下来。约在1830年，萨摩里出生于曼亚姆巴拉杜古村，在其祖辈中，卡马拉或科纳特——传统守旧的农民——要多于穆斯林商人。

萨摩里为了逃避父亲的权威而重操商贸行当。他的母亲在与贝雷特的战争中(1848年)被俘。他为了解救母亲加入了西塞人的队伍，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当他与梅迪纳的主子们闹翻时，贝雷特人因看中他的才干要召募他(1859-1861年)。但是在1861年，萨摩 659 里因自己孤立无援且被人追捕，不得不自立自强开创个人的事业。

近年来出版的若干著作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里无需再详述。萨摩里成功地赢得了卜托隆地区的传统主义者的拥戴，这些人都是他的母系亲属。他们面对四周兴起的穆斯林征服者而感到孤立无助，因而求助于这位有军事才能的杰出的"外甥"。事实上萨摩里保护了他们，直至法国人入侵。同时，他也侵占了他们的一些自由权利。作为回报，他们援助萨摩里去征服他的第一个领地。他对曼丁卡人社会施行改革，结束其内部冲突，开通商路；他解放乔拉人穆斯林教徒，也不把传统主义者变为奴隶。他的这些领导作风很快获得了大批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因而士气高涨，从1871-1881年不断加快了扩张速度。未曾预料的法国人入侵改变了这一运动的特性，其时扩张势力已接近顶峰。

萨摩里得到大多数卡马拉的支持，因而得以征服其他民族。他以萨南科罗为基地，首先使自己成为米洛河上游地区的统治者，又取得西塞人的承认，并且很快征召后者对抗贝雷特人。贝雷特人被消灭后，塞雷-布雷马十分关注这一新兴力量。但是，萨摩里却躲进托马人的森林住地，以避免同他们的冲突。1867年，他带领新军队卷土重来，利用西塞人在瓦苏鲁地区竭尽全力卷入反对自己的时机侵占该地。

接着，萨摩里认真地组织和装备他的军队，将上孔扬地区让给萨泽及吉奉行传统主义的卡马拉人。他没有与卡马拉人作战，声称因卡马拉人是他的亲族。1871年，他向北进军，消灭了传统主义的南特内-法穆杜的霸权，而西塞人是在抵抗南特内-法穆杜时最终失败的。在新近征服的比桑杜古的领土上，他建立了自己的都城，以此表明他既不借助亲族也不依靠他的出生地，是独立地创建自己的帝国的。

西塞人不敢反抗，萨摩里于是与康康结成同盟，他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打破了它的商业封锁，维持了他本人对战败者的权威。他使自己成为富饶的上尼日尔河流域的统治者。此地从富塔贾隆和库鲁萨的边界直至锡吉里和布雷。因此，萨摩里一步登天，处于一个帝国的顶峰，其帝国疆域绝对大于他的先辈和邻国的领土。帝国的规模随即产生组织结构上的问题，为此，他模仿图库洛尔帝国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机构，以便于进行管理。他现在与图库洛尔帝国为邻，但对它很快就产生了一种无言的敌意。可以想象，如果他希望继续向北扩张，他就必须设法消灭这个帝国。

但是，过于仓促的扩张很快就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1878年，西塞人将萨摩里赶出桑卡兰，并着手重新征服西部和塞拉利昂，其目的旨在包围萨摩里的领地。康康在图库洛尔人的影响下，也脱离了他。于是在1879年，萨摩里同时把矛头指向他的两个穆斯林邻邦，660 利用它们兵力分散的弱点，打了两场漂亮的战役(1879年12月至1881年4月)歼灭了对方。康康最后再度降服，一部分卡巴人逃往塞古，从那里带回了法国人。西塞人现在成了阶下囚，梅迪纳也被摧毁，居民被迁往比桑杜古。奥迭内也被占领，从而敞开了通往上象牙海岸(现代的科特迪瓦)的道路。

萨摩里在格贝莱巴村度过了1881年的雨季，当时，塞内加尔总督阿拉卡梅萨给他带来

了法国人的挑战。接着萨摩里向尼日尔河进军。基塔的法国司令官命令萨摩里不得进攻康康人正在坚守的肯耶兰。1882 年初开始的军事冲突一直延续到 1896 年，其中有过几次停火，但在本书中无法详述，因为无论是从编年史的角度还是从事件的主题来看都超出了本书范围。

到 1881 年时，萨摩里的帝国已经建成。这是一个军事霸权，改变了曼丁卡人的社会但又没有摧毁它的结构。穆斯林商人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但传统主义者也保持了应有的自由。大约在 1868 年，这位君主接受了含有军事首领之意的“法阿马”(faama)头衔，在 1884 年又按富塔贾隆的习俗接受了阿尔马米的头衔。这表明在兼并康康之后，穆斯林势力的影响大增，但是由此引起的认同性危机已不属本章论述范围。这个问题与对法国人开战是有关系的。

1880-1881 年，这个新帝国虽然由一个伊斯兰化了的军事阶层管理，却不能看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萨摩里并不是一个有教养的穆斯林，尽管他竭尽全力自学，但为时已晚。他建立起一个控制国家的军事制度，有时还仿效富尔贝人和图库洛尔人的某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没有像他们那样重视宗教。萨摩里是一个政绩卓著的经验主义者，他 20 年的治理给予这个社会一种新的平等公正，使乔拉人得到更多好处，由此缓解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危机。我们暂且不谈他已建立的功业，因为他又突然面对法国人的入侵，这使他一生事业的结局有了一个新方向。它不再是按非洲的思路解决非洲危机，重建非洲社会的问题，而是力图击退外国入侵，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生存下来。

结 束 语

在殖民者征服非洲之前的那段时期，本章涉及的这个地区唯一的一个普遍因素，就是欧洲影响的渗透。这种影响在沿海地区无疑很强烈。这里，隐蔽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叶。不过，有个重要的情况是，非洲出现了新的农产品：棕榈油和花生。这些新产品的出现使原来一直供贵族使用的欧洲产品得以普及到百姓之中。因而，沿海地区早在军事征服和确立政治统治之前，就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并产生了经济上的依赖性。

661

在内陆地区，欧洲的影响要弱得多，同伊斯兰教有联系的苏丹地区的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但是，正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才能说明乔拉革命发生的原因。萨摩里并不理解这一点，他所建立的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所作出的反应，而帝国的建立成功地推迟了殖民征服达 20 年之久。

（吴必康译）

25 尼日尔河湾和沃尔特地区的国家和民族

K. 阿尔欣
J. 基-泽博

19世纪对尼日尔河湾和沃尔特地区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各种大变动的时期。662 政治和制度的崩溃尤其影响了中央集权国家的体制，特别是那些建立了帝国的国家，如阿散蒂、孔国、莫西以及班巴拉等国。更重要的是，这一瓦解不但源于内部的冲突，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外部原因，特别是商业流通领域的显著变化。

特别是集权国家的民族出现了迁移运动。这股民族迁徙浪潮大体上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民族分布状况。经济上的种种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预示着另一个时代即殖民时代的来临。这些变化通常是政治变化的原因，而有时是政治变化的结果。由于萨赫勒地区伊斯兰霸权和欧洲殖民化推进的促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迅速传播。所有这些进程都造成该地区面貌的急剧改变，使之衰弱并促进甚至导致殖民制度的建立。

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大变革

在18世纪期间，沃尔特流域和尼日尔河湾诸国是超越该地区的政治势力的中心。这个中心取代在16世纪后期已衰落的加奥大帝国，并力图利用因奴隶贸易给黄金海岸造成的新的经济和政治局面。然而，19世纪新的情况导致各大王国的瓦解，并促成那些尚未被中央集权国家合并的民族的迁移活动。

阿散蒂体制的兴衰

18世纪，阿散蒂王朝在黑沃尔特河湾地区南部和森林腹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1] 663 由于它的创始人奥塞·图图，以及奥波库·瓦里和奥塞·科若，这个帝国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围绕库马西和金凳子(西卡德瓦)建立起统治中心。它对沿海和北部地区的附属王国行使无可争议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与库马西的奥约科氏族联合的诸王国逐渐臣属这个中心，并向它进贡。这是因为奥塞·科若首先在库马西实行结构改革，后来又将改革扩大到邻近的阿坎人诸王国：曼姆蓬、恩苏塔、德瓦本、贝克瓦伊、科科福、博诺，以及登基拉、阿哈福、塞弗威、阿丹西等。在该地区，库马西赫纳(库马西国王)成为阿散蒂国王。阿散蒂王

[1]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5卷，第12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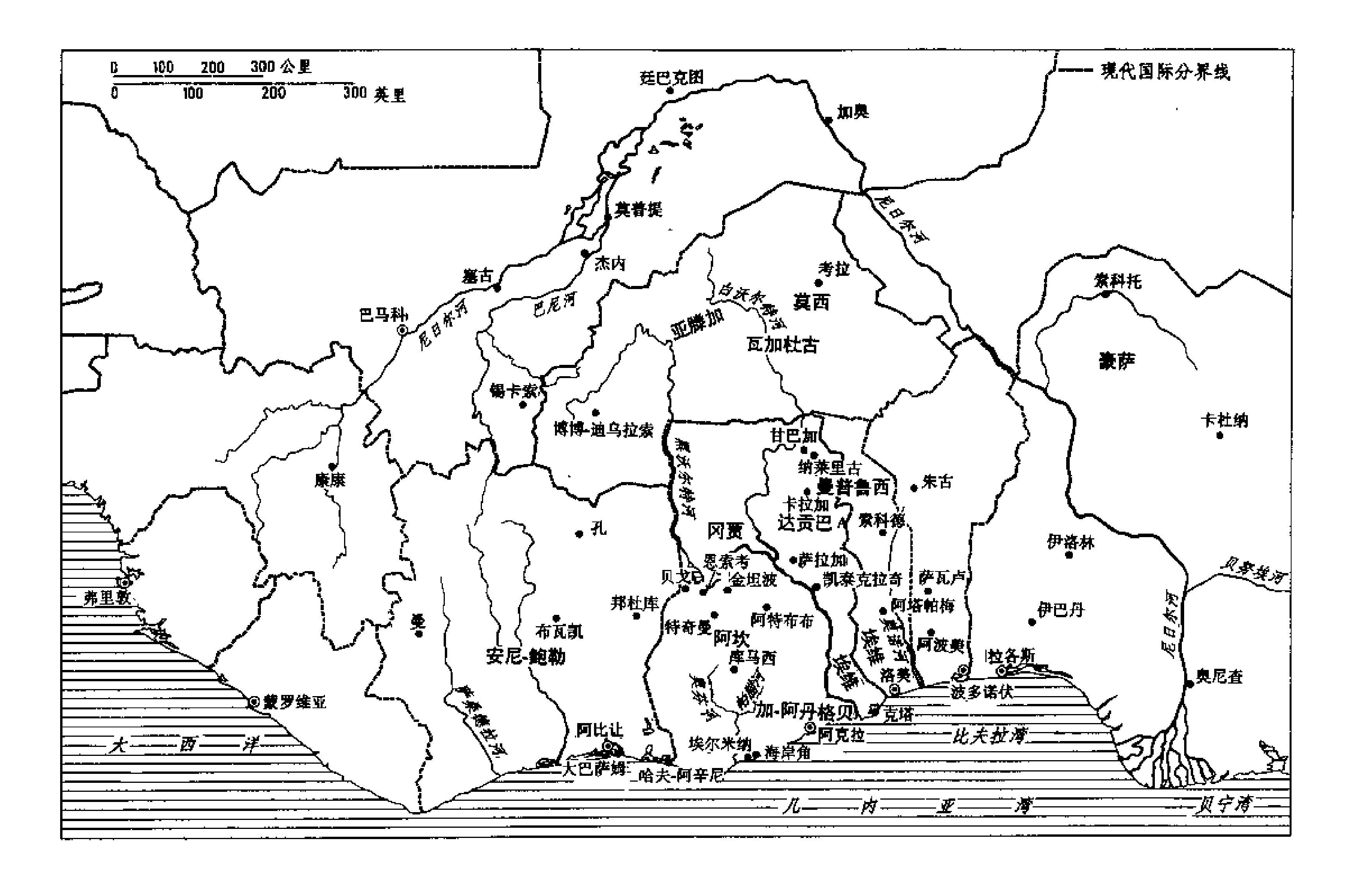


图 25.1　西部非洲：文中提及的部分民族和城镇（仿照K. 阿欣图）



图片 25.1 阿散蒂的金凳子

朝从这一根据地出发，对沿海岸诸王国(瓦萨、恩齐马、特威弗、阿克瓦穆、阿克耶姆、阿夸皮姆、加和阿丹格贝)，特别是对芳蒂酋长国的沿海地带实行政治和经济统治。同样，北部的古亚曼、冈贾、达贡巴和曼普鲁西王国也处于阿散蒂的影响下，特别是在 1794 年条约签订之后，规定每年要向阿散蒂进贡 2000 名奴隶。

19 世纪是以阿散蒂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奥塞·邦苏(1801-1824 年)的统治开始的。他的军队所向披靡，通过一系列战役(1807 年、1811 年和 1814 年)推进到沿海地区。英国当时正卷入拿破仑战争，对他们在黄金海岸的殖民地尚无明确的政策，只得通过商人议事会主席土伦上校和他的后任，承认阿散蒂对沿海地区所有民族的宗主权，乃至主权。

阿散蒂利用英国的承认镇压了一次冈贾人的叛乱，接着又镇压了北部古亚曼人(阿布

龙)的反叛。然而，英国王室把贸易站转交给伦敦商业公司负责，同时派使团带着实际上是一纸空文的条约草稿前往阿散蒂朝廷(见鲍迪奇和杜普伊著作)，赢得时间之后，于1821年对沿海的城堡采取直接负责制，将其置于塞拉利昂总督查尔斯·麦卡锡爵士的管辖之下。在向库马西的一次大胆进攻的行动中，查尔斯爵士在恩萨曼库战役中(1824年)大难临头，他在那里败给了阿散蒂军队。[2]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阿散蒂再次向沿海地区推进，但在多多瓦被英国人所支持的沿海各族的大联盟击溃(1826年)。阿散蒂政权的丧钟就这样被敲响了。

接下来的时期(1826-1874年)，其特点是阿散蒂军队取得几次非决定性的胜利，而最重要的是乔治·麦克莱恩总督对沿海地区实行和平管辖(1830-1843年)，以及芳蒂人和其他沿海民族在面临库马西的威胁与欧洲人入侵时，积极争取实现真正的自治所做的努力。

665 英国政府卷入沿海地区使它为难的同盟者和好斗的阿散蒂之间。尽管英国在多多瓦战役获胜，但它觉得在黄金海岸付出的财力和兵力代价太高而再一次从那里撤退。此后，麦克莱恩的事业[3] 蓬勃发展。麦克莱恩是负责城堡地区管理的商人议事会主席，因而能够自666 由地运用他的商业洞察力和对人的了解，经常无视来自伦敦的官方指示。当时伦敦有一个商业委员会负责城堡地区的事务。麦克莱恩的目的有两个：牵制阿散蒂，同时将沿海地区各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因而，他促成了芳蒂-英国-阿散蒂三方条约的签订。依据条约，各方承认普腊河以南沿海诸国的独立；同意将任何冲突交给英国方面仲裁；维护商路的开放。麦克莱恩力图通过从酋长的法庭到他自己主持的各级法庭，使芳蒂人逐渐熟悉英国的法律原则。当地民兵派驻酋长法庭协助实行新的法律，还在小型交易中使用贝壳货币，并鼓励棕榈油生产，开始改变经济结构。

但1843年英国政府决定重新直接控制沿海殖民地，并通过那些承认英国法律(1844年的契约)[4] 的酋长按法律规范统辖他们。1858年，黄金海岸政府从塞拉利昂分立出来，它和城堡地区不同，是一个保护国而不是殖民地。黄金海岸有权任命它自己的总督，总督负责主持立法和行政会议。

根据当地居民应该为那些促进他们在物质、社会和精神上的进步所采取的措施支付费用的总原则，1852年实施了每人交纳一先令人头税的规定，并为当地居民普遍接受，尽管实行的时间非常短暂。[5]实际上，对人头税的抵制很快变得相当强烈。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收税官员不再是当地酋长，而在于只有8%的税收收入用于办学和修路，而大部分收入付给了大批的政府公务人员。尽管后来做了一些改革，还派出了讨伐队，但派因总督还是被迫在1864年放弃了这项人头税。

这是第一次纯社会性和全民性，而非民族性的抵抗运动。而紧接其后是一次规模更大的行动，[6] 这回是政治性的。早在1864年，黄金海岸的酋长们就送交派因总督一份充满怨

[2] 关于麦卡锡的战争，见A.A.博亨(Boahen)，1974年，第188-189页。

[3] 麦克莱恩的事业，见G.E.梅特卡尔菲(Metcalfe)，1962年。

[4] 斯坦利爵士(Lord Stanley)致H.W.希尔(Hill)总督的信，1843年12月16日，载G.E.梅特卡尔菲主编的文件，第124号，1964年。

[5] 人头税法令，1852年4月19日，载G.E.梅特卡尔菲主编的文件，第181号，1964年。

[6] 参见A.A.博亨，1974年，第239页。

言的记录，对侵害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表示抗议，并举出具体例子，如他们遭到个别公务员的拘禁，表明他们的尊严如何受到藐视。⑦ 此后不久，海岸角的“国王”阿格雷采取了更进一步的做法。在有才华的律师查尔斯·班纳曼的建议下，他对于其领土上的居民被看做英国臣民一事提出抗议，要求澄清酋长和总督之间的关系，并质问为何他没有分享到财政收入。⑧ 最后，阿格雷威胁说，他要招募当地民兵以确保他的领土安全。为此他被放逐到塞拉利昂。

667

然而，这场运动在非洲知识分子的激励下方兴未艾。还在 1885 年，殖民当局就把这些知识分子说成是半文明化的中间阶级，其思想来源于传教士等人。他们强烈要求解放，并对非洲人说：“你们不是英国的臣民，所以你们不必顺从。你们有权在自己的国家分享权力。只有联合起来，你们才能赢得自己的权力。”这就是塞拉利昂人詹姆斯·阿非利加纳斯·霍尔顿以及约瑟夫·史密斯、亨利·巴纳斯、T. 休斯、F. L. 格兰特和 R. J. 格尔蒂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地区的酋长们非常赞同这些观点。他们因害怕再次受到阿散蒂的攻击，下决心致力于本国的防御，但他们很不满意荷兰人对库马西和它的沿海盟国埃尔米纳的软弱态度。因而他们反对英国人与荷兰人为使他们各自的领地成为同族社会彼此进行城堡交换的意图。不过，他们也担心被英国人抛弃。英国人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联合起来抵抗阿散蒂，以保卫沿海地区，但又不准备给他们进行防御的必要条件。为此，在沿海地区的西部和东部分别建立两个自治政府的试点。

在西部，由芳蒂酋长们和登基拉、瓦萨、特威弗和阿辛派来的代表组成的曼克西姆会议，先后起草了三个宪法。⑨ 第一个于 1868 年草成。第二个宪法于 1871 年 11 月由 31 名酋长和国王签字并盖章，该宪法规定，设立一名由与会者选出的国王-主席来主持由酋长们组成的国民议会。至于代表会议，则由每个王国的两名代表（一名酋长和一名学者）组成，由兼管执行会议的副主席负责。然而，在 1872 年，为使邦联的合法性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对第二个宪法作了修改，要求英国政府提供邦联预算的一半，否则，英国政府就要承担把黄金海岸变为殖民地的全部责任。当然，邦联在三年内开始运转，招募了 15,000 人的军队，设立各种机构和部门，包括最高法庭，并且征收赋税，税收的三分之二归邦联，三分之一归各酋长国。

668

在东部，阿克拉周围也产生了一个类似的邦联，但相对该地区酋长的权力来说，这个邦联显得非常虚弱。而且西部的自治运动到 1872 年已经衰落，因为这一年荷兰人最终卖掉了他们的城堡并离开黄金海岸。于是消除了邦联中酋长们担心的一个理由，即他们的军队未能迫使做出抵制埃尔米纳堡的决定，而且他们的财政来源仍然匮乏。但最为重要的是，英国竭力镇压知识分子并且分裂酋长们，直到芳蒂邦联崩溃。

芳蒂邦联尽管短命，但它的出现却有重大意义。它是黄金海岸反对日益扩张的殖民主义的最后一次抗争。它力图重建因欧洲人出现这一致命的影响所破坏的芳蒂人的统一。它

⑦ 梅特卡尔菲主编的文件，第 243 号，1964 年。

⑧ 卡纳旺（Carnavon）致布莱克霍尔（Blackhall）的信，1867 年 2 月 23 日，同上文件，第 258 号。

⑨ 夸西（Quassie/Kwassi）；伊多（Edoo）等人致 A. F. 肯尼迪（Kennedy）爵士的信，1871 年 11 月 24 日，同上文件，第 278 号。

预示着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将在未来黄金海岸的事务中发挥作用，即为民族中不识字的传统领袖提供指导。它还表明，提供教育的殖民当局也提供了它自身最终毁灭的工具。这就是此后殖民政府对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心怀敌意的根本原因。

1872年，阿散蒂派出一支侵略部队南进，以行使他们所认为的对埃尔米纳的古老权力，并重申他们对阿辛、登基拉和阿克耶姆的所有权。因为英国已控制了邦联，并且在1872年买下荷兰的属地，它决定组织反击，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阿散蒂的问题。1874年，他们派出由沃尔斯利将军统率的一支强大军队，攻占了库马西并将它烧毁。同年，强迫阿散蒂国王科菲·卡里卡里接受福梅纳条约。根据这项条约，阿散蒂明确放弃它在黄金海岸的所有权力。

1875年，阿散蒂因与德瓦本的战争而被进一步削弱。德瓦本战败后，它的居民逃往英国保护领地寻求避难。德瓦本原是阿散蒂最善战和最忠实的中心城镇之一。在它失败后，尽管人称普伦佩(胖子)的阿散蒂国王克瓦库·德瓦三世采取了稳定的政策，但在库马西和北部地区的纳贡国家中，仍然陷入混乱状况。1896年，阿散蒂国王在殖民瓜分狂潮时期被诱捕并遭到流放。

18世纪和19世纪初，阿散蒂的势力无可匹敌，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地处尼日尔河湾与几内亚湾沿海地区之间，位置极为有利，同时也由于它的领导者具有政治上和行政组织方面的才能。[10] 在19世纪初，这套体制已发展到高度完善和十分有效的程度，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它不断向外扩张，直到吞并芳蒂诸国。当时，强大的阿散蒂王国是由三种类型的领土单元组成。

第一种类型是阿散蒂酋长国中央族群。他们通过语言相同、地理接近、广泛的家族联669 系网和姻亲关系、一百年来共同的军事活动以及对其丰功伟业的自豪感，得以长期地统一在阿散蒂国王的权威下。此外，从根本上讲，笃信阿散蒂金凳子的保护力和阿散蒂国王祖先之灵有着神奇的结合力。[11]联盟中的成员国采取下列具体形式：成员国的酋长出席库马西国家首脑和阿散蒂国王的登基仪式，对其宣誓效忠，出席酋长大会(nhyiamu)，讨论重大政治问题(如战争、和平和签订条约)，以及承认阿散蒂大誓言是所有阿散蒂国王领土上的最高法律指示。[12]

这种一体化的制度构成了国家机器的根本基础。这些制度除阿散蒂外，也可以在所有阿坎人的国家里见到。这意味着通过征服获得的权力的合法性观念已取代由血缘和宗教关系建立的政治认同的观念。因此，这个庞大帝国的第二种类型的国家是毗邻阿散蒂领地的阿坎诸国。阿坎诸国的人民了解这些制度的意义，他们期望生活在阿散蒂国王的政权下，以便像阿散蒂人一样从这些制度中获得同样的利益。

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包括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相距甚远的民族，如达贡巴人，曼普鲁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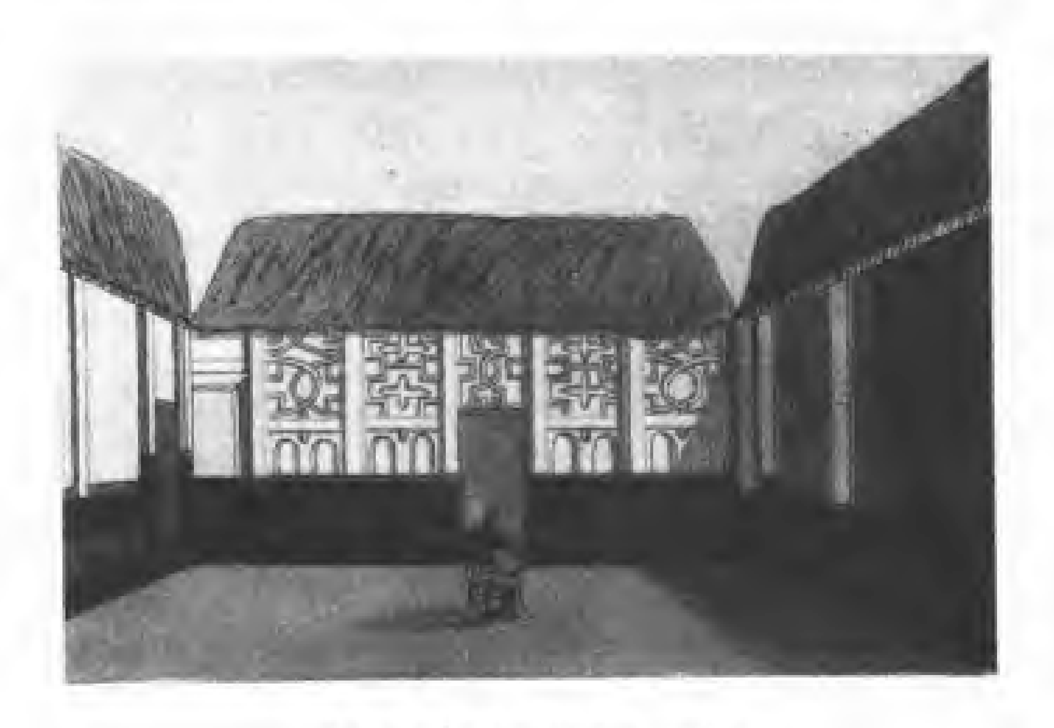
[10]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5卷。

[11] 参阅R.S. 拉特雷(Rattray)，1929年，第398-409页；K.A. 布西亚(Busia)，1951年；I. 威尔克斯(Wilks)，1975年，第2章。

[12] I. 威尔克斯，1975年；J.M. 萨尔巴(Sarbah)，1906年；K.A. 布西亚，1951年，第78页；R.S. 拉特雷，1929年，第388-389页。

人和冈贾人。他们一开始就被阿散蒂当局看做是必须对宗主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民族。这些位于北部的非阿坎人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资源而被迫屈服于军事和政治的控制。他们还以贡赋的形式提供用于阿散蒂战争和农业生产的大部分人力。[13] 对这一重要特点一直存有争议，理由是，造成这一特点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在历次阿散蒂战争中已经存在。与此相似，要充分考虑到在上述所有类型的国家里阿散蒂代表的存在，也要考虑阿散蒂的重要特征在达贡巴的军队，或者阿散蒂国王干涉冈贾和达贡巴的王位继承争端中也有表现。[14]

不管怎样，阿散蒂地区专员的委任，显然是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在阿坎地区，他们必须确保争端的解决是通过遵守阿散蒂国王的誓言，以此强调阿散蒂国王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在这些地区征税，曾被当时的欧洲观察家看做是一种剥削形式，而在阿散蒂国王看来 **670** 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阿散蒂各国自己也必须承担纳税的任务。[15]问题的实质在于领土主权。在非阿坎地区，专员们努力加强阿散蒂国王和达贡巴之间所订"条约"的一些条款，例如[16]有关贡赋的条款。另一方面，我们没有证据肯定阿散蒂的军队中存在冈贾人或达贡巴人的分队，或这些国家支付阿散蒂战争税(apeatoo)。因此，冈贾和达贡巴的王位继承权争端的解决，须看成是具有经济动机的政治行为，因为这些地区的安定保证了贡赋的交纳，并把阿散蒂的制度引入达贡巴的军队中。阿散蒂有一份古老的资料以这样的标题宣布：我们没有同他们一起举行会议(Na yene wonom nko nhyiamu)。



图片25.2 库马西的税务署，1817年

---

[13] T.E. 鲍迪奇(Bowdich)，1819年，第320-321页。

[14] J.K. 芬(Fynn)，1974年；I. 威尔克斯，1975年，第42-60页，拒绝这种划分。

[15] B. 克鲁克尚克(Cruickshank)，1853年，第2卷，第143页。

[16] T.E. 鲍迪奇，1819年，第235页。

但是，与阿坎诸国一样，根本问题还是主权问题，这对阿散蒂在南方征服地区的经济而言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在19世纪初期，阿散蒂主要对其他阿坎族人实行政治统治感兴趣，并极力想把他们的中央集权制度强加给阿坎人。首先，从被征服的阿坎族那里勒索来的贡赋已逐渐变成战争税。[17]其次，被确认为最高法律指示的阿散蒂大誓言“恩塔姆柯塞”(Ntam Kesie)，也在其他的阿坎族人中实行，而阿坎人原有的当地誓言服从于大誓言。[18]在以后时期，周围地区的阿坎人的主要首领被邀参加每年举行的“奥德韦拉”(Odwira)仪式，在仪式上他们必须对阿散蒂国王宣誓效忠。[19]最后，所有阿坎国家的部队都要和阿散蒂军队一样参加帝国内外的阿散蒂战争。主权问题导致阿散蒂和其他阿坎人之间或欧洲人之间的频繁冲突。阿克耶姆国和阿夸皮姆国宣布关闭通向阿克拉的商路，是导致同阿散蒂国王战争的原因，因为后者主要把此举看做叛乱和拒绝接受阿散蒂的政治统治。阿散蒂对芳蒂的进攻也是由于政治霸权的同一欲望引起的。



图片25.3　库马西庆祝奥德韦拉节的第一天，1817年

作为宗主权的明证，阿散蒂国王根据文件规定，要求芳蒂的签约者交付海岸角堡和阿诺马布堡的租金。他自称在1807年对芳蒂领土征服期间曾占领这两处城堡。[20] 1818年，吉亚曼失败后，阿散蒂国王宣称孔曼达人和海岸角人必须交纳一种感恩税(aseda)，以表达对其君主胜利的喜悦。[21] 1822年，阿散蒂国王的专员们甚至要求惩办阿诺马布堡的一名警官，原因是，当阿散蒂一位商人在他面前默祷阿散蒂大誓言时，这位警官的反应不当。[22]

莫西诸国

16世纪以后，莫西地区获得显著发展，到18世纪达到鼎盛时期，[23] 19世纪初出现衰落

---

⑰ T.E.鲍迪奇1819年，第220页。

⑱ 参阅奇泽姆(Chisholm)少校致查尔斯·麦卡锡爵士的信，1822年9月30日，梅特卡尔菲主编的文件，第56号。

⑲ J.M.萨尔巴，1906年。

⑳ T.E.鲍迪奇，1819年，第47、68页。

㉑ 总督和议事会致非洲委员会的信，1819年1月11日，G.E.梅特卡尔菲主编的文件，第39号，1964年；参阅总督和议事会致非洲委员会的信，1819年3月22日，同上文件，第110号。

㉒ 见同上文件，第63号。K.A.布西亚的著作(1951年，第78页)中指出，誓言是固定不变的词句，内容暗指誓言所提到的政治社群历史上发生的一场灾难性事件，据说该社群的酋长拥有这一誓言，通过发誓以回顾历史上发生的这次事件，如若因此搅扰了王室祖先之灵，那么就必须通过祭祀来抚慰他们，因此只能遵循规定的原则，作为法律指示约束冲突的一方在向其发誓的领袖的法庭前或作为向高一级法庭上诉的手段时才背诵誓言；参阅R.S.拉特雷，1929年，第76页，第102-104页，第215页及以后诸页。

㉓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5卷，第12章。

状态，导致内部瘫痪和外部瓦加杜古和亚滕加两个主要王国的瓦解。只有布苏马王国从这一灾难中获益，它扩大并巩固了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有两个例子能充分说明强大的瓦加杜古王国陷入衰落的严重性：布苏马之战和拉勒之战。

不断扩张的布苏马王国，在19世纪初与当时以莫戈·纳巴·杜卢古为统领的瓦加杜古王国发生冲突。通过干预萨尔马坦加(位于卡亚地区)的内部纠纷，布苏马的纳巴·皮加成功地赢得对萨尔马坦加酋长邦的控制。但是当纳巴·皮加给瓦加杜古王国的一名流亡者提供避难所时，遭到纳巴·杜卢古军队的入侵，被迫在马尼寻求避难，而马尼当时正在与瓦加杜古保护下的齐滕加酋长交战。因此，这是一场连环战。在战争过程中，许多不满于向马尼开战的王子们纷纷变节，瓦加杜古国王纳巴·杜卢古则身受致命的重伤。纳巴·皮加的继任者认为马尼国的酋长应对纳巴·杜卢古的身亡负责，迫使马尼的纳巴服毒而死。杜卢古的继承人纳巴·萨瓦多戈还逼迫胆敢与他争夺王位的自家兄弟齐滕加的酋长自杀。

50年后，与布文萨结盟的瓦加杜古再度进攻与皮西拉联盟的布苏马。尽管遭受侵扰，布苏马的纳巴·利吉迪仍用他的骑兵在瓦加杜古对莫戈·纳巴的都城袭击，使其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24]

此外，布苏马和里基亚姆王国之间的战争，使布苏马费了一番力气，吞并萨尔马坦加和皮库坦加两个酋长国。在这些战斗中，里基亚姆国国王纳巴·考布盖得到了杰尔戈吉的一位富尔贝(富拉尼，佩乌尔)酋长的援助。 673

1881年，布苏马的纳巴·利吉迪对古尔曼斯以北的考拉发动征战。考拉与多里的富尔贝王国及莫西领地接壤。布苏马军队极其艰难地占领了考拉人设防的村庄。多里的埃米尔期待考拉战败，以便夺取它。但纳巴·利吉迪没有帮助富尔贝达到这一目的。[25] 1890年纳巴·利吉迪逝世时，布苏马王国已由他扩展到极限。在付出多次流血冲突的代价之后，他使布苏马称雄于富尔贝和古尔曼斯国交接的地区。

在瓦加杜古的东部，布苏马不断夺取土地，而在西部，拉勒的统治者也在公开反叛。拉勒是与古龙西领地接壤的一个有实力的酋长国。这场已熄灭多年的战争在50年后又重新燃起，直到法国征服前，越来越多的民族卷入这场大动乱之中。

战争开始于瓦加杜古的纳巴·卡尔福(1842-1849年)执政时期，是由一件小事触发的，这说明当时莫西制度腐败到什么程度。由于瓦加杜古的纳巴遭到最强大的一个附属国和他的首席大臣维迪·纳巴的联合反对，致使局势更趋恶化。[26] 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联盟，因为它联合了平时是相互对立的两个社会集团：一个是统领地方军的贵族，一个是官僚阶层中出身平民，但却是掌管国家大事的权力集团里位高权重的代表。在这场导致瓦加杜古王国灭亡的内战中，拉勒的纳巴·沃布戈，从其东部领土迅速进入王室领地，并一再要求得到西部地区主要是古龙西人的支持，大量征召他们服役。与此同时，莫戈·纳巴成功地施计置他的反叛"大臣"于死地。

---

[24] Y. 提恩德雷贝奥戈(Tiendrebeogo)，1964年，第57-58页。
[25] P. 戴尔蒙德(Delmond)，1953年，第39页。
[26] Y. 提恩德雷贝奥戈，1964年，第48-49页。

在瓦加杜古的莫戈·纳巴·萨内姆(1871-1889年)执政时期，与拉勒的纳巴·沃布戈的冲突重新激烈地展开。在瓦加杜古下一任莫戈·纳巴(大君主)，名字也叫沃布戈在位时期，双方的战争仍在继续。在第一场战斗中，王室的军队被击溃。疲于征战的莫戈·纳巴不能平息叛乱，转而求助于赞伯马(扎巴里马)雇佣军以赢得这场决定性的战斗。

赞伯马人为逃避富尔贝人的苛捐杂税离开了他们的故土(今尼日尔)。[27] 他们充当掠奴者，为雅纳(延迪的国王)纳·阿布杜莱效命。他们先是按阿尔法·哈诺的命令行动，后来按加扎里，最后则按巴巴托的命令行动。在与雅纳失和后，他们着手夺取受他们剥削、人口比较稠密且富饶的古龙西地区的控制权。当莫戈·纳巴·沃布戈招募他们对抗拉勒时，他们进军莫西地区，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效忠莫戈·纳巴的酋长们则反对他们，封锁其进军道路，使他们像在萨波内和卡亚奥一样被击败。莫戈·纳巴的军队本身也给他们造成了重大损失，直到大将军(tapsoba)接到瓦加杜古的命令之后，才极不情愿地让他们通过。经过多次流血冲突以后，力量被削弱的赞伯马人才到达拉勒的叛乱省份，他们被驱赶到沼泽地并被歼灭。这支介人部队只有一些残留人员到达了列奥。[28] 由于命运可怕的嘲弄，欧洲人的征服迫使瓦加杜古的莫戈·纳巴在1897年从法国属地逃到英国的属地。与此同时，他的附属国和名字相同的拉勒的沃布戈被法国人打败，并在瓦加杜古被处死。

674

在莫西的北部地区，亚滕加的强大是得到公认的，但在19世纪期间，它的衰落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亚滕加除了几次出于扩张和兼并的目的发动战争之外，例如对亚科和塔滕加(里基亚姆)两王国的军事行动，它在这段时期的涉外行动是对外来威胁的反应，其中的典型例子是在杰尔戈吉的行动，还有是同觊觎王位者之间发生的无休止的内战。这些王位觊觎者即使坐上王位大都也活不了多久。

试图通过征服达到统一的主要行动是纳巴·图古里(1806-1822年)对亚科[29] 的两次征战。可是，处在瓦加杜古的莫戈·纳巴和亚滕加的纳巴之间的亚科王国的君主受到前者的影响更大一些。被亚滕加的君主纳巴·图古里废黜的亚科的君主纳巴·西莱姆，一年之后再度掌权，无疑是得到其强大的邻邦瓦加杜古的援助。

针对里基亚姆的行动产生了种种后果。实际上，里基亚姆王国(其首都萨布塞不在中部而在南部地区)已竭尽全力支持亚滕加，特别是对抗强大的布苏马的诸纳巴的斗争。里基亚姆的北部，仅由一条人烟稀少的狭窄的走廊与其南部地区连接，这时无法再与王国的南部基地紧密联系了。另一方面，自纳巴·坎戈执政以来，北部地区就处在亚滕加的影响和压力下。纳巴·托特巴尔博(1834-1850年)和纳巴·耶姆德(1850-1877年)的战争导致蒂道和图尔费两地的完全合并，进而使门加奥的鲁姆巴酋长国从图尔费酋长国分离出来。一位出身奴隶的军阀被派驻蒂道。在科索卡酋长的监视下，提卡里的齐滕加国君受到严密控制，这反而使他更加接近他的“兄弟”达滕加君主，甚至接近里基亚姆国王。

676

此外，亚滕加在里基亚姆荒凉的土地上进行了多次恶战，使它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国王纳巴·托特巴尔博的性命。它赢得对杰尔戈吉的战争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和马

---

[27] M. 伊扎德(Izard)，1970年，第1卷，第183页。
[28] Y. 提恩德雷贝奥戈，1964年，第70-71页。
[29] 见D. 纳加纳博(Nacanabo)，1982年。



图片 25.4 戴面具的莫西人物形象——可能是代表土著权力的"土地祭司"，20世纪初



图片 25.5 莫戈·纳巴·萨内姆接受臣民朝拜，1888年

西纳帝国的边界当时无疑划分得十分清楚，但由于莫西人的干预，加强了杰尔戈吉脱离亚滕加而独立的决心。[30]

19世纪初，纳巴·图古里违背他许多兄弟的意志进行选举，已经播下了混乱和内战的种子。王位争夺者频繁更换，在位时间也极短暂，或轮流乃至同时进行统治。每个争夺者都有自己的氏族和都城。比如，以纳巴·沃布戈和纳巴·尼安比莫戈为一方，以纳巴·科洛戈和纳巴·拉贡戈为另一方的轮流执政。这些王公们从“冈博罗”(弓箭手)的桑人(萨莫人)或“提欧”(骑手)的富尔贝人中招募军队，以便通过武装力量制约政治决策。[31]

总之，19世纪亚滕加的历史发展如同18世纪一样，是面向外部世界的，只是面临的挑战和危险更加严峻。纳巴·鲍戈在位时期(1885-1894年)，因得到萨迦几个儿子(图古里氏族除外)的支持，爆发了兄弟之间的残杀。结果使萨迦的这些儿子先后分裂为托特巴尔博氏族和耶姆德氏族。他们最后同意拥立纳巴·鲍戈执政，但立即受到图古里的儿子们的挑战，这就为法国的干涉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32]

西部和南部沃尔特高原

在这个地区，绝大部分血缘族群和氏族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它们经受住了这段时期的大动乱。这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乔拉人(迪尤拉人)和马尔卡人的入侵。他们通过与土著居民通婚，演化出新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群体，形成博博-乔拉人的原型。但是，不应该在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从理论上划一条线。事实上，中央集权制可以采取非政治的形式，例如塞努福人的“波罗”会社(同龄组织)，就是一个形成了社会等级制度的规模很大的宗教社会。因此毫不奇怪，政治等级制度比较简单的民族，在承受19世纪的动乱时不同于那些政治制度较发达的社会，对以下问题进行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该地区沃尔特各个族群的动荡历史：即入侵、防御性进攻、抵抗、彼此适应和相互通婚。一般来说，虽然多少可说是积极抵制曼德人、莫西人、泽尔马人、马尔卡人和富尔贝人各族群的统治企图，但那些定居时间较长的土著居民逐渐习惯于他们的现状和经济活动，只有当政治压力和经济剥削太厉害时，他们才会迁移。这里我们能举出若干例子。

677

吉里科和克内杜古都是孔-瓦塔拉国的属国。[33]到19世纪末，因另一个乔拉人帝国，即萨摩里·杜尔的帝国向东推进，它们才成为后者的属国。[34]吉里科[35]在18世纪形成于博博-迪乌拉索附近和黑沃尔特河北部河套地区。这个地区由于平息了尼日尔河湾先后称雄的各国(塞古、马西纳、图库勒尔帝国)以及莫西中央高原各王国的叛乱，出现了繁荣景象。但在马甘·乌列·瓦塔拉(1749-1809年)和他的儿子迪奥里·瓦塔拉之后，由于被征服的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一些小民族为寻求美好前程而向外迁移，帝国开始全面崩溃。提埃

[30] M. 伊扎德，1970年，第2卷，第350页。
[31] 同上，第331-333页。
[32] J. 基-泽博(Ki-Zerbo)，1953年。“图古里之子”和“萨迦之子”的相互残杀为法国的干涉提供了机会。
[33] 孔帝国的发展，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5卷，第12章。
[34] 见本书，第24章。
[35]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5卷，第12章。

弗、博博-乔拉、博朗等族人纷纷摆脱它的枷锁。巴科·莫鲁(1839-1851 年)通过与提埃弗和博博-乔拉的结盟，在乌列尼战役击溃了克内杜古的军队，暂时制止了帝国的崩溃。未来的国王提埃巴在乌列尼战役中被俘并被卖做奴隶。

在巴科·莫鲁之后，帝国再度衰败。一个来自杰内的马尔卡伊斯兰教隐士家族，受马马杜·卡伦陶之命，在博罗莫周围为自己建起一处采邑，并联合了马尔卡人、莫西人和达加里-乔拉人，把土著居民柯人逐出博罗莫。接着，他无视瓦塔拉的权威，继续前往征服布瓦穆(布瓦巴的领地)并建立了瓦哈布。尽管遇到种种困难和失败，他的儿子卡拉莫科·莫克塔尔继续完成他在布瓦穆和达加里以及维列地区的未竟之业。

卡拉莫科·莫克塔尔原打算从吉里科南部着手，但克内杜古人从北部完成了。他们是特拉奥雷家族属下的孔人的远亲，是受乔拉人影响并已经伊斯兰化的塞努福族群，18 世纪时在锡卡索一带形成。在 1850-1860 年间，劳拉在塞努福一些小酋长国建立了特拉奥雷的权势。他们的权威从 1875 年以后得到了法国人的盟友提埃巴国王的确认。提埃巴在逼近科洛戈的基耶巴加，并成功地击退萨摩里对他在锡卡索的坚固堡垒的围攻之后，1890 年，提埃巴在西尼马舍利战役也遭到失败。

居住在今天布基纳法索西南部的民族，在这整个时期都处在同样的压力、动乱和冲突之下。因此民族迁移是这一地区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 19 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里，普瓦人、西萨拉人、甘人、迪扬人、比里福尔人、达加腊人以及达加腊-乔拉人相互竞争、排斥，他们在这个地区通婚，聚集或分离。 678

当然，这并未形成人类的潮涌之势。[36] M. 佩雷援引她收集的口头资料指出，有时由若干成分组成的小族群，外出巡视“去看那地方好不好”，另一些“看到那地方很好”的族群便加入他们的行列。这里突出的一点是，这些族群之间保持着最密切的家族联系，尽管在族群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有所区别。例如，他们都属于四大母系氏族，并按母亲的姓氏取名。[37] 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十分相近的沃尔特语系。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丧葬、婚嫁和成年人会习俗，分散居住的格局，相似的社会结构，同样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冲积土壤和改良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而在其它地方则粗放耕作)，等等。可是，在所有这些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从而使每一个族群都顽强地保持自己的特性。

19 世纪初期，库兰戈人、特塞人、甘人、普瓦人和迪扬人已经生活在那里。接着迁来的是洛比人，那时他们人数最多。18 世纪末，他们兵分两路从今天的加纳来到黑沃尔特地区。进入北部的是纳科人(洛比人中的平原居民)，进入南部的则是洛比人中的山区居民。来自人口饱和地区的移民先遣队也陆续到达，他们不顾散居的各民族的利益而定居下来，而且未经重大冲突就赶走了迪扬人、甘人和特塞人，尽管在有争议的边缘地区发生一些地方性的冲突。接着到来的是来自同一地方的比里福尔人，他们沿三条主要路线而来，并定居在达加腊-维利人和洛比人，还有迪扬和普瓦人之间，以及洛比地区的腹地。他们形成了混血种的原型，在文化上与洛比人相近，在语言上则与达加腊人相近，他们经常使用三种语

---

[36] 参阅 H. 居尔赫姆(Guilhem)和 J. 赫伯特(Hébert)，1961 年，第 87 页及以后诸页。

[37] M. 佩雷(Père)，1982 年。按母亲姓氏取名的是希恩人、达人、孔鲍-孔比雷人、西布索-帕列人。

言。最后到来的是达加腊人，他们从黑沃尔特河的东岸(左岸)到达西岸(右岸)。他们可分为两个族群：定居在西北部的达加腊-维列人和居住在河岸地带的达加腊-洛比尔人。所有这些民族大部分时间用于立足和自我保卫，主要不是针对他们的近邻，而是针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乔拉人的小分队。乔拉人因没有能征服他们，就对他们进行绑架勒索。

679 其他民族

这些评论同样适用于19世纪其他不存在中央集权制的沃尔特各族，例如古龙西人、比萨人和萨莫人(萨南人)。我们已知道赞伯马人如何掠夺古龙西人。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古龙西人也要向几个世纪以来同他们融合的近邻莫西诸王国交纳沉重的贡赋。比萨人不仅保持了它在莫阿加集团西南部的地位，而且在这一时期似乎扩展到更远的地方。"比萨人绝没有被莫西人赶回来，他们似乎是……牺牲邻邦的利益才得以站稳脚根。这使得比萨人的加伦戈酋长国很快形成。"[58]

至于北部地区与亚滕加交接的桑人(萨莫人)之地，则远末被征服。在本章研究的这个时期，在亚滕加无休止的王朝争斗中，它一再地被用做撤退的基地和"庇护所"。对这些民族和其他民族都要加以考虑，如定居不久的马尔卡人(达芬)诸酋长国，兰非腊国就是其中之一。总之，那些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在19世纪末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1885年，与其它地区兴起的反抗孔人、博博人或锡卡索人的联盟相似的由布瓦加人、科人和古龙西人组成的联盟，使赞伯马人遭到惨败。这些奉行传统宗教的非洲村社的民主政体，被赋予了惊人的生命力，他们在反抗殖民者时得到出色的表现，但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充分重视。

沃尔特高原的东部地区

在北部地区，杰尔戈吉和利普塔科以新的马西纳诸国和索科托为一方，以老化的亚滕加为另一方形成一个交界地区。利普塔科得利于这一局势，把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古尔曼斯巴驱赶到更南的地区。

在19世纪初，这里就有富尔贝人族群和他们的营地，他们或者处于尼日尔河湾富尔贝的阿多(首领)的统治下，或者接受更南部的古尔曼斯巴酋长的统治。与此同时，在杰尔戈吉，杰尔戈贝-富尔贝人是贾卢贝人的臣民，他们在库朗巴人居住的地区充当贾卢贝人的放牧者，库朗巴人这时也是贾卢贝人的纳贡者。杰尔戈贝人发动暴乱反抗贾卢贝人，也许是得到亚滕加人的帮助，他们最终取得了自身的独立。与此同时，他们还挣脱了由孔费贵族领导的当地居民的奴役。孔费贵族受卢拉姆国王的统治，他的首都在门加奥。杰尔戈贝人后来建立了吉博和巴布列公国。在利普塔科，费罗贝-富尔贝人也是来自马西纳，他们定居在比尔马里·萨拉·佩特统治下的威杜，并作为考拉的古尔曼斯巴的臣民在那里一直生活 680

[58] M. 伊扎德，1970年，第2卷，第226页。

到大约1810年。当时，索科托已取得圣战胜利，富尔贝人认为这既是伊斯兰教也是富尔贝人的大事。于是，他们发动一场民族的和宗教的暴乱，反抗他们的信守传统宗教的古尔曼斯巴主人。[39] 布拉希马·赛伊杜·迪安狄克因而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索科托请求谢赫·奥斯曼的祝福。他带回一面旗帜，表示他们反抗古尔曼斯巴斗争的合法性得到了肯定。古尔曼斯巴领主们的侵扰和勒索为富尔贝人提供了发动一场正义战争的理由。富尔贝人的小母牛被宰杀，牛奶被随处溅泼或让狗舔吃，一名富尔贝妇女被捆绑，头发被剃，遗产被没收等，所有这些行为都与伊斯兰教和“富尔贝方式”背道而驰。

布拉希马·赛伊杜原来只不过是威杜的一名“乔罗”(jooro，村长)，他的职位是由考拉的古尔曼斯巴酋长任命的。他后来成为一位“埃米鲁”(amiiyu，埃米尔)并发起一场圣战。这场圣战以古尔曼斯巴人被赶向南部而告终，尽管仍保留居民混居的广大地区。然而，其他富尔贝氏族(图库洛尔人和瓦坎贝人)则反对布拉希马·赛伊杜日益增长的权力。他们派代表向谢赫·奥斯曼申诉，他答复说，无疑“把权力交给真主指定的这个人是合适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宣布一场圣战，因为他们生活在“异教徒”的环境中比费罗贝人更为长久。[40]索科托经常对这个新王朝施加政治和宗教影响，有时还进行干涉，例如在1890年，它调解了争夺埃米尔国权力的对立双方之间的争端。多里的埃米尔因此向索科托提供的东西却很少，没有派军队支援，经常不能按年交纳各种贡赋(谷物、牲畜、奴隶和布匹)。这是因为道路不安全，特别是在帝国分裂和多里屈从于关图人的统治之后更是如此。加上克比人的起义，以及后来的阿雷瓦人和赞伯马人的起义，都成为难于通行的障碍。另一方面，马西纳的圣战对吉博和巴布列的酋长国影响不大，因为那些国家传统宗教盛行。此外，虽然吉博和巴布列向哈姆达拉希纳贡持续到1858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屈从于马西纳的统治，[41] 也许因为后者没有在当地派驻代表。实际上，他们完全享有自治权，他们的纳贡只是表达敬意，也可能是做好被提前征服的准备。从马西纳的立场来看，进贡也许是它的宗主权的具体表现，它一直就想加强这种宗主权。1858年，巴布列王位继承权的争夺，终于为 681 它提供了一个机会，[42] 哈姆达拉希派出一支由哈吉吉·莫迪统率的军队去干涉这场王权纷争。吉博、巴布列和通戈马耶的军队被击溃了，尽管他们最后协调统一了彼此间的分歧。深感焦虑的亚滕加和达滕加对杰尔戈吉的呼吁作出反应。他们联合起来，在波贝-门加奥使马西南科贝人遭受惨败。后者联合巴洛博人的军队卷土重来。然而，在同一时期，莫西胜利者的贪婪和狂傲激怒了富尔贝人，他们奋起反抗，杀戮莫西人，重新恢复同马西纳人的良好关系。

实际上，在吉博和巴布列，许多家族都卷入了权力斗争，结果一旦对手与马西纳结盟，他们都会去寻求亚滕加的支持。另一个因素是，当地酋长之间的内部斗争，以及土著库朗巴人即将爆发的反抗斗争。到19世纪末，后者在阿里宾达公国时期，已成为能够向杰尔戈吉和利普塔科联盟进行挑战的一支威胁力量。

---

[39] H. 迪亚洛(Diallo)，1979年，第97页及以后诸页。

[40] 同上，第107页。

[41] 同上，第118页。

[42] A. H. 巴(Ba)和J. 达格特(Daget)，1962年；M. 伊扎德，1970年，第2卷，第334页及以后诸页。

还需要提及图阿雷格人。早在1804年，乌达兰-图阿雷格人已定居在这个因他们而得名的地方，并且开始从古尔曼斯巴人和桑海人那里勒索贡品。索里·汉马(1832-1861年)和后来的博卡尔·索里(1890-1892年)都败在他们手中，并且被迫用栅栏加固多里。图阿雷格人因为马西纳帝国的巩固而被迫向东推进，并沿贝里河定居下来。

利普塔科的政治组织是为保持氏族之间的平衡所做的尝试，这反映在其特有的结构中。权力是通过曾领导圣战的布拉希马的父亲赛伊杜之父权系统代代传下来的。然而，费罗贝最终决定或者说同意它的对手托罗德贝人设立任命埃米尔的选举团。该选举团审查每个候选人的个人资格，例如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以及他的业绩，他的母系关系的范围，等等，并且最后做出决定。通过这种参政办法，托罗德贝人即使不得直接行使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可以对费罗贝权力要求者做出决定，并因此使他们结合到这一制度中。[43]

新的埃米尔一旦选出，他必须参加会见，并要回答各种古怪的问题。接着要用动物来祭祀神灵和蛇神。还要造出一个传统样式的新鼓，作为索科托议会授予权力的象征之一。[44]

682 新埃米尔要由一名托罗德贝人当着大伊玛目和卡迪的面将头用头巾包起来，他还要面对旗帜宣誓尊重伊斯兰的习俗和教义，维护他的人民的福利。这是表示宇宙万象更始的一种政治、宗教礼仪，用来祭慰各种想象中的超自然的力量。宗教权力机构由多里的卡迪任命，并授予作为上诉法庭的司法权力。此外，还有一个以多里的大伊玛目为首，由一些村社的伊玛目组成的网络。

这种地方权力结构也可以给那些未能得到埃米尔职位的富尔贝古老氏族提供官职：朱罗(村长)是从血统久远的家族首领阶层中选出的。杰尔戈吉人实行一种把所有氏族在单一的结构上组织起来的相近的制度：酋长由萨达贝人后裔最年长的贵族组成的选举团选出。他们在杰尔戈贝人到来以前是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代表，而杰尔戈贝人只能有一名成员成为酋长。事实上，酋长总是由尼约戈家族的成员担任。其官职的标志是挂着各种农产品的立柱(象征农牧兴旺)。新酋长统治下的物质繁荣是通过土著居民库朗巴人供奉祭品的方式获得的。

塞古和卡尔塔的班巴拉王国

塞古王国和班巴拉王国在18世纪达到全盛期之后，进入了反映他们政治上最消极的停滞时期：侵略行为被看做勇敢之举；发动没有组织的袭击；在王国之间和各个王国内部发生兄弟相互残杀的战争。例如，有王室血统的卡尔塔的马萨西人把塞古的统治者，从比通·库鲁巴里(库里巴里)的儿子登科罗的继承人开始都看做是奴隶出身的军事首领，或者说，仅仅是职业军人。人口较多的塞古王国在两个王国中较为强大。塞古的国王痛恨极端轻视他们的马萨西人。这一情况说明了为什么塞古要对卡尔塔发动持续不断的进攻。后者经常被打败，但从来没有被征服。[45]

---

[43] H. 迪亚洛，1979年，第155页及以后诸页。
[44] 同上，第161页。
[45] L. 陶克希尔(Tauxier)，1942年，第143页。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通约恩人（一个自由民组成的民族，以骁勇著称）凭借自身的力量取得日益重要的地位。例如，当托罗科罗·马里（1854-1856年）和他的兄弟柯格·马里在马萨拉前交战时，兄弟双方招募的通约恩人都决定使用空心子弹。[36]托罗科罗发现无论围攻的一方还是被围的一方竟没有一人受伤惊讶不已，一名通约恩人粗率地告诉他："你们兄弟互相残杀，我们已经受够了，绝不能再打了！"战争就这样停止了。 683

在塞古王国，蒙宗·贾拉（迪阿拉）（约1790-1808年）因发动对卡尔塔和马西纳，还有多贡人和莫西人的战争而名声大振。他的继任者达·蒙宗（1808-1827年）在援助他的臣属，一个非穆斯林的富尔贝人首领（阿多）迪科时，被马西纳的塞库·阿哈马杜·巴里所击败。这一经历告诉他，主要的敌人不是"对手"卡尔塔王国。达·蒙宗是一个狂热而又莽撞的人。[37]他的继任者泰福洛（1827-1839年）误将一个从麦加回来的朝圣者投入监狱；后来查明此人不是一名寻常的朝圣者，而是永不忘记这次耻辱的哈吉吉·奥马尔，即使他是应托罗德贝人蒂尔诺·阿卜杜勒等穆斯林名人的请求而被释放。



图片 25.6 迪巴拉房屋式样，1887年

泰福洛执政以来出现的混乱年代，是以划时代的传奇人物、费罗贝-富尔贝人的一名酋长巴卡里·迪安为标志的（"富尔贝人"被解放后为该国效劳，但决不是指所有的富尔贝人）。巴卡里·迪安不仅成功地抗击了马西纳人发动的进攻，亲手杀死令人生畏的布利西， 684

[36] 同上，第99页。

[37] 关于这一点，参阅马马·戴图拉的一段经历，达·蒙宗的妃子们认为他是"最英俊的男子"。达·蒙宗因嫉妒而发狂，他用阴谋最终杀害了马马·戴图拉。见V. 蒙泰尔（Monteil），1977年，第92页及以后诸页。

而且占领了许多村庄，使塞古居民兴高采烈。他的继任人，除阿里·蒙宗·贾拉之外，都很平庸。阿里后来被哈吉吉·奥马尔打败并刺死。但是，班巴拉人的抵抗运动在从巴尼河右岸开始实行的选举当选酋长的领导下继续进行。

卡尔塔王国的重心已转移到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流域之间。早在19世纪初，德塞·科罗就利用塞古立足未稳之时夺取尼亚米纳。他的继任人穆萨·库腊·博和本杜联合起来反对富塔托罗的阿卜杜勒·卡迪尔，于1807年将他击败并杀死。穆萨·库腊·博还发动对贝莱杜古的卡戈罗以及曼丁卡的战争。在博迪安·莫里巴大帝时期(1815-1838年)，卡尔塔与上加拉姆结盟，反对与卡索联合的本杜的阿尔马米。1818年，哈尔坦凯在该地区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而莫里巴的儿子却在基塔地区劫掠富拉杜人。

面对富尔贝人和图库洛尔人的扩张，塞古的纳尼米巴(1839-1841年)和基兰戈·巴(1841-1844年)经过谈判最后与尼亚拉伦·格兰(1832-1843年)和马马迪·坎迪亚(1843-1854年)达成协议，表示任何情况下都要联手共同对贾瓦拉人(迪亚瓦拉人)作战。可惜为时已晚：他们包括马西纳的富尔贝人对手在内，统统被哈吉吉·奥马尔领导的圣战扫荡殆尽。

综　述

因此，在本章所涉及的地区的中部和北部，已存在的政治结构在19世纪进入日益衰落的状态，有些政治结构还被索科托圣战中崛起的新兴势力所控制。这些势力在被更加强大的外国势力消灭以前，利用当时政治结构内部的腐败取而代之。

对这种衰落不能做简单的解释，比如，可能解释为仅仅是受外部的影响，或者解释为殖民化倾向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作为以前某个时期已经发生的过程的一种结果，无论从他们的内部事务和外部所受到的影响来看，那些没有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王国和民族，它们的历史发展都将达到一个转折点。

莫西、班巴拉和乔拉王国都先后试图控制包括沙漠边缘区和森林边缘在内的这片地区。尽管三者中没有一个得以较长久地控制这个地区，但每当其国势达到顶峰时，总是同他们最大限度地由北向南扩张分不开，即使塞古的班巴拉帝国的核心区更加靠近尼日尔河流域的东西轴心线上。然而，在19世纪，政治上的不稳定和人口的移动是普遍现象。那些代表政权的人，例如塞古的汤迪翁和瓦加杜古朝廷的大臣们领导进行野蛮的大屠杀和分离主义运动。虽然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但是这些冲突不断增加，其范围也在扩大，社会越来越混乱，这无疑给周边的政权以及叛乱者日益造成机会，使他们获得武器，并使用武器向占统治地位的首领们发起挑战。

685

此外，这些王国需要作为一种货币形式购买稀缺货物和作战物资的俘虏在不断减少，越来越不能适应各有关社会生存的需要，尤其这些俘虏是从早已成为纳贡的居民中掳获的，因为这样就是在耗尽统治大国的储备力量。欧洲人决定废除奴隶贸易并没有制止奴隶贸易19世纪期间在尼日尔河湾地区和沃尔特河各条支流汇合的上游地区的许多国家达到高潮，这决不是其间不同寻常的相隔时间所致。国家关于解放奴隶和让他们重归血缘集团的规定，并没有减轻这场灾难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种灾难直到19世纪末叶才得以消除。事实上，一

旦基本的贸易形式遭到破坏，那些曾借助商路终点的“沙漠港口”保持经济发展的国家，被另一些国家阻断了与沿海地区的联系，如今处于被封锁和孤立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注定会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危机时期经常发生的那样，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萨赫勒地区各个社会处在鼎盛时期特别具有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另一个因素是宗教运动的发展。在前几个世纪出现的对待传统宗教的宽容之后，由于圣战在利普塔科取得胜利并席卷班巴拉国家所造成的后果，使宗教运动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度。即使原先在宗教和政治事务方面都十分灵活的莫西地区的雅尔塞人，也开始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改变其宗教信仰。然而，后来的一些伊斯兰国家本身也是短命的，因为它们是已使非洲国家的独自发展注定失败的同样的客观条件的牺牲品。

然而不应忘记，这一时期在国家的外在结构已经解体和陷于无序之后，经历了种种动乱，有时还卷入悲剧性的人口迁移运动的许多民族，仍顽强地继续工作以确保整个社会的生存。这就提醒我们，尽管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陷入动荡，不论这种动荡是自发产生的还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普通百姓都未曾屈服，正像他们以自己的杰出才能迎接这个时期 **686** 的重大挑战，如殖民主义入侵所表现的那样。

社会-经济冲突

生产和贸易

在这个时期，经济活动的基础与今天相比更加依靠农业。虽然缺乏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本章所涉及的这个地区估计99%的人口从事农业，特别是已经定居的土著居民。除工匠之外，只有极少数人口经商，主要是那些以经商为生的民族中分离出来的群体，或是那些热衷于征战的民族；还有些民族像乔拉人，既务农也经商。就一般情况而论，我们可以说沿海地区主要是输入黄金和奴隶，并提供欧洲产品，而萨赫勒地区则是输入柯拉果并从沿海地区获得武器，还向沿海大部分地区输出盐、牲畜和奴隶。介于沿海和萨赫勒地区之间的是热带大草原地区，它向外供应奴隶和牲畜，包括用于商贸运输的驴，用于作战和供宫廷使用的马匹，以及小麦和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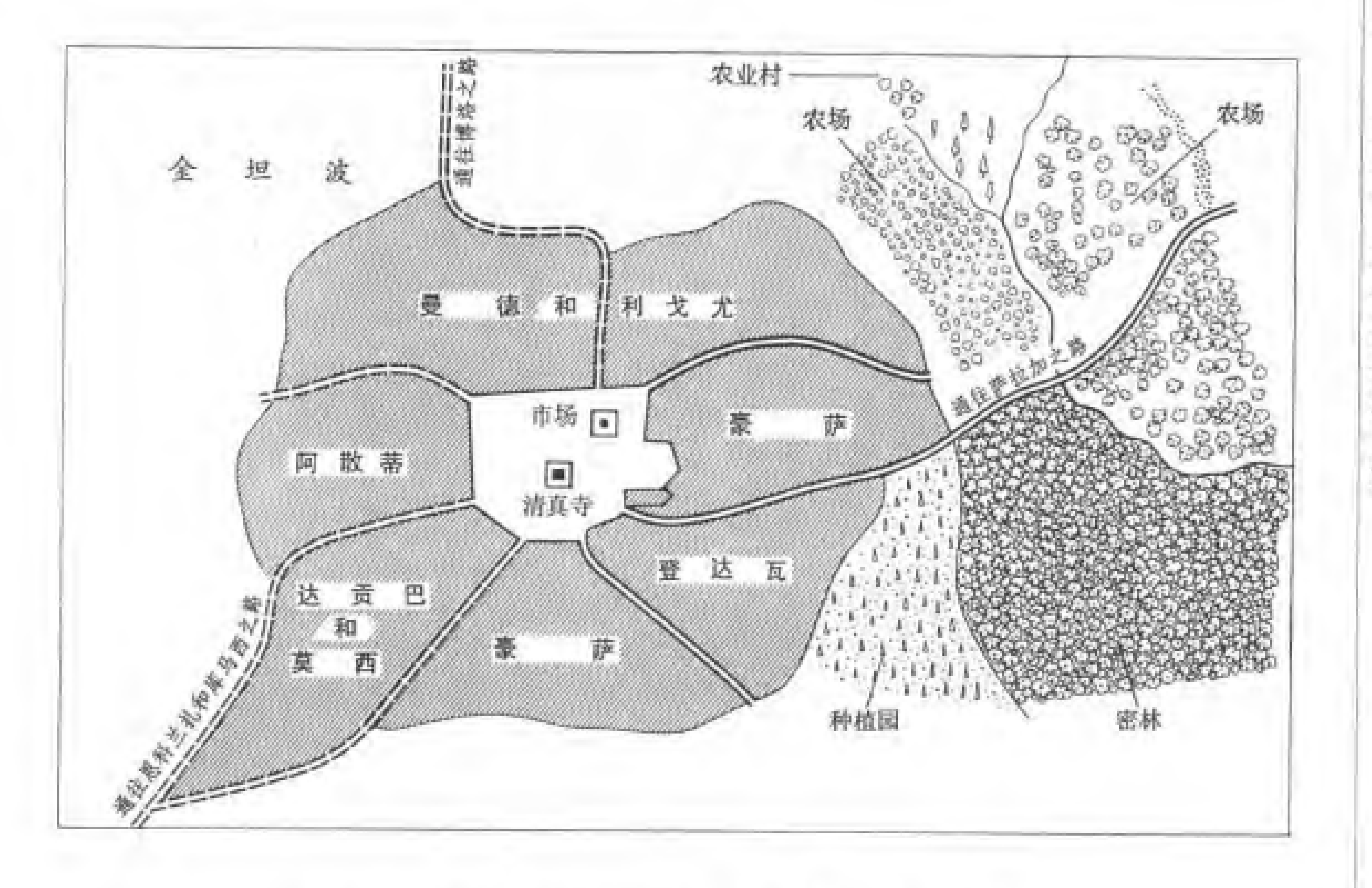
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给这种状况带来了引起结构失衡的因素，特别是在南部。那里执行废奴法令的监督机制建立得最早，执行的也最严格，尽管对家庭奴隶制是容许的。[38] 19世纪下半叶，奴隶制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尼日尔河湾地区。这是因为购买武器的费用急剧上涨，必须在交易中提供更多的奴隶。于是，找出整个族群，例如擅长于挖掘这种“黑色矿石”的赞伯马人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奴隶供给的主要来源不仅是北部地区穆斯

---

[38] A.A.博亨，1974年，第179页。



图片 25.7 莫西商人，1888 年



图片 25.2 金坦波：黄金海岸内地的商业城市（仿照L.C.宾格尔，1892年）

林领袖们发动的大圣战和莫西地区的那些冲突，也从其它一系列渠道得到奴隶：如数以百计的酋长国的居民，图阿雷格领地与沿海商站交接地区的奴隶。在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里，每十年每个地区几乎都爆发战争，而战争意味着有大量俘虏。这些牺牲品大多来自定居的农业社会，这里竟成为奴隶贸易实际的蓄养地。因此，在那些居民大批被掳掠的地区，处处人烟稀少。以俘虏充做贡赋，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十分沉重的。当土著居民采取行动组织起来保护自己时，他们却经常在其它地方的战争中被充做雇佣军，如在赞伯马人的队伍中作战的一些古龙西人，以及参加亚滕加王朝之战的萨莫人（萨南人）。 **687**

贸易渠道

在本章涉及的地区的南部，正如前文所说，是阿散蒂人为控制沿海地区欧洲人的商站而进行殊死战斗的场所，这对于它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占据这些商站，它才能控制贸易路线的两端。19世纪初，占黄金海岸出口额十分之九的奴隶贸易废除之后，根本改变了它的经济状况。然而，到1840年，棕榈油已经取代奴隶贸易成为黄金海岸的主要出口产品。这主要是麦克莱恩的政策所带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继棕榈油之后是橡胶，这两种产品为黄金海岸南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阿散蒂和沃尔特生产的黄金大部分往南运销，而柯拉果则销往北部。可是经过孔城和布纳进一步西行的路线逐渐被放弃，改为托马斯·鲍迪奇报告中提到的通过达贡巴和豪萨地区前往东北方面的路线。由于沿海地区奴隶贸易的废除，进一步促进了北部地区贸易的发展。原因是，通往芳蒂地区的商路经常遭到封锁，而奥斯曼·丹·福迪奥发动圣战以后，豪萨兰和博尔诺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定。

于是，来自欧洲的奢侈品便通过北非南下，运到费赞和豪萨地区，有时甚至经由达荷美沿岸往北运到卡诺，并直达尼日尔河湾地区。土耳其和的黎波里的丝绸、地毯，博尔诺的泡碱，以及豪萨的纺织品，被用来交换达贡巴、莫西和曼德生产的柯拉果、黄金、棉织品，以及苏丹萨赫勒地区的油果和牲畜。

这些说明这个时期冈贾国萨拉加城的惊人发展。[49] 该城恢复了原先冈贾国的格皮佩城所起的作用。萨拉加城是通往延迪、桑桑尼、曼戈以及远至沃尔特、豪萨或约鲁巴领地的出发点。杜普伊告诉我们，萨拉加城是库马西城规模的两倍，人口40万。萨拉加的繁荣一直持续到阿散蒂政权崩溃，当时这条贸易路线移向金坦波。就交换方式而言，以货易货是通行规则，虽然大宗买卖也可能使用金砂，还有贝壳，因麦克莱恩发布告示规定，贝壳应作为沿海地区的合法货币。在洛戈菲拉，J.B.基特加曾发现大量贝壳与土制陶罐碎片堆放在一起，这证明重新使用贝壳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从普腊地区的遗址中挖掘出的。[50]

690 除阿散蒂和洛比的金矿之外，在上黑沃尔特河左岸，特别是19世纪也聚集着大量来自各地的淘金者：迪扬人、达加腊人、博博-乔拉人、布瓦巴人和莫西人，以及土著居民古龙

[49] K. 阿欣(Arhin)，1979年，第3章。

[50] 小贝壳比大贝壳价格高，按兑换率，1万个小贝壳可换得1.1万个大贝壳，这导致货币兑换商的出现，他们从中获得10%的利润；参阅J. B. 基特加(Kietegha)，1983年，第185页。



图片 25.8 萨拉加城，1888 年

西人。他们使用十分简陋的工具(镐、镢、陶罐、葫芦和盆等)挖掘金子。因为只有男人能“看见金子并消灭它”，所以进行劳动分工时规定男子从事勘探、挖掘，以及粉碎矿石的任务，妇女则负责运矿和洗矿工作。到 19 世纪末，这些社区奴隶在人口中的比例很高(在普腊的农村每个家庭有 60 名奴隶)。[51]其突出的特点是，这些都是家庭或个人企业，与任何中央集权制国家没有关联。赞伯马人的入侵使得金矿区一些村庄的农民把工具隐藏在山里，进入备战状态。要是俘获到男人可以卖 10 万个贝壳，而女俘虏则可以卖双倍的价钱。很明显，**691** 黄金生产与猎奴活动，在某些方面是互不相容的。不过，武装袭击集团自然宁可猎取奴隶，因为奴隶更加有利可图。[52] 此外，奴隶还可用来淘金。在 19 世纪上半叶，仅普腊一地每年就可能生产出多达 50 公斤的黄金。[53]

这里的黄金主要运往撒哈拉地区和摩洛哥，而洛比的黄金则运到黄金海岸和利比里亚。部分黄金以金粉和金块的形式贮存在竹筒里或用布包裹，藏在阁楼上，或装入陶罐埋在地下。这些黄金通过当地或区域内的商路，有时运往博博、桑、杰内和莫普提，有时运往孔城和阿散蒂，有时经维萨和瓦运到加奥瓦(洛比)或萨拉加，有时运到瓦加杜古并继续往前运往普伊滕加、坦科多戈和萨拉加。在当地贸易中，黄金被用来购买盐、柯拉果、白长袍、奴隶、牲畜和谷物。据 L.G. 宾格称，沙漠的块盐比其它东西更受青睐。这些盐来自陶德尼，经过廷巴克图、莫普提、杰内、布拉和桑，最后销售到整个萨赫勒地区和热带草原地区。那

51 同上。
52 据 V. 卡钦斯基(Kachinsky)所说，在奴隶商看来，奴隶据说要比黄金的利润高 90 倍，转引自上书，第 155 页。
53 J. 萨加茨基(Sagatsky)，1940 年，第 5 页。

些途经阿德拉尔和提契特运达塞古的盐走的也是同样的路线。来自沿海的海盐和从达博亚的河床盐田采集来的盐一直运到孔城。在萨赫勒的沃尔特地区，吉博人的酋长发展了一种积累奴隶财富的狡猾伎俩。如果一名奴隶杀死某人，然而向酋长自首，他将被免罪并成为后者的财产；对待窃贼的办法是，如果这个窃贼是富有的，酋长就会剥夺他的财富。[54] 到 19 世纪末，多里共有 50,000 自由民和 50,000 奴隶。不过，细心和善于观察的旅行家海因里希·巴尔特，1853 年曾经过这个地区，他在记载里对奴隶只字未提。这表明 19 世纪下半叶这一地区奴隶贸易有很大增长。

从多里通往四面八方的道路形成网络，本身就足以说明萨赫勒与各地的贸易如何开放。因为马西纳帝国立法规定对烟草征收高额税并禁售烟草，使廷巴克图不堪重负，商人们于是把贸易转向由摩尔人和图阿雷格人控制的加奥。这些图阿雷格人大多住在多里。从卡耶经巴马科和邦贾加拉到多里的商路被乔拉人控制，而从索科托经桑桑尼-曼戈到多里的商路

692 则由豪萨人掌握。从瓦希古亚经亚科和卡亚到多里，或从瓦加杜古经齐滕加和普伊滕加到多里的商路由莫西人占用。输入多里的货物有来自北部的烟草、草席、牲畜和盐，用以交换布匹、豪萨的头巾以及欧洲的工业品。豪萨地区产的缠腰布和白长袍，被用来交换牲畜和盐。莫西地区的奴隶、布匹、熟铜和驴则用来交换阿散蒂的柯拉果、盐和牲畜。乔拉地区的商人用家乡产的盐和牲畜换取他们需要的几内亚布和金属器具。在吉博，挤满了来自瓦希古亚的雅尔塞商人，通行易货贸易，而在多里却使用贝壳货币。在多里城，由于经商活动，商人们发现自己与氏族贵族的利益一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通过婚姻结成联盟。尽管这样，商人们在城镇里是居住在属于他们的区域内，而且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总之，商人的活动对整个经济来说作用并不大，但它对所有人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质的影响。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只需回顾一下诸如贝戈、卡法巴、金坦波和阿特布布这些边境社群的重要性。在那里，混合型的社会已迅速成长起来。冈贾人、乔拉人、豪萨人、达贡巴人、阿散蒂人、富尔贝人、约鲁巴人、登迪人、博尔诺人、巴里巴人、库兰戈人、古龙西人等等，纷纷涌人萨拉加城。[55] 这个城市成为一个社会的真实缩影，这里实行的劳动分工比同一种族的土著居民社会更进一步，有地主、佃农、中间商和不同种类的工匠。[56]

社会变化

动荡时期必然出现社会变化。19 世纪尼日尔河湾地区和沃尔特河流域各国的情况确是如此。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进程我们拥有的资料甚少，看来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其社会变化似乎比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社会大，沿海地区的变化比内陆国家大，伊斯兰化地区的变化比其它地区大。虽然没有中央集权制权力结构的农业社会受那个时期动荡的影响最大，但这些社会坚信传统的生活准则，以此来解除他们的苦难。

奴隶和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境况在中央集权国家里更为糟糕。在富尔贝族群中发生的那

[54] H. 迪亚洛，1979 年，第 169 页。
[55] L.G. 宾格(Binger)，引自 M. 约翰逊(Johnson)，无出版日期，SAL/19/1。
[56] K. 阿欣，1979 年，第 3 章。

次的动荡无疑是最剧烈，原先在古尔曼斯巴统治下的游牧民，在圣战之后的几年内便成为统治当地居民或那些被他们沦为平民的民族、俘虏和农奴(bellah 或 remaibe)的君主，迫使他们从事耕种和放牧。此外，他们还统治手工匠人和乐师。这是一个特别严格的等级社会，其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知道的位置。利普塔科的埃米尔除了分到劫掠来的全部掠夺物的五分之一外，[57] 还接受礼物和被称做“扎卡特”的农产品贡赋。与此相似，吉博的酋长收受“贺礼”并对盐商征收税款。这些贵族有时由数以百计的随从侍候。在利普塔科，年老的奴隶状况得到改善(remaibe 可以拥有财产)，但俘虏的地位在利普塔科则悬而未决。乌斯曼·丹·福迪奥亲自向埃米尔建议解放那些参加过对古尔曼斯巴作战的奴隶。利普塔科的埃米尔西库·萨亚鲁在 1861 年面临由觊觎权力的伊斯兰教隐士阿卜杜勒·卡迪里煽动的奴隶起义。这位埃米尔只好同意解放奴隶来缓和局势。

693

工匠们不能享受自由民和贵族享有的权利，而且不能与其他阶层的人通婚。贵族能娶奴隶出身的女孩，但不能与铁匠的女儿结婚。[58]乐师以自己神奇的口才能帮助统治者巩固权力，甚至也能使统治者只享有很小的权力，同样，铁匠由于手艺的神奇性也受人敬畏。铁匠还充当个人与家庭之间冲突的调解人。不过，也不乏各种矛盾。[59]

在瓦加杜古的莫西王国，奴隶被大批地阉割，以便于将他们输送到北部。在阿散蒂，以贡赋形式交纳的活人数量极大，到奴隶制废除时，阿散蒂赫纳(国王)声称他无法再供养他拥有的两万名俘虏奴隶，并补充说：“除非我将他们杀死或卖掉，否则他们将变得强大并杀死我的人民。”[60]

然而，在没有中央集权结构的国度里，奴隶和其主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似乎并不那么敌对。我们得知在普腊的村庄里，奴隶“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得到养育。M. 佩雷告诉我们，在洛比地区，每个亚母系氏族被分为两个群体：纯正血统的维亚人和战俘出身的德阿人。后一类人包括为逃避饥荒和猎袭，在某个凌晨躲在门前而被人发现后收养的人。然而这两类人，已完全融入社会组织里，成为生产和繁衍的生力军。因此，奴隶和他的主人住在同一间茅屋，称主人为“父亲”；他同主人一样都是相同血缘集团的一员，遵守相同的祭礼和禁忌，并从事相同的工作；他的主人为他娶妻，他拥有一块田地并有权积攒贝壳，来赎买他的人身自由或另买一人来替代他。他的要求只是像主人一样能生活在同一村子里。[61]由此可以看到将奴隶制作为加强氏族和所属族群的手段这种审慎政策的明显迹象。

694

这个时期其它类型的矛盾在那些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更加突出，即阿散蒂、班巴拉诸王国、亚滕加、瓦加杜古王国和吉里科，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王公贵族阶层和当权者之间的对立。瓦加杜古王国曾发生这种对立。该国的国王莫戈·纳巴·卡尔福(1842-1849

[57] 按照严格的传统，只有卡迪才能接受，参阅 H. 迪亚洛，1979 年，第 274 页。

[58] 这一情况在亚滕加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9] 据说，当一个村长受命提供一匹马，而为此他牵走铁匠的马时，利普塔科的所有铁匠一齐带上他们的铁砧并把铁砧放在阿米鲁(村长)面前，说：“土地是你们的，但铁器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将不再打制锄头、镐或矛刀，如果人们愿意，他们就别种地了。”最后，村长只好同铁匠们达成协议，并把马归还他们。于是铁匠们就回村了。H. 迪亚洛，1979 年，第 186 页。

[60] J. 杜普伊(Dupuis)，引自 A. 博亨，1974 年，第 179 页。

[61] M. 佩雷(Père)，1982 年，第 214 页及其它诸页。

年)决定把从富人那里没收来的财产分给平民中的穷人。他在执行法律时，对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这一社会政策很可能是卡尔福执政时期因他的重臣维迪·纳巴煽动而发生的王子大叛乱的一个因素。

最后，我们还要谈到沿海地带。那里在贸易和教育的推动下，正在产生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社会等级。当商业活动的基础从奴隶贸易转向以棕榈油、橡胶、象牙和黄金换取欧洲产品之时，一个新的商业阶级应运而生。他们是欧洲贸易公司的代理人，经营由公司进口的大宗商品。于是一批大商人开始了经商生涯，他们在沿海中心区设有商业机构。在他们下面有大批挨家挨户推销的小商贩，他们依赖大商人，为大商人效力。[62]阿散蒂商人独自控制了非洲内陆产品的供应，即阿孔科福(akonkofo)，也是商业活动中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63]

在教育领域，几乎同样在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阶层甚至整个新的社会阶级。处在这个等级最顶端的是大商人家族的后裔，例如黄金海岸的班纳曼家族，自19世纪初期以来，他们已在欧洲或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1827年建立)受教育。这些人被看做"英国绅士"，有绅士风度。他们被允许进入欧洲人的圈子，并且可以担任地方行政官、城堡司令之类的职务。在这个等级的另一端是大批被戏称为"海岸角学者"的人，他们只受过初等教育，受雇担任薪水微薄的办事员，或者因未受雇佣而被迫充当英国人或非洲商人的经纪人漫游于丛林地带。他们受人鄙视，被看做是英国文明的拙劣模仿者，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不识字的酋长和其乡民之中。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那些没有高深学问的非洲人，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成为海岸城镇的独立商人和管理人员。[64] 这样就奠定了今后社会矛盾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些受过教育的企业家阶级之间的合作才使芳蒂联邦得以成立。

695

宗教变革

在这个地区，19世纪是伊斯兰教在北部和中部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基督教再度被传入南部。这两种宗教与教育声誉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不仅具备书写能力，而且摆脱了当地环境的束缚，开阔了视野。

在该地区的北部，由著名人物(索科托的乌斯曼·丹·福迪奥、马西纳的塞库·艾哈迈杜和哈吉吉·奥马尔·塔尔)领导的圣战影响广泛，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作用，如同利普塔科圣战和利普塔科酋长国所起的作用。

甚至班巴拉和莫西两个王国也随着伊斯兰教改宗运动的兴起而前进，或者说至少是受其影响。班巴拉和莫西通常被称为"反抗伊斯兰扩张的壁垒"，但是如果说过去是这样的话，在19世纪当然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此时，伊斯兰教不仅在王国社会秩序的最上层，而且在社会的每个方面都是强有力的势力。我们只需看看19世纪初，蒙宗·贾拉执政时期塞古王国的情况就可以明了。蒙宗·贾拉的母亲马卡罗利用来自塞古-西科罗和特古的伊斯兰教隐

---

[62] B. 克鲁克尚克，1853年，第2卷，第30-94页。
[63] I. 威尔克斯(Wilks)，1975年，第699-705页。
[64] P. 福斯特(Foster)，1965年，第68-69页。

士的斡旋，调解了国王和他的兄弟恩雅纳科罗·达的关系。蒙宗·贾拉的继承人曾向他的朋友，一位博学的伊斯兰教隐士要一个能给他带来胜利的护佑物。托罗科罗·马里(1854-1856年)把自己的一个儿子托付给哈吉吉·奥马尔，请他把孩子抚养成人。可以肯定地说，这诱使君主身边的武士们放弃了他们的忠诚并把孩子溺死，然后对他的继位者解释说："我们杀了你的兄弟，因为他想强迫我们成为穆斯林，他还送礼给伊斯兰教隐士，浪费国家的资源。"[65]在莫西诸王国，穆斯林中达到这种程度的只有雅尔塞人、但在19世纪早期，莫戈-纳巴公开接受伊斯兰教信仰之后，这里成为传教活动的中心。

瓦加杜古的纳巴·杜卢古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在他的朝廷中，伊玛目被作为重要人物对待。然而，似乎为了避免过激的变革，他放逐了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纳巴·萨瓦多戈，并且罢免了孔比西里的首领普旺达。这两位伊斯兰的狂热信徒后来退居于巴桑-瓦尔加，并把那里变成一个宗教基地。当纳巴·萨瓦多戈继承王位后，他恢复了孔比西里首领的职位。孔比西里后来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温床。他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萨拉巴滕加-雅尔塞的古兰经学校学习。 696

在纳巴·卡尔福执政时期，在拉勒发动叛乱的纳巴·沃布戈求助于瓦加杜古的伊玛目，请他以个人的名义与国王斡旋。最后，纳巴·库图终于获得了正规的古兰经教育。他放弃了试图把他的宗教和传统礼仪协调起来的打算，把实施传统礼仪的责任连同习惯法的管理交给了他的大臣们。他在王宫的东门(供妇女和战俘出入的门)建立一座清真寺，遵循伊斯兰教的规定履行义务。他还把一个儿子送到古兰经学校。在另一方面，他帮助布尔萨的纳巴·皮奥戈镇压了来自富塔贾隆的富尔贝人莫迪博·马马杜挑起的穆斯林叛乱。莫迪博拥有"瓦利"(即圣人)的称号，对纳巴不支持他从事改变人们信仰的态度感到失望。当他得到雅尔塞，特别是马兰塞(桑拉伊)和富尔贝人的支持后，毫不犹豫地鼓动起一场叛乱。为此他被迫逃亡，他的"塔利布"(追随者)纷纷被杀掉。[66]事实上，由于莫西人从事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他们发现自己已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伊斯兰化的进程。这个过程在沃尔特河流域的西部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孔国、吉里科、博博-迪乌拉索的支持下，最后有很短一段时间在萨摩里·杜尔的支持下，得以继续。伊斯兰教能在极不易被接受的布瓦、桑古龙西或洛比的社会里传播，要归功于乔拉商人或像瓦哈布和兰菲腊那样的马尔卡(达芬)伊斯兰教隐士。

在本章论及的地区的中心地带，19世纪，伊斯兰教在达贡巴和曼普鲁西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桑桑尼-曼戈也是这样。伊玛目成为政教合一的人物。在阿散蒂，奥塞·克瓦米(1777-1801年)同情伊斯兰教，可以想象他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被废黜的。而奥塞·邦苏宣称："这本书(古兰经)是伟大的，我喜欢它，因为它是真主的书。"据鲍迪奇说，在库马西大约有一千名左右的穆斯林受穆罕默德·加姆巴的领导。他是曼普鲁西伊玛目的儿子，人们称他巴巴，他充分利用自己身为皇家议事会成员的地位。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商人自然都涌进都城。伊斯兰教隐士备下的护身之物，尤其是战袍，售价很高。[67]不应夸大伊 697

[66] 参阅G. 舍隆(Chéron)，1924年，第653页；J. 威特尔斯-吉尔(Withers-Gill)，1924年；N. 列夫泽恩(Levtzion)，1968年，第170页。

[67] 参阅A. 博亨，1974年，第191-194页。

斯兰教在阿散蒂帝国对传统宗教体制的影响，这点无疑十分重要。实际上，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与政治结构相关联。尽管如此，其影响在起作用，而且伊斯兰教竭尽全力使王公们不屈从于基督教及其传教士。几乎在同一时期布干达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基督教只是在19世纪末随着白人神父的到来才在廷巴克图出现。但早在这以前，基督教就已传播到这一地区南部的黄金海岸。在布雷门传教团之前来的巴泽尔福音传教团，在1828年就已立足于黄金海岸的整个东南部（阿夸皮姆崖岸，阿克拉、阿克耶姆、阿达，以及讲埃维语的克塔和佩基地区）。他们开办示范农场和技术学校。[68] 由乔治·麦克莱恩领导的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把他们的传教活动集中在西海岸，把海岸角作为基地。托马斯·伯奇·弗里曼，一个能力非凡的人，不辞辛劳地努力在远至阿散蒂国的整个内陆地区，并沿着海岸远达约鲁巴兰建立卫理公会学校。[69]

弗里曼受到废除奴隶贸易和实现非洲文明协会的理想的鼓舞。该协会的目标是学习主要语言，并改造其中最重要的语言使之能够书写；引进印刷出版技术和发展当地造纸业；调查不同地区的气候；引进医学；为方便运输修路开河；出于卫生目的建立有效的排水系统；与非洲人分享最先进的农业知识；向他们提供设备和优良种子；推荐为世界市场生产最好的农作物。[70] 他们像巴塞尔传教团一样，在海岸角地区建立示范农场。他们接收女童入学，女生的人数常常占十分之三。[71] 更令人难忘的是，为消除传播福音时的语言障碍，早在18



图片25.9 克里斯琴堡（阿克拉）一座巴塞尔传教士木工作坊，木刻，原为照片，约1870年

68 H. W. 德希布鲁内尔(Debrunner)，1967年，第6、7章
69 见T. B. 弗里曼(Freeman)，1843年。
70 H. W. 德布鲁内尔，1967年，第104页。
71 J. 比彻姆(Beecham)牧师的证词，马登(Madden)博士报告专门委员会文件汇编，1842年，引自G. 梅特卡尔菲(编)，1964年，第176页。

世纪，他们就已经把基督教的基本著作译成加语。1875 年，J. G. 克里斯塔勒牧师出版了一本特维语语法书，1818 年又首次出版他编的阿坎语词典，这本词典至今仍是最好的。[72]

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付出种种努力，但传统宗教仍继续影响着绝大多数 698 人的信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新的宗教中仍存有传统信仰存在。

结 束 语

从总体来看，尼日尔河湾地区和沃尔特河流域的各民族，在整个 19 世纪期间，由于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为外来的入侵铺平了道路；的确，他们有时要招引外来干预以解决他们的分歧。但是，可以说，这一过程的种子，早在几个世纪之前由于奴隶贸易而已在经济矛盾中萌芽。新群体的迁徙和定居、社会矛盾乃至政治和宗教的发展，只有联系前几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这一主要现象才能看得清楚。这一主要现象在 19 世纪曾迅速发展并达到白热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地区像非洲其它地方一样，19 世纪的确标志着一个漫长时期的结束。

（鲁 虎译）

[72] J. G. 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875 年，1933 年。

26 19世纪的达荷美、约鲁巴兰、博尔古和贝宁

A. I. 阿西瓦茹

以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为分析单元

699 本章所叙述的地区西部以莫诺河(现在的贝宁-多哥边界)为界，东部和北部以尼日尔河为界，南至(大西洋)贝宁湾。这里大多是起伏不平的旷野，地势从海岸向内地逐渐升高，以阿塔科拉山和库库鲁山海拔最高。总的说来，这里草木蓁蓁，开阔旷远。真正茂密的雨林型植被主要集中在东南一带，即古代的贝宁王国地区，现在的尼日利亚本代尔州范围内以及主要河流的部分流域地区。

该地区包括地理学上西非著名的"狭谷"的大片地区：西部和中部苏丹地区广袤无垠的大草原通过森林地带直接与海洋相联接。达荷美古代的丰恩王国的全部领土和约鲁巴兰的西部，以及博尔古，都在"狭谷"以内。几条河流保障了排水的通畅，其中有尼日尔河、贝宁河、奥韦纳河、奥森河、奥贡河、耶瓦河、韦梅河(法语地图称 Ouémé)、奥帕拉河、祖河和莫诺河。

该地区主要包括四个明显相互关联的不同文化区域，其西面是阿贾人，中部是约鲁巴人，北面有博尔古(念做 Bohu)人，东边是埃多人。可以料想，其中的任何一个文化区域都可以根据其方言、生态和特定的生活方式等亚文化特征再分成小区。操阿贾语的民族[1]主要有三个小族群，包括：统治达荷美古代王国的丰恩人；居住在韦梅河谷和横跨现在的尼日利亚和贝宁人民共和国(前法属达荷美)边界南端的波多诺伏-巴达格里地区的古恩人；生活在贝宁共和国西南部库夫河与莫诺河之间的埃维人，以及毗邻多哥南部和加纳东南部的

700 与埃维人通婚的亲族。在丰恩人的北面和东面，在阿波美高原上聚居着马希人，他们居住在帕维尼扬、萨瓦卢、韦瑟、达萨祖梅、贾卢库和科韦。该族群也有着明显的阿贾人亚文化特征，他们当中流传着其祖先与阿贾人交往的古老的传说。

约鲁巴(法国人种学文献称为纳戈)文化区域是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范围最广大的文化区。[2] 它包括现在尼日利亚的奥贡、拉各斯-奥约和翁多诸州和将近半个夸拉州之地，以及贝宁共和国东部的毗邻部分和多哥中部以西地区。该文化区由许多小族群组成，有的规

---

(1) A. I. 阿西瓦茹(Asiwaju)，1979年

(2) D. 福德(Forde)，1951年；J. 伯索(Bertho)，1949年；E. G. 帕里恩德(Parrinder)，1947年、1955年；P. 默西埃(Mercier)，1950年，

模不大，如伊费人组成的单一王国，或者如埃基蒂型，组成几个自治的君主国。尼日利亚地区内，主要的约鲁巴小族群有：奥约人(居住在奥约州和夸拉州之间人数最多的单一小族群)；居住在奥约州和奥贡州交界地带的伊巴拉帕人；生活在奥约州内的伊费人和伊杰萨人；散居在奥贡州和拉各斯州的伊杰布人；生活在奥贡州的埃格巴人和埃格巴多人；翁多州的翁多人、伊卡莱人、埃基蒂人、奥沃人和阿科科人，以及拉各斯州的阿沃里人和与之通婚的埃格巴多人。从北到南散居在尼日利亚-贝宁国际边境的有萨贝人(萨弗人)、克图人、奥荷里(荷里)人、伊福尼因人和阿纳戈人等小族群。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上还必须添上居住在贝宁共和国中纬度地区和多哥的阿塔帕梅地区的阿纳人、费人(伊费人)和迈因比里人(马尼格里人)。

与约鲁巴兰相似，如今的博尔古也是国际间被分割了的文化区域。[3] 三大传统中心力量中的两个——布萨和伊洛，主要位于现在的博尔古夸拉州地方政府所辖地区之内和尼日利亚索科托州的毗邻部分。而第三个同时也是领土最大的传统国家尼基，则被现在的尼日利亚-贝宁边境分割，尼基国的西半部位于贝宁的这一边，它的其余部分位于边境线的尼日利亚一边。

亚文化的划分或多或少反映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组合和分化层面。正如马乔里·斯图尔特所正确指出的，博尔古是大约15世纪晚些时候，伴随着其三大实力中心布萨、尼基和伊洛而出现的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混合体。这些国家的早期形成似乎是由于一支主要操曼德语的来自马里的外来族群与以前就在此生活的居民融合而成一个新的国家和独特的文化。这种看法可以在博尔古国家流传的关于国家起源的传说中找到一些根据。在博尔古主要使用两种语言：巴托努语和博科语，这一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巴托努语是广大民众讲的属沃尔特语系的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又称为巴鲁巴语，巴里巴语或巴尔巴语；博科语(又称祖格维努语)是曼德语系在东南部的分支，是统治阶级“沃森加里”(Wasangari)讲的语言。 702

这两大语言中又都分成几个不同的方言。譬如，博科语就有四种主要方言，即：在布萨和瓦瓦通用的博科-布萨语(比萨格韦语)；在贝宁共和国的尼基、塞巴纳和康迪及尼日利亚的与尼基有姻亲关系的酋长国如耶希克拉、凯亚马、桑迪鲁、伊莱萨-巴里巴、阿利亚拉和奥库塔使用的博科-尼基语；在伊洛、德卡拉和北阿利亚拉区通用的蒂恩加语或基恩加语。博尔古通过使用两种语言而实现了语言上的统一，成为沟通普通民众和他们传统的统治阶级之间的桥梁。语言的使用所显示的文化上的一致性，由于各王国关于共同起源的传说以及博尔古所有的统治者都承认布萨为其祖先所在地而得以巩固。

该地区的第四个主要文化区域是操埃多语的贝宁王国。[1] 它不仅包括贝宁城及其周围的埃多人，还包括与其有语言和历史渊源的北部的伊尚(埃尚)-伊夫比奥萨康人和阿科科-埃多人，南部及东南部的伊策基里人、乌荷博人和伊索科人。

这四大文化区域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其实，到19世纪早期，文化或种族的相互渗透已

---

[3] O. 巴戈多(Bagodo)，1979年；M. 斯图尔特(Stewart)，即将出版。
[1] R.E. 布拉德伯里(Bradbury)，1957年；A.F.C. 赖德(Ryder)，1969年。



图片 26.1 "巴巴拉沃"(医师)背上的武士，约鲁巴兰东北部出土的雕刻品，约成于1850至1875年

到了相当的程度。一个以约鲁巴人、阿贾人、博尔古人和埃多人为亚文化体系的单一文化复合体已具雏形。共同起源的传说强调思想意识的一致，这至少是力图联系四个亚文化单元的统治阶级，除此之外，该地区相互关联的各族群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语言和其它文化

乃至经济和政治交流的因素。正如几项研究所强调指出的,[5]这些联系引起连续不断的移民运动和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和逆向人口流动。这种流动持续到19世纪,直到以专有边界为特征的欧洲殖民国家领土框架的建立才正式阻止这种流动。因此,该地区从莫诺河到尼日尔河的历史最好看做是一部相互渗透的历史,不仅阿贾人、约鲁巴人、巴里巴人和埃多人内部及相互之间互相渗透,而且他们单独地或集体地与其北面的邻国如努佩人、朱昆人、卡努里人、巴里人、蒙萨人和富尔贝人(富拉尼人),西面的邻邦埃维人、加人、阿丹格贝人、格罗博人和芳蒂人,东面的伊乔人、伊策基里人、伊索科人、乌荷博人、西伊博人、伊加拉人、伊格比拉人和巴萨人相互渗透。 **704**

旧奥约帝国的崩溃

在约19世纪统治着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大多数土地和人民的最重要的单一国家是旧奥约帝国。[6] 这个著名的约鲁巴国家的核心地区几乎从未超出奥森河和奥贡河流域之间的地方。但是,向它纳贡称臣的领土和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明显影响或控制的地区,大致覆盖了本章所叙述地域的西半部。

在最西边,达荷美的阿贾人国家从1740年前后开始,就遭到奥约的一连串进攻,1748年被迫俯首称臣。阿贾的附属国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奥约使波多诺伏沦为保护国,并成为它进行奴隶贸易的主要出口港,此时的波多诺伏也差不多降到附庸国地位。[7] 连结这个港口和奥约的商路穿越约鲁巴人的小族群埃格巴和埃格巴多的地区,因此奥约帝国当局不得不派出国家的官员(ajele)驻守在诸如伊拉罗和后来的伊詹纳等埃格巴多人居住的战略地区,实行控制。奥约在文化和经济方面亦深深地渗透到埃格巴和埃格巴多地区:奥约人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拓殖地,奥约商人在商业活动方面也很活跃。[8]在西部,另外两个主要的约鲁巴人国家克图和萨贝小族群保持政治自治的传统,但是也同奥约保持密切关系,并受益于奥约帝国全面保护的影响。东博尔古和努佩的西南部一样,承认奥约的"阿拉芬"(alafin,国王或皇帝)的权威。所有这些地区都位于前面所说的地理学上的"狭谷"以内,由于地势比较开阔平缓,奥约骑兵可以纵横驰骋,而奥约的代表显然也享有道路及交通之便。

本章所述地区的其余部分,即东半部,位于热带雨林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它组成了约鲁巴文化区的其余部分,即中部的伊费人和伊杰萨人,东部的埃基蒂人、翁多人、阿科科人和奥沃人,南面的伊杰布人、伊卡莱人、奥基提-普帕人和阿沃里人。然而,在我们所探讨的地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非洲国家——贝宁王国,其霸权范围及其显赫一时的辉煌,堪与奥约帝国相提并论。但是,即便这里也发现了大量与奥约保持重要联系的证据。

---

[5] 根据约鲁巴和博尔古同源的基斯拉传说,所有约鲁巴和贝宁君主都承认伊费是其祖先所在地,阿贾人也宣称他们的远祖生活在伊费。见F. 德梅戴罗斯(de Medeiros),1984年;I. A. 阿金乔宾(Akinjogbin)和G. O. 埃克莫德(Ekemode)(编),1976年。

[6] R. C. C. 劳(Law),1977年。

[7] P. 莫顿-威廉斯(Morton-Williams),1964年。

[8] H. 克拉伯顿(Clapperton),1829年;R. 兰德(Lander),18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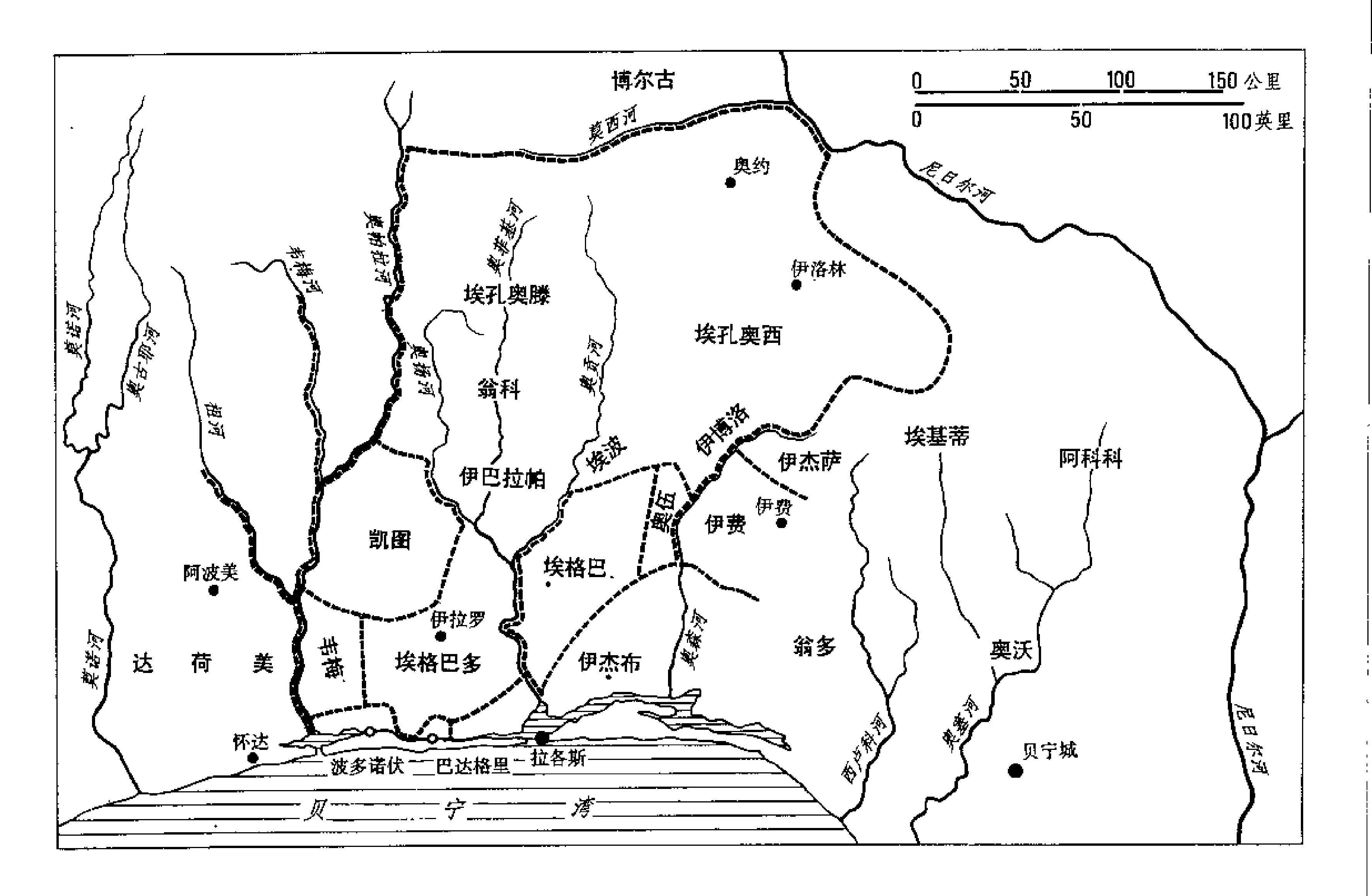


插图26.1 显示旧奥约帝国的约鲁巴-阿贾地区（19世纪初）

资料来源：J.F.阿德·阿贾伊和M.克苏德（编）《西非史》，朗曼出版社，1974年，第131页.



图片26.2 伊杰布-约鲁巴人的伊帕拉镇出入口，约1855年(格利克传教会，1855年)

还有证据表明，奥约或多或少连续地介入了伊费、伊杰萨、埃基蒂、翁多和伊杰布的历史进程。除塞缪尔·约翰逊所记载的传说外，[9]S.A.埃金托伊还提出一种观点，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埃基蒂、伊杰萨和伊博米纳也受到奥约的影响”。[10]我们还没有找到证据支持彼得·莫顿-威廉斯提出的埃基蒂、伊杰萨和阿科科可能充当了奥约帝国的“奴隶储备地”的观点。[11]但是，已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奥约对伊杰萨的军事压力被伊杰萨人成功地击退了。据认为，奥约和伊杰萨分别建立埃德和奥索博是这两个约鲁巴人国家出于需要而建立的军事哨所，以便彼此警戒。这两个相邻的民族日后的关系，实质上是两个约鲁巴亚文化族群之间最终某种程度的相互渗透。 705

有关奥约与贝宁关系的记载更加令人瞩目。[12]这两国执政的王朝不仅宣布它们都起源于伊费，甚至来自同一始祖奥兰扬。因此，这两国都同伊费保持着礼仪性的联系。这种手足之情似乎由于两国之间最小限度的摩擦而得以维系。奥约实力强大的基础是骑兵部队，而骑兵或多或少受限于本章探讨的地区的西部和西北部比较开阔的地方。而贝宁的军事策略只适宜于在东半部众所周知的“常绿森林”中作战。由于这种生态环境的差异，两国的商业活动也就具有互补性。 706

从上述情况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旧奥约帝国处于从莫诺河到尼日尔河整个地

⑨ S.约翰逊(Johnson)，1921年。
⑩ S.A.埃金托伊(Akintoye)，1977年，第29-30页。
⑪ 同上书，P.莫顿-威廉斯，1964年。
⑫ J.F.A.阿贾伊(Ajayi)，载J.F.A.阿贾伊和M.克劳德(Crowder)(编)，1974年。

区历史的核心位置，所以它在19世纪30年代的崩溃注定要在约鲁巴兰、达荷美、博尔古以及贝宁王国统治的地区造成社会政治的震荡。正如J. F. A. 阿贾伊所说，“旧奥约帝国的崩溃对西边操阿贾语的民族以及东边的贝宁帝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3]它标志着本章所探讨的这个地区进入了战火连绵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时代。它对沿贝宁湾海岸贸易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为英国、法国和最后到来的德国竞相干预这个地区的政治造成了有利条件。

在这里详细叙述奥约帝国崩溃的过程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14]只说一点就够了，正如其它类似的立足较稳并且延续多年的国家一样，奥约帝国的崩溃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它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衰落的明显征兆。19世纪的头20年其衰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继任的“阿拉芬”和家族首领们对权力的争夺这一内在因素已相当明晰。由于海外奴隶贸易的衰退，外来因素的影响使这种内在因素日渐复杂化。尤其是乌斯曼·丹·福迪奥的圣战往南扩张，使问题更加复杂起来。

在18世纪时，就已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正当奥约处于大扩张和其实力达登峰造极的时代，帝国就表现出自身结构的日渐腐败，以及军事与领土方面的脆弱性。继1774年埃格巴人在他们神话般的英雄利萨比的领导下成功地发动反叛后，1783年和1791年奥约军队又分别被博尔古和努佩击败。约1835年帝国崩溃后，进入了一个内部政治局势彻底混乱的时期，走马灯似的一个又一个短命而失败的阿拉芬即陨即灭，其中包括阿奥莱和马库，最后出现了长达将近20年之久的王位空缺期。

707　奥约军队总司令(are -ọna-hakanfo)阿方贾发动反叛，得到奥约国中约鲁巴穆斯林的援助，并试图在伊洛林宣布独立。这样，奥约帝国崩溃前的混乱期进入最后一个阶段。聚积在一起支持阿方贾的约鲁巴穆斯林军队贾马阿很快变成了一般他无法控制的力量，与阿方贾结盟从而成功地反叛阿拉芬政权的富尔贝穆斯林巡回教师、神秘主义者萨利赫·阿利米控制了贾马阿，阿方贾最终被这支军队消灭。阿利米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在奥约的眼皮底下在伊洛林建立起独立的国家。他得到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同意，成为伊洛林的首任埃米尔，之后，他把伊洛林的地位从以前的“奥约的一个反叛省份变成富拉尼圣战的一个边疆前哨”。[15]

奥约帝国的崩溃在该地区西半部震动最大，因为帝国对这里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在19世纪余下的整个历史时期，这里大多处于烽火不断的战乱之中，人民颠沛流离。战乱最终对沿海地区的贸易产生破坏性影响，招致欧洲人对内政的干预。有关这方面的历史也已开展了深入研究，还有相关的出版物，因此，在此只需作一个概括介绍。

由于旧奥约帝国发生危机，乌斯曼·丹·福迪奥的圣战波及到伊洛林，并向其它方向扩张，包括博尔古和与之关系密切的约鲁巴西北部的国家萨贝和邻近的讲阿贾语的地区。[16]在北埃格巴多的居民区也出现了种种劫掠活动。当地人发现这是富尔贝圣战的支持者干的。[17]

---

[13] J. F. A. 阿贾伊，第129页。

[14] 详情见J. F. A. 阿贾伊，1974年，R. 劳，1977年；J. F. A. 阿贾伊和S. A. 埃金托伊，1980年；I. A. 阿金乔宾，1965年。

[15] J. F. A. 阿贾伊，1974年，第144页。

[16] D. 罗斯(Ross)，1967年。

[17] A. I. 阿西瓦茹，1976年。

富尔贝人的威胁促成博尔古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外来敌人的态势。在1836年的埃莱杜韦之战中，博尔古和奥约结成联盟，它们铤而走险试图与富尔贝人对抗，结果还是失败了。1840年索科托哈里发国在奥索博彻底败北，在此之前它对伊洛林以南约鲁巴兰中心地区不断扩张造成的威胁一直没有停止。

然而，比这些圣战更具破坏性的是约鲁巴人自身的内讧。这些内讧可分为三大阶段：1820-1825年的奥伍之战、1860-1865年的伊贾耶之战和1877-1893年长达16年之久的埃基蒂帕拉波或基里吉之战。[19]奥伍战争基本上是一场争夺阿波木市场控制权的冲突，一方是与伊杰布结盟的伊费人，另一方据说是得到其邻国埃格巴人支持的奥伍人。伊费-伊杰布联盟得到奥约武士的支持，他们在旧奥约帝国发生危机后向南迁徙，成为为数众多的难民的一部分。



图片26-3 1854年的伊巴丹一瞥，前景为圣公会正教传教会的院落

708

奥伍之战导致其自身的毁灭，使所有最早的埃格巴居民区从具有历史意义的埃格巴森林迁移到南面和西面的领土上。1829年前后建立的伊巴丹城由在奥伍获胜的武士统治；1830年前后建立了作为难民营的阿贝奥库塔，这两地据信都是这场战争的产物。库鲁米领导下建立伊贾耶，阿拉芬·阿蒂巴重建奥约帝国，新首都设在阿戈-奥贾（现在的奥约，在伊巴丹以北50公里左右），这些都是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事情。这些新的居民区迅速发展成为约鲁巴兰新的权力中心，它们为赢得承认和继承因旧奥约帝国的消失而出现真空的政治领导权展开彼此争斗。主要是与阿贝奥库塔结盟的伊贾耶，同另一方伊巴丹进行的伊贾耶战争，就是这种争夺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实例。虽然1862年伊贾耶的毁灭标志着这场争夺达到高

[19] J. F. A. 阿贾伊和 R. S. 史密斯(Smith)，1964年；S. A. 埃金托伊，1971年；B. 阿维（Awe），1964年。

潮，但余波未平，斗争一直持续到1865年在伊科罗杜进行决战。[19]埃基蒂帕拉波之战，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是一场埃基蒂人、伊杰萨人和伊博米纳人结盟反对伊巴丹的大规模战争。在伊巴丹战胜伊贾耶之后，曾征服了这三个族群，并将其并入伊巴丹建立的新兴帝国。[20]

709 达荷美作为自治王国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兴起。此后在19世纪剩余的岁月里，直到1892年被法国入征服，它对约鲁巴兰的频繁入侵，都是旧奥约帝国解体的直接后果。[21]19世纪，达荷美所辖地区从东边的韦梅河延伸到西面的库夫河，南到大西洋，北到北纬7度，大致相当于现在贝宁人民共和国南部的三分之一地区。

虽然自克彭拉(1774-1789年)开始，脱离奥约而独立一直是所有达荷美君主们的政策目标，但是一直到盖佐(1818-1858年)在位初年才摆脱了奥约帝国的束缚。1797年阿冈洛(克彭拉的儿子和继承人)弑君篡位，废黜了阿丹多赞(1797-1818年)，拥立他的弟弟盖佐。这些事件说明，虽然达荷美的朝廷有时也发生混乱和暴力，但与18和19世纪的旧奥约帝国比较起来，达荷美的国王们明显地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统治。

政治上的稳定还由于贝宁王国著名的高度中央集权政府的成功运转而得到进一步保障。欧洲兴起的废除奴隶贸易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该国的经济，因为王国的经济几乎全部建立在奴隶贸易的基础上。然而，盖佐的经济政策是继续满足葡萄牙商人对奴隶的需求。与此同时，他对于棕榈油的出口贸易最终要取代奴隶出口所带来的刺激也作出反应。[22]当旧奥约帝国日渐衰落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时，达荷美相对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开始表现得清晰可见。显而易见，正是出于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盖佐才在19世纪20年代初单方面宣布独立。

通常认为，奥约对这一事态的发展所作出的反应是派出一支由巴洛冈·阿贾纳库统帅的远征军进行讨伐，但这支奥约军被达荷美击溃。而事情的真相似乎是，19世纪20年代，奥约几乎不可能派出一支值得一提的军队到远至达荷美这样的地方对付叛乱。事实上，研究表明，这根本不是一支奥约官方的军队。19世纪20年代初阿贾纳库所统帅的讨伐达荷美的部队很可能是萨贝-克图的联合行动。[23]这支联军包括约鲁巴和马希的部队，而阿贾纳库其人虽然常常被说成是奥约的军阀(balogan，巴洛冈)，但根据相当可靠的丰恩当地的传说，他是萨贝的土著居民。这场主动的军事行动仍然是以熟悉的军事结盟的方式进行的。在过去与达荷美相抗衡中得到旧奥约帝国保护的约鲁巴及与之有关的部族，一旦奥约不再存在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对其共同的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24]不管怎样，阿贾纳库的部队被打败了，他本人也被俘，后来为盖佐处死。

710 这样，达荷美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有组织地入侵约鲁巴兰的过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和对出口奴隶的贪得无厌的需求，由于发展经济作物及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有众所周知的一年一度的人祭风俗，入侵不仅影响到奥贡河以西的约鲁巴人，也影

---

[19] J.F.A.阿贾伊和R.S.史密斯，1964年，第120页。

[20] B.阿维，1964年。

[21] D.罗斯，1967年；K.福拉扬(Folayan)，1967年；S.O.比奥巴库(Biobaku)，1957年。

[22] 关于达荷美自治王国的经济政策的新近的研究，见E.苏莫尼(Soumoni)，1983年。

[23] D.罗斯，1967年，第37-40页。

[24] 19世纪其它类似的联盟包括克图和奥荷里联盟及奥克奥丹和伊波基亚联盟。见A.I.阿西瓦茹，1976年。

响到韦梅河以东的阿贾人和曼希人部族和国家，其中包括波多诺伏。[25]

马希人侵人阿波美的北部和波多诺伏的东南部，是20年代发生的事，而30年代则集中入侵埃格巴多的城镇如伊詹纳和雷富雷富。1831年和1836年，这两座城镇分别被夷为平地。如前所述，伊詹纳是奥约帝国代表官邸所在地，也是接收与分发来自埃格巴多及其邻近地区的贡品的重要中心。1840年代，奥克奥丹和萨贝遭到破坏，1880年代再度遭此劫难。也是在80年代，自70年代末起就遭到骚扰的克图王国，最后在1886年被毁灭。在四年之前，该王国的另一重要城镇伊梅科已被付之一炬。

19世纪50和60年代，达荷美入侵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位于阿贝奥库塔的新兴的埃格巴-约鲁巴国，该国的崛起在阿波美看来是对达荷美独立的威胁。埃格巴在西约鲁巴兰地区的军事活动和它相应的政治扩张使这种威胁变成现实，因为达荷美也正在西约鲁巴攻城掠地。1844年，双方在阿多-奥多的阿沃里镇发生冲突，达荷美的最终失败为双方后来的对抗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尽管1851年和1864年达荷美对阿贝奥库塔发动的两次直接进攻都遭到彻底的失败，但是它对埃格巴人的盟友埃格巴多的报复性征讨却在1862年摧毁了伊萨加，致使其周边地区随后出现一片荒芜。达荷美人对奥贡河上游约鲁巴人的袭击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事实上，直到1892年法国人征服丰恩王国后，这种袭击方告终止。

同这个时期发生的其它战争一样，19世纪的达荷美战争并不一定是种族间的冲突。达荷美入侵韦梅河谷的阿贾人部族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中止协议对波多诺伏发动毁灭性的战争，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20年代的人侵之后不久即达成协议，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保障了两个阿贾人国家和它们的附属国之间的和平关系。这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711**

19世纪从莫诺河到尼日尔河地区西半部发生的战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人口迁移和人口学方面的变化。首先，大量的约鲁巴人及与之通婚的阿贾人被掠为奴并装船运到美洲，当被废奴舰队截获时船上的奴隶则运到塞拉利昂。在其影响所及的西非当地人内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还引起革命性的社会政治变革。[26]在约鲁巴兰，战争导致19世纪以前的许多殖民点大规模毁坏和一系列新城镇的诞生，以及现有城镇的急剧扩大。在旧奥约地区，人口大量流失，已建立起来的城镇，包括历史悠久的奥约城、伊博霍、伊科伊、伊格博恩、伊雷萨和奥杰都成了断垣残壁，这就是明证。此外，遭到破坏的其它约鲁巴城镇还有萨贝、克图、奥伍和一大批埃格巴城镇及与其通婚的雷莫部族。这就是19世纪到约鲁巴兰的旅行家所注意到的“废都”现象。总的说来，人口是从北部战火连绵的内地向南迁徙流动。新建立的殖民区有伊巴丹、阿贝奥库塔、萨加穆、奥克奥丹和艾耶德。1800年前后，沿海地区及其相邻的内陆地区大多人烟稀疏，而到19世纪末却变成了人口稠密的繁华地区。

在操阿贾语的地区，人口流动基本是流向东南部。继1724年和1727年，达荷美人分别征服沿海地区的阿贾人国家阿拉达和维达之后，19世纪来自韦梅河谷和波多诺伏地区的阿贾难民使原先居住在现今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州和奥贡州附近地区相关的居民区人口显著增多了。[27]阿贾文化的东向扩展，是19世纪发生的战争对本章探讨的地区出现的民族融合做出的

---

[25] A.I.阿西瓦茹，1979年；T.莫利罗(Moulero)，1966年。
[26] P.维格尔(Verger)，1955年，第3-11页；C.法伊夫(Fyfe)，1862年，第292-293页。
[27] A.I.阿西瓦茹，1979年。

一个重要贡献。

战争及其社会影响以新社会的发展而告终，由此产生了更新治理方法与风格的需要。新的形势使军人一跃而以统治阶级的面貌出现，原有的王室阶层则破落沉沦。这在约鲁巴人地区尤为明显，那里“奥巴”失去了对军阀(巴洛冈）的控制。在库鲁米领导下，伊贾耶实行军事独裁的试验，在索德克领导下，阿贝奥库塔试行联邦制，在科索科领导下，埃佩则实行立宪君主制。这些都说明了19世纪约鲁巴兰为创造适应于战争引起的新社会政治管理需712 要的新政体所做的努力。[28]20世纪在尼日利亚地区的一些阿贾人国家最终采用约鲁巴人风格的奥巴制度，便是这种文化适应过程的连续性的明证。[29]

贝宁王国的衰落

贝宁由于其君主制的独特力量和中央集权制度的抗拒，在欧洲人征服以前的岁月中没有像奥约帝国所经历的那样完全崩溃。然而，也不能说这个王国逃过了19世纪的毁灭性影响。[30]

大约1800年，贝宁王国由大致相当于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东半部的地区组成，即由此至南从埃基蒂的奥通到海岸一线以东，包括东约鲁巴国家埃基蒂、翁多和奥沃，还有尼日尔三角洲以西的西伊博各民族，南边的乌荷博、伊策基里和伊乔。虽然贝宁城的埃多及其周围地区构成王国的核心部分，但是其它讲埃多语的民族，如东北的埃桑人和北埃多人及东南的乌荷博人和伊索科人可以认为是比尼君主管辖的紧密外围地带。再往远去，贝宁的影响(如果不是指宗主权)遍及大西洋沿岸，西至拉各斯乃至更远的地区。与伊策基里人一样，在贝宁和大多数的阿沃里-约鲁巴及相关的阿纳戈酋长国的统治阶层之间，有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王朝关系，比如埃基蒂、奥沃和翁多在官衔设置和朝廷礼仪方面还是明显地受到贝宁的影响。[31]

贝宁通常被说成在18和19世纪处于持续衰落的国家。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其衰落绝非连续不断，中间经常出现复兴和领土扩张的时期。似乎可以肯定，在失去独立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贝宁王国由于遭到三面进攻，致使其领土大大缩小。彻底击败旧奥约帝国的富尔贝人的圣战也渗透到贝宁王国的北部和东北部。正当以努佩为基地的富尔贝人迫使北埃多国家，如埃桑和伊夫比奥萨康向比达的埃米尔纳贡称臣并皈依伊斯兰教时，来自伊洛林的“贾马阿”袭击了北部的埃基蒂各国。富尔贝人的威胁因伊巴丹向东扩张而更加713 严重。后者发动的征服战争也是在东约鲁巴兰的贝宁领土上进行的。贝宁无力向这些受到侵扰的附属国伸出援助之手，这一事实便足以说明困扰这个密林之中著名的西非国家的灾难之日就要降临了。

---

[28] 见G.O.奥冈多米辛(Oguntomisin)，1979年；J.A.阿坦达(Atanda)，1984年。
[29] A.I.阿西瓦茹，1979年，第22-23页。
[30] R.E.布拉德伯里(Bradbury)，1967年；O.伊基梅(Ikime)，1980年b。
[31] A.I.阿西瓦茹，1976年，第18-19页。



图片26-4 贝宁王宫的圣坛

最后是欧洲势力渗透的威胁。这种威胁一是通过沿海地区贝宁势力范围最重要的中心拉各斯进行的，一是从东南沿尼日尔河而上。贝宁在沿海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它对尼日尔河三角洲西部沿贝宁河贸易的控制，受到欧洲商人(大多是英国人)和非洲中间商(特别是伊策基里人和伊乔人)的挑战。这时贝宁王国才开始感到欧洲势力的扩张给它造成的窘迫。贝宁的乌戈顿港口生意萧条对贝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表明贝宁对沿海地区贸易近乎垄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海岸贸易促进了伊策基里人的政治自治意识，最终导致瓦里的奥卢人和贝宁的奥巴兵戎相见。新贵的成长也在瓦里王国内部埋下了政治冲突的种子。比方说，王国内部争权夺利相互攻讦，在王位继承权问题上争执不休，持异议者迁移他地，建立自治和竞争的权力中心，以致1809年继位的阿肯布亚在1848年去世后至19世纪末竟推举不出一个能被接受的人继任瓦里的奥卢王位。与伊策基里王国一样，阿格博尔也是按照贝宁模式建立君主制并成为贝宁的属国的，同样也是在新兴的海岸贸易的影响下稳步发展为自治国家。贝宁丧失独立以前的最后一位奥巴(国王)奥冯兰温，决心复兴他的王国，其政策包括派一支远征军讨伐阿格博尔，试图在那里重新建立贝宁的权威。然而，他的努力为时已晚，贝宁进攻阿格博尔的部队刚刚占领奥巴丹，就获悉进攻贝宁的英国远征军已于1897年进抵首都的门户。[59]

714

正当贝宁王国面临外来进犯的时候，都城内部却很不平静。主要是由于争夺继承权，致

59 O.伊基梅，1980年b。



图片26.5 英国入侵贝宁时该城一瞥，1897年

使奥巴制度经历了极度的不稳定。虽然1851年奥巴·奥森韦德去世后由阿多洛继位，但这是经过一场激烈的继承权争夺战之后的结果。从1880年代末开始，贝宁城人祭之风日甚，有人解释说，这是行将垮台的统治者寻求通过仪式来解决政治问题的绝望的明证。据说奥巴·奥冯兰混遭到他的兄弟奥洛霍尔霍和主要首领如埃里科、奥布拉耶、奥巴泽卢和奥西亚的激715 烈反对。奥巴决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王国的复兴，他不得不处死这些首领。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征服以前，贝宁之所以怀有反欧情绪，必须考虑到其内部存在的上述危难形势。

欧洲势力的增长

在讨论本章叙述的西非地区欧洲势力的增长时，最好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1861年拉各斯被并入英国殖民地之前，是欧洲列强自由活动的阶段；紧接着，1880年代是法国和英国同德国之间争夺西非的国际冲突阶段。直到1889年英、法完成对该地区的瓜分，后一个阶段方告结束。可是，在这两个阶段里，要强调的是，欧洲人在该地区任何特定时期的活动方式既是对欧洲城市需要的回应，同时也是受了当地形势的刺激。

在这个时期，欧洲商人、探险家或旅行家，还有基督教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特别注意他们各自代表的国别属性。著名的德国探险家海恩里希·巴思率领一支"正式的英国探险队"，而干练的英国探险家 H.M.斯坦利则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效劳。一些主要的基督教传教团体，如圣公会正教传教会(CMS)和罗马天主教会驻里昂的非洲传教社(SMA)，各自任用的传教人员来自不同的欧洲国家。博盖罗神父是意大利人，他在19世纪领导非洲传社会协在西非致力于重新传播罗马天主教。在后来成为尼日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进

行开拓性工作的神父都是法国人。同样，英国传教士如卫理公会的托马斯·伯奇·弗里曼和正教传教会的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在后来成为法属达荷美(现今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地区开创了基督教的传教工作。[33]在沿贝宁湾海岸线的各个主要港口，英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商人建立的贸易商站鳞次栉比，分布着欧洲各国侨民的许多居住区，后一种情况在巴达格里十分明显。

欧洲商人为了获取有利的贸易条件，根据经济上日益依赖于沿海贸易的各港口和国家不断变化的运气，来回穿梭于各海岸港口之间。

不同国别的欧洲人在成分和活动方面的这种灵活性，与先前存在的非洲当地形势的类似的灵活性是一致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形势的特点与其说是僵化的结构性差异，不如说是历史和文化的相互联结的模式与网络。欧洲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的活动主要是受废奴主义运动的支配。 **716**

人们认识到，奴隶贸易只有通过在非洲内地截断其供货来源才能有效废止。欧洲人对内陆腹地的探险，在本章所探讨的地区，根据蒙戈·帕克、休·克拉伯顿和兰德尔兄弟所写的著作可以说明其目的主要是为废奴主义运动搜集科学资料和情报。一般情况下，那些随同探险家或随后而来的传教士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当然，欧洲商人直接深入到内地市场而不再继续与沿海地区的中间商做买卖的雄心也影响了这种新趋势。

所有这些欧洲人的活动，都应该同他们开展活动的非洲当地情况联系起来考虑。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不得不在原有的交通通讯系统、地理状况与人种的相互关系格局内开展活动。蒙戈·帕克死于尼日尔河这条古老的传统运输通道上。当时他的独木舟在博尔古靠近布萨的一个尖岬上遇难。休·克拉伯顿和兰德尔兄弟为寻找尼日尔河源头，走的是一条古老的陆路，这条路将约鲁巴人一些不同的小族群和其毗邻的操阿贾语的邻邦联系起来。这条路还把约鲁巴兰与博尔古、豪萨兰、博尔诺和更远的地方联系起来。由于业已存在相互连结的通道，自北而南、从东向西横跨约鲁巴兰的广阔腹地，基督教会在约鲁巴兰和达荷美之间的布道旅行才有可能进行。

由于各个地区和民族都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往往在别的地方会产生影响和反应。例如，欧洲废奴主义者发现，要阻止奴隶贸易和内地的战争，他们不仅必须认真对付沿海地区的统治者，而且还要与内地不同的权力中心打交道。19世纪上半叶，来自下几内亚海岸不同地区的英国和法国废奴主义者使团，往往都得去阿波美拜访达荷美的国王们。为了调停达荷美与约鲁巴之间的战争，他们不得不往返穿梭于阿贝奥库塔和阿波美之间。与此类似，卷入其中而致力于解决19世纪约鲁巴战争问题的英国和平使者差不多纵横穿越了整个约鲁巴文化区。

遗憾的是，欧洲人的态度不一致，这就助长了政治结构方面的分化。在1840年代末和1850年代初这点已经十分明显。1849年，约翰·比克罗夫特受命出任英国驻贝宁湾和博尼(前比夫拉)领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与欧洲其它国家的利益相比较，英国人的利益将受到特别的保护，英国人的利益也被置于非洲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已经注意到，英国人从

[33] A. O. 马科齐(Makozi)和G. J. A. 奥乔(Ojo)，1982年；E. G. 帕林德(Parrinder)，1967年。

717 尼日尔河三角洲向贝宁王国渗透，导致贝宁内陆地区商业的萧条，以致贝宁的古老港口乌戈顿最终被抛弃。再往西，1851年禁奴舰艇炮击拉各斯时，人们对英国人的政治目的越来越怀疑。

然而，真正标志着历史转折点的事件，是1861年英国正式把拉各斯并入其殖民地，以及同年晚些时候英国海军对波多诺伏采取的行动。[59]自然，英国人采取的这两项举动使法国人敏感起来，后者在维达和波多诺伏都有重要的商业利益。在波多诺伏当政者的推动下，1863年法国人宣布该海岸附近的阿贾人国家为它的保护国，以抑制美国人沿海岸进一步向西推进。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很快发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拉各斯或波多诺伏的真正价值，只有考虑到这两个港口共享的与约鲁巴内地和阿贾内陆的贸易情况才能衡量。英法两国分别卷入拉各斯和波多诺伏的贸易与政治旋涡，引发了两国争夺约鲁巴兰尤其是其西部地区，争夺毗邻的操阿贾语社群控制权的一系列戏剧性冲突。在这场英法争夺中，西约鲁巴兰由于当地人民的积极策应而成为主要的舞台。当地居民把欧洲人的干预看做摆脱其强大的邻国连续不断侵入其领地的出路。

早在1860年代，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总的说来都反对在非洲占有殖民地，但因这一特定的非洲地区具有的特定情况，使两个最活跃的欧洲列强卷人一场抢占领土的斗争中。1863年8月举行的英法会议，实际上达成了以耶瓦河为议定疆界，两国瓜分该地区的协议。这条界线位于1889年的边界以西约20公里处。1862-1863年间，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个地区宣布的保护国没有得到官方正式批准，到1870年代不得不予以放弃。但是，这场争夺战在1880年代又继续下去，部分原因是德国人加入了争夺的行列，另外还由于达荷美的再度入侵更坚定了波多诺伏和西约鲁巴兰各国寻求法国人或英国人保护的决心。1892年，法国人征服达荷美；1895年，英法分割博尔古，英国人的统治扩大到约鲁巴兰的其余地方；1897年英国人征服贝宁。所有这一切都应看做是1860年代以来英法之间争夺的必然结果，而这一结果本身是由欧洲列强试图控制的沿海各个港口外围区原先就存在的自成一体造成的。

社会经济的变革与制度的适应

718 19世纪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欧洲人对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政治的干预，尽管具有戏剧性的特点，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而忽视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更具深远意义而又微妙的变化。首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该地区内外都产生了影响，对此我们已作过论述。强制性的移民加强了各族群与小族群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导致该地区内新的居民区的出现，以及成群奴隶的不断涌人，而且造成非洲入口在美洲尤其是巴西的巴伊亚的增长。萨罗人和阿马罗人(巴西人)返回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加上基督教传教士到来，这些使这个地区涌进新大陆的奴隶最终成为促进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操阿贾语的民族，其迁移运动呈现一种明显的自西向东的趋势，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达荷美重新入侵古恩、约鲁巴各国和韦梅河谷以东的各社群之际。这不仅引

[59] C. W. 纽伯里(Newbury)，1961年；A. I. 阿西瓦茹，1976年。

起原有的东阿贾拓居地如巴达格里、阿吉多和科加在规模上的扩大，而且在现今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州和奥贡州的西部和西南部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拓居地。[35]

在更往东的地区，也明显地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殖民化运动。例如，在约鲁巴兰，若干个小族群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就值得注意。这里旧奥约帝国产生的影响最大，19世纪最初20年里，当旧帝国的首都出现不安定的势力时，其臣民就开始纷纷向外移居。到1830年，奥约移民定居的主要中心区有伊巴丹、伊贾耶，和位于伊巴丹以北的现在的奥约镇。然而，1840年代到1860年代期间，伊巴丹帝国主义的扩张才使旧奥约的向外移民达到高潮。结果，从西北部迁徙来的几个奥约社群在约鲁巴兰东部和东南部的伊博米纳、伊杰萨、埃基蒂、阿科科、翁多、伊卡莱和伊拉杰等亚文化区定居下来。[36]与此相反，一些东约鲁巴族群，如埃基蒂人和伊杰萨人是作为奴隶或自由民，来到伊巴丹以及奥森、伊杰布和伊格巴西南部地区的其它几个拓居地。在博尔古，富尔贝人的圣战引起人口流动，南下约鲁巴文化区，由此造成的压力可与16世纪末桑海帝国衰落时引起的曼德人自北而南的人口流动相比拟。[37]19世纪的人口流动加强了博尔古和奥约、萨贝和克图等约鲁巴西北部各族群之间已经存在的相互渗透的网络。 **719**

族群和亚族群之间的融合引起思想意识和物质文明的大规模的相互交流。我们已经看到，居住在今天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的巴达格里地方政府辖区内的阿贾人，在20世纪得以实行约鲁巴人的奥巴官职制度，而这一发展历程必须追溯到19世纪及其以前的移民运动，和与此相应的阿贾人对约鲁巴制度的采用。同样，奥约的文化影响也可以在东约鲁巴兰看到，如崇拜祖宗桑戈，盛行男子织布，肩挂大鼓。所有这些与其看做1800年以前奥约帝国霸权的产物，不如视为19世纪帝国瓦解后奥约人向外移民的结果。[38]

来自贝宁的类似的影响，尤其是在宫廷礼仪、王室特权和首领职衔方面对奥沃、埃基蒂、阿科科、翁多和伊杰萨的影响——如同生活于现今尼日利亚-贝宁边界两边的阿沃里人一样，表明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及彼此采纳相应的制度这一主旋律具有广泛的影响。贝宁文化对约鲁巴人口方面的影响，在本章所述约鲁巴地区的贝宁人拓居地的传统中得到清楚的反映。关于贝宁对其它操埃多语的民族以及对其东部和北部地区的伊策基里人、乌罗博人和伊索科人的社会政治影响已有较系统的研究。[39]

首先，19世纪奠定了建立现代格式的拓居地的基础，那些建在沿海或靠近海岸的拓居地有很大好处，例如瓦里相对贝宁、拉各斯相对约鲁巴兰其余地区、波多诺伏、维达都提高了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阿贾人海滨城市科托努。这一时期还孕育着后来的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期的新社会。新社会的特点是在西欧经济和文化范畴内形成关系密切的组织(如果说不是统一体组织的话)。

这些新变化是如下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9世纪的战争，比如约鲁巴兰的战争使沿海

[35] A.I.阿西瓦茹，1979年。
[36] S.A.埃金托伊，1971年，第213页及以后诸页。
[37] T.莫利罗(Moulero)，1964年；A.I.阿西瓦茹，1973年。
[38] J.F.A.阿贾伊，1974年。
[39] S.A.埃金托伊，1969年；A.I.阿西瓦茹，1976年。

地区比较安全，从而吸引人们从战火连绵的内地移居沿海地区；由奴隶贸易向“合法贸易”转变，使海运贸易成为固定行业，从而赋予沿海地区明显的经济优势；欧洲势力的稳步增长提高了其择定的沿海城镇如拉各斯、波多诺伏和后来的科托努的传统地位，它们不仅作为港口城市而且作为行将出现的殖民国家和后来的非洲独立国家的政治首都担负着新的日益增多的职责。

720 然而，在所有这些变化中，经济因素看来是占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欧洲人出现的地方尤其如此。首先是商业贸易把欧洲人吸引到非洲，而且也是他们继续留在非洲的最重要的动机。奴隶贸易支配海外贸易达三个世纪之久，19世纪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由于废除出口奴隶贸易，使原有模式发生了变化。西非的这片地区在废除奴隶贸易以前，在欧洲人的记载中以“奴隶海岸”著称，这里被卷入了奴隶贸易的漩涡，它后来能够比较平稳地向“合法贸易”过渡，最终得归功于土著社会的适应能力。

在这方面，也许没有比达荷美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达荷美历来被认为是西非地区掳掠奴隶和从事奴隶贸易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到1851年，虽然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巡逻舰成功地压制了波多诺伏沿岸的海外贩奴活动，但直到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之前，达荷美的维达港并没有完全停止出口奴隶。[40]达荷美继续从事奴隶贸易使阿贾沿海地区，特别是韦梅河与莫诺河之间的地带变成葡萄牙奴隶商贩（大多是巴西人）良好的贩奴场所，这些商贩早就在英国废奴措施生效初期被撵出拉各斯和巴达格里等港口。然而只要有买主，达荷美就继续贩卖奴隶。

事实上，达荷美当局鉴于以巴西为基地的葡萄牙奴隶商想继续在达荷美各港口做奴隶生意，不可能满足英法两国好几个废奴代表团提出的停止奴隶贸易的要求。

不管怎样，达荷美认识到形势在变化。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它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采取的调整措施十分醒目。在一家法国商贸公司维克多·雷吉斯的影响下，国王盖佐（约1818-1858年）被说服扩大棕榈油的贸易，最初是作为奴隶贸易的补充，后来终于发展成为该国出口经济的主导因素。[41]从奴隶贸易向“合法贸易”的过渡意味着把战俘留做维持和扩大棕榈油生产的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增加。奴隶还广泛用于从内地到海岸之间往来的商品运输，而不仅是作为商品出口。到1892-1894年法国征服的时候，达荷美已经奠定新的经济基础——棕榈产品单一经营。达荷美的发展历程便是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其它地方的一面镜子，比如

721 在约鲁巴兰，本来要贩卖到海外的奴隶被广泛地用做农业种植园的劳动力，或者用来运输往返于海岸地区的物品。

废奴运动在该地区还产生了其它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那些涉及到现代化过程的影响。显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释放奴隶的归来。这些释奴有来自塞拉利昂的“萨罗人”以及大多来自巴伊亚也有来自古巴和西印度群岛其它地区的“阿马罗人”或“巴西人”。除了最初被吸引而来的欧洲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在几内亚湾现代化过

---

[40] E. 苏莫尼(Soumoni)，1983年；P. 维格尔(Verger)，1976年。
[41] E. 苏莫尼，1983年。



图片26.6 一直立男人塑像，可能代表国王盖佐(1818-1858年)



图片26-7 国王格雷雷(1858-1889)被象征性地塑成一只狮子

程中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42]这些获得自由的欧洲人最早扮演了第一代中产阶级的重要角色。他们在被称为“奴隶制的严酷学校”经受过磨练。[43]当他们从塞拉利昂归来后已成为“时代的精英”，对当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文化模式颇有依恋之情。而他们的巴西伙伴则是工匠、商人、技师和“熟练的土地耕作者”。他们当中既有基督教牧师的先驱，如尼日利亚地区大名鼎鼎的主教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和牧师詹姆斯·约翰逊(被称为圣者约翰逊)，也有许多不那么著名的从事非洲语言、印刷、出版、建筑和其它行当的人。 722

虽然他们最初定居在维达、阿格维、波多诺伏、巴达格里和拉各斯等沿海地区，但其影响和波及地区远达约鲁巴兰、阿贾内地和更远的地方。其实，萨罗人移居的核心地区是约鲁巴兰和阿贝奥库塔而非拉各斯。而且众所周知，19世纪巴西人在拉各斯存在的重要特征——巴西式建筑，也流传到伊杰布-奥德、伊巴丹和伊莱萨。萨罗人和“巴西人”在他们都适宜居住的贝宁湾也没有正式的分工或区划。有的萨罗人在波多诺伏[44]和更远的西部生活和

---

[42] J. F. A. 阿贾伊，1965年；E. A. 阿扬德莱(Ayandele)，1966年。
[43] A. B. 阿德里比格贝(Aderibigbe)，1959年，第174页。
[44] P. 维格尔，1976年，第536-537页。

工作。在拉各斯，英国的殖民政策尤其是在艾尔弗雷德·莫洛尼(1879-1890年间数度出任总督)执政时期，明显地鼓励“巴西人”定居。虽然如此，文化和历史的因素造成他们在实际聚居地和总的影响方面各有所异。因此，占优势的讲英语的新教徒萨罗人便成为韦梅河流域以东地区的重要特征。到我们所探讨的这一时期结束时，这里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殖民势力范围，最后完全受其控制。

在韦梅河流域以西，占优势的是信仰天主教和讲葡萄牙语的巴西裔非洲人，他们最初在波多诺伏和维达找到了比较适合于他们的文化环境。在此之前，葡属巴西的奴隶贩子已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古老的“巴西人”社区。由于英国禁奴巡逻艇在东边采取行动，他们不得不全部从阿贾海岸撤退。虽然法国人最终取代葡萄牙人控制了韦梅河以西的贝宁湾地区，但仍然留下足够的拉丁文化的痕迹，使“巴西人”宁愿选择这里，而不喜欢去拉丁文化最终注定要消亡的东部海岸。结果，在这片最后变成法属达荷美的土地上，即本章所探讨的地区的西部，巴西裔非洲人的影响最大。他们不仅与法国人合作，使后者成功地征服了达荷美，建立起新殖民地，而且巴西人在那里利用法国殖民教育的优势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从而使他们在达荷美发展成“法属西非的拉丁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5]

723 然而，萨罗人和巴西人在当地中心区的影响各有千秋，这不应当解释成与莫诺河-尼日尔河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全面发展相矛盾。达·西尔瓦、阿尔梅达、多·勒戈、德·苏扎、佩德罗、马丁、佩雷拉等人的后裔，无论是在拉各斯、维达、阿格维还是在波多诺伏，都有基于特定的血亲纽带和一般的历史及文化的紧密关系，也不应作出这样的解释。其实，直到今天，人们一直承认西非的巴西家庭，与他们最初的巴西渊源特别是巴伊亚州的渊源有关系。这种关系使其与巴西人的联系不仅成为非洲历史的基本一致性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而且也是该大陆与散居国外的黑人之间保持重要交流的明证。

(毕健康译)

[45] D.阿尔梅达(d' Almeida)，，1973年，第1章与第2章。

27 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喀麦隆地区

E. J. 阿拉戈亚
L. Z. 埃兰戈(喀麦隆部分)
M. 梅特盖·恩纳赫(加蓬部分)

引　言

本章叙述贝宁湾和博尼湾沿海地区的历史。这里以前称做比夫拉，覆盖的区域西起贝宁河河口，东至奥戈韦盆地三角湾。虽然尼日尔河三角洲最西端的小国伊策基里王国也影响着三角洲的广大地区，但西面包括三角洲的溪流和沼泽的大片海岸地区，居住着伊乔人。近西部内陆地区则是贝宁及与该王国有政治或文化附属关系的各个族群的统治区域。大伊博内陆横亘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北部，由河的两岸一直向下游延伸。尼日尔河以东，是伊博兰的广袤领土，一直伸展到克罗斯河流域北部。 **724**

尼日尔河三角洲以东是克罗斯河。19 世纪，克罗斯河河口地区由卡拉巴尔人国家埃菲克统治。克罗斯河流域的其余地区过去和现在主要居住着伊比比奥人的各族群，其北部居住着与班图人有关的各族群。第四分区是喀麦隆沿海地带，其内陆与克罗斯河流域东部相交。第五分区是奥戈韦盆地和赤道内内亚及加蓬的周边地区。

该地区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可上溯到史前时期，系尼日尔-刚果语系的成员。① 伊博人和尼日尔河三角洲边缘的其他民族属于克瓦语亚语系，而克罗斯河流域的民族和现在的喀麦隆和赤道几内亚的大多数民族都属于班图语系。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伊乔人则形成一个单独的亚语系。

19 世纪通过商业联系加强了由语言的相似所证实以及由民族起源的传说和相互迁徙得以验证的早期关系。②从东向西横穿尼日尔河三角洲、通往内陆向北伸展与其它商路相衔接的贸易通道，在 19 世纪以前就已开辟出来。该地区的尼日尔河和克罗斯河以及其它主要河流，是连结这些河道沿线民族的商业动脉，接受来自内地商路，如那些经过克罗斯河流域向喀麦隆内陆和往南输送到海岸的商品。 **726**

欧洲商人利用沿海地区早已建立的商业中心，沿海岸线经由这些河流逐步向内陆推进，接收来自内陆腹地的商品。于是，欧洲人在沿海地区的出现成为该地区历史上又一个具有团结作用的因素，带来了共同的问题和促成变革的媒介。面对外来势力的影响和欧洲人入侵的挑战，该地区的每个民族都经历了社会、政治或文化的变革或者适应。欧洲人活动的

① J. H. 格林伯格(Greenberg)，1966 年。
② E. J. 阿拉戈亚(Alagoa)，1970 年；R. 哈里斯(Harris)，1972 年；E. M. 奇尔弗(Chilver)，196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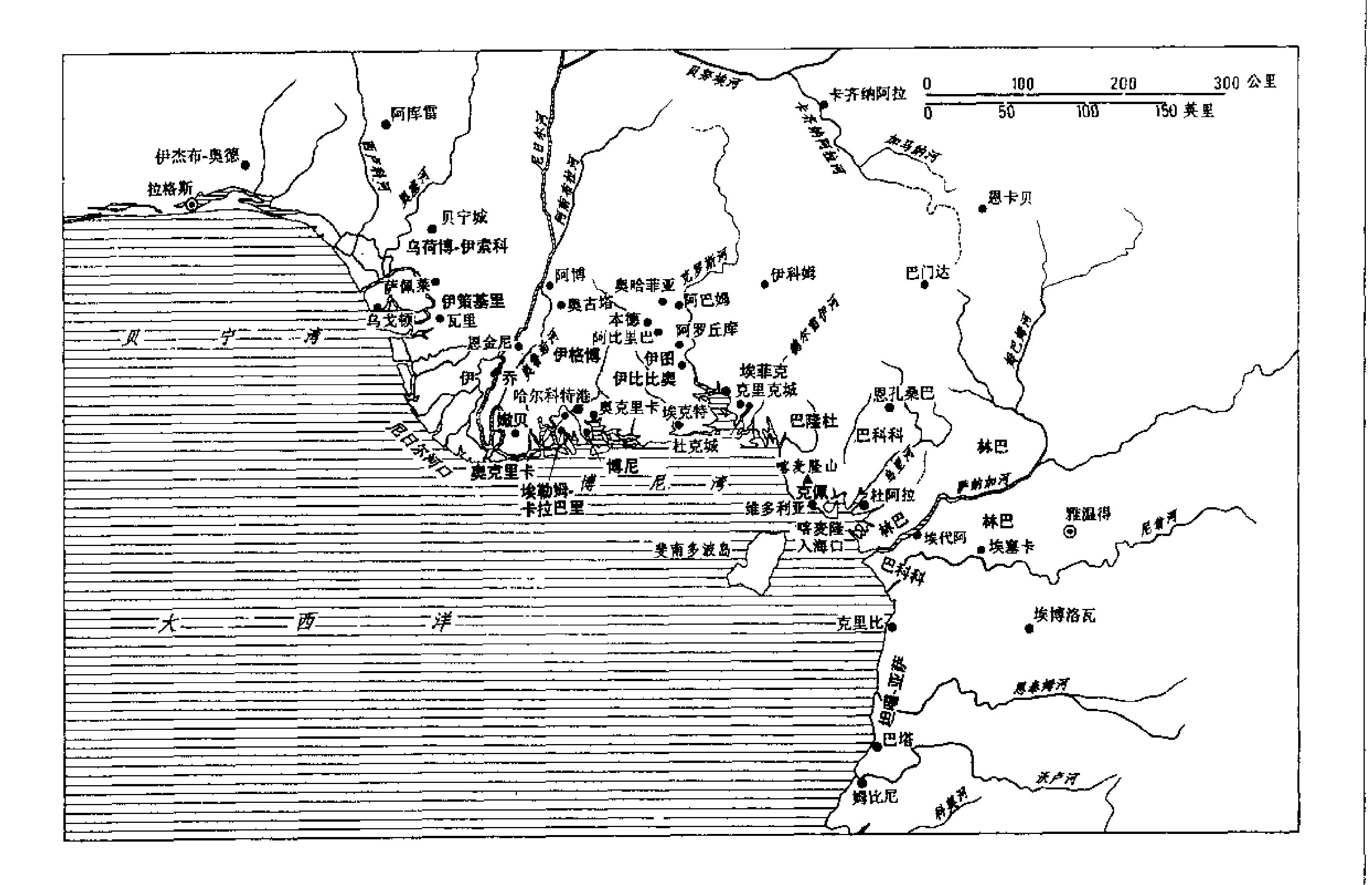


插图 27.1 19 世纪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喀麦隆地区（仿照 E.J. 阿拉戈图）

要素包括：(1)奴隶贸易，以及19世纪废止奴隶贸易的影响；(2)贸易对象由奴隶向当地物产转变，有时被称为合法贸易；(3)基督教传教士进入该地区；(4)欧洲帝国主义的兴起与殖民征服。为了使读者对19世纪整个地区的历史有一个整体概念，必须在各分区的研究中对这些要素一一进行分析。

尼日尔河三角洲

西三角洲地区

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叶，瓦里(奥德-伊策基里)的伊策基里王国是西三角洲最重要的政治和商业中心。伊策基里国的东部和西部，居住着人口众多的伊乔人，他们没有发展成规模较大的能够进行有力竞争的中央集权国家。紧靠伊策基里国的内陆腹地，乌荷博人和伊索科人也大多是组织分散的族群。他们先是伊策基里国中间商奴隶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后来提供棕榈油和棕榈仁。然而，到19世纪，甚至连伊策基里王国也被欧洲来访者仅仅视为贝宁王国的一个“公国”。所以，早些时候到西三角洲的商人通常沿贝宁河上溯到格瓦托(乌戈顿)港，在那里同贝宁奥巴(国王)的代理人做买卖。

大约从17世纪晚期开始，贝宁对西三角洲的直接影响开始减弱，欧洲商人开始利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河、埃斯克拉沃斯和福卡多斯三角湾上的港口。到19世纪初期，几个伊策基里的酋长从瓦里(奥德-伊策基里)迁徙到贝宁三角湾建立商业据点。不久，贝宁河上 727



图片27.1 贝宁河畔一座伊策基里人村落，19世纪90年代

的港口格瓦托(乌戈顿)作为海外贸易中心开始衰落。而后整个19世纪,伊策基里人成为西三角洲地区贸易的强大领导者,贝宁不得不通过他们获取来自欧洲的商品。[3]贝宁力图维持对伊策基里王国的政治统治,要求他们进贡来自瓦里的奥卢人的商品,结果导致内陆商业通道的关闭。然而,奥卢·阿肯布瓦公然违抗贝宁的"奥巴",甚至向持不同政见的贝宁酋长提供避难所。但是,1848年在阿肯布瓦去世时,他的臣民认为他是被奥巴诅咒而死的,而且,因此使伊策基里从1848年到1936年一直没有统治者。

奥卢·阿肯布瓦的代理人称为"河务总督",他们驻扎在贝宁河河口,向欧洲商人征税,为产品定价。19世纪初,通常是最高层的首领如军事首领(iyatsere)和王室主要发言人与守护者(uwangue)出任河务总督。但到1840年代,阿肯布瓦委派其子担任此职。因此1848年后,不再有任命该职的明确程序。英国领事和商人在众多的争执中进行干预。1851年他们安排迪亚雷出任此职,又在1879年把他的继任者查诺米赶下台,因为他试图使英国商人购买棕榈油价钱要公道。最后一任也是最著名的贝宁河务总督纳纳·奥洛穆(1884-1894年)在与英国海军陆战队激战后被俘。1894年他被流放到卡拉巴尔,是英国对尼日利亚进行帝国主义征服的牺牲品之一。

728

729

西三角洲的伊乔人控制了多数水上通道。由于他们不能与外来的欧洲商人直接接触,便采取海盗行为,骚扰伊策基里人和欧洲人的商船。不过,有的伊乔人社群与伊策基里人及其他民族开展内部贸易活动。伊策基里人向伊乔族人,如格巴拉马图人和巴桑人出售陶器,也向沿尼日尔河而上的东三角洲商人提供食盐。贝宁河上游森林地区的埃格贝马人和奥洛迪亚马-伊乔人也制作独木舟,采集染料木,卖给西边的伊杰布环礁湖地区,最远销售到拉各斯(埃科)。他们向伊杰布人换回当地出产的布匹。别的伊乔人则用伊策基里人晒制的干鱼和盐,与尼日尔河三角洲周围及其下游的乌荷博人、伊索科人和伊博人进行交易。

19世纪,西三角洲地区不像东三角洲地区那样重要,后者成为买卖奴隶、棕榈油和棕榈仁的海外商业中心。因此,1840年代只有两家英国商号在博比港和贾克帕港做生意,以后的10年内又增加了三家。1849年,派到贝宁湾和博尼湾的首任英国领事约翰·比克罗夫特驻在靠近喀麦隆海岸和尼日尔河东三角洲的斐南多波岛。直到1891年,才有一位副领事被派到西三角洲的内陆港口萨佩莱,以便监督向该地区尼日利亚腹地的渗透。至此,攫取非洲领土的狂潮已经涌起,纳纳·奥洛穆不得不进行战斗以阻止他们。随后传教士来到西三角洲。

东三角洲地区

居住在东三角洲地区的伊乔族建立了许多城市或居民聚居点,如嫩贝、博尼、埃勒姆-卡拉巴里和奥克里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国家体制。[4] 这些国家,K.O. 戴克称之为城邦。[5] 它们形成了自己的不同于中三角洲地区和西三角洲地区实行分权的伊乔族人的共同

③ P.C. 劳埃德(Lloyd),1963年;O. 伊基梅(Ikime),1968年;A.F.C. 赖德(Ryder),1961年。

④ R. 霍顿(Horton),1969年;E.J. 阿拉戈亚,1971年。

⑤ K.O. 戴克(Dike),1956年。



图片 27-2 伊策基里的纳纳·奥洛穆

模式的独特制度以应付各种不同的挑战：(1)东三角洲地区红树沼泽地的不同的生态条件；(2)与伊博内地的长途贸易，用鱼和盐交换马铃薯、奴隶和其它产品；(3)同西三角洲地区开展盐、陶器、木薯制品和独木舟的贸易。

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内陆的长途贸易还是大西洋沿岸的奴隶贸易，都掌握在政治领导人——国王或称“阿曼亚纳波”(amanyanabo)和族长(即亲族型政治单位或瓦里的领导人，由此组成城市)手中。家族体系内擢升标准公开化，这样，很容易从奴隶或难民中吸收新成员。

19 世纪以前，东三角洲地区各国的这种大致情况，对于我们正确理解 19 世纪日益扩大 730

的欧洲势力与干预的冲击对它们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正是这个基准线的差异决定了类似的外来势力对三角洲国家和卡拉巴尔与喀麦隆沿海地区的影响的差异。

1807 年，英国决定废除奴隶贸易是促成变革的重要因素。为了废止奴隶贸易，英国商人、领事和海军军官开展了新的活动，结果与三角洲地区的国家关系出现了新变化。首先，它增加了英国人在博尼湾的存在。譬如，1827 年一支海军中队进驻斐南多波岛，1849 年首任英国领事约翰·比克罗夫特被委任负责整个贝宁湾和博尼湾地区。同时，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设立了混合委员会法庭，审判被抓获的贩运奴隶的船长，释放有罪的奴隶贩子手中的奴隶。对三角洲地区的国家而言，这些变化意味着英国人在他们的水域里显示权威，以及炮舰外交时代的来临。英国领事运用海军力量为英国商人、传教士和冒险家进行获得有利条款的谈判。实际上，英国领事特别是 1850 年以后的英国领事，继续并加快执行 1830 年代斐南多波总督爱德华·尼科尔斯肇始的与当地酋长签订条约的政策。[6]这些条约规定，当地统治者要立即停止奴隶贸易，改行"合法贸易"，就是说，买卖奴隶之外的别的商品。条约规定了从事合法贸易的管理条例，具体规定了商人应缴纳的关税(comey)的数额，以及英国政府为当地统治者同意放弃奴隶贸易而给予他们的补偿。

英国人在沿海地区的这些活动逐渐侵蚀了当地统治者的权威，尤其是领事们和海军军官帮助英国商人超越当地国家的法律建立自己的司法制度。这一司法制度即所谓的平等法院，主要由英国商人组成，有少数当地家族首领或酋长参加。自然，这些法院是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当地统治者难以染指。

除沿海地区的英国领事和海军军官之外，英国商人和传教士还力图深入到内地，比如，通过组织航行探险。数十年来，英国人一直在寻找尼日尔河的航道和源头。1830 年，当地统治者博伊·阿梅因国王把理查德·兰德和约翰·兰德从阿博带到嫩贝(布腊斯)时，英国人的这种努力获得了成功。当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许多河流的河口被证实就是通向大尼日尔 **731** 河的人口时，英国人对该地区的兴趣大大增加，因为这里可以成为通往尼日利亚富庶的内地和西非的通道。1830 年代到 1850 年代之间，英国商人，如麦格雷戈·莱尔德，以及慈善家和传教士，试图从三角洲地区向内陆推进。

在东三角洲地区，在尼日利亚奴隶出身的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领导下，圣公会正教传教会于 1864 年在博尼，1868 年在嫩贝王国的图恩-布腊斯，1874 年在埃勒姆-卡拉巴里(文件里称新卡拉巴尔)和 1880 年在奥克里卡设立了布道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博尼和嫩贝的统治者都邀请传教士来布道。这些统治者有的希望传教士来办学校，这样，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用英文读写说，以便继续保持同英国商号的贸易往来。他们还认为，允许传教士来活动有利于改善同以领事和海军军官为代表的英国政府的关系，在与邻国的内部争权夺利中加强他们的地位。东三角洲其它地区有时却因这些相同的理由拒绝传教士的到来。这样，当正教传教会在博尼建立之后，1869 年奥波博的贾贾便离开博尼建立自己的国家奥波博，与博尼的传教团便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基督教布道团的创立遭到了三角洲地区每个国家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抵制。在 19 世纪，基督教构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戴克

---

(6)　G. I. 琼斯(Jones)，1963 年，第 221-242 页；E. J. 阿拉戈亚和 A. 福姆博(Fombo)，1972 年，第 90-121 页。

认为基督教把奴隶改造成在这些国家制造动乱的革命者。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了可以解释19世纪造成三角洲国家问题的其它社会政治因素。⑦

三角洲国家社会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统治集团在面临经济基础从奴隶贸易转变成棕榈产品贸易的变化时所遇到的困难。奴隶贸易期间兴起的拓居地没有意识到废除奴隶贸易后面的强大的外来力量，不能使自己完全从事难以弄到的新商品的买卖。贸易的转换意味着改变以前的商业习惯和方法，同新的白人商人打交道。还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即加工棕榈油、砸开坚硬的棕榈果取出棕榈仁，比组织奴隶供应更费劲。对三角洲地区的商人来说，这意味着要进一步向内陆腹地生产中心推进，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独木舟。这种形势潜在地使旧领导集团破产，鼓励雄心勃勃的一代新人崛起。由此演化出三个主要发展趋向：第一，新的贸易导致了供应三角洲国家人力需求的内部奴隶贸易的增长；第二，新的家族和首领的成长导致内在政治平衡的失调(戴克谓之奴隶叛乱)；第三，对内地市场的争夺引起三角洲国家之间多次兵戎相见。



图片 27-3 奥波博的贾贾王

远在19世纪以前，奴隶就引入了三角洲地区各个社会中。这个地区的每个国家已经有把新成员吸收进其社会的程序。19世纪时，这些需要吸收进去的新成员的数量增加了。但在多数国家，采取新的更严厉的方法使买来的奴隶能够在文化上适应生活。几乎每个三角洲国家都要为新买来的奴隶举行庄重的仪式，像新生婴儿那样，给他理发刮脸，象征着他在这个社会获得新生。从那以后，他变成买主家庭里年长成员的孩子。这样的奴隶在一个大家庭里享有家庭成员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且根据他的能力在家庭里的地位也可以提升，甚

⑦ K.O.戴克，1956年，尤其是第5章，第153-165页；E.J.阿拉戈亚，1971年b；G.I.琼斯，1963年，第121-132、160-161页。

至做到族长。他们作为“埃金尼”(Ekine)或“塞基亚普”(Sekiapa)面具舞会社的成员，很快便在民俗和语言方面转变过来。在某些国家，如埃勒姆-卡拉巴里，有一种被称为科罗诺博的治安维持会，恐吓没有完全在文化上改变过来或改变得不够迅速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奴隶没有共同的和独立的身分，他们或因遭受歧视被迫寻机造反，或能够顺利反叛。

然而，为了棕榈油贸易而吸纳奴隶劳动力，使地位较低的酋长家庭发展壮大，他们最 733 终从其父母的家族分离出去。有些家族通过形成分支家庭得以膨胀，有时损害了原有家族，即原有家族的成员由于债务和其它原因转到更兴旺的家族。这种对商业和人力的竞争形势使各地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平衡迅速发生变化。即便在原有家族内部，领导权也易手了。这样，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关键岁月里，博尼王国的两个皇族派别安纳·佩普尔和马尼拉·佩普尔，由贾贾和奥科·琼博领导，二人均是奴隶出身。1860年代，正是博尼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1869年以贾贾为阿曼亚纳波(国王)的新国家奥波博的成立。还应注意到，在博尼当政的国王乔治·佩普尔(1866-1888年)无力阻止渐渐滑向战争的宗派分裂。

1882-1884年，埃勒姆-卡拉巴里面临的危机与博尼近似，即皇族出身的两大派别争夺领导权。阿马基里一派获胜，巴博伊或称威尔·布雷德集团被迫迁移到新的城镇巴卡纳。可是，即使是胜利的一派也不得不迁出埃勒姆-卡拉巴里，因为那里离它的对手博尼国太近太危险。于是从埃勒姆-卡拉巴里的疏散中建立起另外两个城镇，一个是住着卡拉巴里最高统治者阿马基里的布古马，一个是阿博内马。两处距内地市场都较近。

另外两个东三角洲国家嫩贝和奥克里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制度的分裂。19世纪，嫩贝出现的唯一有史可查的内部动荡发生在1879年国王奥基亚的葬礼上。当时基督教徒和传统派围绕应由谁主持殡葬仪式争执不下。后来双方达成妥协，各派分别举行自己的仪式。在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不存在派系之分。在北嫩贝和奥克里卡，主要的政治危机发生在18世纪。当时，新王朝执掌政权，在嫩贝是明吉王朝，在奥克里卡是阿多王朝。19世纪仍然由他们控制政权，没有出现强大的反对力量。还应指出，这两个国家的海外贸易水平没有博尼和埃勒姆-卡拉巴里高。

埃勒姆-卡拉巴里发展成为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各国权力平衡的枢纽。19世纪中期和晚期，它在西边与嫩贝作战，在东南面与博尼交火，在东边抵抗奥克里卡。这些国家不时结成联盟，尽管奥克里卡对于自己明显地依赖博尼的海港出口商品的地位感到不满。可是，埃勒姆-卡拉巴里至少在1869年贾贾在奥波博自立为王以后有一个反对博尼的盟友。在19世纪以后的时间里，奥波博力图将博尼挤出它在伊莫河谷的传统市场，这使得博尼更加急于寻找其它市场。他们沿新卡拉巴尔河而上，到达埃勒姆-卡拉巴里管辖范围的奥比亚图博 734 地区，并通过卡拉巴里的领土进入嫩贝北面的尼日尔河下游。卡拉巴里人也沿着恩金尼河和奥拉希河溯流而上，到达以前由嫩贝控制的区域。

驻在沿海地区的英国领事利用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作筹码，为英国商人和传教士进入内地大开方便之门。在缔结和平条约的过程中，英国领事充当了各国间的调解人。于是，经领事调解签订了一批条约：1871年博尼和埃勒姆-卡拉巴里(新卡拉巴尔)之间、1873年奥波博和博尼之间、1879年博尼和埃勒姆-卡拉巴里之间、1871年埃勒姆-卡拉巴里和奥克里卡之间、1871年嫩贝和埃勒姆-卡拉巴里之间的条约。各国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削弱各个国家抵

制欧洲商人对它们贸易领域的侵犯，及维护自身主权的决心。早在1854年，英国人就与博尼的国王威廉·佩普尔发生冲突。他们把他流放到斐南多波、阿森松、塞拉利昂和伦敦。英国人利用地方上因世仇造成的混乱作为干预的借口。1887年，英国人因为奥波博的贾贾反对他们直接在伊莫河流域从事贸易而推翻他时，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借口。从1830年代开始，由于英国公民被杀或遭到袭击，位于尼日尔河主要河口嫩河口的嫩贝国(布腊斯)的统治者卷入了英国探险队和贸易商与当地居民的纠纷之中。1895年，双方最后摊牌，当时嫩贝人进攻并摧毁了皇家尼日尔公司设在阿卡萨港的重要货栈。此举实为反对该公司企图建立从三角洲的阿卡萨一直到尼日尔河与贝努埃河汇合处的洛科贾的商业垄断。也是在1898年，奥克里卡国王伊巴尼楚卡，由于拒绝执行新成立的英国保护国南尼日利亚政府的命令，被英国领事抓了起来。嫩贝的国王科科藏匿在该国的边远村寨方免于遭难。

因此，到19世纪末，英国人在政治上控制了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地区。在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这个地区的国家不能拥立自己的国王。然而，主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已彻底瓦解，或它们的基本文化和社会结构与价值观遭到毁灭。

伊博内陆地区

长期以来，伊博兰似乎就以其相对稠密的人口和组织成小规模的政治单元为特点。这些特点使它特别容易受到奴隶贸易的毁灭性影响，因为没有能够保护其臣民的大国。不同的伊博族社群似乎卷入相互之间的征战、偷袭和绑架，以便把掳获的奴隶卖给三角洲国家和当经纪人的卡拉巴尔的埃菲克。虽然伊博兰为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博尼、埃勒姆-卡拉巴里各港口和克罗斯河河口地区的卡拉巴尔提供绝大部分出售的奴隶，但是19世纪以前，伊博人并没有与欧洲人发生直接的联系。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来探访的欧洲人也没能深入伊博内地。彼此最初的接触发生在沿河地带，如尼日尔河、伊莫河和克罗斯河的航道上。所以，沿海地区的中间商和内陆地区的商人常在沿河的集市中心相遇，因而对那里的伊博人比对其他族人有更多的了解。阿罗人控制着内地的贸易路线和一些集市，沿海地区的中间商在这些集市上购买奴隶，后来是购买棕榈油和棕榈仁，他们因为既能经商又能制造广为流传的神谕而远近闻名。与此相似，伊莫河上的恩多基人的城镇阿克韦特和奥霍姆贝莱向博尼和奥波博开放了市场。在尼日尔河地区阿博、奥索马里、奥古塔、阿萨巴和奥尼查等国都设有集市中心，这些中心成为外来影响与对外接触的焦点。

735

尽管1807年英国人正式废除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但沿海地区的奴隶贸易一直残存到大约1850年。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里，由于从事棕榈油贸易的需要，沿海地区各民族对内的奴隶贸易额增长了。正如需要人力来耕种庄稼和进行各项祭祀活动那样，从事棕榈油和棕榈仁的生产也需要劳动力。这就使伊博兰的对内奴隶贸易得以继续存在。[8] 因此，我们必须把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看做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伊博兰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奴隶贸易的最突出的破坏性特征，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捕获奴隶

[8] W.R.G.霍顿，1954年；E.伊西切(Isichei)，1973年。

的方式往往摧毁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上的流浪者、触犯法律者被卖为奴。少数人在荒年或因负债也被卖为奴。但是，大多数奴隶显然是通过绑架、突然袭击和战争手段掳获的。据悉，阿罗人还把那些根据神谕被判定有罪的人也卖做奴隶。但是，阿罗人通过其几乎遍布整个伊博兰的商业网络，也从它的唯利是图的同盟者阿巴姆人、奥哈菲亚人、阿比里巴人和埃达人袭击获得的奴隶中购买大量奴隶。因此，阿罗人通过它的神谕对伊博兰产生的广泛影响并没有变成一种团结的力量。[9]这样，阿罗人所热衷的奴隶贸易因其含有暴力因素，使其影响有别于恩里族早些时候对伊博兰广大地区施加的礼仪方面的影响。

从经济上看，对正常的农业活动的破坏肯定也是相当严重的。此外，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沿海地区中间商和欧洲人之间的贸易方面，伊博人从贩奴中所得到的好处，同奴隶贸易所造成的总体损失相比得不偿失。奴隶被用来换取食盐、鱼、烈性酒、火器、帽子和念珠，以及铁、铜和铜条。这些金属条被制成合金器具、祭祀用的钟铃、礼仪用剑、脚铃和其它装饰品。然而，由于这些产品取代了地方工业，使奥卡的铁匠不再重视当地的金属资源。食盐和布匹的进口也损害了当地的工业。

736

1830 年，当理查德·兰德和约翰·兰德穿越奥尼查、阿萨巴和阿博到达尼日尔河三角洲时，他们向欧洲发回了第一份关于伊博内地情况的报告。1841 年和 1854 年，又来了一些英国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1856 年，麦格雷戈·莱尔德在奥尼查建立了第一个贸易站。1879 年，许多相互竞争的英国商号组成联合非洲公司，以开展尼日尔河流域一带的贸易为目标。1886 年，该公司获得皇家特许状，成为具有政府权力的皇家尼日尔公司。该公司在伊博兰的阿萨巴建立了一个重要货栈，并配备了保安队和贸易站。在阿贾伊·克劳瑟和塞拉利昂其他被释放奴隶的领导下，在尼日尔河流域的伊博开展的传教活动早在 1856 年就在奥尼查开始了，其中有的领导人是伊博人，属于圣公会正教传教会。然而，里昂的天主教非洲传教社(SMA)从 1880 年代开始在尼日尔河西岸建立了对立的布道站，先是在阿萨巴，后来在伊塞列-乌库和伊布萨。

因此，首先侵入伊博兰的是沿尼日尔河而上的商人和传教士。伊博人对这些首批侵入者进行过抵抗。[10] 1898-1911 年间，西伊博人采取由“埃库梅库”(ekumeku)秘密会社武装暴动的形式进行抵抗。先是皇家尼日尔公司，1900 年后是英属保护国政府用异常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每一次的反抗行动。英国人最引人瞩目的行动是 1900 年对阿罗人的征伐。这次征伐行动遍及伊博 15,500 平方公里的领土，动用了来自昂瓦纳、伊图、阿克韦特和奥古塔的四支部队。这些部队都在本德和阿罗丘库会合。这表明英国人正式对伊博兰进行征服，这也是一种虎头蛇尾的行动。因为英国人用军事行动来对付的阿罗制度后来证明只需靠宗教专家和商人的共同合作就够了。没有武装力量出来与英国人抗衡，阿罗人对英国权威的挑战是间接的、商业性的和意识形态的。

迄今为止，对于英国人通过破坏以神谕为基础的阿罗人的社会结构，在阿萨巴内地击败“埃库梅库”秘密会社的抵抗，从而征服伊博兰等所有事件的研究表明，伊博社会从此

---

⑨ F.I. 埃克久巴(Ekejiuba)，1972 年；S. 奥滕伯格(Ottenberg)，1958 年。
⑩ F.K. 埃凯奇(Eketchi)，1972 年；P.A. 伊格巴菲(Igbafe)，1971 年。

以后被迫对外来势力门户洞开。例如，有人指出，皈依基督教成了“群众运动”和“戏剧性”现象。F.K. 埃凯奇认为，“那场最令人迷惑不解的1900年代的群众运动，部分原因是由于伊博企图对各种形式的英国统治加以阻挠”，而西蒙·奥滕伯格则相信，由于伊博人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态度和历史，因而特别易于接受变化。[11]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伊博人事实上抛弃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尽管他们比尼日利亚和非洲其它地区类似的民族在更大程度上转向基督教。 737

克罗斯河流域

位于克罗斯河河口的卡拉巴尔的埃菲克国控制着该河流域的商业活动。在沿海地区，其商业区域与伊贝诺河和夸-伊博埃河流域的三角洲国家奥波博相接。但是，该流域最大的族群是伊比比奥人，他们当中也提供了从这部分海岸出口的大多数奴隶。来自克罗斯河上游地区和西北部的伊博地区的产品，经阿罗人转到埃菲克商人手中。阿罗人控制着伊比比奥人的商业重镇伊图。克罗斯河上游的一些民族也通过破坏贸易或收取路捐，试图从与埃菲克人开展的贸易中分享利益。这样，伊图人、乌蒙人和阿库纳库纳人等一些族群与卡拉巴尔的贸易公司总是发生争端。克罗斯河上游的一些民族也与喀麦隆北部地区的民族直接做生意。伊科姆就是一个与喀麦隆进行商业交易的中心，它还与西部的伊博和南部的卡拉巴尔做生意。

尽管卡拉巴尔的贸易同三角洲国家的奴隶贸易以及后来的棕榈油和棕榈仁贸易相似，但由于不同的环境和社会结构，其历史发展也不相同。构成埃菲克国的两个主要社区杜克城和克里克城位于坚实的旱地，而在它们西部的一些邻国则地处三角洲的沼泽地带。因此，卡拉巴尔有奴隶劳作的农业拓殖地，生产某些必需的农产品，甚至提供若干出口商品，如棕榈油。卡拉巴尔的社会结构并不鼓励奴隶进入本族的政治体系。虽然家庭奴隶或城市奴隶可参与海外贸易，他们有时变得富有且颇有势力，但卡拉巴尔的秘密会社“埃克佩”(Ekpe)阻止他们进入执掌国家权力的上流社会。这与三角洲国家的“埃金尼”或“塞基亚普”开放型会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积极进行文化灌输，让奴隶完全与本族的文化和生活融为一体。

以欧洲商人、领事和传教士为代表的促进变革的外部力量，在卡拉巴尔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最初，卡拉巴尔不允许外商在其领土上建立商站，只许他们住在停泊在河上的大篷船上作为房舍和办事处。外商力图通过向埃菲克商人提供贷款或赊账对其施加影响，有时则共同抵制不能信守合约的埃菲克商人，对他们实行经济制裁。但在19世纪时，埃菲克人内部开始发生纠纷，于是欧洲商人以仲裁者和国王拥立者的姿态出现。 738

1846年，苏格兰教会布道团抵达卡拉巴尔。他们在杜克城和克里克城建立了一个由五六个白人传教士、教师、职员和皈依他们的信徒组成的小型自治殖民地。这个传教站成了

---

[11] F.K. 埃凯奇，1972年，第XIII页；S. 奥滕伯格，1959年。

当地部族难民的庇护所。传教士们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向英国领事汇报最新情况，还试图发挥道义作用，甚至以其它方式进行干预。

由于驻扎在斐南多波的英国海军缉私队进出克罗斯河河口极为便利，因而制止卡拉巴尔的奴隶贸易比较容易。1842 年，在签订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条约之后，英国允诺每年向卡拉巴尔的统治者支付补偿金。从 1842 年起，英国在卡拉巴尔的势力逐渐增强，直到 1891 年在那里建立起一个保护国政府。[12]

卡拉巴尔的“奥邦”

英国人在卡拉巴尔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是卡拉巴尔“奥邦”(obong,国王)软弱。这是因为相对说来卡拉巴尔的王位制度刚建立不久。18 世纪到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克罗斯河探访的人提到一些三角洲国家的个别国王，但谈到卡拉巴尔时只笼统说“国王们”。这些政治领袖人物中有的可能是门阀首领，或“埃克佩”官员。奥邦(国王)的职位只是在 19 世纪初期才开始设置。伊弗雷姆公爵(埃非奥姆，约 1800-1834 年)最初以杜克城的最高领导人和克罗斯河上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克里克城的“诚实的埃约一世”(死于 1820 年)，在该城占据着类似的地位。他们两人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大量财富，从而建立起高于其他有类似家族联系者的地位。

除了建立时间不长，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卡拉巴尔君主制的衰弱。首先，在杜克城和克里克城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国王。其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和埃克佩秘密会社的成员互相争夺王位。这样的争夺使英国领事、商人或传教士得以居间仲裁。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19 世纪的奥邦的职责与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他几乎丧失了所有传统的职能或权威，一切活动都同海外贸易有关。因此，奥邦从外商那里收取关税(comey)科米税，授予外商船只停泊权和船主的经商权。必要时动用传统的司法程序。制订和执行法律的内政权力落在埃克佩秘密社团头目手中。所以，19 世纪奥邦的主要职能就是在当地社区和白人之间充当桥梁。故此白人对由谁出任该职颇为关注。

739

杜克城和克里克城国王的相对权力在 19 世纪上半叶沉浮不定。杜克城的伊弗雷姆公爵(1800-1834 年)不仅是克罗斯河地区最富有的酋长，而且拥有“埃亚姆巴”(eyamba)这个埃克佩的最高头衔。他接受最大份额的科米税，把其余的分给其他酋长。伊弗雷姆公爵去世后，克里克城的诚实的埃约二世(1836-1858 年)成为最有势力的商人。到 1852 年，三分之二的科米税归他所有，而杜克城的当政者只能得到三分之一。尽管其财富和贸易地位下降，但杜克城的国王们一般都成功地保持了克里克城领导人所无法企及的重要头衔“埃亚姆巴”，后者只能拥有位居其下的头衔“奥邦科”(obunko)。

对杜克城和克里克城领导职位的继承权的争夺，是克罗斯河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大问题。早些时候克里克城的埃约家族获得的统治权一直维持到 19 世纪结束。它的对手阿卡博姆家族迁走，建立了科巴姆城拓居地。杜克城的情况则不同。1834 年，伊弗雷姆公爵去

---

⑫ D. 福德(Forde)(编)，1956 年；A. J. H. 拉瑟姆(Latham)，1973 年；K. K. 奈尔(Nair)，1972 年。

世，继位的不是他的儿子，也不是他家族的成员，而是埃亚姆巴五世，即埃克佩秘密社团的第五任埃亚姆巴。1847年，埃亚姆巴五世逝世，其家族与伊弗雷姆公爵家族发生争执。英国人推出第三位候选人阿奇邦一世继任。1852年，阿奇邦一世去世，商人和领事承认伊弗雷姆家族有权继任。从此，公爵、埃亚姆巴和阿奇邦三大家族你争我夺，纷争不已。他们各自竭尽种种手段压倒对方，其中包括巫术指控和用毒豆(esere)对敌手进行神判。[13]

埃克佩秘密会社和血盟会

卡拉巴尔的埃克佩秘密会社是克罗斯河流域和喀麦隆部分地区的许多森林民族的豹崇拜的变种。它举行一种类似化妆舞会的活动，青年男子身着拉菲亚纤维织成的带头罩的服饰，而女人和没有人会的人则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然而，会社成员的主要职责是每周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各种社会问题。

在内陆乡村居民区，埃克佩会社由全体长者组成。而在卡拉巴尔的大商业社区中则变成一种排它性的秘密组织。该组织还不断地划分成许多等级。据记载，1828年有五个等级，1840年增加到十个，1858年增至11个。奴隶最初被排除在埃克佩会社之外，但允许在会 740 社成员家里出生的第三代奴隶进人埃克佩会社较低的等级。然而，因为等级是通过按规定交费而获得的，所以较高的等级便由富有的自由人贵族垄断。最高的两个等级则由杜克城和克里克城的政治首领占据。

在19世纪，埃克佩会社是卡拉巴尔有影响的立法和执法权威机构。这一点也为外国来访者有目的的加以利用。因此，1850年，英国的传教士、商船货主和领事敦促卡拉巴尔领导人制定一项埃克佩法律，禁止统治者死后殡葬时用活人做祭牲。埃克佩会社可以被看做是卡拉巴尔政治制度的一个有利特点，它把所有富有的和有势力的自由人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组织里。但是，它歧视为数众多的奴隶出身的人和穷苦人，结果导致19世纪中叶的社会大动荡，戴克把它称做奴隶叛乱。

种植园奴隶社团被称为血盟会(Bloodmen)，它作为一种压力集团出现，主要是为制止国王和家族首领亡故时用奴隶进行人祭。这样一种歃血为盟的奴隶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卡拉巴尔产生，是由于奴隶集中在种植园，而他们都无力反抗。可是，该组织并没有为奴隶的解放而起来造反，甚至也不想夺取埃克佩的政治权力。只是每逢达官贵人病重或去世，奴隶们面临被活祭或被神裁服毒时，允许奴隶集体从种植园进入卡拉巴尔。由于他们的鼓动，1850-1851年，埃克佩制定了不准用活人祭祀的法律。国王阿奇邦一世也认为，在王位争夺战中很需要得到奴隶对他的支持。

因此，卡拉巴尔的社会政治史与三角洲国家有相似之处，即它们的制度都受到外来压力的冲击，但在解决内部问题的具体办法上却不同。埃克佩、君主的地位和血盟会，在卡拉巴尔都是特有的现象。

---

⑬ A.J.H. 拉瑟姆，1972年。

喀麦隆沿海及其内陆地区[14]

喀麦隆沿海地区包括许多近海的岩石岛屿，通常是大片的美洲红树沼泽、溪流和水湾，紧靠海岸是热带雨林区。栖息在这里的居民主要是西北班图人的三大支派，即克佩-姆博科人、杜阿拉-林巴人和坦噶-亚萨人，[15] 及其为数众多的氏族和支系。这些民族的传说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和联姻关系，以农耕、捕鱼和狩猎为生。他们在集市上用鱼换取食物。他们通常组织成自治的村寨，但在布比人、杜阿拉人和伊苏伍人中间也曾出现一些下层首领。杜阿拉人、伊苏伍人及其他族人中最有声望的秘密会社是以水神崇拜为本的“詹古”(Jengu)。[16]

同尼日尔河三角洲各民族的情况一样，19世纪这些西北班图人也受到来自基督教传教士、欧洲商人和帝国主义者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来自废奴主义者。[17]因为到19世纪初期，每个社群都有处于底层的奴隶阶级，而废除奴隶制度的努力给他们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既要找到取代奴隶这一活商品的替代产品，如棕榈油和棕榈仁，又要找到足够的劳动力来生产和运输这些产品。

喀麦隆的杜阿拉人可能早在16世纪就住在沿海地区。但是大约自1706年起，他们征服和吸纳别的班图族群以后，才建立起自己的中央集权国家。[18]他们有一个最高首领，但早在1792年一次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喀麦隆河上的英国商人就已插手干预。他们把人称贝尔的一个出身低微家族的候选人强加给杜阿拉人。1814年，有较高声望的高贵家族的候选人阿克瓦因此宣布独立。这样，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杜阿拉人分裂成两大集团，即贝尔集团和阿克瓦集团。杜阿拉的政治就围绕贝尔王和阿克瓦王展开。这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又各自再分割成若干“城镇”或区。但是，面对这种日趋分裂的局势，为了保持他们的种族团结，杜阿拉人创建了一种新制度“恩冈多”(ngondo)。恩冈多是杜阿拉贵族的一个委员会，由各个杜阿拉村庄的所有委员会的代表组成。[19]

喀麦隆山脉西岭和喀麦隆河支流比姆比亚河一带，是比姆比亚以贸易为主的伊苏伍人国家。比姆比亚由三个村落组成，并由得到酋长委员会辅佐的家族首领统治。至迟从17世纪中叶开始，比姆比亚就是一个有名的小型商业中心。正如比姆比亚本身一样，这些统治者的权力和威望，植根于他们在海外贸易所充当的中间人地位。比姆比亚的主要酋长也从他们的詹古会社成员的身份中获得地位和支持。

比姆比亚最富和最有名的商业富豪是拜尔，欧洲人称他为威廉王。他的母亲出身于比姆比亚的统治家族，但拜尔童年时期是在喀麦隆河地区杜阿拉他的父亲家里度过的。他的父系亲属，把他送到比姆比亚，投靠他的有权势的舅父。由于他以前在喀麦隆河的经历，他

[14] 本部分系喀麦隆雅温得大学历史系洛维特·Z.伊兰戈(Lovett Elango)博士文稿的概述。
[15] E.阿登纳(Ardener)，1956年，第39页。
[16] R.巴罗(Bureau)，1962年，第107–138页。
[17] L.Z.埃朗戈(Elango)，1974年。
[18] E.姆翁(Mveng)，1963年。
[19] V.T.莱文(Levine)，1971年。



图片 27.4 贝尔王的寓所，19 世纪 40 年代

的舅父让他作为自己与欧洲人交易的使者。拜尔因此获得了财富，新的阅历和影响力，并被选为他舅父的当然继承人。1833 年，拜尔说服驻斐南多波的英国代表尼科尔斯上校，承认他为国王，统治从比姆比亚到德尔雷伊河地区包括近海的布比群岛在内的整个沿海地区。交换条件是整个地区作为英国的保护国。虽然英国人拒绝自愿割让，但拜尔拥有国王的称号直到 1879 年去世。这样，杜阿拉和比姆比亚两个单独的实体在 19 世纪发展了联系。文化上的联系由于詹古会社的团结及威廉王拥有一半的杜阿拉血统而得到加强。在商业上，比姆比亚和贝尔城的商人在共同开发德尔雷伊河的商贸业务方面进行合作。他们开发出两条主要商道。第一条是沿海商道，要通过连结两个地区的小港湾区，至今这条商路也没有多大变化。比姆比亚和杜阿拉的一些商人住在这条商路沿线的各个村寨里，收取物品与当地居民交换。第二条是陆路商道，若遇上暴风雨或海浪太大，通过上述小港湾区不安全时，就可以选择这条商道。这条环绕喀麦隆山的商路还开发了象牙资源。比姆比亚内地和贝尔城商业区的对内贸易通道网络，与卡拉巴尔和环绕德尔雷伊河的克罗斯河的埃菲克商人的商贸网络相交叠。 743

喀麦隆-比姆比亚-德尔雷伊河地区的商业联合，由于该地区的各个部分与内陆地区巴门达草原建立了联系而得到进一步加强。[39] 因此，1820 年到 1840 年代，许多来自巴门达"草场"的奴隶到达沿海地区，经德尔雷伊河地区抵达比姆比亚。但是到 19 世纪中叶，贝尔城和比姆比亚商人携手合作，开始与德尔雷伊河地区的富商巨贾成功地进行和平竞争。

1840 年代到达沿海地区的奴隶，大多是在巴门达草原上对巴里-钱巴人多次袭击时抓

[39] E.M. 奇尔弗，1961 年。

到的俘虏。他们代表了沿海地区很多社会从奴隶贸易向合法商业转型的关键因素。正如在卡拉巴尔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一样，在喀麦隆河地区和比姆比亚，奴隶用于生产棕榈油、棕榈仁和其它合法贸易的产品。在比姆比亚和喀麦隆河地区，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威廉王和贝尔王通过组织严密的制度，把他们的奴隶出租给设在斐南多波的西非公司。这种制度带有契约性质，为两位君主提供了额外的财源。但这种制度被滥用，导致英国议会对其进行调查。威廉王被激怒，不仅抗议公司没有支付他的奴隶工钱，而且他的奴隶遭到虐待。

英国人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并开展合法贸易，导致了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和当地统治者主权的逐渐丧失。尽管1883年尼科尔斯和威廉王签订的条约未获批准，但1840-1844年间英国代表还是缔结了一些条约。这些条约为他们干预当地政治提供法律依据。这种干预通常意味着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恐吓违反条约有关条款的酋长，或者催收欠欧洲人的商业债务。1852年，约翰·比克罗夫特甚至还主持阿克瓦城新酋长的选举。有时英国的干预和仲裁是受当地统治者的请求，例如威廉王建立对比姆比亚和德尔雷伊河地区的权威时所做的那样。可是，英国的干预更常用的借口是欧洲人和当地商人之间在偿还贷款或信用方面产生的纠纷。1856年，在杜阿拉建立的平等法院使仲裁和解决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纠纷制度化。

传教士是代表外国势力的一个重要因素。1843年，西印度群岛混血儿出身的约瑟夫·梅里克由英国浸礼教会派到斐南多波。是年，他在贝尔城建立一个传教会，1844年在比姆比亚也建立了传教会。[21]他和他的同事们后来又陆续地建立起一些教堂、学校、木工行；在744 比姆比亚还设立了一家印刷所。由于他们致力于让大批民众皈依基督教，很快就激起当地政权的反对。1850年代，由于天花流行，种族间不断发生战争，再加上饥荒，当地政权与传教士的冲突日趋尖锐。因此英国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保护传教士和他们的教徒。1858年，西班牙总督宣布天主教为斐南多波的国教，浸礼教会在克拉伦斯难以立足。因此，1858年6月，阿尔弗雷德·萨克尔在他命名为维多利亚的安巴斯湾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区。但是当地对浸礼教徒的反对仍然很激烈，尤其是因为许多在维多利亚的英属西印度的殖民者也参与同比姆比亚居民展开商业竞争。

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喀麦隆沿海地区商业的衰退在统治者中间产生一种危机感，一些从属的酋长也出现了不安的抵触情绪，他们因而向维多利亚女王吁请保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于1884年7月吞并了喀麦隆。由于得到当地英国人某种程度的支持，反抗德国吞并的斗争，几乎随即爆发。当地酋长们意识到德国人决心向内地推进，因而将摧毁他们作为中间商的垄断地位，于是对德国人的抵抗更加坚决。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抵抗运动和镇压的企图才暂告一段落。[22]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已无力扭转局势。只有维多利亚作为英国人的据点得以保留下来。但即便在这里，传教士也抵挡不住德国人的骚扰。1887年3月28日，维多利亚正式移交给德国。德国人不失时机地向巴门达草原推进，控制了内陆的贸易，从而改变了内陆商业从一开始就依赖卡拉巴尔的局面。

---

[21] S.N.格伟(Gwe)，1966年
[22] R.约瑟夫，1974年；H.R.鲁丁(Rudin)，1938年。

奥戈韦盆地及其周围地区[23]

喀麦隆以南的奥戈韦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北边的沃勒、诺亚和科莫诸盆地和南边的尼扬加盆地，大致相当于现代的赤道几内亚和加蓬的领土。这片广阔的地区大部为赤道雨林所覆盖，其南面和东面与刚果盆地接壤。这里自远古以来就有人类生息繁衍，20 多年前在各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大量石器遗物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至今对该地区这些最初的居民的身体特征或其它特征，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他们可能是俾格米人的祖先。俾格米人现在分成许多小族群散居在森林里，以狩猎捕鱼为生，将猎物同邻近的操班图语的部落进行物物交换。 **745**

到 19 世纪，这些操班图语的民族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政治实体：有村落国家(芳，凯莱，塞凯，本加)、邦联(姆蓬圭，吉瑟，普努，奥巴姆巴)和王国(从 1860 年开始有恩可米，奥朗古和格尔瓦)。[24] 在这些政治实体内部，不同的民族从事各种活动，有游牧农业，打猎，捕鱼和手工业。手工业首先以其产品的质量而声名远扬，例如芳人打制的铁器。19 世纪的欧洲旅行家认为芳人是该地区最好的铁匠，而上恩古尼的民族尤其是吉瑟人、阿平吉人和米左戈人织的布则是最上乘的。这些经济活动的产品构成不同集团之间广泛开展贸易活动的基础。举例说，科莫河口的姆蓬圭邦联和奥戈韦河三角洲的奥朗古王国之间的木薯粉和干鱼贸易十分活跃；由内陆地区编织巧手织出的著名的“邦戈”布，经由奥戈韦河和雷姆博-恩可米河，从恩古尼河上游运送到沿海地区；最后，装满大包当地出产的食盐的船只从大西洋岸边定期向内陆地区开出。自 1471 年葡萄牙人抵达沿海地区以后，从 17 至 19 世纪，贸易日益发展成为沿海各民族的主要经济活动，廉价的欧洲商品如火枪、酒精饮料、纺织品、廉价的玻璃器皿和小装饰品源源不断涌入，用以换取奴隶、象牙、棕榈油、橡胶、乌木和红木。

沿海地区商业活动的发展产生了如下一些重要后果。第一，它引起长期定居在加蓬北部、喀麦隆南部和赤道几内亚东部地区的某些民族，如芳人及在其之前的凯莱人的迁徙运动。他们从上述地区向海岸迁移，到 19 世纪末，他们到达埃里瓦-恩可米(费尔南-瓦兹礁湖)。其次，这是造成土著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根本原因。以血缘纽带为特征，以及以各个民族内部均已出现三个社会等级，即纯血统(普努人称 fumu，翁耶内人称 awo-ntche，芳人称为 atem bo bayong)、混合血统(翁耶内人称 awoga，芳人称 mintobe)和奴隶为特征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由以财富为基础的另一种社会等级结构所取代。在这种新的等级社会中，突出的特点是，除中、下层阶级外，基本上是由酋长和贵族组成商业中产阶级上层或称资产阶级。这些人掌握了大商业活动的垄断权。

19世纪初，这种社会发展在内地各民族中不很明显，在沿海一带十分突出。从1839年 **746**

---

[23] 本部分根据利伯维尔大学历史系主任尼古拉·梅特古·恩纳赫(Nicolas Metegue N' Nah)的一篇文章改写而成。

[24] 参见 N·梅特古·恩纳赫，1979 年。应当指出的是，直到 17 世纪，特约和维里两个王国仍然包括今天加蓬的大片领土。



图片 27.5 奥戈韦河上的商人瓦森戈，象牙和女眷陪伴左右

开始[20]签订一系列条约，致使法国在加蓬建立贸易站，1849 年在科莫河口建立的利伯维尔成为重镇。从这一贸易站派出大批考察团，使法国的领土要求不断扩大，一直深入到加蓬的内地，使加蓬成为欧洲通往中非的门户。这些考察者包括保罗·贝罗尼·迪夏约（1856-1859 年和 1863-1865 年），塞尔瓦尔·迪贝莱与格里丰·迪贝莱（1862 年），埃梅斯（1867 年），阿尔弗雷德·马尔什与贡比涅总督（1873-1874 年），皮埃尔·萨瓦南·德巴拉扎（1875-1878 年，1879-1882 年和 1883-1885 年），保罗·克拉香（1888-1889 年）以及富罗与多利塞（1889 年）。在北部地区，法国人与西班牙人发生冲突，西班牙人的几支远征队是从斐南多波出发到里奥-穆尼，带队者主要是尼古拉·曼特罗拉与吉列马尔·德阿拉贡（1845 年）、曼努埃尔·伊拉迭尔、奥索里奥与蒙特斯·德奥卡（1884 年）。

随着欧洲人在加蓬的探险活动取得进展，尽管遭到土著居民的抵抗，欧洲人还是同某 747 些酋长订立了条约，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继续在各地定居。到 1882 年，在奥戈韦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已有 90 多个商业机构，大多数属于英国公司（约翰·霍尔特，哈顿和库克森）、德国公司（沃尔曼，舒尔茨，吕布克，屈德林）、西班牙公司（泛大西洋公司）和法国公司（迪巴里·弗雷雷）。此外，还有 20 多个传教站和同样多的教会学校。

然而，尽管西方的影响深深渗入内陆地区，当地的土著社会仍能保持它们的特性。必

[20] 注意，在该地区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是批准殖民占领，由布埃特-威劳米兹和安楚维·科维·拉彭齐奥姆博，即"丹尼斯王"签署。



图片 27.6 奥戈韦河的统治者安楚维·科维·拉庞多奥姆博（"丹尼斯王"）和他的正妻

须指出的是，直到19世纪末期，广大地区仍然没有受到这些外来势力的影响。即使像沿海地区那些西方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地方，他们也遭到本土文化的各种形式的顽强反抗。因此，要广泛地向当地居民传播基督福音就不得不与本土广为流传的偶像崇拜如布维提（Bwiti）、布埃里（Bieri）和翁布维里（Ombwiri）以及诸如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习俗作斗争。

结 束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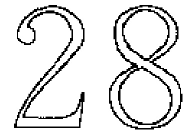
可见，19世纪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喀麦隆地区的大部分地方经历了英国势力的逐渐渗透，而后是法国、最后是德国势力也伸向喀麦隆地区。然而，毫无疑问，直到我们探讨的这一时期结束，这个地区的内陆部分仍未受到欧洲势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早在19世纪以前便与欧洲商人发生直接接触的沿海地区，也没有被轻易地征服。它们自身的历史发展是由当地种种因素，且往往是由与其邻国的关系决定的。因此，尽管沿海地区各民族都同样参与了海外贸易，但它们各自产生了抑制海外贸易影响的各种不同的制度，从各自内在的历史和文化中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三角洲国家的瓦里（家族）制度与克罗斯河流域的埃菲克制度显然不同，后者还采用了内陆地区民族的埃克佩制度，但赋予它以新的职能。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喀麦隆沿海地区的民族发展了詹古制度，它不同于埃菲克人的埃克佩秘密社团，也不同于三角洲国家的开放组织埃金尼或塞基亚普化妆舞会社，与奥戈韦盆地和加蓬的布维提、比埃里和翁布维里等崇拜也不一样。 748

进一步说，虽然通过奴隶买卖和后来的棕榈油与棕榈仁交易开展海外贸易对这些社会

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不能忘记，内陆地区的贸易商道和各民族之间用当地产品进行交换，才是整个19世纪大多数民族经济活动的根基。在政治发展方面，即便在沿海地区，内在的文化因素依然居优势地位：到19世纪，尽管瓦里王国拥有实际主权，它在海外贸易中也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尼日尔河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伊策基里人仍然认为贝宁的奥巴的咒符是决定历史的主导因素。

总而言之，尽管对欧洲人的海外贸易、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和殖民征服等外来因素引起极大关注，但不应忽略19世纪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和奥戈韦盆地之间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内在因素起着基本的、第一位的作用。外来因素的影响决非一朝一夕就占主导地位，各民族在其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里继续享有自治权。这一基本的自治权在外部西方世界强加的影响下得以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些民族没有使自己的文化、制度和特性等要素丧失殆尽。

（毕健康译）



非洲海外移民

F.W. 奈特
Y. 塔利布与 *P.D.* 柯廷(供稿)

导　言

由于跨越大西洋以及其它分支路线的奴隶贸易，非洲人大规模向美洲、中东和欧洲迁 **749** 移，这成为非洲和世界历史中的主要事件。[1] 移民活动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大多非移民本人自愿，他们在欧洲、中东和美洲地区留下许多大大小小的移民社会。[2]

大批非洲人移居到小亚细亚地区和地中海的黎凡特地区，这是非洲人向外移居最早的地区，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向这些地区的移民活动很可能始于公元前几个世纪，7 世纪后穆斯林占优势时期达到最高潮。大多数非洲人通过横跨撒哈拉沙漠的贩奴路线来到这些地区，但也有一些非洲人是作为自由职业者、学者、教师、商人和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圣而移居到此的。由于地中海地区的经济不是粗放型种植业经济，因此每年从撒哈拉以南地区流入的非洲人仍然数量较少，可能不超过几百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大量非洲人受雇当兵或当水手、宦官、官妾和行政管理人员。在有的情况下，如埃及的阿布尔-米斯克·卡富尔(死于 968 年)甚至得以成为国家的卓有成效的统治者。在穆斯林国家中，非洲人不再身为奴隶，有时他们还可以保留与其主人相互影响的具有凝聚力的文化。

非洲人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通过陆路和海路到达印度和远东。到 1520 年代和 1530 年 **750** 代，大约 5000 名非洲士兵在古吉拉特的素丹巴哈杜尔的部队中服役，还有一些非洲人在其海军中服役。更多的非洲人在德里的素丹宫廷以及孟加拉和德干地区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或在军中服役。实际上，由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东南部扩展，也使非洲人迁移到该地区当兵

---

[1] J.M. 麦克弗森(McPherson)、L.B. 霍兰(Holland)等人，1971 年，为进行对移居海外的非洲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开端。该著作出版以来，一些优秀的专题著述，尤其是以移居美洲的非洲人为主题的专题文章显著增加，如 D.B. 戴维斯(Davis)，1975 年；R.W. 福格尔(Fogel)和 S.L. 恩格尔曼(Engerman)，1974 年；H.G. 古特曼(Gutman)，1975 年；E.D. 吉诺维斯(Genovese)，1974 年；S.L. 恩格尔曼和 E.D. 吉诺维斯(编)，1975 年；G.M. 霍尔(Hall)，1971 年；D.W. 科恩(Cohen)和 J.P. 格林(Greene)(编)，1972 年；H. 霍廷克(Hoetink)，1973 年；R. 安斯蒂(Anstey)，1975 年；J. 帕拉西奥斯·普雷西亚多斯(Palacios Preciados)，1973 年；R. 谢里登(Sheridan)，1973 年；R.S. 邓恩(Dunn)，1972 年；C.A. 帕尔默(Palmer)，1976 年，1981 年；R. 比恩(Bean)，1975 年；H. 克莱恩(Klein)，1978 年；L. 劳特(Rout)，1976 年；F.P. 鲍泽(Bowser)，1974 年；W. 迪安(Dean)，1976 年；B.W. 希格曼(Higman)，1976 年；M. 克拉顿(Craton)，1978 年；O. 帕特森(Patterson)，1982 年；T. 柏林(Berlin)和 R. 霍夫曼(Hoffman)(编)，1983 年；P.D. 柯廷(Curtin)，1979 年。

[2] 见 R. 戴维(David)，1970 年，第 33-50 页；L. 巴格纳(Bugner)，1980 年；M. 莫雷诺·弗雷吉纳(Moreno Fraginals)，1977 年。

和从事官僚行政工作。

751　非洲人与欧洲人的接触是地中海商业和军事活动的一种延续。15 世纪时，小规模的贩卖非洲奴隶的贸易在地中海地区兴起，在西西里、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以及南伊比利亚海滨出现大量非洲人。塞维利亚在 16 世纪初大约有 5000 名黑人，大批的非洲人生活在马拉加、韦尔瓦、加的斯以及里斯本。欧洲和非洲在海上的直接联系使得黑人数量增加，到 18 世纪末，法国大约有 2000 名黑人，英国黑人人数接近 15,000 人。虽然英国和法国的黑人同当时大量拥入美洲的非洲人相比数量极小，但这些黑人的集结已引起了两国官方的警觉。法国在 1777 年通过了皇家法令，禁止不同种族间的婚姻；英国 1772 年宣布著名的曼斯菲尔德法案，规定不得在英国奴役非洲人。



图片 28.1　腰间别闪尼波状刀如剑的黑人形象，可能出土于今天的越南地区，大约属 17 世纪的文物

但是，前往美洲的非洲人最为显著。非洲人及其后裔(通常称为美洲黑人)，从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这一地区直到现代在新大陆每一个社会的发展中都起着显著的作用。不管非洲人在某一特定国家人数有多少，他们总的影响一直是不可忽视而又极为深远的。

非洲人和美洲黑人，不管作为奴隶还是自由人，在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美洲土地上披荆斩棘，征服了大片荒野。他们和第一批来到新大陆的探险者一起越过激流险滩，并协助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以及墨西哥和秘鲁的高度文明。他们积极参与建立新社区，为以后不同种族杂居和多元化社会奠定了基础。他们参与营建了一批伊比利亚人的新兴城市：1496年建圣多明各；1522年建墨西哥城和哈瓦那；1535年建伯南布哥和利马；1536年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瓦尔伯莱索；1549年建巴伊亚；1565年建里约热内卢。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他们还参与兴建英国殖民者的港口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詹姆斯敦和查尔斯敦。

与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来到美洲的其他移民群体(主要是自由人)一样，非洲人无所不做，承担着各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先驱者和征服者，又是海盗、高楚牧人、草原居民、奴隶主、商人、仆人和奴隶。他们在某些行业中表现突出，但在法律上却被排斥在社会最高阶层以外。17世纪以后，唯有非洲人成为美洲具有合法地位的奴隶。这种身份在美洲社会的非洲人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3] 在1888年巴西最后废除奴隶制以前，美洲的大多数非洲人都是奴隶，承担着绝大部分艰辛的体力劳动，若没有他们，这些殖民地、保护领地和国家就不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752**

非洲人与现代美洲各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长期、密切和广泛的联系，使得他们在新大陆对几乎每个社会的语言、文化、经济和种族构成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4]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种植园地区，尤其是从美国东南部到巴西东北部沿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岸一带，以及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种植业地区。

中东和东南亚[5]

埃塞俄比亚人由于聪慧和貌美，在阿拉伯和印度卖价颇高。19世纪从埃塞俄比亚出口到亚洲各地的奴隶大部分为儿童，年龄从8岁到16岁不等。有些奴隶是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绍阿王国沿着边界向奥罗莫(加拉)民族发动战争时所俘获的。奴隶被装进数百辆大篷车里，运到埃塞俄比亚沿海的柏培拉、泽拉、塔朱拉、阿萨布、奥布克和马萨瓦诸港口，然后装船横渡红海到吉达、木哈和荷台达等港口。奴隶的买主来自也门和希贾兹的几个城镇，也有来自哈德拉毛、桑给巴尔、阿曼、印度和波斯湾的海运商人。经营这种贸易的主要是阿

---

③ D.B. 戴维斯，1966年，第223-261页。

④ 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刊——Daedalus特刊，103，2，1974年，题为"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S.W. 明茨(Mintz)，1971年；B. 努内斯(Nunez)，1980年；R.M. 莱文(Levine)，1980年；N. 桑切斯-阿尔波诺兹(Sanchez-Albornoz)，1974年。

⑤ B.A. 奥戈特(Ogot)(1979年，第175页)，已指出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关于土耳其的档案，见C. 奥尔享路(Orbanlu)，1972年和1976-1977年，第145-156页。有关早期人类学研究成果，见R. 斯基恩(Skene)，1917年；G. 佩森特(Pesente)，1912年，1929年；D.C. 菲利奥特(Philliot)，和R.F. 阿祖(Azoo)，1906-1907年。

拉伯人，得到古吉拉特(巴尼昂斯)的印度金融家们的支持。⑥

亚洲奴隶的主要供应地为东非。正如 J.B. 凯利所说⑦，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实际上是由马斯喀特阿拉伯人所垄断，其统治者的税收来源主要靠奴隶贸易的关税。在 19 世纪初，马斯喀特是通往波斯湾、波斯、伊拉克和印度的最大票据交易所。但是到 19 世纪末，马斯喀特的主导地位受到南方苏尔港的挑战。大多数在马斯喀特登陆的奴隶只在阿曼本土出卖。



图片 28.2　理查德·伯顿爵士所看到的 19 世纪 50 年代东非的奴隶贸易

753 其余的奴隶由特鲁西尔海岸的代理人，主要是卡瓦斯马人买走，在特鲁西尔海岸或在波斯、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哈萨和内志转卖。从马斯喀特和苏尔港，奴隶也被转运到巴林、科威特和印度南部的信德、库奇、卡提阿瓦等港口和孟买管辖区。准备运往波斯市场的奴隶在布希尔登陆，同时也从沙迦横渡波斯湾运往伦格。值得注意的是，在 19 世纪初，很少把奴隶远道从红海通过阿拉伯运到波斯湾沿岸出卖，巴士拉是从波斯湾上岸的主要奴隶市场。

英国和荷兰的奴隶主也参与了这种有利可图的贸易。他们主要从马达加斯加岛贩来奴隶(卡弗尔)⑧ 运往孟买和马德拉斯监管区以及苏门答腊西岸的早期英国殖民地，以满足各个工厂对劳工的需求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 19 世纪，不但非洲人口大量迁移，而且马**754** 来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也在迁移，他们在印度洋地区不是充当奴隶就是作为有契约束缚的

---

⑥ R.H.K. 达克瓦(Darkwah)，1975 年，第 168 页；J.B. 凯利(Kelly)，1968 年，第 417-418 页。

⑦ J.B. 凯利，1968 年，第 413-414 页。

⑧ 卡弗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不信教或不虔诚之徒，是不承认上帝赐福的人。这个词也有"掩盖"和"否认"之意。阿拉伯人通常用此作为对非穆斯林人的称谓，因此是指特定群体。该词在印度和马来亚群岛被广泛用来指非基督教徒和非穆斯林的非洲奴隶。见 H. 尤勒(Yule)和 A.C. 伯内尔(Burnell)，1886 年，第 141-142 页。

⑨ H. 多德韦尔(Dodwell)(编)，1920 年，第 100、104、135、159-160、188、202、223 页；F.W. 米斯(Mees)(编)，1928 年，第 76 页。

劳动者。这些背景不同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10]

每年去麦加朝圣对于非洲人自愿或不自愿地向中东迁移也起了重要的(尽管是季节性的)作用。许多西非朝圣者通过开罗商队或经过红海的萨瓦金港和马萨瓦港到达麦加，由此形成了小的移居社群。[11]从伟大的马里国王曼萨·穆萨时代起，富有的非洲朝圣者带着大量的奴隶，他们沿途出售一些奴隶以支付旅费。[12]因此，麦加成为阿拉伯半岛的主要奴隶市场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不但非洲奴隶被带到那里转卖，而且塞卡西亚人、马来人、印度人和中亚人也是如此。然后买主把他们带到穆斯林世界各个地方[13]。

少数非洲人留在阿拉伯的圣城进行较高层次的神学研究。马利克学派的西非人占了统治地位。[14] 来自东非的马利克学派的学者在北也门城镇扎比德、拜特-法基和哈德拉毛的著名宗教中心——塔里姆、艾纳特、塞文和盖邓等地聆听沙夫脱教授的讲学。[15]

和以往几个世纪一样，非洲奴隶的劳动在亚洲许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在英国和荷兰殖民国家统治的地区，尤其在印度和马来群岛，包括非洲人在内的奴隶为与美洲相似的种植业经济提供了基础。在中东，尤其在阿拉伯半岛，大量非洲奴隶从事侍女、水手、士兵、管理人、售货员等家庭行业的工作。在农业地区，他们干农活、运水、赶骆驼和牧羊。如上所述，与努比亚人、苏丹人和东非人形成对照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受到厚爱，他们仅干些轻活。[16]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J.L.伯克哈特注意到，贫穷的非洲朝圣者和他们受奴役的同胞一样主要来自当地称为“特克鲁尔”的西非，他们在逗留期间当搬运工、码头工、清洁工，或拣拾柴火、制作坩埚编织席篮以及酿造“勃扎”酒等。[17] **755**

在印度，非洲奴隶从事大量低贱的工作。由于种姓制度，这些低贱工作是印度人不允许或不愿做的，或者英国人认为他们不适宜做的。在各王公土邦中，奴隶们，尤其是非洲奴隶主要从事家仆之类的劳动，例如当妾、阉人、运水人、理发师、保镖、马夫等。据说在19世纪初奥德(现在称为北方邦)国王购买了许多埃塞俄比亚的男女奴隶，挥霍大量资财。这些奴隶买来后就皈依伊斯兰教。我们还得知“这些有钱的贵族穆斯林，尤其是住在帕特纳和加尔各答的贵族穆斯林，除了拥有男女奴隶之外，通常还拥有大量的哈布什(埃塞俄比亚)阉人”。[18]就像早期那样，非洲奴隶被认为是奢侈品。奴隶主的社会地位系根据其拥有奴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奴隶是奴隶主随员中的重要部分，也是他炫耀财富和权力的一种方式。

---

[10] 并非所有移民社区的成员都是奴隶，有一些是政治流放犯。例如，印度尼西亚反殖民主义起义的领导人在失败后被流放到斯里兰卡的荷兰监禁地以及开普殖民地。有关运往亚洲的奴隶的估计数字，见B.A.奥戈特，1979年，第177页。其它各种来源的数字，见J.B.凯利，1968年，第414-416页；W.威尔伯恩(Wilburn)，1813年，第1卷，第35、60页。

[11] 有关西非朝圣者的最新研究，见U.纳卡尔(al-Naqar)，1972年和J.S.伯克斯(Berks)，1978年。

[12] B.刘易斯(Lewis)，1971年，第37页。

[13] 有关麦加奴隶市场的详细情况，见C.S.赫格隆吉(Hurgronje)，1970年，第14-15页；R.伯顿，1964年，第1卷，第252页。有关非洲奴隶的重新分配情况，见R.温斯德迪(Winstedt)，1958年，第53页；W.奥森瓦尔德(Ochsenwald)，1980年，第115-126页。

[14] C.S.赫格隆吉，1970年，第182页。

[15] 见 *Majalah al Rabitah al-'Alawi*，1350 AH，第4卷，第30-31页。

[16] C.S.赫格隆吉，1970年，第11、13页。

[17] J.L.伯克哈特，1829年，第258-275、382页。

[18] A.K.查托帕泰(Chattopadhyay)，1977年，第29，40-41页。

在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监管区，奴隶们，尤其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奴隶，除了干一些家务劳动外，在这些早期的英国殖民地的发展过程中，在经济和军事上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记录表明，奴隶为修建城堡(例如，南印度的圣戴维堡)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充当士兵、水手、码头工人和农业劳动者。[19]

在马来群岛，尤其是苏门答腊的西海岸，如明古连这块英国殖民地[20]，非洲人除了采集和运输胡椒之外，还从事各种行业，如当兵、机械手、泥瓦匠和木匠。最苦的是那些在荷兰金矿(尤其是萨利达)[21] 极其恶劣条件下干活的奴隶。

尽管存在着历史悠久的纳妾习俗，但非洲人和当地亚洲人同化现象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普遍。[22] 经常可以见到与美洲奴隶制相似的“封闭的奴隶制模式”的特征，例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非洲人，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会被其主人接纳为家族成员。非洲人“始终是独立的种族群体，他们通过自然过程或外来的不断补充而繁衍”。为防止非洲人进入主流社会，设置了种种难以逾越的社会障碍。因此非洲人不但没有被同化，而且由于他们身上的奴隶烙印而与人保持一定距离。[23]

在阿拉伯地区西南部的各地和城镇里仍然可以看到许多非洲血统的不同族群——阿克达姆、苏比安、胡贾尔以及加巴尔特，[24] 他们从事最低贱的工作，如清除垃圾、清扫街道等，阿拉伯居民认为这些工作有污染，是不干净的。他们实际上被看做是被遗弃者，被迫居住在隔离区。在希贾兹，贫困的非洲朝圣者的情况也不见得好。据报道他们中大多数人居住在麦地那圣城一个叫“梅纳克”的公共场所一些破旧的小屋中。[25] 据H.R. 迪克森所述，[26] 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愿意娶一个已获自由的女奴，因为这等于是对他们的名誉和血统的污损。据报道，许多孟买的西迪人就居住在市监狱附近的隔离区中。[27] 苏门答腊岛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奴隶，被迫居住在远离马来殖民地和城堡的“海边一个小村庄里”。[28]

---

⑲ H. 多德韦尔(编)，1920年，第104、135页。

⑳ W.F. 米斯(编)，1920年(1773年2月25日从宫廷到马尔博罗堡)。奴隶也在制糖业和烧酒业中劳动。

㉑ 见J. 保罗斯(Paulus)(编)，1917-1921年，第1卷，第806-811页。

㉒ 见C. 道蒂(Doughty)(1926年，第1卷，第554-555页)所归纳的宣传纲要，“那些非洲人被当做奴隶(他们经常是自己战争中的俘虏)，并无怨恨之心，即使是残忍的人贩子通过他们的家长租用他们也不怨恨。付了钱的主顾把他们领到家里，男奴隶被割除包皮，即使思乡之情强烈，但他们的灵魂因此已得到释放。在他们遭遇不幸之时，上帝来看望他们，他们会说，‘这是上帝的恩赐’，他们因此加入了这一赎罪的宗教。他们认为这片土地更好。”在文件中有对比鲜明的图片，如残暴行为、种族歧视、奴隶们逃亡和起义；见D. 隆巴迪(Lombardi)，1971年，第237页；A.K. 查托帕泰，1977年，第42、45、53页；C. 哥伦布(Colomb)，1873年，第101-102页；H.R. 迪克森(Dickson)，1941年，第502页，关于阿拉伯人对家奴的态度；D.C. 菲利奥特(Philliot)和R.F. 阿祖(Azoo)，1906-1907年，第431，434页，关于哈德拉毛对非洲人的歧视。在内格雷斯群岛下缅甸的勃生河口，印度的圣乔治堡政府建立了一个移民拓殖地，由于主管人“协调不力，违背民意”，致使群情激愤，普遍闹事，无止无休。为开垦土地而输入的卡弗尔奴隶奋起反抗他们的主人，抢夺岛上的船只纷纷逃跑。见M. 西姆斯(Symes)，1800年，第10页。

㉓ 见M. 芬利(Finley)的分析，1976年，第819-821页。

㉔ R.B. 萨金特(Serjeant)，1966年，第28-33页。

㉕ J.L. 伯克哈特(Burckhardt)，1829年，第382页。

㉖ H.R. 迪克森，1941年，第503页。

㉗ 孟买城和岛屿的地名词典，1910年，第2卷，第262页。

㉘ J. 巴斯廷(Bastin)，1965年，第43页。在英属印度王国，根据法律，奴隶主对其财产拥有充分的权力。追回在逃奴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任何人“隐匿逃奴”都是非法的，“如同故意收受窃物”。对潜逃的奴隶要公开惩罚，通常是施行鞭打。当时印度报刊登载许多广告，声明对送回逃奴者给予奖励，并向雇用逃奴者提出警告。见A.K. 查托帕泰，1977年，第57页。在中东，奴隶逃亡事件十分普遍，可以追溯到10世纪的伊拉克。详情见C. 佩拉特(Pellat)，1953年，第233-234页。有关苏门答腊的情况，见J. 巴斯廷，同上，第89页。



图片 28.3 19 世纪东印度的黑人奴仆和阉人与其主人的孩子合影

有趣的是，这些完全不同的海外非洲移民社区组织得很好，并保持着原有各民族的传统。C.S. 赫格隆吉[29]认为，麦加的努比亚人是表面上的伊斯兰教徒，只会说一点阿拉伯语，“他们从星期四下午到星期五清晨像过节一样配着自己的民族音乐唱歌，跳舞，纵情欢乐。 758

[29] C.S. 赫格隆吉，1970 年，第 11-12 页，参见 M.b. 哈希姆(Hashim)，回历 1350 年，第 42-43 页。

这些黑人的每一个社区都有他们自己的谢赫(宗教领袖)，通过他的裁决来解决争端，他身边站着一位叫纳吉布的官员，手持一棒执行判决。”

移居欧洲的非洲人

虽然非洲人移居国外主要是通过奴隶贸易，但是也有不是通过奴隶贸易而是作为自由人进入外部世界的，或者在热带美洲经过一段时期的奴隶生活之后进入崭新的生活阶段。非洲人从中世纪起就开始出现在西欧，但从大约15世纪以后其数量才激增。当时非洲黑人先是作为奴隶，后成为自由人出现在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他们最初是通过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商路到达北非的。后来，在15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海上直接贸易的开通，欧洲的非洲人越来越多。[30]

许多非洲人一开始是奴隶，尤其在葡萄牙。这个国家到大约17世纪中叶一直是欧洲唯一重要的贩奴大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非洲人进入了更广阔的欧洲社会，但他们往往处于社会最底层，因为他们的社会状况和在热带殖民地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洲人相似。他们的法律地位也不明确。总的来说，在北欧地区，法律不再承认奴隶的地位，而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法律却照样承认。从1685年起在法国居住的非洲人获得了自由。在上面提到过的1772年曼斯菲尔德勋爵提出的著名的法案通过后，英国的非洲人也得到了自由。但是，在欧洲列强占有的殖民地，在废除奴隶制以前(1834年在英国殖民地，1848年在法国殖民地，1888年在巴西)，有许多事例说明，那里的奴隶仍然维持其奴隶身份。

尽管非洲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是至少从18世纪中叶起，有相当一部分自由的非洲人出现在西欧。各国的统计数字不同，但到1800年，他们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或英国的人数分别已有数千人，而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在早期阶段，其数量可能更多。与欧洲的总人口相比，非洲人总是少数。但是非洲移民大都集中在主要城市，尤其集中在港口城镇，这样他们看起来比实际的人数要多。[31] 毫无疑问，在1840年代以前的任何时期，在欧洲见到的热带非洲血统的人比在热带非洲的欧洲人要多得多。

759

欧洲的非洲人社区也集中于从事某些职业，尤其是家庭仆役之类，部分原因在于从西印度奴隶制地区来的奴隶继承了他们原先所从事的职业，部分原因也反映出欧洲人喜欢使用外来的奴仆。当时，商船也普遍使用非洲海员，葡萄牙商船使用的非洲人要比法国和英国多。另外一个重要的但人数较少的群体是学生，从18世纪中叶起他们大批抵达欧洲，整个19世纪人数日增。在欧洲和非洲的贸易交往日益增长的时代，非洲商人精通一门西方语言，熟悉一些欧洲会计制度，显然会十分有利。于是许多这样的学生通过设在非洲的欧洲奴隶商办事处来到欧洲，并在他们的照料下在利物浦和南特港这些主要从事奴隶贸易的港口学习。

在欧洲的非洲人社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为男性。这一事实具有

[30] A. C. de C. M. 桑德斯(Saunders)，1982年。

[31] P. D. 柯廷，1967年，尤其见第3-16页；W. 罗德尼(Rodney)，1975年；1980年，着重见第110-152页。

两个重要的含义。这些非洲人社区不能独自发展，它们必须由海外人口不断加以充实。这并不是说非洲人不和欧洲妇女发生性关系，但是其后代就文化上来说倾向于欧洲，而不是非洲。经过几代人以后，非洲人的外表特征逐渐消失，成为欧洲血统的人。

虽然东欧与热带非洲的海上来往甚少，但仍有一些非洲人到达东欧。进入东欧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奴隶贸易。当时这并不是北非的主要贸易，也包括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人，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到达的黎波里等与奥斯曼帝国有联系的港口，或从当今苏丹南部沿着尼罗河到达北部地区。[32] 在少数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地方，直到20世纪仍保存着部分非洲文化，如南斯拉夫至今还保留一个操豪萨语的小社区。

移居西半球的非洲人：19世纪的时代背景

与欧洲和亚洲相比，移居美洲的非洲人数量极大。19世纪初，包括自由人和奴隶在内的美洲黑人估计为850万。其中，200多万人（将近25%）生活在美国。大多数非洲人居住在从特拉华到佛罗里达沿大西洋海滨的所谓“奴隶州”。少数非洲人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北方和内陆各州，尤其是集中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大城市。1810年，大约200万非洲人和美洲黑人生活在加勒比海的安德列斯群岛。100万出头的人住在牙买加的英属加勒比群岛、圣基兹、安提瓜、尼维斯、安吉拉、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和特立尼达。海地以前是圣多明各经济繁荣的法属产糖殖民地，大约有45万非洲人。古巴有40万非洲人，波多黎各有28万，巴西有250万，西属美洲大陆共有约130万。大多数在波多黎各的非洲人是自由人，墨西哥的40万非洲人绝大多数也是自由人。委内瑞拉有40万、哥伦比亚有20万、厄瓜多尔有5万、智利和阿根廷各有3万非洲人，他们大多数也是自由人。[33] **760**

因此，19世纪非洲人和美洲黑人总的情况取决于众多的因素。非白种人人口在社会中所占比例的多少是一个因素，奴隶和自由人的比率是另一个因素。贸易状况，各个殖民地的发展方式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都不时地影响着美洲黑人的经历。美洲各地的黑人经历极不相同，不应把他们在各个殖民地和各个地方的经历看做是单一的和一成不变的。虽然从美国到巴西所实行的社会模式证明是一致的，或者基本类似的，但是在美洲的黑人社会无处不是适应了当地的实际情况。[34]

在美洲的黑人社会和文化，其基本的不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以及作物栽培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而不在于影响美洲社会发展的帝国划定的边界。在整个美洲，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的非洲人，无论奴隶还是自由人，似乎有着较为广泛的接触，他 **761**

---

[32] E.R. 托利达诺(Toledano)，1982年。

[33] 这些人口统计数字经过某些调整，摘引自J.H. 富兰克林(Franklin)，1969年，第120、145-149、171、174、186页；F. 坦南鲍姆(Tannenbaum)，1946年，第8-14页；R. 康拉德(Conrad)，1972年，第283页；J.V. 隆巴迪，1971年，第35页；P.D. 柯廷，1969年，第22页；G. 阿圭雷·德贝尔特伦(Aguirre de Beltran)，1972年，第233-234页；F.P. 鲍泽，1974年，第333页；D.W. 科恩和J.P. 格林，1972年，第4、10、14页。

[34] M. 哈里斯(Harris)，1964年；H. 霍廷克(Hoetink)，1973年；R.B. 托普林(Toplin)(编)，1974年和1981年；P. 维利尔斯(Villiers)，1982年。

们比成群生活在农村种植园里的非洲人有更多的机会提高社会地位，也享有较多的自由。这种论点对传统的帝国区域划分似乎是正确的。除了美国以外，奴隶的寿命比自由社会的寿命要短得多，因此在布拉瓦河（美国称格兰德河）以南地区，所有美洲奴隶社会的非自由人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35]

拉丁美洲人实行奴隶制已有漫长的社会经历，奴隶制的社会影响相应也深远，英属和法属美洲的殖民主义者在这方面无法相比。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除了在伊比利亚边境的经历以外，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巴巴多斯、牙买加、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卡罗莱纳、路易斯安娜和圣多明各等地建立奴隶殖民地以前，他们役使非洲人为奴已有一百多年之久。[36]

但是，在19世纪期间，西半球奴隶制度之间更多的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分类上的根本区别。在所有奴隶制中，奴隶获得解放的现象较为少见，妇女比男子更受益于法律，家庭的完整性仍然十分脆弱，在考虑奴隶地位时肤色和血统是主要因素。

在美洲经历的几个世纪中，美洲黑人的悲惨情况从以下的惊人事实中可见一斑：19世纪初，美洲有850万非洲人和美洲黑人，这个数字几乎肯定少于1600年以后输入美洲的非洲人的总数。[37]

在美洲，最大的非洲奴隶输入国是巴西。在奴隶贸易期间，巴西接受了大约38%运往新大陆的非洲人。由今天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成的地区总共承担了86%的奴隶贸易量，其中36%的奴隶贸易是以加勒比群岛为目的地。但是研究新大陆非洲人的历史不能像把大宗货物运抵美洲那样单纯考虑其贸易总量。通过考察几个世纪以来各不同地区相对而言的参与情况，不难发现他们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各种可能性，是十分有意义的。到19世纪末，由于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时间早晚不同，接受奴隶的数量时多时少，这对于美洲黑人人口的分布和文化形态的形成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762

在1600年以前，美洲无疑是伊比利亚人争霸的范围。因此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运往新大陆的非洲人分为两部分，西班牙拥有大约60%，也就是12.5万多人。[38]这些非洲人的到来有助于维护社会的活力，而新来的欧洲人和非洲人所带来的各种疾病使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大批死亡，特别是墨西哥和秘鲁高地的印第安人。[39]考虑到非洲人在新大陆的晚期历史，有必要指出的是，在16世纪末，非洲人普遍认为他们比当地印第安人优越，他们像西属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对待印第安人既傲慢又屈尊，这是很有趣的现象。[40]

大约有150万非洲人在17世纪来到美洲。其中有41%的非洲人去了巴西，35%去了刚

---

[35] P.D. 柯廷，1969年；S.L. 恩格尔曼(Engerman)和E.D. 吉诺维斯(Genovese)(编)，1975年。

[36] L. 汉克(Hanke)，1970年；M. 克拉汉(Crahan)和F.W. 奈特(Knight)(编)，1979年。

[37] 通过奴隶贸易到美洲的非洲人数估计为350-2500万。P.D. 柯廷1969年提出非洲人流动的全面估计，认为将近1000万人。这一数字根据最新的综合方法（使用1969年以后的大量数据）又有所修改，结果增加了2%-3%。见J.E. 伊尼科里(Inikori)，1976年a；E. 维拉·维拉尔(Vila Vilar)，1977年a，第267-280页；S.L. 恩格尔曼和E.D. 吉诺维斯(编)，1975年，第3-128页；H.A. 格默利(Gemery)和J.S. 霍根多恩(Hogendorn)(编)，1979年，尤其是P.E. 洛夫乔伊(Lovejoy)，1982年。

[38] P.D. 柯廷，1969年；E. 维拉·维拉尔，1973年，1977年b；J. 帕拉西奥斯·普雷西亚多斯，1973年。

[39] W.M. 德内万(Denevan)，1976年；E. 沃尔夫(Wolf)，1959年，第194-196页；C. 吉布森(Gibson)，1967年，第140-159页；A.W. 克劳斯贝(Crosby)，1972年。

[40] J. 洛克哈特(Lockhart)，1968年，第171-198页。

建立不久的英属、荷属和法属殖民地(主要在环加勒比地区),还有22%的人前往西属美洲。此时正是组织完备、高度资本化的横渡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初始时期。每年平均输入率从16世纪的约1800名非洲人增长到1.7万多人。西班牙人参与贩奴活动相对减弱,大陆地区印第安人口有所回升。但是由于巴西东北部产糖区日益扩大以及在东加勒比群岛依靠制糖业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区对劳动力的需求,西班牙在奴隶贸易方面的萧条由此得到了极大的补偿。

到18世纪,非洲人向美洲的迁移达到了高潮。美洲的种植经济和提供人力需求的奴隶贸易也发展到成熟阶段。在1700年到1810年之间,凡来新大陆的非洲人,有一半以上已经到达,其人数也许远远超过600万。就人口统计而言,这个时期很可能是非洲与更广阔的世界互相来往和影响最大的时期,越过印度洋以及同欧洲和美洲之间都建立了贸易联系。

18世纪奴隶进口数额庞大,巴西接纳了其中的31.3%,即180多万非洲人;英属加勒比地区为23.2%,约140万奴隶,其中60万人前往牙买加的主要产糖岛;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接纳了22.3%,即130多万人,将近80万奴隶分配到西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圣多明各的主要种植殖民地。西属非洲输入了9.6%的奴隶,即60多万人,大多去了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加勒比群岛和西斯帕尼奥拉岛东部,南美北部边缘的沿海殖民地以及经普拉塔河流域的秘鲁内陆。归荷兰和丹麦所属的加勒比地区接纳了8%的奴隶,大约45万人;而1776年以前曾作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美国接纳了约5.8%的奴隶,即略少于40万人。[41]

763

表28.1 奴隶的输入情况,1700-1810年

地 区	所有非洲人的大致百分比*	非洲人的大致人数
巴西	31.3	1,800,000
英属加勒比地区	23.2	1,400,000
法属安的列斯群岛	22.3	1,300,000
西属美洲	9.6	600,000
荷属和丹麦属安的列斯群岛	8.0	450,000
英属北美——美国	5.8	350,000
总数		5,900,000

* 为舍入整数,百分比的总和并非100%。

可见,18世纪是新大陆种植业奴隶社会发展的最佳时期。典型的例子是1790年以后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出产白糖、靛蓝、咖啡和香料的种植园,以及美国南部和西部稻米和棉花种植园迅速发展。在这段时期,美洲由于农业革命而日趋兴旺发达,地方出口经济得以发展,并十分稳定。[42] 此外,在18世纪末,当地的社会就已达到稳定、自信和成熟阶段,从

[41] 这些数字来源于P.D.柯廷(1969年、1976年)出版物中提供的数字,经过修订。
[42] R.戴维斯,1973年。

而影响了 19 世纪末人们的态度和生活方式。这种态度形成了以后美洲人对移民的接纳或排斥态度的模式，最终形成当地社会所有的群体的固定形象。当欧洲人在美洲殖民地以自由的名义脱离大都市时，他们忙于更为严格地限制非白种人的自由、愿望和正当的权利，而这并不令人惊讶。自 18 世纪起，新大陆的非洲人开始经历遭受压制和剥削最为悲惨的苦难时期。[43]

764

废除奴隶制时期

然而，到 1810 年，废奴运动的潮流使美洲奴隶制社会开始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奴隶制内外结构渐渐瓦解。美洲白人在内部事务中要求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上的切身利益、追求人道主义、与帝国的不相容、受奴役的奴隶们对自由不可遏制的渴望，所有这些因素最后摧毁了美洲的奴隶制度。[44]1776 年后美国政治独立，1804 年后海地独立，1825 年后西属殖民地独立，1822 年后巴西独立，这些都使奴隶制的政治范围和奴隶贸易发生改变，并在每一个帝国、每一个殖民地和州的狭隘边界以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英国在 1783 年丧失了它在北美的殖民地，1808 年终止了奴隶贸易。这两件事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奴隶制和非洲人。最大和最有效益的英国奴隶供应商从市场上消失，然后开始发动一个广泛的运动以期说服其它欧洲国家效仿它的榜样。19 世纪期间，英国的废奴运动极大地削减了运往美洲去的非洲人数量，尽管其总数仍很大。在 1870 年奴隶贸易废止以前，其规模恢复到其第一个世纪所常有的那种规模。[45]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又一次成为主要的奴隶输入地。在这个时期到达新大陆的近 200 万非洲人中，有 110 万(约占 60%)运往巴西，60 多万(约占 31.9%)运往西属安的列斯群岛，其中较大部分的非洲人到了古巴，其余的非洲人到法属加勒比地区，少量的进入美国。

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和非洲人的迁移，满足了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得以开发新开辟地区的农业，并给在非洲大陆的非洲人提供生活条件。[46]因此大多数非洲人进入了美洲大陆的农业种植地区。

但是由于美洲各地种植区的情况不同，在各种社会力量中，非洲人和他们的后裔也形成了自身各具特点的美洲文化。因此，在美洲各地，这种文化上的混合体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765

这当然可以从对香戈(信仰同化祭礼)崇拜发生的变化中看出，香戈也许是新大陆最广为流行的非洲宗教形式。[47] 人们从未怀疑过尼日利亚人，更确切地说约鲁巴人的起源，而香戈崇拜从古巴到特立尼达、海地以及巴西，其形态差异极大。尤其在古巴，这种崇拜在很

---

[43] F.W. 奈特，1974 年；R.B. 托普林(编)，1974 年。

[44] I. 柏林和 R. 霍夫曼(编)，1983 年。

[45] H. 霍廷克，1979 年，第 20-40 页。

[46] H.S. 克莱恩(Klein)(编)，1978 年，第 239-245 页；S. 迈尔斯(Miers)和 I. 科比托夫(Kopytoff)(编)，1977 年，第 3-78 页。

[47] W.R. 巴斯科姆(Bascom)，1972 年；R.G. 汉密尔顿(Hamilton)，1970 年，第 356-373 页；M. 舒勒(Schuler)，1980 年，第 30-40 页；G.E. 辛普森(Simpson)，1978 年，第 75-82 页，190-192 页。

大程度上已天主教化了，而原先是非洲男性香戈崇拜后来成为女性的崇拜。另一方面，其它祭祀仪式以及信条已经更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改变。在其它社区生活和组织方面也有类似香戈祭礼的情况。对克里奥尔非洲人来说，由于19世纪时社会结构的发展趋于稳定，他们在人数上虽然不算少，但要在新大陆维持原有的社会形态变得日益困难，因为他们不得不融入这个社会，成为其中一部分，并做出必要的改变，以适应社会。

19世纪非洲人来到新大陆这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意味着正当他们影响着文化交流的格局时，他们自己也受到了因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非洲、美洲和欧洲的活动引起的深刻变化的巨大影响。这些变化自然又反过来影响着这三个地区的文化，形成了每个地区各具明显差异的特殊文化。[48]

当然，这一事实一方面是由于新来的非洲人对于他们的处境不知所措。在加勒比地区，非洲人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不言而喻均为黑人。而在美国，黑人却表明他们是全国人口中的少数民族，尽管他们一直聚集在个别的州中。又如在厄瓜多尔、智利和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里，从遗传的角度讲，黑人实际上已从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群体中消失，这表明发生了一种广泛的生物混合。[49]

上述地区人口分布的演化与相对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人数，在逻辑上并不一致。美洲社会中的非洲人并不一定与几个世纪以来输入的非洲人比例相符。例如，巴西在奴隶贸易期间输入大约400万奴隶，正如上面提到的，这个数字大约是横渡大西洋奴隶贸易的 **766** 38%。[50] 在1890年奴隶制废止时，巴西大约有400万非洲人，占当地巴西人口的33%，占西半球的美洲黑人总人数的约36%。加勒比地区输入了约500万奴隶，占奴隶贸易的43%，到1886年，古巴这个加勒比海岛屿中最后一个取消奴隶制的地区，当时非洲人仅300万。这些非洲人平均约占当地区域性人口的60%，占西半球美洲黑入人数的80%。美国从贸易中接纳了约50万黑奴，约占总数的4.5%，但到1865年奴隶制终结时，那里有非洲人约450万。这个数字仅占当地人口的7%，但在西半球的美洲黑人总数中却占40.5%。

表28.2 奴隶的输入和19世纪的入口情况

地区	奴隶（百万）	占贸易的百分比	美洲黑人人数（百万）	占人口的百分比	
				当地	西半球
巴西	4.0	38.0	4.0(1890)	33.0	36.0
加勒比地区	5.0	43.0	2.2(1886)	60.0	18.0
美国	0.5	4.5	4.5(1865)	7.0	40.0

表28.2中的数字清楚地表明，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时期，区域内黑人在人口发展的能力方面，变化显著。总的来说，除美国外，美洲的非洲人口不是停滞发展就是未能实现自

[48] H.L. 夏皮罗(Shapiro)，1953年。
[49] G.F. 安德鲁斯(Andrews)，1980年。
[50] 根据P.D. 柯廷关于奴隶输入的数字，1969年；美洲黑人的人口数字引自D.W. 科恩和J.P. 格林(编)，1972年，第4-14页。

然增长。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奴隶人数以每年2%到4%的令人惊讶的比率下降。结果是，到奴隶制废止时奴隶的总人数大大少于输入到各殖民地的奴隶总数。下降的人数靠自由人正常的健康增长无法弥补。

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总模式。在18世纪期间，牙买加输入了60多万奴隶。到1838年奴隶制废除时，奴隶人口不到25万，而黑人总数不到35万。圣多明各在18世纪进口了80多万奴隶，但是在1790年革命前夕，奴隶人数仅余48万，而非白种人的总数为50万。从1810年到1870年古巴输入了约60万非洲奴隶。1810年，古巴的非白种自由民约11.4万。到1880年，奴隶人口估计仅为20万人，而非白种自由民略多于26.9万人。

767

美洲奴隶人数(除美国以外)的急剧下降是对奴隶制的最严厉的控诉。这种制度既不能造就内在可行的和自我再生的社会，也不能提供有效和可靠的劳力。此外，由于奴隶制使得在美洲的非洲人永远没有能力在他们处于少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进行有效的竞争。

非洲的影响

当美洲的奴隶制度在19世纪解体时，美洲各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社会态度已经形成。总的来说，美洲社会对非洲人和非洲文化持敌视态度。

但是，非洲对美洲社会的许多方面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外表性状、语言、音乐、宗教、饮食、艺术、农业和建筑等诸多领域都有影响。在有些方面，非洲的影响很强，也很普遍，由此形成的美洲黑人文化足以与欧洲文化抗衡，有时竟相互补充。

在美国，政治结构对黑人和白人实行严格的划分，把有非洲血统的人统统划归黑人人口范畴。[51]面相比之下，在西半球其它地区则普遍实行着三个层次的社会划分，以适应黑人、混血种人和白人这三大群体的情况。在大多数社会中，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少数白人给予人数明显占优势的非洲人以机会，使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得以在社会其它方面施加影响。

在这三个层次的结构中，每一个层次均有一套法律权利和社会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是根据其财富、肤色和职业而定的。在巴西的产糖区和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区，在加勒比地区，以及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的低地，奴隶和有色人种自由民的权利往往被限制在与对其劳动力总需求成正比的范围内。在巴西东南部、波多黎各、古巴东部和委内瑞拉、阿根廷的内陆省的咖啡种植区、牧区和捕鱼地区，其社会流动性较大，各社会之间的距离较小，与种植地区相比，其内部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区别也较为松散。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圣保罗、加拉加斯、哈瓦那、韦拉克鲁兹、普埃布拉和墨西哥城等城市，非洲人享有相当大的自由，经常在某些职业上同社会上其他自由人竞争。这样的社会排列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美洲黑人和其他居民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起决定作用。

768

奴隶制存在时，大多数非洲人和美洲黑人不是干农活就是当家庭仆役。然而约有20%的非洲人当水手、医士、工匠、赶骡人、保姆、奶妈、商人、财主(包括奴隶在内的财产)、

[51] L.福纳(Foner)，1970年；W.乔丹(Jordan)，1968年；P.梅森(Mason)，1970年。

店主、采矿和榨糖行家，以及卖鱼、卖调味品和粮食的小贩。在18世纪后期爱德华·朗曾抱怨说，在牙买加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落到这一部分人的手里，而且他们垄断了陆路和沿海的运输系统。[52]

虽然在奴隶制废除后加勒比地区非洲血统的农民数量急剧增长，但情况并未有多大变化。在奴隶制期间和奴隶制以后，职业和生物遗传因素确实加强了阶级和等级的变动。当种族标准具有更强烈的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物遗传因素时，个人或家庭可以走向外界，由奴隶变为自由人，或由自由的黑人变为姆拉托(尤其在巴西或西属美洲)，或从姆拉托变为白人(这是一种例外，需要花大笔钱)。到18世纪后期，一些西属美洲的种植园主和商人由于怀疑他们的等级地位，从皇家政府那里买来称为纯血统鉴定的证书，以证明他们至少在前四代中没有摩尔人或犹太人的血统。但是社会内部的变动和总的生活水平最终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取决于人口统计、经济、法律、社会和政治哲学及文化多元性诸因素。社会越是不稳定、不成熟，非洲人和美洲黑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越大，他们为自己和后代争取地位的愿望也越大。

在无处求助的地方，非洲人和美洲黑人便对所在地的环境进行调整，以求适应。在文化共生环境方面，非洲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他们从社会中索取的几乎同样多。正如前法属加勒比群岛东部的方言土语(patois)以及前荷属安的列斯的帕比阿门托(papiamento)语所说的那样，他们需要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少，这促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创造精神。例如，在牙买加、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圣多明各等许多新开发的殖民地，创造精神显得尤其必要，因为那里欧洲人数很少，他们生活在众多非洲人中间。在这些地区欧洲人未能组成一个重要的群体，非洲人则不得不由乌合之众组成一个社会，他们除肤色和奴性相同之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非非洲人对非洲人的风俗习惯能采纳多少可表明他们成功的程度。 769

非洲人并不总是能适应他们进入的社会。若干世纪以来，马隆人，即奴隶制度下的逃亡奴隶，始终是奴隶制的伴生现象。[53] 在巴西的东北部建立的帕尔马里斯逃奴堡，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到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大举进攻才被消灭。在厄瓜多尔的埃斯梅拉尔达斯以及牙买加蓝山的一些地区和在科克皮特地区，马隆人城镇也存在了同样长的时期。逃奴现象不仅表明非洲人渴望自由，而且也是他们行动上对非洲奴隶制的谴责。

当非洲奴隶制在美洲废止时，非洲人的情况比一个世纪以前显著恶化。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进行了政治和经济的重建活动，随之而来的是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排斥非白种人，对他们实行法律上的岐视，其特点是，设置各种种族隔离的机构，私刑拷打，以及公开的种族主义的协会和组织，这些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54] 当时美国黑人总的情况不亚于今天黑人在南非遭受极端种族主义之苦的情况。

在美国，黑人是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较为软弱无力。对比之下海地于1789年革命后由黑人控制了国家。在整个19世纪，非洲文化复兴运动成为这个贫穷、孤立的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凝聚力，尤其从能融合各种宗教信仰的"伏都"(vodun)教的活动可资说明。在其它地

[52] E. 朗(Long)，1774年。
[53] Y. 德巴什(Debbasch)，1961-1962年；M. 舒勒，1970年；R. 普赖斯(Price)，1973年。
[54] G. 迈达尔(Myrdal)，1944年。

方，例如在古巴、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巴西等地，有一小部分美洲黑人取得了显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1868-1898年之间，在古巴进行的那场长期而艰难困苦的战争中，古巴黑人安东尼奥·马塞奥和马克西莫·戈麦斯为争取政治独立而战，成为民族英雄和国际知名人士。但是迟至1912年，古巴一直经历一场主要的种族战争，直到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对古巴非洲人的敌对行为才停止。



图片28.4 圣多明各革命领袖和海地独立之父杜桑·卢维杜尔

19世纪期间，美洲黑人，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十分突出的。尽管非洲和美洲大相径庭，在法律和社会上受到严重的限制，在经济上极为不利，美洲的白种人

不断对抗，但非洲人在美洲仍创建了一些成功的社区。他们建立了安提瓜和牙买加的米科学院和巴巴多斯的科德林顿学院等教育机构，还在美国建立了许多学院，例如弗吉尼亚联 770 合大学(1864 年)，亚特兰大大学和菲斯克大学(1865 年)，以及汉普顿学院和霍华德大学(1867 年)。美国黑人在美国的技术革新方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马里兰州的本杰明·班尼 771 克尔是位数学家和年鉴出版商，他协助测绘了哥伦比亚特区。在 1835 年到 1836 年间，马里兰州的奴隶亨利·布莱尔获得了两项谷物收割机的专利权。在 1850 年代，美国南方联盟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的奴隶本杰明·蒙哥马利发明了船上使用的螺旋桨。在新奥尔良出生并在巴黎受过教育的诺伯特·里勒在 1846 年发明了真空脱水盘，大大促进了炼糖过程。1852 年，伊莱贾·麦科伊发明了机器运转过程中起润滑作用的杯状物。出生在荷属圭亚那的詹·马泽里杰发明了持久耐用的机械，对英格兰地区的制鞋业进行了彻底的革新。来自特斯基吉学院的农业化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发明了三百多种花生产品，从而振兴了美国南部许多地区的农业经济。[59]

对于被放逐的非洲人来说，移居海外是极其严酷而困难的。这些非洲人被迫远离家园，人地生疏，身受奴役，经常遇到敌视者，但他们却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坚忍不拔、极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因而最终成为大多数美洲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内战和世界战争，经历繁荣和萧条，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变迁，非洲人工作、战斗，最后在美洲以及欧洲的几个国家中定居下来。

海外移民与非洲

但是，非洲问题一直是一个经常性的主题，美洲的白种人和黑种人对此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认真思考。在美国，遣返非洲人的想法在 18 世纪时不断被提出来。最值得注意的是 1777 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立法委员会上提出的一份报告。但是遣返工作是在 1815 年后才真正开始，当时保罗·卡夫带领 38 个非洲黑人回到非洲。到 1830 年，利比里亚成为被遣返非洲人的聚居地。他们以前大都是奴隶，由美洲殖民化协会主持，得到联邦和许多州政府财政上的资助。到 1860 年，大约只有 15,000 名移民回到非洲。美国南北战争后，尽管美国黑人在美国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但遣返回非洲的移民还不足 2000 名。

遣返的非洲移民还有另外两个来源。首先是 19 世纪期间来自没收的贩奴船上的马隆人和非洲人，数目不详，由英国人把他们运回非洲，因为英国热心于结束奴隶贸易，而以“合法”贸易取而代之。第二个来源是，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南部各州为数很少的传教士，他 772 们主要是摩拉维亚教派和长老会招聘的，以协助在西非传播基督福音。最突出的事例也许是 19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加纳阿夸皮姆山区的巴塞尔传教机构，1843 年他们决定用牙买加人来取代德国和瑞士的传教士，因为他们在当地死亡率太高，无法有效地传播福音。

来到新大陆的非洲人数以百万计，而他们的后裔回到非洲的仅有数千人。[60] 有很多理由

---

[59] J.H. 富兰克林，1969 年，第 197 页。
[60] T. 希克(Shick)，1980 年。

可以解释这一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资助以建立以前那种运输系统，当时的运输系统曾协助非洲人往西横跨大西洋的流动。19世纪的遣返活动并未给欧洲人或非欧洲人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到1900年，非洲和美洲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非洲人后裔卷入自我意识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畏惧和憎恨外国人的民族主义，这几乎破坏了人们对非洲的好感。此外，奴隶贸易废止以后，对非洲的兴趣往往来自对权力和财富的民族欲望，而美洲黑人既无政治权力，也无财富，他们不能激发自己的兴趣，也无力影响那些把非洲瓜分为殖民地势力范围的人。美洲黑人开始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于他们自身活动范围的新发展。他们关心内部和区域之间的迁移，追求一种美好的生活，抵制那些新的不利的挑战，非洲人之间的联系中断了，但并未消失。个别人再次发起了返回非洲的运动，他们不时以新的号召来为这个运动注入活力。1897年，住在伦敦的特立尼达出生的律师亨利·西尔威斯特·威廉斯成立了泛非协会，后来乔治·帕德莫尔、克瓦米·恩克鲁玛和C.L.R.詹姆斯都曾是该协会的会员。在20世纪20年代，马库斯·加维成立了世界黑人革新协会，这是一个促进非洲非殖民化和团结全球非洲人的运动。加维的这个组织在加拿大、美国、加勒比地区、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有分会。[50] 到1927年加维的组织解散时，非洲问题，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问题在世界事务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朱锡炎译）

---

[50] T.马丁(Martin)，1976年；E.D.克罗农(Cronon)，1962年；R.A.希尔(Hill)(编)，1983年。

29 结束语：欧洲征服前夕的非洲

J.F.A. 阿贾伊

引 言

本卷最后一章旨在概述19世纪70年代初非洲历史演变的主要趋势，尤其是1875-1885 **773** 年欧洲对非洲领土的争夺达到高潮的10年，这期间召开了柏林西非会议，分割并最后征服了非洲。纵观欧洲征服非洲前夕的局势，尽管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国家、民族和政治形态，其发展趋势似乎纷呈不一，但仍可看出占主导的趋势。这就是非洲领导人决心加强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以保卫非洲的领土和利益。但是他们的努力由于欧州人的到来而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并最终夭折。

从本卷的各章中可以看出，19世纪是非洲迅速变化而有时又处于十分矛盾的时期。到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最深远和最广泛的变化均源于其内部因素。其它变化则深受欧洲人在沿海地区的商业、传教或领事活动的影响，尤其是在1850年以后这些活动日益向内陆渗透。有些变革运动，例如某些统治者试图统一埃塞俄比亚，并对它进行机构改革，其影响是局部的。其它变化，如埃及野心勃勃的赫迪夫在尼罗河流域的活动，在整个地区引起极大的反响。姆菲卡尼运动起初只是地方性的，后来很快波及整个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的一部分，甚至在欧洲人征服非洲的前夕，上述地区的历史仍主要是由该运动产生并深受影响的这些国家的历史。[1]

伊斯兰教改革的圣战运动覆盖西非的整个苏丹地区、撒哈拉以东直到昔兰尼卡，又向 **774** 南延伸到森林地区的边缘，其影响远至塞内冈比亚、沃尔特地区、南曼丁卡、北约鲁巴和讲埃多语的民族地区。由于欧洲人对棕榈油、花生、象牙、西沙尔麻和橡胶需求量的增长，以及为满足这些需求而形成的内陆长途贸易路线网，致使贸易成为获得武器和财富的主要因素，也成为非洲广大地区诸国兴衰的重要因素。由于欧洲人贸易的日益扩大以及欧美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开展，基督教教义和欧洲人关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观念，也成为促进从塞拉利昂直到南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这一广阔地区变化的因素。

在这些不同的运动中，最突出的是19世纪非洲领导人在各个不同地区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有些改革是由于受到非洲文化遗产的激励，另外一些改革则是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改革

[1] 见本卷第10章。

思想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领导人只是直接利用贸易范围的扩大和欧洲人的活动所提供的机会，不管他们是商人还是传教士，也不管是捕获猎物的猎人还是获取特许状的猎手。另一个同样突出的特点是，非洲领导人所作的这些改革努力遭到非洲领导人试图利用的欧洲商人、传教士和猎人们的这些活动的系统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这一特点至今一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非洲内部的改革努力一直遭到外来干涉的系统破坏。由于受到关于殖民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是现代化必要条件这一论断的影响，大多数历史学家未能注意到19世纪非洲人对自身的发展作出多大的努力，而欧洲人的征服以及殖民主义的统治又在多大程度上对这种努力进行了破坏和颠覆。

政治结构

这种自身发展的努力在政治结构和国家政权领域中也许最引人注目。西非和中非长期以来所理解的，以及19世纪东非所吸取的奴录贸易时期的深刻教训，就是求得生存，甚至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国家政权的政治结构和军事基础。

在19世纪初期，正如我们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所注意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似乎都有某种程度的脆弱性。在国家制度的各个领域呈现出连续不断的更迭，行政中心的兴衰也如此。”[②]国家对人民实行保护，但又在效忠纳贡和服兵役等方面对人民提出起码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围绕着往往超越国家疆界的亲属关系、宗教、司法以及经济结构运转。只有在马格里布和埃及，因实行了几个世纪的伊斯兰法律，产生了相当持久的政治结构。非洲其它地方，在19世纪只有投入巨大的力量才能产生新的，有可能延续较长时间的政治结构。在由此而引起的激烈的政治抗衡中，有些努力无疑起了反作用，在有些地方，首先看到的是帝国的解体和政权的分散，甚至四分五裂。K. 阿欣和J. 基-泽博是这样描述沃尔特地区的：

> 在19世纪，政治上的不稳定和人口的移动是普遍现象。那些代表政权的人……领导进行野蛮的大屠杀和分离主义运动。虽然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但是这些冲突不断增加，其范围也在扩大社会越来越混乱，这无疑给周边的政权以及叛乱者日益造成机会，使他们获得武器，并使用武器向占统治地位的首领们发起挑战。[③]

这种趋势的典型例子是姆非卡尼最初的影响，以及贸易和乔奎人及奥文本杜人的扩张对卢巴和隆达国家制度的影响。[④]若干国家和帝国消失了。但是更引人注意的是，许多新的权力中心涌现出来，试行新的管理制度。新制度通常使统治者更有效地行使权力，管辖界限更为明确，对靠恩宠而不是靠其世袭权利而升官的官员们控制更严，同时还改进了税收制度等等。[⑤]

---

② 见本卷第1章，第5页。
③ 见本卷第25章，第684-685页。
④ 见本卷第4、5、11章。
⑤ 见T.C. 麦卡斯基（McCaskie），1980年。

有些历史学家把这些改革运动称做是非洲“原始民族主义者和帝国创建者”所进行的一种争夺非洲的活动。这种争夺在某种程度上激起（或者至少有助于解释）欧洲人在非洲的争夺活动。[6] 事实上，这些改革活动与欧洲人在非洲的争夺相比，绝非一种突发或完成的运动。19 世纪一直在进行着实现更加稳定的政治结构的改革，而在这以前，这类改革确实是各民族总变革的一部分。也许变革的步伐加快了，而且这类变革和 17 世纪旧奥约或 18 世纪阿散蒂、达荷美、富塔贾隆、富塔托罗和邦杜等国家的兴起有关。到 19 世纪变革更为普 776 遍了。当然似乎还更加坚定地努力在得到新的军事、社会和经济体系维持得更为持久的结构中使政治改革制度化。

在 18 世纪幸存下来的主要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没进行过内部的重要改革。这是由于激烈的政治对抗，以及要求控制扩大的贸易范围创造了新的挑战机遇。因此，每一个国家要么试图在牺牲邻国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和扩张，要么面临解体和四分五裂。很少有国家像贝宁那样仅仅在领土面积上缩小一些而幸存下来。[7] 大多数国家像阿散蒂、达荷美和布干达那样，依靠不断维持甚至大大提高统治者的效率，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其部属势力，从部属那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垄断主要的经济和战略资源；建立一种由统治者直接任命、提升、惩戒的官员等级制度；通过建立和控制一支常备军来维持政权，指挥常备军的军官依附统治者。这些真正的革命有时并不是通过明显的政治体制变革而实现的，有时又像博尔诺那样，必须通过改朝换代才能成功。[8] 时常通过妥协来指定“新人”以替代旧首领，用新的官僚方式来履行职责，或者新职位带上某种传统旧职衔的味道。

姆菲卡尼运动将恰卡彻底改革后的北恩古尼国家作为一种新典型广泛传播。这个新国家基本上采用年龄等级制度来建立实际上的常备军。这包括广泛征募青年人入伍，招揽妇女作为他们的妻子，他们统统归国王所有。国王拥有一切资源，包括牲畜和农产品，用以维持军队和日益扩大的宫廷开销。其中还涉及把被征服民族的文化纳入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并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崭新的观念。[9] 统治者的人品和统治集团的素质似乎仍然比国家结构更为重要，而国家经常被王室的家族世仇弄得四分五裂。但是毫无疑问，除初期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之外，姆菲卡尼成功地建立了几个较大的、效率较高也更为强大的国家，其政治结构比以前的国家更为持久。这些新国家也有比较明确的边界，仅仅因为它们对被统治的国家提出要求，其管辖范围的大小或界限要明确。统治者还可能利 777 用他在不同宗教信仰中的领导地位，但后来他已不仅仅是主持宗教仪式的领袖。作为国家机器的有效的行政首脑，他在管理、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才能，比亲属关系网和宗教礼仪上的联系更为重要，虽然在有的情况下，此种关系网作为合法的思想体系和正统的来源仍是重要的。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其改革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国家或强化已有的国家制度，而是使一个古老的国家新生，恢复由基督教徒统治的古老的科普特王国。这个王国在穆斯林奥

---

[6] 见 R. 鲁宾逊(Robinson)，1985 年。
[7] 见本卷第 26 章。
[8] 见本卷第 22 章。
[9] 见本卷第 5 章。

罗莫和欧洲基督教徒的压力下已经分裂成为几个互相对抗的酋长国。这场纷争是由于某个争雄者主张维护国王的权力，重新建立与教会的联盟，对其进行改革和装备，并且利用这一政权把其它敌对国家（不管是基督教还是穆斯林）置于皇帝的管辖之下。帝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与争雄者势均力敌的局面并未给特沃德罗斯二世和约翰尼斯四世为建立一个新生的国家留下多大活动的余地。而新结构的建立在获得军事上的优势以前是不可能开始的。这两位皇帝相继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复兴了民族意识，但还不足以垄断经济或战略资源，或完全抑制其附属国想要勾结北方的敌人埃及或从海岸而来的欧洲侵略者的野心。[10]

埃及的赫迪夫力图巩固他们的统治，同样有一种怀旧的因素，他们极力加强国家的世袭君主政体，并把埃及的势力扩展到尼罗河流域，复兴或至少恢复与法老时期或法蒂玛哈里发时期的埃及不相上下的古代辉煌。穆罕默德·阿里的目的是大批杀掉或毁灭马木路克，建立新的官员和委员会的等级制度，改革农业，重新分配土地以便于统治者加强对土地和农业的控制，榨取更多的剩余财富，用以筹措更多的资金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经济；维持一支经过改造的军队，并向奥斯曼帝国买回自治权。

赫迪夫伊斯梅尔恢复和发扬了这种改革精神，雇用欧洲人来监督废奴法令的实施和苏丹的商业活动，完成对苏伊士运河的开挖工作，兴修其它运河、灌溉工程、铁路和通讯系统等。他的目的是在奥斯曼霸主权限的范围内购买欧洲技术，以实现埃及政治结构和体制的现代化。欧洲列强曾利用这种霸主权力对其强加不平等条约，以维护他们在埃及的利益。[11]

778 圣战运动的目的显然是重建传统的哈里发时代的正统伊斯兰教政体。更具体地说，是为了在穆斯林和传统主义者所统治的传统社会中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所选择的统治者需学识渊博、虔诚，能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法律治国，并献身于建立真正的伊斯兰体制。到 19 世纪 70 年代，索科托创始人的继承者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在哈里发的全面监督下，各地的埃米尔其政治结构确实比他们取而代之的豪萨统治者治理的时间长。诚然，在许多方面，伊斯兰统治者和依附他们的贵族阶级重新接受了许多豪萨贵族以及领地所有者和商业巨富的特权。但是，哈里发国享有相对的和平秩序，关注市场、工业、工艺和贸易线路，法官和其他官员拥有权力，埃米尔对下属官员实行管制，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国家在更高层次上行使权力。

塞库·艾哈迈杜在马西纳并入索科托帝国不久就继承了哈吉吉·奥马尔·塔尔的王位。他不得不和王朝内部的对手以及法国人的敌对行动进行斗争。这进一步激励了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尽管有这些困难和限制，帝国还是制定了完整的国家结构、法律原则和行政管理机构，把地域辽阔的帝国中的各个民族统一起来。除了国家结构以外，提加尼教派提出一种信念和生活方式，对于统一和忠诚于统治者起到了促进作用。丁圭拉耶革命的榜样鼓励了许多宗教领袖把圣战推进到其它地区，任用那些向往建立伊斯兰神权政治的神职人员来取代有世俗观念的穆斯林和传统主义者。这样，四分五裂的乔洛夫帝国以及卡约

[10] 见本卷第 15 章。见上述 R. A. 考尔克(Caulk)，1972 年。
[11] 见本卷第 13 章。

尔和沃洛夫等国都处在神职人员的统治下，并将伊斯兰教作为改革因素扩展到塞内冈比亚。在穆斯林处于少数派的南曼丁卡，有经商背景的乔拉（迪尤拉）武士萨摩里·杜尔试图用伊斯兰教来统一各族人民，不管他们以前是穆斯林还是传统主义者。[12]我们看到在努佩和伊洛林，伊斯兰教起着同样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把伊斯兰教同该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融合起来，不仅把一个实行传统礼仪的王权国家改变成为行政上由神权统治的国家，而且将皈依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因素，加速在非穆斯林民族中的扩张。

基督教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向居住在弗里敦和附近村庄的不同民族提供了一种得以建立一个克里奥尔社会的文化体制，就像在利比里亚沿岸的各个拓居点，或在利伯维尔、弗里尔顿和其它取得自由的奴隶的殖民地一样。在不同的地方，物色信教者的传教士往往都受到非洲统治者的欢迎。这些统治者虽然唯恐失去他们的独立性，不愿意让其人民皈依基督教，但他们把传教士的活动看做是可能接受欧洲教育的途径，通过这种教育可读书识字，学 779 会各种技能，如木匠和印刷技术，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学会制造枪支和火药。马达加斯加的统治者先是试图在英国新教徒和法国天主教徒之间保持平衡，然后对二者均采取排斥态度，并设法阻止他们的宗教活动，结果天主教在一些省份取得显著进展，王亲贵族则成了新教徒。统治者试图在外交、司法改革、军队整编和建立君主立宪制方面采用欧洲人的思想。[13]同样地，像莫舒舒的王国巴苏陀等一批南部非洲的新国家，由于处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包围之中，它们接纳传教士作为顾问和外来的捍卫者，保护他们，甚至颁布法律帮助他们进行宗教皈依工作。[14]在黄金海岸的芳蒂族各邦以及其它重要的传教中心，尤其在约鲁巴兰西南部的阿贝奥库塔，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领导人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和与欧洲的联系，对传统的国家结构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建立驻外使领馆，由有文化知识的非洲人来管理，以掌管与欧洲人的外交往来，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改革税收制度，采用调节税以取代原有的捐税和纳贡；改进司法制度，采用档案记录，并把颁布的法律写成文字。[15]

军事体制

政治结构持续时间的长短最终取决于军事力量，尤其在19世纪更是如此，迄今为止，血亲关系和个人崇拜也许比军事体制更起作用。只要大多数士兵是从民众中征募而来，当受到外来攻击时，在旱季的短暂时期(两个正常农作物周期之间)，他们会自带武器和干粮为保卫家乡而战，军队对于与邻邦的关系比之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更为重要。招兵主要依靠统治者的政治敏感，而统治者很少能够对此完全控制。骑兵部队的出现使得军队里有了精英，而且通常也反映了贵族集团的出现。他们和统治者共同享有各种资源，能购买和装备马匹，征募和维持骑兵以及骑兵部队。

现在十分清楚的是，到19世纪中叶，有枪管的滑膛枪或各种不同类型的商用枪支、丹 780

---

⑫ 见本卷第24章。
⑬ 见本卷第16章。
⑭ 见本卷第7章。
⑮ 见A. 帕林德-劳（Pallinder Law），1974年；另见本卷第3章。

麦枪支，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当地土造的，对非洲国家的政治结构都起不了多大影响。当枪支掌握在训练有素的士兵手中来对付不会使用枪支的人民时，可能会暂时取得成功，例如1840年代苏丹南部的埃及士兵那样。但是，火器敌不过使用长矛或毒箭的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骑手们抵挡住第一批子弹后，不等枪手重新装填子弹，就冲到他们跟前。恰卡兵团训练有素的士兵用短柄刺矛，就显示出这种优越性。阿贝奥库塔的埃格巴战士们拥有包括火炮在内的欧洲武器，他们用这些武器抵御了达荷美人的入侵，但在1860年代却敌不过主要用土造武器作战的训练精良的伊巴丹士兵。同样，特沃德罗斯使用突然袭击的战术和部队的轻装强行军，战胜了那些拥有滑膛枪火力优势的士兵。[16]

19世纪战争中的主要变革是出现了职业军人。政治对手间的激烈斗争以及频繁的战争使得某些人不同程度地长期处于武装状态，于是职业军人作为社会的正常部分应运而生。在通常情况下，常规军的规模不大。战争是一种冒险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以获取政权和控制经济资源为特点的冒险行为。军人往往是一个冒险家，他靠经商积累了一些财富，因而能够吸引一些追随者，或通过征募和俘获奴隶在他的私人武装中服役。他依靠这支武装在谋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同时获得个人利益，无论是独立的还是作为国家可以使用的部分资源。如果一切顺利，他就能获得某个官职，并利用其官职使自己和一种政治体系结合起来。比如像莫舒舒这样的执政者，本人就是个最成功的冒险家，他积累了必要的资源，把食客和应召者组织成军队，迫使其他小冒险家除接受他的合并条件之外别无其它选择。[17]

恰卡树立了作为战争领袖的国王形象。他亲手建立了同龄人军团，组织他们进行战术和军纪方面的训练，提供职业军人所需的给养和装备。他重新设计了作战的武器装备，并靠当地来生产这些装备。军队成了国家的核心。有不少军官脱离他时，带走了他麾下的一部分军队，流窜在广阔的领土上。而恰卡则招募更多的追随者，劫掠牲畜和妇女，最后还利用军队把他的统治强加给各个地区的人民，以此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些职业军人的主要有利条件不在于他们的武器，而在于他们的军纪、训练有素以及给养。即使他们不得不在野外生活，他们也能组织物资的调拨，而不靠掠夺为生。19世纪非洲这些最有成效的常规军，就是依靠本地资源进行训练、装备以及物色将领的。这与那些只想在军服、兵营生活、军训和军衔方面一味模仿欧洲军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以马达加斯加为例，其军事改革竟然发展到可以购买军衔的地步，而且还仿照19世纪初欧洲军队的某些做法。

781

由于欧洲军队的有力榜样，欧洲生产的滑膛枪在非洲得以广泛使用。许多新式军队开始采用这种枪支，有的人使用滑膛枪是由于它火力强（如埃菲尔德式步枪），另外的人使用是由于它能发生出噪声，一排滑膛枪手足以打乱来犯骑兵的阵脚。许多非洲统治者喜欢大炮和炮兵。但是，由于大炮笨重，所需火药数量很大，因此统治者设法在本地制造，可惜成效不大。1870年代开始进口更为先进的枪炮，如后膛枪、连发手枪、机枪和大炮，最后发展到输入欧洲人极力垄断的马克沁机枪。有些非洲统治者，如埃格巴的首领们，在使用欧洲大炮时更着重于心理战，而不纯粹是出于军事目的。这里的争议是，早在19世纪以前

[16] 见《非洲历史杂志》两期专刊（第12卷，第2、4期，1971年），题为《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火器问题的论述》；又见J.P. 斯马尔登（Smaldone），1972年；R.A. 考尔克，1972年。

[17] B. 艾维(Awe)，1973年；本卷第5章。

许多统治者就认为进口欧洲枪炮是可取的。但是到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人们才明白，由于开始进口性能更好的枪支，欧洲制造的武器才可以说对非洲的战争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口的欧洲枪炮当时占据无可争辩的优势，从而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寻求进口各种武器就成为商贸、外交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主要特色。

进口欧洲的武器变得越来越重要，所引起的变革，可以从埃塞俄比亚的特沃德罗斯和约翰尼斯两位皇帝的不同经历来加以说明。特沃德罗斯试图聘请欧洲的技术人员在本地制造枪炮和火药，但是他证明，即使没有这些武器，他也能战胜使用滑膛枪且装备良好的军队。约翰尼斯和他的继承人曼涅里克，更加意识到皇帝只有利用他的地位获得更多更好的欧洲武器，才能成功地实现征服提格雷和沿海平原地区敌对者的任务。同样地，不但北非的统治者，而且撒哈拉和苏丹地区的统治者也通过贸易和外交途径，开始储存欧洲的枪炮。这些枪炮主要从北非，也有从西非和东非沿海贸易中贩运而来。马达加斯加的统治者也是如此。在中非和东非，象牙贸易占据主要地位，这进一步促进了武器的进口和社会的军事化。

欧洲武器日益重要，由此产生的一个主要影响是，一些地区的骑兵一直很重要，而现在他们作为精锐部队和主要军事力量的地位在下降，已由欧式装备的步兵所代替。在森林地区和受恩古尼战争影响的地区，传统的精锐部队早已是步兵。到19世纪，该地区的主要趋势是训练和加强其专业化程度，然后把欧洲武器引进步兵部队。在各民族的广泛流动中，例如在姆菲卡尼运动和旧奥约帝国瓦解以后，原先依靠骑兵在丛林地带活动的民族，迁到了更为稠密的森林地区，在那里进行骑兵战相当困难，这进一步促使骑兵地位的下降。有些与欧洲殖民者直接对峙的国家，原来就保持骑兵枪手的传统，他们为了快速行动繁殖了小马，有组织地进口欧洲武器，创建新军队，使他们暂时取得了力量的均衡。在非洲其它许多地方，特别是苏丹，几个世纪以来骑兵一直是军队中的骨干和精锐部队，现在有步枪装备、受过训练的职业步兵一跃成为精锐部队。骑兵开始降到作为防御和后备力量的第二线。因此大大加快了非洲军事体制的变革，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有助于加强统治者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 **782**

社会和经济变革

大量的证据表明，19世纪非洲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在奴隶制的性质方面，以及武士阶级和政治上强有力的商人阶级的出现。这些情况加速了我们在上面论述的政治结构和军事体制变革，另外也是造成这些变革后果的部分原因。加之，对于家庭单位、村社或同龄人组织范围以外的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各个社会这时仍然不允许自由民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19世纪的主导倾向是不断扩大奴隶劳动的范围，使用强制劳动的地区也在扩大，而且更广泛地使用移民的劳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的总趋势是增加对奴隶的占有量，即使在农村地区，每户家庭拥有奴隶的数量都在增加。在带有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条件下对奴隶的使用也不断增多。[18] 使得奴隶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

---

[18] G.M. 麦克谢弗里(McSheffrey)，1983年。

783　自19世纪初始，随着政敌之间的斗争加剧，往往把对土地和牲畜的争执，甚至教义上的分歧推到极端，以致把敌对者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实体彻底摧毁。每个社区都被并入当时的政体，否则统统解散，大批青年男女沦为俘虏。这些俘虏用来满足农业、手工业以及采矿业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有些俘虏在不断出现的职业军队中充当士兵。新的国家结构和军事体制削弱了旧贵族阶级的权势。这些旧贵族一直依靠多妻多子来取得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但是他们也产生新的官僚集团，对这些人需免除一般的农业义务。这些新贵族并不依赖于庞大的亲属集团，而依赖于由食客和俘虏组成的大家庭。他们支撑着日益扩大的农场，为大家庭和战场上打仗的战士们提供粮食。这些大家庭成员还被调去生产当地市场和长途贸易所需的物资，以此获得必要的财富以吸引更多的食客，并购买进口的武器弹药。

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最后废止以及对西非黄金、棕榈油、棕榈仁和花生，对印度洋的毛里求斯、留尼汪岛和马斯克林群岛的蔗糖，对东非、中非的象牙和丁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对俘虏的需要量也日益扩大。这些俘虏不但用于生产上述产品，而且靠他们用头顶或用独木舟沿着海岸运输这些产品。种植园奴隶制就这样应运而生，其形式包括在几内亚沿岸农业地区按习惯法管理的奴隶殖民地，在穆斯林地区按伊斯兰法律管理的形式，以及印度洋群岛类似于美洲式农场的形式。由于越来越多的出身于奴隶的人当兵，以及在各级法庭担任行政工作，据估计，在非洲许多地区，奴隶人数约占总人口的25%到50%。[19] 虽然发生过奴隶叛乱事件，特别是像推翻科洛洛封建君主的洛齐事件，[20]但总的来说奴隶并未形成一个特定的阶级。大部分奴隶从事低贱的劳动，主要是农业生产。虽然当兵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很多，但能够得到信任并有幸成为成功的武士、商人或管理人员的极少。而且，由于他们的财产和生活方式差异很大，奴隶要形成为一个阶级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在旧卡拉巴尔这样的地方，因奴隶被长期地隔离，在文化上不可能使他们融合，而上层统治者又有在葬礼上以殉葬奴隶的多少来斗富的传统，[21] 在这种农村里的奴隶才会以一种神秘

784　的信仰联合起来，要求改善自己的状况。在其它地区，一般是通过每个家庭，使奴隶融入社会。由于融合的程度受到明显的限制——例如许多奴隶急于赎身，或根据殖民地法律获得解放后，渴望返回家乡——因此可以看出，大多数非洲社会变革的动力来自每个家庭中年龄和性别方面的矛盾，以及家族和亲属集团之间争权夺势的矛盾，而不是社会广大阶层之间的矛盾。

很难以定量的方式来解释日益扩大的商业贸易范围对社会构成的影响。商人的增加及其地位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但商人或者可以说已经出现的资本家阶级，增加的范围有多大尚不清楚。19世纪，在北非和西非，以商队为核心的长途贸易，在保证安全、给养、提供可靠设备和运输等方面的组织工作，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在中非和东非也得到迅速发展。在以阿拉伯文作为文字记载的伊斯兰地区，在以欧洲语言作为商业用语的西非奴隶贸易地区，以及斯瓦希里语发展成为商业用语的东非地区都出现了上述发展。有迹象表明，

---

[19] 见本卷第25章。
[20] W.G. 克拉伦斯·史密斯(Clarence-Smith)，1979年b。
[21] K.K. 奈尔(Nair)，1972年，第48页；参阅本卷第27章。

在西非的一些沿海地区，奴隶劳动开始通过扩大使用较古老的强制劳动的形式得到补充，留下“人质”作为贷款的交换方式，人质付出的劳动，一部分作为贷款的利息，一部分作为还清贷款的保证金。由此说明商人集团和银行业务日益重要，而这种强制性劳动的范围也随之急剧扩大。据说到1870年代，在黄金海岸这种制度在其重要性方面开始与奴隶劳动相匹敌。奴隶制是从社会外部充实劳动力的一种方法，而“人质”制度则是在社会内部补充劳动力。[22] 但是，除北非的沿海城市以外，一个独特的商人阶层在缓慢地形成。在受基督教和欧洲思想影响的地区，开始出现类似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商人集团。不过，即使在这些地区(除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外)，商人要在其传统国家内寻求影响和权力，主要是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国家结构内部获取酋长的称号来实现。在苏丹和塞内冈比亚的许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商人和穆斯林宗教领袖联系密切，因此不存在独特的商人阶层，而是身兼神职的商人阶层。在其他地方，商人、武士和统治阶级上层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分。许多人年轻时经商起家，发家后组织其他人继续经商，并用经商所得购买担任传统决策职位的权利。同 785 时，他们还经营农场，管理牲畜和其它财产，并组织由其食客和支持者组成的准军事机构。

早在1870年代，南部非洲的商业农场主，大多是布尔人，也有少数英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已无法满足。开普殖民地靠解放了的奴隶，“学徒”和移居者，例如从姆菲卡尼运动逃出来的姆丰古难民。纳塔尔、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白人农民，更多地依靠邻国的非洲人，他们由于通行证法而失去土地，在行动上受到限制。当时，格里夸兰西部的钻石产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组织移民劳工。虽然就官方而言，在南部非洲不存在奴隶制或“人质”制度，但是已经奠定了一种更坏的无产阶级化制度的基础。非洲国家被蓄意剥夺了最肥沃的土地，无数失去土地的民族别无选择，只能在无情的争夺者所规定的苛刻条件下劳作。这样，白人殖民地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严酷斗争，在英国君主带有偏袒的仲裁下，不仅仅再是土地和牲畜之争，而且是争夺能授权以暴力获取劳动力的绝对霸权。这种斗争不可能在一个“名义上的帝国”内部通过联邦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当所有的欧洲人集团——殖民者、殖民地官员和帝国的君主们——对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时，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却未能认识到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这些游戏的规则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变化中的权力均衡

1870年代，不仅非洲国家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欧洲人在非洲的作用和能力也发生了变化。到1870年，欧洲工业革命对国家政治结构和战争的影响已经十分明显。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权力相对平衡的差距迅速扩大，这一点也变得十分明显。那一年，德国和意大利成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公民很快要求更有效地参与对非洲资源的竞争。在1870到1871年，俾斯麦在战争中击败法国，巩固了德国的统一。那场战争德国采用了

[22] G.M. 麦克谢弗里，1983年。

新的军事技术，尤其是改进了武器装备，实行新的训练标准和战术。这些方面的发展很快影响到非洲，特别在进口改良的枪炮方面。法国人失败之后，提出一项复兴战略，包括在非洲设法建立一个帝国，目的既是着眼于这个帝国的实际价值，也是为了提高士气。他们制订了一项带侵略性的扩大和保护法国在非洲利益的新政策，主要通过商业代理人和传教士来实施，特别是巩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冈比亚的地位。卡比利亚的叛乱遭到残酷的镇压。法国利用这个机会没收了许多公顷的阿拉伯人农田和牧场，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欧洲殖民者，迫使无地的阿拉伯人出卖廉价劳动力。殖民者——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和希腊人——不管是基督教徒还是犹太人，都被认定为法国公民，因此他们享有高于阿拉伯人的特权地位，而阿拉伯人则被认为是法国的臣民。

局势的发展所产生的总的影响加剧了欧洲人之间的竞争。作为对法国激进政策的部分反应，英国人对巩固和维护他们的地位同样表现得十分迫切。1869-1870 年，在南非的格里夸兰西部发现了钻石，并有可能发现储量很大的金矿。这种前景使该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并改变了在非洲的欧洲人之间以及他们和非洲人之间的关系基础。欧洲人的种种活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他们自己，或者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已从他们的活动对欧洲各国的利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重新评价。探险者不能仅仅为了满足科学上的好奇心，还要鼓励他们收集战略情报和商业机密。传教士不仅仅是上帝的奴仆，遵从神的呼唤来传播福音，而被认为是有组织地进行文化植人的国家代理人。他们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削弱所在国的文化和商业上的排外性。商人不仅仅为了谋取利润，而且要为本国建立某种控制铺平道路。这样，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广泛合作，表面上似乎是在 19 世纪的革命形势下利用欧洲人的思想和技术来建设国家，开始被看做是一种颠覆活动，有助于直接而有计划地破坏非洲领导人进行社会改革和实现现代化。同样，非洲统治者通常把废奴主义者的活动看成是消极的。在许多情况下，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结束，其中经过抵制和停顿阶段之后，他们开始合作，进行农产品、黄金、象牙和其它商品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但不干涉拥有奴隶和其它来源的强迫劳动力，因此而奠定了合作的基础。如上所述，增加对奴隶的使用是这种合作的基础。欧洲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在 1870 年代，他们一方面不放弃这种立场，一方面开始用解放奴隶来作为削弱非洲各国经济基础的潜在因素。这里必须特别指出，欧洲人招募的军队大都是由忠于其拯救者的获得解放的非洲奴隶所组成，由拯救者提供武器并指挥他们。

同样，大多数非洲领导人对欧洲传教士持怀疑态度。如果传教士减少宗教皈依的因素而强调教育，多数领导人最终是欢迎他们的。许多统治者对于他们的某些奴隶，甚至奴隶的儿子有机会读、写、识字表示欢迎，他们可以因此获得打开白种人知识库的钥匙，为开展商业活动打下基础。如果传教士讲授诸如图书印刷、建房、机械耕作、疫苗接种等新技术，他们会更受欢迎。传教士有时还被请去传授造枪、造火药和其它战略器材的技术，或至少帮助当地进口这些武器。到 1870 年代已经更加清楚，文化移植的过程就是不断削弱东道国的特性，以及他们保持独立的决心。传教士的活动也成为一种分裂因素，致使一些非洲国家支持某国的欧洲侨民，而另一些非洲国家则加以反对。

欧洲人的活动中最具破坏性的也许就是贸易。贸易给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提供了合作

的基础，因为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促进贸易的发展。非洲统治者为了战略上的理由必须调节贸易，以保证非洲国家和非洲商人尽可能地从中得到好处。当然欧洲商人也会就贸易条件进行谈判，以便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在北非，他们利用奥斯曼君主的弱点，通过条约使欧洲侨民获得额外的特权。作为回报，他们帮助支撑奥斯曼的霸主地位，从而削弱了北非统治者在自己的领地内调节贸易的能力。欧洲人还保留这样的权利：一旦欧洲列强一致行动，他们有权进入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地区，比如，法国于 1830 年打败了阿尔及尔的贝伊，宣布占有整个贝伊领地，1878 年宣布占有突尼斯，这同 1882 年英国宣布占有埃及的做法是一样的。

在 1870 年代，自由贸易成了欧洲人对抗非洲统治者调控贸易的权利的口号。[23] 他们以自由贸易的名义为欧洲商人获取越来越多的特权。他们鼓励非洲统治者向欧洲银行和不可靠的欧洲冒险家大量贷款。他们操纵贷款业务，从而提前多年获得占有产品和关税的权利。他们签订单方面偿还债务的协议，并给予欧洲商人这样和那样的特权以削弱非洲各国的经济，进而削弱非洲统治者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在埃及和突尼斯，他们给当权者强加国际债务佣金，从而大大破坏了当权者的自治权，引发暴乱，阻碍改革，几乎无需通过战争便可直接导致独立的丧失。但是，自由贸易不过是一种使欧洲商人得以控制经济的口号，使他们不但可以排挤非洲商人，还可以排斥其他的欧洲侨民。 **788**

欧洲人从 1870 年代起表现出新的自信心和侵略性，这可以从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中找到原因。这种成熟反映在新枪炮的使用使得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欧洲人领导的军队。这种变化并不突然，欧洲人自己并没有夸大他们的有利条件。到 1871 年时，阿尔及利亚可能由于邻近法国，法国人在那里的战争中投入了多达 11 万人的兵力。除了 1899-1902 年英布战争英国人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外，其它国家都没有在非洲动用过这么多的兵力。1868 年，英国人入侵埃塞俄比亚，雇用了多达 12,000 人的兵力，主要是印度士兵。而在入侵阿散蒂和洗劫库马西时，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的手下只有 2500 名英国士兵。此后，欧洲人宁愿更多地依赖于征募和训练获得自由的奴隶。一些非洲军队，例如祖鲁兵团、达荷美的娘子军和桑给巴尔的卑路支军团都是以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而闻名遐迩。也有一些非洲将领，可与欧洲的将领们相匹敌，而他们往往更加熟悉地形。欧洲人不但设法为自己征募足够的非洲士兵，还招募同盟军。商人和传教士所收集的军事情报经常为招募这样的同盟军提供信息。然而，使欧洲军官和他们的非洲士兵树立新的信心并保持士气的主要因素，是让他们认识到，只要他们在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上保持优势，虽然可能在一两个战役中失利，但最终会赢得战争的胜利。

战争的遗产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 1870 年代，非洲大陆各个地区，对社会进行根本重建的努力产

---

[23] 这点在柏林会议总法案中有十分明确的说明。在刚果河与尼日尔河地区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利奥波德的国际非洲协会和皇家尼日尔公司采取垄断政策的前奏。

生了重大变化。虽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势各异，但总的来说增强了非洲人保卫自己、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与此同时，欧洲人的出现破坏了那里的社会结构，并对非洲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一点也很清楚。这是因为非洲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功是以牺牲所谓战争的遗产为代价的。

一些较大的更为强盛的国家的出现，源于行政权力日趋集中在直接对统治者负责的个别人或有特殊头衔的人手中。官员们更多地是通过其战功、成就和得到统治者的赏识获得职位，而不是靠世袭权利。在建成更加强盛和更加有效地集中行政权力的国家的过程中，较 789 为弱小的国家消失了。面临丧失政权危险的各个集团和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各个集团只得起来反抗，于是战争连绵不断。欧洲人越是觉察到非洲国家的势力在发展，越是下决心要挫败他们。他们能够利用战争的遗产来制造分裂，制造各种机会进行干涉。

新出现的国家形成了延续时间更长的政治体制，一般说来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强制命令实施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正如上面所述，这表明管辖权的范围更加明确，边界的划定也进一步明确。也许这还提高了对土地价值的意识。无论如何，战争变得更为残酷，更为全面。通常不仅仅是相互竞争的统治者为树立相对的权威而战，战争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财富。胜利者往往从失败者手中俘虏大批身强力壮者，掠夺土地和牲畜，有时还兼并整个地区，使战败者丧失其特性。

必须强调指出，19 世纪的战争在加强国家权力的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其它形式的团结。在战争中，政治上的对立和经济上的竞争十分激烈，对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特点毫不尊重，这种民族特点包括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有共同起源的神话，亲属关系和宗教关系，文化上的这些密切关系在过去通常超越国家政权的疆界。民族特点的衰落并不是新现象，但在 19 世纪时这种衰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19 世纪，与姆菲卡尼或与约鲁巴、阿散蒂、马萨依战争有关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冲突，都清楚地表明，国家权力的因素比民族的因素重要得多。的确，在我们考虑战争的范围，与奴隶贸易相关的种种活动，以及进行中的国家组建和重建的过程时，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殖民地征服前夕居然有人认为，人类学关于“部落”是一种静态的生物组织的旧概念适用于非洲民族。与此相反，新的国家结构，并非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它们在非洲各民族面对欧洲人的挑战时，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

欧洲人对非洲日益壮大的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战略，一开始就突出强烈的民族利益。欧洲传教士、商人、探险者和领事代理人以前总是单独行动，彼此间经常不和，而此时为了民族利益开始联合起来。在 19 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和传教士得到英国机构的资助，在桑给巴尔法庭上法国和英国商人互相合作。这种情况在 1870 年代越来越难得见到。但是欧洲人的这种合作战略并不奏效，因为非洲的当权者开始认识到所有欧洲侨民，不管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或探险家，他们最终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且，非洲当权者还擅长挑动欧洲列强 790 之间的争端，坐收渔翁之利。因此迫使欧洲人采取新策略。

如前所述，1870 年代改变非洲权力均衡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军队，也不是他们的训练水平或者将领的指挥才能，而是敌对各方所拥有的枪炮质量或数量。因此，非洲权力之争最终取决于对武器弹药的垄断程度。只要欧洲人追逐各自的民族利益，而非洲统治者从中挑

动争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此外，欧洲人为了寻找同盟者，不得不利用提供优质枪炮的办法，以求缔结条约，获得租让权，保持中立地位或积极参与同敌对的非洲国家的战略。因此，欧洲各国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调整他们之间在非洲的争夺，尤其在限制提供武器弹药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最激烈的竞争对手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试图扮演保护葡萄牙利益的角色，以此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这使俾斯麦有机会在柏林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并扮演了一个有利害关系的掮客的角色。利奥波德国王也借这次会议之机，宣布实行自由贸易和实现反对奴隶制的人道主义目标，寻求国际上对他在刚果的野心予以支持。[61] 这就为后来的布鲁塞尔法案铺平了道路，该法案禁止以开展反对奴隶制运动的名义向非洲统治者提供武器。

事实上，英国人已经把限制武器的供应和反奴隶制运动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使南非的移民"自治"政府不受布鲁塞尔法案的约束。利用这种手段，他们一方面不断与非洲国家开战，同非洲统治者谈判并签订各种条约和公约，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借口非洲国家由于拥有奴隶，而且经营奴隶贸易，不能得到国际法的承认。这样做就有可能借助 1885 年柏林会议的总法案和 1889 年布鲁塞尔法案，宣称按照国际法非洲是"无主地"，只有欧洲各国及其殖民者在那里的利益必须受到保护。

换言之，欧洲列强对非洲国家实行个别对待，承认它们，与某些国家表示友好，对另外一些国家则开战。但他们在欧洲则按种族划分结为同盟，组成一个卡特尔，以此来调控流入非洲的主要武器。非洲领导人对欧洲列强的这种战略并未找到对策。非洲的权力之争已卷入欧洲协调一致的国际政治之中，非洲的外交手段极为不利。非洲领导人是否很晚才认识到威胁他们的危险有多大，尚有疑问。他们习惯地认为欧洲人的基地离他们很远，而他们归根到底在人数上占优势。他们继续而且认为能够在欧洲各国之间挑起争端。在南非，他们甚至相信可以恳请英国女王和她的直接代表执行条约的有关条款，制止英国人和布尔人殖民者以及财富追逐者在南非随心所欲。非洲人也想像欧洲人那样，结成泛非大团结，但这样的想法很不切合实际，因为每个非洲国家似乎都把自身利益摆在首要位置。 791

如果要找出主要因素的话，看来不但要从欧洲战略家的外交才能中，而且从 19 世纪非洲作为革命形势一部分的战争遗产中才能找到基本的答案。正是敌对国家之间的激烈争斗和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使得非洲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对付欧洲人的威胁应先于各国之争，而且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朱锡炎译）

---

[61] 见柏林会议总法案，并见 S. 迈尔斯(Miers)，1971 年。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所述日期指参加该委员会的日期

J. F. A. 阿贾伊(Ajayi)教授
(尼日利亚),自 1971 年起
第六卷主编

F. A. 阿尔布凯克·莫朗(Albuquerque Mourao)教授
(巴西),自 1975 年起

A. A. 博亨(Boahen)教授
(加纳),自 1971 年起
第七卷主编

布布·阿马(Boubou Hama)阁下
(尼日尔),1971-1978 年(1978 年辞职,1982 年逝世)

穆塔姆巴·M. 布尔(Bull)博士(女士)
(赞比亚),自 1971 年起

D. 查奈瓦(Chanaiwa)教授
(津巴布韦),自 1975 年起

P. D. 柯廷(Curtin)教授
(美国),自 1975 年起

J. 德维斯(Devisse)教授
(法国),自 1971 年起

M. 迪富伊拉(Difuila)教授
(安哥拉),自 1978 年起

已故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教授
(塞内加尔),自 1971-1986 年;1986 年逝世

H. 贾伊特(Djait)教授
(突尼斯),自 1975 年起

J. D. 费奇(J. D. Fage)教授
(联合王国),1971-1981 年(已辞职)

M. 埃尔·法西(El Fasi)阁下
(摩洛哥),自 1971 年起
第三卷主编

J. L. 佛朗哥(Franco)教授
(古巴),自 1971 年起(1981 年逝世)

已故 M. H. I. 加拉勒(Galaal)先生
(索马里),1971-1981 年;1981 年逝世

V. L. 格罗塔内利(Grottanelli)博士,教授
(意大利),自 1971 年起

E. 哈贝兰德(E. Haberland)教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 1971 年起

阿克里卢·哈普特(Aklilu Habte)博士
(埃塞俄比亚),自 1971 年起

阿马杜·哈姆帕特·巴(Amadou Hampate Ba)阁下
(马里),1971-1978 年(已辞职)

I. S. 哈雷尔(El-Hareir)博士
(利比亚),自 1978 年起

I. 赫尔贝克(Hrbek)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自 1971 年起
第三卷助理主编

A. 琼斯(Jones)博士 (女士)
(利比里亚)，自 1971 年起

已故阿贝·亚历克西·卡加梅(Abbé Alexis Kagame)先生
(卢旺达)，1971-1981 年；1981 年逝世

I. N. 基曼博(Kimambo)教授
(坦桑尼亚)，自 1971 年起

J. 基-泽博(Ki-Zerbo)教授
(布基纳法索)，自 1971 年起
第一卷主编

D. 拉亚(Laya)先生
(尼日尔)，自 1979 年起

A. 列特涅夫(Letnev)博士
(苏联)，自 1971 年起

G. 莫赫塔尔(Mokhtar)博士
(埃及)，自 1971 年起
第二卷主编

P. 穆蒂布瓦(Mutibwa)教授
(乌干达)，自 1975 年起

D. T. 尼昂(Niane)教授
(塞内加尔)，自 1971 年起
第四卷主编

L. D. 恩康科(Ngcongco)教授
(博茨瓦纳)，自 1971 年起

T. 奥邦加(Obenga)教授
(刚果人民共和国)，自 1975 年起

B. A. 奥戈特(Ogot)教授
(肯尼亚)，自 1971 年起第五卷主编

C. 拉沃雅纳哈里(Ravoajanahary)教授
(马达加斯加)，自 1971 年起

已故 W. 罗德尼(Rodney)教授
(圭亚那)，1979-1980 年；1980 年逝世

已故 M. 希贝卡(Shibeika)教授
(苏丹)，1971-1980 年；1980 年逝世

Y. A. 塔利布(Talib)教授
(新加坡)，自 1975 年起

已故 A. 特谢拉·达莫塔(Teixeira da Mota)教授
(葡萄牙)，1978-1982 年；1982 年逝世

T. 齐邦古(Tshibangu)主任
(扎伊尔)，自 1971 年起

J. 范西纳(Vansina)教授
(比利时)，自 1971 年起

已故 E. 威廉斯(Williams)博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6-1978 年；1978 年辞职；1980 逝世

A. A. 马兹鲁伊(Mazrui)教授
(肯尼亚)
第八卷主编
非本委员会成员

C. 旺济(Wondji)
(象牙海岸)
第八卷助理主编
非本委员会成员

国际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A. 加特拉(Gatera)
教科文组织文化研究与政策处，法国巴黎米奥利斯街
地址：A. Gatera, Divi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ces, 1, rue Miollis, 75015 Paris, France

作 者 简 介

第 1 章　J. J. 阿德·阿贾伊(Ade Ajayi，尼日利亚)：19世纪西非史专家；曾撰写大量论述非洲历史的出版物和期刊文章；拉各斯大学前副校长；伊巴丹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2 章　I. 沃勒斯坦(Wallerstein，美国)：非洲社会学和世界经济体系研究专家；曾撰写各种出版物和文章；曾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宾厄姆顿纽约州立大学的费尔南德·布劳德尔经济学、历史方法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第 3 章　A. 阿杜·博亨(Adu Boahen，加纳)：西非殖民地史专家；曾撰写大量论述非洲历史的出版物和文章；曾任加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

第 4 章　S. 达格特(Daget，法国)：研究19世纪非洲奴隶贸易的专家；曾发表大量关于非洲奴隶贸易的著作和论文；南特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5 章　L. D. 恩康科(Ngcongco，博茨瓦纳)：研究南部非洲历史的专家；曾出版各种有关博茨瓦纳沦为殖民地之前的研究文章；曾担任国家发展、研究与文献研究所所长；博茨瓦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

第 6 章　E. K. 马辛盖泽(Mashingaidze，津巴布韦)：南部非洲史专家；曾任莱索托国立大学教师和津巴布韦驻联合国大使；哈拉雷常任秘书。

第 7 章　N. M. 贝贝(Bhebe，津巴布韦)：南部非洲史专家；曾发表各种关于恩德贝勒人的论著；曾任斯威士兰大学讲师；津巴布韦大学高级讲师。

第 8 章　A. F. 伊萨克曼(Isaacman，美国)：非洲史学专家；曾发表若干论述19至20世纪莫桑比克社会史专著；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9 章　A. I. 萨利姆(Salim，肯尼亚)：东部非洲史专家；曾发表许多论述斯瓦希里语系民族的文章；内罗毕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主席。

第 10 章　I. N. 基曼博(Kimambo，坦桑尼亚)：东部非洲史专家；曾出版若干关于沦为殖民地之前坦桑尼亚各族历史的论著；达累斯萨拉姆前任教务总长、现任历史系教授。

第 11 章　D. W. 科恩(Cohen，美国)：非洲历史人类学专家，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史的手段研究19世纪大湖地区历史问题；专门研究非洲人在学术团体以外所产生的人类学和历史学；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教授。

第 12 章　J. L. 韦吕(Vellut，比利时)：中部非洲史专家；曾发表若干论述刚果、扎伊尔和安哥拉的出版物；卢万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13 章　A. 阿卜杜勒-马利克(Abdel-Malek，埃及)：研究阿拉伯世界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专家；曾出版大量关于阿拉伯和亚非世界政治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论著和文章；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东京联合国大学项目协调员，现任总编辑(SCA-NST)；开罗的作家兼专栏撰稿人。

第 14 章　H. A. 易卜拉欣(Ibrahim，苏丹)：研究19和20世纪埃及和苏丹历史的专家；曾发表大量出版物和文章；喀土穆大学艺术系历史学教授兼系主任。

B. A. 奥戈特(Ogot，肯尼亚)：非洲史专家、开创口头历史各种手段；曾发表许多论述东非历史的出版物；曾任路易斯·利基国际纪念研究所主任；内罗毕肯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15 章　R. 潘克赫斯特(Pankhurst，英国)：埃塞俄比亚历史专家；曾发表若干关于埃塞俄比亚历史和文化的出版物；曾任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研究院院长；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研究院埃

塞俄比亚研究问题教授。

第 16 章 P.W. 穆蒂布瓦(Mutibwa，乌干达)：19世纪马达加斯加历史学专家并出版若干论著，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历史学研究教授。

F.V. 埃索亚韦洛-曼德罗索(Esoavelo-mandroso，马达加斯加)：18和19世纪马达加斯加历史学专家；塔那那利佛大学文学院历史学教授。

第 17 章 M.H. 切利弗(Cherif，突尼斯)：研究北非社会和政治史的专家；曾撰写若干关于北非历史的文章；突尼斯人文学和社会学学院大学教授兼院长。

第 18 章 A. 拉鲁伊(Laroui，摩洛哥)：研究马格里布地区历史的专家；曾出版若干论述摩洛哥和19世纪北非历史的著作；拉巴特大学当代历史学教授。

第 19 章 N.A. 伊凡诺夫(Ivanov，苏联)：非洲中世纪和当代历史研究专家；曾出版若干论述当代北非历史的著作；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负责人。

第 20 章 S. 贝尔(Baier，美国)：西非经济史专家，专门研究西非萨赫勒地区历史；曾发表许多论述萨赫勒地区经济的著作；曾任波士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麻省内蒂克存取技术高级软件工程师。

第 21 章 A.A. 巴特兰(Batran，苏丹)：非洲伊斯兰历史学专家；曾发表有关宗教兄弟会苏非派和西非与北非学术发展的著作和文章；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非洲史教授。

第 22 章 D.M. 拉斯特(Last，英国)：非洲历史和社会学专家；曾撰写若干有关豪萨人历史和文化以及西苏丹学术生活的著作；伦敦大学学院社会人类学高级讲师。

第 23 章 M. 利-塔勒(Ly-Tall，马里)：研究马里历史的专家；曾出版关于马里帝国和哈吉吉·奥马尔·塔尔生平的论著；达喀尔大学IFAN助教。

第 24 章 Y. 佩尔松(Person，法国)：非洲史学专家，专门研究曼丁戈世界；曾发表许多论述非洲历史的著作；法国第一大学历史学教授；已去世。

第 25 章 K. 阿尔欣(Arhin，加纳)：社会人类学专家，专门研究阿坎人的历史和文化；曾发表许多论述阿散蒂的著作；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问题教授。

J. 基-泽博(Ki-Zerbo，布基纳法索)：非洲史和方法论专家；曾发表若干论述黑非洲及其历史的著作；达喀尔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26 章 A.I. 阿西瓦茹(Asiwaju，尼日利亚)：非洲史学专家；曾发表若干专著，论述约鲁巴和阿贾语系各民族以及殖民地分界对非洲各民族的影响；拉各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27 章 E.J. 阿拉戈亚(Alagoa，尼日利亚)：非洲史和方法论专家；曾发表有关伊乔人、口传历史手段和考古学方面的各种研究文章；哈尔科特港大学历史学教授。

L.Z. 埃兰戈(Elango，喀麦隆)：喀麦隆历史学专家，雅温得大学历史系讲师。

M. 梅特盖·恩纳赫(Metegue N'Nah，加蓬)：中非历史学专家，利伯维尔大学历史系主任。

第 28 章 F.W. 奈特(Knight，牙买加)：非洲海外移民史专家；曾发表若干关于古巴、奴隶社会和非洲海外移民的出版物；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Y.A. 塔利布(Talib，新加坡)：研究伊斯兰、马来世界和中东、特别是阿拉伯西南地区的专家；曾发表若干有关专题的论著；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研究系主任。

P.D. 柯廷(Curtin，美国)：非洲史和奴隶贸易史专家；曾发表大量有关主题的出版物；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29 章 J.F. 阿德·阿贾伊(Ade Ajayi，尼日利亚)。

参考文献目录

Abbreviations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AHS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ecame *IJAHS* in 1972);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CEHSAOF Bulletin du Comité d'E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Dakar
BIFAN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later *Fondamental*) *de l'Afrique Noire*, Dakar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CEA 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 Paris: Mouton
CJA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Af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CU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ALB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Nairobi
EAPH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HA History in Africa: A Journal of Method, Waltham, Massachusetts
HMSO Her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HU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AI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London
IFAN Institut Français (later Fondamental) de l'Afrique Noire, Dakar
IJA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IRSH Institut de Recherches Humaines, Niamey
IUP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JAH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CUP
JHSN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JHUP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JICH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Institute of Commonwealth Studies, London
JRAI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ondon
JSAS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London: OUP
KUP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MUP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EA Nouvelles Editions Africaines, Dakar
NUP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U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F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PU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FHOM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aris
ROMM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Aix-en-Provence
SFHOM Société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aris
SNR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Khartoum
SOA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SUP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AJH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Nairobi: EAPH
THSG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 Legon
TNR 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 Dar es Salaam
UC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J Uganda Journal, Kampala
UPP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UWP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YUP Yale University Press

Bibliography

Abbadie, A. d' (1868a) *L'Abyssinie et le roi Théodore* (Paris).
Abbadie, A. d' (1868b) *Douze ans dans la Haute-Ethiopie* (Paris).

Abdallah, Yohanna B. (1973) *The Yaos. Chiikala cha Wayao* (ed. and tr. by Meredith Sanderson, 2nd edn, London: Frank Cass).
Abd al-Malik, A. (1962) *Egypte. Société militaire* (Paris).
Abd al-Malik, A. (1969) *Idéologie et renaissance nationale: l'Egypte moderne* (Paris: Anthropos).
Abir, M. (1965)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monarchies of Enarea and Jimm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H*, 6, 2, pp. 205–19.
Abir, M. (1968) *Ethiopia. The Era of the Princes. The Challenge of Islam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Empire 1769–1855* (London: Longman).
Abir, M. (1977) 'Modernisation, reaction and Muhammad Ali's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3, 3, pp. 295–313.
Abitbol, M. (1979) *Tombouctou et les Arma de la conquête marocaine du Soudan nigérien en 1591 à l'hégémonie de l'Empire du Maçina en 1833*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Abraham, D. P. (1966) 'The roles of Chaminuka and the Mhondoro cults in Shona political history',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pp. 28–42.
Abubakar, S. (1970) *The Lamibe of Fomb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Adamawa 1809–1901*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Press).
Abun-Nasr, J. M. (1962) 'Some aspects of the Umari branch of the Tijanniyya', *JAH*, 3, 2, pp. 329–31.
Abun-Nasr, J. M. (1971)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Cambridge: CUP).
Abun-Nasr, J. M. (1975)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2nd edn, Cambridge: CUP).
Acocks, J. P. H. (1953) *Veld Types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dams, Charles C. (1933) *Islam and Modernism in Egypt, a Study of the Modern Reform Movement Inaugurated by Muhammad* 'Abduh (London: OUP).
Adamu, M. (1978) *The Hausa Factor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Press).
Adamu, M. (1979) 'The delivery of slaves from the central Sudan to the Bight of Beni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H. A. Gemery and J. S. Hogendorn (eds), pp. 163–80.
Addis Hiwet (1975) *Ethiopia: From Autocracy to Revolution* (Londo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Aderibigbe, A. B. (1959) 'The expansion of the Lagos Protectorate 1861–190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Afawarq-Garba Yasus (1901) *Daqmawi Menilek* (Rome).
Agar-Hamilton, J. A. I. (1928) *The Native Policy of the Voortrekkers: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ior of South Africa, 1836–1858*. (Cape Town: Miller).
Ageron, C.-R. (1964)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re, 1830–1964* (Paris: PUF).
Ageron, C.-R. (1968) *Les Algériens musulmans et la France, 1871–1919*, (2 vols, Paris: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Sorbonne).
Ageron, C.-R. (1972) *Politiques coloniales au Maghreb* (Paris: PUF).
Ageron, C.-R. (1977) 'Abdel-Kader', in *Les Africains* (Paris: Jeune Afrique) 1, pp. 19–49.
Ageron, C.-R. (1979) *De l'insurrection de 1871 au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de libération (1954).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ne*, 2 (Paris: PUF).
Aguirre Beltran, G. (1972) *La población negra de México* (2nd edn,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Ahmed, J. M. (1966)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Egyptian Nationalism* (London: OUP).
Ajayi, J. F. A. (1969)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Evanston: NUP).
Ajayi, J. F. A. (1974) 'The aftermath of the collapse of Old Oyo',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129–66.
Ajayi, J. F. A. and Crowder, M. (eds) (1974)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2 (London: Longman).
Ajayi, J. F. A. and Crowder, M. (eds) (1988)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2 (2nd edn, London: Longman).
Ajayi, J. F. A. and Oloruntimehin, B. O. (1976) 'West Africa in the anti-slave trade era', in J. E. Flint (ed.), pp. 200–21.
Ajayi, J. F. A. and Smith, R. S. (1964) *Yoruba Warfa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UP).
Akinjogbin, I. A. (1965) 'The prelude to the Yoruba civil wa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du*, 2, 2, pp. 81–6.
Akinjogbin, I. A. (1967) *Dahomey and Its Neighbours, 1708–1818* (Cambridge: CUP).
Akinjogbin, I. A. and Ekemode, G. O. (eds) (1976)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Yoruba Civilization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Ife, Nigeria, 26–31 July 1976*.
Akintoye, S. A. (1969) 'The north-eastern districts of the Yoruba country and the Benin kingdom', *JHSN*, 4, 4, pp. 539–53.

Akintoye, S. A. (1971) *Revolution and Power Politics in Yorubaland, 1840–1893* (London: Longman).
Alagoa, E. J. (1964) *The Small Brave City State: A History of Nembe-Brass in the Niger Delt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Alagoa, E. J. (1970) 'Long-distance trade and states in the Niger Delta', *JAH*, 11, 3, pp. 319–29.
Alagoa, E. J. (1971a)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the states of the Eastern Niger Delta', *JAH*, 12, 2, pp. 269–78.
Alagoa, E. J. (1971b) 'Nineteenth-century revolutions in the states of the eastern Niger Delta and Calabar', *JHSN*, 5, pp. 565–73.
Alagoa, E. J. and Fombo, A. (1972) *A Chronicle of Grand Bonny* (Ibadan: IUP).
Ali, A. I. M. (1972) *The British, the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in the Sudan, 1820–1881* (Khartoum: KUP).
Allen, J. de Vere (ed.) (1977) *Al-Inkishafi. Catechism of a Soul* (Nairobi, Kampala and Dar es Salaam: EALB).
Alpers, E. A. (1967)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Paper no. 3, Nairobi: EAPH).
Alpers, E. A. (1969) 'Trade, state and society among the Yao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H*, 10, 3, pp. 405–20.
Alpers, E. A. (1972)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East Africa: the matrilineal peoples of the southern interior', in T. O. Ranger and I. Kimambo (eds), pp. 172–96.
Alpers, E. A. (1974)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elude to colonialism', in B. A. Ogot (ed.), pp. 229–48.
Alpers, E. A. (1975) *Ivory and Slaves in East Central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Alpers, E. A. (1976) 'Gujarat and the trade of East Africa, c.1500–1800', *IJAHS*, 9, 1, pp. 22–44.
Amulree, Lord (1970) 'Prince Alamayou of Ethiopia', *Ethiopia Observer*, 13, pp. 8–15.
Ancelle, J. (1887) *Les explorations au Sénégal et dans les contrées voisines* (Paris: Maisonneuve).
Andrews, G. R. (1980) *The Afro-Argentines of Buenos Aires 1800–1900* (Madison: UWP).
Anonymous (nd) 'Histoire des Bahund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ukavu, Zaire, CELA-White Fathers' Language Institute).
Anstey, R. (1975)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 (London:Macmillan).
Arcin, A. (1911) *Histoire de la Guinée Française* (Paris: Chalamel).
Ardener, E. (1956) *Coastal Bantu of the Cameroons* (London: IAI).
Arhin, K. (1967) 'The structure of Greater Ashanti (1700–1824)', *JAH*, 8, 1, pp. 65–85.
Arhin, K. (1970) 'Aspects of the Ashanti northern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frica*, 40, 4, pp. 363–73.
Arhin, K. (1979) *West African Traders in Gha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Longman).
Arnot, F. S. (1889) *Garenganze or Seven Years' Pioneer Mission Work in Central Africa* (London: Hawkins).
Asad, T. (1966)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Kababish tribe', *SNR*, 47, pp. 79–87.
Asiegbu, J. U. J. (1969) *Slavery and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1787–1861: A Study of Liberated African Emigration and British Anti-Slavery Polic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siwaju, A. I. (1973)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Sabe: an ancient Yoruba kingdom', *Lagos Notes and Records*, 4, pp. 17–29.
Asiwaju, A. I. (1976) *Western Yorubaland Under European Rule, 1889–194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alism* (London: Longman).
Asiwaju, A. I. (1979) 'The Aja-speaking peoples of Nigeria: a note on their origins, settlement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up to 1945', *Africa*, 49, 1, pp. 15–28.
Atmore, A. and Marks, S. (1974) 'The imperial factor in South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wards a reassessment', *JICH*, 3, 1, pp. 105–39.
Austen, R. A. (1970) 'The abolition of the overseas slave trade: a distorted theme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JHSN*, 5, 2, pp. 257–74.
Austen, R. A. (1979) '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a tentative census', in H. A. Gemery and J. S. Hogendorn (eds), pp. 23–76.
Awe, B. (1964) 'The rise of Ibadan as a Yoruba power, 1851–1893' (D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Awe, B. (1973) 'Milita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Yoruba country: the Ibadan example', *JAH*, 14, 1, pp. 65–78.
Ayache, G. (1958) 'Aspects de la crise financière au Maroc après l'expédition espagnole de 1860', *Revue historique*, 220, 2, pp. 271–310.
Ayache, G. (1965) 'La crise des relations germano-marocaines, 1894–1897', *Hespéris-Tamuda*, 6, pp. 159–204.
Ayache, G. (1979) *Etudes d'histoire marocaine* (Rabat: SMER).

Ayache, S. (1963) *L'accession au trône (1828) de Ranavalona I: à travers le témoignage de Raombana (1854)* (Tananarive: Imprimerie Nationale).
Ayache, S. (1975) 'Esquisse pour le portrait d'une reine: Ranavalona Ière', *Omaly sy Anio*, 1–2, pp. 251–70.
Ayache, S. (1977) 'Jean Laborde vu par les témoins malgaches', *Omaly sy Anio*, 5–6, pp. 191–222.
Ayandele, E. A. (1966)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 1842–1914: A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yliff, J. and Whiteside, J. (1962) *History of the Abambo, Generally known as Fingos*, (1st edn, 1912, Cape Town).
d'Azevedo, W. L. (1969–71) 'A tribal reaction to nationalism', *Liberian Studies Journal*, 1, 2, pp. 1–21; 2, 1, pp. 43–63; 2, 2, pp. 99–115; 3, 1, pp. 1–19.

Ba, A. H. and Daget, J. (1962) *L'Empire peul du Macina (1818 1853)* (Paris: Mouton).
Ba, O. (1976) *La pénétration française au Cayor, 1854–1861* (Dakar: Oumar Ba).
Ba, O. (nd) *El Hadj Oumar Tal* (unpublished ms).
Baer, G. (1961) 'The village shaykh in modern Egypt', in U. Heyd (ed.)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Jerusalem: Hebrew University).
Baer, G. (1962) *A History of Landownership in Modern Egypt 1800 1950* (London: OUP).
Baeta, C. G. (ed.) (1968) *Christianity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UP).
Bagodo, O. (1979) 'Le royaume Borgu Wassangari de Nikki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essai d'histoire politique' (Mémoire de Maitrise d'Histoire, Université Nationale du Benin, Abomey-Calavi).
Baier, S. (1977) 'Trans-Saharan trade and the Sahel: Damergu 1870–1930', *JAH*, 18, 1, pp. 37–60.
Baier, S. (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of Central Nig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ier, S. and Lovejoy, P. E. (1977) 'The Tuareg of the Central Sudan: gradations of servility at the desert edge (Niger and Nigeria)', in S. Miers and I. Kopytoff (eds), pp. 391 411.
Bain, A. G. (1949) *Journal of Andrew Geddes Bain* (Cape Town: Van Riebeeck Society).
Baker, S. W. (1879) *Ismailia*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al-Barawi, R. and Eleish, M. H. (1944) *Al-tatawwor al-iqtisadi fi Misr fi'l-asr al-ḥadīth* (Cairo: Maktabat al-Nahdah al-Misriyyah).
Barbar, A. (1980) 'The Tarabulus (Libyan) resistance to the Italian invasion: 1911–192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Bargaoui, S. (1982) 'Al milkiya wa alaḳāt el- 'amal fī nāh'iyati Tūnis fī awākhir al-karn al-tāsa' 'ashar wa bidāyat al-ḳarn al 'ishrīn' (Thèse de doctorat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Tunis).
Bargaoui, S. (1983) 'Le phénomène de l'usure dans la Tunisie de 1881', in *Réactions à l'occupation française de la Tunisie en 1881* (Tunis: CNUDST).
Barkindo, B. M. (ed.) (1978)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 (Ibadan: Heinemann).
Barnes, J. A. (1951) *Marriage in a Changing Society: A Study in Structural Change among the Fort Jameson Ngoni* (London: OUP).
Barrett, D. B. (1968) *Schism and Renewal in Africa* (Nairobi: OUP).
Barry, B. (1972) *Le royaume du Waalo. Le Sénégal avant la conquête* (Paris: Maspero).
Bartels, F. L. (1965) *The Roots of Ghana Methodism* (Cambridge: CUP).
Barth, H. (1857)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5 vols,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Barth, H. (1863) *Voyages et découvertes dans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et central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9 à 1855* (4 vols, Paris: Bohné).
Bascom, W. R. (1972) *Shango in the New Worl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stin, John (1965) *The British in West Sumatra, 1685 1825*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Kuala Lumpur).
Bastin, J. (1977) *A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2nd edn, London: Prentice-Hall).
Bathurst, R. C. (1967) 'The Ya'rubi Dynasty of Oman', (D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Batran, A. A. (1972) 'Sidi al-Mukhtar al-Kunti and the recrudescence of Islam in the Western Sahara and the Middle Niger'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Batran, A. A. (1973) 'An introductory note on the impact of Sidi al-Mukhtar al-Kunti (1729 1811) on west African Islam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JHSN*, 6, 4, pp. 347 52.
Batran, A. A. (1974) 'The Qadiriyya-Mukhtariyya Brotherhood in West Africa: the concept of Tasawwuf in the writings of Sidi al-Mukhtar al-Kunti', *TAJH*, 4, 1/2, pp. 41 70.
Batran, A. A. (1983) *Islam and Revolution in Africa: A Study in Arab-Islamic Affairs* (Brattleboro: Center for Arab and Islamic Studies).
Bayram, V. M. (1885) *Gafwat al-i'tibār* (Cairo).

Bazin, J. and Terray, E. (1982) *Guerres de lignages et guerres d'États en Afrique* (Pari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Bdira, M. (1978)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ous-développement: La Tunisie, 1857–1864* (Uppsala: Acta Univers. Upsal.).
Beach, D. (1977) 'The Shona economy: branches of production', in R. Palmer and N. Parsons (eds), pp. 37–65.
Beach, D. (1980) *The Shona and Zimbabwe, 900–1850* (New York: Macmillan).
Beachey, R. W. (1967) 'The East African ivory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H*, **8**, 2, pp. 269–90.
Bean, R. (1975) *The British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1650–1775* (New York: Arne Press).
Beemer, H. (193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organisation in Swaziland', *Africa*, **10**, pp. 55–74.
Behrens, C. (1974) *Les Kroumen de la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Bordeaux CNRS, centre d'études de géographie Tropicale, Talence).
Beke, C. T. (1867) *The British Captives in Abyssinia* (2nd edn, London: Longman, Green, Reader & Dyer).
Bello, M. (1951) *Infaq al-Maisur* (ed. C. E. J. Whitting, London: Luzac).
Bello, M. (1964) *Infaq al-Maisur* (ed. 'Ali 'Abd al-'Azim, Cairo).
Belrose-Huyghes, V. (1975) 'Un exemple de syncrétisme esthétique au XIXe siècle: le Rova de Tananarive d'Andrianjaka à Radama Ier', *Omaly sy Anio*, **1–2**, pp. 273–307.
Belrose-Huyghes, V. (1977) 'Considération sur l'introduction de l'imprimerie à Madagascar', *Omaly sy Anio*, **5–6**, pp. 89–105.
Belrose-Huyghes, V. (1978a) 'Le contact missionnaire au féminin: Madagascar et la LMS, 1795–1835', *Omaly sy Anio*, **7–8**, pp. 83–131.
Belrose-Huyghes, V. (1978b) 'Historique de la pénétration protestante à Madagascar jusqu'en 1829' (Thèse de 3ème cycle, Paris–Antananarivo).
Benachenhour, A. (1966) *L'Etat algérien en 1830. Ses institutions sous l'émir Abd-el-Kader* (Algiers).
Benedict, B. (1965) *Mauritius: Problems of a Plural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Bennett, N. R. (1968) 'The Arab impact', in B. A. Ogot and J. A. Kieran (eds), pp. 216–37.
Bennett, N. R. (1974) 'The Arab impact', in B. A. Ogot (ed.), pp. 210–28.
Bennett, N. R. (1978) *A History of the Arab State of Zanzibar* (London: Methuen).
Bennett, N. R. (1981) *Mirambo of Tanganyika, 1840–1884* (New York: OUP).
Ben Salem, L. (1982) 'Intérêt des analyses en termes de segmentarité pour l'étude des sociétés du Maghreb', *ROMM*, **33**, pp. 113–35.
Berger, I. (1981) *Religion and Resistance in East African Kingdoms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Tervuren: Musée Royale de l'Afrique Centrale).
Berlin, I. and Hoffman, R. (eds) (1983) *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Bernard, A. (1906) *La pénétration saharienne (Algiers: Imprimerie Algérienne).*
Bernard, A. and Lacroix, N. (1906) *L'évolution du nomadisme en Algérie* (Paris: Challamel).
Berntsen, J. L. (1979) 'Pastoralism, raiding and prophets: Maasai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Berque, J. (1978) *L'intérieur du Maghreb, XVe–XI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Bertho, J. (1949) 'La parenté des Yoruba aux peuplades du Dahomey et du Togo', *Africa*, **19**, pp. 121–32.
Bethell, L. (1970) *The Abolition of the Brazilian Slave Trade. Britain, Brazil and the Slave Trade Question, 1807–1869* (Cambridge: CUP).
Bettoli, P. (1882) 'Tripoli commerciale', *L'Esploratore*, 6.
Bhila, H. H. K. (1972) 'Trade and the survival of an African polity: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Manyik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Rhodesia History*, **3**, pp. 11–28.
Bianchi, G. (1886) *Alla terra dei Galla: narrazione della Spedizione Bianchi in Africa nel 1879–80* (Milan: Treves).
Bieber, F. J. (1920–3) *Kaffa: ein altkuschilisches Volkstum in Inner Afrika* (Munster: W. Aschendorff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Binger, L.-G. (1892) *Du Niger au golfe de Guinée par le pays de Kong et le Mossi (1887–1889)* (2 vols, Paris: Hachette).
Biobaku, S. O. (1957) *The Egba and Their Neighbou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ird, J. (ed.) (1888) *The Annals of Natal 1495–1845* (2 vols, Pietermaritzburg: Davis).
Birks, J. S. (1978) *Across the Savannahs to Mecca: The Overland Pilgrimage Route from West Africa* (London: Hurst).
Birmingham, D. (1976) 'The forest and the savanna of Central Africa', in J. E. Flint (ed.), pp. 222–69.

Bizzoni, A. (1897) *L'Eritrea nel passato e nel presente* (Milan: Sonzogno).
Blanc, H. (1868) *A Narrative of Captivity in Abyssinia* (London: Smith, Elder).
Boahen, A. A. (1964) *Britain, the Sahara, and the Western Sudan, 1788–186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oahen, A. A. (1966) *Topic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 Longman).
Boahen, A. A. (1974) 'Politics in Ghana, 1800–1874',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167–261.
Boahen, A. A. (1975)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Longman).
Bogdanovitch, M. N. (1849) *Algirija v novejchee vrenja* (St Petersburg).
Bonner, P. (1983) *Kings, Commoners and Concessionaires: The Evolution and Diss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Swazi State* (Cambridge: CUP).
Bonté, P. (1976) 'Structures de classe et structures sociales chez les Kel Gress', *ROMM*, 21, pp. 141–62.
Bontinck, F. (1974) 'La double traversée de l'Afrique par trois Arabes de Zanzibar (1845–1860)', *Etudes d'Histoire africaine*, 6, pp. 5–53.
Bosworth, C. E., Van Donzel, E., Lewis, B., Pellat, C. (eds) (1978)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n., Vol. 4 (Leiden/London: Brill/Luzac).
Botte, R. (1982) 'La guerre interne au Burundi', in J. Bazin and E. Terray (eds).pp 269–317.
Boudou, A. (1940–2) *Les jésuites à Madagascar aux XIXe siècle.* (Paris: Beauchesne).
Boudou, A. (1943) 'Le complot de 1857', in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concernant Madagascar et les pays voisins* (Paris: Académie Malgache).
Bouët-Willaumez, E. (1846) *Description nautique des côt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comprises entre le Sénégal et l'Equateur*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Bouët-Willaumez, E. (1848) *Commerce et traite des noirs aux côtes occidentales d'Afriqu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Boulard, M. (1958) 'Aperçu sur le commerce caravanier Tripolitaine-Ghet-Niger vers la fin du XIVe siècle', *Bulletin de Liaison Saharienne*, 9, pp. 202–15.
Bourdieu, P. (1970) *Sociologie de l'Algérie* (3rd edn, Paris: PUF).
Bowdich, T. E. (1819) *A Mission from Cape Coast Castle to Ashantee* (London: John Murray).
Bowring, J. (1840) *Report on Egypt and Candia* Cmd Paper, (London).
Bowser, F. P. (1974) *The African Slave in Colonial Peru, 1524–1650* (Stanford: SUP).
Boyd, J. (1982) 'The contribution of Nana Asma'u Fodio to the jihadist movement of Shehu Dan Fodio from 1820 to 1865' (MPhil thesis, North London Polytechnic).
Boyer, P. (1970a) 'Des pachas triennaux à la révolution d'Ali Khodja Dey (1571–1817)', *Revue Historique*, 244, 495, pp. 99–124.
Boyer, P. (1970b) 'Le problème kouloughli dans la Régence d'Alger', *ROMM*, **numéro spécial**, pp. 79–94.
Boyer, P. (1971) 'L'Odyssée d'une tribu saharienne: les Djerama, 1881–1929', *ROMM*, 10, pp. 27–54.
Brasseur, P. (1975a) 'A la recherche d'un absolu missionnaire Mgr Truffet, vicaire apostolique des Deux-Guinées (1812–1847)', *CEA*, 15, 2, pp. 259–85.
Brasseur, P. (1975b) 'Missions catholiques et 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sur la côte d'Afrique', *RFHOM*, 62, 3, pp. 415–46.
Bréhier, L. (1901) *L'Egypte de 1798 à 1900* (Paris: Combet).
Brelsford, W. V. (1956) *The Tribes of Northern Rhodesia* (Lusaka).
Brenner, L. (1973) *The Shehus of Kukaw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renner, L. and Cohen, R. (1988) '*Bonno in the 19th century*'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2 (2nd edn, London, Longman)
Bridge, H. (1845) *Journal of an African Cruiser* (London: Wiley & Putnam).
Brignon, J. et al. (1967) *Histoire du Maroc* (Paris: Hatier).
Broadbent, S. (1865) *A Narrative of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amongst the Barolong Tribe of Bechuanas, South Africa* (London: Wesleyan Mission House).
Brookes, E. H. (1974) *White Rule in Southern Africa 1830–1910*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Brookes, E. H. and Webb, C. de B. (1965) *A History of Natal*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Brooks, G. E. (1972) *The Kru Marin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ark, Delawar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Brooks, G. E. (1975) 'Peanuts and colonialism: consequences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eanuts in West Africa, 1830–70', *JAH*, 16, 1, pp. 29–54.
Brown, K. (1976) *People of Salé: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Moroccan City, 1830–1930* (Cambridge, Mass.: HUP).

Brown, L. C. (1974) *The Tunisia of Ahmad Bey, 1837–1855* (Princeton: PUP).
Brown, M. (1977) 'Ranavalona I and the missionaries 1828–40', *Omaly sy Anio*, 5–6, pp. 191–222.
Brown, M. (1978) *Madagascar Rediscovered: A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Independence* (London: Damien Tunnacliffe).
Brown, W. A. (1968) 'Towards a chronology of the caliphate of Hamdullahi (Māsina)', *CEA*, 7, 31, pp. 428–43.
Brown, W. A. (1969) 'The caliphate of Hamdullahi, c.1818–1864: A study in African history and tradition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Brownlee, C. (1896) *Reminiscences of Kaffir Life and History, and Other Papers* (Lovedale: Lovedale Mission Press).
Brunschwig, H. (1963) *L'Avènement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Colin).
Bryant, A. T. (1929) *Olden Times in Zululand and Natal* (London: Longmans, Green).
Bryant, A. T. (1964) *A History of the Zulu and Neighbouring Tribes* (Cape Town: C. Struik).
Bugner, L. (ed.) (1980)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Bull, M. M. (1972) 'Lewanika's achievement', *JAH*, 13, 4, pp. 463–72.
Bundy, C. (197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uth African Peasantry* (Berkeley: UCP).
Burckhardt, J. L. (1829) *Travels in Arabia* (London: H. Colburn).
Bureau, R. (1962) 'Ethno-sociologie religieuse des Duala et apparentés', *Recherches et Etudes Camerounaises*, 7/8, pp. 1–372.
Burke III, E. (1972) 'The image of the Moroccan state in French ethnological literature: a new look at the origins of Lyautey's Berber policy', in E. Gellner and C. Micaud (eds).
Burke III, E. (1976) *Prelude to the Protectorate in Morocco: Precolonial Protest and Resistance 1860–1912*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Burman, S. (1981) *Chiefdom Politics and Alien Law: Basutuland under Cape Rule, 1871–1884*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Burton, R. F. (1860) *The Lake Regions of Central Africa* (2 vols,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Burton, R. F. (1872) *Zanzibar; City, Island and Coast* (2 vols, London: Tinsley Brothers).
Burton, R. F. (1894) *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London: Tylston & Arnold).
Burton, R. F. (1964) *Pilgrimage to al-Madinah and Meccah* (2 vols, London: Dover).
Busia, K. A. (1951) *The Position of the Chief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of Ashanti* (London: OUP).
Butler, G. (1974) *The 1820 Settlers. An Illustrated Commentary* (Cape Town: Human & Rousseau).

Cachia, A. J. (1975) *Libya Under the Second Ottoman Occupation, 1835–1911* (Tripoli).
Caillé, J. (1951) *Charles Jagerschmidt, chargé d'affaires de France au Maroc (1820–1894)* (Paris: Larose).
Caillé, R. (1830) *Journal d'un voyage à Tombuctou et à Jenné dans l'Afrique Centrale*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Caillon-Fillet, O. (1978) 'Jean Laborde et l'Océan Indien' (thèse de 3e cycle, Université de Aix-en-Provence).
Cameron, V. L. (1877) *Across Africa* (2 vols, 4th edn, London: Daldy, Isbister).
Campbell, G. (1981) 'Madagascar and the slave trade, 1850–1895', *JAH*, 22, 2, pp. 203–28.
Caplan, G. L. (1970) *The Elites of Barotseland 1878–1969* (Berkeley: UCP).
Carreira, A. (1947) *Mandingas da Guiné Portuguesa* (Bissau: Centro do Estudos da Guiné Portuguesa, Memórias no 4).
Carrère, F. and Holle, P. (1855) *De la Sénégambie française*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Frères, Fils & Cie).
Casalis, E. (1861) *The Basutos* (London: Nisbet).
Cassanelli, L. V. (1982) *The Shaping of Somali Society* (Philadelphia: UPP).
Caulk, R. A. (1966)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Menilek II, 1865–96'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Caulk, R. A. (1972) 'Firearms and princely power in Ethiop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H*, 13, 4, pp. 591–608.
Cauneille, A. (1968) *Les Chaamba (leur nomadisme): évolution de la tribu durant l'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Paris: CNRS).
Cecchi, A. (1886–7) *Da Zeila alle frontiere del Caffa* (Rome: Loescher).
Cerulli, E. (1942) 'Gli Emiri di Harar dal secolo XVI, alla conquista egiziana', *Rassegna di Studi Etiopici*, 2.
Cerulli, E. (1943–47) *Etiopi in Palestina* (Rome: Libreria dello Stato).
Cerulli, E. (1957–64) *Somalia. Scritti vari editi ed inediti* (3 vols, Rome: Amministrazione Fiducitaria Italiana di Somalia).

Chaine, M. (1913) 'Histoire du règne de Iohannès IV, roi d'Ethiopie (1868–1889)', *Revue Sémitique*, 21, pp. 178–91.

Chamberlin, C. (1979) 'Bulk exports, trade tiers,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West Africa's "Legitimate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2, pp. 419–38.

Chater, K. (1984) *Dépendance et mutations précoloniales. La Régence de Tunis de 1815 à 1857* (Tunis: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Tunis).

Chattopadhyay, A. K. (1977) *Slavery in the Bengal Presidency, 1772–1843* (London).

Chaudhuri, K. N. (1966) 'India's foreign trade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ing activities, 1828–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19, 2, pp. 345–63.

Chérif, M. H. (1970) 'Expansion européenne et difficultés tunisiennes de 1815 à 1830', *Annales ESC*, 25, 3, pp. 714–45.

Chérif, M. H. (1977) 'Pays du Maghreb en voie de stabilisation', in A. Soboul et al.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L'essor/1715–1750* (Paris: PUF), Vol. 2, pp. 907–21.

Chérif, M. H. (1978) 'H'ammuda Pacha Bey et l'affermissement de l'antonomie tunisienne', in *Les Africains* (Paris: Jeune Afrique), Vol. 7, pp. 99–127.

Chérif, M. H. (1979a) 'Pouvoir et société dans la Tunisie de H'usayn bin Ali, 1705–1740' (Thèse de doctorat d'Etat, Université de Paris, Sorbonne).

Chérif, M. H. (1979b) 'Propriété des oliviers au Sahel dee débuts du XVIIe à ceux du XIXe siècle', in *Actes du Premier Congrès d'Histoire et de la Civilisation du Maghreb* (Tunis: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Vol. 2, pp. 209–52.

Chérif, M. H. (1980) 'Les mouvements paysans dans la Tunisie du XIXe siècle', *ROMM*, 30, pp. 21–55.

Chérif, M. H. (forthcoming) 'Al-lizma wal-lazzāma bi-Tūnis fī l-ḳarn al-thāmin ashar', *Cahiers de Tunisie*.

Chéron, G. (1924) '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 du Mossi: traditions relatives au cercle de Kaya', *BCEHSAOF*, 7, 4, pp. 634–91.

Childs, G. M. (1970) 'The chronology of the Ovimbundu Kingdom', *JAH*, 11, 2, pp. 241—57.

Chilver, E. M. (1961) 'Nineteenth century trade in the Bamenda Grassfields, Southern Cameroons', *Afrika und Übersee*, 14.

Chittick, H. N. and Rotberg, R. I. (1975)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Cultural Synthesis in Pre-colonial Times*.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hrétien, J. P. (1981) 'Le commerce du sel de l'Uvinza au XIXe siècle: de la cueillette au monopole capitaliste',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Raymond Mauny* (2 vols, Paris: SFHOM), Vol. 2, pp. 919–40.

Christaller, J. G. (1875) *A Grammar of the Asante and Fante Languages* (Basel: 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hristaller, J. G. (1933) *Dictionary of the Asante and Fante Language* (2nd edn, first edn 1881, Basel: 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lapperton, H. (1829) *Journal of a Second Expedition into the Interior of Africa* (London: Murray).

Clarence-Smith, W. G. (1979a) *Slaves, Peasants and Capitalists in Southern Angola, 1840–1926* (Cambridge: CUP).

Clarence-Smith, W. G. (1979b) 'Slaves, commoners and landlords in Bulozi *c*.1875 to 1906', *JAH*, 20, 2, pp. 219–34.

Clarence-Smith, W. G. and Moorsom, R. (1975) 'Underdevelopment and class formation in Ovamboland, 1845–1915', *JAH*, 16, 3, pp. 365–81.

Cohen, D. W. (1977) *Womunafu's Bunafu: A Study of Authority in a Nineteenth Century African Community* (Princeton: PUP).

Cohen, D. W. (1983)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exchange in the pre-colonial lakes plateau region of East Africa', in R. I. Rotberg (ed.)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Hunger: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Cohen, D. W. (forthcoming) *Busoga, 1700–1900*.

Cohen, D. W. and Greene, J. P. (eds) (1972) *Neither Slave nor Free: The freedmen of African Descent in the Slave Societies of the New World* (Baltimore: JHUP).

Cohen, R. and Brenner, L. (1974) 'Bornu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93–128.

Cohen, W. B. (1980) *The French Encounter with Africans: White Responses to Blacks, 1530–18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oleman, J. S. (1958) *Nigeria: Background to Nationalism* (Berkeley & Los Angeles: UCP).

Collins, R. O. (1975) *The Southern Sud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el Aviv, University of Tel-Aviv Students Association).

Collins, R. O. and Tignor, R. L. (1967) *Egypt and the Suda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Colomb, P. H. (1873) *Slave-Catching in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Longmans, Green).
Colvin, L. G. (1974) 'Islam and the state of Kajoor: a case of successful resistance to jihad', *JAH*, 15, 4, pp. 587–606.
Colvin, L. G. (198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enegal*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Colvin, L. G. (1982) *Kajor and the French. A Study of Diplomacy from the Slave Trade through the Conquest* (New York: Nok).
Combes, E. and Tamasier, M. (1838) *Voyage en Abyssinie, dans le pays des Galla, de Choa et d'Ifat* (4 vols, Paris: L. Dessessart).
Conrad, R. (1972) *The Destruction of Brazilian Slavery, 1850–1888* (Berkeley: UCP).
Conti Rossini, C. (1921) 'L'editto di ras Gugsa sui feudi', *Rassegna Coloniale*, 1.
Conti Rossini, C. (1947) 'Nuovi documenti per la storia d'Abissinia nel secolo XIX', *Atti del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2.
Cooper, F. (1977) *Plantation Slavery on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New Haven and London: YUP).
Coquery-Vidrovitch, C. (1971) 'De la traite des esclaves à l'exportation de l'huile de palme et des palmistes au Dahomey: XIXe siècle', in C. Meillassoux, (ed.), pp. 107–23.
Coquery-Vidrovitch, C. (1972) 'Research on an African mode of production', in M. A. Klein and G. W. Johnson (eds), pp. 33–52.
Coquery-Vidrovitch, C. (1976) 'La mise en dépendance de l'Afrique noire: essai de périodisation historique', *CEA*, 16, 1–2, pp. 7–58.
Coquery-Vidrovitch, C. and Moniot, H. (1974) *L'Afrique noire de 1800 à nos jours* (Paris: PUF).
Cordell, D. D. (1972) 'The Awlad as Sulayman'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Cordell, D. D. (1977a) 'Eastern Libya, Wadai and the Sanūsīya: A ṭariqa and a trade route', *JAH*, 18, 1, pp. 21–36.
Cordell, D. D. (1977b) 'Dar al-Kuti: a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and state formation on the Islamic frontier in northern Equatorial Africa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nd Chad)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ornevin, R. (1962) *Histoire du Dahomey* (Paris: Berger-Levrault).
Corwin, A. F. (1967) *Spai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Cuba, 1817–1886*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Coupland, R. (1933)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Mov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upland, R. (1938)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upland, R. (1939) *The Exploitation of East Africa, 1856–1890* (London: Faber).
Coursac, J. de (1926) *Une page de l'histoire d'Ethiopie. Le règne de Yohannès* (Romans).
Cousins, W. E. (1895) *Madagascar of Today: A Sketch of the Island*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Crabitès, P. (1933) *Gordon, the Sudan and Slavery* (London: Routledge).
Crahan, M. and Knight, F. W. (eds) (1979) *Af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Legacies of a Link* (Baltimore: JHUP).
Craton, M. (1978) *Searching for the Invisible Man: Slaves and Plantation Life in Jamaica* (Cambridge, Mass: HUP).
Craton, M. (ed.) (1979) *Roots and Branch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Slave Studies* (Oxford: Pergamon).
Cronon, E. D. (1962) *Black Moses: The Study of Marcus Garvey* (Madison: UWP).
Crosby Jr, A. W. (1972)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Crouchley, A. E. (1937)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n the reign of Mohammad Ali', *L'Egypte contemporaine*, 28.
Crouchley, A. E. (1938)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gypt* (London: Longmans, Green).
Crummey, D. (1969) 'Tēwodros as reformer and modernizer', *JAH*, 10, 3, pp. 457–69.
Crummey, D. (1971) 'The violence of Tēwodros',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9, 2, pp. 107–25.
Crummey, D. (1972) *Priests and Politicians: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Missions in Orthodox Ethiopia, 1830–186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ummings, R. (1975) 'Aspects of human porter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kamba of Keny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Cunnison, Ian (1959) *The Luapula Peoples of Northern Rhodesia* (Manchester: MUP).
Cunnison, Ian (1966) 'Kazembe and the Arabs to 1870',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pp. 226–37.
Curtin, P. D. (ed.) (1967) *Africa Remembered* (Madison: UWP).
Curtin, P. D. (1969)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WP).
Curtin, P. D. (1971) 'Jihad in West Africa: early phases and inter-relations in Mauritania and Senegal', *JAH*, 12, 1, pp. 11–24.
Curtin, P. D. (1975) *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Senegambia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 (Madison: UWP).

Curtin, P. D. (1976) 'Measuring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nce again: a comment', *JAH*, 17, 4, pp. 595–605.
Curtin, P. D. (1979)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M. Craton (ed.), pp. 1–17.
Curtin, P. D. (1981)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from Senegambia', in D. Eltis and J. Walvin (eds), pp. 83–97.
Curtin, P. D., Feierman, S., Thompson, L. and Vansina, J. (1978) *African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Cuypers, J. B. (1970) *L'alimentation chez les Shi*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Dachs, A. (1972)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imperialism in practice', in B. Pachai (ed.)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wi* (London: Longman), pp. 283–92.
Daget, S. (1973) 'Les mots esclave, nègre, Noir et les jugements de valeur sur la traite négrière dans la littérature abolitionniste française, de 1770 à 1845', *RFHOM*, 60, 4, pp. 511–48.
Daget, S. (1975) 'Long cours et négriers nantais du trafic illégal (1814–1833)', *RFHOM*, 62, 1–2, pp. 90–134.
Daget, S. (1979) 'British repression of the illegal French slave trade: some considerations', in H. A. Gemery and J. S. Hogendorn (eds), pp. 419–42.
Daget, S. (1980) 'Rôle et contribution des états-côtiers dans l'évolution des rapports entre Africains et Européens du XVe au XIXe siècle',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Abidjan* sér. *D. (Lettres)*, 13, pp. 311–36.
Daget, S. (1983) *Catalogue analytique des armements français soupçonnés de participation au trafic négrier illégal, 1814–1867* (Paris: SFHOM).
D'Almeida, D. (1973) 'Le Dahomey et l'administration coloniale française' (Diplôme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Viè section, Université de Paris, Sorbonne)
Darkwah, R. H. (1975) *Shewa, Menilek and the Ethiopian Empire, 1813–1889* (London: Heinemann).
Davenport, T. R. H. (1969) 'The consolidation of a new society: the Cape Colony',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272–333.
Davenport, T. R. H. (1978) *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David, R. (1970) 'Negro contributions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globe', in J. S. Roucek and T. Kiernan (eds) *The Negro Impact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Davis, D. B. (1966)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vis, D. B. (1975)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vis, R. (1973)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vis, R. W. (1976) *Ethnolinguistic Studies on the Kru Coast, Liberia* (Newark, Delaware: Liberian Studies Association).
De Cosson, E. A. (1877) *The Cradle of the Blue Nile* (London).
De Kiewiet, C. W. (1937) *The Imperial Factor in South Africa* (Cambridge: CUP).
De Kiewiet, C. W. (1968)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London: OUP).
Dean, W. (1976) *Rio Claro: A Brazilian Plantation System, 1820–1920* (Stanford: SUP).
Debbasch, Y. (1961–2) 'Le marronage: essai sur la désertion de l'esclavage antillais', *L'Année Sociologique*.
Debrunner, H. W. (1967)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Ghana* (Accra: Waterville).
Decary, R. (ed.) (1939) *Les Voyages du lieutenant de vaisseau Frappaz dans les mers des Indes* (Tananarive: Académie malgache).
Decary, R. (1960) *L'île Nosy Bé de Madagascar: histoire d'une colonisation* (Paris).
Degler, C. (1971) *Neither Black nor White: Slavery and Race Relations in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Delafosse, M. (1972) *Haut-Sénégal-Niger*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Delius, P. (1980) 'Migrant labour and the Pedi, 1840–80', in S. Marks and A. Atmore (eds), pp. 293–312.
Delivré, A. (1974) *L'Histoire des rois d'Imerina, Interprétation d'une tradition orale* (Paris: Klincksieck).
Delmond, P. (1953) 'Dans la Boucle du Niger. Dori, ville peul', in *Mélanges ethnologiques* (Mémoires d'IFAN, 23, Dakar: IFAN), pp. 9–109.
Delval, R. (1964) *Radama II: Prince de la Renaissance Malgache, 1861–1863* (Paris: Editions de l'Ecole).
Denevan, W. M. (ed.) (1976)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Madison: UWP).
Deng, F. M. (1978) *Africans of Two Worlds* (New Haven & London: YUP).
Denis, P. (1961) *Histoire des Mangbetu et des Matshaga jusqu'a l'arrivée des Belges*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Denoon, D. (1973) *Southern Africa since 1800* (New York: Praeger).

Derman, W. (1973) *Serfs, Peasants, and Socialists* (Berkeley & Los Angeles: UCP).
Derricourt, R. (1974) 'Settlements in the Transkei and Ciskei before the Mfecane', in C. Saunders and R. Derricourt (eds), pp. 39–82.
Deschamps, H. (1951) *Madagascar, Comores, Terres australes* (Paris: Berger-Levrault).
Deschamps, H. (1960) *Histoire de Madagascar* (Paris: Berger-Levrault).
Deschamps, H. (1965) *Quinze ans de Gabon: Les débuts de l'etablissement français 1839–1853* (Paris: SFHOM).
Dez, J. (1967) 'Le Vakinankaratra, esquisse d'une histoire régionale', *Bulletin de Madagascar*, 256, pp. 657–702.
Diallo, D.S. (1977) 'Origines de la guerre civile au Kaarta sous le règne de Mamary Kandia (1842–1855)', *Notes Africaines*, 53, pp. 9–10.
Diallo, H. (1979) *Le Jelgooji et le Liptako*.
Diallo, T. (1972)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Fouta Djalon au XIXe siècle (Fifi Laamu Alsilaamaaku Fuuta Jallo)* (Dakar: IFAN, Initiations et Etudes Africaines, 28).
Diarah, F.B.S. (1982) 'L'organisation politique du Maçina (Diina) 1818–1862' (Thèse de 3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Dias, J.R. (1981) 'Famine and disease in the history of Angola *c*.1830–1930', *JAH*, 22, 3, pp. 349–79.
Dickson, H.R. (1941) *The Arab of the Desert* (London: Allen & Unwin).
Dike, K.O. (1956)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jeghloul, A. (1976) 'La formation sociale algérienne à la veille de la colonisation', *La Pensée*, 185, pp. 61–81.
Djirdjis, F. (1958) *Dirâsât fi târikh Miṣr al-siyâsî mundhou-'l 'aṣr al-Mamlûkî* (Cairo: Al-Dar al-Micriyyahli'-l-Kotob).
Dodwell, H.H. (ed.) (1920) *Records of Fort St. George: Calendar of Madras Despatches* (Madras: Government Press).
Dodwell, H.H. (1931) *The Founder of Modern Egypt; a Study of Muhammad 'Ali* (Cambridge: CUP).
Doughty, C. (1926) *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 (London: Cape).
Douin, G. (1933–41) *Histoire du règne de Khédive Ismaïl* (3 vols, Rome: Société Royale de Géographie d'Egypte).
Drachoussoff, V. (1947) 'Essai sur l'agriculture indigène au Bas-Congo', *Bulletin agricole du Congo belge et du Ruanda-Urundi*.
Drake, B.K. (1976) 'Continuity and flexibility in Liverpool's trade with Africa and the Caribbean', *Business History*, 18, 1, pp. 85–97.
Drescher, S. (1976) 'Le "déclin" du système esclavagiste britannique et l'abolition de la traite', *Annales ESC*, 31, 2, pp. 414–35.
Drescher, S. (1977) *Econocide. British Slavery in the Era of Abolition*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Dubief, J. (1973) 'Les pluies, les crues et leurs effets au Sahara', in *Maghreb et Sahara: études geographiques offertes à Jean Despois* (Paris: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pp. 125–30.
Dufton, H. (1867)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Abyssinia in 1862–3* (London: Chapman & Hall).
Dugmore, R.H. (1958) *The Reminiscences of an Albany Settler* (ed. by E. Van der Riet and L. A. Hewson, Cape Town: Grocott & Sherry).
Dumett, R.E. (1971) 'The rubber trade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frican innovation and market responsiveness', *JAH*, 12, 1, pp. 79–101.
Duminy, A. and Ballard, C. (eds) (1981) *The Anglo-Zulu War: New Perspectives*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Dumont, F. (1974) *L'Anti-Sultan ou Al-Hajj Omar Tal du Fouta, Combattant de la foi* (Dakar and Abidjan: NEA).
Dunn, R.E. (1971) 'The trade of Tafilalt: commercial change in south-east Morocco on the eve of the Protectorate', *AHS*, 4, 2, pp. 271–304.
Dunn, R.E. (1972) 'Berber imperialism: the Ait Atta expansion in southeast Morocco', in E. Gellner and C. Micaud (eds), pp. 85–107.
Dunn, R.E. (1977) *Resistance in the Desert: Moroccan Response to French Imperialism*, 1881–1912 (London: Croom Helm).
Dunn, R.S. (1972) *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Dupre, G. and Massala, A. (1975) 'Marchés et pouvoir chez les Beembe', *Annales ESC*, 30, 6, pp. 1447–76
Dupuis, J. (1824)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Ashantee* (London: Henry Colburn).

Durand, P. (1930) 'Boujad, ville sainte', *Renseignements Coloniaux*, February 1980, pp. 65–77.
Dye, W. McE. (1880) *Moslem Egypt and Christian Abyssinia* (New York: Atkin & Prout).

Echard, N. (1975) 'L'expérience du passé: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paysanne hausa de L'Ader', *Etudes nigériennes*, Niamey (IRSH). 36.
Ehrensaft, P. (197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l empire in pre-colonial Nigeria, 1807–1884', *CJAS*, 6, 3, pp. 451–90.
Ekechi, F. K. (1972)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Rivalry in Igboland 1857–1914* (London: Frank Cass).
Ekejiuba, F. I. (1972) 'The Aro systems of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kenga*, 1, 1, pp. 11–26; 1, 2, pp. 10–21.
Ekman, E. (1975) 'Sweden, the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RFHOM*, 62, 226–7, pp. 221–31.
Elango, L. Z. (1974) 'Bimbia and Britis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33–1879. A study in Anglo-Bimbian trade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unpublished PhD, Boston University).
Elisseev, A. V. (1896) *Po belu svetu. Otcherki i Kartiny iz poutechestvii pe trjom tchastjam starogo sveta* (St Petersburg: Sejkin).
Ellenbergsr, D. and MacGregor, J. (1912) *A History of the Basuto,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Ellis, S. (1980) 'Resistance or collaboration: the Menalamba in the kingdom of Imerina, 1895–1899' (D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Ellis, W. (1838) *History of Madagascar* (2 vols, London: Fisher).
Ellis, W. (1858) *Three Visits to Madagascar During the Years 1853–1854–1856* (London: Murray).
Ellis, W. (1867) *Madagascar Revisited: Describing the Events of a New Reign and the Revolution which followed* (London: Murray).
Ellis, W. (nd, preface 1869) *The Marty Church: A Narrative of the Introduction, Progress and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in Madagascar* (London: Snow)
Eltis, D. (1977) 'The export of slaves from Africa, 1821–184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2, pp. 409–33.
Eltis, D. (1979) 'The direction and fluctuation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1821–1843: a revision of the 1845 Parliamentary Paper', in H. A. Gemery and J. S. Hogendorn (eds), pp. 273–302.
Eltis, D. and Walvin, J. (eds) (1981) *The Abolition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rigins and Effects in Europe,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Madison: UWP).
Engerman, S. L. and Genovese, E. D. (eds) (1975)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ntitative Studies* (Princeton: PUP).
Erckmann, J. (1885) *Le Maroc moderne* (Paris: Challamel).
Esoavelomandroso, M. (1978a) 'Notes sur l'enseignement sous Ranavalona Ière: l'instruction réservée à l'élite', *Ambario*, 2–3, pp. 283–90.
Esoavelomandroso, M. (1978b) 'Religion et politique: l'évangélisation du pays betsimisarka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Omaly sy Anio*, 7–8, pp. 7–42.
Estermann, C. (1956–61) *Etnografia do sudoeste de Angola* (3 vols,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oès do Ultramar).
Etherington, N. A. (1979) 'Labour supply and the genesis of South African confederation in the 1870s', *JAH*, 20, 2, pp. 235–53.
Etherington, N. A. (1981) 'Anglo-Zulu relations, 1856–78', in A. Duminy and C. Ballard (eds), pp. 13–52.
Evans-Pritchard, E. E. (1949) *The Sanusi of Cyrenaica* (London: OUP).

Fage, J. D. (195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 (2nd edn, Cambridge: CUP).
Fage, J. D. (1975) 'The effect of the export slave trade on African population', in R. P. Moss and R. J. Rathbone (eds), *The Population Factor in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pp. 15–23.
Fahmy, M. (1954) *La révolution de l'industrie en Egypte et ses conséquences sociales au XIXe siècle (1800–1850)*, (Leiden: Brill).
Faidherbe, L. (1863) *L'Avenir du Sahara et du Soudan* (Paris: Librairie Challamel Aine).
Fantahun Birhane (1973) 'Gojjam 1800–1855' (fourth-year student essay, Haile Sellassie I University, Addis Ababa).
Farsy, A. S. (1942) *Seyyid Said bin Sultan* (Zanzibar: Mwongozi Printing Press).
Fauroux, E. (1970) 'Le royaume d'Ambohidranandriana', *Taloha*, 3, pp. 55–83.
Feierman, S. (1974) *The Shambaa Kingdom: A History* (Madison: UWP).
Feo Cardoso, J. C. (1825) *Memorias contendo a biographia do vice almirante Luiz da Motta Feo e Torres* (Paris: Fantin).
Féraud, L. C. (1927) *Annales tripolitaines* (Tunis/Paris: Tournier/Vuibert).

Ferrandi, U. (1903) *Seconda spedizione Bòttego. Lugh, emporio commerciale sul Giuba* (Rome: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
Ferret, P. V. and Galinier, J. G. (1847–8) *Voyage en Abyssinie* (Paris: Paulin).
Filliot, J. M. (1974) *La traite des esclaves vers les Mascareign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ORSTOM).
Finley, M. I. (1976) 'A peculiar instituti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877, pp. 819–21.
Fisher, H. J. and Rowland, V. (1971) 'Firearms in the Central Sudan', *JAH*, 12, 3, pp. 215–39.
Flint, E. (1970) 'Trade and politics in Barotseland during the Kololo period', *JAH*, 11, 1, pp. 71–86.
Flint, J. E. (1963) 'The wider background to partition and colonial occupation',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352–90.
Flint, J. E. (1974) 'Economic change in We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380–401.
Flint, J. E. (ed.) (197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5, from c.1790 to c.1870* (Cambridge: CUP).
Florent, H. (1979) *Le gouvernement de Tamatave de 1864 à 1882.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Tananarive: TER, Département d'histoire).
Fogel, R. W. and Engerman, S. L. (1974)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2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Folayan, K. (1967) 'The Egbado and Yoruba-Aja power politics, 1832–1894'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Ibadan).
Folayan, K. (1972) 'Tripoli and the war with the USA, 1801–5', *JAH*, 13, 2, pp. 261–70.
Foner, L. (1970) 'The free people of color in Louisiana and St Dominique: a comparative portrait of two three-caste slave societie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 4, pp. 406–30.
Forde, D. (1951) *The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Western Nigeria* (London: IAI).
Forde, D. (ed.) (1956) *Efik Traders of Old Calabar* (London: OUP).
Forde, D. (ed.) (1967) *West Africa. Kingdo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OUP).
Forde, D. and Jones, G. I. (1950) *The Ibo and Ibibio-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Eastern Nigeria* (London: IAI).
Foster, P. (1965)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Ghana*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Franklin, J. H. (1969)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Americans* (3rd edn, New York: Knopf).
Freeman, R. A. (1898) *Travels and Life in Ashanti and Jaman* (London: Constable).
Freeman, T. B. (1843) *Journal of Two Visits to the Kingdom of Ashantee in Western Africa* (London: Mason).
Freeman-Greenville, G. S. P. (1962)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reeman-Greenville, G. S. P. (1963) 'The coast, 1498–1840',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129–68.
Freeman-Greenville, G. S. P. (1965) *The French At Kilwa Is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reund, W. M. (1974)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ape eastern frontier zone', in C. Saunders and R. Derricourt (eds), pp. 83–99.
Frost, J. (1974) 'A history of the Shilluk of the southern Suda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Fulton, R. M. (1968) 'The Kpell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 *Liberian Studies Journal*, 1, 1, pp. 1–19.
Fyfe, C. (1962)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yfe, C. (1963) *Sierra Leone Inheritance* ((London: OUP).
Fyfe, C. (1972) *Africanus Horton, 1835–1883* (New York: OUP).
Fyfe, C. (ed.) (1978) *African Studies since 1945: A Tribute to Basil Davidson* (London: Longman).
Fyle, C. M. (1981) *The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A Concise Introduction* (London: Evans).
Fynn, H. (1888) in J. Bird (ed.) *Annals of Natal 1495–1845* (2 vols, Pietermaritzburg: Davis).
Fynn, J. K. (1974) 'The structure of Greater Ashanti: another view', *THSG*, 15, 1, pp. 1–22.

Gabira Madihin Kidana (1972) 'Yohannes IV: religious aspects of his internal policy' (fourth-year student essay Haile Sellassie I University, Addis Ababa).
Galbraith, J. S. (1970) 'Myth of the "Little England" era', in A. G. L. Shaw (ed.)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onies, 1815–1865* (London: Methuen), pp. 27–45.
Gallagher, J. and Robinson, R. (1953)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 1.
Gallisot, R. (1965) 'Abdelkader et la nationalité algérienne', *Revue Historique*, 89, 2, pp. 339–68.
Gallisot, R. and Valensi, L. (1968) 'Le Maghreb précolonial: mode de production archaïque ou mode de production féodal', *La Pensée*, 142, pp. 57–93.
Ganiage, J. (1959) *Les origines du protectorat français en Tunisie (1861–1881)* (Paris: PUF).

Gann, L. (1972) 'The end of the slave trade in British Central Africa: 1889–1912', in M. Klein and G. W. Johnson (eds).
Gann, L. H. and Duignan, P. (eds) (1969)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1: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870–1914* (Cambridge: CUP).
Gann, L. H. and Duignan, P. (eds) (1970)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2: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14–1960* (Cambridge: CUP).
Gardel, G. (1961) *Les Touareg Ajjer* (Algiers: Baconnier).
Gbadamosi, T. G. (1979) *The Growth of Islam among the Yoruba* (London: Longman).
Gellner, E. (1969) *Saints of the Atla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Gellner, E. (1972)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organisation of the Berbers of the central High Atlas', in E. Gellner and C. Micaud (eds), pp. 59–66.
Gellner, E. (1978) 'Review of C. L. Brown, *The Tunisia of Ahmed Bey, 1837–185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4, 1, pp. 127–30.
Gellner, E. and Micaud, C. (eds) (1972) *Arabs and Berbers.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North Africa* (London: Duckworth).
Gemery, H. A. and Hogendorn, J. S. (eds) (1979) *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enovese, E. D. (1968) *Economie politique de l'esclavage* (Paris: Maspero).
Genovese, E. D. (1974)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Pantheon).
Gerresch, C. (1976) 'Une lettre d'Ahmed al-Bakkay de Tombouctou à Al-Hajj Umar', *BIFAN (B)*, 28, pp. 890–903.
Ghurbâl, M. S. (1928)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A Study in the Diplomacy of the Napoleonic Era based on Researches 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Archive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Ghurbâl, M. S. (1944) *Mohammad-'Ali al-Kabir* (Cairo: Dar Ihya al-Kotob al-'Arabiyyah).
Gibb, H. A. R. and Bowen, H. (1950)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London: OUP).
Gibson, C. (1967) *Spai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Girard, S. (1873) *Souvenir d'un voyage en Abyssinie* (Paris).
Girault, L. (1959) 'Essai sur les religions des Dagara', *BIFAN*, 21, pp. 329–56.
Gluckman, M. (1963) 'The rise of a Zulu empire', *Scientific American*, 202.
Gobat, S. (1834) *Journal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Abyssinia* (London: Hatchard and Son).
Godelier, M. (1975) 'Modes of production, kinship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 M. Bloch (ed.), *Marxist Analysi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Malaby), pp. 3–29.
Goerg, O. (1980) 'La destruction d'un réseau d'échange précolonial: l'exemple de la Guinée', *JAH*, 21, 4, pp. 467–84.
Good, C. M. (1972) 'Salt, trade and diseas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s northern great lakes region', *IJAHS*, 5, 4, pp. 543–86.
Goodfellow, C. F. (1966) *Great Britain and South African Confederation 1870–1881* (Cape Town: OUP).
Gordon, C. G. (1902) *Letters of General C. G. Gordon to his sister M. A. Gord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Gourou, P. (1955) *La densité de la population rurale au Congo belge* (Brussels: ARSC).
Gourou, P. (1971) 'Favourable or hostile physical environments', in *Leçons de géographie tropicale*, (The Hague-Paris: Mouton), pp. 89–90
Gow, B. A. (1979) *Madagascar and the Protestant Impact: The Work of the British Missions, 1818–95* (London: Longman).
Gran, P. (1979) *Islamic Roots of Capitalism: Egypt 1760–1840* (Austin &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Grandidier, A. and Grandidier, G. (eds) (1942) *Histoire Physique, Naturelle et Politique de Madagascar* (36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Gray, J. M. (1947) 'Ahmed b. Ibrahim – the first Arab to reach Buganda', *UJ*, 11, pp. 80–97.
Gray, J. M. (1957) 'Trading expeditions from the coast to Lakes Tanganyika and Victoria before 1857', *TNR*, 2, pp. 226–47.
Gray, J. M. (1962) *History of Zanzibar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1856* (London: OUP).
Gray, J. M. (1963) 'Zanzibar and the coastal belt, 1840–1884',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212–51.
Gray, R. (1965) 'Eclipse maps', *JAH*, 6, 3, pp. 251–62.
Gray, R. (1970)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udan, 1839–188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ray, R. and Birmingham, D. (eds) (1970) *Pre-colonial African Trade: Essays on Trad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frica before 1900* (London: OUP).
Great Britain, House of Commons (1868)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byssinia 1846–1868* (London).

Green, A. H. (1978) *The Tunisian Ulama, 1873–1915* (Leyden: Brill).
Green, W. A. (1974) 'The West Indies and British West African polic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rrective comment', *JAH*, 15, 2, pp. 247–59.
Green-Pedersen, S. E. (1975) 'The history of the Danish slave trade, 1733–1807', *RFHOM*, 62, 226–7, pp. 196–220.
Greenberg, J. H. (1966) *Languages of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reenfield, R. (1965)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Pall Mall).
Groves, C. P. (1954) *The Planting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Vol. 2 (London: Lutterworth).
Guèbrè Sellassié, G. (1930–2) *Chronique du règne de Ménélik II, roi des rois d'Ethiopie* (Paris: Maisonneuve).
Guilhem, H. and Hebert, J. (1961) *Précis d'Histoire de la Haute-Volta* (Paris: Ligel).
Guillain, C. (1845)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la géographie et le commerce de la partie occidentale de Madagascar* (2 vol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Guillain, C. (1856)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la géographie et le commerc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2 vols, Paris: Bertrand).
Guillaume, H. (1976) 'Les liens de dépendance à l'époque précoloniale, chez les Touaregs de l'Imannen (Niger)', *ROMM*, 21, pp. 111–29.
Gulliver, P. H. (1955) 'A history of the Songea Ngoni', *TNR*, 41, pp. 16–30.
Gulliver, P. H. (1963) *Social Control in an African Society: A Study of the Arusha Agricultural Maasai of Northern Tanganyika*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Gutman, H. G. (1975) *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 A Critique of Time on the Cro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uy, J. (1977) 'Ecological factors in the rise of Shaka and the Zulu kingdom', (paper read at the Conference on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esotho, 1–6 August 1977).
Guy, J. (1980) *The Destruction of the Zulu Kingdom. The Civil War in Zululand 1879–1884* (London: Longman).
Guy, J. (1981) 'The role of colonial officials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Zulu kingdom', in A. Duminy and C. Ballard (eds), pp. 148–69.
Gwei, S. N. (1966) *History of the British Baptist Mission in Cameroons with beginnings in Fernando Po 1841–1866* (unpublished mémoire de maîtrise, Séminaire de théologie baptiste, Rushlikon-Zurich).

al-Hachaichi, M. (1912) *Voyage au pays senoussiya* (Paris: Challamel).
Hafkin, N. (1973) 'Trad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orthern Mozambique'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Hair, P. (1963) 'Notes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Vai script', *Sierra Leone Language Review*, 2.
al-Hajj, M. A. (1964) 'The Fulani concept of jihad', *Odu*, 1, pp. 45–58.
al-Hajj, M. A. (1967) 'The 13th century in Muslim escatology: Mahdist expectations in the Sokoto caliphate', *Research Bulletin, Centre for Arabic Documentation* (Ibadan), 3, 2, pp. 100–15.
Haliburton, G. M. (1971) *The Prophet Harris* (London: Longman).
Hall, G. M. (1971) *Social Control in Slave Plantation Societies: A Comparison of St Domingue and Cuba* (Baltimore: JHUP).
Hamani, D. (1975)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des états Hausa: l'Adar précolonial* (Niamey: IRSH).
Hamani, D. (1979) 'Adar, the Touareg and Sokoto', in Y. B. Usman (e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Sokoto: State History Bureau), pp. 392–407.
Hamid, A. A. A. (1980) 'Abdullah b. Fudi as an exegetist' (PhD thesi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Hamilton Jr, R. G. (1970) 'The present state of African cults in Bahia',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 4, pp. 356–73.
Hammond, R. J. (1966) *Portugal and Africa, 1815–1910* (Stanford: SUP).
Hammond, R. J. (1969) 'Uneconomic imperialism: Portugal in Africa before 1910',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pp. 352–82.
Hancock, W. K. (1942) *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Vol. 2: Problems of Economic Policy, 1918–39* (London: OUP).
Hanke, L. (1970) *Aristotl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A Study in Race Prejudice in the Modern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dyman, J. T. (1977) 'Malagasy refugees to Britain, 1838–41', *Omaly sy Anio*, 5–6, pp. 141–89.
Harries, L. (1961) *Swahili Poet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rries, P. (1981) 'Slavery, social incorporation and surplus extraction: the nature of free and unfree labour in south-east Africa', *JAH*, 22, 3, pp. 309–30.
Harris, M. (1964) *Patterns of Rac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Walker).
Harris, R. (1972) 'The history of trade at Ikom, Eastern Nigeria', *Africa*, 63, 2, pp. 122–39.

Harris, R. (1982) 'The horse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Africa*, 52, 1, pp. 81–5.
Harris, W. C. (1844) *The Highlands of Ethiopia* (London: Longman)
Hart, D. M. (1966) 'Segmentary system and the role of "five-fifths" in tribal Morocco', *ROMM*, 3, pp. 65–95.
Hart, D. M. (1970) 'Conflicting models of Berber tribal structure in the Moroccan Rif: the segmentary alliance systems of the Aith Waryachar', *ROMM*, 7, pp. 93–100.
Hartwig, G. W. (1970) 'The Victoria Nyanza as a trade rou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H*, 11, 4, pp. 535–52.
Hartwig, G. W. (1976) *The Art of Survival in East Africa: The Kerebe and Long-Distance Trade, 1800–1895*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Hartwig, G. W. (1978)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pidemic diseas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astern Africa', in G. W. Hartwig and K. D. Patterson (eds), pp. 25–42.
Hartwig, G. W. and Patterson, K. D. (eds) (1978) *Disease in African Histor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san, Y. F. (1967) *The Arabs and the Suda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Hassan, A. and Naibi, A. S. (1962) *A Chronicle of Abuja* (Lagos: African Universities Press).
al-Haṭṭāb, A. (1935) 'Dirasāt tārikhiyya iḳtiṣadiyya li 'aṣr Muḥammad 'Ali i: al-iḥtikār wa'l-nizām al-zirā 'ī', *Madjallat Koulliyat Ādāb al Ḳāhira*, 3, 1935.
Hay, J. D. (1896) *A Memoir* (London: Murray).
Hay, M. J. (1975)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Kowe, western Kenya', *Hadith*, 5, pp. 90–107.
Hebert, J. et al. (1976) *Esquisse monographique du pays dagara* (Diebougou: roneo).
Hedges, D. (1978) 'Trade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Mozambique and Zululand in th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Herold, J. C. (1962) *Bonaparte en Egypte* (Paris: Plon).
Herskovits, M. J. (1938) *Dahomey, an Ancient West African Kingdom* (New York: J. J. Augustin).
Hertslet, E. (1894) *The Map of Africa by Treaty* (2 vols, London: Harrison).
Hichens, W. (ed.) (1939) *Al-Inkishafi: The Soul's Awakening* (London: Sheldon Press).
Higman, B. W. (1976) *Slav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Jamaica 1807–1832* (New York: CUP).
Hill, G. B. (1887) *Colonel Gordon in Central Africa* (London).
Hill, P. (1977) *Population, Prosperity and Poverty. Rural Kano 1900 and 1970* (Cambridge: CUP).
Hill R. (1965) *Sudan Transport* (London: OUP).
Hill, R. (1966) *Egypt in the Sudan* (London: OUP).
Hill, R. A. (ed.) (1983) *The Marcus Garvey and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Papers*, Vols 1 and 2 (Berkeley: UCP).
Hiskett, M. (1962) 'An Islamic tradition of reform in the Western Suda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SOAS*, 25, pp. 577–96.
Hiskett, M. (1973) *The Sword of Truth* (New York: OUP).
Hiskett, M. (1975) *A History of Hausa Islamic Verse* (London: SOAS).
Hiskett, M. (1976) 'The nineteenth-century jihads in West Africa', in J. E. Flint (ed.), pp. 125–69.
Hitchcock, R. and Smith, M. R. (eds) (1982) *Settlement in Botswana* (London. Heinemann).
Hobsbawm, E. J. (1977) *Industry and Empire* (new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Hodgkin, T. (1956)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London: Muller).
Hoetink, H. (1973) *Slavery and Race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s: Comparative Notes on their Nature and Nexus* (New York: Harper & Row).
Hoetink, H. (1979) 'The cultural links', in M. Crahan and F. W. Knight (eds).
Hogendorn, J. S. (1977) 'The economics of slave use on two "plantations" in the Zaria emirate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IJAHS*, 10, 3, pp. 369–83
Holland, T. J. and Hozier, H. M. (1870) *Record of the Expedition to Abyssinia* (London: HMSO).
Holsoe, S. E. (1967) 'The cassava-leaf people: an ethn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Vai people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Tewo chiefdom'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Holt, P. M. (1970) *The Mahdist State in the Sudan 1881–1898*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olt, P. M. (1973)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London: OUP).
Holt, P. M. (1976) 'Egypt and the Nile Valley', in J. E. Flint (ed.), pp. 13–50.
Hopkins, A. G. (1970) 'The creation of a colonial monetary system: the origins of the West African Currency Board',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3, 1, pp. 101–32.
Hopkins, A. G. (1973)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Hopkins, A. G. (1980) 'Africa's Age of Improvement', *HA*, 7, pp. 141–60.
Hopkins, T. K. and Wallerstein, I. (1982)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world-economy', in T. K. Hopkins, I. Wallerstein, et al.,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Sage), pp. 104–20.

Horton, J. A. (1969) *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s* (ed. by G. Sheppers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Horton, R. (1954) 'The ohu system of slavery in a northern Ibo village-group', *Africa*, 24, 4, pp. 311–6.
Horton, R. (1969) 'From fishing village to city-state: a social history of New Calabar', in M. Douglas and P. Kaberry (eds) *Man in Africa* (London: Tavistock), pp. 37–58.
Hourani, A. (1962)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London: OUP).
Howard, A. M. (1976) 'The relevance of spatial analysis for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Sierra Leone–Guinea system', *JAH*, 17, 3, pp. 365–88.
Hozier, H. M. (1869)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Abyssinia* (London: Macmillan).
Hrbek, I. (1968) 'Towards a periodisation of African history', in T. O. Ranger (ed.), pp. 37–52.
Hrbek, I. (1979) 'The early period of Maḥmadu Lamin's activities', in J. R. Willis (ed.), pp. 211–32.
Hughes, A. J. B. (1956) *Kin, Caste and Nation amongst the Rhodesian Ndebele* (Rhodes-Livingstone Papers, 25, Manchester: MUP).
Hulstaert, G. (1976) *Proverbes Mongo*, no. 49, Relations commerciales de l'Equateur, *Enquêtes et documents d'histoire africaine* (Louvain: mimeograph).
Ḥumayda, B. K. (1973) 'Malamiḥ nin Ta'rikh al-Sūdān fi 'ahd al-Kidiwi Ismā'īl, 1863–1879'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Hunt, D. R. (1937) 'An account of the Bapedi', *Bantu Studies*, 5.
Huntingford, G. W. B. (1955) *The Galla of Ethiopia: The Kingdoms of Kafa and Janjero* (London: IAI).
Hurgronje, J. S. (1970) *Mekka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Daily Life, Customs and Learning of the Moslims of the East-Indian Archipelago* (Leiden: Brill).

Ibn Abī-Dhiyāf, A. (1963–4) *Ith'āf ahl al-zamān bi-akhbar muluk Tunis wa'ahb al-aman* (Tunis: SEACI).
Ibn Zaïdān (1929–33) *Ithar A'lām al-Nās bi-Jamāl Akhbār Hādirat Maknās* (5 vols, Rabat).
Ibn Zaïdān (1961–2) *Al-'Izz wa al-Sawla fi Ma'ālim Nudhum al-Dawla* (2 vols, Rabat).
Ibrāhīm, H. A. (1973) *Muḥammad 'Alī fī "al-Sūdān: dirāsah li-aḥdāf alfatḥ al-Turkī-al-Miṣrī* (Khartoum: KUP).
Ibrāhīm, H. A. (1980a) *Muḥammad 'Alī fī'al Sūdān 1838–1839* (Khartoum).
Ibrāhīm, H. A. (1980b) *Rihlat Muḥammad 'Alī ila al-Sūdān 1838–9* (Khartoum).
Inikori, J. E. (1977) 'The import of firearms into West Africa, 1750–1807: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JAH*, 18, 3, pp. 339–68.
Inikori, J. E. (ed.) (1982a) *Forced Migration. The Impact of the Export Slave Trade on African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Inikori, J. E. (1982b) 'Introduction', in J. E. Inikori (ed.), pp. 13–60.
Inskeep, R. R. (1969) 'The archaeological background',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Vol. I, pp. 1–39.
Isaacman, A. (1972a) *The Africanization of a European Institution; the Zambezi Prazos, 1750–1902* (Madison: UWP).
Isaacman, A. (1972b) 'The origin, form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kunda of South-Central Africa', *JAH*, 13, 3, pp. 443–62.
Isaacman, A. (1973) 'Madzi-Manga, Mhondoro and the use of oral traditions – a chapter in Baru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history', *JAH*, 14, 3, pp. 395–409.
Isaacman, A. (1976) *The Tradition of Resistance in Mozambique: Anti-Colonial Activity in the Zambesi Valley 1850–1921* (Berkeley: UCP).
Isaacman, A. and Isaacman, B. (1977)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c. 1850–1920', *IJAHS*, 10, 1, pp. 31–62.
Isenberg, C. W. and Krapf, J. L. (1843) *Journals ... detailing their Proceedings in the Kingdom of Shoa* (London: Seeley, Burnside & Seeley).
Isichei, E. (1973) *The Ibo people and the Europeans: The Genesis of a Relationship to 1906* (London: Faber).
Issawi, C. P. (1963) *Egypt in Revolu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OUP).
Issawi, C. P. (1966)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1914; a Book of Read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taly,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1906) *Trattati, convenzioni, accordi, protocolli ed altri documenti dll' Africa* (Rome).
Ivanov, N. A. (1976) 'Tunisia' and 'Libya', in V. G. Solodovnikov (ed.) *Istorija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i bordy narodov Afriki v Novoe uremja* (Moscow: Naouka).
Izard, M. (1970)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royaumes Mossi* (2 vols, Recherches Voltaiques, 12, Paris/Ouagadougou: CNRS/CVRS).

al-Jabri, M. A. (nd) *Fi Sha'n Allah* (Cairo).
Jackson, K. A. (1972) 'An ethn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oral traditions of the Akamba of Keny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Jacob, G. (1977) 'Influences occidentales en Imerina et déséquilibres économiques avant la conquête française', *Omaly sy Anio*, 5–6, pp. 223–31.
Jacobs, A. H. (1965)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pastoral Massai' (D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Jaenen, C. J. (1966) 'Theodore II and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thiopia',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1, 2, pp. 26–56.
Jago, T. S. (1902) 'Report on the trade and economy of the Vilayet of Tripoli in Northern Africa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in Great Britain,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Vol. 103.
Jah, O. (1973) 'Sufism and nineteenth century jihad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al-Hajj Umar al-Futi's philosophy of jihad and its sufi bases' (PhD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Jakobsson, S. (1972) *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 British Missions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ry in West Af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1756–1838* (Uppsala: Gleerup).
Jésman, C. (1958) *The Russians in Ethiopia. An Essay in Futili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Jésman, C. (1966) 'The tragedy of Magdala: a historical study', *Ethiopia Observer*, 10.
Johnson, M. (1970) 'The cowrie currencies of West Africa', *JAH*, 11, 1, pp. 17–49; 3, pp. 331–53.
Johnson, M. (1976a) 'Calico caravans: the Tripoli-Kano trade after 1880', *JAH*, 17, 1, pp. 95–117.
Johnson, M. (1976b)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an Islamic theocracy – the case of Masina', *JAH*, 17, 4, pp. 481–95.
Johnson, M. (nd) *Salaga Papers* (2 vols, Lego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Johnson, S. (1921) *History of the Yorubas* (London: Routledge).
Johnston, C. (1844) *Travels in Southern Abyssinia* (London: J. Madden and Co).
Johnston, H. H. (1902) *The Uganda Protectorate*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Johnston, H. A. S. (1967) *The Fulani Empire of Sokoto* (London: OUP).
Jones, A. (1981) 'Who were the Vai?', *JAH*, 22, 2, pp. 159–78.
Jones, G. I. (1963) *The Trading States of the Oil Rivers: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Nigeria* (London: OUP).
Jordan, W. (1968)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Joseph, R. A. (1974) 'Settlers, strikers and *Sans-Travail*: the Douala riots of September 1945', *JAH*, 15, 4, pp. 669–87.
Julien, C. A. (1964)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ne*, Vol. 1, *La conquête et les débuts de la colonisa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Julien, C. A. (1967) *Les Africains* (Paris: Jeune Afrique).
July, R. (1967) *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 (New York: Praeger).
Juneidu, Alhaji (1957) *Tarihin Fulani* (Zaria).

Kachinsky, V. (1935) *Les aspects historiques et sociaux de la question de l'or du Togo* (Paris).
al-Kadir (1903) *Tuhfat as-airfi maathir al-amīr Abd-al-Kadir* (Alexandria).
Kagame, A. (1961) *L'histoire des armées bovines dans l'ancien Rwanda* (Brussel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 d'Outre-Mer).
Kagame, A. (1963) *Les Milices du Rwanda précolonial* (Brussel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 d'Outre-Mer).
Kamara, M. (1975) *La vie d'El Hadji Omar* (trans. by Amar Samb, Dakar: Editions Hilal).
Kamuhangire, E. M. (1972a)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Uganda salt lakes region, 1500–1800' (seminar paper Makerere University).
Kamuhangire, E. M. (1972b) 'Pre-colonial trade in south-western Uganda' (seminar paper Makerere University).
Kamuhangire, E. M. (1976) 'The precolonial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ast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outh-western Uganda salt lakes region', *Hadith*, 5, pp. 66–89.
Kanya-Forster, A. S. (1969) *The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Sudan* (Cambridge: CUP).
Kaplow, S. B. (1977) 'The mudfish and the crocodile: underdevelopment of a West African bourgeoisie', *Science and Society*, 41, pp. 313–33.
Kaplow, S. B. (1978)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raditional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old Coast', *CJAS*, 12, 1, pp. 19–36.
al-Kardūdī, M. (nd) *Kash al-Ghumma bi-Bayān anna Harb al-Nidhām haqq 'alā al-Umma* (Fez).
Kasirye, J. (1959) *Abaterega Ku Namulondo ya Buganda* (London).
Kasozi, A. B. (1974) 'The spread of Islam in Uganda, 1844–1945'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Katzen, M. F. (1969) 'White settlers and the origin of a new society, 1652 -1778',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187 232.
Keenan, J. (1972) 'Social change among the Tuareg', in E.Gellner and C. Micaud (eds), pp. 345–60.
Keenan, J. (1977) *The Tuareg: People of Ahaggar* (London: Allen Lane).
Kellenbenz, H. (1981) 'Zanzibar et Madagascar dans le commerce allemand, 1840–1880', *Colloque de Majunga sur l'histoire et la culture du nord-ouest*.
Kelly, J.B. (1968) *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 1795–188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enny, M. (1979) 'Pre-colonial trade in eastern Lake Victoria', *Azania*, 14, pp. 97–107.
Kent, R. K. (1962) *From Madagascar to the Malagasy Republic*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Kevalevskii, M.M. (1879) *Obchinnoje zemlevladejije pritahiny, khod i posledstvija ege razlogenija* (Moscow).
Khallaf, H. (1962) *Al-tagdid fi'l-iqticad al-Micri al-hadith* (Cairo: 'Issa al-Babi al-Hababi & Co).
Khankī, G. (1948) 'Ibrāhīm bāshā', *Al-kitāb*, 6.
Kīetegha, J. B. (1983) *L'or de la Volta Noire* (Paris: Karthala).
Kimambo, I. N. (1969)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re of Tanzania c. 1500–1900* (Nairobi: EAPH).
Kimambo, I. N. (1970)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Kamba 1850 -1950', *Hadith*, 2, pp. 79–103.
Kimambo, I. N. (1974) 'The Eastern Bantu peoples', in B. A. Ogot (ed.), pp. 195–209.
Kimambo, I. N. and Temu, C. W.. (eds) (1969) *A History of Tanzania* (Nairobi: EAPH)
Kimble, D. (1963)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istner, W. (1952) 'The anti-slavery agitation against the Transvaal Republic, 1852–1868', in *Archives Year Book for South African History* (Pretor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Arts and Science), 2, pp. 193–225.
Kittler, G. D. (1961) *The White Fathers* (New York: Image Books).
Kiwanuka, M. S. N. (1967) *Mutesa of Uganda* (Nairobi: EAPH).
Kiwanuka, S. N. (1972) *A History of Buganda* (London: Longman).
Ki-Zerbo, J. (1953) 'La pénétration française dans les pays de la Haute-Volta' (pre-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de Paris).
Kjekshus, H. (1977) *Ecology Contro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 Heinemann).
Klein, H. S. (1972)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from Angol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4, pp. 894–918.
Klein, H. S. (1976) 'The Cuban slave trade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1790–1843', *RFHOM*, 62, 226–7, pp. 67–89.
Klein, H. S. (ed.) (1978) *The Middle Passag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Princeton: PUP).
Klein, M. A. (1968) *Islam and Imperialism in Senegal Sine-Saloum, 1847–1914* (Stanford: SUP).
Klein, M. A. (1972)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Muslim revolution in Senegambia', *JAH*, 13, 3, pp. 419–41.
Klein, M. A. (1975) 'The study of slavery in Africa', *JAH*, 19, 4, pp. 599–609.
Klein, M. A. and Johnson, G. W. (eds) (1972) *Perspectives on the African Past*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Knight, F. W. (1970) *Slave Society in Cub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dison: UWP).
Knight, F. W. (1974) *The African Dimens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and Bibliography*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Kolmodin, J. (1912–15) *Traditions de Tsazzega et Hazzega* (3 vols, Rome: C. de Luigi).
Koné, A. (1978) 'La prise de Segu et la fin d'El Hadj Omar', *Notes Africaines*, 159, pp. 61–3.
Kraiem, A. (1983) 'Ali ben Khalifa', in *Réactions à L'occupation française de la Tunisie en 1881* (Tunis: CNUDST), pp. 145–58.
Krapf, J. L. (1860) *Travels, Researches and Missionary Labors during an Eighteen Years' Residence in Eastern Africa*. (Boston: Ticknor & Fields).
Kriecken, G. S. van (1976) *Khayr al-din et la Tunisie (1850–1881)* (Leiden: Brill).
Kuper, H. (1947) *An African Aristocracy: Rank among the Swazi of Bechuanaland* (London: OUP).
Kuper, L. (1971) 'African nationalism in South Africa, 1910–1964',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424–76.

Lacheraf, M. (1978) *L'Algérie, nation et société* (2nd edn, Algiers: SNED).
Laitin, D. D. (1982)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state formation among the Yorub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6, 4, pp. 657–714.
Lancaster, C. S. (1974) 'Ethnic identity, history and "tribe" in the middle Zambesi valley', *American Ethnologist*, 1, pp. 707 30.

Landa, R.G. (1976) *Borba algirskogo naroda protiv europejskoi kolonisatsii, 1830–1918* (Moscow: Naouka).
Landau, J.M. (1953) *Parliaments and Parties in Egypt* (Tel Aviv: Israel Publishing House).
Landau, J.M. (1958) *Studies in the Arab Theater and Cinem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ander, R. (1830) *Records of Captain Clapperton's Last Expedition* (London: Colburn & Bentley).
Landes, David S. (1958) *Bankers and Pash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 (London: Heinemann).
Langworthy, H.W. (1971) 'Conflict among rulers in the history of Undi's Chewa kingdom', *TAJH*, 1, pp. 1–24.
Langworthy, H.W. (1972) *Zambia Before 1890* (London: Longman).
Langworthy, H.W. (nd) 'Swahili influence in the area between Lake Malawi and the Luangwa riv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aroui, A. (1970) *L'histoire du Maghreb. Un essai de synthèse* (Paris: Maspero).
Laroui, A. (1975) *L'histoire du Maghreb*, Vol. 2 (Paris: Maspero).
Laroui, A. (1977) *Les origines sociales et culturelles du nationalisme marocain (1830–1912)* (Paris: Maspero).
Last, M. (1967a) *The Sokoto Caliphate* (London: Longman).
Last, M. (1967b) 'A note on the attitudes to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Sokoto jihad', *JHSN*, 4, 1, pp. 3–13.
Last, M. (1974) 'Reform in West Africa: the jihad movem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F.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1–29.
Last, M. (1988) 'Reform in West Africa: the jihad movem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F.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2, (new edn, London: Longman).
Last, M. and al-Hajj, M.A. (1965) 'Attempts at defining a Muslim in 19th century Hausaland and Bornu', *JHSN*, 3, 2, pp. 231–40.
Latham, A.J.H. (1972)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nd economic tension in pre-colonial Old Calabar', *JAH*, 13, 2, pp. 249–60.
Latham, A.J.H. (1973) *Old Calabar, 1600–1891.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upon a Tradi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atham, A.J.H. (1978)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early palm oil trade', *JAH*, 19, 2, pp. 213–18.
Laugel, A. (1959) 'Les Tadjakant, caravaniers du désert', *Bulletin de Liaison Saharienne*, 10, 6, pp. 301–10.
Lavers, J.E. (1977) 'El-Kanemi (1775–1837)', in C.A. Julien (ed.) *Les Africains* (Paris: Éditions Jeune Afrique), Vol. 7, pp. 45–71.
Lavers, J.E. (1980) 'Kanem and Borno to 1808', in O. Ikime (ed.) *Groundwork of Nigeria History* (Ibadan: Heinemann),, pp. 187–209.
Law, R. (1977) *The Oyo Empire, c. 1600–c. 1836: A West African Imperialism in the Era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aw, R. (1980) *The Horse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 IAI).
Leary, F.A. (1969) 'Islam, politics, and colonialism. A political history of Islam in the Casamance region of Senegal (1850–1919)' (PhD thes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ebel, P. (1974) 'Oral traditions and chronicles on Gurage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12, 2, pp. 95–106.
Lefèbvre, T. (1845–54) *Voyage en Abyssinie* (6 vols, Paris: A. Bertrand).
Lihita, M.F. (1944) *Tarikh Miṣr al-iḳtiṣādī fi'l-'uṣūrr al-ḥadītha* (Cairo: Maktabat al-Nabdah al-Micriyyah).
Lejean, G. (1865) *Théodore II: Le nouvel empire d'Abyssinie* (Paris: Amyot).
Lejean, G. (1872) *Voyage en Abyssinie* (Paris: Hachette).
Leone, E. de (1882) *The Khedive's Egypt* (2nd edn, London).
Leone, E. de (1965) *La colonizzazione dell'Africa del Nord (Algeria, Tunisia, Morocco, Libia)* (Padua: CEDAM).
Lesseps, F. de (1869) *Egypte et Turquie* (Paris: Plon).
Leveen, P.E. (1971) 'British slave trade suppression policies, 1821–1865: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évi-Provençal, E. (1922) *Les historiens des Chorfa: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historique et biographique au Maroc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Paris: Larose).
Levine, D.N. (1965) *Wax and Gol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Ethiopian Cultur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vine, D.N. (1974) *Greater Ethiopia. The Evolution of a Multiethnic Socie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vine, R. M. (1980)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and Bibliography*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Levine, V. T. (1971) *The Cameroon Federal Republi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evtzion, N. (1968) *Muslims and Chiefs in West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ewis, B. (1971) 'Hadjdj', in B. Lewis, V. L. Ménage, C. Pellat and J. Schacht (eds), pp. 37–8.
Lewis, B., Ménage, V. L., Pellat, C. and Schacht, J. (eds) (1971)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Vol. 3 (new edn, Leiden/London: Brill/Luzac).
Lewis, B., Pellat, C. and Schacht, J. (eds) (1965)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Vol. 2 (new edn, Leiden/London: Brill/Luzac).
Lewis, H. S. (1965) *A Galla Monarchy: Jimma Abba Jifar, Ethiopia, 1830–1932* (Madison: UWP).
Lewis, I. M. (1955) *Peoples of the Horn of Africa* (London: IAI).
Lewis, I. M. (1965)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 (London: OUP).
Liesegang, G. (1967)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es der Gaza Nguni im sudlichen Mocambiqu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gne).
Liesegang, G. (nd) 'Famines and smallpox in southeastern Afri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inant de Bellefonds, A. (1872–3) *Mémoires sur les principaux travaux d'utilité publique exécutés en Egypte, depuis la plus haute Antiquité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Lindblom, G. (1920) *The Akamba in British East Africa* (2nd edn, Uppsala: Appelbergs).
Little, K. (1951) *The Mende of Sierra Leon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ttle, K. (1965–6)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Poro', *Africa*, 35, 4, pp. 349–65; 36, 1, pp. 62–72.
Little, K. (1970) *The Mende of Sierra Leon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vingstone, D. (1857)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London: Murray).
Lloyd, C. (1949) *The Navy and the Slave Trade. 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
Lloyd, P. C. (1963) 'The Itsekiri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outline social history', *JAH*, 4, 2, pp. 207–31.
Lobato, A. (1948) *Historia da Fundação de Lourenço Marques* (Lisbon: Edições da Revista "Lusitania").
Lockhart, J. (1968) *Spanish Peru, 1532–1560: A Colonial Society* (Madison: UWP).
Loepfe, W. (1974) *Alfred Ilg und die äthiopische Eisenbahn* (Zurich: Atlantis)
Lombardi, D. (1971) 'Un 'expert' Saxon dans les mines d'or de Sumatra au XVIIe siècle', *Archipel*, 2, pp. 225–42.
Long, Edward (1774) *The History of Jamaica*, (3 vols, London: Lowndes).
Loutskii, V. L. (1965) *Novaja istorija arabskih stran* (Moscow: Naouka).
Lovejoy, P. E. (1974) 'Interregional monetary flows in the precolonial trade of Nigeria', *JAH*, 15, 4, pp. 563–85.
Lovejoy, P. E. (1978) 'Plantations in the economy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JAH*, 19, 3, pp. 341–68.
Lovejoy, P. E. (1982) 'The volume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synthesis', *JAH*, 23, 3, pp. 473–501.
Lovejoy, P. E. (1983)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Cambridge: CUP).
Lovejoy, P. E. and Baier, S. (1975) 'The desert-side economy of the Central Sudan', *IJAHS*, 8, 4, pp. 553–83.
Low, D. A. (1963) 'The northern interior, 1840–84',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297–331.
Lutsky, V. (1965) *Modern History of the Arab Countrie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y, M. (1972)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Tarikh el Fettach*', *BIFAN* (B), 34, 3, pp. 471–93.
Lye, W. F. (1967) 'The Difaqane: the Mfecane in the southern Sotho area, 1822–24', *JAH*, 8, 1, pp. 107–31.
Lye, W. F. (1969)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otho peoples after the Difaqane', in L. Thompson (ed.), pp. 190–206.
Lye, W. F. (ed.) (1975) *Andrew Smith's Journal of his expedition in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Africa 1834–36* (Cape Town: Balkem).
Lynch, H. (1967) *Edward Wilmot Blyden, Pan-Negro Patriot, 1832–1912* (London: OUP).
Lyon, G. F. (1821) *A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Northern Africa in the years 1818, 1819 and 1820* (London: Murray).

Mage, E. (1868) *Voyage au Soudan Occidental (1863–1866)* (Paris: Hachette).
Magubane, B. M.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ahjoubi, A. (1977) *L'établissement du Protectorat français en Tunisie* (Tunis: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Mainga, M. (1973) *Bulozi Under the Luyana Kings: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re-colonial Zambia* (London: Longman).

Makozi, A. O. and Ojo, G. J. A. (eds) (1982)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Nigeria* (London: Macmillan).

Malaisse, F. et al (1972) 'The miombo ecosystem: a preliminary study', in P. Golley and F. Golley (eds), *Tropical Ecology*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p. 363–405.

Malortie, Baron de (1882) Egypt: *Native Rulers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London: Ridgway).

Malumfashi, U. F. (1973) 'The life and ideas of Shaikh Uthman dan Fodio, being an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Rawd al-jinan and al-Kashf wa 'l-bayan' (MA thesis, Bayero University, Kano).

Mandala, E. (1979) 'The Kololo interlude in Southern Africa, 1861-1891'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wi).

Mane, M. (1974-5)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Kaabu,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Dakar, Mémoire de l'Université de Dakar).

Mangestu Lamma (1959) *Mashafa Tizita* (Addis Ababa).

Manning, P. (1979) 'The slave trade in the Bight of Benin, 1640-1890', in H. A. Gemery and J. S. Hogendorn (eds), pp. 107–41.

Marchal, J. Y. (1967)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historique du Vakinankaratra, évolution du peuplement dans la Cuvette d'Ambohimanambola, sous-préfecture de Batafo', *Bulletin de Madagascar*, 250, pp. 241-80.

Marcus, H. G. (1975) *The Life and Times of Menilek II, 1844–191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kham, C. R. (1869) *A History of the Abyssinian Expedition* (London: Prideaux).

Marks, S. (1967a) 'The rise of the Zulu kingdom', in R. Oliver (ed.), pp. 85-91.

Marks, S. (1967b) 'The Nguni, the Natalians and their history', *JAH*, 8, 3, pp. 529–40.

Marks, S. and Atmore, A. (eds) (1980)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London: Longman).

Marshall, J. P. (1968) *Problems of Empire: Britain and India, 1757-1813* (London: Allen & Unwin).

Martel, A. (1965) *Les confins saharo-tripolitains de la Tunisie, 1818–1911* (Paris: PUF).

Martin, B. G. (1963) 'A mahdist document from Futa Jallon', *BIFAN* (B), 25, 1–2, pp. 47–57.

Martin, B. G. (1972) 'A short history of the Khalwati order of dervishes', in N. Keddie (ed.) *Scholars, Saints and Sufis* (Berkeley: UCP), pp. 275-305.

Martin, B. G. (1976) *Muslim Brotherhood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frica* (Cambridge: CUP).

Martin, T. (1976) *Race First: The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Struggles of Marcus Garvey and the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Marty, P. (1920–1) *Etudes sur l'Islam et les Tribus du Soudan* (4 vols, Paris: Leroux).

Mason, J. P. (1971) 'The social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Arabized Berbers of Augila oasis in the Libyan Sahara Desert'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Mason, J. P. (1978) 'Desert strongmen in the East Libyan Sahara (c. 1820): a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power in the region of the Augila oasis', *Revue d'histoire maghrébine*, 6, pp. 180–8.

Mason, M. (1970) 'The Nupe King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political history'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Mason, P. (1970) *Race Relations* (London: OUP).

Mason, R. J. (1973) 'The first Early Iron-Age in South Africa: Broederstroom 24/73',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69.

al Masri, F. H. (1963) 'The life of Shehu Usman dan Fodio before the jihad', *JHSN*, 2, 4, pp. 435-48.

al Masri, F. H. (ed. and trans.) (1978) *Bayan Wujub al-Hijra 'ala'l-Ibad* by 'Uthman Ibn Fūdī (Khartoum: KUP).

Massaia. (1921–30) *I miei trentacinque anni di missione nell' alta Etiopia* (Rome: Coop tipografrica Manuzio (12 vol.).

Matsebula, J. S. M. (1972) *A History of Swaziland* (Cape Town: Longman).

Matthews, T. I. (1981) 'Portuguese, Chikunda and the people of the Gwembe valley: the impact of the "Lower Zambezi Complex" on Southern Zambia', *JAH*, 22, 1, 23-42.

Maura y Gamazo, G. (1911) *La question marocaine du point de vue espagnol* (Paris: Challamel).

Maxwell, W. E. (1932) 'The law relating to slavery among the Malays',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0, 1.

M'Bokolo, E. (1981) *Noirs et blancs en Afrique équatoriale: Les sociétés côtières et la pénétration française (vers 1820–1874)* (Paris. Mouton).

McCall, D. F. and Bennett, N. R. (eds) (1971) *Aspects of West African Islam*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McCarthy, M. (1983) *Social Change and the Growth of British Power in the Gold Coast: the Fante states 1807–1874*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cCaskie, T. C. (1980) 'Office, land and subjec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anwere *fekuo* of Kumase: an essa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ante state', *JAH*, 21, 2, pp. 189–208.

McCoan, J. C. (1887) *Egypt as it is* (London: Cassell).
McGaffey, W. (1970) *Custom and Government in the Lower Cong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CP).
McKay, W. F. (1975) 'A pre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Kenya coast'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McPherson, J. M., Holland, L. B., et al. (1971) *Blacks in America: Bibli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Doubleday).
McSheffrey, G. M. (1983) 'Slavery, indentured servitude, legitimate trade and the impact of abolition in the Gold Coast, 1874–1901', *JAH*, 24, 3, pp. 349–68.
Mears, W. G. A. (1970) *Wesleyan Baralong Mission in Trans-Orangia, 1821–1884* (2nd edn, Cape Town: Struik).
Medeiros, F. de (1984) 'Peuples du golfe du Benin Aja-ewe', in *Colloque de Cotonou* (Paris: Karthala).
Meek, C. K. (1925) *The Northern Tribes of Nigeria* (2 vols, London: OUP).
Méhier de Mathuisieulx, H. (1904) 'Une mission en Tripolitanie', *Renseignements Coloniaux*, January 1904, pp. 20–34.
Meillassoux, C. (1971a) 'Introduction', in C. Meillassoux (ed.), (London: OUP), pp. 3–86.
Meillassoux, C. (ed.) (1971b)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UP).
Meillassoux, C. (1974) 'From reproduction to produc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3, pp. 315–45.
Meillassoux, C. (1975) *L'esclavage en Afrique précoloniale* (Paris: Maspero).
Meillassoux, C. (1981) *Maidens, Meal and Money* (Cambridge: CUP).
Memmi, A. (1963) *La poésie algérienne de 1830 à nos jours (Approches socio-historiques)* (Paris: Mouton).
Mendes Moreira, J. (1948) *Fulas do Cabu* (Bissau: Centro de Estudos da Guiné Portuguesa).
Merad, A. (1978) 'Iṣlāḥ', in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B. Lewis and C. Pellat (eds), pp. 141–63.
Mercer, P. (1971) 'Shilluk trade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o 1861', *JAH*, 12, 3, pp. 407–26.
Mercier, P. (1950) 'Notice sur le peuplement Yoruba du Dahomey-Togo', *Etudes Dahoméennes*, 4, pp. 29–40.
Metcalfe, G. E. (1962) *Maclean of the Gold Coast* (London: OUP).
Metcalfe, G. E. (1964) *Great Britain and Ghana: Documents of Ghana History, 1807–1957* (London: Nelson).
Metegue N'Nah, N. (1979)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au Gabon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Paris: L'Harmattan).
Meyer-Heiselberg, R. (1967) *Notes from the Liberated African Department in the Archives at Fourah Bay College, Freetown, Sierra Leone* (Uppsala: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Michailidis, G. (1950) 'Le désert et la civilisation égyptienne', *Cahiers d'Histoire Egyptienne*.
Michaux-Bellaire, E. (1921) 'Essai sur l'histoire des confréries religieuses, *Hespéris*, 1, pp. 141–58.
Middleton, J. and Campbell, J. (1965) *Zanzibar: Its Society and Its Politics* (London: OUP).
Miège, J. L. (1961–3) *Le Maroc et l'Europe (1830–1894)* (4 vols, Paris: PUF).
Miège, J. L. (1975) 'La Libye et le commerce transsaharien au XIXe siècle', *ROMM*, 19, pp. 135–68.
Miers, S. (1971) 'Notes on the arms trade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Southern Africa between 1870 and 1890', *JAH*, 12, 4, pp. 571–8.
Miers, S. (1975) *Britain and the Ending of the Slave Trade* (London: Longman).
Miers, S. and Kopytoff, I. (eds) (1977) *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Madison: UWP).
Miller, J. C. (1973) 'Slaves, slavers and social 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Kasanje', in F. W. Heimer (ed.) *Social Change in Angola*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pp. 9–29.
Milliot, L. (1911) *L'Association agricole chez les Musulmans du Maghreb, (Maroc, Algérie, Tunisie)* (Paris: Rousseau).
Minna, M. (1982) 'Sultan Muhammad Bello and his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to the Sokoto Caliphate', (PhD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Mintz, S. W. (1971) 'Towards an Afro-American history', *UNESCO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 2, pp. 317–32.
Moffat, R. (1945) *The Matebele Journals* (ed. J. P. R. Wallis, 2 vols, London: Chatto & Windus).
Moffat, R. and Moffat, M. (1951) *Apprenticeship at Kuruman* (ed. I. Schapera, London: Chatto & Windus).
Mondon-Vidailhet, F. M. C. (1905) *Chronique de Theodoros II* (Paris: Bibliothêque Nationale).
Montagne, R. (1930) *Les Berbères et le Makhzen dans le sud du Maroc* (Paris).
Monteil, C. (1932) *Une cité soudanaise, Djenne, métropole du Delta central du Niger* (Paris: Société d'Editions gé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Monteil, P. L. (1894) *De Saint-Louis à Tripoli par le Tchad* (Paris: Alcan)
Monteil, V. (1966) *Esquisses Sénégalaises* (Dakar: IFAN).
Monteil, V. (1977) *Les Bambara de Segou et de Kaarta* (1st edn, 1924, Paris: Maisonneuve).
Moreno Fraginals, M. (ed.) (1977) *Africa en America Latina* (Mexico: UNESCO).
Moreno, M. (1942) 'La cronaca di re Teodoro attribuita al dabtarà "Zaneb"', *Rassegna di Studi Etiopici*, 2, pp. 143–80.
Morgan, M. (1969) 'Continuities and traditions in Ethiopian histor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ign of Tewodros', *Ethiopia Observer*, 12.
Morton-Williams, P. (1964) 'The Oyo Yoruba and the Atlantic trade, 1670–1830', *JHSN*, 3, 1.
Moulero, T. (1964) 'Histoire et légende de Chabi', *Etudes Dahoméennes*, 2, pp. 51–93.
Moursy, M. K. (1914) *De l'étendue du droit de propriété, étude historique, juridique et comparée* (Paris: Recueil Sirey).
Mouser, B. L. (1973) 'Traders, coasters and conflict in the Rio Pongo from 1790–1808', *JAH*, 14, 1, pp. 45–64.
Mouser, B. L. (1975) 'Landlords – strangers: a process of 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IJAHS*, 8, 3, pp. 425–40.
Moyer, R. A. (1974) 'The Mfengu, self-defence and the Cape frontier wars', in C. Saunders and R. Derricourt (eds), pp. 101–26.
Mudenge, S. I. (1974) 'The role of foreign trade in the Rozvi empire: a reappraisal', *JAH*, 15, 3, pp. 373–91.
Muller, C. F. J. (ed.) (1974) *Five Hundred Years: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2nd edn, Pretoria and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Munro, J. F. (1976)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London: Dent).
Munthe, L. (1969) *La Bible à Madagascar, les deux premières traductions du Nouveau Testament malgache* (Oslo: Egede Instututtet).
Munthe, L., Ravoajanahary, C. and Ayache, S. (1976) 'Radama Ier et les Anglais: les négociations de 1817 d'après les sources malgaches', *Omaly sy Anio*, 3–4, pp. 9–104.
Murray, D. R. (1971) 'Statistics of the slave trade to Cuba, 1790–1867',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3, 2, pp. 131–49.
Mustafa, A. A. (1965) *Micr wa'l-mas'alah al-Micriyyah* (Cairo: Dar al-Ma'aref).
Mutibwa, P. M. (1972)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Madagascar', *TAJH*, 2, 1, pp. 32–63.
Mutibwa, P. M. (1974) *The Malagasy and the Europeans: Madagascar's Foreign Relations, 1861–1895* (London: Longman).
Mveng, E. (1963) *Histoire du Cameroun*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Mworoha, E. (1977) *Peuples et rois de l'Afrique des lacs* (Dakar: NEA).
Myatt, F. (1970) *The March to Magdala* (London: Leo Cooper).
Myrdal, G. (1944) *An American Dilemma* (2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Nacanabo, D. (1982) 'Le royaume maagha de Yako'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é de Paris).
Nachtigal, G. (1967) *Sahara und Sudan, Ergebnisse Sechsjahriger Reisen in Afrika* (Graz).
Nair, K. K. (1972)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South Eastern Nigeria 1841–1906: A Study of Power, Diplomacy and Commerce in Old Calabar* (London: Frank Cass).
al-Naqar, U. (1972) *The Pilgrimage Tradition in West Africa: An Historical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hartoum: KUP).
Nardin, J. C. (1965) 'Le Libéria et l'opinion publique en France, 1821–1847', *CAE*, 6, 1, pp. 96–144.
al-Naṣīrī, A. (1954–56) Al-Istiqṣā li-Akhbār Duwal al-Maghrib al-Aqṣā, 9 vol. (Casablanca).
Nayenga, F. P. B. (1976)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lacustrine states of Busoga, Uganda, 1750–1939'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Needham, D. E. (1974) *From Iron Age to Independenc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London: Longman).
Neumark, S. D. (1954)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Newbury, C. W. (1961) *The Western Slave Coast and Its Rulers: European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Among the Yoruba and Adja-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Western Nigeria, Southern Dahomey and Togo*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bury, C. W. (1966) *North African and Western Sudan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re-evaluation*, *JAH*, 7, 2, pp. 233–46.
Newbury, C. W. (1968) 'The protectionist revival in French colonial trade: the case of Senegal',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1, 2, pp. 337–48.
Newbury, C. W. (1972) 'Credit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West African trade', *JAH*, 13, 1, pp. 81–95.

Newbury, D. S. (1975) 'Rwabugiri and Ijwi' *Etudes d'Histoire Africaine*, 7, pp. 155–73.
Newbury, D. S. (1980) 'Lake Kivu regional trad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des Africanistes*, 50, 2, pp. 6–30.
Newbury, D. S. (nd) 'Lake Kivu regional trad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published paper).
Newbury, M. C. (1975) '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n: a century of clientship in Kinyaga, Rwand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Newitt, M. D. D. (1973a) *Portuguese Settlement on the Zambesi, Exploration, Land Tenure and Colonial Rule in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Newitt, M. D. D. (1973b) 'Angoche,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Portuguese c. 1844–1910', *JAH*, 13, 4, pp. 659–73.
Ngcongco, L. (1982a) 'Impact of the Difaqane on Tswana states', in R. Hitchcock and M. R. Smith (eds), pp. 161–71.
Ngcongco, L. (1982b) 'Precolonial migration in south-eastern Botswana' in R. Hitchcock and M. R. Smith (eds), pp. 23–9.
Nicholls, C. S. (1971) *The Swahili Coast: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rade on the East African Littoral, 1798–1856* (London: Allen & Unwin).
Nicholson, S. E. (1976) 'A climatic chronology for Africa: synthesis of geological, historical and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dat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Nicholson, S. E. (forthcoming) 'Saharan climates in historic times', in H. Faure and M. E. J. Williams (eds) *The Sahara and the Nile*.
Nicol, F. (1940) 'Les traitants français de la côte est de Madagascar, de Ranavalona I à Radama II', *Mémoire de l'Académie Malgache*, 33.
Nöldeke, T. (1892) *Sketches from Eastern History* (London & Edinburgh: A. & C. Black).
Norris, H. T. (1968) *Shinqiti Folk Literature and S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orris, H. T. (1975) *The Tuaregs* (Warminster: Aris & Philips).
Northrup, D. (1976)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slave and palm oil trades in the Bight of Biafra', *JAH*, 17, 3, pp. 352–64.
Nuñez, B. (1980) *Dictionary of Afro-Lat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Nwani, O. A. (1975) 'The quantity theory in the early monetary system of West Africa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Nigeria, 1850–1895',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 1, pp. 185–93.

Ochsenwald, W. (1980) 'Muslim European conflict in the Hijaz: the slave trade controversy, 1840–189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6, 1, pp. 115–26.
Oded, A. (1974) *Islam in Uganda* (New York: Halsted Press).
Ogot, B. A. (1967)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Luo People, 1500–1900* (Nairobi: EAPH).
Ogot, B. A. (1968) 'Kenya under the British, 1895 to 1963', in B. A. Ogot and J. A. Kieran (eds), pp. 255–89.
Ogot, B. A. (ed.), (1974)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2nd edn, Nairobi: EAPH).
Ogot, B. A. (ed.) (1976) *Kenya Before 1900* (Nairobi: EAPH).
Ogot, B. A. (1979) 'Population movements between East Africa, the Horn of Africa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Studies and Documents, 2, Paris), pp. 175–82.
Ogot, B. A. and Kieran, J. A. (eds) (1968)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Olaniyan, R. (1974) 'British desires for legitimate trade in West Africa, 1860–1874: 1, the Imperial dilemma', *Odu*, 9, pp. 23–44.
Oliveira Martins, F. A. (ed.) (1952) 'Hermenegildo Capelo e Roberto Ivens, vol. II', in *Diarios da viagem de Angola a contra-costa* (Lisbon), pp. 366–83.
Oliver, R. (1952) *The Missionary Factor in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s, Green).
Oliver, R. (ed.) (1967) *The Middle Age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OUP).
Oliver, R. (1965) *The Missionary Factor in East Africa* (2nd edn, London: Longman).
Oliver, R. and Fage, J. D. (1962)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Oliver, R. and Mathew, G. (eds) (1963)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loruntimehin, B. O. (1972a) *The Segu Tukulor Empire* (London: Longman).
Oloruntimehin, B. O. (1972b)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movement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We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badan*, 7, 1, pp. 33–58.
Omer-Cooper, J. D. (1966) *The Zulu Aftermath, A Nine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Bantu Africa* (London: Longman).
Omer-Cooper, J. D. (1969)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fecane', in L. Thompson (ed.), pp. 207–29.
Omer-Cooper, J. D. (1976a) 'The Nguni outburst', in J. E. Flint (ed.), pp. 319–52.

Omer-Cooper, J. D. (1976b) 'Colonial South Africa and its frontiers', in J. E. Flint (ed.), pp. 353–92.

Onneken, A. (1956) *Die Konigskultur Kaffas und der verwandten Konigreiche* (Frankfurt).

Oppel, A. (1887) 'Die religiosen Verhaltnisse von Afrika', *Zeitschrift der Gesselschaft fur Erdkunde zu Berlin*, 21.

Orhanlu, C. (1972) 'Turkish archival sources about Ethiopia', *IV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Etiopici* (Rome).

Orhanlu, C. (1976–7) 'Turkish language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about Africa' [in Turkish], *Tarih Institusu Dergisi*, 7–8, pp. 145–56.

Ottenberg, S. (1958) 'Ibo oracl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4, 3, pp. 295–317.

Ottenberg, S. (1959) 'Ibo receptivity to change', in W. R. Bascom and M. J. Herskovits (ed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frican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30–43.

Packard, R. M. (1981) *Chiefship and Cosmology: An Historical Study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age, M. E. (1974) 'The Manyema hordes of Tippu Tip: a case stud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lave trade in East Africa', *IJAHS*, 7, 1, pp. 69–84.

Palacios Preciados, J. (1973) *La Trata de Negros por Cartagena de Indias, 1650–1750* (Tunja, Colombia: Universidad Pedagogica y Technologica).

Pallinder-Law, A. (1974) 'Aborted modernization in West Africa? The case of Abeokuta', *JAH*, 15, 1, pp. 65–82.

Palmer, C. A. (1976) *Slaves of the White God: Blacks in Mexico, 1570–1650* (Cambridge, Mass: HUP).

Palmer, C. A. (1981) *Human Cargoes: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to Spanish America, 1700–173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almer, H. R. (1928) *Sudanese Memoirs* (Lagos: Government Printer).

Palmer, R. and Parsons, N. (eds) (1977a) *The Roots of Rural Povert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almer, R. and Parsons, N. (1977b)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R. Palmer and N. Parsons (eds), pp. 1–32.

Pankhurst, R. K. P.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 (London: Lalibela House).

Pankhurst, R. K. P. (1964) 'Ethiopia and the Red Sea and Gulf of Aden port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thiopia Observer*, 8.

Pankhurst, R. K. P. (1966a) 'The Emperor Theodore and the question of foreign artisans in Ethiopia' in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in African History*, Vol. 2 (Boston: African Studies Centre, Boston University).

Pankhurst, R. K. P. (1966b) 'The Saint-Simonians and Ethiopia',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Haile Sellassie 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Pankhurst, R. K. P. (1966c) *State and Land in Ethiopian History* (Addis Ababa: Haile Sellassie 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Pankhurst, R. K. P. (1967) 'Menilek and the utilisation of foreign skills',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5, 1, pp. 29–42.

Pankhurst, R. K. P. (1968)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1800–1935* (Addis Ababa: Haile Sellassie 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Pankhurst, R. K. P. (1972) 'Yohannes Kotzika, the Greeks and British intervention against Emperor Tewodros in 1867–8', *Abba Salama*, 3, pp. 87–117.

Pankhurst, R. K. P. (1973a) 'Popular opposition in Britain to British intervention against Emperor Tewodros of Ethiopia (1867–1868)', *Ethiopia Observer*, 14, pp. 141–203.

Pankhurst, R. K. P. (1973b) 'The library of Emperor Tewodros at Maqdala (Magdala)', *BSOAS*, 36, pp. 17–42.

Pankhurst, R. K. P. (1974) 'Tewodros. The question of a Greco-Romanian or Russian hermit or adventur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Ethiopia', *Abba Salama*, 5, pp. 136–59.

Pantucek, S. (1969) *Tounisskaja literatoura. Krathii etcherk* (Moscow: Nauka).

Parkinson, C. N. (1937) *Trade in the Eastern Seas, 1793–1813* (Cambridge: CUP).

Parkyns, M. (1854) *Life in Abyssinia* (New York: Appleton).

Parrinder, E. G. (1947) 'The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Dahomey', *Africa*, 17, pp. 122–48.

Parrinder, E. G. (1955) 'Some western Yoruba towns', *Odu*, 2, pp. 4–10.

Parrinder, E. G. (1967) *Story of Ketu* (Ibadan: IUP).

Patterson, O. (1982)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Mass.: HUP).

Paulus, J. (ed.) (1917 21) *Encyclopaedie van Nederlandsch-Indie* ('s-Gravenhage: Nijhoff/Leiden: Brill).
Pellat, C. (1953) *Le milieu basrien et le formation de Gahiz* (Paris).
Pennec, P. (1964) *Les transformations des corps de métiers de Tunis* (Tunis: ISEA-AM).
Père, M. (1982) *Les deux bouches. Les sociétés du rameau Lobi entre la tradition et le changement* (Paris: TI).
Perini, R. (1905) *Di qua del Mareb* (Florence).
Person, Y. (1968 75) *Samori, unu Révolution Dyula* (3 vols, Dakar: IFAN).
Person, Y. (1971) 'Ethnic movements and acculturation in Upper Guinea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IJAHS*, 4, pp. 669 89.
Person, Y. (1972) 'Samori and resistance to the French', in R. Rotberg and A. Mazrui (eds),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New York: OUP), pp. 80 112.
Person, Y. (1974) 'The Atlantic Coast and the northern savannas, 1800–188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262 307.
Person, Y. (1979) 'Samori and Islam', in J. R. Willis (ed.), pp. 259 77.
Person, Y. (1981) 'Communication: who were the Vai?', *JAH* 23, 1, p. 133.
Pesenti, G. (1912) *Di alcunni canti arabici e somalici.*
Pesenti, G. (1929) *Canti sacri e profani, danze e ritmi degli Arabi, dei Somali e dei Suahili* (Milan: L'Eroica)
Peterson, J. (1969) *Provin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1787–1870* (London: Faber).
Petherick, J. and Petherick, K. (1869) *Travels in Central Africa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estern Tributaries* (London).
Philliot, D. C. and Azoo, R. F. (1906 7) 'Some Arab folk tales from the Hadramou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p. 399–439.
Phillipson, D. W. (1969) 'Early iron-using peoples of Southern Africa', in L. Thompson (ed.), pp. 24 - 49.
Phiri, K. M. (1975) 'Chewa history in Central Malawi and the use of oral traditions, 1600–192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igeot, A. (1956) 'Les français à Tindouf', *Bulletin de Liaison Saharienne* 7, 23, pp. 85–94.
Pirone, M. (1961) *Appunti di Storia dell'Africa* (Rome: Edizioni Rioerche).
Plowden, W. C. (1868) *Travels in Abyssinia and the Galla Count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Porter, A. (1963) *Creoledom: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etown Society* (London: OUP).
Porter, D. H. (1970)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in England, 1784–1807* (New York: Archon).
Price, R. (1973) *Maroon Societies* (New York: Doubleday-Anchor).
Priestley, M. (1969) *West African Trade and Coast Society, A Family Study* (London: OUP).
Prins, A. H. (1962) *The Swahili-Speaking Peoples of Zanzibar and the East African Coast* (London: IAI).
Prins, A. H. (1971) *Didemic Lamu: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a Muslim Maritime Town* (Groningen).

Quinn, C. A. (1972) *Mandingo Kingdoms of the Senegambia: Traditionalism, Islam and European Expansion* (London: OUP).
Quinn, C. A. (1979) 'Maba Diakhou and the Gambian jihād, 1850–1890', in J. R. Willis (ed.), pp. 233–58.

Rabary, Le pasteur (1957) *Ny Maritiora Malagasy* (Tananarive: Imprimerie Luthérienne).
al-Rafe'i, A.-R. (1948a) *Al-thawrah al-'Arabiyyah* (Cairo).
al-Rafe'i, A.-R. (1948b) *Asr Isma'il* (2nd edn, Cairo: Mataba at al-Nahdah al-Micriyyah).
al-Rafe'i, A.-R. (1948c) *Micr wa'l-Soudan fi awa'el 'ahd al-ihtilal (tarikh Migr al-qawmi min sanat 1882 ila sanat 1892)* (2nd edn, Cairo: Maktabat al-Nahdah al-Micriyyah).
al-Rafe'ī A.-R. (1951) *'Asr Mohammad-Alī* (3rd edn, Cairo: Maktabat al-Nahdah al-Micriyyah).
Raffenel, A. (1856) *Nouveau voyage dans le pays des nègres* (2 vols, Paris: N. Chaix).
Rainihifina, J. (1975) *Lovantsaina, I, Tantara betsileo* (2nd edn, Fianarantsoa).
Raison, F. (1970) 'Un tournant dans l'histoire religieuse merina du XIXe siècle: la fondation des temples protestants à Tananarive entre 1861 et 1869',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Madagascar* (série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11, pp. 11–56.
Raison, F. (1977) 'L'échange inégal de la langue, la pénétration des techniques linguistiques dans une civilisation de l'oral (Imerina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Annales ESC*, 32, 4, pp. 639–69.
Raison, F. (1979) 'Temps de l'astrologie, temps de l'histoire: le premier almanach de LMS en Imerina, 1864', *Omaly sy Anio*, 9, pp. 41–78.

Rakotomahandry, S. (1981) *L'armée royale sous Ranavalona Ière, aspects sociaux et économiques. Essai de description statistique* (Tananarive: TER Département d'histoire).
Ralibera, D. (1977) 'Recherches sur la conversion de Ranavalona II', *Omaly sy Anio*, 7–8, pp. 7–42.
Ramanakasina, V. (nd) *Medicine and Doctors in the Anglo-Malagasy Civilisation* (Tananarive: TER, Département des Langues Vivantes).
Ranger, T. O. (1963) 'The last days of the empire of the Mwene Mutapa'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 Lusaka).
Ranger, T. O. (ed.) (1968) *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Ranger, T. O. (1973) 'Territorial cults i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JAH*, 14, 4, pp. 581–98.
Ranger, T. O. (1975) *Dance and Society in Eastern Africa 1890–1970: The Beni Ngoma* (London: Heinemann).
Ranger, T. O. and Kimambo, I. (eds) (1972)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frican Religion* (Berkeley: UCP).
Rangley, W. H. J. (1959) 'The Makololo of Dr Livingstone', *Nyasaland Journal*, 12, pp. 59–98.
Rantoandro, G. (1981) 'Une communauté mercantile du Nord-Ouest: les Antalaotra', *Colloque sur l'histoire et la culture du nord-ouest, Majunga.*
Raombaha (1980) *Histoires I* (edn and French trans. by S. Ayache, Fianarantosa).
Rasamuel, D. (1980) *Traditions orales et archéologie de la basse Sahatorendrika: Etude de sources concernant le peuplement* (2 vols, TER, Département d'histoire).
Rasmussen, R. K. (1977) *Mzilikazi of the Ndebele* (London: Heinemann).
Rasoamioraramanana, M. (1974) *Aspec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e la vie à Majunga 1862–1881* (TER, Département d'histoire).
Rasoamioraramanana, M. (1981a) 'Un grand port de l'Ouest: Majunga (1862–1881)', *Recherches, Pédagogie, Culture*, Jan 1981, pp. 78–9.
Rasoamioraramanana, M. (1981b) 'Pouvoir merina et esclavage dans le Boina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1862–1883', *Colloque sur l'histoire et la culture du nord-ouest, Majunga.*
Rassam, H. (1869)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Mission to Theodore, King of Abyssinia* (London: Murray).
Ravisse, P. (1896) (Ismail Pacha, Khedive d'Egypte (1830–1895), extract from the *Revue d'Egypte* (Cairo).
Redmayne, A. (1968a) 'Mkwawa and the Hehe wars', *JAH*, 9, 3, pp. 409–36.
Redmayne, A. (1968b) 'The Hehe', in A. D. Roberts (ed.), pp. 37–58.
Renault, F. (1976) *Libération d'esclaves et nouvelle servitude* (Abidjan-Dakar: NEA).
Renault, F. and Daget, S. (1980) 'La traite des esclaves en Afrique', *Etudes Scientifiques* (Cairo).
Rennie, J. K. (1966) 'The Ngoni states and European intrusion',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pp. 302–31.
Revoil, G. (1885) 'Voyage chez les Benadirs, les Comalis et les Bayouns en 1882–1883', *Le Tour du Monde*, 49.
Rey, A. (1978) 'Mohammed Bin 'Abdallah ou le combat du chérif de Ouergla', in *Les Africains*, Vol. 12 (Paris: Jeune Afrique).
Rey-Goldzeiguer, A. (1977) *Le royaume arabe* (Paris).
Reynolds, B. (1968)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Peoples of the Gwembe Valley* (Manchester: MUP).
Reynolds, E. (1974a) *Trade and Economic Change on the Gold Coast, 1807–1874* (London: Longman).
Reynolds, E. (1974b)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frican merchant class on the Gold Coast, 1830–1874', *CEA*, 14, 2, pp. 253–64.
Reynolds, E. (1975)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case of the Gold Coa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 pp. 94–116.
Richards, A. R. (1977)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Egypt, 1798–1882', *Review*, 1, 2, pp. 3–49.
Ritter, E. A. (1955) *Shaka Zulu* (London: Longman).
Rivière, P. L. (1924–5) *Traités, codes et lois du Maroc* (Paris: Recueil Sirey).
Rivlin, H. A. B. (1961)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of Muhammad 'Ali in Egypt* (Cambridge, Mass.: HUP).
Roberts, A. D. (ed.) (1968) *Tanzania before 1900* (Nairobi: EAPH).
Roberts, A. D. (1969)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 N. Kimambo and A. J. Temu (eds), pp. 57–84.
Roberts, A. D. (1970a) 'Pre-colonial trade in Zambia', *African Social Research*, 10, pp. 715–46.
Roberts, A. D. (1970b) 'Nyamwezi trade', in R. Gray and D. Birmingham (eds), pp. 39–74.
Roberts, A. D. (1973) *A History of the Bemba* (Madison: UWP).
Roberts, R. (1978) 'The Maraka and the economy of the middle Niger valley, 1790–1908'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Roberts, R. (1980) 'Long distance trade and production: Sinsani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H*, 21, 2, pp. 169–88.

Robertson, A.F. (1978) *Community of Strangers: A Journal of Discovery in Uganda* (London: Scolar Press).
Robinson, C.H. (1895) *Hausaland*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Robinson, R. (1985) 'The Berlin Conference of 1884–85 an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Berlin West African Conference* (Berlin, February 1985, edited by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Robinson, R. and Gallagher, J. (1961)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Roche, C. (1976) *Conquête et résistance des peuples de la Casamance* (Dakar: NEA).
Rochet d'Héricourt, C.F.X. (1841) *Voyage sur la côte orientale de la mer Rouge, dans le pays d'Adal et le royaume de Choa* (Paris: Bertrand).
Rochet d'Héricourt, C.F.X. (1846) *Second voyage sur les deux rives de la mer Rouge, dans le pays des Adels et le royaume de Choa* (Paris: Bertrand).
Rodney, W. (1970)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odney, W. (1972)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London: Bogle l'Ouverture).
Rodney, W. (1975) 'Africa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 R. Gra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From c. 1600 to c. 1790* (Cambridge: CUP), pp. 578–622.
Rohlfs, G. (1883) *Meine Mission nach Abessynien auf Befehl Sr. Maj. des deutschen Kaisers, im Winter 1880–81* (Leipzig).
Roncek, J.S. and Kiernan, T. (eds) (1970) *The Negro Impact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Ronen, D. (1971) 'On the African role in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in Dahomey', *CEA*, 11, 1, pp. 5–13.
Ross, D. (1967) 'The rise of the autonomous kingdom of Dahomey, 1818–1894'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Rossi, E. (1968) *Storia di Tripoli e della Tripolitania* (Rome: Istituto per l'Oriente).
Roux, E. (1964) *Time Longer than Rope* (2nd edn, Madison: UWP).
Rout, L.B. (1976) *The African Experience in Spanish America, 1502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UP).
Rowley, H. (1867) *The Story of the Universities' Mission to Central Africa* (London: Saunders, Otley).
Rubenson, S. (1966) *King of Kings: Tewodros of Ethiopia* (Nairobi: OUP).
Rudin, H.R. (1938) *Germans in the Cameroons, 1884–1914* (New Haven: YUP).
Ruedy, J. (1967) *Land Policy in Colonial Algeria. The Origins of the Rural Public Dom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CP).
Russel, S. (1884) *Une mission en Abyssinie et dans la mer Rouge* (Paris: Plon, Nourrit).
Ryder, A.F.C. (1961)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the kingdom of Warri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JHSN*, 2, 2, pp. 251–7.

Sabry, M. (1930) *L'Empire égyptien sous Mohamed-Ali et la question d'Orient (1811–1849)* (Paris: Paul Geuthner).
Sabry, M. (1933) *L'empire égyptien sous Ismail et l'ingérence anglo-française (1863–1879)* (Paris: Paul Geuthner).
Sa'dallah, A. (1983) *Al h'araka al wat'aniya al-jazā'iriya* (3rd edn, Algiers: SNED).
Sagatzky, J. (1940) 'Problèmes d'organisation de l'industrie aurifère dans l'ex-Haute Volta, II, domaine politiqu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bidjan, 23 July 1940).
Saïdouni, N. (nd) *Al-niz'ām al-mālī li-l Jazā ir.*
Saint-Martin, Y. (1967) *L'empire toucouleur et la France, un demi-siècle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1846–1893)* (Dakar: Publications de la Faculté de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Salim, A.I. (1973) *The Swahili-Speaking Peoples of Kenya's Coast, 1895–1965* (Nairobi: EAPH).
Salt, H. (1814) *A Voyage to Abyssinia* (London: Rivington).
Sammarco, A. (1935) *Précis de l'histoire d'Egypte par divers historiens et archéologues, Vol. 4: Les règnes de 'Abbas, de Sa'id et d'Ismail (1848–1879)* (Rome: Istituto Poligrafico del Stato).
Sanchez-Albornoz, N. (1974) *The Population of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Berkeley: UCP).
Sanders, P. (1975) *Moshoeshoe: Chief of the Sotho* (London: Heinemann).
Santi, P. and Hill, R. (eds) (1980) *The Europeans in the Sudan 1834–187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aran, P. and Burton-Page, J. (1965) 'Ḍarībah' in B. Lewis, C. Pellat and J. Schacht (eds), pp. 142–58.
Sarbah, J.M. (1906) *Fanti National Constitution* (London: Clowes).
Sari, D. (1970) *Les villes précoloniales de l'Algérie occidentale* (Algiers: SNED).
Saunders, A.C. de C.M. (1982) *A Social History of Black Slaves and Freedmen in Portugal, 1441–1555* (Cambridge: CUP).

Saunders, C. and Derricourt, R. (eds) (1974) *Beyond the Cape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kei and Ciskei* (London: Longman).
Schnapper, B. (1961) *La politique et le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e golfe de Guinée de 1838 à 1871*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Schnapper, B. (1959) 'La fin du régime de l'Exclusif: Le commerce étranger dans les possessions françaises d'Afrique tropicale (1817–1870)', *Annales Africaines*, pp. 149–99.
Schnerb, R. (1957) *Le XIXe siècle. L'apogée de l'expansion européene (1815–1914)* (Paris: PUF).
Schoffeleers, M. (1972a) 'The history and political role of the M'bona cult among the Mang'anja' in T. O. Ranger and I. Kimambo (eds), pp. 73–94.
Schoffeleers, M. (1972b) 'The Gisumphi and M'bona cults in Malawi: a comparative history',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ligious History, Lusaka).
Schroder, G. and Siebel, D. (1974) *Ethnographic Survey of Southwestern Liberia: The Liberian Kran and the Sapo*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chuler, M. (1970) 'Ethnic slave rebellions in the Caribbean and the Guiana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 4.
Schuler, M. (1980) *Alas, Alas Kongo: A Social History of Indentured African Immigration into Jamaica, 1841–1865* (Baltimore: JHUP).
Schwab, G. and Harley, G. W. (1947) *Tribes of the Liberian Hinterland* (Cambridge, Mass.: HUP).
Schwartz, A. (1973) *Mise en place des populations Guere et Wobe* (Abidjan: duplicated).
Schweinfurth, G. (1873) *The Heart of Africa* (London: Low, Marston, Low & Searle).
Scott, E. P. (1978) 'Subsistence, market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Hausaland',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12, 4, pp. 449–70.
Seddon, D. (1978) 'Economic anthropology or political economy? (I):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pre-capitalist formation in the Maghreb', in J. Clammer (ed.), *The New Economic Anthropology* (London: Macmillan), pp. 61–109.
Selous, F. (1893)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South-East Africa* (London: Ward).
Serjeant, R. B. (1966) 'South Arabia and Ethiopia – African elements in the South Arabian popu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 I, pp. 25–33.
Shack, W. A. (1966) *The Gurage* (London: OUP).
Shapiro, H. L. (1953) *Race Mixture* (Paris: UNESCO).
al-Sharqāwī, M. (1958) *Misr fi'l-qarn al-'thamen 'ashar* (3 vols, Cairo).
Shea, P. J. (1974)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dyeing industry of precolonial Kano', *Kano Studies*, ns, 1, 2, pp. 55–61.
Shea, P. J. (1978) '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 rural Kano', in B. M. Barkindo (ed.).
Shea, P. J. (forthcoming) *Black Cloth*.
Shepherd, A. F. (1868) *The Campaign in Abyssinia* (Bombay 'Times of India' Office).
Shepperson, G. (1968) 'Ethiopianism: past and present', in C. G. Baeta (ed.), pp. 249–68.
Shepperson, G. and Price, T. (1958) *Independent African: John Chilembwe and the Origins, Sett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yasaland Native Uprising of 1915*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Shepstone, T. (1888)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Zulu-Kafir race of south-eastern Africa', in J. Bird (ed.), *The Annals of Natal, 1495–1845* (2 vols, Pietermaritzburg: Davis), pp. xxx–xxx.
Sheridan, R. (1974) *Sugar and Slaver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623–1775*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heriff, A. M. H. (1971) 'The rise of a commercial empire: an aspect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Zanzibar, 1780–1873'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Sheriff, A. M. H. (1980) 'Tanzanian societies at the time of partition', in M. H. Y. Kaniki (ed.),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Longman), pp. 11–50.
Shibayka, M. (1957) *Al-Sudan fi Qarn* (Cairo).
Shorter, A. (1969) *Nyungu-ya-Mawe* (Nairobi: EAPH).
Shorter, A. (1972) *Chiefship in Western Tanzan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Kimbu*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huqayr, N. (1967) *Jughrā fiyat-wa-Tārikh al Sūdān* (Beirut).
Shukri, M. F. (1937) *Khedive Ismail and Slavery in the Sudan, 1863–1879* (Cairo).
Shukri, M. F. (1946) *Misr wal Sayada ala al-Sudan* (Cairo).
Shukri, M. F. (1948) *Al-Ḥukm al-Miṣrī fil Sūdān 1820–1885* (Cairo).
Shukri, M. F. (1958) *Misr wal Sudan, Ta rikh Wahdat, Waoil Nil al-Siyasis il Qarn al-Tesi-a Ashar* (Cairo).
Sillery, A. (1952) *The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Cape Town: OUP).
Sillery, A. (1954) *Sechele* (Cape Town: OUP).
Simpson, G. E. (1978) *Black Religions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kene, R. (1917) 'Arab-Swahili dances and ceremonies', *JRAI*, 47, pp. 413–34.

Skinner, E. P. (1964) *The Mossi of Upper Volta: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a Sudanese People* (Stanford: SUP).

Slama, B. (1967) *L'insurrection de 1864 en Tunisie* (Tunis: Maison tunisienne de l'édition).

Slousch, N. (1908) 'La Tripolita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Karamanli',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6, pp. 58–84, 211–32, 433–53.

Smaldone, J. P. (1971) 'The firearms trade in the Central Sud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 F. McCall and N. R. Bennett (eds).

Smaldone, J. P. (1972) 'Firearms in the Central Sudan: a revaluation', *JAH*, 13, 4, pp. 591–608.

Smaldone, J. P. (1977) *Warfare in the Sokoto Caliphate* (Cambridge: CUP).

Smith, A. (1963)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interior, 1840–84',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253–96.

Smith, A. K. (1969) 'The trade of Delagoa Bay as a factor in Nguni politics 1750–1835', in L. Thompson (ed.), pp. 171–89.

Smith, A. K. (1973) 'The peoples of Southern Mozambique: an historical survey', *JAH*, 14, 4, pp. 565–80.

Smith, E. W. (1956) 'Sebetwane and the Makalolo', *African Studies*, 15, 2, pp. 49–74.

Smith, H. F. C. (1961) 'A neglected theme of West African history; the Islamic revolutions of the 19th century', *JHSN*, 2, 2, pp. 169–85.

Smith, I. R. (1972) *The Emin Pasha Relief Expedition 1886–9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mith, M. G. (1960) *Government in Zazzau* (London: OUP).

Smith, M. G. (1978) *The Affairs of Daura* (Berkeley: UCP).

Soleillet, P. (1887) *Voyage à Segou, 1878–1879* (Paris: Challamel).

Soumoni, E. (1983) 'Trade and politics in Dahomey 1841–1892,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House of Regi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Ife).

Sourian-Hoebrechts, C. (1969) *La presse maghrebine Libye, Tunisie, Algérie; évolution historique, situation en 1965, organisation et problèmes actuels*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Sousberghe, L. de (1961) *Deux palabres d'esclaves chez les Pende* (Brussels: ARSC).

Sow, A. I. (1966) *La femme, la vache et la foi* (Paris: Julliard).

Sow, A. I. (1968) *Chroniques et récits du Fuuta Jallon* (Paris: Klincksieck).

Spear, T. (1972) 'Zwangendaba's Ngoni 1821–1890: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a migration' (Occasional Paper No. 4 of the Afric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Spear, T. (1974) 'The Kaya complex: a history of the Mijikenda peoples of the Kenya coast to 190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pear, T. (1981) *Kenya's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in Africa* (London: Longman).

Spitzer, L. (1974) *The Creoles of Sierra Leone* (Madison: UWP).

Stamm, A. (1972) 'La société créole à Saint-Paul de Loanda dans les années 1838–1848', *RFHOM*, 217, pp. 578–610.

Stanley, H. M. (1872)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 Searle).

Stanley, H. M. (1874) *Coomassie and Magdala*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 Searle).

Stanley, H. M. (1878)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2 vols, Lond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Staudenraus, P. J. (1961) *The African Colonization Movement, 1816–186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taudinger, P. (1889) *Im Herzen der Haussa Länder* (Berlin: Landsberger).

Stefaniszyn, B. and de Santana, H. (1960) 'The rise of the Chikunda condottieri', *Northern Rhodesian Journal*, 4, pp. 361–8.

Stengers, J. (1962) 'L'impérialisme colonial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mythe ou réalité', *JAH*, 3, 3, pp. 469–91.

Stevenson-Hamilton, J. (1929) *The Low-Veld: Its Wild Life and its People* (London: Cassell).

Stewart, C. C. (1976a) 'Southern Saharan scholarship and the *Bilād al-Sūdān*', *JAH*, 17, 1, pp. 73–93.

Stewart, C. C. (1976b) 'Frontier disputes and problems of legitimation: Sokoto–Masina relations, 1817–1837', *JAH*, 17, 4, pp. 495–514.

Stewart, C. C. and Stewart, E. K. (1973) *Islam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Mauritania: A Case Study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tewart, M. (forthcoming) 'The Borgu people of Nigeria and Benin: the disruptive effect of partition on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JHSN*.

Stitz, V. (1974) *Studien zur Kulturgeographie Zentraläthiopiens* (Bonn: Dümmlers).

Stokes, E. and Brown, R. (eds) (1966) *The Zambezian Past: Studies in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Manchester: MUP).

Sundkler, B. G. (1961) *Bantu Prophets in South Africa* (2nd edn, London: OUP).

Swai, B. (1984) 'Precolonial states and European merchant capital in Eastern Africa', in A. Salim (ed.), *State Formation in East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p. 15–35.
Symes, M. (1800)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Kingdom of Ava* (London: Bulmer).
Szymanski, E. (1965) 'La guerre hispano-marocaine 1859–1860',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2, pp. 54–64.

Tagher, J. (1949) 'Bibliographie analytique et critique des publications françaises et anglaises relatives à l'histoire du règne de Mohammad Ali', *Cahiers d'histoire égyptienne*, 2, pp. 128–235.
al-Ṭahṭāwī, R. R. (1869) *Manāhedj al-albāb al-Miṣriyya fi mabāhedj al-ādāb al-* 'aṣriyya.
Takla Yasus (nd) *Tarika Nagast Za Ityopiya* ms in the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Library, Addis Ababa).
Tal, Al-Hajj 'Uumar (nd[a]) *Les Rimah* (trans. Maurice Puech, Dakar, Diplômes d'Etudes Supérieures).
Tal, Al-Hajj 'Uumar (nd[b]) *Safinat al-saada* (trans. M. Gueye).
Tal, Al-Hajj 'Umar (1983) *Bayān Mawaḳa* (trans. S. M. Mahibou and J. L. Triaud, (Paris: Editions du CNRS).
Tambo, D. C. (1976) 'The Sokoto caliphate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JAHS*, 9, 2, pp. 187–217.
Tannenbaum, F. (1946) *Slave and Citizen* (New York: Vintage).
Tasūlī, A. (nd) *Jawāb 'alā su'āl al-Amīr 'Abd al-Qādir* (Fez).
Tedeschi, S. (1874) L'emirato di Harar Secondo un documento inedito',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Atti del IV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Etiopici* (Rome).
Tégnier, Y. (1939) *Les petit-fils de Touameur. Les Chaamba sous le régime français, leur transformation* (Paris: Editions Domat-Montchrestien).
Teixeira Da Mota, A. (1954) *Guiné Portuguesa* (2 vols, Lisbon: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Temini, A. (1978) *Le beylik de Constantine et Hadj Ahmed Bey (1830–1837)* (Tunis: Publications de la RHM).
Temperley, H. (1972) *British Anti-Slavery, 1823–1870* (London: Longman).
Terray, E. (1969)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Dida de Côte d'Ivoire (Dijon, Imprimerie Darantière).*
Terray, E. (1972) *Marxism and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Theal, G. M. (1891)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1795–1834*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Theal, G. M. (1900)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Republics and Native Territories from 1854 to 1872*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Thebault, E. (1960) *Code des 305 articles* (Etudes malgaches, Tananarive: Centre de Droit Privé).
Thiers, H. (1867) *L'Egypte ancienne et moderne à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Paris: Dramard-Baudry).
Thomas, R. and Bean, R. (1974) 'The fishers of men: the profits of the slave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4, pp. 885–914.
Thompson, L. (1969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the Zulu kingdom and Natal',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334–90.
Thompson, L. (1969b)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the High Veld',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391–446.
Thompson, L. (ed.) (1969c)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Thompson, L. (1971a) 'The subjection of the African chiefdoms, 1870–1898',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245–86.
Thompson, L. (1971b) 'The compromise of Union',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325–64.
Thompson, L. (1975) *Survival in Two Worlds: Moshoeshoe of Lesotho 1786–18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hompson, V. and Adloff, R. (1965) *The Malagasy Republic: Madagascar Today* (Stanford: SUP).
Thomson, J. (1885) *Through Masai Land* (Lond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Thornton, J. (1977) 'Demography and history in the kingdom of Kongo, 1550–1750', *JAH*, 18, 4, pp. 507–30.
Tiendrebeogo, Y. (1964) *Histoire et coutumes royales des Mossi de Ouagadougou* (Ouagadougou: Naba).
Toledano, E. (1982) *The Ottoman Slave Trade and Its Suppression, 1840–1890* (Princeton: PUP).
Tonnoir, R. (1970) *Giribuma.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et à la petite histoire du Congo équatorial*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Toplin, R. B. (ed.) (1974) *Slavery and Race Relations in Latin Americ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Toplin, R. B. (ed.) (1981) *Freedom and Prejudice: The Legacy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Tosh, J. (1970) 'The northern interlacustrine region', in R. Gray and D. Birmingham (eds), pp. 103–18.

Tosh, J. (1978) 'Lango agriculture during the early colonial period: land and labour in a cash-crop economy', *JAH*, 19, 3, pp. 415–39.
Tosh, J. (1980) 'The cash-crop revolution in tropical Africa: an agricultural reappraisal', *African Affairs*, 79, 314, pp. 79–94.
Townsend, W. J. (1892) *Madagascar: Its Missionaries and Martyrs* (London: Partridge and Co).
Trapiols, S. (1964) 'The origins of the Cape franchise qualifications of 1853', *JAH*, 5, 1, pp. 37–54.
Trimingham, J. S. (1952) *Islam in Ethiopia* (London: OUP).
Trimingham, J. S. (1962)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OUP).
Trimingham, J. S. (1969)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J. Kritzeck and I. M. Lewis (eds), *Islam in Africa* (New York: Van Nostrand-Reinhold Co), pp. 13–28.
Trimingham, J. S. and Fyfe, C. (1960) 'The early expansion of Islam in Sierra Leone', *Sierra Leone Bulletin of Religions*, 2.
Tukur, M. M. (1977) 'Values and public affairs: the relevance of the Sokoto Caliphal experie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igerian polity' (PhD thesi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Turc, N. (1950) *Chronique d'Egypte, 1798–1804* (Cairo: G. Wiet).
Turyahikayo-Rugyeme, B. (1976) 'Markets in pre-colonial East Africa: the case of the Bakiga', *Current Anthropology*, 17, 2, pp. 286–90.
Twaddle, M. (1966) 'The founding of Mbale', *UJ*, 30, 1, pp. 25–38.
Tyam, M. A. (1935) *La vie d'El Hadj Omar, qacida en poular* (trans. H. Gaden,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Tyam, M. A. (1961) *La Vie d'El-Hadj Omar (Qacida en Poular)* (trans. H. Gaden, Paris).
Tylden, G. (1950) *Rise of the Basuto* (Cape Town: Juta and Co).
Tzadua, P. (1968) *The Petha Nagast, The Law of Kings* (Addis Ababa).

Ullendorff, E. (1960) *The Ethiopians* (London: OUP)
Unomah, A. C. (1972) 'Economic expans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Unyanyembe (*c.* 1840–190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Ibadan).
Unomah, A. C. and Webster, J. B. (1976) 'East Africa: the expansion of commerce', in J. E. Flint (ed.), pp. 270–318.
Uzoigwe, G. N. (1973) 'The slave trade and African society', *THSG*, 14, 2, pp. 187–212.

Vail, H. L. (1972) 'Suggestions towards a reinterpreted Tumbuka history', in B. Pachai (ed.),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wi* (Evanston: NUP).
Vail, H. L. (1977) 'Ecology and history: the example of Eastern Zambia', *JSAS*, 2, pp. 129–55.
Valensi, L. (1969a) *Le Maghreb avant la prise d'Alger 1790–1830* (Paris: Flammarion).
Valensi, L. (1969b) 'Islam et capitalisme: production et commerce des chéchias en Tunisie et en France aux 18e et 19e siècl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7, pp. 376–400.
Valensi, L. (1977) *Fellahs tunisiens. L'é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aux 18e et 19e siècles* (Paris & The Hague: Mouton).
Valensi, L. (1978) 'Pays avancés et pays dominés', in L. Bergeron (ed.),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 1840* (Paris).
Valentia, G. (1809) *Voyages and Travels to India, Ceylon, the Red Sea, Abyssinia and Egypt* (London: W. Miller).
Valette, J. (1960) *L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de Madagascar au XIXème siècle* (Tananarive: Imprimerie officielle).
Valette, J. (1962) *Etude sur le règne de Radama I* (Tananarive: Imprimerie nationale).
Valette, J. (1971) 'Madagascar', in H. Deschamps (ed.), *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Vol. 2 (Paris).
Van Jaarsveld, F. A. (1961) *The Awakening of Afrikaner Nationalism 1868–1881* (Cape Town: Human & Rousseau).
Van Jaarsveld, F. A. (1975) *From Van Riebeeck to Vorster 1652–194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Perskor).
Van Warmelo, J. J. (1935)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Bantu Tribes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Government Printer).
Vansina, J. (1966)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ansina, J. (1973) *The Tio Kingdom of the Middle Congo, 1880–1892* (London: OUP).
Vansina, J. (1978) 'Finding food and the history of pre-colonial Equatorial Africa',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7, pp. 9–19.
Vatin, J. C. (1974) *L'Algérie politique. Histoire et société* (Paris: A. Colin).
Vellez Caroço, J. (1948) *Monjur, o Gabú e a sua história* (Bissau: Centro de Estudos de Guiné Portuguesa).

Vellut, J.-L. (1972) 'Notes sur le Lunda et la frontière luso-africaine (1700–1900)', *Etudes d'Histoire Africaine*, 3, pp. 61–166.
Vellut, J.-L. (1975) 'Le royaume de Cassange et les réseaux luso-africains (*ca.* 1750–1810)', *CAE*, 15, 1, pp. 117–36.
Verbeken, A. (1956) *Msiri, roi de Garenganze l'homme rouge du Katanga* (Brussels).
Verger, P. (1955) 'Yoruba influences in Brazil', *Odu*, I, 3.
Verger, P. (1968) *Flux et reflux de la traite des nègres entre le golfe de Bénin et Bahia de Todos los Santos, du XVIIe au XIXe siècle* (Paris: Mouton).
Verger, P. (1976)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ight of Benin and Bahia*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Vila Vilar, E. (1973) 'Los asientos portuguesos y el contrabando de negros', *Anuario de Estudios Americanos*, 30, pp. 557–9.
Vila Vilar, E. (1977) 'The large-scale introduction of Africans into Vera Cruz and Cartagena', in V. Rubin and A. Tuden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lavery in New World Plantation Societies*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pp. 267–80.
Villari, L. (1938) 'I "gulti" della regions di Axum', *Rassegna Economica dell' Africa Italiana*, 26.
Villiers, P. (1982) *Traite des noirs et navires négrier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Seigneurs).
Vis, H. L., Yourassowsky, C. and van der Borght, H. (1975) *A Nutritional Survey in the Republic of Rwanda*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Voll, J. O. (1969) 'A history of the Khatmiyyah tariqa',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Wagner, R. (1980) 'Zoutpansberg: the dynamics of a hunting frontier, 1848–67', in S. Marks and A. Atmore (eds), pp. 313–49.
Wahidah, A. F. S. (1950) *Fi usul as-mas'alah al-Misriyyah* (Cairo: Matba' at Misr).
Waïgalo, N. (1977) Le Maçina de 1853 à 1896 (dissertation, Bamako).
Waldmeier, T. (1886)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ophilus Waldmeier* (London: Partridge).
Walker, E. A. (1957) *A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3rd edn, London: Longmans, Green).
Wallace, D. M. (1883) *Egypt and the Egyptian Question* (London: Macmillan).
Wallerstein, I. (1970) 'The colonial era in Africa: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pp. 399–421.
Wallerstein, I. (1973) 'Africa in a capitalist world', *Issues*, 3, 3, pp. 1–11.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allerstein, I. (1976) 'The three stages of Af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economy', in P. C. W. Gutkind and I. Wallerstei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Africa* (Beverly Hills: Sage), pp. 30–57.
Wallerstein, I. (1980)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2,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astell, R. E. P. (1944)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in relation to Madagascar, 1810–1896'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Webb, C. de B. (1981) 'The origins of the war: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in A. Duminy and C. Ballard (eds), pp. 1–12.
Weld, H. B. (1922) *The Royal Chronicle of Abyssinia* (Cambridge: CUP).
Were, G. S. (1967) *A History of the Abaluyia of Western Kenya c. 1500–1930* (Nairobi: EAPH).
Were, G. S. (1968) 'The Western Bantu peoples from AD 1300 to 1800', in B. A. Ogot and J. A. Kieran (eds), pp. 177–97.
Wheeler, D. L. (1964) 'A note on smallpox in Angola, 1670–1875', *Studia*, 13–14, pp. 351–62.
Wheeler, D. L. (1968) 'Gungunhana', in N. R. Bennett (ed.) *Leadership in Eastern Africa*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Wheeler, D. L. (1972) 'The first Portuguese colonial movement, 1835–1875', *Iberian Studies*, 1, 1, pp. 25–7.
Wheeler, D. L. and Pélissier, R. (1971) *Angola* (New York: Praeger).
Wilburn, W. (1813) *Oriental Commerce* (London).
Wilkins, K. St. C. (1870) *Reconnoitring in Abyssinia* (London).
Wilks, I. (1975)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Cambridge: CUP).
Williams, E. (1944) *Capitalism and Slavery* (London: Deutsch).
Willis, J. R. (1967) 'Jihād fī sabīl Allāh – its doctrinal basis in Islam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West Africa', *JAH*, 8, 3, pp. 395–415.
Willis, J. R. (1970) ''Al-Hājj 'Umar Sa'id al-Fūtī al-Tūrī (*c.* 1794–1864) and the doctrinal basis of his Islamic reformist movement in the Western Suda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Willis, J. R. (1978) 'The Torodbe clerisy: a social view', *JAH*, 19, 2, pp. 195–212.
Willis, J. R. (ed.) (1979a) *Studies in West African Islamic History: The Cultivators of Islam* (London: Cass).
Willis, J. R. (1979b)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the diffusion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in J. R. Willis (ed.) (1979a), pp. 1–39.
Willis, J. R. (1979c) 'The writings of al-Ḥājj 'Umar al-Fūtī and Shaykh Mukhtār b. Wadī' at Allāh. literary themes, sources and influences', in J. R. Willis (ed.) (1979a), pp. 177–210.
Willis, J. R. (forthcoming) *The Umarian Jama'a*.
Wills, A. J. (1964)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London: OUP).
Wills, A. J. (196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2nd edn, London: OUP).
Wilson, A. (1972) 'Long-distance trade and the Luba Lomani empire', *JAH*, 13, 4, pp. 575–89.
Wilson, M. (1958)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ranskei and Ciskei', *African Studies*, 18, 4.
Wilson, M. (1969a) 'The Sotho, Venda, and Tsonga',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131–82.
Wilson, M. (1969b)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the Eastern Cape Frontier',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233–71.
Wilson, M. (1971) 'The growth of peasant communities',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pp. 49–103.
Wilson, M. and Thompson, L. (eds) (1969)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1: South Africa to 18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ilson, M. and Thompson, L. (eds) (1971)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2: South Africa 1870–196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instedt, R. (1958) *The Malays, a Cultural History* (5th ed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Withers-Gill, J. (1924) *The Moshi Tribe*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Wolf, E. (1959) *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ylde, A. B. (1901) *Modern Abyssinia* (London: Methuen).
Wylie, K. C. (1970–1) 'Notes on Kailundu's campaign into Liberia in 1889', *Liberian Studies Journal*, 3, 2, pp. 167–72.
Wylie, K. C. (1977) *The Political Kingdom of the Temne. Temne Government in Sierra Leone, 1825–1910*,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Ylvisaker, M. (1975)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of the Lamu archipelago to the adjacent Kenya co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Ylvisaker, M. (1983) *Lamu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nd, Trade and Politics*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Yoder, J. C. (1974) 'Fly and elephant parti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Dahomey, 1840–1870', *JAH*, 15, 3, pp. 417–32.
Yule, H. and Burnell, A. C. (1886) *Hobson-Jobson: being a glossary of Anglo-Indian colloquial words and phrases* (London: John Murray).

Zebadia, A. (1974) 'The career and correspondence of Ahmed al-Bakkāy of Tombuctu: an historical study of hi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ole from 1847 to 1866'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el-Zein, A. (1974) *Sacred Meadows: Structural Analysis of Religious Symbolism in an East African Town* (Evanston: NUP).
Zewde Gabre-Sellassie (1975) *Yohannes IV of Ethiop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Ziadeh, N. (1958) *Sanūsīyah: A Study of a Revivalist Movement in Islam* (Leiden: Brill).

索　引

说明：

1. 页码带“n”者指脚注有详细说明。

2. 词条中的小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强调年代者除外。

3. 地图中的地名未标页码。

译者注：原书索引中的某些词条与正文的拼写不符，有些因无法核实，故保留原样，望读者见谅。